

The Wealth of Nations

强国富民的西方经济学“圣经”

国富论



[英] 亚当·斯密 原著

(全译典藏图本)

胡长明 译

人民出版

亞當斯密：國富論序論及全書設計

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

這類產物或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對消費者人數，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國國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情況的好壞，視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無論就哪一國國民說，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究成什麼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麪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於這兩種情況。

此外，上述供給的好壞，取決於前一情況的，似乎較多。在未開化的漁獵民族間，一切能夠勞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從事有用勞動，儘可能以各種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他自己和家內族內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漁獵的人。不過，他們是那麼貧乏，以致往往僅因為貧乏的緣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覺得迫不得已，要殺害老幼以及長期患病的親人；或遺棄這些人，聽其餓死或被野獸吞食。反之，在文明繁榮的民族間，雖有許多人全然不從事勞動，而且他們所消費的勞動生產物，往往比大多數勞動者所消費的要多過十倍乃至百倍。但由於社會全部勞動生產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給，就連最下等最貧窮的勞動者，只要勤勉節儉，也比野蠻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勞動生產力的這種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勞動的生產物，按照什麼順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給社會上各階級？這就是本書第一篇的主題。

不論一國國民在運用勞動時，實際上究竟是怎樣熟練，怎樣有技巧，怎樣有判斷力，在運用情況繼續不變的期間，一國國民每年供給狀況的好壞，總必取決於其國民每年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究竟成什麼比例。我以後要說明，有用的生產性勞

動者人數，無論在什麼場合，都和推動勞動的資本量的大小及資本用途成比例。所以本書第二篇，討論資本的性質，逐漸累積資本的方法，只及因為資本用途不同，所推動的勞動量亦不相同這幾點。

在勞動運用上已有相當程度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的不同國民，對於勞動的一般管理或指導，曾採取極不相同的計劃。這些計劃，並不同等地有利於一國生產物的增加。有些國家的政策，特別鼓勵農村的產業；另一些國家的政策，卻特別鼓勵城市的產業。對於各種產業，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發展的國家，怕還沒有。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的政策，都比較不利於農村的產業，即農業，而比較有利於城市的產業，即工藝、製造業和商業。本書第三篇將說明，什麼情況使人們採用和規定這種政策。

這些計劃的實行，最初也許是起因於特殊階級的利益與偏見，對於這些計劃將如何影響社會全體的福利，他們不曾具有遠見，亦不曾加以考慮。可是，這些計劃卻引起了極不相同的經濟學說。有的人認為城市產業重要；有的人又力說農村產業重要。這些不相同的學說，不僅對學者們的意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君王和國家的政策亦為它們所左右。我將盡我所能，在本書第四篇詳細明確地解釋這些不同學說，並說明它們在各時代和各國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要之，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於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並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麼性質。第五篇即最後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在這一篇裏，我要努力說明以下各點：第一，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些部分應該出自由全社會負擔的賦稅，哪些部分應該出自社會某特殊階級或成員負擔的特殊賦稅。第二，來自全社會所有納稅人的經費是怎樣募集的，而各種募集方法大抵有什麼利弊。第三，什麼使幾乎所有近代各國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為擔保來舉債，而這種債務，對於真實財富，換言之，對於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什麼影響。

第一章論分工

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

爲使讀者易於理解社會一般業務分工所產生的結果，我現在來討論個別製造業分工狀況。一般人認爲，分工最完全的製造業，乃是一些極不重要的製造業。不重要製造業的分工，實際上並不比重要製造業的分工更爲周密。但是，目的在於供給少數人小量需要的不重要製造業，所僱用的勞動者人數，必然不多，而從事各部門工作的工人，往往可集合在同一工廠內，使觀察者能一覽無遺。反之，那些大製造業，要供給大多數人的大量需要，所以，各工作部門都僱有許許多多勞動者，要把這許許多多勞動者集合在一個廠內，勢不可能。我們要同時看見一個部門以上的工人，也不可能。象這種大製造業的工作，儘管實際上比小製造業分成多得多的部分，但因爲這種劃分不能象小製造業的劃分那麼明顯，所以很少人注意到。

釦針製造業是極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喚起人們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來作爲例子。一個勞動者，如果對於這職業（分工的結果，使釦針的製造成爲一種專門職業）沒有受過相當訓練，又不知怎樣使用這職業上的機械（使這種機械有發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結果），那末縱使竭力工作，也許一天也製造不出一枚釦針，要做二十枚，當然是決不可能了。但按照現在經營的方法，不但這種作業全部已經成爲專門職業，而且這種職業分成若干部門，其中有大多數也同樣成爲專門職業。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同的操作。裝圓頭，塗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職業。這樣，釦針的製造分爲十八種操作。有些工廠，這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固然，有時一人也兼任二三門。我見過一個這種小工廠，只僱用十個工人，因此在這一個工廠中，有幾個工人擔任二三種操作。象這樣一個小工廠的工人，雖很窮困，他們的必要機械設備，雖很簡陋，但他們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針十二磅。從每磅中等針有四千枚計，這十個工人每日就可成針四萬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四千八百枚。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末，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二十枚針，

說不定一天連一枚針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製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製造不出來。

就其他各種工藝及製造業說，雖有許多不能作這樣細密的分工，共操作也不能變得這樣簡單，但分工的效果總是一樣的。凡能採用分工制的工藝，一經採用分工制，便相應地增進勞動的生產力。各種行業之所以各各分立，似乎也是由於分工有這種好處。一個國家的產業與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程度如果是極高的，則其各種行業的分工一般也都達到極高的程度。未開化社會中一人獨任的工作，在進步的社會中，一般都成為幾個人分任的工作。在進步的社會中，農民一般只是農民，製造者只是製造者。而且，生產一種完全製造品所必要的勞動，也往往分由許多勞動者擔任。試以麻織業和毛織業為例，從亞麻及羊毛的生產到麻布的漂白和燙平或呢絨的染色和最後一道加工，各部門所使用的不同技藝是那麼多啊！農業由於它的性質，不能有象製造業那樣細密的分工，各種工作，不能象製造業那樣判然分立。木匠的職業與鐵匠的職業，通常是截然分開的，但畜牧者的業務與種稻者的業務，不能象前者那樣完全分開。紡工和織工，幾乎都是各別的兩個人，但鋤耕、耙掘、播種和收割，卻常由一人兼任。農業上種種勞動，隨季節推移而巡迴，要指定一個人只從事一種勞動，事實上絕不可能。所以，農業上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跟不上製造業上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採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現在最富裕的國家，固然在農業和製造業上都優於鄰國，但製造業方面的優越程度，必定大於農業方面的優越程度。富國的土地，一般都耕耘得較好，投在土地上的勞動與費用也比較多，生產出來的產品按照土地面積與肥沃的比例來說也較多；但是，這樣較大的生產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過所花的較大勞動量和費用。在農業方面，富國勞動生產力未必都比貧國勞動生產力大得多，至少不象製造業方面一般情況那樣大得多。所以，如果品質同樣優良，富國小麥在市場上的售價，未必都比貧國低廉。就富裕和進步的程度說，法國遠勝于波蘭，但波蘭小麥的價格，與品質同樣優良的法國小麥同樣低廉。與英格蘭比較，論富裕，論進步，法國可能要遜一籌，但法國產麥省出產的小麥，其品質之優良完全和英格蘭小麥相同，而且在大多數年頭，兩者的價格也大致相同。可是，英格蘭的麥田耕種得比法國好，而法國的

麥田，據說耕種得比波蘭好得多。貧國的耕作，儘管不及富國，但貧國生產的小麥，在品質優良及售價低廉方面，卻能在相當程度上與富國競爭。但是，貧國在製造業上不能和富國競爭；至少在富國土壤氣候位置適宜於這類製造業的場合，貧國不能和富國競爭。法國綢所以比英國綢又好又便宜，就是因為織綢業，至少在今日原絲進口稅很高的條件下，更適合於法國氣候，而不十分適合於英國氣候。但英國的鐵器和粗毛織物，卻遠勝於法國，而且品質同樣優良的英國貨品，在價格上比法國低廉得多。據說，波蘭除了少數立國所需的粗糙家庭製造業外，幾乎沒有什麼製造業。

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

第一，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增進，勢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實施的結果，各勞動者的業務，既然終生侷限於一種單純操作，當然能夠大大增進自己的熟練程度。慣於使用鐵錘而不曾練習制鐵釘的普通鐵匠，一旦因特殊事故，必須制釘時，我敢說，他一天至多隻能做出二三百枚針來，而且質量還拙劣不堪。即使慣於制釘，但若不以制釘為主業或專業，就是竭力工作，也不會一天製造出八百枚或一千枚以上。我看見過幾個專以制釘為業的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在盡力工作時，每人每日能製造二千三百多枚。可是，制釘決不是最簡單的操作。同一勞動者，要鼓爐、調整火力，要燒鐵揮錘打製，在打製釘頭時還得調換工具。比較起來，制釘針和制金屬鈕釦所需的各項操作要簡單得多，而以此為終生業務的人，其熟練程度通常也高得多。所以，在此等製造業中，有幾種操作的迅速程度簡直使人難於想象，如果你不曾親眼見過，你決不會相信人的手能有這樣大的本領。

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常要損失一些時間，因節省這種時間而得到的利益，比我們驟看到時所想象的大得多。不可能很快地從一種工作轉到使用完全不相同工具而且在不同地方進行的另一種工作。耕作小農地的鄉村織工，由織機轉到耕地，又由耕地轉到織機，一定要虛費許多時間。誠然，這兩種技藝，如果能在同一廠坊內

進行，那末時間上的損失，無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如此，損失還是很大。人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時，通常要閒逛一會兒。在開始新工作之初，勢難立即精神貫注地積極工作，總不免心不在焉。而且在相當時間內，與其說他是在工作，倒不如說他是在開玩笑。閒蕩、偷懶、隨便這種習慣，對於每半小時要換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幾乎每天必須從事二十項不同工作的農村勞動者，可說是自然會養成的，甚而可說必然會養成的。這種習慣，使農村勞動者常流於遲緩懶惰，即在非常吃緊的時候，也不會精神勃勃地幹。所以，縱使沒有技巧方面的缺陷，僅僅這些習慣也一定會大大減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利用適當的機械能在什麼程度上簡化勞動和節省勞動，這必定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舉例。我在這裏所要說的只是：簡化勞動和節省勞動的那些機械的發明，看來也是起因於分工。人類把注意力集中在單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許多種事物上，更能發現達到目標的更簡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結果，各個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會傾注在一種簡單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質上還有改良的餘地，各個勞動部門所僱的勞動者中，不久自會有人發現一些比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來完成他們各自的工作。唯其如此，用在今日分工最細密的各種製造業上的機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發明。他們從事於最單純的操作，當然會發明比較便易的操作方法。不論是誰，只要他常去觀察製造廠，他一定會看到極象樣的機械，這些機械是普通工人爲了要使他們擔當的那部分工作容易迅速地完成而發明出來的。最初的蒸汽機，原需僱用一個兒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斷開閉汽鍋與汽筒間的通路。有一次擔任這工作的某兒童，因爲愛和朋友遊玩，他用一條繩把開閉通路的舌門的把手，系在機械的另一部分，舌門就可不需人力自行開閉。原爲貪玩想出來的方法，就這樣成爲蒸汽機大改良之一。

可是，一切機械的改良，決不是至由機械使用者發明。有許多改良，是出自專門機械製造師的智巧；還有一些改良，是出自哲學家或思想家的智能。哲學家或思想家的任務，不在於製造任何實物，而在於觀察一切事物，所以他們常常能夠結合利用各種完全沒有關係而且極不類似的物力。隨着社會的進步，哲學或推想也象其他各種職業那

樣，成爲某一特定階級人民的主要業務和專門工作。一此外，這種業務或工作，也象其他職業那樣，分成了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又各成爲一種哲學家的行業。哲學上這種分工，象產業上的分工那樣，增進了技巧，並節省了時間。各人擅長各人的特殊工們不但增加全體的成就，而且大大增進科學的內容。

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裏，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各勞動者，除自身所需數的以外，還有大量產物可以出賣；同時，因爲一切其他勞動者的處境相同，各個人都能以自身生產的大量產物，換得其他勞動者生產的大量產物，換言之，都能換得其他勞動者大量產物的價格。別人所需的物品，他能與以充分供給；他自身所需的，別人亦能與以充分供給。於是，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榮的國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罷；你就會看到，用他的勞動的一部分（雖然只是一小部分）來生產這種日用品的人的數目，是難以數計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級上衣，就是許多勞動者聯合勞動的產物。爲完成這種樸素的產物，勢須有牧羊者、揀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紡工、織工、漂白工、裁縫工，以及其他許多人，聯合起來工作。加之，這些勞動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遠，把材料由甲地運至乙地，該需要多少商人和運輸者啊！染工所用藥料，常須購自世界上各個遙遠的地方，要把各種藥料由各個不同地方收集起來，該需要多少商業和航運業，該需要僱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製造者和繩索製造者啊！爲生產這些最普通勞動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種類的勞動啊！複雜機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車或織工用的織機，姑置不論，單就簡單器械如牧羊者剪毛時所用的剪刀來說，其製造就須經過許多種類的勞動。爲了生產這極簡單的剪刀，礦工、熔鐵爐建造者、木材採伐者、熔鐵廠燒炭工人、制磚者、泥水匠、在熔鐵爐旁服務的工人、機械安裝工人、鐵匠等等，必須把他們各種各樣的技藝聯結起來。同樣，要是我們考察一個勞動者的服裝和家庭用具，如貼身穿的粗麻襯衣，腳上穿的鞋子，就寢用的牀鋪和牀鋪上各種裝置，調製食物的爐子，由地下采掘出來而且也許需要經過水陸運輸才能送到他手邊供他燒飯的煤炭，廚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食桌上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

物和分取食物的陶製和錫蠟制器皿，製造麪包和麥酒供他食喝的各種工人，那種透得熱氣和光線並能遮蔽風雨的玻璃窗，和使世界北部成為極舒適的居住地的大發明所必須藉助的一切知識和技術，只及工人製造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種器具等等。總之，我們如果考察這一切東西，並考慮到投在這每樣東西上的各種勞動，我們就會覺得，沒有成千上萬的人的幫助和合作，一個文明國家裏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這是我們很錯誤地想象的）他一般適應的舒服簡單的方式也不能夠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給的。

第二章論分工的原由

引出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儘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並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它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漸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

述種傾向，是不是一種不能進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是理性和言語能力的必然結果，這不屬於我們現在研究的範圍。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在其他各種動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種動物，似乎都不知道這種或其他任何一種協約。兩隻獵犬同逐一兔，有時也象是一種協同動作。它們把兔逐向對手的方向，或在對手把兔逐到它那邊時，加以攔截。不過。這種協同動作，只是在某一特定時刻，它們的慾望對於同一對象的偶然的一致，而並不是契約的結果。我們從未見過甲乙兩犬公平審慎地交換骨頭。也從未見過一種動物，以姿勢或自然呼聲，向其他動物示意說：這為我有，那為你有，我願意以此易彼。一個動物，如果想由一個人或其他動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與者的歡心外，不能有別種說服手段。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獻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種種嬌態，來喚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們人類，對於同胞，有時也採取這種手段。如果他沒有別的適當方法，叫同胞滿足他的意願，他會以種種卑劣阿諛的行為，博取對方的厚意。不過這種辦法，只能偶一為之，想應用到一切場合，卻為時間所不許。一個人盡畢生之力，亦難博得幾個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會中，隨時有取得多數人的協作和援助的必要。別的動物，一達到壯年期，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的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作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

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社會上，除乞丐外，沒有一個人願意全然靠別人的恩惠過活。而且，就連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賴別人。誠然，乞丐生活資料的供給，至部出自善人的慈悲。雖然這種道義歸根到底給乞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但沒有，也不可能，隨時隨刻給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東西。他的大部分臨時需要和其他人一樣，也是通過契約、交換和買賣而得到供給的。他把一個人給他的金錢，拿去購買食物，把另一個人給他的舊衣，拿去交換更合身的舊衣，或交換一些食料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舊衣換成貨幣，再用貨幣購買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

由於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通過契約、交換和買賣取得的，所以當初產生分工的也正是人類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例如，在狩獵或游牧民族中，有個善於製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製成的弓矢，與他人交換家畜或獸肉，結果他發覺，與其親自到野外捕獵，倒不如與獵人交換，因為交換所得卻比較多。為他自身的利益打算，他只好以製造弓矢為主要業務，於是他便成為一種武器製造者。另有一個人，因長於建造小茅房或移動房屋的框架和屋頂，往往被人請去造屋，得家畜獸肉為酬，於是他終於發覺，完全獻身於這一工作對自己有利，因而就成為一個房屋建築者。同樣，第三個人成為鐵匠或銅匠，第四個人成為硝皮者或製革者，皮革是未開他人類的主要衣料。這樣一來，人人都一定能夠把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換得自己所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這就鼓勵大家各自委身於一種特定業務，使他們在各自的業務上，磨鍊和發揮各自的天賦資質或才能。

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並不象我們所成覺的那麼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例如，兩個性格極不相同的人，一個是哲學家，一個是街上的挑夫。他們間的差異，看來是起因於習慣、風俗與教育，而不是起因於天性。他們生下來，在七八歲以前，彼此的天性極相類似，他們的雙親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們兩者間看出任何顯著的差別。大約在這個年齡，或者此後不久，他們就從事於極不相同的職業，於是他們才能的差異，漸漸可以看得出來，往後逐漸增大，結果，哲學家為虛榮心所驅使，簡直不肯承認他

們之間有一點類似的地方。然而，人類如果沒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的傾向，各個人都須親自生產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務和工作全無分別，那末工作差異所產生的才能的巨大差異，就不可能存在了。

使各種職業家的才能形成極顯著的差異的，是交換的傾向；使這種差異成為有用的也是這個傾向。許多同種但不同屬的動物，得自天性的天資上的差異，比人類在未受教育和未受習俗薰陶以前得自自然的資質上的差別大得多。就天賦資質說，哲學家與街上挑夫的差異，此猛犬與獵狗的差異，比獵狗與長耳狗的差異，比長耳狗與牧畜家犬的差異，少得多。但是，這些同種但不同屬的動物，並沒有相互利用的機會。猛犬的強力，決不能輔以獵狗的敏速，輔以長耳狗的智巧，或輔以牧畜家犬的柔順。它們因為沒有交換交易的能力和傾向，所以，不能把這種種不同的資質才能，結成一個共同的資源，因而，對於同種的幸福和便利，不能有所增進。各動物現在和從前都須各自分立，各自保衛。自然給了它們各種各樣的才能，而它們卻不能以此得到何種利益。人類的情況，就完全兩樣了。他們彼此間，那怕是極不類似的才能也能交相為用。他們依着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傾向，好象把各種才能所生產的各種不同產物，結成一個共同的資源，各個人都可以這個資源隨意購取自己需要的別人生產的物品。

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

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因為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

有些業務，那怕是最普通的業務，也只能在大都市經營。例如搬運工人，就只能在大都市生活。小村落固不待言；即普通墟市，亦嫌過小，不能給他以不斷的工作。散佈在荒涼的蘇格蘭高地一帶的人跡稀少的小鄉村的農夫，不論是誰，也不能不為自己的家屬兼充屠戶、烙面師乃至釀酒人。在那種地方，要在二十哩內找到二個鐵匠、木匠或泥水匠，也不容易。離這班工匠至少有八九哩之遙的零星散居人家，只好親自動手作許多小事情；在人口衆多的地方，那些小事情一定會僱請專業工人幫忙。農村工人幾乎到處都是一個人兼營幾種性質很類似因而使用同一材料的行業。農村木匠要製造一切木製的物品；農村鐵匠要製作一切鐵製的物品。農村木匠不僅是木匠，同時又是細工木匠，傢俱師、雕刻師、車輪製造者、耕犁製造者，乃至二輪四輪運貨車製造者。木匠的工作如此繁雜，鐵匠的工作還更繁雜。在蘇格蘭高地那樣僻遠內地，無論如何，總維持不了一個專門造鐵釘的工人。因為他即使一日只能制釘一千枚，一年只勞動三百日，也每年能制釘三十萬枚。但在那裏，一年也銷不了他一日的製造額，就是說銷不了一千枚。

水運開拓了比陸運所開拓的廣大得多的市場，所以從來各種產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開始於沿海沿河一帶。這種改良往往經過許久以後才慢慢普及到內地。現在，以御者二人馬八匹，駕廣輻四輪運貨車一輛，載重約四噸貨物，往返倫敦和愛丁堡間，計需六星期日程。然而，由六人或八人駕駛船一艘，載重二百噸貨物，往返倫敦和利斯間，也只需同樣日程。所以需一百人，四百匹馬和五十輛四輪運貨車搬運的貨物，可借水運之便，由六人或八人搬運。而且，把二百噸貨物由倫敦運往愛丁堡，依最低陸運費計算，亦需負擔一百人三個星期的生活費和四百匹馬五十輛四輪運貨車的維持費，以及和維持費幾乎相等的消耗。若由水運，所應負擔的，充其量也不過是六人至八

人的生活費，載重二百噸貨船的消耗費，和較大的保險費，即水運保險費與陸運保險費之間的差額。所以，假若在這兩都市間，除陸運外，沒有其他交通方法，那末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價格很高的貨物而外，便沒有什麼商品能由一地運至另一地了。這樣，兩地間的商業，就只有現今的一小部分，而這兩地相互間對產業發展提供的刺激，也只有現今的一小部分。假使世界上只有陸運，則各僻遠地區間的商業，一定會無法進行。有什麼貨物，負擔得起由倫敦至加爾各答的陸上運費呢，即使有這種貨物，又有什麼輸送方法能使貨物安然通過介在兩地間的許多野蠻民族的領土呢，然而，現今這兩個都市，相互進行大規模的貿易，相互提供市場，並對彼此的產業發展，相互給與很大的鼓勵。

由於水運有這麼大的便利，所以工藝和產業的改良，都自然發初在水運便利的地方。這種改良總要隔許久以後才能普及到內地。由於與河海隔離，內地在長期間內，只能在鄰近地方，而不能在其他地方，銷售其大部分生產物。所以，它的貨品銷量，在長時間內，必定和鄰近地方的財富與人口成比例。結果，它的改良進步總落在鄰近地方的後面。我國殖民北美所開發的大種植園，都沿着海岸和河岸，很少擴展到離此很遠的地區。

根據最可靠的歷史記載，開化最早的乃是地中海沿岸各國。地中海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內海，沒有潮汐，因而除風起浪湧外，也沒有可怕的波濤。地中海，由於海面平滑，島嶼棋佈，離岸很近，在羅盤針尚未發明，造船術尚不完全，人都不願遠離海岸，而視狂瀾怒濤為畏途的時候，對於初期航海最為適宜。在古代，駛過世界的盡頭，換言之，駛過直布羅陀海峽西航，在航海上久被視為最危險最可驚的企圖。就連當時以造船航海事業著名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過了許久纔敢於嘗試。而且，在他們嘗試過了很久以後，別國人民纔敢問津。

在地中海沿岸各國中，農業或製造業發達最早改良最大的，要首推埃及。上埃及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羅河兩岸數哩內。在下埃及，尼羅河分成無數支流，大大小小，分佈全境；這些支流，只要略施人工，就不但可在境內各大都市間，而且在各重要村落間，甚至在村野各農家間，提供水上交通的便利。這種便利，與今日荷蘭境內的萊茵

河和麥斯河，幾乎全然一樣。內陸航行，如此廣泛，如此便易，無怪埃及進步得那麼早。

東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國東部的幾個省，似乎也在極早的時候期已有農業和製造業上的改良，雖然關於這種往古事蹟的真相，我歐洲有權威的歷史家尚未能予以確證。印度的恆河及其他大河，都分出許多可通航的支流，與埃及的尼羅河無異。中國東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擴大了內地航行的範圍。這種航行範圍的廣闊，不但非尼羅河或恆河所可比擬，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塵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國人，都不獎勵外國貿易。他們的財富似乎全然得自內陸的航行。

非洲內地，黑海和裏海以北極遠的亞洲地方，古代的塞西亞，即今日的韃靼和西伯利亞，似乎一向都處於野蠻未開化狀態。韃靼海是不能通航的冰洋，雖有若干世界著名大河流過韃靼，但因彼此距離太遠，大部分地區不利於商業和交通。在歐洲，有波羅的海與亞得里亞海；在歐亞兩大陸間，有地中海與黑海；在亞洲，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瓜及退羅諸海灣。但在非洲，卻是一個大內海也沒有，境內諸大河又相隔太遠，因此不能有較大規模的內地航行。此外，一國境內，縱有大河流貫其間，但若毫無支流，其下游又須流經他國國境始注於海，這國也就仍然不能有大規模的商業，因為上游國能否與海洋交通，隨時都要受下游國的支配，就巴伐利亞、奧地利和匈牙利各國說，多瑙河的效用極為有限，但若此河到黑海的全部航權，竟為三國中任何一國所獨有，效用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第四章論貨幣的起源及其效用

分工一經完全確立，一個人自己勞動的生產物，便只能滿足自己慾望的極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慾望，須用自己消費不了的剩餘勞動生產物，交換自己所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餘部分來滿足。於是，一切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商業社會。

但在剛開始分工的時候，這種交換力的作用，往往極不靈敏。假設甲持有某種商品，自己消費不了，而乙所持有的這種物品，卻不夠自己消費。這時，甲當然樂於出賣，乙當然樂於購買甲手中剩餘物品的一部分，但若乙手中，並未持有甲目下希求的物品，他們兩者間的交易，仍然不能實現。比如，屠戶把自己消費不了的肉，放在店內，釀酒家和烙面師，固然都願意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一份，但這時，假設他們除了各自的製造品外，沒有別種可供交易的物品，而屠戶現時需要的麥酒和麪包，已經得到了供給，那末，他們彼此之間，沒有進行交易的可能。屠戶不能作釀酒家和烙面師的商人，而釀酒家和烙面師也不能作屠戶的顧客。這樣，他們就不能互相幫助。然而，自分工確立以來，各時代各社會中，有思慮的人，為了避免這種不便，除自己勞動生產物外，隨時身邊帶有一定數量的某種物品，這種物品，在他想來，拿去和任何人的生產物交換，都不會見拒絕。

為這目的而被人們先後想到並用過的物品可有種種。未開化社會，據說曾以牲畜作為商業上的通用媒介。牲畜無疑是極不便的媒介，但我們卻發現了，古代往往以牲畜頭數作為交換的評價標準，亦即用牲畜交換各種物品。荷馬曾說：迪奧米德的鎧甲，僅值牛九頭，而格羅卡斯的鎧甲，卻值牛一百頭。據說，阿比西尼亞以鹽為商業變換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種貝殼為媒介；弗吉尼亞用菸草；紐芬蘭用乾魚丁；我國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國家則用獸皮或鞣皮。據我所聞，直到今日，蘇格蘭還有個鄉村，用鐵釘作媒介，購買麥酒和麪包。

然而，不論在任何國家，由於種種不可抗拒的理由，人們似乎都終於決定使用金屬而不使用其他貨物作為媒介。金屬不易磨損。那與任何其他貨物比較，都無愧色。而且，它不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

還能任意分割，而全無損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這性質卻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沒有。金屬的這一特性，使金屬成為商業流通上適宜的媒介。例如，假設除了牲畜，就沒有別種物品可以換鹽，想購買食鹽的人，一次所購價值，勢必相當於整頭牛或整頭羊，他所購買的價值，不能低於這個限度，因為他用以購買食鹽的物品，不能分割，分割了，就不能復原。如果他想購買更多的食鹽，亦只有依同一理由，以牛或羊二三頭，購入兩倍或三倍多的分量。反之，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屬，他的問題就容易解決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當分量的金屬，來購買價值相當的物品。

各國為此目的而使用的金屬，並不相同。古斯巴達人用鐵，古羅馬人用銅，而一切富裕商業國的國民卻使用金銀。最初用作交換媒介的金屬，似乎都是粗條，未加何種印記或鑄造。普林尼引古代歷史家蒂米阿斯的話說：直到瑟維阿斯·圖利阿斯時代為止，羅馬人還沒有鑄造的貨幣，他們購買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沒有刻印的銅條、換言之，這些粗條，就是當時當作貨幣使用的東西。

在這樣粗陋狀況下，金屬的使用，有兩種極大的不便。第一是稱量的麻煩；第二是化驗的麻煩。貴金屬在分量上有少許差異，在價值上便會有很大差別。但要正確稱量這類金屬，至少需備有極精密的法碼和天平。金的稱量，尤其是一種精細的操作。誠然，賤金屬稱量稍差，在價值上不會發生大的影響，因此，沒有仔細稱量的必要。但若一個窮人，買賣值一個銅板的貨物，也需每次稱量這一個銅板的重量，就不免令人覺得麻煩極了。化驗金屬的工作，卻更為困難，更為煩瑣。要不是把金屬的一部分放在坩堝裏，用適當的熔解藥熔解，檢驗的結果就很不可靠。在鑄幣制度尚未實施以前，除非通過這種又困難又煩瑣的檢驗，否則就很容易受到極大的欺騙。他們售賣貨物的所得，可能是表面上很象一磅純銀或純銅，而其中卻混有許多最粗劣最低賤的金屬。所以，進步國家，為避免此種弊害、便利交易、促進各種工商業發達起見，都認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購買貨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屬上，加蓋公印。於是就有了鑄幣制度和稱為造幣廠的官衙。這種制度的性質，類似麻布呢絨檢查官制度。這些檢查官的任務是，通過加蓋公印，確定這市上各種商品的分量，劃一它們的品質。

最初蓋在貨幣金屬上的公印，其目的似乎都在於確定，那必須確定而又最難確定的金屬的品質或純度。當時的刻印，與現今銀器皿和銀條上所刻的純度標記很相似。在金塊上刻印，但只附在金屬一面而不蓋住金屬全面的西班牙式標記，亦與此相似。它所確定的，只是金屬的純度，不是金屬的重量。傳載，亞伯拉罕秤銀四百舍克爾給伊弗倫，作為馬克派拉田地的代價。據說，舍克爾是當時商人流通的貨幣。可是，那時金屬貨幣的流通，和今日金塊銀條的授受一樣，都不論個數，只論重量。在古代，撒克遜人入主英格蘭，其歲人據說不是徵取貨幣，而是徵取實物，即各種食糧。以貨幣繳納的習慣，是征服王威廉第一創始的。不過，當時納入國庫的貨幣，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是按重量而不按個數計收的。

要稱量金屬而毫無差誤，是很麻煩和很困難的。這便引出了鑄幣制度。鑄幣的刻印，不僅蓋住金屬塊的兩面，有時還蓋住它的邊緣。這種刻印，不但要確定金屬的純度，還要確定它的重量。自是以後，鑄幣就象現在那樣，全以個數授受，沒有稱重量的麻煩了。

那些鑄幣的名稱，看來原要表明內含的重量或數量。羅馬鑄造貨幣，始於瑟維阿斯·圖利阿斯時代，當時羅馬幣阿斯（AS）或龐多（Pondo）含有純銅一羅馬磅。阿斯或龐多，象我們的特魯瓦磅那樣，分為十二盎斯，每盎斯含有純銅一盎斯。在愛德華一世時代，一英磅含有純銀一陶爾磅。一隅爾磅似比一羅馬磅多些，而比一特魯瓦磅少些。特魯瓦磅，到亨利八做第十八年，才由英國造幣廠採用。特魯瓦是法國東北部香檳省的一個城市，在那時候，歐洲各國人民時常出入它的市場，大家因此都熟悉並尊重這個有名市場所用的權衡。在查理曼大帝時代，法幣利佛（Livre）含純銀一特魯瓦磅。蘇格蘭幣一磅，自亞力山大一世至布魯斯時代止，都含有與英幣一鎊同重量同純度的銀一磅。英格蘭、法蘭西和蘇格蘭的貨幣一便士，最初都含有重一便士的銀，即一盎斯的二十分之一的銀，或一磅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的銀。先令最初似亦系重量名稱。亨利三世當時的法律規定：小麥一夸特值二十先令時，值一個銅板的上等小麥麪包，須重十二先令四便士。不過，先令對便士或先令對磅的比例，似乎不象便士對磅的比例那麼穩定。法國古時的蘇（Sou）或先令，有時含五便士，有時含十二便士，有時含二十乃至四十便士。在古代撒克遜人間，一先令在某

一個時期似只含五便士，其含量的變動，與其鄰國人即法蘭克人的先令大抵很類似。法國自查理曼大帝時代以來，英格蘭自征服王威廉第一時代以來，鎊、先令或便士的價值，雖有很大變動，但彼此間的比例，似和現今一樣，沒有多大變動。我相信，世界各國的君主，都是貪婪不公的。他們欺騙臣民，把貨幣最初所含金屬的真實分量，次第削減。在羅馬共和國後期，羅馬的阿斯，減到原價的二十四分之一，含量名爲一磅，實只半盎斯。英格蘭的鎊和便士，現今價值大約相當於當初的三分之一；蘇格蘭的鎊和便士，大約相當於當初的三十六分之一；法國的鎊和便士，大約相當於當初的五十六分之一。通過採用這些辦法，君王和國家就能以較小量的銀，表面上償還債務，並履行各種契約。實際上，政府的債權人因此被剝奪了一部分應得的權利。政府允許國內一切其他債務人，都有和君王相等的特權，他們同樣能以新的貶值幣，償還貨幣改鑄前借來的金額。所以，這種措施，常有利於債務人，而有損於債權人；有的時候，這種措施產生了比公共大災禍所能產生的大得多、普遍得多的個人財產上的革命。

但貨幣卻就在這情況下，成爲一切文明國商業上的通用媒介。通過這媒介，一切貨物都能進行買賣，都能相互交換。

我現在要討論人們在以貨幣交換貨物或只貨物交換貨物時所遵循的法則。這些法則決定所謂商品相對價值或交換價值。

應當注意，價值一詞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佔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金鋼鑽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

爲要探討支配商品交換價值的原則，我將努力闡明以下三點：

第一，什麼是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換言之，構成一切商品真實價格的，究竟是什麼，

第二，構成真實價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麼，

第三，什麼情況使上述價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時高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有時又低於其自然價格或普通價格？換言之，使商

品市場價格或實際價格，有時不能與其自然價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關於這三個問題，我將在以下三章內盡力作出詳細明瞭的說明。不過，有些地方象似冗贅，要請讀者忍耐；有些地方雖經我竭力作詳盡的說明，恐仍難免說得不夠清楚，要請讀者細心體會。我因要求十分明瞭，往往不憚煩瑣。但對一個極其抽象的問題，即使殫精竭慮，期其明瞭，恐仍難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第五章論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

或其勞動價格與貨幣價格

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麼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於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於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佔有某貨物，但不願自己消費，而願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於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對於已得此物但願用只交換他物的人來說，它的真正價值，等於因佔有它而能自己省免並轉加到別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煩。以貨幣或貨物購買物品，就是用勞動購買，正如我們用自己的勞動取得一樣。此等貨幣或貨物，使我們能夠免除相當的勞動。它們含有一定勞動量的價值，我們用以交換其他當時被認為有同量勞動價值的物品。勞動是第一性價格，是最初用以購買一切貨物的代價。世間一切財富，原來都是用勞動購買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所以，對於佔有財富並願用以交換一些新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於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

霍布斯說：財富就是權力。但獲得或承繼大宗財產的人，未必就獲得或承繼了民政上或軍政上的政治權力。他的財產，也許可以提供他一種獲得政權的手段，但單有財產未必就能給他政權。財產對他直接提供的權力，是購買力，是對於當時市場上各種勞動或各種勞動生產物的支配權。他的財產的大小與這種支配權的大小恰成比例，換言之，財產的大小，與他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勞動量或他人勞動生產物數量的大小恰成比例。一種物品的交換價值，必然恰等於這物品對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勞動支配權。

勞動雖是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一切商品的價值，通常不是按勞動估定的。要確定兩個不同的勞動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難。兩種不同工作所費去的時間，往往不是決定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們的不同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須加以考慮。一個鐘頭的困難工

作，比一個鐘頭的容易工作，也許包含有更多勞動量；需要十年學習的工作做一小時，比普通業務做一月所含勞動量也可能較多。但是，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的準確尺度不容易找到。誠然，在交換不同勞動的不同生產物時，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上述困難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進行這種交換時，不是按任何準確尺度來作調整，而是通過市場上議價來作大體上兩不相虧的調整。這雖不很準確，但對日常買賣也就夠了。

加之，商品多與商品交換，因而多與商品比較，商品少與勞動交換，因而少與勞動比較。所以，以一種商品所能購得的另一種商品量來估定其交換價值，比以這商品所能購得的勞動量來估定其交換價值，較為自然。而且，我們說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比說一定分量的勞動，也更容易使人理解。因為，前者是一個可以看得到和接觸得到的物體，後者卻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縱能使人充分理解，也不象具體物那樣明顯、那樣自然。

但是，在物物交換已經停止，貨幣已成為商業上一般媒介的時候，商品就多與貨幣交換，少與別種商品交換。屠戶需要麪包或麥酒，不是把牛肉或羊肉直接拿到麪包店或酒店去交換，卻是先把牛肉或羊肉拿到市場去換取貨幣，然後再用貨幣交換麪包或麥酒。他售賣牛羊肉所得的貨幣量，決定他後來所能購買的麪包量和麥酒量。因此，屠戶估計牛羊肉價值，自然多用牛羊肉直接換來的物品量即貨幣量，少用牛羊肉間接換來的物品量即麪包和麥酒量。說家畜肉一磅值三便士或四便士，比說肉一磅值麪包三斤或四斤，或值麥酒三夸脫或四夸脫，也更合宜。所以，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多按貨幣量計算，少按這商品所能換得的勞動量或其他商品量計算。

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金銀的價值時有變動，時有高低，其購買也時有難易。一定金銀量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勞動量或他種商品量，往往取決於當時已發現的著名金銀礦山出產量的大小。十六世紀美洲金銀礦山的發現，使歐洲金銀的價值幾乎減低為原價的三分之一。此等金屬由礦山上市所需勞動既較少，故上市後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勞動也按同一程度減少。而且，在金銀價值上，這雖是最大的一次變革，但不能說是歷史上唯一無二的變革。我們知道，本身數量會不斷變動的尺度，如人足一步、人手一握或兩臂合抱，決不是測定

他物數量的正確尺度；同樣，自身價值會不斷變動的商品，也決不是計量他種商品價值的準確尺度。但是，勞動卻當別論。等量勞動，無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對於勞動者都可以說有同等的價值。如果勞動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練與技巧程度，那末在勞動時，就必然犧牲等量的安樂、自由與幸福。他所購得的貨物不論多少，總是等於他所付出的代價。誠然，他的勞動，雖有時能購得多量貨物，有時只能購得少量貨物，但這是貨物價值變動，不是購買貨物的勞動價值變動。不論何時何地，凡是難於購得或在取得時需花多量勞動的貨物，價必昂貴；凡是易於購得或在取得時只需少量勞動的貨物，價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價值絕不變動的勞動，纔是隨時隨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後和真實標準。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

可是，等量勞動，對於勞動者，雖常有等量價值，但在僱用勞動者的人看來，它的價值卻時高時低。僱主購買勞動，有時需用多量貨物，有時只需用少量貨物；因而，在他看來，勞動價格與其他一切物品一樣常在變動。在他看來，以多量貨物購得的勞動價昂，以少量貨物購得的勞動價廉。其實，在前一場合，是貨物價廉；在後一場合，是貨物價昂。

所以，按照通俗的說法，勞動也象商品一樣可以說有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貨幣。勞動者是貧是富，其勞動報酬是壞是好，不與其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與其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

就商品與勞動說，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的區別，不僅僅是純理論問題，在實用上，也非常重要。同一真實價格的價值，往往相等；但同一名義價格的價值，卻往往因金銀價值變動而產生極大的差異。所以，假設一個人，要以永久租佃為條件而售賣地產，如果他真要使地租的價值永久不變，那就不可把地租定為一定數額的貨幣。一定數額的貨幣的價值難免有兩種變動：第一，由於同一名稱鑄幣各時代所含不同金銀分量而產生的變動；第二，由於同一分量金銀價值各時代各不相同而產生的變動。

君王和國家往往認為，減少鑄幣內所含的純金屬的量對他們眼前有利。但他們很少認為，增加鑄幣內所含純金屬量於己有利。我相信，各國鑄幣內所含的純金屬量都在不斷減少，從來沒有增加，所只，這種變動常使貨幣地租的價值降低。

美洲礦山的發現，降低了歐洲金銀的價值。據一般人推測，金銀價值還會逐漸下降，而且在長時期內大概會繼續下降（但我認為這沒有確實論據）。所以，在這種推測下，即使地租不規定為鑄幣若干鎊，而規定為純銀或某種成色的白銀若干盎斯，這種變動多半會降低而不是增加貨幣地租的價值。

穀物地租卻不如此。穀物地租，即使在鑄幣名實一致的時候，也比貨幣地租更能保持原有價值。伊麗莎白第十八年規定，國內各學院地租，三分之二納貨幣，其餘三分之一要納穀物，或按照當時最近市場上的谷價摺合貨幣。由穀物摺合貨幣的部分，原不過佔全部地租的三分之一，但現在據布勒克斯頓博士說，卻已二倍於其他三分之二了。依此算來，各學院的貨幣地租，一定幾乎已經減到原值的四分之一或其原值穀物的四分之一了。但是，自腓力普和瑪利朝代迄今，英國鑄幣單位幾乎無變化；同一數量的鎊、先令或便士，幾乎含有同一分量純銀。由此可見，各學院貨幣地租價值的跌落完全是由於銀價的下降。

設若銀價下落，而鑄幣內所含的純銀量又同時減少，貨幣地租的損失就會更大。蘇格蘭鑄幣含銀量的變動比英格蘭大得多，而法蘭西又比蘇格蘭大得更多。所以，這兩國昔日報有價值的地租，現在幾乎全無價值可言。

在兩個相隔很遠的時期裏，等量穀物（即勞動者的生活資料），比等量金銀或其他貨物，似更可能購買等量勞動。所以，等量穀物在兩個相隔很遠的時期裏更可能保持幾乎相同的真實價格，換言之，使有穀物者，更可能以等量穀物購買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勞動。我只說，等量穀物比等量其他商品更可能購買或支配等量勞動，因為等量穀物不可能絲毫不差地購買或支配等量勞動。勞動者的生活資料，換言之，勞動的真實價格，如後章所要說明的，在不同時期是大不相同的。勞動者所享有的生活資料，在進步社會，多於靜止社會，在靜止社會，又多於退步社會。在一定時間內，穀物以外其他任何商品所能

購得的勞動量，必定相當於這商品當時所能購得的生活資料量。所以，穀物地租，只受一定分量穀物所能購買的勞動量上的變動的影響。但以其他任何物品計算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分量穀物所能購買的勞動量上的變動的影響，同時還要受一定分量這物品所能購換的穀物量上的變動的影響。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穀物地租真實價值的變動，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雖比貨幣地租真實價值的變動少得多，但就一年一年來說，卻比貨幣地租真實價值的變動多得多。如後章所要說明的，勞動的貨幣價格，並不逐年隨穀物的貨幣價格漲落而變動。它似乎不和穀物的暫時或偶然價格相適應，而和穀物的平均或普通價格相適應，而且，我們以後會知道，穀物的平均或普通價格，受銀價的支配，受銀礦山出產額大小的支配，受運銀到市場所必須使用的勞動量的支配，因而也受所必須消費的穀物量的支配。銀價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有時雖有很大變動，但就一年一年來說，卻很少有很大變動，往往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內，具有相同或大約相同的價值。因此，也在這麼長久的一個時期內，具有相同或幾乎相同的平均或普通貨幣價格。而勞動也保持有同樣的貨幣價格，至少在社會其他情況全無變動或幾乎無變動的場合是這樣。不過，穀物的暫時或偶然價格，今年比去年高一倍是常會發生的事，例如，今年每夸特二十五先令，明年漲至五十先令。可是，當穀物漲至每夸特五十先令時，穀物地租的名義價值和真實價值就比以前高一倍，或者說所支配的勞動量或其他貨物量比以前大一倍，但在這些變動中，勞動和大多數其他商品的貨幣價格卻仍舊不變。

由此可見，只有勞動纔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換言之，只有用勞動作標準，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銀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就一年一年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穀物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但無論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或就一年一年來說，我們都可極其準確地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勞動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穀物比銀更適合於作為尺度，因為在這場合，等量穀物比等量白銀更有支配等量勞

動的可能。反之，就一年一年來說，以銀為尺度又勝於穀物，因為在這場合，等量的銀比等量穀物更有支配等量勞動的可能。

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的區分，對訂定永久地租或締結長期租地契約，可能還有用處，但對日常生活中比較普通的買賣，卻沒有用處。

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一切物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都成正比例。例如，在倫敦市場上售賣一種商品，所得貨幣愈多，那末在那個時間，它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勞動量亦愈多；所得貨幣愈少，它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亦愈少。所以，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貨幣乃是一切商品的真實交換價值的正確尺度。但只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方纔是這樣。

在相隔很遠的兩個地方，商品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不成正比例，而往來販運貨物的商人只考慮商品的貨幣價格，換言之，他所考慮的，只是購買商品所用的銀數和出賣商品可換得的銀數之間的差額。在中國廣州地方，半盎斯白銀所可支配的勞動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倫敦一盎斯白銀所可支配的也許還要大。所以，對於各該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在廣州以半盎斯白銀出售，比在倫敦只一盎斯白銀出售，實際上也許更有價值，更為重要。不過，如果倫敦商人能在廣州以半盎斯白銀購買的某一商品，後來能在倫敦以一盎斯白銀的價格出賣，他這趟買賣，就獲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象倫敦和廣州的銀價完全相同一樣。至於廣州半盎斯白銀，比倫敦一盎斯白銀，能夠支配更多勞動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對這個商人來說，是不重要的。在倫敦，一盎斯白銀使他能夠支配的勞動量和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量，總是兩倍於半盎斯白銀，而這正是他所希求的。

由於一切買賣行為的適當與否，最終都取決於商品的名義價格或貨幣價格，而日常生活中幾乎所有交易也受其支配，所以，人們大都注意名義價格而不注意真實價格，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就本書說，有時也必須比較特定商品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方的不同真實價值，換言之，有時也必須比較特定商品在不同時期對其所有者所提供的不同的支配他人勞動的能力。這樣，我們所比較的，與其說是出售特定商品通常可得的不同銀量，勿寧說是不同銀量所能買得的不同勞動量。但是，時間隔遠了，地方隔遠了，勞動的時價如何，往往無從正確知道。正式記錄穀物時價的地方雖然不多，但

對於穀物時價，人們一般知道得比較清楚，而歷史家和著述家也更常注意穀物時價。所以，一般地說，我們得心滿意足地用穀物時價來作比較，這並不是因為它和勞動時價總是恰恰以同一比例漲落，而是因為二者一般總是以最近似的比例漲落。我在下面要作幾個這種比較。

隨着產業進步，商業國發現了同時使用數種金屬鑄幣的便利；大的付款用金幣；價值不大不小的買賣用銀幣；數額更小的買賣用銅幣或比銅幣更賤的金屬鑄幣。在這三種金屬中，他們往往特別選定一種作為主要的價值尺度。而他們所選擇的，似乎都是最先用作商業媒介的金屬。他們在沒有其他貨幣可用時，就已把它用作本位，所以後來即使需要改變，也往往仍舊使用。

據說，羅馬在第一次普尼克戰爭之前五年內開始鑄造銀幣；在這之前，羅馬只有銅幣。所以，羅馬共和國似乎繼續以銅幣為價值尺度。羅馬一切簿賬，一切財產價值，都以若干阿斯或若干塞斯特斯（Sesterce）計算。阿斯一直是銅幣名稱。而塞斯特斯一詞其意即為兩個半阿斯，故塞斯特斯雖原為銀幣，但其價值常以銅幣計算。所以，在羅馬，對於負債很多的人，人們都說，他借有許多別人的銅。

至於那些在羅馬帝國廢墟上立國的北方民族，在定居之初，似乎只有銀幣，即在後此若干年代，也沒有金幣和銅幣。撒克遜人入主英格蘭時，英格蘭也只有銀幣。直到愛德華三世時代，只有少許金幣。在詹姆士一世以後，纔有銅幣。所只，在英格蘭，而且依據同一理由，我相信，在近代歐洲的其他各國，一切簿賬以及一切貨物與一切財產的價值都用銀計算。要表述一個人的財產額時，我們不說它值多少金幾尼，而說它值多少磅純銀。

我相信，各國法定的支付手段，最初都只是被特認為價值標準的那種金屬鑄幣。在英格蘭，黃金在鑄幣後很久還不曾取得法幣資格。金幣和銀幣價值的比例，不由法律或公告規定，而純然取決於市場。所以，債務人如果以金償債，債權人可以拒絕，不然，就須按照雙方同意的金價計算。銅在今日，只用以兌換小銀幣，已經不是法幣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本位金屬與非本位金屬的區別，已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區別了。

往後，人們逐漸習慣於同時使用數種鑄幣，而且熟悉各種鑄幣價值的比例；我相信，在那時候，大多數國家，才感到了確定這比例的

便利，才用法律規定，有怎樣純度和重量的幾尼，應該兌換二十一先令，並規定對於有那麼大數額的債款，可用它作為法幣償付。在這種狀態下，在法定比例繼續有效期間內，本位金屬與非本位金屬的區別，只是名義上的區別了。

不過，在法定比例發生變動時，本位金屬與非本位金屬的區別又成為我至少似乎成為不僅僅是名義上的區別。例如，在一切賬目都以銀幣記明，而一切債務都以銀幣表明的場合，如果金幣一幾尼的法定價值，由二十一先令落至二十先令，或升至二十二先令，以銀幣償還舊欠，雖和以前相同，然只金幣償還，就有很大的差異。在一幾尼低於二十一先令場合，所需金幣數額必較大；在高於二十一先令的場合，所需金幣數額必較小。在這情況下，與金價比較，銀價似乎不易於變動。這時，好象是以銀衡量金的價值，而不以金衡量銀的價值。金的價值，似取決於金所能交換的銀量；銀的價值，似不取決於銀所能交換的金量。但這種差異，全然起因於賬目款額多用銀幣表明的習慣。例如，德拉蒙期票一張，若註明金幣二十五幾尼或五十幾尼，則在法定比例發生變動以後，仍舊可只象只前那樣用同額金幣付還。這時，若不以金幣而以銀幣兌付，則所需銀數必隨法定比例的變動而有很大的不同。就這張期票的支付說，與銀價比較，金價又似乎不易於變動。這時，又好象是以金衡量銀的價值，而不是以銀衡量金的價值了。所以，如果賬簿、契約、債券上的款額全都以金幣來表示，則被特認為價值標準或價值尺度的金屬，就應當是金而不是銀了。

在不同金屬鑄幣的不同價值中，要是有個法定比例持續不變，那末最昂貴的金屬的價值，事實上便支配一切鑄幣的價值。例如，英銅幣十二便士，以常衡（十六盎斯為一磅）計，重銅半磅，而由於銅質不良，未鑄成銅幣前很少能值銀幣七便士。可是，由於法律規定，銅幣十二便士換一先令，於是在市場上被認為值一先令，並可隨時換成一先令。即在最近金幣改革以前，英國金幣，一般地說，不曾象大部分銀幣那樣，低劣到標準重量以下，至少在倫敦及其附近流通的金幣是如此。可是，磨損的銀幣二十一先令的被視為無大損耗的金幣一幾尼的等值物。最近，由於法律規定，英政府已採取措施使金幣也象別的國家的通用鑄幣那樣儘量接近於標準重量。而官署非依重量計算不得收受金幣的命令，在這命令繼續有效的期間內，當可保持金幣的重

量，使常與標準接近。銀幣仍如金幣改革以前那樣處於磨損剝蝕狀態。可是在市場上，磨損了的銀幣二十一先令，仍被認為值優良的金幣一幾尼。

這樣，金幣的改革顯然擡高了能和金幣兌換的銀幣的價值。

英國造幣廠以金一磅鑄成四十四個半幾尼，按一幾尼為二十一先令計算，就等於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所只，重一盎斯的金幣，等於銀幣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英格蘭向來不徵收鑄幣稅，以重一鎊或一盎斯標準金塊持往造幣廠，可不折不扣換回重一鎊或一盎斯的鑄幣。所以，每盎斯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就成為英格蘭所謂金的造幣廠價格，也就是造幣廠交換標準金塊所付給的金幣量。

在金幣改革前，市場上標準金塊的價格，好多年都在每盎斯三鎊十八先令以上，常是三鎊十九先令，更常是四鎊。但在當時磨損的四鎊的金幣裏，很少含有一盎斯以上的標準金。金幣改革以後，每盎斯標準金塊的市價很少超過三鎊十七先令七便士。改革前，其市場價格總是或多或少地超過造幣廠價格；改革後，市場價格一直低於造幣廠價格。但不論以金幣或以銀幣支付，市價都相同。所以，最近金幣的改革，不僅提高了金幣的價值，而且也提高了和金塊乃至和一切其他貨物對比的銀的價值。不過，因為大部分其他貨物的價格，還受許多其他原因的影響，所以和這些貨物相比，金幣或銀幣的價值增長得不象它們那麼顯著。

英格蘭造幣廠以標準銀塊一鎊鑄成含有重標準銀一鎊的六十二先令銀幣。所只，一盎斯合五先令二便士就是英格蘭所謂銀的造幣廠價格，也就是造幣廠交換標準銀塊所給付的銀幣量。在金幣改革以前，一盎斯標準銀塊的市場價格有時是五先令四便士，有時是五先令五便士，有時是五先令六便士，有時是五先令七便士，有時是五先令八便士。不過，就中似乎以五先令七便士為最普通。金幣改革以後，一盎斯標準銀塊的市場價格降到五先令三便士、五先令四便士或五先令五便士，很少超過五先令五便士。可是，銀塊的市場價格，雖因金幣改革而減低了許多，但始終沒有降到象造幣廠那麼低的價格。

就英格蘭鑄幣所合不同金屬的比價說，銅的評價遠遠超過它的真實價值，因而銀的評價略低於它的真實價值。在歐洲市場，就法國、荷蘭的鑄幣說，純金一盎斯大約摸純銀十四盎斯；就英格蘭的鑄幣

說，純金一盎斯卻能換得純銀約十五盎斯。就是說，銀在英格蘭的評價低於歐洲一般的評價。然而，即使在英格蘭，銅塊的價格也不因鑄幣銅的評價過高而增高；同樣，銀塊價格，也不因鑄幣銀的評價過低而低落。銀塊仍保持着它對金子的適當比例；由於同一理由，銅塊也保持着它對銀子的適當比例。

在威廉第三改革銀幣以後，銀塊價格仍然略高於造幣廠價格。洛克認為，這種高價是允許銀塊輸出而禁止銀幣輸出的結果。他說，允許銀塊輸出，國內對銀塊的需要必大於對銀幣的需要。可是，國內為普通買賣而需要銀幣的人，必然比為輸出或為其他目的而需要銀塊的人多得多。現在我們也同樣允許金塊輸出、禁止金幣輸出，而金塊價格卻落到造幣廠價格之下。那時象現今一樣，鑄幣的銀，和金對比，是評價太低了。那時（那時金幣也被認為無須改革）象現今一樣，金幣支配一切鑄幣的真實價值。以前的銀幣改革，既不能使銀塊價格降低到造幣廠價格，那末，現今任何類似的改革恐怕也不能做到這一點。

假若銀幣能夠象金幣那樣，做到和標準重量大致相同，那末按照今日比價，金幣一幾尼所能換入的銀幣，就要多於它所能購買的銀塊。銀幣如含有十足的標準重量，則先把銀幣熔成銀塊，再以銀塊換成金幣，然後以金幣換取銀幣，就有利可圖。要防止此種毛病，似乎只有改變金銀比價。

就鑄幣的金銀適當比值說，要是把現今低於這比值的銀價評得高於這比值，同時又象規定銅幣除了可以兌換先令外不得充作法幣那樣，規定銀幣除了可以兌換幾尼外不得充作法幣，那末上述毛病，也許可以減少。銀的高的評價絕不會使任何債權人吃虧，正如現今銅的高的評價，不會使債權人吃虧一樣。在這種規定下，吃虧的只有銀行業者。當他們的銀行發生擠兌時，他們往往以最小的六便士銀幣支付款項，想借此延宕時間。這種規定的實行，卻使他們不能再使用這種不名譽的方法來避免立時兌付。結果他們將不得不經常在金櫃中儲有更大數量的現金。這對銀行業者當然很不利，但對債權人的利益卻是很大的保障。

固然，即使在今日優良金幣中，三磅十七先令十便士半（金的造幣廠價格），也未必含有一盎斯以上的標準金；因此，有人認為，這

數額不應當購換更多的標準金塊。但是，金鑄幣在使用上實較金塊便利；加之，鑄造貨幣在英國雖不取費，但金塊持往造幣廠，往往須在數星期之後才能換回鑄幣。現今造幣廠工作繁忙，要延到數月以後才能取回鑄幣。時間這樣的拖延，等於抽收小額的鑄幣稅，並使金幣的價值略高於等量金塊的價值。所以，英國鑄幣銀的評價，若能保持對金的適當比例，那末，不實行銀幣改革，也能使銀塊價格落到造幣廠價格之下；甚至現今磨損了的銀幣價值也會受銀幣所能兌換的優良金幣的價值的支配。

對鑄造金銀幣課以小額鑄幣稅，會使鑄幣金銀的價值更進一步高出同量條塊金銀。這時，鑄造貨幣會按稅額比例增加鑄幣金屬的價值，正如把金銀製成器皿會按製造費用的大小而增加金銀器皿的價值。鑄幣價值高於金銀塊，這不僅可阻止鑄幣的熔解，還可以阻止鑄幣的輸出。萬一因當前某種急需而輸出貨幣，其大部分不久也會流回本國。鑄幣在外國，只能按照條塊的重量出售，而在國內卻具有超過重量的購買力。所以把輸出的貨幣帶回國內來是有利可圖的。法蘭西對鑄幣課以百分之八的鑄幣稅。據說，法國輸出的貨幣都會自動回到本國來。

金銀條塊市價不時變動的原因，和一切其他商品市價不時變動的原因相同。此類金屬常因海陸運輸途中的意外事件而遭受損失；在鍍金、包金、鑲邊和繡花過程中，都會有不斷的消耗；在鑄幣及器皿上，都會有磨損。所以，自己不佔有礦山的國家，爲了彌補此等損失和消耗，就需要不斷輸入金銀。我相信，金銀進口商也象其他商人一樣會竭力使金銀的輸入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可是，無論他們對供求的考慮如何周到，也總不免有時輸入太多，有時輸入太少。假如金銀條塊輸入多於需要，他們往往不願冒再輸出的危險與困難，而情願以略低於一般價格的價格在國內售去若干；反之，如果輸入少於需要，他們可得的市價，就會高於一般價格。但是，在這種偶然變動下，金銀條塊的市價，若竟能在好幾年內穩定地持續地保持着略高於造幣廠價格或略低於造幣廠價格的狀態，我們敢說，那一定起因於鑄幣本身的某種情況，使得一定數量鑄幣的價值在這幾年內高於或低於鑄幣中應含有的純金量或純銀量。結果的穩定和持續，只相應的原因的穩定和持續爲前提。

任何一個國家的貨幣，在某一特定時間和特定地方，是怎樣準確的價值尺度，那要看通用的鑄幣是怎樣準確地符合於它的標準，換言之，要看鑄幣所包含的純金量或純銀量，是怎樣準確地符合於它應當含有的純金量或純銀量。例如，在英國，如果四十四個半幾尼恰好含有標準金一磅，即純金十一盎斯和合金一盎斯，則此種金幣，就可作為某一特定時間和特定地方所可能有的商品實際價值的正確尺度。此四十四個半幾尼，若因磨損消耗，其所合標準金重量不到一磅，而且磨損的程度又參差不一，則這種價值尺度就會象其他各種度量衡一樣，難免有些不正確。恰好適合標準的度量衡既不多見，所以商人們調整自己商品價格時，總是儘量不按照應當有的度量衡標準，而按照他們憑一般經驗覺得實際上是的那種度量衡標準來調整。在鑄幣紊亂的場合，商品價格也不是按鑄幣應當含有的純金量或純銀量，而是按商人一般以經驗覺察到的鑄幣實際含量來作調整。

應當指出，我所謂的商品貨幣價格，總是指這商品出售所得的純金量或純銀量，與鑄幣名稱無關。例如，我把愛德華一世時代六先令八便士的貨幣價格，和今日一鎊的貨幣價格，看做同一的貨幣價格，因為根據我們所能判斷的，那時的六先令八便士和今日的一鎊幾乎含有同一分量的純銀。

第六章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

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例如，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狸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於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末，海狸一頭當然換鹿二頭。所以，一般地說，二日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一日勞動的生產物，兩點鐘勞動的生產物的價值二倍於一點鐘勞動的生產物，這是很自然的。

如果一種勞動比另一種勞動更為艱苦，對於這較大的艱苦，自然要加以考慮。一點鐘艱苦程度較高的勞動的生產物，往往可交換兩點鐘艱苦程度較低的勞動的生產物。

如果某種勞動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末為尊重具有這種技能的人，對於他的生產物自然要給與較高的價值，即超過他勞動時間所應得的價值。這種技能的獲得，常須經過多年苦練，對有技能的人的生產物給予較高的價值，只不過是對獲得技能所需費去的勞動與時間，給以合理的報酬。進步社會，對特別艱苦的工作和特別熟練的勞動，一般都在勞動工資上加以考慮。在初期矇昧社會，可能也作過這種考慮。

在這種社會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都屬於勞動者自己。一種物品通常應可購換或支配的勞動量，只由取得或生產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勞動量來決定。

資本一經在個別人手中積聚起來，當然就有一些人，為了以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或勞動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上得到一種利潤，便把資本沒在勞動人民身上，以原材料與生活資料供給他們，叫他們勞作。與貨幣、勞動或其他貨物交換的完全製造品的價格，除了足夠支付原材料代價和勞動工資外，還須剩有一部分，給予企業家，作為他把資本投在這企業而得的利潤。所以，勞動者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就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另一部分支付僱主的利潤，來報酬他墊付原材料和工資的那全部資本。假若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所得，不能多於他所墊付的資本，他便不會有僱用工人的興趣；而且，如果他所得的利潤不能和他所墊付的資本額保持相當的比例，他就不會進行大投資而只進行小投資。

也許有人說，資本的利潤只是特種勞動工資的別名，換言之，不外是監督指揮這種勞動的工資。但利潤與工資截然不同，它們受着兩個完全不同的原則的支配，而且資本的利潤同所謂監督指揮這種勞動的數量、強度與技巧不成比例。利潤完全受所投資本的價值的支配，利潤的多少與資本的大小恰成比例。假定某處有兩種不同的製造業，各僱用勞動者二十人，工資每人每年十五鎊，即每年各需支工資三百鎊，而該處製造業資本的普通年利潤為百分之十。又假定一方每年所加工的粗糙原料只值七百鎊；另一方所加工的精細原料值七千鎊。合計起來，前者每年投下的資本不過一千鎊；而後者卻有七千三百鎊。因此，按百分之十年利計，前一企業家每年預期可得一百鎊的利潤；後一企業家每年卻預期得到七百三十鎊的利潤。他們的利潤額，雖那麼不相同，他們的監督指揮卻無甚差別，甚或全然一樣。在許多大工廠裏，此類工作大抵託由一個重要職員經管。這個職員的工資，正確地表示了監督指揮那一類勞動的價值。在決定這職員的工資時，通常不僅考慮他的勞動和技巧，而且考慮他所負的責任；不過，他的工資和他所管理監督的資本並不保持一定的比例。而這資本所有者，雖幾乎沒有勞動，卻希望其利潤與其資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所以，在商品價格中，資本利潤成爲一個組成部分，它和勞動工資絕不相同，而且受完全不相同原則的支配。

在這種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未必都屬於勞動者，大都須與僱用他的資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於取得或生產任何一種商品的勞動量，也不能單獨決定這種商品一般所應交換、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很明顯，還須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個因素決定，那就是對那勞動墊付工資並提供材料的資本的利潤。

一國土地，一旦完全成爲私有財產，有土地的地主，象一切其他人一樣，都想不勞而獲，甚至對土地的自然生產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帶的樹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種自然果實，在土地共有時代，只須出些力去採集的，現今除出力外，卻須付給代價。勞動者要採集這些自然產物，就必須付出代價，取得准許採集的權利；他必須把他所生產或所採集的產物的一部分交給地主。這一部分，或者說，這一部分的代價，便構成土地的地租。在大多數商品價格中，於是有了第三個組成部分。

必須指出，這三個組成部分各自的真實價值，由各自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勞動量來衡量。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成爲勞動的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成爲地租和利潤的那些部分的價值。

無論在什麼社會，商品價格歸根到底都分解成爲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之一。在進步社會，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爲絕大部分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

以穀物價格爲例。其中，一部分付給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付給生產上所僱用的勞動者的工資及耕畜的維持費，第三部分付給農業家的利潤。穀物的全部價格，或直接由這三部分構成，或最後由這三部分構成。也許有人認爲，農業家資本的補充，即耕畜或他種農具消耗的補充，應作爲第四個組成部分。但農業上一切用具的價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個部分構成。就耕馬說，就是飼馬土地的地租，牧馬勞動的工資，再加上農業家墊付地租和工資的資本的利潤。因此，在穀物價格中，雖必須以一部分支付耕馬的代價及其維持費，但共全部價格的直接或最後由地租、勞動及利潤這三部分組成。

就麪粉價格說，我們必須在穀物價格上，加上面粉廠主的利潤及其僱工的工資；就麪包價格說，我們須加上面包師的利潤及其僱工的工資。但由農家那裏運穀物到麪粉廠，由麪粉廠運麪粉到麪包師，又需若干勞動；墊付這種勞動的工資，又需若干資本。這種勞動的工資，和這種資本的利潤，亦須加在這兩種物品的價格內。

亞麻價格，與穀物價格同樣可分爲三個組成部分。麻布的組成，既須理麻工、紡工、織工、漂白工等的勞動，而分途僱用這些工人的僱主，又須分接投下資本，所以，這種種勞動的工資，這種種資本的利潤，亦須加徵麻布價格內。

物品製造，越接近於完成，其價格中工資利潤部分，和地租部分比較，便越大。隨着製造的進展，不僅利潤的項目增加，而且後一階段製造者，比前一階段製造者得到更多利潤。因爲，後者比前者需要更多資本。例如，僱用織工的資本，必須大於僱用紡工的資本。因爲，僱用織工的資本，除了要付還僱用紡工的資本及其利潤，還要支付織工的工資。利潤對資本總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然而，即在最進步社會，也有少數商品的價格，只能分為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兩個部分，且有更少數商品的價格，單由勞動工資構成。例如，海產魚類的價格，通常只有兩個組成部分：其一支付漁夫的勞動，其二支付漁業資本的利潤。有時，在此種價格中也會有地租，但極少見，關於這一點，我以後要說明。河上漁業卻往往與海上漁業不同，至少就歐洲大部分說，它們的情況是截然兩樣的。歐洲的鮭魚業大體上都要支付地租。這種地租，雖嚴格地說不能稱為土地地租，但無疑和工資與利潤一起成為鮭魚價格的構成部分。蘇格蘭某些地方，有少數窮人在海岸拾集通常叫做蘇格蘭瑪瑙的斑色小石。雕石業者付給他們的價格，只是他們的勞動工資，其中沒有地租部分，也沒有利潤部分。

總之，無論什麼商品的全部價格，最後必由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一個部分構成。在商品價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產、製造乃至搬運所需要的全部勞動的價格外，剩餘的部分必然歸作利潤。

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由那三個部分全數或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一切商品價格，必然由那三個部分構成，而且作為勞動工資、土地地租或資本利潤，在國內不同居民間分配。社會上年年由勞動採集或生產的全部物品，或者說，它的全部價格，本來就是照這樣分給社會不同成員中某些人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歸根到底都是來自這三種收入中的一個。

不論是誰，只要自己的收入來自自己的資源，他的收入就一定來自他的勞動、資本或土地。來自勞動的收入稱為工資。來自運用資本的收入稱為利潤。有資本不自用，而轉借他人，藉以取得收入，這種收入，稱為貨幣的利息或利益。出借人既給借用人以獲取利潤的機會，借用人就付給利息作為報酬。由借款獲得的利潤，一部分當然屬於冒險投資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則當然屬於使借用人有獲取利潤機會的出借人。利息總是一種派生的收入，借用人只要不是為還債而借債的浪子，那末，他償還利息所用的款項，如果不是來自運用借款而得到的利潤，一定是來自他種收入源泉。完全來自土地的收入，稱為地租，屬於地主。農業家的收入，有一部分得自勞動，另一部分則得自資本。在他看來，土地不過是使他能夠藉以獲得勞動工資和資本利

潤的工具。一切賦稅，一切以賦稅為來源的收入，一切俸金、恩卹金和各種年金，歸根到底都是來自這三個根本的收入源泉，都直接間接以勞動工資、資本利潤或土地地租支出。

這三種不同的收入，當它們屬於各別的個人時，容易區別；但在屬於同一個人時，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說法是如此。

耕種自己一部分土地的鄉紳，在支付耕作費用以後，當然要以地主資格獲得地租，並以農業家資格獲得利潤。可是，他往往把這全部收益籠統地叫做利潤，這樣就把地租和利潤混淆了，至少按通常說法是如此。我國在北美和西印度的種植園主，大部分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經營農業，因此，我們常聽他們說到種植園的利潤，很少聽人們說到種植園的地租。

一般農業家，很少僱用監工來指導農場的一般工作。他們通常也自己勞作，如犁耕、耙掘等等。所以，在全部收穫中，除去地租，剩餘的部分就不僅包含農業資本及其普通利潤，而且含有他們自己作為勞動者和監工所應得的工資。但是，在收回資本和支付地租以後所剩餘的一切，統稱為利潤。這所謂利潤，明明含有工資在內。所以，在這場合，工資又與利潤混為一談了。

假若一個獨立工作的製造業者，擁有足夠的資本來購買原材料並維持生活直到貨物上市，那末，他所獲得的收益便應有兩項：其一，以工人資格領取的工資；其二，以老闆資格以售賣工人出品所獲得的利潤。但他這兩項收益，普通也統稱為利潤。在這場合，工資也和利潤混淆了。

一個親自動手栽培植物的種園家，一身兼有地主、農業家和勞動者三種資格。所以，他的生產物自應對他一個人支給地主的地租、農業家的利潤和勞動者的工資。但通常卻把他的全部收入看做他的勞動所得。在這一場合，地租和利潤這二者，又和工資混為一談了。

由於在文明國家內，交換價值單由勞動構成的商品極不常見，大部分商品的交換價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潤和地租，所以，社會全部勞動年產物所能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遠遠超過這年產物生產製造乃至運輸所需要的勞動量。假若社會每年所能購買的全勞動量，每年都被社會僱用，那末，因為勞動量將年年大大增加的緣故，後一年度的生產物將比前一年度的生產物具有更大的價值。可是，無論那一個國

家，都不是用全部年產物來維持勤勞階級。無論那一個國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產物歸遊惰階級消費。一國年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減少，還是不增不減，要取決於這一國家的年產物每年是按照什麼比例分配給這兩個階級的人民。

第七章論商品的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

在每一個社會及其鄰近地區，各種用途的勞動的工資以及各種用途的資本的利潤，都有一種普通率或平均率。這普通率，象我在後面所說那樣，自然部分受社會的一般情況，即貧富、進步退步或停滯狀況的支配，部分受各種用途的特殊性質的支配。同樣，在每一個社會及其鄰近地區，地租也有一個普通率或平均率。這普通率，象我在後面所說那樣，也是部分受土地所在地的社會及其鄰近地區的一般情況的支配，部分受土地的天然肥沃與人工改良的支配。

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稱為那地方那時候通行的工資自然率、利潤自然率或地租自然率。一種商品價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於生產、製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可以說是按它的自然價格的價格出售的。

商品這樣出賣的價格，恰恰相當於其價值，或者說，恰恰相當於出售這商品的人實際上所花的費用。普通所謂商品原始費用，雖沒有包含再販賣這商品的利潤，但若再販賣者按照不能得到當地一般利潤率的價格把這商品賣掉，那他顯然就會遭受損失。因為，他若把資本投在其他方面，就可以得到那筆利潤。況且，他的利潤就是他的收入，也就是他生活資料的正當資源。他在製造商品、把它送往市場去的過程中，要墊付勞動者的工資或生活資料，也要墊付他自身的生活資料。他自身的生活資料，大體上說與他可以出賣商品指望的利潤相當。因此，商品的出賣若不能給他以利潤，那就等於說，他沒有從這商品的出賣取回其實際費用。

能提供這種利潤的價格，雖然未必是一般商人出賣貨物的最低價格，但卻是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肯出賣的最低價格，至少在有絕對自由即各人能隨意變更職業的地方，情形是如此。

商品通常出賣的實際價格，叫做它的市場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它的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它的自然價格，有時和它的自然價格完全相同。

每一個商品的市場價格，都受支配於它的實際供售量，和願支付它的自然價格（或者說願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勞動工資和利潤的全部價值）的人的需要量，這二者的比例。願支付商品的自

然價格的人，可稱為有效需求者，而他們的需求，可稱為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也許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實現。此種需求與絕對需求不同。一個貧民在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有一輛六馬拉大馬車的需求，他這種需求並不是有效需求，因為那馬車絕不是為要滿足他的這種需要而送往市場出售的。

市場上任何一個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些願支付這商品出售前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勞動工資和利潤的全部價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數量的供給。他們當中有些人，不願得不到這種商品，寧願支付較大的價格。於是競爭便在需求者中間發生。而市場價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價格之上。價格上升程度的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及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所引起的競爭熱烈程度的大小。但在同樣富有和同樣奢侈的競爭者間，缺乏程度所能引起的競爭程度的大小，卻要看這商品對求購者的重要性的。所以，在都市被封鎖或發生饑饉場合，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總是非常昂貴。

反之，如果市場上這種商品的供售量超過了它的有效需求，這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那些願支付這商品出售前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勞動工資和利潤的全部價值的人，其中一部分必須售給出價較低的人。這一部分價格的低落，必使全體價格隨着低落。這樣，它的市場價格，便或多或少地降到自然價格以下。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超過額是怎樣加劇賣方的競爭，或者說，要看賣方是怎樣急於要把商品賣出。超過程度儘管相同，易腐敗的商品輸入過多比耐久性商品輸入過多能引起賣方更大的競爭。例如，柑橘輸入過多就比舊式鐵器輸入過多能引起賣方更大的競爭。

如果市場上這種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夠供給它的有效需求，市場價格便和自然價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這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價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價格售出。各商人之間的競爭使他們都得接受這價格，但不使他們接受更低的價格。

每種商品的上市量自然會使自己適合於有效需求。因為，商品量不超過有效需求，對所有使用土地、勞動或資本而以商品供應市場者有利；商品量不少於有效需求對其他一切人有利。

如果市場上商品量一旦超過它的有效需求，那末它的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必定會降到自然率以下。如果下降部分為地租，地主的利害關係立刻會促使他們撤回一部分土地；如果下降部分為工資或利潤，勞動者或僱主的利害關係也會促使他們把勞動或資本由原用途撤回一部分。於是，市場上商品量不久就會恰好足夠供應它的有效需求，價格中一切組成部分不久就都升到它們的自然水平，而全部價格又與自然價格一致。

反之，如果市場上商品量不夠供應它的有效需求，那末它的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必定會上升到自然率以上。如果上升部分為地租，則一切其他地主的利害關係自然會促使他們準備更多土地來生產這種商品；如果上升部分是工資或利潤，則一切其他勞動者或商人的利害關係也會馬上促使他們使用更多的勞動或資本，來製造這種商品送往市場。於是，市場上商品量不久就充分供應它的有效需求，價格中一切組成部分不久都下降到它們的自然水平，而全部價格又與自然價格一致。

這樣，自然價格可只說是中心價格，一切商品價格都不斷受其吸引。各種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時會把商品價格擡高到這中心價格之上，有時會把商品價格強抑到這中心價格以下。可是，儘管有各種障礙使得商品價格不能固定在這恆固的中心，但商品價格時時刻刻都向着這個中心。

為使一種商品上市每年所使用的全部勞動量，自然會依着這個方式使自己適合於有效需求。其目的當然在於始終把適當商品量提供市場，使供給足夠適應需求，而不超過需求。

但是，在有些業務上，同量勞動逐年所產出的商品量可大不相同，在有些業務上，卻往往相等，或幾乎相等。例如，同數農業勞動者，所產出的穀物、葡萄酒、油、忽布花等商品量，就一年不同於一年；但同數紡織工所產出的麻布和呢絨量，卻年年相等，或幾乎相等。就前一種產業說，適合有效需求的生產量，只是這產業的平均生產額。由於實際生產量往往比平均生產額大得多或小得多，所以市場上商品量有時大大超過其有效需求，有時極不夠供應其有效需求。所以縱使有效需求能夠始終保持同一程度，商品的市場價格仍不免時有變動，有時比其自然率高得多，有時又低得多。但就後一種產業說，

由於同量勞動的生產量總是相同，或大約相同，所以，生產量能更正確地適合其有效需求。在有效需求保持同一狀態時，商品市場價格也保持同一狀態，和自然價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大家從經驗都知道，麻布和呢絨的價格，不象谷價那樣常常變動，也沒有谷價那樣大的變動。因為，前者的價格只隨需求的變動而變動；後者的價格，則不僅隨需求的變動而變動，還隨着為供應需求而上市的商品量的更巨大和更頻繁的變動而變動。

商品市價偶然和一時的變動，主要對價格中工資部分和利潤部分發生影響，而對其中地租部分則影響不大。用貨幣確定了的地租，無論就比率說或就價值說，絕不受其影響。以原生產物一定比例或一定數量計算的地租，無疑也只能在年租的價值上，不能在年租的比價上受其影響。在議定租佃條件時，地主和農業經營者都盡他們所知，竭力使地租率適合於生產物的平均價格，而不適合於其臨時價格。

這些偶然和一時的變動，要看當時市場上積存的商品或勞動是過多還是不足，換言之，要看當時市場上既成作業或待成作業是過多還是不足，而對工資或利潤的價值和比率發生影響。在國喪的場合，黑布存貨往往感到不足，以致市價騰貴，因而持有多量這種商品的商人的利潤便增加了。可是，所增加的僅是商人的利潤，而織布工人的工資卻毫不受影響。因為這時市上感到不足的是商品，不是勞動，換言之，是既成作業，不是待成作業。不過，國喪雖不能影響織工們的工資，卻會擡高縫工們的工資。因為，在這場合，感到不足的是勞動，對於勞動，換言之，對於待成的作業，有效需求便大於現有供給量。國喪減低了花彩絲綢和棉布的價格，從而減低了持有多量花彩絲綢和棉布的商人的利潤，以及精製這些商品的勞動者的工資。因為這時候，對於這些商品和生產這些商品的勞動者的需要，都不免要停頓半年甚或一年。於是，這類商品與這類勞動都供過於求。

各種商品的市場價格，雖可說有不斷地趨向自然價格的趨勢，但有許多商品，有時由於特殊的意外事故，有時由於天然的原因，有時又由於特殊政策的規定，其市場價格能在相當長時期內大大超過其自然價格。

當某一商品因有效需求增加而市價比自然價格高得多的時候，造商品的供給者大抵都小心翼翼地隱瞞這種變化情況。要是被人知道，

其豐厚的利潤定會誘使許多新競爭者向這方面投資。結果，有效需求完全得到供給，這商品的市場價格不久就降低到自然價格，甚或降低到自然價格之下。如果供給者距市場很遠，他們有時能保持祕密數年，而在這數年內，他們就可獨享非常的利潤。不過，必須承認，這種祕密很少能長久保守，而那非常的利潤只能在這祕密未給人知道以前獨享。

製造業方面的祕密，比商業方面的祕密，能保守得長久些。一個染業者，如果發現了一種製造染料的方法，其所費僅及通常方法的一半，而他又能妥善處理，他就能終生獨享這發現的利益，甚至能把它傳給子孫。這種額外利得是來自他個人勞動的高價格，所以可適當地說是他個人勞動的高工資，但因爲他資本每一部分一再得到這種利得，而且他的利得總額與其資本總額保有一定比例，所以，通常都不說它是勞動的高工資，而說它是資本的額外利潤。

市價的這種增高，顯然是起因於特殊的偶發事件，不過它的作用有時能夠持續好多年。

有些自然產物的產出，需要一種特殊土壤與特殊位置，以致一個大國中適於生產這些產物的土地即使全被使用，怕仍不夠供應有效需求。因此，這種產物的全部上市量有可能售給那些願支付特別價格的人，就是說，他們所支付的價格超過按自然率計算，足夠支付生產它們的土地的地租，以及產製和運銷所用的勞動的工資和資本的利潤的價格。這種商品可連續數世紀按這種高價出售。這樣，其價格中，地租部分一般高於按自然率計算的地租。生產這樣珍貴產物的土地的地租，例如有優良土壤和位置的法國珍貴葡萄園的地租，和其鄰近同樣肥沃和同樣精耕細作的其他土地的地租，不經常保持一定的比例。反之，其價格中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部分，和鄰近其他地方的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卻往往保有自然的比例。

市價的這種增高，顯然是起因於天然的原團。這種原因會使有效需求不能取得充分的供給，而它的作用，因此將永遠繼續下去。

給個人或商業公司以壟斷權，其作用與商業或製造業中保守祕密相同。壟斷者使市場存貨經常不足，從而使有效需求永遠不能得到充分供給。這樣，他們就能以大大超過自然價格的市價出賣他們的產品，而他們的報酬，無論是工資或是利潤，都大大超過其自然率。

壟斷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價格。反之，自然價格或自由競爭的價格，雖不是在各個時期，但在長期間內，卻是可能有的最低價格。壟斷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是能向買者榨取的最高價格，或者是想象中買者願支付的最高價格，而自然價格或自由競爭的價格，卻是賣者一般能接受的最低價格，也就是他能夠繼續營業的最低價格。

同業組合的排他特權，學徒法規，只及限制特殊職業上競爭人數的各種法規，雖然在程度上不及壟斷，但在趨向上卻與壟斷相同。它們是一種擴大的壟斷，往往使某些產業所有商品的市價能長久超過自然價格，並使生產這些商品所使用的勞動的工資和資本的利潤稍稍超過其自然率。

市價的這種增高，顯然是起因於各種法規的規定。只要這種種法規繼續有效，市價的這種增高就會繼續存在。

任何一個商品的市價雖能長期高於其自然價格，但不能長期低於其自然價格。價格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要是低於自然率，其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立刻就會感覺到這種損失，立刻就會從使用中撤回一部分土地或勞動或資本，使上市的商品量，恰恰只夠供應有效需求。因此，市價不久便將升到自然價格的水平。至少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情況是這樣。

在製造業繁榮時，學徒法規與其他各種法規，雖能使勞動者的工資擡高到自然率以上，但一旦製造業衰微，卻使勞動者的工資降落到自然率以下。因為，這些法規，在前一場合，妨阻他人進入他們的職業，在後一場合，妨阻他們改就許多別種職業。不過，這些法規，對擡高勞動者的工資起着相當長期的作用，但對降低勞動者的工資卻接起着那麼長久的作用。就前者說，這些法規的作用可持續好多世紀；就後者說，當那些在產業繁榮時受過職業訓練的勞動者有一些死去的時候，這些法規的作用便不能繼續下去。在他們死去以後，學習這一職業的勞動者人數自會適合於有效需求。至於象印度和古代埃及那樣，各個人依據教規，都有承繼父業的義務，變更職業，即科以最可怕的瀆神之罪，那就無論對於什麼職業，亦不難使其勞動工資或資本利潤一連幾代都落在自然率以下。

關於商品的市場價格與自然價格一時的差異或永久的差異，我想我所要說的只此而已。

自然價格本身隨其組成部分即工資、利潤和地租的自然率的變動而變動。但無論在什麼社會，這種自然率都隨着社會的貧富、進步退步或停滯而變動。我在以下四章內，將竭盡所能，詳細明瞭地說明這些變動的原因。

第一，我要努力說明，什麼情況自然而然地決定工資率，而這些情況，又怎樣受社會的貧富、進步退步或停滯的影響。

第二，我要努力說明，什麼情況自然而然地決定利潤率，而這些情況，又怎樣受上述社會狀況的變動的影響。

第三，我要努力說明，什麼情況支配下面要說的比例。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雖因勞動及資本的用途不同而大不相同，但各種勞動用途的貨幣工資和各種資本用途的貨幣利潤似乎都有一定的比例。如後章所要說明的那樣，這種比例部分取決於各種用途的性質，部分取決於所在社會的不同法律和政策。不過，這種比例，雖在許多方面受法律 and 政策的支配，但似乎不受所在社會貧富、進步退步或停滯等狀況的影響，而在所有這些不同狀況中保持不變，或幾乎不變。

第四，我要努力說明，什麼情況支配土地地租，並使一切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格或是上升或是下降。

第八章論勞動工資

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

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資本尚未累積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屬於勞動者，既無地主也無僱主來同他分享。

這種狀態如果繼續下去，勞動工資將隨着分工所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增大而增加起來。但一切物品卻將日漸低廉，因為生產它們所需要的勞動量變小了。在這種狀態下，等量勞動所生產的各種商品自然可以互相交換，所以，要購買各種商品，只需較少數量的勞動生產物。

可是一切物品，儘管實際上變得低廉，但表面上卻有些物品地比以前昂貴，換句話說，可交換較多數量的其他貨物。假定大多數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增加十倍，即現今一天勞動的生產量十倍於以前一天的勞動，而某一種產業的勞動生產力卻只增加一倍，即造產業現今一天勞動的生產量只二倍於以前一天的勞動。在這場合，這大多數產業一天勞動生產物，如果與那產業一天勞動生產物交換，那末前者以原工作量的十倍，不過購入後者原工作量的二倍。因此，後者的一定分量，例如一磅，就似乎比以前貴了五倍。但其實卻是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購買這一磅貨物所需的其他貨物量雖五倍於以前，但生產或購買這一磅貨物所需的勞動量卻不過等於以前的二分之一。所以，現今獲得此物比以前容易了兩倍。

但勞動者獨享全部勞動生產物的這種原始狀態，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資本累積，就宣告終結了。所以，在勞動生產力尚未有顯著改善以前，這種原始狀態早已不復存在了；要就此種狀態對勞動報酬或勞動工資所可能有的影響作進一步的探討，那是徒勞無功的。

土地一旦成為私有財產，地主就要求勞動者從土地生產出來或採集到的幾乎所有物品中分給他一定份額。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為要以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一個項目。

一般耕作者大都沒有維持生活到莊稼收割的資料。他們的生活費通常是由僱用他們的農業家從他的資本項下墊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勞動者的生產物，換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資本時得到相當的利潤，否則

他就不願僱用勞動者。因此，利潤成爲要從用在土地上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扣除的第二個項目。

其實，利潤的扣除，不僅農業生產物爲然，一切其他勞動的生產物亦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藝或製造業中，大部分勞動者在作業完成以前都需要僱主給他們墊付原材料、工資與生活費。僱主分享他們的勞動生產物，換言之，分享勞動對原材料所增加的價值，而這一分享的份額便是他的利潤。

一個獨立工作的工人，有時也有資力，足以自行購買原材料，並維持自己生活，一直到作業完成。他兼有勞動者及僱主的身分，享有全部勞動生產物，即享有勞動所加於原材料的全部價值。因此，他的利得包含通常屬於兩個不同身分的人所有的兩種不同收入，即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

可是，這種實例不很多。就全歐洲說，其比例是，在老闆下面工作的工人有二十個，自己獨立工作的工人只有一個。而且，勞動工資一語，都普遍理解爲，在勞動者爲一人而僱用他的資本所有者另爲一人的一般情況下，勞動獲得的工資。

勞動者的普通工資，到處都取決於勞資兩方所訂的契約。這兩方的利害關係絕不一致。勞動者盼望多得，僱主盼望少給。勞動者都想爲提高工資而結合，僱主卻想爲減低工資而聯合。

但在一般的爭議情況下，要預知勞資兩方誰佔有利地位，誰能迫使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條件，決非難事。僱主的人數較少，團結較易。加之，他們的結合爲法律所公認，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勞動者的結合卻爲法律所禁止。有許多議會的法會取締爲提高勞動價格而結合的團體，但沒有一個法令取締爲減低勞動價格而結合的組織。況且，在爭議當中，僱主總比勞動者較能持久。地主、農業家、製造者或商人，縱使不僱用一個勞動者，亦往往能靠既經蓄得的資本維持一兩年生活；失業勞動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見，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簡直沒有。就長時期說，僱主需要勞動者的程度，也許和勞動者需要僱主的程度相同，但僱主的需要沒有勞動者那樣迫切。

據說，工人的結合常常聽到，而僱主的結合卻很少聽到。可是，誰要是因此認爲僱主實際很少結合，那就未免昧於世故，不瞭解這問

題的真相了。僱主們爲使勞動工資不超過其實際工資率，隨時隨地都有一種祕而不宣的團結一致的結合。破壞團結，隨時隨地都是最不名譽的行動，都爲近鄰和同業者所恥笑。我們所以不常聽到這種結合，正因爲那是一種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結合，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結合。此外，僱主們爲要把勞動工資減低到其實際工資率以下，有時也組織特殊的結合。此種結合，直到達到目的爲止，總是保持極度的沉默與祕密。勞動者這時雖痛切成到資方的這種祕密結合，卻往往無抵抗他屈服，其他人因此都不知道。不過，對於僱主的這種結合，工人們往往也組織對抗的防禦性結合。而且，即在沒有這種僱主結合的時候，工人們爲提高勞動價格，有時也自動結合起來。他們所持的理由，有時是食糧騰貴，有時是僱主從他們的勞動得到過多的利潤。他們的結合，無論是防禦性的或是攻擊性的，總是聲聞遐邇。爲求爭點迅速解決，他們老是狂呼吶喊，有時甚至用極可怕的暴力。他們處於絕望的境地，鋌而走險，如果不讓自己餓死，就得脅迫僱主立即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時，僱主也同樣喧呼吶喊，請求官廳援助，要求嚴厲執行取締工人結合的嚴峻法規。因此，工人很少能從那些憤激的結合的暴動中得到利益。那些結合，部分因爲官廳干涉，部分因爲僱主較能持久，部分因爲大多數勞動者爲了目前生計不得不屈服，往往以爲首者受到懲罰或一敗塗地而告終。

不過，在爭議中，僱主雖常居於有利地位，但勞動工資有一定的標準，在相當長的期間內，即使最低級勞動者的普通工資，似也不能減到這一定標準之下。

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坎梯隆似乎因此推測，最下級普通勞動者，爲供養兒女二人，至少須取得倍於自身所需的生活費，而其妻子，由於需要照料兒女，其勞動所得，只夠維持自己。但據一般計算，常有半數兒童在未成年以前死去。因此，最貧窮的勞動者按照上述計算，一般都想至少養育四個孩子，以便能有兩個孩子活到成人年齡。但坎梯隆認爲，四個孩子的必要扶養費也許和一個成年人的生活費幾乎相等。他還說，一個強壯奴隸勞動的價值，算來倍於其生活費，一個最低級勞動者勞動的價值，不可能低於一個強壯奴隸勞動的價值。因

此，至少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為贍養家屬，即使最低級普通勞動者夫婦二人勞動所得，也必須能稍稍超過維持他倆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費用。但是，這種超過額，是按什麼比例，是按上述比例，或是按其他比例，我不想加以確定。

可是，有某些情況，有時也使勞動者立於有利地位，並使他們能夠得到大大超過上述工資的工資。很明顯，上述工資是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不論何國，如果對那些靠工資過活的人，即工人、散工、各種傭人等的需求不斷地增加，換言之，如果每年提供的就業機會都比前一年多，勞動者就沒有為着提高工資而結合的必要。勞動者不夠，自會導致僱主間的競爭；僱主們競相出高價僱用勞動者，這樣他們就自動衝破了防止工資提高的自然結合。

很明顯，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定隨着預定用來支付勞動工資的資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這種資金有兩種：一，超過維持生活需要的收入；二，超過僱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資財。

地主、年金領受者、有錢人，如果認為自己的收入除維持身家外還有剩餘，他們一定會把剩餘額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來僱用若干家僕。這剩餘額增加，他們所僱用的家僕自然也隨之而增加。

織工、鞋匠這一類獨立工作的勞動者所持的資本，如果除了購買供自己使用的原材料並維持他在貨品出售以前的生活外，還有剩餘，他自然也會以這剩餘額僱用一個乃至數個幫工，以便靠他們的勞作獲利。這剩餘增加，他所僱幫工的人數自然也隨之而增加。

因此，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必隨一國收入和資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決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所以，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自隨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國民財富不增加，對工資勞動者的需求決不會增加。

然而，使勞動工資增高的，不是龐大的現有國民財富，而是不斷增加的國民財富。因此最高的勞動工資不在最富的國家出現，而卻在最繁榮，即最快變得富裕的國家出現。今日英格蘭確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勞動工資卻比英格蘭各地高。紐約地方，普通勞動者一日的工資為美幣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幣二先令；造船木匠為美幣十先

令六便士，外加之英幣六便士的糖酒一品脫，全部合英幣六先令六便士；泥水匠及建築木匠為美幣八先令，合英幣四先令六便士；裁縫幫工為美幣五先令，合英幣二先令十便士。這些價格都在倫敦價格之上。據說，其他殖民地的工資也和紐約同樣高。食品的價格，北美各地都比英格蘭低得多。北美從來沒有饑荒現象。即在歉收的年度，只不過減少輸出，沒減到自己供給不足。所以，北美勞動的貨幣價格如果比母國各地高，那末其真實價格，即其貨幣價格對勞動者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實際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比母國更高。

北美雖沒有英格蘭那樣富裕，但比英格蘭更繁榮，並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財富。一國繁榮最明確的標識，就是居民人數的增加。英格蘭以及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居民，在大約五百年內，不敢說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屬各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內，就增加了一倍。就現在說，這種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斷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據說，當地高齡居民往往能親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個以上的直系子孫。由於勞動報酬優厚，多子女不但不成為室家之累，反而成為家庭富盛的源泉。在離去雙親家庭以前，每個兒女的勞動，推算起來，足有純收益一百鎊的價值。一個有四五個孩子的青年寡婦，在歐洲中等及下等人民間，很少能找到第二丈夫，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兒女常是誘使男子向她求婚的財產。兒童的價值是結婚的最大鼓勵。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足怪的。可是，儘管早婚招致了人口很大的增加，但北美人民卻仍不斷髮出勞動者不足的訴苦聲。對勞動者需求的增加，和維持勞動者資金的增加，似乎比勞動供給的增加快得多。

一國儘管非常富有，如若長久陷於停滯狀態，我們就不能希望在那裏找到極高的工資。指定用來支付工資的資金，換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資本，也許達到極大的數額。但這數額如果數世紀不變，或幾乎不變，那末每年所僱用的勞動者人數就很容易供應下一年所需勞動者人數，甚或還有剩餘。這樣，勞動者既不缺少，僱主也不會為要獲得勞動者而相互競爭。在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增加卻自然會超過需要僱用的人數。就業機會常感不足，於是勞動者為要獲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競爭。假如，該國勞動者的工資，本來足夠養活他們各自的身家而且還有剩餘，那末勞動者間的競爭和僱主們的利害關係，不久就會使

工資減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哥孛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哥孛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於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於贍養家屬的記述，則衆口一辭。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爲搜尋，或者說，爲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於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爲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屍體，例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爛掉併發臭，他們得到它，正象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麼高興。結婚，在中國是受到了獎勵的，但這並不是由於生兒育女有出息，而是由於有殺害兒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總有若干嬰孩被委棄街頭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樣投在水裏。而這種可怕的殺嬰工作，據說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認的謀生手段。

不過，中國雖可能處於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裏，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僱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顯然減少。所以，最下級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雖很缺乏，但還能勉強敷衍下去，使其階級保持着原有的人數。

在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顯著減少的國家裏，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職業所需要的僱工和勞動者，都比前一年少。許多不能在上等職業中找得工作的上等階級人民，也想在最下等的職業中找工作。這樣，在最下等職業中，就不但有了超過需要的最下級勞動者，而且還有過多的從其他各階級紛紛擁入的人。結果，職業的競爭變得非常劇烈，以致把勞動工資減低到極悲慘極貧困的生活水準。而且，即使忍受這些苛刻條件，還有許多人找不到職業。這些人，要麼餓

死，要麼淪為乞丐，不然也許只有搞罪大惡極的勾當才能取得生活資料。接着，窮乏、飢餓和死亡等災禍就落到最下級的勞動者身上，後來波及所有上等階級，終至國內居民減少到經過苛政或災禍而碩果僅存的收入和資本所能容易維持的人數。東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領殖民地的現狀，也許幾乎就是如此。如果一個國家土地肥沃，人口又經大大減少，因而生活資料並不十分困難，可是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萬人因飢餓而瀕於死亡，我們就可以斷言，那是因為該國指定用來維持貧困勞動者的資金正在迅速減少。英國保護和統治北美的政治機構和壓迫與壓制東印度的商業公司的不同性質，用這兩地的不同情況來說明，也許是再好不過的。

所以勞動報酬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進的自然徵候。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維持費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徵候，而勞動者處於飢餓狀態，乃是社會急速退步的徵候。

看來，不列顛現今的勞動工資，顯然超過了維持勞動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數額。為證明這一點，我們無須作煩瑣或未必有結果的計算，來推定勞動者至少需多少工資，才能養活一家。有很多明顯徵象表明，不列顛各地勞動工資，不是以符合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為準則的。

第一，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級勞動也有夏季工資與冬季工資的區別。夏季工資總是最高工資。但冬季有薪炭臨時開支，故冬季家庭生活費在一年中為最大。生活費最低時，工資反而最高，這就表明，勞動工資不受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數額的支配，而受工作的數量及其假定價值的支配。也許有人說，勞動者應貯藏夏季工資的一部分，來支付冬季費用，而他全年的工資，並不超過他一年中維持身家所需要的數額。可是，奴隸或絕對仰賴他人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卻不是這樣。他的日常生活資料，都和他的日常需要相稱。

第二，不列顛的勞動工資，不隨食品價格變動而變動。食品價格，到處都年年變動，常常月月變動。但有許多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經過半世紀，還仍舊不變。因此，假若這些地方的貧窮勞動者，在食品最昂貴的年歲，能夠維持他的身家，那末，在食品價格一般而供給又很充足的年歲，必能過舒適生活；在食品異常低廉的年歲，就過着優裕生活。在過去十年中，不列顛有許多地方食物昂貴，

而勞動的貨幣價格並不隨着顯著提高。固然，確有些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提高了，但那與其說起因於食物的昂貴，倒不如說起因於勞動需求的增加。

第三，就不同年度說，食品價格的變動，大於勞動工資的變動，而就不同地方說，勞動工資的變動，卻大於食品價格的變動。麪包和家畜肉的價格，在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一般相同，或大約相同。這兩種商品以及大多數其他零售商品（貧窮勞動者零購的一切物品），在大都市和在僻遠地方，價格是同樣低廉，或者，大都市方面還比較低廉，其原因我以後說明。但大都市與其附近地帶的勞動工資，往往比數哩以外地方的勞動工資，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倫敦及其附近勞動的普通價格，可只說是每日十八便士。數哩以外，即減低到十四便士或十五便士。愛丁堡及其附近勞動的普通價格，可只說是每日十便士，數哩以外，就低落到八便士。八便士是蘇格蘭低地一帶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在那裏，這價格的變動比英格蘭少得多。勞動價格上的差異，雖未必會驅使一個人由一教區移到另一教區去，但貨物價格這樣的差異，卻必然使許多容積巨大的貨物，從一教區到另一教區，從國內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甚至可只說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運輸，變得非常頻繁，不久就使它們趨於均衡。人性見異思遷，雖早有定論，但根據我們的經驗，人類卻顯然又是安土重遷，最最愛移動的。貧苦勞動者，在不列顛勞動價格最低廉的地方，要是能夠維持家屬，那末在不列顛工資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過優裕的生活。

第四，勞動價格的變動，無論就時間說或就地方說，不但不與食品價格的變動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

一般人常食穀物的價格，蘇格蘭比英格蘭高，蘇格蘭幾乎每年都由英格蘭輸入大宗穀物。英格蘭穀物，在輸入穀物的蘇格蘭售賣的價格，必須高於在輸出穀物的英格蘭售賣的價格，但英格蘭穀物在蘇格蘭市場售賣的價格，不能高於和它相競爭的同質量蘇格蘭本地穀物的價格。穀物品質的良否，主要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就這一點說，英格蘭穀物，遠勝於蘇格蘭穀物，所以，從外表說，或從其體積說，英格蘭穀物的價格，雖高於蘇格蘭穀物的價格，但就其實質即品質或重量說，一般卻比蘇格蘭低廉得多。可是，勞動價格，在蘇格

蘭卻比英格蘭低。因此，貧苦勞動者，在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即蘇格蘭，如能維持其家屬，那末在聯合王國的另一部分即英格蘭，就必能過豐裕的生活。現今，蘇格蘭普通人民，從燕麥片為最常食和最好食物，這和英格蘭同階級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較，一般是壞得多。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兩地人民工資差異的原園，而是工資差異的結果，可是許多人卻往往不可思議地倒果為因。甲富而乙貧，並不是因為甲有馬，乙卻步行，而是因為甲富能備有馬車，乙貧不能不步行。

各年度計算，前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比現世紀高。現在，這是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實證，那末蘇格蘭，比英格蘭更為明確。因為蘇格蘭每年的公定谷價可作證明，蘇格蘭每年按市場實際狀況，依宣誓手續，評定所屬各地種種穀物的價格。如果這種直接證掘還需要間接證據作為旁證，那末我說，法國甚或歐洲大多數地方的情況也是這樣。就法國說，我們有了最明確的證明。不過，前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穀物價格，略高於現世紀，雖無可置疑，但前世紀兩地勞動價格，比現世紀低得多，亦同樣無可置疑。因此，假如貧窮勞動者，在前世紀能夠維持他的家屬，那末，他現在必定能過着舒適得多的生活。前世紀，在蘇格蘭大多數地方，普通勞動的最普通日工資，夏天為六便士，冬天為五便士。在蘇格蘭高地及西部各島若干地方，工資還是一星期三先令或大約三先令。現在，在蘇格蘭低地，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一天為八便士。在愛丁堡附近，在鄰近英格蘭因而可能受英格蘭影響的各州，在勞動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哥、卡朗和愛州等附近，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一天為十便士，有時或為一先令。英格蘭農工商業的改進，遠較蘇格蘭為早。勞動的需求以及勞動的價格，必隨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前世紀和現世紀，英格蘭的勞動工資高於蘇格蘭。而且從那時以來，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大大增加，但由於英格蘭各地支付的工資，在種類上比蘇格蘭多，所以，要確定英格蘭工資的增加率，比蘇格蘭困難。1614年，步兵一名一日的餉銀，與現今同為八便士。當初規定這種餉額時，必然是以普通勞動者普通工資為標準，因為步兵大都徵自這個階級。查理二世時代，高等法院院長黑爾斯，推算勞動者六口（父親母親，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用費，一星期為十先令，即一年需二十六鎊。他認為，如果他們不能靠勞動來賺得此數，他們就得靠乞討或盜竊來湊成此數。黑爾斯對

於這問題，似曾下了一番研究。從熟習政治數學博得德維南博士的格里戈裏·金，也曾於至6既年推算一般勞動者及外傭工的普通收入，以為平均由三個半人合成的家庭，一年需費十五鎊。從表面上看，金的計算，似與黑爾斯的計算有出入，但實則大體一致。他們都認為，這種家庭一星期的用費，每人約二十便士。從那時以來，王國多數地方，這種家庭的貨幣收入與貨幣費用，都有大的增加，不過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沒有象最近刊佈的關於現今勞動工資增高那些誇張報告所說的那麼多。必須指出，任何地方的勞動價格，都不能極正確地確定。因為，就是同一地方同一種類的勞動，也往往依照勞動者的巧拙只及僱主的寬吝，給付不同的價格。在工資波有法律規定的地方，我們想要確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資。而且，經驗似乎告訴我們，法律雖屢次企圖規定工資，但實際上，卻從未作出適當的規定。

現世紀，勞動的真實報酬，即勞動使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於勞動貨幣價格的增加。不僅穀物的價格，比從前稍稍低廉，而且那些成為貧窮勞動者適意和衛生食料的許多其他東西的價格，也大大跌落。例如，現今王國大多數地方馬鈴薯價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從前用鋤而今日普通用犁種植的蕪青、胡蘿蔔、捲心菜等的價格，也可以說和馬鈴薯同樣低廉。一切蔬果，也變得低廉。我們知道，前一世紀英國消費的大部分蘋果和洋蔥，都是由弗蘭德輸入的。麻布製造和呢絨製造的大改良，給勞動者提供了質更好價更廉的衣服。賤金屬製造的大改良，不僅給勞動者提供了更精良的職業用具，而且提供了許多快意的和便利的傢俱。誠然，肥皂、食鹽、蠟燭、皮革及發酵酒，由於課稅而擡高了價格，但其中，為貧窮勞動者所必須消費的分量，卻極其有限。這小部分商品價格的昂貴，並不抵消其他多數物品價格的下落。世人往往說，奢侈之風，波及下等階級，連貧窮勞動者現在也對以前的衣食住條件感到不滿足，他們這樣說，使我們確信，勞動的貨幣價格與其真實價格增大了。

下層階級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呢，或是對社會不利呢？一看就知道，這問題的答案極為明顯。各種傭人、勞動者和職工，在任何大政治社會中，都佔最大部分。社會最大部分成員境遇的

改善，決不能視為對社會全體不利。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而且，供給社會全體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勞動生產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過得去的衣食住條件，纔算是公正。

貧困無疑會使人不想結婚，但未必會使人不結婚。貧困似乎還有利於生育。蘇格蘭高地處於半飢餓狀態的婦女，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會婦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兩三個。不妊症，雖為上等社會所常患，但在下等社會，卻極少有。女性的奢侈，雖能刺激享樂的慾望，看來往往會削弱，而且常常會徹底破壞生育能力。

貧困雖不能阻止生育，但極不利於子女的撫養。柔嫩植物長出來了，但在土地塞冽和氣候嚴酷的環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聽說，蘇格蘭高地常有一母產子二十個而活的只有一個的實例。幾個富有經驗的軍官告訴我說，士兵在聯隊內生的全部兒童，漫說後來用以補充聯隊的缺額，即用以充當聯隊的吹鼓手，亦嫌不夠。但是，在兵營附近看到的可愛孩子，卻比其他地方多。這些孩子很少長到十三四歲。有些地方生出來的兒童，在四歲前，死去一半；有許多地方，在七歲前死去一半；在九、十歲前死去一半，幾乎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樣大的死亡率，在各地地方下等人民間都可看到。他們不能象上等人民那麼注意養育子女。一般地說，他們的結婚，雖比上流社會的人更為多產，但他們的兒童中，達到成年的卻比較少。與普通人民的兒童比較，育嬰堂及教區慈善會內收養的兒童，死亡率還要大。

各種動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資料成比例。沒有一種動物的增殖，能超過這個比例。然而，在文明社會，只有在下等人中間，生活資料不夠才能限制人類進一步繁殖。要限制進一步的增殖，除了殺死他們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沒有其他方法。

豐厚的勞動報酬，由於它使勞動者能夠改善他們兒童的給養，從而使他們能夠養大較多的兒童，勢必會放寬和擴大上述限度。應該指出，上述限度擴大的程度，也必然儘可能和勞動需求所需要的程度相稱。如果勞動需求繼續增加，勞動報酬必然鼓勵勞動者結婚和增殖，使他們能夠不斷增加人口，來供給不斷增加的勞動需求。什麼時候，要是勞動報酬不夠鼓勵人口增殖，勞動者的缺乏不久就會擡高勞動的

報酬。什麼時候，要是勞動報酬過分鼓勵人口增殖，勞動者的過多不久就使勞動的報酬減到其應有的程度。在前一場合，市場上的勞動供給，如此不足，在後一場合，市場上的勞動供給，又如此過剩，結果都迫使勞動價格，不久又回到社會所需要有的適當程度。因此，象對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產一樣，對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產。生產過於遲緩，則加以促進；生產過於迅速，則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論在北美，在歐洲，或是在中國，支配和決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這一需求。這需求在北美，成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歐洲，成為人口緩慢而逐漸增加的原因，在中國，就成為人口不增不減的原因。

據說，奴隸的損耗，其損失在僱主，自由傭工的損耗，其損失卻在他自身。其實，後者的損耗，與前者的損耗一樣都是屋主的損失。各種職工和傭工，都必須給付這樣的工資，使他們能夠按照社會對他們的需求的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等情況，而維持其種類。不過，自由傭工的損耗，雖同是僱主的損失，但與奴隸的損耗比較，則僱主所受損失又少得多。要是我可這樣說，用作補充或修補奴隸損耗的資金，通常都由不留心的僱主或疏忽的監工管理。但修補自由傭工損耗的資金卻由自由傭工自己管理。一由錢財通常管理得漫無秩序的富人管理，所只管理上自亦漫無秩序；一由處處節省和錙銖必較的窮人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處處節省和錙銖必較。在這樣不同的管理下，相同的目的，卻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費用。所以，徵之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的經驗，我相信，由自由人做成的作品，歸根到底比由奴隸做成的作品低廉。即在普通勞動工資很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也是這樣。

所以，充足的勞動報酬，既是財富增加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對充足的勞動報酬發出怨言，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發出悲嘆。

也許值得指出，不是在社會達到絕頂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處於進步狀態並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樂。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境遇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是困苦。進步狀態實是社會各階級快樂旺盛的狀態。靜止狀態是呆滯的狀態，而退步狀態則是悲慘的狀態。

充足的勞動報酬，鼓勵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勵他們勤勉。勞動工資，是勤勉的獎勵。勤勉象人類其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勞動者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他們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捷。例如，英格蘭勞動者比蘇格蘭勞動者強；大都會附近的勞動者比僻遠農村的勞動者強。誠然，有些勞動者如能在四天中掙得足以維持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資料，將無所事事地虛度過其餘三天，但就大多數勞動者說，並不如此。反之，在工資按件計算時，許多勞動者往往沒幾年就把身體搞垮了。據說，倫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不能保持最精壯氣力到八年以上。此種現象，在工資按件計算的許多其他行業，常有發生。製造業一般是按件計算工資，連農村勞動在工資較通常為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計資。幾乎各種技工，在特殊業務上，往往因操勞過度而生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醫生拉馬齊尼，關於這類疾病，曾著有專書。我們不把我們的士兵看做勤勞人民，但在他們從事某項特殊工程而按件領受工資時，軍官常須與領工者約定，他們每日報酬，按他們的報酬率，不得超過一定數額。在這條件訂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競爭希望得到較大報酬而操勞過度，損害健康。一星期中四天過度的操勞，乃是其餘三天閒散的真正原因，而世人對於這三天的閒散，卻大發牢騷並大聲叫囂。大多數人在連續數天緊張的腦力或體力勞動之後，自然會強烈地想要休息。這慾望，除非受到暴力或某種強烈需要的抑制，否則是幾乎壓制不住的。天性要求，在緊張勞動之後，有一定程度的縱情快樂，有時只是悠閒自在一會，有時卻是閒遊浪蕩和消遣娛樂。如不依從這要求，其結果常是很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不然，遲早亦會產生職業上的特殊疾病。如果僱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勞動者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有人說，在物價低廉的年度，勞動者大抵較平常懶惰；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則較平常勤勉。他們由此得到結論：生活資料豐富，勞動者的工作，就弛緩起來；生活資料不足，勞動者的工作就緊張起來。說生活資料略較平常豐富，也許使一部分勞動者偷閒，那是無可置疑的，但若說大多數勞動者，都會因此怠於作業，或者說，一般人在吃

得不好時，比吃得好時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更好，在疾病時，比健康時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說法。應該指出，對一般人民說，饑饉的年歲，往往是疾病死亡的年歲，而疾病和死亡，勢必減低他們的勞動產物。

在物資豐厚的年度，傭工往往離開主人，靠自己勞動生活。但食品價格的低廉，由於增加用來維持傭工的資金，也鼓勵僱主，尤其是農業家，僱用更多的傭工。因為在這時期，農業家與其以低廉市價出賣穀物，倒不如以穀物維持較多傭工，以期得到較大的利潤。對傭工的需求增加，而供應這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低廉時上升。

在物資缺乏的年度，生計的困難與不安定，使這些傭工切望復得舊有的工作。但食品的高價，由於減少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使僱主傾向於減少現有的傭工，而不傾向於增加。況且，在物價高昂的年度，貧窮獨立勞動者往往把以前用以購置材料的少額資本全部提出來消費，這樣就不得不變為傭工。求職的人數，既然超過了就職的機會，許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條件，來獲取職業。所以在物價昂貴的年度，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低落。

因此，各種居主，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和勞動者訂結契約，比在物價低廉的年度更為有利，而且覺得，勞動者在前一場合，比在後一場合，更為恭順，更願依靠他們，所以，僱主們認為，物價高昂的年度，對他們的事業更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農業家喜歡物價高昂的年度，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的地租和利潤，大部分決定於糧食的價格。不過，若說一般人在為自己工作時，工作較少，在為他人工作時，工作較多，那是再荒謬不過的。貧窮的獨立勞動者，一般都比按件計資的幫工勤勉，因為前者享有自身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後者則須與僱主分享。大製造廠中的傭工，容易受惡友誘惑，往往道德淪喪；獨立勞動者卻不易受此影響。工資以年或月計的傭工，不論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樣的工資和津貼，就這一點說，獨立勞動者的工作效率比這些傭工更大得多。物價高昂的年歲，傾向於增高獨立勞動者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而物價低廉的年歲，則傾向於減低其比例。

麥桑斯是法國一位博學多能的作家，在聖·埃蒂安選舉時任貢稅收稅官。爲要說明貧民在物價低廉時所做的工作比物價高昂時多，他曾把三種製造品——埃爾伯夫的粗毛織品和盧昂遍地皆是的麻織品與絲織品——在物價低時及物價高時的產量及價值，拿來比較。據他由官署登記簿抄下的報告，這三種製造品在物價低時的生產量及價值，一般都比物價高時大；物價最低的年度，生產量與價值，往往最大，而物價最高的年度，往往最小。這三種製造品似乎都處於生產停滯狀態，其生產量，逐年計算，雖略有出入，但總的說來，卻是不增不減。

蘇格蘭的麻織品，和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品，同是正在增加的製造品。其生產量與價值，雖時有變動，但大體上卻在增高。不過，我曾檢閱這些製造品年產額公佈的記錄，卻不能發現年產額的變動與各時期的物價高低有什麼顯著關係。誠然，在物資非常不足的1740年，這兩種製造品產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資仍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蘇格蘭製造品產量卻比常年多。同年，約克郡製造品產量卻下降，其生產額，直至1766年，換言之，直到美洲印花稅法廢止以後，才恢復到1755年的數額。在1766年和1767年，約克郡製造品生產額增加到前此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從那時起不斷地增加。

以販銷遠地爲目的的一切大製造業的產品量，與其說必然取決於產地旺季價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說必然取決於消費國中影響商品需求的那些情況，取決於和平或戰爭，取決於其他競爭製造業的盛衰，取決於那些商品的主要顧客是高興買還是不高興買。此外，也許在物價低廉時期製造的額外作品，有大部分，未曾登記在製造業公開記錄上。離開僱主的男傭工，成爲獨立勞動者。婦女回到父母家中，從事紡織，給自身及家庭製造衣服。連獨立勞動者也未必都製造售給大眾的商品，而爲鄰人僱請，製造家庭用品。所以，他們的勞動產品，常沒登記在公開記錄上，這些記錄，有時是那麼誇張，而我們商人和製造業者，卻往往根據這種記錄，妄斷最大帝國的盛衰。

雖然勞動價格的變動，不一定都與食物價格的變動一致，而且往往完全相反，但我們不可因此認爲，食品價格對於勞動價格沒有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必然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其一，是對勞動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對勞動的需求，按照它是

在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換言之，按照它所需要的是增加着的人口、減少着的人口或是不增不減的人口，而決定必須給予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的貨幣價格，取決於購買這數量所需要的金額。所以，在食物低廉的場合，勞動的貨幣價格雖有時很高，但在食物昂貴而勞動需求繼續不變的場合，勞動的貨幣價格卻更高。

勞動的貨幣價格，在突然非常大的豐年，有時上升，而在突然非常大的荒年，有時下落，這是因為在前一場合，勞動的需求增加，而在後一場合，勞動的需求減少。在突然非常大的豐年，許多僱主手中的資金，足夠維持和僱用比他們前一年所僱用的多的勞動者，而這些超過通常需要的勞動者，未必都能僱到，於是，要僱用更多勞動者的僱主，便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使勞動的貨幣價格及真實價格擡高起來。

在突然發生的非常大荒年，情形正相反。用來僱用勞動者的資金，既較前年度為少，便有許多人失業，於是他們為獲得職業而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使勞動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都下落。譬如在1740年這個非常大的荒年，有許多人只要有飯吃就願工作。在後此的幾個豐年裏，僱用勞動者和僱工僅比較困難了。

食品漲價，會提高勞動的價格，而物價昂貴年度的荒歉，由於減少了勞動需求，因而會降低勞動的價格。反之，食品跌價，會減低勞動的價格，而物價低廉年度的豐饒，由於增加了勞動需求，因而會擡高勞動的價格。在食品價格只有一般變動的場合，那兩種對立原因，似乎會互相抵消。這也許就是勞動工資所以到處都較食物價格穩定得多、經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

勞動工資的增加，必然按照價格中工資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擡高許多商品的價格，並按照價格增高的比例，減少國內外這些商品的消費。但是，使勞動工資增加的原因，即資本的增加，卻會增加勞動生產力，使較少的勞動生產較多的產品。僱用很多勞動者的資本家，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勢必妥當分配他們的業務，使他們生產儘可能多的產品。由於同一原因，他力圖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機械供給他們。在某一特殊工廠內勞動者間發生的事實，由於同一理由，也在大社會的勞動者間發生。勞動者的人數愈多，他們的分工當然就

愈精密。更多人從事於發明對各人操作最適用的機械，所以這種機械就容易發明出來。由於有了這些改良的機械，許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勞動生產出來。這樣，勞動量的減少，就不只抵償勞動價格的增加。

第九章論資本利潤

資本利潤的增減，與勞動工資的增減，同樣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但財富狀態對兩者的影響卻大不相同。

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因而傾向於減低利潤。在同一行業中，如有許多富商投下了資本，他們的相互競爭，自然傾向於減低這一行業的利潤；同一社會各種行業的資本，如果全都同樣增加了，那末同樣的競爭必對所有行業產生同樣的結果。

前面已經說過，即使要確定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時間的勞動的平均工資，也不容易。而且，所能確定的，只不過是最普通的工資。但就資本利潤說，就連最普通的利潤，我們也很少能夠確定。利潤極易變動，經營某特定行業的人，未必都能夠說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潤是多少。他的利潤，不但要受他所經營的那些商品價格的變動的影響，而且要受他的競爭者和顧客運氣的好壞、商品在海陸運輸上甚或在堆棧內所可能遭遇的許許多多意外事故的影響。所以，利潤率不僅年年變動，日日變動，甚至時時刻刻都在變動。要確定一個大國內各行業平均利潤，必然更加困難；至於要相當準確地確定以前或現今的利潤，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不過，我們要相當準確地確定往昔或現今的資本平均利潤，雖不可能，但我們可以貨幣的利息上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原則：在使用貨幣所獲較多的地方，對於貨幣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多的報酬；在使用貨幣所獲較少的地方，對於貨幣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少的報酬。我們由此確信，一國內資本的一般利潤，必定隨着其市場的一般利息率的變動而變動。利息率下落，利潤必隨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潤必隨着上升。所以，利息的變動情況，可使我們略知利潤的變動情況。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以法令宣佈，一切利息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可見，以前的利息有的時候是在百分之十以上。其後，熱心宗教的愛德華六世，受宗教的影響，禁止一切利息。但這種禁令，和同性質的其他各種禁令一樣，據說沒產生效果，而高利貸的弊害，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於是，亨利八世的法令，由於伊麗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條的規定，又發生效力了。此後，百分之十常為法定利息

率，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把它限定為百分之八。復辟後不久，利息率減為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再減至百分之五。這一切法律的規定，看來極其適當。它們都是在市場利息率即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借款的利息率變動之後作出的，並不是走在前頭。自安妮女王時代以來，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似乎比市場利息率高，而不比它低。在晚近戰爭以前，政府曾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而王國首都及其他許多地方，有良好信用的人則以百分之三點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點五等利息率借款。

我國自亨利八世以來，財富與收入都在不斷增加，而且在進展過程中，其速度似乎是逐漸增加，而不是減少。不僅日在進步，而且進步得越來越快。這期間的勞動工資不斷增加，而大部分工商業的資本利潤卻在減少。

在大都市經營一種行業，往往比鄉村需墓更多的資本。各種行業上所使用的資本的龐大和富裕的競爭者人數的衆多，乃是都市資本利潤率一般低於農村資本利潤率的原因。但是，都市的勞動工資，一般都比農村高。在繁榮的都市，擁有大量生產資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們所需要的人數僱到勞動者，所以他們互相競爭，這樣就擡高勞動工資而減低資本利潤。在沒有充分資本來僱用全體勞動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為獲得職業而相互競爭，於是勞動工資降落，而資本利潤增高。

蘇格蘭的法定利息率雖與英格蘭相同，市場利息率卻高些。該地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不能以少於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就連愛丁堡的私立銀行，對於隨時兌現全部或一部分的期票，也給與百分之四的利息。倫敦的私立銀行，對於儲入的資金，不給付利息。在蘇格蘭經營幾乎所有行業，所需資本都比英格蘭少。所以蘇格蘭普通利潤率，比英格蘭高些。上面已經說過，蘇格蘭的勞動工費，比英格蘭低。此外，蘇格蘭不僅比英格蘭窮得多，其進展的速度也慢得多，儘管它明顯地是在前進。

法國法定利息率，在本世紀內，不常受市場利息率的支配。在1720年，法定利息率，由二十分之一落到五十分之一，即由百分之五落到百分之二。在1724年，提到三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三點三。在1725年，再提到二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五。1766年，拉弗迪執

政，又減到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其後，神父特雷執政，又恢復到原來的百分之五。一般認為，這樣強行抑制法定利息率的目的，在於為減低公債利息率做準備；這種目的有時確曾達到。就現在說，法國也許沒有英國那麼富裕。法國的法定利息率一般比英國低，而市場利息率卻一般比英國高。這是因為法國，象其他國家一樣，有了很安全和很容易的迴避法律的方法。據在英法兩國經商的英國商人說，法國的商業利潤比英國高；正由於這個原因，許多英國人不想把資本投在重商的本國，卻願投在輕商的法國。法國的工資比英國低。你如果由蘇格蘭到英格蘭去，你所看到的這兩地普通人民服裝和麪色的差異，可充分表示這兩地社會狀況的差異。然而，假如你從法國回到英國來，這種對照就更為鮮明瞭。法國無疑比蘇格蘭富裕，但其進步速度似乎不及蘇格蘭。對於蘇格蘭，人們一般甚或普遍認為，它正在退步；此種見解，即使對法國說，也是沒有根據的；一個二三十年前曾到過蘇格蘭視察而現在又到那邊視察的人，絕不會對它抱有此種見解。

反之，就領土面積及人口的比例說，荷蘭比英格蘭富裕。荷蘭政府以百分之二的利息率借款，而有良好信用的人民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據說，荷蘭的勞動工資比英格蘭高。大家又都知道，荷蘭人經營生意所獲利潤，比歐洲其他任何國人都低。有些人說，現今荷蘭的商業正在衰退。就商業的某些部門說，也許確是如此。但上面所說的徵候似可表明，該國商業並未一般衰退。當利潤減少時，商人們往往都埋怨說商業衰退了；可是利潤減少，乃是商業繁盛的自然結果，或是所投資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結果。在晚近英法戰爭中，荷蘭人乘機獲得了法國全部運輸業務，而且直到現今，還有一部分操在荷蘭人手中。英法的國債，成為荷蘭人一宗大財產。據說，單就英國說，就有大約四千萬鎊（但我以為這說得過大）。此外，荷蘭人還把鉅額資金貸給較本國利息率為高的外國的私人。這些事實，無疑表示他們資本的過剩，或者說，他們的資本已增加到投在本國適當生產上不能得相當利潤的程度，但不表示商業衰退。由經營特定行業而獲得的私人資本，雖增加到不能盡行投在這一行業上的程度，但這一行業仍繼續增進；大國的資本也可有這種情況。

在我國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勞動工資、貨幣利息只及資本利潤，都比英格蘭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 and 市場利息率，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不過，勞動的高工資和資本的高利潤同時存在，是新殖民地特殊情況所特有的現象，而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見的。在新殖民地中，資本對領土面積的比例以及人口對資本的比例，在一定期間內必定比大多數國家低。他們所有的土地，多於他們資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們只把資本投在土質最肥沃和位置最適宜的土地上，即投在海濱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此外，購買這等土地的價格，往往低於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為購買並改良這等土地而投下的資本，必然產生極大的利潤，因而使他們能夠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這種有利用途上的資本的迅速積累，使種植園所有者能僱用的工人數，很快增加到新殖民地不能供應的程度。這樣，他們能在新殖民地居到的勞動者的報酬，使極其優裕。但是，隨着殖民地的擴展，資本利潤就逐漸減少。土質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既全被佔有，耕作土壤和位置較差的土地所能取得的利潤，使減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資本，也只能提供較低的利息。在現世紀中，我國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 and 市場利息率，都因此大大減低。隨着財富、改良工作及人口的增進，利息低落了。勞動工資卻不與資本利潤共同跌落。不論資本利潤如何，對勞動的需求，隨資本增加而增加。利潤儘管減低，資本卻不但繼續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為迅速。就此點說，勤勞的國家和勤勞的個人都一樣。大資本利潤雖低，但比高利潤的小資本，一般增加得更為迅速。俗語說，貨幣產生貨幣。已經取得了少許，不愁不能取得更多。最困難的是這少許的取得。在前面，我已就資本的增加和業務的增加，即資本的增加和對有用勞動的需求的增加這兩者的關係，作了部分的說明，以後在論述資本積累時，當詳加說明。

新領土的獲得或新行業的開展，即使在財富正在迅速增加的國家，也會提高資本利潤，因而也會增加貨幣利息。由於這國家的資本，不夠應付這種新獲得或新發展所給各個人帶來的全部業務，所以只把它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潤的那些行業上。以前投在其他行業上的資本，必有一部分撤回來，轉入更有利的新行業。所以，在那些舊行業，競爭便沒有以前那麼劇烈，而市場上各種貨物的供給也減少了。貨物減少，價格勢必或多或少地上升，這就對經營者提供更大的利潤，而他們也能以比從前高的利息率借入資金。在晚近戰爭結束以後

不久，有良好信用的個人，乃至一些倫敦最大商號，一般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在戰前，他們通常沒交付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點五以上的利息。這可由我國佔領北美和西印度曾增加我國領土與商業那一事實來充分說明，用不着設想我國資財已經減少。舊資本所要經營的業務增加得那麼多，那必然會使很多行業的資本量減少，結果，在這些行業，由於競爭已較和緩，利潤必然增加。我相信，晚近戰爭的巨大費用，並沒使不列顛的資財減少，其原因，我以後將加以說明。

但是，社會資財即維持產業的資金的減少，使勞動工資降低，因而使資本利潤以及貨幣利息增高。由於勞動工資低落，社會上剩有的資本的所有者，以貨品提供市場所需的費用，比以前少；由於他們以貨品提供市場所用的資本比以前少，他們能夠且比以前高的價格出售貨物。所費較少，所得較多，他們的利潤從兩方面增加，因此能夠出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及東印度其他英領殖民地，獲得巨大資產是那麼快、那麼容易這一事實，可以證明這些貧苦地方的勞動工資非常的低而資本利潤非常的大。其貨幣利息也相應地非常的高。孟加拉農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資金，並以次期的收穫物作為抵押。能夠擔負這種高利息的利潤，必然侵佔地主的幾乎所有地租，而這樣高的利息，也必然侵佔利潤的大部分。羅馬共和國衰亡以前，各地方在總督竭澤而漁的暴政下，似乎都有同樣高的利息。從西塞羅的書簡，我們知道，有道德的布魯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島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借款。

一國所獲的財富，如已達到它的土壤、氣候和相對於他國而言的位置所允許獲得的限度，因而沒有再進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這種狀態下，它的勞動工資及資本利潤也許都非常的低。一國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達到其領土所可維持或其資本所可僱用的限度，那末，在這種狀態下，職業上的競爭必然非常激烈，使勞動工資低落到僅足維持現有勞動者人數，而且由於人口已經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國的資本，如與國內各種必須經營的行業所需要的資本相比，已達到飽和程度，那末各種行業所使用的資本，就達到各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允許使用的程度。這樣，各地方的競爭就大到無可再大，而普通利潤便小到無可再小。

然而，也許沒有一個國家的財富曾經達到這種程度。中國似乎長期處於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麼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藉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範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得極大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息率，據說是百分之十二，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擔負這樣高的利息。

一國法律上的缺陷，有時會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過它的貧富狀況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強制人們履行契約，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處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國家中破產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遠。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確定性，就使他索取破產者在借款時通常需要出的那麼高的利息。在侵略羅馬帝國西部各地的未開化民族中，有許久，契約的履行與否只憑當事者的信義，他們王朝的裁判所很少過問此事。當時利息率達到那麼高，恐怕這也是一部分原因。

要是法規完全禁止利息，那也不能收到效果。許多人必須借入資金；而出借人，不僅對於這筆資金的使用，要求相當的報酬，而且對於迴避法律的困難和危險，也要求相當的補償。孟德斯鳩說，一切回數國利息率之所以高，並不是圖為他們貧窮，而是部分因為法律禁止利息，部分因為貸金難於收回。

最低的普通利潤率，除了足夠補償投資容易遇到的意外損失以外，還須有剩餘。只有這一剩餘纔是純利潤或淨利潤。普通所謂總利潤，除了包含這種剩餘以外，還包含為補償意外損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與純利潤成比例。

出借資金，即使相當謹慎，亦有受意外損失的可能。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潤率一樣，除了補償貸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損失外，還須有剩餘。如果無此剩餘，那末出藉資金的動機，就只能是慈善心或友情了。

在財富已達到極度、而且用在各種行業上的資本都已達到最大限度的國家，普通純利潤率便很低，因而這種利潤所能負擔的普通市場利息率也很低；這樣，除大富豪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貨幣利息生活。小有產者和中等有產者，都不得不自己監督自己資本的用途。幾乎一切人都得成為實業家，都有從事某種產業的必要。荷蘭的現狀，似與此相似。在那裏，不是實業家，就不能算是時髦人物。需要使得幾乎每一個人都習以為常地去經營某種行業。習俗又到處支配時尚。不和別人穿上同樣的服裝，便成為笑柄；不和別人同樣從事實業，也不免成為笑柄。一個無所事事的遊惰者，廁身實業家中間，正如一個文官廁身軍隊中間一樣，會感到很尷尬，甚至會受到輕視。

最高的普通利潤率，也許是這樣一種利潤率，它在大部分商品價格中佔去應當歸作地租那一部分的全部，僅餘足夠支付商品生產及上市所需的勞動的最低工資，即僅足維持生存的工資。在勞動者從事工作時，總得設法養活他們，但地主未必都要給付。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孟加拉經營商業的利潤，恐怕與這最高率相差不遠。

通常市場利息率對普通純利潤率所應有的比例，必隨利潤升落而變動。英國商人把相當於兩倍利息的利潤，看做適中合理的利潤。我想，這所謂適中合理的利潤，不外就是普通利潤。在普通純利潤率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國家，借用資金來經營業務的人，從所得利潤之半作為利息，也許是合理的。資本由借用人擔負風險，他好象給出借人保險；在大部分行業，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既可作為這種保險所冒風險的足夠補償，亦可作為不辭辛苦運用這筆資本的足夠報酬。可是，在普通利潤率低得多或高得多的國家，就不可能有像上述那樣的利息和純利潤的比例。利潤率低得多時，也許不能以一半作為利息；利潤率高得多時，就可以一半以上作為利息。

財富迅速增進的國家，可在許多商品的價格上，以低的利潤彌補高的勞動工資，這樣它們的商品，就能與繁榮程度較低而勞動工資較低的鄰國的商品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

實際上，高利潤擡高生產物價格的傾向，比高工資大得多。例如，麻布製造廠各種勞動者，如梳麻工、紡工、織工等的工資，如果每日各提高二便士，那末麻布一匹價格所必須增高的數額，只等於生產這一匹麻布所僱的工作人數，乘以他們生產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

數，再乘以二便士。商品價格中歸於工資的那一部分，在一切製造階段，按算術級數遞次增加。但僱用這些工人的所有僱主的利潤，如果都擡高百分之五，那末，商品價格中歸於利潤的那一部分，在一切製造階段，就按幾何級數遞次增加。就是說，梳麻工的僱主在賣麻時，要求他所墊付的材料和工人工資的全部價值，另外加上百分之五。同樣，紡工的僱主，也要求他所墊付的麻價和紡工工資的全部價值，另外加上百分之五。推而至於織工的僱主，也同樣要求另外加上百分之五。所以，工資增高對商品價格擡高的作用，恰如單利對債額累積的作用。利潤增高的作用，卻象複利一樣。我國商人和製造者，對於高工資提高物價、從而減少國內外銷路的惡果，大發牢騷；但對於高利潤的惡果，他們卻隻字不談。關於由自己得利而產生的惡果，他們保持沉默。他們只對由他人得利而產生的惡果，大喊大叫。

第十章 論工資與利潤隨勞動與資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的勞動和資本用途的利害，總的說來，在同一地方內，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斷趨於相等。在同一地方內，假若某一用途，明顯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會有許多人離去比較不利的用途，而擠進比較有利的用途。這樣，這種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其他各種用途相等。至少，在各事物都聽任其自然發展的社會，即在一一切都聽其自由，各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並能隨時自由改業的社會，情況確是如此。各人的利害關係必然會促使他尋求有利的用途，避開不利的用途。

誠然，歐洲各地的貨幣工資及貨幣利潤，都隨勞動和資本用途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但這種不相同，部分起因於各種用途本身情況，這些情況，實際上，至少在一般人想象上，對某些職業的微薄貨幣得利有所補償，而對另一些職業的優厚貨幣得利有所抵銷；部分因為歐洲各國的政策都不讓事物完全自由地發展。

為要分別討論那些情況及那種政策，我把本章分作兩節。

就我所能觀察到的說，有以下五種主要情況，一方面對某些職業的微薄金錢報酬給予補償，另一方面又對另一些職業的優厚金錢報酬加以抵銷：第一，職業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職業學習有難有易，學費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職業所須擔負的責任有重有輕；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第一，勞動工資因業務有難易、有污潔、有尊卑而不相同。例如，大多數地方，就整年計算，縫工的所得較織工為少，這是因為縫工的工作較為容易。織工的所得較鐵匠為少，這是因為織工的工作清潔得多。鐵匠雖是一種技工，但十二小時工作所得，往往不及一個普通煤礦工八小時工作所得，這是因為鐵匠的工作，不象煤礦工那麼污穢危險，而且他是在地面上日光下工作。對於一切尊貴職業，榮譽可以說是報酬的大部分。如本節後面所述，就金錢得利說，考慮到各方面，從事此等職業的報酬一般都很有有限。反之。在卑賤的職業上，情形正相反。屠戶的職業既粗蠻又討厭，但在許多地方，他們的得利比

大部分其他普通職業多。劊子手的職業，是最可嫌惡的職業，可是，與其工作量相比，他的報酬比任何普通職業都多。

未開化社會視為最重要的漁獵，在進步社會，卻成為最愉快的娛樂。古時為必要而漁獵，今日卻為消遣而漁獵。所以在進步社會內，把別人消遣的事當作職業的人，都是極貧苦的。自西奧克里塔斯時代以來，漁夫都極其貧困。私獵者在英國各地都是極貧苦的人。在嚴禁私獵的國家中，特許狩獵者的狀況也不見得優裕多少。許多人操此等職業是由於他們對此等職業的自然興趣，而不是由於此等職業能給他們提供優裕生活；而他們勞動生產物的售價，與其勞動量相比，總是過於低廉，從事此種職業的人，除了極少的生活費外，實不能更有所得。

不愉快和不名譽對資本利潤的影響，和它們對勞動工資的影響相同。小旅館或小酒店的老闆決不是自己店鋪的主人，醉客蠻橫無理，他們只好忍受，他們所操的職業是不名譽和不愉快的職業。但在普通營業中，象這樣以小額資本得到大額利潤的營業，是很少見的。

第二，勞動工資，因業務學習有難易、學費有多寡而不相同。

設置高價機器，必然期望達機器在磨毀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業可以收回投下的資本，並至少獲得普通的利潤。一種費去許多工夫和時間才學會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練的職業，可只說等於一臺高價機器。學會這種職業的人，在從事工作的時候，必然期望，除獲得普通勞動工資外，還收回全部學費，並至少取得普通利潤。而且，考慮到人的壽命長短極不確定，所以還必須在適當期間內做到這一點，正如考慮到機器的比較確定的壽命，必須於適當期間內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潤那樣。熟練勞動工資和一般勞動工資之間的差異，就基於這個原則。

歐洲各國的政策都把機械師、技工和製造師的勞動看做熟練勞動，而把一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看做普通勞動。這種政策似乎認為，前者的勞動化後者的勞動在性質上更細緻更巧妙。在若干場合也許是這樣，但在大多數場合卻不是這樣，我在下面加以說明。所以，歐洲各國的法律習俗，為使某人從事前一種勞動的資格，都要求他先作學徒，但嚴格程度各地不同。而對於後一種勞動，全聽人自由，不加限制。在作學徒期內，學徒的全部勞動都歸師傅所有。學徒的生活費，在許多場合，還是仰給於父母親或親戚，至於衣服，幾乎都是由

父母親或親戚務辦。依照普通習慣，學徒還須給師傅若干學費。不能給付金錢的學徒就要給付時間，換言之，要做比一般年限長的學徒。不過，這對師傅未必有利，因為學徒往往習於怠惰，而這對學徒總是不利的。反之，就農村勞動說，勞動者往往在被僱從事簡易工作的時候學會了比較繁難的工作。在受僱期中，無論在什麼階段，他都能以自己勞動維持自己生活。因此，歐洲各國的機械師、技工和製造師的工資，論理要稍稍高於普通勞動者的工資，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這種情形，使他們成為高人一等的人。但是，一般地說，他們這種優越程度很有限。製造單色的亞麻布和呢絨這類普通製造品的工人，一日或一星期所得，平均計算，不過略多於普通勞動者一日或一星期的工資。由於他們的工作，比較經常均一，所以全年總計所得也許多些。但是，很明顯，這也不過足夠補償他們受教育所花的更多費用。

精巧藝術和自由職業的學習需要更長時間和更大費用。所以，畫家和雕刻家、律師和醫生的貨幣報酬當然要大得多，而實際上也是如此。

但資本利潤，卻不大受使用資本的那一行業學習難易的影響。大都市通常所用的各種投資方法，就學習難易的程度說，似乎完全相等。國內或國外貿易的一部門業務，大抵不比另一部門業務繁難得多。

第三，各種職業的勞動工資因業務安定不安定而不相同。

有些職業比其他職業安定得多。大部分製造業工匠，要是能夠勞作，一年中幾乎每日都有工作。反之，泥水匠或磚匠在酷寒或天氣險惡時便完全沒有工作。而且，即在天氣好的時候，他們有無工作仍須取決於顧客的臨時要求。以此之故，他們可能常常沒有工作。他們在被僱時所得，不僅要足夠維持他們無工作時期的生計，而且對於他在不安定境遇中不時威到的焦慮和沮喪的痛苦亦須與以若干補償。所以，大部分製造業工人所得，推算起來和普通勞動者日工資幾乎相等，但泥水匠和磚匠所得卻大抵有普通勞動工資的一倍半乃至兩倍。普通勞動者一星期如可獲得四、五先令，泥水匠和磚匠往往可得七、八先令。前者如為六先令，後者常為九、十先令。前者如為九、十先令，象在倫敦那樣，後者常為十五到十八先令。但在各種熟練勞動中，泥水匠和磚匠那樣的勞動似乎最容易學習。據說，倫敦轎伕在夏

天有時被僱為磚匠。所以，這類勞動者的高工資，與其說是熟練的報酬，倒不如說是不安定的報酬。

建築木匠所從事的業務，比泥水匠的工作似乎更細緻、重技巧。但在許多地方，不可說在一切地方，建築木匠每日的工資卻比泥水匠略低。這是因為他工作的有無，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顧客的臨時要求，但不象泥水匠那樣完全取決於顧客的臨時要求，且又不象泥水匠那麼容易受天氣的影響。

如果一般地提供經常工作的職業，在某一地方不提供經常的工作，那末操這些職業的工人的工資總會上升，大大超過這些職業工人的工資和普通勞動工資的通常比例。倫敦一切下層技工，象其他各地的日傭工那樣，每日每週都可能被僱主僱入或解僱。因此，倫敦最下層技工，即裁縫工，一日也能獲得半克朗，儘管十八便士可以說是普通勞動的日工資。在小都市及鄉村地方，裁縫工的工資往往僅等於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但在倫敦，裁縫工動輒數星期無所事事，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除工作不經常外，還加上艱苦、不愉快和不清潔，那末，即使這種工作是最普通的勞動，那些情況有時也使其工資上升到超過最熟練技工的工資。按件計資的煤礦工，在紐卡斯爾，一般可得到約二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在蘇格蘭許多地方，可得到約三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他們得到高工資，全是由於他們工作的艱苦、不愉快和不清潔。他們大抵都能隨他們的意思，要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就艱苦、不清潔和不愉快說，倫敦運煤工人的職業幾乎和煤礦工的職業相同，但由於炭船難免不定期到達，所以大部分運煤工人的工作，必定是很不固定的。以此之故，煤礦工如果通常得到二倍三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那末，運煤工人有時得到四倍、五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似乎不應該認為是不合理的。依據數年前的調查，運煤工人按照當時工資率，每日能得到六先令至十先令。就六先令說，大約四倍於倫敦普通勞動的工資。不論何種職業，最低的普通報酬往往可算是從事這職業者絕大多數所得的報酬。他們的所得，儘管顯得過高，但如果除補償職業上一切不適意情況外還有剩餘，那末在一個沒有壟斷特權的職業裏，不久必有許許多多競爭者出現，很快就使其工資率降落下來。

至於任何行業的資本的普通利潤，都不可能受資本用途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影響。資本是否固定地使用，不取決於行業，而取決於經營行業的人。

第四，勞動的工資，因勞動者所須負擔的責任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地方金匠和寶石匠的工資，不僅比需要同樣技巧的許多其他勞動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許多其他勞動者高。這是因為有貴重的材料付託給他們。

我們把身體的健康委託於醫生；把財產，有時甚至把生命和名譽委託於律師或辯護士。象這樣重大的信任決不能安然委託給卑不足道的人。所以他們得到的報酬必須使他們能夠保持這重大託付所需要有的社會地位。他們必須保持的社會地位，和他們必須受的長期教育與必須花的鉅額費用，勢必使他們的勞動價格更加增高。

如果一個人僅僅使用自己資本經營生意，他就沒受到什麼委託。至於他能否由他人取得信用，不取決於他所經營的行業的性質，而取決於他人對他的財產、正直和智慮的意見是怎樣。因此，不同行業中不同的利潤率，不可能起因於經營各行業者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委託。

第五，各種職業的勞動工資，隨取得資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個學習職業的人能否勝任所學的職業，此可能性的大小，因職業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機械職業說，成功幾乎都是有把握的，但就自由職業說，卻是很沒有把握的。例如，送子學作鞋匠，無疑他能學會製鞋的技術；但若送子學法律，那末精通法律並能靠法律吃飯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對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說，中彩者應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職業說，這成功的一人，應享有不成功二十人應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大概要到將近四十歲時才能從職業取得一些收益的律師，其所得報酬應不僅足以補償他自己為受教育所花的那麼多時間和那麼大費用，而且足以補償那些全無所得的二十多人的教育時間與費用。儘管律師所收的費有時顯得過高，但他的真正報酬必不止此。計算一下，某一地方的鞋匠或織工這類普通工人一年間可能收入的總額和他們一年間可能支出的總額，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收入一般多於支出。如果你用同樣的方法，

總計各律師及各法學協會見習律師的支出與收入，你就會知道，即使你儘量提高他們年收入的估計，並儘量減低他們年支出的估計，他們的年收入，只等於年支出的極小部分。所以，法律業這個彩票，決不是完全公平的彩票。法律業與其他許多自由職業和榮譽職業，所得金錢報酬顯然都是很充分的。

但這些職業能與其他職業並駕齊驅。其出路雖令人氣短，但所有豁達磊落的人都爭先恐後地向這方面擠來。這是由於有兩個鼓舞他們的原團：第一，希望做這些行業的狀元的名譽心；第二，對於自己的才能甚至幸運，一切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天生的自信心。

一個人如果在一種作到平凡地步也不容易的職業裏特別顯露頭角，那就最明確地表示他具有所謂天才或卓越的才幹。由這卓越才幹所博得的人們的讚賞常是他的報酬的一部分。這部分報酬是大還是小，要看讚賞的程度是大還是小。對醫生說，這佔全報酬的大部分；對律師說，所佔的部分更大；對詩人或哲學家說，幾乎佔了全部。

世上有幾種非常適意而優美的才能，若能取得，定能博得某種讚賞，但若用這才能來謀利，世人就會根據意見或偏見認為是公開出賣靈魂。因此，為謀利而運用此種才能的人，所得金錢，不但須補償他學習這種技能所花的時間、工夫和費用，且須補償他以此謀生而招致的聲名上的損失。俳優、歌劇唱角、歌劇舞蹈者等所以有非常大的報酬，乃是起因於這兩個原則：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於運用這才能而蒙受的聲名上的損失。我們在一方面鄙視其人格，在另一方面卻又對其才能給與非常優厚的報酬，這乍看起來，似乎很不合理。其實，正因為我們鄙視他們的人格，所以要厚酬他們的才能。假若世人對於這些職業的意見或偏見一旦改變，他們的金錢報酬很快就會減少。因為更多的人要從事這些職業，而競爭勢必使他們勞動的價格很快降低。這類才能雖不是一般才能，但絕不是象世人所想象的那麼稀罕。完全具有這種才能而不屑用以圖利謀生的人，實不在少數。更多人能學得這種才能，如果運用這種才能來謀生不致於損害名譽的話。

大多數人對於自己的才能總是過於自負。這是歷代哲學家和道德家所說的一種由來已久的人類通病。但世人對於自己幸運的不合理猜測，卻不大為識者所注意。要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對自己幸運妄加猜測，比對自己才能過於自負，恐怕還更普遍些。身體精神相當健旺的

人，對自己的幸運，總不免抱有幾分自信。每一個人，對得利的機會，都或多或少地作了過高的評價，而大多數人，對損失的機會，作了過低的評價。身體精神相當健旺的人，對於損失的機會，很少作過高的評價。

我們認購買彩票的人都認為能中彩這一事實可以看出，人們自然而然地把得利的機會估得過高。完全公平的彩票，換言之，以全部得利抵償全部損失的彩票，不獨從來沒有，以後亦永遠不會有，因為要是這樣，經營者便一無所得。就國營彩票說，彩票實際上並不具有等於購買者所給付的價格的價值，但市場通常按超過實際價值之百分之二十、三十乃至四十的價格售賣。彩票這種需求所以發生的唯一原因，不外是大家想中大彩的癡心妄想。一個很穩重的人，雖明知用以購買彩票的小額資金的實際價值比中彩機會的實際價值也許要高過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但也不認為，以小額資金釣取一萬鎊乃至二萬鎊的中彩機會是愚蠢的。獎金不超過二十鎊的彩票，縱使在其他方面比普通國營彩票更接近於完全的公平，但要購這種彩票的人恐怕要少得多。為要增加得中大彩的機會，有的人，同時購買彩票數張，有的人，買更多的分條彩票。但是，你冒險購買越多的彩票，你就越可能是損失者，這是數學上再確定不過的定則。假若你冒險購買全部彩票，你肯定會虧損。你購買彩票的張數越多，你的損失就越接近於上述肯定的損失。

我們從保險業者的輕微利潤可以看出，損失機會往往估得過低，很少估得高於其價值的。把火災保險或海上保險當作一種事業經營，所收的普通保險費必須足以補償普通的損失，支付經營的費用，並提供資本要是用於一般經營所能取得的利潤。只給付這麼多保險費的被保險人，明顯地只給付危險的真實價值，換言之，只給付他有充分的理由可指望的最低保險價格。雖然許多人從經營保險生意取得微利，但很少人由此發大財。由此可見，一般得利與損失相抵的結果，對保險業不象對那些使許多人發財的其他行業那麼有利。然而，儘管保險費一般都很低廉，許多人卻非常輕視危險而不願支付保險費。就全英國的房屋平均推算，二十戶中就有十九戶，甚或百戶中有九十九戶，不曾保有火險。海上風險，在許多人看來，比火災更為可怕，所以，保險船隻對未保險船隻的比例卻比保險房屋對未保險房屋的比例大得

多。但無論在什麼季節，甚至在戰爭期中，都有許多未保險船隻往來航行。象這樣未保險的航海，有時也不能遽然斷為不慎。一大公司甚或一大商人，若有船二、三十隻同時航行海面，它們可以說是相互保障，而由此節約下來的保險費，也許足夠補償在一般情況下所可能遭受的損失而有餘。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船隻不保水險、房屋不保火險，都是沒有這種精密計算的結果，完全是由於輕率無遠慮和鹵莽地輕視危險。

輕視危險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只選擇職業的青年時期最為活躍。在這時期，對不幸的恐懼抵不過對幸運的希望。這從普通青年歡歡喜喜地應募參軍或出海航行，比從上流社會青年熱中於從事所謂自由職業，看得更加明顯。

普通士兵所可蒙受的損失是很明顯的。然而，青年志願兵不顧危險，在新戰爭開始時，特別踊躍地應募。升遷的機會雖幾乎沒有，但他們在青年的幻想中想到了許許多多可以獲得但事實上並不能獲得的榮譽和大功的機會。這些空虛的希望，就成為他們流血的全部代價。他們的報酬比普通勞動者低，而且在實際工作上，他們的勞苦比普通勞動者大得多。

總的說來，航海這個彩票，並沒象陸軍那個彩票那麼不利。一個有聲譽的工匠的兒子往往可以得到父親的允許去航海。可是，如果他應募作陸軍士兵，總要瞞着他的父親。就前一職業說，他人也看到有幾分成功的機會，而就後一職業說，除了他自己，誰都不會認為有成功的機會。偉大的海軍上將，沒象偉大的陸軍上將博得那麼大的民衆崇拜。海上服務最大成功所可得到的名利，也不象陸上同樣的成功所可得到的名利那麼喧赫。海陸軍上將以下的軍官，都有這樣的差別。依據等級的規定，海軍上校與陸軍上校屬於同一階位。但在一般的評價上，不把這兩者同樣看待。由於彩票中，大彩比較少，所以小彩就比較多。因此，普通水兵，比普通陸軍士兵，更常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名利。而獲得中小彩的希望，乃是一般人願充作水兵的主要原因。普通水兵的熟練與技巧，雖比幾乎所有技工的熟練與技巧都強得多，而他們一生中雖不斷地和困難與危險作搏鬥，可是，在他們繼續充當普通水兵的時候，儘管他們有那麼大的熟練技巧，和那麼大的困難與危險，他們除了在運用熟練與技巧和克服困難與危險時，有點快感外，

幾乎沒得到其他報酬。他們的工資，並不大於決定海員工資率的那一港口的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由於他們不斷往返於各港口間，所以，由不列顛各港口出航的海員，每月工資，比各港口任何其他勞動者的工資，更趨於一致。而且，由於倫敦港海員出入最多，所以倫敦海員工資率便決定其他各港口的海員工資率。倫敦各級工人大多數的工資約有愛丁堡同級工人工資的兩倍。但由倫敦出航的水手，每月所得工資，很少比由利斯港出航的水手高出三四先令，這麼大的差額是不常見的。就平時和就商船說，這種勞動在倫敦的價格，以月計，是二十一先令到大約二十七先令。然而倫敦普通勞動者以一星期九先令或十先令計算，每月可得到四十先令乃至四十五先令。誠然，水手除工資外，還供有食糧。但其價值，未必會超過他所得工資及普通勞動者所得工資的差額。即使有時超過了這差額，但這超過額也不能算是水手的純利，因為水手不能和其家庭分享這種食糧，而必須用他的工資來養活他的妻子。

冒險生活的危險和九死一生，並不使青年人的勇氣受挫折，有時似乎反鼓勵他們去選擇這類職業。在下層階級中間，慈母往往不願把兒子送入海港城市的學校讀書，害怕兒子看到海船，並受水手的談話和冒險事蹟的引誘，去參加海洋生活。在遙遠將來可能發生的危險，並不使我們有所畏懼，因為我們可望憑自己的勇敢與機智來擺脫危險，因此不會提高這類職業的勞動工資。至於勇敢與機智不能有所用的職業情形就兩樣了。而非常不衛生的職業的勞動工資總是特別豐厚。不衛生乃是一種不愉快，而它對勞動工資所生的影響應歸入不愉快那個總項目。

各種資本用途的普通利潤率，或多或少地隨收益的確定與不確定而不同。一般地說，國內商業的收益，不象國外貿易那麼不確定，而國外貿易的一些部門，又不象另一些部門那麼不確定。例如，對北美貿易的收益，不象對牙買加貿易的收益那麼不確定。普通利潤率，隨危險程度增高而多少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險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換句話說，增高的利潤不一定能完全抵償危險。破產在最危險職業上最常見。最危險的事業要算祕密輸入。在冒險成功的場合，其得利固厚，但這種冒險無可避免地導致破產。成功的奢望，在這場合所起的作用，正如在其他場合一樣，誘使那麼多冒險家去做這種危險生

意，以致他們的競爭，使利潤減低到不夠補償危險的程度。要使危險完全得到補償，其普通收益，應在資本普通利潤外，不僅彌補一切不時的損失，還對冒險家提供一種與保險家利潤同性質的利潤。但是，如果普通收益足夠提供這些，那末這些行業的破產危險就不比其他行業更為常見。

因此，使勞動工資各不相同的五種情況，只有兩種影響到資本利潤，那就是工作是愉快還是不愉快，是安全還是危險。就愉快或不愉快說，大多數不同資本用途，都相差不遠，或者全無差別，但在各種不同的勞動用途，卻存在着很大的差異。而且，資本的普通利潤，雖隨危險程度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程度未必和危險程度都成比例。由此可見，在同一社會或其附近地方，各種資本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潤率，比各種勞動的貨幣工資更接近於一個水平。事實上，也正如此。普通勞動者所得，和生意好的律師與醫生所得的差異，明顯地比任何兩種行業的普通利潤的差異大得多。況且，各種行業利潤表面上的差異往往是靠不住的，這是因為我們未必都把應該算作工資和應當算作利潤的區別開來。

藥劑師的利潤一語，已成為非常過分得利的代名詞。但是這種表面上很大的利潤，往往只是合理的勞動工資。就技能說，藥劑師比其他一切技工精巧得多。他所受付託的責任，也重得多。他是貧民的醫生，而在病痛或危險比較輕微的場合，也是富人的醫生。所以，他的報酬，應當和他的技能與他所受付託相稱，而且一般是包含在出售藥品的價格中。但是，在大商業都市中，生意最興隆的藥劑師，每年出賣的全部藥品，所費於他的，也許不過三四十磅。所以，他所賣的價格，雖是三四百磅，換言之，雖以十倍的利潤出售，但這利潤，一般地說，也許只是他的合理工資；他的合理工資，除了加在藥品價格上，簡直沒有第二種方法取得。他的表面利潤的大部分，乃是穿上利潤外衣的真實工資。

在海口小市鎮上，資本百鎊的小雜貨商人，能獲得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的利潤，而同地資本萬鎊的大批發商人，卻很少能夠獲得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利潤。他所經營的雜貨業，對該地居民的便利說，也許是必要的，而狹小的市場不允許更大資本投在這種營業上。可是，那小雜貨商人，須靠此過活，並過着和經營這業務所必須有的各種資

格相稱的生活。除具有小額資本外，他不僅須能讀，能寫，能算，又須能相當準確地判斷五六十種商品的價格與品質，並能以最低廉價格購買這些商品的市場。簡言之，這種商人必須具備大商人所需具備的一切知識。他所以不能成為大商人，只因爲他沒有充足的資本。象這樣有才能的人，每年取得三四十鎊作為勞動的報酬，決不能認為過分。從他的似乎很大的資本利潤中，除去上述報酬，那末剩餘的部分恐怕不會比普通利潤多。所以，表面利潤的大部分，在這場合，也不外是真實工資。

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潤與批發商表面上的利潤之間的差異，在都市比在小市鎮及農村小得多。在雜貨行業能投資一萬鎊的地方，雜貨商人的勞動工資，對於這麼大資本的真實利潤，就不過是很小的一個附加部分。所以，在那種地方，富裕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潤比批發商表面上的利潤更趨於一致。正由於這個原因，都市裏的零售價格一般和小市鎮及農村同樣低廉，而且往往比後者低廉得多。例如，雜貨一般是低廉得多；麪包與家畜肉往往是同樣低廉。把雜貨運往都市的費用並不比運往小城市或農村多，而把穀物和牲畜運往都市的費用便大得多，因爲它們大部分要從遠得多的地方運來。雜貨的原價，都市和農村一樣，所以，在貨物價格中附加利潤最少的地方，便最低廉。麪包和家畜肉的原價，大城市化農村高，所以，大城市的利潤雖較低，這些物品的售價未必較低，卻往往是同樣低廉。就麪包及家畜肉這類商品說，其表面利潤減少的原因，就是其原價增加的原因。市場的擴大，一方面由於所用資本較多而減少其表面利潤，另一方面，又由於仰給於遠方的必要而增加其原價。這表面利潤的減少與原價的增大，在許多場合，看來幾乎可以互相抵消。穀物及牲畜的價格，雖然在王國各地很不相同，但麪包及家畜肉的價格，在王國的大多數地方，一般地說，幾乎相同，其原因也許就在於此。

零售商及批發商的資本利潤，雖在都市一般比小市鎮和農村小，但以小資本開始經營而發大財的人，在都市常可看到，而在小市鎮和農村卻幾無一人。在小市鎮和農村，由於市場狹隘，營業未必都隨資本的增加而擴大，所以，在這些地方，個別商人的利潤率雖很高，利潤的總額卻不很大，而他們年年的蓄積額也有限。反之，大城市的營業，能隨資本的增加而擴大，而勤儉商人的信用，增加得比其資本增

加快得多。這樣，他的營業隨他的信用及資本這兩者的增大而擴張；他的利潤總額隨他的營業的擴張而增加；他每年所積累的資金也隨他利潤總額的增加而加大。但是，即在大城市，由於一種正常的、確定的和爲人所周知的行業而發大財的，也很少見，而發大財主要是由於長時期的勤勉、節約和小心的經營。誠然，大城市中，往往有從事所謂投機生意而突然致富的，但投機商人，並不是經營正常的、確定的和爲人所周知的業務。他今年是穀物商，明年是酒商，後年又是砂糖商、菸草商或茶商。不論何種行業，只要他預先看到這行業有超過普通利潤的希望，他便馬上加入，一旦預先看到那種行業的利潤將要降落到和其他行業相等，他又馬上離開。因此，他的利潤和損失，不能和其他任何正常的、確定的和爲人所周知的行業的利潤與損失相提並論。大膽的冒險者，有時也許由於兩三次投機的成功而獲得很大財產，有時也許會由於兩三次投機的失敗而損失很大財產。這種生意，除大城市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進行。因爲經營這種生意所需要的情報，只在商務最繁盛和交易最頻繁的地方纔會有。

上述五種情況，雖使勞動工資與資本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不均等，卻不使勞動或資本不同用途所有實際上和想象上的利害不均等。這些情況的性質，使得一些用途上小的金錢得利得到補償，並使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錢得利有所抵消。

但是，要使不同用途所有利害能有這樣的均等，那末即在最自由的地方，亦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那些用途，必須在那地方及其附近，爲人所周知，而且確立很久。第二，那些用途必須處在普通狀態，即所謂自然狀態。第三，那些用途，必須是使用者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

第一，只有那些用途，在那地方及其附近，爲人所周知而且確立很久，纔會有這樣的均等。

在其他情況都相同的地方，新行業的工資大都高於舊行業。當計劃者擬設立一新製造業時，他最初必須以高於其他行業的工資或高於本行業應有的工資，從其他行業招誘工人過來，而他要經過很長時間纔敢把工資降到一般水平。有些製造品，其需要完全由於時尚和一時愛好而產生，這些製造品總會不斷變動，很少能持久，因而不能看做老製品。反之，另一些製造品，其需要主要由於效用與必需而產生，

這些製造品，不象上述製造品那麼容易變動，同一的形式和構造，可經歷數世紀，還爲人所需要。所以，前一類製造業，與後一類製造業比較，工資可能較高。伯明翰的製造品多半屬於前一類；設菲爾德的製造品多半屬於後一類。據說，這兩個不同地方的勞動工資，很適合它們這樣不同性質的製造品。

新的製造業、商業或農業經營，總是一種投機，而計劃者期望由此獲得非常的利潤。這種利潤，有時是很大的，但有時，也許是很小的；但一般說來，這種新行業的利潤，和當地及附近其他舊行業的利潤，卻不保有正常的比例。如果計劃成功了，利潤在最初通常是很高的。但當這行業或營業一經確立而爲人所周知的時候，競爭就使其利潤降到和其他行業相同的水平。

第二，只在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處在普通狀態，即所謂自然狀態下時，這些用途的所有利害纔會有這樣的均等。

對幾乎各種勞動的需求，有時較平常爲大，有時卻較平常爲小。勞動這用途的收益，在前一場合，增高到普通水平以上，在後一場合，減低到普通水平以下。對農村勞動的需求，在鋤草期和收穫期比一年中大部分時期都大，其工資也隨着需求的增加而增高；在戰爭中，四五萬原爲商船服務的海員，被迫而爲國王服務，這樣，對商船海員的需求，必然由於員額短少而增加，而這時海員的工資，常由每月二十一先令至二十七先令上升到四十先令至六十先令。然而在日趨凋落的製造業，情形卻正相反，許多勞動者，不願捨去原有職業，所得工資雖低於按照他們工作性質所應得的工資，也只好認爲滿足。

資本的利潤，隨使用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而變動。當任何一個商品的價格上升到普通或平均價格之上的時候，爲要出售這商品而使用的資本，至少有一部分，其利潤上升到原有水平之上；當價格下降時，利潤也降到原有水平之下。一切商品的價格，或多或少地都會變動，但一些商品的價格，變動得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就人類勞動所生產的貨物說，每年所用的勞動量，必是這樣受每年需求的支配，以致每年平均產量，都儘可能接近於每年平均消費量。前面說過，有些用途，以同量勞動，總會生產同量或幾乎同量商品。例如在麻布或呢絨製造業，同一數量的勞動者，年年幾乎製造同一數量的麻布或呢絨。所以，象這類商品的市場價格變動，只能起因於需求上的偶然變

動。國喪使黑布的價格增高，但是，對素麻布及呢絨的需求幾乎沒有變動，所以，其價格也幾乎沒有變動。但有些用途，使用同量勞動，未必都生產同量商品。例如，就穀物、葡萄酒、忽布花、砂糖、菸草等說，由同量勞動在各年生產的數量，很不相同。所以，此類商品的價格，不僅隨需求的變動而變動，而且隨數量方面更大和更頻繁的變動而變動，因而這類商品價格的變動是非常大的。但是，經營此類商品的一些商人的利潤，必然隨此類商品價格的變動而變動。一般投機商人的活動，大都在此類商品上進行。他們看到此種商品將要上升，立即買入；看到此種商品將要下落，立即賣出。

第三，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只有在這些用途成為使用者的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的場合，纔會有這樣的均等。

當某一個人依某一種職業謀生，而那職業並不佔有他的大部分時間時，他往往就願意在閒暇期間從事另一種職業，而他由此所得的工資，雖低於按照那工作性質所應當有的工資，他也願意接受。

在蘇格蘭許多地方，迄今還有稱為農場僱工的那一種人存在。不過，這種人現在比數年前減少了。他們是地主和農場主的外傭工。他們由僱主方面通常取得的報酬是一間住宅，一塊種蔬菜的小園，一塊夠飼養一頭母牛的草場，再加上一兩畝不好的耕地。當僱主需要他們的勞動時，他也許還每星期給他們兩配克燕麥片，約值十五便士。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僱主或是隻需要他們的少許勞動或是全不需要，而他們自己小耕地的耕種，也不會佔去能由他自己隨意處理的全部時間。所以，當這些僱工比現今多的時候，據說，他們都願意在閒暇時間，以極小的報酬為任何人工作，都願意以低於其他勞動者的工資勞作。在古代，這種僱工遍佈於歐洲各地。在土地種得很壞而人口稀少的國家，大部分地主和農場主，要不是使用這辦法，那末在需要特別多勞動者的季節，就不能屆到。此等勞動者偶然得到的日報酬或星期報酬，顯然不是他們勞動的全部價格。他們的小租用地，在他們勞動的全部價格中佔一個很可觀的部分。可是，那些收集往昔勞動及食品價格並喜歡把這兩者的價格說得非常低賤的許許多多作家，似乎把這種勞動者偶然得到的日報酬或星期報酬，看做那種勞動的全部價格。

象這類勞動的生產物，往往以低於應有的價格，在市場出售。蘇格蘭許多地方編織的襪子的價格，比任何地方用織機織成的襪子的價

格低廉得多。那就是因為編織此等襪的勞動者都是從其他職業獲得了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每年設得蘭都有一千雙以上襪子輸入利斯，其價格每雙由五便士至七便士。我聽說，設得蘭羣島的小首都勒韋克，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每日為十便士。但是，即在設得蘭羣島，他們所組成的絨線株，一雙卻值一幾尼以上。

在蘇格蘭，亞麻線的紡織，象襪子的編織一樣，也是由主要做其他工作的僱工來搞的。這些人企圖從紡麻或織襪取得他們的全部生活費用，但只得到極微薄的生活費。在蘇格蘭，一星期能賺得二十便士的女紡工，就算是很有本事的紡工。

在富裕國家，市場一般都是那麼廣闊，以致任何一個行業，都夠容納這行業的全部勞動和資本。以一種職業謀生，同時又以另一種職業獲得若干小利益的情況，多半在貧國纔有。然而，和上面有點相象的下述情況，卻也出現於一個很富裕國家的首都。房租較倫敦為高的都市，我相信，全歐洲沒有一個。但是，餘屋附有傢俱，而租金卻又低廉的都市，也要首推倫敦。在倫敦租賃餘屋，不但比巴黎低廉得多，而且就同樣好質量的房屋說，也比愛丁堡低廉得多。使人也許覺得驚奇的是，全房租的高昂，竟成為餘屋租金低廉的原因。一切大都市房租的高昂，基於數種原因：勞動價格昂貴，一般必須由遠地供給的一切建築材料昂貴；地皮地租昂貴，佔有壟斷者地位的各個地主，對於不良街市地皮一畝，往往要求比最優良農田百畝的地租更高的地租。倫敦房租高昂的原因，除上述外，還有一個，那就是倫敦人民所特有的風俗和習慣，使各家主都得租賃全屋。住宅一語，在法蘭西和蘇格蘭以及歐洲其他地方，常常只意味着建築物的一層，而在英格蘭，卻意味着同一屋頂下的全部房屋。倫敦商人必須在他的顧客所在的城市的那一部分租一整座房屋。他把最下一層作為自己的店鋪，頂樓作為他自己及其家屬的寢所。他把中間兩層，分租他人，藉以收回一部分房租。他期望靠營業來維持其家庭的生活，並不希望以分租的租金來養活家庭。而巴黎和愛丁堡的分租部分房屋的人，往往專靠分租房間來謀生，因此，分租的租金，不但須足夠支付房屋的全部租金，並須足夠維持他家庭生活的全部費用。

——第二節起因於歐洲政策的不均等

由此可見，即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由於缺少上述三條件的任何一個，勞動和資本不同用途所有利害就必然有以上所說的那些不均等。但是，因為歐洲政策不讓事物有完全自由的發展，所以由此便產生了比上游重要得多的其他不均等。

歐洲政策主要是依以下三種方式促成這樣的不均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職業中的競爭人數，使共少於原來願意加入這些職業的人數；第二，增加另一些職業上的競爭，使超越自然的限度；第三，不讓勞動和資本自由活動，使它們不能由一職業轉移到其他職業，不能由一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

第一，歐洲的政策，由於限制一些職業上的競爭人數，使願加入者不能加入，所以使勞動和資本用途所有利害有了非常大的不均等。

同業組合的排外特權，是歐洲政策限制職業競爭人數的主要手段。

有組合的行業的排外特權，勢必在特權設立的城市中，只許那些有經營此業自由的人相互競爭。得到這種自由的必要條件，通常是在當地有適當資格的師傅門下做學徒。組合的規則，有時限定各師傅所得容納的學徒人數，通常規定學徒的年限。這兩種規則的目的，在於限制各該行業上的競爭人數，使願加入者不能加入。學徒人數的規定，是直接限制競爭，而長的學徒年限的規定，由於增加學習費用，間接限制競爭，但同樣有效果。

設菲爾德的刀匠師傅，依組合規則，同時不得有徒弟一人以上。諾福克及諾韋傑的織匠師傅，同時不得有徒弟二人以上，違者每月科罰金五鎊，向國王繳納。英格蘭內地及英領各殖民地的帽匠師傅，亦不許同時有徒弟二人以上，違者月科罰金五鎊，半歸國王，半歸向記錄法庭控告的人。這兩項規定，雖曾由王國公法確認，顯然是按照設菲爾德制定規則的這種組合精神制定的。倫敦絲織業，組合不到一年，就制定各師傅不得同時有徒弟二人以上。後來，通過議會的法令，才把這規則廢止了。

往昔，全歐洲大部分有組合的行業，似乎都把學徒期限定為七年。所有這樣的組合，往昔都稱為university，這確是任何組合的拉丁文原名。鐵匠university，縫工university等等，在古時都市的特許狀中，常可看見。今日特稱為大學（university）的這個特殊團體，設立

之初，獲得文藝碩士學位所必需的學習年限的規定，明顯地是以往昔有組合行業的學徒年限的規定為範本的。一個人，想在普通行業上，獲得稱師受徒的資格，就得在具有適當資格的師傅門下做學徒七年。同樣，一個人想在文藝上成為碩士、教師或學者（此三者在往昔是同義語），取得收受學生或學徒（此兩者原來亦是同義語）的資格，也得在具有適當資格的碩士門下學習七年。

伊麗莎白五年所頒佈的通常稱為學徒年限法令規定，此後無論何人，至少須做七年學徒，否則不許從事當時英格蘭所有的一切手藝、工藝或技藝。於是以前英格蘭各地許多特殊組合的規則，都成了市鎮一切行業的公法。該法令所用的詞語，極為籠統，似包括王國全部，但在解釋上，其適用範圍，只限於各市鎮。按照解釋，一個農村勞動者，可搞幾種不同的工藝，儘管他對於每一種技藝都未曾從師學習七年。為便利農村居民，一個人兼搞幾種工藝，是必要的，而且要把一定人數分給每一種工藝，農村人口往往是不夠的。

此外，按照這法令用語嚴格的解釋，則其適用範圍，又只限於伊麗莎白五年以前在英格蘭境內建立的行業，而沒有擴到以後新建立的行業。這種限制，引起了幾個區別，作為政策的規定，這些區別是再愚蠢不過的。例如，按照裁定，馬車製造人，不得自行製造車輪，亦不得自行僱人製造，他必須向車輪匠購買。因為車輪製造業是伊麗莎白五年以前英格蘭已有的行業。但車輪匠，即使沒有在馬車製造匠門下做過學徒，卻不妨製造馬車，或僱人製造。因為馬車製造業是學徒法令頒佈以後英格蘭纔有的行業，所以不受該法令的限制。在曼徹斯特、伯明翰和沃弗漢普頓等地，有許多製造業，就根據這種理由，不受學徒法令的拘束，因為它們是伊麗莎白五年以後在英格蘭建立的。

就法蘭西說，學徒年限，各市不同，各業也不同。在巴黎，雖大多數行業以五年為期，但一個人想取得某種行業上的師傅資格，他至少還須再作五年幫工。在以後這五年間，他被稱為師傅的夥伴，而這五年期間，稱為夥伴期間。

就蘇格蘭說，關於學徒年限，沒有普遍規定的法律。在不同的同業組合，年限不相同。在年限定得長的組合，一般可通過給付少額款項來縮短期限。此外，在大多數城市中，只要給付極少額款項，便可買得任何同業組合的會員資格。蘇格蘭的主要製造者，如亞麻布和大

麻布的織工，以及附屬於這類製造者的其他各種技工，如車輪製造者、紡車製造者等，不給付款項，可在自治城市操業。在自治城市，一切市民，在一星期內的法定日，都可自由販賣家畜肉。在蘇格蘭，學徒年限普通為三年，即在一些需要非常精巧的技藝，也是如此。據我所知，一般說來，歐洲各國的同業組合法律，都不象蘇格蘭那麼寬大。

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主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與技巧。不讓他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鄰人的條件下，使用他們的體力與技巧，那明顯地是侵犯這最神聖的財產。顯然，那不但侵害這勞動者的正當自由，而且還侵害勞動僱用者的正當自由。妨害一個人，使不能在自己認為適當的用途上勞動，也就妨害另一個人，使不能僱用自己認為適當的人。一個人適合不適合僱用，無疑地可交由有那麼大利害關係的僱主自行裁奪。立法當局假惺惺地擔憂着僱主雇用不適當的勞動者，因而出於干涉，那明顯地不只是壓制，而且是僭越。

長期學徒制，並不能保證市場上不常出現不良作品。要是市場上常有不良作品，那一般地說不是無能的結果，而是欺詐的結果。最長的學徒年限，也不能保證沒有欺詐。所以，為防止此種弊害，需要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法規。金屬器皿上刻有純度記號，麻布和呢絨上印有檢記，對購買者所給與的保證，比學徒法令所給與的保證大得多。購買者判別貨物，一般只看記號或檢印，絕不會認為，製造貨物的工人曾否做過七年學徒，是值得查問的。

長期學徒制，並不傾向於養成少年人的勤勞習慣。按件計資的勞動者，由於所作愈多所得愈厚，自會趨於勤勉。至於學徒，由於利不幹己，很可能流於怠惰，實際上亦常如此。就下級職業說，勞動樂趣，完全在於勞動報酬。誰能最早享到勞動的樂趣，誰就最早對勞動有興趣，也就最早獲得勤勉習慣。一個少年人，在長時間內，不能由勞動享受絲毫利益，當然就對勞動有惡感。由公共慈善團體送去做學徒的兒童，其年限一般比普通的年限長，結果多半成為非常怠惰而無用的人。

古代沒有學徒制度存在。在一切近代法典中，師傅和學徒間的各種相互義務。都成為重要的一條，但羅馬法關於此等義務，卻隻字不提。我們現在歸諸學徒一詞的概念，即在一定行業中，僕人在主子將授予這一行業的技藝的條件下，必須在一定年限內，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我不能由希臘或拉丁語中，找出一個相當字眼來表達這個概念（我想，我敢斷定這兩國文字中沒有這種字眼）。

長的學徒年限，是全然不必要的。比一般手藝高得多的技藝，如掛鐘手錶的製造，並不含有需要長期教授的神祕技術。誠然，這些美妙機器的最初發明，甚至用以製造這些機器的一些器具的最初發明，無疑是經過長久時間和深湛思索之後才作出的作品，並且可公公正正說是人類發明才能的最可喜成果之一。但是，當這些機器和器具，一經發明好了，一經理解好了，那末，要詳詳細細地，給少年人講解，怎樣使用器具，和怎樣做機器，大概不需要幾星期以上的講授時間，也許只需要數天的講授時間。就一般機械工藝說，數天講授時間，一定就夠了。誠然，就普通手藝說，要學得手的靈巧，非有大量實踐和體驗不可。但一個少年人，如果最初即以幫工的資格勞動，並依他工作量的多少給與工資，而他要賠償由於粗劣的技藝和無經驗而損壞的材料，那他在業務的實習上，必然勤勉得多，注意得多。其教育，一般地說，更必有效，而且總可少花些時間，少花些費用。誠然，師傅將是一個損失者。現在師傅無須出的學徒在七年學習期內的工資，到那時，他就要掏腰包。而且，最終，學徒本身也不免成為損失者。在一個那麼容易學得成功的職業上，他將遇到更多的競爭者，於是，當他成為一個完全勞動者時，他的工資將比現今少得多。競爭這樣的增大，不僅會減低工人的工資，也會減低師傅的利潤。而從事手藝、工藝和技藝的，都將成為損失者，但社會卻將成為得利者，各種技工的製造品，將以比現在低廉得多的價格，在市場出售。

同業組合以及大部分組合規則的設立，在於通過限制自由競爭，以阻止價格這樣的下降，從而，阻止工資及利潤的下降——自由競爭勢必引起價格這樣的下降。往時，歐洲多數地方，設立組合，只須取得組合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的許可。在英格蘭，還須取得國王的特許狀。不過，國王這種特權，似乎不是為了防止這些壟斷事業侵犯一般自由，而是為了要向臣民榨取貨幣。一般地說，只要向國王繳納若干

款項，似乎都很容易取得特許狀。假若某一種類技工或商人，認為不經國王特許而設立組合是合適的，這些當時所謂不正當的同業組合，未必因此會受到取締，但須每年向國王繳納若干罰金，取得允許，來行使被剝奪的權利。一切組合以及組合認為應制定來管理自己的規則，都歸組合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直接監督。所以對組合有什麼管制，通常不是來自國王，而是來自那更大的團體，對於更大的團體，那些附屬團體只是構成部分。

自治城市的統治權，當時完全掌握在商人和技工手中。對他們中各個階級來說，防止他們常說的各自產品在市場上存貨過多，實際上就是使他們各自產品在市場上經常保持存貨不足狀態，這樣做分明都是符合於他們各自利益的。各階級都急於制定，為達到此目的的適當規則，而且在自己被允許制定的條件下，也同意其他一切階級都制定規則。結果，各階級所需要的貨物，都得以比此等規則制定以前略高的價格，向市上其他階級購買。而他們自己的貨物，也能以相當高的價格出賣。賣買相衡，正如他們所說半斤八兩。同一市內任何階級都不會因此等規則而蒙受損失。但在他們與農村交易時，他們卻受到很大的利益。維持各都市並使各都市富裕的，正是這種交易。

一切都市的生活資料與工業原料，全都仰給於農村。都市對這些資料與原料給付代價的主要方法有二：第一，把那些原料中一部分加過工製成成品送還農村，這樣，那些物品的價格，就因勞動工資及老闆或直接僱主的利潤而增大了。第二，把由外國輸入或由國內遙遠地方輸入都市的粗製品或精製品一部分，送往農村；這樣，那些物品的原價，就因水陸運輸的勞動者工資及僱用這些勞動者的商人的利潤而增大了。都市由它的製造品取得的利益，乃是它的第一種商業的得利；它由對內及對外貿易獲得的利益，乃是它的第二種商業的得利。勞動者的工資及各種僱主的利潤，構成了這兩種商業得利的全部。所以，不論何種規則，只要會使那些工資和利潤比此等規則制定以前有所增加的，就會使都市能以較少的都市勞動量購買較多的農村勞動量。此等規則，使都市商人和技工享有比農村的地主、農場主及農業勞動者更大的利益，因而破壞了都市與農村商業上應有的自然均等。社會勞動的全部年產品，每年都是在都市和農村人民中間分配的。由

於有了此等規則，都市住民，就享有此等規則未制定前所不會有的較大分額，而農村住民，卻享有較少的分額。

都市對每年由農村輸入的食品和原料，實際上所給付的代價，乃是它每年輸往農村的製造品及其他物品的數量。輸出品的賣價愈高，輸入品的買價便愈低。都市產業就更為有利，而農村產業就更為不利。

我們只須通過一次非常簡單而又明顯的觀察，無須作精密計算，就可弄明白，歐洲各地都市產業都比農村產業更為有利。在歐洲各國，我們可只看到，從小資本開始經營原來屬於都市的產業，即商業和製造業，而後來發大財的，至少有一百個人，而以小資本開始經營原來屬於農村的產業，即改良和耕種土地以出產天然產物，而後來發大財的，只有一個人。所以，都市產業的報酬，必然比農村產業優異。都市的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也明顯地比農村大。但是，資本與勞動，自然要尋找最有利的用途。它們自然要儘量彙集於都市而離開農村。

都市住民羣集一地，能夠容易地結合在一起。結果，都市中最不足道的工藝，在某些地方，也有組合。即在完全未有組合的地方，他們一般都有組合的精神，換言之，他們嫉妒外鄉人，不願意收學徒，不願意把工藝上的祕密傳授別人。這種組合精神，往往教導他們通過自願結合或協約，來阻止不能靠規則來禁止的自由競爭。所居勞動者人數有限的行業，最容易形成這類結合。比如，使一千紡工和織工繼續操作所需要的梳毛工，也許不過六人。這些梳毛工人，通過結合，不收學徒，不僅能夠壟斷這種工藝，使整個羊毛製造業成為他們的奴隸，而且使他們勞動的價格，大大超過按照這作業性質所應有的工資。

農村的住房，散居相距很遠的地方，不能容易地結合起來。他們不但從來沒有組合，並且一向就缺乏組合的精神。他們並不認為，必須經過當學徒，纔有資格從事農村的主要職業，即農業。然而，事實上除了所謂美術及自由職業，恐怕沒有一種職業象農業那樣需要種種複雜的知識和經驗的。用各國文字寫成的關於農業的不可勝數的書籍可以證明，連最有智慧、最有學識的國民，也不認為農業是最容易理解的。而且，如果我們想從那些書籍，獲得一般農民通常都掌握的關

於各種複雜操作的知識，也是辦不到的，儘管一些無聊作家，在說到一般農民時，有時愛用輕蔑的話。反之，就普通機械工藝說，所有操作都可在薄薄數頁的小冊子裏附加插圖，作詳盡明瞭的說明。現在法國科學院所刊行的工藝史，對於某些工藝，實際上就是用這個方法說明的。此外，必須隨天氣的變更以及許多意外事故而變更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判斷與熟慮，比永遠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多得多。

不僅一般農民的技術或農業的一般操作方法，而且農村中許多低級勞動所需要的經驗與熟練，比大部分機械工藝所需要的多得多。對銅鐵加工的人，使用完全同性質或幾乎同性質的工具與材料工作。但用一隊牛馬耕鋤土地的人，卻使用健康狀態、體力和性情在各個時間各不相同的工具工作。而他所加工的材料和所用器具的狀況都是容易變的，都需要他運用很大的判斷力和思辨力來處理。普通莊稼漢，雖被看做愚蠢無智的典型，卻幾乎都有此種判斷力與思辨力。誠然，他不象都市機械工人那麼慣於社會交際，而他的聲調和言語，也不免使那些沒有聽慣的人覺得粗野而且不容易瞭解。但他慣於考慮各種各樣事物的理解力，一般比終日通常只搞一二種極簡單操作的人強得多。只要你因營業關係，或為好奇心所驅使，曾和農村下級人民與都市下級人民多接觸，你就知道，前者實比後者優秀。據說，中國和印度農村勞動者的地位與工資，都比大多數技工和製造工人高。假若沒有同業組合法規及組合精神從中作梗，各地方也許都和中國、印度一樣。

不過，歐洲各地都市產業所以比農村產業優越，並不完全由於同業組合及組合法規的存在。其他許許多多規定，也助長了這種優勢。對外國製造品，和對外國商人輸入的一切貨物，課以高的關稅，都傾向於助長這種優勢。同業組合法規，使都市居民能夠擡高他們製品價格，不必憂慮由於同國人的自由競爭而降低價格。而高關稅的規定，使都市居民不怕外人的競爭。由這兩種法規而產生的增高價格，不論何處，都由農村的地主、農場主和勞動者負擔。他們對於這種壟斷權的建立，幾乎未曾反抗。他們通常不想結成組合，也不適合於結成組合，而商人和製造者的叫喊和詭辯很容易說服他們，使他們相信，社會一部分而且是不重要的一部分的私利，乃是全社會的利益。

英國都市產業化農村產業優越的程度，過去似較現今為大。與前世紀或現世紀初葉比較，現今的農村勞動工資，更接近於工業勞動工資，現今的農業資本利潤，亦更接近於工商業資本利潤。這種變化，可以說是以前過分獎勵都市產業所必產生但直到晚近才呈現的後果。都市所累積的資本量，終於達到這麼大的數額，以致把這數額的資本，使用在都市所特有的產業上，就不能得到象往昔那麼多的利潤。都市所特有的產業，與其他一切產業，同樣有一定的限度，而資本增加，由於擴大競爭，勢必使資本利潤減低。都市方面利潤的減低，勢必使資本流向農村，農村勞動有了新需求，勞動的工資必然增高。要是我可這樣說的話，資本這樣就散佈於地面上，而且由於在農業方面使用，資本使部分地回到農村來，資本的大部分，本來是以農村為犧牲而在都市中累積的。歐洲各國農村最大的改良，都是都市本來所累積的資本流回農村的結果，關於這點，我將在下面說明，同時將論證，雖有若干國家，經這過程達到了很大的富裕程度，但這過程本身是極緩慢、極不確定、極易遭到不可勝數的意外事故的阻撓，而且，無論就那一點說，都是違反自然，違反理性的。至於這過程所由而產生的利害關係、偏見、法律及習俗，我將在本書第三篇及第四篇作出詳盡明瞭的說明。

同業中人甚至為了娛樂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們談話的結果，往往不是陰謀對付公眾便是籌劃擡高價格。誠然，想通過能實施的或不違反自由和正義的法律來阻止同業者這樣的集會，那是辦不到的，但法律不應該使這種集會易於舉行，更不應該使這種集會非舉行不可。

要同市一切同業者都把姓名住所登記在公共登記簿的規則，就使這種集會易於舉行。因為這把本來也許無法結識的個別人連繫起來，並使同一行業每一個人都能借此獲知所有其他人的住址。

要同一行業的人捐些錢，以救濟同業中的貧者、病者以及孤兒寡婦的規則，由於要他們處理一個共同利害問題，就使這樣的集會非舉行不可。

同業組合，不但使這種集會成為必要，而且使多數通過的決議案對全體有拘束力。就自由行業說，除非同業者全體同意，否則不可能結成有效的組合，而且這組合只在各個人意見繼續一致的時間內，才

能繼續存在。而就同業組合說，能依多數決議制定規則，並附有適當的懲罰條款；這規則限制競爭的作用，比任何自由結合更有效更持久。

有人說，爲着更好地管理行業，同業組合是必要的。這是全無根據的話。對職工的有效和真正的監督，不是他們所屬的組合的監督，而是他們的顧客的監督。使職工不敢欺詐懈怠的，乃是對失業的恐懼。排外的組合，必然削弱這種監督力量。有了排外的組合，一批工人，不論好壞，都得僱用。所只在許多有組合的都市中，甚至在一些最必要的行業上，也不能找到差可人意的工人。如果你要有差可人意的作品，那就必須在郊外定做，那裏的勞動者沒有排外特權，只憑本領。但你得把他們製成了的物品，祕密運入都市。

這樣，歐洲的政策，由於使某些職業中的競爭限於此願加入者爲少的人數，就使勞動和資本的各種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非常大的不均等。

第二，歐洲的政策，增加了某些職業中的競爭，使其超過了自然的限度，因而使勞動和資本的各種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另一種即和上述不相同的不均等。

由於人們認爲，給某些職業培養適當數目的人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時由公共團體，有時由熱誠的私人捐助基金者，爲此目的，設置了許多獎金、助學金、獎學金、苦學生津貼等等。結果，就使這些職業的人數，大大超過自然的限度。我相信，一切基督教國家，大部分牧師的教育費，都是出自這個來源。完全由自費受教育的，不多見。所以，那些自費受教育的人，所花的長久時間和巨大費用以及所下苦功，未必都能獲得相應的報酬，因爲教會中擠滿了願意接受比他們應得報酬低得多的報酬的人。這樣，富者應得的報酬，就因貧者的競爭而被奪去了。我們把教區牧師助理或教堂牧師同一般行業的幫工比較，未免有失體統，但教區牧師助理或教堂牧師的薪水與幫工的工資，卻可正當地視爲有同一性質的。這三種人，都按他們和其上司所訂的契約獲取工作報酬。按照幾次全國宗教會議所公佈的規定，英格蘭教區牧師助理的薪水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還是五馬克，其所含白銀和現今十鎊貨幣所含的大約相同。在同一時期，泥水師傅的工資一日四便士，泥水幫工的工資一日三便士，前者所含銀量和現今一先令所合

相同，後者相當於現今九便士產所以這兩種勞動者，假如能經常被僱，其工資就比教區牧師助理優越得多。假若泥水師傅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就業，其所得工資便和教區牧師助理的薪捧相等。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十二號法令宣稱：“由於對教區牧師助理注給與充分的給養與獎勵，所以有些地方，這些教區牧師助理的給養很不充分。茲特授權各地主教，以簽字蓋章，發放足夠維持生活的庫金或津貼，每年不得超過五十鎊，也不得少於二十鎊。”現今，教區牧師助理年得四十鎊的，即視為非常優裕。儘管上述法令限定年薪不得少於二十鎊，但是許多教區牧師助理，每年俸金少於二十鎊。倫敦的製鞋幫工，卻有的每年可得四十鎊；同市中，任何種類的勤勉勞動者，每年所得，幾乎都在二十鎊以上。二十鎊這數額，確不超過許多農村教區普通勞動者通常所得的數額。無論什麼時候，要是法律企圖規定工資，其結果總是使工資減低，而不使它增高。可是法律曾經好多次企圖擡高教區牧師助理的工資，併為保持教會的尊嚴，命令教區長，要給教區牧師助理以超過他們甘願接受的極微薄生活費的報酬。法律在這兩方面的企圖，都毫無效果。法律從來沒把教區牧師助理的工資，提高到它要提高的程度，也沒把勞動者的工資減低到它要減低的程度。法律既不能阻止前者因處境窮困，競爭者衆多，而甘心接受比法定生活費少的給養，也不能阻止後者，由於僱用人為要取得利潤或愉快，競相僱用，而獲得超過法定生活費的給養。

教會下級職員的景況，雖很窮困，但大聖俸的優異，和其他教會中的尊嚴，卻能保持教會的崇高地位。而且，這種職業所受到的尊敬，正可以補償他們金錢上報酬的低微。在英格蘭及一切羅馬天主教國家，教會這一彩票上所能中的彩數，比所需要的多得多。蘇格蘭、日內瓦以及一些其他新教教會的實例，使我們確信，就一個有那麼大聲譽，而受教育機會又是那麼容易取得的職業說，要獲得一般聖俸的希望，便誘使相當多的有學問和品行端莊的人充當聖職。

而就全無常俸的律師和醫師這些職業說，如果也有那麼多的人由公費教育，那末這些職業上的競爭，不久就變得非常激烈，大大削減他們金錢上的報酬。這樣一來，以自費教育子弟，從事這些職業，就不值得。這些職業，將完全由公共慈善團體所培養的人士充當。他們

人數衆多而且貧窮，一般都滿足於極微薄的報酬。結果，律師和醫師這些職業，就不能象現在那樣受尊重。

通常叫做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正處在律師和醫師在上述假設下所可能有的境況。在歐洲各地，這些人大部分是爲要供職教會而教育出來的，但有種種原因，使他們不能取得聖職。所以，他們的教育一般都是出於公費，而他們的人數到處又是那麼多，使得他們勞動的價格，通常極其低微。

印刷術發明以前，文人靠其才能獲取報酬的唯一職業，就是充當公私教師，換言之，把自己學得的奧妙而有用的知識，授與他人。這種職業，比印刷術發明以後，爲書賈執筆賣文的職業，確是更有名譽，更有效用，而且一般地說，甚至是更可獲利的職業。要做一個出色教師，所需要的時間與研究，所需要的天資、知識和勤勉，至少必與著名律師和醫師所需要的相同。然而，出色教師的普通報酬，卻比不上律師和醫師所得的報酬，因爲前者的職業，擠滿了靠公費受教育的窮苦的人，而後者的職業，則由從自費受教育的少數人充任。不過，公私教師的通常報酬，現今雖然很少，但若那些爲麪包而執筆賣文的更貧苦文人，不趕出市場，而加入競爭，那末這些教師的報酬，無疑比現今還要微薄。在印刷術發明以前，學者和乞丐，似乎是非常接近的同義語。當時各大學校長，似乎常給他們的學生髮乞食證。

在從前還沒設置這種獎學津貼，使貧困子弟爲從事神學、醫學及法學這三種職業而受教育的時候，卓越教師的報酬，似乎就比上面所說的大得多。蘇格拉底，在所謂反詭辯學派的演說中，曾譴責當時教師言行不一致。他說：“他們對他們學生作極堂皇的諾言，說要把學生訓練成爲有智慧、幸福和公正的人，但對這樣重大的功勞，他們只求四邁納或五邁納那麼微薄的報酬。”他繼續說：“教人智慧，自己無疑地應當是有智慧的。但是，一個人以這樣低的價格，出賣這樣高的貨色，定會被人訾爲大愚。”在這裏，蘇格拉底對當時教師報酬，確沒有誇張的意思；我們可相信，當時教師的報酬，正是他所說的那麼多。四邁納，等於現今十三磅六先令八便士；五邁納，等於十六磅十三先令四便士。雅典當時對最優秀教師的普通報酬，必定不少於五邁納。蘇格拉底自己向學生每人要十邁納，即三十三磅六先令八便士。據說，他在雅典講學時，有一百個學生。我認爲，一百個是他在一個

時期所授的學生數，即來聽他叫做一系列連續講演的人數。象雅典這麼大的都市，象蘇格拉底這樣出色的教師，象他所教的又是當時那麼流行的修辭學，學生一百人，並不算太多。所以，對於每系列連續講演，他必定得到有一千邁納，即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在另一個地方的普魯塔克說，他的通常講金，有一千邁納。當時其他許多卓越的教師，似都曾獲有大宗財產。喬治阿斯曾以純金製成自己的金像，贈給德爾菲寺堂。我們不可認為，他自己的金像，與其身體是同樣大。喬治阿斯的生活方式，和當時其他兩位有名的教師，即皮阿斯及普羅特格拉斯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圖看來，都很華麗，甚至接近於豪奢。柏拉圖自己的生活，據說，也很闊綽。亞里士多德是亞力山大王子的師傅。王子及其父腓力普，對他報酬的隆厚，那是一般所公認的。但亞里士多德卻以為，回到雅典再開學園，更為上算。當時傳授知識的教師，也許沒有此後數十年那麼多。此後數十年，競爭的結果，也許使教師的勞動的價格，以及世間對他們人格的尊敬，都稍稍下降。但最傑出的所享受的報酬和尊敬，似乎總是比今日從事同一職業的人大得多。雅典市民曾派遣學園學派大師卡尼阿邊及斯多亞派大師提奧奇尼斯出使羅馬，其使節的尊嚴，真令人羨慕。當時雅典雖失去了以前的壯觀，但還是個獨立有名的共和國。此外，卡尼阿迪是巴比倫人，以嫉妒外人充當公職著稱的雅典人，居然在這種場合，派遣卡尼阿迪，足見他們對這位大師尊敬到了什麼程度。

上述那樣的不均等，從全體看來，對社會大眾，也許是利多害少。公職教師的地位，雖不免因此稍稍降低，但學藝教育費的低廉，確是一種利益，大大抵消了公職教師地位的降低。如果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學校和學院組織得比現在更合理，那末大眾由此受到的利益將更大。

第三，歐洲政策，妨礙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移轉到其他職業，由一地方移轉到其他地方，從而使勞動和資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時候出現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學徒法令，妨礙勞動的自由活動，甚至使勞動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職業轉到其他職業；同業組合的排外特權，妨礙勞動的自由活動，甚至使勞動在同一職業不能由一地方轉到其他地方。

我們時常看到，一種製造業的勞動者獲得高工資，而另一種製造業的勞動者卻不得不滿足於最低的生活費。前一種製造業，處在前進狀態，不斷需要新的勞動者，後一種製造業，處在衰退狀態，勞動者的過剩，不斷增加。這兩種製造業，有時是在同一都市，有時是在同一都市的鄰近地方，但相互間卻不能有絲毫的協助。在前一場合，有學徒法令妨害其相互協助。在後一場合，有學徒法令和排外的組合，妨害其相互協助。可是，有許多不同種類的製造業，操作很類似，設無此等不合理的法規，從中作梗，勞動者就能很容易由一職業轉到另一職業。例如，織素麻的技術與織素絲的技術，幾乎完全相同。織素羊毛的技術，雖略有差別，但因為這差別極其有限，麻織工或絲織工，亦只要學習數日，就能成為差可人意的毛織工。因此，假若這三種主要製造業中，任一製造業陷於衰退狀態，該製造業的勞動者，可改就其他兩種繁榮的製造業之一，而他們的工資，在繁榮的製造業中不會過高，在衰退的製造業中，亦不會過低。誠然，英格蘭今日麻布製造業，通過特別法令而開放了，人人都有從事這業的自由，但由於該業，沒在英格蘭大部分地區大力推廣，所以這對其他衰退製造業的勞動者，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就業機會。在實施學徒法令的地方，衰退製造業的勞動者只好請教區救濟，或以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從事勞動。不過，按照他們的習慣，他們更適合於做類似製造業的工人，而不太適合於做普通勞動者。所以，一般地說，他們寧願請教區救濟。

什麼妨害勞動者的自由流動，也同樣妨害資本的自由流動。因為一種行業上所能使用的資本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這行業所能使用的勞動量。不過，同業組合法規妨礙資本由一地移到另一地的自由流動，在程度上小於它妨礙勞動的自由流動。不論何處，富裕商人要在自治城市中獲得經商的特權，比貧窮技工在自由城市中獲得勞作的特權容易得多。

我相信，同業組合法規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是歐洲各地共有的現象。而濟貧法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據我所知，卻是英格蘭所特有的現象。自有濟貧法以來，貧民除了在所屬的教區內，就不易取得居住權，甚至不易找得工作的機會。同業組合法規所妨害的，只是技工和製造工人勞動的自由移動。獲得居住權的困難，甚至妨害一般勞動

的自由移動。英格蘭的亂政，恐以此為最。我現在就其起源、發展及現狀，作一些說明，也許不是無益的吧。

英國貧民，一向是靠修道院施捨，修道院破毀的結果，貧民得不到此種施捨。後來，雖幾經設法救濟，但均無效果。伊麗莎白女王三十四年，頒佈第二號法令，規定各教區有救濟其所屬貧民的義務，並規定每年任命管理人，會同教區委員，通過教區稅，徵收足夠救濟貧民的金額。

按這法令，各教區都不得不贍養所轄境內的貧民。但一個人怎樣纔算是所轄境內的貧民呢？這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一定時間內，有了略不相同的答案，直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十四年的法令，才確定下來。該法令規定，不論是誰，只要繼續不斷在某教區住過四十天，就可取得這教區的戶籍。但在這四十天期限內，治安推事二人，得依教區委員或貧民管理人的陳訴，把新居民遣回他最後合法居住處所的教區，除非新居民租有每年十磅地租的土地，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擔保脫除原屬教區戶籍而治安推事認為滿意的保證金。

據說，此種法令曾產生若干欺詐行為。教區職員有時賄使區內貧民潛赴其他教區，並在其他教區潛住四十天，獲得戶簿，以圖脫去原屬教區戶籍。為矯正此種弊竇，詹姆士三世第一年，作以下的規定：不論何人，在新教區獲得戶籍所必需的連續居住四十日，一律以他以書面向當地教區委員或貧民管理人報告他新居地址及家族人數之日算起。

然而，教區職員對於自己教區，未必都象他們對其他教區那樣公正辦事。對於這樣闖進教區的人，他們有時默許他們闖進，接受書面報告，而不採取任何適當處置。由於教區各居民，為自身利益，都要儘可能阻止這樣闖進的人，所以，在威廉三世第三年，又有以下的規定：那四十日居住期，只從那書面報告，在教堂於星期日作禮拜後公佈之日算起。

伯恩博土說：“書面報告公佈後，繼續居住四十日而獲得戶籍的人，畢竟寥寥無幾。此等法令的目的，不在於使移住人獲得戶籍，而在於使人不能潛入教區，因為繳交報告書，只是給這教區以迫令他遷回原教區的力量。但是，如果一個人有那樣的地位，以致實際上能否

迫令其遷回原教區很有疑問，那末他繳交報告書，就迫使教區在以下兩種辦法中選擇一種：第一，容許他繼續居住四十日，不抗拒地給予戶籍；第二，試行權力，命其退出。”

因此，這種法令，使貧窮人幾乎不可能按繼續居住四十日的老辦法獲得新戶籍。爲使一個教區普通人民，不致因這法令而不能在另一個教區安家立業，又規定無須繳交或公佈報告書亦能取得戶籍的其他四種辦法：一，繳納教區所課的稅；二，被推選爲一年任期的教區職員，並供職一年；三，在教區當學徒；四，被教區僱用，爲期一年，而且在這整年內連續做同一工作。

誰都不能按這四種辦法中頭二個辦法，取得戶籍，而只能通過教區全體人民的行動，取得戶籍。教區人民都懂得很清楚，把一個除自身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按課稅或選爲教區職員等辦法收容進來的結果是怎樣。

已經結婚的人都不能按後二個辦法取得戶籍。做學徒的，很少是結過婚的，而已經結婚的傭工，又有明令規定，不得由於受僱一年而取得戶籍。採用通過服務取得戶籍這辦法的主要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一年爲僱用期的老習慣，這習慣，從前在英格蘭是那麼通行，直到今日法律仍把未經議定的僱傭期間解釋爲一年。但是，僱主未必都願意因僱用傭工一年，便給他以戶籍，而居工亦未必都願意因被僱一年而取得新戶籍，因爲最後的戶籍取消從前的戶籍，他們可能因此失去他們出生地即父母親和親戚居住地的原戶籍。

很明顯，一個獨立工人，不論他是普通勞動者或是技工，都不能通過做學徒或被僱而獲得新的戶籍。因此，當他帶着他的技能進入新教區時，不論他如何健康，如何勤勉，除非他租有每年租金十鎊的土地——這對於除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是無法辦到的——，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保證職除原屬教區戶籍而二個治安推事認爲滿意的保證金，否則教區委員或貧民管理人就可隨時令其退出。誠然，保證金數目完全由治安推事自由裁決，但他們所要求的，不可能少於三十鎊，法律規定，凡購買價值少於三十鎊的世襲不動產的人不能取得戶籍，因爲這不夠作爲脫除原戶籍的擔保。靠勞動爲生的人很少能提出三十鎊保證金，而且實際上所要求的往往比這數額大得多。

爲了在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那幾乎完全被上述法令所剝奪的勞動自由流動，當局想出了發證書的辦法。威廉三世第八年及第九年的法令規定，不論是誰，要是持有他最後合法居住的教區發給的證書，由該區委員及貧民管理人署名，二名治安推事認可，並註明任何教區都有收留他的義務，那末他所移向的教區，不得以他可能成爲負擔的理由，令其退出，只有在他實際上成爲負擔時纔可令其遷移，在那場合，發給證書的教區，有負擔其生活費和遷移資的義務。爲使持證者所要居住的教區能有最大的安全，同一法令又規定：移居者須租有一年租金十鎊的土地，或自行給教區服務滿一年，才能取得戶籍。這樣，他就不能通過繳交報告書、被僱、做學徒或繳納教區稅而取得戶籍。此外，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法令第一號第十八條規定，持有此項證書的人的傭工或學徒都不能在他所住教區內取得戶籍。

這個發證書的辦法在什麼程度上恢復了被上述各法令所幾乎完全剝奪的勞動移動自由，我們可從伯恩博士以下有見識的話看得出來。博士說：“教區當然有種種理由，責令新來者交出證書。持有證書而來居住的人，不能通過做學徒、被僱、繳交報告書或繳納教區稅而取得戶籍。他們的學徒和僱工不能取得戶籍。如果他們成爲負擔，他們所居住的教區，當然知道要把他們遷到什麼教區去，而後一教區要擔負他們的遷移資及遷移期間的生活費。如果他們病了，不能遷移，發證的教區須擔負他們的生活費。所有這些，都非有證書不可。但所遷入的教區責令交出證書的理由，就是原教區一般不肯發給證書的理由。領證書的人民，大有被遷回的可能，而在他們遷回時，境況比從前還要壞。”伯恩博士這種論調，其用意似乎說，貧民要遷入的教區，應要求交證書，而貧民要遷出的教區，不應輕易發證書。這個極有才智的作家，在他所著《濟貧法史》中又說：“就證書這辦法說，存在看多少慘酷的事實。它使教區職員有權力把貧民可以說是終身幽禁起來，儘管貧民在不幸獲得所謂戶籍的地方繼續居住是那麼不合適，而他自己所要移住的地方對他是那麼有利。”

雖然證書只證明領證者所屬的教區，並不證明領證者的善良操行，但這證書是否發給，是否收納，完全由教區職員自由裁決。據伯恩博士說，有一次，有人向高等法院建議，命令教區委員及貧民管理人簽發證書，但高等法院認爲這是個非常離奇的建議，拒絕了。

英格蘭境內，相距不遠的各地方的勞動價格，很不均等，這也許是起因於英格蘭的居住法，那種法律使無證書的貧民不能轉地勞作。誠然，康健而勤勉的獨身者有時也可以由於寬容而無證書而在其他教區得到居處，但有妻室子女的人，要作此種嘗試，就不免要為大多數教區所斥逐。而獨身者，要是後來結婚，也將同樣被斥逐。因此，在英格蘭，不能象在蘇格蘭以及我相信在居住方面沒有障礙的所有其他國家那樣，一個教區勞動力的不足，都可由其他教區勞動力的過剩得到補救。在這些國家，在大都市附近或在對勞動有異常需要的地方，工資有時高些，而距此等地方愈遠，工資使越接近於那國家的工資一般水平，但象英格蘭鄰近各地方的工資，有的時候突然發生的莫明其妙的差異，卻是別處沒有的。在英格蘭，貧民要超越教區的人為境界，往往比超越國家間由高山脈或海灣構成的自然境界困難得多。這些自然境界有時使這些國家的工資率判然不同。

強迫一個沒有犯過輕罪的人，遷出他所願居的教區，顯然是侵害天賦自由與正義的。英格蘭的普通人民，雖是那麼羨慕自由，但他們也象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普通人民一樣，從來不曾正確瞭解自由是什麼，在一百多年內，一直甘受此種壓迫，不圖補救。有思慮的人，有時也說，居住法為羣衆所不滿，可是，它沒象搜查票那樣，成為大家叫叫嚷嚷地反對的對象。搜查票無疑是一種弊害，但不會產生象居住法那麼普通的壓迫。我敢斷言，今日四十歲的英格蘭貧民幾乎註有一個在他一生中接受過這荒謬居住法慘酷的壓迫的。

我將從下面的話，結束這冗長的一章。在往昔，最初只全國性的普通法律，然後從各州治安推事的特殊命令，規定工資，到現在，這兩種辦法都廢而不用了。伯恩博士說：“四百餘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把性質上不允許仔細限定的東西硬加以精密釐定的做法，該廢止了。如果所有同業工人都領受同額工資，一切競爭都會停止，而技能或發明才能也將無發揮之餘地。”

然而，時至今日，個別法案有時還企圖規定個別行業和個別地方的工資。喬治三性第八年的法令規定，除國喪場合，倫敦及其附近五英里以內的裁縫業者，每日不得支給二先令七便士以上的工資，而其僱工也不得領受此金額以上的工資，違者科以重罰。從來立法當局在規定雇主及僱工關係時，總是以僱主為顧問。所以，法規對勞動者有

利的，總是正當而公平，但對僱主有利的，往往卻是不正當不公平。例如，命令某些不同行業僱主須以貨幣而不得以貨物支給工資的法律，是完全正當而公平的。僱主們並不因此而有什麼實際上的困難。所要求於他們的，只是把他們一向想採用而實際上不常採用的貨物支付法，改為貨幣支付法。這種法律當然對勞動者有利，但喬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卻有利於僱主。當僱主企圖減低勞動工資而互相聯合時，他們通常是締結一種祕密的同盟或協定，相約不得支給定額以上的工資，違者懲處。如果勞動者也成立一種對抗的結合，約定不許接受定額以下的工資，違者懲處，法律就將嚴厲地制裁勞動者。法律果是公平，就得以對付勞動者的辦法，對付僱主。但喬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卻用法律實施了僱主們有時企圖通過這種結合來規定的規章。勞動者常常抱怨這法律，說這法律把最有能力和最勤勉的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同樣看待，這種抱怨似乎是完全有根據的。

此外，以前，常常通過規定食品及其他物品的價格，來規定商人的利潤。據我所知，今日的麪包法定價格是這種舊習慣的唯一遺蹟。在有排外同業組合的地方，規定生活第一必需品的價格，也許是一種適當處置。但在沒有組合的地方，競爭對調節物價的作用比法定價格的作用大得多。喬治二世第三十一年制定的規定麪包價格的辦法，由於法律上的缺陷，在蘇格蘭無法實行，這辦法要靠市場職員執行，而蘇格蘭當時沒有市場職員。直到喬治三世第三年，才矯正法律上這個缺陷。但蘇格蘭從前未實行法定價格，也無何等大的不便，而在現在還施行法定價格的地方，也不見有何等大的利益。但是，在蘇格蘭大多數都市，都有自稱有排外特權的麪包業組合，但沒對這特權加以嚴密的保護。

已經說過，投在不同用途上的勞動和資本的不同工資率和利潤率的比例，似乎不大受所屬社會的貧富、進步或退步停滯狀態的影響。公共福利上這樣的變革，雖然會影響一般工資率和利潤率，但歸根到底對所有不同用途必有相同的影響。因此，不同用途上的工資率和利潤率的比例，必繼續相同，至少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不會因上述變革而變動。

第十章 論工資與利潤隨勞動與資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的勞動和資本用途的利害，總的說來，在同一地方內，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斷趨於相等。在同一地方內，假若某一用途，明顯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會有許多人離去比較不利的用途，而擠進比較有利的用途。這樣，這種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其他各種用途相等。至少，在各事物都聽任其自然發展的社會，即在一一切都聽其自由，各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並能隨時自由改業的社會，情況確是如此。各人的利害關係必然會促使他尋求有利的用途，避開不利的用途。

誠然，歐洲各地的貨幣工資及貨幣利潤，都隨勞動和資本用途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但這種不相同，部分起因於各種用途本身情況，這些情況，實際上，至少在一般人想象上，對某些職業的微薄貨幣得利有所補償，而對另一些職業的優厚貨幣得利有所抵銷；部分因為歐洲各國的政策都不讓事物完全自由地發展。

為要分別討論那些情況及那種政策，我把本章分作兩節。

就我所能觀察到的說，有以下五種主要情況，一方面對某些職業的微薄金錢報酬給予補償，另一方面又對另一些職業的優厚金錢報酬加以抵銷：第一，職業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職業學習有難有易，學費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職業所須擔負的責任有重有輕；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第一，勞動工資因業務有難易、有污潔、有尊卑而不相同。例如，大多數地方，就整年計算，縫工的所得較織工為少，這是因為縫工的工作較為容易。織工的所得較鐵匠為少，這是因為織工的工作清潔得多。鐵匠雖是一種技工，但十二小時工作所得，往往不及一個普通煤礦工八小時工作所得，這是因為鐵匠的工作，不象煤礦工那麼污穢危險，而且他是在地面上日光下工作。對於一切尊貴職業，榮譽可以說是報酬的大部分。如本節後面所述，就金錢得利說，考慮到各方面，從事此等職業的報酬一般都有限。反之。在卑賤的職業上，情形正相反。屠戶的職業既粗蠻又討厭，但在許多地方，他們的得利比大部分其他普通職業多。劊子手的職業，是最可嫌惡的職業，可是，與其工作量相比，他的報酬比任何普通職業都多。

未開化社會視為最重要的漁獵，在進步社會，卻成為最愉快的娛樂。古時為必要而漁獵，今日卻為消遣而漁獵。所以在進步社會內，把別人消遣的事當作職業的人，都是極貧苦的。自西奧克里塔斯時代以來，漁夫都極其貧困。私獵者在英國各地都是極貧苦的人。在嚴禁私獵的國家中，特許狩獵者的狀況也不見得優裕多少。許多人操此等職業是由於他們對此等職業的自然興趣，而不是由於此等職業能給他們提供優裕生活；而他們勞動生產物的售價，與其勞動量相比，總是過於低廉，從事此種職業的人，除了極少的生活費外，實不能更有所得。

不愉快和不名譽對資本利潤的影響，和它們對勞動工資的影響相同。小旅館或小酒店的老闆決不是自己店鋪的主人，醉客蠻橫無理，他們只好忍受，他們所操的職業是不名譽和不愉快的職業。但在普通營業中，象這樣以小額資本得到大額利潤的營業，是很少見的。

第二，勞動工資，因業務學習有難易、學費有多寡而不相同。

設置高價機器，必然期望達機器在磨毀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業可以收回投下的資本，並至少獲得普通的利潤。一種費去許多工夫和時間才學會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練的職業，可只說等於一臺高價機器。學會這種職業的人，在從事工作的時候，必然期望，除獲得普通勞動工資外，還收回全部學費，並至少取得普通利潤。而且，考慮到人的壽命長短極不確定，所以還必須在適當期間內做到這一點，正如考慮到機器的比較確定的壽命，必須於適當期間內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潤那樣。熟練勞動工資和一般勞動工資之間的差異，就基於這個原則。

歐洲各國的政策都把機械師、技工和製造師的勞動看做熟練勞動，而把一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看做普通勞動。這種政策似乎認為，前者的勞動化後者的勞動在性質上更細緻更巧妙。在若干場合也許是這樣，但在大多數場合卻不是這樣，我在下面加以說明。所以，歐洲各國的法律習俗，為使某人有從事前一種勞動的資格，都要求他先作學徒，但嚴格程度各地不同。而對於後一種勞動，全聽人自由，不加限制。在作學徒期內，學徒的全部勞動都歸師傅所有。學徒的生活費，在許多場合，還是仰給於父母親或親戚，至於衣服，幾乎都是由父母親或親戚務辦。依照普通習慣，學徒還須給師傅若干學費。不能給付金錢的學徒就要給付時間，換言之，要做比一般年限長的學徒。

不過，這對師傅未必有利，因為學徒往往習於怠惰，而這對學徒總是不利的。反之，就農村勞動說，勞動者往往在被僱從事簡易工作的時候學會了比較繁難的工作。在受僱期中，無論在什麼階段，他都能以自己勞動維持自己生活。因此，歐洲各國的機械師、技工和製造師的工資，論理要稍稍高於普通勞動者的工資，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這種情形，使他們成為高人一等的人。但是，一般地說，他們這種優越程度很有限。製造單色的亞麻布和呢絨這類普通製造品的工人，一日或一星期所得，平均計算，不過略多於普通勞動者一日或一星期的工資。由於他們的工作，比較經常均一，所以全年總計所得也許多些。但是，很明顯，這也不過足夠補償他們受教育所花的更多費用。

精巧藝術和自由職業的學習需要更長時間和更大費用。所以，畫家和雕刻家、律師和醫生的貨幣報酬當然要大得多，而實際上也是如此。

但資本利潤，卻不大受使用資本的那一行業學習難易的影響。大都市通常所用的各種投資方法，就學習難易的程度說，似乎完全相等。國內或國外貿易的一部門業務，大抵不比另一部門業務繁難得多。

第三，各種職業的勞動工資因業務安定不安定而不相同。

有些職業比其他職業安定得多。大部分製造業工匠，要是能夠勞作，一年中幾乎每日都有工作。反之，泥水匠或磚匠在酷寒或天氣險惡時便完全沒有工作。而且，即在天氣好的時候，他們有無工作仍須取決於顧客的臨時要求。以此之故，他們可能常常沒有工作。他們在被僱時所得，不僅要足夠維持他們無工作時期的生計，而且對於他在不安定境遇中不時威到的焦慮和沮喪的痛苦亦須與以若干補償。所以，大部分製造業工人所得，推算起來和普通勞動者日工資幾乎相等，但泥水匠和磚匠所得卻大抵有普通勞動工資的一倍半乃至兩倍。普通勞動者一星期如可獲得四、五先令，泥水匠和磚匠往往可得七、八先令。前者如為六先令，後者常為九、十先令。前者如為九、十先令，象在倫敦那樣，後者常為十五到十八先令。但在各種熟練勞動中，泥水匠和磚匠那樣的勞動似乎最容易學習。據說，倫敦轎伕在夏天有時被僱為磚匠。所以，這類勞動者的高工資，與其說是熟練的報酬，倒不如說是不安定的報酬。

建築木匠所從事的業務，比泥水匠的工作似乎更細緻、重技巧。但在許多地方，不可說在一切地方，建築木匠每日的工資卻比泥水匠略低。這是因為他工作的有無，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顧客的臨時要求，但不象泥水匠那樣完全取決於顧客的臨時要求，且又不象泥水匠那麼容易受天氣的影響。

如果一般地提供經常工作的職業，在某一地方不提供經常的工作，那末操這些職業的工人的工資總會上升，大大超過這些職業工人的工資和普通勞動工資的通常比例。倫敦一切下層技工，象其他各地的日傭工那樣，每日每週都可能被僱主僱入或解僱。因此，倫敦最下層技工，即裁縫工，一日也能獲得半克朗，儘管十八便士可以說是普通勞動的日工資。在小都市及鄉村地方，裁縫工的工資往往漢等於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但在倫敦，裁縫工動輒數星期無所事事，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除工作不經常外，還加上艱苦、不愉快和不清潔，那末，即使這種工作是最普通的勞動，那些情況有時也使其工資上升到超過最熟練技工的工資。按件計資的煤礦工，在紐卡斯爾，一般可得到約二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在蘇格蘭許多地方，可得到約三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他們得到高工資，全是由於他們工作的艱苦、不愉快和不清潔。他們大抵都能隨他們的意思，要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就艱苦、不清潔和不愉快說，倫敦運煤工人的職業幾乎和煤礦工的職業相同，但由於炭船難免不定期到達，所以大部分運煤工人的工作，必定是很不固定的。以此之故，煤礦工如果通常得到二倍三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那末，運煤工人有時得到四倍、五倍於普通勞動的工資，似乎不應該認為是不合理的。依據數年前的調查，運煤工人按照當時工資率，每日能得到六先令至十先令。就六先令說，大約四倍於倫敦普通勞動的工資。不論何種職業，最低的普通報酬往往可算是從事這職業者絕大多數所得的報酬。他們的所得，儘管顯得過高，但如果除補償職業上一切不適意情況外還有剩餘，那末在一個沒有壟斷特權的職業裏，不久必有許許多多競爭者出現，很快就使其工資率降下來。

至於任何行業的資本的普通利潤，都不可能受資本用途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影響。資本是否固定地使用，不取決於行業，而取決於經營行業的人。

第四，勞動的工資，因勞動者所須負擔的責任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地方金匠和寶石匠的工資，不僅比需要同樣技巧的許多其他勞動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許多其他勞動者高。這是因為有貴重的材料付託給他們。

我們把身體的健康委託於醫生；把財產，有時甚至把生命和名譽委託於律師或辯護士。象這樣重大的信任決不能安然委託給卑不足道的人。所以他們得到的報酬必須使他們能夠保持這重大託付所需要有的社會地位。他們必須保持的社會地位，和他們必須受的長期教育與必須花的鉅額費用，勢必使他們的勞動價格更加增高。

如果一個人僅僅使用自己資本經營生意，他就沒受到什麼委託。至於他能否由他人取得信用，不取決於他所經營的行業的性質，而取決於他人對他的財產、正直和智慮的意見是怎樣。因此，不同行業中不同的利潤率，不可能起因於經營各行業者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委託。

第五，各種職業的勞動工資，隨取得資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個學習職業的人能否勝任所學的職業，此可能性的大小，因職業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機械職業說，成功幾乎都是有把握的，但就自由職業說，卻是很沒有把握的。例如，送子學作鞋匠，無疑他能學會製鞋的技術；但若送子學法律，那末精通法律並能靠法律吃飯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對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說，中彩者應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職業說，這成功的一人，應享有不成功二十人應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大概要到將近四十歲時才能從職業取得一些收益的律師，其所得報酬應不僅足以補償他自己為受教育所花的那麼多時間和那麼大費用，而且足以補償那些全無所得的二十多人的教育時間與費用。儘管律師所收的費有時顯得過高，但他的真正報酬必不止此。計算一下，某一地方的鞋匠或織工這類普通工人一年間可能收入的總額和他們一年間可能支出的總額，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收入一般多於支出。如果你用同樣的方法，總計各律師及各法學協會見習律師的支出與收入，你就會知道，即使你儘量提高他們年收入的估計，並儘量減低他們年支出的估計，他們的年收入，只等於年支出的極小部分。所以，法律業這個彩票，決不

是完全公平的彩票。法律業與其他許多自由職業和榮譽職業，所得金錢報酬顯然都是很充分的。

但這些職業能與其他職業並駕齊驅。其出路雖令人氣短，但所有豁達磊落的人都爭先恐後地向這方面擠來。這是由於有兩個鼓舞他們的原團：第一，希望做這些行業的狀元的名譽心；第二，對於自己的才能甚至幸運，一切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天生的自信心。

一個人如果在一種作到平凡地步也不容易的職業裏特別顯露頭角，那就最明確地表示他具有所謂天才或卓越的才幹。由這卓越才幹所博得的人們的讚賞常是他的報酬的一部分。這部分報酬是大還是小，要看讚賞的程度是大還是小。對醫生說，這佔全報酬的大部分；對律師說，所佔的部分更大；對詩人或哲學家說，幾乎佔了全部。

世上有幾種非常適意而優美的才能，若能取得，定能博得某種讚賞，但若用這才能來謀利，世人就會根據意見或偏見認為是公開出賣靈魂。因此，為謀利而運用此種才能的人，所得金錢，不但須補償他學習這種技能所花的時間、工夫和費用，且須補償他以此謀生而招致的聲名上的損失。俳優、歌劇唱角、歌劇舞蹈者等所以有非常大的報酬，乃是起因於這兩個原則：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於運用這才能而蒙受的聲名上的損失。我們在一方面鄙視其人格，在另一方面卻又對其才能給與非常優厚的報酬，這乍看起來，似乎很不合理。其實，正因為我們鄙視他們的人格，所以要厚酬他們的才能。假若世人對於這些職業的意見或偏見一旦改變，他們的金錢報酬很快就會減少。因為更多的人要從事這些職業，而競爭勢必使他們勞動的價格很快降低。這類才能雖不是一般才能，但絕不是象世人所想象的那麼稀罕。完全具有這種才能而不屑用以圖利謀生的人，實不在少數。更多人能學得這種才能，如果運用這種才能來謀生不致於損害名譽的話。

大多數人對於自己的才能總是過於自負。這是歷代哲學家和道德家所說的一種由來已久的人類通病。但世人對於自己幸運的不合理猜測，卻不大為識者所注意。要是可以這樣說的話，對自己幸運妄加猜測，比對自己才能過於自負，恐怕還更普遍些。身體精神相當健旺的人，對自己的幸運，總不免抱有幾分自信。每一個人，對得利的機會，都或多或少地作了過高的評價，而大多數人，對損失的機會，作

了過低的評價。身體精神相當健旺的人，對於損失的機會，很少作過高的評價。

我們認購買彩票的人都認為能中彩這一事實可以看出，人們自然而然地把得利的機會估得過高。完全公平的彩票，換言之，以全部得利抵償全部損失的彩票，不獨從來沒有，以後亦永遠不會有，因為要是這樣，經營者便一無所得。就國營彩票說，彩票實際上並不具有等於購買者所給付的價格的價值，但市場通常按超過實際價值之百分之二十、三十乃至四十的價格售賣。彩票這種需求所以發生的唯一原因，不外是大家想中大彩的癡心妄想。一個很穩重的人，雖明知用以購買彩票的小額資金的實際價值比中彩機會的實際價值也許要高過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但也不認為，以小額資金釣取一萬鎊乃至二萬鎊的中彩機會是愚蠢的。獎金不超過二十鎊的彩票，縱使在其他方面比普通國營彩票更接近於完全的公平，但要購這種彩票的人恐怕要少得多。為要增加得中大彩的機會，有的人，同時購買彩票數張，有的人，買更多的分條彩票。但是，你冒險購買越多的彩票，你就越可能是損失者，這是數學上再確定不過的定則。假若你冒險購買全部彩票，你肯定會虧損。你購買彩票的張數越多，你的損失就越接近於上述肯定的損失。

我們從保險業者的輕微利潤可以看出，損失機會往往估得過低，很少估得高於其價值的。把火災保險或海上保險當作一種事業經營，所收的普通保險費必須足以補償普通的損失，支付經營的費用，並提供資本要是用於一般經營所能取得的利潤。只給付這麼多保險費的被保除人，明顯地只給付危險的真實價值，換言之，只給付他有充分的理由可指望的最低保險價格。雖然許多人從經營保險生意取得微利，但很少人由此發大財。由此可見，一般得利與損失相抵的結果，對保險業不象對那些使許多人發財的其他行業那麼有利。然而，儘管保險費一般都很低廉，許多人卻非常輕視危險而不願支付保險費。就全英國的房屋平均推算，二十戶中就有十九戶，甚或百戶中有九十九戶，不曾保有火險。海上風險，在許多人看來，比火災更為可怕，所以，保險船隻對未保險船隻的比例卻比保險房屋對未保險房屋的比例大得多。但無論在什麼季節，甚至在戰爭期中，都有許多未保險船隻往來航行。象這樣未保險的航海，有時也不能遽然斷為不慎。一大公司甚

或一大商人，若有船二、三十隻同時航行海面，它們可以說是相互保障，而由此節約下來的保險費，也許足夠補償在一般情況下所可能遭受的損失而有餘。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船隻不保水險、房屋不保火險，都是沒有這種精密計算的結果，完全是由於輕率無遠慮和鹵莽地輕視危險。

輕視危險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只選擇職業的青年時期最為活躍。在這時期，對不幸的恐懼抵不過對幸運的希望。這從普通青年歡歡喜喜地應募參軍或出海航行，比從上流社會青年熱中於從事所謂自由職業，看得更加明顯。

普通士兵所可蒙受的損失是很明顯的。然而，青年志願兵不顧危險，在新戰爭開始時，特別踊躍地應募。升遷的機會雖幾乎沒有，但他們在青年的幻想中想到了許許多多可以獲得但事實上並不能獲得的榮譽和大功的機會。這些空虛的希望，就成為他們流血的全部代價。他們的報酬比普通勞動者低，而且在實際工作上，他們的勞苦比普通勞動者大得多。

總的說來，航海這個彩票，並沒象陸軍那個彩票那麼不利。一個有聲譽的工匠的兒子往往可以得到父親的允許去航海。可是，如果他應募作陸軍士兵，總要瞞着他的父親。就前一職業說，他人也看到有幾分成功的機會，而就後一職業說，除了他自己，誰都不會認為有成功的機會。偉大的海軍上將，沒象偉大的陸軍上將博得那麼大的民衆崇拜。海上服務最大成功所可得到的名利，也不象陸上同樣的成功所可得到的名利那麼喧赫。海陸軍上將以下的軍官，都有這樣的差別。依據等級的規定，海軍上校與陸軍上校屬於同一階位。但在一般的評價上，不把這兩者同樣看待。由於彩票中，大彩比較少，所以小彩就比較多。因此，普通水兵，比普通陸軍士兵，更常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名利。而獲得中小彩的希望，乃是一般人願充作水兵的主要原因。普通水兵的熟練與技巧，雖比幾乎所有技工的熟練與技巧都強得多，而他們一生中雖不斷地和困難與危險作搏鬥，可是，在他們繼續充當普通水兵的時候，儘管他們有那麼大的熟練技巧，和那麼大的困難與危險，他們除了在運用熟練與技巧和克服困難與危險時，有點快感外，幾乎沒得到其他報酬。他們的工資，並不大於決定海員工資率的那一港口的普通勞動者的工資。由於他們不斷往返於各港口間，所以，由

不列顛各港口出航的海員，每月工資，比各港口任何其他勞動者的工資，更趨於一致。而且，由於倫敦港海員出入最多，所以倫敦海員工資率便決定其他各港口的海員工資率。倫敦各級工人大多數的工資約有愛丁堡同級工人工資的兩倍。但由倫敦出航的水手，每月所得工資，很少比由利斯港出航的水手高出三四先令，這麼大的差額是不常見的。就平時和就商船說，這種勞動在倫敦的價格，以月計，是二十一先令到大約二十七先令。然而倫敦普通勞動者以一星期九先令或十先令計算，每月可得到四十先令乃至四十五先令。誠然，水手除工資外，還供有食糧。但其價值，未必會超過他所得工資及普通勞動者所得工資的差額。即使有時超過了這差額，但這超過額也不能算是水手的純利，因為水手不能和其家庭分享這種食糧，而必須用他的工資來養活他的妻子。

冒險生活的危險和九死一生，並不使青年人的勇氣受挫折，有時似乎反鼓勵他們去選擇這類職業。在下層階級中間，慈母往往不願把兒子送入海港城市的學校讀書，害怕兒子看到海船，並受水手的談話和冒險事蹟的引誘，去參加海洋生活。在遙遠將來可能發生的危險，並不使我們有所畏懼，因為我們可望憑自己的勇敢與機智來擺脫危險，因此不會提高這類職業的勞動工資。至於勇敢與機智不能有所用的職業情形就兩樣了。而非常不衛生的職業的勞動工資總是特別豐厚。不衛生乃是一種不愉快，而它對勞動工資所生的影響應歸入不愉快那個總項目。

各種資本用途的普通利潤率，或多或少地隨收益的確定與不確定而不同。一般地說，國內商業的收益，不象國外貿易那麼不確定，而國外貿易的一些部門，又不象另一些部門那麼不確定。例如，對北美貿易的收益，不象對牙買加貿易的收益那麼不確定。普通利潤率，隨危險程度增高而多少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險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換句話說，增高的利潤不一定能完全抵償危險。破產在最危險職業上最常見。最危險的事業要算秘密輸入。在冒險成功的場合，其得利固厚，但這種冒險無可避免地導致破產。成功的奢望，在這場合所起的作用，正如在其他場合一樣，誘使那麼多冒險家去做這種危險生意，以致他們的競爭，使利潤減低到不夠補償危險的程度。要使危險完全得到補償，其普通收益，應在資本普通利潤外，不僅彌補一切不

時的損失，還對冒險家提供一種與保險家利潤同性質的利潤。但是，如果普通收益足夠提供這些，那末這些行業的破產危險就不比其他行業更為常見。

因此，使勞動工資各不相同的五種情況，只有兩種影響到資本利潤，那就是工作是愉快還是不愉快，是安全還是危險。就愉快或不愉快說，大多數不同資本用途，都相差不遠，或者全無差別，但在各種不同的勞動用途，卻存在着很大的差異。而且，資本的普通利潤，雖隨危險程度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程度未必和危險程度都成比例。由此可見，在同一社會或其附近地方，各種資本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潤率，比各種勞動的貨幣工資更接近於一個水平。事實上，也正如此。普通勞動者所得，和生意好的律師與醫生所得的差異，明顯地比任何兩種行業的普通利潤的差異大得多。況且，各種行業利潤表面上的差異往往是靠不住的，這是因為我們未必都把應該算作工資和應當算作利潤的區別開來。

藥劑師的利潤一語，已成為非常過分得利的代名詞。但是這種表面上很大的利潤，往往只是合理的勞動工資。就技能說，藥劑師比其他一切技工精巧得多。他所受付託的責任，也重得多。他是貧民的醫生，而在病痛或危險比較輕微的場合，也是富人的醫生。所以，他的報酬，應當和他的技能與他所受付託相稱，而且一般是包含在出售藥品的價格中。但是，在大商業都市中，生意最興隆的藥劑師，每年出賣的全部藥品，所費於他的，也許不過三四十磅。所以，他所賣的價格，雖是三四百磅，換言之，雖以十倍的利潤出售，但這利潤，一般地說，也許只是他的合理工資；他的合理工資，除了加在藥品價格上，簡直沒有第二種方法取得。他的表面利潤的大部分，乃是穿上利潤外衣的真實工資。

在海口小市鎮上，資本百鎊的小雜貨商人，能獲得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的利潤，而同地資本萬鎊的大批發商人，卻很少能夠獲得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利潤。他所經營的雜貨業，對該地居民的便利說，也許是必要的，而狹小的市場不允許更大資本投在這種營業上。可是，那小雜貨商人，須靠此過活，並過着和經營這業務所必須有的各種資格相稱的生活。除具有小額資本外，他不僅須能讀，能寫，能算，又須能相當準確地判斷五六十種商品的價格與品質，並能以最低廉價格

購買這些商品的市場。簡言之，這種商人必須具備大商人所需具備的一切知識。他所以不能成為大商人，只因爲他沒有充足的資本。象這樣有才能的人，每年取得三四十鎊作為勞動的報酬，決不能認為過分。從他的似乎很大的資本利潤中，除去上述報酬，那末剩餘的部分恐怕不會比普通利潤多。所以，表面利潤的大部分，在這場合，也不外是真實工資。

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潤與批發商表面上的利潤之間的差異，在都市比在小市鎮及農村小得多。在雜貨行業能投資一萬鎊的地方，雜貨商人的勞動工資，對於這麼大資本的真實利潤，就不過是很小的一個附加部分。所以，在那種地方，富裕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潤比批發商表面上的利潤更趨於一致。正由於這個原因，都市裏的零售價格一般和小市鎮及農村同樣低廉，而且往往比後者低廉得多。例如，雜貨一般是低廉得多；麪包與家畜肉往往是同樣低廉。把雜貨運往都市的費用並不比運往小城市或農村多，而把穀物和牲畜運往都市的費用便大得多，因為它們大部分要從遠得多的地方運來。雜貨的原價，都市和農村一樣，所以，在貨物價格中附加利潤最少的地方，便最低廉。麪包和家畜肉的原價，大城市化農村高，所以，大城市的利潤雖較低，這些物品的售價未必較低，卻往往是同樣低廉。就麪包及家畜肉這類商品說，其表面利潤減少的原因，就是其原價增加的原因。市場的擴大，一方面由於所用資本較多而減少其表面利潤，另一方面，又由於仰給於遠方的必要而增加其原價。這表面利潤的減少與原價的增大，在許多場合，看來幾乎可以互相抵消。穀物及牲畜的價格，雖然在王國各地很不相同，但麪包及家畜肉的價格，在王國的大多數地方，一般地說，幾乎相同，其原因也許就在於此。

零售商及批發商的資本利潤，雖在都市一般比小市鎮和農村小，但以小資本開始經營而發大財的人，在都市常可看到，而在小市鎮和農村卻幾無一人。在小市鎮和農村，由於市場狹隘，營業未必都隨資本的增加而擴大，所以，在這些地方，個別商人的利潤率雖很高，利潤的總額卻不很大，而他們年年的蓄積額也有限。反之，大城市的營業，能隨資本的增加而擴大，而勤儉商人的信用，增加得比其資本增加快得多。這樣，他的營業隨他的信用及資本這兩者的增大而擴張；他的利潤總額隨他的營業的擴張而增加；他每年所積累的資金也隨他

利潤總額的增加而加大。但是，即在大城市，由於一種正常的、確定的和爲人所周知的行業而發大財的，也很少見，而發大財主要是由於長時期的勤勉、節約和小心的經營。誠然，大城市中，往往有從事所謂投機生意而突然致富的，但投機商人，並不是經營正常的、確定的和爲人所周知的業務。他今年是穀物商，明年是酒商，後年又是砂糖商、菸草商或茶商。不論何種行業，只要他預先看到這行業有超過普通利潤的希望，他便馬上加入，一旦預先看到那種行業的利潤將要降落到和其他行業相等，他又馬上離開。因此，他的利潤和損失，不能和其他任何正常的、確定的和爲人所周知的行業的利潤與損失相提並論。大膽的冒險者，有時也許由於兩三次投機的成功而獲得很大財產，有時也許會由於兩三次投機的失敗而損失很大財產。這種生意，除大城市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進行。因爲經營這種生意所需要的情報，只在商務最繁盛和交易最頻繁的地方纔會有。

上述五種情況，雖使勞動工資與資本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不均等，卻不使勞動或資本不同用途所有實際上和想象上的利害不均等。這些情況的性質，使得一些用途上小的金錢得利得到補償，並使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錢得利有所抵消。

但是，要使不同用途所有利害能有這樣的均等，那末即在最自由的地方，亦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那些用途，必須在那地方及其附近，爲人所周知，而且確立很久。第二，那些用途必須處在普通狀態，即所謂自然狀態。第三，那些用途，必須是使用者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

第一，只有那些用途，在那地方及其附近，爲人所周知而且確立很久，纔會有這樣的均等。

在其他情況都相同的地方，新行業的工資大都高於舊行業。當計劃者擬設立一新製造業時，他最初必須以高於其他行業的工資或高於本行業應有的工資，從其他行業招誘工人過來，而他要經過很長時間纔敢把工資降到一般水平。有些製造品，其需要完全由於時尚和一時愛好而產生，這些製造品總會不斷變動，很少能持久，因而不能看做老製品。反之，另一些製造品，其需要主要由於效用與必需而產生，這些製造品，不象上述製造品那麼容易變動，同一的形式和構造，可經歷數世紀，還爲人所需要。所以，前一類製造業，與後一類製造業

比較，工資可能較高。伯明翰的製造品多半屬於前一類；設菲爾德的製造品多半屬於後一類。據說，這兩個不同地方的勞動工資，很適合它們這樣不同性質的製造品。

新的製造業、商業或農業經營，總是一種投機，而計劃者期望由此獲得非常的利潤。這種利潤，有時是很大的，但有時，也許是很小的；但一般說來，這種新行業的利潤，和當地及附近其他舊行業的利潤，卻不保有正常的比例。如果計劃成功了，利潤在最初通常是很高的。但當這行業或營業一經確立而為人所周知的時候，競爭就使其利潤降到和其他行業相同的水平。

第二，只在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處在普通狀態，即所謂自然狀態下時，這些用途的所有利害纔會有這樣的均等。

對幾乎各種勞動的需求，有時較平常為大，有時卻較平常為小。勞動這用途的收益，在前一場合，增高到普通水平以上，在後一場合，減低到普通水平以下。對農村勞動的需求，在鋤草期和收穫期比一年中大部分時期都大，其工資也隨着需求的增加而增高；在戰爭中，四五萬原為商船服務的海員，被迫而為國王服務，這樣，對商船海員的需求，必然由於員額短少而增加，而這時海員的工資，常由每月二十一先令至二十七先令上升到四十先令至六十先令。然而在日趨凋落的製造業，情形卻正相反，許多勞動者，不願捨去原有職業，所得工資雖低於按照他們工作性質所應得的工資，也只好認為滿足。

資本的利潤，隨使用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而變動。當任何一個商品的價格上升到普通或平均價格之上的時候，為要出售這商品而使用的資本，至少有一部分，其利潤上升到原有水平之上；當價格下降時，利潤也降到原有水平之下。一切商品的價格，或多或少地都會變動，但一些商品的價格，變動得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就人類勞動所生產的貨物說，每年所用的勞動量，必是這樣受每年需求的支配，以致每年平均產量，都儘可能接近於每年平均消費量。前面說過，有些用途，以同量勞動，總會生產同量或幾乎同量商品。例如在麻布或呢絨製造業，同一數量的勞動者，年年幾乎製造同一數量的麻布或呢絨。所以，象這類商品的市場價格變動，只能起因於需求上的偶然變動。國喪使黑布的價格增高，但是，對素麻布及呢絨的需求幾乎沒有變動，所以，其價格也幾乎沒有變動。但有些用途，使用同量勞動，

未必都生產同量商品。例如，就穀物、葡萄酒、忽布花、砂糖、菸草等說，由同量勞動在各年生產的數量，很不相同。所以，此類商品的價格，不僅隨需求的變動而變動，而且隨數量方面更大和更頻繁的變動而變動，因而這類商品價格的變動是非常大的。但是，經營此類商品的一些商人的利潤，必然隨此類商品價格的變動而變動。一般投機商人的活動，大都在此類商品上進行。他們看到此種商品將要上升，立即買入；看到此種商品將要下落，立即賣出。

第三，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只有在這些用途成為使用者的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的場合，纔會有這樣的均等。

當某一個人依某一種職業謀生，而那職業並不佔有他的大部分時間時，他往往就願意在閒暇期間從事另一種職業，而他由此所得的工資，雖低於按照那工作性質所應當有的工資，他也願意接受。

在蘇格蘭許多地方，迄今還有稱為農場僱工的那一種人存在。不過，這種人現在比數年前減少了。他們是地主和農場主的外傭工。他們由僱主方面通常取得的報酬是一間住宅，一塊種蔬菜的小園，一塊夠飼養一頭母牛的草場，再加上一兩畝不好的耕地。當僱主需要他們的勞動時，他也許還每星期給他們兩配克燕麥片，約值十五便士。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僱主或是隻需要他們的少許勞動或是全不需要，而他們自己小耕地的耕種，也不會佔去能由他自己隨意處理的全部時間。所以，當這些僱工比現今多的時候，據說，他們都願意在閒暇時間，以極小的報酬為任何人工作，都願意以低於其他勞動者的工資勞作。在古代，這種僱工遍佈於歐洲各地。在土地種得很壞而人口稀少的國家，大部分地主和農場主，要不是使用這辦法，那末在需要特別多勞動者的季節，就不能屆到。此等勞動者偶然得到的日報酬或星期報酬，顯然不是他們勞動的全部價格。他們的小租用地，在他們勞動的全部價格中佔一個很可觀的部分。可是，那些收集往昔勞動及食品價格並喜歡把這兩者的價格說得非常低賤的許許多多作家，似乎把這種勞動者偶然得到的日報酬或星期報酬，看做那種勞動的全部價格。

象這類勞動的生產物，往往以低於應有的價格，在市場出售。蘇格蘭許多地方編織的襪子的價格，比任何地方用織機織成的襪子的價格低廉得多。那就是因為編織此等襪的勞動者都是從其他職業獲得了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每年設得蘭都有一千雙以上襪子輸入利斯，其

價格每雙由五便士至七便士。我聽說，設得蘭羣島的小首都勒韋克，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每日爲十便士。但是，即在設得蘭羣島，他們所組成的絨線株，一雙卻值一幾尼以上。

在蘇格蘭，亞麻線的紡織，象襪子的編織一樣，也是由主要做其他工作的僱工來搞的。這些人企圖從紡麻或織襪取得他們的全部生活費用，但只得到極微薄的生活費。在蘇格蘭，一星期能賺得二十便士的女紡工，就算是很有本事的紡工。

在富裕國家，市場一般都是那麼廣闊，以致任何一個行業，都夠容納這行業的全部勞動和資本。以一種職業謀生，同時又以另一種職業獲得若干小利益的情況，多半在貧國纔有。然而，和上面有點相象的下述情況，卻也出現於一個很富裕國家的首都。房租較倫敦爲高的都市，我相信，全歐洲沒有一個。但是，餘屋附有傢俱，而租金卻又低廉的都市，也要首推倫敦。在倫敦租賃餘屋，不但比巴黎低廉得多，而且就同樣好質量的房屋說，也比愛丁堡低廉得多。使人也許覺得驚奇的是，全房租的高昂，竟成爲餘屋租金低廉的原因。一切大都市房租的高昂，基於數種原因：勞動價格昂貴，一般必須由遠地供給的一切建築材料昂貴；地皮地租昂貴，佔有壟斷者地位的各個地主，對於不良街市地皮一畝，往往要求比最優良農田百畝的地租更高的地租。倫敦房租高昂的原因，除上述外，還有一個，那就是倫敦人民所特有的風俗和習慣，使各家主都得租賃全屋。住宅一語，在法蘭西和蘇格蘭以及歐洲其他地方，常常只意味着建築物的一層，而在英格蘭，卻意味着同一屋頂下的全部房屋。倫敦商人必須在他的顧客所在的城市的那一部分租一整座房屋。他把最下一層作爲自己的店鋪，頂樓作爲他自己及其家屬的寢所。他把中間兩層，分租他人，藉以收回一部分房租。他期望靠營業來維持其家庭的生活，並不希望以分租的租金來養活家庭。而巴黎和愛丁堡的分租部分房屋的人，往往專靠分租房間來謀生，因此，分租的租金，不但須足夠支付房屋的全部租金，並須足夠維持他家庭生活的全部費用。

—第二節起因於歐洲政策的不均等

由此可見，即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由於缺少上述三條件的任何一個，勞動和資本不同用途所有利害就必然有以上所說的那些不均

等。但是，因為歐洲政策不讓事物有完全自由的發展，所以由此便產生了比上游重要得多的其他不均等。

歐洲政策主要是依以下三種方式促成這樣的不均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職業中的競爭人數，使共少於原來願意加入這些職業的人數；第二，增加另一些職業上的競爭，使超越自然的限度；第三，不讓勞動和資本自由活動，使它們不能由一職業轉移到其他職業，不能由一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

第一，歐洲的政策，由於限制一些職業上的競爭人數，使願加入者不能加入，所以使勞動和資本用途所有利害有了非常大的不均等。

同業組合的排外特權，是歐洲政策限制職業競爭人數的主要手段。

有組合的行業的排外特權，勢必在特權設立的城市中，只許那些有經營此業自由的人相互競爭。得到這種自由的必要條件，通常是在當地有適當資格的師傅門下做學徒。組合的規則，有時限定各師傅所得容納的學徒人數，通常規定學徒的年限。這兩種規則的目的，在於限制各該行業上的競爭人數，使願加入者不能加入。學徒人數的規定，是直接限制競爭，而長的學徒年限的規定，由於增加學習費用，間接限制競爭，但同樣有效果。

設菲爾德的刀匠師傅，依組合規則，同時不得有徒弟一人以上。諾福克及諾韋傑的織匠師傅，同時不得有徒弟二人以上，違者每月科罰金五鎊，向國王繳納。英格蘭內地及英領各殖民地的帽匠師傅，亦不許同時有徒弟二人以上，違者月科罰金五鎊，半歸國王，半歸向記錄法庭控告的人。這兩項規定，雖曾由王國公法確認，顯然是按照設菲爾德制定規則的這種組合精神制定的。倫敦絲織業，組合不到一年，就制定各師傅不得同時有徒弟二人以上。後來，通過議會的法令，才把這規則廢止了。

往昔，全歐洲大部分有組合的行業，似乎都把學徒期限定為七年。所有這樣的組合，往昔都稱為university，這確是任何組合的拉丁文原名。鐵匠university，縫工university等等，在古時都市的特許狀中，常可看見。今日特稱為大學（university）的這個特殊團體，設立之初，獲得文藝碩士學位所必需的學習年限的規定，明顯地是以往昔有組合行業的學徒年限的規定為範本的。一個人，想在普通行業上，

獲得稱師受徒的資格，就得在具有適當資格的師傅門下做學徒七年。同樣，一個人想在文藝上成為碩士、教師或學者（此三者在往昔是同義語），取得收受學生或學徒（此兩者原來亦是同義語）的資格，也得在具有適當資格的碩士門下學習七年。

伊麗莎白五年所頒佈的通常稱為學徒年限法令規定，此後無論何人，至少須做七年學徒，否則不許從事當時英格蘭所有的一切手藝、工藝或技藝。於是以前英格蘭各地許多特殊組合的規則，都成了市鎮一切行業的公法。該法令所用的詞語，極為籠統，似包括王國全部，但在解釋上，其適用範圍，只限於各市鎮。按照解釋，一個農村勞動者，可搞幾種不同的工藝，儘管他對於每一種技藝都未曾從師學習七年。為便利農村居民，一個人兼搞幾種工藝，是必要的，而且要把一定人數分給每一種工藝，農村人口往往是不夠的。

此外，按照這法令用語嚴格的解釋，則其適用範圍，又只限於伊麗莎白五年以前在英格蘭境內建立的行業，而沒有擴到以後新建立的行業。這種限制，引起了幾個區別，作為政策的規定，這些區別是再愚蠢不過的。例如，按照裁定，馬車製造人，不得自行製造車輪，亦不得自行僱人製造，他必須向車輪匠購買。因為車輪製造業是伊麗莎白五年以前英格蘭已有的行業。但車輪匠，即使沒有在馬車製造匠門下做過學徒，卻不妨製造馬車，或僱人製造。因為馬車製造業是學徒法令頒佈以後英格蘭纔有的行業，所以不受該法令的限制。在曼徹斯特、伯明翰和沃弗漢普頓等地，有許多製造業，就根據這種理由，不受學徒法令的拘束，因為它們是伊麗莎白五年以後在英格蘭建立的。

就法蘭西說，學徒年限，各市不同，各業也不同。在巴黎，雖大多數行業以五年為期，但一個人想取得某種行業上的師傅資格，他至少還須再作五年幫工。在以後這五年間，他被稱為師傅的夥伴，而這五年期間，稱為夥伴期間。

就蘇格蘭說，關於學徒年限，沒有普遍規定的法律。在不同的同業組合，年限不相同。在年限定得長的組合，一般可通過給付少額款項來縮短期限。此外，在大多數城市中，只要給付極少額款項，便可買得任何同業組合的會員資格。蘇格蘭的主要製造者，如亞麻布和大麻布的織工，以及附屬於這類製造者的其他各種技工，如車輪製造者、紡車製造者等，不給付款項，可在自治城市操業。在自治城市，

一切市民，在一星期內的法定日，都可自由販賣家畜肉。在蘇格蘭，學徒年限普通為三年，即在一些需要非常精巧的技藝，也是如此。據我所知，一般說來，歐洲各國的同業組合法律，都不象蘇格蘭那麼寬大。

勞動所有權是一切其他所有權的主要基礎，所以，這種所有權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窮人所有的世襲財產，就是他的體力與技巧。不讓他以他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鄰人的條件下，使用他們的體力與技巧，那明顯地是侵犯這最神聖的財產。顯然，那不但侵害這勞動者的正當自由，而且還侵害勞動僱用者的正當自由。妨害一個人，使不能在自己認為適當的用途上勞動，也就妨害另一個人，使不能僱用自己認為適當的人。一個人適合不適合僱用，無疑地可交由有那麼大利害關係的僱主自行裁奪。立法當局假惺惺地擔憂着僱主雇用不適當的勞動者，因而出於干涉，那明顯地不只是壓制，而且是僭越。

長期學徒制，並不能保證市場上不常出現不良作品。要是市場上常有不良作品，那一般地說不是無能的結果，而是欺詐的結果。最長的學徒年限，也不能保證沒有欺詐。所以，為防止此種弊害，需要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法規。金屬器皿上刻有純度記號，麻布和呢絨上印有檢記，對購買者所給與的保證，比學徒法令所給與的保證大得多。購買者判別貨物，一般只看記號或檢印，絕不會認為，製造貨物的工人曾否做過七年學徒，是值得查問的。

長期學徒制，並不傾向於養成少年人的勤勞習慣。按件計資的勞動者，由於所作愈多所得愈厚，自會趨於勤勉。至於學徒，由於利不幹己，很可能流於怠惰，實際上亦常如此。就下級職業說，勞動樂趣，完全在於勞動報酬。誰能最早享到勞動的樂趣，誰就最早對勞動有興趣，也就最早獲得勤勉習慣。一個少年人，在長時間內，不能由勞動享受絲毫利益，當然就對勞動有惡感。由公共慈善團體送去做學徒的兒童，其年限一般比普通的年限長，結果多半成為非常怠惰而無用的人。

古代沒有學徒制度存在。在一切近代法典中，師傅和學徒間的各種相互義務。都成為重要的一條，但羅馬法關於此等義務，卻隻字不提。我們現在歸諸學徒一詞的概念，即在一定行業中，僕人在主子將

授予這一行業的技藝的條件下，必須在一定年限內，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我不能由希臘或拉丁語中，找出一個相當字眼來表達這個概念（我想，我敢斷定這兩國文字中沒有這種字眼）。

長的學徒年限，是全然不必要的。比一般手藝高得多的技藝，如掛鐘手錶的製造，並不含有需要長期教授的神祕技術。誠然，這些美妙機器的最初發明，甚至用以製造這些機器的一些器具的最初發明，無疑是經過長久時間和深湛思索之後才作出的作品，並且可公公正正說是人類發明才能的最可喜成果之一。但是，當這些機器和器具，一經發明好了，一經理解好了，那末，要詳詳細細地，給少年人講解，怎樣使用器具，和怎樣做機器，大概不需要幾星期以上的講授時間，也許只需要數天的講授時間。就一般機械工藝說，數天講授時間，一定就夠了。誠然，就普通手藝說，要學得手的靈巧，非有大量實踐和體驗不可。但一個少年人，如果最初即以幫工的資格勞動，並依他工作量的多少給與工資，而他要賠償由於粗劣的技藝和無經驗而損壞的材料，那他在業務的實習上，必然勤勉得多，注意得多。其教育，一般地說，更必有效，而且總可少花些時間，少花些費用。誠然，師傅將是一個損失者。現在師傅無須出的學徒在七年學習期內的工資，到那時，他就要掏腰包。而且，最終，學徒本身也不免成為損失者。在一個那麼容易學得成功的職業上，他將遇到更多的競爭者，於是，當他成為一個完全勞動者時，他的工資將比現今少得多。競爭這樣的增大，不僅會減低工人的工資，也會減低師傅的利潤。而從事手藝、工藝和技藝的，都將成為損失者，但社會卻將成為得利者，各種技工的製造品，將以比現在低廉得多的價格，在市場出售。

同業組合以及大部分組合規則的設立，在於通過限制自由競爭，以阻止價格這樣的下降，從而，阻止工資及利潤的下降——自由競爭勢必引起價格這樣的下降。往時，歐洲多數地方，設立組合，只須取得組合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的許可。在英格蘭，還須取得國王的特許狀。不過，國王這種特權，似乎不是為了防止這些壟斷事業侵犯一般自由，而是為了要向臣民榨取貨幣。一般地說，只要向國王繳納若干款項，似乎都很容易取得特許狀。假若某一種類技工或商人，認為不經國王特許而設立組合是合適的，這些當時所謂不正當的同業組合，未必因此會受到取締，但須每年向國王繳納若干罰金，取得允許，來

行使被剝奪的權利。一切組合以及組合認為應制定來管理自己的規則，都歸組合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直接監督。所以對組合有什麼管制，通常不是來自國王，而是來自那更大的團體，對於更大的團體，那些附屬團體只是構成部分。

自治城市的統治權，當時完全掌握在商人和技工手中。對他們中各個階級來說，防止他們常說的各自產品在市場上存貨過多，實際上就是使他們各自產品在市場上經常保持存貨不足狀態，這樣做分明都是符合於他們各自利益的。各階級都急於制定，為達到此目的的適當規則，而且在自己被允許制定的條件下，也同意其他一切階級都制定規則。結果，各階級所需要的貨物，都得以比此等規則制定以前略高的價格，向市上其他階級購買。而他們自己的貨物，也能以相當高的價格出賣。賣買相衡，正如他們所說半斤八兩。同一市內任何階級都不會因此等規則而蒙受損失。但在他們與農村交易時，他們卻受到很大的利益。維持各都市並使各都市富裕的，正是這種交易。

一切都市的生活資料與工業原料，全都仰給於農村。都市對這些資料與原料給付代價的主要方法有二：第一，把那些原料中一部分加過工製成成品送還農村，這樣，那些物品的價格，就因勞動工資及老闆或直接僱主的利潤而增大了。第二，把由外國輸入或由國內遙遠地方輸入都市的粗製品或精製品一部分，送往農村；這樣，那些物品的原價，就因水陸運輸的勞動者工資及僱用這些勞動者的商人的利潤而增大了。都市由它的製造品取得的利益，乃是它的第一種商業的得利；它由對內及對外貿易獲得的利益，乃是它的第二種商業的得利。勞動者的工資及各種僱主的利潤，構成了這兩種商業得利的全部。所以，不論何種規則，只要會使那些工資和利潤比此等規則制定以前有所增加的，就會使都市能以較少的都市勞動量購買較多的農村勞動量。此等規則，使都市商人和技工享有比農村的地主、農場主及農業勞動者更大的利益，因而破壞了都市與農村商業上應有的自然均等。社會勞動的全部年產品，每年都是在都市和農村人民中間分配的。由於有了此等規則，都市住民，就享有此等規則未制定前所不會有的較大分額，而農村住民，卻享有較少的分額。

都市對每年由農村輸入的食品和原料，實際上所給付的代價，乃是它每年輸往農村的製造品及其他物品的數量。輸出品的賣價愈高，

輸入品的買價便愈低。都市產業就更為有利，而農村產業就更為不利。

我們只須通過一次非常簡單而又明顯的觀察，無須作精密計算，就可弄明白，歐洲各地都市產業都比農村產業更為有利。在歐洲各國，我們可只看到，從小資本開始經營原來屬於都市的產業，即商業和製造業，而後來發大財的，至少有一百個人，而以小資本開始經營原來屬於農村的產業，即改良和耕種土地以出產天然產物，而後來發大財的，只有一個人。所以，都市產業的報酬，必然比農村產業優異。都市的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也明顯地比農村大。但是，資本與勞動，自然要尋找最有利的用途。它們自然要儘量彙集於都市而離開農村。

都市住民羣集一地，能夠容易地結合在一起。結果，都市中最不足道的工藝，在某些地方，也有組合。即在完全未有組合的地方，他們一般都有組合的精神，換言之，他們嫉妒外鄉人，不願意收學徒，不願意把工藝上的祕密傳授別人。這種組合精神，往往教導他們通過自願結合或協約，來阻止不能靠規則來禁止的自由競爭。所居勞動者人數有限的行業，最容易形成這類結合。比如，使一千紡工和織工繼續操作所需要的梳毛工，也許不過六人。這些梳毛工人，通過結合，不收學徒，不僅能夠壟斷這種工藝，使整個羊毛製造業成為他們的奴隸，而且使他們勞動的價格，大大超過按照這作業性質所應有的工資。

農村的住房，散居相距很遠的地方，不能容易地結合起來。他們不但從來沒有組合，並且一向就缺乏組合的精神。他們並不認為，必須經過當學徒，纔有資格從事農村的主要職業，即農業。然而，事實上除了所謂美術及自由職業，恐怕沒有一種職業象農業那樣需要種種複雜的知識和經驗的。用各國文字寫成的關於農業的不可勝數的書籍可以證明，連最有智慧、最有學識的國民，也不認為農業是最容易理解的。而且，如果我們想從那些書籍，獲得一般農民通常都掌握的關於各種複雜操作的知識，也是辦不到的，儘管一些無聊作家，在說到一般農民時，有時愛用輕蔑的話。反之，就普通機械工藝說，所有操作都可在薄薄數頁的小冊子裏附加插圖，作詳盡明瞭的說明。現在法國科學院所刊行的工藝史，對於某些工藝，實際上就是用這個方法說

明的。此外，必須隨天氣的變更以及許多意外事故而變更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判斷與熟慮，比永遠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多得多。

不僅一般農民的技術或農業的一般操作方法，而且農村中許多低級勞動所需要的經驗與熟練，比大部分機械工藝所需要的多得多。對銅鐵加工的人，使用完全同性質或幾乎同性質的工具與材料工作。但用一隊牛馬耕鋤土地的人，卻使用健康狀態、體力和性情在各個時間各不相同的工具工作。而他所加工的材料和所用器具的狀況都是容易變的，都需要他運用很大的判斷力和思辨力來處理。普通莊稼漢，雖被看做愚蠢無智的典型，卻幾乎都有此種判斷力與思辨力。誠然，他不象都市機械工人那麼慣於社會交際，而他的聲調和言語，也不免使那些沒有聽慣的人覺得粗野而且不容易瞭解。但他慣於考慮各種各樣事物的理解力，一般比終日通常只搞一二種極簡單操作的人強得多。只要你因營業關係，或為好奇心所驅使，曾和農村下級人民與都市下級人民多接觸，你就知道，前者實比後者優秀。據說，中國和印度農村勞動者的地位與工資，都比大多數技工和製造工人高。假若沒有同業組合法規及組合精神從中作梗，各地方也許都和中國、印度一樣。

不過，歐洲各地都市產業所以比農村產業優越，並不完全由於同業組合及組合法規的存在。其他許許多多規定，也助長了這種優勢。對外國製造品，和對外國商人輸入的一切貨物，課以高的關稅，都傾向於助長這種優勢。同業組合法規，使都市居民能夠擡高他們製品價格，不必憂慮由於同國人的自由競爭而降低價格。而高關稅的規定，使都市居民不怕外人的競爭。由這兩種法規而產生的增高價格，不論何處，都由農村的地主、農場主和勞動者負擔。他們對於這種壟斷權的建立，幾乎未曾反抗。他們通常不想結成組合，也不適合於結成組合，而商人和製造者的叫喊和詭辯很容易說服他們，使他們相信，社會一部分而且是不重要的一部分的私利，乃是全社會的利益。

英國都市產業化農村產業優越的程度，過去似較現今為大。與前世紀或現世紀初葉比較，現今的農村勞動工資，更接近於工業勞動工資，現今的農業資本利潤，亦更接近於工商業資本利潤。這種變化，可以說是以前過分獎勵都市產業所必產生但直到晚近才呈現的後果。都市所累積的資本量，終於達到這麼大的數額，以致把這數額的資

本，使用在都市所特有的產業上，就不能得到象往昔那麼多的利潤。都市所特有的產業，與其他一切產業，同樣有一定的限度，而資本增加，由於擴大競爭，勢必使資本利潤減低。都市方面利潤的減低，勢必使資本流向農村，農村勞動有了新需求，勞動的工資必然增高。要是我可這樣說的話，資本這樣就散佈於地面上，而且由於在農業方面使用，資本使部分地回到農村來，資本的大部分，本來是以農村為犧牲而在都市中累積的。歐洲各國農村最大的改良，都是都市本來所累積的資本流回農村的結果，關於這點，我將在下面說明，同時將論證，雖有若干國家，經這過程達到了很大的富裕程度，但這過程本身是極緩慢、極不確定、極易遭到不可勝數的意外事故的阻撓，而且，無論就那一點說，都是違反自然，違反理性的。至於這過程所由而產生的利害關係、偏見、法律及習俗，我將在本書第三篇及第四篇作出詳盡明瞭的說明。

同業中人甚至為了娛樂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們談話的結果，往往不是陰謀對付公眾便是籌劃擡高價格。誠然，想通過能實施的或不違反自由和正義的法律來阻止同業者這樣的集會，那是辦不到的，但法律不應該使這種集會易於舉行，更不應該使這種集會非舉行不可。

要同市一切同業者都把姓名住所登記在公共登記簿的規則，就使這種集會易於舉行。因為這把本來也許無法結識的個別人連繫起來，並使同一行業每一個人都能借此獲知所有其他人的住址。

要同一行業的人捐些錢，以救濟同業中的貧者、病者以及孤兒寡婦的規則，由於要他們處理一個共同利害問題，就使這樣的集會非舉行不可。

同業組合，不但使這種集會成為必要，而且使多數通過的決議案對全體有拘束力。就自由行業說，除非同業者全體同意，否則不可能結成有效的組合，而且這組合只在各個人意見繼續一致的時間內，才能繼續存在。而就同業組合說，能依多數決議制定規則，並附有適當的懲罰條款；這規則限制競爭的作用，比任何自由結合更有效更持久。

有人說，為着更好地管理行業，同業組合是必要的。這是全無根據的話。對職工的有效和真正的監督，不是他們所屬的組合的監督，

而是他們的顧客的監督。使職工不敢欺詐懈怠的，乃是對失業的恐懼。排外的組合，必然削弱這種監督力量。有了排外的組合，一批工人，不論好壞，都得僱用。所只在許多有組合的都市中，甚至在一些最必要的行業上，也不能找到差可人意的工人。如果你要有差可人意的作品，那就必須在郊外定做，那裏的勞動者沒有排外特權，只憑本領。但你得把他們製成了的物品，祕密運入都市。

這樣，歐洲的政策，由於使某些職業中的競爭限於此願加入者為少的人數，就使勞動和資本的各種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非常大的不均等。

第二，歐洲的政策，增加了某些職業中的競爭，使其超過了自然的限度，因而使勞動和資本的各種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另一種即和上述不相同的不均等。

由於人們認為，給某些職業培養適當數目的人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時由公共團體，有時由熱誠的私人捐助基金者，為此目的，設置了許多獎金、助學金、獎學金、苦學生津貼等等。結果，就使這些職業的人數，大大超過自然的限度。我相信，一切基督教國家，大部分牧師的教育費，都是出自這個來源。完全由自費受教育的，不多見。所以，那些自費受教育的人，所花的長久時間和巨大費用以及所下苦功，未必都能獲得相應的報酬，因為教會中擠滿了願意接受比他們應得報酬低得多的報酬的人。這樣，富者應得的報酬，就因貧者的競爭而被奪去了。我們把教區牧師助理或教堂牧師同一般行業的幫工比較，未免有失體統，但教區牧師助理或教堂牧師的薪水與幫工的工資，卻可正當地視為有同一性質的。這三種人，都按他們和其上司所訂的契約獲取工作報酬。按照幾次全國宗教會議所公佈的規定，英格蘭教區牧師助理的薪水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還是五馬克，其所含白銀和現今十鎊貨幣所含的大約相同。在同一時期，泥水師傅的工資一日四便士，泥水幫工的工資一日三便士，前者所含銀量和現今一先令所含相同，後者相當於現今九便士產所以這兩種勞動者，假如能經常被僱，其工資就比教區牧師助理優越得多。假若泥水師傅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就業，其所得工資便和教區牧師助理的薪捧相等。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十二號法令宣稱：“由於對教區牧師助理注給與充分的給養與獎勵，所以有些地方，這些教區牧師助理的給養很不充分。茲特授

權各地主教，以簽字蓋章，發放足夠維持生活的庫金或津貼，每年不得超過五十鎊，也不得少於二十鎊。”現今，教區牧師助理年得四十鎊的，即視為非常優裕。儘管上述法令限定年薪不得少於二十鎊，但是許多教區牧師助理，每年俸金少於二十鎊。倫敦的製鞋幫工，卻有的每年可得四十鎊；同市中，任何種類的勤勉勞動者，每年所得，幾乎都在二十鎊以上。二十鎊這數額，確不超過許多農村教區普通勞動者通常所得的數額。無論什麼時候，要是法律企圖規定工資，其結果總是使工資減低，而不使它增高。可是法律曾經好多次企圖擡高教區牧師助理的工資，併為保持教會的尊嚴，命令教區長，要給教區牧師助理以超過他們甘願接受的極微薄生活費的報酬。法律在這兩方面的企圖，都毫無效果。法律從來沒把教區牧師助理的工資，提高到它要提高的程度，也沒把勞動者的工資減低到它要減低的程度。法律既不能阻止前者因處境窮困，競爭者衆多，而甘心接受比法定生活費少的給養，也不能阻止後者，由於僱用人為要取得利潤或愉快，競相僱用，而獲得超過法定生活費的給養。

教會下級職員的景況，雖很窮困，但大聖俸的優異，和其他教會中的尊嚴，卻能保持教會的崇高地位。而且，這種職業所受到的尊敬，正可以補償他們金錢上報酬的低微。在英格蘭及一切羅馬天主教國家，教會這一彩票上所能中的彩數，比所需要的多得多。蘇格蘭、日內瓦以及一些其他新教教會的實例，使我們確信，就一個有那麼大聲譽，而受教育機會又是那麼容易取得的職業說，要獲得一般聖俸的希望，便誘使相當多的有學問和品行端莊的人充當聖職。

而就全無常俸的律師和醫師這些職業說，如果也有那麼多的人由公費教育，那末這些職業上的競爭，不久就變得非常激烈，大大削減他們金錢上的報酬。這樣一來，以自費教育子弟，從事這些職業，就不值得。這些職業，將完全由公共慈善團體所培養的人士充當。他們人數衆多而且貧窮，一般都滿足於極微薄的報酬。結果，律師和醫師這些職業，就不能象現在那樣受尊重。

通常叫做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正處在律師和醫師在上述假設下所可能的境況。在歐洲各地，這些人大部分是為要供職教會而教育出來的，但有種種原因，使他們不能取得聖職。所以，他們的教育一

般都是出於公費，而他們的人數到處又是那麼多，使得他們勞動的價格，通常極其低微。

印刷術發明以前，文人靠其才能獲取報酬的唯一職業，就是充當公私教師，換言之，把自己學得的奧妙而有用的知識，授與他人。這種職業，比印刷術發明以後，為書賈執筆賣文的職業，確是更有名譽，更有效用，而且一般地說，甚至是更可獲利的職業。要做一個出色教師，所需要的時間與研究，所需要的天資、知識和勤勉，至少必與著名律師和醫師所需要的相同。然而，出色教師的普通報酬，卻比不上律師和醫師所得的報酬，因為前者的職業，擠滿了靠公費受教育的窮苦的人，而後者的職業，則由從自費受教育的少數人充任。不過，公私教師的通常報酬，現今雖然很少，但若那些為麪包而執筆賣文的更貧苦文人，不趕出市場，而加入競爭，那末這些教師的報酬，無疑比現今還要微薄。在印刷術發明以前，學者和乞丐，似乎是非常接近的同義語。當時各大學校長，似乎常給他們的學生髮乞食證。

在從前還沒設置這種獎學津貼，使貧困子弟為從事神學、醫學及法學這三種職業而受教育的時候，卓越教師的報酬，似乎就比上面所說的大得多。蘇格拉底，在所謂反詭辯學派的演說中，曾譴責當時教師言行不一致。他說：“他們對他們學生作極堂皇的諾言，說要把學生訓練成為有智慧、幸福和公正的人，但對這樣重大的功勞，他們只要求四邁納或五邁納那麼微薄的報酬。”他繼續說：“教人智慧，自己無疑地應當是有智慧的。但是，一個人以這樣低的價格，出賣這樣高的貨色，定會被人訾為大愚。”在這裏，蘇格拉底對當時教師報酬，確沒有誇張的意思；我們可相信，當時教師的報酬，正是他所說的那麼多。四邁納，等於現今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五邁納，等於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雅典當時對最優秀教師的普通報酬，必定不少於五邁納。蘇格拉底自己向學生每人要十邁納，即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據說，他在雅典講學時，有一百個學生。我認為，一百個是他在一個時期所授的學生數，即來聽他叫做一系列連續講演的人數。象雅典這麼大的都市，象蘇格拉底這樣出色的教師，象他所教的又是當時那麼流行的修辭學，學生一百人，並不算太多。所以，對於每系列連續講演，他必定得到有一千邁納，即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在另一個地方的普魯塔克說，他的通常講金，有一千邁納。當時其他許

多卓越的教師，似都曾獲有大宗財產。喬治阿斯曾以純金製成自己的金像，贈給德爾菲寺堂。我們不可認為，他自己的金像，與其身體是同樣大。喬治阿斯的生活方式，和當時其他兩位有名的教師，即皮阿斯及普羅特格拉斯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圖看來，都很華麗，甚至接近於豪奢。柏拉圖自己的生活，據說，也很闊綽。亞里士多德是亞力山大王子的師傅。王子及其父腓力普，對他報酬的隆厚，那是一般所公認的。但亞里士多德卻以為，回到雅典再開學園，更為上算。當時傳授知識的教師，也許沒有此後數十年那麼多。此後數十年，競爭的結果，也許使教師的勞動的價格，以及世間對他們人格的尊敬，都稍稍下降。但最傑出的所享受的報酬和尊敬，似乎總是比今日從事同一職業的人大得多。雅典市民曾派遣學園學派大師卡尼阿邊及斯多亞派大師提奧奇尼斯出使羅馬，其使節的尊嚴，真令人羨慕。當時雅典雖失去了以前的壯觀，但還是個獨立有名的共和國。此外，卡尼阿迪是巴比倫人，以嫉妒外人充當公職著稱的雅典人，居然在這種場合，派遣卡尼阿迪，足見他們對這位大師尊敬到了什麼程度。

上述那樣的不均等，從全體看來，對社會大眾，也許是利多害少。公職教師的地位，雖不免因此稍稍降低，但學藝教育費的低廉，確是一種利益，大大抵消了公職教師地位的降低。如果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學校和學院組織得比現在更合理，那末大眾由此受到的利益將更大。

第三，歐洲政策，妨礙勞動和資本的自由活動，使不能由一職業移轉到其他職業，由一地方移轉到其他地方，從而使勞動和資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時候出現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學徒法令，妨礙勞動的自由活動，甚至使勞動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職業轉到其他職業；同業組合的排外特權，妨礙勞動的自由活動，甚至使勞動在同一職業不能由一地方轉到其他地方。

我們時常看到，一種製造業的勞動者獲得高工資，而另一種製造業的勞動者卻不得不滿足於最低的生活費。前一種製造業，處在前進狀態，不斷需要新的勞動者，後一種製造業，處在衰退狀態，勞動者的過剩，不斷增加。這兩種製造業，有時是在同一都市，有時是在同一都市的鄰近地方，但相互間卻不能有絲毫的協助。在前一場合，有學徒法令妨害其相互協助。在後一場合，有學徒法令和排外的組合，

妨害其相互協助。可是，有許多不同種類的製造業，操作很類似，設無此等不合理的法規，從中作梗，勞動者就能很容易由一職業轉到另一職業。例如，織素麻的技術與織素絲的技術，幾乎完全相同。織素羊毛的技術，雖略有差別，但因為這差別極其有限，麻織工或絲織工，亦只要學習數日，就能成為差可人意的毛織工。因此，假若這三種主要製造業中，任一製造業陷於衰退狀態，該製造業的勞動者，可改就其他兩種繁榮的製造業之一，而他們的工資，在繁榮的製造業中不會過高，在衰退的製造業中，亦不會過低。誠然，英格蘭今日麻布製造業，通過特別法令而開放了，人人都有從事這業的自由，但由於該業，沒在英格蘭大部分地區大力推廣，所以這對其他衰退製造業的勞動者，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就業機會。在實施學徒法令的地方，衰退製造業的勞動者只好請教區救濟，或以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從事勞動。不過，按照他們的習慣，他們更適合於做類似製造業的工人，而不太適合於做普通勞動者。所以，一般地說，他們寧願請教區救濟。

什麼妨害勞動者的自由流動，也同樣妨害資本的自由流動。因為一種行業上所能使用的資本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這行業所能使用的勞動量。不過，同業組合法規妨礙資本由一地移到另一地的自由流動，在程度上小於它妨礙勞動的自由流動。不論何處，富裕商人要在自治城市中獲得經商的特權，比貧窮技工在自由城市中獲得勞作的特權容易得多。

我相信，同業組合法規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是歐洲各地共有的現象。而濟貧法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據我所知，卻是英格蘭所特有的現象。自有濟貧法以來，貧民除了在所屬的教區內，就不易取得居住權，甚至不易找得工作的機會。同業組合法規所妨害的，只是技工和製造工人勞動的自由移動。獲得居住權的困難，甚至妨害一般勞動的自由移動。英格蘭的亂政，恐以此為最。我現在就其起源、發展及現狀，作一些說明，也許不是無益的吧。

英國貧民，一向是靠修道院施捨，修道院破毀的結果，貧民得不到此種施捨。後來，雖幾經設法救濟，但均無效果。伊麗莎白女王三十四年，頒佈第二號法令，規定各教區有救濟其所屬貧民的義務，並規定每年任命管理人，會同教區委員，通過教區稅，徵收足夠救濟貧民的金額。

按這法令，各教區都不得不贍養所轄境內的貧民。但一個人怎樣纔算是所轄境內的貧民呢？這就成爲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一定時間內，有了略不相同的答案，直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十四年的法令，才確定下來。該法令規定，不論是誰，只要繼續不斷在某教區住過四十天，就可取得這教區的戶籍。但在這四十天期限內，治安推事二人，得依教區委員或貧民管理人的陳訴，把新居民遣回他最後合法居住處所的教區，除非新居民租有每年十磅地租的土地，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擔保脫除原屬教區戶籍而治安推事認爲滿意的保證金。

據說，此種法令曾產生若干欺詐行爲。教區職員有時賄使區內貧民潛赴其他教區，並在其他教區潛住四十天，獲得戶簿，以圖脫去原屬教區戶籍。爲矯正此種弊竇，詹姆士三世第一年，作以下的規定：不論何人，在新教區獲得戶籍所必需的連續居住四十日，一律以他以書面向當地教區委員或貧民管理人報告他新居地址及家族人數之日算起。

然而，教區職員對於自己教區，未必都象他們對其他教區那樣公正辦事。對於這樣闖進教區的人，他們有時默許他們闖進，接受書面報告，而不採取任何適當處置。由於教區各居民，爲自身利益，都要儘可能阻止這樣闖進的人，所以，在威廉三世第三年，又有以下的規定：那四十日居住期，只從那書面報告，在教堂於星期日作禮拜後公佈之日算起。

伯恩搏士說：“書面報告公佈後，繼續居住四十日而獲得戶籍的人，畢竟寥寥無幾。此等法令的目的，不在於使移住人獲得戶籍，而在於使人不能潛入教區，因爲繳交報告書，只是給這教區以迫令他遷回原教區的力量。但是，如果一個人有那樣的地位，以致實際上能否迫令其遷回原教區很有疑問，那末他繳交報告書，就迫使教區在以下兩種辦法中選擇一種：第一，容許他繼續居住四十日，不抗拒地給予戶籍；第二，試行權力，命其退出。”

因此，這種法令，使貧窮人幾乎不可能按繼續居住四十日的老辦法獲得新戶籍。爲使一個教區普通人民，不致因這法令而不能在另一個教區安家立業，又規定無須繳交或公佈報告書亦能取得戶籍的其他四種辦法：一，繳納教區所課的稅；二，被推選爲一年任期的教區職

員，並供職一年；三，在教區當學徒；四，被教區僱用，為期一年，而且在這整年內連續做同一工作。

誰都不能按這四種辦法中頭二個辦法，取得戶籍，而只能通過教區全體人民的行動，取得戶籍。教區人民都懂得很清楚，把一個除自身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按課稅或選為教區職員等辦法收容進來的結果是怎樣。

已經結婚的人都不能按後二個辦法取得戶籍。做學徒的，很少是結過婚的，而已經結婚的傭工，又有明令規定，不得由於受僱一年而取得戶籍。採用通過服務取得戶籍這辦法的主要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一年為僱用期的老習慣，這習慣，從前在英格蘭是那麼通行，直到今日法律仍把未經議定的僱傭期間解釋為一年。但是，僱主未必都願意因僱用傭工一年，便給他以戶籍，而居工亦未必都願意因被僱一年而取得新戶籍，因為最後的戶籍取消從前的戶籍，他們可能因此失去他們出生地即父母親和親戚居住地的原戶籍。

很明顯，一個獨立工人，不論他是普通勞動者或是技工，都不能通過做學徒或被僱而獲得新的戶籍。因此，當他帶着他的技能進入新教區時，不論他如何健康，如何勤勉，除非他租有每年租金十鎊的土地——這對於除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人，是無法辦到的——，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保證職除原屬教區戶籍而二個治安推事認為滿意的保證金，否則教區委員或貧民管理人就可隨時令其退出。誠然，保證金數目完全由治安推事自由裁決，但他們所要求的，不可能少於三十鎊，法律規定，凡購買價值少於三十鎊的世襲不動產的人不能取得戶籍，因為這不夠作為脫除原戶籍的擔保。靠勞動為生的人很少能提出三十鎊保證金，而且實際上所要求的往往比這數額大得多。

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那幾乎完全被上述法令所剝奪的勞動自由流動，當局想出了發證書的辦法。威廉三世第八年及第九年的法令規定，不論是誰，要是持有他最後合法居住的教區發給的證書，由該區委員及貧民管理人署名，二名治安推事認可，並註明任何教區都有收留他的義務，那末他所移向的教區，不得以他可能成為負擔的理由，令其退出，只有在他實際上成為負擔時纔可令其遷移，在那場合，發給證書的教區，有負擔其生活費和遷移資的義務。為使持證者所要居住的教區能有最大的安全，同一法令又規定：移居者須租有一年租金

十鎊的土地，或自行給教區服務滿一年，才能取得戶籍。這樣，他就不能通過繳交報告書、被僱、做學徒或繳納教區稅而取得戶籍。此外，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法令第一號第十八條規定，持有此項證書的人的傭工或學徒都不能在他所住教區內取得戶籍。

這個發證書的辦法在什麼程度上恢復了被上述各法令所幾乎完全剝奪的勞動移動自由，我們可從伯恩博士以下有見識的話看得出來。博士說：“教區當然有種種理由，責令新來者交出證書。持有證書而來居住的人，不能通過做學徒、被僱、繳交報告書或繳納教區稅而取得戶籍。他們的學徒和僱工不能取得戶籍。如果他們成為負擔，他們所居住的教區，當然知道要把他們遷到什麼教區去，而後一教區要擔負他們的遷移資及遷移期間的生活費。如果他們病了，不能遷移，發證的教區須擔負他們的生活費。所有這些，都非有證書不可。但所遷入的教區責令交出證書的理由，就是原教區一般不肯發給證書的理由。領證書的人民，大有被遷回的可能，而在他們遷回時，境況比從前還要壞。”伯恩博士這種論調，其用意似乎說，貧民要遷入的教區，應要求交證書，而貧民要遷出的教區，不應輕易發證書。這個極有才智的作家，在他所著《濟貧法史》中又說：“就證書這辦法說，存在看多少慘酷的事實。它使教區職員有權力把貧民可以說是終身幽禁起來，儘管貧民在不幸獲得所謂戶籍的地方繼續居住是那麼不合適，而他自己所要移住的地方對他是那麼有利。”

雖然證書只證明領證者所屬的教區，並不證明領證者的善良操行，但這證書是否發給，是否收納，完全由教區職員自由裁決。據伯恩博士說，有一次，有人向高等法院建議，命令教區委員及貧民管理人簽發證書，但高等法院認為這是個非常離奇的建議，拒絕了。

英格蘭境內，相距不遠的各地方的勞動價格，很不均等，這也許是起因於英格蘭的居住法，那種法律使無證書的貧民不能轉地勞作。誠然，康健而勤勉的獨身者有時也可以由於寬容而無證書而在其他教區得到居處，但有妻室子女的人，要作此種嘗試，就不免要為大多數教區所斥逐。而獨身者，要是後來結婚，也將同樣被斥逐。因此，在英格蘭，不能象在蘇格蘭以及我相信在居住方面沒有障礙的所有其他國家那樣，一個教區勞動力的不足，都可由其他教區勞動力的過剩得到補救。在這些國家，在大都市附近或在對勞動有異常需要的地方，

工資有時高些，而距此等地方愈遠，工資便越接近於那國家的工資一般水平，但象英格蘭鄰近各地方的工資，有的時候突然發生的莫名其妙的差異，卻是別處沒有的。在英格蘭，貧民要超越教區的人為境界，往往比超越國家間由高山脈或海灣構成的自然境界困難得多。這些自然境界有時使這些國家的工資率判然不同。

強迫一個沒有犯過輕罪的人，遷出他所願居的教區，顯然是侵害天賦自由與正義的。英格蘭的普通人民，雖是那麼羨慕自由，但他們也象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普通人民一樣，從來不曾正確瞭解自由是什麼，在一百多年內，一直甘受此種壓迫，不圖補救。有思慮的人，有時也說，居住法為羣衆所不滿，可是，它沒象搜查票那樣，成為大家叫叫嚷嚷地反對的對象。搜查票無疑是一種弊害，但不會產生象居住法那麼普通的壓迫。我敢斷言，今日四十歲的英格蘭貧民幾乎註有一個在他一生中接受過這荒謬居住法慘酷的壓迫的。

我將從下面的話，結束這冗長的一章。在往昔，最初只全國性的普通法律，然後從各州治安推事的特殊命令，規定工資，到現在，這兩種辦法都廢而不用了。伯恩博士說：“四百餘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把性質上不允許仔細限定的東西硬加以精密釐定的做法，該廢止了。如果所有同業工人都領受同額工資，一切競爭都會停止，而技能或發明才能也將無發揮之餘地。”

然而，時至今日，個別法案有時還企圖規定個別行業和個別地方的工資。喬治三性第八年的法令規定，除國喪場合，倫敦及其附近五英里以內的裁縫業者，每日不得支給二先令七便士以上的工資，而其僱工也不得領受此金額以上的工資，違者科以重罰。從來立法當局在規定雇主及僱工關係時，總是以僱主為顧問。所以，法規對勞動者有利的，總是正當而公平，但對僱主有利的，往往卻是不正當不公平。例如，命令某些不同行業僱主須以貨幣而不得以貨物支給工資的法律，是完全正當而公平的。僱主們並不因此而有什麼實際上的困難。所要求於他們的，只是把他們一向想採用而實際上不常採用的貨物支付法，改為貨幣支付法。這種法律當然對勞動者有利，但喬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卻有利於僱主。當僱主企圖減低勞動工資而互相聯合時，他們通常是締結一種秘密的同盟或協定，相約不得支給定額以上的工資，違者懲處。如果勞動者也成立一種對抗的結合，約定不許接

受定額以下的工資，違者懲處，法律就將嚴厲地制裁勞動者。法律果是公平，就得以對付勞動者的辦法，對付僱主。但喬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卻用法律實施了僱主們有時企圖通過這種結合來規定的規章。勞動者常常抱怨這法律，說這法律把最有能力和最勤勉的勞動者和普通勞動者同樣看待，這種抱怨似乎是完全有根據的。

此外，以前，常常通過規定食品及其他物品的價格，來規定商人的利潤。據我所知，今日的麪包法定價格是這種舊習慣的唯一遺蹟。在有排外同業組合的地方，規定生活第一必需品的價格，也許是一種適當處置。但在沒有組合的地方，競爭對調節物價的作用比法定價格的作用大得多。喬治二世第三十一年制定的規定麪包價格的辦法，由於法律上的缺陷，在蘇格蘭無法實行，這辦法要靠市場職員執行，而蘇格蘭當時沒有市場職員。直到喬治三世第三年，才矯正法律上這個缺陷。但蘇格蘭從前未實行法定價格，也無何等大的不便，而在現在還施行法定價格的地方，也不見有何等大的利益。但是，在蘇格蘭大多數都市，都有自稱有排外特權的麪包業組合，但沒對這特權加以嚴密的保護。

已經說過，投在不同用途上的勞動和資本的不同工資率和利潤率的比例，似乎不大受所屬社會的貧富、進步或退步停滯狀態的影響。公共福利上這樣的變革，雖然會影響一般工資率和利潤率，但歸根到底對所有不同用途必有相同的影響。因此，不同用途上的工資率和利潤率的比例，必繼續相同，至少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不會因上述變革而變動。

作為使用土地的代價的地租，自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實際情狀所支給的最高價格。在決定租約條件時，地主都設法使租地人所得的土地生產物份額，僅足補償他用以提供種子、支付工資、購置和維持耕畜與其他農具的農業資本，並提供當地農業資本的普通利潤。這一數額，顯然是租地人在不虧本的條件下所願意接受的最小份額，而地主決不會多留給他。生產物中分給租地人的那一部分，要是多於這一數額，換言之，生產物中分給租地人那一部分的價格，要是多於這一數額的價格，地主自然要設法把超過額留為己有，作為地租。因此，地租顯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實際情況所能繳納的最高額。誠然，有時由於存心寬大，更經常是由於無知，地主接受比這一數額略低的地租；同樣，有時也由於無知（但比較少見），租地人繳納比這一數額略高的地租，即甘願承受比當地農業資本普通利潤略低的利潤。但這一數額，仍可視為土地的自然地租，而所謂自然地租，當然是大部分出租土地應得的地租。

也許有人認為，土地的地租，不外是地主用來改良土地的資本的合理利潤或利息。無疑地，有些時候，情況可只說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但不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對於未經改良的土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而所謂改良費用的利息或利潤，一般只是這原有地租的附加額。而且改良土地，未必都由地主出資本，有時是由租地人出資本。不過，在續訂租約時，地主通常要求增加地租，好象改良是由他出資本搞的。

有時，地主對於完全不能由人力改良的自然物，也要求地租。例如，克爾普是一種海草。這種海草一經燃燒，即可成為製造玻璃和肥皂以及其他用途所需要的礆鹽。不列顛幾個地方，尤其是蘇格蘭，都生產這種海草。它生於高潮能達到的岩石上，這些岩石每日被海潮淹沒兩次，所以，生在這些岩石上的海草，絕不是通過人力而增多的。但是，對於以生產這種海草的海岸為界的所有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象他們對谷田要求地租一樣。

設得蘭羣島附近，產魚極為豐富。魚成為居民食糧的大部分。但是，居民要從水產物獲利，就不能不住在近海地帶。因此，該地地主所收的地租，就不是和農民由土地上所能獲得的利益成比例，而是和他由土地和海上這兩方面所能獲得的利益成比例。這種地租部分是以

魚繳納的。魚這種商品價格中含有地租成分是很少見的，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它的實例。

這樣看來，作為使用土地的代價的地租，當然是一種壟斷價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費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數額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繳納的數額成比例。

只有這樣的土地生產物，才能經常送往市場售賣，即其普通價格，足夠補還產物上市所需要墊付的資本，並提供普通利潤。如果普通價格超過這限度，其剩餘部分自然歸作土地地租。若不超過這限度，貨物雖可運往市場售賣，但不能提供地租。價格是否超過這限度，取決於需求。

土地生產物中，有些物品的需求，使得它們在市場售賣的價格，總是超過其原費；有些物品的售價，或是超過或是不超過其原費。前者，總能給地主提供地租；後者，隨着不同情況，有時能提供地租，有時不能提供地租。

所以應當注意，地租成為商品價格構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資與利潤不同的。工資和利潤的高低，是價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卻是價格高低的結果。商品的價格的有高有低是因為這一商品上市所須支付的工資與利潤有高有低。但這商品能提供高地租，能提供低地租，或不能提供地租，卻是因為這商品價格有高有低，換言之，因為這商品價格，是大大超過或稍稍超過足夠支付工費及利潤的數額，或是僅夠支付工資及利潤。

我把本章分為以下三節，專門討論：第一，總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第二，有時能提供有時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產物；第三，這兩種原生產物，彼此互相比較或和製造品比較，在不同改良階段，所自然產生的相對價值上的變動。

象一切其他動物一樣，人類的增殖，自然會和其生活資料相稱。所以，對於食物，總是或多或少地有需要。食物總能購買或支配或多或少的勞動量，而願為獲得食物而從事勞作的人，總是可以找得到的。誠然，對勞動支給高工資的結果，食物能購得的勞動量雖與處理得最經濟時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未必相等，但食物總能按照鄰近一帶勞動者的普通生活標準維持一定數量的勞動。

但是，就幾乎任何位置的土地說，其所產食物，除足夠維持它上市所需的勞動外，還有剩餘。而這剩餘，又不僅僅足夠補償僱用勞動所墊付的資本及其利潤，還留有作為地主地租的餘額。

挪威及蘇格蘭的荒涼曠野，產有一種牧草。以這牧草飼養牲畜，所得的乳汁與繁殖出來的牲畜，除了足夠維持牧畜所需要的一切勞動，並支給牧畜者或畜羣所有人的普通利潤外，還有小額剩餘，作為地主的地租。牧場地租，隨着牧場條件的優良程度而增加。優良土地，不但比同面積的劣等土地，能維持更多的牲畜，而且由於牲畜集聚於較小地區，飼養上和收穫上，需要較少的勞動。這樣，地主就從生產物數量的增加以及維持費用的減少這兩方面得到利益。

不問土地的生產物如何，其地租隨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相同；不問其肥沃程度如何，其地租又隨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相同。都市附近的土地，比僻遠地帶同樣肥沃的土地，能提供更多的地租。耕作後者，所費勞動量，與耕作前者所資勞動量雖相同，但僻遠地方產物運到市場，必需較大勞動量。因此，這僻遠地方，必須維持較大數量的勞動，而農業家利潤及地主地租所出自的剩餘部分，勢必減少。但是，前面說過，僻遠地方的利潤率，一般比都市附近高，所以，在這減少的剩餘部分中，屬於地主的部分，必定更小。

良好的道路、運河或可通航河流，由於減少運輸費用，使僻遠地方與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於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僻遠地方，必是鄉村中範圍最為廣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進這廣大地區的開發。同時，又破壞都市附近農村的獨佔，因而對都市有利。連都市附近的農村，也可因此受到利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雖會使若干競爭的商品，運到舊市場來，但另一方面，對都市附近農村的農產物，卻能開拓許多新市場。加之，獨佔乃是良好經營的大敵。良好經營，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競爭，纔得到普遍的確立。自由和普遍的競爭，勢必驅使各個人，為了自衛而採用良好經營方法。將近五十年前，倫敦近郊一些州郡，曾向議會請願，反對徵收通行稅的道路擴展到僻遠州郡。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樣那些僻遠州郡，由於勞動低廉，它們的牧草和穀物，將以比附近州郡低的價格在倫敦市場出賣，倫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將因此下降，而他們的耕

作事業，將因而衰退。然而，從那時起，他們的地租，卻增高了，而他們的耕作事業，也改善了。

中等肥沃程度的谷田為人類生產的食物，比最上等同面積牧場所生產的多得多。耕作谷田，雖需大得多的勞動量，但在收回種子和扣除一切勞動維持費用以後所剩餘的食物量，也大得多。所以，一磅家畜肉的價值，如果一向都沒被認為大於一磅麪包的話，那末上述較大的剩餘到處都具有較大的價值，而且是農業家利潤及地主地租所以出的較大基金。在農業幼稚初期，情況似乎普遍如此。

但這兩種食物即麪包與家畜肉的相對價值，在不同農業發展時期，大不相同。在農業幼稚初期，國內絕大部分未曾開闢的土地，都用於收畜。家畜肉比麪包多，而麪包這食物成為極大競爭的對象，因而可賣得極大價格。據烏洛阿說，在阿根廷首都，四五十年前，一頭牛的普通價格為四里爾，合英幣二十一便士半，而且購買時，可在二三百頭的牛羣中隨意選擇。烏洛阿授說到麪包價格，這大概是因為麪包價格並沒有什麼值得敘述的地方。他又說，那邊一頭牛的價格，幾乎和捕獲它所費的勞動相等。但無論在那裏，栽種穀物，就得使用很大勞動量，而阿根廷位於拉普拉塔河上，拉普拉塔河當時成為歐洲至波託西銀礦的直接通路，在這樣一個國家，其勞動的貨幣價格，不可能很低廉。但當國內大部分地區成為耕地的時候，情形卻完全兩樣了。這時，麪包比家畜肉多，競爭既轉變了方向，家畜肉價格就變得比麪包高。

加之，耕地擴大，未開闢原野，就不夠供應家畜肉的需求。許多耕地，必須用於飼養牲畜。所以牲畜價格，不但要足夠維持飼養所需要的勞動，而且要足夠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時地主所能收得的地租及農業家所能收得的利潤。可是，荒野地上所飼養的牲畜，與改良地上所飼養的牲畜，在同一市場，比照品質和重量，以同一價格出售。荒野地所有者，就乘此良機，按照其牲畜的價格，增加土地的地租。不到一世紀以前，蘇格蘭高地許多地方的家畜肉價格，和燕麥麪包的價格相等，甚或較為低廉。後來，英格蘭和蘇格蘭統一，蘇格蘭高地的牲畜在英格蘭得到了市場。現在，蘇格蘭高地家畜肉的普通價格比本世紀初大約高三倍，而高地許多土地的地租在這一時期內增加三四倍。

今日不列顛各地，最上等家畜肉一磅約值最上等白麪包二磅以上，而在豐年，有時值最上等白麪包三磅乃至四磅。

所以，隨着改良的進展，未改庭的牧場的地租與利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已改良的牧場的地租與利潤的支配，而已改庭的牧場的地租與利潤，又受谷田的地租與利潤的支配。穀物每年收穫一次，家畜肉卻需四五年工夫，纔有收穫。因此，同是一畝土地，家畜肉的出產額，比穀物出產額少得多，家畜肉較低的產量必須以較高的價格得到補償。假若價格的優越程度，超過了這限度，那末就有更多的谷田，改爲牧場；假若價格的優越程度，沒達到這限度，那末已用作牧場的土地，一部分又必改爲谷田。但是，必須知道，牧草和穀物在地租和利潤上這樣的均等，直接生產牲畜食物的土地和直接生產人類食物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潤上這樣的均等，只在大部分土地已經改良的國家，纔會發生。就某些地方說，情形卻完全兩樣，牧場的地租和利潤，比耕地的地租和利潤高得多。

在大都市附近，對牛乳及馬糧的需求，以及家畜內的高價，使牧草價格增高得超過它對穀物價格的自然比例。很明顯，這種地方性利益決不會擴及到僻遠地區。

某些國家的特殊情況，有時使其人口變得非常稠密，以致這些國家所有土地，象大都市附近地域一樣，所生產的牧草及穀物，不夠滿足共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其土地，主要用以生產那容積較大、不易由遠方輸來的牧草，而人民所食的穀物，則仰給於外國。現今荷蘭正處在這樣的狀態。在古羅馬繁榮時代，古意大利都把大部分土地，用來生產牧草。據西西羅說，老伽圖曾說：“經營私有土地所得的利潤與利益，以善於飼養爲最，佔第一位；差可人意的飼養，佔第二位；不善的飼養，佔第三位。”他把農耕的利潤與利益，列爲第四位。古羅馬常把穀物無代價地或極低價地分配其人民，結果大大阻害部近古羅馬的古意大利地域的耕作。這種穀物，來自被征服省分。這些被征服省分，有的不納賦稅，但須將產物十分之一，以每配克六便士的法定價格賣給共和國。共和國以這穀物廉價配售人民，這必然使羅馬舊領土的穀物，在羅馬市場上跌價，因而必然妨害其穀物耕作。

此外，在以穀物爲主要產物的開闊地方，圈圍草地的地租往往比附近谷田的地租高。圈圍便於飼養耕畜，而圈圍地這樣高的地租，並

不是由於草地生產物的價值，而是由於利用耕畜耕作的谷田生產物的價值。假若鄰近土地全被圈圍，那高地租就會跌落。現在蘇格蘭圈圍地地租的高昂，似乎由於圈圍地太少，圈圍地一增加，其地租大概就會下降。圈圍土地，對牧畜比對耕作更有利。它不但可節省看守牲畜的勞動，也使牲畜由於不受守護人或守護狗的驚擾，吃得更好。

但在沒有這種地方性利益的地方，收地的地租和利潤，自不免要受適宜於耕種穀物或其他一般植物性食品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潤的支配。

同一面積的土地，僅僅使用天然牧草，所能飼養的牲畜使比較少，而使用蕪青、胡蘿蔔、包菜等人工牧草，或使用其他已經用過的方法，所能飼養的牲畜便比較多，這樣就可使進步國家中家畜肉本來高於麪包的價格，稍稍降低。而且，事實上似乎如此；至少，可以相信，倫敦市場上家畜肉對面包的相對價格，現今比前世紀初葉低得多。

伯奇博士在他所著《亨利親王傳》的附錄中，詳記這親王日常支付的家畜肉的價格。重六百磅的牛一頭，通常只費他九鎊十先令，即每百磅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亨利親王是在1612年11月6日，他十九歲時死的。

1764年3月，議會曾調查當時食品價格高騰的原因，在這次蒐集的許多證據中，有一個弗及尼亞商人證言：他於1763年3月備辦船上食物，支付每百磅牛肉二十四先令至二十五先令的價格，他認為這是普通價格，而在物價高的年度，即1764年，對於同質同量的牛肉，他卻支付二十七先令。但是，1764年這樣高的價格，卻比亨利親王所付的日常價格還低四先令八便士；應當指出，為遠道航海而購買的適於醃藏的牛肉，一定是最好的。

亨利親王所支付的價格，等於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那是包括上等或下等肉塊的平均價格。所以，推算起來，當時零售的上等肉，每磅不可能少於四便士半或五便士。

在1764年議會作調查時，作證人都說，當時上等牛肉的上好肉塊的零售價格每磅為四便士到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下等肉塊的價格，每磅由七個銅元到二便士半或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他們說，一般地

說，此種價格比三月間的普通市價，每磅約高半便士。但是，連這樣高的價格，也比亨利親王時代的普通零售價低廉得多。

前世紀頭十二年間，溫莎市場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每亨特（合九溫徹斯特蒲式耳）為一鎊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

然而，在1764年前十二年（包括1764年）內，同一市場上上等小麥的平均價格，每亨特為二鎊一先令九便士半。

因此，小麥價格在前世紀頭十二年內，比它在1764年前的十二年（包括1764年在內）內低廉得多，而家畜肉價格卻高得多。

在一切大國中，大部耕地，都用來生產人類的糧食或牲畜的糧食。此等土地的地租和利潤，支配其餘一切耕地的地租和利潤。假若用以生產某種特殊生產物的土地，提供了比上越少的地租和利潤，那種土地，馬上就會改作谷田或牧場。若能提供更多的地租和利潤，那末部分谷田或收場不久就改用來生產那特殊的生產物。

為使土地適合於那特殊生產物的生產，或最初要花比谷田或收場所要花的更大改良費用，或每年要花更大的耕作費用。較大的改良費用，一般提供較大的地租，而較大的耕作費用，一般也提供較大的利潤。這樣增高的地租和利潤，往往只是較大費用的合理利息或報酬。

就栽植忽布花、果樹及蔬菜的土地說，地主的地租和農業家的利潤，一般比谷田或草地大。但是，使土地適合於這種栽植，需要更大的費用，所以應給與地主以更大的地租。此外，這種土地，需要更細心和更巧妙的使用，所以應給農業家以更大的利潤。況且，這些作物，至少是忽布和水果的收成，很不確定，所以，其價格必須提供類似保險的利潤的某種東西，以補償一切意外損失。種園者的平凡境遇，使我們確信，他們的大技能，很少得到過大的報酬。許多有錢的人為着自娛都從事種園者那種愉快作業。所以，以種園謀利，得不到很大利益，因為那些應該成為他們產物的最好顧客的都自己種植各種珍貴花木。

地主從這種改良所享得的利益，似乎都僅僅足以補償改良所花的費用。就古代耕作說，除葡萄園外，農場中能提供最有價值產物的部分，似乎是便於澆水的菜園。但是被古代人曾為農業技術之父的德莫克里特斯，在二千年前，寫了關於這方面的著述。他認為，把菜園繞以圍牆，是不聰明的辦法，因為菜園的利潤，不能補償其石牆的費

用，而磚塊（我想那種磚塊是指由日光曬乾的一種）一經風雨毀壞，就需要修補。科倫麥勒引用德莫克里特斯的話，不加反駁，但提倡使用由荊棘和茨作成的籬笆。他說，根據他的經驗，那是既持久又不易侵入的柵欄，然而在德莫克里特斯時代，一般人民似乎還不懂得這個圈圍方法。科倫麥勒這意見，首先為瓦羅推薦，以後又為帕拉迪阿斯採用。根據這些古代農事改良者的意見，菜園生產物的價值，似乎只稍稍超過特殊栽培和澆水的費用。靠近太陽的國家，那時和現在都認為，應掌握水源，把它導入園地。歐洲今日大部分地方的菜園，依舊採用科倫麥勒提倡的圍籬方法。在不列顛及其他北方國家，不借助於圍牆，就不能獲得優庭的果實。所以，它們的優良果實的價格，必須償付其生產上所不可少的圍牆建築費和維持費。常常用果樹圈圍菜園，這樣就使不能從生產物來補償圍牆建築費和維持費的菜園，也得到圈圍的好處。

種植適當而培養完善的葡萄園，乃是農場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似乎是古代和現代一切葡萄酒產國都承認的農業上無可置疑的原理。但據科倫麥勒說，種植新葡萄園有無利益，卻是古代意大利各農業家間爭論紛壇的問題。科倫麥勒和一個確實愛種新奇作物的人一樣，決然贊同種植新葡萄園，並通過利潤與費用的比較，力圖證明，種植新葡萄園是一種最有利益的農事改良。然而，關於這種新產業計劃中利潤與費用的比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而在農業中尤其如此。如果這種種植所得的利益，都是象科倫麥勒所想象的那麼大，那末關於這問題，就不會有那種爭論。直到現今，在葡萄酒產國中，這還是爭論紛壇的問題。這些國家的農事作家，即高級耕作的愛好者和鼓吹者，和科倫麥勒一樣，都決然贊同栽種新葡萄園。法國舊葡萄園所有者阻止種植新葡萄園的焦急心情，似可支持那些作家的意見，並表示那些有經驗的人，都覺得現今在那個國家種植葡萄，比栽種其他任何植物，更有利可圖。可是，同時似乎也表示，從另一方面看來，葡萄園的優越利潤，如果不受限制葡萄自由培植那些法律的庇護，就不能持續下去。1731年，舊葡萄園所有者，得到以下敕令：凡未經國王特許，新葡萄園的種植，停種二年以上的葡萄園的續種，都在禁止之列。要得國王這種特許，又須先請州長查驗，證明這土地不適宜於任何其他耕作。據說，當時發佈這敕令的理由，是穀物、牧草的缺乏和葡萄酒的過剩。但是，葡萄酒過剩，如確係事實，那末它就會使這種種植的利

潤降落到牧場和谷田的利潤的自然比例以下，這樣無須上述敕令便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園的種植。關於所謂葡萄園增加，招致了穀物缺乏，我們知道，就法國說，在土地適宜於生產穀物的葡萄產州，穀物耕種得比其他各州更精細，在勃艮策和吉延是如此，在上郎格多克也是如此。一種耕作事業僱用很多勞動者，必然給另一種耕作事業的產品提供了好市場，從而鼓勵另一種耕作事業。減少能購買葡萄酒的人數，無疑是最浪有效果的獎勵穀物耕作事業的方策。這方策簡直等於通過阻遏製造業來促進農業的政策。

因此，那些作物，需要有較大土地改良費用，使土地適合於栽種，或需要有較大的每年耕作費用，其地租和利潤，縱使往往大大超過穀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潤，這超過額如果僅足抵償高的費用，那末其地租和利潤，實際上是受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潤的支配。

誠然，有時也發生這樣的情況，適合於栽種某特殊作物的土地過小，不夠供應其有效需求。在這種情況下，那生產物全部，都可售給願出比一般略高的價格的那些人，他們所出的價格，稍稍超過這作物生產以至上市，按地租、工資和利潤的自然率，或按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在這種價格中，除去改良及耕作的全部費用後，所剩餘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只在這種情況下，可不和穀物或牧草的同樣剩餘部分保有正常的比例，而且可在任何程度上超過。這超過額的大部分，自然歸於地主。

必須知道，葡萄酒的地租利潤對穀物牧草的地租利潤的普通和自然比例，只在生產好的普通葡萄酒的葡萄園纔會有。這種葡萄園的土壤，或是輕鬆，或是含有砂礫，或是含有沙。而所產葡萄酒，除濃度與適合衛生外，又無可以稱道的特色。國內普通土地，只能和這種普通葡萄園相提並論，至於有特殊品質的葡萄園，那顯然非普通土地所可同日而語了。

在一切果樹中，從葡萄樹最易受土壤差異的影響。據說，來自一種特殊土壤的特殊美味，決不是在另一種土壤上，通過人工所能做到的。這種現實上或想象上的美味，有時僅為幾個葡萄園產物所特有，有時為小區域中絕大部分葡萄園所共有，有時又為一大州中大部分葡萄園所共有。這種葡萄酒在市場上出售的全量，不夠供應共有效需

求，即不夠供應那些願支付，為產製和運輸這種葡萄酒，按一般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或按上般葡萄園所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的人的需求。因此，這全量可賣給願支付更高價格的人，這必然會把這種葡萄酒的價格擡高到超過普通葡萄酒的價格。這兩種價格相差的大小，要看這種葡萄酒的流行性與稀少性所激起的購買者競爭程度的大小而定。但無論相差多少，其差額的大部分，歸於地主。雖然這種葡萄園，在栽培土，一般都比其他葡萄園更為謹慎周到，但其較高的價格，與其說是慎重栽培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慎重栽培的原團。就生產此種高價產物說，由怠慢而產生的損失非常的大，所以，即使最不小心的人，也不得不注意。因此，這高價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夠支付生產上額外勞動的工資和額外資本的利潤。

歐洲各國在西印度佔有的蔗田，可與這高價的葡萄園相比擬。蔗田的全部產量，不夠滿足歐洲人的有效需求，所以，這全部產量，只能賣給願以超過這產品生產和上市，按其他任何產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的價格而購買的人。據熟悉交趾支那農事的波佛爾氏說，交趾支那最上等精製白糖價格，通常為每昆特爾三皮亞斯特，合英幣十三先令六便士。那邊所謂昆特爾，合巴黎的一百五十磅到二百磅，平均相當於巴黎一百七十五磅。以英衡計，每百磅約八先令。這與我們從我們殖民地輸入的紅糖或粗砂糖通常支付的價格比較，不及四分之一，與最上等精製白糖比較，價格也不及六分之一。交趾支那大部分農地，是用來生產大多數國民所食的米麥。那裏，米麥和砂糖的價格，也許具有自然的比例，即大部分農地各種作物，自然而然地成比例，使各地主和各農業家，都得到儘可能按通常原始改良費用和每年耕作費用計算的報酬。但我國蔗田殖民地的砂糖價格，對歐美稻田或麥田的生產物價格，卻沒有這種的比例。據說，甘蔗栽培者，常常希望以糖酒及糖蜜兩項，補償所有的栽培費，而從全部砂糖作為純利潤。就我說，不敢冒昧確認此係事實，設其如此，正如穀物耕作者希望以糠蒿二項，補償其耕作費用，而以全部穀粒作為純利潤。我常常看見，倫敦及其他都市的商人團體，收買我國蔗田殖民地的荒地，託代辦人或代理人從事改良和耕作，期獲利潤；雖然距離遙遠，而當地司法行政又不健全，不能保障他們的確定收入，他們亦在所不顧。而在蘇格蘭、愛爾蘭或北美產谷

區域的最肥沃土地，誰都不想用同一方法來改良和耕作，雖然這些地方司法行政完善，他們可望得到比較正常的收入。

在北美的弗及尼亞和瑪利蘭，由於栽種菸草更為有利，所以，人們情願種菸草，不願種穀物。在歐洲大部分，栽種菸草，也獲得利益，但是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以菸草為主要課稅對象，而國內要是栽種菸草，對各栽種地徵稅，比對輸入菸草課關稅較為繁難，於是大多數地方，竟因此以不合理的命令，禁止栽種菸草。結果，允許栽種菸草的地方，便取得了一種壟斷，而弗及尼亞和瑪利蘭的菸草生產量最大，所以它們雖有若干競爭者，卻享受這種壟斷的大部分利益。可是，栽種菸草，似不象栽種甘蔗那麼有利。我從來不曾聽過，居住不列顛的商人，投資改良和培植菸草園。以種菸草發財，由殖民地返國的，也不象由我們蔗島，以生產砂糖發財而返國的那麼常見。從殖民地居民樂於栽種菸草、不願栽種穀物這一事實看來，歐洲對菸草的有效需求，似未全部得到供給，但菸草的供給，也許比砂糖的供給更接近於有效需求。現在，菸草的價格，也許超過菸草產製和上市，按谷田一般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率所必須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資與利潤，但其超過額必定小於現今糖價的超過額。因此，我國殖民地的菸草種植者，象法國舊葡萄園所有者那樣，都害怕生產過剩。於是，通過議會法會，限定年齡十六歲到六十歲的黑奴一人，只得栽培菸草六千本，他們認為六千本可出菸草一千磅。他們計算，每個黑奴，除生產這數量菸草外，還能耕作玉蜀黍耕地四畝。道格拉斯博士告訴我們（我想他的話未必可靠），他們為防止市場供給過剩，在豐年有時把每個黑奴所生產的菸草，燒去若干，象荷蘭人把他們所生產的香料燒去若干一樣。如果維持現今菸草價格，需要採用這種過激辦法，那末，栽種菸草優於栽種穀物的好處，即使目前還多少存在，恐怕不會長久繼續下去。

由此可見，生產人類糧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任何特殊產物所提供的地租，不會長久低於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因為那土地定會立即改為他用；要是任何特殊產物所提供的地租，通常高於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那是因為適合於這產物的土地過少，不能供應其有效需求。

在歐洲，直接充作人類糧食的土地生產物是五穀。所以，除位置特殊外，歐洲谷田的地租，支配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英國不必羨慕法國的葡萄園，也不必羨慕意大利的橄欖園。因為葡萄與橄欖，如非佔有特殊位置，其價值亦須由穀物價值規定，而在穀物生產上，英國土地的肥沃，並不比這兩國土地差得多。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國民一般愛吃的植物性糧食，不是穀物，而是另一種植物，並假定在這國家普通土地上，通過和谷田耕作相同或幾乎相同的耕作，所能產出的這種植物量，卻比最肥沃谷田所生產的多得多，那末，地主的地租，換言之，支付勞動工資並扣回農業家資本及其普通利潤後所剩餘的食物量，必然大得多。不論這國家維持勞動的普通工資是怎樣，這較大的剩餘量，總能維持較大的勞動量，而地主因此也就能購買或支配更多的勞動量。他的地租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對於他人勞動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權，必定大得多。

稻田所產的食物量，比麥田所產的大得多。據說，稻田每畝，普通每年收穫二次，每交三十蒲式耳到六十蒲式耳。雖然耕種稻田，通常需要更多的勞動，但其生產量，除了維持勞動以外，還有更多的剩餘。因此，在以米為普通愛好的食物，而耕作者主要也是靠米維持生活的產米國家，地主從這更大的剩餘所得的，比產麥國地主所得的多。在卡羅林納和英領其他殖民地，耕作者一般兼有農業家和地主身分，因此，地租與利潤混淆；當地稻田雖每年只收穫一次，而當地人民根據歐洲普通習慣，不以米為普通愛好的植物性食物，但都認為耕種稻田，比耕種麥田更為有利。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澤地，而且有一季充滿着水。它不適宜於種麥，不適宜於作牧場，不適宜於作葡萄園，實則除種稻外，不適宜於栽種任何對人類有用的植物性食物。而適於那些用途的土地，也不適宜於種稻。所以，即在產米國中，稻田的地租，不能規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因為其他耕地不能轉為稻田。

馬鈴薯地的產量，不亞於稻田的產量，而比麥田的產量大得多。一畝地生產馬鈴薯一萬二千磅，並不算怎麼優異的產量，一畝地生產小麥二千磅，卻算是優異產量。誠然，馬鈴薯所含水分很大，從這兩種植物所得的固體滋養料，不能與其重量成比例。但是，從馬鈴薯這

塊根食物的重量中，即使扣除一半作為水分——這是很大的扣除——，一畝地的馬鈴薯，仍有六千磅固體滋養料，仍三倍於一畝麥地的產額。況且，耕作一畝馬鈴薯的費用，比耕作一畝麥地的費用少，而就麥地在播種前通常需要的犁鋤休種說，所費就超過栽種馬鈴薯的鋤草及其他特殊費用。所以，這塊根食物，如果在將來成為歐洲某地人民的普通愛好食物，正如米在一些產米國家成為人民的普通愛好食物那樣，使得栽培馬鈴薯的土地面積在全耕地中所佔的比例，等於現今栽種小麥及其他人類食用穀物的土地面積在全耕地中所佔的比例，那末同一面積的耕地必能養活多得多的人民。而且，勞動者如果一般都靠馬鈴薯過活，那末在生產中，除了扣回耕作資本及維持勞動外，還有更大的剩餘。這剩餘的大部分，亦將屬於地主。人口就會增加，而地租也會增高，大大超過現今的地租。

凡適於栽種馬鈴薯的土地，亦適於栽種其他一切有用植物。假如馬鈴薯耕地，在全部耕地中所佔比例，和今日谷田所佔比例相同，那末馬鈴薯耕地的地租，就將象今日谷田地租那樣，規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我聽說，蘭開夏某些地方認為，勞動人民吃燕麥麪包，比吃小麥麪包，肚子更飽。而在蘇格蘭，我也聽到同樣的話。我對於此種傳聞，總覺有點疑問。吃燕麥麪包的蘇格蘭普通人民，一般地說，不象吃小麥麪包的同一階級英格蘭人民那麼強壯，那麼清秀；他們既不象英格蘭人那麼起勁地工作，也不象英格蘭人那麼健康。由於在這兩地上流人中間沒有這種差異，經驗似乎告訴我們，蘇格蘭普通人民的食物，沒有英格蘭普通人民的食物那麼適合於人類的體質。但就馬鈴薯說，情形卻完全兩樣。倫敦的轎伕、腳伕和煤炭挑夫，以及那些靠賣淫為生的不幸婦女（也許是英國領土中最強壯男子和最美麗女子），據說，這些人的大部分，來自一般只馬鈴薯為食物的愛爾蘭最下級人民。馬鈴薯提供最明確的證據，證明它含有營養素，而且特別適合於人類的體質。

馬鈴薯很難保存一年，而且不可能象穀物那樣貯藏二三年。不能在腐爛以前賣出的恐懼，使人不想栽種馬鈴薯，而在任何大國，馬鈴薯不象麪包那樣，成為各階級人民的主要植物性糧食，這也許是一個主要原因。

—第二節論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

地租的土地生產物

在各種土地生產物中，似乎只有人類食物是必然提供地租的；其他生產物，隨着不同情況，有時提供地租，有時不提供地租。

人類最需要的東西，除了食物，就是衣服及住宅。

在原始自然狀態下，土地在衣服及住宅材料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比在食物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多得多。但在進步狀態下，土地在前一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有時卻比在後一方面所能供給的人數少，至少，就人們需要衣服住宅材料和願意支付代價這二方面說，是如此。所以，在原始自然狀態下，衣服和住宅材料總是過剩，因而沒有多少價值，甚或完全沒有價值。在進步狀態下，此等材料往往缺乏，其價值於是增大。在前一場合，大部分衣住材料，由於無用被拋棄，而使用部分的價格，可以說只等於改造這些材料使其適於人用所花的勞動與費用。因此，對於地主，自不能提供地租。在後一場合，這些材料全被使用，而且往往求過於供。於是，對於此等材料的任何部分，總有人願意以超過其產製和上市的費用的價格來購買。所以，此等材料的價格，對地主總可提供若干地租。

原始的衣服材料，乃是較大動物的皮。所以，只那些動物的肉為主要食料的狩獵和牧畜民族，在獲取食料時，就獲得了他們自身穿不了的衣服。如果沒有對外貿易，那末此等多餘材料，便看作無價值東西而被拋棄。就未被歐洲人發現以前的北美狩獵民族說，情況大抵如此。現在，他們以過剩的毛皮和歐洲人交換毛氈、火器和白蘭地酒，這樣就使他們的毛皮具有若干價值。我相信，在現在世界的通商狀態下，即使最不開化的民族，只要土地所有制已確立，就在一定程度上有這種對外貿易，他們在國內土地生產但不能在國內加工或消費的衣服材料，在較富裕的鄰國中，找到那樣的銷路，以致此等材料的價格，擡高到超過其運輸費用。於是，此等材料的價格，就給地主提供了若干地租。當蘇格蘭高地牲畜的大部分，在內部丘陵地帶消費的時候，獸皮成為輸出的最主要商品，換回其他物品，這樣就稍稍增加了高地土地的地租。以前，英格蘭不能在本國加工或消費的羊毛，也在當時更富裕和更勤勞的弗蘭德人的國家裏找到了銷路，其售價對羊毛產地也提供了若干地租。然而，在耕作狀態不比當時英格蘭及今日蘇

格蘭高地更爲進步，又無對外貿易的國家，衣服材料顯然是那麼過剩，以致有一大部分由於無用而被拋棄，那就不能給地主提供地租。

住屋材料，未必都能象衣服材料那樣容易運往遙遠地方，因而，也不象衣服材料那樣容易成爲國外貿易的對象。即使在今日商業狀況下，也常常如此。在住屋材料生產過剩的國家，這些過剩材料，不能給地主提供什麼價值。倫敦附近的良好石礦，提供了相當大的地租，而蘇格蘭和威爾士許多地方的石礦，卻不提供地租。在人口稠密農耕進步的國家中，用於建築的無果樹木，價值很高，其產地提供了相當大的地租，而在北美許多地方，樹木產地的所有者，卻不但得不到地租，如果有人願意採伐並運去他的大部分大樹，他還會非常感謝。蘇格蘭高地有些地方，由於缺少公路和水運，所以能向市場運送的只有樹皮，而木材則隨地委棄，聽其腐爛。當住屋材料是那麼過剩的時候，實際上被使用的那一部分的價值，也不過等於加工時所花的勞動和費用。這一部分，對地主不提供地租。然而當鄰近富裕國民，有住屋材料的需要時，又當別論。例如，倫敦街道的鋪石，曾使蘇格蘭海岸一部分不毛岩石的所有者，從向來不提供地租的岩石收到地租。又如，挪威及波羅的海沿岸的樹木，在不列顛許多地方找到了國內找不到的市場，於是這些樹木給其所有者提供了若干地租。

國家的人口，不和它們衣住材料所能供給的人數成比例，而和它們食物所能供給的人數成比例。食物要是得到供給，那就不難找到必要的衣服及住宅。但是，有了住宅衣服，往往不易找到食物。即在不列顛許多地方，只一人一日的勞動，也能造成稱爲住宅的簡單建築物。把獸皮製成最簡單的衣服，只需要一天多的勞動。就野蠻或未開化民族說，爲獲得這種衣服及住宅，所費不過佔全年勞動百分之一。而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用於獲取食物，往往只勉強夠用。

但由於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結果，一家的勞動，能供給二家的食物，於是半數人口的勞動便足以生產供給全社會的食物，所以共餘半數，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勞動，能用來生產其他物品，即用以滿足人類其他慾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傢俱，以及所謂成套的應用物品，便是大部分這些慾望和嗜好的主要對象。富人所消費的糧食，並不比他窮苦鄰人所消費的多。在質的方面，也許大不相同，選擇和烹調富人的糧食，可能需要更大的勞動和技術，而在量的方面，幾乎相同。

但是，我們且把富人堂皇的邸宅，巨大的衣櫥，和貧民的陋屋敝衣比較一下罷；這兩者，不論在質的方面、量的方面，都會令人感到極大的差異。各個人食慾，都受胃的狹小容量的支配，而對於住宅、衣服、傢俱及應用物品的欲求，似乎卻無止境。所以，對自己所消費不了的剩餘食物有支配權的人，一定願意用剩餘食物或其代價來交換足以滿足其他慾望的東西。用滿足有限慾望以後的剩餘物品，來換取無限慾望的滿足。另一方面，窮人爲取得食物，竭力勞作，以滿足富人此等嗜好；而窮人爲使自己的食物供給較有把握，往往相互競爭，使其作品，益臻完善，益趨低廉。勞動者人數，隨食物量增大而增加，換言之，隨土地改良及耕作的進步而增加。由於他們工作的性質容許極度的分工，所以他們能夠加工的原料的數量增加得比他們的人數多得多。因此，人類發明才能在建築物、衣服、應用物品或傢俱上有用的或作爲裝飾品使用的各種原料，甚至地中的化石、礦產、貴金屬和寶石，都有了需要。

這樣看來，食物不僅僅是地租的原始來源，而後來求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其他生產物說，其價值中相當乾地租的部分，亦來自生產食物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勞動生產力這樣的增進，是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結果。但是，那些到後來才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的生產物，並不一定都能提供地租。即使土地業已改良並耕作的國家，對這類土地生產物的需求，未必都達到那樣的程度，以致其價格，除了支付工資，償還資本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還有剩餘。這類生產物是否能提供地租，要看各種情況而定。

例如，煤礦能否提供地租，部分要看它的產出力，部分要看它的位置。

礦山的產出力是大還是小，要看使用一定數量勞動、從這礦山所能取出的礦物量是多於或是少於使用等量勞動從大部分其地同類礦山所能取出的數量。

有些煤礦，位置很便宜，但由於產出力過小，不能開採。其生產物，不能償還費用。這樣的煤礦，不能提供利潤，也不能提供地租。

有些煤礦的產出物，僅夠支付勞動工資，償還開礦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企業家由這種煤礦，能期待若干利潤，地主卻不能由此得到地租。所以，象這類煤礦，除了地主自己開採，投下資本，可期

得到普通利潤外，其餘任何人，都不能經營有利。蘇格蘭有許多煤礦，由地主親自經營。這些煤礦，不能由他人經營，因為沒有地租，地主不許任何人採掘，而任何人採掘，也不能付給地主以地租。

蘇格蘭還有些煤礦，產出力很大，但由於位置不好，不能進行採掘。足夠支付開礦費用的礦山產量，有時雖可使用一般勞動量或比一般少的勞動量採掘出來，但在人口稀少，而缺少公路或水運的內地，這麼多的礦產，將無法賣出。

和木柴比較，煤炭是比較不適意的燃料，據說，還是比較不合衛生的燃料。在消費煤炭的地方，其費用一般要比木柴的費用少。

此外，木柴價格，幾乎象牲畜價格一樣，隨農業狀態的變動而變動，其變動的原因，和牲畜價格變動的原因，完全相同。在農業幼稚狀態下，各國大部分地方都是樹木。那些樹木，在當時地主眼中，全是毫無價值的障礙物，如果有人願意採伐，他定然是歡喜不過的。後來，農業進步，那些樹木，部分由於耕作發達而被砍去，部分由於牲畜增加而歸於毀滅。牲畜頭數增加的比例，和全由人類勤勞而獲得的穀物增加的比例，雖不相同，但在人類的注意和保護下，牲畜也繁殖起來。人類在豐饒的季節，預先給牲畜貯藏食料，以備在缺少季節使用，樣樣人類給牲畜提供的食物量，就此未開發的自然所提供的多。人類給牲畜剷除敵害，使它們能安然自由享受自然所給與的一切。許許多多畜羣，隨意放牧森林，森林中的老樹，雖不受到損害，但幼樹卻受到摧殘。其結果，在一二世紀後，整個森林歸於毀滅。這樣，木柴的不足，擡高了木柴的價格。這價格，給地主提供了很好的地租。地主有時覺得，從最好土地栽植無果樹木，更為有利，而大的利潤，往往足夠抵消其收入的遲緩。這似乎是現今不列顛境內許多地方的情況，在這些地方，格林的利潤，被認為和谷田或種牧草的利潤相等。不過，地主由植林所得的利益，不論何處，至少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不能超過谷田或牧場的地租，而在耕作進步的內地，其利益往往比此種地租少得多。在土地改良得很好的海岸，作為燃料的煤炭，要是容易得到供給，那末建築木材由耕作事業較落後的外國輸入，往往比本國生產更為便宜。愛丁堡最近數年建築的新城市，也許沒有一根木材是蘇格蘭產的。

不論木柴的價格是怎樣，如果一個地方燒煤炭的費用，和燒木柴的費用幾乎相等，那末我們可相信，在那情況下，煤炭在那地方的價格就達到最高的水平。英格蘭內地某些地方，特別是牛津郡，情況似乎就是如此。牛津郡普通人民的火爐中，通常都混用木柴與煤炭，可見這兩種燃料的費用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在產煤國家，任何地方的煤炭價格，都比這最高價格低得多。否則，煤炭就擔負不起由陸運或水運送往遙遠地方的運輸費用。這樣，煤炭能夠賣出的，不過是很少的分量。煤礦採掘者及所有者，爲自己利益計，定會覺得，與其以最高價格賣出少量，倒不如以比最低價格略高的價格賣出多量。此外，產出力最大的煤礦，支配附近一切煤礦的煤炭價格。那些產出力最大煤礦的所有者及經營者發覺，只略低於附近煤礦的價格出售煤炭，就能增大其地租與利潤。這樣一來，鄰近煤礦，不久也不得不以同樣的價格出售煤炭，儘管它們不能以這價格出售。儘管這樣的價格總要削減，有時甚至剝奪它們的地租與利潤。於是一部分煤礦只好停止經營，另一部分煤礦因不能提供地租而只能由所有者自己來經營。

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煤炭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售賣的最低價格，乃是僅足補償使它上市所需用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的價格。那些對地主不提供地租，因而非由地主自己來經營就得完全棄置的煤礦，其煤炭價格，一般必和這最低價格大致相同。

即在煤炭提供地租的地方，煤礦價格中的地租部分，一般比其他大多數土地原生產物價格中的地租部分小。土地地面的地租，通常等於總生產額的三分之一。這份額，大概是確定的，不受收穫上意外事變的影響。然而就煤礦說，則以總生產額的五分之一爲非常大的地租，而以總生產額的十分之一爲普通地租。而且，這地租額極不確定，要看生產額有無意外變動而定。意外變動是那樣的大，以致在三十倍年租被認爲是購買田產的普通價格的國家，十倍年租卻被看做是收買煤礦的高價。

對所有者說，煤礦的價值，取決於煤礦的產出力，也同樣取決於煤礦的位置。而金屬礦山的價值，則取決於產出力的多，取決於位置的少。由礦石分離出來的普通金屬，尤其是貴金屬，具有那麼大的價值，以致一般地說，都負擔得起長時間陸運和長距離水運的費用。其

市場不侷限於礦山鄰近國家，而擴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銅，成為歐洲貿易商品；西班牙的鐵，成為智利及祕魯的貿易商品；祕魯的銀，不僅在歐洲找到了銷路，而且通過歐洲，也在中國找到了銷路。

西莫蘭及什羅普郡的煤炭價格，對紐卡斯爾的煤炭價格，沒有多大影響，而利奧諾爾的煤炭價格，對紐卡斯爾的煤炭價格，則毫無影響。這些煤礦產物，絕不會互相競爭。但距離很遠的金屬礦產物，卻往往有發生相互競爭的可能，而事實上，也常如此。因此，世界產金屬最多的地方，普通金屬價格，尤其是貴金屬價格，必然或多或少地影響世界各地礦山的金屬價格。日本銅的價格，必對歐洲銅礦上銅的價格發生影響。祕魯銀的價格，換言之，祕魯銀在當地所能購買的勞動量或貨物量，不但對歐洲銀礦上銀的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上銀的價格，也有影響。祕魯銀礦發現以後，大部分歐洲銀礦歸於廢棄。銀價降得那麼低，以致那些銀礦產物，不能償還開採費用，或者說，除償還開採時所消費的衣食住及其他必需品外，不能提供一些利潤。波託西銀礦發現後，古巴及聖多明各的礦山，乃至祕魯的舊礦山，也有這種情況。

這樣看來，各礦山所產各種金屬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世界當時產量最大的礦山產物價格的支配，所以大部分礦山所產的金屬價格，除償還其採掘費用外，沒有多大剩餘，因而，對地主，不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在大多數礦山所產的賤金屬價格中，地租似乎只佔小部分，而在貴金屬價格中，地租所佔部分尤小。勞動與利潤，構成了貴賤金屬價格的大部分。

以產量豐富著稱於世的康沃爾錫礦的平均地租，據這錫礦區副監督波勒斯說，高達總產量的六分之一。他並說，有些礦山的地租超過這比率，有些不及這比率。蘇格蘭許多產量很豐富的鋁礦的地租，也佔總產量的六分之一。

據佛勒齊及烏羅阿兩氏稱，祕魯銀礦所有者，往往只要求經營銀礦的人，在他設立的磨場中磨碎礦石，並把一部分磨碎的礦石給與所有者作為磨碾的代價。的確，直到1736年，西班牙國王對這些銀礦所徵收的礦稅，計達標準銀產額五分之一；截至此時為止，這可視為大部分祕魯銀礦的真實地租，祕魯銀礦當時是世界最豐富的銀礦。如果礦不徵稅，這五分之一當然屬於地主，而當時由於負擔不起這種捐稅

而沒有采掘的許多礦山，定會開採。康沃爾公爵所徵的錫稅，據說為全價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即二十分之一以上；不論其稅率怎樣，要是不課稅，這當然屬於礦山所有者。假定以二十分之一，與上述六分之一相加，就可發現，康沃爾錫礦的全部平均地租對祕魯銀礦的全部平均地租的比例，是十三比十二。然而，祕魯銀礦現今連這低微的地租也不能擔負，而銀稅也在1736年由五分之一，減到十分之一。銀稅雖輕微如此，但與二十分取一的錫稅比較，卻更能引誘人們做走私生意，而就走私說，貴重的物品必比容積大的物品容易得多。所以，有人說，西班牙國王得不到什麼稅收，而康沃爾公爵卻得到很好稅收。以此之故，地租在世界最豐富錫礦生產錫的價格中所佔的部分，可能比地租在世界最豐富銀礦生產銀的價格中所佔的部分大。在償還開採那些礦產物所使用的資本及共普通利潤後，留歸礦山所有者的剩餘部分，賤金屬似比貴金屬大。

祕魯銀礦開採者的利潤，通常亦不甚大。最熟悉當地情形並最受人敬佩的上述那兩位作家告訴我們說，在祕魯着手開採新銀礦的人，都被認為是註定要傾家蕩產的，所以大家都避開他。看來，採礦業在祕魯和在這裏一樣被看作彩票，中彩的少，不中彩的多，而幾個大彩，卻誘引許多冒險家做這樣無結果的嘗試，失去他們的財產。

可是，由於祕魯國王的歲入大部分來自銀礦，所以祕魯法律儘量獎勵新礦的發現及開採。發現新礦山者，不論是誰，一律按照他看準的礦派方向，劃出一塊長二百四十六呎寬一百二十三呎的礦區歸他所有，並自行開採，不給地主任何報酬。鑑於自己的利益，康沃爾公爵也在那古公國內，制訂了類似的規定。凡在荒野或未圈地內發現錫礦的人，都可在一定範圍內，劃出錫礦的境界，這叫做為礦山定界。這境界設定者，就是該礦區實際所有者。他可以不经原地主許可自行開採，或租與他人開採，不過在採掘時要給地主微薄的報酬。在以上那兩種規定中，私有財產的神聖權利都由於國庫歲入想象上的權利而被侵犯了。

祕魯同樣獎勵新金礦的發現與開採，而國王的金稅只佔標準金產量的二十分之一。原來金稅與銀稅同為五分之一，後來減到十分之一，然而就開採的情況看來，即十分之一的稅率也覺太重。上述兩作家佛勒齊和烏羅阿曾說，由銀礦發財的已屬罕見，由金礦發財的更為

罕見。這二十分之一似乎是智利、祕魯大部分金礦所支付的全部地租。金的走私比銀的走私容易得多，這不但由於和容積對比，金的價值高於銀的價值，而且由於金的固有狀態特殊。象大多數其他金屬那樣，銀在被發現時，一般攙有其他礦物，很少是純質，要把銀從這礦化物中分解出來，須經過極困難和極煩瑣的操作，而這種操作，要在特設的廠坊進行，這樣就容易受到國王官吏的監督。反之，金在被發現時，幾乎都是純質，有時發現相當大的純金塊，即使攙有幾乎看不出來的砂土及其他外附物，但通過極簡短的操作，也能使純金從這些混雜物分解出來。不論何人，只要持有少量水銀，就可在自己私宅中進行分解工作。所以，國王如果從報稅只得到很少的收入，那末他從金稅所得的收入可能要少得多，而地租在金價中所佔的部分，必定比它在銀價中所佔的部分小得多。

貴金屬能在市場出賣的最低價格，換言之，貴金屬長期在市場上所能交換的最小其他貨物量，要受決定一切其他貨物普通最低價格的原理的支配。決定這種最低價格的，是使貴金屬從礦裏走上市場通常所需投下的資本，換言之，是使貴金屬從礦裏走上市場通常所需消費的衣食住。這最低價格必須足夠償還所費的資本並提供這資本的普通利潤。

但貴金屬的最高價格似乎不取決於任何他物，而只取決於貴金屬本身的實際供給是不足還是豐裕。貴金屬的最高價格，不由任何其他貨物的最高價格決定，不象煤炭那樣，其價格由木柴的價格決定，除木柴外任何東西的缺乏都不能使煤炭價格上漲。把金的稀缺性增加到一定程度，那末最小一塊金可能變得比金鋼鑽還昂貴，並可能換得更大數量的其他貨物。

對貴金屬的需求，一半出於其效用，一半出於其美質。除鐵外，貴金屬也許比任何其他金屬有用。貴金屬容易保持清潔，而且不易生鏽，所以，食桌及廚房用具，如以金銀製造，更惹人喜愛。銀製的煮器比鋁製、銅製或錫制的煮器清潔。金制的煮器又比銀製的煮器清潔。不過，貴金屬的主要價值，在於它的美質，而這美質，使貴金屬特別適宜於作衣物和傢俱的裝飾。任何顏料或染料，都不能提供象鍍金那麼光亮的色彩。貴金屬的這種美質，又因貴金屬的稀少而大大增加。在大部分富人看來，富的娛悅，主要在於富的炫耀，而自己具有

別人求之不得的富裕的決定性標幟時，算是最大的炫耀。在他們看來，有幾分用處或有幾分美的物品，由於稀少而大大增加其價值，換句話說，由於收集相當數量的這種物品，需要有很大勞動量，而這麼大的勞動量的代價，只有他們才能支付，因而大大增加其價值。他們情願用比這種物品美麗得多、有用得多、但比較普通的物品的價格更高的價格來購買這種物品。效用、美麗和稀少這些特質，乃是貴金屬具有高價，即到處都能換得很大數量其他貨物的根本原因。貴金屬並不是由於用作貨幣而後具有高價值的，它在未用作貨幣以前，就已有高價值，而高價值正是使它適宜於作這種用途的特質。不過，這種用途，由於引起了新需求，由於減少了能被用於其他用途的數量，後來保持或增加了其價值。

對寶石的需求，全由美質而產生。寶石除作為裝飾物外，沒有其他效用。其美質的價值，因為稀少，即因為採掘困難和採掘費用浩大，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數場合，工資及利潤，幾乎佔寶石高價格的全部。地租在寶石價格中只佔極小部分，往往不佔任何部分，只產出力最大的礦山才提供相當大的地租。寶石商塔弗尼埃考察戈爾康達和維沙波爾兩地的金鋼石礦山時聽說，當地礦山是為着國王的利益而開採的，而國王曾命令，除產最大和最美的金鋼石的礦山外，其餘所有礦山一律封閉。在所有者看來，其餘所有礦山都是不值得開採的。

由於世界各地貴金屬及寶石的價格，都受世界上最豐富礦山產物價格的支配，所以貴金屬或寶石礦山給所有者所能提供的地租，不和其絕對產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相對產出力成比例，換言之，和它比同種類其他礦山優越的程度成比例。如果有新礦山發現，而這些新礦山之優於波託西礦山，正象波託西礦山之優於歐洲礦山一樣，那末，銀價就會下降得多，甚至波託西礦山也無經營價值。在西領西印度發現以前，歐洲最豐富礦山，也許已能對其所有者提供象秘魯最豐富礦山對其所有者所提供的那麼大的地租。就銀量說，當時雖較今日少得多，但當時由此所能換得的其他貨物量，可能與今日相同，而所有者當時所得分額所能換得的勞動量或商品量，也可能與今日相等。生產物和地租的價值，換言之，生產物和地租給公眾與礦主所提供的實際收入，今昔可能一樣。

貴金屬或寶石最豐富的礦山，對子世界財富，不能有多大的增加。因為這類產品的價值，主要來自其稀少。要是這類產品多了，其價值必然下落，這時，金銀餐具，及其他衣服傢俱的奢華裝飾物，就能以較前少的勞動量或商品量買入。這就是世界能得自金銀寶石之豐富的唯一利益。

就土地財產說，情況卻不如此。土地的生產物及地租這兩者的價值，不和其相對產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絕對產出力成比例。生產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總能供給一定人數的衣食住，而且，不論他主享有的比率如何，他總能因此支配相當的勞動，和支配這勞動所給他提供的商品。最貧瘠土地的價值，並不因近鄰有最肥沃土地而減少。反之，其價值卻常因此而增加。肥沃土地所養活的衆多的人口，給貧瘠土地的許多生產物提供了市場，而貧瘠土地的生產物，在能以自己產物維持自己的人民中，原是找不到市場的。

什麼東西增加了生產食物的土地的產出力，它就不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價值，而且也給許多其他土地的生產物創造了新的需求，從而使這些土地的價值也增加了。由於土地的改良，許多人都有自己消費不了的剩餘食物，因而對貴金屬和寶石有了需求，對於衣服、住宅、傢俱和設備方面其他一切便利品和裝飾品，也有了需求。食物不僅成為世界上財富的主要部分，而且使許多其他各種財貨具有主要價值的，乃是食物的豐富。當古巴和聖多明各剛被西班牙人發現時，那邊的窮苦居民，常以小金塊作為頭飾和服飾。他們對這些金塊的評價，似乎和我們對那些比一般略美的小鵝卵石的評價相同，就是說，值得拾取，但有人要時，卻不值得拒絕。他們對新客第一次請贈金塊，無不立即贈與，似乎並不認為贈送了新客非常珍貴的禮物。他們看到西班牙人那麼熱切地想獲得金塊，感到驚訝。他們沒有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國家，它的許多人民，對於他們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麼大的剩餘量，願意以足夠供養全家好幾年的大量食物，來交換小量會發亮的玩意兒。如果他們能夠理解此中理由，西班牙人的黃金熱，就不會使他們驚異了。

有時提供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生產物

這二者價值比例的變動

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糧食日益豐富，這必然會增加對一切能供實用及裝飾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產物的需求。所以，在改良進展過程中，可預期這兩種生產物的相對價值只有一種變動。就是說，和總能提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相比，有時提供地租有時不提供地租的生產物的價值不斷地增長。隨着技術和產業的發展，衣服居住材料、地中 useful 化石和礦物、以至貴金屬和寶石的需求題漸增加。它們所能換得的食物逐漸增多，換言之，其價格逐漸增高。因此，以上所說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數場合的情況，要是沒有特殊事故使這些物品中某些物品的供給增加得大大超過其需求的話，那就是這些物品在一切場合的情況。

例如，砂石礦的價值，必然隨其周圍地方改良的日益增大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增高；如果這石礦是鄰近一帶的唯一石礦，情況尤其如此。然而銀礦的價值，即使在周圍千哩以內沒有第二個銀礦，其價值也不一定隨礦山所在國的改良而增加。砂石礦產物的市場，很少擴到周圍數哩以外，而其需求，一般必和這小區域的改良與人口成比例。而銀礦產物的市場，卻可擴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方人口都增加，否則白銀的需求不會因銀礦附近某大國的改進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進，但若在這改進的過程中，發現了豐富得多的新礦山，那末儘管白銀的需求必然會增加，但由於銀的供給增加得那麼多，所以銀的真實價格可能逐漸低落。一定分量的白銀比如說一磅白銀所能支配或所能購買的勞動量，或者說一磅白銀所能換得的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即穀物的量，可能逐漸減少下去。

白銀的大市場，是有世界上有商業有文化的地方。

假若白銀市場的需求，由於一般的改反而增加，同時，供給卻不按同一比例而增加，那末，白銀的價值就會按照穀物的價值而逐漸增高起來。即一定分量白銀所能換得的穀物量將逐漸增加，或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將逐漸下降。

反之，如果由於某種意外事故，供給的增加，在好多年內，在比例上都大於需求的增加，那末這金屬就會逐漸低廉。換言之，儘管有了一切改良，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卻逐漸增高。

另一方面，假若這金屬的供給和其需求幾乎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這金屬就能繼續購買或交換幾乎相同數量的穀物。儘管有了一切改

良，穀物卻繼續保持着幾乎相同的平均貨幣價格。

這三者似乎包括了在改良進程中所能發生的事情的一切可能的組合。如果我們以法國和英國發生的事實來作判斷，那末在過去四世紀中，這三種不同的組合似乎都在歐洲市場上發生過，而發生的順序和我這裏所說的大約相同。

順便談談前四世紀銀價的變動

第一期

在1350年及前此數年間，英格蘭小麥一夸特的平均價格，大約都被估計為不低於陶衡銀四盎斯，陶衡銀四盎斯約合現今英幣二十先令。以後，似乎逐漸低落到二盎斯，約合現今英幣十先令。我們覺得，這一夸特十先令的價格，是十六世紀初葉估定的小麥價格，直到1570年，還為這麼多。

1305年，即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制定了所謂勞動法規。這法規在前言中大大非難傭工的橫霸，說他們不應要求僱主增加工資。所以，這法規規定：一切傭工及勞動者，此後應滿足於愛德華三世第二十年及前此四年通常領得的工資及配給（配給一詞，當時含有衣服及食料這二者），因此他們所得的配給小麥，無論何地，只以每蒲式耳十便士計算，而且，這配給，以小麥或貨幣交付，又須聽僱主選擇。每蒲式耳十便士，是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極普通的小麥價格，因為它需要由特殊法會來迫使傭工接受，以代替通常的配給口糧，而這價格，也被認為是前此十年即法令所指的愛德華三世第十六年的低廉價格。但愛德華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含有大約陶衡銀半盎斯，大約等於現今英幣半克郎。所以，與當時貨幣六先令八便士相當、又與今日貨幣二十先令相當的陶衡銀四盎斯，必定在當時被認為是小麥一夸特即八蒲式耳的普通價格。

關於被認為是當時穀物的普通價格，這法令所提供的證明，無疑地比歷史家及其他著述家記錄的某些年度的谷價好得多，因為他們所記，側重異常高昂或異常低廉的價格，所以想依此判斷當時的普通價格，實不容易。加之，我們還有別種理由可相信，十四世紀初及以前數年小麥的普通價格，不下於每夸特四盎斯，而其他各種穀物價格，也依此為準。

1309年，坎特布里的聖奧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長拉弗·得·波恩就任時，曾大擺筵席。關於這次筵席，威廉·桑恩記錄了食單及許多食物價格。計當時消費的，第一為小麥五十三夸特，價十九鎊，即每夸特六先令二便士，約合今幣二十一先令二便士；第二為麥芽五十六夸特，價十七鎊十先令，即每夸特六先令，約合今幣十八先令；第三為麥二十夸特，價四鎊，即每夸特四先令，約合今幣十二先令。在這場合，麥芽和燕麥價格，似乎高於它們和小麥的通常比價。

此等價格的記載，不是因為其異常高昂，也不是因為其異常低廉，而只是對這次大規模饗宴所消費大量穀物實際價格的偶然記載。

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即 1262年，恢復了所謂“麪包麥酒法定價格”這個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說，此法令系其祖先即往時英格蘭國王所制定。由此推斷，此法令，至少是亨利二世訂的或竟是諾爾曼征服時代訂的。此法令按照當時每夸特由一先令至二十先令的小麥價格，規定麪包價格。但是，可假定此種法令，諒必同樣仔細考慮到超過普通價格或不及普通價格的價格，所以在這假設下，含有陶衡銀六盎斯而相當於今幣三十先令的當時十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被視為一夸特小麥的普通價格，而且，直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還被認為是普通價格。因此，我們假定，那普通價格不少於法定最高麪包價格的三分之一，換言之，不少於含有陶衡銀四盎斯的當時貨幣六先令八便士，總不會大錯。

因此，根據這些事實，我們有相當理由作出這個結論：即在十四世紀中葉及以前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一夸特小麥的平均價格或普通價格，大概不會在陶衡銀四盎斯以下。

由大約十四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初，被認為是小麥的不高不低價格，換言之，小麥的普通或平均價格，似已逐漸減到這價格的一半，最後降到大約等於陶衡銀二盎斯，約合今幣十先令。一直到1570年，還被估定為這麼多。

在1512年諾薩伯蘭第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務記錄中，對於小麥價格，有二種不同的計算：其一，一夸特以六先令八便士計算；其二，一夸特僅只五先令八便士計算。在1512年，六先令八便士僅含有陶衡銀二盎斯，約合今幣十先令。

從許多法令看來，由愛德華三世第二十五年以至伊麗莎白在位初期這二百餘年的時間中，六先令八便士一直被認為是小麥的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亦即所謂不高不低的價格，然而，在這時期內，由於銀幣有一些變革，此名義金額中所含的銀量，卻在不斷減少。不過，銀價的增加，很足以補償含銀量的減少。所以，在立法當局看來，名義金額合銀量減少這種情況不值得注意。

1436年，立法當局規定，小麥價格如低落至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那就不經特許，亦可輸出。1463年又規定，小麥每夸特價格若未超過六先令八便士，那就禁止其輸入。立法當局認為，當麥價十分低的時候，任其輸出，亦無不便，但若麥價增高，則允許輸入是精明的措施。因此，當時含有今幣十三先令四便士那麼多銀的六先令八便士（其含銀量，比愛德華三世時代同一名義金額所含的銀量，已減少三分之一），就是當時所謂不高不低的小麥價格。

1554年，腓力普王及瑪利女王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法令，以及1558年，伊麗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令，同樣規定，在小麥一亨特價格超過六先令八便士時，禁止其輸出。當時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銀量，並不比現今同一名稱的金額多二便士。但不久就發覺，要到價格如此低落時纔不限制穀物輸出，這實是等於永遠禁止小麥輸出。於是，在伊麗莎白第五年，即1562年，又規定小麥價格若不超過每亨特十先令，就可隨時在指定的港口輸出。當時十先令和現今同一名稱的金額幾乎含有相等的銀量。所以，這六先令八便士的價格，當時被認為是所謂不高不低的小麥價格，這和上述亨利伯爵家務記錄所估計的價格，大抵相符。

法國的情形，亦與此相似，該國穀物平均價格，在十五世紀末葉及十六世紀初，比過去二世紀低廉得多。杜普雷·得·聖莫爾以及論穀物政策這篇論文的文章作家都這樣說。在同一時期，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谷價也許同樣下降了。

白銀和穀物相對價值的增高，也許全是因為供給繼續不變而需求則隨改良及耕作的進步而增加；也許全是因為，需求繼續不變而供給逐漸減少，當時世界上已發現的大部分銀礦，都已採掘將盡，因而費用大大增加；也許部分由於前一原因，部分由於後一原因。十五世紀末葉及十六世紀初，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局，比過去數世紀安定。這

安定性的增加，自然使產業發展和改良程度增高，而貴金屬及其他一切裝飾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自然隨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年產物加多，那末為流通這年產物，便需要有更多的鑄幣。富者人數增多，就需要有更多銀製器皿及其他銀製裝飾品。此外，認為當時以銀供給歐洲市場的大部分銀礦，可能採掘將盡，因而採掘起來費用更大，那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其中多數銀礦是從古羅馬時代起就開採的。

論述往時商品價格的作家，大部分都認為，自諾爾曼征服時代起，甚或從朱利阿·愷撒侵略時代起，直到美洲各礦山發現的時候止，銀的價值都在不斷減少。我想，這種見解的發生，一部分起因於他們對穀物及其他土地原生產物所作的觀察，另一部分則起因於一種通俗說法，說一切國家的銀量，自然而然地隨財富的增加而增加，其價值則自然而然地隨銀量的增加而跌落。

在觀察穀物價格時，以下三種情況似乎常使他們走入迷途：

第一，在古時，幾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實物支付，即以一定數量的穀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的。然而有時候地主卻規定，關於年地租，他可隨心所欲地要求佃戶以實物支付，或以代替實物的一定數額貨幣支付。象這樣以一定數額貨幣代替實物繳納的價格，在蘇格蘭稱為換算價格。因為在這場合，要實物和要代價的選擇權，總操在地主手中，所以，為佃戶的安全計，其換算價格，需要訂得比平均市價低，而不把它訂得比平均市價高。因此，許多地方的換算價格，都比平均市價的一半稍稍多些。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直到今日，對家禽還沿用這種換算辦法，有些地方，對牲畜還沿用這種換算辦法。要不是由於實施公定谷價制度而廢除換算辦法，那末，對穀物恐怕至今還會沿用這種辦法。所謂公定谷價，就是根據谷價公定委員會作出的判斷，每年依照各州實際市場價格，對各種類各不同品質穀物的平均價格所評定的價格。這一制度，在換算穀物地租時，都照當年的公定價格而不依據任何定價；所以，佃戶都得到充分保障，而地主亦覺得方便得多。但蒐集往年穀價的作家們，往往把蘇格蘭所謂換算價格，誤認為實際市場價格。弗利伍德有個時候，曾自認犯了此種錯誤。可是，由於他是為着某一特殊目的而從事著述，他把這種換算價格用了十五回以後，纔敢承認此種錯誤。那時換算價格系小麥每夸特八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這金額所含的銀量與今幣十六先令所含的

相同，但在他所研究的最後一年即 1562 年，這金額所含的銀量，則與現今同一名稱金額所含的銀量相同。

第二，某些關於法定價格的古代法令，有時由怠惰錄事潦草地抄寫，有時由立法當局潦草地訂定，這樣就使上述作家受到迷惑。

以前關於法定價格的法令，首先總是規定，在小麥和大麥價格最低時，麪包和麥酒應有的價格，接着規定，在這兩種穀物超過這最低價格時，麪包和麥酒應有的價格。然而，那些法令的抄寫者往往以為，抄所規定的頭三四個最低價格，就夠了，他們想借此節省自己的勞動，我想他們認為，這已足以表明，較高的價格應按什麼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麪包、麥酒公定價格法令中，麪包的價格就是按照一夸特小麥以當時的貨幣一先令到二十先令的不同的價格規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刻印法令彙編以前，一切法會集所根據的抄本，都沒有抄到十二先令以上的價格。因此，為這不完全抄本所貽誤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認為，每夸特六先令即大約等於今幣十八先令的普通價格，乃是當時小麥的一般價格或平均價格。

又如，約在同時制定的懲罰椅和頸手枷法令規定，麥酒的價格按大麥一夸特以二先令到四先令不等的價格每上升六便士調整一次。但是，這四先令的價格，並不被認為是大麥當時常達到的最高價格，而這些價格只是作為例子，來說明較高或較低價格應按這比例增減。這可以這法會最後的詞句：“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 看得出來。這詞句，雖欠精確，但意義卻夠明瞭。就是說：“這樣，麥酒價格，應隨大麥價格每六便士的升降而增減。”立法當局在制定這法令時，似乎象抄寫上述那條法令的人同樣疏忽。

蘇格蘭古律書的古抄本，載有公定價格的法合，其中麪包價格是根據小麥的所有不同價格調整的，這些價格從每波爾十便士到三先令不等，蘇格蘭-波爾約合英格蘭半夸特。在被認為是這法令制定的時候，蘇格蘭三便士約合現今英幣九先令。魯迭曼氏似乎依此斷定，三先令為當時小麥最高價格，十便士、一先令，至多二先令，則為其普通價格。但是，一參閱抄本，就很明白，那些價格，只是作為例子用來說明小麥和麪包所應有的比價的。這法令最後說：“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其餘，得按上面所提到的穀物價格加以判斷”。

第三，在遠古時代，小麥有時以極低價格出賣，這也使上述作家有所談解，他們認為，當時的小麥最低價格，既比後代的小麥最低價格低得多，那末其普通價格，亦必比後代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許發現，遠古時代的小麥最高價格，也比後代的小麥最高價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價格比近代的最低價格低得多。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一夸特小麥的兩種價格：共一為當時貨幣四鎊十六先令，合今幣十四鎊八先令；其二為當時貨幣六鎊八先令，合今幣十九鎊四先令。象這樣過高的價格，在十五世紀末葉或十六世紀初葉，都不會見到。雖然，穀物的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易於變動，但在動亂和無秩序的社會，變動得更為劇烈。在這樣的社會，商業和交通中斷，以致國內甲地的富饒，不能救濟乙地的貧乏。從十二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末葉，在普蘭塔日尼王室統治下紊亂的英國，一個地區，可能很富饒，而另一個相距不很遠的地區，可能由於季節災害或鄰近豪族侵入，毀壞莊稼，而陷於饑饉；如果有個敵對的貴族的領地介在這兩地區中間，那末前者就不能對後者有所援助。然而，在十五世紀後半葉和十六世紀，在都鐸王朝的強力統治下，沒有一個貴族強大得敢於擾亂社會秩序。

讀者在本章末尾，將會看到弗利伍德所蒐集的，從1202年到1597年（包括這二年在內）的小麥價格，他把這些價格換算為現時貨幣，並按照年代順序，每十二年分作一期，計共分為七期。各期的末尾，又記有該期十二年間的平均價格。弗利伍德對於這樣長時期，只能蒐集到八十年的價格，以致最後一期還差四個年度。因此我從伊頓學院的記載，補入了1598年、1599年、1600年及1601年的價格。我所增補的，只此四年。從此等數字，讀者可只看到，自十三世紀初葉一直到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每十二年的平均價格，都在逐漸下降，到十六世紀末期，又逐漸上升。弗利伍德所蒐集的價格，似乎主要是惹人注意的過高價格或過低價格，所以，我不敢斷言，由他這些價格能得出很確當的結論。但是，這些價格，要是能證明什麼的話，那末所證明的就是我所要闡明的了。可是，弗利伍德自己，象大多數其他作家，似乎都相信，銀價在此期間，由於銀產量日益豐饒而不斷減低。他所蒐

集的穀物價格，確和此種意見不一致，而和杜不雷·聖·莫爾的見解，和我所努力說明的那種見解卻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聖·莫爾這兩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誠誠懇懇地蒐集往時的各種物價。他們兩人的意見，雖是那麼不相同，而他們兩人所蒐集的事實，至少就穀物價格說，是那麼一致，這不免令人感到幾分奇異。

然而，最有見識的作家所據以推斷遠古時代銀的巨大價值的，與其說是穀物的低廉價格，倒不如說是其他許多土地原生產物的低廉價格。據說，穀物是一種製造品，在未開化時代，穀物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貴得多。我想，所謂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獵物那一類非製造品。此等物品，在貧困和野蠻時代，無疑比穀物低廉得多。但這低廉，不是銀價過高的結果，而是這些商品價值低的結果。這不是因為白銀在那時代能購入或代表比富裕和進步時代更多的勞動量，而是因為在那時代，此等商品購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勞動量。白銀在西屬美洲必然比歐洲低廉，即在產出國必然比輸入國低廉，因為要耗去運費和保險費，由水陸長途運輸。但是烏羅阿卻告訴我們，不久從前，在阿根廷首都，從四百頭牛中挑一頭，價格僅二十一便士半。拜倫告訴我們，在智利首都，良馬一匹的價格為英幣十六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區域又全未開墾的國家，家禽、牲畜和獵物都不難由極少量勞動獲得，因此它們所能購買的勞動極為有限。此等商品在那裏只能從低廉的貨幣價格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證明那邊白銀的真實價值很高，只證明那邊此等商品的真實價值很低。

白銀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個商品或任何一類商品，而是勞動。這一點我們應當隨時牢記。

在土地幾乎荒蕪或人口稀少的國家，自然生產的家禽、牲畜和各種獵物，往往比居民所須消費的多得多。在這種狀態下，供給通常超過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會狀態，在不同的改良階段，此等商品便代表極不相同的勞動量，或等於極不相同的勞動量。

無論在什麼社會狀態下，無論在什麼改良階段中，穀物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但各種勞動的平均產量，大體上總是和其平均消費量相適應，就是說，平均供給，大體上總是和其平均需求相適應。而且，無論在什麼改良階段，在同一土壤同一氣候中，生產同一數量的穀物，平均地說，需要花幾乎相同的勞動量，或者說，需要花幾乎等量

的代價，因為，在耕作改良的狀態下，勞動生產力的不斷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農具價格的不斷增加所抵消，我們根據這些，可以確信：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在一切改良階段中，等量穀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產物，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換等量勞動。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在前面說過，在財富和改良的不同階段中，穀物是比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更正確的價值尺度。因此，在上述不同階段，我們以穀物與銀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個或一種商品與銀相比，更能正確判定銀的真實價值。

加之，穀物或其他為人民一般愛好的植物性食物，在各個文明國家，都是勞動者生活資料的主要部分。農業擴大的結果，各國土地所生產的植物性食物，此動物性食物多得多，而勞動者到處都從最低廉和最豐饒的適合衛生的食物為主要生活資料。除了最繁榮的國家，或勞動報酬非常昂貴的地方，在勞動者生活資料中，家畜肉不過佔極小部分，家禽佔更小的部分，獵物不佔任何部分。在法國，甚至在勞動報酬較法國略高的蘇格蘭，勞動貧民，如非到了佳節或其他特殊場合，就很少嚐到肉味。因此，勞動的貨幣價格，在很小程度上，取決於家畜肉或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平均貨幣價格，而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穀物即勞動者主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貨幣價格。所以，金銀的真實價值，換言之，金銀所能購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在極小程度上取決於金銀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產物量，而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金銀所能購入的穀物量。

然而，上述不仔細的觀察，也許不會使那麼多聰明作家陷於迷途，要不是他們同時受到以下一個俗見的影響，即由於各國的銀量自然隨着財富的增加而增加，所以銀的價值隨銀量的增加而減少。但是，這種見解，毫無根據。

任何一個國家貴金屬數量增加的原因有二：其一，供給貴金屬的礦山的產額的增加；其二，人民財富的增加，即勞動年產物的增加。前一原因，無疑地和貴金屬價值的減少有關，但後一原因，卻與其價值的減少無關。

隨着更豐饒礦山的發現，就有更大數量的貴金屬提供市場，而較大數量貴金屬所要交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數量上如果和從前一樣，那末同一數量金屬所換得的商品量必定比從前少。所以，一國

貴金屬量的增加，要是起因於礦山產額的增加，那就必然使貴金屬的價值有所減少。

反之，在一國財富增加時，換言之，在該國勞動年產物逐漸增大時，這更大量商品的流通，就需要有更大量的通貨。而人民有了更大數量的商品來交換金銀器皿，買得起金銀器皿，自然會購買越來越多的金銀器皿。他們的通貨量，由於必要而增加，他們的金銀器皿量，由於追求虛榮和浮華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繪畫及其他各種奢侈品和珍奇品，由於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雕刻家和畫家在富裕繁榮時所獲報酬，不可能比貧乏不景氣時低，因此金銀在富裕繁榮時的價格，不可能比貧乏不景氣時低。

如果更豐饒新礦的偶然發現，並不使金銀價格下落，那末，由於各國的金銀價格自隨各國財富的增進而上升，所以，不論礦山的狀態如何，金銀在富國的價格，自然總比貧國的價格高。金銀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樣，目要尋找最好價格的市場，而對一切貨物都付得起最好價格的國家，通常就是能對金銀支付最好價格的國家。必須記住，對於一切貨物所支付的代價，歸根到底不外乎勞動。在勞動都得到同樣良好報酬的國家，勞動的貨幣價格，與勞動者生活資料的貨幣價格成比例。然而，金銀在富國所能交換的生活資料，自然比貧國多，換言之，金銀在生活資料豐饒的國家所換得的生活資料，自比生活資料的供給比較惡劣的國家所能換得的多。這兩個國家要是相隔很遠，其差異便很大，因為金銀雖自然而然地由壞市場流入好市場，但由於距離很遠，很難輸送巨大數量金銀，使兩個國家金銀的價格，接近於一個水平。這兩個國家要是很靠近，那末由於運輸容易，上述差額便較小，有時甚至看不出來。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富裕得多，而中國和歐洲生活資料的價格，大相懸殊。中國的米價比歐洲各地的小麥價格低廉得多。英格蘭比蘇格蘭富裕得多，但此兩地小麥價格的差異，卻少得多，只不過看得出有些差別。就數量說，蘇格蘭產的小麥價格，一般似乎比英格蘭產的低廉得多，然就品質說，其價格卻肯定比英格蘭產的要高些。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得到大量的供給。不論何種物品，其價格在輸入國通常總是比輸出國高些。因此，英格蘭小麥，在蘇格蘭售得的價格，必然比英格蘭高。可是，就品質，即就小麥所

能製成的麪粉或飯盒的量和質說，英格蘭小麥一般不能只比蘇格蘭小麥高的價格在蘇格蘭市場上出售。

就生活資料價格說，中國與歐洲有很大差異，而就勞動貨幣價格說，則有更大的差異。這是因為歐洲大部分處在改良進步狀態，而中國似乎處在停滯狀態，所以，勞動在歐洲的真實報酬比中國高。英格蘭勞動的貨幣價格，比蘇格蘭勞動的貨幣價格高，因為後者雖在不斷進步，但不象前者那麼快，所以，其勞動的真實報酬也低得多。蘇格蘭人民很多移住外國，而英格蘭人民卻很少遷移，這足以證明，這兩地的勞動需求有很大的差別。必須記住，不同國家不同真實勞動報酬的比例，不受各該國實際貧富程度的支配，而受各該國進步、退步或停滯等狀態的支配。

在最富裕民族間，金銀自然有最大價值，而在最貧乏民族間，自然只有最小價值。在最貧乏的未開化民族間，金銀幾乎沒有價值。

穀物在大都市總是比僻遠地方昂貴。但這昂貴，不是銀價實際低廉的結果，而是穀物實際昂貴的結果。把銀運往大都市，所需要的勞動量並不比運往僻遠地方少，而把穀物運往大都市卻需要多得多的勞動量。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業國，如荷蘭及熱那亞地區，其穀物價格的高與大都市穀物價格的高屬於同一原因。它們不能生產足夠維持其居民的穀物。它們富於技術工人和製造工人的勤勉與熟練，富於簡化勞動和節省勞動的各種機器，富於運輸船舶，而且富於其他一切運輸工具和商業手段。然而，它們缺乏穀物，它們所需要的穀物必須從遙遠國家輸入，所以其價格，須附加自這些國家運來的費用。把白銀運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勞動量並不比運往但澤少，但把穀物運往阿姆斯特丹，卻需要多得多的勞動量。總之，白銀的真實成本，在兩地必定幾乎相同，穀物的真實成本，在兩地卻大相懸殊。現在假定荷蘭或熱那亞居民數目照舊，而它們的真實富裕程度減低了，從遙遠國家輸入穀物的能力也減低了，那末，伴隨着這種衰退而來的必然是銀量的減少，銀量的減少或者是衰退的原因，或者是衰退的結果，但穀物的價格，不但不會隨銀量的減少而下降，反而會上升到饑年的價格。當我們缺少必需品時我們必定放棄一切不必要物品。不必要物品的價值，在貧窮困苦時期下降，正如它在富裕繁榮時期上升那樣。必需品的價

況與此不同。必需品的真實價格，即它們能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在貧窮困苦時期上升，在富裕繁榮時期下降。富裕繁榮時期，總是物資非常豐富的時期，否則就不能說是富裕繁榮時期。穀物是必需品，而白銀只是不必要物品。

因此，在十四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中葉這段時期內，由於財富增進和改良發展而引起的貴金屬數量的增大，不論其增大程度如何，它對不列顛或歐洲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發生減少貴金屬價值的傾向。所以，蒐集往時穀物價格的作家，要是根據對穀物或其他物品價格的觀察，沒有理由推斷這個時期裏白銀的價值減低了，那末他們就更沒有理由，根據想象中財富的增進和改良的發展來推斷這期間白銀價值的減低。

第二期

不管各學者對於第一期銀價變動的意見，是那麼不相同，他們對於第二期銀價變動的意見，卻相同。

在從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這大約七十年的時期裏，白銀價值和穀物價值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變動。這期間，銀的真實價值下降了，換言之，它所能換得的勞動量，比從前少；穀物的名義價格上升了，從前售價是每夸特二盎斯銀，約合今幣十先令，這時售價是每夸特六盤斯或八盎斯銀，約合今幣三十先令或四十先令。

美洲豐饒礦山的發現，似乎是這時期銀對穀物的比價減低的唯一原因。對於此種變動，大家都作同樣的說明，關於銀的比價下降這一事實及其原因，從未發生爭執。在這一時期，大部分歐洲在產業和改良上，都看着進展，而對銀的需求，因此必然增加。但是，供給的增加，大大超過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銀價大大低落。應當注意，美洲銀礦的發現，對英格蘭的物價，似未曾有顯著影響，直到1570年從後，纔有影響。儘管波託西銀礦已發現二十多年了，但對英格蘭物價還無影響。

根據伊頓學院的記錄，從1595年到1620年并包括1595年和1620年在內，溫莎市場上，最好小麥一夸特或九蒲式耳的平均價格為二鎊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從這金額略去零數，再減去全額的九分之一，即減去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那末一夸特或八蒲式耳的價格為一鎊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從這金額同樣略去零數，再由余

下的金額，減除九分之一成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即最好小麥與中等小麥這二者價格之差，那末中等小麥價格，約為一鎊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三便士，約合報六盎斯又一盎斯的三分之一。

又據同一記錄，從1621年到1636年，在同一市場上，同一衡量的最好小麥的平均價格，約為二鎊十先令。從這金額按上述扣除，那末一夸特或八蒲式耳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為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約合銀七又三分之一盎斯。

第三期

美洲礦山發現所招致的銀價低落，似乎到1630年與1640年之間或在1636年左右，已告停止，而與谷價比較，銀價的低落那時候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到了現世紀，銀價多少趨於上升，這上升的趨勢，或許在前世紀從前即已開始。

據上述記錄，從1637年到1700年，即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麥，平均價格似為二鎊十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這平均價格，比十六年前的平均價格，僅高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但在這六十年間，發生了兩個事件，以致當時穀物的缺乏，遠遠超過收成情況所造成的程度。單單這兩個事件，就夠說明穀物價格這時稍稍昂貴的原因，而無須設想銀價有進一步的下跌。

第一個事件是內亂。內亂阻害耕作，妨礙商業。其結果，穀物價格的騰貴大大超過了當時收成情況所造成的程度。內亂的這個影響，普及到不列顛一切市場，而穀物須仰給於僻遠地方的倫敦市場所受影響尤巨。所以，據上述記錄，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最好小麥一夸特，價格在1648年為四鎊五先令，次年為四鎊。這兩年穀物的價格，超過二鎊十先令（1637年前十六年的平均價格），計達三鎊五先令。要是把它在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中攤分，那就很夠說明當時谷價為什麼稍稍騰貴。此兩年度的價格，雖屬最高價格，但內亂引起的高價格，無疑不只是這些。

第二件事，是1688年頒佈的穀物輸出獎勵法令。據一般人設想，這種獎勵金，由於促進耕作，經過長久的歲月，大概總會增加穀物的產量，使國內市場上的谷價因此趨於便宜。獎勵金究能在什麼程度上，增加穀物生產，減低谷物價格，我要在後面討論，現在所要說

的，只是1688年到1700年間，並不曾發生這個效果。在這個短期中，獎勵金的唯一效果是，因為獎勵每年剩餘量的輸出，曾使前一年度的豐產，不能彌補後一年的歉收，所以反擡高了國內市場上的穀物價格。從1693年到1699年間，英格蘭普遍感到的穀物缺乏，雖主要起因於當時天時不良，因此不是英格蘭所特有的現象，而是歐洲大部分所共有的現象，但我們應當知道，獎勵金的頒發，確曾在英格蘭增加穀物缺乏的程度。所以，1699年，有九個月時間禁止穀物輸出。

在上述兩件事發生的時候，還發生了第三件事，這件事雖不會引起穀物的缺乏，也不會增多通常對穀物所實際支付的銀量，但穀物價格的名義金額，卻必然會因此增大若干。這種事件，即銀幣的削剪磨毀，使銀幣價值大大低落。此種惡劣行為，始於查理二世時代，從後繼續發展，一直到1695年。據朗迪斯所述：當時通用銀幣的價值，比其標準價值平均約低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代表一切商品市場價格的名義金額，與其說受標準銀幣應含銀量的支配，無寧說受銀幣實含銀量的支配。所以，這名義金額，在鑄幣因削剪磨毀而價值低減的場合，比較在鑄幣接近標準價值的場合，非較大不可。

在本世紀，銀幣低減至標準重量從下的程度，當從目下為最。不過，銀幣的磨損雖很大，其價值卻因它能與金幣兌換，而為金幣價值所維持住了。在晚近金幣改鑄以前，金幣雖磨損了不少，然沒有銀幣磨損那麼厲害。反之，在1695年，銀幣的價值，並沒有得到金幣維持；金幣一幾尼，當時通常可換削損了的銀幣三十先令。晚近金幣改鑄以前，銀塊價格，每盎斯很少能值五先令七便士以上，這價格只比造幣廠價格高五便士。但1695年，銀塊普通價格，卻為每盎斯六先令五便士，即超過造幣廠價格十五便士。所以，就是在晚近金幣改鑄以前，金銀兩種鑄幣和銀塊比較，其低於標準價值的程度，至多不過百分之八。反之，在1695年，據說鑄幣卻低於標準價值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本世紀初葉，換言之，在威廉王進行大改鑄之後，大部分通用銀幣，一定比今日銀幣更接近其標準重量。本世紀中，沒有發生一種象內亂那樣阻害耕作妨礙商業的大災厄。採行將近數十年的穀物輸出獎勵制度，雖必定把穀物價格擡高，超過按照那時實際耕作情況本來會有的價格，但因為這種獎勵金在本世紀已有充分時間，產出一般人們所期待的好結果，即促進農耕和增加國內市場上的穀物量。所

只，就我們後面將要說明的那種學理說來，它在一方面雖產生稍稍擡高物價的效果，同時在另一方面，卻也不見得不會產生稍稍減低物價的效果。許多人還以為，減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所以，根據伊頓學院的記錄，在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期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麥，平均價格計為二鎊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這價格比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期間的平均價格，約低十先令八便士，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比1636年以前十六年期間（那時候美洲豐富礦山發現的影響，可以認為已經充分發揮）的平均價格，約低九先令六便士；比1620年以前二十六年期間（那時候美洲礦山發現的影響，尚未充分發揮）的平均價格，約低一先令。據上所述，則在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中，中等小麥的平均價格，由八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約為三十二先令。

由此可知，在本世紀中，和穀物價格相比，銀價似乎稍稍上升，但這上升的趨勢，也許於前世紀終結以前即已開始。

1687年，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麥，價格計為一鎊五先令二便士。這價格，是1595年以來的最低價格。

格里戈裏·金，是一位通曉此種事情的有名學者。1688年，他推算的結果，認為在一般豐年，小麥的平均生產者價格，為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即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據我所知，所謂生產者價格，有時又稱為契約價格，即農民簽訂契約，規定在一定年限內，供給商人一定數量穀物時所定的價格。因為這契約，使農民可以省去上市議價的費用和麻煩，所以，契約價格通常比一般認為的平均市價低。金氏判定當時一般豐年的普通契約價格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據我所知，在最近連年天時不佳穀物缺乏的時期以前，這種價格，確是一般年歲的普通契約價格。

1688年，議會通過設置獎勵金，獎勵穀物的輸出。當時鄉紳在立法機關所佔席數，較現今為多。他們感到穀物的貨幣價格在暖漸下落。獎勵金是以人為力量，使這價格擡高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位時代那種程度的權宜辦法，所以，在谷價每夸特漲到四十八先令以前，要繼續發給。這個價格，與金氏在同年推定的一般年歲的生產者價格相比，約高二十先令，即約高七分之五。假使金氏的計算，確有幾分值得它那時候所博得的普遍讚揚的話，那末，當時除了極歉收的年度，

每夸特四十八先令的價格，就只有藉助於獎勵金那一類人爲手段，否則絕無實現可能。不過，當時威廉王政府的實力，尚未鞏固，正在懇求鄉紳制定年土地稅。政府方面既有所求於鄉紳，對於鄉紳們的建議便只好採納了。

由此可見，在前世紀結束以前，銀價和谷價相比大抵已擡高若干了，到了本世紀，這上升趨勢，雖由於獎勵金的必然作用，不能按照當時的實際耕作情形而大大顯著起來，但銀價大體上仍繼續上升。

在豐年時候，獎勵金由於促進穀物的輸出，當然會使谷價特別昂貴，超過本來會有的數目。但獎金制度最明顯的目的，卻也就是在最豐收的年度，仍要設法使谷價提高，以獎勵耕作。

不錯，在穀物大缺乏的年度，獎勵金大抵停發。但是，在這種年度內，仍有許多年數的谷價，不免蒙受獎勵金制度的影響。豐年穀物，既由獎勵金誘起了異常的輸出，所以，以甲年豐收補救乙年不足的調劑作用，就無從施展了。

總之，獎勵金不論在豐年或在歉歲，都會使谷價擡高，超過按照實際耕作情況所本來會有的價格。這樣說來，假使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穀物平均價格，比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期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低，那末，要是在同一耕作狀態下，沒有獎勵金的作用，那就一定會低得多了。

但是，也許有人說，沒有獎勵金的促進，耕作狀態或許就有所不同。獎勵金制度對於一國農業究有何種影響，我要在後面專門討論獎勵金的時候說明。在這裏，我只打算論談銀價和谷價相比升漲更多這一事實，並不單是英格蘭特有的現象。這現象，在同一時期且以幾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國發生。這事實，曾經三位非常忠實、勤勉而辛苦的谷價研究者社普雷·德·聖莫爾先生、麥桑斯先生和穀物政策論著者所承認。

但法國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穀物輸出。我們很難設想，幾乎相同於發生在一個禁止穀物輸出國家的價格下降現象，在另一個國家卻歸因於獎勵穀物輸出。

大概，穀物平均貨幣價格上這種變動，與其認爲是穀物真實價值下落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歐洲市場上銀的真實價值漸趨騰貴的結果。前面說過，穀物在相當長時期內，和銀或任何其他商品比較，是更正

確的價值尺度。美洲各豐饒礦山發現後，穀物的貨幣價格，比從前騰貴了三倍乃至四倍。當時這種變動的原因，一般人都以為不是穀物真實價值騰貴，而是銀的真實價格下落。所以，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的穀物平均價格，如果比前世紀大部分年度的穀物平均價格低廉，我們應該同樣說，這變動的原因，不是穀物真實價值下落，而是銀的真實價值上升。

過去十年乃至十二年間高昂的谷價，曾使人猜疑，歐洲市場上白銀的真實價值還會繼續下落。但這種高昂的谷價，分明是天時異常不順的結果，是偶發的暫時的故事，不是恆久的事。在最近十年乃至十二年間，歐洲大部分，都苦於天時不良。加以波蘭發生擾亂，許多在谷價高昂年度須仰賴波蘭供給的國家，於是益陷於穀物缺乏的苦境。象這樣長期的天時不順，雖不是很尋常的事，但也決不是特殊希奇的事。曾研究過去谷價的人，都不難舉出同種類似的其他若干實例。此外，異常荒歉的十年，比異常豐收的十年，並不是更為稀奇的現象。從1741年到1750年的谷價低廉，與最近八年乃至十年間的谷價高昂正好是一個對照。據伊顧學院的記錄，1741年到1750年間，溫莎市場上，由九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的最好小麥，平均價格僅為一鎊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這比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的平均價格，約低廉六先令三便士。依此推斷，在這十年間，由八蒲式耳組成的一夸特的中等小麥，平均價格就僅為一鎊六先令八便士了。

但是，1741年與1750年間的穀物價格，一定是由於有獎勵金的緣故，纔沒有在國內市場上按自然的趨勢下落。據海關統計，這十年間所輸出的各種穀物的數量，竟達到八百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一蒲式耳。為此而支付的獎勵金達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二鎊十七先令四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蘭，在下院陳述，前三年中，穀物輸出獎勵金一項支出了極巨大的金額。他所說，有很正當的理由。但如在次年，則更有充分理由。因為單是這一年，付出的獎勵金就達到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六先令六便士。這種強制的輸出，必曾使國內市場上的谷價，升漲到超過沒有獎勵金時所會有的價格，至於超過多少，無須說明。

在本章所附的統計表之末，讀者可以看到，那十年的統計，是和其他各年的統計分開的。此外，也可看到前此十年的統計。這十年的

平均數，雖同樣在本世紀最初六十四年的總平均數以下，但低得不多。但1740年，實是異常歉收的年度。1750年以前那二十年間，和1770年以前那二十年，恰好是一個對照。前者雖夾有一二昂貴年度，但顯然比本世紀的總平均數低得多，後者雖夾有一二低廉年度（例如1759年），但顯然比總平均數高得多。假使前者低於總平均數以下的程度，不如後者超過總平均數以上的程度，其原因，自應歸於獎勵金制度。況且，這變動顯然很急激，非緩慢漸進的銀價變動所能解釋。結果的急激，只能由動作急激的原因來說明。那就是天時的意外變動。

不列顛的勞動貨幣價格，在本世紀中，確是上升了。但這種上升，不是歐洲市場上銀價減低的結果，而是不列顛普通繁榮因而對勞動的需求增加的結果。法國的繁榮程度，不及英國，目前世紀中葉以來，該國勞動的貨幣價格，隨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日漸低落。在前世紀乃至本世紀中，法國普通勞動一日的工資，幾乎始終如一地等於小麥一塞蒂埃的平均價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約為四溫切斯特衡蒲式耳。前面說過，不列顛勞動的實際報酬，換言之，付給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實際量，在本世紀中，已着着增加。其貨物價格的上升，似乎不是由於歐洲一般市場上銀價的跌落，而是由於不列顛有特殊的好景況，使該國特殊市場上勞動的實際價格上升。

在美洲發現以後，在一段時期中，白銀在歐洲市場上，依舊是以原來的價格或不大低於原來的價格出賣。因而，這一期間的礦業利潤，非常可觀，大大超過自然水平。但此後不久，以銀輸入歐洲的人，漸漸發覺了，輸入額不能全部以這高價售出。銀所能交換的貨物量，逐漸減少。銀的價格，逐漸落至自然價格的限度。換言之，銀的價格，僅夠按照自然率支付其上市所須支給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及土地地租了。前面說過，祕魯大部分銀礦都須付西班牙國王所課等於總產額十分之一的賦稅。於是，使土地的地租，全無着落。這種賦稅，最初為總產額之半，不久即減低至三分之一，接着又減至五分之一，最後為十分之一，一直繼續到現在，在祕魯大部分銀礦中，這似乎就是償卻開礦家資本及支付其普通利潤後所剩下的全部了。開礦家的利潤，曾有一度非常高，但現今卻低落到僅足使他繼續開採了。這事實，是一般所承認的。

西班牙國王對於祕魯銀礦所課的礦稅，在 1504 年，減為等於登記的銀的五分之一。該年即 1545 年波託西銀礦發現之前四十一年。在九十年中，即在 1636 年以前，這些對西班牙國王納稅的美洲最豐饒礦山，有足夠時間，充分發揮影響，使歐洲市場上的銀價，降低到無可再低的限度。九十年是一個足夠長的時間，使任何非獨佔商品的價格，都要降落到其自然價格，或者說，降落到在它繼續繳納特種賦稅的場合下仍能長期間繼續出售的最低價格。

歐洲市場上的銀價，本有可能進一步跌落，使得稅率，也許不但必須減低至十分之一，象 1736 年那樣，而且還必須象金稅一樣，減低至二十分之一，甚至使得現今尚繼續開採的大部分美洲礦山，有停止開採之必要。這些情況之所以沒有發生，是由於銀的需求亦在逐漸增加，美洲銀礦出產物的市場亦在逐漸擴大，不僅維持住了歐洲市場上的銀價，而且還把銀價擡高到稍稍超過前世紀中葉的水平。

自美洲發現以來，一直到現今，其銀礦出產物的市場，都在逐漸擴大。

第一，歐洲市場已逐漸擴大。美洲發現後，歐洲大部分都有很大進步。英格蘭，荷蘭，法蘭西，德意志，瑞典，丹麥，甚至俄羅斯，都在農業及製造業上着着向前發展。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它的沒落，是在祕魯被征服以前，此後，則漸有起色。西班牙及葡萄牙，據說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佔歐洲的極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沒有達到一般想象的程度。在十六世紀初葉，西班牙即與法國比較，也是一個極貧窮的國家。法國從那時以來已有很大改進。所以，常常巡遊這兩國的查現五世，曾有這樣有名的評語：在法國一切物資都是豐富的，但在西班牙一切物資都是缺乏的。歐洲農業和製造業的生產額既然增大了，其流通所需的銀幣量自須逐漸增加；富翁的人數，既然加多了，銀製器皿和銀製飾物的數量，也必須逐漸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這地方農業、工業及人口的進步，比歐洲最繁榮國家也快得多，因此對銀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英領殖民地，完全是一個新市場。那裏，以前一向對銀沒有需求，規則一部分因為鑄幣，一部分因打製器皿，而不斷增大銀的需求了。大部分西班牙領和葡萄牙領殖民地，也全為新市場。新格倫納達、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歐洲人發現以前，其

居民純為不知工藝不知農業的野蠻民族。可是，他們到現在，大部分都有了相當的工藝與農業了。墨西哥與祕魯兩國，雖不能全然視為新市場，但確是比過去擴大了的市場。記述這兩國古代壯麗狀態的奇異故事，不論如何掩飾誇張，凡讀它們的發現史及征服史的人，只要具有沉着的眼光，就會看出，當時居民在農工商業上比今日烏克蘭的韃靼人更為無知。即兩國中比較進步的祕魯人，也只知道以金銀作裝飾品，而不知鑄金銀為貨幣。他們的商業，完全以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所以，幾乎沒有分工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同時不得不建築自己的住宅，製造自己的傢俱、衣物、鞋及農具等。他們之間，雖有若干工匠，但是據說都是由君王貴族僧侶維持的，實際上恐怕就是這般人的僕役或奴隸。墨西哥和祕魯所有的古代工藝，從來沒有以任何製造品供給過歐洲市場。西班牙的軍隊，不過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二百五十人，卻幾乎到處覺得不易獲得食物。據說這般軍人足跡所至，就連人口極稠密、耕作極發達的地方，也常常發生饑荒。這種事實足以證明，記述這些國家人口稠密、耕作發達的故事，大部分是虛構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統治方式，在許多方面沒有象英國殖民地那樣有利於農業的發展、技術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長，但西班牙殖民地在所有這幾方面，卻比歐洲任何國家都進步得快。其原因是土壤肥沃、氣候宜人，以及土地廣大低廉。這是一切新殖民地共有的優點。有了這些優點，就足以補償其政治上的許多缺點。弗雷齊埃曾於1713年觀光祕魯，他說，利馬市人口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但1740年到1746年間，居住此地的烏洛阿卻說，這市人口超過了五萬。這兩位著者，關於智利及祕魯其他許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計算的差異，與此略同。他們兩人報告的正確，是無可置疑的。其計算的差異，正可表示當地人口的增加，並不遜於英領殖民地。總之，這一切，都表明美洲即是該地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那裏對於白銀的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歐洲最繁榮國家還快得多。

第三，東印度為美洲銀礦產物的另一市場。自這些礦山開採以來，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日有增加。從這時起，依賴亞卡普科船舶而進行的美洲和東印度間的直接貿易，繼續增大，而同時經由歐洲的間接交易，增加得尤其多。十六世紀中，與東印度進行正規貿易的歐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同世紀末，荷蘭人起來競爭。不及數年，就把葡萄牙人趕走，使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前世紀

的大部分時間，東印度貿易的最大部分，由這兩國分佔。葡萄牙人貿易日見衰退，而荷蘭人的貿易，卻以比這衰退更快的速度不斷增長。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前世紀即與印度進行交易，到這一世紀，他們間的貿易大大擴大了。瑞典人及丹麥人的東印度貿易，開始於本世紀。俄羅斯人，最近也組織所謂商隊，取道西伯利亞及韃靼，徑赴北京，與中國進行正規的交易。總之，除法國東方貿易因最近的戰爭而被毀滅了以外，其餘各國對東方的貿易，幾乎無不在繼續擴大。歐洲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日益增多。其消費額之大，似乎曾使印度各種業務逐漸增大。例如，十六世紀中葉以前，歐洲用茶，極其有限，不過把它用作藥品。然而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本國國民當作飲料而輸入的，每年計達一百五十萬磅。但這還不夠滿足需要，又由荷蘭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不斷祕密輸入。而且，在法國東印度公司繁榮時代，又常由法國海岸祕密輸入。此外，對於中國的瓷器，馬魯古羣島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無數貨物，歐洲的消費額也只幾乎同樣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在東印度貿易上的船舶說，前世紀任何時候全歐洲所用的船舶，比最近航運銳減，以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以噸數計，怕多不了許多。

但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錢的價值，卻比歐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此種差別，是因前者多為產米國，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穫兩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穫的產量，又比小麥普通的收穫多。所以，產米國與產麥國比較，即使面積相同，產米國的糧食，亦必較更為豐富。這些國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這些國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浪費不了的大量剩餘，可以出賣，於是掌握着可購買多得多的他人勞動量的手段。因此，徵之任何記載，中國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歐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隸役。而且，這些大官富豪，持有過剩食物，於是能夠支付較大數量的糧食來交換那些產額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競求的金銀寶石。所以，供給印度市場的銀礦，和供給歐洲市場的銀礦相比，即使同樣豐饒，其產物在印度所能換得的糧食，亦必較多。可是，以貴金屬供給印度市場的礦山，似乎遠較以貴金屬供給歐洲市場的礦山貧瘠，而以寶石供給印度市場的礦山，卻遠較以寶石供給歐洲市場的礦山豐饒，所以，貴金屬在印度，自然比在歐洲能換得更多的寶石，並能換得多得多的糧食。象金剛石那樣非必要物品，其貨幣價格，在印度比在歐

洲要低些，而象糧食這樣最重要必需品的貨幣價格，在印度要比在歐洲低得多。但前面說過，在中國和印度斯坦這兩個印度大市場，勞動的真實價格，即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量，卻不如歐洲勞動者。這些勞動者的工資，因此只能購到較少量的食物，食物在印度既比歐洲低廉，所以，與歐洲比較，印度勞動的貨幣價格，就加倍低廉，因為一方面它只能購到少量的糧食，一方面糧食的價格又便宜。在技術相同勤勞相同的場合，各國製造品，必有大部分的貨幣價格，與其勞動的貨幣價格成比例。中國和印度斯坦製造業上的技術和勤勞，雖不及歐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遠。它們勞動的貨幣價格，既如此低廉，其製造品的貨幣價格，自然要比歐洲任何地方低。加之，歐洲大部分地方輸送貨物，多由陸運。先把原料由產地運往製造所，再由製造所運往市場，其間所消費的勞動既多，製造品的真實價格及名義價格，就因而增大。反之，在中國和印度斯坦，則因內地河港縱橫，貨物常由水運。所需運費，既較歐洲為少，其大部分製造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就更加降低。綜合這些理由，貴金屬由歐洲運往印度，從前極有利，現今仍極有利。在印度能夠獲得好價的物品，沒有什麼能與貴金屬相比擬，就是說，在歐洲產製花費一定數量的勞動和商品的商品，沒有一個在印度能比貴金屬換得更多數量的勞動和商品。貴金屬中，以金運往印度，又不如以銀運往印度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亦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在前者方面，雖能以銀十盎斯至多十二盎斯購得金一盎斯，在後者方面，則需銀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團此，對於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於向馬尼拉航行的亞卡普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着這種種關係，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賣買為媒介。

為供給如此廣大的市場，每年由各礦山掘取的銀量，不但要足夠供應一切繁榮國家不斷增加的鑄幣需求和器皿需求，還必須足夠彌補一切用銀國家銀幣銀器皿的不斷毀損和消磨。

貴金屬用作鑄幣的不斷消耗，用作器皿由於磨損與洗擦的不斷消耗，只及用作使用範圍非常廣泛的各種商品的不斷消耗，是極其可觀

的。單就這些消耗來說，每年就必須有極大數量的供給。某些製造業中所消費的這些金屬，從全體來看，或許不比這逐漸的消費來得多，但由於消費快得多，所以特別感到顯著。據說，單單伯明翰某些製造品，為鍍金包金而使用的金銀量，每年計達英幣五萬鎊，這五萬鎊金銀，一經移作此種用途，就絕對無恢復原狀之可能。從這事實，我們更可以想到，世界各地，在與伯明翰這些製造品相類似的製造品上，或在鑲邊、彩飾、金銀器、書邊鍍金及傢俱等物上，每年所消費的金銀，不知多少。而且金銀每年由一地運往他地，在海陸途中失去的分量，也一定不在少數。加之，掘地埋藏寶物，為亞洲各國幾乎普遍的習俗。埋藏的場所，在埋藏者死亡以後，往往無人知道。這種習俗；必然增加金銀的損失量。

根據極可靠的記錄，由卡迪茲及里斯本輸入的金銀量（包括明翰密輸），每年約值六百萬鎊。

據麥格斯氏說，1748年到1753年這六年期間，西班牙每年輸入的平均量，和1747年到1753年這七年期間，葡萄牙每年輸入的平均量，合計銀一百一十萬零一千一百零七磅，金四萬九千九百四十磅。銀每金衡磅值六十二先令，計值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鎊十先令。金每金衡磅值四十四幾尼半，計值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兩者共值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鎊四先令。麥根斯認為這些登記的進口數字是正確的。關於輸出金銀的各地點以及從每一地點輸入金銀量，他都根據登記簿，詳為揭示。關於他認為可能秘密輸入的金銀量，他也作了估計。這位慎重商人的豐富經驗，使他的意見，顯得十分有力。

《歐洲人在東西印度創業的哲學史及政治史》一書作者，以能辯而見聞廣博著名於世。據他說，自1754年到1764年輸入西班牙的金銀量，平均以十里爾銀幣為一皮亞斯特計算，計達一千三百九十八萬四千一百八十五又五分之三皮亞斯特。但這隻就登記過的輸入量而言，若把秘密輸入量加入，每年總輸入恐不下一千七百萬皮亞斯特。一皮亞斯特如按四先令六便士換算，全額即等於英幣三百八十二萬五千鎊。這位作者，曾詳細列舉金銀輸出各地點，並參考登記錄，詳細記載各該地輸出的金銀量。據他報告，每年由巴西輸入里斯本的金量，若就葡萄牙國王所徵稅額判斷（稅率似為標準金屬的五分之一），共

價值當為葡幣一千八百萬克魯查多，即法幣四千五百萬利佛，約合英幣二百萬鎊。關於祕密輸入部分，他說，如果作為公開輸入部分的八分之一計算，準沒有錯，這樣又可加上二十五萬鎊，合計共二百二十五萬鎊。依據這種計算，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每年輸入的貴金屬，總額就達到六百零七萬五千鎊。

此外，我曾查閱若干其他確實可靠的記述，儘管只是抄本，對於這每年平均總輸入量所估計的數字，都在六百萬鎊左右，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每年輸入卡迪茲及里斯本的貴金屬量，不等於美洲各礦山至年產量的全部。全年產額中有一部分往往由亞卡普科船舶運往馬尼拉；有一部分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歐洲各國殖民地間進行祕密賣買；還有一部分無疑是留在出產地。此外，美洲礦山，並非沒界唯一的金銀礦山。但是，它們是世界最豐饒的礦山。人們公認，今日已發現的其他各礦山產出額和美洲礦山比較，是微不足道的。人們也公認，美洲產出額的大部分，每年都向卡迪茲和里斯本兩地輸入。但是，單是伯明翰一年消費的五萬鎊，已相當於這每年六百萬鎊輸入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從這看來，計界各地每年消費的金銀總額，也許與其產出的總額相等。即有剩餘，亦不過足供給一切繁榮國家的繼續增加的需求。有時，甚或不夠滿足此需求，這樣就使歐洲市場上的金銀價格提高若干。

每年由礦山提供市場的銅鐵量，絕非金銀所可比較。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想象，這些賤金屬供給的增大，有超過共需求的傾向，或者說，有使其價格逐漸趨於低廉的傾向。那末，我們為什麼想象貴金屬有這傾向呢，不錯，賤金屬比較堅固，但用於比較容易磨損的用途，而且因其價值較輕，人們對其保存也不象對貴金屬那麼留心。但是，貴金屬並不一定比賤金屬更能久存。貴金屬亦常在各方面損失、消磨和耗費。

一切金屬價格，雖都有緩慢的逐漸的變動，但與其他土地原生產物比較，則逐年的變動，確是比較小。而貴金屬價格與賤金屬價格比較，則突然變動的可能性還要小。原來，金屬價格不易變動的原因，就在於它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穀物，在今年年終將全部或幾乎全部消費乾淨，但二三百年前由礦山採取的鐵，可能一部分現在還在使

用，二三千年前由礦山採取的金，也可能有一部分現在還在使用。各年度被消費的穀物量，與各年生產的穀物量，常常保持相當的比例。但甲年度與乙年度所使用的鐵量間的比例，幾乎不大會受這兩年度鐵礦產出額偶然差異的影響。所使用的金量間的比例，更不會受金礦出產額變動的影響。所以，大部分金屬礦山逐年的生產額，雖比大部分谷田逐年的生產額，也許有更大的變動，但生產額的變動，對這兩種不同生產物價格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金銀價值比例的變動

美洲礦山發現以前，歐洲各造幣廠規定純金對純銀的價值比例，為一比十隻至一比十二。即一盎斯純金被認為值十盎斯乃至十二盎斯的純銀。到前世紀中葉，其比例改變為一比十四乃至一比十五，即一盎斯純金被認為值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的純銀。這樣，金的名義價值增大了，換言之，金所能交換的銀量加多了。金銀兩金屬的真實價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得的勞動量，雖一同下落，但銀比金落得更低。美洲金礦銀礦的豐饒程度，比以前任何已發現礦山都大，但銀礦的豐饒程度，比金礦似乎更大。

每年由歐洲運往印度的銀量很大，使得英國一部分殖民地的銀價和金對比漸趨低落。加爾各答的造幣廠，與歐洲一樣，認為一盎斯純金值十五盎斯純銀。可是，這評價和金在孟加拉市場上的價值相比，似覺太高。中國金銀之比，依然為一對十，或一對十二，日本據說是一對八。

據麥根斯氏的計算，每年輸入歐洲的金銀數量之間的比例，將近一對二十二，即金輸入一盎斯，銀輸入二十二盎斯。可是，銀輸入歐洲後，又有一部分轉運東印度，結果，留在歐洲的金銀數量之間的比例，他以為，約與其價值比例相同，即一對十四或十五。他似乎以為，這兩金屬價值間的比例，必然與其數量間的比例一致。所以，在他想來，如果沒有這麼多銀輸出，則它們價值的比例，當為一對二十二。

但兩種商品的普通價值比例，與其在市場上普通存量的比例，不必一致。一頭值十幾尼的牛的價格，約為一頭值三先令六便士的羊的價格六十倍。如果我們依此推想，通常市場上有牛一頭，即有羊六十頭，那是可笑的。只根據一般以金一盎斯可購銀十四乃至十五盎斯的

事實，就推論通常市場上有金一盎斯，即有銀十四至十五盎斯，也是同樣荒唐可笑的。

通常市場上銀的數量對金的數量的比例，比一定數量金的價值對同一數量銀的價值的比例，大抵大得多。市上廉價商品與市上高價商品相比較，往往不但前者的總量更大，而且前者的總價值也更大。每年上市的麪包，不僅總量比家畜肉大，價值也比家畜肉大。家畜肉的總量和總價值，大於家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家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大於野禽的總量和總價值。廉價商品的顧客，通常化高價商品的顧客多得多，廉價商品因此能在市上售去更大的數量，售去更大的價值。所以，廉價商品總量對高價商品總量的比例，通常必大於一定數量高價商品價值對同量廉價商品價值的比例。就貴金屬說，銀為廉價商品，金為高價商品。因此，通常市場上，銀不僅在總量上比金大，而且在總價值上也比金大，這是我們可以預斷的。凡持有少量金銀器物的人，只要把自己的銀器和金器比較一下，就會發覺，銀器在數量上，在價值上，都大於金器，而且，還有許多人，持有不少的銀器，卻毫無金器。即使有之，亦不過限於錶殼，鼻菸盒，只及諸如此類的小玩意兒，其總額的價值，極為有限。不錯，就英國鑄幣說，所有金幣的價值，大於所有銀幣的價值，但在其他各國，情況並非如此。有些國家的鑄幣，其所有銀幣的價值，差不多與所有金幣的價值相等。據造幣廠統計，蘇格蘭在未與英格蘭合併以前，金幣雖略多於銀幣，但相差不多。其他許多國家的鑄幣，則佔多數的不是金幣而是銀幣。法國一切鉅額的支付，通常都用銀幣。至於金幣，則只限於隨身攜帶的小額，此外即不容易得到。但是，一切國家的銀器價值，總必大於其金器價值，而只有少數國家，金幣佔鑄幣的大部分，所以，從前一種優勢來抵償後一種比勢，實綽有餘裕。

在一種意義上，銀在過去，總比金低廉得多，而在將來，恐也不免如此。但在另一種意義上，照今日西班牙市場上的情況，也許可說金較廉於銀。一種商品，不但可按照其平常價格的絕對大小，而說它是昂貴的或低廉的，同時，並可按照其價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其長時期供應市場所可能的最低價格，說它是昂貴的或低廉的。這所謂最低價格，是指只足夠補償這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資本及其普通利潤的價格，也就是對地主不能提供任何報酬而全部由工資及利潤二者構成

的價格。現在在西班牙市場上，金確實比銀更接近於這最低價格。西班牙所課的金稅，不過合標準金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而銀稅則為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前面說過，美洲西班牙屬地的大部分金銀礦山，其地租全都作為賦稅供給國王。國王的收入，在金的方面還不及銀的方面。經營金礦發財的，也比經營銀礦發財的少。可見金礦的利潤，一定低於銀礦的利潤。這樣，西班牙市場上金的價格，既只提供較少的地租和利潤，所以與銀比較，就一定多少更接近於這最低價格了。把一切費用都列入計算，在西班牙市場上，全部黃金，似乎不能象全部白銀那樣有利出售。但是，葡萄牙在巴西所收的金稅，與西班牙往昔在墨西哥和祕魯所收的銀稅，同為標準金屬的五分之一。這樣，美洲的全部黃金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銀，以更接近這可能的最低價格的價格供應歐洲一般市場，就很難說了。

金剛鑽及其他寶石的價格，恐怕比金的價格，更接近這可能的最低價格。

銀稅不僅和奢侈品稅一樣，是最適當的稅目，而且，在當時，又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泉源。所以，這種課稅，在有徵收可能的時候，是難於放棄的。但完稅的不可能，已在1736年使銀稅由五分之一減至十分之一，也許有一天，同一的不可能將使其不得不再減，正象金稅不得不減到二十分之一那樣。美洲西班牙屬地的銀礦，也象其他各礦山一樣，由於採掘較從前深入，由於排出這些深處的積水以及供給這些深處以新鮮空氣等費用較大，開採費用逐漸增大。這種情形，曾經調查過這些礦山狀況的人，都是承認的。

這些等於增大銀的稀少性（因為一種商品的獲得，如果困難加甚了，費用增加了，就可說它是益形稀少）的原因，一定會引起以下三種現象之一。這種費用的增加，第一，一定會由於銀價的按正比例增加而取得補償；或是第二，一定會由於銀稅按正比例減少而取得補償；或是第三，一定會一部分通過這種方法，另一部分通過另一種方法而取得補償。三者必居其一，但以第三種現象為最可能。正如金稅儘管大減，但和銀相比的金價仍然上升一樣，銀稅儘管大減，但和勞動及其他商品相比的銀價，也可能仍然上升。

但是，銀稅的遞減，縱然不能全然防止歐洲市場上銀價的上升，至少，總會多少推遲其上升。減稅的結果，以前因不堪重稅而中止開

採的礦山，現在也許會再行採掘。這樣，每年上市的銀量，一定要加多若干，而一定數量銀的價值，也一定要低落若干。1736年西班牙國王減低銀稅的結果，歐洲市場上的銀價，比較以前雖不曾實際減落，但與在銀說不減場合所會有的銀價比較，大概至少要低百分之十。

上述各事實和議論，使我相信，或者更切當地說，使我揣測，銀機雖減，銀價卻在現世紀的歐洲市場上，上升若干。我所以說揣測，是因為我對於這問題，雖竭盡了力量，但我的意見仍夠不上叫做信念。的確，假定銀價果有上升，其上升程度，到目前為止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儘管說了上面這些話，恐怕還有許多人，不但對銀價實際上曾否上升，而且對相反現象有否發生，即銀價在今日歐洲市場上是否仍舊在下落，仍然拿不定主意。

不過，以下的事件，是必須注意的。不論金銀的被假定的年輸入量是多是少，其年消費量終歸有一個時期會與其年輸入量相一致。金銀的總量愈多，其消費亦必增大，有時還比總量增加得多得多。總量增多，其價值必因而減少。於是用途增多，人們使用時也不那麼慎重愛護，結果，金銀的消費量必以比其總量的增加更大的比例增大。所以，經過一定時期後，金銀的每年消費量，在輸入不繼續增加的條件下，一定會與其每年輸入量趨於一致。可是，今日的輸入，依舊在繼續增加。

如果使金銀每年消費量達到與每年輸入量相等以後，每年輸入逐漸減少，那末，每年消費量也許有一段時間會超過每年輸入量。於是，金銀的總量可能逐漸不知不覺地減少，金銀的價值逐漸不知不覺地上升，一直到每年輸入量不增不減之時為止。這時候，金銀每年消費量，將逐漸不知不覺地適應每年輸入量所能支持的數額。

懷疑銀價仍在繼續跌落的根據

歐洲財富日益增加，以及認為由於貴金屬量自隨財富增加而增加，貴金屬價值因此自隨貴金屬數量增加而減少這個俗見，可能使許多人相信，歐洲市場上金銀價值迄今還在跌落。而許多土地原生產物還在逐漸騰貴這個事實，也許使這班人越發確信這種見解。

我已在前面說過，一國隨財富增加而增加的貴金屬量，絕沒有減低其價值的傾向。一切種類的奢侈品和珍奇品，當然都蝟集富國，由於同一原因，金銀也自然蝟集富國。這不是因為這些物品，在富國比

在貧國低廉，卻是因爲它們在富國比在貧國昂貴，即在富國可得更好的價格。優越的價格，吸引了這些物品，這優越性一旦消滅，這些物品就不會向這方面蝟集。

除了穀物及其他全靠人類勤勞而生產的各種植物，一切種類的原生產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種獵獲物，如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礦物等，都隨社會財富增長和技術改進而自然趨於昂貴，這也是我已經努力說明過的。所只，縱使這些商品能換得比以前多的白銀，我們仍不能因此便說，銀價實際上已較前低落，換言之，銀只能購買比以前少的勞動量。能由此引出的結論只是，這些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已經提高，換言之，能購得比以前多的勞動量。隨着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這些商品，不但名義價格上升了，其真實價格也上升了。名義價格的上升，並非銀價下落的結果，而是該商品自身真實價值上升的結果。

社會進步對三種原生產物的不同影響

原生產物，可只分作三類。第一類產物幾乎全然不能由人類勞力使之增加；第二類產物能適應需要而增加；第三類產物雖能由人類勤勞而增加，但人類勤勞的實效是有限的或靠不住的。第一類產物的真實價格可隨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而無限制地上升。第二類產物的真實價格，有時雖可大大上升，但決不能長久超越一定限度。第三類產物的真實價格，在自然傾向上，雖依改良程度的增進而增高，不過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價格有時甚至反而下落，有時保持原狀，有時或多或少地上升，要看偶然事變使人類勤勞的努力，在增加此等產物時所收實效如何而定。

第一類

隨社會進步而價格提高的第一類產物，是幾乎完全不能由人類勤勞增加的。它們的產額既不能超過自然生產的一定分量，它們的性質又非常容易腐敗，所以，想把各季節生產的這類產物，全部蓄積起來，勢不可能。大部分稀少特異的鳥類魚類，各種野禽野獸，各種候鳥，都屬於此類。隨着財富的增進以及隨財富的增進而發生的奢侈的增進，對此等產物的需求多半會增加，但其供給卻不能由人力使其大量增加。所以，這等商品的價格，就可隨購買者競爭的不斷擴大而無限制地上升。例如山鵲，即使成爲時尚品，價格上升到二十幾尼一

隻，人類也不能由勤勞而使市上的山鵲增加到大大超過現有的只數。古羅馬人最隆盛時代，為何對珍貴魚類鳥類支付極高價格，正可用這理由來說明。這種高價，確非當時銀價低落的結果，而是不能隨人意增加的這些稀有珍品本身價值上升的結果。在羅馬共和國沒落前後若干年內，銀的真實價值比今日大部分的歐洲都高。羅馬共和國對西西里所繳納什一稅的小麥，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付價三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六便士。但這價格大概要比平均的市價低，西西里農民有義務按這價格交售他們的小麥，他們認為是一種課稅。所以，羅馬人若需從西西里輸入什一稅以外的穀物，他們就須依照契約，對於超過量每一配克付給四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八便士。這價格，想即當時認為適當而合理的價格，也就是當時視為平均或普通的契約價格，換算起來，每夸特約值二十一先令。英國小麥，就品質而言，較西西里小麥為劣，而就歐洲市場上售價而言，通常較西西里小麥為低。但在最近荒歉年度以前，其普通契約價格，卻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因此，把往古時代的銀價，與現在的銀價相比，一定為三對四之反比例，即當時報三盎斯，與現在銀四盎斯比較，能購得同量的勞動或商品。歷史學家普林尼記載，塞伊阿斯以六千塞斯特斯（合英幣五十鎊）購一隻白夜鶯，獻給女王阿格利皮納；阿西尼阿斯·塞納以八千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幣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購紅魚一尾。當我們讀到這種記載時，這些奇貴的價格，雖夠使我們驚絕，但這些價格以我們看來，似還比實價少三分之一。這兩件東西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交換的勞動及食品量，比其名義價格在今日給我們表示的數量，約多三分之一。這就是說，塞伊阿斯為一隻白夜鶯而付出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等於現今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才能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阿西尼阿斯·塞納為一尾紅魚而付出的勞動及食品的支配權，等於現今八十八鎊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才得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引起這種過分價格的原因，與其說是銀量充斥，以致銀價低廉，倒不如說是羅馬人的剩餘勞動剩餘食品過於豐盈，以致珍奇品爭購者多。當時羅馬人所持有的銀量，比同一勞動量及食品量的支配權在今日所能獲得的銀量要小得多。

第二類

價格隨社會進步而騰貴的第二類原生產物，其數量能應人類需要而增加。它們包括那些有用的動植物，當土地未開闢時，自然生產物很多，以致無價值可言，到了耕作進步，就不得不讓位給那些更為有利的別種產物。在社會日益進步的長期過程中，此類產物的數量日益減少，而同時，其需要卻繼續增加。於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它所能購入或支配的真實勞動量，逐漸增加，終而增加得這麼多，以致與他種由人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產出的任何物品比較，也不相上下。但是，一旦達到這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如果竟超過這限度，那馬上就會有更多土地和勞動，用到這方面來生產此等物品。

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程度，如果使人們覺得，開墾土地以生產牲畜牧草，和開墾土地以生產人類食物，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進一步上漲了，如果更上漲，馬上就會有更多的谷田轉化為牧場。耕地擴大的結果，一方面，野生牧草的數量減少了，以致不依勞動培育而自然生長的家畜的肉減少；另一方面，持有交換家畜肉的穀物或穀物代價的人數又增加了，以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於是，家畜肉價格，繼之。牲畜價格必逐漸騰貴，終使人覺得，以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生產牲畜的牧草，和生產人類的食物，有同等利益。但一定要到社會進步的後期，耕作事業才舍如此擴大，使牲畜價格擡高到這種程度。要是國家還向前進步，牲畜價格不高到此等程度，一定會繼續騰貴。在今日歐洲，恐怕還有一部分地方牲畜價格，未增到這個極限。即合併以前的蘇格蘭某地方，亦屬如此。蘇格蘭的地方，宜於畜牧的多，宜於其他用途的少。所以，那裏的牲畜，如只行銷於內地市場，則牲畜價格，恐怕不會達到這樣的高，以致把土地生產牧草成為有利。前面說過，英格蘭的牲畜價格，在倫敦附近，雖似於前世紀初期達到了這極限，但較僻遠地方，大概很久以後才達到這限度。也許至今還有少數地方，尚未達到這限度。但是，在第二類原生產物中，價格首先隨社會進步而升至極限的，恐怕要算牲畜。

在牲畜價格尚未達到這高度以前，就是適於深耕細作的土地，也必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作。在土地廣大的國家，常有大部分農地，位於僻遠地方，其肥料不易仰給幹都市，因此，耕作優良的土地其數量一定和農地自能生產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農地自產肥料量，又一定和

農地所維持的牲畜數成比例。土地施加肥料，不外二途：其一，放畜于田，因而得糞；其二，飼畜於廄，出糞肥田。但牲畜價格如不夠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潤，農民就不願在土地上放牧牲畜，更不願設廄飼養牲畜。因為，設廄飼養牲畜所需牧草，勢須仰給於肥沃而已經墾治的土地，如從荒蕪未曾墾治的土地刈取那裏所生的零落的牧草，所需勞動和費用，一定非常的大。這樣，如果牲畜放牧於已經墾治的土地，其價格已不夠償付該地產草的費用，那末發廄飼養，牧草的刈取搬運，要增加相當的勞動和費用，其價格必定更不夠償付產草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下，想設廄飼養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尚無所謂，若要多養，決無利潤可言。但如果只飼養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則所得肥料，決不夠供給可耕土地的全部，使其不斷保持良好狀態。肥料既不夠供給全部農地，農民自然會揀最有利最便當，即最豐饒而位於農家庭院附近的土地，進行施肥，結果，全部農地中，常保持良好耕作狀態的，就單是一部分土地，而其餘大部分土地，則惟有任其荒蕪，至多不過任其生產若干瘠弱小草，似苟延少許奄奄待斃的牲畜的殘生。所養的牲畜，與土地完全加入耕作所需的數額比較，雖嫌太少，但與土地實際產出的牧草比較，卻又往往嫌其過多。這荒蕪地的一部分，在這樣繼續放牧六七年後，可能加以墾治，也許可產出一兩季粗劣的燕麥或其他粗劣的穀類。過此以往，則地力消耗淨盡，又須回覆以前的休耕放牧狀態。於是，又進而墾治其他部分，這些新墾地，也產出一兩季粗劣穀物，以後也地力耗竭，回覆休耕原狀。蘇格蘭在未與英格蘭合併以前，其低地一帶的土地，大都在這方式下經營。當時能夠不斷靠肥料而維持良好狀態的土地，常常僅佔全農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有時，甚且不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其餘土地，則全無肥料可施；不過其中還有若干部分，系依上述方式，挨次墾治，挨次休耕。所以，在蘇格蘭，本可耕作的應好土地，亦因依照此種方式經營，以致其生產額比其生產力所能生產的低得多。此種經營方式，當然是不利的。但蘇格蘭在合併以前，似因牲畜過於低廉，不得不採取此種不利的經營方式。至於牲畜大大騰貴之後，該國大部分地方，何以依然沿用舊法，那是因為在若干地方。人民愚昧拘泥古習，而在大多數地方，又由於事理之自然，不容即時或急速採用優良方法。其中障礙，可大別為二：第一，租地人貧困，還沒有足夠時間來取得足夠的牲畜，使他們能更完全地耕作其土地。他們資力有限，牲畜騰貴，

飼養更多牲畜雖對他們有利，但也使他們難於多購。第二，縱使租地人具有此等資力，而牧草地的闢治，亦非一蹴可幾。總之，牲畜增加和土地改良這兩者，勢須同時進行，不能分先後。牲畜沒有增加，土地便無法改進；土地要不是大大改進，牲畜又不會顯著增加，因為不大大改進土地，就不能維持大大增加的牲畜。象這種革故圖新過程中的自然障礙，非有長時期的勤勉節約，那是無法剷除的。現今，舊方式雖在逐漸衰落，但要國內各地全盤廢除，恐怕還要經過半世紀或一世紀的時間。蘇格蘭從與英格蘭合併所得的一切商業利益，也許只牲畜價格騰貴為最大利益。牲畜的騰貴，不但提高了高地一帶地產的價值，同時，又成為低地一帶改進的主要原因。

一切新殖民地，都有大墾荒蕪的地。此等荒蕪地，除飼養牲畜外，不能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不久就極度繁殖。凡繁多的物品，價格必然非常便宜。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是歐洲人由故鄉運來，但在極短期間內，這些牲畜就增殖了那麼多，以致價值變得那麼低，使得馬投林野，所有者亦聽其自然，不復追尋。在這情形下，闢地飼養牲畜，必無利可圖。要闢地飼養牲畜而有利，要到這些殖民地建立之後，經過漫長的歲月才能辦到。那裏，肥料既形缺乏，投在耕作事業上的資財，與用於耕作的土地又不相稱，所以，其農業經營的方式，與今日仍通行於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的如出一轍。當瑞典旅行家卡爾姆敘述他於1749年在北美某些英國殖民地所聞見的農業狀況時，他說，那裏很難找出英格蘭民族的特性，因為英格蘭民族在農業的各個方面都是有名的熟練的。他又說，當地人民，很少給自己谷田施放肥料。當一片土地因連續收穫而地力耗盡以後，他們就開墾其他新的土地。到這片土地的地力又耗盡後，他們再開闢第三片的土地。他們的牲畜，一任其彷徨林野或未闢之荒地間。春生牧草，因齧取過早之故，往往不到開花結實，即毀滅淨盡。所以，牲畜常陷於半飢餓狀態中。春生牧草，是北美地方的天然牧草。歐洲人開始定居於該地時，此種牧草異常繁盛，高達三四英尺。卡爾姆明確指出，在他寫遊記時不能養活一頭母牛的一塊土地，往時肯定可以養活四頭母牛，而且，以前每頭母牛，能夠產出現在每頭四倍的牛乳。他以為，該地的牲畜，所以一代一代漸趨退化的原因不外乎牧草缺乏。此等牲畜，恐與三四十年前，在蘇格蘭各地所見的矮小牲畜無大差別。今日蘇格蘭低

地矮小牲畜的大改良，與其說由於畜種的選擇（雖然有些地方，也使用這種方法），無寧說由於飼料的豐饒。

因此，雖然牲畜的價格，要到墾殖改良的後期，才能增高到使關地飼養牲畜成為有利，但在這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先達到這有利價格的，恐怕仍當首推牲畜，因為牲畜價格如未達到這程度，則墾殖改良的程度，要接近今日歐洲許多地方已達到的狀況，似乎亦不可能。

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初達到這價格的為牛，最後達到這價格的當為鹿肉。不列顛的鹿肉價格，表面上雖似過高，但這高價還不夠償還鹿園費用這一事實，凡有飼鹿經驗的都知道得很清楚。設非如此，就會象古代羅馬人飼養社鵝那種小鳥一樣，不久成為普通農家飼養的動物了。瓦羅和科技麥拿告訴我們，飼養社鵝是最有利的事業。蒿鳥飛到法國時很瘦，據說在法國有些地方，把它養肥是非常有利的事業。總之，鹿肉如果繼續為流行食品，而不列顛的財富與奢侈，又象過去某時期一樣增進上去，那末鹿肉價格，或將比今日還要貴。

在改良進步的過程中，由必需品牛的價格漲到極點，到奢侈品鹿肉的價格漲到極點，其間介有很長的歲月。在這長久歲月中，許多其他種類的原生產物，各依其不同情形，或遲或速地逐漸達到其最高價格。

這樣，在一切農場中，穀倉廄舍的廢物，都能養活若干家禽。此等家禽的飼養，既是廢物利用，無須農業家特別開支，所以，家禽通常都只極廉價格出售。農業家由此獲得的，幾乎全為純利，而價格也不會再低，使他們不願飼養。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國家，象這樣無需費用飼養的家禽，常常足夠供應全部的需要，因此，這種家禽，就常與家畜肉及其他一切肉食同樣廉價。不過由這方法飼養的家禽總數，勢必化農場飼養的家畜肉總數少得多。凡效用相同而數量較少的產物，常比效用相同而數量較多的產物，更為富裕奢華時代的人民所愛好。因之，耕作改進，財富和奢侈性增加的結果，家禽價格，就逐漸超過家畜肉價格，最終升到那麼高，使闢地飼養家禽，成為有利事業。家禽價格一旦達此高度，即不能繼續上升，否則用於其他用途的土地，亦必改用來飼養家禽。法國若干地方，家禽飼養一向被視為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其有利程度，足使農民願為飼養家禽而廣種玉米和蕎麥。中等農家，有時竟在宅內養雞四百餘隻。英格蘭對於飼養家禽，似乎不象法國那樣重視。可是，家禽在英格蘭的售價，一定比法國高，因為英格蘭每年有多量家禽仰給於法國。在墾殖改進的過程中，一切肉食達到最高價格的時候，必定是在闢地生產此等動物食料成為通常做法的前夕。在這種做法尚未普遍以前，此等動物的價格，必因其稀缺而騰貴，而在這種做法普遍化之後，通常必有新栽培方法發現，使農家能在同面積土地上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這種飼料。

產量既多，農家不但必須降低售價，而且亦能夠降低售價，因為要是不能，多產必不能長久繼續。今日倫敦市上家畜肉的普通價格，也許因引種苜蓿、蕪菁、胡蘿蔔、捲心菜等物而比前世紀初期低廉。

豬為貪食的動物，不但食糞，且食其他一切有用動物所嫌忌的髒物。因此，豬的飼養，與家禽同，其初不過為廢物利用。這樣，只要利用廢物飼養的豬的數量，能夠充分滿足需要，此種家畜肉的市價，必比他種家畜肉低廉得多。但是，需要如超過此數量所能滿足的程度，換言之，飼養豬如果同飼養其他家畜一樣，有特為其生產飼料的必要，那末豬的價格，必然因此騰貴。在一國的自然狀態及農業狀態下，養豬比飼養其他家畜，所需費用如較多，則豬肉價將比其他各種獸肉昂貴，如較少，則豬肉價將比其他各種獸肉低廉。據布豐說，法國的豬肉價幾乎與牛肉價相同。在不列顛許多地方，現今豬肉卻比牛肉稍貴。

關於不列顛豬及家禽價格的昂貴，往往有人說，那是因為佃農和小農的人數減少了。此等人數的減少，是歐洲各地技術改良及耕作進步以前所要發生的事件，同時，又是使此等物品價格，比在沒有此事件發生時，更早更快騰貴的原因。一個最貧窮的家庭，往往不用何等費用即能養活一頭貓或一隻犬。一個最貧窮的農家，也同樣能以極少的費用養活幾隻家禽或一頭母豬數頭小豬。他們把食桌上些許殘物、乳漿、乳渣，作為此等動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餘的食料，則任其在附近田野間自行尋求，而不會明顯地損害他人。象這樣無所費而生產的動物的數量，勢必因小農人數減少而大大減少，同時，其價格勢必比小農人數尚未減少時更快地提高。但是，這種動物的價格，在改良的過程中，遲早總會達到可能有的最高限度，換言之，遲早總會達到這樣高的價格，以致能對耕作提供此等動物食料的土地所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支付象對耕作大部分其他耕地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所支付的一樣的報酬。

制牛乳的業務，最初也是為了廢物利用，與養豬及家禽同。農場上耕牛所產的牛乳，平常都超過小牛哺育及農家消費的必要量，而在某一季節所產尤多。可是，在一切土地的原生產物中，以牛乳為最易腐敗。牛乳在產量最高的熱季，很少能保存二十四小時。於是，農家把一部分製為牛酪，保存一週；一部分製為鹽牛酪，保存一年；一大

部分製為幹牛酪，保存至數年之久。這種種牛酪，農家通常以一部分留作家用，其餘則全數運往市場，只尋求最好的售價。市價即使低賤，也不致賤到使農家不願以這剩餘部分供應市場。要是市價過低，農家對於制酪作業，多半會搞得不精不潔，乃至不為這種作業另備房屋，而因陋就簡地在煙燻、污穢、不潔的廚房中進行。實際上，蘇格蘭在三四十年前，一切農家制酪的作業，類皆如此，即在今日，還有許多農家，繼續此種狀態。導致家畜肉價格逐漸昂貴的原因，即對家畜肉需求的增加，以及隨着農業改虔利用廢物飼養的家畜數量的減少，同樣會使制酪業的產品的價格，騰貴起來。制酸業產品的價格，當然與家畜肉價格和飼養家畜的費用相關聯。價格增高，就能夠對更多勞動給酬，也能夠促進農家對於制酪的注意和清潔。制酪就成了更值得農家注意的副業，其產品的質量就日益改良。最後，其價格升到那麼高，雖以最好的耕地為制酪而飼養家畜亦可獲利。可是，價格一達此高度，即不能進一步上升，否則馬上便有更多土地移作此種用途。英格蘭大部分地方的牛酪價格，似已達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有許多良好土地，為着制酪而飼養家畜。蘇格蘭除大都市附近若干地方外，其餘各地，都似乎未達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普通農家很少為了制酪而以良好土地飼養家畜。在最近數年間，牛酪的價格，確在漸趨昂貴，但如為此目的而使用良好土地，卻仍不上算。蘇格蘭的牛酪品質，一般都不及英格蘭。的確，這品質上的低劣，恰抵其價格上的低賤。可是，品質低劣並不是價格低賤的原因，卻是價格低賤的結果。蘇格蘭牛酪的品質，即使遠較今日為優，但在蘇格蘭現狀下，我想，上市的大部分牛酪，仍不能以遠較今日為高的價格出售。品質優良的牛乳，生產上必然有較多土地和勞動方面的費用。象今日這種價格，恐不夠補償此種費用。英格蘭許多地方的牛酪價格，無疑較為昂貴，但制酪業和生產穀物與飼養家畜這兩種主要農作業比較，仍不能視為一種比較有利的土地利用途徑。所以制酪業在蘇格蘭就更不那麼有利了。

不論任何國家，必須依人力生產的一切土地生產物價格，要是不足以償還土地的改虔費用及耕作費用，該國的土地，決不會完全用來耕作，完全得到改良。要使全國土地完全用於耕種和得到改良，各種生產物的價格，第一，要足夠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為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視谷田地稅為轉移；第二，要能對農家所付的勞動和

費用，給與同良好谷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樣好的報酬。換言之，農家必須由這價格，取回其資本，並獲得資本的普通利潤。各種生產物價格的上漲，顯然必須先於生產這各種生產物的土地的改良。得利是一切改良的目的，改良的必然結果如為損失，即不得謂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產的物品價格，不足補償改良的費用，那末，改良的結果，就必然是損失。因此，全國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如確為一切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則這一類原生產物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視為公共災禍，而應視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須的先驅和伴隨物。

上述一切原生產物的名義價格或貨幣價格的上漲，並非銀價下落的結果，而是這些產物自身真實價格上漲的結果。這些生產物不但值更大的銀量，而且值比以前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它們上市既需費去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因此上市之後，它們代表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或者說，在價值上等於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

第三類

第三類即最後一類原生產物的價格，隨着改良程度的增進而自然地上漲。人類勤勞對增加此等產物所收的實效，或為有限，或為不確定。因此，這類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雖有隨改良的進步而上升的自然趨勢，但有時甚或會下落，有時在各不同時代，會繼續同一狀態，有時又會在同一時期裏或多或少地上升，視所發生的不同的偶發事件使人類勤勞的努力在該產物的增產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而不同。

某些原生產物的生產，視他種產物的生產為轉移。因之，一國所能提供的前一類產物量，必然受它所能提供的後一類產物量的支配。例如，一國的羊毛或皮革的量，必受該國所維持的牛羊頭數的支配；它所能維持的牛羊頭數，又必然受該國改良狀況及農業性質的支配。

也許有人說，在改進的過程中，使牛羊肉價格逐漸提高的原因，也同樣會使毛革的價格，按幾乎相同的比例而提高。如果在進行改良的初期，毛革市場和家畜內市場，同樣侷限於狹窄範圍，則上面所說，也許會成為事實。可是，這兩者的市場範圍，通常是極不相同的。

家畜肉的銷路，幾乎到處都侷限於本國境內。英屬美洲的某地和愛爾蘭，雖經營着大規模的醃肉業，但據我所知，今日商業世界中，

經營此業的，換言之，以本國大部分家畜肉輸往他國的，只有這兩個地方。

反之，毛革市場，即在開始進行改良之時，亦很少限於本國境內。羊毛不經何等調製，生皮略加調製，就可很容易地送往遙遠國家。因為此等產物是多種製造品的原料，所以，即使其出產國的產業對它沒有需求，其他國家的產業也可能對它有需求。

在耕作粗放因而人口稀少的國家，毛皮價格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的部分，總比在耕作較好人口較密而家畜肉有較大需求的國家大得多。據休謨觀察，薩克遜時代的羊毛價格，約值一頭羊的價格的五分之二。他只為此種比例，比現在羊毛價格在全羊價格中所佔的比例大得多。據我所得的很確實的報道，西班牙某些地方，往往單因採取羊脂、羊毛而殺羊，其屍肉則聽其在地上腐爛，或讓肉食鳥獸吃掉。此種事實，如果連在西班牙有時也會發生，那在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在西屬美洲的其他許多地方，就幾乎是習見的現象了。這些地方，往往單為利用獸皮獸脂而不斷撲殺有角動物。當海地島時常遭受海盜侵擾，而法國人的種植園（現幾乎已延伸到該島的全部西部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況，向未改善到足使該島西班牙人的家畜具有若干價值的時候，那裏也經常專為獸皮獸脂而撲殺牲畜。西班牙現今不但繼續佔有該島的東部海岸，而且佔有該島的全部內地與山嶺地區。

隨着改良及人口的增殖，一頭牲畜全部軀體的價格，必定會上漲。不過，此種上漲對獸肉價格的影響，比對獸毛獸皮價格的影響大得多。獸內市場，在社會原始狀態下，總侷限於其產出國境內，所以必定隨社會進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擴大。但獸毛獸皮這兩者，縱使為野蠻國產物，亦往往行銷於全商業世界，其市場很少能因一國社會進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擴大。全世界商業的狀態，既不會因一國的改良而受到顯著的影響，所以這種商品的市場，在社會改進、人口增加之後，可能仍與以前完全相同或幾乎相同。不過，按事物的自然趨勢，社會如果改進，其市場一定會有多少擴展。設使一國以此等商品為原料的製造業，日益繁盛，則此等商品的市場，即使不隨着大大擴大，也必會轉移到比以前更接近於產地的地方，結果，此等原料的價格，至少會按所節省運費的程度而提高。在此場合，獸毛獸皮價格，

縱不能與獸肉價格，依同一比例提高，亦自然會上升若干，決不至於下落。

不過，英格蘭的毛織物製造業，雖很繁盛，但羊毛價格，自愛德華三世以來，卻大大跌落。據許多可靠的記錄，在愛德華三世朝代（十四世紀中葉或1339年左右），英格蘭羊毛-託德（即二十八磅）的普通合理價格，不下於當時貨幣十先令。當時貨幣十先令，含有陶衡銀六盎斯，以每盎斯合二十便士計算，約當今幣三十先令。現在英國最優良羊毛的良好價格，卻不過每託德二十一先令。這樣，愛德華三世時代羊毛的貨幣價格，對於現在羊毛貨幣價格的比例，為十對七。至其真實價格，則前者之優越尤大。按每夸特麥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昔時十先令可購小麥十二蒲式耳。按每夸特麥價二十八先令計算，現在二十一先令只能購得小麥六蒲式耳。因此，往時羊毛真實價格，對於現在羊毛真實價格的比例，當為十二對六，即二對一。這就是說，當時羊毛一託德所購得的食品量，二倍於現在羊毛一託德所可購得的食品量。設使這兩時代的勞動真實報酬相等，則昔時羊毛一託德所可購得的勞動量，亦二倍於今日。

羊毛真實價格及名義價格的跌落，決不是自然的結果，而是暴力和人為的結果。第一，是絕對禁止英格蘭羊毛輸出的結果；第二，是准許西班牙羊毛免稅輸入的結果；第三，是隻許愛爾蘭羊毛輸往英格蘭，而不得行銷他國的結果。由於有這些規定，英格蘭羊毛市場，就限於國內，而不能隨社會進步，有什麼擴張了。在英格蘭市場上，其他若干國的羊毛得與本國內地羊毛競爭，愛爾蘭羊毛則被迫與英格蘭羊毛競爭。加之，由於愛爾蘭毛織物製造業，遭受不公平不正當的阻礙，愛爾蘭人在自己境內只能利用一小部分自產羊毛，因此，不得不把其大部分輸往英格蘭，即容許他們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場。

關於古時的生皮價格，我不能找到何等可靠的記錄。羊毛通常被制定為輸納國王的物品，當輸納時，所評價格至少必為當時普通價格。至於生皮則情況似不如此。不過，弗裏伍德曾根據 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與該院某牧師之間的帳單告訴我們，公牛皮五張，價十二先令；母牛皮五張，價七先令三便士；二齡羊皮三十六張，價九先令；小牛皮十六張，價二先令。在1425年時，十二先令所含的銀，約等於今日英幣二十四先令。這樣，按這帳單，公牛皮每張

價格，摺合銀量，就等於今幣四又五分之四先令。它的名義價格，遠較現今為低，但當時十二先令，按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可購小麥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而同量小麥，在現今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算，卻要值三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當時公牛皮一張，所能購得的小麥量，現在需要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購得。即其真實價值，等於今幣十先令三便士。當時家畜一入冬令，即不免陷於半飢餓狀態，我們不能設想其軀體是肥大的，重量四石即常衡十六磅一張的公牛皮，在今日視為中等牛皮，在往時恐要視為上等牛皮。據我所見，每石半克朗，實為今日（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價格，按這價格，這重四石的牛皮一張，不過值今幣十先令。因此，就公牛皮的名義價格而言，今日較當時為高，但就真實價格而言，即就所能購買或支配的食品真實量而言，今日實較古時為低。如上述帳單所示，母牛皮價格對公牛皮價格，大抵常保有普通比例。羊皮價格大大超過這普通比例。羊皮也許和羊毛一起賣掉。反之，小牛皮價格大大低於這比例。在家畜價格非常低廉的國家中，不是為着延續畜種而飼養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時撲殺。二三十年前的蘇格蘭，就是這樣。小牛價格通常不夠償還它所消費的牛乳價格。所以，撲殺小牛可節省牛乳。小牛的皮的價格因此很低。

生皮價格，現在比幾年前遠為低廉。此中原因大約不外海豹皮的關稅撤廢了，1769年又許愛爾蘭及其他殖民地的生皮得於一定年限內無稅輸入。不過，就現在全世紀平均來看，生皮的真實價格大概比古時略高。此種商品的性質，和羊毛比較，就更不宜於輸送遠方。共保存所易蒙受的損害，亦較羊毛為大。若以鹽醃漬，則以品質不如新鮮生皮，其售價將更低。這種情形，必定會使生皮的價格在自己國內精製的國家高，不在自己國內精製而向外國輸出的國家低。在野蠻國家低，在進步的工業國高。在現代高，在古代低。加之，英國製革業，並不能象毛織業那樣，使人相信這種製造業的繁榮，為國家安全所繫，因而象後者那樣受到國人的愛護。固然，生皮的輸出被禁止了，且被宣告是一種有害行為，但由海外輸入的生皮，卻已課稅。由愛爾蘭及各殖民地輸入的生皮關稅，雖經一度廢除（僅五年），可是，愛爾蘭剩餘的生皮，即不在愛爾蘭自己境內精製的生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顛境內銷售。至於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不過數年以前，才列

入只許在母國販賣、不得向他處販賣的商品項目中。愛爾蘭在這一方面，也不曾象羊毛那樣，爲了要維持不列顛製造業而受到壓迫。

在進步和有文化的國家裏，不論何種規定，如果立意在於減低獸毛價格或獸皮價格，就必有提高獸肉價格的傾向。農民在良好土地上飼養的牲畜，其價格必須足夠付給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給農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種土地的普通利潤，否則他們就將不再飼養。因此兩者不取償幹牲畜的皮毛，即取償於牲畜的肉。所取於皮毛的愈少，則所取於肉的必愈多，所取於肉的愈少，則所取於皮毛的必愈多。地主只要獲取地租，農業家只要獲取利潤，至於毛、皮、肉的價格，各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比例如何，那是他們不暇計及的。由此看來，在改良及耕作發達國家，地主和農業家決不會因此等規定而受到大的影響，不過由於肉價的上漲，他們在消費者立場上受些不利罷了。但是，在社會不改進、田野未開闢的國家，情形則完全兩樣。此等國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來畜牧，畜牧而外，無其他用途。而牲畜價格的主要部分，又全由毛、皮構成，肉不過佔極少的部分。在此種場合，他們以地主和農業家的資格說，就將大受上述規定的影響。但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說，則所受影響極爲有限。因爲在此種場合，毛、皮價格的跌落，並不會招致肉價的提高。因爲，該國大部分土地，除飼養牲畜外，即無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只好繼續飼養同數牲畜。家畜肉將仍以同一數量提供市場，家畜肉的需求不會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價格也不會較前加大。肉價保持原狀，毛價比較跌落，於是，牲畜的全部價格就下落，接着，以牲畜爲主要產物的一切土地（即該國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輸出的規定（這種規定，通常說是愛德華三世制定的，實則不然），在當時的情形下，實爲最有害的規定。其實行不但使國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價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遲土地的此後的改進。

蘇格蘭自與英格蘭合併後，其羊毛價格顯著下落。因爲蘇格蘭羊毛自合併時起即與歐洲大市場絕緣，而侷限於不列顛小市場中。如果不是家畜肉價格的上升充分補償了羊毛價格的下落，那末，蘇格蘭南

部各郡主要用於養羊業的大部分土地的價格。必深受這次合併的影響。

人類對於增加羊毛產量生皮產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國牲畜的產量說，必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其要依靠外國牲畜的產量說，又必定是無把握的。就後一層說，與其說要依靠外國出產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倒不如說要依靠外國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同時，外國對於此等原生產物的輸出，是否認為應加以限制，亦對上述努力的實效有影響。凡此均非本國操業者所得自主，所以，人類勤勞在這方面所得的實效，不但受有限制，並且是不確定的。

人類勤勞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類勤勞增加另一種極重要原生產物即魚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這方面的努力，勢必受當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離海洋遠嗎，內地江河湖沼多嗎，此等海洋江河湖沼產出量豐富嗎，這些都很有關係。當人口增多，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增多的時候，魚的購買者必增多。而且，這些購買者，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或換句話說，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的代價來作購買。但是，為供應此擴大了的市場，所投下的勞動量，如不增多到超過市場擴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滿足這擴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來只需要一千噸魚的市場，如擴大到需要一萬噸魚，那末，為供給此市場而增加的勞動量，非超過十倍，就不能滿足這需要。因為在此場合，魚類大都要取自較遠地方，使用的漁船，一定要較大，用以捕魚的工具，一定價格較高。因此，這種商品的真實價格，自然會隨改良增進而上升，我相信，各國的魚價，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捕魚一日能得多少，雖難於確定，然若就一年或數年說，則在一定地方情況下，我們認為，人類捕魚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當確定的，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可是，由於這功效取決於一國財富及勤勞狀態的少，取決於地理位置的多，所以，兩個國家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漁業上人類勤勞的功效，卻可能相同；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相同，這功效卻可能大不相同。捕魚的功效與改良狀態的關係，很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也是我在這裏所要討論的。

人類要增加由地中採出的各種礦物金屬量，特別是比較昂貴的金石量，其勤勞功效，雖似乎沒有限制，但完全不確定。

一國所有貴金屬量的多寡，並不受該國地理情況如礦山肥瘠的限制。沒有礦山的國家，往往擁有大量貴金屬。無論什麼國家，其所擁有的貴金屬的多寡，取決於以下兩種情況。第一，取決於該國的購買力，取決於其產業狀態，取決於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因為這些因素決定它所能用以開採本國礦山的金銀或購買他國礦山的金銀這一類非必要品的勞動與食品的量是多還是少。第二，取決於在一定期間內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礦山的肥瘠程度。因為金銀輸途容易，運費低廉，而且體積小價值大，所以，即離礦山很遠的國家，其金銀量，也要多少受這種礦山肥瘠的影響。中國、印度的金銀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礦山豐饒的影響。

就一國金銀量須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前一情況（購買力）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與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實價格一樣，多半隨該國財富及改良的增進而上升，隨該國的貧困與不振而下降。因為，持有多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和只持有少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比較，在購買一定數量金銀時，一定能支付較大數量的勞動與食品。

就一國金銀量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後一情況（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情況）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買所能交換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必按照那礦山豐饒貧瘠情況的比例而或多或少地升降。

但很明顯，在一定時期內以金銀供給世界的礦山，究竟是豐饒，或是貧瘠，與一特定國家的產業狀態大抵沒有何等關係，而且與一般世界的產業狀態，似乎也沒有何等必然的關係。固然，在技藝與貿易逐漸向世界更廣的地面擴展，而礦山的探索也隨着向更廣的地面擴大的場合，新礦山發現的機會，必比其探索只限於比較狹窄地區的時候來得大。但在舊礦山漸次掘盡的時候，能否發現新礦山是極無把握的事，絕非人類技巧和勤勞所能保證。不是實際發現，不是採掘成功，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價值，甚至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存在。一切跡象都不可靠，這是世所公認的。在進行探索新礦山的時候，人類勤勞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同是無限大的。今後一二世紀中，也許能發現較以前更為豐饒的新礦山，而那時候現在最多產的礦山，將比美洲各礦山發現以前的任何礦山還要顯得貧瘠，這也是可能有的事。無論這

兩者中那一個實現，對於世界的真實財富和繁榮，換言之，對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是無關重要的。這年產物的名義價值，換言之，表明或代表這年產物的金銀量，無疑會有極大的差異，可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其所能購買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卻完全一樣。在前一場合，一先令可能只代表今日一便士所能代表的同量勞動。在後一場合，一便士可能代表今日一先令所代表的同量勞動。但在前一場合，持有一先令的人，並不見得比今日持有一便士的人富，在後一場合，持有一便士的人，也並不比今日持有一先令的人窮。人類從前一場合所享得的唯一利益，是金銀器皿的低廉與繁多，人類從後一場合蒙受的唯一不利，只是這類不關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貴與稀少。

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蒐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作家，大都以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廉，換言之，大都以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作為此等金屬不足的證據，而且作為當時一般國家貧乏野蠻的證據。這種概念，是和那一國富裕由於金銀豐饒、一國貧乏由於金銀不足的經濟學體系分不開的。關於此種經濟學體系，我將於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說明，在此僅論以下事實，即金銀價值的昂貴，僅可證明以此類金屬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貧瘠，決不能證明金銀昂貴國家的貧窮與野蠻。貧國不能象富國購買那麼多的金銀，也不能對於金銀支付那麼高的價格。所以，此等金屬的價值，在貧國決不會比富國更高。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固然，歐洲的財富，自美洲礦山發現以來，已大有增加，同時金銀價值亦逐漸低落。但這種價值的下落，並非起因於歐洲真實財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是起因於曠古未有的豐饒礦山的偶然發現。歐洲金銀量的增加與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雖然是發生在幾乎同一個時期，但其原因卻非常不相同，兩者相互間簡直沒有何等自然關係。金銀量的增加，事出偶然，與任何深慮、任何政策無關，而且深慮與政策，亦無能為力。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則是起因於封建制度的崩潰與新政府的成立。後者對於產業，給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獎勵，即相當保證了各人得享受各人勞動的果實。封建制度至今依舊殘存的波蘭，其貧乏狀況差不多和美洲發現以前無異。然而在波蘭，也

象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樣，穀物的貨幣價格騰貴了，金銀的真實價值下落了。可知在波蘭，貴金屬也象在他國一樣，數量增加了，其增加的數量，就其對該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來說，也和他國相似。可是，這種貴金屬的增加，似乎並不曾增加該國的年產物，不曾增進其製造業及農業，也不曾改善其居民的境遇。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在美洲擁有許多礦山，但在歐洲各國中，恐怕它們是僅次於波蘭的兩個最貧國家了。可是，貴金屬的價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卻一定比歐洲其他地方低，因為，貴金屬是這兩國運往歐洲各地的，不但要附加運費和保險費，而已由於這兩國金銀的輸出，或被禁止或需繳納重稅，還要付走私費用。所以，就其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說，貴金屬量在這兩國一定比歐洲其他各國多。然而，它們卻比歐洲其他各國貧。它們雖已廢除了封建制度，但代興的並不是更好的制度。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國的富裕繁榮，金銀價值的騰貴，換言之，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國的貧困、野蠻。

不過，一國的貧困、野蠻，雖不能取證於穀物的低賤，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鳥獸這類東西的貨幣價格比穀物的貨幣價格來得低這個事實。這類東西貨幣價格的低賤，明顯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此等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佔的面積，較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價，較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財和人口，對其土地面積所持的比例，與普通文明國不同，從而證明其社會狀態向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由一艘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只是那時候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決不能據以推斷該國的貧富。但是，我們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該國是富裕，或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物品貨幣價格騰貴的原因，如全是由於銀價跌落，則一切貨物所受影響，一定相同。即銀價若較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貨物價格，亦必相應地普遍擡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壇的各種食品價格的騰貴，其

程度卻參差不一。就現世紀平均來看，人們公認，即使那些以銀價騰貴來說明谷價騰貴的人也承認，谷價上升率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後者價格的騰貴，決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跌落，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許已可充分說明，為什麼這些食品價格漲得比穀物大，而無須求助於銀價跌落的假設。

單就穀物說，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及最近異常不良季節以前，其價格較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略低。此種事實，不但英國溫莎市場價格表證明其屬實，即蘇格蘭各郡公定谷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二氏所精勤蒐集的許多市場賬簿，亦證明其屬實。此種實證，原極繁瑣難稽，現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們所期望的那麼完備了。

至於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穀物高價，可由季節不良充分說明，不必想到銀價跌落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跌落的見解，實無何等確鑿的根據。既不根據對谷價的觀察，也不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或許有人說：同量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量，即使照上面的敘述，亦遠較前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量為少。他們還說，確定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確定一種徒然的、無益的區別，對一個只攜帶一定量白銀去做買賣或只有一定量貨幣收入的人，並無幫助。我當然不敢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這種區別決不能因此便說是全無所用。

一國的繁榮狀態，可由此區別，得到一平易的左證。所以這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當不無助益。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從它所能推得的，只是美洲礦山的豐饒。儘管有了這種情況，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會日漸衰微，象葡萄牙、波蘭那樣，或者日漸增加，象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這些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該土地產出力的增長，或由於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隼的擴展，由於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堅決地斷定，該國是在繁榮進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

否增加，既能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那無疑不能說對公眾毫無助益，至少能給予公眾以若干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僱員的報酬時，此區別對公眾也有若干助益。若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則此等僱員的金銀報酬（假定以前並未失之過高），便應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依這同一比例減少。但食物價格的騰貴，如果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着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產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麼比例來擡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要否擡高，其判定就成爲一個極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既一定會使一切動物性食物與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提高，它也一定會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下落。它必能使動物性食物價格上漲，因爲生產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已改良而適於穀物的生產，就得對地主和農業家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潤。它必能使植物性食物的價格下跌，因爲由於增加了土地的產出力，這種食物的產量必更爲豐足。而且，農業的改良使許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廉的（因爲所需土地與勞動化穀物少）價格上市。如馬鈴薯，如玉米即所謂印度玉蜀黍，都屬於此類。此兩者爲歐洲農業，或者說歐洲本身，由於通商及航海大發展而得到的二大改良。此外，在農業幼稚狀態下，許多植物性食物，其栽種僅侷限於菜園中，所用器具僅爲鋤。到了農業改進，這些植物就開始在一般農場栽植，並以耕犁從事栽植。如蕪菁、胡蘿蔔、捲心菜等，都屬於此類。因此，在社會改良的進程中，如果某一種食品的真实價格必因而騰貴，那末，另一種食品的真实價格，就必因而跌落。在此場合，要判定前者的漲價，在什麼程度上能由後者的跌價來抵償，那是更微妙的問題。家畜肉價格一旦漲到極點（除豬肉外，一切家畜內在英格蘭大部分地方，似乎已於一世紀前，達到了極點），此後其他各種動物性食物價格，無論如何騰貴，對一般下層階級人民的境遇，是不會有大影響的。英格蘭大部分貧民境遇必不至因家禽、魚類、野禽或鹿肉價格的騰貴而陷於大困苦，團爲馬鈴薯的跌價定可給予一定的補救。

當現今食物缺乏時，谷價昂貴，無疑會使一般貧民受苦。但在普通豐年，穀物以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出售時，他種原生產物價格的自然上升，不會使貧民感到大痛苦。食鹽、肥皂、皮革、麥芽、麥酒等

製造品價格因課稅而發生的人為的上漲，也許會引起他們更大的痛苦。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但是，改良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逐漸降低一切製造品真實價格的結果。隨着改良，一切製造業的費用，大概都會逐漸減低，沒有例外。機械的改善，技巧的進步，作業上更妥當的分工，無一非改良所致，亦無一不使任何作業所需的勞動量大減。誠然，社會狀態，日益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足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餘。

固然，有些製造品，從改良上所得的一切利益，還不足以抵償其原料真實價格的增高。在許多木器的製作，能以最好機器、最大技巧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還抵不過木材真實價格由於土地改良而發生的上漲。

但是，在原料的真實價格沒有增高或增高有限的場合，製造品的真實價格，一定會大大低落。

近兩世紀，物價跌落最顯著的要算那些以賤金屬為原料的製造品了。前世紀中葉需二十餘鎊才能購得的手錶，現在恐怕有二十先令就可購得。刀匠鐵匠所製成的物品，各種鋼鐵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出品設菲爾德出品著稱的一切貨物，其價格跌落的程度，雖然沒有象表價那麼大，但也足使歐洲其他各地工人驚倒。他們在許多場合承認，即使以兩倍甚至三倍的價格，還不能製出同樣優良的產品。也許以賤金屬為材料的這種製造業，比一切其他製造業都更適宜於進行分工，更可進行機械改良。其製造品價格的特別低廉，當無足怪。

在近兩世紀中，毛織業製造品，沒有何等顯著的跌價。反之，最上等毛織物價格，在這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間，和其品質比較，卻上漲了一些。據說，這是因為西班牙羊毛貴了好多。又有人說，完全由英格蘭羊毛製成的約克州毛織物的價格，就其品質說，在現世紀中，已跌落了好些。但是品質的好壞，大有爭辯的餘地。所以這種說法，我都認為未必確實。毛織業上的分工狀況，今日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機械，亦無大變動。但這兩方面可能都有小小改良，使毛織物價格跌落若干。

但是，我們如把此種製造品的現在價格和更遠的十五世紀末葉價格比較。則其跌價就顯得明確得多。那時分工程度，遠不及今日精細，使用的機器，亦遠較今日不完備。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頒佈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碼，零售不得超過十六先令，違者每碼課罰金四十先令”。依此推斷，含銀量約與今幣二十四先令相等的十六先令，當時看做是上等呢一碼的合理價格。當時頒佈此法令，意在取締奢侈，可知普通售價必在十六先令以上。每碼一幾尼在今日可看做此等織物的最高價格。這樣說來，即使假定品質相等，最上等呢的貨幣價格，自十五世紀末葉以來，亦顯有跌落，何況今日最上等呢的質量，可能比當時好得多。至於它的真實價格，則跌落更大。六先令八便士，為當時及此後許久小麥每夸特的平均價格，所以十六先令就是小麥二夸特三蒲式耳多的價格。現在小麥一夸特如評價為二十八先令，則當時最上等呢一碼的真實價格，至少必等於現在英幣三鎊六先令六便士。當時購買這種呢一碼的人，必須支付今日三鎊六先令六便士所能支配的勞動量與食品量。粗呢的真實價格，雖亦顯有跌落，但其跌落程度，沒有上等呢那麼大。

1463年即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佈的法令，限定農業僱工、普通工人、市外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所僱用的僱工，都不得穿用每碼二先令以上的呢。當時二先令，約含有今幣四先令同量的銀。但是，現在每碼值四先令的約克呢，恐怕比當時最苦僱工穿用的呢好得多。所以，這些人所穿衣物的貨幣價格，就其品質說，現在亦比當時低廉。至其真實價格，那是更比當時低廉了。小麥每蒲式耳十便士，當時看做適中合理的價格。所以，二先令，就是當時小麥約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合理價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麥，更值八先令九便士。當時貧困僱工，每購這種呢一碼，所須捨棄的購買力，相當於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購得的食品量。但是，這法令也旨在取締貧民的奢侈與浪費。可知當時貧民通常所穿的衣着，比現在昂貴得多。

這法令，又禁這階級人民，不得穿用每雙價格超過十四便士（約等於今幣二十便士）的長襪。當時十四便士，約為小麥一蒲式耳二配克的價格，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麥要

賣五先令三便士。在我們今日看來，長襪一雙值五先令三便士，對最窮最賤的僱工是貴到極點的價格，然而，當時下級僱工，必須對長襪支付等於這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時代，歐洲各地大概沒有一地方知道織襪技術。當時所穿長襪，都是由普通布匹製成。而這也許是其昂貴原因之一。英格蘭最先穿襪的，據說是女王伊麗莎白，她的襪，是由西班牙大使奉贈的。

往時精粗毛織業所用機械，都遠不及今日完備。這些機械近數百年來，曾經過三次大改良，此外還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數和重要性，現難於確定。三次主要改良如下：第一，以紡條紡錘代替紡輪，其結果，同量勞動，能成就二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若干精妙機械，大大便利和節省絨線毛線的卷繞或經緯線在上機前的安排，這種工作在此等機械未發明前，極其累贅困難。第三，果用漂布機漿洗，代替以往布脫機後入水踐踏使布密緻的方法。在十六世紀初期，英格蘭各地尚不如水車風車。即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國，亦是如此。唯有意大利一國，比這早一些時候採用此等機械。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往時精粗毛織品，何以較現在昂貴。往時，此等貨物上市，更費去更多勞動，所以上市後，必須交換更大量勞動的價格。

英格蘭往時製造粗毛織品的方法，與今日工業幼稚國所用的相同，它大概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偶爾擔當過。但他們通常只在沒有其他工作可做時才做這工作，這工作並不是他們大部分生活資料所仰給的來源。勞動者當作副業製成的物品，其價格總比其生活費完全或大部分取資的製品的價格低得多，那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至於精毛織品，那時候英格蘭尚無製造，而是仰給於商務繁盛的弗蘭德。那時候，該地製造這種毛織品的人，大概也象現在一樣，從這工作取給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費。此外，當時弗蘭德製品，是一種外貨。對國王須繳納若干賦稅，至少，亦得繳納往時通行的噸稅和磅稅。這些稅大概不很高，當時歐洲國家的政策，不在於設高關稅以限制外國製品輸入，卻寧願獎勵商人，使能廉價輸入豪紳顯貴所希求的本國不能自制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粗製品的真實價格，與精製品真實價格相比，何以昔時遠低於今日。

本章的結論

我在此將以下述議論，結束這冗長的一章。即一切社會狀況的改良，都有一種傾向，直接或間接使土地的真實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實財富增大，使地主對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有更大的購買力。

改良及耕作的擴大，可直接擡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產物，必然隨全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生產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实價格的騰貴，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結果，接着，又是促進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原因。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會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地上所得部分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支配他人勞動的能力，會隨土地生產物真實價值的提高而增大，而他在全部生產物中所分的比例亦會隨之增大。這種生產物，在其真實價值增高以後，並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勞動量來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產物中，只須以一較小部分來補償僱用勞動的資本及支付普通的利潤。由是就有較大部分歸地主所有。

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如果能直接使製造品真實價格低落，亦必能間接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通常把他消費不了的原生產物或剩餘原生產物的價格，去交換製造品。凡減低製造品真實價格的事物，無不提高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因為，同量的原生產物，這時候可換得更多的製造品。於是，地主便能購買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裝飾品和奢侈品。

社會真實財富的增加，社會所屬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都有間接提高土地真實地租的傾向。這種勞動量，自然有一定部分流向土地方面。土地上將有更多的人和牲畜從事耕作。土地生產物將隨所投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稅又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至於和上述相反的情況，例如對耕作及改良的忽視，某種土地原生產物真實價格的低落，由於製造技術退步和產業凋敝而發生的製造品真實價格的騰貴，以及社會真實財富的衰落等等，都傾向於減低土地的真實地租，減少地主的真實財富，使地主對於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只有較小的購買力。

上面已經說過，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級，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歸根結底，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由此可見，這三大階級中，第一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和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凡是促進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促進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在關於商業及政治問題的公衆集議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打算，決不會貽誤國家，至少，在他們對本階級利益具有相當知識的場合是如此。但實際上，他們往往缺乏這種知識。他們在上述三階級中，算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用勞力，不用勞心，更用不着任何計劃與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這一階級所處的安樂穩定地位，使他們自然流於懶惰。懶惰不但使他們無知，並使他們不能用腦筋來預測和了解一切國家規章的後果。

第二階級即靠工資過活的階級的利益，也同樣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勞動工資最高的時候，就是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所僱勞動量逐年顯著增加的時候。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處於不增不減的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馬上就會低落，只夠他們贍養家庭，維持種類。當社會衰退時，其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一限度以下。勞動者在繁榮社會中不能享得地主階級那樣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會中卻要蒙受任何階級所經驗不到的痛苦。但是，勞動者的利益，雖與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但他們沒有了解一般社會利益的能力，更沒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係。他們的狀況，不能讓他們有接受各方必要消息的時間，即使有此時間，他們的教育和習慣，也不能使他們對任何消息作出適當的判斷。因此，在公衆集議時，只在特殊場合，即在僱主為着自己的特殊目的，而不是為着勞動者的利益，出來鼓動並支持勞動者發言的場合，勞動者才發表意見。此外，勞動者能發言的，很不多見，其議論受到尊敬的，更為少聞。

勞動者的僱主即靠利潤為生的人，構成第三個階級。推動社會大部分有用勞動活動的，正是為追求利潤而使用的資本。資本使用者的

規劃和設計，支配指導着勞動者的一切最重要動作。但他們這一切規劃和設計，都是以利潤為目標。利潤率不象地租和工資那樣，隨社會繁榮而上升，隨社會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國自然低，在貧國自然高，而在迅速趨於沒落的國家最高。因此，這一階級的利益與一般社會利益的關係，就和其他兩階級不同。在這一階級中，商人和製造業者通常是使用資本最大的兩階層。因為他們最富裕，所以最為社會所尊敬。他們終日從事規劃與設計，自比大部分鄉紳具有更敏銳的理解力。可是，因為他們通常為自己特殊事業的利益打算，而不為社會一般利益打算，所以，他們的判斷，即使在最為公平（不總是如此）的場合，也是取決於關於前者的考慮，而很少取決於關於後者的考慮。他們比鄉紳高明，與其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公眾利益，倒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於這種比較優越的理解，他們往往利用鄉紳的寬宏施行欺騙手段，使他老老實實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眾利益，唯有他們的利益纔是公眾利益，並使他僅僅憑了這單純而誠篤的信念，捨棄自己的利益和公眾的利益，去遷就他們。其實，不論在哪一種商業或製造業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縮小競爭，無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往往對於公眾有利，後者卻總是和公眾利益相反。縮小競爭，只會使商人的利潤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餘市民卻為了他們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負擔。因此，這一階級所建議的任何新商業法規，都應當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懷疑態度作了長期的仔細檢查以後，決不應隨便採用。因為他們這般人的利益，從來不是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說，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在於壓迫公眾。事實上，公眾亦常為他們所欺騙所壓迫。

第二篇 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

序論

在無分工，少交換，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給的原始社會狀態下，要經營社會事業，無須預儲資財。人人都力圖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餓了便到森林去打獵；衣服壞了，便剝獸類的皮革來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樹枝草皮，盡其所能，加以修葺。

在徹底實行分工之後，一人自己勞動的產物，便僅能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的極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賴他人勞動的產物來供給。這種產物必由購買而得。購買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產物，或者說，他自己產物的價格。但在購買以前，不僅自己勞動的產物要已經作成，還要已經賣掉，所以至少在這兩件事情能夠辦到以前，必須先在某個地方儲有各色各樣的貨物，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提供材料和工具供他使用。例如織匠在織物尚未作成、尚未賣掉以前，要不是在自己手中或他人手中有所蓄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給他提供材料和工具，他就織不出任何東西。很明顯，這種儲蓄非在他開始從事這項職業很久以前完成不可。

按照事物的本性，資財的蓄積，必須在分工以前。預蓄的資財愈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細密，而分工越細密，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個工人所擔任的操作，既漸趨簡單，便有各種新機械發明使操作更為簡便迅速。所以，當分工進步了的時候，僱用工人數目不變，所必須預先儲有的食物供應，要和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相同；而必須預先儲蓄的材料和工具，卻要比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所需要的來得多。況且，一種行業分工越是細密，它的工人人數往往越是增加；更確切地說，使他們分工能夠越來越細密的，就是他們人數的增加。

要這樣大大改進勞動生產力，預蓄資財是絕對必要的。而這種蓄積，亦自然會導致這種改進。投資僱用勞動的人，自然希望投資方法能夠儘量產出最大量的產品。所以，對工人職務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適當；在能夠發明或購買的限度內，他所備置的機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這兩方面，他的能力怎樣，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資財，看他能僱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國家裏，不僅產業的數量隨着舉辦產業

的資財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於資財增加的結果，同量產業所能生產的產品亦會大增。

我在本篇所要說明的是：資財的性質怎樣，資財蓄積對各種資本的影響怎樣；資本用途不同，其影響又是怎樣？本篇共分五章。我們知道，一個人或一個大社會的資財，自然會分成幾個部門，所以在第一章，我要說明什麼是這些部門。我們把貨幣看做社會總資財的一個特殊部門，所只在第二章，我要討論貨幣的性質和作用。積為資本的資財，或由所有者自己使用，或貸與他人使用，所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要就這兩種情形加以討論。第五章所要討論的，是資本的不同用途，對國民產業量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量，會直接發生什麼不同的影響。

序論

在無分工，少交換，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給的原始社會狀態下，要經營社會事業，無須預儲資財。人人都力圖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餓了便到森林去打獵；衣服壞了，便剝獸類的皮革來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樹枝草皮，盡其所能，加以修葺。

在徹底實行分工之後，一人自己勞動的產物，便僅能滿足自身隨時發生的需要的極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賴他人勞動的產物來供給。這種產物必由購買而得。購買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產物，或者說，他自己產物的價格。但在購買以前，不僅自己勞動的產物要已經作成，還要已經賣掉，所以至少在這兩件事情能夠辦到以前，必須先在某個地方儲有各色各樣的貨物，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提供材料和工具供他使用。例如織匠在織物尚未作成、尚未賣掉以前，要不是在自己手中或他人手中有所蓄積，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並給他提供材料和工具，他就織不出任何東西。很明顯，這種儲蓄非在他開始從事這項職業很久以前完成不可。

按照事物的本性，資財的蓄積，必須在分工以前。預蓄的資財愈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細密，而分工越細密，同一數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個工人所擔任的操作，既漸趨簡單，便有各種新機械發明使操作更為簡便迅速。所以，當分工進步了的時候，僱用工人數目不變，所必須預先儲有的食物供應，要和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相同；而必須預先儲蓄的材料和工具，卻要比在分工沒有這樣進步時所需要的來得多。況且，一種行業分工越是細密，它的工人人數往往越是增加；更確切地說，使他們分工能夠越來越細密的，就是他們人數的增加。

要這樣大大改進勞動生產力，預蓄資財是絕對必要的。而這種蓄積，亦自然會導致這種改進。投資僱用勞動的人，自然希望投資方法能夠儘量產出最大量的產品。所以，對工人職務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適當；在能夠發明或購買的限度內，他所備置的機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這兩方面，他的能力怎樣，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資財，看他

能僱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國家裏，不僅產業的數量隨着舉辦產業的資財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於資財增加的結果，同量產業所能生產的產品亦會大增。

我在本篇所要說明的是：資財的性質怎樣，資財蓄積對各種資本的影響怎樣；資本用途不同，其影響又是怎樣？本篇共分五章。我們知道，一個人或一個大社會的資財，自然會分成幾個部門，所以在第一章，我要說明什麼是這些部門。我們把貨幣看做社會總資財的一個特殊部門，所只在第二章，我要討論貨幣的性質和作用。積為資本的資財，或由所有者自己使用，或貸與他人使用，所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要就這兩種情形加以討論。第五章所要討論的，是資本的不同用途，對國民產業量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量，會直接發生什麼不同的影響。

第一章論資財的劃分

一人所有的資財，若僅足維持他數日或數週的生活，他很少會想從這筆資財取得收入。他將慎之又慎地消費它，並且希望在使用完它之前，能依靠自身的勞動，取得一些東西來作補充。在這場合，他的收入完全來自他的勞動。各國貧窮勞動者大部分就是過這種生活。

他所有的資財，如足夠維持他數月或數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這筆資財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將僅保留一適當部分，作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費，以維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資財於是分成兩部分。他希望從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稱為資本。另一部分，則供目前消費，其中包含三項東西：（一）原為這一目的而保留的那部分資財；（二）逐漸得來的收入，不論來源如何；（三）用以上兩項於以前買進來但至今尚未用完的物品，如被服、傢俱等等。為目前的消費而保留的資財，或包含三項之一，或三項之二，或三項全有。

對投資者提供收入或利潤的資本，有兩種使用方法。

一，資本可用來生產、製造或購買物品，然後賣出去以取得利潤。這樣使用的資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狀時，對於投資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潤。商人的貨物，在未賣出換得貨幣以前，不能提供收入或利潤；貨幣在未重新付出換得貨物以前，也是一樣。商人的資本不斷以一個形態用出，以另一個形態收進；而且也只有依靠這種流通，依靠這種繼續的交換，纔有利潤可圖。因此，這樣的資本可稱為流動資本。

二，資本又可用來改良土地，購買有用的機器和工具，或用來置備無須易主或無須進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潤的東西。這樣的資本可稱為固定資本。

不同職業所必需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的比例，極不相同。

譬如，商人的資本便全然是流動資本。他簡直無需使用機器或工具，除非把商店或堆棧看做機器或工具。

手工業者和製造者的資本，一部分就須固定在工具上。不過，這部分的大小，各業不同，有的行業很小，有的行業很大。裁縫業者除了一包針外，不需別種工具。製鞋業者的工具比較值錢些，但多得有限。織布業者與製鞋業者比較，工具就貴得多了。但是，這一類手工

業者的資本，大部分是流動的，起初或作為工人工資而流出，或作為原材料價格而流出，然後再從產品價格流入，其中含有利潤。

在別種事業，就需要大得多的固定資本了。譬如，一個大鐵工廠，要設置熔鐵爐、鍛冶場、截鐵場，非有極大經費不可。至若開採煤礦所需的吸水機以及其他各種機械，所費還要多。

就農業家說，用於購買農具的資本是固定的；用於維持工人與支付工資的資本是流動的。前者他保管在手中從而獲取利潤，後者他支付出去從而獲取利潤。耕畜的價格或價值，和農具一樣，可稱為固定資本；飼養牲畜的費用，和維持工人的費用一樣，可稱為流動資本。農業家獲取利潤的方法，一為保有耕畜，一為支付飼養牲畜的費用。但只售賣為目的，非以代耕為目的的牲畜，其購買費和飼養費，卻都應歸入流動資本之內。在這裏，農業家靠出賣牲畜以取得利潤。在生產牲畜的國家，非以代耕或販賣為目的，而是以剪毛、擠乳、繁殖以求利潤為目的而買入的羊或牛，應當稱為固定資本；在這裏生利的方法在於保有它們。它們的維持費是流動資本；在這裏，生利的方法在於付出維持費。賺回維持費的時候，維持費的利潤及牲畜全部價格的利潤，都會在羊毛價格、產乳價格、繁殖價格上，提供出來。種子的全部價值，亦可稱為固定資本。種子雖往返於土地與穀倉之間，但未更換主人，所以沒有真正地流動過。農業家獲取利潤，不是靠出售種子，而是靠種子孳生產品。

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總資財，即是其全體居民的資財，所以，亦自然分作這三個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

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費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潤。已由消費者購買，但尚未完全消費掉的食品、衣服、傢俱等物，屬於這一類。僅供居住的國內房屋，也是這個部分中的一個部分。投在房屋上的資財，如該屋是由其所有者自住，那末，從那時起，即失去資本的作用，就是說，它對屋主不提供任何收入。這樣的住屋，雖然象衣服、傢俱一樣對他很有用，但也象衣服、傢俱一樣，不能給他提供收入。它只是費用的一部分，不是收入的一部分。租屋與人，可以取租，但房屋本身不能生產任何東西，租戶仍須從勞動、資本或土地上所得的收入來付租金。所以，對於屋主私人，它雖提供收入，因而有資本作用，但對社會公眾，則不提供收入，不能有資本作用。它絲毫

不能增加全體人民的收入。同樣，衣服和傢俱，有時亦可提供收入，從而對特殊個人有資本作用。化裝舞會盛行的地方，就有人以出租化裝衣服為業，租期一夜。傢俱商人常常論月或論年出租傢俱；葬儀店往往論日論星期出租葬儀品。還有許多人出租備有傢俱的房屋，不僅收取房租，還收取傢俱租。總之，這種租借事件隨地都有。但由出租此種物品而得來的收入，歸根結底總是出自別種收入來源。此外，尚有一事須加以注意，即無論就個人說或就社會說，在留供目前消費的各種資財中，消費最慢的是投在房屋上的那一部分。衣服可穿用數年，傢俱可使用五十年或一百年，但建築堅固、保護周全的房屋，卻可使用好幾百年。不過房屋雖要好久時間纔會消耗掉，但它仍是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和衣服、傢俱一樣。

第二部分就是固定資本。其特性是不必經過流通，不必更換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潤。其中主要包含四項：

第一，一切便利勞動和節省勞動的有用機器與工具。第二，一切有利潤可取的建築物，如商店、堆棧、工場、農屋、廠舍、穀倉等。這類建築物，不僅對出租房屋的屋主提供收入，而且對納租的人也是獲取收入的手段。這種建築物和住屋大不相同。這是營業上的用具，也應該視為營業上用具。第二，用開墾、排水、圍牆、施肥等有利可圖的方法投下的使土地變得更適於耕作的土地改良費。改良的農場好象有用的機器，可以便利勞動，節省勞動；它使投資者投下的等量流動資本能提供大得多的收入。這兩者是一樣有利的，但機器較易磨損，而改良的土地卻比較耐久。農業家除了按照最有利的辦法，投下耕作所必須投下的資本以外，對於土地簡直用不着什麼修繕。第四，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學習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學徒，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象已經實現並且固定在學習者的身上。這些才能，對於他個人自然是財產的一部分，對於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產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的熟練程度，可和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其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固定資本。學習的時候，固然要花一筆費用，但這種費用，可以得到償還，兼取利潤。

第三部分是流動資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要靠更換主人而提供收入。它也包含四項：

第一，貨幣。賴有貨幣，其他三項才能週轉而分配給真正的消費者。第二，屠戶、牧畜家、農業家、谷商、釀酒商等人所有的食品，他們出售這種食品，可以獲得利潤。第三，還在耕作者、製造者、布商、木材商、木匠、瓦匠等人手中的衣服、傢俱、房屋三者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否是純粹的原料或半加工的材料，可以不問；只要未曾製成衣服、傢俱或房屋，即屬於這項。第四，已經制成，但仍在製造者或商人手中，未曾賣給或分配給真正消費者的物品，例如鍛冶店、木器店、金店、寶石店、瓷器店以及其他各種店鋪櫃檯上陳列着的製成品。這樣，流動資本包含各種商家手裏的食品、材料、製成品及貨幣。食料、材料、製成品的流轉和分配，都須有貨幣。不然就不能到達最後使用或消費它們的人手中。

這四項中，有三項——食品、材料、製成品——通常在一年內，或在較一年為長或短的期間內，會由流動資本變成固定資本，或變成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

固定資本都是由流動資本變成的，而且要不斷地由流動資本來補充。營業上一切有用的機器工具，都出自流動資本。流動資本提供建造機器的材料，提供維持建造機器的工人的費用。機器製成以後，又常須有流動資本來修理。沒有流動資本，固定資本不能提供任何收入。工作所用的材料，工人生存所賴的食料，都出自流動資本。沒有流動資本，即使最有用的機器工具，亦不能生產一點東西。土地無論怎樣改良，沒有流動資本，亦不能提供收入。維持耕作和收穫的工人，也非有流動資本不可。

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具有同一目的，也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使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不致匱乏，而且能增加。人民的衣食住，都仰給於這種資財。人民的貧富，亦取決於這兩種資本所能提供的這項資財是豐饒還是貧乏。

爲了補充社會上固定資本和供目前消費的資財，需要不斷從流動資本中抽出大部分，所從流動資本亦須有不斷的補充。沒有這仲補充，流動資本不久就會幹竭。這種增什有三個主要來源，即土地產物、礦山產物、漁業產物。達三個資源不斷供給食料和材料。其中有一部分通過加工製爲完成品。正是由於這種供給，從流動資本年抽出的食料、材料、完成品，纔有了新的補充。此外，還必須從礦山採取所

需要的維持和補充用來作為貨幣的金屬。在普通情況下，貨幣雖無須從流動資本抽出來作為固定資本或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但象其他東西一樣，貨幣難免磨損，難免輸往外國，所以仍須不斷加以補充，不過數量小得多罷了。

土地、礦山和漁業都需要有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來經營；其產物，不僅要償還這樣投下的資本，益以利潤，還要償還社會上一切其他資本，益以利潤。製造者每年消費的食品和材料，山農民年年為之補充；農民每年消費的工業品，由製造者年年為之補充。這兩個階級同，雖很少以製造品和農產品互相直接交換，但他們之間年年進行交換的實際情況，卻就是如此。我們知道，農民所有的是穀物、牲畜、亞麻、羊毛；他所要的是衣服、傢俱、工具。買穀物、牲畜、亞麻、羊毛的人，不見得就是賣衣服、傢俱、工具的人。所以農民先用原生產物換取貨幣；有了貨幣，他就可隨地購買他所需要的製造品。經營漁業和礦業的資本，亦至少有一部分由土地來補充。從水裏捕魚，從地裏掘礦，都少不了地面上的產物。

在它們自然生產力大小相等的場合，土地、礦山和漁場的產額，都和投資數量的大小與資金用法的好壞成比例。在資本數量相等，投資方法又同樣適當的場合，它們的產量就和它們的自然生產力的大小成比例。

在一切生活比較安定的國家裏，有常識的人，無不願用可供他使用的資財來求目前享樂，或求未來利潤。如是用來求目前享樂，那它就是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如是用來求未來利潤，那未求利潤的方法，不是把資財保留在手裏，就是把資財花用出去。在前一場合，它是固定資本；在後一場合，它是流動資本。在生命財產相當安全的場合，一個人如果不把他所能支配的一切資財（不管是自有的或借入的）用於這些用途之一，說他不是瘋狂，我是不能相信的。

如果不幸，國家專制，君主暴虐，人民財產隨時有受侵害的危險，那末，人民往往把資財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這樣，當他們所時時刻刻提防的災難一隻臨頭的時候，他們就可隨時把它帶往安全地方。據說，在土耳其，在印度，並且我相信在亞洲其他各國，都常有這種事情。在封建暴虐時代，我國似乎也有過這種情形。發掘的寶物，當時被視為歐洲各大國君主的一項大收入。凡埋藏地下、無從證明屬於

誰的物品，概視為國王所有，非得國王特令恩准，那就既不屬於發現者，亦不屬於地主。此種寶藏，在當時極受重視。當時的金銀礦產亦復如此。倘非明令特許，金銀礦產並不包含在普通土地所有權之內。隨意開採是不行的。但鉛、銅、錫、煤各種礦山，因比較不重要，所以聽任人民開採。

第二章 論作為社會總資財的一部門或作為維持國民資本的費用的貨幣

在第一篇，我曾指出：因為商品的生產和上市，曾經使用勞動、資本與土地，所以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都分解為三個部分，其一為勞動工資，其二為資本利潤，其三為土地地租。誠然，事實上有些商品的價格，僅由兩部分構成，即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甚至還有極少數商品的價格，單單由一部分構成，即勞動工資。但無論如何，商品價格終歸成為上述那三個部分中的一個或全部。不歸於地租也不歸於工資的部分，必歸於利潤。

就各特殊商品分別論述，情形已如上述，就構成全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全部商品而總括論述，情形亦必如此。我在第一篇說過：一國年產物的總價格或總交換價值，亦必分解為這三個部分而分配於國內各居民。不是作為勞動工資，不是作為資本利潤，就是作為土地地租。

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全部價值，雖如此分歸各居民，而成為各居民的收入，但是，好象個人私有土地的地租可以分為總地租和純地租一樣，國內全部居民的收入，亦可分為總收入和純收入。

個人私有土地的總地租，包含農業家付出的一切；在總地租中，減去管理上、修繕上各種必要費用，其餘留給地主支配的部分，稱為純地租。換言之，所謂純地租，就是在不傷害其財產的條件下可留供地主目前消費的資財，或者說，可用來購置衣食，修飾住宅，供他私人享樂的資財。地主的實際財富，不視其總地租的多寡，而視其純地租的多寡以為定。

一個大國全體居民的總收入，包含他們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其餘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純收入。換言之，所謂純收入，乃是以不侵蝕資本為條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資財。這種資財，或留供目前的消費，或用來購置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娛樂品等等。國民真實則富的大小，不取決於其總收入的大小，而取決於其純收入的大小。

很明顯，補充固定資本的費用，決不能算在社會純收入之內。有用的機器，必待修補而後能用；營業上的工具，必待修補而後能工作；有利可圖的房屋，必待修繕而後有利可圖。這種修茸所必要的材料，只及把這種種材料製為成品所需要的勞動產品，也都不能算作社會上的純收入。固然，這種勞動的價格，也許會成為社會純收入的一部分，因為從事此種勞動的工人，可能要把工資的全部價值作為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但就別種勞動說，那就不僅勞動的價格歸入這種資財，而且勞動的產品，也歸入這種資財；勞動的價格歸入工人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勞動的產品則成為別人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別人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都由工人的勞動而增加。

固定資本的目標，在於增加勞動生產力，換言之，在於使同一數目的工人能夠完成多得多的工作。設備完全，有必要的建築物、圍牆、水溝、道路等等的農場，和沒有這些設備的農場比較，即使廣狹相等，肥瘠相等，勞動人數相等，役畜數目相等，所獲產物也必多得多。有最精良機器設備的廠坊，和工具不這麼完備的廠坊比較，雖所僱工人的人數相等，出產量亦一定會大得多。適當地花在固定資本上面的任何費用，一定都能很快地帶回很大的利潤，而且年產物價值由此而來的增加，會比這類改良物所必要的維持費大得多。不過這種維持費，要動用這種年產物的一部分。原來可直接用只增加食品、衣料、住所以及各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材料和人工，就有一部分改作他用。這新的用途當然是很有利的，但與原來的用途不同。因此我們說，機械學的改良，使同一數目的工人，得以較低廉較簡單的機器，進行同量的工作，這委實是社會的福利。從前比較昂貴複雜的機器，其修補常須費去一定數量的材料和人工。現在機器改良了，這一定數量的材料和人工，可以節省下來，再憑藉某種機器的力量，用來增加產品的數量。譬如，大製造廠主原來每年須以一千鎊作為機器修理費，現在，倘使能夠把修理費成為二百鎊，其餘五百鎊出可用以增購材料，增加工人。這樣，帆器產品的數量，自然會增加起來。產品增加了，由此種產品而產生的社會福利，亦跟着增加。

在一個大國，固定資本的維持費，可與私有土地的修理費相比。保持土地產物，從而保持地主的總地租和純地租的數額，都常須有修

理費。但當措施得宜，修理費減少，而產物並不減少時，則總地租至少依舊不減，而純地租則一定會增加起來。

但是，固定資本的維持費，雖然不能列在社會純收入之內，但流動資本的維持費，卻不能與此並論。流動資本包含四部分，即貨幣、食料、材料、製成品。我們說過，後三部分，經常由流動資本中抽出，變作社會上的固定資本或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凡不變為固定資本的消費品，就變作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而成為社會純收入的一部分。所以，維持這三部分流動資本，並沒從社會純收入抽出任何部分的年產物，只維持固定資本，才需要從社會純收入中抽出一部分年產物。

就這點看，社會流動資本便與個人流動資本不同。個人的流動資本，決不能算作個人的純收入；個人的純收入全由他的利潤構成。但社會流動資本，雖由社會內各個人的流動資本合成，但不能因此便說社會流動資本絕對不是社會純收入的一部分。商店內存的貨物，雖然不是商人自己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但可以是別人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由別種財源取得收入的他人，可經常以該收入補還商人的貨物的價值，以及償付商人的利潤。商人的資本不會減損，享用者的資本辦不會減損。

因此，社會流動資本中只有一部分，其維持會減少社會純收入。這一部分就是貨幣。

貨幣雖為流動資本的一部分，但就它對社會收入的影響說，它和固定資本是很相象的。

第一，營業上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建造與維持，是需要一項費用的。這項費用，雖然是社會總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從社會純收入中扣除下來的。貨幣亦然。貨幣的收集與彌補，亦需要一項費用，這種費用雖然是社會總收入的一部分，但也是從社會純收入中扣除下來的。貨幣是商業上的大工具，有了它，社會上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娛樂品，才得以適當的比例，經常地分配給社會上各個人。但它是非常昂貴的工具。這昂貴工具的維持，必須費去社會上一定數量極有價值的材料即金銀和一定數量極其精巧的勞動，使其不能用來增加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即不能用來增加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

第二，無論就個人說或就社會說，構成固定資本的營業上使用的機器和工具，都不是總收入或純收入的一部分。貨幣亦然。社會的全部收入，雖賴貨幣能經常分配給社會各成員，但貨幣不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貨幣只是貨物藉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不相同。構成社會收入的只是貨物，而不是流通貨物的輪轂。計算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時，必須從每年流通的全部貨幣與全部貨物中，減去貨幣的全部價值，一個銅板也不能算在裏面。

這個議論會使人覺得有些詭辯或有疑問，只因所用文字曖昧不明；如果解釋適當，理解無誤，那幾乎是自明的。

我們說一定數額貨幣時，有時指的僅是貨幣內含的金塊，有時又暗暗地指這數額貨幣所能換得的貨物，即指因佔有這數額貨幣而取得的購買力。譬如，我們說英國的通貨計一千八百萬鎊時，我們的意思不過說，據某作家計算或設想，英國現今流通這這麼多金塊。但若說某甲年收入五十鎊或一百鎊時，我們通常所指的，不僅是他每年可收入的金塊量，而只是他每年可以購買或可以消費的貨物的價值。我們通常用這句話來表示他是怎樣生活，或者說，他應該怎樣生活，換言之，他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就數量說，就質量說，該是怎樣？

我們說一定數額貨幣，意思不僅指這數額貨幣內含的金塊，內中還暗指這一數額貨幣所能換得的貨物，所只，在這場合，這數額貨幣所表示的財富或收入，決不能同時等於這兩種價值，卻只能等於二者之一。僅與其說等於前者，無寧說等於後者；與其說等於貨幣，無寧說等於貨幣所值。設某甲每星期領養老金一幾尼，一星期內，他可用這一幾尼購買一定數量的生活品。便利品、娛樂品。他每星期的真實收入，換言之，他的真實財富，即和這數量的大小成比例。他每星期的收入，決不能同時與一幾尼相等，又與這一幾尼所能購買的貨物相等。它只等於二者之一。事實上，與其說等於前者，無寧說等於後者；與其說等於這一幾尼，無寧說等於這一幾尼所值。

如果這人的養老金，不以金付給，卻每星期付以一幾尼的票據一紙，很明顯，他的收入，與其說是這一片紙，無寧說是這一片紙所能換得的物品。一個幾尼，亦可以看作一張票據。有了這張票據，可以向鄰近各個商人，支取一定數量必需品和便利品。構成取得這些物品

的人的收入，與其說是餘塊，無寧說是他因佔有這個幾尼而能夠換得的貨物。如果這一個幾尼竟然不能換得什麼物品，那它的價值，就象對破產者所開的票據，同樣沒有價值。

一國全體居民每星期或每年的收入，雖然都可以是，而且實際也是，由貨幣支付，但無論如何，他們真實財富的大小，他們全體每星期或每年的真實收入的大小，總是和他們全體用貨幣所能購買的消費品最的大小成比例。這樣，他們全體收入的全部，顯然不能又等於這貨幣，又等於這消費品，而只等於這兩價值之一，與其說等於前一價值，無寧說等於後一價值。

我們常用一個人每年領受的金額，來表示這個人的收入。但所以如此，只因爲這個金額，可以支配地的購買力，換言之，可以支配他每年所能取得的消費品的價值。我們仍然認爲，構成他的收入的，是這種購買力或消費力，而不是含有這種力量的金塊。

如果就個人說，情形已經十分明白，那末，就社會說，情形還更明白。一個人每年領受的金額，往往恰好等於他的收入；亦即國此故，他所領受的金額，最能簡切明白表示他收入的價值。但流通在社會間的金額，決不能等於社會全體人員的收入。同一幾尼，今日付甲，作爲甲的養老金，明日可付乙，作爲乙的養老金，後日又可付丙，作爲丙的養老金。所以在任何國家，年年流通着的金額，和年年付出的養老金比較，價值都要小得多。但購買力，換言之，由陸續付出的全都養老金陸續買進的全部貨物，和這全部養老金比較，卻總具有同樣的價值；同樣，全體領取養老金的人的收入，也必定與這全部養老金具有同樣的價值。構成社會收入的，決不是金塊；社會上所有的金塊，其數量比它的價值要小得多。構成社會收入的，實是購買力，是那些輾轉在各個人手中流通的金塊陸續購得的貨物。

貨幣是流通的大輪轂，是商業上的大工具。象一切其他職業上的工具一樣，那是資本的一部分，並已是極有價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把收入分配給應得收入的人，固然是靠了鑄幣內含金塊的流通，但那金塊，決不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

最後，構成固定資本的機器和工具，還有一點類似貨幣那一部分流動資本。建造和維持機器的費用的節省，若不減損勞動生產力，就

是社會純收入的增進。同樣，收集和維持貨幣這一部分流動資本的費用的節省，亦是社會純收入的增進。

固定資本維持費的節省，為什麼就是社會純收入的增進，這問題，是夠明白的，而且我們曾作出局部的解釋。企業家的全部資本，必然會分作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在資本總額不變的場合，二者互相消長，乃勢所必然。這部分越小，那部分就越大。提供材料，支給工資，推動產業的，是流動資本。所以，固定資本維持費的節省，若不減損勞動生產力，就一定會增加推動產業的基金，從而增加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

以紙代金銀幣，可以說是從低廉得多的一種商業工具，代替另一種極其昂貴的商業工具，但其便利，卻有時幾乎相等。有了紙幣，流通界無異使用了一個新輪，它的建立費和維持費，比較舊輪，都輕微得多。但它怎樣作流通的輪轂，怎樣可增加社會的總收入或純收入呢，箇中理由，人們還不甚明瞭，所以，需要進一步的說明。

紙幣有好幾種，各不相同；銀行的流通券，是最普通的，最合用的。一國人民若相信某銀行家資產雄厚，行為誠實，處事謹慎，換言之，相信他有隨時兌換現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銀行家發行的鈔票，便可在社會上通用，無異於金幣銀幣。

假設某銀行家，以十萬鎊期票，借給他的顧客，這種期票，既然和貨幣有同等作用，所以，債務人自當償付利息，象借入貨幣一樣。這利息，便是銀行家得利的來源。發出去的期票，固然有一部分會不斷回來兌現，但總有一部分不斷在社會上流通。所以，他發出去的期票，雖然是十萬鎊，但有二萬鎊金銀幣，常常足夠應付不時的需要。這樣，這種期票的發行，使二萬鎊金銀幣可收十萬鎊金銀幣的功用。同一數量消費品的交換，同一數量消費品的週轉和分配，可通過這十萬鎊期票而實現，和通用十萬鎊金銀相同。因之，國內流通用途，可省八萬鎊的金銀。假設國內銀行林立，都依達辦法經營，那末，這時流通國內貨物所需的金銀，就不過等於沒有這期票時代所需的五分之一了。

讓我們假設，某個國家某個時代的通貨總共為一百萬鎊，這個數目已夠流通國內全部年產物。再讓我們假定，後來因為銀行林立，發行兌現的期票一百萬鎊，而在金櫃內保留二十萬鎊，以應不時的需

要。這樣，在流通界就有了八十萬鎊金銀幣，和一百萬鎊期票，總共一百八十萬鎊了。但國內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流通、週轉和分配，原來只需要一百萬鎊；現在，銀行的作用又不能馬上增加國內年產物數額。所以，在有銀行作用以後，流通國內年產物，一百萬鎊仍是足夠的。待售待買的貨物量照舊，用以買賣的貨幣量，亦自然可以照舊。流通的渠道——如果這名稱適當——自必完全照舊。一百萬鎊，就足以充滿渠道了。逾這限度，灌注下去，勢必溢而旁流。現在，我們灌注下了一百八十萬鎊了。八十萬鎊定然會溢流出米，這數額是國內流通界所容納不下的。但是，國內不能容納的數目，置之不用，又未免損失太大。因此，一定會把它送到外國去尋求在本國尋求不到的有利用途。不過，紙幣是不能送到外國去的，國為外國離發行銀行遠，離可使用法律強迫其兌現的國家遠，所以，紙幣在外國是個能通用的。送到外國去的，一定是八十萬鎊金銀。國內流通的渠道，以前由一百萬鎊金銀充滿，現在，卻將由紙幣一百萬鎊充滿了。

這巨量金銀送往外國，決不是無所為的，決不是送給外國作禮物的。它的外流，定然會換進一些外國貨來，供本國人消費，或轉賣給別國人民消費。假使運金銀的人是甲國人民，他們現今用這巨量金銀，購乙國貨物，供兩國人民消費。他們所經營的，就是所謂販運貿易。由此獲得的利潤，當然是甲國純收入的增進。所以，這巨量的金銀，就象新創的基金一樣，可用以開辦新的事業。國內事業，現由紙幣經營，金銀就移轉過來，作為這種新事業的基金。

如果他們用這巨量金銀，購外國貨物，來供本國消費，那買進來的貨物，不是（一）遊惰階級消費的貨品，如外國葡萄酒、外國綢緞等等，就一定是（二）更多的材料、工具和食料等，從而維持和僱用更多的勤勞人民，這些人民再生產出他們每年消費的價值，外加利潤。

如果用於前一途徑，就無異鼓勵奢侈，增加消費，而不增加生產，不增加維持這項消費的固定基金，對社會無論就那一點說，都是有害的。

如果是用於後一途徑，卻可鼓勵勤勞，雖然會增加社會上的消費，但也會提供維持這項消費的固定資金。消費者會把每年消費的價值，全都再生產出來，同時提供利潤。社會上的總收入，換言之，社會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勢將增加起來，其增加的數量，等於工人

對加工材料所增加的全部價值。社會的純收入，也必然增加，其增加的數量，等於上述價值減去這些工人使用工具機械所需要的維持費後剩下的價值。

由於銀行作用而被排往外國的金銀，假如是用來購買本國消費的外國貨物，就有大部分是，而且一定是，用來購買第二類貨物。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幾乎是必然的。固然，也何這詳的人，他們的收入雖沒有增加，卻忽然大揮霍起來，但我相信，世界上，決沒有一個階級，全是這麼辦。謹慎從事，固然不能望於人人，但至少，一個階級，總有大多數人不侈靡，不亂花錢，這大多數人的行為，總能奉行謹慎的原則。至於那般遊惰者，作為一個階級，他們的收入，既不能由於銀行的作用而增加毫厘，所以，除了少數實際的例外，他們這一階級的費用，亦不能由於銀行的作用而增加。遊惰階級對外國貨物的需求，是照舊的，或者大概照舊。由於銀行作用而排往外國購買外國貨物以供本國消費的貨幣，亦只有一極小部分，是用來購買這般人需用的物品。其中大部分當然是用來振興實業，不是用來獎勵遊惰。

我們計算社會流動資本所能推動的勞動量時，常須記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社會流動資本中，僅可計算食料、材料、製成品三項。而由貨幣構成，僅用以實現這三項流通的部分，必須減去。推動產業，需要三件東西，即材料、工具和工資。材料是工作的對象；工具是工作的手段；工資是工人作工的目的。貨幣既不是工作的材料，亦不是工作的工具；工資雖普通用貨幣支付，但工人的真實收入，並非由貨幣或金塊構成。構成工人真實收入的，是貨幣的價值，或者說，是金塊所能換得的貨物。

一定數量資本所能僱用的勞動量，顯然等於該資本能供給以材料、工具以及適應於工作性質的維持費的工人的數量。購買材料工具和維持工人，固然少不了貨幣，但該資本全部所能履用的勞動量，無疑不能同時等於用以購買的貨幣和被購買的材料、工具、食料。而只等於這兩價值之一，與其說等於前者，無寧說等於後者。

以紙幣代金銀幣，則全部流動資本所能提供的材料、食料和工具，必按所代金銀的全價值而增加。流動和分配輪轂的全部價值，現在被加在本來靠它而流通的貨物的價值上面。這件事，有些象某個大工廠廠主的處境。由於機器的改良，他捨棄舊機器不用，把新舊機器

價格之差額，加入流動資本，即加入作為購置材料、支付工資的基金。

一國流通的貨幣，對於靠它而流通的貨物的價值，究竟保持着什麼比例，也許沒有確定的可能。有人說是一比五，又有人說是一比十，一比二十，一比三十。但是，貨幣對年產物全部價值所持的比例，無論怎樣微小，在年產物中，只有一部分，常常是一小部分，指定用作維持產業的基金，但貨幣對這一部分年產物所持的比例，總該不小。如果以紙幣代替，流通所需要的金銀量減少到等於原先的五分之一，那末，其餘那五分之四，若有大部分是加在維持產業的基金內，那當然會大大增加產業的數量，因而會大大增加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

晚近二三十年來，蘇格蘭幾乎所有大都市，都設立許多銀行，甚至窮鄉僻壤，有時也如此。這種銀行作用的結果，正如上述。國內事業，幾乎完全用紙幣週轉；一切種類的購買和支付，亦都憑藉紙幣。除了兌須二十先令的鈔票外，銀幣很少見到，金幣尤其少見。銀行林立，雖未免良莠不齊，以致議院有立法制裁的必要，但國家曾因銀行設立而得莫大利益，卻無可違言。我聽說：格拉斯戈自銀行創立以來，十五年間，商業竟已加倍。蘇格蘭的商業，自兩公立銀行（一名蘇格蘭報行，1693年國會議決創立；一名皇家銀行，以國王敕令設立於1727年）在愛丁堡創立以來，就不只加了四倍。在這個短期內，蘇格蘭一般的商業，格拉斯戈的商業，是否這樣增進，我不敢自作聰明，妄加斷議。若果如此，則如此巨大的進展，似乎不能盡歸功於銀行的設立，或許還有別種原因。不過，說蘇格蘭這個時期的工商業大有增進，並且說銀行設立，就是它們增進的一個大原因，總不見得錯誤。

在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併前在蘇格蘭境內流通而在合併後不久拿到蘇格蘭銀行再鑄的銀幣價值，為四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七鎊十先令九便士。關於金幣，則無可稽考。但據蘇格蘭造幣廠舊帳簿所錄，似乎每年鼓鑄的金的價值，略多於銀。當時有許多人惟恐銀一入蘇格蘭銀行即不能復為己有，所以有許多銀幣，始終沒有拿到蘇格蘭銀行去；此外，還有若干流通的英格蘭鑄幣，亦未曾繳進去。所以，未合併前，蘇格蘭通用的金銀幣價值，合計不下於一百萬鎊。這數額

似乎構成當時蘇格蘭全部的通貨，因為當時蘇格蘭銀行雖沒有競爭者，它的鈔票發行不少，但在全部通貨中，僅佔極小部分。現在蘇格蘭的全部通貨，估計當不下二百萬鎊，其中金銀幣大概不過五十萬鎊。但是，蘇格蘭的金銀幣雖是大減了，它的真實財富，它的繁榮，卻絲毫未受損害。反之，農工商各業的發達，是很明顯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亦很明顯。

銀行發行鈔券的主要方法，是貼現匯票，換言之，是墊付貨幣，收買未滿期的匯票。匯票不等期滿，即可持票往銀行預貸現金。銀行方面，就計算到期應收的利息，在全部貸額中扣除。到期後，匯票的兌付，既可償還銀行預貸出去的價值，還會帶來利息形式的純利潤。銀行貼現匯票，是以本銀行發行的鈔券支付，並不是以金銀支付。銀行家可以根據經驗，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把鈔券墊付出去，所以，他所能貼現的匯票金額，可以加多，他在利息方面所能獲得的純利益，亦自然加多了。

蘇格蘭的商業，今仍不甚繁榮，在上述兩銀行創立時，尤不足道。如果該兩銀行單單經營匯票的貼現，營業必甚寥寥。所以，它們發明另一方法來發行信用券，即所謂現金結算法。隨便那一個人，只要他找得到兩個有確實信用並有確實地產的保證人擔保，並允在銀行要求償還時即如數還清所借金額及其法定利息，就可向銀行商借一定數額的款項如二千鎊或三千鎊。我相信，這種貸放方法，世界各處銀行都有。但據我所知，蘇格蘭各銀行所接受的還款條件特別簡易。這也許是他們銀行營業旺盛、國家得益深厚的主要原因。

在蘇格蘭，凡具有上述信用條件向銀行按照這個方法借到比方說一千鎊的人，可以隨時分期還款，有二三十鎊就可付還一次。銀行方面就以每次收款的日期起，至全數償清的日期止，計算每次所收回的數額，並在全部金額的利息中，減少相應數目的利息。各種商人，各種實業家，都覺得這種方法很便利，因而樂於助長銀行的營業，不但在一切支付上都欣然接受銀行鈔票，並勸人接受。在顧客商借貨幣時，銀行大都以本銀行的鈔票付給。商人以鈔票購買製造者的貨物，製造者以鈔票購買農業家的食料、材料，農業家以鈔票付給地主作為地租，地主以鈔票付給商人購買各種便利品、奢侈品，商人最後又把

鈔票還給銀行，來抵銷借款。因之，全國銀錢來往，幾乎無往不用鈔票。銀行營業，自然就旺盛了。

賴有現金結算法，商人們得推廣營業，而不致有危險。假設有兩商人，一在倫敦，一在愛丁堡，所經營的營業相同，所投下的資本相等。愛丁堡商人因有現金結算法，所只營業規模能夠搞得較大，人員能夠用得較多，而不致有危險。倫敦商人則因無現金結算法，常須在自己金櫃內或在銀行金櫃內（那自然沒有利息）保有鉅額貨幣，只應付不斷的索討賒購貸款的要求。假定常須保有五百鎊，那末，和不需常常保有現金五百鎊滯財的場合比較，堆棧內貨物的價值，就會少五百鎊。假設商人保有的存貨普通每年脫售一次，這時候，與無需保有滯財的場合比較，他就因為常須保有五百鎊滯財，所得而脫售的貨物，總少五百鎊的價值。在這場合，他每年的利潤，他所能僱用以辦理銷售事務的工人，都必定比他多賣五百鎊貨物的場合少。反之，愛丁堡商人，無須保有滯財來應付這種不時的需要。萬一遇有急需，他可由現金結算法，向銀行借錢來應付，以後，接續有售賣，即以所得貨幣或紙幣，逐漸償還銀行借款。與倫敦商人比較，他可用同量資本，囤積較多量貨物，而無危險。因之，他給自己賺取更大的利潤，給那些為市場提供貨物的勞動人民以更多的就業機會。國家因之得利不小。

固然，英格蘭銀行通過貼現匯票所給予英格蘭商人的便利，可等於現金結算法給與蘇格蘭商人的便利，但要記住，蘇格蘭商人也可向銀行貼現匯票，和英格蘭商人一樣容易。而除了貼現期票，蘇格蘭銀行還有現金結算法，故於商人尤為便利。

任何國家，各種紙幣能毫無阻礙地到處流通的全部金額，決不能超過其所代替的金銀的價值，或（在商業狀況不變的條件下）在沒有這些紙幣的場合所必須有的金銀幣的價值。例如，蘇格蘭通用的紙幣，假設最低的是二十先令紙票，那末，能在全蘇格蘭流通的這項通貨其總額決不可超過國內每年交易二十先令及二十先令以上的價值的交易通常所需的金銀的數額。如果超過了這個總額，那過剩的部分，既不能行於國內，又不能輸往國外，結果，會馬上回到銀行去，兌換金銀。得鈔票的人民，立即覺得他們所有的鈔票，超過國內交易所需。他們既然不能把紙幣送往外國，當然，馬上會持向銀行，要求兌

現。因爲，過剩的鈔票，一經換作金銀，輸往國外，很容易就有用處；在鈔票還是鈔票的時候，卻一點用處也沒有。總之，過剩的額數，將全數回到銀行兌現，如果銀行對兌現表現困難或遲緩，回到銀行去的鈔票，還會更多。由此而起的驚疑，必然會使兌現要求，更緊張起來。

各種企業的經營，都少不了經費。房租、用人、辦事員、會計員等的工資，在各種企業中都是不可少的。除了這各項，銀行特有的費用，可分爲兩類：第一，金櫃內，常須儲存無利息可得的鉅額貨幣，以應付持票兌現的不時要求。第二，因應付不時要求而將幹竭的金櫃，須時時補充。如果，銀行發行紙幣過多，超過國內流通的需要，不能流通的過剩的額數，不斷轉來兌現，在這情況下，銀行的金櫃，不但要按紙幣過剩的比例增加儲存的金銀，而且要按更大的比例增加儲存的金銀，因爲紙幣的歸來，其速度比發行過剩額的擴大快得多。所以，銀行第一項特別用費的增加，不僅要按非不得已的兌現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且要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此外，此種發行過度的銀行，雖應有較充實的金櫃，但其金櫃的幹竭，卻一定比在發行謹慎的情況下快得多。因此，對於金櫃的補充，常須作不斷的加緊的努力。但這樣大量不斷地由金櫃流出來的鑄幣，不能在國內流通。這種鑄幣，是爲兌換超過流通需要的紙幣而流出的，所以也是流通所不需要的。按照常理，鑄幣是不會被廢置無用的，它在國內沒有用處，就會以這種或那種形態輸往外國，以尋求有利用途。但金銀這樣的不斷輸出，又適足助長銀行覓取金銀補充金櫃的困難，從而增加銀行的費用。所以，象這樣的銀行，必因兌現的非不得已的增加，增加它第二項特別費用，增加得比第一項還多。

假設某銀行發行的紙幣，爲四萬鎊，而這恰是國內流通所能容易地吸收和使用的數目，爲應付不時需要起見，銀行金櫃須常常儲有一萬鎊金銀。假使這銀行企圖發行四萬四千鎊，那增加的四千鎊，既是超過社會容易吸收使用的數目，將一邊發出，一邊流回。這樣，爲應付不時需要起見，銀行金櫃應該儲存的款項，就不只一萬一千鎊，而爲一萬四千鎊。於是，四千鎊過剩的紙幣，將毫無利益可得，而且，不僅無利，還有損失。因爲這銀行要負擔不斷收集四千鎊金銀的費

用，這金銀一經收進來，馬上又要散發出去。不斷收進，不斷散出，所費該要多少。

如果所有銀行都理解而且注意本身的利益，流通界上就不致於紙幣過剩。不幸的是，所有銀行未必都理解本身的利益。流通界紙幣過剩的現象，就常常發生了。

由於發行紙幣量過大，剩餘額不斷歸來兌換金銀，許多年來，英格蘭銀行，每年都須鼓鑄金幣，自八十萬鎊至一百萬鎊不等，平均計算，每年大約要鑄八十五萬鎊。數年前，因金幣磨損得不堪，低劣得不堪，銀行大鑄金幣，常須以每盎斯四鎊的高價格購買金塊，鑄成時，每盎期卻僅值三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損失達百分之二點五至百分之三。鑄造的數額很大，所以損失不小。雖然銀行免付鑄幣稅，造幣一切費用全由政府負擔，但政府的慷慨不能使銀行免於損失。

蘇格蘭銀行，亦以發行過多，不得不常常委託倫敦代理人，代他們收集貨幣，其費用很少低於百分之一點五或百分之二的。這樣收集的貨幣，通常由馬車送來，保險費每百鎊抽十五先令，即百分之零點七五。但代理人所收集的貨幣，還往往不能及時補充本銀行的金櫃。金櫃的幹竭太快了。在這場合，蘇格蘭銀行就得向有來往的倫敦各銀行開發匯票，以籌所需數目。到期滿倫敦銀行向它們開發匯票索取借款以及利息和佣錢時，若干蘇格蘭銀行，由於發行過剩，困難重重，常常苦於無法應付，不得不向原債權人或倫敦別家往來銀行，開第二批匯票。有時，同一金額，不，不如說同一金額的匯票，會在倫敦愛丁堡間，往返二三次以上。這樣累積的全部金額的利息和佣錢，都須由債務銀行付給。蘇格蘭各銀行，甚至一向未曾過於冒險逐利的，有時也不得不使用這種自取滅亡的方法。

因兌換過剩紙幣而由英格蘭銀行或蘇格蘭銀行付出的金幣，亦必成為過剩，而為流通界所不容。結果，這種金幣，或以鑄幣形式輸往外國，或熔成金塊輸往外國，又成熔成金塊，以每盎斯四鎊的高價售於英格蘭銀行。輸往外國的或熔成金塊的，在金幣中，總是最新的，最重的，最好的。國為留在國內保持鑄幣形態的鑄幣，並不分別輕重。輕的重的價值都是一樣。但在外國，或在國內熔為金塊時，重的價值就較大。所以，英格蘭銀行儘管每年鼓鑄大批新幣，年終仍不免訝然失驚，嘆息今年鑄幣的缺乏和去年沒有不同。而且，英格蘭銀行

儘管每年發出許多新而且好的鑄幣，鑄幣的形狀，不見得一天一天好起來，而卻一天一天壞下去。今年鑄了這麼多新幣，明年又覺有再鑄這麼多新幣的必要。又因鑄幣常常磨損剪鉸，金塊價格就不斷提高起來，因而，每年造幣的費用，也是一年大過一年。據觀察所得，英格蘭銀行因需以鑄幣直接供給本銀行的金櫃，竟需以鑄幣間接供給全國。英格蘭銀行金櫃內的鑄幣，會以各種方式，不斷流向全國各地去。所有需要用以支持過剩的英格蘭、蘇格蘭紙幣的鑄幣，所有由紙幣造成的國內必需的鑄幣的缺乏，英格蘭銀行都得出來供給。無疑，蘇格蘭各銀行，因為自己不小心和太沒有成算，吃的虧是不小的。不過英格蘭銀行所吃的虧還要大。因為，不但它自己不小心，使它吃虧；蘇格蘭各銀行更大的不小心，更使它吃虧。

英國大膽的計劃家，往往不度量自己的資力，經營過分的營業。英國紙幣會如此過剩，當初亦即起因於此。

商人或企業家營業的資本，既不宜全向銀行借貸，亦不宜大部向銀行借貸。商人或企業家固然可以向銀行借錢來應付不時的需要，省得儲下現錢留着不用，但他的資本，亦只有這個部分，宜向銀行借貸。企業家向銀行借錢，應該限於這個部分。如果銀行借出紙幣，不超過這個限度的價值，那發行出去的紙幣額，亦決不會超過國內無紙幣時流通所需的金銀額，決不致數量過剩，決不致有一部分為國內流通界所不能容納。

假設銀行給商人貼現的乃是由真實債權人向真實債務人開發，而到期時後者會立即兌付的匯票，那末，銀行墊付的，就只是這部分的價值，即商人否則得以現錢形式保留着以備不時之需的這部分價值。這種匯票，一經到期就會兌付，所以，銀行墊付出去的價值及其利息也一定可以取回。要是銀行只和這類顧客來往，銀行的金櫃，就象一個水池，雖有水不斷流出，也有水不斷流入，出入數量相等，團此，積水常常一樣充滿，或幾乎一樣充滿，無需時刻留神。這種銀行的金櫃的補充，並不需要多少費用，甚至完全不需要費用。

一個營業不曾過度的商人，即使在沒有期票要求銀行貼現的場合，也常有現金的要求。如果銀行方面除給他的匯票貼現外，還允許按簡單的條件，用現金結算法，在他需要金錢的時候，貨以貨幣，而在他存貨續有售出的時候，陸續零星償還，那對商人就極其便利，他

就無需常常儲備專款以應不時之急。而確有需要時，他就可憑現金結算法來應付。不過，銀行對待這種顧客應該十分注意，看它在一個短時期中（比方說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或者八個月），從他們那裏通常收回來的總額，是否等於通常貸給他們的總額。如果在這短時期內，收入大都能夠等於貸出，就可放心大膽繼續和這種顧客來往。象這樣的來往，金櫃的流出固然很大，流入也很大；所以，無需任何進一步的注意，金櫃可始終一樣充滿，或幾乎一樣充滿，補充這樣的金櫃，用不着多大的費用。反之，如果顧客償還的數額，常常不及貸出的數額，那就不能繼續放膽和他來往，至少不能繼續按照這種方式和他來往。在這場合，金櫃的出流，必遠大於入流。除非不斷作重大努力，付鉅額費用補充金櫃，否則金櫃就很容易趨於枯竭。

因此，蘇格蘭各銀行，在一個長時期內非常謹慎地要求一切顧客經常定期地歸還貸款。如果他不能照辦，那無論他有怎樣大的財產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銀行貸得一文。由於這樣的謹慎，銀行方面，除了幾乎完全不必特別破費來補充金櫃而外還得到其他兩種很大的利益。

第一，由於這樣的謹慎，銀行方面，除自己帳簿外，不必另去搜集別種證據，即能相當準確地判斷債務人的盛衰情況。債務人償債情況是否正常，大都取決於其業務的盛衰。私人放債，債戶少的數家，多的也不過數十家，所以，要察知債務人的行為和經濟情況，委託一個經理人就行了，甚至經理人亦不必要。但銀行放債動輒數百家，而且還有許多別種事情要不斷留心注意，所以，除自己帳簿所提供的資料外，它還需要有關於大部分債務人情況和行為的其他經常性報道。蘇格蘭各銀行，所以要求債務人必須常常償款，也許因為看到了這一點。

第二，由於這樣的謹慎，銀行方面就不致於發行過剩的、為社會所不能容納的紙幣。在相當期間內，顧客償入的數額，若大都等於貸出的數額，那就可證明銀行貸給他的紙幣額，並沒有超過他在無銀行貸借的場合為應付不時之需所必須保留的金銀量，從而可以證明銀行發出去的紙幣額，也未曾超過國內在無紙幣的場合所應流通的金銀量。償入的頻繁，償入時期的有定，償入款項的數額，在足以表明銀行方面貸出去的數額，並沒有超過顧客在無借貸時所必須以現金形式保留以應不時之需的那一部分資本，也就是說，並沒有超過顧客在無

借貸時所必須以現金形式保留，使得他的其餘資本可繼續不斷使用的那一部分資本。在這場合，只有這一部分顧客的資本，在相當期間內，繼續不斷以鑄幣或紙幣這兩種貨幣形態時而收進、時而付出。銀行借貸，如果超過這一部分，那在相當期間內，顧客償入的數額，一定不能等於貸出的數額。就銀行的金櫃說，這種來往的入流，定然抵不過這種來往的出流。紙幣的發行，因為超過了在無紙幣發行時顧客所須保有以應急需的金銀量，也就馬上超過了在無紙幣發行時國內流通界所會有的金銀量，因而馬上就會超過了在無紙幣發行時國內流通界所容易容納的數量。這種過剩的紙幣，馬上會回銀行來兌換現金。這第二種利益，與第一種利益比較，是同樣實在的。但對於這種利益，蘇格蘭各銀行，似乎沒有了解得那麼清楚。

銀行既以貼現匯票法，又以現金結算法，使國內有信用的商人，無需儲有滯財，以應不時的急需，那就算盡了全力了，國內商人就不可再有所望於銀行了。為銀行本身的利益與安全計，它也只能做到這個地步，不能再作什麼了。為銀行本身利益計，商人的流動資本，不能全部貸自銀行，大部分也不行。因為商人的流動資本，雖繼續以貨幣的形式，時出時入，但全部收入的時候，距離全部付出的時候太遠了，要在短期間內適合於銀行的利益，使償入的數額，等於貸出的數額，那是辦不到的。至於固定資本，就更不應該大部分貸自銀行了。比方說，制鐵家建立鐵廠、鐵爐、工場、倉庫、工人住宅等等的資本吧，又比方說開礦家開坑掘井、排除積水、建築道路車軌的資本吧，土地改良家開墾荒地、排積水、築圍牆、建農舍、廄舍、穀倉等必要建築物的資本吧，那都不宜大部分貸自銀行。固定資本的收回，比流動資本的收回緩慢得多。固定資本一經投下，即使投下的方法非常適當，亦要經過許多年數才能收回。這樣長的期間，當然不利於銀行。固然，企業家可很適當地使用借入的資本進行他的大部分計劃，但要使債權人不吃虧，債務人應持有充分資本，足夠保證（如果我可以這樣說）債權人資本的安全，足夠使債務人的營業計劃縱使失敗，亦不致使債權人蒙受損失，這樣對債權人才算公道。然而，即使如此，非數年不能償清的借款，仍以不向銀行貸借為上策。那最好提出抵押品，向那些專賴利息為生的私人貸借；因為他們不想投資營業，但願把錢供給有信用的人，數年不還，亦未嘗不可的。不取抵押品，無需印花費、律師費，就以貨幣貸人，而償還條件又象蘇格蘭銀行所肯接

受的那麼簡單的銀行，對於這樣的商人企業家來說，當然可說是最方便的債權人。不過，象這樣的商人，對於這樣的銀行來說，卻就是最不方便的人。

二十五年來，蘇格蘭各銀行所發行的紙幣，至少也十足地等於國內流通界所易容納的數額了。對於蘇格蘭各種事業，銀行的幫助已經是盡了全力了，為銀行本身利益計，它們只能辦到這樣。而且事實上，它們的營業，已有些微過度的地方。因為這種過度，銀行方面已經吃虧了，至少，利潤是減少了。在這一種營業上，經營規模只要略為過度，便不免有此結果。不幸，逐利常情，得隴望蜀，商人們、企業家們還以為未足，他們以為銀行信用事業，可任意推廣，推廣銀行信用事業，除了添少數紙張費以外，用不着增添什麼費用。他們埋怨銀行理事先生們眼光狹小、態度畏葸。他們說，銀行信用事業還沒擴充到和國內各種事業的擴充相稱的程度。他們所謂事業推廣，很明白，是指把事業推廣到超過他們自己的資本或能夠憑藉抵押品向私人借得的資本所能經營的範圍。他們以為，他們短少的資本，銀行有設法供給的義務。他們覺得，他們所希望得到的全部資本，銀行是義當供給的。但銀行方面的意見不同。於是，在銀行拒絕推廣信用的時候，有些企業家想出了一個法門。這個法門，在一段時期中，顯得對他們很適用，雖所費大得多，但其有效性，卻和極度推廣銀行信用事業無異。這法門就是大家知道的循環劃匯。不幸的商人，在瀕於破產地位的肘候，往往利用這個辦法。由這辦法取得資金，在英格蘭是行之已久了。據說，上次戰爭期間，因營業利潤極大，商人們往往不度量自己的資本，把事業過分推廣起來，於是，這種循環劃匯的辦法，大為流行。後來，這辦法又由英格蘭傳入蘇格蘭。在蘇格蘭，商業是有限多了，資本亦有限多了，所以這種辦法，傳入蘇格蘭後，比較起來，愈見流行。

這種循環劃匯辦法，在一般實業家心裏，當然都很明白，似乎沒有說明的必要。但本書讀者，未必都是實業家，而且，這種辦法對於銀行的影響，即使一般實業家，也似乎不大瞭解，所以，我將設法來作儘可能明瞭的說明。

當歐洲野蠻法律還沒有強迫商人履行契約的時候，商人間形成一種習慣，即賦給匯票以非常的權利，使得以匯票（尤其是定期很短不

過兩三月的匯票) 進行借款, 比以任何他種證據都容易成功。匯票到期, 承兌人若不能立即照付, 他馬上就算破產。於是持票人可作成拒付證書, 持向出票人索款。如果出票人也不能立即照付, 亦就算破產。又如果匯票在未到期以前, 輾轉流通, 或以購貨, 或以借款, 迭經數人之手, 這些人各在票背簽署名號, 作為籤保, 這些人就也對這匯票負完全責任, 如果匯票到了自己面前, 自己不能立時照付, 也馬上被宣告破產。這種慣例, 晚近二百年來, 已為歐洲各國法律所採納。出票人, 承兌人, 背書人, 即使信用有疑問, 但因匯票期限如此短促, 多少對持票人是一種保障; 雖然他們都有破產的危險, 但不見得在這短促期間內, 他們都會破產。房子已經傾斜了, 不能持久了, 今晚就會倒塌嗎, 不見得吧, 我姑且冒險住一晚——這是倦行者的心事, 正好比喻匯票持有人的心理。

假設愛丁堡商人甲, 向倫敦商人乙, 開出匯票, 限期兩月, 要乙付銀若干。事實上, 倫敦商人乙, 並無所負於愛丁堡商人甲。他所以願承兌甲的匯票, 因為兩方協商的條件, 是在付款期限未到以前, 乙亦可向甲出一張匯票, 數額相等, 外加利息佣錢, 兌期亦為兩月。所以, 在兩個月的限期未滿以前, 乙向甲出一張匯票, 甲又在這匯票滿期以前, 再向乙出第二次匯票。在這第二次匯票未滿期以前, 乙再照樣向甲出匯票, 都以兩個月為期。這樣循環下去, 可連續至於數月, 甚而至於數年, 不過, 乙向甲開出的一切匯票, 累積下來的利息佣錢, 都要算在裏面。利息例為每年百分之五, 佣錢每次至少百分之零點五。如果每年來往六次, 佣錢就要加六倍, 所只靠這種辦法籌款的甲, 每年費用就至少也在百分之八以上。如果佣錢高漲, 或如要對以前匯票的利息和佣錢付複利, 那末, 利上算利, 費用就要更大。這就是所謂循環借款的辦法。

據說, 國內大部分商業上的投資, 普通利潤是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之間。用這樣方法借得貨幣的營業, 如果除了償付借錢的巨大費用, 還能提供很好的剩餘利潤, 那非是一種非常幸運的投機不行。但是, 近來有許多規模巨大的計劃, 在若干年中除靠這個方法從鉅額費用借來的資金外別無其他資本。無疑的, 這些計劃家在他們的黃金夢中, 看到了大利潤的非常鮮明的幻象。但是, 當他們醒了, 或在他們

營業結束時，或在他們無力再繼續經營下去時，我相信，運氣好得能夠實現所作的夢的，沒有幾個。

愛丁堡的甲向倫敦的乙開出的匯票，經常由甲於到期前兩個月持向愛丁堡銀行貼現。倫敦的乙隨後向甲開出的匯票，也照樣地經常由乙持向英格蘭銀行或倫敦的其他銀行貼現。銀行貼現這些循環匯票所付出的大都是鈔票。在愛丁堡，是付蘇格蘭銀行的鈔票；在倫敦，是付英格蘭銀行的鈔票。固然貼現的匯票，期到了都照兌，不過，為貼現第一張匯票而實際付出去了的價值，卻永遠沒有實際歸還貼現它的銀行。因為，在第一張匯票將到期的時候，第二張匯票又開出了，數額還更大。沒有這第二張匯票，第一張匯票根本就該有兌付的可能。所以，第一張匯票的兌付，全然是個名義。這種循環匯票的流轉，使銀行金櫃在發生了出流之後，一直沒有入流來補還這項出流。

銀行因貼現這些循環匯票而發的紙幣，往往達到進行大規模農業、工業或商業計劃所要使用的全部資金的數目，而不僅限於在沒有紙幣的情況下，企業家必須以現金形式保持在家中，以備不時之需的那部分資金的數目。所以，銀行發出的這種紙幣，大部分是社會所不能容納的，是超過國內在無紙幣的情況下流通界應有的金銀價值的。過剩的部分，馬上會回到銀行，要求兌換金銀。銀行必須盡其所能，設法尋求這項金銀。這是這些計劃家施巧用計向銀行弄去的資本，不但沒有經過銀行知道或得過銀行慎重考慮後的同意，甚至，銀行在若干時間中，可能毫不覺得曾貸給了他們這資本。

設甲乙二人，狼狽相倚，互出循環期票，向同一銀行貼現。銀行方面，當然不久就能發覺他們的行徑，就能明白看出，他們營業但自己並沒有資本，他們的資本全然是它借給他們的。但是，假如他們不常在一家貼現，時而這家，時而那家，而且兩人並不一直互向彼此開出匯票，而兜個大圈子，經過許多其他計劃家，這些計劃家以利益所在，互相幫忙，最後由其中之一，向他們開出匯票，那末，哪一張是真實匯票，哪一張是虛偽匯票，就不易辨認了。是有真實債務人和真實債權人的匯票呢，或是除了貼現匯票的銀行別無真實債權人、除了獵取貨幣的計劃家別無真實債務人的循環匯票呢，那就難於知道了。即使銀行終而察覺了這點，但可能已經太晚，這樣的匯票，已經貼現不少了。這時，拒絕他們，不再貼現，必然會使他們一齊破產，而他

們破產，可能使銀行隨着破產。爲顧念自身利益與安全計，在這危險境況中，銀行方面也許只好再冒險繼續貼現一些時候，企圖慢慢把貸款收回，或者加重貼現條件，迫使他們逐漸轉向別方面或者別個銀行設法，從而使自己儘快從這個圈套中擺脫出來。然而就在英格蘭銀行，倫敦各家主要銀行，以及比較慎重的蘇格蘭各銀行，陷入過深，開始對貼現提出較苛的條件時，這班計劃家不僅驚慌起來，而且憤怒起來。他們自己的苦惱無疑是直接起因於銀行方面這種慎重的必要的準備措施，但他們竟把自己的苦惱說成是全國的苦惱。他們說，這種全國的苦惱，完全是由於銀行方面識見卑陋，舉措失當；他們想努力使國家臻於繁榮富裕的境地，而銀行卻吝於幫助。他們似乎認爲銀行按照他們所希望的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借給他們資金，乃是銀行的義務。然而就事實說，要挽救銀行自身的信用，要挽救國家的信用，銀行拒絕對借款已經過多的人繼續按照這種方法貸給信用，是這時候唯一可實行的辦法。

在這喧擾和窘困之中，蘇格蘭如果開設了一家新銀行，聲言以救國難爲職志。它立意很慷慨，但措施失當了，而且似乎不甚明瞭它所企圖救濟的困難，其性質是怎樣，其原因是什麼。這銀行的貸借，無論就現金結算法說，或就貼現匯票說，都比其他銀行寬大。就後者說，它幾乎不問匯票是真實匯票還是循環匯票，一律予以貼現。這銀行曾明白宣佈宗旨說，只要有相當的保證，甚至需要非常長的時期才能償還（象改良土地用的）的資本，也全部可以向銀行借取。甚至說，促進這樣的土地改良，是銀行所以設立的一個愛國目標。由於對現金結算、期票貼現採取這樣寬大的政策，銀行必然發行大量鈔票，其過剩的部分，既然不易爲社會所容納，當然隨發隨回來兌換金銀。銀行金櫃，本來就不大充實。它從兩次招股募到的資本雖號你十六萬鎊，但實收不過百分之八十，而且是分期繳納。大部分股東，於第一次繳入股款後，即向銀行用現金結算法貸借。銀行理事先生們，以爲股東借款，當受同樣寬大的待遇，所以，有大部分股東繳了第一期股款以後，其餘各期繳入的，幾乎全是在現金結算法下借出的款項。這樣，他們後來的交股，就不過是把先從銀行某一金櫃提去的款項，放入銀行的另一金櫃。所以，銀行金櫃，即使原本充滿，共過度的發行，亦必使銀行金櫃很快耗竭，只好走上失敗的途徑，向倫敦銀行開出匯票，期滿時再開，加上利息佣錢的數目，從而兌付前一匯票，除

這辦法外，沒有其他能及時補充金櫃的耗竭。這銀行的金櫃，原來就不很充實，據說，營業不過數月，就不得不乞助於這個辦法。幸而，各股東的田產，不在數百萬鎊以下，他們認購股分時，實際上即等於把這田產保證銀行的一切借條，有如此充實的保證作為銀行信用的後盾，所以，貸借政策雖如此寬大，銀行營業，仍能廣續二年有餘。到非停業不可時，發出的紙幣額，已近二十萬鎊了。這種紙幣，隨發隨回，因要支持這些紙幣的流通，它屢向倫敦各銀行開出匯票。累積下去，到了銀行不得不倒閉的時候止，匯票價值，已在六十萬鎊以上。這樣，在二年多的時間裏，這銀行借出去的，也達八十萬鎊以上，取息百分之五。對那二十萬鎊用紙幣借出去的放款所收的百分之五的利息，也許可視為純利，因為除了管理費外，沒有其他扣除。但那六十多萬鎊向倫敦出匯票借來的，其利息佣錢等，卻在百分之八以上。所以，兩者對比，銀行借出的金額，其中要吃虧百分之三以上的利息的，不止四分之三。

這銀行經營的結果，似正和它的創辦人的本意相反。他們的目的，似乎在於對國內那些他們認為有勇敢進取精神的企業，給予支持，同時把蘇格蘭各銀行，尤其是在貼現方面被指摘為過於畏縮的設於愛丁堡的各家銀行排擠掉，從而把整個銀行營業集於一身。無疑的，這銀行曾給各計劃家以暫時的救濟，使他們在無可如何的境地下，多拖延了兩年左右。但事到盡頭，仍不過使他們陷入債務愈深，因此到了失敗的時候，他們的損失更重，他們債權人的損失也更重。所以，這些計劃家所加於自己及國家的困難，這銀行不但沒有加以救濟，事實上，反而使它加深了。為他們本身計，為他們債權人計，為國家計，他們大部分的營業，不如早兩年停止的好。不過這銀行所給予各計劃家的暫時性的救濟，結果成為對蘇格蘭其他銀行永久性的救濟。在蘇格蘭其他銀行不肯貼現循環匯票的時候，這新銀行對出循環匯票的人，卻伸出雙手歡迎。賴有它，其他各銀行，很容易就脫離了厄境，不然它們就決無法擺脫這厄境，一定要受巨大損失，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名譽還要遭受損失。所以這銀行經營的結果，加劇了它所要減除的國家災難，但卻使它所要取而代之的各競爭銀行免受大災難。

這銀行初成立的時候，有些人認為，銀行金櫃雖易枯竭，但來貸借紙幣的都提出了擔保品，拿這種擔保品作擔保，取得錢來補充金

櫃，決不是難事。但我相信，不久，經驗就告訴了他們，這個籌款方法，未免遠水救不得近火。這樣不充實而又易幹竭的金櫃，除了走上沒落的途徑，向倫敦各銀行開出一次匯票，滿期時再開出一次匯票，層迭下去，累積的利息佣錢愈來愈多外，簡直沒有第二個辦法可用以補充。即使這種辦法，足使它在需要款項的時候，能立刻借到，但結果不僅無利可圖，且一定次次受損失，以致作為一個營利的公司，終必一敗塗地，雖然滅亡的過程，沒有象採取一再出要這種費用更大的籌款方法那麼快。它仍不能從所發紙幣的利息取得利潤，因為紙幣既是超過國內流通領域所能吸收和使用的，必然隨發隨回來換取金銀，而為了兌換，銀行方面須不斷地借債，借債的全部用費以及探聽誰有錢出借、和有錢的人磋商、寫債卷、立契約等等所需費用，全須銀行負擔。出入對比，顯然對銀行有損而無益。用這方法補充金櫃，好比叫人持水桶到遠井汲水來補充只有出流而無入流的水池。耶是一定要失敗的。

這種辦法，雖對這作為營利機構的銀行，不但可適用，而且有利，但對於國家不僅無利且有大害。這辦法，絲毫不能增加國內出貸的貨幣量，只能使全國的貸借事項都集中在這家銀行身上，而使它成為全國總貨藉機關罷了。要借錢的，將不向有錢出借的私人貸借，而都來請求這個銀行。私家貸借，一般不過數人或數十人，債務人的行為謹慎與否，誠實與否，都為債權人所熟習，盡有選擇甄別的餘地。和銀行來往的，動輒數百家，其中大多數的情況，往往為理事先生所不深悉，選擇甄別，當然無所措手，因之，比較起來，銀行在貸出上，當然不如私家審慎。事實上，和這樣一個銀行來往的，本來大部分就是幻想的計劃家，就是一再開出循環匯票的出票人。他們把資金投在奢侈浪費的事業上，這些事業，即使得到一切可能的幫助，亦必難底於成，即使能夠成功，亦決不能償還所費。它們也決不能拿出足夠的基金，維持等於其所僱用的那麼多的勞動。反之，私家貸借，就沒有這種現象。誠實儉樸的私家的債務人，大概總是用借入的資本，經營與他們自己的資本額相稱的事業。這些事業，也許沒有那麼宏大，那麼驚人，但更穩當，更有利，定能償還投下的資本並給與大的利潤，定能提供一筆基金，足以僱用比它們原先僱用的多得多的勞動。所以，即使新銀行的計劃成功，結果也絲毫不能增加國內的資

本，徒使大部分資本，不投在謹慎有利的事業上去，而改投到不謹慎的無利益的事業上去。

有名的勞氏，只為蘇格蘭產業不振的原因，就是缺少貨幣來經營。他提議設立一個特別銀行，使該銀行所發紙幣，等於全國土地的總價值。他覺得，這是救濟貨幣缺少的好辦法。在他最初提出這個計劃的時候，蘇格蘭議會亦覺得不可採納。後來奧林斯公爵攝法蘭西政治，卻就他的原議略加改正而採行了。可任意增加紙幣數額的觀念，即是所謂密西西比計劃的實在根據。這個計劃，就銀行業說，就買賣股票生意說，其狂妄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杜浮納在其《對林託〈關於商業與財政的政治觀察〉一書的評論》中，曾詳細說明這個計劃的內容，這裏不贅述。這計劃所根據的原理，在勞氏所著關於貨幣與貿易的一篇論文（那在他最初提出這個計劃時，就在蘇格蘭發表了）中，亦有說明。在這篇論文以及其他根據同一原理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宏偉而空幻的理論，至今猶在許多人腦中留有很深刻的印象。最近受人攻擊認為營業毫無節制的蘇格蘭及其他各處銀行，恐怕亦多少受了這個理論的影響。

英格蘭銀行，在歐洲是最大的銀行，它是1694年7月27日由國會議決以敕令設立的。當時它借給政府的數目，共計一百二十萬鎊，每年可向政府支取十萬鎊，其中，九萬六千鎊作為利息（年利百分之八），四千鎊作為管理費。革命建立起來的新政府的信用一定還很差，否則不會有這樣高的利息。

1697年，銀行資本增加了一百萬零一千一百七十一鎊十先令。因此，這時其總資本達二百二十萬零一千一百七十一鎊十先令。這次增資，據說旨在維持國家信用。1696年，國庫庫券要打四成、五成或六成折扣，銀行紙幣要打二成折扣。這時，正在大量改鑄銀幣，銀行認為宜暫時停止紙幣兌現，而這必然會影響銀行信用。

按照安妮女王第七年第七號法令，銀行以四十萬鎊貸給國庫。加上原來借給政府的一百二十萬鎊，貸給政府的錢總計達到了一百六十萬鎊。因此，1708年，政府信用已等於私人，因為政府能以百分之六的利息率借到款項，而這正是當時市場上普通的利息率。按照同一法令，銀行又購買了利息六釐的財政部證券一百七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銀行資本準再增加一倍。所以，在1708年，銀

行資本就等於四百四十萬零二千三百四十三鎊，貸給政府的總額就等於三百三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

1709年，英格蘭銀行按照百分之十五的比例催收股款，收得了六十五萬六千二百零四鎊一先令九便士。1710年，又按照百分之十的比例催收股款，收得了五十萬零一千四百四十八鎊十二先令十一便士。兩次催收的結果，銀行資本達到五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鎊十四先令八便士。

按喬治一世第三年第八號法合，英格蘭銀行又吃進財政部證券二百萬鎊，因此，就這時計算，銀行貸給政府的金額，已有五百三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接喬治一世第八年第二十一號法分，銀行購買南海公司股票四百萬鎊。因要購買這項股票，銀行不得不再增募資本三百四十萬鎊。這時總算下來，銀行貸給政府的金額為九百三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但其資本總額卻不過八百九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五鎊十四先令八便士。兩方對比，銀行貸給政府的有息貸款，已多於其母本，或者說，已多於其要對股東分派紅利的資金了。換言之，銀行已開始有不分紅利的資本，而這種資本已多於分紅的資本了。這情況一直繼續至現今。1746年，銀行陸續貸給政府一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八百鎊，銀行陸續募集的分紅利資本亦達一千零七十八萬鎊。自此到今日，這兩數目都沒有改變。遵照喬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五號法合，為了延續銀行營業執照，銀行同意繳給政府十一萬鎊，不取息，亦不要償還，所以，這不曾增加銀行貸出額，亦不曾增加銀行資本額。

銀行紅利，時有高低，視各時期銀行對政府貸款的利息的高低以及其他情況為轉移。這貸款利息率已由百分之八逐漸減至百分之三。過去幾年間，銀行紅利常為百分之五點五。

英政府穩定，英格蘭銀行亦隨之穩定。貸給政府的金額不損失，銀行債權人亦不致有所損失。英格蘭不能有第二個銀行由國會議決設立，或有六人以上的股東。所以英格蘭銀行已非普通銀行可比，它是一個國家大機關了。每年公債利息的大部分，是由它收付，財政部證券，是由它流通。土地稅、麥芽稅的徵收額，往往是由它墊付。這些稅的稅款，納稅人往往逾期好幾年不到國庫繳納。在這情況下，即使主事者明察，但由於對國家的職責，亦不免發行逾量的紙幣。它也貼

現商人匯票。有時，不僅英格蘭，就連漢堡、荷蘭的鉅商，亦求它貸借。據說，1763年，有一次，英格蘭銀行在一星期內貸出了將近一百六十萬鎊，大部分還是金塊。額數是否如此巨大，期間是否如此短促，我不敢妄斷。但英格蘭銀行，卻真有時迫不得已，竟以六便士的銀幣來應付各種支出。

慎重的銀行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於增加一國資本，而在於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商人不得不儲存只應急需的滯財，全然是死的資財，無所利於商人自己，亦無所利於他的國家。慎重的銀行活動，可使這種死資財變成活資財，換言之，變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既有利於己，又有利於國。在國內流通即國內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物所賴以年年流通年年分配給真正消費者的金銀幣，象在商人手上的現錢一樣，也是死的資財。這種死資財，在一國資本中，雖是極有價值的一部分，但不能為國家生產任何物品。慎重的銀行活動，以紙幣代替大部分的這項金銀，使國家能把大部分這項死資財，變做活動的資財，變做有利於國的資財。流通國內的金幣銀幣，可與通衢大道相比。通衢大道，能使稻麥流轉運到國內各市場，但它本身卻不產稻麥。慎重的銀行活動，以紙幣代金銀，比喻得過火一點，簡直有些象駕空為軌，使昔日的大多數通衢大道，化為良好的牧場和稻田，從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但是，我們又必須承認，有了這種設施，國內工商業，固然略有增進，但用比喻來說，和足踏金銀鋪成的實地相比，這樣由紙幣的飛翼飄然吊在半空，是危險得多的。管理紙幣，若不甚熟練，不用說了，即使熟練慎重，恐仍會發生無法制止的災禍。

比方說，戰爭失敗，敵軍佔領首都，維持紙幣信用的庫藏，亦陷敵手。在這種情況下，國內流通全靠紙幣進行的國家，比起大部分靠金銀來流通的國家，當然要困難得多。平常的通商手段既全無價值，除了物物交換，除了賒欠，就不能有所交換。一切賦稅，既常以紙幣繳納，君主也就無法支付軍餉，充實武庫。在這種情況下，全用紙幣的國家比之大部分用金銀的國家更難恢復原狀。因此，一國君主，要把他的領土隨時都保持在易於防守的狀態，就不僅要防止那種能使發

行紙幣銀行破產的紙幣發行過剩現象，還要設法使銀行所發紙幣不在國內流通界佔較大的部分。

國內貨物的流通，可分作二途：（一）商人彼此間的流通；（二）商人與消費者間的流通。同一貨幣，無論其為一張紙幣或一枚現金，可能有時用於前一種流通，有時用於後一種流通，但由於這兩種流通，是同時不斷進行的，所以，各需一定數量的貨幣來經營。商人彼此間流通的貨物的價值，決不能超過商人和消費者間流通的貨物的價值。商人所買的一切，終須賣歸消費者。商人彼此間的交易，往往是批發，所以每次總須有大量貨幣。商人和消費者間的交易，往往是零售，所以每次有小量貨幣（如一先令或甚至半便士）就夠了。但小量貨幣流通得比大量貨幣快得多。一先令比一幾尼流轉得快，半便士又比一先令流轉得快。因此，以年計算，全部消費者所購買的價值，雖至少應等於全部商人所購買的價值，但消費者每年購買所需的貨幣量，卻比較小得多。由於流通速度較快，同一枚貨幣，作為消費者購買手段的次數，比作為商人購買手段的次數多得多。

紙幣可加統制，或使其單在商人之間流通，或推廣其流通範圍，使商人與消費者間的交易，亦有大部分使用紙幣。如果鈔票面額，沒有在十鎊以下的，象在倫敦情況那樣，那末，紙幣的流通，勢必只限於商人彼此之間。消費者得到一張十鎊的鈔票，在第一次買東西的時候就須兌換這張鈔票，那怕所購僅值五先令。所以在消費者把這張鈔票用去四十分之一以前，鈔票早已回到商人手上去。蘇格蘭各銀行所發的鈔票，卻有小至二十先令的，在這情況下，紙幣的流通範圍就自然推廣，使商人與消費者間的交易，亦有大部分使用紙幣。在國會議決禁止通用十先令和五先令的鈔票以前，消費者購物，便常使用小額紙幣。北美洲那裏發出的紙幣，竟有小至一先令的，結果，消費者購物，幾乎都用鈔票。至於約克州，有些紙幣，僅值六便士，結果如何，更不用說了。

發行這樣的小額紙幣，如果得到准許而且普遍實施，即無異獎勵許多普通人去開銀行，並使他們有力量成為銀行家。普通人所發出的五鎊甚至一鎊的期票，大家會拒絕不用；但他發出的六便士期票，大家卻不會拒絕。這些乞丐般的銀行家，當然很容易破產，結果，對於接受他們鈔票的窮人，可能引起很大的困難，甚至極大的災難。

把全國各地銀行鈔票的最低面額，限為五鎊，也許是較好的辦法。這樣，各地銀行所發的鈔票，大抵就會只在商人彼此間流通，象在倫敦一樣。在倫敦，發行的鈔票的面值不得少於十鎊。五鎊所能購得的貨物，雖僅等於十鎊之半，但在英國其他各地，人們對五鎊，正象豪華倫敦人對十鎊那樣重視，而且一次花掉五鎊，也象倫敦人一次花掉十鎊那樣稀罕。

如果紙幣象在倫敦那樣，主要在商人間流通，市面上的金銀便不至匱乏。如果象在蘇格蘭尤其是象在北美洲那樣，紙幣的流通，推廣到商人與消費者間交易的大部分，市面上的金銀就會全被驅逐，國內商業會至用紙幣進行。蘇格蘭禁發十先令、五先令的鈔票，曾稍稍減輕市面上金銀缺乏的困難；若再禁發二十先令的鈔票，當有更大的功效。聽說，美洲自從禁發若干種紙幣以來，金銀已更豐饒了。在紙幣未曾發行以前，聽說美洲的金銀還更豐饒。

雖然紙幣應當主要限於商人之間的流通，但銀行在這場合，仍能幫助國內工商業，幾乎象在紙幣差不多佔全部通貨的場合一樣。因為商人為應付不時急需而須儲存的滯財，本來就只在商人之間流通的。在商人與消費者的交易上，商人沒有儲存滯財的必要。在這種交易上，商人只有錢進，沒有錢出。所以，雖然銀行鈔票的發行，只限於如此數額，使得只在商人之間流通，但銀行通過貼現真實匯票及現金結算辦法，依然能夠使大部分商人不必要儲有那麼多的現金，專門用來對付不時的需要。銀行依然能夠對各種商人提供它們所能提供的最大貢獻。

也許有人說，銀行鈔票無論數額大小，只要私人願受，就應在許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領受，取締其發行，實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是法律應有的。因為法律不應妨害天然的自由，而應予以扶持。從某觀點說，這限制誠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會危害全社會安全的少數人的天然自由，卻要受而且應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無論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專制的政府，法律強迫人民建築隔牆，以預防火災蔓延，其侵犯天然的自由，無異於我們這裏主張以法律限制銀行活動。

由銀行鈔票構成的紙幣，若由信用確實的人發行，無條件的，只要拿來，隨時都能兌現，那就無論從哪方面說，它的價值，都等於金

幣銀幣，因為它隨時可以換得金銀。任何貨物，用這種紙幣買賣，其價格一定象用金銀買賣，一樣便宜，不會稍貴。

有人說，紙幣增加，由於增加通貨總量，從而減低全部通貨價值，所以，必會提高商品的貨幣價格。這話，不見得可靠，因為有多少紙幣加進來，就有多少金銀會改作他用，所以，通貨的總量，不一定會增加。一世紀來，蘇格蘭糧食價格，以1759年為最廉。但那時因有十先令、五先令銀行鈔票的發行，紙幣之多，實非今日可比。再者，現在蘇格蘭銀行業的增加，總算可以了，但現在蘇格蘭糧食價格和英格蘭糧食價格的比例，卻和先前沒有兩樣。英格蘭的紙幣，可算多了，法蘭西的紙幣，可算少了，但兩國穀物價格的貴賤，卻多是相等。

在休謨發表《政治論文集》的1751年和1752年間，以及在蘇格蘭增發紙幣之後，糧食價格極明顯地漲了起來，但其原因，與其說是紙幣增加，無寧說是天時不正。

如果構成紙幣的鈔券，是否能夠立即兌現，還須取決於發行人的有無誠意，或取決於持券人未必都有能力履行的一種條件，或者要在若干年後才能兌現，而且目前不計利息，那情形就不同了。這樣的紙幣，當然要按照立即兌現的困難或不可靠性的大小，或者按照兌現期間的遠近，而多少跌在金銀價值之下。

數年前，蘇格蘭各銀行，常在所發鈔票上加印選擇權條款。依此條款，凡持票求兌者，或見票即兌，或見票六月後兌現，但添付六個月的法定利息，可由銀行理事決擇。有些銀行的理事先生，有時利用這個條款，有時威脅持大批鈔票求兌者，要他們滿足於一部分的兌現，否則就要利用這條款。那時候，蘇格蘭的通貨，幾乎大部分是這些銀行的鈔券。能否兌現，既大是疑問，其價值當然會低落在金銀之下。在這弊病未經消除的期間（尤其是1762年、1763年和1764年），卡萊爾對倫敦實行平價匯兌，達弗里斯距卡萊爾不及三十英里，但對倫敦的匯兌，卻往往貼水百分之四。很明顯，這是因為卡萊爾以金銀兌付匯票，達弗里斯則以蘇格蘭銀行鈔票兌付匯票。這鈔票要兌換現金，既然不一定有把握，所只和鑄幣比較，價值就跌了百分之四。後來，國會禁止發行五先令、十先令鈔票的命令，又規定鈔票不得附加

選擇權條款，英格蘭對蘇格蘭的匯兌才恢復自然匯率，即順應於貿易情況和匯兌情況的匯率。

約克郡紙幣，竟有小至六便士的，但持票人按規定要存票至一幾尼纔可要求兌現。這個條件，在持票人方面，往往難於辦到。故其價值亦低在金銀價值之下。後來，國會議決，廢止這種規定，認為它不合法，並且象蘇格蘭一樣，禁止發行二十先令以下的鈔券。

北美洲紙幣，非由銀行發行，亦不能隨時兌現。它是由政府發行的，非經數年，不能兌現。殖民地政府雖不付持票人以任何利息，但曾宣告紙幣為法幣，須按額面價值接受支付債務。但是，即使殖民地政府非常穩固，在一般利息是六釐的地方，十五年後才能支付的一百鎊鈔票，其價值和四十鎊現金差不了多少。所以，強迫債權人接受一百鎊紙幣作為清償以現金借給的一百鎊債務，未免太不公平，任何以自由相標榜的政府大概都未曾試行過。這顯然象誠實坦率的道格拉斯博士所說，是不誠實的債務人欺騙債權人的一種勾當。1772年，本雪文尼亞政府，第一次發行紙幣，佯言紙幣價值與金銀等，嚴禁人們以紙幣賣貨時索取比以金銀賣貨較高的售價。這個法令，言專橫，則與其本意所要支持的法令無異；言無效，則有過於其本意所要支持的法令。法律可以使一先令在法律上等於一幾尼，因為它可以指導法庭解除這樣拿出一先令的債務人的義務。但是，售貨與否，賣者各有自由。強賣者視一先令為一幾尼，卻是法律所辦不到的。所以，有的時候英國對這一些殖民地的匯兌，一百鎊可以等於一百三十鎊，而對另一些殖民地，一百鎊卻簡直可以等於一千一百鎊，雖有這樣的法令，亦無可奈何。試一研究其中原因，就知道價值懸殊，乃是因為各殖民地發出去的紙幣額，極不相等。而且，紙幣兌現期限，長短不一，兌現可能性，亦大小不同。

這樣看來，國會議決殖民地以後發行的紙幣，都不得定為法幣，是最適當不過的。為什麼各殖民地都不贊成這個議決案呢？

與我國其他殖民地比較，本雪文尼亞對發行紙幣往往比較持重。那裏的紙幣，據說，從來沒有低落於未發紙幣以前的金銀價值以下。但在紙幣第一次發行以前，本雪文尼亞已提高殖民地鑄幣的單位名稱，且由議會議決，英國五先令的鑄幣，在殖民地境內流通，可以當作六先令三便士，後來又提高至六先令八便士。所以，殖民地貨幣一

鎊，即使在通貨是金銀幣的時候，和英幣一鎊比較，價值已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通貨是紙幣時，其價值低於英幣一鎊的價值，很少大大超過百分之三十。主其事者，以為這樣提高鑄幣單位名稱，使等量金銀，在殖民地比在母國當作更大的數目使用，即可防止金銀輸出，卻不知道殖民地鑄幣的單位名稱提高後，由母國運來的貨物的價格，亦必按比例提高，金銀輸出，還是一樣迅速。

殖民地紙幣，既許人民按其面額用以完納本州各種賦稅，不折不扣。所以，即使紙幣真的或被認為要在很久以後才兌現，其價值亦定可多少增加一些。不過這種增加價值，要看本州發行的紙幣額怎樣超過本州繳納賦稅所能使用的紙幣額，而有多少不等。據我們考察所得，各州紙幣額，都大大超過本州繳納賦稅所能使用的紙幣額。

一國君主，如果規定賦稅中有一定部分必須用紙幣繳納，那末，即使紙幣什麼時候兌現，全視國王的意志，亦定能多少提高紙幣的價格。發行紙幣的銀行，若測度納稅所需，使所發紙幣額，常常不夠應付納稅人的需求，那紙幣價值，即將高於它的面值，或者說，紙幣在市場上所能買得的金銀幣，會多過它票面所標誌的數量。但有些人就根據這點，來說明所謂阿姆斯特丹銀行紙幣的升水，即說明它的價值何以高於通用貨幣，雖然據他們說，這種紙幣不能憑所有者的意志隨便拿出行外去。他們說，大部分外國匯票，須以銀行紙幣兌付，換言之，須在銀行帳簿上轉帳；該銀行理事先生，故意使銀行紙幣額，常常不夠應付這用途的需要。他們說，這就是阿姆斯特丹銀行紙幣常比金銀幣價值高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五的理由。但我們將在後面看到，這種說明是很不確實的。

紙幣價值，雖可落在金銀鑄幣價值之下，但金銀價值，不會因紙幣價值下落而下落。金銀所能換得的他種貨物的量，不會因此減少。金銀價值對其他貨物價值的比例，無論在什麼場合，都不取決於國內通用紙幣的性質與數量，而取決於當時以金銀供給商業世界大市場的金銀礦藏的豐瘠，換言之，取決於一定數量金銀上市所需要的勞動量對一定數量他種貨物上市所需要的勞動量的比例。

銀行發行鈔票，若有限制而且可隨時兌現，即可不致妨礙社會安全，而銀行的其他營業，亦就可任其自由。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地，近年來，銀行林立，許多人引為隱憂。但其設立，不僅無害於社會；社

會安全，反從而增進了。銀行林立，競爭者多，為提防同業進行惡意的擠兌，各行的營業自必格外慎重，所發紙幣，亦必對現金額數，保持適當的比例。這種競爭，可使各銀行的紙幣，限在較狹範圍內流通；可使各銀行在流通中的紙幣，因而減少。全部紙幣既分別在更多的區域流通，所以，一個銀行的失敗（這是必有的事），對於公眾，影響必定較小。同時，這種自由競爭，又使銀行對於顧客的營業條件，必須更為寬大，否則將為同業所排擠。總之，一種事業者對社會有益，就應當任其自由，廣其競爭。競爭愈自由，愈普遍，那事業亦就愈有利於社會。

第三章論資本積累並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

有一種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另一種勞動，卻不能夠。前者因可生產價值，可稱為生產性勞動，後者可稱為非生產性勞動。製造業工人的勞動，通常會把維持自身生活所需的價值與提供僱主利潤的價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價值上。反之，家僕的勞動，卻不能增加什麼價值。製造業工人的工資，雖由僱主墊付，但事實上履主毫無所費。製造業工人把勞動投在物上，物的價值便增加。這樣增加的價值，通常可以補還工資的價值，並提供利潤。家僕的維持費，卻是不能收回的。僱用許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維持許多家僕，是致貧的途徑。但家僕的勞動，亦有它本身的價值，象工人的勞動一樣，應得到報酬。不過，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可以固定並且實現在特殊商品或可賣商品上，可以經歷一些時候，不會隨生隨滅。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勞動貯存起來，在必要時再提出來使用。那種物品，或者說那種物品的價格，日後在必要時還可用以僱用和原為生產這物品而投下的勞動量相等的勞動量。反之，家僕的勞動，卻不固定亦不實現在特殊物品或可賣商品上。家僕的勞動，隨生隨滅，要把它價值保存起來，供日後僱用等量勞動之用，是很困難的。

有些社會上等階級人士的勞動，和家僕的勞動一樣，不生產價值，既不固定或實現在耐久物品或可賣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來供日後僱用等量勞動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陸軍，都是不生產的勞動者。他們是公僕，共生計由他人勞動年產物的一部分來維持。他們的職務，無論是怎樣高貴，怎樣有用，怎樣必要，但終究是隨生隨滅，不能保留起來供日後取得同量職務之用。他們治理國事，捍衛國家，功勞當然不小，但今年的治績，買不到明年的治績；今年的安全，買不到明年的安全。在這一類中，當然包含着各種職業，有些是很尊貴很重要的，有些卻可說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師、律師、醫師、文人；後者如演員、歌手、舞蹈家。在這一類勞動中，即使是最低級的，亦有若干價值，支配這種勞動價值的原則，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勞動價值的原則。但這一類勞動中，就連最尊貴的，亦不能生產什麼東西供日後購買等量勞動之用。象演員的對白，雄辯家的演說，音樂家的歌唱，他們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隨生隨滅的。

生產性勞動者、非生產性勞動者以及不勞動者，同樣仰食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生產物的數量無論怎麼大，決不是無窮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從而次年生產物亦必愈少。反之，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從而次年生產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產的物品，一切年產物都是生產性勞動的結果。

固然，無論在哪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是用來供給國內居民消費，給國內居民提供收入，但無論出自土地或出自生產性勞動者之手，它們都是一出來就自然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來補償資本，補充從資本取出來的食料、材料和製成品；另一部分，則或以利潤形式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生產物說，一部分是用來補償農場主的資本，另一部分用來支付利潤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作為地主的收入。就大工廠的生產物說，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以補償廠商的資本，另一部分則支付利潤，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收入。

用來補償資本的那一部分年產物，從來沒有立即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而是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至於一開始即指定作為利潤或地租收入的部分，則可能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也可能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

把資財一部分當作資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資本併兼取利潤。因此，他只用以僱用生產性勞動者。這項資財，首先對其所有者提供資本的作用，以後又構成生產性勞動者的收入。至於他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那一部分資財，從這樣使用的時候起，即由他的資本中撤出來，放在他留供直接消費的資財中。

非生產性勞動者和不勞動者，都須仰給於收入。這裏所謂收入，可分為兩項：一，在年產物中有一部分，一開始即指定作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潤收入；二，在年產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來補償資本和僱用生產性勞動者的，但在歸到獲得它的人們手中後，除維持他們衣食外，他們往往不分差別地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例如，不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連普通工人，在工資豐厚的場

合，也常僱用個把家僕，看回木偶戲。這樣，他就拿一部分收入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並且，他也許要納一些稅。這時，他所維持的那些人，雖然尊貴得多，但同樣是不生產的。不過按照常情，原想用來補償資本的那部分年產物，在還未用以僱用本要僱用的足夠的生產性勞動者，推動他們工作以前，決不至移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勞動者在未作工獲得工資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資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是決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資往往不多。這只是他節省下來的收入；就生產性勞動者的情況說，無論怎樣，也節省不了許多，不過，他們總有一些。就賦稅說，因為他們這一階級的人數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們各各所納雖很有限，但他們這一階級所納的，卻很可觀。地租和利潤，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生活所依賴的主要資源。這二種收入，最容易節省。它們的所有者可以用來僱用生產者，亦同樣可以用來僱用不生產者。但是，大體上，他們似乎特別喜歡用在後一方面。大領主的費用，通常用於供養遊惰人們的多，用於供養勤勞人民的少。富商的資本雖只用來僱用勤勞人民，但象大領主一樣，他的收入也大都用來豢養不生產的人們。

我們說過，由土地、由生產性勞動者生產出來的年產物，一生產出來，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為補償資本的基金，還有一部分作為地租或利潤的收入。我們現在又知道，隨便在哪一國，生產者對不生產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兩個部分的比例。而且，這比例，在貧國和富國又極不相同。

今日歐洲各富國，往往從土地生產物的極大部分用來補償獨立富農的資本，其餘則用以支付他的利潤與地主的地租。但在昔日封建政府林立的時候，年產物的極小部分已經足夠補償耕作的資本。因為那時候耕作所需的資本，不過是幾頭老牛老馬，而它們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產物，因此，也可把它們看作天然產物的一部分。這些牲畜，一般也是屬於地主的，而由地主借給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餘產物，也歸地主所有，或作為土地的地租，或作為無甚價值的資本的利潤。耕者大都是地主的奴僕，他們的身家財產，都同樣是地主的財產。那些不是奴僕的耕者，是可以隨意退租的佃戶。他們所繳納的地租，常常名義上和免役租一樣，但事實上依然等於全部土地生產物。而且，在和平的時候，地主可隨時徵用他們的勞役，在戰爭的時候，

他們又須出去服兵役。他們雖然住得離地主的家遠一些，但他們隸屬於地主，無異於住在地主家裏的家奴。他們的勞役既然都須聽地主支配，土地生產物當然是全部屬於地主。現在歐洲情況卻大不同了。在全部土地生產物中，地租所佔的比例很少超過三分之一，有時還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數量計，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卻大都已三倍或四倍於往日；現今在年生產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產物的全部比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在農業日益進步的時代，就數量說，地租雖是日增，但對土地生產物的比例，卻是日減。

就歐洲各富國說，大資本現今都投在商業和製造業上。古代貿易很少，製造業簡陋，所需資本極少。可是它們所提供利潤一定很大。古時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十以下。這可證明他們的利潤必定足夠提供這麼大的利息。現在，歐洲各進步國家的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六以上；最進步國家的利息率，且有時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或百分之二。因為富國的資本比貧國多得多，所以富國居民由資本利潤而得的收入也比貧國大得多。但就利潤與資本的比例說，那就通常小得多。

與貧國比較，富國用來補償資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當然要大得多。但不僅如此，與直接歸作地租和利潤的部分比較，它在年產物中所佔比例也大得多。此外，與貧國比較，富國僱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當然要大得多。但也不僅如此。我們說過，一國的年產物，除了一部分定為僱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外，其餘是用來僱用生產性勞動，還是用來僱用非生產性勞動，並不一定，但通常是用在後一用途。與貧國比較，富國僱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在年產物中所佔比例，也大得多。

這兩種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國家，都必然會決定一國人民的性格是勤勞還是遊惰。和我們祖先比較，我們是更勤勞的，這是因為，和二三百年前比較，我們用來維持勤勞人民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來維持遊惰人民的基金大得多。我們祖先，因為沒受到勤勞的充分獎勵，所以遊惰了。俗話說：勞而無功，不如戲而無益。在下等居民大都仰給於資本的運用的工商業城市，這些居民大都是勤勞的、認真的、興旺的。英國和荷蘭的大城市，便是很好的例證。在主要依靠君主經常或臨時駐節來維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計主要仰給於收入的花

費，這些人民大都是遊惰的、墮落的、貧窮的。羅馬、凡爾賽、貢比涅、楓丹白露，是很好的例證。講到法國，除了盧昂、波爾多兩市，其他各議會城市的工商業毫不足道。一般下等人民，由於大都依靠法院人員只及前來打官司的人的費用來維持，所以，大都是遊惰的、貧窮的。盧昂、波爾多兩市，則因地勢關係，商業頗為發達。盧昂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點，無論物品是由外國輸入或由沿海各地運來。波爾多則為加龍流域所產葡萄酒的集散地點，這些地方產酒豐富，世界聞名，外國人都喜歡飲用，所以輸出很多。這樣好的地勢，當然會吸引資本投到這方面來。因為這樣，這兩個城市的工業才駸駸日上。其他各議會城市的情形便不同了。人們投下資本，都只為維持本市的消費，換言之，投下的資本為數有限，決不能超過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馬德里、維也納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這三城市中，巴黎要算最勤勞的了，但巴黎就是巴黎本市制造品的主要銷售市場；巴黎本城的消費，就是一切營業的主要對象。既為王公駐節之所、又為工商輻輳之地，既為本市消費而營業、又為外地及外國消費而營業的城市，在歐洲只有倫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這三個城市所處的地位都很有利，適合於作為大部分遠方消費物品的集散地點。但在花費大收入的城市，除把資本用於供應本地的消費外，想有利地使用資本，就不象在下等人民生計專靠資本的運用來維持的工商大城市那麼容易。靠花費收入來維持生活的大部分人們都遊惰慣了，使得一些應該勤勉作事的人，亦不免與之同化。所以，在這地方使用資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英格蘭和蘇格蘭未合併前，愛丁堡的工商業很不發達。後來，蘇格蘭議會遷移了，王公貴族不一定要住在那裏了，那裏的工商業才慢慢振興起來。但蘇格蘭的大理院、稅務機關等，未曾遷移，所以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裏花費。因此，就工商業說，愛丁堡遠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生計，大都靠資本的運用。再者，我們有時看到，在製造業方面很有進展的大鄉村的居民，往往由於公侯貴族卜居其間，而變得懶惰和貧困。

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資本與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勞與遊惰的比例。資本佔優勢的地方，多勤勞；收入佔優勢的地方，多遊惰。資本的增減，自然會增減真實勞動量，增減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因而，增減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增減一國人民的真實財富與收入。

資本增加，由於節儉；資本減少，由於奢侈與妄為。一個人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這個增多的資本，他可以親自投下來僱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給別人，使其能僱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個人的資本，既然只能由節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個人構成的社會的資本，亦只能由這個方法增加。

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節儉，不是勤勞。誠然，未有節儉以前，須先有勤勞，節儉所積蓄的物，都是由勤勞得來。但是若只有勤勞，無節儉，有所得而無所貯，資本決不能加大。節儉可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基金，從而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他們的勞動，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對象的價值，所以，節儉又有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的趨勢。節儉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更大的勞動量可增加年產物的價值。

每年節省的象每年花費的一樣，經常被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同時被消費掉。但消費的人不同。富人每年花費的收入部分，大都由遊惰的客人和家用的婢僕消費掉，這些人消費完了就算了，不留下什麼作為報酬。至於因要圖利而直接轉為資本的每年節省下來的部分，也同樣並幾乎同時被人消費掉，但消費的人是勞動者、製造者、技工。他們會再生產他們每年消費掉的價值，並提供利潤。現在假定他的收入都是貨幣，如果他把它全部花掉，他用全部收入購得的食物、衣服和住所，就是分配給前一種人。如果節省的一部分，為圖利而直接轉作資本，親自投用，或借給別人投用，那末，他由這節省部分購得的食物、衣料和住所，就將分配給後一種人。消費是一樣的，但消費者不同。

節儉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養若干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而且，他好象工廠的創辦人一樣，設置了一種永久性基金，將來隨便什麼時候，都可維持同樣多的生產性勞動者。這種基金，將如何分派，將用到什麼地方，固然沒有法律予以保障，沒有信託契約或永遠營業證書加以規定，但有一個強有力的原理保護其安全，那就是所有者個人的利害關係。如果把這基金的任何部分，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這樣不按照原指定用途濫用該基金的人，非吃虧不可。

奢侈者就是這樣濫用資本：不量入爲出，結果就蠶食了資本。正象把一種敬神之用的基金的收入移作瀆神之用的人一樣，他把父兄節省下來打算作點事業的錢，豢養着許多遊手好閒的人。由於僱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減少了，所僱用的能增加物品價值的勞動量亦減少了，因而，全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生產物價值減少了，全國居民的真實財富和收入亦減少了。奢侈者奪勤勞者的麪包來豢養遊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節儉，不足抵償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爲，不但會陷他自身於貧窮，而且將陷全國於匱乏。

縱使奢侈者所費全系國產商品，不用一點外國貨，結果亦將同樣影響社會的生產基金。每年總有一定數量的食品和衣服，本來應該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被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因此，每年一國生產物的價值，總不免低於本來應有的價值。

有人會說，這種花費，不是用來購買外國貨，不曾引起金銀往外輸出，國內貨幣是不會減少的。但是，假若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產者消費，而是分配給生產者，他們就不僅可再生產他們消費的全部價值，而且可提供利潤了。這同量的貨幣將依然留在國內，卻又再生產了一個等價值的消費物品，所以結果將有兩個價值，不僅有一個價值。

而且，年生產物價值日趨減落的國家，決不能保留這同量的貨幣。貨幣的唯一功用，是週轉消費品。賴有貨幣，食品、材料與製成品纔可實行賣買，而分配給正當的消費者。一國每年所能通用的貨幣量，取決於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不是本國土地和勞動的直接生產物，就是用本國生產物購買進來的物品。國內生產物的價值減少了，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亦必減少，因而，國內每年所能通用的貨幣量，亦必減少。因生產物年年減少而被逐出國內流通領域以外的貨幣，決不能棄無所用。貨幣所有者由於利害關係，決不願自己的貨幣放着不用。國內沒有用途，他就會不顧法律，不顧禁止，送往外國，用來購買國內有用的各種消費物品。貨幣每年的輸出，將在一定期間內繼續着，使國內人民每年的消費額，超過他們本國年產物的價值。繁榮時代從積下來年產物所購買的金銀，在這逆境中可支持他們一些時候。但在這場合，金銀輸

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結果。實際說來，這種輸出，甚至還可暫時減少民生凋敝的痛苦。

反過來說，一國年產物的價值增加了，貨幣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國內流通的消費品價值增加了，當然需要更多的貨幣量來流通。因此，有一部分增加的生產物，必定會四散出去，在有金銀的地方，購買必要增加的金銀。但在這場合，金銀增加，只是社會繁榮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繁榮的原因。購買金銀的條件，是到處一樣的。從礦山掘出，再運到市上來，總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或資本。爲這事業而勞動而投資的人，總需要農食住的供給與收入。這一定數量的供給和收入，就是購買金銀的價格。在英格蘭購買金銀是這樣，在祕魯購買金銀也是這樣。需要金銀的國家，只要出得起這個價格，用不着擔心所需的金銀會長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銀，亦不會長久留在國內。

所以，無論我們根據明白合理的說法，說構成一國真實財富與收入的，是一國勞動和土地的年產物的價值，或是依隨通俗的偏見，說構成一國真實財富與收入的，是國內流通的貴金屬量——總之，無論就哪一個觀點說，奢侈都是公衆的敵人，節儉都是社會的恩人。

再講妄爲。妄爲的結果，和奢侈相同。農業上、礦業上、漁業上、商業上、工業上一切不謹慎的、無成功希望的計劃，對於僱用生產性勞動的基金，都有使之減損的趨勢。固然，投在這種計劃上的資本，亦只由生產性勞動者消費，但由於使用不適當，所只，他們消費的價值，不能充分再生產出來，與使用適當的場合比較，總不免減少社會上的生產基金。

幸而就大國的情形說，個人的奢侈妄爲，不能有多大影響。另一部分人的儉樸慎重，總夠補償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爲而有餘。

講到奢侈，一個人所以會浪費，當然因爲他有現在享樂的慾望。這種慾望的熱烈，有時簡直難於抑制，但一般說來，那總是暫時的偶然的。再講節儉，一個人所以會節儉，當然因爲他有改良自身狀況的願望。這願望，雖然是冷靜的、沉着的，但我們從胎裏出來一直到死，從沒一刻放棄過這願望。我們一生到死，對於自身地位，幾乎沒有一個人會有一刻覺得完全滿意，不求進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樣改良呢，一般人都覺得，增加財產是必要的手段，這手段最通俗，最明顯。增加財產的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

節省一部分，貯蓄起來。所以，雖然每個人都不免有時有浪費的慾望，並且，有一種人，是無時不有這慾望，但一般平均說來，在我們人類生命的過程中，節儉的心理，不僅常佔優勢，而且大佔優勢。

再講妄為，無論那裏，慎重和成功的事業總佔極多數。不慎重、不成功的事業，總佔極少數。我們雖然常常看見破產的失意者，但在無數的經營商業的人中，失敗的總是全數中的極小部分。一千個中，只有一個吧。破產這種災禍，對於一個清白的人，實在是極大的極難堪的災禍。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實在不多。當然羅，不知道避免它的人，象不知道避絞臺的人一樣，也並非沒有。

地大物博的國家，固然不會因私人奢侈妄為而貧窮，但政府的奢侈妄為，卻有時可把它弄得窮困。在許多國家中，公衆的收入，全部或幾乎全部都是用來維持不生產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會中的牧師神父，就是這一類人。又如海陸軍，他們在平時既一無生產，在戰時又不能有所獲取，來補償他們的維持費。甚至在戰爭繼續進行的期間，也如此。這些人，因為他們一無生產，不得不仰給於別人勞動的產物。如果他們人數增加到不應有的數額，他們可能在某一年消費掉這麼多的上述產物，以致反無足夠餘量來維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產的生產性勞動者。於是下一年的再生產，一定不及上一年。如果這種混亂情形繼續下去，第三年的再生產，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應拿人民的一部分剩餘收入來維持的不生產者，他們可能消費了人民全收入的這樣大的部分，使得這麼多人民不得不侵蝕他們的資本，侵蝕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以致不論個人多麼節儉多麼慎重，都不能補償這樣大的浪費。

然而，就經驗所得，在大多數場合，個人的節儉慎重，又似乎不僅可以補償個人的奢侈妄為，而且可以補償政府的浪費。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以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這不斷的努力，常常強大得足以戰勝政府的浪費，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錯誤，使事情日趨改良。譬如，人間雖有疾病，有庸醫，但人身上總似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難關，恢復原來的健康。

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只有兩個方法，一為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一為增進受僱勞動者的生產力。很明顯，要增

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目，必先增加資本，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數受僱勞動者的生產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勞動、縮減勞動的機械和工具，或者把它們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為適當。但無論怎樣，都有增加資本的必要。要改良機器，少不了增加資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資本。把工作分成許多部分，使每個工人一直專做一種工作，比由一個人兼任各種工作，定須增加不少資本。因此，我們如果比較同一國民的前代和後代，發覺那裏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後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狀況進步了，工業擴大了、繁盛了，商業推廣了，我們就可斷言，在這兩個時代間，這國的資本，必定增加了不少。那裏一部分人民的節儉慎重所增加於資本的數額，一定是多於另一部分人民的妄為和政府的浪費所侵蝕了的資本的數額。說到這裏，我應該聲明一句，只要國泰民安，即使政府不是節省慎重的，國家情況，也可有這種進步。不過，我們要正確判定這種進步，不應比較兩個相離太近的時代。進步是如此逐漸的，時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時，即使國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們往往因看到某種產業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便懷疑它全國的財富與產業都在退步。

和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復辟時比較，現在英格蘭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當然是多得多了。現在懷疑英國年產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在這一百年時間內，幾乎每隔五年，即有幾本寫得很好能使人動聽的書或小冊子，說英格蘭的國富正在銳減，人口正在減少，並且說那裏是農業退步，工業凋零，商業衰落。而且，這類書籍，不見得全是黨派的宣傳品，全是欺詐和見利忘義的產物。我曉得，它們裏面有許多是極誠實、極聰明的作家所寫的。這些人所敘述的，沒有不是他們自己相信的。

再者，和二百年前伊麗莎白即位時比較，查理二世復辟時代英格蘭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必定多得多了。和三百年前約克與蘭克斯特爭勝時代末期比較，伊麗莎白時代英格蘭的年產物，必又多得多了。再推上去，約克與蘭克斯特時代，當然勝於諾爾曼征服的時代；諾爾曼征服的時代，當然又勝於撒克遜七人統治的時代。在撒克遜七人統治的時代，英國當然不能說是一個進步的國家，但與朱利阿·凱撒侵略

時代（這時，英格蘭居民的狀況，和北美野蠻人相差不遠）比較，又算大進步了。

然而，在這各個時期中，私人有很多浪費，政府也有很多浪費，而且發生了許多次費用浩大的不必要的戰爭，原用來維持生產者的年產物，有許多移用來維持不生產者。有時，在江激烈時候，浪費的浩大，資本的破壞，在任何人看來，都會感覺這不但會妨礙財富的自然蓄積（實際上確是如此），而且會使國家在這時期之末陷於更為貧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復辟以後，英國境況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那時又有多少紊亂與不幸事件發生呢？如果我們是生在那時，我們一定會耽心英格蘭的前途，說它不僅要陷於貧困，怕還會全然破滅吧。你想想看，倫敦大火以後，繼以大疫，又加英荷兩次戰後的革命騷擾，對愛爾蘭戰爭，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對法耗費巨大的大戰，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亂。不說別的，單就達四次英法大戰的結果來說，英國欠下來的債務，就在一億四千五百萬鎊以上，加上戰爭所引起的各種特殊支出，恐怕總共不下二億鎊吧。自革命以來，我國年產物，就常有這樣大的部分，用來維持非常多的不生產者。假使當時沒有戰爭，那末當時當作那樣用費的資本，其中定有一部分會改變用途來僱用生產性勞動者。生產性勞動者既能再生產他們消費的全價值，並提供利潤，那末，我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見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如果當時沒有戰爭，建造起來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廣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製造業一定增多了，已有的製造業又一定推廣了；至於國民真實財富與收入將要怎樣增加起來，我們也許難於想象。

政府的浪費，雖無疑曾阻礙英格蘭在財富與改良方面的自然發展，但不能使它停止發展。與復辟時代比較，現在英格蘭土地和勞動的年生產物是多得多了；與革命時代比較，也是多得多了。英格蘭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維持農業勞動的資本，也一定比過去多得多了。一方面雖有政府的誅求，但另一方面，卻有無數個人在那裏普遍地不斷地努力改進自己的境況，節省哪、慎重哪，他們不動聲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資本累積起來。正是這種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況下自由發展，使英格蘭幾乎在過去一切時代，都能日趨富裕，日趨改

良。而且，將來永遠照樣進行下去，亦不是沒有希望的事體。可是，英格蘭從來沒有過很節儉的政府，所以，居民亦沒有節儉的特性。由此可見，英格蘭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頒佈節儉法令，甚至禁止外國奢侈品輸入，倡言要監督私人經濟，節制鋪張浪費，實是最放肆、最專橫的行爲。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始終無例外地是社會上最浪費的階級。他們好好注意自己的費用就行了，人民的費用，可以任憑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們的浪費，不會使國家滅亡，人民的浪費，那裏談得上呢。

節儉可以增加社會資本，奢侈可以減少社會資本。所以，花費等於收入的人，不蓄積資本，亦不蠶食資本，不增加資本，亦不減少資本。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在各種花費方法中，有些比其他更可促進國富的增長。

個人的收入，有的用來購買立時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無補於來日。有的用來購買比較耐久的可以蓄積起來的物品，今日購買了，就可以減少明日的費用，或增進明日費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富翁簡直是室滿奴婢，廄滿犬馬，大吃大用的花。有些寧願食事儉約，奴婢減少，卻修飾莊園，整飭別墅，頻興建築，廣置有用的或專作爲裝飾的傢俱、書籍圖畫等等。有些，卻明璫瓔珞，灼爍滿前。還有些，則有如前數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寵臣，衣服滿箱，錦繡滿牀。設有甲乙二富郎，財產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來購買比較耐久的商品，乙則用其大部分收入，來購買即享即用的物品。到後來，甲的境況，必能日漸改進，今日的費用，多少可以增進明日費用的效果。乙的境況，決不會比原先更好。到底，甲必較富於乙。甲尚有若干貨物，雖其價值不如當時所費，但總有多少價值。乙的費用，就連痕跡也沒留下來，十年或二十年浪費的結果，真是一無餘物。

對個人財富較有益的消費方法，對國民財富亦較有益。富人的房屋、傢俱、衣服，轉瞬可一變而對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階級玩厭了的時候，中下階級的人民，可以把它們買來，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這樣使用錢財的時候，全體人民的一般生活狀況就逐漸改進了。在一個富裕已久的國家，下等人民雖不能自己出資建造大廈，但往往佔有大廈；雖不能自己定製上等傢俱，但往往使用看上等傢俱。往日西穆爾的邸宅，現今已經成爲巴斯道上的客寓；詹姆士一世的婚

牀（那是皇后從丹麥帶來的嫁奩，作為鄰國通婚的禮物），幾年前，已經陳列在敦弗林的酒店。在有些無進步也無退步或已稍稍沒落的古城，我們有時可發現幾乎沒有一所房屋是眼前佔有人所蓋得起的。如果你進裏面去，還可見到許多還可適用的非常講究但已是老式的傢俱。這些傢俱絕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錢定製的。王宮別墅，書籍圖像，以及各種珍奇物品，常常又是光榮又是裝飾，不但對其所在的本地地方如此，對其所屬國家亦如此。凡爾賽宮是法蘭西的裝飾和光榮，斯托威和威爾登是英格蘭的裝飾和光榮。意大利創造名勝古蹟的財富，雖然是減落了，創造名勝古蹟的大天才（也許因為沒有用處）雖然似乎是湮沒了，但那裏的名勝古蹟，卻仍然博得世人的讚賞。

把收入花費在比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僅較有利於蓄積，而且又較易於養成儉樸的風尚。設使一個人在這方面花費得過多，他可幡然改計，而不致為社會人士所譏評。如果原來是婢僕成羣，驟然撤減，如果原來是華筵廣設，驟然減省，如果原來是陳設豐麗，驟然節用，就不免為鄰人共見，而且好象是意味着自己承認往昔行為的錯誤。所以，象這樣大花大用的人，不是迫於破產，很少有改變習慣的勇氣。反之，如果他原愛用錢添置房屋、傢俱、書籍或圖畫，以後如果自覺財力不濟，他就可以幡然改習，人亦不疑。因為此類物品，前已購置，無需源源購置不絕。在別人看來，他改變習性的原因，似乎不是財力不濟，而是意興已闌。

何況，費財於耐久物品，所養常多；費財於款待賓客，所養較少。一夕之宴，所費為二三百斤糧食，其中也許有一半傾於糞堆，所耗不可謂不大。設以宴會所費，用以僱用泥木工、技匠等等，則所費糧食的價值雖相等，所養的人數必加多。工人們將一便士一便土地、一鎊一鎊地購買這些糧食，一鎊也不會消耗毀棄。一則用以維持生產者，能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一則用以維持不生產者，不能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

讀者不要以為，費財於耐久物品，即為善行，費財於款待賓客，全為惡行。一個富人把他收入主要用於款待賓客時，即以收入的大部分，分濟友伴。如他用以購買耐久物品，利則僅及於一身，非有代價，即不許他人分享。因此，後一種的花費，特別是花於購珠寶、衣飾等等這些瑣細東西，常常不僅表示一種輕浮性向，而且表示卑下的

自私自利性向。我上面的意思，不過是說，費財於耐久物品，由於助長有價商品的蓄積，所以可獎勵私人的節儉習慣，是較有利於社會資本的增進；由於所維持的是生產者而不是不生產者，所以較有利於國富的增長。

第四章論貸出取息的資財

貸出取息的資財，出借人總是看作資本。出借人總希望借貸期滿，資財復歸於己，而在借期中借用人因曾使用這資財，要付他年租若干。這種資財，在借用人手裏，可用作資本，亦可用作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如果用作資本，就是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可再生產價值，並提供利潤。在這場合，他無須割讓或侵蝕任何其他收入的資源便能償還該資本及其利息。如果用作目前消費的資財，他就成為浪費者，他奪去了維持勤勞階級的基金，來維持遊惰階級。在這場合，除非他侵蝕某種收入的資源如地產或地租，他就無法償還資本，支付利息。

貸出取息的資財，無疑有時兼用在這兩種用途上，但用在前一用途的較多，用在後一用途的較少。借錢揮霍的人，勢難久立，借錢給他的人，常要後悔愚不可及。除了重利盤剝者，象這樣的貸借，對雙方都毫無利益。社會上固然難免有這樣貸借的事件發生，但因人各自利，所以，可以相信，它不會象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常有。任何比較謹慎的富人，如果問他願以大部分資財貸給謀利的人呢，或是浪費的人呢，他聽了，怕只會發笑，笑你會提出這樣不成問題的問題。借用人雖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節儉家，但即在他們之中，節儉的終必比奢侈的多得多，勤勞的終必比遊惰的多得多。

借款徒供揮霍的，只有鄉紳。鄉紳借款，通常有財產為抵押，其所借款，常非用於有利的用途。但就連鄉紳，借錢亦並非全供浪費。所借的錢，常常早在未借之前就已用光。他們日常享用的東西，多向商店老闆賒購，往往賒得很多，必須出息借款來還清賬目，鄉紳們所借的資本實是補償商店老闆的資本，他們所收的地租，不夠償還，所以向別人借款來償還。這時他借錢並不是為了要花費，只是為了要補償先前已經花掉了的資本。

取息的貸款，大都是從貨幣借出，或為鈔票，或為金銀。但借用人所需要、出借人所供給的實際上不是貨幣而是貨幣的價值，換言之，是貨幣所能購買的貨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即享即用的資財，那末，他所貸借的便是能夠即享即用的貨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振興產業的資本，那末，他所貸借的便是勞動者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材料與

食品。貸借的事情，實際就是出借人把自己一部分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使用權讓與借用人，聽他隨意使用。

貨幣總是國內各種貸借的手段，不論其為鈔票或為鑄幣。一國能有多少資財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或者象一般人所說，能有多少貨幣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並不受貨幣價值的支配，而受特定部分年產物價值的支配。這特定部分年產物從土地生出或由生產的工人製出後，即被指定作資本用，同時所有者又無意親自使用，因而借給別人。因為這種資本的出借與償還，都以貨幣來往，故被稱為金錢上的利害關係。這不僅不同於農業上的利害關係，且不同於工商業上的利害關係，因為在工商業，資本所有者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資本的。但我們應該知道，即使在金錢上的利害關係方面，貨幣也不過象一張讓與的契約一樣，甲把無意親自使用的資本轉讓給乙。這樣轉讓的資本量，和作為轉讓手段的貨幣的數量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同一枚鑄幣或同一張紙幣。可作許多次的購買，亦可連續作許多次的貸借。例如，甲以一千鎊借給乙，乙立即用來向丙購一千鎊貨物。丙因不需貨幣，就把這一千鎊借給丁，丁又立即用來向戊購一千鎊貨物。戊也因為不需要貨幣，同樣地把這一千鎊借給己，己再立即向庚購一千鎊貨物。所以貨幣還是原來那幾枚鑄幣或孤幾張紙幣，但不消幾天功夫，貸借就已進行三次，購買亦已進行三次了。每一次，在價值上，都與這貨幣總額相等。甲、丙、戊是有錢出借的人，乙、丁、己是要借錢的人。他們所貸借的，其實只是購買那些貨物的能力。貸借的價值與效用，都在於這種購買力。這三個有錢人所貸出的資財，等於這筆貨幣所能購買的貨物的價值，所以，這三次貸借所借出的資財，實三倍於購買所用的貨幣的價值。假使債務人所購的貨物，應用適當，能在相當期間償還原借的價值及其利息，這種貸借，就十分可靠。而且，這筆貨幣，既可用作貸借三倍其價值的手段，或基於同一理由，也可用作貸借三十倍其價值的手段，所以，也可連續用作償還債務的手段。

照這樣看，以資本貸人取息，實無異由出借人以一部分的年產物，讓與借用人。但為報答這種讓與，借用人須在借用期內，每年從較小部分的年生產物，讓與出借人，稱作付息；在借期滿後，又以相等於原來由出借人讓給他的那部分年產物，讓與出借人，稱作還本。

在轉讓這較小部分和較大部分的場合，貨幣雖然都作為讓與證，但和其所讓與的東西，完全不同。

一從土地生出或由生產性勞動者製出，即被指定作補償資本之用的那一部分年產物，如果增加了，則所謂金錢上的利害關係亦自然隨而增加。資本一般增加了，所有者無意親自使用但望從此得一收入的資本，亦必增加。換言之，資財增加了，貸出生息的資財，亦必逐漸增加。

貸出生息的資財增加了，使用這種資財所必須支付的價格即利息必然低落。那些使物品市價隨物品數量增加而減低的一般原因，固然是使這時利息低落的一個原因，但除了這個原因，我們還可尋出幾個特殊的原因。第一，一國的資本增加了，投資的利潤必減少。要在國內為新資本找到有利的投資方法，將日見困難。資本間的競爭，於是發生，資本所有者常互相傾軋，努力把原投資人排擠出去。但要排擠原投資人，只有把自己的要求條件，放寬一些。他不僅要賤賣，而且，有時因為要出賣，還不得不貴買。第二，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增加了，對生產性勞動的需求亦必日益增加。因之，勞動者不愁無人僱用，資本家反愁無人可僱。資本家間的競爭提高了勞動的工資，降低了資本的利潤。因使用資本而造成的利潤既然減低了，為使用資本而付給的代價，即利息率，非隨之減低不可。

洛克、勞氏、孟德斯鴻，還有許多別的作家，都以為，因為西屬西印度的發現，金銀量增加了，這增加就是大部分歐洲利息率低落的真實原因。他們說，這兩種金屬本身的價值減低了，所以，它們特定部分的使用，亦只有較小的價值，因而使用它們時出得起的價格亦較小。這個觀念乍一看來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實是錯誤的。這錯誤已為休謨充分揭露了，我們也許沒有再講的必要。但下面極簡明的議論，或可進一步說明迷惑這幾位先生的謬見。

在西屬西印度尚未發現以前，大部分歐洲的普通利息率，似為百分之十。從那時起，各國的普通利息率，他已降為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三。姑且假設某國銀價低落的比例，恰等於利息率低落的比例。比方說，在利息率由百分之十減至百分之五的地方，等量的銀，現在所能購買的貨物量，只等於從前的一半。這種假設，真與事實符合嗎？我相信，事實決不如此，但這種假設，對於

我現今要考察的那種學說卻很有利。而且，就是根據這個假設，我們亦決不能說，銀的價值的低落，有一點點減低利息率的趨勢。因爲，假若現今一百鎊的價值僅等於昔日五十鎊的價值，那現今十鎊的價值亦就只等於昔日五鎊的價值。減低母本價值的原因，無論它是什麼，這原因也必然會減低利息的價值，且按同一比例減低其價值。母本價值與利息價值的比例，必然依舊，雖然利息率並未改變。如果利息率真是改變了，這兩個價值之間的比例，就非改變不可。如果現今一百鎊的價值，只等於昔日五十鎊的價值，那末，現今五鎊的價值，也只等於昔日二鎊半的價值。所以，在母本價值折半的時候，把利息率由百分之十減至百分之五，那對使用資本所付的利息的價值，就只等於昔時利息價值的四分之一了。

在靠白銀流通的商品的數量未曾增加的時候，銀量增加，只會減低銀的價值。這時，各種貨品的名義價值，都會增大，但他們的真實價值，卻依舊不變。它們可換得較多的銀，但它們所能支配的勞動量，所能維持和僱用的勞動者人數，必依舊不變。移轉等量資本由甲到乙所需要的銀量，可能增加了，但資本卻沒有增加。那讓與證，象冗長的委託書一樣，是累贅多了，但所讓與的物品，卻仍舊一樣，而只能產生同樣的效果。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既然依舊，對生產性勞動的需求自然也依舊。所以，生產性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名義上雖是增大了，實際上卻是不變。以所付的銀量計，工資雖是加大了，以所能購買的貨物量計，工資卻是依舊。資本利潤，無論就名義說，就實際說，都無變動。勞動的工資，因爲常以所付銀量計算，所以在所付銀量增加時，有時工資雖毫無增加，外表上卻似乎已經增加。資本的利潤，卻不是這樣。資本利潤，不由所得銀量的多寡計算。計算利潤的時候，我們只計算所得銀量與所投資本的比例。比方，我們說到工資，常常說這個國家的普通工資是每星期五先令；我們說到利潤，常常說這個國家的普通利潤是百分之十。但國內所有的資本，既和以前一樣，分有這全部資本的國內各個人的資本的競爭，亦必和以前一樣。他們做交易時所享受的便利和從前一樣，所遭遇的困難也和從前一樣。因此，資本對利潤的普通比例依舊不變，而貨幣的普通利息亦依舊不變。使用貨幣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須受使用貨幣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潤的支配。

在國內流通界貨幣量不變的場合，國內每年流通的商品量的增加，卻除了發生貨幣價值提高的結果外，還會引起許多別的重要結果。這時，一國資本，名義上雖是依舊，實際上卻已增加。它可能仍繼續由同量貨幣表示，但卻能支配較大的勞動量。它所能維持和僱用的生產性勞動量增加了，勞動的需求因此亦增加。工資自將隨勞動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但從表面上看，卻可能似乎在下跌。這時勞動者所領受作為工資的貨幣量，可能比以前少，但現今這較少的貨幣所能購得的物品量，卻比從前較多貨幣所能購買的物品量還要多。但無論在實際上和名義上，資本的利潤都會減少。國內所有的資本總量既已增加，資本間的競爭，當然會隨而增加。資本家各自投資的結果，即使所獲，在各自資本所僱的勞動的生產物中所佔比例比以前小，亦只有自認晦氣。貨幣的利息，既然與資本的利潤共進退，所以，貨幣的價值雖然大增了，換言之，一定量貨幣所能購買的物品量雖然大增了，但貨幣的利息仍然可能大減。

有些國家的法律，禁止貨幣的利息。但由於在任何地方使用資本都會取得利潤，所只在任何地方使用資本都應有利息為酬。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盤剝的罪惡，反會使它加甚，因為，債務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貨幣的報酬，而且要對出借人冒險接受這種報酬支付一筆費用。換言之，要給出借人保險，他不遭受對重利盤剝所處的刑罰。

在放債取利不被禁止的國家，為了禁止重利盤剝，法律往往規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這個最高利息率，總應略高於最低市場利息率，即那些能夠提供絕對可靠擔保品的借款人借用貨幣時通常所付的價格。這個法定利息率若低於最低市場利息率，其結果將無異於全然禁止放債取利的結果。如果取得的報酬少於貨幣使用之所值，則債權人便不肯借錢出去，所以債務人得為債權人冒險接受貨幣使用之全值而支付一筆費用。如果法定利息率適等於最低市場利息率，則一般沒有穩當擔保品的人便不能從遵守國法的誠實人那裏借到錢，而只好任重利盤剝者盤剝。現在英國，從貨幣貸給政府，年息為百分之三，貸給私人，若有穩當擔保品，則年息為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點五，所以，象英國這樣的國家，規定百分之五為法定利息率，也許是再適當沒有。

必須注意，法定利息率，雖應略高於最低市場利息率，但亦不應高得過多。比方說，如果英國法定利息率，規定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末，就有大部分待借的貨幣，會借到浪費者和投機家手裏去，因為只有他們這一類人，願意出這樣高的利息。誠實人只能以使用貨幣所獲的利潤的一部分，作為使用貨幣的報酬，所以，不敢和他們競爭。這樣，一國資本，將有大部分會離開誠實的人，而轉到浪費者手裏，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卻用在浪費資本和破壞資本的用途上。反之，在法定利息率僅略高於最低市場利息率的場合，有錢出借的都寧願借給誠實人，不願借給浪費者和投機家。因為借給誠實人所得的利息，和借給浪費者所收取的利息幾乎相同，而錢在誠實人手上，穩當得多。這樣，一國資本就大部分在誠實人手中，而在這些人手中的資本，大抵都用得有利。

沒有任何法律，能把利息減低到當時最低普通市場利息率之下。1766年，法國國王規定利息率須由百分之五減至百分之四，但結果，人民用種種方法逃避該法律，民間借貸利息率仍為百分之五。

應該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場價格，取決於普通市場利息率。有資本不願親自使用但願從此得一收入的人，對於究竟把它用來購買土地好，還是把它借出取息好，通常總是再三盤算的。土地財產是極穩當可靠的，除此以外，大都還有其他幾種利益。所以，比較起來，把錢貸給別人收取利息，所得雖更多，但他通常卻寧願購買土地而得較小收入。這些利益可以抵補收入上一定的差額，但亦只能抵補收入上一定的差額。如果土地地租遠遜於貨幣利息，那就誰也不願購買土地，土地的普通價格必因而跌落。反之，如果這些利益抵償這差額後還有許多剩餘，那就誰也寧願購買土地，土地普通價格就會提高。在利息率為百分之十時，土地售價常為年租的十倍或十二倍。利息率減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時，土地售價就上升到年租的二十倍、二十五倍，甚至三十倍。法國市場利息率高於英國；法國土地的普通價格低於英國。英國土地售價常為年租的三十倍；法國土地售價常為年租的二十倍。

第五章論資本的各種用途

一切資本，雖都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但等量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隨用途的不同而極不相同，從而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能增加的價值，亦極不相同。

資本有四種不同用途。第一，用以獲取社會上每年所須使用所須消費的原生產物；第二，用以製造原生產物，使適於眼前的使用和消費；第三，用以運輸原生產物或製造品，從有餘的地方運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使成為較小的部分，適於需要者的臨時需要。第一種用法是農業家、礦業家、漁業家的用法；第二種用法是製造者的用法；第三種用法是批發商人的用法；第四種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為，這四種用法，已經包括了一切投資的方法。

這四種投資方法，有相互密切關係，少了一種，其他不能獨存，即使獨存，亦不能發展。為全社會的福利計，亦是缺一不可。

一，假設沒有資本用來提供相當豐饒的原生產物，製造業和商業恐怕都不能存在。二，原生產物，有一部分往往要加工製造後才適於使用或消費。假設沒有資本投在製造業中把它加工，則這種原生產物將永遠不會被生產出來，因為沒有對它的需求；或如果它是天然生長的，它就沒有交換價值，不能增加社會財富。三，原生產物及製造品富饒的地方，必從所餘運往缺乏的地方，假設沒有資本投在運輸業中，這種運輸便不可能。於是它們的生產量便不能超過本地消費所需要的。批發商人的資本，可通有無，使這個地方的剩餘生產物交換別個地方的剩餘生產物，所以，既可以獎勵產業，又可以增進這兩個地方的享用。四，假設沒有資本投在零售商業中，把大批原生產物和製造品分成小的部分，來適應需要者的臨時需要，那末，一切人對於所需的貨品都得大批買進來，超過目前的必需。假設社會上沒有屠戶老闆，我們大家都非一次購買一頭牛或一頭羊不可。這對富人也一定是不便的，對貧民將更為不便。貧窮勞動者如果要勉強一次購買一個月或半年的糧食，那他的資本一定有一大部分，不得不改作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一定有一部分本來能提供收入的，不得不變作不能提供收入的。職業上的工具，店鋪內的傢俱，都非減少不可。對這種人來

說，最方便的辦法，是在需要生活品的時候，能夠逐日購買，逐時購買。這樣，他可以把幾乎全部資財用作資本。於是他所能提供的工作的價值擴大了，而他以此所獲的利潤，將足以抵銷零售商的利潤對貨物價格所增加的數目而有餘。有些政論家對商店老闆的成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小商賈羣立，雖然他們相互間也許有妨害，但對社會毫無妨害。所以，不需要對他們課稅，或限制他們的人數。例如，某市及其鄰近地帶對於雜貨的需求限制着該市所能售出的雜貨量，因此可投在雜貨商業上的資本，決不可能超過足以購買這數量雜貨所必需的數額。這種有限的資本，如果分歸兩個雜貨商人經營，這兩人間的競爭，會使雙方都把售價減低得比一個人獨營的場合便宜。如果分歸二十個雜貨商人經營，他們間的競爭會更劇烈，而他們結合起來擡高價格的可能性會變得更小。他們間的競爭，也許會使他們中一些人弄得破產，但這種事情，我們不必過問，當事人應該自己小心。他們的競爭，決不會妨害消費者，亦不會妨害生產者。比之一兩個人獨佔的時候，那隻能使零售商人貴買而賤賣。零售商人多了，其中也許有壞分子，誘騙軟弱顧客購買自己至不需要的貨品。不過，這種小弊害，值不得國家去注意，更用不着國家去干涉。限制他們的人數不一定能杜絕這個弊害。舉一個最顯著的例，不是因為市場上有許多酒店，我們社會上纔有飲酒的風尚；而是社會上由於他種原因而產生了好飲酒的風尚，才使市場上有許多酒店。

把資本投在這四種用途上的人，都是生產性勞動者，他們的勞動，如果使用得當，就可固定而且實現在勞動對象或可賣物品上，至少，也可把維持他們自身和他們自身消費掉的價值，加在勞動對象或可賣物品的價格上。農場主、製造者、批發商人、零售商人的利潤，都來自前兩者所生產及後兩者所售賣的貨品的價格。但是，各自投在這四種用途的資本雖相等，但因用途不同，等量資本所直接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卻不相同，從而，對於所屬社會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增加的價值的比例，亦不相同。

向批發商人購買貨物的零售商人的資本，補償並提供批發商人的資本及其利潤，使其營業得以繼續。零售商的資本，只直接僱用了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受僱的唯一的生產性勞動者。這資本的使用，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增加的價值，只是他自己的利潤。

向農業家購買原生產物、向製造者購買製造品的批發商人的資本，補償並提供農業家和製造者的資本及其利潤，使其營業得以繼續。這就是批發商間接維持社會上生產性勞動，增加社會年產物價值的主要方法。他的資本，也僱用了運輸貨物的水手腳伕。所以它對於這種貨物的價格所增加的，不僅等於批發商自己利潤的價值，而且還包括水手腳伕工資的價值。它所直接僱用的生產性勞動只如此；對於年產物它所直接增加的價值亦只如此。但批發商人的資本在這二方面的作用要比零售商人的資本大得多。

製造者的資本，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資本，投在他的生意所用的工具上，補償出賣這些工具的其他製造者的資本並給他們提供利潤。其餘就是流動資本。在流動資本中，有一部分是用來購買材料，這部分補償供給這些材料的農業家和礦商的資本並給他們提供利潤。但其大部分，是一年一次地或在比一年短得多的時間內分配給他所僱用的工人的。所以，他的資本對他所加工的材料所增加的價值，包括有僱工的工資，和僱主投資支付工資和購買材料工具應得的利潤。所以，與批發商人的等量資本比較，他的資本所直接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大多了，對於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增加的價值，亦大多了。

農業家資本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最大。他的工人是生產性勞動者，他的牲畜也是生產性勞動者。在農業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勞動；自然的勞動，雖無須代價，它的生產物卻和最昂貴的工人生產物一樣，有它的價值。農業的最重要的任務，與其說是增加自然的產出力，無寧說是指引自然的產出力，使生產最有利於人類的植物，雖然它也增加自然的產出力。長滿蓬蒿荊棘的田地可能生產的植物，常常不比耕作最好的葡萄園或谷田所能生產的少。耕耘與其說是增益自然的產出力，無寧說是支配自然的產出力。人工以外，尚有大部分工作，非賴自然力不可。所以，農業上僱用的工人與牲畜，不僅象製造業工人一樣，再生產他們消費掉的價值（或者說，再生產僱用他們的資本）及資本家的利潤，而且生產更大的價值。他們除了再生產農業家的資本及利潤外，通常還要再生產地主的地租。這種地租，可只說是地主借給農業家使用的自然力的產物。地租的大小取決於想象上的自然力的大小，換言之，取決於想象上的土地的自然產出力或土地的改進產出力的大小。減除了一切人的勞作之後，所餘的便是自然的勞

作。它在全生產物中，很少佔四分之一以下，很常佔三分之一以上。用在製造業上的任何同量的生產性勞動，都不能引出這樣大的再生產。在製造業上，自然沒做什麼，人做了一切；再生產的大小，總是和導致再生產的生產因素的力量的大小成比例。所以，和投在製造業上的等量資本比較，投在農業上的資本，不僅推動較大的生產性勞動量，而且，按照它所僱用的生產性勞動的量來說，它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增加的價值，對國內居民的真實財富與收入所增加的價值，都大得多。在各種資本用途中，農業投資最有利於社會。

投在農業上和零售業上的資本，總是留在本社會內。它們的使用，有一定地點，在農業，是農場；在零售業，是商店。而且，它們的所有者，大都是本社會內的居民。當然，有時也有例外。

批發商人的資本，卻似乎不固定或停留在什麼地方，而且也沒有必要固定或停留在什麼地方。因為要賤買貴賣，他們的資本往往周遊各地。

製造者的資本，當然要停留在製造的場所。但在什麼地方製造，卻似乎沒有確定的必要。有時，製造的場所，不僅離材料出產地點很遠，且離製成品銷售地點也很遠。里昂製造業的材料，從很遠的地方運來，那裏的出品，也要運到遠處纔有人消費。西西里時髦人的衣料是別國製造的絲綢；絲綢的材料，卻又是西西里的產物。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國製造，但英國織成的毛織物，卻有一部分後來又送還西班牙。

投資於國內剩餘生產物輸出事業的人，無論是我們本國人或是外國人，無關重要。如果是外國人，我國受僱的生產性勞動者人數，當然比較少，但至只一個；我國的年產物價值，也當然比較少，但也只少這一個人的利潤。至於所僱用的水手腳伕是不是本國人，那與他是否本國人無關，他是本國人，也可以僱用外國的水手腳伕。輸出人雖有國籍上的差別，但以資本輸出國內剩餘生產物來交換國內需要的物品，那就無論是外國人或是本國人的資本，對這剩餘生產物所給予的價值，總是一樣的。批發商人是本國人也好，不是本國人也好，他的資本，同樣有效地使生產這剩餘生產物的人的資本得以償還，同樣有效地使生產這剩餘生產物的人的營業得以繼續經營下去。這就是批發

商人資本對維持本國生產性勞動和對增加本國年產物價值所提供的主要助力。

比較重要的是，製造者的資本應留在國內。因為有這種資本留在國內，本國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必較大，本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能增加的價值也必較大。但不在本國境內的製造者資本也對本國很有效用。譬如，英國亞麻製造者年年投資從波羅的海沿岸各地輸入亞麻來加工。此等資本，雖非產麻國所有，但對產麻國有利，則很明瞭。這種亞麻，只是產麻國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設不年年輸出，以交換本地所需各物，即無價值可言，其生產將立即停止。輸出亞麻的商人可償還亞麻生產人的資本，從而鼓勵他們繼續生產；英國製造者，又可償還這種商人的資本，使他們繼續運輸。

象個人一樣，一個國家往往沒有足夠資本，既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種起來，又把全部原生產物加工起來，使適於直接的消費及使用，又把剩餘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運往遠方的市場換取國內需要的物品。不列顛許多地方的居民，沒有足夠資本來改良和耕種他們所有的全部土地。蘇格蘭南部的羊毛，就大部分因為當地缺乏資本，不得不經過極不平坦的道路，用車運到約克郡去加工。英國有許多小工業城市，其人民沒有足夠資本把產品運到需要它們的遠方市場去銷售。他們中，縱使有個把商人，亦只好說是大富商的經理人。這種大富商，往往住在比較大的商業城市裏。

一國資本，要是不夠同時兼營這三種事業，那末，我們就可以說，投在農業上的部分愈大，所推動的國內的生產性勞動量也愈大，同時，對社會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增加的價值也愈大。除了農業，當推製造業。投在出口貿易上的資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所有資本還不足兼營這三事業的國家，就其富裕的程度說，實未達到自然所允許達到的最高點。無論就個人說，就社會說，企圖以不充足的資本，在時機未成熟時兼營這三事，都不是取得充足資本的最捷途徑。正象一個人的資本有一定的限度一樣，國內全體人民的資本亦有一定的限度，只夠用於某幾方面。要增加個人資本，須從收入內節省而不斷蓄積；要增加國民資本，亦須從收入內節省而不斷蓄積。因此，資本的用途，若能給國內全體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從而使全體居民都能作最大的積蓄，則國民資本大概就會極迅速地增加起來。

但國內全體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以國民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大小為轉移。

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沒在農業上。那裏也就主要爲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於富強。那裏，除了家庭製造業和粗糙製造業（這種製造業，一定會隨着農業的進步而產生，每個家庭的婦女兒童，都能經營這種工作），就沒有製造業。至於輸出業和航運業，則大部分由住在英國的商人投資經營。甚至有些省分，特別是維瓦尼亞和瑪利蘭，經營零售生意的店鋪和棧房辦爲居住在母國的商人所有。零售業不由本地商人資本經營的事例不多，這就是其中之一。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製造品輸入，使能夠製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佔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製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於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同樣，如果他們要設法壟斷全部輸出業，結果也許更會如此。

人類繁榮的過程，似乎從來未曾延續這樣的久，使得任何一個大的國家，可以而獲得了足夠的資本來兼營這三種事業，除非我們認爲關於中國、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農業情況的那些奇異記載，是可以置信的。然而，就連一切記載所推爲世界上最富的這三個國家，也只主要擅長農工業。他們的國外貿易，並不繁盛。古埃及人對於海洋，有一種迷信的畏懼心；印度人亦常有這種迷信；至於中國的對外通商，向來就不發達。這三個國家的剩餘生產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運到外國去，換回它們所需要的其他東西，那常常是金銀。

這樣，同一資本在國內所推動的勞動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價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農業上、工業上、批發商業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是批發商業，投資結果，亦將因所營批發商業的種類不同而極不相同。

一切批發貿易，或一切大批買進來以便大批再賣出去的貿易，可分作三類，即國內貿易，消費品的國外貿易和運送貿易。國內貿易是從國內這個地方買國產貨物進來，再在國內另一個地方把它賣出去，那包括內陸貿易和沿海貿易。消費品的國外貿易是購買外國貨物，供

本國消費。販運貿易，是從事各外國間的貿易，即以甲國的剩餘產物運往乙國。

投資在國內貿易上，購買國內甲地產物運往乙地售賣，往返一次，一般可以償還兩個都是投在本國農業或工業上的資本，使本國的農業製造業不致中斷。運用資本，從商人店裏，把一定價值的商品運出去，結果，大都至少可只換還一個等價值的別種商品。所以，假若交換的兩方，全是本國產業的產物，結果當然可以償還本國兩個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使能繼續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比如，把蘇格蘭製造品運到倫敦，再把英格蘭穀物或製造品運到愛丁堡來的資本，往返一次，無疑可以換還兩個投在英國製造業或農業上的資本。

國內消費的外國貨物如果是用本國產業的產物來購買，那末，每往返一次，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也能換還兩個不同的資本，不過其中只有一個是用來維持本國產業的。例如，把英國貨物運至葡萄牙，再把葡萄牙貨物運至英國的資本，往返一次，只補還一個英國資本。另一個卻是葡萄牙的。所以，即使此種貿易能象國內貿易同樣快地賺回本利，投在此種貿易上的資本，比較起來，亦只能鼓勵半數的本國產業，鼓勵半數的本國生產性勞動。

但是，此種貿易很少能象國內貿易那麼快地賺回本利。國內貿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賺回一次，甚至三四次。此種貿易的本利，每年賺回一次，已屬難能，二三年賺回一次，亦非僅見。往往，投在國內貿易上的資本，已經運用了十二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十二次，而投在此種貿易上的資本，僅運用一次。所以，兩個資本要是相同，投在國內貿易上的資本，與投在對外貿易上的資本比較，前者對於本國產業，往往可提供二十四倍的鼓勵與扶持。

國內消費的外國貨物，有時是不用本國產物換購，而用第二外國貨品換購。但這第二外國貨品，非直接由本國產品換購，必間接由本國產品換購，即以本國產物，購買第三外國貨品，再用以購買第二外國貨品，因為除了戰爭和征服的場合，外國貨品，只有用本國產品直接換購而得，或用本國產品經過兩三次不同交易間接換購而得，此外別無他法可以獲得。所以，使用於這樣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的資本，和使用於最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的資本比較，除了它最後的收回，由於必須依靠兩三次不同對外貿易的資本的收回，所需時間較長

這一點外，無論就那一點說，都有相同的效果。設使商人以英國製造品換購維及尼亞的菸草，再用維及尼亞的菸草換購里加的麻桌，那末，非經過兩次對外貿易，資本不能返到商人手上，再用來購買同量的英國製造品。再假設用以購買維及尼亞菸草的，不是英國製造品，卻是牙買加的砂糖，牙買加的砂糖，才由英國製造品購換，那就得等候三次對外貿易資本的收回，該商人才能再使用同一資本購買同量的英國製造品。又假設經營這二次或三次對外貿易的，是兩三個不同的商人。第一個商人輸入的貨品，歸第二個買去輸出，第二個輸入的貨品，又歸第三個買去輸出，那就各個商人說，各自資本的收回，確是比較迅速；但投在貿易上全部資本的最後收回，卻是一樣遲緩。投在這種迂迴貿易上的資本，究為一人所有，或為三人所有，對個別商人，雖有關係，但對國家，卻毫無關係。無論為一人所有，或為三人所有，間接用一定價值的英國製造品來交換一定量麻桌，與英同製造品和麻桌直接互相交換的場合比較，所需資本總必大三倍。所以，和比較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較，投在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雖數量相等，但它對於本國生產性勞動所提供的鼓勵與扶持卻往往要少些。

用以購買國內消費的外國貨品的，無論是什麼外國商品，都不能改變貿易的性質，不能增減它對本國生產性勞動所能提供的鼓勵與扶持。如果用的是巴西的金，祕魯的銀，這金銀的購買，就象維及尼亞菸草的購買一樣，當然少不了要用某種本國產業的產物，或由本國產物換購的某種物品。所以，就本國的生產性勞動說，無論在利的方面，在害的方面，在償還直接用來維持該生產性勞動的資本的遲速方面，以金銀為手段的消費品的國外貿易，都和任何其他同樣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一樣，毫無區別。比較起來，以金銀為手段的消費品的國外貿易，似乎還有一個好處。金銀為物，可在小容積中包含大價值，故與等價值的其他貨品比較，運輸費是比較的小，保險費卻未必較大。此外，金銀在運輸過程中，比較不容易遭受破損。所以，用金銀作媒介，比較用別種外國貨物作媒介，我們往往可用較小量本國貨物購得等量的外國貨品。所以，比較起來，用別種外國貨物作媒介，不如用金銀作媒介，因為國內的需求可以而得到更充分的供給，而所費又比較的少。至於不斷輸出金銀以購買本國需要的外國貨物，能否陷國家於貧困，這問題我們以後要從長討論。

投在運送貿易上的資本，全是從本國抽調出來，不用來維持本國的生產性勞動，卻轉用來維持外國的生產性勞動，這種貿易經營一次，雖可償還兩個資本，但全非本國所有。從波蘭運穀物到葡萄牙、再運葡萄牙水果、葡萄酒到波蘭的荷蘭商人的策本，確乎償還了兩個資本，但全非用來維持荷蘭的生產性勞動。其中，一個是用來維持波蘭的生產性勞動，一個是用來維持葡萄牙的生產性勞動，歸到荷蘭去的，只是荷蘭商人的利潤。有了這種貿易，荷蘭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並不是沒有增加，但所增加的只限於此。固然，如果運送貿易所用的船舶與水手是本國的船舶與水手，那末，為支付運費而使用的那一部分資本，是用來推動本國的生產性勞動，用來僱用本國的生產性勞動者的。事實上，運送貿易旺盛的國家，幾乎都是這樣進行的。運送貿易的名詞，也許就是由此而來，因為這種國家的人民，對外國人來說常常是運送者。但運輸所需要的船舶與水手，不一定為本國所有。比方說，經營波蘭葡萄牙間運送貿易的荷蘭商人，不一定要用荷蘭船舶，用英國船舶也未始不可。我們可以說，在某些時候，他的確是這樣做。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人們認為，運送貿易特別有利於象英國這種國家，它的國防與安全取決於船舶與水手的數目。但是，在消費品的國外貿易方面，甚至在國內貿易方面，同量的資本，可照樣僱用那麼多的船舶與水手，如果所必需的運輸，是用近海航船來進行的話。一定數量的資本，究竟能僱用多少船舶與水手，不取決於貿易的性質，而是一部分取決於貨物容積與貨物價值的比例，一部分取決於運輸海港間的距離。在這二個條件中，前者尤為重要。紐卡斯爾與倫敦間的煤炭貿易，雖兩海港相距甚近，但所僱用的船舶與水手，比英格蘭全部運送貿易更多。所以，以異常的獎勵，強迫一國資本，使不按照自然趨勢，而以過大部分投在運送貿易上，是否能夠增進一國的航業，大是疑問。

這樣，與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等量資本比較，投在國內貿易上的資本，所維持所鼓勵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一般較大，所增加的本國年生產物價值，一般也較大。但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與投在運送貿易上的等量資本比較，在這兩方面，卻提供更大的利益。在有富即有勢的今日，一國的富強，一定和其年產物價值，即和其一切賦稅最終所以出的基金相稱。政治經濟學的大目標，既是增進本國的富強，所以，為本國計，與其獎勵消費品國外貿易，無寧獎勵

國內貿易，與共獎勵運送貿易，無寧獎勵消費品國外貿易或國內貿易。爲本國計，不應強制亦不應誘使大部分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到消費品國外貿易或運送貿易方面去。

但是，如果這三種貿易，是順應事物的趨勢，自然發展起來，沒有受到拘束，沒有遭遇壓力，那末，無論其中那一種，就都不僅有利而且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

在特定工業部門的產品超過本國需要的場合，其剩餘部分，就必然被送往國外以交換國內需要的物品。沒有這種輸出，國內生產性勞動一定有一部分會停頓，因而會減少國內年產物的價值。英國出產的穀物、呢絨、金屬製品，常超過國內市場的需要。因此，剩餘部分，必須送往國外，以交換英國需要的物品。沒有這種輸出，這個剩餘部分，將不能獲得充足的價格，來補償生產它時所費的勞動與費用。沿海沿江一帶，所以宜於舉辦產業，就是國爲剩餘產物易於輸出，易於換得本地需要的物品。

用本國剩餘產物購得的外國貨品，若多過國內市場所需要的，則其剩餘部分必須運往國外，以交換國內需要的別種貨品。英國輸出本國剩餘產物的一部分，每年在維及尼亞、瑪利蘭二地購買菸草約九萬六千桶。但英國每年所需，也許不過一萬四千桶。所以，其餘八萬二千桶，若不能送往國外，以交換國內需要品，這八萬二千桶的輸入，就會立刻停頓。每年爲購買這八萬二千桶而製造的貨品，原來不爲本國所需，現今輸出的路又塞了，當然會停止生產，而爲製造這種貨品而被僱的那一部分英國人，亦將無工可作。所以，最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時和最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一樣，也是扶持本國生產勞動、維持本國年產物價值所必要的手段。

如果一國累積的資本，不能全數用來供給本國消費，全數用來維持本國的生產性勞動，則其剩餘部分自然會流入運送貿易渠道，供給他國消費，維持他國的生產性勞動。運送貿易，是國民大財富的自然結果與徵象，但不是國民大財富的自然原因。贊成這種貿易而特別給予獎勵的政治家，似把結果與徵象誤認爲原因。就土地面積和居民數目來衡量，荷蘭是歐洲最富之國，所以，荷蘭佔有了歐洲運送貿易的最大部分。英格蘭是僅次於荷蘭的歐洲最富國家，亦有不少運送貿易。不過，在多數場合，英格蘭的運送貿易，不如你爲間接的消費品

國外貿易。我們運東方的、西印度的、亞美利加的貨物到歐洲各市場去的貿易，大半就是這種性質。購買這種貨物的手段，一般即使不是英國的產物，亦是用英國產物購來的物品，而且，這些貿易最後帶回的物品，又大都在英國消費，或在英國使用。只有由英國輪船裝運的地中海各港間的貿易以及由英國商人經營的和印度沿海各港間的貿易，纔是英國的真正運送貿易。

國內各地因有相互交換剩餘生產物的必要，故有國內貿易；所以，國內貿易的範圍，只及投在國內貿易上的資本量，必受國內各地剩餘生產物價值的限制。消費品的國外貿易範圍，必受本國全部剩餘生產物價值以及能由此購得的物品的價值的限制。運送貿易所交換的，是全世界各國的剩餘生產物。所以，其範圍必受全世界各國剩餘生產物的價值的限制。與以上兩種貿易比較，它可能有的範圍，簡直沒有止境，它所能吸引的資本亦最大。

私人利潤的打算，是決定資本用途的唯一動機。投在農業上呢，投在工業上呢，投在批發商業上呢，或投在零售商業上呢？那要看什麼用途的利潤最大。至於什麼用途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最大，什麼用途所能增加的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最多，他從來不會想到。所以，在農業最有利潤，耕作最易致富的國家，個人的資本，自然會投在對社會最有利的用途上。可是在歐洲，投資於農業所獲利潤並不見得比別種事業更為優越。的確，這幾年來，歐洲各地有許多計劃家盛稱農耕的利潤，但不必仔細討論他們的估算，只須略一觀察，就知道他們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常常看見一種白手成家的人，他們從小小的資本，甚至沒有資本，只要經營數十年製造業或商業，便成為一個富翁。然而一世紀來，用少量資本經營農業而發財的事例，在歐洲簡直沒有一個。歐洲各大國，仍有許多無人耕作的優良土地；已有人耕作的土地，亦尚未充分改良。所以，現今隨便什麼地方的農業，都還可以容納許多資本。歐洲各國什麼政策，使得在都市經營產業的利益的，遠過於在農村經營產業，從而，往往使私人寧願投資於遠方（如亞洲美洲）的運送貿易，而不願投資來耕墾靠近自己的最豐沃土地，關於這一點，我在下一篇再詳細討論吧。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

第一章論財富的自然的發展

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與農村居民通商。這種商業，有的是以原生產物與製造品直接交換，有的是以貨幣或紙幣作媒介交換。農村以生活資料及製造材料供給都市，都市則以一部分製造品供給農村居民。不再生產亦不能再生產生活資料的都市，其全部財富和全部生活資料都可說是得自農村。但我們不要根據這點，就說都市的利得即是農村的損失。他們有相互的利害關係。這裏，分工的結果，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對雙方從事各種職業的居民都有利益。農村居民，與其親自勞動來製造他們需要的製造品，無寧作這種交換，因為由這種交換，他們可用較小量的自身勞動生產物購得較大量的製造品。都市是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農民用不了的東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換他們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愈廣闊。這種市場愈廣闊，對廣大人民愈有利。在離都市一哩生產的穀物，與在離都市二十哩生產的穀物，在市上的售價都一樣。但後者所得的售價，一般地說，不但要補償其生產費用和上市費用，而且要對農業家提供農業的普通利潤。所以，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穀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的穀物的運費全部價值。此外，在他們購買的東西的買價上，他們還節省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試一比較都市附近各農村和遠離都市各農村的耕作事業，你就知道都市商業是怎樣有利於農村。就連所有宣傳貿易差額的各種謬說，也沒有一種敢妄說城鄉通商對城市或對鄉村有損的。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資料必先於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產前者的產業，亦必先於生產後者的產業。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村的耕種和改良，必先於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只剩餘產物維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餘，才談得上增設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資料，不一定要仰給於附近的農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給於國內的農村，而可以從遠方運來，所以，這雖然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卻使各時代各國家進步繁榮的過程，因而有所差異。

農村先於都市的事態，在大多數國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國家，又有人類天性促其實現。只要人爲制度不壓抑人類天性，則在境內土地尚未完全開墾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設，決不能超過農村的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多數人必寧願投資以改良土地開墾土地，不願投資於工業及國外貿易。投在土地上的資本，可受到投資人自身更直接的監察；與商人資本比較，他的財產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財產，不但常須冒狂風巨浪的危險，而且由於商人常須對風俗情況都不易熟習的遠郊的人貸給信用，還要冒人類的愚蠢與不正行爲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險。反之，地主的資本，卻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說是盡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鄉村風景的美麗，鄉村生活的愉快，鄉村心理的恬靜，以及鄉村所提供的獨立性，只要這獨立性不受到人爲的迫害的話，這些實具有吸引每一個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爲人的原始目標，所以，在有人類存在的一切階段，這個原始的職業將爲人類所永遠愛悅。

沒有工匠的幫助，農耕必大感不便，且會時作時輟。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犁匠、泥水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爲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爲不必要象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或小村落。後來，又有屠戶、酒家、麪包師，只及許多就供給臨時需要那一點說對他們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於是市鎮日益擴大起來。鄉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務的。市鎮是鄉民不斷前往把原生產物交換製造品的市集或市場。就是依着這種交換，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的供給。他們售給鄉村居民的製成品的數量，支配他們所購的材料及食料的數量。所以，他們的材料及食料的增加，只能按照鄉民對製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這種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發展。所以，設使人爲制度不擾亂事物的自然傾向，那就無論在什麼政治社會裏，都市財富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是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結果，而且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增長擴大。

在未曾墾殖、土地極易購得的我們北美殖民地，爲銷售於遠方而興辦的製造業，在任何市鎮都還不曾有過。在北美洲，當工匠獲得的

資本，超過他所經營的、以供給鄰近鄉村為職志的事業所需要的數額時，他不會想辦一家工廠來作銷售遠方的生意。他一般寧願用多餘的資財，來購買或改良未開墾的土地，由技工一變而為農業家。當地付給技工的高昂工資，對於技工所提供的舒暢生活，都不足以誘使他為他人工作，他總情願為自己工作。他覺得，技工是顧客的僕役，仰給生活於顧客；至於耕作自己的土地，從自己家庭的勞力取得衣食之資的農業家，則是真正的主人翁，獨立於世界。

反之，在土地全已開墾或不易購得的國家，技工所獲資本，如果已經不能全數投在鄰近地區隨時需要的事業上，其有餘部分，就會用來擴張營業，準備銷售遠方。鍛工將建立鐵廠，織工將建立麻織廠毛織廠。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各種製造業，將慢慢地進行精密的分工，用各種方法加以改進。這是大家容易想得到的，用不着細選。

在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的條件下，人們選擇投資途徑時，在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業兩者中，自寧願選擇製造業，其原因正如在農業與製造業中，寧願選擇農業一樣。與製造商的資本比較，地主或農業家的資本更為穩當。同樣地，與國外貿易的資本比較，製造商的資本更為穩當，因為隨時都在自己監察之下。誠然，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社會，剩餘原生產物及製造品，或者說，國內無人需要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都必須送往外國，以交換國內需要的其他物品。但輸運剩餘產物到外國去的資本，為本國所有，成為外國所有，卻是無關重要的。如果本國的資本，不夠我們同時耕作一切土地，並完完全全地製造一切原生產物，那末，由外國資本來輸運本國剩餘原生產物到外國去，亦對本國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賴有這種資本，本國的資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國、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證明了一種事實，即是，縱使本國輸出業，有大部分為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設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資本，即波有外國資本替它們輸出剩餘產物，它們的進步，會慢得多吧。

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程度上按照這種

順序投用。總得先開墾了一些土地然後才能成立很多城市；總得在城市裏先有了些粗糙的製造業，然後纔會有人願意投身於國外貿易。

這個自然的順序，雖然在所有進步的社會裏都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但就今日歐洲各國的情狀說，這個順序卻就許多方面說，似乎完全相反。它們的精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多由國外貿易引出。農業大改良，也是製造業和國外貿易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反自然的退化的順序，乃是風俗習慣迫成的。他們原來的統治的性質使他們的風俗習慣變成了這個模樣。後來，這種統治大大改變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卻仍沒有多大改變。

第二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侵擾羅馬帝國西部以來，歐洲起了一個大變革，跟着這個大變革發生的是，歐洲擾攘了好幾百年。野蠻民族對原居民的掠奪和迫害，中斷了城鄉間的貿易。城市都成了荒墟，鄉村亦無人耕作。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很富裕的西歐，一變而為極貧乏，極野蠻。在接連不斷的擾攘中，那些民族的頭子，佔有或篡奪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有人耕作的土地雖然不多，但要找一塊沒有所有主的土地，卻不可能。一切土地都被吞併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數大地主所吞併。

最初吞併荒地的危害雖很大，但有可能只不過是暫時的危害。這些土地本可通過繼承或分割，把它們拆小。但長男承繼法，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繼而拆小；限嗣繼承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割而拆小。

如果我們把土地看作只是謀生求樂的手段，和動產一樣，那末，按照自然承繼法，當然會把土地象動產一樣，分給家內所有的兒女。因為每一個兒女的生計，都為老父所同樣關心。羅馬人就是採行這種自然承繼法。他們不分別長幼，不分別男女，只要是自己養的，就可以承繼自己的土地。他們處分土地的方法，和我們現在處分動產的方法一樣。不過，當土地被看作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權力強弱所繫的時候，就被認為以不分割而專歸於一人比較適當。在那些不安靖的時候，大地主同時都是小貴族。他的佃戶，便是他的隸屬。他是他們的裁判官，是他們和平時節的立法者，亦是他們戰爭時節的領導人。他可任意進行戰爭，對鄰國作戰，有時對國王作戰。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地產是否安全，其中居民有無保障，都取決於它的大小。把一個

地產分拆，無異把它破壞，換言之，無異把它拆開來，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強鄰的侵蝕吞併。所以，適應着當時這種情況，在地產承繼方面，長男承繼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來。爲了同一理由，君主國通常亦由長男一人承繼。雖然最初並不總是如此。爲君主國的安全與權力計，國土寧可不加分裂、寧可在諸兒女中，選擇一個人來單獨承繼。但選擇誰呢，那樣重要的一件事，當然要鄭重規定一個普通規例，使選擇不按個人資質好壞這個不大可靠的區別，而按某種明白的、無可爭論的標準。在同一家庭的各兒女中，除了性別與年齡，再沒有其他無可爭論的區別了。根據一般經驗，男性比女性好，而在其他一切條件相等的場合，年長的比年幼的好。長男承繼權，就這樣成立了。而所謂直系繼承，亦就從此發生了。

一種法律在初成立時，都有環境上的需要，並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這種環境。但事實上，往往產生這法律的環境已發生變化，而這法律卻仍繼續有效。今日歐洲，僅領有一畝地的小地主，其安全已無異於擁有千萬畝地的大地主。產生長男承繼權的環境大變了，長男承繼僅卻依然存在。由於在各種制度中，這法律是最宜於保持貴族尊嚴的，所以，今後會再行幾百年也說不定。但事實上，除了這一點，長男承繼權也就沒有一點不違反大家庭的真實利益了。這權利，因爲要使一個兒子富裕，就使其他兒子陷於窮困。

限嗣繼承法是長男繼承法施行的自然結果。它的採行，旨在維護由長男繼承法導引出來的直系繼承，以及防止由於子孫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遺產在贈與、遺讓或割讓名義下旁落的危險。這種法律，羅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國有幾個法律家，雖然喜歡以今制附會羅馬古制，實則，羅馬人所謂預備繼承人預定法和囑託遺贈法，都與限嗣繼承法迥不相同。

在大土地財產仍爲諸侯領地時，限嗣繼承或許不是不合理的辦法。象一些所謂君主國的根本法律一樣，這個法律，可以使許許多多人不致因一人輕舉妄動而受災殃。但今日歐洲各國，大地產和小地產已同樣受國法保護，所以，這種法律就變得再荒唐不過了。這種法律的制定，根據一種根本錯誤的假定：即對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類的各代後裔，沒有同等的權利，當代人的所有權，要受限制於五百年前祖宗的心意。在今日的歐洲，實行限嗣繼承法的地方還很

不少。在貴族血統仍是享受民事或軍事榮譽的必要資格的地方，限嗣繼承法尤牢不可破。限嗣繼承法被貴族認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權所必要的手段。這一階級既奪得了一種超乎其同胞之上的不正當的利益，卻又擔心自己的貧乏會貽人譏笑，以為應當再享有另一種不正當的利益。據說，英國習慣法很厭惡世業世祿的制度，因而，和歐洲其他各君主國比較，世業世祿的制度在那裏比較受限制。雖然在英格蘭，世業世祿的制度也還未完全廢除。據說，現在蘇格蘭，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仍受着嚴格的限嗣繼承法的支配。

在這情況下，大面積的荒地不僅為少數豪族所兼併，而且永無再分散的可能。事實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產生這種制度的混亂時節，大地主的精力，幾乎全部用來保護已有的領土，擴大自身對鄰國的管轄權、支配權。他們實在沒有餘暇來開墾土地改良土地。後來和平了，法制的確立，秩序的安定，雖然使他們有餘暇，但他們一般沒有心思耕墾土地，並且常常沒有必要的才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費用，超過了或恰好相等於他的收入（這是極常有的現象），他就沒有資本，可以投在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個經濟家，那末，他又通常感覺，與其用一年的節省未改良舊的地產，不如用來購買新的地產比較合算。改良土地，象各種商業計劃一樣，要獲利潤，不斤斤注意小節省小贏利是絕對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即使天生是好儉樸的，亦不大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悅己的裝飾，而不注意自己沒有多大需要的利潤。他自幼就養成了飾衣裳、盛車馬、崇居室、麗陳設的嗜好。他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即在想改良土地時，這種習慣所涵養的心理仍會支配着他。他也許會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畝土地大大裝飾起來，花費比該地改良後所值大十倍的費用，終而發覺如果對他所有全部地產都照樣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無其他嗜好，恐怕也會在沒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盡他所有的財產。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自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以來，有些大地產，繼續在少數人手裏，至今沒有改動。把這些大地產與鄰近的小地產比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論證而相信大地產是怎樣不利於改良。

如果從這樣的大地主還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對土地的改良，那末從那些佔有的土地比他們少的人那裏，就更無這種希望了。在歐洲舊狀

態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農。他們全是或幾乎全是奴隸，不過他們的隸役，比古希臘羅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隸役和緩一些。他們與其說隸屬於主人，無寧說是隸屬於土地。因此，他們可以和土地一同出賣，但不能單獨出賣。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們還可以結婚。而且，主人沒有權利把他們夫婦，賣給不同的人，從而拆散他們的姻緣。主人殘害或殺害了奴隸，還要受處分，不過一般是小懲罰罷了。但是，奴隸不得蓄積財產。他們所獲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隨時取去。所以，奴隸所能進行的墾殖和改良，實際上都是由主人進行，由主人負擔費用的。種子、牲畜、農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效益，亦是主人的。這種奴隸，除了日常維持生活的東西，什麼也不能獲得。所以，在這場合，正當地說，土地仍是由地主佔有、由農奴耕作的。這種奴隸制度，在俄羅斯，在波蘭，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亞，在摩拉維亞，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現在還存在。這種制度逐漸全然廢除了的地方，不過歐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進行大改良，已是很難，那末，當他們使用奴隸耕作的時候，要他們進行大改良就更是無望了。我相信，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經驗，都證明了一件事，即：奴隸勞動雖表面上看來只需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但徹底通盤計算起來，其代價是任何勞動中最高的。一個不能獲得一點財產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麼也不關心。他的工作，夠他維持生活就行了，你要從他身上多榨出一些來，那只有出於強迫，他自己決不會願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麥拉的著作都說，古意大利的穀物耕種事業，在奴隸制度下非常衰微，對主人非常不利。耕種事業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古希臘並沒有多大進步。所以，當論及柏拉圖理想國時他說：要有一片象巴比倫平原那樣極大極豐沃的土地，纔可以養活五千懶惰人（當時認為衛護那理想國所必要的戰士）及其妻僕。

人類好勝的心理，多以統治下等人為榮，而以俯就下等人為恥。所以，如果法律允許，工作的性質也允許，那在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他一定願意選用奴隸。蔗糖與菸草的栽種，能夠提供使用奴隸耕作的費用；穀物的耕種，現在似乎還不能夠辦到這一點。主要產物為穀物的英國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來操作。本雪文尼亞人最近議決釋放黑奴。那種事實，使我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

奴隸是他們財產的大部分，他們決不會贊成釋放。但以蔗糖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隸擔任；以菸草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隸擔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種甘蔗的利潤特別大，在歐美兩洲，簡直沒有什麼耕種事業比得上。栽種菸草的利潤，雖比不上栽種甘蔗，但與栽種穀物比較，卻仍然較大。這兩種耕種事業都能提供奴隸耕作的費用，但栽種甘蔗，比栽種菸草更能提供這種費用。所以，與白種人數相比，黑奴的數目，在甘蔗區域，比在菸草區域大得多。

繼古代奴隸耕作者之後，逐漸出現了法蘭西今日稱作對分佃農的一種農民。這種農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隸農），在英格蘭，這制度早已廢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現在不知道他們叫作什麼。在這制度下，種子、牲畜、農具，總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資本，都由地主供給。農民離去或被逐去時，這種資本就須歸還地主。出產物在留出被認為保持原資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後，其餘就由地主與農人均分。

在對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費用，嚴格地說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隸耕作制下沒有差別。但其中，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對分佃耕制下的傭農，是自由人，他們能夠佔得財產，可以享有土地生產物的一定比例。生產總額愈大，他所佔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們的利益，顯然在於能夠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反之，一個沒有佔得財產希望只能維持自己生活的奴隸，就會圖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產物多於自身所需。也許就是部分因為對分佃耕制對地主有利，部分因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勵農效反抗他們的權力，終而使大家都覺得奴隸耕作制不利，於是大部分歐洲的奴隸耕作制度逐漸消滅。這樣一次大的變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怎樣發生的，在近代歷史中，是最難稽考的事件之一。羅馬教會，常自誇其廢除奴隸的功績。當然，我們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紀亞歷山大三世時代，羅馬教皇就發出了普通釋放奴隸的訓諭。但這訓諭，似乎不過是個諄諄的勸諭，不遵守訓諭的人，並不受處罰。奴隸制度依然保持了數百年。最後，因為上述那兩種利害關係（他主的利害與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來，才逐漸把它廢除。一個已被釋放，又許繼續保用土地，

但自己沒有資本的賤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資本，纔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爲法蘭西今日所稱的對分佃農不可。

不過，在對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費分文，而享受土地生產物的一半，留歸對分佃農享有的自屬不多。在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節省的更是有限。對分佃農決不願用這有限的節餘來改良土地。教會什一稅，不過抽去生產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極大的障礙。抽去生產物的半數，一定會切實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給的資本，從土地儘量取得大量的生產物，固然是對分佃農所願望，但若以自有資本與地主資本混合，卻決非對分佃農所願的。在法蘭西，據說，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對分佃農耕作。地主常常指摘農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來拖車。因爲，拖車的利潤，全部歸於農民，耕田的利潤，卻須與地主平分。在蘇格蘭的某些地方也殘留着這種佃農，叫作由地主借給種子農具的佃戶。大貴族吉爾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說，英格蘭古代的佃農，與其稱爲農戶，無寧稱爲地主的屬役。這種佃農，大概與此屬於同一種類。

慢慢地繼對分佃農而起的農民，可以說是真正的農民。他們耕田的資本是自己的，但要對地主繳納一定數額的地租。這種農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們有時覺得，投下一部分資本改良土地，對自己有益。他們希望，在租期未滿以前，投下的資本可以收回，並提供很大的利潤。不過，就連這種農民的借地權，也有一個長時期是極不可靠的。今日歐洲有許多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土地換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滿，可把農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蘭，甚至得依虛構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違法的暴力手段驅逐農民，農民所能憑藉以取獲賠償的訴訟章程，是極不完善的。農民並不一定能恢復佔有原來的土地，他們通常只能獲得損失的賠償，而且所償決不能等於所損。在歐洲，英格蘭也許是頂尊重耕農的一個國家。但那裏，亦遲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訴訟法。規定改佃時，佃農得要求賠償損失，並得要求恢復借地權。此種要求，不必由一次審問而審結。這個訴訟法，施行極其有效，所以，近來，地主若要爲佔有土地而起訴，他常常不用地主名義，按權利令狀起訴，而常常用他的佃農名義，按退佃合狀起訴。以此之故，在英格蘭，佃戶的安全等於地主了。此外，英格蘭又規定，每年納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終身租地權就

是終身保有的不動產，有選舉國會議員的權利，耕農既大部分有這種終身不動產，所以政治上的勢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輕視他們。我相信，歐洲除了英格蘭，沒有一個地方的佃農，未立租地權約，便出資財建築倉廩，不怕為地主所奪的。這種十分有利於農民的法律風俗，所起的促進現代英格蘭偉大光榮的作用，也許比為商業而定立的所有各種誇大條例所起的作用還要大得多。

保障最長租期使不為各種承繼人所妨害的法律，據我所知，乃英國所特有。早在1449年，這種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傳到蘇格蘭去。但當時，限嗣繼承的財產的承繼人，往往不許從一年以上的期間出租田地，所以，這法律的澤潤未能儘量廣佈。最近，國會雖立法補救，但這些束縛仍太嚴厲。此外，在蘇格蘭，租地人又因沒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所以不象英格蘭加農那樣，受到地主那麼大的重視。

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雖亦保障佃農權利，使不受土地承繼人和購買人的損害，但這種權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蘭西初定租期為九年，近來才延長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勵佃農進行各種最重要的改良。我們知道，歐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為他們所設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們認為，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應以土地長期出租，使得他們長期間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價值。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淺。他們不會想到這種規定，一定會妨害改良，結果，一定會妨害他們自己的真實利益。

古代，農民對於地主，除了納租，還須提供各種勞役。那種勞役，既不明定於租約內，又不受任何規定支配，只要莊主諸侯需要，就得隨命隨到。這種全無規定的勞役，使佃農不知受了多少痛苦。蘇格蘭晚近把一切全無規定的勞役廢止，不到幾年，國內農民的境況就改善了許多。

農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復同樣橫暴。公路的建築修補（這種勞役，我相信，各處尚未廢除，但橫暴的程度不等），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在王軍或王官過境時，當地農民，又有提供車馬糧食的義務，那雖有代價，但代價定於食物徵發官。我相信，在歐洲各君主國中，只英國一國，完全消除了食物徵發的壓迫。在法國和德國，那都未曾消除。

農民所負擔的勞役義務，既如上述。農民所負擔的納稅義務，其不規則和橫暴的程度也和勞役義務不相上下。古代貴族，雖不願在金錢方面給君主以任何幫助，但毫不躊躇地聽任君主對佃農徵收貢稅。他們沒有看出，這種苛稅終必嚴重地影響他們自身的收入。法國今天仍有貢稅，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稅的一例。貢稅是加於假定的農民的利潤的一種稅，它是根據農民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估定的。所以，農民為自身利益計，儘可能裝窮，結果，他耕作所用的資本必減至儘可能少的程度。至於改良土地的資本，那就以減少到零為宜。即使法國農民手中積蓄了一點資本，亦將因有貢稅，不願投到土地上來。貢稅事實上幾乎等於禁止農民把積蓄投資於土地。此外，此種賦稅被認為會抑低任何要完納它的人的身分，使不僅不能與鄉紳平行，且不能與市民並列。而誰租借別人的土地，誰就要完納這種稅。紳士，甚至有產的市民，都不願受這種恥辱。所以，施行這種賦稅的結果，不僅使從土地方面蓄積起來的資本不用來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資本都不用來改良土地。英格蘭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稅和十五分之一稅，就它們對土地的影響說，似乎是和貢稅同一性質的稅。

在這一切害農政策之下，要耕者來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這一階級的人民，儘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卻處於大不利的地位。農民與地主比較，猶如借錢經商者與有資親自經商者相比。固然，無論是藉資經商，或是有資親自經商，只要他們的行為一樣慎重，他們的資財就都可以增進，但因借錢經商者的利潤有一大部分歸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錢經商者的資財的增進，定要遲緩得多。同樣，與地主比較，即使行為一樣慎重，佃農耕地的改良，亦要遲緩得多；因為，在農民的場合，生產物的大部分須歸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場合，這一部分卻仍可用來作進一步的改良。此外，農民的地位，當然比地主低。不僅如此，歐洲有大部分地方，把農民看作下等人民，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師。至於農民地位被看得低於大商人和大製造商，那是全歐洲各地普遍的情況了。世上有幾個大財主願捨棄高的地位而與下等階級的人民為伍呢，所以，即在現今，歐洲人的資本，仍很少會由他業轉到農業上來改良土地。也許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英國資本轉到農業方面來改良土地的，比較多些。但即在英國，在若干地方用於農業上的大資本，大都是在農業上獲得的（和一切其他職業比較，農業上資財的蓄積，最為遲緩）。不

過，我們應該知道，在所有國家裏，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農、大農。在歐洲君主國中，英格蘭也許格外有這種情形。據說，在荷蘭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爾尼共和政府中，農民的地位，亦不亞於英格蘭農民。

除上述外，歐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於土地的改良與墾作的地方，不論進行改良和墾作的人是地主還是農民。（一）到處都規定，未經特許，穀物輸出一律禁止；（二）限制穀物甚至各種農產物的內地貿易，實行禁壟斷禁零售禁屯積種種謬法，確立集市市場的特權。我說過，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為世界最大帝國的中心地，然其農耕的進展，亦不免因禁止穀物輸出和獎勵外谷輸入而受到許多阻礙。至於土地沒有那樣肥沃，位置沒有那樣有利的國家，其耕作事業會因限制穀物的內地貿易和禁止穀物輸出而受到何種程度的阻礙，就難於想象了。

第三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

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居民的境況，並不比農村居民好。不過，那時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臘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內的居民大不相同。在這等古代共和國內，地主佔居民中的多數，他們分佔公地，都覺得房屋毗連，環以圍牆，便於共同防禦。但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主大都散居於各自領地的城寨內，住在各自的佃農及屬民中間。市鎮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們的處境無異於隸役，或近似於隸役。古時各憲章所賦與歐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權利，充分證明了他們在未取得這些權利以前的生活情況。這些憲章，准許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領主許可；第二，在他死後，他的財物，可由兒孫承繼，不由領主領取；第三，自身遺產，可由遺囑處分。這種權利的頒給，充分證明了在未頒給前，他們是和農村耕作者幾乎一樣，或竟全然一樣，處於賤奴狀態。

這些人，無疑是很貧困很下賤的，他們肩挑着貨物，過市赴墟，從這裏跑到那裏，與今日拉車荷擔的小販相類似。那時歐洲各國，象現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一樣，經常在這些旅行者經過某些采邑，經過某些橋樑，赴市趁墟，設攤售貨的時候，把賦稅加在他們的人身與貨物上。在英格蘭，這些稅，叫做過界稅、過橋機、落地說、攤稅。有的時候，國王以及在某些場合擁有這項權力的大領主，特許某些商人，

特別是住在他們領地內的商人，免納各稅。因此，這些商人的地位，雖在其他各點與隸役無異或極相類似，但仍被稱為自由商人。不過，他們為報答保護者的保護，通常每年須納人頭稅若干。當時非付厚酬，保護不易獲得。所以，這類人頭稅可看作他們對保護者捨棄其他稅收所提供的補償。這種交換條件的實行，當初只限於個人，其期限或限於其人之身，或憑保護者的好惡。英國土地清丈冊關於幾個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記載，常常提及某某市民為這種保護各納人頭稅若干給國王或大領主。有時，它又只記錄這些人所納的稅的總和。

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制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徵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徵，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

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着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稅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着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着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佈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藉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欺凌，不稍寬恕。市民當然嫉恨領主，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亦畏懼領主，嫉恨領主。另一方面，國王雖亦鄙視市民，但他沒有嫉恨他們、畏懼他們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關係，使國王市民互結同盟，以抗領主。市民是國王敵人的敵人，所以，國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盡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變為穩固，不依靠這種敵人。給予市民權力，使能推舉市長，制訂市法規，建築城堡自衛，進行軍事訓練，國王就這樣盡他權力之所及，把一切獨立安全的手段給與市民，使他們不依靠領主。但要使他們的自由同盟能對他們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對國王提供相當大的援助，則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組織不可，非有強制居民服從的權威不可。至於把市稅永久包給他們，則是為了表

明心跡，使他願結為朋友、結為同盟的人，不疑懼他將來會再壓迫他們，會把稅額提高或把稅包給別人。

對領主感情最壞的國王，對於市民，敕賜往往最為寬大。例如英格蘭國王約翰，對市民最為寬容。法蘭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統率領主的權力。至其末年，據神父丹尼爾說，其子路易，即後來稱為肥路易的，與國內各主教，籌商最適當的方法，以取締領主暴行。主教們的意見，可歸納為兩種提議。一，在國王領土內，各大城市都設市長和市議會，以創設新的管轄體系。二，使城市居民，組織新的民軍，聽市長調遣，在必要時，出發援助國王。據法蘭西各考古學家說，法蘭西市長制度和市議會制度，就是這時創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蘇阿比亞王統治下，纔得到這種種特權；有名的漢薩同盟，也是在這時纔開始露頭角。

都市民軍的力量，此時既不下於鄉村民軍，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與當地領主爭議時，他們常佔優勢。意大利、瑞士等地，各個都市或由於離首府所在地很遠，或由於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於其他原故，君主對它們已全無權力，它們大都逐漸成為獨立的民主社會，並征服當地貴族，迫令其拆毀鄉間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資格居住在都市內。伯爾尼民主國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簡史，類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意大利屢起屢滅的無數大民主國的歷史亦復如此。

英法二國王權雖有時甚為式微，但從未全部消滅。都市因此沒有完全獨立的機會。但因市民勢力日張，除上游的市稅以外，國王一切賦稅，須得市民同意，才徵收得到。國王有急需，就通詔全國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國會。這些代表可與牧師和貴族一起議決，給與國王特別經濟援助。由於市民代表，大都袒護國王，國王有時利用他們從抵抗議會內大領主的權力。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歐洲各大君主國的國會的由來。

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就在這種狀態下，在各都市確立了。但此時，鄉村耕作者，依然受貴族的各種迫害。處於無力自衛狀態的人，自然滿足於僅夠過活的生活資料；因為，擁有更多財富，只會招惹壓迫者更苛虐的誅求。反之，當人們勤勞的結果確有親自享受的把握時，他們就自然會努力來改善他們自身的境遇，不僅要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娛樂品。所以，以生產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東西為目的的產業，在都市建立的時期，比在農村早得多。在賤奴狀態下受領主鉗制的貧窮農民，稍有儲蓄，必掩藏唯謹，免得領主看見，攬為己有，而且一有機會，即逃往都市。加之，當時法律對市民既如此寬縱，同時又如此熱望削減領主對農民的權力，所以，農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為領主所獲，即可永享自由。因此，鄉村勤勞居民，一有蓄積，自然會逃到都市來，把都市看作他們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產業手段，歸根到底，都出自農村。但近海岸沿河邊的城市居民，卻不一定只從鄰近農村得到這些物品。他們有大得多的範圍。他們或只自身工業的製造品作交換，或經營遙遠國家間的運送業，以甲國產物交換乙國產物，而從遠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物品。一個城市不但在其鄰近各農村都很貧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與通商的各個農村也都很貧乏很衰落的情況下，仍可發達起來，日臻於富強。因為單個地說，每個農村對它所能提供的食料與僱傭機會也許有限，但綜合起來說，它們所能提供的卻極可觀。不過，在商業範圍還極狹隘的那時，就有些國家很富裕、產業就很發達了。例如，未曾滅亡時的希臘帝國，亞巴西德統治下的撒拉遜人的帝國，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巴伯裏海岸某地，以及摩爾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在歐洲，最早由商業致大富的，似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當時居於世界的文明部分和進步部分的中心。十字軍雖然破壞了許多資財，傷害了許多居民，妨礙了歐洲大部分地方的進步，但卻非常有利於意大利若干城市的發展。為爭奪聖地從各地出發的大軍，對於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各市的航海業，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十字軍有時由這些地方的船隻運送，其糧食則常由它們供給。它們簡直可以說是大軍的輜重隊。使歐洲其他各國遭受極大破壞的十字軍，卻成為這些民主國富裕的泉源。

商業城市的居民往往以製造品和奢侈品運往富國，只滿足大富翁的虛榮心，大富翁亦極願以大量本國土產物來交換。因此，當時大部分歐洲商業，主要都是以本國土產物交換較文明國的製造品。英格蘭

的羊毛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及弗蘭德的精製呢絨交換；波蘭的穀物亦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白蘭地酒及法蘭西意大利的絲絨交換。

這樣，對精良製造品的嗜好，就通過國外貿易超漸普及到未有精製造業的國家。但此種嗜好，一經普及於國內，便引起很大的需要，商人為免去運輸費起見，自然會想到在本國建立同種製造業。這就是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各地為遠地銷售而建立的製造業的由來。

但我們必需注意，世界上從未存在過而且也決不能存在完全沒有製造業的大國，我說的大國沒有製造業，所指的只是精良進步的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各大國大部分居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傢俱，都是本國產業的產物。此種情形，在普通所謂無製造業的貧國，尤為常見，而在普通所謂製造業發達的富國，反而不常見。與貧國比較，富國下等階級人民日用的衣服傢俱，反有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國的產物。

各國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其發生的情況有兩種。

第一種是國內商人和企業家象上面所說，有時因要仿效外國某種製造業，而勇往直前地（如果可這樣說），把資本投下來經營的。象這樣發生的製造業乃是國外通商的結果。十三世紀盛行於路卡地方的綢製造業、絨製造業、緞製造業，即如此發生。此等製造業，後為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拉卡尼的暴令所驅逐。1310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卡；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議在那裏開辦綢業。當地官吏准許，並給以多種特權。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創設綢業。開始的時候，即僱有工人三百。伊麗莎白時代才傳入英格蘭而在古代即已盛行於弗蘭德之呢絨業，現在里昂及斯皮塔菲爾的綢業，似乎也是這樣發生的。這樣發生的製造業，因為是仿效外國，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國材料。當威尼斯初有製造業時，一切材料，都從西西里及利文運來。更久以前的路卡製造業，其所用的材料亦產在外國。桑樹的培植，蠶蟲的飼養，在十六世紀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還不大知道。種桑養蠶的技術，在查理九世時代，才傳入法國。弗蘭德製造業所用的羊毛，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英格蘭。西班牙羊毛，雖然不是英格蘭毛織物最初採用的材料，卻是適於遠地銷售的毛織業最初所採用的材料。現時里昂製造業所用的絲，亦大半是外國產；而且，在它初建時，就全部或幾乎全部是外國產。斯皮塔菲爾製造業所用的材料，

大概一向全部都不是英國產物。象這樣的製造業，大部分是因少數人的計謀而創辦的，所以設立的地址，有時是濱海的都市，有時是內陸的都市，視這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和主意而定。

有時，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逐漸改良而成的。我們說過，即最貧陋的國家，亦常有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由這種製造業逐漸改良而生的製造業，大都使用本國出產的材料；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離海岸很遠有時甚至離可通航運的水路亦很遠的內地加工的。土壤肥沃的內地，耕作容易，所產物品，除了維持耕者生活所需外，還有很多剩餘。這種剩餘，因陸運費太貴，航運不便，不易運往外地。因此，出產的豐饒，使糧食低廉，從而鼓勵工人住在那裏。他們覺得，在那裏勞動化在其他地方可獲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們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產的，他們把材料加工後，即以製成品，或者說，以製成品的價格，換得更多的材料和糧食。他們節省了由內地到沿河沿海各地或遙遠市場的運輸費，從而給剩餘部分原生產物，增加了一個新的價值。這樣，耕者可以比從前更為簡易的條件，從這班工人手裏取得對他們有用或者使他們滿意的物品。對於剩餘部分農產物，耕者可取得更高的價格；他們所需要的其他便利品，又可以較低價格買得。這鼓勵農民並使農民有能力進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餘的廣量。土地肥沃，使製造業誕生，而製造業的發展，又轉過來增進土地的出產力。製造業最初僅供應本地；後來，作品精緻改良了，便能供應遠地的市場。因為，原生產物甚至粗製造品很難擔負由陸運運往遠地的費用，而精製造品卻不會成到這種困難。精製造品，在小容積中，常包含大量原生產物的價格。例如，一匹精製呢絨，雖僅重八十磅，但所含價格，卻不僅是八十磅羊毛的價格，而且，有時，還包含着幾千磅穀物，即各種工人及其直接僱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這種穀物，如果以穀物的原形運往海外，定然是極困難的。但若以精製品的形態運往，則雖運往最遠的角落亦很容易。利斯、赫利法克、設菲爾德、伯明翰、沃弗漢普頓等地的製造業，就是按照這個方式，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的。這種製造業是農業的結果。其推廣與改進，在歐洲現代史上，一般遲於那些由對外貿易促成的製造業。在現在在上述各地很繁榮的那些製造業適於外銷以前一百多年，英格蘭就以其用西班牙羊毛為原料的精製呢絨業著名於世了。前一類製造業是隨着農業的發展而

推廣、改進的，而農業的推廣與改進，又是國外貿易和直接由此而產生的製造業的最後和最大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說明。

第四章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有所貢獻，其貢獻的途徑有三。

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易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的開發與進一步的改進。受到這利益的，不僅僅是都市所在的農村。凡與都市通商的農村，都多少受其實惠。它們為此等農村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提供了市場，結果就鼓勵了其產業和產業的改進。當然，靠近都市的農村，所得實惠，自必最大。其原生產物的運輸，所費既較省，所以，與較遠農村的產物比較，商人們即使付給生產者較高的買價，但對於消費者，取價卻仍可一樣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獲的財富，常用以購買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開墾的土地。商人們都渴望變成鄉紳。而且，在他們變成了鄉紳的時候，他們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與鄉紳不同。鄉紳是一向奢侈慣了的，他只會花錢，從來不會想到賺錢。商人卻常用錢來經營有利事業，他用一個錢，就希望在這一個錢回來的時候，帶回一些利潤。他們這種不同的習慣，必然會影響他們在一切事業上的性情和脾氣。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業家，鄉紳往往是膽怯的事業家。就商人說，如果他覺得投下大資本來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費用的比例增大它的價值，他就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但鄉紳很少有資本，即使有些資本，也很少敢如此來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進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資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餘。設你幸而住在四周農村多未開墾的商業都市中，你當能看到商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比鄉紳是活躍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經商而養成的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也使他更適合於進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獲利。

三，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但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這一種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卻不為世人所注意。據我所知，曾注意此點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謨先生。

在既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餘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於鄉村式的款客。這剩餘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羣的婢僕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象兵士服從國王一樣。在歐洲工商業尚未擴張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領主，其待客的闊綽，都超過我們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廳，為威廉·魯弗斯的飯廳，然而常有人滿之患。托馬斯·伯克特常以清潔的草蓆，鋪於廳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們嶄新的衣裳。據說，瓦維克大公每日在各莊園所款待的賓客，達三萬人；此或言過其實，但數目必很大，否則不會被誇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知道，不多幾年前，蘇格蘭高地一帶，仍盛行近似這種規模的款客，而在工商業很不發達的民族，這種風氣，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說：“我曾見一阿拉伯酋長，在他售賣牲畜的市中，當街宴請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於他的婢僕。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數年前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足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納地租，僅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現在該處的貨幣，與他處比較，也並不能購買更多的商品。其實，在一個大莊園所產的剩餘產物必須在本莊園內消費的農村，為地主便利打算，與其在家中消費這全部剩餘，不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消費其一部分，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僕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佔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於領主，無異於婢僕、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裏養佃農，與在自己家裏養婢僕、家奴，無甚區別。婢僕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於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於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

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禦共同敵人，纔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國王要依靠自己的權力，強制某大領主領地內人民償還小小的債務，那裏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國王所要花的力量，幾乎將等於消滅一個內戰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說這種地方性裁判權起源於封建法律，實是一個錯誤。不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權，在歐洲尚不知有所謂封建法律以前數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領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權、鑄幣權、制定地方行政法規權，也已在這時候掌握在大領主手中了。英格蘭被征服前的薩克遜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並不下於被征服後諾爾曼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但我們不可設想，直到被征服以後，封建法律才成為英格蘭習慣法。在法蘭西，領主統治僅、裁判權的發生先於封建法律的發生，尤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種權力，無疑會隨着上述各種財產制度與風習而產生。且不講古代英法兩王國吧，我們就在晚得多的時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種結果必隨這種種原因而發生。不到三十年前，蘇格蘭洛赫巴地方，有個叫做克默倫的紳士，不是貴族領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佃農，不過是亞蓋爾公爵的一個家臣罷了。他既沒有獲得正式的委任狀，又不是治安推事，卻對其民衆執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權。據說，他的審判裁判，雖無司法儀式，卻很公正。也許在當時當地的情形下，他為維持公共治安計，不得不出面承攬這權力。這位紳士，每年得租不過五百鎊，1745年率領八百人蔘加了斯托亞的起義。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決不是想擴大封建領主的權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們的權力縮小。自國王以下，直到最下級的領主，都由封建法律妥為制定等階，各有各的職守和義務。在領主未成年時，該領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歸其直接上司領受，土地管理權亦歸其直接上司掌握。結果，各大領主未成年時，他們土地的地租和對土地的管理權也都歸於國王。國王對於這種未成年的領主，盡保護教育的責任，並

以監護人的資格，爲之婚娶，不過選擇的對象，要身分相稱。但是，這種法律，雖本意要加強國王的權力，削弱大領主的權力，但仍不能使鄉村居民得有安寧的秩序良好的政府，因爲它不能徹底改變紛亂狀態所由而起的財產制度與風習。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憑一切強制力量所辦不到的事，卻由國外商業和製造業潛移默化，逐漸實現。國外商業與製造業的興起，漸使大領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餘產物與他物交換。由此而得的物品，於是無須與佃農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費。完全爲自己不爲他人，這似乎是一切時代爲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們一發現了由自己來消費所收地租的全部價值的方法之後，他們就不願再和別人共同享受這價值。他們就寧願把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或其價格，用來換取一對金鋼石鈕釦或其他同樣無用而無意義的東西，隨而也把這糧食所能給他們帶來的權威一併捨棄了。但金鋼石鈕釦是由他自己獨享、無人與他共享的。至於以前的花費方法，他至少要與一千人共享。這區別是非常明顯的，要作出取捨的決定，有賴於明智的判斷。於是，爲了滿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虛榮心，他們終於完全捨棄了上述權威。

在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國家，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除了以這一萬鎊養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聽命以外，也許就沒有其他的消費方法。但在現在的歐洲，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不必直接養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喚無使喚價值的僕役十多人，卻可消費其全部收入。事實上，他通常也是這樣做。他間接維持的人，也許和往昔消費方法所僱用的一樣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換得的寶物量，也許很少，但爲採集製造這寶物而被僱用的工人，卻必然很多。這種寶物的昂貴價格，大都由於這些工人的工資及其直接僱主的利潤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寶物的價格，即間接支付這一切工資與利潤，從而間接維持了這些工人及其僱主的生活。不過，他對於他們各人的貢獻，卻只是他們全年生活費的極小部分。他們各人每年的生活費，來自他一個

人的，少數佔全部的十分之一，許多佔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則尚不及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他雖然對維持他們全體的生活有所貢獻，但他們全體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維持，所以，對於他，他們就多少是獨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地租維持佃農和門客的生活時，他們是各自維持各自的佃農和門客的生活。但在他們以地租維持商人工匠時，他們全體所能養活的人數也許和往昔一樣多，而且由於鄉村式的款客方法難免浪費，現在所能養的，也許比往昔還多。但是，分開計算，他們每個人對這較大人數中每個人的生活費所貢獻的往往極微。每個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費，都不是得自一個顧客，而是得自千百個不同的顧客。他在某程度上，雖要仰給於他們中每一個人，但不絕對仰賴他們中任何一個人。

大地主的個人消費，就在這情況下逐漸增大起來。因此，他所養活的門客，就非逐漸減少以至全部打發掉不可。由於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農，亦非逐漸打發不可。農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顧對裁減佃農的怨言，卻仍把佃農人數減少到按照當時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況耕作所需要有的最少人數。由於盡數打發了不必要的寄食者，由於逼着佃農繳出農田所能提供的全部價值，地主所得的剩餘，或者說剩餘的價格，逐漸增大了。這個較大的剩餘，商人和製造業者又給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來消費，象前此消費其餘部分一樣。個人消費增大這個因素，又驅使地主們渴望所得地租，能超過現在改良狀態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數額。但這樣土地就要進一步改良，佃農就要增加費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夠長，不足以使他收回這增加的費用及其利潤，他決不會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長租期。地主們愛好浮華，要擴大用度，終於承認佃農的條件。這就是長期租地權的起因。

可隨意退租的佃農，耕作土地，給付十足的代價，他並非完全隸屬於地主。他們彼此所得的金錢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不會犧牲生命與財產來為地主服務，而在租期延長後，他就簡直是獨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約或習慣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點其他事情。

佃農既已獨立，門客又已打發掉，大領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執行，不能再擾亂地方的治安了。他們那與生俱存的權利已經賣

掉，然而，出賣的目的，不是象伊騷那樣爲了飢餓，爲了必需，卻僅僅爲了耳目玩好，僅僅爲了爲兒童所玩樂而非成人所應追求的寶石鑽戒。因此，他們就象城市中的殷實市民或商人一樣平庸了。於是，在城市，在鄉村，都設立了正常的政府。沒有誰能擾亂都市的政治，也沒有誰能擾亂鄉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與本題無關，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產，由父傳子，子傳孫，傳至許多世代的世家，在商業國，是極罕見的。反之，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如威爾斯，如蘇格蘭高地，則極普通。阿拉伯歷史，充滿着貴族的世系；有一位韃靼可汗，著了一部歷史，曾經譯成幾種歐洲文字，其中，就全是關於貴族的世系。這可證明，古世家在這些國家是極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於養活儘量多的人的國家裏，富人的用度很少過分，他的仁愛心似乎難得熱烈得使他企圖養活超過他所能養活的人數。但在收入的最大部分歸個人消費時，他的用度就往往極無限制；因爲他的個人虛榮心，是無限制的、永遠滿足不了的。所以，在商業國，即使有極嚴厲的法規取締揮霍浪費，長期富裕的家庭仍屬罕見。但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即使沒有法規取締，亦多長富之家。象韃靼和阿拉伯那樣的遊牧民族，財產不易消費，取締浪費的法規，亦無設立的可能。

對於公衆幸福，這真是一種極重要的革命，但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衆幸福的階級。滿足最幼稚的虛榮心，是大領主的唯一動機。至於商人工匠，雖不象那樣可笑，但他們也只爲一己的利益行事。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可賺錢的地方去賺一個錢。大領主的癡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於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於這次革命，卻既不瞭解，亦未預見。

因此，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業是農村改良與開發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

但是，這種發展，既與自然趨勢相反，當然是遲緩和不確定的。試一比較以工商業爲國富基礎的歐洲各國的緩慢進步，與以農業爲國富基礎的我國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進步吧。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數目，在將近五百年中，未增加一倍。我國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卻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歐洲，長男承繼法和各種永久所有權，使大地產不能分割，因而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們知道，小地

主對其有限土地十分熟悉，愛護備至。他不但喜歡開發它，而且喜歡改良它。他在各種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聰明、最常成功的了。加之，長男承繼法和永久所有權，又使許多土地不能出賣，常使購買土地的資本多於待售的土地，從而使土地常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買價的利息，至於修補費，及其他各種意外費用，更不用說。所以，購買土地，在歐洲，是小資本利潤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經營工商業了的人，為圖安全起見，亦有時願把小資本用來購買土地。還有些從別個來源取得收入的專門職業家，亦常因要保儲蓄的安全，喜投資購買土地。但是，一個青年，如果不願從事工商業，而用二三千鎊資本購買一小塊土地來開發，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圖成為大富翁、大名人，就絕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資本用於別的用途，他就可望發大財或享大名，和別人一樣。而且，這樣的青年人，雖不希望成為地主，但大都不願為農民。這樣，任人購買的土地既少，土地的賣價又高，結果，使許多原來可能用於改良土地開發土地的資本都不投到這方面來。反之，在北美洲，則有五六十鎊的資本，便足夠用來開辦一個農場。那裏，未開墾土地的購買與開發，既為最大資本最有利的用途，亦為最小資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樣的地方，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裏的土地，幾乎可全無代價取得，即使須出代價，亦比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少得多。這種事在歐洲是絕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為私有財產的任何國家都是不會有的。可是，當一個大家庭的家主死時，所遺土地財產若能平均分配於各個兒女，則所遺地產，大都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會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這樣將漸足抵付買地地價的利息；以小額資本購買土地，亦將和其他用途同樣有利。

英格蘭，因土壤天然肥沃，因海岸線與全國面積相比甚長，又因有許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貫其間，使內陸各地，能有水運之便，所以，與歐洲任何大國比較，都一樣宜於國外通商，一樣宜於經營遠地銷售的製造業，一樣宜於上述情況所能引起的種種改良。此外，自伊麗莎白即位以來，英國立法，都特別注意工商業的利益；事實上，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即荷蘭亦不例外，其法律一般地說，能這樣有利於此種產業。所以，英國工商業就在這整個時期內不斷地向前發展起來。無疑，農村的開發與改良，亦不斷地在進步；但其進步，似較遲

緩，不如工商業的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許在伊麗莎白時代以前就耕種了，可是還有很大部分，仍全未耕種，至於已耕種的土地，其耕作狀況，大部分亦未盡滿人意。不過，英格蘭的法律，不僅由保護商業而間接鼓勵農業，且有若干對農業直接加以獎勵。除歉收年度外，穀物輸出，不僅自由，且有獎金。在收穫一般的年度，外谷輸入，又有等於禁止輸入的關稅。除了來自愛爾蘭的以外，活牲畜的輸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許從愛爾蘭輸入亦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在兩種最重要的土地生產物即麪包與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實享有一種獨佔，他人無從染指。這種獎勵，雖象我後面指出的那樣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國立法當局，實有贊助農業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蘭法律對於國內農民曾竭盡所能使其安定獨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長男承繼法尚未消滅，什一稅繼續徵收，與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權有時仍然有效的國家中，英格蘭總算是最鼓勵農業的國家了。但英格蘭農業的情況，仍是如此。設使農業除了由於商業進步而間接得到鼓勵以外，沒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勵，政府袖手旁觀，聽任農民的處境停留於與歐洲其他各國相同的狀態，那末，農業將呈現何種情況呢。伊麗莎白即位迄今已二百餘年了。這悠長的期間，是人類繁榮階段通常所能持續的最久期間。

在英格蘭成為大商業國以前大約一百年，法蘭西的對外貿易很可觀。照當時人的設想，似在查理第八遠征那不勒斯以前，法國的航海業就已很可觀。但就全體說，法蘭西土地的耕作與改良，遜於英格蘭。法國法律從未給予農業以直接的獎勵。

西班牙與葡萄牙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雖多由外國船舶裝運，但很可觀。西班牙葡萄牙對他們殖民地的國外貿易，由本國船裝運，這貿易因殖民地富饒廣大，尤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國外貿易，並不曾在這兩國內引起任何重大的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甚至，這兩國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開墾。就國外貿易說，在歐洲各大國中，除意大利外，葡萄牙歷史最久。

由於國外貿易及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而使全國土地全部得到開發與改良的國家，在歐洲，似乎只有一個意大利。據古西亞迪尼說，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農村已經耕種，而且最多山最荒蕪的地區也同樣已經耕種。這個國家所處的相當有利的

地位，以及在這個國家裏存在的大量獨立小邦，對於上述土地的全面開墾或不無貢獻。然而，這位賢明的近代歷史家雖這樣說，但那時意大利的土地墾作，不及今日的英格蘭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通過工商業而獲得的資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與改良事業上得到保障和實現，總是極不確定的財產。說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公民，這句話真是不錯。究竟在何處營業的問題，在他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他們對甲國成到一種厭惡，那怕頂微小，亦可使他把資本從甲國遷到乙國。跟着資本的遷移，資本所維持的產業，亦必移動。在資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為建築物，成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資本決不能說屬於某一國。據說汗薩同盟大部分都市都擁有大財富，這財富如今到哪裏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紀、十四世紀模糊的歷史中外，廈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甚至它們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麼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稱究竟屬於歐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確定。但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意大利所遭的災禍，雖然使倫巴迪亞和托斯卡納所屬各城市的工商業大為衰落，但這些地方，至今仍為歐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弗蘭德在內戰後又受西班牙的統治，這些雖然延去了安特衛普·根特、布魯哲斯的大商業，但弗蘭德至今仍為歐洲財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進步的地方。戰爭與政治上的一般變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業為唯一來源的富源趨於耗竭。通過比較可靠的農業改良而產生的富源就比較持久得多，除了由於敵對蠻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續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較激烈的大變動，如羅馬帝國崩潰前後西歐的大變動外，其他事件都破壞不了。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

第一章論財富的自然的發展

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與農村居民通商。這種商業，有的是以原生產物與製造品直接交換，有的是以貨幣或紙幣作媒介交換。農村以生活資料及製造材料供給都市，都市則以一部分製造品供給農村居民。不再生產亦不能再生產生活資料的都市，其全部財富和全部生活資料都可說是得自農村。但我們不要根據這點，就說都市的利得即是農村的損失。他們有相互的利害關係。這裏，分工的結果，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對雙方從事各種職業的居民都有利益。農村居民，與其親自勞動來製造他們需要的製造品，無寧作這種交換，因為由這種交換，他們可用較小量的自身勞動生產物購得較大量的製造品。都市是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農民用不了的東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換他們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愈廣闊。這種市場愈廣闊，對廣大人民愈有利。在離都市一哩生產的穀物，與在離都市二十哩生產的穀物，在市上的售價都一樣。但後者所得的售價，一般地說，不但要補償其生產費用和上市費用，而且要對農業家提供農業的普通利潤。所以，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穀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的穀物的運費全部價值。此外，在他們購買的東西的買價上，他們還節省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試一比較都市附近各農村和遠離都市各農村的耕作事業，你就知道都市商業是怎樣有利於農村。就連所有宣傳貿易差額的各種謬說，也沒有一種敢妄說城鄉通商對城市或對鄉村有損的。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資料必先於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產前者的產業，亦必先於生產後者的產業。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村的耕種和改良，必先於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只剩餘產物維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餘，才談得上增設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資料，不一定要仰給於附近的農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給於國內的農村，而可以從遠方運來，所以，這雖然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卻使各時代各國家進步繁榮的過程，因而有所差異。

農村先於都市的事態，在大多數國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國家，又有人類天性促其實現。只要人爲制度不壓抑人類天性，則在境內土地尚未完全開墾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設，決不能超過農村的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多數人必寧願投資以改良土地開墾土地，不願投資於工業及國外貿易。投在土地上的資本，可受到投資人自身更直接的監察；與商人資本比較，他的財產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財產，不但常須冒狂風巨浪的危險，而且由於商人常須對風俗情況都不易熟習的遠郊的人貸給信用，還要冒人類的愚蠢與不正行爲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險。反之，地主的資本，卻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說是盡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鄉村風景的美麗，鄉村生活的愉快，鄉村心理的恬靜，以及鄉村所提供的獨立性，只要這獨立性不受到人爲的迫害的話，這些實具有吸引每一個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爲人的原始目標，所以，在有人類存在的一切階段，這個原始的職業將爲人類所永遠愛悅。

沒有工匠的幫助，農耕必大感不便，且會時作時輟。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犁匠、泥水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爲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爲不必要象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或小村落。後來，又有屠戶、酒家、麪包師，只及許多就供給臨時需要那一點說對他們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於是市鎮日益擴大起來。鄉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務的。市鎮是鄉民不斷前往把原生產物交換製造品的市集或市場。就是依着這種交換，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的供給。他們售給鄉村居民的製成品的數量，支配他們所購的材料及食料的數量。所以，他們的材料及食料的增加，只能按照鄉民對製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這種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發展。所以，設使人爲制度不擾亂事物的自然傾向，那就無論在什麼政治社會裏，都市財富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是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結果，而且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增長擴大。

在未曾墾殖、土地極易購得的我們北美殖民地，爲銷售於遠方而興辦的製造業，在任何市鎮都還不曾有過。在北美洲，當工匠獲得的

資本，超過他所經營的、以供給鄰近鄉村為職志的事業所需要的數額時，他不會想辦一家工廠來作銷售遠方的生意。他一般寧願用多餘的資財，來購買或改良未開墾的土地，由技工一變而為農業家。當地付給技工的高昂工資，對於技工所提供的舒暢生活，都不足以誘使他為他人工作，他總情願為自己工作。他覺得，技工是顧客的僕役，仰給生活於顧客；至於耕作自己的土地，從自己家庭的勞力取得衣食之資的農業家，則是真正的主人翁，獨立於世界。

反之，在土地全已開墾或不易購得的國家，技工所獲資本，如果已經不能全數投在鄰近地區隨時需要的事業上，其有餘部分，就會用來擴張營業，準備銷售遠方。鍛工將建立鐵廠，織工將建立麻織廠毛織廠。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各種製造業，將慢慢地進行精密的分工，用各種方法加以改進。這是大家容易想得到的，用不着細選。

在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的條件下，人們選擇投資途徑時，在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業兩者中，自寧願選擇製造業，其原因正如在農業與製造業中，寧願選擇農業一樣。與製造商的資本比較，地主或農業家的資本更為穩當。同樣地，與國外貿易的資本比較，製造商的資本更為穩當，因為隨時都在自己監察之下。誠然，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社會，剩餘原生產物及製造品，或者說，國內無人需要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都必須送往外國，以交換國內需要的其他物品。但輸運剩餘產物到外國去的資本，為本國所有，成為外國所有，卻是無關重要的。如果本國的資本，不夠我們同時耕作一切土地，並完完全全地製造一切原生產物，那末，由外國資本來輸運本國剩餘原生產物到外國去，亦對本國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賴有這種資本，本國的資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國、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證明了一種事實，即是，縱使本國輸出業，有大部分為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設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資本，即波有外國資本替它們輸出剩餘產物，它們的進步，會慢得多吧。

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程度上按照這種

順序投用。總得先開墾了一些土地然後才能成立很多城市；總得在城市裏先有了些粗糙的製造業，然後纔會有人願意投身於國外貿易。

這個自然的順序，雖然在所有進步的社會裏都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但就今日歐洲各國的情狀說，這個順序卻就許多方面說，似乎完全相反。它們的精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多由國外貿易引出。農業大改良，也是製造業和國外貿易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反自然的退化的順序，乃是風俗習慣迫成的。他們原來的統治的性質使他們的風俗習慣變成了這個模樣。後來，這種統治大大改變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卻仍沒有多大改變。

第二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侵擾羅馬帝國西部以來，歐洲起了一個大變革，跟着這個大變革發生的是，歐洲擾攘了好幾百年。野蠻民族對原居民的掠奪和迫害，中斷了城鄉間的貿易。城市都成了荒墟，鄉村亦無人耕作。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很富裕的西歐，一變而為極貧乏，極野蠻。在接連不斷的擾攘中，那些民族的頭子，佔有或篡奪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有人耕作的土地雖然不多，但要找一塊沒有所有主的土地，卻不可能。一切土地都被吞併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數大地主所吞併。

最初吞併荒地的危害雖很大，但有可能只不過是暫時的危害。這些土地本可通過繼承或分割，把它們拆小。但長男承繼法，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繼而拆小；限嗣繼承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割而拆小。

如果我們把土地看作只是謀生求樂的手段，和動產一樣，那末，按照自然承繼法，當然會把土地象動產一樣，分給家內所有的兒女。因為每一個兒女的生計，都為老父所同樣關心。羅馬人就是採行這種自然承繼法。他們不分別長幼，不分別男女，只要是自己養的，就可以承繼自己的土地。他們處分土地的方法，和我們現在處分動產的方法一樣。不過，當土地被看作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權力強弱所繫的時候，就被認為以不分割而專歸於一人比較適當。在那些不安靖的時候，大地主同時都是小貴族。他的佃戶，便是他的隸屬。他是他們的裁判官，是他們和平時節的立法者，亦是他們戰爭時節的領導人。他可任意進行戰爭，對鄰國作戰，有時對國王作戰。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地產是否安全，其中居民有無保障，都取決於它的大小。把一個

地產分拆，無異把它破壞，換言之，無異把它拆開來，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強鄰的侵蝕吞併。所以，適應着當時這種情況，在地產承繼方面，長男承繼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來。爲了同一理由，君主國通常亦由長男一人承繼。雖然最初並不總是如此。爲君主國的安全與權力計，國土寧可不加分裂、寧可在諸兒女中，選擇一個人來單獨承繼。但選擇誰呢，那樣重要的一件事，當然要鄭重規定一個普通規例，使選擇不按個人資質好壞這個不大可靠的區別，而按某種明白的、無可爭論的標準。在同一家庭的各兒女中，除了性別與年齡，再沒有其他無可爭論的區別了。根據一般經驗，男性比女性好，而在其他一切條件相等的場合，年長的比年幼的好。長男承繼權，就這樣成立了。而所謂直系繼承，亦就從此發生了。

一種法律在初成立時，都有環境上的需要，並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這種環境。但事實上，往往產生這法律的環境已發生變化，而這法律卻仍繼續有效。今日歐洲，僅領有一畝地的小地主，其安全已無異於擁有千萬畝地的大地主。產生長男承繼權的環境大變了，長男承繼僅卻依然存在。由於在各種制度中，這法律是最宜於保持貴族尊嚴的，所以，今後會再行幾百年也說不定。但事實上，除了這一點，長男承繼權也就沒有一點不違反大家庭的真實利益了。這權利，因爲要使一個兒子富裕，就使其他兒子陷於窮困。

限嗣繼承法是長男繼承法施行的自然結果。它的採行，旨在維護由長男繼承法導引出來的直系繼承，以及防止由於子孫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遺產在贈與、遺讓或割讓名義下旁落的危險。這種法律，羅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國有幾個法律家，雖然喜歡以今制附會羅馬古制，實則，羅馬人所謂預備繼承人預定法和囑託遺贈法，都與限嗣繼承法迥不相同。

在大土地財產仍爲諸侯領地時，限嗣繼承或許不是不合理的辦法。象一些所謂君主國的根本法律一樣，這個法律，可以使許許多多人不致因一人輕舉妄動而受災殃。但今日歐洲各國，大地產和小地產已同樣受國法保護，所以，這種法律就變得再荒唐不過了。這種法律的制定，根據一種根本錯誤的假定：即對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類的各代後裔，沒有同等的權利，當代人的所有權，要受限制於五百年前祖宗的心意。在今日的歐洲，實行限嗣繼承法的地方還很

不少。在貴族血統仍是享受民事或軍事榮譽的必要資格的地方，限嗣繼承法尤牢不可破。限嗣繼承法被貴族認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權所必要的手段。這一階級既奪得了一種超乎其同胞之上的不正當的利益，卻又擔心自己的貧乏會貽人譏笑，以為應當再享有另一種不正當的利益。據說，英國習慣法很厭惡世業世祿的制度，因而，和歐洲其他各君主國比較，世業世祿的制度在那裏比較受限制。雖然在英格蘭，世業世祿的制度也還未完全廢除。據說，現在蘇格蘭，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仍受着嚴格的限嗣繼承法的支配。

在這情況下，大面積的荒地不僅為少數豪族所兼併，而且永無再分散的可能。事實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產生這種制度的混亂時節，大地主的精力，幾乎全部用來保護已有的領土，擴大自身對鄰國的管轄權、支配權。他們實在沒有餘暇來開墾土地改良土地。後來和平了，法制的確立，秩序的安定，雖然使他們有餘暇，但他們一般沒有心思耕墾土地，並且常常沒有必要的才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費用，超過了或恰好相等於他的收入（這是極常有的現象），他就沒有資本，可以投在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個經濟家，那末，他又通常感覺，與其用一年的節省未改良舊的地產，不如用來購買新的地產比較合算。改良土地，象各種商業計劃一樣，要獲利潤，不斤斤注意小節省小贏利是絕對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即使天生是好儉樸的，亦不大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悅己的裝飾，而不注意自己沒有多大需要的利潤。他自幼就養成了飾衣裳、盛車馬、崇居室、麗陳設的嗜好。他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即在想改良土地時，這種習慣所涵養的心理仍會支配着他。他也許會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畝土地大大裝飾起來，花費比該地改良後所值大十倍的費用，終而發覺如果對他所有全部地產都照樣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無其他嗜好，恐怕也會在沒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盡他所有的財產。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自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以來，有些大地產，繼續在少數人手裏，至今沒有改動。把這些大地產與鄰近的小地產比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論證而相信大地產是怎樣不利於改良。

如果從這樣的大地主還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對土地的改良，那末從那些佔有的土地比他們少的人那裏，就更無這種希望了。在歐洲舊狀

態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農。他們全是或幾乎全是奴隸，不過他們的隸役，比古希臘羅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隸役和緩一些。他們與其說隸屬於主人，無寧說是隸屬於土地。因此，他們可以和土地一同出賣，但不能單獨出賣。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們還可以結婚。而且，主人沒有權利把他們夫婦，賣給不同的人，從而拆散他們的姻緣。主人殘害或殺害了奴隸，還要受處分，不過一般是小懲罰罷了。但是，奴隸不得蓄積財產。他們所獲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隨時取去。所以，奴隸所能進行的墾殖和改良，實際上都是由主人進行，由主人負擔費用的。種子、牲畜、農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效益，亦是主人的。這種奴隸，除了日常維持生活的東西，什麼也不能獲得。所以，在這場合，正當地說，土地仍是由地主佔有、由農奴耕作的。這種奴隸制度，在俄羅斯，在波蘭，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亞，在摩拉維亞，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現在還存在。這種制度逐漸全然廢除了的地方，不過歐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進行大改良，已是很難，那末，當他們使用奴隸耕作的時候，要他們進行大改良就更是無望了。我相信，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經驗，都證明了一件事，即：奴隸勞動雖表面上看來只需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但徹底通盤計算起來，其代價是任何勞動中最高的。一個不能獲得一點財產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麼也不關心。他的工作，夠他維持生活就行了，你要從他身上多榨出一些來，那只有出於強迫，他自己決不會願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麥拉的著作都說，古意大利的穀物耕種事業，在奴隸制度下非常衰微，對主人非常不利。耕種事業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古希臘並沒有多大進步。所以，當論及柏拉圖理想國時他說：要有一片象巴比倫平原那樣極大極豐沃的土地，纔可以養活五千懶惰人（當時認為衛護那理想國所必要的戰士）及其妻僕。

人類好勝的心理，多以統治下等人為榮，而以俯就下等人為恥。所以，如果法律允許，工作的性質也允許，那在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他一定願意選用奴隸。蔗糖與菸草的栽種，能夠提供使用奴隸耕作的費用；穀物的耕種，現在似乎還不能夠辦到這一點。主要產物為穀物的英國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來操作。本雪文尼亞人最近議決釋放黑奴。那種事實，使我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

奴隸是他們財產的大部分，他們決不會贊成釋放。但以蔗糖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隸擔任；以菸草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隸擔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種甘蔗的利潤特別大，在歐美兩洲，簡直沒有什麼耕種事業比得上。栽種菸草的利潤，雖比不上栽種甘蔗，但與栽種穀物比較，卻仍然較大。這兩種耕種事業都能提供奴隸耕作的費用，但栽種甘蔗，比栽種菸草更能提供這種費用。所以，與白種人數相比，黑奴的數目，在甘蔗區域，比在菸草區域大得多。

繼古代奴隸耕作者之後，逐漸出現了法蘭西今日稱作對分佃農的一種農民。這種農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隸農），在英格蘭，這制度早已廢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現在不知道他們叫作什麼。在這制度下，種子、牲畜、農具，總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資本，都由地主供給。農民離去或被逐去時，這種資本就須歸還地主。出產物在留出被認為保持原資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後，其餘就由地主與農人均分。

在對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費用，嚴格地說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隸耕作制下沒有差別。但其中，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對分佃耕制下的傭農，是自由人，他們能夠佔得財產，可以享有土地生產物的一定比例。生產總額愈大，他所佔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們的利益，顯然在於能夠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反之，一個沒有佔得財產希望只能維持自己生活的奴隸，就會圖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產物多於自身所需。也許就是部分因為對分佃耕制對地主有利，部分因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勵農效反抗他們的權力，終而使大家都覺得奴隸耕作制不利，於是大部分歐洲的奴隸耕作制度逐漸消滅。這樣一次大的變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怎樣發生的，在近代歷史中，是最難稽考的事件之一。羅馬教會，常自誇其廢除奴隸的功績。當然，我們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紀亞歷山大三世時代，羅馬教皇就發出了普通釋放奴隸的訓諭。但這訓諭，似乎不過是個諄諄的勸諭，不遵守訓諭的人，並不受處罰。奴隸制度依然保持了數百年。最後，因為上述那兩種利害關係（他主的利害與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來，才逐漸把它廢除。一個已被釋放，又許繼續保用土地，

但自己沒有資本的賤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資本，纔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爲法蘭西今日所稱的對分佃農不可。

不過，在對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費分文，而享受土地生產物的一半，留歸對分佃農享有的自屬不多。在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節省的更是有限。對分佃農決不願用這有限的節餘來改良土地。教會什一稅，不過抽去生產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極大的障礙。抽去生產物的半數，一定會切實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給的資本，從土地儘量取得最大量的生產物，固然是對分佃農所願望，但若以自有資本與地主資本混合，卻決非對分佃農所願的。在法蘭西，據說，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對分佃農耕作。地主常常指摘農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來拖車。因爲，拖車的利潤，全部歸於農民，耕田的利潤，卻須與地主平分。在蘇格蘭的某些地方也殘留着這種佃農，叫作由地主借給種子農具的佃戶。大貴族吉爾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說，英格蘭古代的佃農，與其稱爲農戶，無寧稱爲地主的屬役。這種佃農，大概與此屬於同一種類。

慢慢地繼對分佃農而起的農民，可以說是真正的農民。他們耕田的資本是自己的，但要對地主繳納一定數額的地租。這種農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們有時覺得，投下一部分資本改良土地，對自己有益。他們希望，在租期未滿以前，投下的資本可以收回，並提供很大的利潤。不過，就連這種農民的借地權，也有一個長時期是極不可靠的。今日歐洲有許多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土地換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滿，可把農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蘭，甚至得依虛構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違法的暴力手段驅逐農民，農民所能憑藉以取獲賠償的訴訟章程，是極不完善的。農民並不一定能恢復佔有原來的土地，他們通常只能獲得損失的賠償，而且所償決不能等於所損。在歐洲，英格蘭也許是頂尊重耕農的一個國家。但那裏，亦遲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訴訟法。規定改佃時，佃農得要求賠償損失，並得要求恢復借地權。此種要求，不必由一次審問而審結。這個訴訟法，施行極其有效，所以，近來，地主若要爲佔有土地而起訴，他常常不用地主名義，按權利令狀起訴，而常常用他的佃農名義，按退佃合狀起訴。以此之故，在英格蘭，佃戶的安全等於地主了。此外，英格蘭又規定，每年納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終身租地權就

是終身保有的不動產，有選舉國會議員的權利，耕農既大部分有這種終身不動產，所以政治上的勢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輕視他們。我相信，歐洲除了英格蘭，沒有一個地方的佃農，未立租地權約，便出資財建築倉廩，不怕為地主所奪的。這種十分有利於農民的法律風俗，所起的促進現代英格蘭偉大光榮的作用，也許比為商業而定立的所有各種誇大條例所起的作用還要大得多。

保障最長租期使不為各種承繼人所妨害的法律，據我所知，乃英國所特有。早在1449年，這種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傳到蘇格蘭去。但當時，限嗣繼承的財產的承繼人，往往不許從一年以上的期間出租田地，所以，這法律的澤潤未能儘量廣佈。最近，國會雖立法補救，但這些束縛仍太嚴厲。此外，在蘇格蘭，租地人又因沒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所以不象英格蘭加農那樣，受到地主那麼大的重視。

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雖亦保障佃農權利，使不受土地承繼人和購買人的損害，但這種權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蘭西初定租期為九年，近來才延長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勵佃農進行各種最重要的改良。我們知道，歐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為他們所設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們認為，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應以土地長期出租，使得他們長期間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價值。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淺。他們不會想到這種規定，一定會妨害改良，結果，一定會妨害他們自己的真實利益。

古代，農民對於地主，除了納租，還須提供各種勞役。那種勞役，既不明定於租約內，又不受任何規定支配，只要莊主諸侯需要，就得隨命隨到。這種全無規定的勞役，使佃農不知受了多少痛苦。蘇格蘭晚近把一切全無規定的勞役廢止，不到幾年，國內農民的境況就改善了許多。

農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復同樣橫暴。公路的建築修補（這種勞役，我相信，各處尚未廢除，但橫暴的程度不等），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在王軍或王官過境時，當地農民，又有提供車馬糧食的義務，那雖有代價，但代價定於食物徵發官。我相信，在歐洲各君主國中，只英國一國，完全消除了食物徵發的壓迫。在法國和德國，那都未曾消除。

農民所負擔的勞役義務，既如上述。農民所負擔的納稅義務，其不規則和橫暴的程度也和勞役義務不相上下。古代貴族，雖不願在金錢方面給君主以任何幫助，但毫不躊躇地聽任君主對佃農徵收貢稅。他們沒有看出，這種苛稅終必嚴重地影響他們自身的收入。法國今天仍有貢稅，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稅的一例。貢稅是加於假定的農民的利潤的一種稅，它是根據農民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估定的。所以，農民為自身利益計，儘可能裝窮，結果，他耕作所用的資本必減至儘可能少的程度。至於改良土地的資本，那就以減少到零為宜。即使法國農民手中積蓄了一點資本，亦將因有貢稅，不願投到土地上來。貢稅事實上幾乎等於禁止農民把積蓄投資於土地。此外，此種賦稅被認為會抑低任何要完納它的人的身分，使不僅不能與鄉紳平行，且不能與市民並列。而誰租借別人的土地，誰就要完納這種稅。紳士，甚至有產的市民，都不願受這種恥辱。所以，施行這種賦稅的結果，不僅使從土地方面蓄積起來的資本不用來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資本都不用來改良土地。英格蘭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稅和十五分之一稅，就它們對土地的影響說，似乎是和貢稅同一性質的稅。

在這一切害農政策之下，要耕者來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這一階級的人民，儘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卻處於大不利的地位。農民與地主比較，猶如借錢經商者與有資親自經商者相比。固然，無論是藉資經商，或是有資親自經商，只要他們的行為一樣慎重，他們的資財就都可以增進，但因借錢經商者的利潤有一大部分歸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錢經商者的資財的增進，定要遲緩得多。同樣，與地主比較，即使行為一樣慎重，佃農耕地的改良，亦要遲緩得多；因為，在農民的場合，生產物的大部分須歸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場合，這一部分卻仍可用來作進一步的改良。此外，農民的地位，當然比地主低。不僅如此，歐洲有大部分地方，把農民看作下等人民，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師。至於農民地位被看得低於大商人和大製造商，那是全歐洲各地普遍的情況了。世上有幾個大財主願捨棄高的地位而與下等階級的人民為伍呢，所以，即在現今，歐洲人的資本，仍很少會由他業轉到農業上來改良土地。也許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英國資本轉到農業方面來改良土地的，比較多些。但即在英國，在若干地方用於農業上的大資本，大都是在農業上獲得的（和一切其他職業比較，農業上資財的蓄積，最為遲緩）。不

過，我們應該知道，在所有國家裏，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農、大農。在歐洲君主國中，英格蘭也許格外有這種情形。據說，在荷蘭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爾尼共和政府中，農民的地位，亦不亞於英格蘭農民。

除上述外，歐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於土地的改良與墾作的地方，不論進行改良和墾作的人是地主還是農民。（一）到處都規定，未經特許，穀物輸出一律禁止；（二）限制穀物甚至各種農產物的內地貿易，實行禁壟斷禁零售禁屯積種種謬法，確立集市市場的特權。我說過，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為世界最大帝國的中心地，然其農耕的進展，亦不免因禁止穀物輸出和獎勵外谷輸入而受到許多阻礙。至於土地沒有那樣肥沃，位置沒有那樣有利的國家，其耕作事業會因限制穀物的內地貿易和禁止穀物輸出而受到何種程度的阻礙，就難於想象了。

第三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

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居民的境況，並不比農村居民好。不過，那時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臘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內的居民大不相同。在這等古代共和國內，地主佔居民中的多數，他們分佔公地，都覺得房屋毗連，環以圍牆，便於共同防禦。但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主大都散居於各自領地的城寨內，住在各自的佃農及屬民中間。市鎮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們的處境無異於隸役，或近似於隸役。古時各憲章所賦與歐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權利，充分證明了他們在未取得這些權利以前的生活情況。這些憲章，准許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領主許可；第二，在他死後，他的財物，可由兒孫承繼，不由領主領取；第三，自身遺產，可由遺囑處分。這種權利的頒給，充分證明了在未頒給前，他們是和農村耕作者幾乎一樣，或竟全然一樣，處於賤奴狀態。

這些人，無疑是很貧困很下賤的，他們肩挑着貨物，過市赴墟，從這裏跑到那裏，與今日拉車荷擔的小販相類似。那時歐洲各國，象現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一樣，經常在這些旅行者經過某些采邑，經過某些橋樑，赴市趁墟，設攤售貨的時候，把賦稅加在他們的人身與貨物上。在英格蘭，這些稅，叫做過界稅、過橋機、落地稅、攤稅。有的時候，國王以及在某些場合擁有這項權力的大領主，特許某些商人，

特別是住在他們領地內的商人，免納各稅。因此，這些商人的地位，雖在其他各點與隸役無異或極相類似，但仍被稱為自由商人。不過，他們為報答保護者的保護，通常每年須納人頭稅若干。當時非付厚酬，保護不易獲得。所以，這類人頭稅可看作他們對保護者捨棄其他稅收所提供的補償。這種交換條件的實行，當初只限於個人，其期限或限於其人之身，或憑保護者的好惡。英國土地清丈冊關於幾個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記載，常常提及某某市民為這種保護各納人頭稅若干給國王或大領主。有時，它又只記錄這些人所納的稅的總和。

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制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徵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徵，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

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着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稅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着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着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佈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藉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欺凌，不稍寬恕。市民當然嫉恨領主，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亦畏懼領主，嫉恨領主。另一方面，國王雖亦鄙視市民，但他沒有嫉恨他們、畏懼他們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關係，使國王市民互結同盟，以抗領主。市民是國王敵人的敵人，所以，國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盡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變為穩固，不依靠這種敵人。給予市民權力，使能推舉市長，制訂市法規，建築城堡自衛，進行軍事訓練，國王就這樣盡他權力之所及，把一切獨立安全的手段給與市民，使他們不依靠領主。但要使他們的自由同盟能對他們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對國王提供相當大的援助，則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組織不可，非有強制居民服從的權威不可。至於把市稅永久包給他們，則是為了表

明心跡，使他願結為朋友、結為同盟的人，不疑懼他將來會再壓迫他們，會把稅額提高或把稅包給別人。

對領主感情最壞的國王，對於市民，敕賜往往最為寬大。例如英格蘭國王約翰，對市民最為寬容。法蘭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統率領主的權力。至其末年，據神父丹尼爾說，其子路易，即後來稱為肥路易的，與國內各主教，籌商最適當的方法，以取締領主暴行。主教們的意見，可歸納為兩種提議。一，在國王領土內，各大城市都設市長和市議會，以創設新的管轄體系。二，使城市居民，組織新的民軍，聽市長調遣，在必要時，出發援助國王。據法蘭西各考古學家說，法蘭西市長制度和市議會制度，就是這時創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蘇阿比亞王統治下，纔得到這種種特權；有名的漢薩同盟，也是在這時纔開始露頭角。

都市民軍的力量，此時既不下於鄉村民軍，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與當地領主爭議時，他們常佔優勢。意大利、瑞士等地，各個都市或由於離首府所在地很遠，或由於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於其他原故，君主對它們已全無權力，它們大都逐漸成為獨立的民主社會，並征服當地貴族，迫令其拆毀鄉間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資格居住在都市內。伯爾尼民主國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簡史，類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意大利屢起屢滅的無數大民主國的歷史亦復如此。

英法二國王權雖有時甚為式微，但從未全部消滅。都市因此沒有完全獨立的機會。但因市民勢力日張，除上游的市稅以外，國王一切賦稅，須得市民同意，才徵收得到。國王有急需，就通詔全國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國會。這些代表可與牧師和貴族一起議決，給與國王特別經濟援助。由於市民代表，大都袒護國王，國王有時利用他們從抵抗議會內大領主的權力。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歐洲各大君主國的國會的由來。

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就在這種狀態下，在各都市確立了。但此時，鄉村耕作者，依然受貴族的各種迫害。處於無力自衛狀態的人，自然滿足於僅夠過活的生活資料；因為，擁有更多財富，只會招惹壓迫者更苛虐的誅求。反之，當人們勤勞的結果確有親自享受的把握時，他們就自然會努力來改善他們自身的境遇，不僅要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娛樂品。所以，以生產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東西為目的的產業，在都市建立的時期，比在農村早得多。在賤奴狀態下受領主鉗制的貧窮農民，稍有儲蓄，必掩藏唯謹，免得領主看見，攬為己有，而且一有機會，即逃往都市。加之，當時法律對市民既如此寬縱，同時又如此熱望削減領主對農民的權力，所以，農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為領主所獲，即可永享自由。因此，鄉村勤勞居民，一有蓄積，自然會逃到都市來，把都市看作他們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產業手段，歸根到底，都出自農村。但近海岸沿河邊的城市居民，卻不一定只從鄰近農村得到這些物品。他們有大得多的範圍。他們或只自身工業的製造品作交換，或經營遙遠國家間的運送業，以甲國產物交換乙國產物，而從遠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物品。一個城市不但在其鄰近各農村都很貧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與通商的各個農村也都很貧乏很衰落的情況下，仍可發達起來，日臻於富強。因為單個地說，每個農村對它所能提供的食料與僱傭機會也許有限，但綜合起來說，它們所能提供的卻極可觀。不過，在商業範圍還極狹隘的那時，就有些國家很富裕、產業就很發達了。例如，未曾滅亡時的希臘帝國，亞巴西德統治下的撒拉遜人的帝國，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巴伯裏海岸某地，以及摩爾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在歐洲，最早由商業致大富的，似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當時居於世界的文明部分和進步部分的中心。十字軍雖然破壞了許多資財，傷害了許多居民，妨礙了歐洲大部分地方的進步，但卻非常有利於意大利若干城市的發展。為爭奪聖地從各地出發的大軍，對於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各市的航海業，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十字軍有時由這些地方的船隻運送，其糧食則常由它們供給。它們簡直可以說是大軍的輜重隊。使歐洲其他各國遭受極大破壞的十字軍，卻成為這些民主國富裕的泉源。

商業城市的居民往往以製造品和奢侈品運往富國，只滿足大富翁的虛榮心，大富翁亦極願以大量本國土產物來交換。因此，當時大部分歐洲商業，主要都是以本國土產物交換較文明國的製造品。英格蘭

的羊毛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及弗蘭德的精製呢絨交換；波蘭的穀物亦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白蘭地酒及法蘭西意大利的絲絨交換。

這樣，對精良製造品的嗜好，就通過國外貿易超漸普及到未有精製造業的國家。但此種嗜好，一經普及於國內，便引起很大的需要，商人為免去運輸費起見，自然會想到在本國建立同種製造業。這就是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各地為遠地銷售而建立的製造業的由來。

但我們必需注意，世界上從未存在過而且也決不能存在完全沒有製造業的大國，我說的大國沒有製造業，所指的只是精良進步的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各大國大部分居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傢俱，都是本國產業的產物。此種情形，在普通所謂無製造業的貧國，尤為常見，而在普通所謂製造業發達的富國，反而不常見。與貧國比較，富國下等階級人民日用的衣服傢俱，反有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國的產物。

各國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其發生的情況有兩種。

第一種是國內商人和企業家象上面所說，有時因要仿效外國某種製造業，而勇往直前地（如果可這樣說），把資本投下來經營的。象這樣發生的製造業乃是國外通商的結果。十三世紀盛行於路卡地方的綢製造業、絨製造業、緞製造業，即如此發生。此等製造業，後為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拉卡尼的暴令所驅逐。1310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卡；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議在那裏開辦綢業。當地官吏准許，並給以多種特權。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創設綢業。開始的時候，即僱有工人三百。伊麗莎白時代才傳入英格蘭而在古代即已盛行於弗蘭德之呢絨業，現在里昂及斯皮塔菲爾的綢業，似乎也是這樣發生的。這樣發生的製造業，因為是仿效外國，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國材料。當威尼斯初有製造業時，一切材料，都從西西里及利文運來。更久以前的路卡製造業，其所用的材料亦產在外國。桑樹的培植，蠶蟲的飼養，在十六世紀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還不大知道。種桑養蠶的技術，在查理九世時代，才傳入法國。弗蘭德製造業所用的羊毛，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英格蘭。西班牙羊毛，雖然不是英格蘭毛織物最初採用的材料，卻是適於遠地銷售的毛織業最初所採用的材料。現時里昂製造業所用的絲，亦大半是外國產；而且，在它初建時，就全部或幾乎全部是外國產。斯皮塔菲爾製造業所用的材料，

大概一向全部都不是英國產物。象這樣的製造業，大部分是因少數人的計謀而創辦的，所以設立的地址，有時是濱海的都市，有時是內陸的都市，視這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和主意而定。

有時，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逐漸改良而成的。我們說過，即最貧陋的國家，亦常有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由這種製造業逐漸改良而生的製造業，大都使用本國出產的材料；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離海岸很遠有時甚至離可通航運的水路亦很遠的內地加工的。土壤肥沃的內地，耕作容易，所產物品，除了維持耕者生活所需外，還有很多剩餘。這種剩餘，因陸運費太貴，航運不便，不易運往外地。因此，出產的豐饒，使糧食低廉，從而鼓勵工人住在那裏。他們覺得，在那裏勞動化在其他地方可獲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們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產的，他們把材料加工後，即以製成品，或者說，以製成品的價格，換得更多的材料和糧食。他們節省了由內地到沿河沿海各地或遙遠市場的運輸費，從而給剩餘部分原生產物，增加了一個新的價值。這樣，耕者可以比從前更為簡易的條件，從這班工人手裏取得對他們有用或者使他們滿意的物品。對於剩餘部分農產物，耕者可取得更高的價格；他們所需要的其他便利品，又可以較低價格買得。這鼓勵農民並使農民有能力進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餘的廣量。土地肥沃，使製造業誕生，而製造業的發展，又轉過來增進土地的出產力。製造業最初僅供應本地；後來，作品精緻改良了，便能供應遠地的市場。因為，原生產物甚至粗製造品很難擔負由陸運運往遠地的費用，而精製造品卻不會成到這種困難。精製造品，在小容積中，常包含大量原生產物的價格。例如，一匹精製呢絨，雖僅重八十磅，但所含價格，卻不僅是八十磅羊毛的價格，而且，有時，還包含着幾千磅穀物，即各種工人及其直接僱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這種穀物，如果以穀物的原形運往海外，定然是極困難的。但若以精製品的形態運往，則雖運往最遠的角落亦很容易。利斯、赫利法克、設菲爾德、伯明翰、沃弗漢普頓等地的製造業，就是按照這個方式，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的。這種製造業是農業的結果。其推廣與改進，在歐洲現代史上，一般遲於那些由對外貿易促成的製造業。在現在在上述各地很繁榮的那些製造業適於外銷以前一百多年，英格蘭就以其用西班牙羊毛為原料的精製呢絨業著名於世了。前一類製造業是隨着農業的發展而

推廣、改進的，而農業的推廣與改進，又是國外貿易和直接由此而產生的製造業的最後和最大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說明。

第四章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有所貢獻，其貢獻的途徑有三。

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易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的開發與進一步的改進。受到這利益的，不僅僅是都市所在的農村。凡與都市通商的農村，都多少受其實惠。它們為此等農村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提供了市場，結果就鼓勵了其產業和產業的改進。當然，靠近都市的農村，所得實惠，自必最大。其原生產物的運輸，所費既較省，所以，與較遠農村的產物比較，商人們即使付給生產者較高的買價，但對於消費者，取價卻仍可一樣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獲的財富，常用以購買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開墾的土地。商人們都渴望變成鄉紳。而且，在他們變成了鄉紳的時候，他們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與鄉紳不同。鄉紳是一向奢侈慣了的，他只會花錢，從來不會想到賺錢。商人卻常用錢來經營有利事業，他用一個錢，就希望在這一個錢回來的時候，帶回一些利潤。他們這種不同的習慣，必然會影響他們在一切事業上的性情和脾氣。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業家，鄉紳往往是膽怯的事業家。就商人說，如果他覺得投下大資本來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費用的比例增大它的價值，他就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但鄉紳很少有資本，即使有些資本，也很少敢如此來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進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資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餘。設你幸而住在四周農村多未開墾的商業都市中，你當能看到商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比鄉紳是活躍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經商而養成的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也使他更適合於進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獲利。

三，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但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這一種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卻不為世人所注意。據我所知，曾注意此點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謨先生。

在既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餘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於鄉村式的款客。這剩餘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羣的婢僕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象兵士服從國王一樣。在歐洲工商業尚未擴張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領主，其待客的闊綽，都超過我們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廳，為威廉·魯弗斯的飯廳，然而常有人滿之患。托馬斯·伯克特常以清潔的草蓆，鋪於廳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們嶄新的衣裳。據說，瓦維克大公每日在各莊園所款待的賓客，達三萬人；此或言過其實，但數目必很大，否則不會被誇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知道，不多幾年前，蘇格蘭高地一帶，仍盛行近似這種規模的款客，而在工商業很不發達的民族，這種風氣，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說：“我曾見一阿拉伯酋長，在他售賣牲畜的市中，當街宴請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於他的婢僕。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數年前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足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納地租，僅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現在該處的貨幣，與他處比較，也並不能購買更多的商品。其實，在一個大莊園所產的剩餘產物必須在本莊園內消費的農村，為地主便利打算，與其在家中消費這全部剩餘，不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消費其一部分，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僕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佔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於領主，無異於婢僕、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裏養佃農，與在自己家裏養婢僕、家奴，無甚區別。婢僕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於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於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

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禦共同敵人，纔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國王要依靠自己的權力，強制某大領主領地內人民償還小小的債務，那裏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國王所要花的力量，幾乎將等於消滅一個內戰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說這種地方性裁判權起源於封建法律，實是一個錯誤。不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權，在歐洲尚不知有所謂封建法律以前數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領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權、鑄幣權、制定地方行政法規權，也已在這時候掌握在大領主手中了。英格蘭被征服前的薩克遜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並不下於被征服後諾爾曼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但我們不可設想，直到被征服以後，封建法律才成為英格蘭習慣法。在法蘭西，領主統治僅、裁判權的發生先於封建法律的發生，尤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種權力，無疑會隨着上述各種財產制度與風習而產生。且不講古代英法兩王國吧，我們就在晚得多的時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種結果必隨這種種原因而發生。不到三十年前，蘇格蘭洛赫巴地方，有個叫做克默倫的紳士，不是貴族領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佃農，不過是亞蓋爾公爵的一個家臣罷了。他既沒有獲得正式的委任狀，又不是治安推事，卻對其民衆執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權。據說，他的審判裁判，雖無司法儀式，卻很公正。也許在當時當地的情形下，他為維持公共治安計，不得不出面承攬這權力。這位紳士，每年得租不過五百鎊，1745年率領八百人蔘加了斯托亞的起義。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決不是想擴大封建領主的權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們的權力縮小。自國王以下，直到最下級的領主，都由封建法律妥為制定等階，各有各的職守和義務。在領主未成年時，該領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歸其直接上司領受，土地管理權亦歸其直接上司掌握。結果，各大領主未成年時，他們土地的地租和對土地的管理權也都歸於國王。國王對於這種未成年的領主，盡保護教育的責任，並

以監護人的資格，爲之婚娶，不過選擇的對象，要身分相稱。但是，這種法律，雖本意要加強國王的權力，削弱大領主的權力，但仍不能使鄉村居民得有安寧的秩序良好的政府，因爲它不能徹底改變紛亂狀態所由而起的財產制度與風習。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憑一切強制力量所辦不到的事，卻由國外商業和製造業潛移默化，逐漸實現。國外商業與製造業的興起，漸使大領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餘產物與他物交換。由此而得的物品，於是無須與佃農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費。完全爲自己不爲他人，這似乎是一切時代爲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們一發現了由自己來消費所收地租的全部價值的方法之後，他們就不願再和別人共同享受這價值。他們就寧願把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或其價格，用來換取一對金鋼石鈕釦或其他同樣無用而無意義的東西，隨而也把這糧食所能給他們帶來的權威一併捨棄了。但金鋼石鈕釦是由他自己獨享、無人與他共享的。至於以前的花費方法，他至少要與一千人共享。這區別是非常明顯的，要作出取捨的決定，有賴於明智的判斷。於是，爲了滿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虛榮心，他們終於完全捨棄了上述權威。

在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國家，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除了以這一萬鎊養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聽命以外，也許就沒有其他的消費方法。但在現在的歐洲，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不必直接養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喚無使喚價值的僕役十多人，卻可消費其全部收入。事實上，他通常也是這樣做。他間接維持的人，也許和往昔消費方法所僱用的一樣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換得的寶物量，也許很少，但爲採集製造這寶物而被僱用的工人，卻必然很多。這種寶物的昂貴價格，大都由於這些工人的工資及其直接僱主的利潤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寶物的價格，即間接支付這一切工資與利潤，從而間接維持了這些工人及其僱主的生活。不過，他對於他們各人的貢獻，卻只是他們全年生活費的極小部分。他們各人每年的生活費，來自他一個

人的，少數佔全部的十分之一，許多佔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則尚不及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他雖然對維持他們全體的生活有所貢獻，但他們全體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維持，所以，對於他，他們就多少是獨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地租維持佃農和門客的生活時，他們是各自維持各自的佃農和門客的生活。但在他們以地租維持商人工匠時，他們全體所能養活的人數也許和往昔一樣多，而且由於鄉村式的款客方法難免浪費，現在所能養的，也許比往昔還多。但是，分開計算，他們每個人對這較大人數中每個人的生活費所貢獻的往往極微。每個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費，都不是得自一個顧客，而是得自千百個不同的顧客。他在某程度上，雖要仰給於他們中每一個人，但不絕對仰賴他們中任何一個人。

大地主的個人消費，就在這情況下逐漸增大起來。因此，他所養活的門客，就非逐漸減少以至全部打發掉不可。由於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農，亦非逐漸打發不可。農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顧對裁減佃農的怨言，卻仍把佃農人數減少到按照當時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況耕作所需要有的最少人數。由於盡數打發了不必要的寄食者，由於逼着佃農繳出農田所能提供的全部價值，地主所得的剩餘，或者說剩餘的價格，逐漸增大了。這個較大的剩餘，商人和製造業者又給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來消費，象前此消費其餘部分一樣。個人消費增大這個因素，又驅使地主們渴望所得地租，能超過現在改良狀態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數額。但這樣土地就要進一步改良，佃農就要增加費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夠長，不足以使他收回這增加的費用及其利潤，他決不會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長租期。地主們愛好浮華，要擴大用度，終於承認佃農的條件。這就是長期租地權的起因。

可隨意退租的佃農，耕作土地，給付十足的代價，他並非完全隸屬於地主。他們彼此所得的金錢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不會犧牲生命與財產來為地主服務，而在租期延長後，他就簡直是獨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約或習慣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點其他事情。

佃農既已獨立，門客又已打發掉，大領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執行，不能再擾亂地方的治安了。他們那與生俱存的權利已經賣

掉，然而，出賣的目的，不是象伊騷那樣爲了飢餓，爲了必需，卻僅僅爲了耳目玩好，僅僅爲了爲兒童所玩樂而非成人所應追求的寶石鑽戒。因此，他們就象城市中的殷實市民或商人一樣平庸了。於是，在城市，在鄉村，都設立了正常的政府。沒有誰能擾亂都市的政治，也沒有誰能擾亂鄉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與本題無關，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產，由父傳子，子傳孫，傳至許多世代的世家，在商業國，是極罕見的。反之，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如威爾斯，如蘇格蘭高地，則極普通。阿拉伯歷史，充滿着貴族的世系；有一位韃靼可汗，著了一部歷史，曾經譯成幾種歐洲文字，其中，就全是關於貴族的世系。這可證明，古世家在這些國家是極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於養活儘量多的人的國家裏，富人的用度很少過分，他的仁愛心似乎難得熱烈得使他企圖養活超過他所能養活的人數。但在收入的最大部分歸個人消費時，他的用度就往往極無限制；因爲他的個人虛榮心，是無限制的、永遠滿足不了的。所以，在商業國，即使有極嚴厲的法規取締揮霍浪費，長期富裕的家庭仍屬罕見。但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即使沒有法規取締，亦多長富之家。象韃靼和阿拉伯那樣的遊牧民族，財產不易消費，取締浪費的法規，亦無設立的可能。

對於公衆幸福，這真是一種極重要的革命，但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衆幸福的階級。滿足最幼稚的虛榮心，是大領主的唯一動機。至於商人工匠，雖不象那樣可笑，但他們也只爲一己的利益行事。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可賺錢的地方去賺一個錢。大領主的癡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於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於這次革命，卻既不瞭解，亦未預見。

因此，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業是農村改良與開發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

但是，這種發展，既與自然趨勢相反，當然是遲緩和不確定的。試一比較以工商業爲國富基礎的歐洲各國的緩慢進步，與以農業爲國富基礎的我國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進步吧。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數目，在將近五百年中，未增加一倍。我國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卻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歐洲，長男承繼法和各種永久所有權，使大地產不能分割，因而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們知道，小地

主對其有限土地十分熟悉，愛護備至。他不但喜歡開發它，而且喜歡改良它。他在各種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聰明、最常成功的了。加之，長男承繼法和永久所有權，又使許多土地不能出賣，常使購買土地的資本多於待售的土地，從而使土地常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買價的利息，至於修補費，及其他各種意外費用，更不用說。所以，購買土地，在歐洲，是小資本利潤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經營工商業了的人，為圖安全起見，亦有時願把小資本用來購買土地。還有些從別個來源取得收入的專門職業家，亦常因要保儲蓄的安全，喜投資購買土地。但是，一個青年，如果不願從事工商業，而用二三千鎊資本購買一小塊土地來開發，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圖成為大富翁、大名人，就絕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資本用於別的用途，他就可望發大財或享大名，和別人一樣。而且，這樣的青年人，雖不希望成為地主，但大都不願為農民。這樣，任人購買的土地既少，土地的賣價又高，結果，使許多原來可能用於改良土地開發土地的資本都不投到這方面來。反之，在北美洲，則有五六十鎊的資本，便足夠用來開辦一個農場。那裏，未開墾土地的購買與開發，既為最大資本最有利的用途，亦為最小資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樣的地方，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裏的土地，幾乎可全無代價取得，即使須出代價，亦比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少得多。這種事在歐洲是絕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為私有財產的任何國家都是不會有的。可是，當一個大家庭的家主死時，所遺土地財產若能平均分配於各個兒女，則所遺地產，大都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會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這樣將漸足抵付買地地價的利息；以小額資本購買土地，亦將和其他用途同樣有利。

英格蘭，因土壤天然肥沃，因海岸線與全國面積相比甚長，又因有許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貫其間，使內陸各地，能有水運之便，所以，與歐洲任何大國比較，都一樣宜於國外通商，一樣宜於經營遠地銷售的製造業，一樣宜於上述情況所能引起的種種改良。此外，自伊麗莎白即位以來，英國立法，都特別注意工商業的利益；事實上，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即荷蘭亦不例外，其法律一般地說，能這樣有利於此種產業。所以，英國工商業就在這整個時期內不斷地向前發展起來。無疑，農村的開發與改良，亦不斷地在進步；但其進步，似較遲

緩，不如工商業的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許在伊麗莎白時代以前就耕種了，可是還有很大部分，仍全未耕種，至於已耕種的土地，其耕作狀況，大部分亦未盡滿人意。不過，英格蘭的法律，不僅由保護商業而間接鼓勵農業，且有若干對農業直接加以獎勵。除歉收年度外，穀物輸出，不僅自由，且有獎金。在收穫一般的年度，外谷輸入，又有等於禁止輸入的關稅。除了來自愛爾蘭的以外，活牲畜的輸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許從愛爾蘭輸入亦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在兩種最重要的土地生產物即麪包與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實享有一種獨佔，他人無從染指。這種獎勵，雖象我後面指出的那樣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國立法當局，實有贊助農業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蘭法律對於國內農民曾竭盡所能使其安定獨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長男承繼法尚未消滅，什一稅繼續徵收，與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權有時仍然有效的國家中，英格蘭總算是最鼓勵農業的國家了。但英格蘭農業的情況，仍是如此。設使農業除了由於商業進步而間接得到鼓勵以外，沒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勵，政府袖手旁觀，聽任農民的處境停留於與歐洲其他各國相同的狀態，那末，農業將呈現何種情況呢。伊麗莎白即位迄今已二百餘年了。這悠長的期間，是人類繁榮階段通常所能持續的最久期間。

在英格蘭成為大商業國以前大約一百年，法蘭西的對外貿易很可觀。照當時人的設想，似在查理第八遠征那不勒斯以前，法國的航海業就已很可觀。但就全體說，法蘭西土地的耕作與改良，遜於英格蘭。法國法律從未給予農業以直接的獎勵。

西班牙與葡萄牙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雖多由外國船舶裝運，但很可觀。西班牙葡萄牙對他們殖民地的國外貿易，由本國船裝運，這貿易因殖民地富饒廣大，尤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國外貿易，並不曾在這兩國內引起任何重大的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甚至，這兩國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開墾。就國外貿易說，在歐洲各大國中，除意大利外，葡萄牙歷史最久。

由於國外貿易及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而使全國土地全部得到開發與改良的國家，在歐洲，似乎只有一個意大利。據古西亞迪尼說，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農村已經耕種，而且最多山最荒蕪的地區也同樣已經耕種。這個國家所處的相當有利的

地位，以及在這個國家裏存在的大量獨立小邦，對於上述土地的全面開墾或不無貢獻。然而，這位賢明的近代歷史家雖這樣說，但那時意大利的土地墾作，不及今日的英格蘭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通過工商業而獲得的資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與改良事業上得到保障和實現，總是極不確定的財產。說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公民，這句話真是不錯。究竟在何處營業的問題，在他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他們對甲國成到一種厭惡，那怕頂微小，亦可使他把資本從甲國遷到乙國。跟着資本的遷移，資本所維持的產業，亦必移動。在資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為建築物，成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資本決不能說屬於某一國。據說汗薩同盟大部分都市都擁有大財富，這財富如今到哪裏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紀、十四世紀模糊的歷史中外，廈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甚至它們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麼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稱究竟屬於歐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確定。但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意大利所遭的災禍，雖然使倫巴迪亞和托斯卡納所屬各城市的工商業大為衰落，但這些地方，至今仍為歐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弗蘭德在內戰後又受西班牙的統治，這些雖然延去了安特衛普·根特、布魯哲斯的大商業，但弗蘭德至今仍為歐洲財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進步的地方。戰爭與政治上的一般變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業為唯一來源的富源趨於耗竭。通過比較可靠的農業改良而產生的富源就比較持久得多，除了由於敵對蠻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續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較激烈的大變動，如羅馬帝國崩潰前後西歐的大變動外，其他事件都破壞不了。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

第一章論財富的自然的發展

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與農村居民通商。這種商業，有的是以原生產物與製造品直接交換，有的是以貨幣或紙幣作媒介交換。農村以生活資料及製造材料供給都市，都市則以一部分製造品供給農村居民。不再生產亦不能再生產生活資料的都市，其全部財富和全部生活資料都可說是得自農村。但我們不要根據這點，就說都市的利得即是農村的損失。他們有相互的利害關係。這裏，分工的結果，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對雙方從事各種職業的居民都有利益。農村居民，與其親自勞動來製造他們需要的製造品，無寧作這種交換，因為由這種交換，他們可用較小量的自身勞動生產物購得較大量的製造品。都市是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農民用不了的東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換他們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愈廣闊。這種市場愈廣闊，對廣大人民愈有利。在離都市一哩生產的穀物，與在離都市二十哩生產的穀物，在市上的售價都一樣。但後者所得的售價，一般地說，不但要補償其生產費用和上市費用，而且要對農業家提供農業的普通利潤。所以，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穀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的穀物的運費全部價值。此外，在他們購買的東西的買價上，他們還節省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試一比較都市附近各農村和遠離都市各農村的耕作事業，你就知道都市商業是怎樣有利於農村。就連所有宣傳貿易差額的各種謬說，也沒有一種敢妄說城鄉通商對城市或對鄉村有損的。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資料必先於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產前者的產業，亦必先於生產後者的產業。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村的耕種和改良，必先於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只剩餘產物維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餘，才談得上增設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資料，不一定要仰給於附近的農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給於國內的農村，而可以從遠方運來，所以，這雖然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卻使各時代各國家進步繁榮的過程，因而有所差異。

農村先於都市的事態，在大多數國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國家，又有人類天性促其實現。只要人爲制度不壓抑人類天性，則在境內土地尚未完全開墾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設，決不能超過農村的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多數人必寧願投資以改良土地開墾土地，不願投資於工業及國外貿易。投在土地上的資本，可受到投資人自身更直接的監察；與商人資本比較，他的財產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財產，不但常須冒狂風巨浪的危險，而且由於商人常須對風俗情況都不易熟習的遠郊的人貸給信用，還要冒人類的愚蠢與不正行爲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險。反之，地主的資本，卻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說是盡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鄉村風景的美麗，鄉村生活的愉快，鄉村心理的恬靜，以及鄉村所提供的獨立性，只要這獨立性不受到人爲的迫害的話，這些實具有吸引每一個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爲人的原始目標，所以，在有人類存在的一切階段，這個原始的職業將爲人類所永遠愛悅。

沒有工匠的幫助，農耕必大感不便，且會時作時輟。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犁匠、泥水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爲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爲不必要象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或小村落。後來，又有屠戶、酒家、麪包師，只及許多就供給臨時需要那一點說對他們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於是市鎮日益擴大起來。鄉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務的。市鎮是鄉民不斷前往把原生產物交換製造品的市集或市場。就是依着這種交換，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的供給。他們售給鄉村居民的製成品的數量，支配他們所購的材料及食料的數量。所以，他們的材料及食料的增加，只能按照鄉民對製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這種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發展。所以，設使人爲制度不擾亂事物的自然傾向，那就無論在什麼政治社會裏，都市財富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是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結果，而且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增長擴大。

在未曾墾殖、土地極易購得的我們北美殖民地，爲銷售於遠方而興辦的製造業，在任何市鎮都還不曾有過。在北美洲，當工匠獲得的

資本，超過他所經營的、以供給鄰近鄉村為職志的事業所需要的數額時，他不會想辦一家工廠來作銷售遠方的生意。他一般寧願用多餘的資財，來購買或改良未開墾的土地，由技工一變而為農業家。當地付給技工的高昂工資，對於技工所提供的舒暢生活，都不足以誘使他為他人工作，他總情願為自己工作。他覺得，技工是顧客的僕役，仰給生活於顧客；至於耕作自己的土地，從自己家庭的勞力取得衣食之資的農業家，則是真正的主人翁，獨立於世界。

反之，在土地全已開墾或不易購得的國家，技工所獲資本，如果已經不能全數投在鄰近地區隨時需要的事業上，其有餘部分，就會用來擴張營業，準備銷售遠方。鍛工將建立鐵廠，織工將建立麻織廠毛織廠。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各種製造業，將慢慢地進行精密的分工，用各種方法加以改進。這是大家容易想得到的，用不着細選。

在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的條件下，人們選擇投資途徑時，在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業兩者中，自寧願選擇製造業，其原因正如在農業與製造業中，寧願選擇農業一樣。與製造商的資本比較，地主或農業家的資本更為穩當。同樣地，與國外貿易的資本比較，製造商的資本更為穩當，因為隨時都在自己監察之下。誠然，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社會，剩餘原生產物及製造品，或者說，國內無人需要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都必須送往外國，以交換國內需要的其他物品。但輸運剩餘產物到外國去的資本，為本國所有，成為外國所有，卻是無關重要的。如果本國的資本，不夠我們同時耕作一切土地，並完完全全地製造一切原生產物，那末，由外國資本來輸運本國剩餘原生產物到外國去，亦對本國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賴有這種資本，本國的資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國、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證明了一種事實，即是，縱使本國輸出業，有大部分為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設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資本，即波有外國資本替它們輸出剩餘產物，它們的進步，會慢得多吧。

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程度上按照這種

順序投用。總得先開墾了一些土地然後才能成立很多城市；總得在城市裏先有了些粗糙的製造業，然後纔會有人願意投身於國外貿易。

這個自然的順序，雖然在所有進步的社會裏都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但就今日歐洲各國的情狀說，這個順序卻就許多方面說，似乎完全相反。它們的精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多由國外貿易引出。農業大改良，也是製造業和國外貿易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反自然的退化的順序，乃是風俗習慣迫成的。他們原來的統治的性質使他們的風俗習慣變成了這個模樣。後來，這種統治大大改變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卻仍沒有多大改變。

第二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侵擾羅馬帝國西部以來，歐洲起了一個大變革，跟着這個大變革發生的是，歐洲擾攘了好幾百年。野蠻民族對原居民的掠奪和迫害，中斷了城鄉間的貿易。城市都成了荒墟，鄉村亦無人耕作。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很富裕的西歐，一變而為極貧乏，極野蠻。在接連不斷的擾攘中，那些民族的頭子，佔有或篡奪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有人耕作的土地雖然不多，但要找一塊沒有所有主的土地，卻不可能。一切土地都被吞併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數大地主所吞併。

最初吞併荒地的危害雖很大，但有可能只不過是暫時的危害。這些土地本可通過繼承或分割，把它們拆小。但長男承繼法，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繼而拆小；限嗣繼承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割而拆小。

如果我們把土地看作只是謀生求樂的手段，和動產一樣，那末，按照自然承繼法，當然會把土地象動產一樣，分給家內所有的兒女。因為每一個兒女的生計，都為老父所同樣關心。羅馬人就是採行這種自然承繼法。他們不分別長幼，不分別男女，只要是自己養的，就可以承繼自己的土地。他們處分土地的方法，和我們現在處分動產的方法一樣。不過，當土地被看作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權力強弱所繫的時候，就被認為以不分割而專歸於一人比較適當。在那些不安靖的時候，大地主同時都是小貴族。他的佃戶，便是他的隸屬。他是他們的裁判官，是他們和平時節的立法者，亦是他們戰爭時節的領導人。他可任意進行戰爭，對鄰國作戰，有時對國王作戰。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地產是否安全，其中居民有無保障，都取決於它的大小。把一個

地產分拆，無異把它破壞，換言之，無異把它拆開來，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強鄰的侵蝕吞併。所以，適應着當時這種情況，在地產承繼方面，長男承繼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來。爲了同一理由，君主國通常亦由長男一人承繼。雖然最初並不總是如此。爲君主國的安全與權力計，國土寧可不加分裂、寧可在諸兒女中，選擇一個人來單獨承繼。但選擇誰呢，那樣重要的一件事，當然要鄭重規定一個普通規例，使選擇不按個人資質好壞這個不大可靠的區別，而按某種明白的、無可爭論的標準。在同一家庭的各兒女中，除了性別與年齡，再沒有其他無可爭論的區別了。根據一般經驗，男性比女性好，而在其他一切條件相等的場合，年長的比年幼的好。長男承繼權，就這樣成立了。而所謂直系繼承，亦就從此發生了。

一種法律在初成立時，都有環境上的需要，並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這種環境。但事實上，往往產生這法律的環境已發生變化，而這法律卻仍繼續有效。今日歐洲，僅領有一畝地的小地主，其安全已無異於擁有千萬畝地的大地主。產生長男承繼權的環境大變了，長男承繼僅卻依然存在。由於在各種制度中，這法律是最宜於保持貴族尊嚴的，所以，今後會再行幾百年也說不定。但事實上，除了這一點，長男承繼權也就沒有一點不違反大家庭的真實利益了。這權利，因爲要使一個兒子富裕，就使其他兒子陷於窮困。

限嗣繼承法是長男繼承法施行的自然結果。它的採行，旨在維護由長男繼承法導引出來的直系繼承，以及防止由於子孫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遺產在贈與、遺讓或割讓名義下旁落的危險。這種法律，羅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國有幾個法律家，雖然喜歡以今制附會羅馬古制，實則，羅馬人所謂預備繼承人預定法和囑託遺贈法，都與限嗣繼承法迥不相同。

在大土地財產仍爲諸侯領地時，限嗣繼承或許不是不合理的辦法。象一些所謂君主國的根本法律一樣，這個法律，可以使許許多多人不致因一人輕舉妄動而受災殃。但今日歐洲各國，大地產和小地產已同樣受國法保護，所以，這種法律就變得再荒唐不過了。這種法律的制定，根據一種根本錯誤的假定：即對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類的各代後裔，沒有同等的權利，當代人的所有權，要受限制於五百年前祖宗的心意。在今日的歐洲，實行限嗣繼承法的地方還很

不少。在貴族血統仍是享受民事或軍事榮譽的必要資格的地方，限嗣繼承法尤牢不可破。限嗣繼承法被貴族認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權所必要的手段。這一階級既奪得了一種超乎其同胞之上的不正當的利益，卻又擔心自己的貧乏會貽人譏笑，以為應當再享有另一種不正當的利益。據說，英國習慣法很厭惡世業世祿的制度，因而，和歐洲其他各君主國比較，世業世祿的制度在那裏比較受限制。雖然在英格蘭，世業世祿的制度也還未完全廢除。據說，現在蘇格蘭，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仍受着嚴格的限嗣繼承法的支配。

在這情況下，大面積的荒地不僅為少數豪族所兼併，而且永無再分散的可能。事實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產生這種制度的混亂時節，大地主的精力，幾乎全部用來保護已有的領土，擴大自身對鄰國的管轄權、支配權。他們實在沒有餘暇來開墾土地改良土地。後來和平了，法制的確立，秩序的安定，雖然使他們有餘暇，但他們一般沒有心思耕墾土地，並且常常沒有必要的才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費用，超過了或恰好相等於他的收入（這是極常有的現象），他就沒有資本，可以投在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個經濟家，那末，他又通常感覺，與其用一年的節省未改良舊的地產，不如用來購買新的地產比較合算。改良土地，象各種商業計劃一樣，要獲利潤，不斤斤注意小節省小贏利是絕對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即使天生是好儉樸的，亦不大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悅己的裝飾，而不注意自己沒有多大需要的利潤。他自幼就養成了飾衣裳、盛車馬、崇居室、麗陳設的嗜好。他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即在想改良土地時，這種習慣所涵養的心理仍會支配着他。他也許會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畝土地大大裝飾起來，花費比該地改良後所值大十倍的費用，終而發覺如果對他所有全部地產都照樣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無其他嗜好，恐怕也會在沒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盡他所有的財產。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自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以來，有些大地產，繼續在少數人手裏，至今沒有改動。把這些大地產與鄰近的小地產比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論證而相信大地產是怎樣不利於改良。

如果從這樣的大地主還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對土地的改良，那末從那些佔有的土地比他們少的人那裏，就更無這種希望了。在歐洲舊狀

態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農。他們全是或幾乎全是奴隸，不過他們的隸役，比古希臘羅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隸役和緩一些。他們與其說隸屬於主人，無寧說是隸屬於土地。因此，他們可以和土地一同出賣，但不能單獨出賣。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們還可以結婚。而且，主人沒有權利把他們夫婦，賣給不同的人，從而拆散他們的姻緣。主人殘害或殺害了奴隸，還要受處分，不過一般是小懲罰罷了。但是，奴隸不得蓄積財產。他們所獲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隨時取去。所以，奴隸所能進行的墾殖和改良，實際上都是由主人進行，由主人負擔費用的。種子、牲畜、農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得益，亦是主人的。這種奴隸，除了日常維持生活的東西，什麼也不能獲得。所以，在這場合，正當地說，土地仍是由地主佔有、由農奴耕作的。這種奴隸制度，在俄羅斯，在波蘭，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亞，在摩拉維亞，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現在還存在。這種制度逐漸全然廢除了的地方，不過歐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進行大改良，已是很難，那末，當他們使用奴隸耕作的時候，要他們進行大改良就更是無望了。我相信，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經驗，都證明了一件事，即：奴隸勞動雖表面上看來只需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但徹底通盤計算起來，其代價是任何勞動中最高的。一個不能獲得一點財產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麼也不關心。他的工作，夠他維持生活就行了，你要從他身上多榨出一些來，那只有出於強迫，他自己決不會願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麥拉的著作都說，古意大利的穀物耕種事業，在奴隸制度下非常衰微，對主人非常不利。耕種事業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古希臘並沒有多大進步。所以，當論及柏拉圖理想國時他說：要有一片象巴比倫平原那樣極大極豐沃的土地，纔可以養活五千懶惰人（當時認為衛護那理想國所必要的戰士）及其妻僕。

人類好勝的心理，多以統治下等人為榮，而以俯就下等人為恥。所以，如果法律允許，工作的性質也允許，那在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他一定願意選用奴隸。蔗糖與菸草的栽種，能夠提供使用奴隸耕作的費用；穀物的耕種，現在似乎還不能夠辦到這一點。主要產物為穀物的英國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來操作。本雪文尼亞人最近議決釋放黑奴。那種事實，使我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

奴隸是他們財產的大部分，他們決不會贊成釋放。但以蔗糖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隸擔任；以菸草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隸擔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種甘蔗的利潤特別大，在歐美兩洲，簡直沒有什麼耕種事業比得上。栽種菸草的利潤，雖比不上栽種甘蔗，但與栽種穀物比較，卻仍然較大。這兩種耕種事業都能提供奴隸耕作的費用，但栽種甘蔗，比栽種菸草更能提供這種費用。所以，與白種人數相比，黑奴的數目，在甘蔗區域，比在菸草區域大得多。

繼古代奴隸耕作者之後，逐漸出現了法蘭西今日稱作對分佃農的一種農民。這種農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隸農），在英格蘭，這制度早已廢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現在不知道他們叫作什麼。在這制度下，種子、牲畜、農具，總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資本，都由地主供給。農民離去或被逐去時，這種資本就須歸還地主。出產物在留出被認為保持原資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後，其餘就由地主與農人均分。

在對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費用，嚴格地說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隸耕作制下沒有差別。但其中，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對分佃耕制下的傭農，是自由人，他們能夠佔得財產，可以享有土地生產物的一定比例。生產總額愈大，他所佔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們的利益，顯然在於能夠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反之，一個沒有佔得財產希望只能維持自己生活的奴隸，就會圖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產物多於自身所需。也許就是部分因為對分佃耕制對地主有利，部分因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勵農效反抗他們的權力，終而使大家都覺得奴隸耕作制不利，於是大部分歐洲的奴隸耕作制度逐漸消滅。這樣一次大的變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怎樣發生的，在近代歷史中，是最難稽考的事件之一。羅馬教會，常自誇其廢除奴隸的功績。當然，我們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紀亞歷山大三世時代，羅馬教皇就發出了普通釋放奴隸的訓諭。但這訓諭，似乎不過是個諄諄的勸諭，不遵守訓諭的人，並不受處罰。奴隸制度依然保持了數百年。最後，因為上述那兩種利害關係（他主的利害與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來，才逐漸把它廢除。一個已被釋放，又許繼續保用土地，

但自己沒有資本的賤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資本，纔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爲法蘭西今日所稱的對分佃農不可。

不過，在對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費分文，而享受土地生產物的一半，留歸對分佃農享有的自屬不多。在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節省的更是有限。對分佃農決不願用這有限的節餘來改良土地。教會什一稅，不過抽去生產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極大的障礙。抽去生產物的半數，一定會切實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給的資本，從土地儘量取得最大量的生產物，固然是對分佃農所願望，但若以自有資本與地主資本混合，卻決非對分佃農所願的。在法蘭西，據說，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對分佃農耕作。地主常常指摘農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來拖車。因爲，拖車的利潤，全部歸於農民，耕田的利潤，卻須與地主平分。在蘇格蘭的某些地方也殘留着這種佃農，叫作由地主借給種子農具的佃戶。大貴族吉爾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說，英格蘭古代的佃農，與其稱爲農戶，無寧稱爲地主的屬役。這種佃農，大概與此屬於同一種類。

慢慢地繼對分佃農而起的農民，可以說是真正的農民。他們耕田的資本是自己的，但要對地主繳納一定數額的地租。這種農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們有時覺得，投下一部分資本改良土地，對自己有益。他們希望，在租期未滿以前，投下的資本可以收回，並提供很大的利潤。不過，就連這種農民的借地權，也有一個長時期是極不可靠的。今日歐洲有許多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土地換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滿，可把農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蘭，甚至得依虛構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違法的暴力手段驅逐農民，農民所能憑藉以取獲賠償的訴訟章程，是極不完善的。農民並不一定能恢復佔有原來的土地，他們通常只能獲得損失的賠償，而且所償決不能等於所損。在歐洲，英格蘭也許是頂尊重耕農的一個國家。但那裏，亦遲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訴訟法。規定改佃時，佃農得要求賠償損失，並得要求恢復借地權。此種要求，不必由一次審問而審結。這個訴訟法，施行極其有效，所以，近來，地主若要爲佔有土地而起訴，他常常不用地主名義，按權利令狀起訴，而常常用他的佃農名義，按退佃合狀起訴。以此之故，在英格蘭，佃戶的安全等於地主了。此外，英格蘭又規定，每年納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終身租地權就

是終身保有的不動產，有選舉國會議員的權利，耕農既大部分有這種終身不動產，所以政治上的勢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輕視他們。我相信，歐洲除了英格蘭，沒有一個地方的佃農，未立租地權約，便出資財建築倉廩，不怕為地主所奪的。這種十分有利於農民的法律風俗，所起的促進現代英格蘭偉大光榮的作用，也許比為商業而定立的所有各種誇大條例所起的作用還要大得多。

保障最長租期使不為各種承繼人所妨害的法律，據我所知，乃英國所特有。早在1449年，這種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傳到蘇格蘭去。但當時，限嗣繼承的財產的承繼人，往往不許從一年以上的期間出租田地，所以，這法律的澤潤未能儘量廣佈。最近，國會雖立法補救，但這些束縛仍太嚴厲。此外，在蘇格蘭，租地人又因沒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所以不象英格蘭加農那樣，受到地主那麼大的重視。

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雖亦保障佃農權利，使不受土地承繼人和購買人的損害，但這種權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蘭西初定租期為九年，近來才延長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勵佃農進行各種最重要的改良。我們知道，歐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為他們所設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們認為，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應以土地長期出租，使得他們長期間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價值。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淺。他們不會想到這種規定，一定會妨害改良，結果，一定會妨害他們自己的真實利益。

古代，農民對於地主，除了納租，還須提供各種勞役。那種勞役，既不明定於租約內，又不受任何規定支配，只要莊主諸侯需要，就得隨命隨到。這種全無規定的勞役，使佃農不知受了多少痛苦。蘇格蘭晚近把一切全無規定的勞役廢止，不到幾年，國內農民的境況就改善了許多。

農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復同樣橫暴。公路的建築修補（這種勞役，我相信，各處尚未廢除，但橫暴的程度不等），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在王軍或王官過境時，當地農民，又有提供車馬糧食的義務，那雖有代價，但代價定於食物徵發官。我相信，在歐洲各君主國中，只英國一國，完全消除了食物徵發的壓迫。在法國和德國，那都未曾消除。

農民所負擔的勞役義務，既如上述。農民所負擔的納稅義務，其不規則和橫暴的程度也和勞役義務不相上下。古代貴族，雖不願在金錢方面給君主以任何幫助，但毫不躊躇地聽任君主對佃農徵收貢稅。他們沒有看出，這種苛稅終必嚴重地影響他們自身的收入。法國今天仍有貢稅，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稅的一例。貢稅是加於假定的農民的利潤的一種稅，它是根據農民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估定的。所以，農民為自身利益計，儘可能裝窮，結果，他耕作所用的資本必減至儘可能少的程度。至於改良土地的資本，那就以減少到零為宜。即使法國農民手中積蓄了一點資本，亦將因有貢稅，不願投到土地上來。貢稅事實上幾乎等於禁止農民把積蓄投資於土地。此外，此種賦稅被認為會抑低任何要完納它的人的身分，使不僅不能與鄉紳平行，且不能與市民並列。而誰租借別人的土地，誰就要完納這種稅。紳士，甚至有產的市民，都不願受這種恥辱。所以，施行這種賦稅的結果，不僅使從土地方面蓄積起來的資本不用來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資本都不用來改良土地。英格蘭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稅和十五分之一稅，就它們對土地的影響說，似乎是和貢稅同一性質的稅。

在這一切害農政策之下，要耕者來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這一階級的人民，儘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卻處於大不利的地位。農民與地主比較，猶如借錢經商者與有資親自經商者相比。固然，無論是藉資經商，或是有資親自經商，只要他們的行為一樣慎重，他們的資財就都可以增進，但因借錢經商者的利潤有一大部分歸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錢經商者的資財的增進，定要遲緩得多。同樣，與地主比較，即使行為一樣慎重，佃農耕地的改良，亦要遲緩得多；因為，在農民的場合，生產物的大部分須歸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場合，這一部分卻仍可用來作進一步的改良。此外，農民的地位，當然比地主低。不僅如此，歐洲有大部分地方，把農民看作下等人民，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師。至於農民地位被看得低於大商人和大製造商，那是全歐洲各地普遍的情況了。世上有幾個大財主願捨棄高的地位而與下等階級的人民為伍呢，所以，即在現今，歐洲人的資本，仍很少會由他業轉到農業上來改良土地。也許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英國資本轉到農業方面來改良土地的，比較多些。但即在英國，在若干地方用於農業上的大資本，大都是在農業上獲得的（和一切其他職業比較，農業上資財的蓄積，最為遲緩）。不

過，我們應該知道，在所有國家裏，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農、大農。在歐洲君主國中，英格蘭也許格外有這種情形。據說，在荷蘭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爾尼共和政府中，農民的地位，亦不亞於英格蘭農民。

除上述外，歐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於土地的改良與墾作的地方，不論進行改良和墾作的人是地主還是農民。（一）到處都規定，未經特許，穀物輸出一律禁止；（二）限制穀物甚至各種農產物的內地貿易，實行禁壟斷禁零售禁屯積種種謬法，確立集市市場的特權。我說過，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為世界最大帝國的中心地，然其農耕的進展，亦不免因禁止穀物輸出和獎勵外谷輸入而受到許多阻礙。至於土地沒有那樣肥沃，位置沒有那樣有利的國家，其耕作事業會因限制穀物的內地貿易和禁止穀物輸出而受到何種程度的阻礙，就難於想象了。

第三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

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居民的境況，並不比農村居民好。不過，那時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臘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內的居民大不相同。在這等古代共和國內，地主佔居民中的多數，他們分佔公地，都覺得房屋毗連，環以圍牆，便於共同防禦。但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主大都散居於各自領地的城寨內，住在各自的佃農及屬民中間。市鎮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們的處境無異於隸役，或近似於隸役。古時各憲章所賦與歐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權利，充分證明了他們在未取得這些權利以前的生活情況。這些憲章，准許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領主許可；第二，在他死後，他的財物，可由兒孫承繼，不由領主領取；第三，自身遺產，可由遺囑處分。這種權利的頒給，充分證明了在未頒給前，他們是和農村耕作者幾乎一樣，或竟全然一樣，處於賤奴狀態。

這些人，無疑是很貧困很下賤的，他們肩挑着貨物，過市赴墟，從這裏跑到那裏，與今日拉車荷擔的小販相類似。那時歐洲各國，象現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一樣，經常在這些旅行者經過某些采邑，經過某些橋樑，赴市趁墟，設攤售貨的時候，把賦稅加在他們的人身與貨物上。在英格蘭，這些稅，叫做過界稅、過橋機、落地稅、攤稅。有的時候，國王以及在某些場合擁有這項權力的大領主，特許某些商人，

特別是住在他們領地內的商人，免納各稅。因此，這些商人的地位，雖在其他各點與隸役無異或極相類似，但仍被稱為自由商人。不過，他們為報答保護者的保護，通常每年須納人頭稅若干。當時非付厚酬，保護不易獲得。所以，這類人頭稅可看作他們對保護者捨棄其他稅收所提供的補償。這種交換條件的實行，當初只限於個人，其期限或限於其人之身，或憑保護者的好惡。英國土地清丈冊關於幾個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記載，常常提及某某市民為這種保護各納人頭稅若干給國王或大領主。有時，它又只記錄這些人所納的稅的總和。

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制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徵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徵，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

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着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稅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着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着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佈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藉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欺凌，不稍寬恕。市民當然嫉恨領主，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亦畏懼領主，嫉恨領主。另一方面，國王雖亦鄙視市民，但他沒有嫉恨他們、畏懼他們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關係，使國王市民互結同盟，以抗領主。市民是國王敵人的敵人，所以，國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盡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變為穩固，不依靠這種敵人。給予市民權力，使能推舉市長，制訂市法規，建築城堡自衛，進行軍事訓練，國王就這樣盡他權力之所及，把一切獨立安全的手段給與市民，使他們不依靠領主。但要使他們的自由同盟能對他們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對國王提供相當大的援助，則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組織不可，非有強制居民服從的權威不可。至於把市稅永久包給他們，則是為了表

明心跡，使他願結為朋友、結為同盟的人，不疑懼他將來會再壓迫他們，會把稅額提高或把稅包給別人。

對領主感情最壞的國王，對於市民，敕賜往往最為寬大。例如英格蘭國王約翰，對市民最為寬容。法蘭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統率領主的權力。至其末年，據神父丹尼爾說，其子路易，即後來稱為肥路易的，與國內各主教，籌商最適當的方法，以取締領主暴行。主教們的意見，可歸納為兩種提議。一，在國王領土內，各大城市都設市長和市議會，以創設新的管轄體系。二，使城市居民，組織新的民軍，聽市長調遣，在必要時，出發援助國王。據法蘭西各考古學家說，法蘭西市長制度和市議會制度，就是這時創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蘇阿比亞王統治下，纔得到這種種特權；有名的漢薩同盟，也是在這時纔開始露頭角。

都市民軍的力量，此時既不下於鄉村民軍，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與當地領主爭議時，他們常佔優勢。意大利、瑞士等地，各個都市或由於離首府所在地很遠，或由於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於其他原故，君主對它們已全無權力，它們大都逐漸成為獨立的民主社會，並征服當地貴族，迫令其拆毀鄉間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資格居住在都市內。伯爾尼民主國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簡史，類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意大利屢起屢滅的無數大民主國的歷史亦復如此。

英法二國王權雖有時甚為式微，但從未全部消滅。都市因此沒有完全獨立的機會。但因市民勢力日張，除上游的市稅以外，國王一切賦稅，須得市民同意，才徵收得到。國王有急需，就通詔全國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國會。這些代表可與牧師和貴族一起議決，給與國王特別經濟援助。由於市民代表，大都袒護國王，國王有時利用他們從抵抗議會內大領主的權力。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歐洲各大君主國的國會的由來。

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就在這種狀態下，在各都市確立了。但此時，鄉村耕作者，依然受貴族的各種迫害。處於無力自衛狀態的人，自然滿足於僅夠過活的生活資料；因為，擁有更多財富，只會招惹壓迫者更苛虐的誅求。反之，當人們勤勞的結果確有親自享受的把握時，他們就自然會努力來改善他們自身的境遇，不僅要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娛樂品。所以，以生產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東西為目的的產業，在都市建立的時期，比在農村早得多。在賤奴狀態下受領主鉗制的貧窮農民，稍有儲蓄，必掩藏唯謹，免得領主看見，攬為己有，而且一有機會，即逃往都市。加之，當時法律對市民既如此寬縱，同時又如此熱望削減領主對農民的權力，所以，農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為領主所獲，即可永享自由。因此，鄉村勤勞居民，一有蓄積，自然會逃到都市來，把都市看作他們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產業手段，歸根到底，都出自農村。但近海岸沿河邊的城市居民，卻不一定只從鄰近農村得到這些物品。他們有大得多的範圍。他們或只自身工業的製造品作交換，或經營遙遠國家間的運送業，以甲國產物交換乙國產物，而從遠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物品。一個城市不但在其鄰近各農村都很貧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與通商的各個農村也都很貧乏很衰落的情況下，仍可發達起來，日臻於富強。因為單個地說，每個農村對它所能提供的食料與僱傭機會也許有限，但綜合起來說，它們所能提供的卻極可觀。不過，在商業範圍還極狹隘的那時，就有些國家很富裕、產業就很發達了。例如，未曾滅亡時的希臘帝國，亞巴西德統治下的撒拉遜人的帝國，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巴伯裏海岸某地，以及摩爾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在歐洲，最早由商業致大富的，似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當時居於世界的文明部分和進步部分的中心。十字軍雖然破壞了許多資財，傷害了許多居民，妨礙了歐洲大部分地方的進步，但卻非常有利於意大利若干城市的發展。為爭奪聖地從各地出發的大軍，對於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各市的航海業，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十字軍有時由這些地方的船隻運送，其糧食則常由它們供給。它們簡直可以說是大軍的輜重隊。使歐洲其他各國遭受極大破壞的十字軍，卻成為這些民主國富裕的泉源。

商業城市的居民往往以製造品和奢侈品運往富國，只滿足大富翁的虛榮心，大富翁亦極願以大量本國土產物來交換。因此，當時大部分歐洲商業，主要都是以本國土產物交換較文明國的製造品。英格蘭

的羊毛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及弗蘭德的精製呢絨交換；波蘭的穀物亦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白蘭地酒及法蘭西意大利的絲絨交換。

這樣，對精良製造品的嗜好，就通過國外貿易超漸普及到未有精製造業的國家。但此種嗜好，一經普及於國內，便引起很大的需要，商人為免去運輸費起見，自然會想到在本國建立同種製造業。這就是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各地為遠地銷售而建立的製造業的由來。

但我們必需注意，世界上從未存在過而且也決不能存在完全沒有製造業的大國，我說的大國沒有製造業，所指的只是精良進步的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各大國大部分居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傢俱，都是本國產業的產物。此種情形，在普通所謂無製造業的貧國，尤為常見，而在普通所謂製造業發達的富國，反而不常見。與貧國比較，富國下等階級人民日用的衣服傢俱，反有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國的產物。

各國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其發生的情況有兩種。

第一種是國內商人和企業家象上面所說，有時因要仿效外國某種製造業，而勇往直前地（如果可這樣說），把資本投下來經營的。象這樣發生的製造業乃是國外通商的結果。十三世紀盛行於路卡地方的綢製造業、絨製造業、緞製造業，即如此發生。此等製造業，後為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拉卡尼的暴令所驅逐。1310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卡；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議在那裏開辦綢業。當地官吏准許，並給以多種特權。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創設綢業。開始的時候，即僱有工人三百。伊麗莎白時代才傳入英格蘭而在古代即已盛行於弗蘭德之呢絨業，現在里昂及斯皮塔菲爾的綢業，似乎也是這樣發生的。這樣發生的製造業，因為是仿效外國，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國材料。當威尼斯初有製造業時，一切材料，都從西西里及利文運來。更久以前的路卡製造業，其所用的材料亦產在外國。桑樹的培植，蠶蟲的飼養，在十六世紀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還不大知道。種桑養蠶的技術，在查理九世時代，才傳入法國。弗蘭德製造業所用的羊毛，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英格蘭。西班牙羊毛，雖然不是英格蘭毛織物最初採用的材料，卻是適於遠地銷售的毛織業最初所採用的材料。現時里昂製造業所用的絲，亦大半是外國產；而且，在它初建時，就全部或幾乎全部是外國產。斯皮塔菲爾製造業所用的材料，

大概一向全部都不是英國產物。象這樣的製造業，大部分是因少數人的計謀而創辦的，所以設立的地址，有時是濱海的都市，有時是內陸的都市，視這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和主意而定。

有時，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逐漸改良而成的。我們說過，即最貧陋的國家，亦常有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由這種製造業逐漸改良而生的製造業，大都使用本國出產的材料；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離海岸很遠有時甚至離可通航運的水路亦很遠的內地加工的。土壤肥沃的內地，耕作容易，所產物品，除了維持耕者生活所需外，還有很多剩餘。這種剩餘，因陸運費太貴，航運不便，不易運往外地。因此，出產的豐饒，使糧食低廉，從而鼓勵工人住在那裏。他們覺得，在那裏勞動化在其他地方可獲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們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產的，他們把材料加工後，即以製成品，或者說，以製成品的價格，換得更多的材料和糧食。他們節省了由內地到沿河沿海各地或遙遠市場的運輸費，從而給剩餘部分原生產物，增加了一個新的價值。這樣，耕者可以比從前更為簡易的條件，從這班工人手裏取得對他們有用或者使他們滿意的物品。對於剩餘部分農產物，耕者可取得更高的價格；他們所需要的其他便利品，又可以較低價格買得。這鼓勵農民並使農民有能力進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餘的廣量。土地肥沃，使製造業誕生，而製造業的發展，又轉過來增進土地的出產力。製造業最初僅供應本地；後來，作品精緻改良了，便能供應遠地的市場。因為，原生產物甚至粗製造品很難擔負由陸運運往遠地的費用，而精製造品卻不會成到這種困難。精製造品，在小容積中，常包含大量原生產物的價格。例如，一匹精製呢絨，雖僅重八十磅，但所含價格，卻不僅是八十磅羊毛的價格，而且，有時，還包含着幾千磅穀物，即各種工人及其直接僱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這種穀物，如果以穀物的原形運往海外，定然是極困難的。但若以精製品的形態運往，則雖運往最遠的角落亦很容易。利斯、赫利法克、設菲爾德、伯明翰、沃弗漢普頓等地的製造業，就是按照這個方式，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的。這種製造業是農業的結果。其推廣與改進，在歐洲現代史上，一般遲於那些由對外貿易促成的製造業。在現在在上述各地很繁榮的那些製造業適於外銷以前一百多年，英格蘭就以其用西班牙羊毛為原料的精製呢絨業著名於世了。前一類製造業是隨着農業的發展而

推廣、改進的，而農業的推廣與改進，又是國外貿易和直接由此而產生的製造業的最後和最大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說明。

第四章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有所貢獻，其貢獻的途徑有三。

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易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的開發與進一步的改進。受到這利益的，不僅僅是都市所在的農村。凡與都市通商的農村，都多少受其實惠。它們為此等農村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提供了市場，結果就鼓勵了其產業和產業的改進。當然，靠近都市的農村，所得實惠，自必最大。其原生產物的運輸，所費既較省，所以，與較遠農村的產物比較，商人們即使付給生產者較高的買價，但對於消費者，取價卻仍可一樣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獲的財富，常用以購買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開墾的土地。商人們都渴望變成鄉紳。而且，在他們變成了鄉紳的時候，他們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與鄉紳不同。鄉紳是一向奢侈慣了的，他只會花錢，從來不會想到賺錢。商人卻常用錢來經營有利事業，他用一個錢，就希望在這一個錢回來的時候，帶回一些利潤。他們這種不同的習慣，必然會影響他們在一切事業上的性情和脾氣。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業家，鄉紳往往是膽怯的事業家。就商人說，如果他覺得投下大資本來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費用的比例增大它的價值，他就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但鄉紳很少有資本，即使有些資本，也很少敢如此來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進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資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餘。設你幸而住在四周農村多未開墾的商業都市中，你當能看到商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比鄉紳是活躍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經商而養成的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也使他更適合於進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獲利。

三，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但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這一種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卻不為世人所注意。據我所知，曾注意此點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謨先生。

在既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餘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於鄉村式的款客。這剩餘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羣的婢僕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象兵士服從國王一樣。在歐洲工商業尚未擴張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領主，其待客的闊綽，都超過我們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廳，為威廉·魯弗斯的飯廳，然而常有人滿之患。托馬斯·伯克特常以清潔的草蓆，鋪於廳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們嶄新的衣裳。據說，瓦維克大公每日在各莊園所款待的賓客，達三萬人；此或言過其實，但數目必很大，否則不會被誇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知道，不多幾年前，蘇格蘭高地一帶，仍盛行近似這種規模的款客，而在工商業很不發達的民族，這種風氣，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說：“我曾見一阿拉伯酋長，在他售賣牲畜的市中，當街宴請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於他的婢僕。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數年前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足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納地租，僅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現在該處的貨幣，與他處比較，也並不能購買更多的商品。其實，在一個大莊園所產的剩餘產物必須在本莊園內消費的農村，為地主便利打算，與其在家中消費這全部剩餘，不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消費其一部分，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僕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佔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於領主，無異於婢僕、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裏養佃農，與在自己家裏養婢僕、家奴，無甚區別。婢僕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於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於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

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禦共同敵人，纔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國王要依靠自己的權力，強制某大領主領地內人民償還小小的債務，那裏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國王所要花的力量，幾乎將等於消滅一個內戰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說這種地方性裁判權起源於封建法律，實是一個錯誤。不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權，在歐洲尚不知有所謂封建法律以前數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領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權、鑄幣權、制定地方行政法規權，也已在這時候掌握在大領主手中了。英格蘭被征服前的薩克遜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並不下於被征服後諾爾曼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但我們不可設想，直到被征服以後，封建法律才成為英格蘭習慣法。在法蘭西，領主統治僅、裁判權的發生先於封建法律的發生，尤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種權力，無疑會隨着上述各種財產制度與風習而產生。且不講古代英法兩王國吧，我們就在晚得多的時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種結果必隨這種種原因而發生。不到三十年前，蘇格蘭洛赫巴地方，有個叫做克默倫的紳士，不是貴族領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佃農，不過是亞蓋爾公爵的一個家臣罷了。他既沒有獲得正式的委任狀，又不是治安推事，卻對其民衆執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權。據說，他的審判裁判，雖無司法儀式，卻很公正。也許在當時當地的情形下，他為維持公共治安計，不得不出面承攬這權力。這位紳士，每年得租不過五百鎊，1745年率領八百人蔘加了斯托亞的起義。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決不是想擴大封建領主的權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們的權力縮小。自國王以下，直到最下級的領主，都由封建法律妥為制定等階，各有各的職守和義務。在領主未成年時，該領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歸其直接上司領受，土地管理權亦歸其直接上司掌握。結果，各大領主未成年時，他們土地的地租和對土地的管理權也都歸於國王。國王對於這種未成年的領主，盡保護教育的責任，並

以監護人的資格，爲之婚娶，不過選擇的對象，要身分相稱。但是，這種法律，雖本意要加強國王的權力，削弱大領主的權力，但仍不能使鄉村居民得有安寧的秩序良好的政府，因爲它不能徹底改變紛亂狀態所由而起的財產制度與風習。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憑一切強制力量所辦不到的事，卻由國外商業和製造業潛移默化，逐漸實現。國外商業與製造業的興起，漸使大領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餘產物與他物交換。由此而得的物品，於是無須與佃農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費。完全爲自己不爲他人，這似乎是一切時代爲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們一發現了由自己來消費所收地租的全部價值的方法之後，他們就不願再和別人共同享受這價值。他們就寧願把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或其價格，用來換取一對金鋼石鈕釦或其他同樣無用而無意義的東西，隨而也把這糧食所能給他們帶來的權威一併捨棄了。但金鋼石鈕釦是由他自己獨享、無人與他共享的。至於以前的花費方法，他至少要與一千人共享。這區別是非常明顯的，要作出取捨的決定，有賴於明智的判斷。於是，爲了滿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虛榮心，他們終於完全捨棄了上述權威。

在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國家，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除了以這一萬鎊養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聽命以外，也許就沒有其他的消費方法。但在現在的歐洲，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不必直接養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喚無使喚價值的僕役十多人，卻可消費其全部收入。事實上，他通常也是這樣做。他間接維持的人，也許和往昔消費方法所僱用的一樣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換得的寶物量，也許很少，但爲採集製造這寶物而被僱用的工人，卻必然很多。這種寶物的昂貴價格，大都由於這些工人的工資及其直接僱主的利潤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寶物的價格，即間接支付這一切工資與利潤，從而間接維持了這些工人及其僱主的生活。不過，他對於他們各人的貢獻，卻只是他們全年生活費的極小部分。他們各人每年的生活費，來自他一個

人的，少數佔全部的十分之一，許多佔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則尚不及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他雖然對維持他們全體的生活有所貢獻，但他們全體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維持，所以，對於他，他們就多少是獨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地租維持佃農和門客的生活時，他們是各自維持各自的佃農和門客的生活。但在他們以地租維持商人工匠時，他們全體所能養活的人數也許和往昔一樣多，而且由於鄉村式的款客方法難免浪費，現在所能養的，也許比往昔還多。但是，分開計算，他們每個人對這較大人數中每個人的生活費所貢獻的往往極微。每個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費，都不是得自一個顧客，而是得自千百個不同的顧客。他在某程度上，雖要仰給於他們中每一個人，但不絕對仰賴他們中任何一個人。

大地主的個人消費，就在這情況下逐漸增大起來。因此，他所養活的門客，就非逐漸減少以至全部打發掉不可。由於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農，亦非逐漸打發不可。農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顧對裁減佃農的怨言，卻仍把佃農人數減少到按照當時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況耕作所需要有的最少人數。由於盡數打發了不必要的寄食者，由於逼着佃農繳出農田所能提供的全部價值，地主所得的剩餘，或者說剩餘的價格，逐漸增大了。這個較大的剩餘，商人和製造業者又給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來消費，象前此消費其餘部分一樣。個人消費增大這個因素，又驅使地主們渴望所得地租，能超過現在改良狀態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數額。但這樣土地就要進一步改良，佃農就要增加費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夠長，不足以使他收回這增加的費用及其利潤，他決不會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長租期。地主們愛好浮華，要擴大用度，終於承認佃農的條件。這就是長期租地權的起因。

可隨意退租的佃農，耕作土地，給付十足的代價，他並非完全隸屬於地主。他們彼此所得的金錢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不會犧牲生命與財產來為地主服務，而在租期延長後，他就簡直是獨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約或習慣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點其他事情。

佃農既已獨立，門客又已打發掉，大領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執行，不能再擾亂地方的治安了。他們那與生俱存的權利已經賣

掉，然而，出賣的目的，不是象伊騷那樣爲了飢餓，爲了必需，卻僅僅爲了耳目玩好，僅僅爲了爲兒童所玩樂而非成人所應追求的寶石鑽戒。因此，他們就象城市中的殷實市民或商人一樣平庸了。於是，在城市，在鄉村，都設立了正常的政府。沒有誰能擾亂都市的政治，也沒有誰能擾亂鄉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與本題無關，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產，由父傳子，子傳孫，傳至許多世代的世家，在商業國，是極罕見的。反之，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如威爾斯，如蘇格蘭高地，則極普通。阿拉伯歷史，充滿着貴族的世系；有一位韃靼可汗，著了一部歷史，曾經譯成幾種歐洲文字，其中，就全是關於貴族的世系。這可證明，古世家在這些國家是極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於養活儘量多的人的國家裏，富人的用度很少過分，他的仁愛心似乎難得熱烈得使他企圖養活超過他所能養活的人數。但在收入的最大部分歸個人消費時，他的用度就往往極無限制；因爲他的個人虛榮心，是無限制的、永遠滿足不了的。所以，在商業國，即使有極嚴厲的法規取締揮霍浪費，長期富裕的家庭仍屬罕見。但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即使沒有法規取締，亦多長富之家。象韃靼和阿拉伯那樣的遊牧民族，財產不易消費，取締浪費的法規，亦無設立的可能。

對於公衆幸福，這真是一種極重要的革命，但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衆幸福的階級。滿足最幼稚的虛榮心，是大領主的唯一動機。至於商人工匠，雖不象那樣可笑，但他們也只爲一己的利益行事。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可賺錢的地方去賺一個錢。大領主的癡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於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於這次革命，卻既不瞭解，亦未預見。

因此，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業是農村改良與開發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

但是，這種發展，既與自然趨勢相反，當然是遲緩和不確定的。試一比較以工商業爲國富基礎的歐洲各國的緩慢進步，與以農業爲國富基礎的我國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進步吧。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數目，在將近五百年中，未增加一倍。我國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卻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歐洲，長男承繼法和各種永久所有權，使大地產不能分割，因而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們知道，小地

主對其有限土地十分熟悉，愛護備至。他不但喜歡開發它，而且喜歡改良它。他在各種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聰明、最常成功的了。加之，長男承繼法和永久所有權，又使許多土地不能出賣，常使購買土地的資本多於待售的土地，從而使土地常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買價的利息，至於修補費，及其他各種意外費用，更不用說。所以，購買土地，在歐洲，是小資本利潤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經營工商業了的人，為圖安全起見，亦有時願把小資本用來購買土地。還有些從別個來源取得收入的專門職業家，亦常因要保儲蓄的安全，喜投資購買土地。但是，一個青年，如果不願從事工商業，而用二三千鎊資本購買一小塊土地來開發，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圖成為大富翁、大名人，就絕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資本用於別的用途，他就可望發大財或享大名，和別人一樣。而且，這樣的青年人，雖不希望成為地主，但大都不願為農民。這樣，任人購買的土地既少，土地的賣價又高，結果，使許多原來可能用於改良土地開發土地的資本都不投到這方面來。反之，在北美洲，則有五六十鎊的資本，便足夠用來開辦一個農場。那裏，未開墾土地的購買與開發，既為最大資本最有利的用途，亦為最小資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樣的地方，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裏的土地，幾乎可全無代價取得，即使須出代價，亦比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少得多。這種事在歐洲是絕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為私有財產的任何國家都是不會有的。可是，當一個大家庭的家主死時，所遺土地財產若能平均分配於各個兒女，則所遺地產，大都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會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這樣將漸足抵付買地地價的利息；以小額資本購買土地，亦將和其他用途同樣有利。

英格蘭，因土壤天然肥沃，因海岸線與全國面積相比甚長，又因有許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貫其間，使內陸各地，能有水運之便，所以，與歐洲任何大國比較，都一樣宜於國外通商，一樣宜於經營遠地銷售的製造業，一樣宜於上述情況所能引起的種種改良。此外，自伊麗莎白即位以來，英國立法，都特別注意工商業的利益；事實上，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即荷蘭亦不例外，其法律一般地說，能這樣有利於此種產業。所以，英國工商業就在這整個時期內不斷地向前發展起來。無疑，農村的開發與改良，亦不斷地在進步；但其進步，似較遲

緩，不如工商業的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許在伊麗莎白時代以前就耕種了，可是還有很大部分，仍全未耕種，至於已耕種的土地，其耕作狀況，大部分亦未盡滿人意。不過，英格蘭的法律，不僅由保護商業而間接鼓勵農業，且有若干對農業直接加以獎勵。除歉收年度外，穀物輸出，不僅自由，且有獎金。在收穫一般的年度，外谷輸入，又有等於禁止輸入的關稅。除了來自愛爾蘭的以外，活牲畜的輸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許從愛爾蘭輸入亦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在兩種最重要的土地生產物即麪包與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實享有一種獨佔，他人無從染指。這種獎勵，雖象我後面指出的那樣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國立法當局，實有贊助農業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蘭法律對於國內農民曾竭盡所能使其安定獨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長男承繼法尚未消滅，什一稅繼續徵收，與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權有時仍然有效的國家中，英格蘭總算是最鼓勵農業的國家了。但英格蘭農業的情況，仍是如此。設使農業除了由於商業進步而間接得到鼓勵以外，沒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勵，政府袖手旁觀，聽任農民的處境停留於與歐洲其他各國相同的狀態，那末，農業將呈現何種情況呢。伊麗莎白即位迄今已二百餘年了。這悠長的期間，是人類繁榮階段通常所能持續的最久期間。

在英格蘭成為大商業國以前大約一百年，法蘭西的對外貿易很可觀。照當時人的設想，似在查理第八遠征那不勒斯以前，法國的航海業就已很可觀。但就全體說，法蘭西土地的耕作與改良，遜於英格蘭。法國法律從未給予農業以直接的獎勵。

西班牙與葡萄牙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雖多由外國船舶裝運，但很可觀。西班牙葡萄牙對他們殖民地的國外貿易，由本國船裝運，這貿易因殖民地富饒廣大，尤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國外貿易，並不曾在這兩國內引起任何重大的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甚至，這兩國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開墾。就國外貿易說，在歐洲各大國中，除意大利外，葡萄牙歷史最久。

由於國外貿易及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而使全國土地全部得到開發與改良的國家，在歐洲，似乎只有一個意大利。據古西亞迪尼說，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農村已經耕種，而且最多山最荒蕪的地區也同樣已經耕種。這個國家所處的相當有利的

地位，以及在這個國家裏存在的大量獨立小邦，對於上述土地的全面開墾或不無貢獻。然而，這位賢明的近代歷史家雖這樣說，但那時意大利的土地墾作，不及今日的英格蘭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通過工商業而獲得的資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與改良事業上得到保障和實現，總是極不確定的財產。說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公民，這句話真是不錯。究竟在何處營業的問題，在他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他們對甲國成到一種厭惡，那怕頂微小，亦可使他把資本從甲國遷到乙國。跟着資本的遷移，資本所維持的產業，亦必移動。在資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為建築物，成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資本決不能說屬於某一國。據說汗薩同盟大部分都市都擁有大財富，這財富如今到哪裏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紀、十四世紀模糊的歷史中外，廈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甚至它們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麼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稱究竟屬於歐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確定。但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意大利所遭的災禍，雖然使倫巴迪亞和托斯卡納所屬各城市的工商業大為衰落，但這些地方，至今仍為歐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弗蘭德在內戰後又受西班牙的統治，這些雖然延去了安特衛普·根特、布魯哲斯的大商業，但弗蘭德至今仍為歐洲財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進步的地方。戰爭與政治上的一般變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業為唯一來源的富源趨於耗竭。通過比較可靠的農業改良而產生的富源就比較持久得多，除了由於敵對蠻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續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較激烈的大變動，如羅馬帝國崩潰前後西歐的大變動外，其他事件都破壞不了。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

第一章論財富的自然的發展

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與農村居民通商。這種商業，有的是以原生產物與製造品直接交換，有的是以貨幣或紙幣作媒介交換。農村以生活資料及製造材料供給都市，都市則以一部分製造品供給農村居民。不再生產亦不能再生產生活資料的都市，其全部財富和全部生活資料都可說是得自農村。但我們不要根據這點，就說都市的利得即是農村的損失。他們有相互的利害關係。這裏，分工的結果，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對雙方從事各種職業的居民都有利益。農村居民，與其親自勞動來製造他們需要的製造品，無寧作這種交換，因為由這種交換，他們可用較小量的自身勞動生產物購得較大量的製造品。都市是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農民用不了的東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換他們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愈廣闊。這種市場愈廣闊，對廣大人民愈有利。在離都市一哩生產的穀物，與在離都市二十哩生產的穀物，在市上的售價都一樣。但後者所得的售價，一般地說，不但要補償其生產費用和上市費用，而且要對農業家提供農業的普通利潤。所以，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穀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的穀物的運費全部價值。此外，在他們購買的東西的買價上，他們還節省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試一比較都市附近各農村和遠離都市各農村的耕作事業，你就知道都市商業是怎樣有利於農村。就連所有宣傳貿易差額的各種謬說，也沒有一種敢妄說城鄉通商對城市或對鄉村有損的。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資料必先於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產前者的產業，亦必先於生產後者的產業。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村的耕種和改良，必先於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只剩餘產物維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餘，才談得上增設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資料，不一定要仰給於附近的農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給於國內的農村，而可以從遠方運來，所以，這雖然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卻使各時代各國家進步繁榮的過程，因而有所差異。

農村先於都市的事態，在大多數國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國家，又有人類天性促其實現。只要人爲制度不壓抑人類天性，則在境內土地尚未完全開墾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設，決不能超過農村的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多數人必寧願投資以改良土地開墾土地，不願投資於工業及國外貿易。投在土地上的資本，可受到投資人自身更直接的監察；與商人資本比較，他的財產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財產，不但常須冒狂風巨浪的危險，而且由於商人常須對風俗情況都不易熟習的遠郊的人貸給信用，還要冒人類的愚蠢與不正行爲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險。反之，地主的資本，卻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說是盡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鄉村風景的美麗，鄉村生活的愉快，鄉村心理的恬靜，以及鄉村所提供的獨立性，只要這獨立性不受到人爲的迫害的話，這些實具有吸引每一個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爲人的原始目標，所以，在有人類存在的一切階段，這個原始的職業將爲人類所永遠愛悅。

沒有工匠的幫助，農耕必大感不便，且會時作時輟。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犁匠、泥水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爲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爲不必要象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或小村落。後來，又有屠戶、酒家、麪包師，只及許多就供給臨時需要那一點說對他們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於是市鎮日益擴大起來。鄉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務的。市鎮是鄉民不斷前往把原生產物交換製造品的市集或市場。就是依着這種交換，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的供給。他們售給鄉村居民的製成品的數量，支配他們所購的材料及食料的數量。所以，他們的材料及食料的增加，只能按照鄉民對製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這種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發展。所以，設使人爲制度不擾亂事物的自然傾向，那就無論在什麼政治社會裏，都市財富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是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結果，而且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增長擴大。

在未曾墾殖、土地極易購得的我們北美殖民地，爲銷售於遠方而興辦的製造業，在任何市鎮都還不曾有過。在北美洲，當工匠獲得的

資本，超過他所經營的、以供給鄰近鄉村為職志的事業所需要的數額時，他不會想辦一家工廠來作銷售遠方的生意。他一般寧願用多餘的資財，來購買或改良未開墾的土地，由技工一變而為農業家。當地付給技工的高昂工資，對於技工所提供的舒暢生活，都不足以誘使他為他人工作，他總情願為自己工作。他覺得，技工是顧客的僕役，仰給生活於顧客；至於耕作自己的土地，從自己家庭的勞力取得衣食之資的農業家，則是真正的主人翁，獨立於世界。

反之，在土地全已開墾或不易購得的國家，技工所獲資本，如果已經不能全數投在鄰近地區隨時需要的事業上，其有餘部分，就會用來擴張營業，準備銷售遠方。鍛工將建立鐵廠，織工將建立麻織廠毛織廠。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各種製造業，將慢慢地進行精密的分工，用各種方法加以改進。這是大家容易想得到的，用不着細選。

在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的條件下，人們選擇投資途徑時，在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業兩者中，自寧願選擇製造業，其原因正如在農業與製造業中，寧願選擇農業一樣。與製造商的資本比較，地主或農業家的資本更為穩當。同樣地，與國外貿易的資本比較，製造商的資本更為穩當，因為隨時都在自己監察之下。誠然，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社會，剩餘原生產物及製造品，或者說，國內無人需要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都必須送往外國，以交換國內需要的其他物品。但輸運剩餘產物到外國去的資本，為本國所有，成為外國所有，卻是無關重要的。如果本國的資本，不夠我們同時耕作一切土地，並完完全全地製造一切原生產物，那末，由外國資本來輸運本國剩餘原生產物到外國去，亦對本國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賴有這種資本，本國的資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國、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證明了一種事實，即是，縱使本國輸出業，有大部分為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設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資本，即波有外國資本替它們輸出剩餘產物，它們的進步，會慢得多吧。

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程度上按照這種

順序投用。總得先開墾了一些土地然後才能成立很多城市；總得在城市裏先有了些粗糙的製造業，然後纔會有人願意投身於國外貿易。

這個自然的順序，雖然在所有進步的社會裏都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但就今日歐洲各國的情狀說，這個順序卻就許多方面說，似乎完全相反。它們的精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多由國外貿易引出。農業大改良，也是製造業和國外貿易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反自然的退化的順序，乃是風俗習慣迫成的。他們原來的統治的性質使他們的風俗習慣變成了這個模樣。後來，這種統治大大改變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卻仍沒有多大改變。

第二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侵擾羅馬帝國西部以來，歐洲起了一個大變革，跟着這個大變革發生的是，歐洲擾攘了好幾百年。野蠻民族對原居民的掠奪和迫害，中斷了城鄉間的貿易。城市都成了荒墟，鄉村亦無人耕作。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很富裕的西歐，一變而為極貧乏，極野蠻。在接連不斷的擾攘中，那些民族的頭子，佔有或篡奪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有人耕作的土地雖然不多，但要找一塊沒有所有主的土地，卻不可能。一切土地都被吞併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數大地主所吞併。

最初吞併荒地的危害雖很大，但有可能只不過是暫時的危害。這些土地本可通過繼承或分割，把它們拆小。但長男承繼法，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繼而拆小；限嗣繼承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割而拆小。

如果我們把土地看作只是謀生求樂的手段，和動產一樣，那末，按照自然承繼法，當然會把土地象動產一樣，分給家內所有的兒女。因為每一個兒女的生計，都為老父所同樣關心。羅馬人就是採行這種自然承繼法。他們不分別長幼，不分別男女，只要是自己養的，就可以承繼自己的土地。他們處分土地的方法，和我們現在處分動產的方法一樣。不過，當土地被看作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權力強弱所繫的時候，就被認為以不分割而專歸於一人比較適當。在那些不安靖的時候，大地主同時都是小貴族。他的佃戶，便是他的隸屬。他是他們的裁判官，是他們和平時節的立法者，亦是他們戰爭時節的領導人。他可任意進行戰爭，對鄰國作戰，有時對國王作戰。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地產是否安全，其中居民有無保障，都取決於它的大小。把一個

地產分拆，無異把它破壞，換言之，無異把它拆開來，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強鄰的侵蝕吞併。所以，適應着當時這種情況，在地產承繼方面，長男承繼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來。爲了同一理由，君主國通常亦由長男一人承繼。雖然最初並不總是如此。爲君主國的安全與權力計，國土寧可不加分裂、寧可在諸兒女中，選擇一個人來單獨承繼。但選擇誰呢，那樣重要的一件事，當然要鄭重規定一個普通規例，使選擇不按個人資質好壞這個不大可靠的區別，而按某種明白的、無可爭論的標準。在同一家庭的各兒女中，除了性別與年齡，再沒有其他無可爭論的區別了。根據一般經驗，男性比女性好，而在其他一切條件相等的場合，年長的比年幼的好。長男承繼權，就這樣成立了。而所謂直系繼承，亦就從此發生了。

一種法律在初成立時，都有環境上的需要，並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這種環境。但事實上，往往產生這法律的環境已發生變化，而這法律卻仍繼續有效。今日歐洲，僅領有一畝地的小地主，其安全已無異於擁有千萬畝地的大地主。產生長男承繼權的環境大變了，長男承繼僅卻依然存在。由於在各種制度中，這法律是最宜於保持貴族尊嚴的，所以，今後會再行幾百年也說不定。但事實上，除了這一點，長男承繼權也就沒有一點不違反大家庭的真實利益了。這權利，因爲要使一個兒子富裕，就使其他兒子陷於窮困。

限嗣繼承法是長男繼承法施行的自然結果。它的採行，旨在維護由長男繼承法導引出來的直系繼承，以及防止由於子孫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遺產在贈與、遺讓或割讓名義下旁落的危險。這種法律，羅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國有幾個法律家，雖然喜歡以今制附會羅馬古制，實則，羅馬人所謂預備繼承人預定法和囑託遺贈法，都與限嗣繼承法迥不相同。

在大土地財產仍爲諸侯領地時，限嗣繼承或許不是不合理的辦法。象一些所謂君主國的根本法律一樣，這個法律，可以使許許多多人不致因一人輕舉妄動而受災殃。但今日歐洲各國，大地產和小地產已同樣受國法保護，所以，這種法律就變得再荒唐不過了。這種法律的制定，根據一種根本錯誤的假定：即對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類的各代後裔，沒有同等的權利，當代人的所有權，要受限制於五百年前祖宗的心意。在今日的歐洲，實行限嗣繼承法的地方還很

不少。在貴族血統仍是享受民事或軍事榮譽的必要資格的地方，限嗣繼承法尤牢不可破。限嗣繼承法被貴族認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權所必要的手段。這一階級既奪得了一種超乎其同胞之上的不正當的利益，卻又擔心自己的貧乏會貽人譏笑，以為應當再享有另一種不正當的利益。據說，英國習慣法很厭惡世業世祿的制度，因而，和歐洲其他各君主國比較，世業世祿的制度在那裏比較受限制。雖然在英格蘭，世業世祿的制度也還未完全廢除。據說，現在蘇格蘭，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仍受着嚴格的限嗣繼承法的支配。

在這情況下，大面積的荒地不僅為少數豪族所兼併，而且永無再分散的可能。事實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產生這種制度的混亂時節，大地主的精力，幾乎全部用來保護已有的領土，擴大自身對鄰國的管轄權、支配權。他們實在沒有餘暇來開墾土地改良土地。後來和平了，法制的確立，秩序的安定，雖然使他們有餘暇，但他們一般沒有心思耕墾土地，並且常常沒有必要的才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費用，超過了或恰好相等於他的收入（這是極常有的現象），他就沒有資本，可以投在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個經濟家，那末，他又通常感覺，與其用一年的節省未改良舊的地產，不如用來購買新的地產比較合算。改良土地，象各種商業計劃一樣，要獲利潤，不斤斤注意小節省小贏利是絕對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人，即使天生是好儉樸的，亦不大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悅己的裝飾，而不注意自己沒有多大需要的利潤。他自幼就養成了飾衣裳、盛車馬、崇居室、麗陳設的嗜好。他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即在想改良土地時，這種習慣所涵養的心理仍會支配着他。他也許會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畝土地大大裝飾起來，花費比該地改良後所值大十倍的費用，終而發覺如果對他所有全部地產都照樣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無其他嗜好，恐怕也會在沒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盡他所有的財產。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自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以來，有些大地產，繼續在少數人手裏，至今沒有改動。把這些大地產與鄰近的小地產比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論證而相信大地產是怎樣不利於改良。

如果從這樣的大地主還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對土地的改良，那末從那些佔有的土地比他們少的人那裏，就更無這種希望了。在歐洲舊狀

態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農。他們全是或幾乎全是奴隸，不過他們的隸役，比古希臘羅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隸役和緩一些。他們與其說隸屬於主人，無寧說是隸屬於土地。因此，他們可以和土地一同出賣，但不能單獨出賣。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們還可以結婚。而且，主人沒有權利把他們夫婦，賣給不同的人，從而拆散他們的姻緣。主人殘害或殺害了奴隸，還要受處分，不過一般是小懲罰罷了。但是，奴隸不得蓄積財產。他們所獲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隨時取去。所以，奴隸所能進行的墾殖和改良，實際上都是由主人進行，由主人負擔費用的。種子、牲畜、農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得益，亦是主人的。這種奴隸，除了日常維持生活的東西，什麼也不能獲得。所以，在這場合，正當地說，土地仍是由地主佔有、由農奴耕作的。這種奴隸制度，在俄羅斯，在波蘭，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亞，在摩拉維亞，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現在還存在。這種制度逐漸全然廢除了的地方，不過歐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進行大改良，已是很難，那末，當他們使用奴隸耕作的時候，要他們進行大改良就更是無望了。我相信，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經驗，都證明了一件事，即：奴隸勞動雖表面上看來只需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但徹底通盤計算起來，其代價是任何勞動中最高的。一個不能獲得一點財產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麼也不關心。他的工作，夠他維持生活就行了，你要從他身上多榨出一些來，那只有出於強迫，他自己決不會願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麥拉的著作都說，古意大利的穀物耕種事業，在奴隸制度下非常衰微，對主人非常不利。耕種事業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古希臘並沒有多大進步。所以，當論及柏拉圖理想國時他說：要有一片象巴比倫平原那樣極大極豐沃的土地，纔可以養活五千懶惰人（當時認為衛護那理想國所必要的戰士）及其妻僕。

人類好勝的心理，多以統治下等人為榮，而以俯就下等人為恥。所以，如果法律允許，工作的性質也允許，那在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他一定願意選用奴隸。蔗糖與菸草的栽種，能夠提供使用奴隸耕作的費用；穀物的耕種，現在似乎還不能夠辦到這一點。主要產物為穀物的英國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來操作。本雪文尼亞人最近議決釋放黑奴。那種事實，使我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

奴隸是他們財產的大部分，他們決不會贊成釋放。但以蔗糖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隸擔任；以菸草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隸擔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種甘蔗的利潤特別大，在歐美兩洲，簡直沒有什麼耕種事業比得上。栽種菸草的利潤，雖比不上栽種甘蔗，但與栽種穀物比較，卻仍然較大。這兩種耕種事業都能提供奴隸耕作的費用，但栽種甘蔗，比栽種菸草更能提供這種費用。所以，與白種人數相比，黑奴的數目，在甘蔗區域，比在菸草區域大得多。

繼古代奴隸耕作者之後，逐漸出現了法蘭西今日稱作對分佃農的一種農民。這種農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隸農），在英格蘭，這制度早已廢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現在不知道他們叫作什麼。在這制度下，種子、牲畜、農具，總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資本，都由地主供給。農民離去或被逐去時，這種資本就須歸還地主。出產物在留出被認為保持原資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後，其餘就由地主與農人均分。

在對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費用，嚴格地說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隸耕作制下沒有差別。但其中，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對分佃耕制下的傭農，是自由人，他們能夠佔得財產，可以享有土地生產物的一定比例。生產總額愈大，他所佔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們的利益，顯然在於能夠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反之，一個沒有佔得財產希望只能維持自己生活的奴隸，就會圖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產物多於自身所需。也許就是部分因為對分佃耕制對地主有利，部分因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勵農效反抗他們的權力，終而使大家都覺得奴隸耕作制不利，於是大部分歐洲的奴隸耕作制度逐漸消滅。這樣一次大的變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怎樣發生的，在近代歷史中，是最難稽考的事件之一。羅馬教會，常自誇其廢除奴隸的功績。當然，我們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紀亞歷山大三世時代，羅馬教皇就發出了普通釋放奴隸的訓諭。但這訓諭，似乎不過是個諄諄的勸諭，不遵守訓諭的人，並不受處罰。奴隸制度依然保持了數百年。最後，因為上述那兩種利害關係（他主的利害與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來，才逐漸把它廢除。一個已被釋放，又許繼續保用土地，

但自己沒有資本的賤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資本，纔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爲法蘭西今日所稱的對分佃農不可。

不過，在對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費分文，而享受土地生產物的一半，留歸對分佃農享有的自屬不多。在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節省的更是有限。對分佃農決不願用這有限的節餘來改良土地。教會什一稅，不過抽去生產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極大的障礙。抽去生產物的半數，一定會切實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給的資本，從土地儘量取得最大量的生產物，固然是對分佃農所願望，但若以自有資本與地主資本混合，卻決非對分佃農所願的。在法蘭西，據說，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對分佃農耕作。地主常常指摘農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來拖車。因爲，拖車的利潤，全部歸於農民，耕田的利潤，卻須與地主平分。在蘇格蘭的某些地方也殘留着這種佃農，叫作由地主借給種子農具的佃戶。大貴族吉爾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說，英格蘭古代的佃農，與其稱爲農戶，無寧稱爲地主的屬役。這種佃農，大概與此屬於同一種類。

慢慢地繼對分佃農而起的農民，可以說是真正的農民。他們耕田的資本是自己的，但要對地主繳納一定數額的地租。這種農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們有時覺得，投下一部分資本改良土地，對自己有益。他們希望，在租期未滿以前，投下的資本可以收回，並提供很大的利潤。不過，就連這種農民的借地權，也有一個長時期是極不可靠的。今日歐洲有許多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土地換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滿，可把農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蘭，甚至得依虛構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違法的暴力手段驅逐農民，農民所能憑藉以取獲賠償的訴訟章程，是極不完善的。農民並不一定能恢復佔有原來的土地，他們通常只能獲得損失的賠償，而且所償決不能等於所損。在歐洲，英格蘭也許是頂尊重耕農的一個國家。但那裏，亦遲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訴訟法。規定改佃時，佃農得要求賠償損失，並得要求恢復借地權。此種要求，不必由一次審問而審結。這個訴訟法，施行極其有效，所以，近來，地主若要爲佔有土地而起訴，他常常不用地主名義，按權利令狀起訴，而常常用他的佃農名義，按退佃合狀起訴。以此之故，在英格蘭，佃戶的安全等於地主了。此外，英格蘭又規定，每年納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終身租地權就

是終身保有的不動產，有選舉國會議員的權利，耕農既大部分有這種終身不動產，所以政治上的勢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輕視他們。我相信，歐洲除了英格蘭，沒有一個地方的佃農，未立租地權約，便出資財建築倉廩，不怕為地主所奪的。這種十分有利於農民的法律風俗，所起的促進現代英格蘭偉大光榮的作用，也許比為商業而定立的所有各種誇大條例所起的作用還要大得多。

保障最長租期使不為各種承繼人所妨害的法律，據我所知，乃英國所特有。早在1449年，這種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傳到蘇格蘭去。但當時，限嗣繼承的財產的承繼人，往往不許從一年以上的期間出租田地，所以，這法律的澤潤未能儘量廣佈。最近，國會雖立法補救，但這些束縛仍太嚴厲。此外，在蘇格蘭，租地人又因沒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所以不象英格蘭加農那樣，受到地主那麼大的重視。

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雖亦保障佃農權利，使不受土地承繼人和購買人的損害，但這種權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蘭西初定租期為九年，近來才延長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勵佃農進行各種最重要的改良。我們知道，歐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為他們所設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們認為，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應以土地長期出租，使得他們長期間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價值。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淺。他們不會想到這種規定，一定會妨害改良，結果，一定會妨害他們自己的真實利益。

古代，農民對於地主，除了納租，還須提供各種勞役。那種勞役，既不明定於租約內，又不受任何規定支配，只要莊主諸侯需要，就得隨命隨到。這種全無規定的勞役，使佃農不知受了多少痛苦。蘇格蘭晚近把一切全無規定的勞役廢止，不到幾年，國內農民的境況就改善了許多。

農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復同樣橫暴。公路的建築修補（這種勞役，我相信，各處尚未廢除，但橫暴的程度不等），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在王軍或王官過境時，當地農民，又有提供車馬糧食的義務，那雖有代價，但代價定於食物徵發官。我相信，在歐洲各君主國中，只英國一國，完全消除了食物徵發的壓迫。在法國和德國，那都未曾消除。

農民所負擔的勞役義務，既如上述。農民所負擔的納稅義務，其不規則和橫暴的程度也和勞役義務不相上下。古代貴族，雖不願在金錢方面給君主以任何幫助，但毫不躊躇地聽任君主對佃農徵收貢稅。他們沒有看出，這種苛稅終必嚴重地影響他們自身的收入。法國今天仍有貢稅，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稅的一例。貢稅是加於假定的農民的利潤的一種稅，它是根據農民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估定的。所以，農民為自身利益計，儘可能裝窮，結果，他耕作所用的資本必減至儘可能少的程度。至於改良土地的資本，那就以減少到零為宜。即使法國農民手中積蓄了一點資本，亦將因有貢稅，不願投到土地上來。貢稅事實上幾乎等於禁止農民把積蓄投資於土地。此外，此種賦稅被認為會抑低任何要完納它的人的身分，使不僅不能與鄉紳平行，且不能與市民並列。而誰租借別人的土地，誰就要完納這種稅。紳士，甚至有產的市民，都不願受這種恥辱。所以，施行這種賦稅的結果，不僅使從土地方面蓄積起來的資本不用來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資本都不用來改良土地。英格蘭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稅和十五分之一稅，就它們對土地的影響說，似乎是和貢稅同一性質的稅。

在這一切害農政策之下，要耕者來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這一階級的人民，儘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卻處於大不利的地位。農民與地主比較，猶如借錢經商者與有資親自經商者相比。固然，無論是藉資經商，或是有資親自經商，只要他們的行為一樣慎重，他們的資財就都可以增進，但因借錢經商者的利潤有一大部分歸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錢經商者的資財的增進，定要遲緩得多。同樣，與地主比較，即使行為一樣慎重，佃農耕地的改良，亦要遲緩得多；因為，在農民的場合，生產物的大部分須歸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場合，這一部分卻仍可用來作進一步的改良。此外，農民的地位，當然比地主低。不僅如此，歐洲有大部分地方，把農民看作下等人民，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師。至於農民地位被看得低於大商人和大製造商，那是全歐洲各地普遍的情況了。世上有幾個大財主願捨棄高的地位而與下等階級的人民為伍呢，所以，即在現今，歐洲人的資本，仍很少會由他業轉到農業上來改良土地。也許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英國資本轉到農業方面來改良土地的，比較多些。但即在英國，在若干地方用於農業上的大資本，大都是在農業上獲得的（和一切其他職業比較，農業上資財的蓄積，最為遲緩）。不

過，我們應該知道，在所有國家裏，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農、大農。在歐洲君主國中，英格蘭也許格外有這種情形。據說，在荷蘭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爾尼共和政府中，農民的地位，亦不亞於英格蘭農民。

除上述外，歐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於土地的改良與墾作的地方，不論進行改良和墾作的人是地主還是農民。（一）到處都規定，未經特許，穀物輸出一律禁止；（二）限制穀物甚至各種農產物的內地貿易，實行禁壟斷禁零售禁屯積種種謬法，確立集市市場的特權。我說過，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為世界最大帝國的中心地，然其農耕的進展，亦不免因禁止穀物輸出和獎勵外谷輸入而受到許多阻礙。至於土地沒有那樣肥沃，位置沒有那樣有利的國家，其耕作事業會因限制穀物的內地貿易和禁止穀物輸出而受到何種程度的阻礙，就難於想象了。

第三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

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居民的境況，並不比農村居民好。不過，那時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臘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內的居民大不相同。在這等古代共和國內，地主佔居民中的多數，他們分佔公地，都覺得房屋毗連，環以圍牆，便於共同防禦。但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主大都散居於各自領地的城寨內，住在各自的佃農及屬民中間。市鎮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們的處境無異於隸役，或近似於隸役。古時各憲章所賦與歐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權利，充分證明了他們在未取得這些權利以前的生活情況。這些憲章，准許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領主許可；第二，在他死後，他的財物，可由兒孫承繼，不由領主領取；第三，自身遺產，可由遺囑處分。這種權利的頒給，充分證明了在未頒給前，他們是和農村耕作者幾乎一樣，或竟全然一樣，處於賤奴狀態。

這些人，無疑是很貧困很下賤的，他們肩挑着貨物，過市赴墟，從這裏跑到那裏，與今日拉車荷擔的小販相類似。那時歐洲各國，象現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一樣，經常在這些旅行者經過某些采邑，經過某些橋樑，赴市趁墟，設攤售貨的時候，把賦稅加在他們的人身與貨物上。在英格蘭，這些稅，叫做過界稅、過橋機、落地稅、攤稅。有的時候，國王以及在某些場合擁有這項權力的大領主，特許某些商人，

特別是住在他們領地內的商人，免納各稅。因此，這些商人的地位，雖在其他各點與隸役無異或極相類似，但仍被稱為自由商人。不過，他們為報答保護者的保護，通常每年須納人頭稅若干。當時非付厚酬，保護不易獲得。所以，這類人頭稅可看作他們對保護者捨棄其他稅收所提供的補償。這種交換條件的實行，當初只限於個人，其期限或限於其人之身，或憑保護者的好惡。英國土地清丈冊關於幾個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記載，常常提及某某市民為這種保護各納人頭稅若干給國王或大領主。有時，它又只記錄這些人所納的稅的總和。

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制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徵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徵，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

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着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稅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着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着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佈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藉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欺凌，不稍寬恕。市民當然嫉恨領主，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亦畏懼領主，嫉恨領主。另一方面，國王雖亦鄙視市民，但他沒有嫉恨他們、畏懼他們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關係，使國王市民互結同盟，以抗領主。市民是國王敵人的敵人，所以，國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盡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變為穩固，不依靠這種敵人。給予市民權力，使能推舉市長，制訂市法規，建築城堡自衛，進行軍事訓練，國王就這樣盡他權力之所及，把一切獨立安全的手段給與市民，使他們不依靠領主。但要使他們的自由同盟能對他們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對國王提供相當大的援助，則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組織不可，非有強制居民服從的權威不可。至於把市稅永久包給他們，則是為了表

明心跡，使他願結為朋友、結為同盟的人，不疑懼他將來會再壓迫他們，會把稅額提高或把稅包給別人。

對領主感情最壞的國王，對於市民，敕賜往往最為寬大。例如英格蘭國王約翰，對市民最為寬容。法蘭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統率領主的權力。至其末年，據神父丹尼爾說，其子路易，即後來稱為肥路易的，與國內各主教，籌商最適當的方法，以取締領主暴行。主教們的意見，可歸納為兩種提議。一，在國王領土內，各大城市都設市長和市議會，以創設新的管轄體系。二，使城市居民，組織新的民軍，聽市長調遣，在必要時，出發援助國王。據法蘭西各考古學家說，法蘭西市長制度和市議會制度，就是這時創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蘇阿比亞王統治下，纔得到這種種特權；有名的漢薩同盟，也是在這時纔開始露頭角。

都市民軍的力量，此時既不下於鄉村民軍，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與當地領主爭議時，他們常佔優勢。意大利、瑞士等地，各個都市或由於離首府所在地很遠，或由於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於其他原故，君主對它們已全無權力，它們大都逐漸成為獨立的民主社會，並征服當地貴族，迫令其拆毀鄉間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資格居住在都市內。伯爾尼民主國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簡史，類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意大利屢起屢滅的無數大民主國的歷史亦復如此。

英法二國王權雖有時甚為式微，但從未全部消滅。都市因此沒有完全獨立的機會。但因市民勢力日張，除上游的市稅以外，國王一切賦稅，須得市民同意，才徵收得到。國王有急需，就通詔全國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國會。這些代表可與牧師和貴族一起議決，給與國王特別經濟援助。由於市民代表，大都袒護國王，國王有時利用他們從抵抗議會內大領主的權力。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歐洲各大君主國的國會的由來。

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就在這種狀態下，在各都市確立了。但此時，鄉村耕作者，依然受貴族的各種迫害。處於無力自衛狀態的人，自然滿足於僅夠過活的生活資料；因為，擁有更多財富，只會招惹壓迫者更苛虐的誅求。反之，當人們勤勞的結果確有親自享受的把握時，他們就自然會努力來改善他們自身的境遇，不僅要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娛樂品。所以，以生產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東西為目的的產業，在都市建立的時期，比在農村早得多。在賤奴狀態下受領主鉗制的貧窮農民，稍有儲蓄，必掩藏唯謹，免得領主看見，攬為己有，而且一有機會，即逃往都市。加之，當時法律對市民既如此寬縱，同時又如此熱望削減領主對農民的權力，所以，農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為領主所獲，即可永享自由。因此，鄉村勤勞居民，一有蓄積，自然會逃到都市來，把都市看作他們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產業手段，歸根到底，都出自農村。但近海岸沿河邊的城市居民，卻不一定只從鄰近農村得到這些物品。他們有大得多的範圍。他們或只自身工業的製造品作交換，或經營遙遠國家間的運送業，以甲國產物交換乙國產物，而從遠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物品。一個城市不但在其鄰近各農村都很貧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與通商的各個農村也都很貧乏很衰落的情況下，仍可發達起來，日臻於富強。因為單個地說，每個農村對它所能提供的食料與僱傭機會也許有限，但綜合起來說，它們所能提供的卻極可觀。不過，在商業範圍還極狹隘的那時，就有些國家很富裕、產業就很發達了。例如，未曾滅亡時的希臘帝國，亞巴西德統治下的撒拉遜人的帝國，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巴伯裏海岸某地，以及摩爾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在歐洲，最早由商業致大富的，似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當時居於世界的文明部分和進步部分的中心。十字軍雖然破壞了許多資財，傷害了許多居民，妨礙了歐洲大部分地方的進步，但卻非常有利於意大利若干城市的發展。為爭奪聖地從各地出發的大軍，對於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各市的航海業，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十字軍有時由這些地方的船隻運送，其糧食則常由它們供給。它們簡直可以說是大軍的輜重隊。使歐洲其他各國遭受極大破壞的十字軍，卻成為這些民主國富裕的泉源。

商業城市的居民往往以製造品和奢侈品運往富國，只滿足大富翁的虛榮心，大富翁亦極願以大量本國土產物來交換。因此，當時大部分歐洲商業，主要都是以本國土產物交換較文明國的製造品。英格蘭

的羊毛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及弗蘭德的精製呢絨交換；波蘭的穀物亦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白蘭地酒及法蘭西意大利的絲絨交換。

這樣，對精良製造品的嗜好，就通過國外貿易超漸普及到未有精製造業的國家。但此種嗜好，一經普及於國內，便引起很大的需要，商人為免去運輸費起見，自然會想到在本國建立同種製造業。這就是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各地為遠地銷售而建立的製造業的由來。

但我們必需注意，世界上從未存在過而且也決不能存在完全沒有製造業的大國，我說的大國沒有製造業，所指的只是精良進步的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各大國大部分居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傢俱，都是本國產業的產物。此種情形，在普通所謂無製造業的貧國，尤為常見，而在普通所謂製造業發達的富國，反而不常見。與貧國比較，富國下等階級人民日用的衣服傢俱，反有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國的產物。

各國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其發生的情況有兩種。

第一種是國內商人和企業家象上面所說，有時因要仿效外國某種製造業，而勇往直前地（如果可這樣說），把資本投下來經營的。象這樣發生的製造業乃是國外通商的結果。十三世紀盛行於路卡地方的綢製造業、絨製造業、緞製造業，即如此發生。此等製造業，後為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拉卡尼的暴令所驅逐。1310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卡；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議在那裏開辦綢業。當地官吏准許，並給以多種特權。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創設綢業。開始的時候，即僱有工人三百。伊麗莎白時代才傳入英格蘭而在古代即已盛行於弗蘭德之呢絨業，現在里昂及斯皮塔菲爾的綢業，似乎也是這樣發生的。這樣發生的製造業，因為是仿效外國，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國材料。當威尼斯初有製造業時，一切材料，都從西西里及利文運來。更久以前的路卡製造業，其所用的材料亦產在外國。桑樹的培植，蠶蟲的飼養，在十六世紀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還不大知道。種桑養蠶的技術，在查理九世時代，才傳入法國。弗蘭德製造業所用的羊毛，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英格蘭。西班牙羊毛，雖然不是英格蘭毛織物最初採用的材料，卻是適於遠地銷售的毛織業最初所採用的材料。現時里昂製造業所用的絲，亦大半是外國產；而且，在它初建時，就全部或幾乎全部是外國產。斯皮塔菲爾製造業所用的材料，

大概一向全部都不是英國產物。象這樣的製造業，大部分是因少數人的計謀而創辦的，所以設立的地址，有時是濱海的都市，有時是內陸的都市，視這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和主意而定。

有時，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逐漸改良而成的。我們說過，即最貧陋的國家，亦常有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由這種製造業逐漸改良而生的製造業，大都使用本國出產的材料；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離海岸很遠有時甚至離可通航運的水路亦很遠的內地加工的。土壤肥沃的內地，耕作容易，所產物品，除了維持耕者生活所需外，還有很多剩餘。這種剩餘，因陸運費太貴，航運不便，不易運往外地。因此，出產的豐饒，使糧食低廉，從而鼓勵工人住在那裏。他們覺得，在那裏勞動化在其他地方可獲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們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產的，他們把材料加工後，即以製成品，或者說，以製成品的價格，換得更多的材料和糧食。他們節省了由內地到沿河沿海各地或遙遠市場的運輸費，從而給剩餘部分原生產物，增加了一個新的價值。這樣，耕者可以比從前更為簡易的條件，從這班工人手裏取得對他們有用或者使他們滿意的物品。對於剩餘部分農產物，耕者可取得更高的價格；他們所需要的其他便利品，又可以較低價格買得。這鼓勵農民並使農民有能力進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餘的廣量。土地肥沃，使製造業誕生，而製造業的發展，又轉過來增進土地的出產力。製造業最初僅供應本地；後來，作品精緻改良了，便能供應遠地的市場。因為，原生產物甚至粗製造品很難擔負由陸運運往遠地的費用，而精製造品卻不會成到這種困難。精製造品，在小容積中，常包含大量原生產物的價格。例如，一匹精製呢絨，雖僅重八十磅，但所含價格，卻不僅是八十磅羊毛的價格，而且，有時，還包含着幾千磅穀物，即各種工人及其直接僱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這種穀物，如果以穀物的原形運往海外，定然是極困難的。但若以精製品的形態運往，則雖運往最遠的角落亦很容易。利斯、赫利法克、設菲爾德、伯明翰、沃弗漢普頓等地的製造業，就是按照這個方式，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的。這種製造業是農業的結果。其推廣與改進，在歐洲現代史上，一般遲於那些由對外貿易促成的製造業。在現在在上述各地很繁榮的那些製造業適於外銷以前一百多年，英格蘭就以其用西班牙羊毛為原料的精製呢絨業著名於世了。前一類製造業是隨着農業的發展而

推廣、改進的，而農業的推廣與改進，又是國外貿易和直接由此而產生的製造業的最後和最大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說明。

第四章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有所貢獻，其貢獻的途徑有三。

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易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的開發與進一步的改進。受到這利益的，不僅僅是都市所在的農村。凡與都市通商的農村，都多少受其實惠。它們為此等農村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提供了市場，結果就鼓勵了其產業和產業的改進。當然，靠近都市的農村，所得實惠，自必最大。其原生產物的運輸，所費既較省，所以，與較遠農村的產物比較，商人們即使付給生產者較高的買價，但對於消費者，取價卻仍可一樣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獲的財富，常用以購買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開墾的土地。商人們都渴望變成鄉紳。而且，在他們變成了鄉紳的時候，他們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與鄉紳不同。鄉紳是一向奢侈慣了的，他只會花錢，從來不會想到賺錢。商人卻常用錢來經營有利事業，他用一個錢，就希望在這一個錢回來的時候，帶回一些利潤。他們這種不同的習慣，必然會影響他們在一切事業上的性情和脾氣。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業家，鄉紳往往是膽怯的事業家。就商人說，如果他覺得投下大資本來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費用的比例增大它的價值，他就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但鄉紳很少有資本，即使有些資本，也很少敢如此來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進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資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餘。設你幸而住在四周農村多未開墾的商業都市中，你當能看到商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比鄉紳是活躍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經商而養成的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也使他更適合於進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獲利。

三，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但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這一種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卻不為世人所注意。據我所知，曾注意此點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謨先生。

在既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餘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於鄉村式的款客。這剩餘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羣的婢僕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象兵士服從國王一樣。在歐洲工商業尚未擴張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領主，其待客的闊綽，都超過我們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廳，為威廉·魯弗斯的飯廳，然而常有人滿之患。托馬斯·伯克特常以清潔的草蓆，鋪於廳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們嶄新的衣裳。據說，瓦維克大公每日在各莊園所款待的賓客，達三萬人；此或言過其實，但數目必很大，否則不會被誇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知道，不多幾年前，蘇格蘭高地一帶，仍盛行近似這種規模的款客，而在工商業很不發達的民族，這種風氣，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說：“我曾見一阿拉伯酋長，在他售賣牲畜的市中，當街宴請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於他的婢僕。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數年前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足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納地租，僅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現在該處的貨幣，與他處比較，也並不能購買更多的商品。其實，在一個大莊園所產的剩餘產物必須在本莊園內消費的農村，為地主便利打算，與其在家中消費這全部剩餘，不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消費其一部分，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僕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佔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於領主，無異於婢僕、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裏養佃農，與在自己家裏養婢僕、家奴，無甚區別。婢僕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於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於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

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禦共同敵人，纔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國王要依靠自己的權力，強制某大領主領地內人民償還小小的債務，那裏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國王所要花的力量，幾乎將等於消滅一個內戰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說這種地方性裁判權起源於封建法律，實是一個錯誤。不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權，在歐洲尚不知有所謂封建法律以前數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領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權、鑄幣權、制定地方行政法規權，也已在這時候掌握在大領主手中了。英格蘭被征服前的薩克遜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並不下於被征服後諾爾曼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但我們不可設想，直到被征服以後，封建法律才成為英格蘭習慣法。在法蘭西，領主統治僅、裁判權的發生先於封建法律的發生，尤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種權力，無疑會隨着上述各種財產制度與風習而產生。且不講古代英法兩王國吧，我們就在晚得多的時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種結果必隨這種種原因而發生。不到三十年前，蘇格蘭洛赫巴地方，有個叫做克默倫的紳士，不是貴族領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佃農，不過是亞蓋爾公爵的一個家臣罷了。他既沒有獲得正式的委任狀，又不是治安推事，卻對其民衆執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權。據說，他的審判裁判，雖無司法儀式，卻很公正。也許在當時當地的情形下，他為維持公共治安計，不得不出面承攬這權力。這位紳士，每年得租不過五百鎊，1745年率領八百人蔘加了斯托亞的起義。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決不是想擴大封建領主的權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們的權力縮小。自國王以下，直到最下級的領主，都由封建法律妥為制定等階，各有各的職守和義務。在領主未成年時，該領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歸其直接上司領受，土地管理權亦歸其直接上司掌握。結果，各大領主未成年時，他們土地的地租和對土地的管理權也都歸於國王。國王對於這種未成年的領主，盡保護教育的責任，並

以監護人的資格，爲之婚娶，不過選擇的對象，要身分相稱。但是，這種法律，雖本意要加強國王的權力，削弱大領主的權力，但仍不能使鄉村居民得有安寧的秩序良好的政府，因爲它不能徹底改變紛亂狀態所由而起的財產制度與風習。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憑一切強制力量所辦不到的事，卻由國外商業和製造業潛移默化，逐漸實現。國外商業與製造業的興起，漸使大領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餘產物與他物交換。由此而得的物品，於是無須與佃農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費。完全爲自己不爲他人，這似乎是一切時代爲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們一發現了由自己來消費所收地租的全部價值的方法之後，他們就不願再和別人共同享受這價值。他們就寧願把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或其價格，用來換取一對金鋼石鈕釦或其他同樣無用而無意義的東西，隨而也把這糧食所能給他們帶來的權威一併捨棄了。但金鋼石鈕釦是由他自己獨享、無人與他共享的。至於以前的花費方法，他至少要與一千人共享。這區別是非常明顯的，要作出取捨的決定，有賴於明智的判斷。於是，爲了滿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虛榮心，他們終於完全捨棄了上述權威。

在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國家，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除了以這一萬鎊養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聽命以外，也許就沒有其他的消費方法。但在現在的歐洲，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不必直接養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喚無使喚價值的僕役十多人，卻可消費其全部收入。事實上，他通常也是這樣做。他間接維持的人，也許和往昔消費方法所僱用的一樣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換得的寶物量，也許很少，但爲採集製造這寶物而被僱用的工人，卻必然很多。這種寶物的昂貴價格，大都由於這些工人的工資及其直接僱主的利潤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寶物的價格，即間接支付這一切工資與利潤，從而間接維持了這些工人及其僱主的生活。不過，他對於他們各人的貢獻，卻只是他們全年生活費的極小部分。他們各人每年的生活費，來自他一個

人的，少數佔全部的十分之一，許多佔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則尚不及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他雖然對維持他們全體的生活有所貢獻，但他們全體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維持，所以，對於他，他們就多少是獨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地租維持佃農和門客的生活時，他們是各自維持各自的佃農和門客的生活。但在他們以地租維持商人工匠時，他們全體所能養活的人數也許和往昔一樣多，而且由於鄉村式的款客方法難免浪費，現在所能養的，也許比往昔還多。但是，分開計算，他們每個人對這較大人數中每個人的生活費所貢獻的往往極微。每個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費，都不是得自一個顧客，而是得自千百個不同的顧客。他在某程度上，雖要仰給於他們中每一個人，但不絕對仰賴他們中任何一個人。

大地主的個人消費，就在這情況下逐漸增大起來。因此，他所養活的門客，就非逐漸減少以至全部打發掉不可。由於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農，亦非逐漸打發不可。農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顧對裁減佃農的怨言，卻仍把佃農人數減少到按照當時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況耕作所需要有的最少人數。由於盡數打發了不必要的寄食者，由於逼着佃農繳出農田所能提供的全部價值，地主所得的剩餘，或者說剩餘的價格，逐漸增大了。這個較大的剩餘，商人和製造業者又給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來消費，象前此消費其餘部分一樣。個人消費增大這個因素，又驅使地主們渴望所得地租，能超過現在改良狀態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數額。但這樣土地就要進一步改良，佃農就要增加費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夠長，不足以使他收回這增加的費用及其利潤，他決不會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長租期。地主們愛好浮華，要擴大用度，終於承認佃農的條件。這就是長期租地權的起因。

可隨意退租的佃農，耕作土地，給付十足的代價，他並非完全隸屬於地主。他們彼此所得的金錢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不會犧牲生命與財產來為地主服務，而在租期延長後，他就簡直是獨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約或習慣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點其他事情。

佃農既已獨立，門客又已打發掉，大領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執行，不能再擾亂地方的治安了。他們那與生俱存的權利已經賣

掉，然而，出賣的目的，不是象伊騷那樣爲了飢餓，爲了必需，卻僅僅爲了耳目玩好，僅僅爲了爲兒童所玩樂而非成人所應追求的寶石鑽戒。因此，他們就象城市中的殷實市民或商人一樣平庸了。於是，在城市，在鄉村，都設立了正常的政府。沒有誰能擾亂都市的政治，也沒有誰能擾亂鄉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與本題無關，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產，由父傳子，子傳孫，傳至許多世代的世家，在商業國，是極罕見的。反之，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如威爾斯，如蘇格蘭高地，則極普通。阿拉伯歷史，充滿着貴族的世系；有一位韃靼可汗，著了一部歷史，曾經譯成幾種歐洲文字，其中，就全是關於貴族的世系。這可證明，古世家在這些國家是極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於養活儘量多的人的國家裏，富人的用度很少過分，他的仁愛心似乎難得熱烈得使他企圖養活超過他所能養活的人數。但在收入的最大部分歸個人消費時，他的用度就往往極無限制；因爲他的個人虛榮心，是無限制的、永遠滿足不了的。所以，在商業國，即使有極嚴厲的法規取締揮霍浪費，長期富裕的家庭仍屬罕見。但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即使沒有法規取締，亦多長富之家。象韃靼和阿拉伯那樣的遊牧民族，財產不易消費，取締浪費的法規，亦無設立的可能。

對於公衆幸福，這真是一種極重要的革命，但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衆幸福的階級。滿足最幼稚的虛榮心，是大領主的唯一動機。至於商人工匠，雖不象那樣可笑，但他們也只爲一己的利益行事。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可賺錢的地方去賺一個錢。大領主的癡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於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於這次革命，卻既不瞭解，亦未預見。

因此，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業是農村改良與開發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

但是，這種發展，既與自然趨勢相反，當然是遲緩和不確定的。試一比較以工商業爲國富基礎的歐洲各國的緩慢進步，與以農業爲國富基礎的我國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進步吧。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數目，在將近五百年中，未增加一倍。我國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卻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歐洲，長男承繼法和各種永久所有權，使大地產不能分割，因而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們知道，小地

主對其有限土地十分熟悉，愛護備至。他不但喜歡開發它，而且喜歡改良它。他在各種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聰明、最常成功的了。加之，長男承繼法和永久所有權，又使許多土地不能出賣，常使購買土地的資本多於待售的土地，從而使土地常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買價的利息，至於修補費，及其他各種意外費用，更不用說。所以，購買土地，在歐洲，是小資本利潤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經營工商業了的人，為圖安全起見，亦有時願把小資本用來購買土地。還有些從別個來源取得收入的專門職業家，亦常因要保儲蓄的安全，喜投資購買土地。但是，一個青年，如果不願從事工商業，而用二三千鎊資本購買一小塊土地來開發，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圖成為大富翁、大名人，就絕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資本用於別的用途，他就可望發大財或享大名，和別人一樣。而且，這樣的青年人，雖不希望成為地主，但大都不願為農民。這樣，任人購買的土地既少，土地的賣價又高，結果，使許多原來可能用於改良土地開發土地的資本都不投到這方面來。反之，在北美洲，則有五六十鎊的資本，便足夠用來開辦一個農場。那裏，未開墾土地的購買與開發，既為最大資本最有利的用途，亦為最小資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樣的地方，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裏的土地，幾乎可全無代價取得，即使須出代價，亦比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少得多。這種事在歐洲是絕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為私有財產的任何國家都是不會有的。可是，當一個大家庭的家主死時，所遺土地財產若能平均分配於各個兒女，則所遺地產，大都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會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這樣將漸足抵付買地地價的利息；以小額資本購買土地，亦將和其他用途同樣有利。

英格蘭，因土壤天然肥沃，因海岸線與全國面積相比甚長，又因有許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貫其間，使內陸各地，能有水運之便，所以，與歐洲任何大國比較，都一樣宜於國外通商，一樣宜於經營遠地銷售的製造業，一樣宜於上述情況所能引起的種種改良。此外，自伊麗莎白即位以來，英國立法，都特別注意工商業的利益；事實上，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即荷蘭亦不例外，其法律一般地說，能這樣有利於此種產業。所以，英國工商業就在這整個時期內不斷地向前發展起來。無疑，農村的開發與改良，亦不斷地在進步；但其進步，似較遲

緩，不如工商業的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許在伊麗莎白時代以前就耕種了，可是還有很大部分，仍全未耕種，至於已耕種的土地，其耕作狀況，大部分亦未盡滿人意。不過，英格蘭的法律，不僅由保護商業而間接鼓勵農業，且有若干對農業直接加以獎勵。除歉收年度外，穀物輸出，不僅自由，且有獎金。在收穫一般的年度，外谷輸入，又有等於禁止輸入的關稅。除了來自愛爾蘭的以外，活牲畜的輸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許從愛爾蘭輸入亦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在兩種最重要的土地生產物即麪包與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實享有一種獨佔，他人無從染指。這種獎勵，雖象我後面指出的那樣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國立法當局，實有贊助農業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蘭法律對於國內農民曾竭盡所能使其安定獨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長男承繼法尚未消滅，什一稅繼續徵收，與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權有時仍然有效的國家中，英格蘭總算是最鼓勵農業的國家了。但英格蘭農業的情況，仍是如此。設使農業除了由於商業進步而間接得到鼓勵以外，沒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勵，政府袖手旁觀，聽任農民的處境停留於與歐洲其他各國相同的狀態，那末，農業將呈現何種情況呢。伊麗莎白即位迄今已二百餘年了。這悠長的期間，是人類繁榮階段通常所能持續的最久期間。

在英格蘭成為大商業國以前大約一百年，法蘭西的對外貿易很可觀。照當時人的設想，似在查理第八遠征那不勒斯以前，法國的航海業就已很可觀。但就全體說，法蘭西土地的耕作與改良，遜於英格蘭。法國法律從未給予農業以直接的獎勵。

西班牙與葡萄牙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雖多由外國船舶裝運，但很可觀。西班牙葡萄牙對他們殖民地的國外貿易，由本國船裝運，這貿易因殖民地富饒廣大，尤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國外貿易，並不曾在這兩國內引起任何重大的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甚至，這兩國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開墾。就國外貿易說，在歐洲各大國中，除意大利外，葡萄牙歷史最久。

由於國外貿易及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而使全國土地全部得到開發與改良的國家，在歐洲，似乎只有一個意大利。據古西亞迪尼說，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農村已經耕種，而且最多山最荒蕪的地區也同樣已經耕種。這個國家所處的相當有利的

地位，以及在這個國家裏存在的大量獨立小邦，對於上述土地的全面開墾或不無貢獻。然而，這位賢明的近代歷史家雖這樣說，但那時意大利的土地墾作，不及今日的英格蘭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通過工商業而獲得的資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與改良事業上得到保障和實現，總是極不確定的財產。說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公民，這句話真是不錯。究竟在何處營業的問題，在他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他們對甲國成到一種厭惡，那怕頂微小，亦可使他把資本從甲國遷到乙國。跟着資本的遷移，資本所維持的產業，亦必移動。在資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為建築物，成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資本決不能說屬於某一國。據說汗薩同盟大部分都市都擁有大財富，這財富如今到哪裏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紀、十四世紀模糊的歷史中外，廈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甚至它們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麼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稱究竟屬於歐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確定。但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意大利所遭的災禍，雖然使倫巴迪亞和托斯卡納所屬各城市的工商業大為衰落，但這些地方，至今仍為歐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弗蘭德在內戰後又受西班牙的統治，這些雖然延去了安特衛普·根特、布魯哲斯的大商業，但弗蘭德至今仍為歐洲財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進步的地方。戰爭與政治上的一般變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業為唯一來源的富源趨於耗竭。通過比較可靠的農業改良而產生的富源就比較持久得多，除了由於敵對蠻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續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較激烈的大變動，如羅馬帝國崩潰前後西歐的大變動外，其他事件都破壞不了。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

第一章論財富的自然的發展

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與農村居民通商。這種商業，有的是以原生產物與製造品直接交換，有的是以貨幣或紙幣作媒介交換。農村以生活資料及製造材料供給都市，都市則以一部分製造品供給農村居民。不再生產亦不能再生產生活資料的都市，其全部財富和全部生活資料都可說是得自農村。但我們不要根據這點，就說都市的利得即是農村的損失。他們有相互的利害關係。這裏，分工的結果，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對雙方從事各種職業的居民都有利益。農村居民，與其親自勞動來製造他們需要的製造品，無寧作這種交換，因為由這種交換，他們可用較小量的自身勞動生產物購得較大量的製造品。都市是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農民用不了的東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換他們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餘產物的市場愈廣闊。這種市場愈廣闊，對廣大人民愈有利。在離都市一哩生產的穀物，與在離都市二十哩生產的穀物，在市上的售價都一樣。但後者所得的售價，一般地說，不但要補償其生產費用和上市費用，而且要對農業家提供農業的普通利潤。所以，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穀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的穀物的運費全部價值。此外，在他們購買的東西的買價上，他們還節省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試一比較都市附近各農村和遠離都市各農村的耕作事業，你就知道都市商業是怎樣有利於農村。就連所有宣傳貿易差額的各種謬說，也沒有一種敢妄說城鄉通商對城市或對鄉村有損的。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資料必先於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產前者的產業，亦必先於生產後者的產業。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村的耕種和改良，必先於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鄉村居民須先維持自己，才只剩餘產物維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農村產物的剩餘，才談得上增設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資料，不一定要仰給於附近的農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給於國內的農村，而可以從遠方運來，所以，這雖然不是一般原則的例外，卻使各時代各國家進步繁榮的過程，因而有所差異。

農村先於都市的事態，在大多數國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國家，又有人類天性促其實現。只要人爲制度不壓抑人類天性，則在境內土地尚未完全開墾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設，決不能超過農村的耕作情況和改良情況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多數人必寧願投資以改良土地開墾土地，不願投資於工業及國外貿易。投在土地上的資本，可受到投資人自身更直接的監察；與商人資本比較，他的財產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財產，不但常須冒狂風巨浪的危險，而且由於商人常須對風俗情況都不易熟習的遠郊的人貸給信用，還要冒人類的愚蠢與不正行爲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險。反之，地主的資本，卻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說是盡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鄉村風景的美麗，鄉村生活的愉快，鄉村心理的恬靜，以及鄉村所提供的獨立性，只要這獨立性不受到人爲的迫害的話，這些實具有吸引每一個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爲人的原始目標，所以，在有人類存在的一切階段，這個原始的職業將爲人類所永遠愛悅。

沒有工匠的幫助，農耕必大感不便，且會時作時輟。農民常常需要鍛工、木匠、輪匠、犁匠、泥水匠、磚匠、皮革匠、鞋匠和縫匠的服務。這類工匠，一方面因爲要互相幫助，另一方面又因爲不必要象農民那樣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小市鎮或小村落。後來，又有屠戶、酒家、麪包師，只及許多就供給臨時需要那一點說對他們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於是市鎮日益擴大起來。鄉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務的。市鎮是鄉民不斷前往把原生產物交換製造品的市集或市場。就是依着這種交換，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的供給。他們售給鄉村居民的製成品的數量，支配他們所購的材料及食料的數量。所以，他們的材料及食料的增加，只能按照鄉民對製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這種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發展。所以，設使人爲制度不擾亂事物的自然傾向，那就無論在什麼政治社會裏，都市財富的增長與規模的擴大，都是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結果，而且按照鄉村耕作及改良事業發展的比例而增長擴大。

在未曾墾殖、土地極易購得的我們北美殖民地，爲銷售於遠方而興辦的製造業，在任何市鎮都還不曾有過。在北美洲，當工匠獲得的

資本，超過他所經營的、以供給鄰近鄉村為職志的事業所需要的數額時，他不會想辦一家工廠來作銷售遠方的生意。他一般寧願用多餘的資財，來購買或改良未開墾的土地，由技工一變而為農業家。當地付給技工的高昂工資，對於技工所提供的舒暢生活，都不足以誘使他為他人工作，他總情願為自己工作。他覺得，技工是顧客的僕役，仰給生活於顧客；至於耕作自己的土地，從自己家庭的勞力取得衣食之資的農業家，則是真正的主人翁，獨立於世界。

反之，在土地全已開墾或不易購得的國家，技工所獲資本，如果已經不能全數投在鄰近地區隨時需要的事業上，其有餘部分，就會用來擴張營業，準備銷售遠方。鍛工將建立鐵廠，織工將建立麻織廠毛織廠。隨着時間的推進，這各種製造業，將慢慢地進行精密的分工，用各種方法加以改進。這是大家容易想得到的，用不着細選。

在利潤相等或幾乎相等的條件下，人們選擇投資途徑時，在製造業與國外貿易業兩者中，自寧願選擇製造業，其原因正如在農業與製造業中，寧願選擇農業一樣。與製造商的資本比較，地主或農業家的資本更為穩當。同樣地，與國外貿易的資本比較，製造商的資本更為穩當，因為隨時都在自己監察之下。誠然，隨便什麼時代，隨便什麼社會，剩餘原生產物及製造品，或者說，國內無人需要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都必須送往外國，以交換國內需要的其他物品。但輸運剩餘產物到外國去的資本，為本國所有，成為外國所有，卻是無關重要的。如果本國的資本，不夠我們同時耕作一切土地，並完完全全地製造一切原生產物，那末，由外國資本來輸運本國剩餘原生產物到外國去，亦對本國有很大的利益。因為，賴有這種資本，本國的資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國、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證明了一種事實，即是，縱使本國輸出業，有大部分為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設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資本，即波有外國資本替它們輸出剩餘產物，它們的進步，會慢得多吧。

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這種順序是極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擁有多少領土的社會，資本總是在某程度上按照這種

順序投用。總得先開墾了一些土地然後才能成立很多城市；總得在城市裏先有了些粗糙的製造業，然後纔會有人願意投身於國外貿易。

這個自然的順序，雖然在所有進步的社會裏都已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但就今日歐洲各國的情狀說，這個順序卻就許多方面說，似乎完全相反。它們的精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多由國外貿易引出。農業大改良，也是製造業和國外貿易所產生的結果。這種反自然的退化的順序，乃是風俗習慣迫成的。他們原來的統治的性質使他們的風俗習慣變成了這個模樣。後來，這種統治大大改變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卻仍沒有多大改變。

第二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侵擾羅馬帝國西部以來，歐洲起了一個大變革，跟着這個大變革發生的是，歐洲擾攘了好幾百年。野蠻民族對原居民的掠奪和迫害，中斷了城鄉間的貿易。城市都成了荒墟，鄉村亦無人耕作。在羅馬帝國統治時很富裕的西歐，一變而為極貧乏，極野蠻。在接連不斷的擾攘中，那些民族的頭子，佔有或篡奪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有人耕作的土地雖然不多，但要找一塊沒有所有主的土地，卻不可能。一切土地都被吞併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數大地主所吞併。

最初吞併荒地的危害雖很大，但有可能只不過是暫時的危害。這些土地本可通過繼承或分割，把它們拆小。但長男承繼法，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繼而拆小；限嗣繼承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割而拆小。

如果我們把土地看作只是謀生求樂的手段，和動產一樣，那末，按照自然承繼法，當然會把土地象動產一樣，分給家內所有的兒女。因為每一個兒女的生計，都為老父所同樣關心。羅馬人就是採行這種自然承繼法。他們不分別長幼，不分別男女，只要是自己養的，就可以承繼自己的土地。他們處分土地的方法，和我們現在處分動產的方法一樣。不過，當土地被看作不單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權力強弱所繫的時候，就被認為以不分割而專歸於一人比較適當。在那些不安靖的時候，大地主同時都是小貴族。他的佃戶，便是他的隸屬。他是他們的裁判官，是他們和平時節的立法者，亦是他們戰爭時節的領導人。他可任意進行戰爭，對鄰國作戰，有時對國王作戰。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地產是否安全，其中居民有無保障，都取決於它的大小。把一個

地產分拆，無異把它破壞，換言之，無異把它拆開來，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強鄰的侵蝕吞併。所以，適應着當時這種情況，在地產承繼方面，長男承繼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來。爲了同一理由，君主國通常亦由長男一人承繼。雖然最初並不總是如此。爲君主國的安全與權力計，國土寧可不加分裂、寧可在諸兒女中，選擇一個人來單獨承繼。但選擇誰呢，那樣重要的一件事，當然要鄭重規定一個普通規例，使選擇不按個人資質好壞這個不大可靠的區別，而按某種明白的、無可爭論的標準。在同一家庭的各兒女中，除了性別與年齡，再沒有其他無可爭論的區別了。根據一般經驗，男性比女性好，而在其他一切條件相等的場合，年長的比年幼的好。長男承繼權，就這樣成立了。而所謂直系繼承，亦就從此發生了。

一種法律在初成立時，都有環境上的需要，並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這種環境。但事實上，往往產生這法律的環境已發生變化，而這法律卻仍繼續有效。今日歐洲，僅領有一畝地的小地主，其安全已無異於擁有千萬畝地的大地主。產生長男承繼權的環境大變了，長男承繼僅卻依然存在。由於在各種制度中，這法律是最宜於保持貴族尊嚴的，所以，今後會再行幾百年也說不定。但事實上，除了這一點，長男承繼權也就沒有一點不違反大家庭的真實利益了。這權利，因爲要使一個兒子富裕，就使其他兒子陷於窮困。

限嗣繼承法是長男繼承法施行的自然結果。它的採行，旨在維護由長男繼承法導引出來的直系繼承，以及防止由於子孫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遺產在贈與、遺讓或割讓名義下旁落的危險。這種法律，羅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國有幾個法律家，雖然喜歡以今制附會羅馬古制，實則，羅馬人所謂預備繼承人預定法和囑託遺贈法，都與限嗣繼承法迥不相同。

在大土地財產仍爲諸侯領地時，限嗣繼承或許不是不合理的辦法。象一些所謂君主國的根本法律一樣，這個法律，可以使許許多多人不致因一人輕舉妄動而受災殃。但今日歐洲各國，大地產和小地產已同樣受國法保護，所以，這種法律就變得再荒唐不過了。這種法律的制定，根據一種根本錯誤的假定：即對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類的各代後裔，沒有同等的權利，當代人的所有權，要受限制於五百年前祖宗的心意。在今日的歐洲，實行限嗣繼承法的地方還很

不少。在貴族血統仍是享受民事或軍事榮譽的必要資格的地方，限嗣繼承法尤牢不可破。限嗣繼承法被貴族認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權所必要的手段。這一階級既奪得了一種超乎其同胞之上的不正當的利益，卻又擔心自己的貧乏會貽人譏笑，以為應當再享有另一種不正當的利益。據說，英國習慣法很厭惡世業世祿的制度，因而，和歐洲其他各君主國比較，世業世祿的制度在那裏比較受限制。雖然在英格蘭，世業世祿的制度也還未完全廢除。據說，現在蘇格蘭，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仍受着嚴格的限嗣繼承法的支配。

在這情況下，大面積的荒地不僅為少數豪族所兼併，而且永無再分散的可能。事實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產生這種制度的混亂時節，大地主的精力，幾乎全部用來保護已有的領土，擴大自身對鄰國的管轄權、支配權。他們實在沒有餘暇來開墾土地改良土地。後來和平了，法制的確立，秩序的安定，雖然使他們有餘暇，但他們一般沒有心思耕墾土地，並且常常沒有必要的才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費用，超過了或恰好相等於他的收入（這是極常有的現象），他就沒有資本，可以投在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個經濟家，那末，他又通常感覺，與其用一年的節省未改良舊的地產，不如用來購買新的地產比較合算。改良土地，象各種商業計劃一樣，要獲利潤，不斤斤注意小節省小贏利是絕對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即使天生是好儉樸的，亦不大能夠做到這一點。這種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悅己的裝飾，而不注意自己沒有多大需要的利潤。他自幼就養成了飾衣裳、盛車馬、崇居室、麗陳設的嗜好。他已經養成了這種習慣。即在想改良土地時，這種習慣所涵養的心理仍會支配着他。他也許會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畝土地大大裝飾起來，花費比該地改良後所值大十倍的費用，終而發覺如果對他所有全部地產都照樣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無其他嗜好，恐怕也會在沒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盡他所有的財產。現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自封建的無政府狀態以來，有些大地產，繼續在少數人手裏，至今沒有改動。把這些大地產與鄰近的小地產比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論證而相信大地產是怎樣不利於改良。

如果從這樣的大地主還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對土地的改良，那末從那些佔有的土地比他們少的人那裏，就更無這種希望了。在歐洲舊狀

態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農。他們全是或幾乎全是奴隸，不過他們的隸役，比古希臘羅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隸役和緩一些。他們與其說隸屬於主人，無寧說是隸屬於土地。因此，他們可以和土地一同出賣，但不能單獨出賣。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們還可以結婚。而且，主人沒有權利把他們夫婦，賣給不同的人，從而拆散他們的姻緣。主人殘害或殺害了奴隸，還要受處分，不過一般是小懲罰罷了。但是，奴隸不得蓄積財產。他們所獲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隨時取去。所以，奴隸所能進行的墾殖和改良，實際上都是由主人進行，由主人負擔費用的。種子、牲畜、農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效益，亦是主人的。這種奴隸，除了日常維持生活的東西，什麼也不能獲得。所以，在這場合，正當地說，土地仍是由地主佔有、由農奴耕作的。這種奴隸制度，在俄羅斯，在波蘭，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亞，在摩拉維亞，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現在還存在。這種制度逐漸全然廢除了的地方，不過歐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進行大改良，已是很難，那末，當他們使用奴隸耕作的時候，要他們進行大改良就更是無望了。我相信，一切時代、一切國民的經驗，都證明了一件事，即：奴隸勞動雖表面上看來只需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但徹底通盤計算起來，其代價是任何勞動中最高的。一個不能獲得一點財產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麼也不關心。他的工作，夠他維持生活就行了，你要從他身上多榨出一些來，那只有出於強迫，他自己決不會願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麥拉的著作都說，古意大利的穀物耕種事業，在奴隸制度下非常衰微，對主人非常不利。耕種事業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古希臘並沒有多大進步。所以，當論及柏拉圖理想國時他說：要有一片象巴比倫平原那樣極大極豐沃的土地，纔可以養活五千懶惰人（當時認為衛護那理想國所必要的戰士）及其妻僕。

人類好勝的心理，多以統治下等人為榮，而以俯就下等人為恥。所以，如果法律允許，工作的性質也允許，那在奴隸與自由人之間，他一定願意選用奴隸。蔗糖與菸草的栽種，能夠提供使用奴隸耕作的費用；穀物的耕種，現在似乎還不能夠辦到這一點。主要產物為穀物的英國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來操作。本雪文尼亞人最近議決釋放黑奴。那種事實，使我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

奴隸是他們財產的大部分，他們決不會贊成釋放。但以蔗糖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隸擔任；以菸草為主要產物的英國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隸擔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種甘蔗的利潤特別大，在歐美兩洲，簡直沒有什麼耕種事業比得上。栽種菸草的利潤，雖比不上栽種甘蔗，但與栽種穀物比較，卻仍然較大。這兩種耕種事業都能提供奴隸耕作的費用，但栽種甘蔗，比栽種菸草更能提供這種費用。所以，與白種人數相比，黑奴的數目，在甘蔗區域，比在菸草區域大得多。

繼古代奴隸耕作者之後，逐漸出現了法蘭西今日稱作對分佃農的一種農民。這種農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隸農），在英格蘭，這制度早已廢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現在不知道他們叫作什麼。在這制度下，種子、牲畜、農具，總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資本，都由地主供給。農民離去或被逐去時，這種資本就須歸還地主。出產物在留出被認為保持原資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後，其餘就由地主與農人均分。

在對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費用，嚴格地說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隸耕作制下沒有差別。但其中，有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對分佃耕制下的傭農，是自由人，他們能夠佔得財產，可以享有土地生產物的一定比例。生產總額愈大，他所佔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們的利益，顯然在於能夠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反之，一個沒有佔得財產希望只能維持自己生活的奴隸，就會圖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產物多於自身所需。也許就是部分因為對分佃耕制對地主有利，部分因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勵農效反抗他們的權力，終而使大家都覺得奴隸耕作制不利，於是大部分歐洲的奴隸耕作制度逐漸消滅。這樣一次大的變革，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怎樣發生的，在近代歷史中，是最難稽考的事件之一。羅馬教會，常自誇其廢除奴隸的功績。當然，我們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紀亞歷山大三世時代，羅馬教皇就發出了普通釋放奴隸的訓諭。但這訓諭，似乎不過是個諄諄的勸諭，不遵守訓諭的人，並不受處罰。奴隸制度依然保持了數百年。最後，因為上述那兩種利害關係（他主的利害與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來，才逐漸把它廢除。一個已被釋放，又許繼續保用土地，

但自己沒有資本的賤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資本，纔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爲法蘭西今日所稱的對分佃農不可。

不過，在對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費分文，而享受土地生產物的一半，留歸對分佃農享有的自屬不多。在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節省的更是有限。對分佃農決不願用這有限的節餘來改良土地。教會什一稅，不過抽去生產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極大的障礙。抽去生產物的半數，一定會切實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給的資本，從土地儘量取得最大量的生產物，固然是對分佃農所願望，但若以自有資本與地主資本混合，卻決非對分佃農所願的。在法蘭西，據說，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對分佃農耕作。地主常常指摘農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來拖車。因爲，拖車的利潤，全部歸於農民，耕田的利潤，卻須與地主平分。在蘇格蘭的某些地方也殘留着這種佃農，叫作由地主借給種子農具的佃戶。大貴族吉爾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說，英格蘭古代的佃農，與其稱爲農戶，無寧稱爲地主的屬役。這種佃農，大概與此屬於同一種類。

慢慢地繼對分佃農而起的農民，可以說是真正的農民。他們耕田的資本是自己的，但要對地主繳納一定數額的地租。這種農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們有時覺得，投下一部分資本改良土地，對自己有益。他們希望，在租期未滿以前，投下的資本可以收回，並提供很大的利潤。不過，就連這種農民的借地權，也有一個長時期是極不可靠的。今日歐洲有許多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土地換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滿，可把農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蘭，甚至得依虛構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違法的暴力手段驅逐農民，農民所能憑藉以取獲賠償的訴訟章程，是極不完善的。農民並不一定能恢復佔有原來的土地，他們通常只能獲得損失的賠償，而且所償決不能等於所損。在歐洲，英格蘭也許是頂尊重耕農的一個國家。但那裏，亦遲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訴訟法。規定改佃時，佃農得要求賠償損失，並得要求恢復借地權。此種要求，不必由一次審問而審結。這個訴訟法，施行極其有效，所以，近來，地主若要爲佔有土地而起訴，他常常不用地主名義，按權利令狀起訴，而常常用他的佃農名義，按退佃合狀起訴。以此之故，在英格蘭，佃戶的安全等於地主了。此外，英格蘭又規定，每年納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終身租地權就

是終身保有的不動產，有選舉國會議員的權利，耕農既大部分有這種終身不動產，所以政治上的勢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輕視他們。我相信，歐洲除了英格蘭，沒有一個地方的佃農，未立租地權約，便出資財建築倉廩，不怕為地主所奪的。這種十分有利於農民的法律風俗，所起的促進現代英格蘭偉大光榮的作用，也許比為商業而定立的所有各種誇大條例所起的作用還要大得多。

保障最長租期使不為各種承繼人所妨害的法律，據我所知，乃英國所特有。早在1449年，這種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傳到蘇格蘭去。但當時，限嗣繼承的財產的承繼人，往往不許從一年以上的期間出租田地，所以，這法律的澤潤未能儘量廣佈。最近，國會雖立法補救，但這些束縛仍太嚴厲。此外，在蘇格蘭，租地人又因沒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所以不象英格蘭加農那樣，受到地主那麼大的重視。

在歐洲的其他地方，雖亦保障佃農權利，使不受土地承繼人和購買人的損害，但這種權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蘭西初定租期為九年，近來才延長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勵佃農進行各種最重要的改良。我們知道，歐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為他們所設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們認為，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應以土地長期出租，使得他們長期間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價值。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淺。他們不會想到這種規定，一定會妨害改良，結果，一定會妨害他們自己的真實利益。

古代，農民對於地主，除了納租，還須提供各種勞役。那種勞役，既不明定於租約內，又不受任何規定支配，只要莊主諸侯需要，就得隨命隨到。這種全無規定的勞役，使佃農不知受了多少痛苦。蘇格蘭晚近把一切全無規定的勞役廢止，不到幾年，國內農民的境況就改善了許多。

農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復同樣橫暴。公路的建築修補（這種勞役，我相信，各處尚未廢除，但橫暴的程度不等），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在王軍或王官過境時，當地農民，又有提供車馬糧食的義務，那雖有代價，但代價定於食物徵發官。我相信，在歐洲各君主國中，只英國一國，完全消除了食物徵發的壓迫。在法國和德國，那都未曾消除。

農民所負擔的勞役義務，既如上述。農民所負擔的納稅義務，其不規則和橫暴的程度也和勞役義務不相上下。古代貴族，雖不願在金錢方面給君主以任何幫助，但毫不躊躇地聽任君主對佃農徵收貢稅。他們沒有看出，這種苛稅終必嚴重地影響他們自身的收入。法國今天仍有貢稅，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稅的一例。貢稅是加於假定的農民的利潤的一種稅，它是根據農民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估定的。所以，農民為自身利益計，儘可能裝窮，結果，他耕作所用的資本必減至儘可能少的程度。至於改良土地的資本，那就以減少到零為宜。即使法國農民手中積蓄了一點資本，亦將因有貢稅，不願投到土地上來。貢稅事實上幾乎等於禁止農民把積蓄投資於土地。此外，此種賦稅被認為會抑低任何要完納它的人的身分，使不僅不能與鄉紳平行，且不能與市民並列。而誰租借別人的土地，誰就要完納這種稅。紳士，甚至有產的市民，都不願受這種恥辱。所以，施行這種賦稅的結果，不僅使從土地方面蓄積起來的資本不用來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資本都不用來改良土地。英格蘭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稅和十五分之一稅，就它們對土地的影響說，似乎是和貢稅同一性質的稅。

在這一切害農政策之下，要耕者來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這一階級的人民，儘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卻處於大不利的地位。農民與地主比較，猶如借錢經商者與有資親自經商者相比。固然，無論是藉資經商，或是有資親自經商，只要他們的行為一樣慎重，他們的資財就都可以增進，但因借錢經商者的利潤有一大部分歸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錢經商者的資財的增進，定要遲緩得多。同樣，與地主比較，即使行為一樣慎重，佃農耕地的改良，亦要遲緩得多；因為，在農民的場合，生產物的大部分須歸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場合，這一部分卻仍可用來作進一步的改良。此外，農民的地位，當然比地主低。不僅如此，歐洲有大部分地方，把農民看作下等人民，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師。至於農民地位被看得低於大商人和大製造商，那是全歐洲各地普遍的情況了。世上有幾個大財主願捨棄高的地位而與下等階級的人民為伍呢，所以，即在現今，歐洲人的資本，仍很少會由他業轉到農業上來改良土地。也許與歐洲其他國家比較，英國資本轉到農業方面來改良土地的，比較多些。但即在英國，在若干地方用於農業上的大資本，大都是在農業上獲得的（和一切其他職業比較，農業上資財的蓄積，最為遲緩）。不

過，我們應該知道，在所有國家裏，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農、大農。在歐洲君主國中，英格蘭也許格外有這種情形。據說，在荷蘭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爾尼共和政府中，農民的地位，亦不亞於英格蘭農民。

除上述外，歐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於土地的改良與墾作的地方，不論進行改良和墾作的人是地主還是農民。（一）到處都規定，未經特許，穀物輸出一律禁止；（二）限制穀物甚至各種農產物的內地貿易，實行禁壟斷禁零售禁屯積種種謬法，確立集市市場的特權。我說過，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為世界最大帝國的中心地，然其農耕的進展，亦不免因禁止穀物輸出和獎勵外谷輸入而受到許多阻礙。至於土地沒有那樣肥沃，位置沒有那樣有利的國家，其耕作事業會因限制穀物的內地貿易和禁止穀物輸出而受到何種程度的阻礙，就難於想象了。

第三章 論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

羅馬帝國崩潰後，都市居民的境況，並不比農村居民好。不過，那時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臘共和國、意大利共和國內的居民大不相同。在這等古代共和國內，地主佔居民中的多數，他們分佔公地，都覺得房屋毗連，環以圍牆，便於共同防禦。但在羅馬帝國崩潰後，地主大都散居於各自領地的城寨內，住在各自的佃農及屬民中間。市鎮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們的處境無異於隸役，或近似於隸役。古時各憲章所賦與歐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權利，充分證明了他們在未取得這些權利以前的生活情況。這些憲章，准許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領主許可；第二，在他死後，他的財物，可由兒孫承繼，不由領主領取；第三，自身遺產，可由遺囑處分。這種權利的頒給，充分證明了在未頒給前，他們是和農村耕作者幾乎一樣，或竟全然一樣，處於賤奴狀態。

這些人，無疑是很貧困很下賤的，他們肩挑着貨物，過市赴墟，從這裏跑到那裏，與今日拉車荷擔的小販相類似。那時歐洲各國，象現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一樣，經常在這些旅行者經過某些采邑，經過某些橋樑，赴市趁墟，設攤售貨的時候，把賦稅加在他們的人身與貨物上。在英格蘭，這些稅，叫做過界稅、過橋機、落地說、攤稅。有的時候，國王以及在某些場合擁有這項權力的大領主，特許某些商人，

特別是住在他們領地內的商人，免納各稅。因此，這些商人的地位，雖在其他各點與隸役無異或極相類似，但仍被稱為自由商人。不過，他們為報答保護者的保護，通常每年須納人頭稅若干。當時非付厚酬，保護不易獲得。所以，這類人頭稅可看作他們對保護者捨棄其他稅收所提供的補償。這種交換條件的實行，當初只限於個人，其期限或限於其人之身，或憑保護者的好惡。英國土地清丈冊關於幾個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記載，常常提及某某市民為這種保護各納人頭稅若干給國王或大領主。有時，它又只記錄這些人所納的稅的總和。

都市居民的情況，無論當初是怎樣卑賤，但與鄉村耕作者比較，他們取得自由與獨立，在時間上總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頭稅，是國王收入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收入，多由國王制定比額，在一定年限內包給該市長官或其他人徵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這樣的信用，來經收他們本市的這種稅收，於是就對這全部稅額，聯合負責。這種包稅辦法，對於歐洲各國國王的一般經濟，當是十分適宜的，因為他們本來慣於把莊園全部的稅收，交由莊園全體佃農包辦，使對這全部稅收負連帶責任。但這種辦法，對佃農亦有利。他們可照自己喜歡的方法從事稽徵，並通過自己聘員之手將稅款納於國庫，不必再受國王派出的吏役的橫暴了。這在當時被視為極重大的一件事。

當初，市民包辦市的租稅，和農民包辦莊園的稅一樣，是有年限的。後來，跟着時代的推進，變成永久的。稅額一定，以後永遠不能再加。稅額既成為永久的，以納此稅為條件的其他各種賦稅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稅的豁免，便不限於一人之身，不再屬於作為個人的個別的人，而屬於特殊城市內的一切市民了。這個城市，因此成為所謂自由市；由於同一理由，市民成為所謂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說過的那種種重要特權即嫁女自由權、兒女承繼權與遺囑權，一般常是隨着這種權利一同賜給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種種特權，是否常伴隨着貿易自由權的賜與，賜給作為個人的個別市民，我不知道。也許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麼直接的證據。不過，無論如何，賤奴制度及奴隸制度的主要屬性，就這樣從他們身上解去了，至少，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在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由這個字的意義上，是自由了。

不僅如此。他們通常設立一種自治機關，有權推舉市長，設立市議會，設立市政府，頒佈市法規，建築城堡以自衛，使居民習戰事、任守備。遇有敵攻或意外事情，凡屬居民，不分晝夜，都須盡防衛責任。在英格蘭，他們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轄；所有訴訟，除公訴外，都可由市長判決。在其他各國，市長所得的裁判權尤大。

市稅由市民包辦的都市，不能不給它們以某種裁判權，藉以強迫市民納稅。此時，國家紛亂，如果要它們到別的法庭請求這種判決，勢必極其困難。但很奇怪，歐洲各國君主，為什麼這樣地用這部分稅收來交換這種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稅。我們知道，這種稅收在一切稅收中，是最不必勞神費財，自然會增加起來的。此外，還有一點，也是很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們竟然自動地在他們領土的中心，建立一種獨立的民主國。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須記得，在當時紛亂情形下，歐洲各國君主，也許沒有一個能保護國內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領主的壓迫。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國法保護，又無力自衛，所以只有兩條路走，就是說，若不投身某大領主之下，為其奴隸，乞求保護，就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守衛，彼此相互保護。城市居民單個地說，沒有自衛能力，但一經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輕視。領主常鄙視市民，不僅認為市民的身分與己不同，而且認為市民是被釋放的奴隸，其族類亦與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領主嫉妒憤怒，有機會即加以壓迫欺凌，不稍寬恕。市民當然嫉恨領主，畏懼領主。恰好，國王亦畏懼領主，嫉恨領主。另一方面，國王雖亦鄙視市民，但他沒有嫉恨他們、畏懼他們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關係，使國王市民互結同盟，以抗領主。市民是國王敵人的敵人，所以，國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盡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變為穩固，不依靠這種敵人。給予市民權力，使能推舉市長，制訂市法規，建築城堡自衛，進行軍事訓練，國王就這樣盡他權力之所及，把一切獨立安全的手段給與市民，使他們不依靠領主。但要使他們的自由同盟能對他們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對國王提供相當大的援助，則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組織不可，非有強制居民服從的權威不可。至於把市稅永久包給他們，則是為了表

明心跡，使他願結為朋友、結為同盟的人，不疑懼他將來會再壓迫他們，會把稅額提高或把稅包給別人。

對領主感情最壞的國王，對於市民，敕賜往往最為寬大。例如英格蘭國王約翰，對市民最為寬容。法蘭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統率領主的權力。至其末年，據神父丹尼爾說，其子路易，即後來稱為肥路易的，與國內各主教，籌商最適當的方法，以取締領主暴行。主教們的意見，可歸納為兩種提議。一，在國王領土內，各大城市都設市長和市議會，以創設新的管轄體系。二，使城市居民，組織新的民軍，聽市長調遣，在必要時，出發援助國王。據法蘭西各考古學家說，法蘭西市長制度和市議會制度，就是這時創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蘇阿比亞王統治下，纔得到這種種特權；有名的漢薩同盟，也是在這時纔開始露頭角。

都市民軍的力量，此時既不下於鄉村民軍，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與當地領主爭議時，他們常佔優勢。意大利、瑞士等地，各個都市或由於離首府所在地很遠，或由於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於其他原故，君主對它們已全無權力，它們大都逐漸成為獨立的民主社會，並征服當地貴族，迫令其拆毀鄉間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資格居住在都市內。伯爾尼民主國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簡史，類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意大利屢起屢滅的無數大民主國的歷史亦復如此。

英法二國王權雖有時甚為式微，但從未全部消滅。都市因此沒有完全獨立的機會。但因市民勢力日張，除上游的市稅以外，國王一切賦稅，須得市民同意，才徵收得到。國王有急需，就通詔全國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國會。這些代表可與牧師和貴族一起議決，給與國王特別經濟援助。由於市民代表，大都袒護國王，國王有時利用他們從抵抗議會內大領主的權力。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歐洲各大君主國的國會的由來。

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就在這種狀態下，在各都市確立了。但此時，鄉村耕作者，依然受貴族的各種迫害。處於無力自衛狀態的人，自然滿足於僅夠過活的生活資料；因為，擁有更多財富，只會招惹壓迫者更苛虐的誅求。反之，當人們勤勞的結果確有親自享受的把握時，他們就自然會努力來改善他們自身的境遇，不僅要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娛樂品。所以，以生產生活必需品以外的東西為目的的產業，在都市建立的時期，比在農村早得多。在賤奴狀態下受領主鉗制的貧窮農民，稍有儲蓄，必掩藏唯謹，免得領主看見，攬為己有，而且一有機會，即逃往都市。加之，當時法律對市民既如此寬縱，同時又如此熱望削減領主對農民的權力，所以，農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為領主所獲，即可永享自由。因此，鄉村勤勞居民，一有蓄積，自然會逃到都市來，把都市看作他們唯一安全的避難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產業手段，歸根到底，都出自農村。但近海岸沿河邊的城市居民，卻不一定只從鄰近農村得到這些物品。他們有大得多的範圍。他們或只自身工業的製造品作交換，或經營遙遠國家間的運送業，以甲國產物交換乙國產物，而從遠地取得他們所需要的種種物品。一個城市不但在其鄰近各農村都很貧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與通商的各個農村也都很貧乏很衰落的情況下，仍可發達起來，日臻於富強。因為單個地說，每個農村對它所能提供的食料與僱傭機會也許有限，但綜合起來說，它們所能提供的卻極可觀。不過，在商業範圍還極狹隘的那時，就有些國家很富裕、產業就很發達了。例如，未曾滅亡時的希臘帝國，亞巴西德統治下的撒拉遜人的帝國，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巴伯裏海岸某地，以及摩爾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在歐洲，最早由商業致大富的，似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當時居於世界的文明部分和進步部分的中心。十字軍雖然破壞了許多資財，傷害了許多居民，妨礙了歐洲大部分地方的進步，但卻非常有利於意大利若干城市的發展。為爭奪聖地從各地出發的大軍，對於威尼斯、熱那亞和比薩各市的航海業，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十字軍有時由這些地方的船隻運送，其糧食則常由它們供給。它們簡直可以說是大軍的輜重隊。使歐洲其他各國遭受極大破壞的十字軍，卻成為這些民主國富裕的泉源。

商業城市的居民往往以製造品和奢侈品運往富國，只滿足大富翁的虛榮心，大富翁亦極願以大量本國土產物來交換。因此，當時大部分歐洲商業，主要都是以本國土產物交換較文明國的製造品。英格蘭

的羊毛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及弗蘭德的精製呢絨交換；波蘭的穀物亦常與法蘭西的葡萄酒白蘭地酒及法蘭西意大利的絲絨交換。

這樣，對精良製造品的嗜好，就通過國外貿易超漸普及到未有精製造業的國家。但此種嗜好，一經普及於國內，便引起很大的需要，商人為免去運輸費起見，自然會想到在本國建立同種製造業。這就是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歐各地為遠地銷售而建立的製造業的由來。

但我們必需注意，世界上從未存在過而且也決不能存在完全沒有製造業的大國，我說的大國沒有製造業，所指的只是精良進步的製造業，或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各大國大部分居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傢俱，都是本國產業的產物。此種情形，在普通所謂無製造業的貧國，尤為常見，而在普通所謂製造業發達的富國，反而不常見。與貧國比較，富國下等階級人民日用的衣服傢俱，反有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國的產物。

各國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其發生的情況有兩種。

第一種是國內商人和企業家象上面所說，有時因要仿效外國某種製造業，而勇往直前地（如果可這樣說），把資本投下來經營的。象這樣發生的製造業乃是國外通商的結果。十三世紀盛行於路卡地方的綢製造業、絨製造業、緞製造業，即如此發生。此等製造業，後為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拉卡尼的暴令所驅逐。1310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卡；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議在那裏開辦綢業。當地官吏准許，並給以多種特權。因此，他們就在那裏創設綢業。開始的時候，即僱有工人三百。伊麗莎白時代才傳入英格蘭而在古代即已盛行於弗蘭德之呢絨業，現在里昂及斯皮塔菲爾的綢業，似乎也是這樣發生的。這樣發生的製造業，因為是仿效外國，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國材料。當威尼斯初有製造業時，一切材料，都從西西里及利文運來。更久以前的路卡製造業，其所用的材料亦產在外國。桑樹的培植，蠶蟲的飼養，在十六世紀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還不大知道。種桑養蠶的技術，在查理九世時代，才傳入法國。弗蘭德製造業所用的羊毛，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英格蘭。西班牙羊毛，雖然不是英格蘭毛織物最初採用的材料，卻是適於遠地銷售的毛織業最初所採用的材料。現時里昂製造業所用的絲，亦大半是外國產；而且，在它初建時，就全部或幾乎全部是外國產。斯皮塔菲爾製造業所用的材料，

大概一向全部都不是英國產物。象這樣的製造業，大部分是因少數人的計謀而創辦的，所以設立的地址，有時是濱海的都市，有時是內陸的都市，視這少數人的利害關係和主意而定。

有時，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逐漸改良而成的。我們說過，即最貧陋的國家，亦常有家用品製造業和粗物製造業。由這種製造業逐漸改良而生的製造業，大都使用本國出產的材料；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離海岸很遠有時甚至離可通航運的水路亦很遠的內地加工的。土壤肥沃的內地，耕作容易，所產物品，除了維持耕者生活所需外，還有很多剩餘。這種剩餘，因陸運費太貴，航運不便，不易運往外地。因此，出產的豐饒，使糧食低廉，從而鼓勵工人住在那裏。他們覺得，在那裏勞動化在其他地方可獲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們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產的，他們把材料加工後，即以製成品，或者說，以製成品的價格，換得更多的材料和糧食。他們節省了由內地到沿河沿海各地或遙遠市場的運輸費，從而給剩餘部分原生產物，增加了一個新的價值。這樣，耕者可以比從前更為簡易的條件，從這班工人手裏取得對他們有用或者使他們滿意的物品。對於剩餘部分農產物，耕者可取得更高的價格；他們所需要的其他便利品，又可以較低價格買得。這鼓勵農民並使農民有能力進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餘的廣量。土地肥沃，使製造業誕生，而製造業的發展，又轉過來增進土地的出產力。製造業最初僅供應本地；後來，作品精緻改良了，便能供應遠地的市場。因為，原生產物甚至粗製造品很難擔負由陸運運往遠地的費用，而精製造品卻不會成到這種困難。精製造品，在小容積中，常包含大量原生產物的價格。例如，一匹精製呢絨，雖僅重八十磅，但所含價格，卻不僅是八十磅羊毛的價格，而且，有時，還包含着幾千磅穀物，即各種工人及其直接僱主的生活資料的價格。這種穀物，如果以穀物的原形運往海外，定然是極困難的。但若以精製品的形態運往，則雖運往最遠的角落亦很容易。利斯、赫利法克、設菲爾德、伯明翰、沃弗漢普頓等地的製造業，就是按照這個方式，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的。這種製造業是農業的結果。其推廣與改進，在歐洲現代史上，一般遲於那些由對外貿易促成的製造業。在現在在上述各地很繁榮的那些製造業適於外銷以前一百多年，英格蘭就以其用西班牙羊毛為原料的精製呢絨業著名於世了。前一類製造業是隨着農業的發展而

推廣、改進的，而農業的推廣與改進，又是國外貿易和直接由此而產生的製造業的最後和最大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面說明。

第四章都市商業對農村改良的貢獻

工商業都市的增加與富裕，對所屬農村的改良與開發，有所貢獻，其貢獻的途徑有三。

一；為農村的原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易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的開發與進一步的改進。受到這利益的，不僅僅是都市所在的農村。凡與都市通商的農村，都多少受其實惠。它們為此等農村的原生產物或製造品，提供了市場，結果就鼓勵了其產業和產業的改進。當然，靠近都市的農村，所得實惠，自必最大。其原生產物的運輸，所費既較省，所以，與較遠農村的產物比較，商人們即使付給生產者較高的買價，但對於消費者，取價卻仍可一樣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獲的財富，常用以購買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開墾的土地。商人們都渴望變成鄉紳。而且，在他們變成了鄉紳的時候，他們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與鄉紳不同。鄉紳是一向奢侈慣了的，他只會花錢，從來不會想到賺錢。商人卻常用錢來經營有利事業，他用一個錢，就希望在這一個錢回來的時候，帶回一些利潤。他們這種不同的習慣，必然會影響他們在一切事業上的性情和脾氣。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業家，鄉紳往往是膽怯的事業家。就商人說，如果他覺得投下大資本來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費用的比例增大它的價值，他就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但鄉紳很少有資本，即使有些資本，也很少敢如此來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進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資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餘。設你幸而住在四周農村多未開墾的商業都市中，你當能看到商人在這方面的活動，比鄉紳是活躍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經商而養成的愛秩序、節省、謹慎等各種習慣，也使他更適合於進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獲利。

三，農村居民一向處在與其鄰人的戰爭和對其上司的依附狀態中。但工商業的發達，卻逐漸使他們有秩序，有好政府，有個人的安全和自由。這一種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卻不為世人所注意。據我所知，曾注意此點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謨先生。

在既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農村，一個大地主，對維持耕作者所剩餘的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既無物可以交換，就無所謂地把它花費於鄉村式的款客。這剩餘部分，如足夠養活一百人，他即用以養活一百人，如足夠養活一千人，他即用以養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實無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圍常有成羣的婢僕和門客。他們依賴他的給養，既無任何等價物品為報酬，就服從他，象兵士服從國王一樣。在歐洲工商業尚未擴張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領主，其待客的闊綽，都超過我們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廳，為威廉·魯弗斯的飯廳，然而常有人滿之患。托馬斯·伯克特常以清潔的草蓆，鋪於廳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士文人，不致染污他們嶄新的衣裳。據說，瓦維克大公每日在各莊園所款待的賓客，達三萬人；此或言過其實，但數目必很大，否則不會被誇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知道，不多幾年前，蘇格蘭高地一帶，仍盛行近似這種規模的款客，而在工商業很不發達的民族，這種風氣，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說：“我曾見一阿拉伯酋長，在他售賣牲畜的市中，當街宴請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賴大領主，無異於他的婢僕。他們即使不是賤奴，也是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他們所納的地租，無論就任何方面說，也不能與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資料等價。數年前在蘇格蘭高地一帶，足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納地租，僅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現在依然如此；而且現在該處的貨幣，與他處比較，也並不能購買更多的商品。其實，在一個大莊園所產的剩餘產物必須在本莊園內消費的農村，為地主便利打算，與其在家中消費這全部剩餘，不如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消費其一部分，如果消費它的人們，是象門客家僕一樣，聽從自己號令的話。這樣，他可省去許多麻煩，伴侶不至過多，家庭不至過大。僅付比免役租多一點的地租，而佔有能維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其從屬於領主，無異於婢僕、家奴。他們須絕對服從領主的命令。這種領主，在佃農家裏養佃農，與在自己家裏養婢僕、家奴，無甚區別。婢僕和佃農的食糧都來自領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繼續則取決於領主的高興。

在這情況下，大領主對於其佃農和家奴，必然有一種駕馭的權威。這種權威，便是一切古代貴族權力的基礎。他們在平時，是境內

居民的裁判者，在戰時，是境內居民的統領者。他們有統率境內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權力，所只在境內成了治安的維持人，法律的執行者。沒有任何其他人擁有這樣的權力，國王也沒有這權力。國王在古代，不過是領土內最大的領主，其他領主，只為共同防禦共同敵人，纔給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國王要依靠自己的權力，強制某大領主領地內人民償還小小的債務，那裏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國王所要花的力量，幾乎將等於消滅一個內戰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將大部分農村的司法權，交給能執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統轄民軍的權力，交給能統轄民軍的人。

說這種地方性裁判權起源於封建法律，實是一個錯誤。不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權，在歐洲尚不知有所謂封建法律以前數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領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權、鑄幣權、制定地方行政法規權，也已在這時候掌握在大領主手中了。英格蘭被征服前的薩克遜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並不下於被征服後諾爾曼各領主所掌握的統治權與裁判權。但我們不可設想，直到被征服以後，封建法律才成為英格蘭習慣法。在法蘭西，領主統治僅、裁判權的發生先於封建法律的發生，尤為不容置疑的事實。這種種權力，無疑會隨着上述各種財產制度與風習而產生。且不講古代英法兩王國吧，我們就在晚得多的時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據，證明這種種結果必隨這種種原因而發生。不到三十年前，蘇格蘭洛赫巴地方，有個叫做克默倫的紳士，不是貴族領主，甚至不是一個大佃農，不過是亞蓋爾公爵的一個家臣罷了。他既沒有獲得正式的委任狀，又不是治安推事，卻對其民衆執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權。據說，他的審判裁判，雖無司法儀式，卻很公正。也許在當時當地的情形下，他為維持公共治安計，不得不出面承攬這權力。這位紳士，每年得租不過五百鎊，1745年率領八百人蔘加了斯托亞的起義。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決不是想擴大封建領主的權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們的權力縮小。自國王以下，直到最下級的領主，都由封建法律妥為制定等階，各有各的職守和義務。在領主未成年時，該領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歸其直接上司領受，土地管理權亦歸其直接上司掌握。結果，各大領主未成年時，他們土地的地租和對土地的管理權也都歸於國王。國王對於這種未成年的領主，盡保護教育的責任，並

以監護人的資格，爲之婚娶，不過選擇的對象，要身分相稱。但是，這種法律，雖本意要加強國王的權力，削弱大領主的權力，但仍不能使鄉村居民得有安寧的秩序良好的政府，因爲它不能徹底改變紛亂狀態所由而起的財產制度與風習。政府的權力仍過小，貴族的權力仍過大，而貴族權力過大，正是政府權力過小的原因。封建等階制度雖然確立了，國王仍不能制服大領主。大領主，依然橫暴如故。他們相互間依然不斷地任意作戰，甚至常常對國王作戰。廣大的鄉野仍呈一片強取豪奪和騷亂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憑一切強制力量所辦不到的事，卻由國外商業和製造業潛移默化，逐漸實現。國外商業與製造業的興起，漸使大領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餘產物與他物交換。由此而得的物品，於是無須與佃農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費。完全爲自己不爲他人，這似乎是一切時代爲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們一發現了由自己來消費所收地租的全部價值的方法之後，他們就不願再和別人共同享受這價值。他們就寧願把足以維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糧食或其價格，用來換取一對金鋼石鈕釦或其他同樣無用而無意義的東西，隨而也把這糧食所能給他們帶來的權威一併捨棄了。但金鋼石鈕釦是由他自己獨享、無人與他共享的。至於以前的花費方法，他至少要與一千人共享。這區別是非常明顯的，要作出取捨的決定，有賴於明智的判斷。於是，爲了滿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虛榮心，他們終於完全捨棄了上述權威。

在無國外貿易又無精製造業的國家，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除了以這一萬鎊養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聽命以外，也許就沒有其他的消費方法。但在現在的歐洲，每年有一萬鎊收入的人，不必直接養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喚無使喚價值的僕役十多人，卻可消費其全部收入。事實上，他通常也是這樣做。他間接維持的人，也許和往昔消費方法所僱用的一樣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換得的寶物量，也許很少，但爲採集製造這寶物而被僱用的工人，卻必然很多。這種寶物的昂貴價格，大都由於這些工人的工資及其直接僱主的利潤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寶物的價格，即間接支付這一切工資與利潤，從而間接維持了這些工人及其僱主的生活。不過，他對於他們各人的貢獻，卻只是他們全年生活費的極小部分。他們各人每年的生活費，來自他一個

人的，少數佔全部的十分之一，許多佔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則尚不及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他雖然對維持他們全體的生活有所貢獻，但他們全體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維持，所以，對於他，他們就多少是獨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地租維持佃農和門客的生活時，他們是各自維持各自的佃農和門客的生活。但在他們以地租維持商人工匠時，他們全體所能養活的人數也許和往昔一樣多，而且由於鄉村式的款客方法難免浪費，現在所能養的，也許比往昔還多。但是，分開計算，他們每個人對這較大人數中每個人的生活費所貢獻的往往極微。每個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費，都不是得自一個顧客，而是得自千百個不同的顧客。他在某程度上，雖要仰給於他們中每一個人，但不絕對仰賴他們中任何一個人。

大地主的個人消費，就在這情況下逐漸增大起來。因此，他所養活的門客，就非逐漸減少以至全部打發掉不可。由於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農，亦非逐漸打發不可。農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顧對裁減佃農的怨言，卻仍把佃農人數減少到按照當時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況耕作所需要有的最少人數。由於盡數打發了不必要的寄食者，由於逼着佃農繳出農田所能提供的全部價值，地主所得的剩餘，或者說剩餘的價格，逐漸增大了。這個較大的剩餘，商人和製造業者又給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來消費，象前此消費其餘部分一樣。個人消費增大這個因素，又驅使地主們渴望所得地租，能超過現在改良狀態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數額。但這樣土地就要進一步改良，佃農就要增加費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夠長，不足以使他收回這增加的費用及其利潤，他決不會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長租期。地主們愛好浮華，要擴大用度，終於承認佃農的條件。這就是長期租地權的起因。

可隨意退租的佃農，耕作土地，給付十足的代價，他並非完全隸屬於地主。他們彼此所得的金錢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隨意退租的佃農，不會犧牲生命與財產來為地主服務，而在租期延長後，他就簡直是獨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約或習慣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點其他事情。

佃農既已獨立，門客又已打發掉，大領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執行，不能再擾亂地方的治安了。他們那與生俱存的權利已經賣

掉，然而，出賣的目的，不是象伊騷那樣爲了飢餓，爲了必需，卻僅僅爲了耳目玩好，僅僅爲了爲兒童所玩樂而非成人所應追求的寶石鑽戒。因此，他們就象城市中的殷實市民或商人一樣平庸了。於是，在城市，在鄉村，都設立了正常的政府。沒有誰能擾亂都市的政治，也沒有誰能擾亂鄉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與本題無關，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產，由父傳子，子傳孫，傳至許多世代的世家，在商業國，是極罕見的。反之，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如威爾斯，如蘇格蘭高地，則極普通。阿拉伯歷史，充滿着貴族的世系；有一位韃靼可汗，著了一部歷史，曾經譯成幾種歐洲文字，其中，就全是關於貴族的世系。這可證明，古世家在這些國家是極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於養活儘量多的人的國家裏，富人的用度很少過分，他的仁愛心似乎難得熱烈得使他企圖養活超過他所能養活的人數。但在收入的最大部分歸個人消費時，他的用度就往往極無限制；因爲他的個人虛榮心，是無限制的、永遠滿足不了的。所以，在商業國，即使有極嚴厲的法規取締揮霍浪費，長期富裕的家庭仍屬罕見。但在商業不盛的國家，即使沒有法規取締，亦多長富之家。象韃靼和阿拉伯那樣的遊牧民族，財產不易消費，取締浪費的法規，亦無設立的可能。

對於公衆幸福，這真是一種極重要的革命，但完成這種革命的，卻是兩個全然不顧公衆幸福的階級。滿足最幼稚的虛榮心，是大領主的唯一動機。至於商人工匠，雖不象那樣可笑，但他們也只爲一己的利益行事。他們所求的，只是到一個可賺錢的地方去賺一個錢。大領主的癡愚，商人工匠的勤勞，終於把這次革命逐漸完成了，但他們對於這次革命，卻既不瞭解，亦未預見。

因此，在歐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業是農村改良與開發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

但是，這種發展，既與自然趨勢相反，當然是遲緩和不確定的。試一比較以工商業爲國富基礎的歐洲各國的緩慢進步，與以農業爲國富基礎的我國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進步吧。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數目，在將近五百年中，未增加一倍。我國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卻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歐洲，長男承繼法和各種永久所有權，使大地產不能分割，因而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們知道，小地

主對其有限土地十分熟悉，愛護備至。他不但喜歡開發它，而且喜歡改良它。他在各種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聰明、最常成功的了。加之，長男承繼法和永久所有權，又使許多土地不能出賣，常使購買土地的資本多於待售的土地，從而使土地常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買價的利息，至於修補費，及其他各種意外費用，更不用說。所以，購買土地，在歐洲，是小資本利潤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經營工商業了的人，為圖安全起見，亦有時願把小資本用來購買土地。還有些從別個來源取得收入的專門職業家，亦常因要保儲蓄的安全，喜投資購買土地。但是，一個青年，如果不願從事工商業，而用二三千鎊資本購買一小塊土地來開發，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圖成為大富翁、大名人，就絕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資本用於別的用途，他就可望發大財或享大名，和別人一樣。而且，這樣的青年人，雖不希望成為地主，但大都不願為農民。這樣，任人購買的土地既少，土地的賣價又高，結果，使許多原來可能用於改良土地開發土地的資本都不投到這方面來。反之，在北美洲，則有五六十鎊的資本，便足夠用來開辦一個農場。那裏，未開墾土地的購買與開發，既為最大資本最有利的用途，亦為最小資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樣的地方，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裏的土地，幾乎可全無代價取得，即使須出代價，亦比其自然生產物的價值少得多。這種事在歐洲是絕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為私有財產的任何國家都是不會有的。可是，當一個大家庭的家主死時，所遺土地財產若能平均分配於各個兒女，則所遺地產，大都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會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獨佔價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這樣將漸足抵付買地地價的利息；以小額資本購買土地，亦將和其他用途同樣有利。

英格蘭，因土壤天然肥沃，因海岸線與全國面積相比甚長，又因有許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貫其間，使內陸各地，能有水運之便，所以，與歐洲任何大國比較，都一樣宜於國外通商，一樣宜於經營遠地銷售的製造業，一樣宜於上述情況所能引起的種種改良。此外，自伊麗莎白即位以來，英國立法，都特別注意工商業的利益；事實上，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即荷蘭亦不例外，其法律一般地說，能這樣有利於此種產業。所以，英國工商業就在這整個時期內不斷地向前發展起來。無疑，農村的開發與改良，亦不斷地在進步；但其進步，似較遲

緩，不如工商業的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許在伊麗莎白時代以前就耕種了，可是還有很大部分，仍全未耕種，至於已耕種的土地，其耕作狀況，大部分亦未盡滿人意。不過，英格蘭的法律，不僅由保護商業而間接鼓勵農業，且有若干對農業直接加以獎勵。除歉收年度外，穀物輸出，不僅自由，且有獎金。在收穫一般的年度，外谷輸入，又有等於禁止輸入的關稅。除了來自愛爾蘭的以外，活牲畜的輸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許從愛爾蘭輸入亦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在兩種最重要的土地生產物即麪包與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實享有一種獨佔，他人無從染指。這種獎勵，雖象我後面指出的那樣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國立法當局，實有贊助農業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蘭法律對於國內農民曾竭盡所能使其安定獨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長男承繼法尚未消滅，什一稅繼續徵收，與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權有時仍然有效的國家中，英格蘭總算是最鼓勵農業的國家了。但英格蘭農業的情況，仍是如此。設使農業除了由於商業進步而間接得到鼓勵以外，沒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勵，政府袖手旁觀，聽任農民的處境停留於與歐洲其他各國相同的狀態，那末，農業將呈現何種情況呢。伊麗莎白即位迄今已二百餘年了。這悠長的期間，是人類繁榮階段通常所能持續的最久期間。

在英格蘭成為大商業國以前大約一百年，法蘭西的對外貿易很可觀。照當時人的設想，似在查理第八遠征那不勒斯以前，法國的航海業就已很可觀。但就全體說，法蘭西土地的耕作與改良，遜於英格蘭。法國法律從未給予農業以直接的獎勵。

西班牙與葡萄牙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雖多由外國船舶裝運，但很可觀。西班牙葡萄牙對他們殖民地的國外貿易，由本國船裝運，這貿易因殖民地富饒廣大，尤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國外貿易，並不曾在這兩國內引起任何重大的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甚至，這兩國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開墾。就國外貿易說，在歐洲各大國中，除意大利外，葡萄牙歷史最久。

由於國外貿易及適於遠地銷售的製造業而使全國土地全部得到開發與改良的國家，在歐洲，似乎只有一個意大利。據古西亞迪尼說，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農村已經耕種，而且最多山最荒蕪的地區也同樣已經耕種。這個國家所處的相當有利的

地位，以及在這個國家裏存在的大量獨立小邦，對於上述土地的全面開墾或不無貢獻。然而，這位賢明的近代歷史家雖這樣說，但那時意大利的土地墾作，不及今日的英格蘭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無論哪一個國家，通過工商業而獲得的資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與改良事業上得到保障和實現，總是極不確定的財產。說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國家的公民，這句話真是不錯。究竟在何處營業的問題，在他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他們對甲國成到一種厭惡，那怕頂微小，亦可使他把資本從甲國遷到乙國。跟着資本的遷移，資本所維持的產業，亦必移動。在資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為建築物，成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資本決不能說屬於某一國。據說汗薩同盟大部分都市都擁有大財富，這財富如今到哪裏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紀、十四世紀模糊的歷史中外，廈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甚至它們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麼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稱究竟屬於歐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確定。但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意大利所遭的災禍，雖然使倫巴迪亞和托斯卡納所屬各城市的工商業大為衰落，但這些地方，至今仍為歐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弗蘭德在內戰後又受西班牙的統治，這些雖然延去了安特衛普·根特、布魯哲斯的大商業，但弗蘭德至今仍為歐洲財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進步的地方。戰爭與政治上的一般變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業為唯一來源的富源趨於耗竭。通過比較可靠的農業改良而產生的富源就比較持久得多，除了由於敵對蠻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續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較激烈的大變動，如羅馬帝國崩潰前後西歐的大變動外，其他事件都破壞不了。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序論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

不同時代不同國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產生兩種不同的關於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其一，可稱為重商主義；其二，可稱為重農主義。關於這兩個主義，我將盡我所能，作詳細明瞭的說明，而且將從重商主義開始。這是近世的學說，在我國今日又最爲人所理解。

序論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

不同時代不同國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產生兩種不同的關於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其一，可稱為重商主義；其二，可稱為重農主義。關於這兩個主義，我將盡我所能，作詳細明瞭的說明，而且將從重商主義開始。這是近世的學說，在我國今日又最爲人所理解。

第一章商業主義或重商主義的原理

財富由貨幣或金銀構成這一通常流行的見解，是自然而然地因貨幣有兩重作用而產生的。貨幣是交易的媒介，又是價值的尺度。因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我們用貨幣，比用任何其他商品，都更容易取得我們所需的物品。我們總是覺得，獲取貨幣是一件要事。只要有貨幣，以後隨便購買什麼，都沒有困難。因為它是價值的尺度，我們使用各種商品所能換得的貨幣量，來估計其他各種商品的價值。有很多貨幣的人，被稱為富人；只有極少一點貨幣的人，被稱為窮人。儉樸的或想發財的人，被說成是愛貨幣的人；不謹慎的、不吝嗇的或奢侈的人，被說成是漠視貨幣的人。發財等於是有了貨幣。總之，按照通俗的說法，財富與貨幣，無論從哪一點看來，都是同義語。

象富人一樣，富足的國家往往被認為擁有很多貨幣。在任何國家，貯積金銀被認為是致富的捷徑。美洲發現後，有一個時期，西班牙人每到一個生疏的海岸，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近處有無金銀髮現。他們就根據這種情報，判定那個地方有沒有殖民的價值，乃至有沒有徵服的價值。以前，法蘭西國王特遣僧人普拉諾·卡爾比諾去見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據這位大使說，韃靼人所常常問到的，只是法蘭西王國的牛羊多不多。他們的問題和西班牙人的問題有同樣的目的。他們想要知道那個國家是否十分富足，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都不知道貨幣的用處；在他們中間，牲畜便是交易的媒介，便是價值的尺度。所以在他們看來，財富是由牲畜構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來，財富是由金銀構成一樣。在這兩種看法中，韃靼人的看法也許最接近於真理。

洛克先生曾指出貨幣與其他各種動產的區別。他說，其他各種動產是那麼容易消耗，以致由這等動產構成的財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這等動產的國家，即使毫無輸出，只要是奢侈浪費，明年就可能很缺少這等動產。反之，貨幣卻是一個可靠的朋友，它雖然會由這個人轉給那個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國外，就很不容易浪費消耗。所以，在他看來，金銀乃是一國動產中最堅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認為，由於這個緣故，增加此等金屬，應當是該國政治經濟的大目標。

另一些人卻以為，一國如能脫離全世界而存在，則國內流通的貨幣無論多少，都毫無關係。借這種貨幣而流通的可消費物品，只會換取或多或少的貨幣；他們認為，這樣的國家實際上是富是貧，完全取決於此等可消費物品的豐饒或稀少。但對於那些同外國發生聯繫，而且有時不得不對外作戰，因而有必要在遠地維持海陸軍的國家，他們的看法卻又不同。他們說，除了送出貨幣來支付給養，否則就無法在遠地維持海陸軍，但要送出貨幣，又非先在國內有許多貨幣不可。所以，每個這樣的國家都必須盡力在和平時期累積金銀，一旦需要，纔會有財力進行對外戰爭。

由於有這些通常流行的見解，歐洲各國都盡力研究在本國累積金銀的一切可能的方法，雖然沒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屬供給歐洲的主要礦山佔有者，它們曾以最嚴厲的刑罰或苛重的關稅禁止金銀輸出。往時，其他大多數歐洲國家似乎也都採用類似的禁止辦法作為它們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古代蘇格蘭議會法案裏，我們會出乎意料地發現，亦曾以重刑禁止金銀輸出國外。法蘭西和英格蘭古時候也曾採用同樣的政策。

當那些國家成為商業國時，商人們在許多場合總感到這種禁令非常不便。他們以金銀為媒介，向外國購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輸入本國或運往別國，比用任何其他商品為媒介，往往都更為有利。因此他們反對這種禁令，認為它妨害貿易。

他們說，首先，為購買外國貨物而輸出金銀，未必會減少國內的金銀量。反之，還往往會增加那種數量；因為，如果外貨消費額並不因此而國內增加，那些貨物就可再輸出國外，以高利潤在那裏售出，所以，帶回來的財寶也許會比原來為購買貨物而輸出的金銀多得多。托馬斯·孟把這種國外貿易的作用同農業的播種期和收穫期相比較。他說：“如果我們只看見農夫在播種時期把很多優良穀物撒播到地裏去的行為，我們一定會把他看做一個狂人而不是農夫。但如果我們再考察他在收穫期間的勞動，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行為是既有價值又有很大的收穫的。收穫纔是他努力的目的。”

第二，他們說，這種禁令並不能阻止金銀輸出，因為金銀價值大體積小，極容易向外走私。他們以為，只有適當地注意所謂貿易差額，才能防止這種輸出。當一國輸出的價值大於輸入的價值時，外國

就欠它一個差額，那必然以金銀償還，從而增加國內的金銀量。當輸入的價值大於輸出的價值時，它就欠外國一個差額，這必然也以金銀償還，從而減少國內的金銀量。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禁止金銀輸出，就不但不能阻止金銀輸出，而且將使金銀輸出加多一層危險，從而使金銀輸出加多一層費用。所以，在這種禁令下，匯兌將更不利於有逆差的國家；購買外國匯票的人，對於售賣外國匯票的銀行，不僅要對運送貨幣的天然風險、周折與費用付出代價，而且要對由於禁止金銀輸出而產生的意外風險付出代價。匯兌愈是不利於一個國家，貿易差額亦必然愈是不利於這個國家。與貿易差額順差的國家比較，貿易差額逆差的國家的貨幣價值必定相應地低得多。譬如，英、荷兩國間的匯兌，若百分之五不利於英國，則在匯兌時便須以英銀一百零五盎斯購買荷銀一百盎斯的匯票。英銀一百零五盎斯既然與荷銀一百盎斯的價值相等，故亦只能購得相應數量的荷蘭貨物。反之，荷銀一百盎斯卻與英銀一百零五盎斯的價值相等，故亦可購得相應數量的英國貨物。總之，售給荷蘭的英國貨物將以低得那麼多的價格出售，而售給英國的荷蘭貨物又將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出售，這都是由於匯兌的這種差額。英國貨物所換回的荷蘭貨幣少得那麼多，而荷蘭貨物所換回的英國貨幣卻多得那麼多。所以，貿易差額就必然在那麼大的程度上更不利於英國，必須把更大數量的金銀輸往荷蘭，以彌補差額。

以上的議論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卻是強辭奪理的。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往往有利於國家的議論，是正確的。認為在私人覺得金銀輸出有利時，禁令不能防止金銀輸出的議論，也是正確的。但他們如下的議論卻是強辭奪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國其他有用商品的數量，需要政府更大的關心；自由貿易能確保這些商品的適量供應，毋需政府給予那樣的關心。他們又說，匯兌的高價必然加劇他們所謂的貿易差額的不利程度，或導致更多的金銀輸出，這樣的說法也是強辭奪理。誠然，這種高價極不利於該欠外國債務的商人。在購買外國匯票時，他們要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付給銀行。但是，雖然由禁令而產生的風險可能使銀行索取額外費用，卻未必會因此而輸出更多的貨幣。這種費用，一般是在走私時在國內支付的，它不會使人在所需匯出的數目以外，多輸出一文錢。匯兌的高價，也自然會使商人努力平衡他們的輸出和輸入，使他們儘量縮小他們的支付額。此外，匯兌的高價必定會產生類似課稅的作

用，因為它增高外貨的價格，從而減少外貨的消費。所以，匯兌的高價不致於增加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而只會減少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因而也會減少金銀的輸出。

儘管這樣，那些議論卻使聽取它們的人深信不疑。它們是由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陳述的；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這種問題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知道，國外貿易可以富國，但對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他們卻沒有一個懂得清楚。商人們完全知道，國外貿易如何使他們自己富裕。理解這個問題，原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但瞭解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卻不是他們的份內之事了。除了在他們要向國家請求改訂國外貿易法案的時候，他們從來不考慮到這個問題。只有在請求改訂法律的時候，他們才必須陳述國外貿易的有利結果，才必須陳述現行法律如何阻礙這種有利的結果。他們向那些要對這種事情作出決定的裁判官說，國外貿易可以帶貨幣回國，但國外貿易法卻使國外貿易所帶回來的貨幣比沒有這種法律的時候少。裁判官聽了這個說法，也覺得十分滿意。這種議論於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金銀輸出禁令，僅以本國的鑄幣為限。外國鑄幣和金銀塊的輸出，聽其自由。在荷蘭和其他一些地方，這種自由甚至擴展到本國鑄幣。政府的注意力，從對金銀輸出的監視，轉到對貿易差額的監視，而把貿易差額看作能夠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原因。他們放棄了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轉向另一個更為複雜、更為困難但卻是同樣毫無結果的監督。托馬斯·孟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準則。內地或國內貿易，尤其重要的是，即那種以同量資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國人民獲得最大就業機會的貿易，卻被視為只是國外貿易的輔助。據說，國內貿易既不能從外國帶貨幣回來，也不能把貨幣帶出國外。所以，除非國內貿易的盛衰可以間接影響國外貿易的狀況，否則它就決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貧困。

沒有葡萄園的國家，須從外國取得葡萄酒；同樣，沒有礦山的國家也無疑地必須從外國取得金銀。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個有資力購買葡萄酒的國家，總會獲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決不會缺少那些金

屬。金銀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必須以一定的價格購買；而且，正因為它們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那些金屬的價格。我們完全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無需政府注意，也總會給我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葡萄酒；我們可以同樣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總會按照我們所能購人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給我們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於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銀。

在各個國家，人類勤勞所能購入或生產的每一種商品量，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願意支付為生產這種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勞動與利潤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調節。但按照有效需求而發生的這種調節作用，在金銀這種商品上最為容易，也最為準確；這是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最容易從一處地方運到另一處地方，從價廉的地方運到價昂的地方，從超過有效需求的地方運到不足以滿足有效需求的地方。譬如，如果英格蘭除自己所擁有的黃金外，其有效需求還需要一定數量的黃金，那末一艘兼載客貨的定期郵船就可從里斯本或從其他可以購買黃金的地方運來黃金五十噸，用以鑄成五百多萬幾尼。但如果有效需求需要同等價值的穀物，那末以五幾尼換一噸穀物計算，輸入這批穀物便需載重一百萬噸的船隻，或每艘載重一千噸的船隻一千艘。就是使用英格蘭的海軍船隻，也運載不完。

當一國所輸入的金銀量超過有效需求時，無論政府怎樣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輸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嚴刑峻法，並沒能使金銀不外溢。從祕魯和巴西源源而來的輸入，超過了這兩個國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銀在這兩個國家的價格降低到鄰國之下。反之，某國的金銀量如不足供應其有效需求，那就會使金銀的價格擡高到鄰國之上，用不着政府操心去輸入金銀。即使政府盡力想禁止金銀輸入，亦決不能生效。萊克加斯所制定的法律設置障礙以阻止金銀輸入斯巴達，但斯巴達人的充沛的購買力卻衝破了這一切障礙。一切嚴峻的關稅法是不能阻止荷蘭和戈登堡東印度公司把茶葉輸入英國的，因為它們比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茶葉便宜一些。一磅茶葉的價格通常以銀計算，最高是十六先令，因此一碗茶葉的體積約一百倍於十六先令的體積；如以金幣計算，則在二千倍以上。茶葉走私的困難，亦當照此倍數增加。

有許多貨物，因體積關係，不能隨意由在貨充足的市場轉移到存貨不足的市場，但金銀要由金銀豐足的市場運到金銀缺乏的市場，卻

很容易。一部分由於這個緣故，金銀的價格纔不家其他大部分貨物的價格那樣在存貨過多或不足時不斷髮生變動。固然，金銀的價格也不是完全不變動的，但其變動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和齊一的。例如，有人也許沒有多大根據地認為，在本世紀和前一世紀的歐洲，金銀因不斷由西屬西印度輸入，其價值已經不斷地但逐漸地下落。要使金銀的價格突然改變，從而使其他一切貨物的貨幣價格立刻發生顯著的漲落，那就非有象美洲的發現所造成的那種商業上的革命不可。

儘管如此，一個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如果在任何時候缺乏金銀，要想法補足，那就比補足其他任何商品的缺乏都更方便。如果製造業的原料不足，工業必陷於停頓。如果食糧不足，人民必然為飢餓所苦。但如果貨幣不足，則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換，又可賒賬買賣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調節得當的紙幣來加以彌補。第一種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種方法就比較方便了，至於第三種方法，則不但方便，而且有時還會帶來一些利益。所以，無論就哪一點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於保持或增加國內貨幣量的關心，都是不必要的。

可是，人們對於貨幣稀少的抱怨是再普遍不過了。貨幣象葡萄酒一樣，只有那些既沒有購買它的資力，又沒有貸借信用的人，才一定會經常感到缺乏。而有資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貨幣或葡萄酒時很少會感到缺乏。然而抱怨貨幣稀少的人，未必都是無遠慮的浪子。有時，整個商業城市及其鄰近地方都會普遍感到貨幣稀少。營業過度是這一現象的普通原因。穩重的人要是不比照其資本訂定經營計劃，結果也會象沒有量入為出的浪費者一樣，既沒有購買貨幣的資力，又沒有借貸貨幣的信用。在計劃實現以前，他們的資財就已耗盡，接着他們的信用也完了。他們到處去向人借貸貨幣，但人家都說沒有貨幣出借。即使這種對貨幣稀少的普遍抱怨，也並不能經常證明國內流通的金銀已失常量，而僅能證明有許多人想望金銀但無力支付代價罷了。在貿易的利潤偶然較平常為大的時候，無論大小商人都容易犯營業過度的錯誤。他們輸出的貨幣並不總比平常多，但他們在國內國外都用賒賬的方式實進數量異常的貨物，運往遙遠的市場，希望在付款期前收回貨物的代價。如果付款期前不能收回代價，他們手上就沒有購買貨幣的資力，也沒有借貸貨幣的確實擔保品了。對貨幣稀少的普遍抱

怨，不是起因於金銀的稀少，而是起因於那些求借者難以借貸，以及債權人害怕債款難以收回，不肯出借。

如果力求認真地證明，財富不由貨幣或金銀構成，而由貨幣所購各物構成，並且只在購買貨物時貨幣纔有價值，那就未免過於滑稽。無疑，貨幣總是國民資本的一部分；但我們已經說過，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並總是最無利可圖的一部分。

商人所以普遍覺得以貨幣購買貨物較易，以貨物購買貨幣較難，並不是因為構成財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貨幣而不是貨物，而是因為貨幣是已知的和確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於和一切物品交換，但要取得貨幣來交換貨物，卻不見得那麼容易。此外，大部分貨物比貨幣更易於磨損，如果保存它們，可能往往要蒙受大得多的損失。商人有貨物存在手上，同有貨物價格存在金庫相比，更容易發生為他所不能應付的對貨幣的需求。而且，他的利潤直接出自賣貨的多，出自買貨的少，因此他一般更急於以貨物交換貨幣，而不那麼急於以貨幣交換貨物。不過，豐富的貨物堆在貨棧，不能及時售出，這有時可能成為個別商人破產的原因，但決不能使一國或一個地方遭受同樣的災難。商人的全部資本，往往由容易損壞的、須定用來購買貨幣的貨物構成。但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只有極小一部分可以預定用來從鄰國購買金銀。極大部分是在國內流通和消費的。就連運往外國的剩餘物品，也常有大部分用來購買他種外國貨物。所以，預定用以購買金銀的那部分貨物，即使不能賣出以換取金銀，亦不至使一個國家破產。誠然，它可能遭受某些損失和不方便，也可能不得不採用某種為替補貨幣所必需的辦法。但是，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照常一樣或幾乎照常一樣，因為它有同樣多的或幾乎同樣多的可消費資本來維持自己。以貨物交換貨幣，未必總象以貨幣交換貨物那麼容易，但從長遠看來，以貨物交換貨幣卻比以貨幣交換貨物更有必要。除了購買貨幣，貨物還有其他許多用處；但除了購買貨物，貨幣就一無所用。所以，貨幣必然追求貨物，而貨物卻並不總是或無需追求貨幣。購買貨物的人往往打算自己消費或使用，並不總想再把貨物出售，但售賣貨物的人卻總想再購買。前者購買貨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務，而後者售賣貨物，頂多只能完成他的任務的一半。人們所以需求貨幣，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他們用貨幣所能購買的物品。

據說，可消費的物品不久會被破壞，而金銀則具有較大的耐久性，只要不繼續輸出，就可在長時期內累積起來，使國家的真實財富增加到使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所以，以這種耐久的商品交換那些容易損壞的商品，據說是最不利於國家的貿易。不過，我國的鐵器也是極耐久的商品，如不繼續輸出，也可能在長時期內累積起來，使國內鍋釜的數量增加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但如果我們以英國的鐵器交換法國的葡萄酒，卻又不被看作是不利的貿易。我們一看就知道，隨便在哪一個國家，這類用具的數目必然要受實際用途的限制；我們也容易瞭解，在任何一個國家，鍋釜都是用來烹調通常在那裏消費的食物的，不必要地增多鍋釜是荒謬的；如果食物的數量增加了，要連帶增加鍋釜的數目就很容易，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來購買鍋釜，或增加以製造鍋釜為業的鐵工就行了。我們也同樣容易看出，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量都受這類金屬的實際用途的限制，或是鑄成硬幣當通貨使用，或是製成器皿當家具使用。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鑄幣量都受國內借鑄幣而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的支配；商品的價值增加了，立刻就會有一部分商品被運到有金銀鑄幣的外國，去購買為流通商品所必須增加的鑄幣量。我們又知道，金銀器皿的數量都受國內豪華家族的數目與財富的支配，豪華家族的數目與財富增加了，就很可能會有一部分增加的財富被送到有金銀器皿的地方去購買所需要增加的金銀器皿。要豪華家族購置多於他們所需要的廚房用具，以增加其快樂，那是荒謬的；同樣，要一個國家輸入或保留多於它所需要的金銀，以增加國富，也是荒謬的。出資購買那些不必要的用具，不僅不能增進而且會減損家庭食品的數量和質量；同樣，出資購買不必要那麼多的金銀，也必然會減少用於衣食住和用於維持人民生計的財富。必須記住，金銀無論鑄成硬幣或製成器皿，同廚房用具一樣，都是器具。如果增加金銀的用途，增加可以用金銀來流通、支配和製造的可消費的物品，就一定會增加金銀的數量；但是，如果你想用非常的手段來增加它們的數量，那就一定會減少它們的用途，甚至會減少它們的數量，因為金銀的數量必須受其用途的限制。如果金銀累積得超過所需的數量，那末，由於金銀的運輸是那麼容易，而閒置不用的損失又是那麼大，任何法律也不能防止其立即輸出國外。

一國要對外進行戰爭，維持遠遣的海陸軍，並不一定要累積金銀。海陸軍所賴以維持的不是金銀，而是可消費的物品。國內產業的

年產物，換言之，本國土地、勞動和可消費資本的年收入，就是在遙遠國家購買此等可消費的物品的時候。有了這種手段的國家就能維持對遙遠國家的戰爭。

一國可循三種不同的途徑購買遠遣軍隊的餉給與食糧。第一，把一部分累積的金銀運往外國；第二，把製造業的年產物的一部分運往外國；第三，把常年原生產物的一部分運往外國。

不妨稱爲一國累積或貯存的金銀，可分爲三個部分：第一，流通的貨幣；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銀器皿；第三，由幹多年節儉而業已聚存於國庫的貨幣。

這樣的金銀很少能從一國的流通貨幣中節省下來，因爲在這一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剩餘。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每年買賣的貨物的價值要求有一定數量的貨幣來把貨物流通和分配給真正的消費者，但不能使用超過必要的數量。流通的渠道必然吸引充足的貨幣額，但一到飽和就不能再加容納。但在對外戰爭的情況下，通常從這個渠道里抽取若干。由於有大量的人遣往國外，國內所要維持生活的人數便大爲減少了。國內流通的貨物既已減少，爲流通貨物所必需的貨幣也必減少。在這樣的場合，通常發行大批紙幣，如英格蘭的財政部證券、海軍部證券和銀行證券。這些紙幣既然代替了流通的金銀，就使國家有機會把較大數量的金銀運往外國。不過，對外戰爭費用浩大，而且延續幾年，要靠上述辦法所提供的資源來維持，那就極不充分了。

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銀器皿，更無濟於事。上次戰爭開始時，法蘭西曾使用這種辦法，但從這方面所得的利益還不足補償鑄造的損失。

往時，君王累積的財寶曾提供一個大得多而且耐久得多的資源。但在今日，除了普魯士國王，全歐洲似乎沒有一國君王以累積財寶爲政策了。

本世紀的歷次對外戰爭，也許是歷史上費用最大的戰爭了，維持這種戰爭的基金似乎很少依靠流通貨幣、私人家庭的金銀器皿或國庫財寶的輸出。前次對法戰爭使英國花費了九千萬鎊以上，其中不但有七千五百萬鎊新募的國債，而且還有每鎊土地稅附加二先令的附加稅，以及從還債基金中每年借用的款項。這項費用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用在外國，即用在德意志、葡萄牙和美利堅，用在地中海各口岸，用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羣島。英格蘭國王沒有累積的財寶。我們從來沒有

聽說有非常大量的金銀器皿被熔解。那時人們一向認為，國內流通的金銀不超過一千八百萬鎊。但自從最近金幣改鑄以來，大家相信那種估計未免過低。因此，我們不妨按照我記得曾經看到或聽到過的最誇大的統計，假定我國金銀合計達三千萬鎊。如果戰爭是用我國的貨幣來進行的，那末甚至根據這個統計，在六、七年期間內也一定曾經把這數目全部運出運回一共至少兩次。如果可以作這樣的假設，那就能提供最有決定性的論點來證明政府沒有必要注意貨幣的保存，因為根據這一假定，國內的全部貨幣一定曾在這麼短的時期內在兩個不同的時間行着無事地有了往返。可是，在這期間內流通渠道並不顯得比平常更空虛，有資力換取貨幣的人，很少感到貨幣缺乏。在整個戰爭時期，尤其是在戰爭將要結束的時候，對外貿易的利潤確較平常為大。這種情況在英國各口岸引起了往往會引起的一種普遍的營業過度現象。這種現象又引起了對貨幣稀少的不滿，而這種不滿常常是跟着營業過度現象出現的。許多人缺少貨幣，因為他們既無資力可以換取，又無信用可以借貸，而且因為債務人覺得難於借貸，債權人也就覺得難於收回。不過，擁有可以換取金銀的價值的人，一般都能以他們的價值換取金銀。

所以，上次戰爭的巨大費用的支付，一定主要不是靠金銀的輸出，而是靠英國某種商品的輸出。在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員同一個商人訂約匯款至外國時，這商人就向國外來往通匯處出一期票，他爲了支付這張期票，自然會盡力把商品而不是金銀運出國外。如果那個國家不需要英國的商品，他就會設法把商品運往別國，購買一張期票，來付清所欠那個國家的款項。把商品運往宜於銷售的市場，總可取得相當的利潤，但運金銀出國，卻很難得到任何利潤。當這些金屬被運往外國以購買外國商品時，商人所獲得的利潤不是來自商品的購買，而是來自回程貨的售賣。但如果他只是爲了還債而運出金銀，那他就不能換回商品，因而不能得到利潤。所以，他自然會絞盡腦汁，用輸出商品而不是用輸出金銀的辦法來償還外債。《英國現狀》的作者指出，在上次戰爭期間，英國輸出了大量貨物，但沒有運回任何回程貨來。

除上述三種金銀外，在一切大商業國中，還有大量金銀塊交替地輸入和輸出，以經營國外貿易。這種金銀塊象國幣在國內流通一樣地

在各商業國之間流通，可以被看作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國幣的流動及其方向，受流通本國境內的商品的支配，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的流動及其方向，則受流通於各國間的商品的支配。二者都用來便利交換，一則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一則用於不同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也許曾動用這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的一部分來進行上一次戰爭。在一場全面戰爭的時候，人們自然要認為，這種貨幣的流動與方向和承平時不同，它在戰場周圍流通得更多，交戰國軍隊所需的餉結和食糧都要在交戰地點周圍及鄰近國家購買。但英國每年這樣使用的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無論多少，一定要年年購買，而用以購買的，或是英國商品，或是以英國商品換取的其他物品。所以歸根到底，仍是商品，仍是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纔是使我們能夠進行戰爭的基本資源。人們認為，每年這樣大的費用一定從鉅額的年產物中支付，那是很自然的。例如，1761年的費用便在一千九百萬鎊以上。任何金銀的累積都不會能夠維持每年這樣大的費用。即使是金銀，其年產額也無法維持這樣大的開支。根據最可靠的統計，每年輸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銀一般不會大大超過六百萬鎊；就某幾年來說，還不夠支付上次戰爭四個月的費用。

軍隊派往遙遠的國家，其餉給和食糧要在遠地購買。購買這些東西或買進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以購買這些東西，要輸出若干商品。最宜於為這目的而輸出的商品，似乎是製造得比較精巧的工業品，即體積小價值大，因而能以不大的費用運到遙遠地方的製造品。一個國家，如果它的產業每年生產這種大量剩餘的製造品輸往外國，那末，即使它不輸出大量金銀，甚至沒有如此大量的金銀可供輸出，也能進行一場費用浩大的對外戰爭好多年。誠然，每年剩餘製造品的很大部分必須在這種情況下輸出，而它雖給商人帶回利潤，卻不給國家帶回任何利潤，因為政府向商人購買外國期票，以便在外國購買軍隊的餉給和食糧。不過，總有一部分剩餘製造品的輸出，仍可帶回利潤。在戰爭期間，政府將對製造業提出加倍的要求。第一，由於購買軍隊的餉給和食糧，政府向外國出了期票，為了付清期票，政府就要求製造業製造商品，以便運往外國；第二，國內通常已經消費掉的外國貨物，仍須向外國購買，為了換回這種貨物，政府又要求製造業製造商品運往外國。在破壞性最大的對外戰爭中，大部分的製造業往往會極度繁榮；反之，在恢復和平的時候卻往往會衰落下去。它們可能在國

家衰落時繁榮，而在國家恢復繁榮時衰落。英國製造業的許多不同部門在上次戰爭期間和在戰後一段時期的不同狀況，可作我上面所說的例證。

借土地原生產物的輸出而進行費用浩大或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是不相宜的。把大量原生產物運往外國以購買軍隊的餉給和食糧，費用太大。而且沒有幾個國家所生產的原生產物，除了足夠維持本國居民生活所需外，還能有大量剩餘。因此，以大量原生產物輸往外國，實無異奪去人民一部分的必要生活資料。至於製造品的輸出，情形就有所不同。製造業工人的生活資料仍保存在國內，所輸出的僅是他們產品的剩餘部分。休謨屢次注意到往昔英國國王不能不斷地進行長期對外戰爭的事實。那時英國除了土地原生產物和若干最粗陋的製造品，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購買遠地軍隊的餉給和食糧。但原生產物不能從國內消費中大量節省下來，粗製造品和原生產物的運輸費用又過於巨大。所以，他們不能長期對外作戰，並不是因為缺少貨幣，而是因為缺少比較精巧的工業品。英格蘭的買賣在那時和現在都是以貨幣為媒介的。那時貨幣流通量對通常買賣次數和價值的比例，必定和現在相同，更確切地說，必定比現在大，因為那時沒有紙幣，現在紙幣卻已代替了大部分金銀。在商業和製造業不甚發達的國家，遇有非常事件發生，臣民對君主很難有多大援助，其理由我將在下面說明。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裏，君主都努力累積財寶，作為預防不測事件的唯一手段。即使沒有這種必要，君王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自然會傾向於為累積所必需的節儉。在那樣簡樸的狀態下，甚至君主的消費也不受愛好宮廷豪華的虛榮心的支配，而用於賞賜佃戶，款待家臣。虛榮心幾乎總是導致浪費，但賞賜和款待卻很少引起這種結果。因此，每一個韃靼酋長都有財寶。查理十二世有名的同盟者烏克蘭哥薩克酋長馬捷帕的財寶據說很多。梅羅文加王朝的法蘭西國王都有財寶。在他們分封兒子時，也把財寶分給他們。撒克遜君王以及征服後最初幾個國王，也似乎曾經累積過財寶。每一個新朝代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奪取前王的財寶，作為獲得繼承權的最重要的手段。先進的商業國家的君王，卻沒有累積財寶的同樣的必要，因為他們在非常事故發生時，通常都能得到臣民的特別援助。他們累積的傾向也沒有那樣厲害。他們自然地、也許必然他仿效那個時代流行的辦法，他們的消費和領土內各大業主的消費一樣，會受豪華的虛榮心的支配。宮廷中毫

無意義的裝飾一天比一天華麗，其用費之大，不僅阻止累積，而且往往侵及預定供更必要的用途的基金。德西利達斯關於波斯宮廷所說的話，可適用於歐洲一些君主的宮廷。他說：他在那裏只看到許多富麗的東西，看不到什麼力量；看到許多奴婢，看不到幾個軍人。

金銀的輸入，不是一國得自國外貿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經營國外貿易的任何地方之間，毫不例外地都可從中得到兩種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輸出他們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剩餘部分，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過以剩餘物品換取其他物品來滿足他們一部分的需要並增加他們的享受，這種貿易使剩餘物品有了價值。利用這個辦法，國內市場的狹隘性並不妨礙任何工藝或製造業部門的分工發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由於給國內消費不了的那一部分勞動成果開拓了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這就可以鼓勵他們去改進勞動生產力，竭力增加他們的年產物，從而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與收入。對於彼此進行對外貿易的所有不同的國家，對外貿易都不斷地從事完成這些偉大而重要的工作。當然，經營國外貿易的商人一般總是較多地注意供應本國人民的需要和輸出本國的剩餘物品，較少地注意供應別國人民的需要和輸出別國的剩餘物品，所以最受國外貿易的利益的，是商人所在的國家，但通商各國也都得到巨大的利益。以金銀輸入沒有金銀礦山但又需要金銀的國家，無疑是對外貿易業務的一部分，但這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單爲了這種打算而經營國外貿易的國家，恐怕在一世紀內還沒有機會裝滿一船金銀。

美洲的發現之所以使歐洲變得富裕，並非由於輸入金銀的緣故。因爲美洲金銀礦山豐饒，這些金屬的價格降低了。與十五世紀相比，現今購買金銀器皿所需付給的穀物或勞動，約爲當時的三分之一。歐洲每年花費同量的勞動和商品，就能買到大約三倍於當時的金銀器皿。但是，當一種商品跌到從前售價的三分之一時，不僅原來有資力購買這商品的人可購買三倍於此的數量，而且許許多多原來沒有資力購買這商品的人也能購買；現在有資力購買金銀器皿的人數，也許比從前增加到十倍以上，也許增加到二十倍以上。因此，歐洲現有的金銀器皿，不僅可能比設若美洲金銀礦尚未發現而甚至在其目前進步狀態下所會有的金銀器皿多三倍以上，而且可能多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直到現在爲止，歐洲無疑地已經獲得了實在的便利，不過那確是

一種微不足道的便利。金銀價格的低廉使這些金屬不象以前那樣宜於充作貨幣。爲了購買同一東西，我們必須攜帶較多的金銀，並在口袋裏帶一個先令而不象從前那樣只帶四便士的一個銀幣。很難說上述的便利和不便利，哪一種較不重要，這兩者本來都不會使歐洲的情況發生任何根本的變化。然而美洲的發現確曾使歐洲的情況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美洲的發現給歐洲各種商品開闢了一個無窮的新市場，因而就有機會實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術，而在以前通商範圍狹隘，大部分產品缺少市場的時候，這是決不會有的現象。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跟着增大了。歐洲的商品對美洲來說幾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許多商品對歐洲來說也是新奇的。於是發生了一系列以前從未想到過的新的交易，它當然對舊大陸有利，但自然對新大陸也同樣有利。由於歐洲人蠻橫地侵害別人的權利，一件對所有國家本來都是有利的東西，卻成爲若干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

幾乎同時發生的經由好望角至東印度的航道的發現，也許開闢了一個比美洲更大的國外貿易市場，雖然距離更遠。美洲當時只有兩個在各方面都比野蠻人優越的民族，它們在被發現後不久就被消滅了。其餘的都不過是野蠻人。但是，中國、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國以及東印度的幾個帝國，雖然沒有比較豐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各方面卻比墨西哥或祕魯更爲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製造業更爲進步；即使我們相信西班牙各作家關於那些帝國往昔情況的誇大記載，也仍得承認這一點，其實這些作家的話顯然是不足置信的。文明富國間交易的價值，總會比文明富國與未開化人和野蠻人交易的價值大得多。但歐洲從美洲貿易所得的利益，卻一向比它從東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大得多。葡萄牙人獨佔東印度貿易幾乎達一百年之久，其他歐洲國家要把任何貨物運到東印度去或從東印度購入任何貨物，都須間接經過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紀初葉荷蘭人開始侵入東印度時，他們把全部東印度的商業交由一家獨佔公司經營。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和丹麥人隨後都仿效他們的先例，所以，歐洲任何大國都沒有享受到對東印度自由貿易的利益。這種貿易之所以不及美洲貿易有利的唯一原因是，美洲貿易、即歐洲幾乎每一國家對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是其一切臣民可以自由經營的。那些東印度公司的專營的特權、雄厚的財富，以及這些財富爲它們從本國政府獲得的惠益和保護，已經引起不

少嫉妒。這種嫉妒心理使人往往把它們的貿易看作是完全有害的，因為經營這種貿易的國家每年都輸出大量的白銀。有關的方面回答說，由於這種不斷地輸出白銀，他們的貿易一般說來可能使歐洲陷於貧困，但對於從事貿易的具體國家來說，卻並非如此；因為，通過輸出一部分回程貨到歐洲其他國家，這種貿易每年給本國帶回的白銀數量遠遠超過輸出的白銀數量。反對者和答辯者都以我剛纔一直在考察的流行的想法為根據。所以，關於他們任何一方，我們都不必多所論述了。由於每年有白銀輸往東印度，歐洲的銀器也許比另一種情況下稍為貴一些，銀幣所能購買的勞動和商品大概也多一些。在這兩個結果中，前者所受的損失很小，後者所得的利益很小，兩者都微不足道，不值得社會任何部分的注意。東印度的貿易由於為歐洲商品開闢了一個市場，或者用近似的說法，為那些商品所購買的金銀開闢了一個市場，就一定會增加歐洲商品的年產量，因而也增加歐洲的實際財富和收入。它們至今增加得很少，也許是因為那種貿易處處受到限制的緣故。

關於財富存在於貨幣或金銀之中這一流行的說法，我認為有必要作詳盡的考察，雖然這樣做難免令人感到沉悶。我已經說過，按照普通的說法，貨幣往往表示財富；這種詞義的含糊使這一流行的見解在我們聽來非常熟悉，甚至那些確信這種說法是謬論的人也往往會忘記自己的原則，在推理的過程中把它當做確定不移的、不可否認的真理。英國有幾個研究商業的優秀作家在開頭就指出，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僅在於金銀，而且在於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種各樣可消費的物品。但在他們推理的過程中，他們卻似乎把土地、房屋和可消費的物品統統忘記了；他們的論證往往認為：一切財富在於金銀，增加那些金屬是國家工商業的巨大目標。

但是，財富在於金銀，以及無金銀礦山的國家只有通過貿易差額、即使輸出價值超過輸入價值才能輸入金銀這兩個原則既然已經確立，那末，政治經濟學的巨大目的就一定變成儘量減少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的輸入，儘量增加國內產業產品的輸出了。因此，使國家致富的兩大手段就是限制輸入和獎勵輸出。

輸入的限制有二種。

第一，凡能由本國生產的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無論從什麼國家輸入，都一律加以限制。

第二，在對某些外國的貿易中，如果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本國，那就幾乎是無論何種貨物。只要是從那些國家輸入的，都一律加以限制。

這些不同的限制有時採用高關稅的方法，有時採用絕對禁止的方法。

獎勵輸出的方法，有時是退稅，有時是發給獎勵金，有時是同主權國家訂立有利的通商條約，有時是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兩種不同的情況下允許退稅。已納關稅或國產稅的國內製造品，在輸出時往往將課稅的全部或一部發還；輸入時已經課稅的外國商品，如再輸出，則有時將課稅的全部或一部發還。

獎勵金的頒發，用以獎勵某些新興的製造業，或用以獎勵被認為應受特殊照顧的其他一些工業。

通過有利的通商條約，本國的貨物或商人在某一外國獲得了其他國家的貨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權。

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不僅使殖民地建立國的貨物和商人享有某些特權，而且往往使他們取得獨佔權。

上述兩種限制輸入的方法連同四種獎勵輸出的方法，乃是使貿易差額有利，以增加國內金銀量的六種主要的手段，為重商主義所倡導。我將在以下各章分別加以討論。對於這六種手段有沒有所說的把貨幣輸入到國內來的傾向，我將不再多加註意，而主要考察這些手段的每一種對於國家產業的年產物可能有什麼影響。這些手段既然會增加或減少國家年產物的價值，顯然也一定會增加或減少國家的實際財富和收入。

第二章 論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生產的貨物

以高關稅或絕對禁止的辦法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夠生產的貨物，國內從事生產這些貨物的產業便多少可以確保國內市場的獨佔。例如，禁止從外國輸入活牲畜和醃製食品的結果，英國牧畜業者就確保了國內肉類市場的獨佔。對穀物輸入課以高額關稅，就給與穀物生產者以同樣的利益，因為在一般豐收的時候對穀物輸入課以高額關稅，等於禁止它的輸入。外國毛織品輸入的禁止，同樣有利於毛織品製造業。絲綢製造業所用的材料雖全系產自國外，但近來也已取得了同樣的利益。麻布製造業尚未取得這樣的利益，但正在大踏步向這一目標邁進。還有其他許多種類的製造業同樣地在英國完全取得了或幾乎取得了不利於同胞的獨佔權。英國所絕對禁止輸入或在某些條件下禁止輸入的貨物，其種類之繁多，不很熟悉關稅法的人是簡直極不容易猜想出來的。

這種國內市場的獨佔，對享有獨佔權的各種產業往往給予很大的鼓勵，並往往使社會在那情況下有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財轉用到這方面來，那是毫無疑問的。但這辦法會不會增進社會的全部產業，會不會引導全部產業走上最有利的方向，也許並不是十分明顯的。

社會全部的產業決不會超過社會資本所能維持的限度。任何個人所能僱用的工人人數必定和他的資本成某種比例，同樣地，大社會的一切成員所能繼續僱用的工人人數，也一定同那社會的全部資本成某種比例，決不會超過這個比例。任何商業條例都不能使任何社會的產業量的增加超過其資本所能維持的限度。它只能使本來不納入某一方向的一部分產業轉到這個方向來。至於這個人為的方向是否比自然的方向更有利於社會，卻不能確定。

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

第一，每個人都想把他的資本投在儘可能接近他家鄉的地方，因而都儘可能把資本用來維持國內產業，如果這樣做他能取得資本的普

通利潤，或比普通利潤少得有限的利潤。

所以，如果利潤均等或幾乎均等，每一個批發商人就都自然寧願經營國內貿易而不願經營消費品的國外貿易，寧願經營消費品國外貿易而不願經營運送貿易。投資經營消費品國外貿易，資本往往不在自己的監視之下，但投在國內貿易上的資本卻常在自己的監視之下。他能夠更好地瞭解所信託的人的品性和地位，即使偶然受騙，也比較清楚地瞭解他為取得賠償所必須根據的本國法律。至於運送貿易，商人的資本可以說分散在兩個外國，沒有任何部分有攜回本國的必要，亦沒有任何部分受他親身的監視和支配。譬如，阿姆斯特丹商人從克尼斯堡運送穀物至里斯本，從里斯本運送水果和葡萄酒至克尼斯堡，通常必須把他資本的一半投在克尼斯堡，另一半投在里斯本。沒有任何部分有流入阿姆斯特丹的必要。這樣的商人自然應當住在克尼斯堡或里斯本，只有某種非常特殊的情況纔會使他選擇阿姆斯特丹作為他的住處。然而，由於遠離資本而感到的不放心，往往促使他把本來要運往里斯本的克尼斯堡貨物和要運往克尼斯堡的里斯本貨物的一部分，不計裝貨卸貨的雙重費用，也不計稅金和關稅的支付，運往阿姆斯特丹。為了親身監視和支配資本的若干部分，他自願擔負這種特別的費用。也正由於這樣的情況，運送貿易佔相當份額的國家才經常成為它通商各國貨物的中心市場或總市場。為了免除第二次裝貨卸貨的費用，商人總是儘量設法在本國市場售賣各國的貨物，從而在可能範圍內儘量使運送貿易變為消費品國外貿易。同樣，經營消費品國外貿易的商人，當收集貨物準備運往外國市場時，總會願意以均等或幾乎均等的利潤儘可能在國內售賣貨物的一大部分。當他這樣儘可能地使他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變為國內貿易時，他就可以避免承擔輸出的風險和麻煩。這樣一來，要是我可這樣說的話，本國總是每一國家居民的資本不斷繞之流通並經常趨向的中心，雖然由於特殊原因，這些資本有時從那中心被趕出來，在更遙遠地方使用。可是，我已經指出，投在國內貿易上的資本，同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等量資本相比，必能推動更大量的國內產業，使國內有更多的居民能夠由此取得收入和就業機會。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同投在運送貿易上的等量資本相比，也有同樣的優點。所以，在利潤均等或幾乎均等的情况下，每個個人自然會運用他的資本來給國內產業提供最大的援助，使本國儘量多的居民獲得收入和就業機會。

第二，每個個人把資本用以支持國內產業，必然會努力指導那種產業，使其生產物儘可能有最大的價值。

勞動的結果是勞動對其對象或對施以勞動的原材料所增加的東西。勞動者利潤的大小，同這生產物價值的大小成比例。但是，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他貨物。

但每個社會的年收入，總是與其產業的全部年產物的交換價值恰好相等，或者無寧說，和那種交換價值恰好是同一樣東西。所以，由於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儘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儘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於寧願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着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實上，這種裝模作樣的神態在商人中間並不普遍，用不着多費脣舌去勸阻他們。

關於可以把資本用在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上面，其生產物能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地的地位，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託給任何個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於任何委員會或參議院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險也沒有了。

使國內產業中任何特定的工藝或製造業的生產物獨佔國內市場，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而這種管制幾乎毫無例外地必定是無用的或有害的。如果本國產業的生產物在國內市

場上的價格同外國產業的生產物一樣低廉，這種管制顯然無用。如果價格不能一樣低廉，那末一般地說，這種管制必定是有害的。如果一件東西在購買時所費的代價比在家內生產時所費的小，就永遠不會想要在家內生產，這是每一個精明的家長都知道的格言。裁縫不想製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購買。鞋匠不想製作他自己的衣服，而僱裁縫製作。農民不想縫衣，也不想製鞋，而寧願僱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們都感到，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應當把他們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鄰人處於某種有利地位的方面，而以勞動生產物的一部分或同樣的東西，即其一部分的價格，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

在每一個私人家庭的行爲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個大國的行爲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國能以比我們自己製造還便宜的商品供應我們，我們最好就用我們有利地使用自己的產業生產出來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們購買。國家的總勞動既然總是同維持它的產業的資本成比例，就決不會因此減少，正如上述工匠的勞動並不減少一樣，只不過聽其隨意尋找最有利的用途罷了。要是把勞動用來生產那些購買比自己製造還便宜的商品，那一定不是用得最爲有利。勞動象這樣地不去用於顯然比這更有價值的商品的生產，那一定或多或少會減損其年產物的價值。按照假設，向外國購買這種商品，所費比國內製造未得便宜。所以，如果聽其自然，僅以等量資本僱用勞動，在國內所生產商品的一部分或其價格的一部分，就可把這商品購買進來。所以，上述管制的結果，國家的勞動由較有利的用途改到較不利的用途。其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不但沒有順隨立法者的意志增加起來，而且一定會減少下去。

誠然，由於有了這種管制，特定製造業有時能比沒有此種管制時更迅速地確立起來，而且過了一些時候，能在國內以同樣低廉或更低廉的費用製造這特定商品。不過，社會的勞動，由於有了此種管制，雖可更迅速地流入有利的特定用途，但勞動和收入總額，卻都不能因此而增加。社會的勞動，只能隨社會資本的增加而比例增加；社會資本增加多少，又只看社會能在社會收入中逐漸節省多少。而上述那種管制的直接結果，是減少社會的收入，凡是減少社會收入的措施，一定不會迅速地增加社會的資本；要是聽任資本和勞動尋找自然的用途，社會的資本自會迅速地增加。

沒有那種管制，那特定製造業雖不能在這社會上確立起來，但社會在其發展的任何時期內，並不因此而更貧乏。在這社會發展的一切時期內，其全部資本與勞動，雖使用的對象不相同，但仍可能使用在當時最有利的用途。在一切時期內，其收入可能是資本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收入，而資本與收入也許以可能有的最大速度增加着。

有時，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產上，某一國佔有那麼大的自然優勢，以致全世界都認為，跟這種優勢做鬥爭是枉然的。通過嵌玻璃、設溫牀、建溫壁，蘇格蘭也能栽種極好的葡萄，並釀造極好的葡萄酒，其費用大約三十倍於能由外國購買的至少是同樣好品質的葡萄酒。單單爲了要獎勵蘇格蘭釀造波爾多和布岡迪紅葡萄酒，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國葡萄酒輸入，這難道是合理的嗎？但是，如果蘇格蘭不向外國購買它所需要的一定數量的葡萄酒，而竟使用比購買所需的多三十倍的資本和勞動來自己製造，顯然是不合理的，那末所使用的資本與勞動，僅多三十分之一，甚或僅多三百分之一，也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程度雖沒有那麼驚人，但卻完全是同樣不合理。至於一國比另一國優越的地位，是固有的，或是後來獲得的，在這方面，無關重要。只要甲國有此優勢，乙國無此優勢，乙國向甲國購買，總是比自己製造有利。一種技藝的工匠比另一種技藝的工匠優越的地位，只是後來獲得的，但他們兩者都認為，互相交換彼此產品比自己製造更有利。

從獨佔國內市場取得最大好處的，乃是商人與製造業者。禁止外國牲畜及醃食品的輸入，以及對外國穀物課高關稅——這在一般豐年等於禁止——雖有利於英國牧畜者與農民，但其有利程度，比不上商人和製造業者從同類限制所得的利益。製造品，尤其是精製造品，比穀物和牲畜，更易於由一國運至另一國。所以，國外貿易，通常以販賣製造品爲主要業務。在製造品方面，只要能佔一點點利益，甚至在國內市場上，也能使外國人以低於我國工人的產品的價格出售。但在土地原生產物方面，非有極大的好處不能作到這個地步。如果在這情況下准許外國製造品自由輸入，也許有幾種國內製造業會受其損害，也許有幾種國內製造業會完全毀滅，結果大部分資本與勞動，將離去現在用途，被迫尋找其他用途。但土地原生產物最自由的輸入，不能對本國農業發生這樣的影響。

例如，即使牲畜的輸入變得那麼自由，但由於能夠輸入的是那麼少，所以對英國牧畜業沒有多大影響。活牲畜，恐怕是海運昂於陸運的唯一商品了。因為牲畜能夠行走，陸運時牲畜能自己搬運自己。但由海運，則被輸運的，不僅是牲畜，而且還有牲畜所需的食料和飲料，要費許多錢，並經過許多麻煩。愛爾蘭和不列顛間的海程，距離很短，愛爾蘭牲畜的輸入，因此較易。最近只允許愛爾蘭牲畜在有限時期內輸入，但如果允許其永久自由輸入，對不列顛牧畜者的利益也不會有很大影響。不列顛靠近愛爾蘭海的地方，都是牧畜地。輸入的愛爾蘭牲畜，必須趕過廣大地方，才能到達適當的市場，所費不貲，而且經過很多麻煩。肥的牲畜，不能行走那麼遠，所以，只有瘦牲畜可以輸入，這種輸入不會損害飼畜或肥育牲畜的地方的利益，因為減低了瘦牲畜的價值，所以對這些地方是有利的，這種輸入只會損害繁殖地方地方的利益。自從愛爾蘭牲畜准許輸入以來，愛爾蘭牲畜運入不多，而瘦牲畜售價依然高昂這一事實，似足證明，就連不列顛的繁殖地方，也不見得大受愛爾蘭牲畜自由輸入的影響。據說，愛爾蘭的普通人民，對於牲畜的輸出，有時曾加以劇烈的反對。但是，輸出者如果覺得繼續輸出牲畜有很大利益，那在法律贊助他們的時候，他們要克服愛爾蘭羣衆的反對，是很容易的。

此外，飼畜及肥富的地方，必定都是已大加改良的地方，而繁殖地方，卻通常是未開墾的地方。提高瘦牲畜的價格，由於增加了未開墾土地的價值，無異是反對改良的獎勵金。對於全境都已大加改良的地方，輸入瘦牲畜比繁殖瘦牲畜更為有利。因此，現在的荷蘭，據說信奉此原理。蘇格蘭、威爾士及諾森伯蘭的山地，都是不能有多大改良的地方，並且看來先天註定要作為不列顛的繁殖場的。准許外國牲畜自由輸入，其唯一結果不過是使這些地方不能利用聯合王國其他地方日益增加的人口與改良，就是說，不能把牲畜價格擡高到非常的高度，不能對國內比較改良和開墾過的地方課取一種真實的稅。

象活牲畜一樣，醃食品最自由的輸入，也不能對不列顛牧畜者的利益有多大影響。醃食品，不僅是笨重的商品，而且與鮮肉比較，其品質較劣，其價格又因所需勞動和費用較多而較昂。所以，這種醃食品，雖能與本國的醃食品競爭，但決不能與本國的鮮肉競爭。它雖可用作遠洋航輪上的食料，以及諸如此類的用途，但在人民食料中，究

竟不佔大的部分。自認準許醃食品自由輸入以來，從愛爾蘭輸入的醃食品爲量仍然不多這一事實，是我國牧畜業者絲毫用不着畏懼這種自由輸入的實證。家畜的價格，似乎不曾顯著地受到它的影響。

即使外國穀物的輸入，也不能對不列顛農業家的利益有多大影響。穀物是比家畜肉笨重得多的商品。四便士一磅的家畜肉和一便士一磅的小麥一樣昂貴。甚至在大荒年，輸入的外國穀物爲數也不多這一事實，可消除我國農民對外國穀物自由輸入的恐懼。根據見聞廣博的穀物貿易研究者的論文，平均每年輸入的各種穀物量，總共不過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夸特，只達本國消費額五百七十一分之一。但由於穀物獎勵金在豐年導致了超過實際耕作狀態所容許的輸出，所以在歉年，必然導致超過實際耕作狀態所容許的輸入。這樣一來，今年的豐收，不能補償明年的歉收。由於平均輸出量，必因這種獎勵金而增大，所以平均輸入量，必因這種獎勵金而增大，超過實際耕作狀態所需要輸入的程度。要是沒有獎勵金，那末輸出的穀物將比現在少，因此逐年平均計算，輸入量也許亦比現在少。穀物商人，換言之，在英國及他國間販運穀物的人，將因此而失去許多生意，遭受很大損失，但就鄉紳和農業家說，吃虧卻極其有限，所以我曾說，最希望獎勵金制度繼續實行下去的人，不是鄉紳與農業家，而是穀物商人。

在一切人民中，鄉紳與農業家算是最少有卑劣的獨佔精神的人，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光榮。大製造廠企業家，如果發覺附近二十哩內新建了一個同種類工廠，有時會驚慌起來。在阿比維爾經營毛織品製造業的荷蘭人，規定在那城市周圍六十哩內，不許建設同類工廠。反之，農業家與鄉紳，卻通常願意促進鄰近各田莊的開墾與改良，不會加以阻止。大部分製造業，都有要保密的祕密，而他們卻沒有什麼祕密，如果他們發現了有利的新方法，他們一般都歡喜把這方法告訴他們鄰人，而且儘可能來推廣。老伽圖曾說：Pius Questus， stabilissimusque， minimeque invidiosus； minimeque male cogitantes sunt， qui in eo studio occupati sunt。（這是最受人尊敬的職業，從事於這種職業的人，生活最爲穩定，最不爲人忌恨，他們也最沒有不滿之念。）鄉紳與農業家，散居國內各地，不易於結合，商人與製造業者，卻集居於城內，易於結合。他們都沾染城市所盛行的專營同業組合的習氣，他們一般取得了違反各城市居民利益的專營的特權，自然

竭力沒法取得違反所有同國人的專營的特權。保障國內市場獨佔、限制外國貨物輸入的方法，似乎就是他們的發明。鄉紳和農業家，忘卻他們本人地位所應有的寬大心，起來要求穀物及家畜肉供給的獨佔權，也許是模仿商人和製造業者，而且鑑於他們有意壓迫自己，要和他們立於同等的地位。至於自由貿易對他們利益的影響比對商人和製造業者利益的影響少得多這一問題，他們也許沒花工夫去考慮。

以恆久的法律，禁止穀物及牲畜的輸入，實際上等於規定，一國的人口與產業，永遠不得超過本國土地原生產物所能維持的限度。

但是，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國內產業，似乎一般只在下述二場合是有利的。

第一，特定產業，為國防所必需。例如，大不列顛的國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它有多少海員與船隻。所以，大不列顛的航海法，當然力圖通過絕對禁止或對外國航船課重稅來使本國海員和船舶獨佔本國航運業了。航海法的規例，大要如下：

一、凡與大不列顛居留地和殖民地通商或在大不列顛沿岸經商的船舶，其船主、船長及四分之三船員，必須為英國籍臣民，違者沒收船舶及其所載的貨物。

二、有許多體積極大的輸入品，只能由上述那種船舶或商品出產國的船舶（其船主、船長及四分之三船員為該國人民）輸入大不列顛，但由後一類船舶輸入，必須課加倍的外人稅。若由其他船舶輸入，則處以沒收船舶及其所載貨物的懲罰。此法令頒佈時，荷蘭人是歐洲的大運送業者，它現在仍是歐洲的大運送業者。但這法令公佈後，他們再不能作大不列顛的運送業者了，再不能把歐洲其他各國的貨物輸入我國了。

三、有許多體積極大的輸入品，只許由出產國船舶輸入，連使用英國船舶運送也在禁止之列，違者沒收船舶與其所載貨物。這項規定，可能也是專為荷蘭人而設。荷蘭那時，象現在一樣，是歐洲各種貨物的大市場，有了這個條例，英國船舶就不能在荷蘭國境內起運歐洲其他各國的貨物了。

四、各種醃魚、鯨鬚、鯨鰭、鯨油、鯨脂，非由英國船捕獲及調製，在輸入不列顛時，即須課以加倍的外人稅。那時歐洲以捕魚為業

供給他國的，只有荷蘭人，現在主要仍是荷蘭人。有了這個條例，他們以魚供給英國，就須繳納極重的稅了。

這航海法制定的時候，英、荷兩國雖實際上沒有戰爭，然兩國間的仇恨，已達極點。這仇恨在制定這法律的長期議會統治時期已經開始，不久在克倫威爾王朝及查理二世王朝的荷蘭戰爭中爆發了出來。所以，說這個有名法令的有幾個條目是從民族仇恨出發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但這些條目卻是象深思熟慮的結果同樣明智。當時的民族仇恨，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蘭安全的荷蘭海軍力量為其目的，這和經過最冷靜的熟思所想出來的正相同。

航海法對國外貿易，即對因國外貿易而增加的財富，是不利的。一國對外國的通商關係，象個別商人對他所交易的人的關係一樣，以賤買貴賣為有利。但是，在貿易完全自由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最可能有賤買的機會，因為貿易完全自由，鼓勵一切國家，把它所需的物品，運到它那邊來。由於同一原因，它也最可能貴賣，因為買者麇集於它的市場，貨物售價可儘量提高。誠然，航海法，對來到英國輸出英國產物的外國船隻，未曾課稅。甚至往時輸出貨物和輸入貨物通常都要納的外人稅，由於以後若干法令，有大部分輸出品，無須再繳納了。但這一切，都不足減輕航海法對國外貿易的有害傾向。外國人如果因為受我們禁止，或被我們課取高關稅，不能來此售賣，也不能來此購買。空船來我國裝貨的外國人，勢必損失從他們國家到大不列顛的船費。所以減少售賣者人數，即是減少購買者人數。這樣，與貿易完全自由的時候比較，我們不僅在購買外國貨物時，要買得更貴，而且在售賣本國貨物時，要賣得更賤。但是，由於國防比國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國各種通商條例中，航海法也許是最明智的一種。

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國內產業，一般有利的第二場合是，在國內對國內生產物課稅的時候。在這場合，對外國同樣產物課以同額稅，似乎亦合理。這辦法不會給國內產業以國內市場的獨佔權，亦不會使流入某特殊用途的資財與勞動，比自然會流入的多。課稅的結果，僅使本來要流入這用途的任何一部分資財與勞動，不流入較不自然的用途，而本國產業與外國產業，在課稅後，仍能在和課稅前大約相同的條件下互相競爭。在大不列顛，當國內產業的生產物課有此等稅的時候，通常就對同種類外國商品的輸入，課以高得多的關

稅，免得國內商人和製造業者吵吵嚷嚷地埋怨說，此等商品要在國內賤賣了。

關於自由貿易這個第二種限制，有人認為，在一些場合，不應侷限於輸入本國而與本國課稅品相競爭的那些外國商品，應該擴大到許許多多外國商品。他們說，生活必需品，要是在國內課稅，那末不僅對外國輸入的同種生活必需品課稅是正當的，即對輸入本國能和本國任何產業的生產物競爭的各種外國商品課稅也是正當的。他們說，這種課稅的結果，必然擡高生活品價格，勞動者生活品價格擡高的結果，勞動價格一定跟着擡高。所以，本國產業生產的各種商品，雖沒直接課稅，但其價格都將因此種課稅而上升，因為生產達各種商品的勞動的價格上升了。所以，他們說，這種課稅，雖只以生活必需品為對象，但實際上等於對國內一切產物課稅。他們認為，為要使國內產業與國外產業立於同等地地位，對輸入本國而與本國任何商品競爭的任何外國商品，須一律課以與本國商品價格增高額相等的稅。

生活必需品稅，如英國的石礮稅、鹽稅、皮革稅、燭稅等，是否必然提高勞動價格，從而提高一切其他商品的價格，我將在後面考察賦稅時，加以考察。但是，假定這種稅有這後果（它無疑有這後果），一切商品價格象這樣由於勞動價格的上漲而普遍上漲的情況，在以下兩方面和特定商品由於直接課有特種賦稅而漲價的情況有所不同。

第一，這特種賦稅能使這特定商品的價格提高到什麼程度，總可以很準確地判定。但勞動價格一般的提高，可在什麼程度上，影響各種不同勞動生產物的價格，卻不能相當準確地判定。所以，要按各種國內商品價格上漲的比例，對各種外國商品課以相當的賦稅，不可能做得相當準確。

第二，生活必需品稅對人民景況的影響，和貧瘠土壤與不良氣候所產生的影響大致相同。食糧價格因此變得比從前昂貴，正象在土壤貧瘠氣候不良的情況下生產食糧，需要異常的勞動和費用。在土壤和氣候引起天然的窮乏時，指導人民如何使用其資本與勞動，是不合理的；在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引起人為的缺乏時，指導人民應如何使用其資本與勞動，也是不合理的。很明顯，在這兩個場合，對人民最有利的是，讓他們儘可能適應自己的環境，尋找勞動的用途，使他們在不

利的情況下，能在國內或國外市場佔有稍稍優越的地位。他們的捐稅負擔已經太重了，再給他們課新稅，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已經給付過高的價格，要他們對其他大部分物品，也給付過高的價格，作為補救辦法，無疑是最不合理的。

這類賦稅，在達到一定高度時所造成的禍害，等於土壤貧瘠和天時險惡所造成的禍害。但最普遍徵收這類賦稅的地方，卻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國家。其他國家，都經不起這麼大的亂政。只有最強健的身體，才能在不衛生的飲食下生存並處在健康狀態，所以，只有各種產業都具有最大固有優點和後來獲得優點的國家，才能在這類賦稅下存在而繁榮。在歐洲，這一類賦稅最多的國家，要算荷蘭，而荷蘭所以繼續繁榮，並不是由於有了這一類賦稅，象不合理的想象那樣，而是由於荷蘭有了特殊情況，使得這種賦稅不能阻止其繼續繁榮。

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本國產業，在上述二場合，是一般有利，而在下述二場合，則有考慮餘地。（一）在一個場合，在什麼程度上，繼續准許一定外國貨物的自由輸入，是適當的；（二）在另一個場合，在什麼程度上，或使用什麼方式，在自由輸入業已中斷若干時候之後，恢復自由輸入，是適當的。

在什麼程度上繼續准許一定外國商品的自由輸入是適當的，有時成為要考慮的問題的場合是，某一外國以高關稅或禁止的方法，限制我國某些製造品輸入那國家的時候。在這場合，復仇心自然要驅使我們報復，我們對他們某些或一切製造品，課以同樣的關稅或禁止其輸入我國。各國通常都是如此進行報復的。法國人為了庇護本國的製造業，對於一切能和他們競爭的外國商品，特別喜歡用限制輸入的方法。這似乎是科爾伯特政策的大部分。科爾伯特才能雖不小，但在這裏，卻似乎為商人和製造業者的詭辯所欺瞞了，這般商人和製造業者，老是要求一種有害同胞的獨佔權。現在，法國最有才智的人都認為，他這種行為對法國無利。這位大臣1667年公佈關稅法，對大多數外國製造品課以極高的關稅。荷蘭人請求減輕關稅不得，於1671年，禁止法國葡萄酒、白蘭地及製造品輸入。1672年的戰事，一部分可歸因於這次商業上的爭論。1678年尼麥格和約，允荷蘭人之請，減輕了這種種關稅，荷蘭人於是也撤回了輸入禁令。英法兩國大約是在同一個時候開始互相採用同樣的高關稅與禁止政策來壓迫對方的產業的，

但首先採用的似乎是法蘭西。從那時以來存在着的敵愾心，使得它們都不肯減輕關稅。1697年，英國禁止弗蘭德製造的麻花邊輸入。弗蘭德那時為西班牙領地，其政府禁止英國毛織品輸入，以為報復。1700年，英國撤回了禁止弗蘭德麻花邊輸入的禁令，以弗蘭德撤回禁止英國毛織品輸入的禁令為條件。

為了要撤廢大家所斥責的高關稅或禁令而採用的報復政策，如果能達到撤廢的目的，就可說是良好的政策。一般地說，大的外國市場的恢復，可以抵消由於某些物品價格暫時昂貴而蒙受的暫時的困難而有餘。要判斷這種報復能否產生那種效果，與其說需要有所謂立法家的知識，不如說需要有所謂政治家或政客的技巧，因為立法家的考慮，應受不變的一般原理的指導，而狡猾的動物即世俗所謂政治家或政客的考慮，則受事件暫時的變動的支配。在沒有撤銷這種禁令的可能性的時候，為了要賠償我國某些階級人民所受的損害，再由我們自己來傷害我們的利益，不僅傷害那些階級的利益而且傷害幾乎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似乎不是一個好辦法。在我們鄰國禁止我國某種製造品時，我們通常不但禁止他們同種製造品，而且禁止他們其他幾種製造品，因為僅僅前者，很少能給他們以顯著的影響。這無疑可給我國某些部門的工人以鼓勵，替他們排除了一些競爭者，使他們能在國內市場上擡高他們的價格。不過，因鄰國禁令而蒙受損害的那些我國工人，決不會從我國的禁令得到利益。反之，他們以及我國幾乎所有其他階級人民，在購買某些貨物時，都不得不支付比從前更為昂貴的價格。所以，象這一類的法律，對全國課了真實的稅，受益的不是受鄰國禁令之害的那一階級工人，卻是另一階級人民。

在外國貨物的自由輸入已經中斷若干時候以後，使在什麼程度上或使用什麼方式來恢復自由輸入才適當成為一個也許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的場合是，本國的某些製造業，由於一切能和它們的製造品競爭的外國貨物，都課有高關稅或被禁止輸入而擴大起來，能僱用許許多多工人的時候。在這場合，人道主義也許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復自由貿易。如果驟然撤廢高關稅與禁止，較低廉的同種類外國貨物，即將迅速流入國內市場，把我國千千萬萬人民的日常職業與生活資料奪去。由此而起的混亂，當然很大。但依據下達二個理由，這混亂也許比一般所想象的小得多。

第一，無獎勵金通常亦可輸出到歐洲其他各國的製造品，都不會受到外國商品自由輸入的大影響。這種製造品，輸往外國，其售價必與同品質同種類的其他外國商品同樣低廉。因此，在國內，其售價目必較低廉，因而仍能控制國內市場。即使有一些愛時髦的人，有時只因爲是外國貨，便愛好起來，本國製造的同種類貨物，雖價廉物美，亦爲他們所不取，然而這種愚行，總不會那麼普及，所以對人民一般職業沒有顯著的影響。我國毛織品製造業、鞍皮業、鐵器業中，即有很大一部分製造品，每年不依賴獎勵金而輸往歐洲其他各國，而僱用職工最多的製造業，亦就是這幾種製造業。從自由貿易受到最大損害的，也許是絲製造業，其次是麻布製造業，但後者所受損失比前者少得多。

第二，這樣恢復貿易自由，雖將使許多人民突然失去他們通常的職業和普通的謀生方法，但他們不會因此而失業或無生計。上次戰爭結束時，海陸軍裁減了十萬以上，所減人數等於大的製造業所僱用的人數，他們頓時失去了他們平素的職業，無疑會感到困難，但他們並不因此便被剝奪了一切職業與生計。水兵的較大部分也許逐漸轉移到商船上去服務，在這當中，被遣散的海陸軍兵士，都被吸收在廣大的人民羣衆中，受僱於各種職業。十萬多慣於使用武器，而且其中有許多慣於劫掠的人，他們的位置起了那麼大的變化，卻不曾引起大的動亂，也不曾引起顯著的混亂。任何地方，流氓的數目並未因此而顯著增加，而且，據我所知，除了商船海員外，無論何種職業的勞動工資也未曾減少。要是我們比較兵士和任何種類製造業工人的習慣，我們就可發現，後者改業的可能性比前者大，因爲兵士一向賴餉給爲生，而製造業工人則專賴自身勞動爲生。前者習於怠惰與閒蕩，後者習於勤勉與刻苦。由一種辛勤勞動改爲另一種辛勤勞動，當然比由怠惰閒蕩改爲勤勞容易得多。此外，我曾說過，大部分製造業，都有性質相似的旁系製造業，所以，工人很容易從這些製造業的一種轉到另一種。而且這類工人的大部分，有時還被僱從事農村勞動。以前在特定製造業上僱用他們的資財，仍將留在國內，按另一個方式，僱用同數的人。國家的資本和從前相同，勞動的需要也和從前相同，或大致相同，不過是在不同地方和不同職業上使用。誠然，海陸軍兵士如被遣散，有在不列顛或愛爾蘭任何都市或任何地方操任何職業的自由。讓我們恢復國王陛下的一切臣民有選擇任何職業的天賦自由，象海陸軍

士兵所享受的那樣，換言之，摧毀同業組合的專營的特權、撤廢學徒法令（這二者都是對天賦自由的實際侵害），再撤廢居住法，使貧窮工人在此他此業失了業的，能在被地彼業就業，無須擔心已被人檢舉，亦無須擔心被迫遷移，這樣社會與個人，由於某特定製造業工人的偶然遣散而蒙受的損害，就不會大於他們從士兵的遣散所遭受的損害。我國的製造業工人，無疑對國家有很大的功績，但和以血肉保衛國家的那些人相比，他們的功績就顯得小，對於他們，用不着有更好的待遇。

不能期望自由貿易在不列顛完全恢復，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島或烏托邦在不列顛設立一樣。不僅公衆的偏見，還有更難克服的許多個人的私利，是自由貿易完全恢復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軍隊的將校，都象製造業者反對在國內市場增加競爭者人數的法律那樣激烈和那樣一致地反對縮小兵力，都象製造業者鼓動他們工人，以暴力攻擊這種法律的提議者那樣激烈和那樣一致地鼓動他們的士兵，以暴力攻擊縮減兵力的提議者，那末要想縮編軍隊，正如現在想在任何方面減縮我國製造業者既得的危害我們同胞的獨佔權同樣危險。這種獨佔權，已經在那麼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某些製造業的人數，他們象一個過於龐大的常備軍一樣，不但可以脅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脅迫立法機關。贊助加強此種獨佔權提案的國會議員，不僅可獲得理解貿易的佳譽，而且可在那一個以人數衆多和財富龐大而佔重要地位的階級中，受到歡迎與擁護。反之，要是他反對這類提案，要是他有阻止這類提案的權力，那末，即使他被公認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會功績，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譽的侮辱與誹謗，不免受人身的攻擊，而且有時有實際的危險，因為憤怒和失望的獨佔者，有時會以無理的暴行，加害於他。

大製造業經營者，如果由於在國內市場上突然遇到了外國人競爭，不得不放棄原業，其損失當然不小。通常用來購買材料支付工資的那一部分資本，要另覓用途，也許不會十分困難。但固定在工廠及職業用具上的那一部分資本，其處置卻不免造成相當大的損失。對於他們的利益，公平的考慮，要求這種變革不要操之過急，而要徐緩地、逐漸地，在發出警告很久以後實行。要是立法機關的考慮，不為片面利益的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而為普遍幸福的廣大見地所指

導，那末它爲此要特別小心，不建立任何新的這一類獨佔，也不推廣已經建立的獨佔。這樣的法規，在一定程度上給國家帶來紊亂，而後來的救濟，也難免引起另一種紊亂。

至於在什麼程度上，可對外國商品輸入課稅，不是爲着防止輸入，而是爲着籌集政府收入，那是我以後考察賦稅時所要考察的問題。但爲防止輸入，甚或爲減少輸入而設的稅，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破壞關稅收入的。

第三章 論對其貿易的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

那些國家的各種貨物的輸入所加的異常限制

第一節即使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這種限制也不合理

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增加金銀量的第二個方法，是對其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例如，西利西亞的細竹布，繳納了一定的稅，即可輸入英國，供英國本國消費；但法國的細葛布及細竹布，卻除了輸入倫敦港落棧以待輸出以外，便禁止輸入。法國葡萄酒輸入所須負擔的稅，亦較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國家葡萄酒為重。依照1692年所謂輸入稅，一切法國商品，都須繳納其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稅；但其他各國的貨物所納的稅，卻大部分要輕得多，很少超過百分之五。誠然，法國葡萄酒、白蘭地、食鹽、醋，不在此限，但此等商品，卻依照別項法律或這個法令的特殊條款，繳納別種苛重的稅。1696年，又認為此百分之二十五，還不夠阻止法國商品輸入，於是又對白蘭地以外的法國貨物再課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稅，同時對法國葡萄酒每大桶課新稅二十五鎊並對法國醋每大桶課新稅十五鎊。法國貨物從未省免稅則上列舉的各種貨物或大部分貨物必須繳納的那些一般補助稅或百分之五稅。要是把三分之一補助稅和三分之二補助稅也計算在內，作為全部要繳納的補助稅，那就課有那些補助稅的五種。因此，在這次戰爭開始以前，法國大部分農產品和製造品，至少也須負擔百分之七十五的稅。但大部分貨物實在負擔不起這樣重的稅。所以，課它們以這樣重的稅無異禁止其輸入。我相信，法國也針鋒相對地以同樣苛重的稅，加在我們的貨物及製造品上，雖然我不知道它所課的稅具體苛重到什麼地步。這種相互的限制，幾乎斷絕了兩國間一切公平貿易，使法國貨物運至英國，和英國貨物運至法國，主要都靠走私。我在前章所考察的有原則，發源於私人利害關係和獨佔精神；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各原則，卻發源於國民的偏見與敵意。因此，我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原則更不合理。甚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來說，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即使英、法間自由通商的結果，貿易差額確對法國有利，我們亦不能因此便斷言，那樣一種貿易將對英國不利，亦不能因此便

斷言，英國全部貿易總差額，將因此種貿易而愈不利於英國。如果法國葡萄酒，比葡萄牙葡萄酒價廉物美，其麻布則比德意志的麻布價廉物美，那末英國所需的葡萄酒與外國麻布，當然以向法國購買為有利，以向葡萄牙、德意志購買為不利。從法國每年輸入的貨物的價值，固將大增，但因同品質的法國貨物較廉於葡萄牙、德意志二國貨物，故全部輸入品的價值必減少，而減少的數量，則與其低廉程度相稱。即使輸入的法國貨物完全在英國消費，情況也是如此。

第二，所輸入的全部法國貨物，有大部分可能再輸到其他國家去作有利的販賣。這種再輸出，也許會帶回與法國全部輸入品的原始費用有同等價值的回程貨。人們關於東印度貿易所常說的話，對法國貿易也可適用，就是說，東印度貨物，雖有大部分是用金銀購買，但由其中一部分貨物的再輸出，所帶回到本國來的金銀，比全部貨物的原始費用還多。現在，荷蘭最重要貿易部門之一，就是運法國貨物到歐洲其他各國。英國人飲的法國葡萄酒，亦有一部分祕密由荷蘭及西蘭輸入。如果英法間貿易自由，或法國貨物在輸入時與歐洲其他各國繳納同樣的稅，並在輸出時收回，那末英國可能就會分享到那對荷蘭說來十分有利的貿易的好處。

第三，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依以判定兩國間的貿易差額究竟對何國有利，即何國輸出的價值最大。關於這一類問題，我們的判斷，往往根據由個別營業家的私利所左右的國民偏見與敵意。在這場合，人們往往使用兩個標準，即關稅漲簿與匯兌情況。由於關稅賬簿對各種商品所評的價，有大部分不準確，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那是很靠不住的標準。至於匯兌情形，恐怕也是同樣不可靠。

當倫敦與巴黎兩地以平價匯兌時，據說那就顯示倫敦欠巴黎的債務，恰被巴黎欠倫敦的債務所抵消了。反之，購買巴黎匯票，若須在倫敦給付匯水，據說那就顯示倫敦欠巴黎的債務，沒被巴黎欠倫敦的債務所抵消。因此，倫敦必須以一定差額的貨幣送往巴黎。因為輸出貨幣既招危險，又很麻煩，並須給付費用，所以代匯者要求匯水，匯兌人亦須給付匯水。據說，這兩都市間，債權與債務的普通狀態，必然受彼此間商務來往普通情況的支配。由甲都市輸入乙都市的數額若不大於由己都市輸出到甲都市的數額，由己都市輸入甲都市的數額若不大於由甲都市輸出到乙都市的數額，則彼此間債務與債權可以抵

消。但若甲方從乙方輸入的價值大於甲方向乙方輸出的價值，則甲方負乙方的數額必大於乙方負甲方的數額。債權債務不能互相抵消，於是債務大於債權的方面，必須輸出貨幣。匯兌的普通情況，既標示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亦必然標示兩地間輸出與輸入的普通情況，因為兩地間債權債務的普通狀態，必然受兩地間輸出輸入普通情況的支配。

可是，即使匯兌的一般情況，可充分表示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但亦不能因此便斷言，債務債權的普通狀態若有利於一個地方，貿易差額亦即對它有利。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未必完全取決於兩地間商務來往的一般情況，而常受兩地間任何一地對其他各地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支配。譬如，英國購買了漢堡、但澤、里加等處的貨物，要是常以荷蘭匯票支付貨物代價，那末英荷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即不完全受這兩國間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支配，而卻受英國對那些其他地方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影響。在這場合，即使英格蘭每年向荷蘭的輸出，遠遠超過英國每年從荷蘭輸入的價值，即使所謂貿易差額大有利於英國，英國每年仍須輸貨幣到荷蘭去。

此外，按照一向計算匯兌平價的方法，匯兌的一般情況，亦不能充分表示，匯兌的一般情況如果被認為有利於一個國家，那末債務與債權的一般情況亦對它有利。換言之，真實的匯兌情況，與估計的匯兌情況，可能極不相同，而且事實上往往極不相同，所以，在許多場合，關於債務債權的一般情況，我們決不能根據匯兌的一般情況得到確實的結論。

假設你在英國支付的一筆貨幣，按照英國造幣廠標準，包含若干盎斯納銀，而你所得的匯票，在法國兌付的貨幣額，按照法國造幣廠標準，其中所含的純銀量恰好相等，人們就說英法兩國以平價匯兌。如果你所支付的多於兌付所得，人們就認為你付了匯水，並說匯兌對英國不利，對法國有利。如果你支付的少於兌付所得，人們就認為你得了匯水，並說匯兌對法國不利，對英國有利。

但是，第一，我們不能常常按照各國造幣廠的標準，來判斷各國通貨的價值。各國通貨的磨損程度和削剪程度，低於標準的程度，是有多有少的。一國通用鑄幣與他國通用鑄幣的相對價值，並不看各自應含的純銀量，而卻看各自實含的純銀量來定。在威廉王時代改鑄銀

幣以前，英荷間的匯兌，依照普通計算法，按照各自造幣廠的標準，要英國貼水百分之二十五。但英國當時通用鑄幣的價值，據朗迪斯調查研究所得，卻低於其標準價值百分之二十五。所以，當時兩國間的匯兌，照通常計算法，雖是那麼大不利於英國，實則有利於英國。實際上在英國支付較小量純銀，所購得的匯票，卻可在荷蘭兌得較大量純銀。被想象為付了匯水的人，實際上可能得了匯水。在英國金幣改鑄以前，法國鑄幣比英國鑄幣的磨損程度小得多，而法國鑄幣接近其標準的程度也許比英國鑄幣大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如果英法間的匯兌，據計算，其不利於英國的程度，若未超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則真實的匯兌便可對英國有利。而自金幣改鑄以來，匯兌總是有利於英國而不利於法國。

第二，有些國家的造幣費用，由政府支付；有些國家，則由私人支付。在後一場合，持銀塊往造幣廠鑄造的，不僅要支付鑄幣的費用，有時還要給政府提供若干收入。在英國，造幣費用由國家支付，如果你持一磅重的標準銀至造幣廠，你可取回六十二先令，內合同樣的標準銀一磅。在法國，鑄幣須扣除百分之八的稅，這不僅足夠支付造幣費用，而且可給政府提供小的收入。在英國，因鑄造不收費，故鑄幣的價值，絕不可能大大超過鑄幣內含的銀塊量的價值。在法國，工價增加鑄幣的價值，正象工價增加精製金銀器皿的價值一樣。所以，包含一定重量純銀的一定數額法國貨幣，比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英國貨幣，有更大的價值，必須支付更多的銀塊或商品來購買它。所以，這兩國的鑄幣，雖同樣接近各自造幣廠的標準，但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英國貨幣，未必就能購買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法國貨幣，因而未必就能購買在法國兌付這貨幣額的匯票。如果為購買一張匯票，英國所支付的超額貨幣，恰好補償法國鑄幣費用，那末兩國間的匯兌，事實上就是平兌。債務與債權自可互相抵消，雖然按照計算，這兩國間的匯兌大有利於法國。如果為購買這張期票，英國所支付的貨幣，少於上述數額，那末兩國間的匯兌，事實上有利於英國，雖然按計算對法國有利。

第三，有些地方，如阿姆斯特丹、漢堡、威尼斯等地，都以他們所謂銀行貨幣兌付外國匯票；但有些地方，如倫敦、里斯本、安特衛普、勒格亨等地，則以當地通用貨幣兌付。所謂銀行貨幣，總是比同

一名義金額的通用貨幣有更大價值，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貨幣一千盾，就比阿姆斯特丹地方通用貨幣一千盾有更大的價值。二者間的差額，被稱為銀行的扣頭，這在阿姆斯特丹，一般是大約百分之五。假設兩國通用的貨幣，同樣接近各自造幣廠的標準，但一國以通用貨幣兌付外國匯票，另一國則以銀行貨幣兌付外國匯票，這兩國間的匯兌，即使事實上有利於以通用貨幣兌付的國家，但按照計算，仍可有利於以銀行貨幣兌付的國家。這好比兩國間的匯兌，雖然事實上是有利於以較劣貨幣兌付外國匯票的國家，但按照計算，仍可有利於以較良貨幣兌付的國家，其中理由，正相類似。在最近金幣改鑄以前，對阿姆斯特丹，對漢堡，對威尼斯，我相信，對一切其他以所謂銀行貨幣兌付的地方，倫敦的匯兌，按照計算，都是不利於倫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言，這種匯兌事實上對倫敦不利。從金幣改鑄以來，甚至與這些地方通匯也對倫敦有利了。對里斯本，對安特衛普，對勒格亨，我相信除了對法國，倫敦對歐洲大多數以通用貨幣兌付匯票的地方，按照計算，其匯兌大都對倫敦有利；事實上，大抵也是這樣。

順便談談儲金銀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儲金銀行

象法國、英國那樣的大國，其通貨幾乎全由本國鑄幣構成。如果這種通貨因磨損、剪削或其他原因，而其價值降至標準價值之下，國家可通過改鑄有效地恢復通貨的舊觀。但是，象熱那亞、漢堡那樣的小國，其通貨很少全由本國鑄幣構成，一定有一部分是由它的居民常常來往的各鄰國的鑄幣構成。象這樣的國家，通過改鑄，只能改良其鑄幣，未必能改良其通貨。這種通貨，因其本身性質極不確定，一定數額的這種通貨，價值亦很不確定，故在外國，其評價必然低於其實際價值。所以，如果這種國家以這種通貨兌付外國匯票，其匯兌就一定對它大為不利。

這種不利的匯兌，必然使商人們吃虧。為作救濟，這樣的小國，一經注意到了貿易的利益，為使商人們不吃虧，往往規定，凡有一定價值的外國匯票，不得以通用貨幣兌付，只許以一定銀行的銀票兌付或在一定銀行的賬簿上轉賬。這種銀行是靠國家的信用，並在國家的保護下建立起來的，其兌付匯票，勢須完全按照國家的標準，以良好的真正的貨幣兌付。威尼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漢堡、紐倫堡等地的銀行，原來似乎都是為了這目的而設立的，雖然其中有些可能在

後來被迫改變了目的。這種銀行的貨幣既優於這些國家的通用貨幣，必然會產生貼水，貼水的大小，視通貨被認為低於國家標準的程度的大小而定。據說，漢堡銀行的貼水，一般約為百分之十四，這百分之十四，乃是國家標準良幣與由鄰國流入的損削低價劣幣二者之間被認為應有的差額。

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廣大貿易從歐洲各地帶回來的大量剪削磨損的外國鑄幣，使阿姆斯特丹通貨的價值比造幣廠新出良幣的價值約低百分之九。在這情況下，新出的良幣，往往是一經鑄造出來，即被溶解，或被輸出。擁有大量通貨的商人，不能常常找到足夠的良幣來兌付他們的匯票；此類匯票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不確定，儘管有了若干防止這種不確定性的法規。

爲了糾正這種不利情況，阿姆斯特丹於1609年在全市的保證下設立了一家銀行。這家銀行，既接受外國鑄幣，也接受本國輕量的磨損了的鑄幣，除了在價值中扣除必要的鼓鑄費和管理費，即按照國家的標準良幣，計算其內在價值。在扣除此小額費用以後，所餘的價值，即在銀行賬簿上，作為信用記入。這種信用叫做銀行貨幣，因其所代表的貨幣，恰好按照造幣廠標準，故常有同一的真實價值，而其內在價值又大於通用貨幣。同時又規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兌付或賣出的六百盾以上的匯票，都得以銀行貨幣兌付。這種規定，馬上就消除了一切匯票價值的不確定性。由於有這種規定，每個商人，爲了要兌付他們的外國匯票，不得不與那銀行來往。這必然會引起對銀行貨幣的需要。

銀行貨幣，除了它固有的對通用貨幣的優越性以及上述需要所必然產生的增加價值外，還具有幾種別的優點。它沒有遭受火災、劫掠及其他意外的可能；阿姆斯特丹市，對它負全責，其兌付，僅需通過單純的轉賬，用不着計算，也用不着冒風險由一個地方運至另一個地方。因爲它有這種種優點，似乎自始就產生了一種貼水；大家都相信，所有原來儲存銀行內的貨幣，都聽其留在那邊，誰也不想要求銀行支還，雖然這種存款在市場上出售，可得到一項貼水。如要求銀行支還，銀行信用的所有者就會失去此項貼水。新由造幣廠造出的先令，既不能在市場上比普通的磨損了的先令購得更多的貨物，所以，從銀行金櫃中取出來歸入私人金櫃中的良好真正貨幣，和通用貨幣混

在一起，就不易辨認，其價值就不高於通用貨幣。當它存在銀行金櫃時，它的優越性是大家知道而且是確認的。當它流入私人金櫃時，要確認它的優越性，所付代價要大於這兩種貨幣的差額。此外，一旦從銀行金櫃中提出來，銀行貨幣的其他各種優點，亦必隨着喪失。安全性喪失了，方便的安全的移讓性喪失了，支付外國匯票的用處亦喪失了。不僅如此，要不是預先支付保管費，就不可能從銀行金櫃提出貨幣來。

這種鑄幣存款，或者說銀行必須以鑄幣付應的存款，就是銀行當初的資本，或者說就是所謂銀行貨幣所代表的那種東西的全部價值。現在，一般認為，那只是銀行資本的極小的一部分。爲了便利用金銀條塊進行的貿易，這許多年以來，銀行採取的辦法是對儲存金銀條塊的人付給信貸。這種信貸，一般比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約低百分之五。同時，銀行繪與一張受領證書或收據，使儲存金銀條塊的人或持證人得於六個月內的任何時候取回所存金銀，條件是將等於那筆信貸的銀行貨幣交還銀行，並給付千分之二十五（如果存的是白銀）或千分之五十（如果存的是黃金）的保管費。但同時又規定，若是到期不能作此種支付，則所存之金銀條塊即按收受時的價格，或按爲此而付給信貸時的價格，歸銀行所有。如此支付的儲金保管費，可以看作是一種倉庫租金。至於金的倉庫租金，爲什麼要比銀的倉庫租金高得那麼多，也有幾種不同的理由。據說，金的純度，比銀的純度更難確認。比較貴重的金屬，比較容易作假，由作假而引起的損失亦比較大。此外，銀是標準金屬，據說，國家的意圖，是鼓勵以銀儲存，不怎麼鼓勵以金儲存。

金銀條塊的價格比通常略低時，其儲存最爲普遍，到價格騰貴時，則往往被提出。在荷蘭，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一般比其造幣廠價格高，這好比最近金幣改鑄以前英格蘭的情況，理由亦相同。其差額，據說一般爲每馬克六至十六斯泰弗，即銀八盎斯，其中包含純銀十一分合金一分。對於這樣的銀（在被鑄爲外國鑄幣時，其成色爲一般所周知，而且被確認，例如墨西哥銀圓）的儲存，銀行所給的價格，即銀行所給的信貸，則爲每馬克二十二盾；造幣廠價格約爲二十三盾，市場價格則爲二十三盾六斯泰弗，乃至二十三盾十六斯泰弗，超出造幣廠價格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金銀條塊的銀行價格、造幣

廠價格及市場價格幾乎保持着相同的比例。一個人一般可爲了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與市場價格間的差額，而出售其受領證書。金銀條塊的受領證書，幾乎常有若干價格。所以，坐待六個月期滿，不把儲金提出來，或忘記支付千分之二十五或幹分之五十的保管費，而獲取另六個月的新受領證書，以致銀行得按收受時的價格把儲金收爲已有，卻是極不常有的現象。但是，這現象雖不常有，但亦有時發生，而在金的場合又比銀的場合較常發生，因爲銀的保管費較輕，金則因爲是比較貴重的金屬，其保管亦須支付較高的倉庫租金。

由儲存金銀條塊而換得銀行信用與受領證書的人，在其匯票到期時，以銀行信用兌付。至於受領證書是出賣或是保留，那就看他對於金銀條塊價格的漲跌，作怎樣的判斷。但此種銀行信用與受領證書，大都不會長久保留亦無長久保留的必要。有受領證書並要提取金銀條塊的人，老是發現有許多銀行信用或銀行貨幣，讓他以普通價格購買；同樣，有銀行貨幣並要提取金銀條塊的人，也發現有同樣多的受領證書，讓他購買。

銀行信用所有者及受領證書持有者，是銀行的兩種不同債權人。受領證書持有者，不把等於被領金銀條塊價格的一定數額銀行貨幣，給與銀行，就不能提取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金銀條塊。如果他自己沒有銀行貨幣，他就得向有銀行貨幣的人，購買銀行貨幣。但有銀行貨幣的人，若不能向銀行提出受領證書，表示自己所需要的數額，他亦不能提取金銀條塊。如果他自己沒有受領證書，他亦得向有受領證書的人，購買受領證書。有受領證書的人，購買銀行貨幣，其實就是購買提取一定數量金銀條塊的權力，這種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比其銀行價格高百分之五。所以，他爲購買銀行貨幣而通常支付的那百分之五貼水，並不是爲了一種想象的價值，而是爲了一個真實的價值而支付的。有銀行貨幣的人，購買受領證書，其實亦就是購買提取一定數量金銀條塊的權力，這種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一般比其造幣廠價格高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所以，他爲購買受領證書而支付的價格，亦同樣是爲了一個真實的價值而支付的。受領證書的價格及銀行貨幣的價格合起來，便構成金銀條塊的完全價值或價格。

以國內流通的鑄幣存入銀行，銀行既給予銀行信用，也發給受領證書，但這種受領證書，通常是沒有價值的，也不能在市場上售得什

麼價格。例如，以值三盾三斯泰弗的達克通存入銀行，所換得的信用只值三盾，或者說比流通價值低了百分之五。銀行雖亦同樣發給受領證書，使持票人得在六個月內任何時候，支付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費，提出存在銀行的達克通，但這種受領證書，往往不能在市場上售得什麼價格。三盾銀行貨幣，雖大都可可在市場上售得三盾三斯泰弗，即在提出以後，可得到達克通的完全價值，但由於在提出以前，須納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費，所以得失相衡，恰好互相抵消。可是，假若銀行貼水，降為百分之三，這種受領證書便可在市場上售得若干價格，便可售得百分之一點七五了。但現今銀行貼水，大都在百分之五左右，所以，這種受領證書往往聽其滿期，或者象人們所說，聽其歸銀行所有。至於儲存金達克所得的受領證書，就更常聽其滿期，因為其倉庫租金為千分之五十，尤為昂貴。在這種鑄幣或條塊的儲存聽其歸銀行所有時，銀行往往可得利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可看作是永遠保管這種儲存物的倉庫租金。

受領證書過期的銀行貨幣的數額，必然是很大的。受領證書已經過期的銀行貨幣的數額，必定包含銀行當初的全部資本。據一般假設，銀行當初的全部資本，自從第一次存入以來，就沒有一個人想要調換新的受領證書，或把儲金提出，因為根據我們上面舉出的種種理由，那就無論採用那兩方法中任何一個，都必然是有損失的。但這數額無論是怎樣大，在銀行貨幣全額中所佔的部分，據假設是很小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過去好幾年來，是歐洲最大的金銀條塊倉庫，但其受領證書卻是很少過期的，或很少照一股所說歸銀行所有。比這大得多的那一部分銀行貨幣或銀行賬簿上的信用，都是過去好幾年來，由金銀條塊商人不斷儲存、不斷提取而創立的。

沒有受領證書，即不能向銀行有所要求。證書過期的那比較小量銀行貨幣，和受領證書還是有效的那比較大量銀行貨幣混在一起，所以沒有受領證書的銀行貨幣額雖很可觀，但決沒有某一特定部分銀行貨幣永遠沒有誰來要求。銀行不能為同一事物而對兩個人負擔債務人的義務；沒有受領證書的銀行貨幣所有者，在未購得受領證書以前，決不能要求銀行付款。在平靜的時候，他要按照市場價格購得一張受領證書，毫不困難。這種價格，和根據受領證書有權向銀行提取鑄幣或金銀條塊能在市售賣的價格，一般是相符合的。

但在國難時期，情形就兩樣了，例如，1672年法蘭西人侵入時，銀行貨幣所有者都想從銀行提出儲金，歸自己保存，大家都需要受領證書。這種需要，可能非常地提高受領證書的價格。有受領證書的人，可能作非分之想，不要求各受領證書所記明的銀行貨幣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卻要求百分之五十。知道銀行組織的敵人，甚至會把一切受領證書收買進來，以防止財寶搬出。一般認為，在這非常時期，銀行會打破只對受領證書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規。無銀行貨幣但有受領證書的人，一向必定只領取了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儲金價值的百分之二或三。所以，有人說，在這場合，銀行定會毫不遲疑地以貨幣或金銀條塊，對有銀行貨幣記在銀行賬簿上但無受領證書可向銀行提取儲金的人支付完全的價值；同時，對於有受領證書但無銀行貨幣的人支付百分之二或三，因為這個數目，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他們所應得的全部價值了。

即在平常和平靜的時候，受領證書持有者的利益在於減低貼水，藉以較低價格購買銀行貨幣（從而以較低價格購買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可以提取的金銀條塊），或以較高價格把受領證書賣給有銀行貨幣並望提取金銀條塊的人；受領證書的價格，一般等於銀行貨幣的市場價格及受領證書所記明的鑄幣或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之差。反之，銀行貨幣所有者的利益，卻在於提高貼水，藉以高價出售其銀行貨幣，或以低價購買受領證書。這樣相反的利害關係，往往會導致投機買賣的欺詐行為。為防止這種欺詐，近數年來銀行決定，不論什麼時候，賣出銀行貨幣換取通貨要貼水百分之五，而再度買進銀行貨幣，要貼水百分之四。這種決定的結果，貼水不能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亦不能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銀行貨幣與流通貨幣二者市場價格間的比例，不論什麼時候，都很接近它們固有價值間的比例。但在未有此種決定以前，銀行貨幣的市場價格，高低不一，按照這兩種相反利害關係對市場的影響，有時貼水上升到百分之九，有時又下跌而與通用貨幣平價。

阿姆斯特丹銀行宣稱，不以儲金任何部分貸出；儲金賬簿上每記下一盾，即在金庫內，保藏等於一盾價值的貨幣或金銀條塊。受領證書尚未失效，隨時可來提取，而事實上不斷地流出和流入的那一部分貨幣與金銀條塊，全保藏在金庫內，不容致疑，但受領證書久已滿

期，在平常和平靜時候不能要求提取，而實際上大概在聯邦國家存在的時期內永遠留在銀行裏的那一部分資本，是否亦是這樣，卻似乎有疑問。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銀行貨幣即有一盾金銀存在銀行金庫裏這一信條，在各種信條中總算是奉行最力的了。阿姆斯特丹市作了這個信條的保證人。銀行歸四個現任市長監督，這四個市長每年改選一次，新任的四個市長，比照賬簿，調查銀行金庫，宣誓接管，後來，再以同樣莊嚴的儀式，把金庫點交給繼任的人。在這真誠的宗教國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廢。有了此種更迭，對於一切不正當行為，似乎有了充足的保障。黨爭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過許多次革命，但在這一切革命中，佔優勢的黨派，都沒在銀行管理那一點上攻擊他們前任的不忠誠。對於失勢的黨派的名譽與信用，再沒有第二種事情比這種攻擊有更深刻的影響的了；如果這種攻擊真有根據，我們可以斷言，那是一定會提出來的。1672年，當時法王在烏德勒支，阿姆斯特丹銀行付款迅速，以致無人懷疑它履行契約的忠誠。當時，從銀行金庫中提出的貨幣，還有些曾為銀行設立後市政廳大火所燒焦。這些貨幣，必定是從那時候起，即保存在銀行金庫內的。

這銀行的金銀總額究竟有若干，老早就成為好事者臆測的問題。但關幹這總額多少，只能推測。一般認為，與這銀行有賬目來往的人，約有二千；假設他們每人平均存有一千五百鎊的價值（那是最大的假設），那末銀行貨幣總額，因而，銀行金銀總額，便大約等於三百萬鎊，以每鎊十一盾計算，就大約等於三千三百萬盾。這樣一個大數額，足以經營極廣泛的流通，但比一些人關於這總額誇大的臆測，卻小得多。

阿姆斯特丹市從這銀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除了所謂倉庫租金，凡第一次與銀行開來往賬戶的，須納費十盾；每開一次新賬，又領納費三盾三斯泰弗；每轉一次賬，須納費二斯泰弗；如果轉賬的數目不及三百盾，則須納六斯泰弗，以防止小額的轉賬。每年不清算賬目二次的，罰二十五盾。轉賬的數目如果超過了儲存的賬目，須納費等於超過額的百分之三，其請求單亦被擱置。據一般人設想，銀行由受領證書滿期歸為己有的外國鑄幣與金銀條塊，在有利時出售，亦獲得不少利潤。此外，銀行貨幣以百分之五的貼水賣出，以百分之四的貼水買入，亦給銀行提供利潤。這些不同利得，大大超過支付職員薪俸和

開支管理費用。單單儲存所納保管費一項，據說等於十五萬盾至二十萬盾的年純收入。不過，這機關設立的目標，原來不是收入，而是公益。其目的在幹使商人不至因不利的匯兌而吃虧。由此而生的收入，是不曾預料到的，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意外。我爲了要說明，爲什麼理由，用銀行貨幣兌付的國家和用通用貨幣兌付的國家，其匯兌大都似乎有利於前者，而不利於後者。不知不覺地說出了冗長的題外話，現在，我該回到本題。前一種國家用以兌付匯票的貨幣，其固有價值總是不變，恰與其造幣廠標準相符；後一種國家用以兌付匯票的貨幣，其固有價值不斷變動，而且幾乎都多少低於其造幣廠標準。

第二節根據其他原則，這種異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在本章的前節，我竭力說明，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理，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爲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貨物的輸入，也不必加以異常的限制。

然而，此種限制以及許多其他商業條例所根據的整個貿易差額學說，是再不合理不過的。當兩地通商時，這種學說認爲，如果貿易額平衡，則兩地各無得失；如果貿易額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損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稱。但這兩種設想都是錯誤的。象我後面所要說明的那樣，獎勵金與獨佔權，雖爲本國利益而設立，但由獎勵金及獨佔權所促成的貿易，卻可能對本國不利，而且事實上常是這樣。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進行的兩地間的貿易，雖未必對兩地同樣有利，但必對兩地有利。

所謂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釋，不是金銀量的增加，而是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交換價值的增加，或是一國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兩地貿易額平衡，而兩地間的貿易，全由兩國國產商品的交換構成，那末在大多數場合，它們不僅都會得利，所得利益而且必相等或幾乎相等。這樣，各爲對方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提供了一個市場。甲方爲生產及製造這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而投下的資本，即在一定數目居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或生計的資本，將由乙方補還；乙方投下的這種資本，將由甲方補還。所以，兩國的居民，都有一部分，將間接從另一國取得他們的收入與生計。兩國間所交換的商品，其價值又被假設相等，則在大多數場合，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而且，因爲都是用來生產兩國的國產商

品，所以，兩國居民由此種分配而得的收入與生計，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彼此互相提供的這種收入與生計，按照商務來往大小的比例，有多有少。若彼此每年都等於十萬鎊，則彼此給對方居民所提供的，亦為十萬鎊的年收入；若等於一百萬鎊，則彼此給對方居民提供的，亦為一百萬鎊的年收入。

設甲乙兩國間的貿易，是屬於這樣的性質，即甲國貨物輸至乙國的純為國產商品，乙國輸至甲國的回程貨則純為外國商品，那末，在這假設下，兩國的貿易額，仍被認為是平衡的，彼此都以商品償付。在這場合，兩國仍然享有利得，但利得的程度不同；從這種貿易取得最大收入的，是隻輸出國產商品的那一國居民。比方說，英國從法國輸入的，純為法國所生產的國產商品，但英國卻沒有法國所需要的商品，每年不得不以大量的外國貨物如菸草與東印度貨物來償付。這種貿易雖可給兩國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給法國居民所提供的收入，必多於給英國居民所提供的。法國每年投在這種貿易上的全部資本，是在法國人民間分配的。但英國資本，只有一部分，即用來生產英國貨物備與外國貨物交換的那一部分資本，是每年在英國人民間分配的。其資本，有較大部分是用來補還弗吉尼亞、印度和中國的資本，並對這些遙遠國家居民提供一種收入與生計。即使兩國所投資本相等或幾乎相等，但法國資本的使用，給法國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國資本的使用，所增於英國人民收入的大得多。因為，在這場合，法國所經營的，是對英國的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英國所經營的，是對法國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這兩種國外貿易所生的不同結果，已經在前面充分說明過了。

不過，兩國間的貿易，也許既不能雙方全為國產商品的交換，也不能一方全為國產商品，一方全為外國貨物。幾乎一切國家，彼此間所交換的，都一部分是國產商品，一部分是外國貨物。但是，國產商品佔交換品最大部分而外國貨物佔交換品最小部分的國家，總是主要的利得者。

假若英國用以償還法國每年輸入品的，不是菸草與東印度貨物，而是金銀，那貿易額便被認為是不平衡的，因為不是以商品而是以金銀償付商品。其實，在這場合，也象在前一場合一樣，能給兩國人民提供若干收入，不過給法國人民提供的，比給英國人民提供的多。英

國人民，必從此取得收入。為生產英國商品以購買金銀而投下的資本，即在英國一定人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的資本，必可因此而補還，使其用途得以繼續。輸出一定價值的金銀，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正如輸出等價值任何其他貨物，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一樣。反之，在大多數場合，都會增加英國資本總量。只有其國外需求被認為大於其國內需求，而其回程貨在國內的價值大於輸出品在國內的價值的那些貨物才輸到國外去。如果菸草在英國僅值十萬鎊，但輸往法國而購回的葡萄酒，在英國卻可值十一萬鎊，那末這種交換，就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如果英國以金十萬鎊所購得的法國葡萄酒，在英國亦可值十一萬鎊，則這種交換也就同樣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在酒庫中有值十一萬鎊葡萄酒的商人，比在堆棧中有值十萬鎊菸草的商人更富裕，同樣也比在金櫃中有值十萬鎊的商人更富裕。他和其他二人比較，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並繪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計與職業。但國家的資本與其全體人民的資本相等，而一國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又等於這一切資本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所以，一國資本及其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就大都會因此種交換而增加。為英國的利益計，與其用弗吉尼亞菸草或用巴西、祕魯金銀，當然無寧用它自己的鐵器及寬幅厚呢來購買法國葡萄酒。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總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但以金銀進行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並不比以其他貨物進行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不利。無礦產國每年輸出金銀，不會使金銀更容易幹竭。正如無煙草國每年輸出菸草，不會使菸草更容易幹竭。有資力購買菸草的國家，決不會長久缺乏菸草；同樣，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也決不會良久缺乏金銀。

有人說，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是一種虧本的交易，而製造業國和葡萄酒產國間自然會有的貿易，也可以說有同樣的性質。我卻以為，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並不一定是虧本的交易。就此種貿易本身的性質說，其利益和任何其他貿易相同，不過，也許比較容易被濫用。釀酒家的職業，甚至小酒販的職業，與其他職業同是必要的分工部門。工人所需的麥酒量，一般是與其親自釀造，無寧向釀酒家購買；而且，他若是一個貧窮工人，那末他購買麥酒，一般是與其向釀酒家作大量的購買，無寧向小酒販作小量的購買。倘若他是個貪食者，他可能購買過多的麥酒，正如他可能購買過多的家畜肉；要是他想扮作一個翩翩公子，他可能購買過多呢絨布匹。貿易自由，雖然可

能被濫用，而且，有幾種貿易自由，特別容易發生這種結果，但無論如何，對幹工人大眾，這一切貿易自由，總是有利的。此外，有時有了由嗜酒過度而蕩產的個人，但似乎用不着擔心會有這樣的國家。雖然在每個國家，都有許多人，在酒這方面所花費的超過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但有更多人，所花費的小於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應該指出，根據經驗，葡萄酒的低廉，似乎不是泥醉的原因，而是節酒的原因。葡萄酒產國的人民，一般是歐洲最節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南部各省人民。對於普通日常飲食，人民很少過度使用。象溫和啤酒那樣廉價的飲料，就是大花大用，也不能表現一個人的寬宏和好客。反之，只在過熱或過寒不能栽種葡萄樹，因而葡萄酒異常稀少昂貴的國家，如北方民族、熱帶民族（如幾內亞海岸的黑人），泥醉才成為普遍的惡習。當法國軍隊，從法國北部各省開拔至南部各省，即從葡萄酒昂貴區域開拔至葡萄酒低廉區域時，據說，起初往往因見良好葡萄酒如此價廉新鮮而耽溺其中，但駐留數月之後。其中大部分，便象當地居民一樣節酒了。同樣，如果把外國葡萄酒稅、麥芽稅、麥酒稅、啤酒稅一律取消，或可使英國中下等階級人民間暫時盛行泥醉風氣，但不久也許就會養成一個恆久的普遍的節酒習俗。現今，在上流社會即有資力消費最貴飲料的人中，泥醉已經不是他們的惡習了。吃麥酒而泥醉的縉紳先生，極不常見。此外，葡萄酒貿易在英國的限制，與其說爲了要防止人民走入（如果可以這樣說）酒店，無寧說爲了要防止人民，使其不能購買價最廉物美最的飲料。那種限制，有利於葡萄牙的葡萄酒貿易，不利於法國的葡萄酒貿易。據說，對於我國製造品，葡萄牙人是比較好的顧客，法國人是比較不好的顧客，所以，我們應當優待葡萄牙人，加以獎勵。據說，他們照顧了我們，我們也應當照顧他們。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為一個大帝國政治設施的原則。其實，只有小商人，纔會把這種策略看作是對待顧客的規則。至於大商人，不問這些小節，總是在價最廉物美最美的地方購買他的貨物。

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認為他們的利益在於使一切鄰國變得窮困。各國都嫉妒與他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並把這些國家的利得，看作是他們的損失。國際通商，家個人通商一樣，原來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為不和與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們反覆無常的野心，在這世紀及前世紀，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大於

商人和製造業者們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間支配者的暴力與不正，自古以來即是一種禍害。我認爲，按照人事的性質，這種禍害是無法除去的。至於不是亦不應該是人間支配者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們，其卑鄙的貪慾，其獨佔的精神，雖也許不能改正，但要不讓他們擾亂別人的安寧，卻是極其容易的。

最初發明這種原則傳佈這種原則的，無疑是獨佔的精神；最先倡導這種原則的人並不象後來信奉這種原則的人那麼傻。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爲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象同業組合內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內居民僱用其他人而只僱用他們自己一樣，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在於自己保有國內市場的獨佔權。因此，在英國，在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對幹幾乎一切由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都課以異常重稅。因此，凡能輸入本國，與本國製造品競爭的一切外國製造品，都課以高的關稅，或禁止輸入。因此，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爲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換言之，對民族仇恨異常激烈的國家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

在戰爭或政治上，鄰國的財富，雖對我國有危險，但在貿易上，則確對我國有利益。在戰時，敵國的財富，或可使敵國能夠維持比我國強大的海陸軍。但在和平的通商狀態下，鄰國的財富，必使他們能夠和我們交換更大的價值，必對我國產業的直接生產物或用這種生產物購進來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場。勤勞的鄰近的富人，和窮人比較，是更好的顧客；鄰近的富國，也是這樣。經營同種製造業的富人，固然是鄰近各同業者的危險鄰人，但他的花費，可給鄰近的其餘一切人提供好的市場，所以，對絕大多數鄰人是有利的。不僅如此，較貧的經營同業的工人，又將因此而減低其售價，因而，對其餘一切人有利。同樣，富國的製造業者，無疑會成爲鄰國同種製造業者極危險的競爭者，但這種競爭，卻有利於人民大眾。此外，這樣富國的大花費，必能在其他方面，給人民大眾提供良好的市場，使他們得利。想發財的私人，決不會退居窮鄉僻壤，一定會住在首都或大商業都

市。他們知道，財富流通極少的地方，所可取得的財富極少；財富流通極多的地方，可有些財富歸到他們手裏。指導着一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的常識的原則，應該支配一百萬人、一千萬人、二千萬人的判斷，應該使全國國民都認為，鄰國的富乃是本國可能獲得財富的原因和機會。想由國外貿易致富的國家，在其鄰國都是富裕勤勉的商業國時，最易達到目的。一國四周，如果都是遊牧的未開化人和貧窮的野蠻人，那末，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無疑可使國家致富，但要由國外貿易致富，就絕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國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而致富的。據說，古代埃及人，極不注意國外貿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與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以一切鄰國陷於貧困境況為目標的近代外國通商原則，如果能夠產出它所企望的結果，那就一定會陷國外貿易於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視的地位。

法國和英國間的貿易，所以會在兩國都受到那麼多的阻礙與限制，就是此等原則的結果。如果這兩國能拋棄商業的嫉妒和國民的仇恨，來考察其真實利害關係，那末對英國來說，法國的貿易，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對法國來說，英國的貿易，亦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法國為英國最近的鄰國。英國南部沿海各地與法國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間的貿易，好象國內貿易一樣，可以每年往返四次、五次乃至六次。這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比較投在國外貿易大多數其他部門上的等量資本，能夠推動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勞動量，能夠僱用和養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人數。這兩國彼此相隔最遠的各地間的貿易，也至少可望每年往返一次。所以，就連這種貿易，也比我國對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國外貿易同樣有利。若與誇大的我國對北美殖民地的貿易（那一般要三年，乃至四年五年以上，才能往返一次）比較，那至少也有利三倍。此外，法國據說有居民二千三百萬，我國北美殖民地居民卻據說不過三百萬。法國又比北美洲富饒得多，雖然由於法國財富分配不平均，法國的貧民乞丐，比北美多得多。所以，與我國北美殖民地比較，法國所能提供的市場，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為頻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英國的貿易，亦同樣有利於法國。英國貿易對於法國的利益，要按照兩國財富、人口與鄰近的程度，大幹法國殖民地貿易對

於法國的利益。這就是兩國智者所認為宜加以阻止的貿易和最受其偏愛獎勵的貿易這二者間很大的差別。

然而，使兩國間開放的自由的貿易對兩國那麼有利的環境，卻成為產生這種貿易的主要障礙的原因。因為是鄰國，它們必然是故國；於是，一方的富強，增加另一方的恐懼，而本來可增進國民友誼的有利因素，卻成為助長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們同是富裕勤勉的國家。每一國商人和製造者，都擔心會在技術與活動上遇到另一國商人和製造業者的競爭。商業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長了商業上的嫉妒，兩者相互助長。兩國的貿易者，都熱烈地確信他們自私自利的謬說，宣稱不受限制的國外貿易，必然會生出不利的貿易差額，而不利的貿易差額，又一定會導致國家的滅亡。

在歐洲各商業國內，自命的這種學說的學者常常預告；不利的貿易差額，將使國家頻於滅亡。這激起了各商業國不少的憂慮，幾乎各商業國都試圖改變貿易差額，使對本國有利而對鄰國不利。但在這一切憂慮以後，在這一切無效的嘗試以後，似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曾因上述原因而變得貧困。和重商主義者的預料相反，實行開放門戶並允許自由貿易的都市與國家，不但不曾因此種自由貿易而滅亡，而且因此致富。歐洲今日，從某幾點說，配稱為自由港的都市雖有幾個，但配稱為自由港的國家卻還沒有。最接近於此的國家，也許要算荷蘭了，雖然仍離此很遠。大家承認，不僅荷蘭國民財富全部得自對外貿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資料也得自對外貿易。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有另一種差額，和貿易差額極不相同。一國的盛衰，要看這差額是有利或是不利。這就是年生產與年消費的差額。前面說過，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如果超過了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這超過額的比例而增加起來。在這場合，社會在其收入內維持其生存，每年從其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部分，自然會加到社會資本上去，並用以進一步增加年生產物。反之，如果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小於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短少的比例而減少下去。在這場合，社會的支出超過了社會的收入，那必然會侵蝕社會的資本。資本必然會減退，隨着資本的減退，其產業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亦減退。

生產與消費的差額，和所謂貿易差額全不相同。在沒有對外貿易、不與世界往來的國家內，可以發生這種差額。在財富、人口與改良都在逐漸增進或在逐漸減退的全地球上，也可以發生這種差額。

即使在所謂的貿易差額一般不利於一個國家時，生產與消費的差額仍可不斷地有利於這個國家。即使半世紀來，這個國家輸入的價值都大於輸出的價值；在這全期間內，流入的金銀，全部立即輸出；流通鑄幣逐漸減少而以各種紙幣替代鑄幣；甚至它對各主要通商國家所負的債務，亦在逐漸增加；但它的真實財富，它的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仍可在這期間，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來。我國北美殖民地的狀態，以及它們在現今的擾亂事件發生以前對不列顛的貿易狀態，都可證明這並不是一個不接近於事實的假設。

第三章 論對其貿易的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

那些國家的各種貨物的輸入所加的異常限制

第一節即使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這種限制也不合理

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增加金銀量的第二個方法，是對其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例如，西利西亞的細竹布，繳納了一定的稅，即可輸入英國，供英國本國消費；但法國的細葛布及細竹布，卻除了輸入倫敦港落棧以待輸出以外，便禁止輸入。法國葡萄酒輸入所須負擔的稅，亦較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國家葡萄酒為重。依照1692年所謂輸入稅，一切法國商品，都須繳納其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稅；但其他各國的貨物所納的稅，卻大部分要輕得多，很少超過百分之五。誠然，法國葡萄酒、白蘭地、食鹽、醋，不在此限，但此等商品，卻依照別項法律或這個法令的特殊條款，繳納別種苛重的稅。1696年，又認為此百分之二十五，還不夠阻止法國商品輸入，於是又對白蘭地以外的法國貨物再課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稅，同時對法國葡萄酒每大桶課新稅二十五鎊並對法國醋每大桶課新稅十五鎊。法國貨物從未省免稅則上列舉的各種貨物或大部分貨物必須繳納的那些一般補助稅或百分之五稅。要是把三分之一補助稅和三分之二補助稅也計算在內，作為全部要繳納的補助稅，那就課有那些補助稅的五種。因此，在這次戰爭開始以前，法國大部分農產品和製造品，至少也須負擔百分之七十五的稅。但大部分貨物實在負擔不起這樣重的稅。所以，課它們以這樣重的稅無異禁止其輸入。我相信，法國也針鋒相對地以同樣苛重的稅，加在我們的貨物及製造品上，雖然我不知道它所課的稅具體苛重到什麼地步。這種相互的限制，幾乎斷絕了兩國間一切公平貿易，使法國貨物運至英國，和英國貨物運至法國，主要都靠走私。我在前章所考察的有原則，發源於私人利害關係和獨佔精神；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各原則，卻發源於國民的偏見與敵意。因此，我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原則更不合理。甚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來說，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即使英、法間自由通商的結果，貿易差額確對法國有利，我們亦不能因此便斷言，那樣一種貿易將對英國不利，亦不能因此便斷言，英國全部貿易總差額，將因此種貿易而愈不利於英國。如果法

國葡萄酒，比葡萄牙葡萄酒價廉物美，其麻布則比德意志的麻布價廉物美，那末英國所需的葡萄酒與外國麻布，當然以向法國購買為有利，以向葡萄牙、德意志購買為不利。從法國每年輸入的貨物的價值，固將大增，但因同品質的法國貨物較廉於葡萄牙、德意志二國貨物，故全部輸入品的價值必減少，而減少的數量，則與其低廉程度相稱。即使輸入的法國貨物完全在英國消費，情況也是如此。

第二，所輸入的全部法國貨物，有大部分可能再輸到其他國家去作有利的販賣。這種再輸出，也許會帶回與法國全部輸入品的原始費用有同等價值的回程貨。人們關於東印度貿易所常說的話，對法國貿易也可適用，就是說，東印度貨物，雖有大部分是用金銀購買，但由其中一部分貨物的再輸出，所帶回到本國來的金銀，比全部貨物的原始費用還多。現在，荷蘭最重要貿易部門之一，就是運法國貨物到歐洲其他各國。英國人飲的法國葡萄酒，亦有一部分祕密由荷蘭及西蘭輸入。如果英法間貿易自由，或法國貨物在輸入時與歐洲其他各國繳納同樣的稅，並在輸出時收回，那末英國可能就會分享到那對荷蘭說來十分有利的貿易的好處。

第三，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依以判定兩國間的貿易差額究竟對何國有利，即何國輸出的價值最大。關於這一類問題，我們的判斷，往往根據由個別營業家的私利所左右的國民偏見與敵意。在這場合，人們往往使用兩個標準，即關稅漲簿與匯兌情況。由於關稅賬簿對各種商品所評的價，有大部分不準確，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那是很靠不住的標準。至於匯兌情形，恐怕也是同樣不可靠。

當倫敦與巴黎兩地以平價匯兌時，據說那就顯示倫敦欠巴黎的債務，恰被巴黎欠倫敦的債務所抵消了。反之，購買巴黎匯票，若須在倫敦給付匯水，據說那就顯示倫敦欠巴黎的債務，沒被巴黎欠倫敦的債務所抵消。因此，倫敦必須以一定差額的貨幣送往巴黎。因為輸出貨幣既招危險，又很麻煩，並須給付費用，所以代匯者要求匯水，匯兌人亦須給付匯水。據說，這兩都市間，債權與債務的普通狀態，必然受彼此間商務來往普通情況的支配。由甲都市輸入乙都市的數額若不大於由己都市輸出到甲都市的數額，由己都市輸入甲都市的數額若不大於由甲都市輸出到乙都市的數額，則彼此間債務與債權可以抵消。但若甲方從乙方輸入的價值大於甲方向乙方輸出的價值，則甲方

負乙方的數額必大於乙方負甲方的數額。債權債務不能互相抵消，於是債務大於債權的方面，必須輸出貨幣。匯兌的普通情況，既標示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亦必然標示兩地間輸出與輸入的普通情況，因為兩地間債權債務的普通狀態，必然受兩地間輸出輸入普通情況的支配。

可是，即使匯兌的一般情況，可充分表示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但亦不能因此便斷言，債務債權的普通狀態若有利於一個地方，貿易差額亦即對它有利。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未必完全取決於兩地間商務來往的一般情況，而常受兩地間任何一地對其他各地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支配。譬如，英國購買了漢堡、但澤、里加等處的貨物，要是常以荷蘭匯票支付貨物代價，那末英荷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即不完全受這兩國間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支配，而卻受英國對那些其他地方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影響。在這場合，即使英格蘭每年向荷蘭的輸出，遠遠超過英國每年從荷蘭輸入的價值，即使所謂貿易差額大有利於英國，英國每年仍須輸貨幣到荷蘭去。

此外，按照一向計算匯兌平價的方法，匯兌的一般情況，亦不能充分表示，匯兌的一般情況如果被認為有利於一個國家，那末債務與債權的一般情況亦對它有利。換言之，真實的匯兌情況，與估計的匯兌情況，可能極不相同，而且事實上往往極不相同，所以，在許多場合，關於債務債權的一般情況，我們決不能根據匯兌的一般情況得到確實的結論。

假設你在英國支付的一筆貨幣，按照英國造幣廠標準，包含若干盎斯納銀，而你所得的匯票，在法國兌付的貨幣額，按照法國造幣廠標準，其中所含的純銀量恰好相等，人們就說英法兩國以平價匯兌。如果你所支付的多於兌付所得，人們就認為你付了匯水，並說匯兌對英國不利，對法國有利。如果你支付的少於兌付所得，人們就認為你得了匯水，並說匯兌對法國不利，對英國有利。

但是，第一，我們不能常常按照各國造幣廠的標準，來判斷各國通貨的價值。各國通貨的磨損程度和削剪程度，低於標準的程度，是有多有少的。一國通用鑄幣與他國通用鑄幣的相對價值，並不看各自應含的純銀量，而卻看各自實含的純銀量來定。在威廉王時代改鑄銀幣以前，英荷間的匯兌，依照普通計算法，按照各自造幣廠的標準，

要英國貼水百分之二十五。但英國當時通用鑄幣的價值，據朗迪斯調查研究所得，卻低於其標準價值百分之二十五。所以，當時兩國間的匯兌，照通常計算法，雖是那麼大不利於英國，實則有利於英國。實際上在英國支付較小量純銀，所購得的匯票，卻可在荷蘭兌得較大量純銀。被想象為付了匯水的人，實際上可能得了匯水。在英國金幣改鑄以前，法國鑄幣比英國鑄幣的磨損程度小得多，而法國鑄幣接近其標準的程度也許比英國鑄幣大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如果英法間的匯兌，據計算，其不利於英國的程度，若未超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則真實的匯兌便可對英國有利。而自金幣改鑄以來，匯兌總是有利於英國而不利於法國。

第二，有些國家的造幣費用，由政府支付；有些國家，則由私人支付。在後一場合，持銀塊往造幣廠鑄造的，不僅要支付鑄幣的費用，有時還要給政府提供若干收入。在英國，造幣費用由國家支付，如果你持一磅重的標準銀至造幣廠，你可取回六十二先令，內合同樣的標準銀一磅。在法國，鑄幣須扣除百分之八的稅，這不僅足夠支付造幣費用，而且可給政府提供小的收入。在英國，因鑄造不收費，故鑄幣的價值，絕不可能大大超過鑄幣內含的銀塊量的價值。在法國，工價增加鑄幣的價值，正象工價增加精製金銀器皿的價值一樣。所以，包含一定重量純銀的一定數額法國貨幣，比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英國貨幣，有更大的價值，必須支付更多的銀塊或商品來購買它。所以，這兩國的鑄幣，雖同樣接近各自造幣廠的標準，但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英國貨幣，未必就能購買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法國貨幣，因而未必就能購買在法國兌付這貨幣額的匯票。如果為購買一張匯票，英國所支付的超額貨幣，恰好補償法國鑄幣費用，那末兩國間的匯兌，事實上就是平兌。債務與債權自可互相抵消，雖然按照計算，這兩國間的匯兌大有利於法國。如果為購買這張期票，英國所支付的貨幣，少於上述數額，那末兩國間的匯兌，事實上有利於英國，雖然按計算對法國有利。

第三，有些地方，如阿姆斯特丹、漢堡、威尼斯等地，都以他們所謂銀行貨幣兌付外國匯票；但有些地方，如倫敦、里斯本、安特衛普、勒格亨等地，則以當地通用貨幣兌付。所謂銀行貨幣，總是比同一名義金額的通用貨幣有更大價值，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貨幣一千

盾，就比阿姆斯特丹地方通用貨幣一千盾有更大的價值。二者間的差額，被稱為銀行的扣頭，這在阿姆斯特丹，一般是大約百分之五。假設兩國通用的貨幣，同樣接近各自造幣廠的標準，但一國以通用貨幣兌付外國匯票，另一國則以銀行貨幣兌付外國匯票，這兩國間的匯兌，即使事實上有利於以通用貨幣兌付的國家，但按照計算，仍可有利於以銀行貨幣兌付的國家。這好比兩國間的匯兌，雖然事實上是有利於以較劣貨幣兌付外國匯票的國家，但按照計算，仍可有利於以較良貨幣兌付的國家，其中理由，正相類似。在最近金幣改鑄以前，對阿姆斯特丹，對漢堡，對威尼斯，我相信，對一切其他以所謂銀行貨幣兌付的地方，倫敦的匯兌，按照計算，都是不利於倫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言，這種匯兌事實上對倫敦不利。從金幣改鑄以來，甚至與這些地方通匯也對倫敦有利了。對里斯本，對安特衛普，對勒格亨，我相信除了對法國，倫敦對歐洲大多數以通用貨幣兌付匯票的地方，按照計算，其匯兌大都對倫敦有利；事實上，大抵也是這樣。

順便談談儲金銀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儲金銀行

象法國、英國那樣的大國，其通貨幾乎全由本國鑄幣構成。如果這種通貨因磨損、剪削或其他原因，而其價值降至標準價值之下，國家可通過改鑄有效地恢復通貨的舊觀。但是，象熱那亞、漢堡那樣的小國，其通貨很少全由本國鑄幣構成，一定有一部分是由它的居民常常來往的各鄰國的鑄幣構成。象這樣的國家，通過改鑄，只能改良其鑄幣，未必能改良其通貨。這種通貨，因其本身性質極不確定，一定數額的這種通貨，價值亦很不確定，故在外國，其評價必然低於其實際價值。所以，如果這種國家以這種通貨兌付外國匯票，其匯兌就一定對它大為不利。

這種不利的匯兌，必然使商人們吃虧。為作救濟，這樣的小國，一經注意到了貿易的利益，為使商人們不吃虧，往往規定，凡有一定價值的外國匯票，不得以通用貨幣兌付，只許以一定銀行的銀票兌付或在一定銀行的賬簿上轉賬。這種銀行是靠國家的信用，並在國家的保護下建立起來的，其兌付匯票，勢須完全按照國家的標準，以良好的真正的貨幣兌付。威尼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漢堡、紐倫堡等地的銀行，原來似乎都是為了這目的而設立的，雖然其中有些可能在後來被迫改變了目的。這種銀行的貨幣既優於這些國家的通用貨幣，

必然會產生貼水，貼水的大小，視通貨被認為低於國家標準的程度的大小而定。據說，漢堡銀行的貼水，一般約為百分之十四，這百分之十四，乃是國家標準良幣與由鄰國流入的損削低價劣幣二者之間被認為應有的差額。

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廣大貿易從歐洲各地帶回來的大量剪削磨損的外國鑄幣，使阿姆斯特丹通貨的價值比造幣廠新出良幣的價值約低百分之九。在這情況下，新出的良幣，往往是一經鑄造出來，即被溶解，或被輸出。擁有大量通貨的商人，不能常常找到足夠的良幣來兌付他們的匯票；此類匯票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不確定，儘管有了若干防止這種不確定性的法規。

爲了糾正這種不利情況，阿姆斯特丹於1609年在全市的保證下設立了一家銀行。這家銀行，既接受外國鑄幣，也接受本國輕量的磨損了的鑄幣，除了在價值中扣除必要的鼓鑄費和管理費，即按照國家的標準良幣，計算其內在價值。在扣除此小額費用以後，所餘的價值，即在銀行賬簿上，作為信用記入。這種信用叫做銀行貨幣，因其所代表的貨幣，恰好按照造幣廠標準，故常有同一的真實價值，而其內在價值又大於通用貨幣。同時又規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兌付或賣出的六百盾以上的匯票，都得以銀行貨幣兌付。這種規定，馬上就消除了一切匯票價值的不確定性。由於有這種規定，每個商人，爲了要兌付他們的外國匯票，不得不與那銀行來往。這必然會引起對銀行貨幣的需要。

銀行貨幣，除了它固有的對通用貨幣的優越性以及上述需要所必然產生的增加價值外，還具有幾種別的優點。它沒有遭受火災、劫掠及其他意外的可能；阿姆斯特丹市，對它負全責，其兌付，僅需通過單純的轉賬，用不着計算，也用不着冒風險由一個地方運至另一個地方。因爲它有這種種優點，似乎自始就產生了一種貼水；大家都相信，所有原來儲存銀行內的貨幣，都聽其留在那邊，誰也不想要求銀行支還，雖然這種存款在市場上出售，可得到一項貼水。如要求銀行支還，銀行信用的所有者就會失去此項貼水。新由造幣廠造出的先令，既不能在市場上比普通的磨損了的先令購得更多的貨物，所以，從銀行金櫃中取出來歸入私人金櫃中的良好真正貨幣，和通用貨幣混在一起，就不易辨認，其價值就不高於通用貨幣。當它存在銀行金櫃

時，它的優越性是大家知道而且是確認的。當它流入私人金櫃時，要確認它的優越性，所付代價要大於這兩種貨幣的差額。此外，一旦從銀行金櫃中提出來，銀行貨幣的其他各種優點，亦必隨着喪失。安全性喪失了，方便的安全的移讓性喪失了，支付外國匯票的用處亦喪失了。不僅如此，要不是預先支付保管費，就不可能從銀行金櫃提出貨幣來。

這種鑄幣存款，或者說銀行必須以鑄幣付應的存款，就是銀行當初的資本，或者說就是所謂銀行貨幣所代表的那種東西的全部價值。現在，一般認為，那只是銀行資本的極小的一部分。爲了便利用金銀條塊進行的貿易，這許多年以來，銀行採取的辦法是對儲存金銀條塊的人付給信貸。這種信貸，一般比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約低百分之五。同時，銀行繪與一張受領證書或收據，使儲存金銀條塊的人或持證人得於六個月內的任何時候取回所存金銀，條件是將等於那筆信貸的銀行貨幣交還銀行，並給付千分之二十五（如果存的是白銀）或千分之五十（如果存的是黃金）的保管費。但同時又規定，若是到期不能作此種支付，則所存之金銀條塊即按收受時的價格，或按爲此而付給信貸時的價格，歸銀行所有。如此支付的儲金保管費，可以看作是一種倉庫租金。至於金的倉庫租金，爲什麼要比銀的倉庫租金高得那麼多，也有幾種不同的理由。據說，金的純度，比銀的純度更難確認。比較貴重的金屬，比較容易作假，由作假而引起的損失亦比較大。此外，銀是標準金屬，據說，國家的意圖，是鼓勵以銀儲存，不怎麼鼓勵以金儲存。

金銀條塊的價格比通常略低時，其儲存最爲普遍，到價格騰貴時，則往往被提出。在荷蘭，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一般比其造幣廠價格高，這好比最近金幣改鑄以前英格蘭的情況，理由亦相同。其差額，據說一般爲每馬克六至十六斯泰弗，即銀八盎斯，其中包含純銀十一分合金一分。對於這樣的銀（在被鑄爲外國鑄幣時，其成色爲一般所周知，而且被確認，例如墨西哥銀圓）的儲存，銀行所給的價格，即銀行所給的信貸，則爲每馬克二十二盾；造幣廠價格約爲二十三盾，市場價格則爲二十三盾六斯泰弗，乃至二十三盾十六斯泰弗，超出造幣廠價格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金銀條塊的銀行價格、造幣廠價格及市場價格幾乎保持着相同的比例。一個人一般可爲了金銀條

塊的造幣廠價格與市場價格間的差額，而出售其受領證書。金銀條塊的受領證書，幾乎常有若干價格。所以，坐待六個月期滿，不把儲金提出來，或忘記支付千分之二十五或幹分之五十的保管費，而獲取另六個月的新受領證書，以致銀行得按收受時的價格把儲金收為已有，卻是極不常有的現象。但是，這現象雖不常有，但亦有時發生，而在金的場合又比銀的場合較常發生，因為銀的保管費較輕，金則因為是比較貴重的金屬，其保管亦須支付較高的倉庫租金。

由儲存金銀條塊而換得銀行信用與受領證書的人，在其匯票到期時，以銀行信用兌付。至於受領證書是出賣或是保留，那就看他對於金銀條塊價格的漲跌，作怎樣的判斷。但此種銀行信用與受領證書，大都不會長久保留亦無長久保留的必要。有受領證書並要提取金銀條塊的人，老是發現有許多銀行信用或銀行貨幣，讓他以普通價格購買；同樣，有銀行貨幣並要提取金銀條塊的人，也發現有同樣多的受領證書，讓他購買。

銀行信用所有者及受領證書持有者，是銀行的兩種不同債權人。受領證書持有者，不把等於被領金銀條塊價格的一定數額銀行貨幣，給與銀行，就不能提取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金銀條塊。如果他自己沒有銀行貨幣，他就得向有銀行貨幣的人，購買銀行貨幣。但有銀行貨幣的人，若不能向銀行提出受領證書，表示自己所需要的數額，他亦不能提取金銀條塊。如果他自己沒有受領證書，他亦得向有受領證書的人，購買受領證書。有受領證書的人，購買銀行貨幣，其實就是購買提取一定數量金銀條塊的權力，這種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比其銀行價格高百分之五。所以，他為購買銀行貨幣而通常支付的那百分之五貼水，並不是為了一種想象的價值，而是為了一個真實的價值而支付的。有銀行貨幣的人，購買受領證書，其實亦就是購買提取一定數量金銀條塊的權力，這種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一般比其造幣廠價格高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所以，他為購買受領證書而支付的價格，亦同樣是為了一個真實的價值而支付的。受領證書的價格及銀行貨幣的價格合起來，便構成金銀條塊的完全價值或價格。

以國內流通的鑄幣存入銀行，銀行既給予銀行信用，也發給受領證書，但這種受領證書，通常是沒有價值的，也不能在市場上售得什麼價格。例如，以值三盾三斯泰弗的達克通存入銀行，所換得的信用

只值三盾，或者說比流通價值低了百分之五。銀行雖亦同樣發給受領證書，使持票人得在六個月內任何時候，支付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費，提出存在銀行的達克通，但這種受領證書，往往不能在市場上售得什麼價格。三盾銀行貨幣，雖大都可市場上售得三盾三斯泰弗，即在提出以後，可得到達克通的完全價值，但由於在提出以前，須納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費，所以得失相衡，恰好互相抵消。可是，假若銀行貼水，降為百分之三，這種受領證書便可在市場上售得若干價格，便可售得百分之一點七五了。但現今銀行貼水，大都在百分之五左右，所以，這種受領證書往往聽其滿期，或者象人們所說，聽其歸銀行所有。至於儲存金達克所得的受領證書，就更常聽其滿期，因為其倉庫租金為千分之五十，尤為昂貴。在這種鑄幣或條塊的儲存聽其歸銀行所有時，銀行往往可得利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可看作是永遠保管這種儲存物的倉庫租金。

受領證書過期的銀行貨幣的數額，必然是很大的。受領證書已經過期的銀行貨幣的數額，必定包含銀行當初的全部資本。據一般假設，銀行當初的全部資本，自從第一次存入以來，就沒有一個人想要調換新的受領證書，或把儲金提出，因為根據我們上面舉出的種種理由，那就無論採用那兩方法中任何一個，都必然是有損失的。但這數額無論是怎樣大，在銀行貨幣全額中所佔的部分，據假設是很小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過去好幾年來，是歐洲最大的金銀條塊倉庫，但其受領證書卻是很少過期的，或很少照一股所說歸銀行所有。比這大得多的那一部分銀行貨幣或銀行賬簿上的信用，都是過去好幾年來，由金銀條塊商人不斷儲存、不斷提取而創立的。

沒有受領證書，即不能向銀行有所要求。證書過期的那比較小量銀行貨幣，和受領證書還是有效的那比較大量銀行貨幣混在一起，所以沒有受領證書的銀行貨幣額雖很可觀，但決沒有某一特定部分銀行貨幣永遠沒有誰來要求。銀行不能為同一事物而對兩個人負擔債務人的義務；沒有受領證書的銀行貨幣所有者，在未購得受領證書以前，決不能要求銀行付款。在平靜的時候，他要按照市場價格購得一張受領證書，毫不困難。這種價格，和根據受領證書有權向銀行提取鑄幣或金銀條塊能在市售賣的價格，一般是相符合的。

但在國難時期，情形就兩樣了，例如，1672年法蘭西人侵入時，銀行貨幣所有者都想從銀行提出儲金，歸自己保存，大家都需要受領證書。這種需要，可能非常地提高受領證書的價格。有受領證書的人，可能作非分之想，不要求各受領證書所記明的銀行貨幣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卻要求百分之五十。知道銀行組織的敵人，甚至會把一切受領證書收買進來，以防止財寶搬出。一般認為，在這非常時期，銀行會打破只對受領證書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規。無銀行貨幣但有受領證書的人，一向必定只領取了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儲金價值的百分之二或三。所以，有人說，在這場合，銀行定會毫不遲疑地以貨幣或金銀條塊，對有銀行貨幣記在銀行賬簿上但無受領證書可向銀行提取儲金的人支付完全的價值；同時，對於有受領證書但無銀行貨幣的人支付百分之二或三，因為這個數目，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他們所應得的全部價值了。

即在平常和平靜的時候，受領證書持有者的利益在於減低貼水，藉以較低價格購買銀行貨幣（從而以較低價格購買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可以提取的金銀條塊），或以較高價格把受領證書賣給有銀行貨幣並望提取金銀條塊的人；受領證書的價格，一般等於銀行貨幣的市場價格及受領證書所記明的鑄幣或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之差。反之，銀行貨幣所有者的利益，卻在於提高貼水，藉以高價出售其銀行貨幣，或以低價購買受領證書。這樣相反的利害關係，往往會導致投機買賣的欺詐行為。為防止這種欺詐，近數年來銀行決定，不論什麼時候，賣出銀行貨幣換取通貨要貼水百分之五，而再度買進銀行貨幣，要貼水百分之四。這種決定的結果，貼水不能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亦不能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銀行貨幣與流通貨幣二者市場價格間的比例，不論什麼時候，都很接近它們固有價值間的比例。但在未有此種決定以前，銀行貨幣的市場價格，高低不一，按照這兩種相反利害關係對市場的影響，有時貼水上升到百分之九，有時又下跌而與通用貨幣平價。

阿姆斯特丹銀行宣稱，不以儲金任何部分貸出；儲金賬簿上每記下一盾，即在金庫內，保藏等於一盾價值的貨幣或金銀條塊。受領證書尚未失效，隨時可來提取，而事實上不斷地流出和流入的那一部分貨幣與金銀條塊，全保藏在金庫內，不容致疑，但受領證書久已滿

期，在平常和平靜時候不能要求提取，而實際上大概在聯邦國家存在的時期內永遠留在銀行裏的那一部分資本，是否亦是這樣，卻似乎有疑問。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銀行貨幣即有一盾金銀存在銀行金庫裏這一信條，在各種信條中總算是奉行最力的了。阿姆斯特丹市作了這個信條的保證人。銀行歸四個現任市長監督，這四個市長每年改選一次，新任的四個市長，比照賬簿，調查銀行金庫，宣誓接管，後來，再以同樣莊嚴的儀式，把金庫點交給繼任的人。在這真誠的宗教國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廢。有了此種更迭，對於一切不正當行為，似乎有了充足的保障。黨爭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過許多次革命，但在這一切革命中，佔優勢的黨派，都沒在銀行管理那一點上攻擊他們前任的不忠誠。對於失勢的黨派的名譽與信用，再沒有第二種事情比這種攻擊有更深刻的影響的了；如果這種攻擊真有根據，我們可以斷言，那是一定會提出來的。1672年，當時法王在烏德勒支，阿姆斯特丹銀行付款迅速，以致無人懷疑它履行契約的忠誠。當時，從銀行金庫中提出的貨幣，還有些曾為銀行設立後市政廳大火所燒焦。這些貨幣，必定是從那時候起，即保存在銀行金庫內的。

這銀行的金銀總額究竟有若干，老早就成為好事者臆測的問題。但關幹這總額多少，只能推測。一般認為，與這銀行有賬目來往的人，約有二千；假設他們每人平均存有一千五百鎊的價值（那是最大的假設），那末銀行貨幣總額，因而，銀行金銀總額，便大約等於三百萬鎊，以每鎊十一盾計算，就大約等於三千三百萬盾。這樣一個大數額，足以經營極廣泛的流通，但比一些人關於這總額誇大的臆測，卻小得多。

阿姆斯特丹市從這銀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除了所謂倉庫租金，凡第一次與銀行開來往賬戶的，須納費十盾；每開一次新賬，又領納費三盾三斯泰弗；每轉一次賬，須納費二斯泰弗；如果轉賬的數目不及三百盾，則須納六斯泰弗，以防止小額的轉賬。每年不清算賬目二次的，罰二十五盾。轉賬的數目如果超過了儲存的賬目，須納費等於超過額的百分之三，其請求單亦被擱置。據一般人設想，銀行由受領證書滿期歸為己有的外國鑄幣與金銀條塊，在有利時出售，亦獲得不少利潤。此外，銀行貨幣以百分之五的貼水賣出，以百分之四的貼水買入，亦給銀行提供利潤。這些不同利得，大大超過支付職員薪俸和

開支管理費用。單單儲存所納保管費一項，據說等於十五萬盾至二十萬盾的年純收入。不過，這機關設立的目標，原來不是收入，而是公益。其目的在幹使商人不至因不利的匯兌而吃虧。由此而生的收入，是不曾預料到的，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意外。我爲了要說明，爲什麼理由，用銀行貨幣兌付的國家和用通用貨幣兌付的國家，其匯兌大都似乎有利於前者，而不利於後者。不知不覺地說出了冗長的題外話，現在，我該回到本題。前一種國家用以兌付匯票的貨幣，其固有價值總是不變，恰與其造幣廠標準相符；後一種國家用以兌付匯票的貨幣，其固有價值不斷變動，而且幾乎都多少低於其造幣廠標準。

第二節根據其他原則，這種異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在本章的前節，我竭力說明，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理，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爲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貨物的輸入，也不必加以異常的限制。

然而，此種限制以及許多其他商業條例所根據的整個貿易差額學說，是再不合理不過的。當兩地通商時，這種學說認爲，如果貿易額平衡，則兩地各無得失；如果貿易額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損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稱。但這兩種設想都是錯誤的。象我後面所要說明的那樣，獎勵金與獨佔權，雖爲本國利益而設立，但由獎勵金及獨佔權所促成的貿易，卻可能對本國不利，而且事實上常是這樣。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進行的兩地間的貿易，雖未必對兩地同樣有利，但必對兩地有利。

所謂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釋，不是金銀量的增加，而是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交換價值的增加，或是一國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兩地貿易額平衡，而兩地間的貿易，全由兩國國產商品的交換構成，那末在大多數場合，它們不僅都會得利，所得利益而且必相等或幾乎相等。這樣，各爲對方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提供了一個市場。甲方爲生產及製造這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而投下的資本，即在一定數目居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或生計的資本，將由乙方補還；乙方投下的這種資本，將由甲方補還。所以，兩國的居民，都有一部分，將間接從另一國取得他們的收入與生計。兩國間所交換的商品，其價值又被假設相等，則在大多數場合，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而且，因爲都是用來生產兩國的國產商

品，所以，兩國居民由此種分配而得的收入與生計，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彼此互相提供的這種收入與生計，按照商務來往大小的比例，有多有少。若彼此每年都等於十萬鎊，則彼此給對方居民所提供的，亦為十萬鎊的年收入；若等於一百萬鎊，則彼此給對方居民提供的，亦為一百萬鎊的年收入。

設甲乙兩國間的貿易，是屬於這樣的性質，即甲國貨物輸至乙國的純為國產商品，乙國輸至甲國的回程貨則純為外國商品，那末，在這假設下，兩國的貿易額，仍被認為是平衡的，彼此都以商品償付。在這場合，兩國仍然享有利得，但利得的程度不同；從這種貿易取得最大收入的，是隻輸出國產商品的那一國居民。比方說，英國從法國輸入的，純為法國所生產的國產商品，但英國卻沒有法國所需要的商品，每年不得不以大量的外國貨物如菸草與東印度貨物來償付。這種貿易雖可給兩國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給法國居民所提供的收入，必多於給英國居民所提供的。法國每年投在這種貿易上的全部資本，是在法國人民間分配的。但英國資本，只有一部分，即用來生產英國貨物備與外國貨物交換的那一部分資本，是每年在英國人民間分配的。其資本，有較大部分是用來補還弗吉尼亞、印度和中國的資本，並對這些遙遠國家居民提供一種收入與生計。即使兩國所投資本相等或幾乎相等，但法國資本的使用，給法國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國資本的使用，所增於英國人民收入的大得多。因為，在這場合，法國所經營的，是對英國的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英國所經營的，是對法國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這兩種國外貿易所生的不同結果，已經在前面充分說明過了。

不過，兩國間的貿易，也許既不能雙方全為國產商品的交換，也不能一方全為國產商品，一方全為外國貨物。幾乎一切國家，彼此間所交換的，都一部分是國產商品，一部分是外國貨物。但是，國產商品佔交換品最大部分而外國貨物佔交換品最小部分的國家，總是主要的利得者。

假若英國用以償還法國每年輸入品的，不是菸草與東印度貨物，而是金銀，那貿易額便被認為是不平衡的，因為不是以商品而是以金銀償付商品。其實，在這場合，也象在前一場合一樣，能給兩國人民提供若干收入，不過給法國人民提供的，比給英國人民提供的多。英

國人民，必從此取得收入。為生產英國商品以購買金銀而投下的資本，即在英國一定人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的資本，必可因此而補還，使其用途得以繼續。輸出一定價值的金銀，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正如輸出等價值任何其他貨物，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一樣。反之，在大多數場合，都會增加英國資本總量。只有其國外需求被認為大於其國內需求，而其回程貨在國內的價值大於輸出品在國內的價值的那些貨物才輸到國外去。如果菸草在英國僅值十萬鎊，但輸往法國而購回的葡萄酒，在英國卻可值十一萬鎊，那末這種交換，就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如果英國以金十萬鎊所購得的法國葡萄酒，在英國亦可值十一萬鎊，則這種交換也就同樣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在酒庫中有值十一萬鎊葡萄酒的商人，比在堆棧中有值十萬鎊菸草的商人更富裕，同樣也比在金櫃中有值十萬鎊的商人更富裕。他和其他二人比較，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並繪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計與職業。但國家的資本與其全體人民的資本相等，而一國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又等於這一切資本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所以，一國資本及其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就大都會因此種交換而增加。為英國的利益計，與其用弗吉尼亞菸草或用巴西、祕魯金銀，當然無寧用它自己的鐵器及寬幅厚呢來購買法國葡萄酒。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總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但以金銀進行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並不比以其他貨物進行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不利。無礦產國每年輸出金銀，不會使金銀更容易幹竭。正如無煙草國每年輸出菸草，不會使菸草更容易幹竭。有資力購買菸草的國家，決不會長久缺乏菸草；同樣，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也決不會良久缺乏金銀。

有人說，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是一種虧本的交易，而製造業國和葡萄酒產國間自然會有的貿易，也可以說有同樣的性質。我卻以為，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並不一定是虧本的交易。就此種貿易本身的性質說，其利益和任何其他貿易相同，不過，也許比較容易被濫用。釀酒家的職業，甚至小酒販的職業，與其他職業同是必要的分工部門。工人所需的麥酒量，一般是與其親自釀造，無寧向釀酒家購買；而且，他若是一個貧窮工人，那末他購買麥酒，一般是與其向釀酒家作大量的購買，無寧向小酒販作小量的購買。倘若他是個貪食者，他可能購買過多的麥酒，正如他可能購買過多的家畜肉；要是他想扮作一個翩翩公子，他可能購買過多呢絨布匹。貿易自由，雖然可

能被濫用，而且，有幾種貿易自由，特別容易發生這種結果，但無論如何，對幹工人大眾，這一切貿易自由，總是有利的。此外，有時有了由嗜酒過度而蕩產的個人，但似乎用不着擔心會有這樣的國家。雖然在每個國家，都有許多人，在酒這方面所花費的超過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但有更多人，所花費的小於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應該指出，根據經驗，葡萄酒的低廉，似乎不是泥醉的原因，而是節酒的原因。葡萄酒產國的人民，一般是歐洲最節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南部各省人民。對於普通日常飲食，人民很少過度使用。象溫和啤酒那樣廉價的飲料，就是大花大用，也不能表現一個人的寬宏和好客。反之，只在過熱或過寒不能栽種葡萄樹，因而葡萄酒異常稀少昂貴的國家，如北方民族、熱帶民族（如幾內亞海岸的黑人），泥醉才成為普遍的惡習。當法國軍隊，從法國北部各省開拔至南部各省，即從葡萄酒昂貴區域開拔至葡萄酒低廉區域時，據說，起初往往因見良好葡萄酒如此價廉新鮮而耽溺其中，但駐留數月之後。其中大部分，便象當地居民一樣節酒了。同樣，如果把外國葡萄酒稅、麥芽稅、麥酒稅、啤酒稅一律取消，或可使英國中下等階級人民間暫時盛行泥醉風氣，但不久也許就會養成一個恆久的普遍的節酒習俗。現今，在上流社會即有資力消費最貴飲料的人中，泥醉已經不是他們的惡習了。吃麥酒而泥醉的縉紳先生，極不常見。此外，葡萄酒貿易在英國的限制，與其說爲了要防止人民走入（如果可以這樣說）酒店，無寧說爲了要防止人民，使其不能購買價最廉物美最的飲料。那種限制，有利於葡萄牙的葡萄酒貿易，不利於法國的葡萄酒貿易。據說，對於我國製造品，葡萄牙人是比較好的顧客，法國人是比較不好的顧客，所以，我們應當優待葡萄牙人，加以獎勵。據說，他們照顧了我們，我們也應當照顧他們。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為一個大帝國政治設施的原則。其實，只有小商人，纔會把這種策略看作是對待顧客的規則。至於大商人，不問這些小節，總是在價最廉物美最美的地方購買他的貨物。

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認為他們的利益在於使一切鄰國變得窮困。各國都嫉妒與他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並把這些國家的利得，看作是他們的損失。國際通商，家個人通商一樣，原來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為不和與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們反覆無常的野心，在這世紀及前世紀，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大於

商人和製造業者們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間支配者的暴力與不正，自古以來即是一種禍害。我認爲，按照人事的性質，這種禍害是無法除去的。至於不是亦不應該是人間支配者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們，其卑鄙的貪慾，其獨佔的精神，雖也許不能改正，但要不讓他們擾亂別人的安寧，卻是極其容易的。

最初發明這種原則傳佈這種原則的，無疑是獨佔的精神；最先倡導這種原則的人並不象後來信奉這種原則的人那麼傻。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爲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象同業組合內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內居民僱用其他人而只僱用他們自己一樣，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在於自己保有國內市場的獨佔權。因此，在英國，在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對幹幾乎一切由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都課以異常重稅。因此，凡能輸入本國，與本國製造品競爭的一切外國製造品，都課以高的關稅，或禁止輸入。因此，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爲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換言之，對民族仇恨異常激烈的國家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

在戰爭或政治上，鄰國的財富，雖對我國有危險，但在貿易上，則確對我國有利益。在戰時，敵國的財富，或可使敵國能夠維持比我國強大的海陸軍。但在和平的通商狀態下，鄰國的財富，必使他們能夠和我們交換更大的價值，必對我國產業的直接生產物或用這種生產物購進來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場。勤勞的鄰近的富人，和窮人比較，是更好的顧客；鄰近的富國，也是這樣。經營同種製造業的富人，固然是鄰近各同業者的危險鄰人，但他的花費，可給鄰近的其餘一切人提供好的市場，所以，對絕大多數鄰人是有利的。不僅如此，較貧的經營同業的工人，又將因此而減低其售價，因而，對其餘一切人有利。同樣，富國的製造業者，無疑會成爲鄰國同種製造業者極危險的競爭者，但這種競爭，卻有利於人民大眾。此外，這樣富國的大花費，必能在其他方面，給人民大眾提供良好的市場，使他們得利。想發財的私人，決不會退居窮鄉僻壤，一定會住在首都或大商業都

市。他們知道，財富流通極少的地方，所可取得的財富極少；財富流通極多的地方，可有些財富歸到他們手裏。指導着一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的常識的原則，應該支配一百萬人、一千萬人、二千萬人的判斷，應該使全國國民都認為，鄰國的富乃是本國可能獲得財富的原因和機會。想由國外貿易致富的國家，在其鄰國都是富裕勤勉的商業國時，最易達到目的。一國四周，如果都是遊牧的未開化人和貧窮的野蠻人，那末，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無疑可使國家致富，但要由國外貿易致富，就絕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國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而致富的。據說，古代埃及人，極不注意國外貿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與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以一切鄰國陷於貧困境況為目標的近代外國通商原則，如果能夠產出它所企望的結果，那就一定會陷國外貿易於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視的地位。

法國和英國間的貿易，所以會在兩國都受到那麼多的阻礙與限制，就是此等原則的結果。如果這兩國能拋棄商業的嫉妒和國民的仇恨，來考察其真實利害關係，那末對英國來說，法國的貿易，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對法國來說，英國的貿易，亦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法國為英國最近的鄰國。英國南部沿海各地與法國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間的貿易，好象國內貿易一樣，可以每年往返四次、五次乃至六次。這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比較投在國外貿易大多數其他部門上的等量資本，能夠推動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勞動量，能夠僱用和養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人數。這兩國彼此相隔最遠的各地間的貿易，也至少可望每年往返一次。所以，就連這種貿易，也比我國對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國外貿易同樣有利。若與誇大的我國對北美殖民地的貿易（那一般要三年，乃至四年五年以上，才能往返一次）比較，那至少也有利三倍。此外，法國據說有居民二千三百萬，我國北美殖民地居民卻據說不過三百萬。法國又比北美洲富饒得多，雖然由於法國財富分配不平均，法國的貧民乞丐，比北美多得多。所以，與我國北美殖民地比較，法國所能提供的市場，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為頻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英國的貿易，亦同樣有利於法國。英國貿易對於法國的利益，要按照兩國財富、人口與鄰近的程度，大幹法國殖民地貿易對

於法國的利益。這就是兩國智者所認為宜加以阻止的貿易和最受其偏愛獎勵的貿易這二者間很大的差別。

然而，使兩國間開放的自由的貿易對兩國那麼有利的環境，卻成為產生這種貿易的主要障礙的原因。因為是鄰國，它們必然是故國；於是，一方的富強，增加另一方的恐懼，而本來可增進國民友誼的有利因素，卻成為助長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們同是富裕勤勉的國家。每一國商人和製造者，都擔心會在技術與活動上遇到另一國商人和製造業者的競爭。商業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長了商業上的嫉妒，兩者相互助長。兩國的貿易者，都熱烈地確信他們自私自利的謬說，宣稱不受限制的國外貿易，必然會生出不利的貿易差額，而不利的貿易差額，又一定會導致國家的滅亡。

在歐洲各商業國內，自命的這種學說的學者常常預告；不利的貿易差額，將使國家頻於滅亡。這激起了各商業國不少的憂慮，幾乎各商業國都試圖改變貿易差額，使對本國有利而對鄰國不利。但在這一切憂慮以後，在這一切無效的嘗試以後，似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曾因上述原因而變得貧困。和重商主義者的預料相反，實行開放門戶並允許自由貿易的都市與國家，不但不曾因此種自由貿易而滅亡，而且因此致富。歐洲今日，從某幾點說，配稱為自由港的都市雖有幾個，但配稱為自由港的國家卻還沒有。最接近於此的國家，也許要算荷蘭了，雖然仍離此很遠。大家承認，不僅荷蘭國民財富全部得自對外貿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資料也得自對外貿易。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有另一種差額，和貿易差額極不相同。一國的盛衰，要看這差額是有利或是不利。這就是年生產與年消費的差額。前面說過，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如果超過了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這超過額的比例而增加起來。在這場合，社會在其收入內維持其生存，每年從其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部分，自然會加到社會資本上去，並用以進一步增加年生產物。反之，如果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小於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短少的比例而減少下去。在這場合，社會的支出超過了社會的收入，那必然會侵蝕社會的資本。資本必然會減退，隨着資本的減退，其產業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亦減退。

生產與消費的差額，和所謂貿易差額全不相同。在沒有對外貿易、不與世界往來的國家內，可以發生這種差額。在財富、人口與改良都在逐漸增進或在逐漸減退的全地球上，也可以發生這種差額。

即使在所謂的貿易差額一般不利於一個國家時，生產與消費的差額仍可不斷地有利於這個國家。即使半世紀來，這個國家輸入的價值都大於輸出的價值；在這全期間內，流入的金銀，全部立即輸出；流通鑄幣逐漸減少而以各種紙幣替代鑄幣；甚至它對各主要通商國家所負的債務，亦在逐漸增加；但它的真實財富，它的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仍可在這期間，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來。我國北美殖民地的狀態，以及它們在現今的擾亂事件發生以前對不列顛的貿易狀態，都可證明這並不是一個不接近於事實的假設。

第三章 論對其貿易的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

那些國家的各種貨物的輸入所加的異常限制

第一節即使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這種限制也不合理

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增加金銀量的第二個方法，是對其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例如，西利西亞的細竹布，繳納了一定的稅，即可輸入英國，供英國本國消費；但法國的細葛布及細竹布，卻除了輸入倫敦港落棧以待輸出以外，便禁止輸入。法國葡萄酒輸入所須負擔的稅，亦較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國家葡萄酒為重。依照1692年所謂輸入稅，一切法國商品，都須繳納其價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稅；但其他各國的貨物所納的稅，卻大部分要輕得多，很少超過百分之五。誠然，法國葡萄酒、白蘭地、食鹽、醋，不在此限，但此等商品，卻依照別項法律或這個法令的特殊條款，繳納別種苛重的稅。1696年，又認為此百分之二十五，還不夠阻止法國商品輸入，於是又對白蘭地以外的法國貨物再課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稅，同時對法國葡萄酒每大桶課新稅二十五鎊並對法國醋每大桶課新稅十五鎊。法國貨物從未省免稅則上列舉的各種貨物或大部分貨物必須繳納的那些一般補助稅或百分之五稅。要是把三分之一補助稅和三分之二補助稅也計算在內，作為全部要繳納的補助稅，那就課有那些補助稅的五種。因此，在這次戰爭開始以前，法國大部分農產品和製造品，至少也須負擔百分之七十五的稅。但大部分貨物實在負擔不起這樣重的稅。所以，課它們以這樣重的稅無異禁止其輸入。我相信，法國也針鋒相對地以同樣苛重的稅，加在我們的貨物及製造品上，雖然我不知道它所課的稅具體苛重到什麼地步。這種相互的限制，幾乎斷絕了兩國間一切公平貿易，使法國貨物運至英國，和英國貨物運至法國，主要都靠走私。我在前章所考察的有原則，發源於私人利害關係和獨佔精神；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各原則，卻發源於國民的偏見與敵意。因此，我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原則更不合理。甚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來說，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即使英、法間自由通商的結果，貿易差額確對法國有利，我們亦不能因此便斷言，那樣一種貿易將對英國不利，亦不能因此便斷言，英國全部貿易總差額，將因此種貿易而愈不利於英國。如果法

國葡萄酒，比葡萄牙葡萄酒價廉物美，其麻布則比德意志的麻布價廉物美，那末英國所需的葡萄酒與外國麻布，當然以向法國購買為有利，以向葡萄牙、德意志購買為不利。從法國每年輸入的貨物的價值，固將大增，但因同品質的法國貨物較廉於葡萄牙、德意志二國貨物，故全部輸入品的價值必減少，而減少的數量，則與其低廉程度相稱。即使輸入的法國貨物完全在英國消費，情況也是如此。

第二，所輸入的全部法國貨物，有大部分可能再輸到其他國家去作有利的販賣。這種再輸出，也許會帶回與法國全部輸入品的原始費用有同等價值的回程貨。人們關於東印度貿易所常說的話，對法國貿易也可適用，就是說，東印度貨物，雖有大部分是用金銀購買，但由其中一部分貨物的再輸出，所帶回到本國來的金銀，比全部貨物的原始費用還多。現在，荷蘭最重要貿易部門之一，就是運法國貨物到歐洲其他各國。英國人飲的法國葡萄酒，亦有一部分祕密由荷蘭及西蘭輸入。如果英法間貿易自由，或法國貨物在輸入時與歐洲其他各國繳納同樣的稅，並在輸出時收回，那末英國可能就會分享到那對荷蘭說來十分有利的貿易的好處。

第三，我們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依以判定兩國間的貿易差額究竟對何國有利，即何國輸出的價值最大。關於這一類問題，我們的判斷，往往根據由個別營業家的私利所左右的國民偏見與敵意。在這場合，人們往往使用兩個標準，即關稅漲簿與匯兌情況。由於關稅賬簿對各種商品所評的價，有大部分不準確，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那是很靠不住的標準。至於匯兌情形，恐怕也是同樣不可靠。

當倫敦與巴黎兩地以平價匯兌時，據說那就顯示倫敦欠巴黎的債務，恰被巴黎欠倫敦的債務所抵消了。反之，購買巴黎匯票，若須在倫敦給付匯水，據說那就顯示倫敦欠巴黎的債務，沒被巴黎欠倫敦的債務所抵消。因此，倫敦必須以一定差額的貨幣送往巴黎。因為輸出貨幣既招危險，又很麻煩，並須給付費用，所以代匯者要求匯水，匯兌人亦須給付匯水。據說，這兩都市間，債權與債務的普通狀態，必然受彼此間商務來往普通情況的支配。由甲都市輸入乙都市的數額若不大於由己都市輸出到甲都市的數額，由己都市輸入甲都市的數額若不大於由甲都市輸出到乙都市的數額，則彼此間債務與債權可以抵消。但若甲方從乙方輸入的價值大於甲方向乙方輸出的價值，則甲方

負乙方的數額必大於乙方負甲方的數額。債權債務不能互相抵消，於是債務大於債權的方面，必須輸出貨幣。匯兌的普通情況，既標示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亦必然標示兩地間輸出與輸入的普通情況，因為兩地間債權債務的普通狀態，必然受兩地間輸出輸入普通情況的支配。

可是，即使匯兌的一般情況，可充分表示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但亦不能因此便斷言，債務債權的普通狀態若有利於一個地方，貿易差額亦即對它有利。兩地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未必完全取決於兩地間商務來往的一般情況，而常受兩地間任何一地對其他各地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支配。譬如，英國購買了漢堡、但澤、里加等處的貨物，要是常以荷蘭匯票支付貨物代價，那末英荷間債務與債權的普通狀態，即不完全受這兩國間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支配，而卻受英國對那些其他地方商務來往一般情況的影響。在這場合，即使英格蘭每年向荷蘭的輸出，遠遠超過英國每年從荷蘭輸入的價值，即使所謂貿易差額大有利於英國，英國每年仍須輸貨幣到荷蘭去。

此外，按照一向計算匯兌平價的方法，匯兌的一般情況，亦不能充分表示，匯兌的一般情況如果被認為有利於一個國家，那末債務與債權的一般情況亦對它有利。換言之，真實的匯兌情況，與估計的匯兌情況，可能極不相同，而且事實上往往極不相同，所以，在許多場合，關於債務債權的一般情況，我們決不能根據匯兌的一般情況得到確實的結論。

假設你在英國支付的一筆貨幣，按照英國造幣廠標準，包含若干盎斯納銀，而你所得的匯票，在法國兌付的貨幣額，按照法國造幣廠標準，其中所含的純銀量恰好相等，人們就說英法兩國以平價匯兌。如果你所支付的多於兌付所得，人們就認為你付了匯水，並說匯兌對英國不利，對法國有利。如果你支付的少於兌付所得，人們就認為你得了匯水，並說匯兌對法國不利，對英國有利。

但是，第一，我們不能常常按照各國造幣廠的標準，來判斷各國通貨的價值。各國通貨的磨損程度和削剪程度，低於標準的程度，是有多有少的。一國通用鑄幣與他國通用鑄幣的相對價值，並不看各自應含的純銀量，而卻看各自實含的純銀量來定。在威廉王時代改鑄銀幣以前，英荷間的匯兌，依照普通計算法，按照各自造幣廠的標準，

要英國貼水百分之二十五。但英國當時通用鑄幣的價值，據朗迪斯調查研究所得，卻低於其標準價值百分之二十五。所以，當時兩國間的匯兌，照通常計算法，雖是那麼大不利於英國，實則有利於英國。實際上在英國支付較小量純銀，所購得的匯票，卻可在荷蘭兌得較大量純銀。被想象為付了匯水的人，實際上可能得了匯水。在英國金幣改鑄以前，法國鑄幣比英國鑄幣的磨損程度小得多，而法國鑄幣接近其標準的程度也許比英國鑄幣大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如果英法間的匯兌，據計算，其不利於英國的程度，若未超過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則真實的匯兌便可對英國有利。而自金幣改鑄以來，匯兌總是有利於英國而不利於法國。

第二，有些國家的造幣費用，由政府支付；有些國家，則由私人支付。在後一場合，持銀塊往造幣廠鑄造的，不僅要支付鑄幣的費用，有時還要給政府提供若干收入。在英國，造幣費用由國家支付，如果你持一磅重的標準銀至造幣廠，你可取回六十二先令，內合同樣的標準銀一磅。在法國，鑄幣須扣除百分之八的稅，這不僅足夠支付造幣費用，而且可給政府提供小的收入。在英國，因鑄造不收費，故鑄幣的價值，絕不可能大大超過鑄幣內含的銀塊量的價值。在法國，工價增加鑄幣的價值，正象工價增加精製金銀器皿的價值一樣。所以，包含一定重量純銀的一定數額法國貨幣，比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英國貨幣，有更大的價值，必須支付更多的銀塊或商品來購買它。所以，這兩國的鑄幣，雖同樣接近各自造幣廠的標準，但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英國貨幣，未必就能購買包含等量純銀的一定數額法國貨幣，因而未必就能購買在法國兌付這貨幣額的匯票。如果為購買一張匯票，英國所支付的超額貨幣，恰好補償法國鑄幣費用，那末兩國間的匯兌，事實上就是平兌。債務與債權自可互相抵消，雖然按照計算，這兩國間的匯兌大有利於法國。如果為購買這張期票，英國所支付的貨幣，少於上述數額，那末兩國間的匯兌，事實上有利於英國，雖然按計算對法國有利。

第三，有些地方，如阿姆斯特丹、漢堡、威尼斯等地，都以他們所謂銀行貨幣兌付外國匯票；但有些地方，如倫敦、里斯本、安特衛普、勒格亨等地，則以當地通用貨幣兌付。所謂銀行貨幣，總是比同一名義金額的通用貨幣有更大價值，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貨幣一千

盾，就比阿姆斯特丹地方通用貨幣一千盾有更大的價值。二者間的差額，被稱為銀行的扣頭，這在阿姆斯特丹，一般是大約百分之五。假設兩國通用的貨幣，同樣接近各自造幣廠的標準，但一國以通用貨幣兌付外國匯票，另一國則以銀行貨幣兌付外國匯票，這兩國間的匯兌，即使事實上有利於以通用貨幣兌付的國家，但按照計算，仍可有利於以銀行貨幣兌付的國家。這好比兩國間的匯兌，雖然事實上是有利於以較劣貨幣兌付外國匯票的國家，但按照計算，仍可有利於以較良貨幣兌付的國家，其中理由，正相類似。在最近金幣改鑄以前，對阿姆斯特丹，對漢堡，對威尼斯，我相信，對一切其他以所謂銀行貨幣兌付的地方，倫敦的匯兌，按照計算，都是不利於倫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言，這種匯兌事實上對倫敦不利。從金幣改鑄以來，甚至與這些地方通匯也對倫敦有利了。對里斯本，對安特衛普，對勒格亨，我相信除了對法國，倫敦對歐洲大多數以通用貨幣兌付匯票的地方，按照計算，其匯兌大都對倫敦有利；事實上，大抵也是這樣。

順便談談儲金銀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儲金銀行

象法國、英國那樣的大國，其通貨幾乎全由本國鑄幣構成。如果這種通貨因磨損、剪削或其他原因，而其價值降至標準價值之下，國家可通過改鑄有效地恢復通貨的舊觀。但是，象熱那亞、漢堡那樣的小國，其通貨很少全由本國鑄幣構成，一定有一部分是由它的居民常常來往的各鄰國的鑄幣構成。象這樣的國家，通過改鑄，只能改良其鑄幣，未必能改良其通貨。這種通貨，因其本身性質極不確定，一定數額的這種通貨，價值亦很不確定，故在外國，其評價必然低於其實際價值。所以，如果這種國家以這種通貨兌付外國匯票，其匯兌就一定對它大為不利。

這種不利的匯兌，必然使商人們吃虧。為作救濟，這樣的小國，一經注意到了貿易的利益，為使商人們不吃虧，往往規定，凡有一定價值的外國匯票，不得以通用貨幣兌付，只許以一定銀行的銀票兌付或在一定銀行的賬簿上轉賬。這種銀行是靠國家的信用，並在國家的保護下建立起來的，其兌付匯票，勢須完全按照國家的標準，以良好的真正的貨幣兌付。威尼斯、熱那亞、阿姆斯特丹、漢堡、紐倫堡等地的銀行，原來似乎都是為了這目的而設立的，雖然其中有些可能在後來被迫改變了目的。這種銀行的貨幣既優於這些國家的通用貨幣，

必然會產生貼水，貼水的大小，視通貨被認為低於國家標準的程度的大小而定。據說，漢堡銀行的貼水，一般約為百分之十四，這百分之十四，乃是國家標準良幣與由鄰國流入的損削低價劣幣二者之間被認為應有的差額。

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廣大貿易從歐洲各地帶回來的大量剪削磨損的外國鑄幣，使阿姆斯特丹通貨的價值比造幣廠新出良幣的價值約低百分之九。在這情況下，新出的良幣，往往是一經鑄造出來，即被溶解，或被輸出。擁有大量通貨的商人，不能常常找到足夠的良幣來兌付他們的匯票；此類匯票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不確定，儘管有了若干防止這種不確定性的法規。

爲了糾正這種不利情況，阿姆斯特丹於1609年在全市的保證下設立了一家銀行。這家銀行，既接受外國鑄幣，也接受本國輕量的磨損了的鑄幣，除了在價值中扣除必要的鼓鑄費和管理費，即按照國家的標準良幣，計算其內在價值。在扣除此小額費用以後，所餘的價值，即在銀行賬簿上，作為信用記入。這種信用叫做銀行貨幣，因其所代表的貨幣，恰好按照造幣廠標準，故常有同一的真實價值，而其內在價值又大於通用貨幣。同時又規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兌付或賣出的六百盾以上的匯票，都得以銀行貨幣兌付。這種規定，馬上就消除了一切匯票價值的不確定性。由於有這種規定，每個商人，爲了要兌付他們的外國匯票，不得不與那銀行來往。這必然會引起對銀行貨幣的需要。

銀行貨幣，除了它固有的對通用貨幣的優越性以及上述需要所必然產生的增加價值外，還具有幾種別的優點。它沒有遭受火災、劫掠及其他意外的可能；阿姆斯特丹市，對它負全責，其兌付，僅需通過單純的轉賬，用不着計算，也用不着冒風險由一個地方運至另一個地方。因爲它有這種種優點，似乎自始就產生了一種貼水；大家都相信，所有原來儲存銀行內的貨幣，都聽其留在那邊，誰也不想要求銀行支還，雖然這種存款在市場上出售，可得到一項貼水。如要求銀行支還，銀行信用的所有者就會失去此項貼水。新由造幣廠造出的先令，既不能在市場上比普通的磨損了的先令購得更多的貨物，所以，從銀行金櫃中取出來歸入私人金櫃中的良好真正貨幣，和通用貨幣混在一起，就不易辨認，其價值就不高於通用貨幣。當它存在銀行金櫃

時，它的優越性是大家知道而且是確認的。當它流入私人金櫃時，要確認它的優越性，所付代價要大於這兩種貨幣的差額。此外，一旦從銀行金櫃中提出來，銀行貨幣的其他各種優點，亦必隨着喪失。安全性喪失了，方便的安全的移讓性喪失了，支付外國匯票的用處亦喪失了。不僅如此，要不是預先支付保管費，就不可能從銀行金櫃提出貨幣來。

這種鑄幣存款，或者說銀行必須以鑄幣付應的存款，就是銀行當初的資本，或者說就是所謂銀行貨幣所代表的那種東西的全部價值。現在，一般認為，那只是銀行資本的極小的一部分。爲了便利用金銀條塊進行的貿易，這許多年以來，銀行採取的辦法是對儲存金銀條塊的人付給信貸。這種信貸，一般比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約低百分之五。同時，銀行繪與一張受領證書或收據，使儲存金銀條塊的人或持證人得於六個月內的任何時候取回所存金銀，條件是將等於那筆信貸的銀行貨幣交還銀行，並給付千分之二十五（如果存的是白銀）或千分之五十（如果存的是黃金）的保管費。但同時又規定，若是到期不能作此種支付，則所存之金銀條塊即按收受時的價格，或按爲此而付給信貸時的價格，歸銀行所有。如此支付的儲金保管費，可以看作是一種倉庫租金。至於金的倉庫租金，爲什麼要比銀的倉庫租金高得那麼多，也有幾種不同的理由。據說，金的純度，比銀的純度更難確認。比較貴重的金屬，比較容易作假，由作假而引起的損失亦比較大。此外，銀是標準金屬，據說，國家的意圖，是鼓勵以銀儲存，不怎麼鼓勵以金儲存。

金銀條塊的價格比通常略低時，其儲存最爲普遍，到價格騰貴時，則往往被提出。在荷蘭，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一般比其造幣廠價格高，這好比最近金幣改鑄以前英格蘭的情況，理由亦相同。其差額，據說一般爲每馬克六至十六斯泰弗，即銀八盎斯，其中包含純銀十一分合金一分。對於這樣的銀（在被鑄爲外國鑄幣時，其成色爲一般所周知，而且被確認，例如墨西哥銀圓）的儲存，銀行所給的價格，即銀行所給的信貸，則爲每馬克二十二盾；造幣廠價格約爲二十三盾，市場價格則爲二十三盾六斯泰弗，乃至二十三盾十六斯泰弗，超出造幣廠價格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金銀條塊的銀行價格、造幣廠價格及市場價格幾乎保持着相同的比例。一個人一般可爲了金銀條

塊的造幣廠價格與市場價格間的差額，而出售其受領證書。金銀條塊的受領證書，幾乎常有若干價格。所以，坐待六個月期滿，不把儲金提出來，或忘記支付千分之二十五或幹分之五十的保管費，而獲取另六個月的新受領證書，以致銀行得按收受時的價格把儲金收為已有，卻是極不常有的現象。但是，這現象雖不常有，但亦有時發生，而在金的場合又比銀的場合較常發生，因為銀的保管費較輕，金則因為是比較貴重的金屬，其保管亦須支付較高的倉庫租金。

由儲存金銀條塊而換得銀行信用與受領證書的人，在其匯票到期時，以銀行信用兌付。至於受領證書是出賣或是保留，那就看他對於金銀條塊價格的漲跌，作怎樣的判斷。但此種銀行信用與受領證書，大都不會長久保留亦無長久保留的必要。有受領證書並要提取金銀條塊的人，老是發現有許多銀行信用或銀行貨幣，讓他以普通價格購買；同樣，有銀行貨幣並要提取金銀條塊的人，也發現有同樣多的受領證書，讓他購買。

銀行信用所有者及受領證書持有者，是銀行的兩種不同債權人。受領證書持有者，不把等於被領金銀條塊價格的一定數額銀行貨幣，給與銀行，就不能提取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金銀條塊。如果他自己沒有銀行貨幣，他就得向有銀行貨幣的人，購買銀行貨幣。但有銀行貨幣的人，若不能向銀行提出受領證書，表示自己所需要的數額，他亦不能提取金銀條塊。如果他自己沒有受領證書，他亦得向有受領證書的人，購買受領證書。有受領證書的人，購買銀行貨幣，其實就是購買提取一定數量金銀條塊的權力，這種金銀條塊的造幣廠價格，比其銀行價格高百分之五。所以，他為購買銀行貨幣而通常支付的那百分之五貼水，並不是為了一種想象的價值，而是為了一個真實的價值而支付的。有銀行貨幣的人，購買受領證書，其實亦就是購買提取一定數量金銀條塊的權力，這種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一般比其造幣廠價格高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所以，他為購買受領證書而支付的價格，亦同樣是為了一個真實的價值而支付的。受領證書的價格及銀行貨幣的價格合起來，便構成金銀條塊的完全價值或價格。

以國內流通的鑄幣存入銀行，銀行既給予銀行信用，也發給受領證書，但這種受領證書，通常是沒有價值的，也不能在市場上售得什麼價格。例如，以值三盾三斯泰弗的達克通存入銀行，所換得的信用

只值三盾，或者說比流通價值低了百分之五。銀行雖亦同樣發給受領證書，使持票人得在六個月內任何時候，支付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費，提出存在銀行的達克通，但這種受領證書，往往不能在市場上售得什麼價格。三盾銀行貨幣，雖大都可市場上售得三盾三斯泰弗，即在提出以後，可得到達克通的完全價值，但由於在提出以前，須納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費，所以得失相衡，恰好互相抵消。可是，假若銀行貼水，降為百分之三，這種受領證書便可在市場上售得若干價格，便可售得百分之一點七五了。但現今銀行貼水，大都在百分之五左右，所以，這種受領證書往往聽其滿期，或者象人們所說，聽其歸銀行所有。至於儲存金達克所得的受領證書，就更常聽其滿期，因為其倉庫租金為千分之五十，尤為昂貴。在這種鑄幣或條塊的儲存聽其歸銀行所有時，銀行往往可得利百分之五，這百分之五，可看作是永遠保管這種儲存物的倉庫租金。

受領證書過期的銀行貨幣的數額，必然是很大的。受領證書已經過期的銀行貨幣的數額，必定包含銀行當初的全部資本。據一般假設，銀行當初的全部資本，自從第一次存入以來，就沒有一個人想要調換新的受領證書，或把儲金提出，因為根據我們上面舉出的種種理由，那就無論採用那兩方法中任何一個，都必然是有損失的。但這數額無論是怎樣大，在銀行貨幣全額中所佔的部分，據假設是很小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過去好幾年來，是歐洲最大的金銀條塊倉庫，但其受領證書卻是很少過期的，或很少照一般所說歸銀行所有。比這大得多的那一部分銀行貨幣或銀行賬簿上的信用，都是過去好幾年來，由金銀條塊商人不斷儲存、不斷提取而創立的。

沒有受領證書，即不能向銀行有所要求。證書過期的那比較小量銀行貨幣，和受領證書還是有效的那比較大量銀行貨幣混在一起，所以沒有受領證書的銀行貨幣額雖很可觀，但決沒有某一特定部分銀行貨幣永遠沒有誰來要求。銀行不能為同一事物而對兩個人負擔債務人的義務；沒有受領證書的銀行貨幣所有者，在未購得受領證書以前，決不能要求銀行付款。在平靜的時候，他要按照市場價格購得一張受領證書，毫不困難。這種價格，和根據受領證書有權向銀行提取鑄幣或金銀條塊能在市售賣的價格，一般是相符合的。

但在國難時期，情形就兩樣了，例如，1672年法蘭西人侵入時，銀行貨幣所有者都想從銀行提出儲金，歸自己保存，大家都需要受領證書。這種需要，可能非常地提高受領證書的價格。有受領證書的人，可能作非分之想，不要求各受領證書所記明的銀行貨幣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卻要求百分之五十。知道銀行組織的敵人，甚至會把一切受領證書收買進來，以防止財寶搬出。一般認為，在這非常時期，銀行會打破只對受領證書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規。無銀行貨幣但有受領證書的人，一向必定只領取了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儲金價值的百分之二或三。所以，有人說，在這場合，銀行定會毫不遲疑地以貨幣或金銀條塊，對有銀行貨幣記在銀行賬簿上但無受領證書可向銀行提取儲金的人支付完全的價值；同時，對於有受領證書但無銀行貨幣的人支付百分之二或三，因為這個數目，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他們所應得的全部價值了。

即在平常和平靜的時候，受領證書持有者的利益在於減低貼水，藉以較低價格購買銀行貨幣（從而以較低價格購買受領證書上所記明的可以提取的金銀條塊），或以較高價格把受領證書賣給有銀行貨幣並望提取金銀條塊的人；受領證書的價格，一般等於銀行貨幣的市場價格及受領證書所記明的鑄幣或金銀條塊的市場價格之差。反之，銀行貨幣所有者的利益，卻在於提高貼水，藉以高價出售其銀行貨幣，或以低價購買受領證書。這樣相反的利害關係，往往會導致投機買賣的欺詐行為。為防止這種欺詐，近數年來銀行決定，不論什麼時候，賣出銀行貨幣換取通貨要貼水百分之五，而再度買進銀行貨幣，要貼水百分之四。這種決定的結果，貼水不能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亦不能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銀行貨幣與流通貨幣二者市場價格間的比例，不論什麼時候，都很接近它們固有價值間的比例。但在未有此種決定以前，銀行貨幣的市場價格，高低不一，按照這兩種相反利害關係對市場的影響，有時貼水上升到百分之九，有時又下跌而與通用貨幣平價。

阿姆斯特丹銀行宣稱，不以儲金任何部分貸出；儲金賬簿上每記下一盾，即在金庫內，保藏等於一盾價值的貨幣或金銀條塊。受領證書尚未失效，隨時可來提取，而事實上不斷地流出和流入的那一部分貨幣與金銀條塊，全保藏在金庫內，不容致疑，但受領證書久已滿

期，在平常和平靜時候不能要求提取，而實際上大概在聯邦國家存在的時期內永遠留在銀行裏的那一部分資本，是否亦是這樣，卻似乎有疑問。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銀行貨幣即有一盾金銀存在銀行金庫裏這一信條，在各種信條中總算是奉行最力的了。阿姆斯特丹市作了這個信條的保證人。銀行歸四個現任市長監督，這四個市長每年改選一次，新任的四個市長，比照賬簿，調查銀行金庫，宣誓接管，後來，再以同樣莊嚴的儀式，把金庫點交給繼任的人。在這真誠的宗教國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廢。有了此種更迭，對於一切不正當行為，似乎有了充足的保障。黨爭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過許多次革命，但在這一切革命中，佔優勢的黨派，都沒在銀行管理那一點上攻擊他們前任的不忠誠。對於失勢的黨派的名譽與信用，再沒有第二種事情比這種攻擊有更深刻的影響的了；如果這種攻擊真有根據，我們可以斷言，那是一定會提出來的。1672年，當時法王在烏德勒支，阿姆斯特丹銀行付款迅速，以致無人懷疑它履行契約的忠誠。當時，從銀行金庫中提出的貨幣，還有些曾為銀行設立後市政廳大火所燒焦。這些貨幣，必定是從那時候起，即保存在銀行金庫內的。

這銀行的金銀總額究竟有若干，老早就成為好事者臆測的問題。但關幹這總額多少，只能推測。一般認為，與這銀行有賬目來往的人，約有二千；假設他們每人平均存有一千五百鎊的價值（那是最大的假設），那末銀行貨幣總額，因而，銀行金銀總額，便大約等於三百萬鎊，以每鎊十一盾計算，就大約等於三千三百萬盾。這樣一個大數額，足以經營極廣泛的流通，但比一些人關於這總額誇大的臆測，卻小得多。

阿姆斯特丹市從這銀行獲得了很大的收入。除了所謂倉庫租金，凡第一次與銀行開來往賬戶的，須納費十盾；每開一次新賬，又領納費三盾三斯泰弗；每轉一次賬，須納費二斯泰弗；如果轉賬的數目不及三百盾，則須納六斯泰弗，以防止小額的轉賬。每年不清算賬目二次的，罰二十五盾。轉賬的數目如果超過了儲存的賬目，須納費等於超過額的百分之三，其請求單亦被擱置。據一般人設想，銀行由受領證書滿期歸為己有的外國鑄幣與金銀條塊，在有利時出售，亦獲得不少利潤。此外，銀行貨幣以百分之五的貼水賣出，以百分之四的貼水買入，亦給銀行提供利潤。這些不同利得，大大超過支付職員薪俸和

開支管理費用。單單儲存所納保管費一項，據說等於十五萬盾至二十萬盾的年純收入。不過，這機關設立的目標，原來不是收入，而是公益。其目的在幹使商人不至因不利的匯兌而吃虧。由此而生的收入，是不曾預料到的，簡直可以說是一種意外。我爲了要說明，爲什麼理由，用銀行貨幣兌付的國家和用通用貨幣兌付的國家，其匯兌大都似乎有利於前者，而不利於後者。不知不覺地說出了冗長的題外話，現在，我該回到本題。前一種國家用以兌付匯票的貨幣，其固有價值總是不變，恰與其造幣廠標準相符；後一種國家用以兌付匯票的貨幣，其固有價值不斷變動，而且幾乎都多少低於其造幣廠標準。

第二節根據其他原則，這種異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在本章的前節，我竭力說明，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理，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爲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的貨物的輸入，也不必加以異常的限制。

然而，此種限制以及許多其他商業條例所根據的整個貿易差額學說，是再不合理不過的。當兩地通商時，這種學說認爲，如果貿易額平衡，則兩地各無得失；如果貿易額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損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稱。但這兩種設想都是錯誤的。象我後面所要說明的那樣，獎勵金與獨佔權，雖爲本國利益而設立，但由獎勵金及獨佔權所促成的貿易，卻可能對本國不利，而且事實上常是這樣。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進行的兩地間的貿易，雖未必對兩地同樣有利，但必對兩地有利。

所謂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釋，不是金銀量的增加，而是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交換價值的增加，或是一國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兩地貿易額平衡，而兩地間的貿易，全由兩國國產商品的交換構成，那末在大多數場合，它們不僅都會得利，所得利益而且必相等或幾乎相等。這樣，各爲對方剩餘生產物的一部分提供了一個市場。甲方爲生產及製造這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而投下的資本，即在一定數目居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或生計的資本，將由乙方補還；乙方投下的這種資本，將由甲方補還。所以，兩國的居民，都有一部分，將間接從另一國取得他們的收入與生計。兩國間所交換的商品，其價值又被假設相等，則在大多數場合，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而且，因爲都是用來生產兩國的國產商

品，所以，兩國居民由此種分配而得的收入與生計，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彼此互相提供的這種收入與生計，按照商務來往大小的比例，有多有少。若彼此每年都等於十萬鎊，則彼此給對方居民所提供的，亦為十萬鎊的年收入；若等於一百萬鎊，則彼此給對方居民提供的，亦為一百萬鎊的年收入。

設甲乙兩國間的貿易，是屬於這樣的性質，即甲國貨物輸至乙國的純為國產商品，乙國輸至甲國的回程貨則純為外國商品，那末，在這假設下，兩國的貿易額，仍被認為是平衡的，彼此都以商品償付。在這場合，兩國仍然享有利得，但利得的程度不同；從這種貿易取得最大收入的，是隻輸出國產商品的那一國居民。比方說，英國從法國輸入的，純為法國所生產的國產商品，但英國卻沒有法國所需要的商品，每年不得不以大量的外國貨物如菸草與東印度貨物來償付。這種貿易雖可給兩國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給法國居民所提供的收入，必多於給英國居民所提供的。法國每年投在這種貿易上的全部資本，是在法國人民間分配的。但英國資本，只有一部分，即用來生產英國貨物備與外國貨物交換的那一部分資本，是每年在英國人民間分配的。其資本，有較大部分是用來補還弗吉尼亞、印度和中國的資本，並對這些遙遠國家居民提供一種收入與生計。即使兩國所投資本相等或幾乎相等，但法國資本的使用，給法國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國資本的使用，所增於英國人民收入的大得多。因為，在這場合，法國所經營的，是對英國的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英國所經營的，是對法國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這兩種國外貿易所生的不同結果，已經在前面充分說明過了。

不過，兩國間的貿易，也許既不能雙方全為國產商品的交換，也不能一方全為國產商品，一方全為外國貨物。幾乎一切國家，彼此間所交換的，都一部分是國產商品，一部分是外國貨物。但是，國產商品佔交換品最大部分而外國貨物佔交換品最小部分的國家，總是主要的利得者。

假若英國用以償還法國每年輸入品的，不是菸草與東印度貨物，而是金銀，那貿易額便被認為是不平衡的，因為不是以商品而是以金銀償付商品。其實，在這場合，也象在前一場合一樣，能給兩國人民提供若干收入，不過給法國人民提供的，比給英國人民提供的多。英

國人民，必從此取得收入。為生產英國商品以購買金銀而投下的資本，即在英國一定人民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的資本，必可因此而補還，使其用途得以繼續。輸出一定價值的金銀，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正如輸出等價值任何其他貨物，不減少英國資本總量一樣。反之，在大多數場合，都會增加英國資本總量。只有其國外需求被認為大於其國內需求，而其回程貨在國內的價值大於輸出品在國內的價值的那些貨物才輸到國外去。如果菸草在英國僅值十萬鎊，但輸往法國而購回的葡萄酒，在英國卻可值十一萬鎊，那末這種交換，就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如果英國以金十萬鎊所購得的法國葡萄酒，在英國亦可值十一萬鎊，則這種交換也就同樣可使英國資本增加一萬鎊。在酒庫中有值十一萬鎊葡萄酒的商人，比在堆棧中有值十萬鎊菸草的商人更富裕，同樣也比在金櫃中有值十萬鎊的商人更富裕。他和其他二人比較，可推動更大的勞動量，並繪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計與職業。但國家的資本與其全體人民的資本相等，而一國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又等於這一切資本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所以，一國資本及其每年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就大都會因此種交換而增加。為英國的利益計，與其用弗吉尼亞菸草或用巴西、祕魯金銀，當然無寧用它自己的鐵器及寬幅厚呢來購買法國葡萄酒。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總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但以金銀進行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並不比以其他貨物進行的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不利。無礦產國每年輸出金銀，不會使金銀更容易幹竭。正如無煙草國每年輸出菸草，不會使菸草更容易幹竭。有資力購買菸草的國家，決不會長久缺乏菸草；同樣，有資力購買金銀的國家，也決不會良久缺乏金銀。

有人說，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是一種虧本的交易，而製造業國和葡萄酒產國間自然會有的貿易，也可以說有同樣的性質。我卻以為，工人和麥酒店的交易，並不一定是虧本的交易。就此種貿易本身的性質說，其利益和任何其他貿易相同，不過，也許比較容易被濫用。釀酒家的職業，甚至小酒販的職業，與其他職業同是必要的分工部門。工人所需的麥酒量，一般是與其親自釀造，無寧向釀酒家購買；而且，他若是一個貧窮工人，那末他購買麥酒，一般是與其向釀酒家作大量的購買，無寧向小酒販作小量的購買。倘若他是個貪食者，他可能購買過多的麥酒，正如他可能購買過多的家畜肉；要是他想扮作一個翩翩公子，他可能購買過多呢絨布匹。貿易自由，雖然可

能被濫用，而且，有幾種貿易自由，特別容易發生這種結果，但無論如何，對幹工人大眾，這一切貿易自由，總是有利的。此外，有時有了由嗜酒過度而蕩產的個人，但似乎用不着擔心會有這樣的國家。雖然在每個國家，都有許多人，在酒這方面所花費的超過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但有更多人，所花費的小於他們資力所允許的程度。應該指出，根據經驗，葡萄酒的低廉，似乎不是泥醉的原因，而是節酒的原因。葡萄酒產國的人民，一般是歐洲最節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國南部各省人民。對於普通日常飲食，人民很少過度使用。象溫和啤酒那樣廉價的飲料，就是大花大用，也不能表現一個人的寬宏和好客。反之，只在過熱或過寒不能栽種葡萄樹，因而葡萄酒異常稀少昂貴的國家，如北方民族、熱帶民族（如幾內亞海岸的黑人），泥醉才成爲普遍的惡習。當法國軍隊，從法國北部各省開拔至南部各省，即從葡萄酒昂貴區域開拔至葡萄酒低廉區域時，據說，起初往往因見良好葡萄酒如此價廉新鮮而耽溺其中，但駐留數月之後。其中大部分，便象當地居民一樣節酒了。同樣，如果把外國葡萄酒稅、麥芽稅、麥酒稅、啤酒稅一律取消，或可使英國中下等階級人民間暫時盛行泥醉風氣，但不久也許就會養成一個恆久的普遍的節酒習俗。現今，在上流社會即有資力消費最貴飲料的人中，泥醉已經不是他們的惡習了。吃麥酒而泥醉的縉紳先生，極不常見。此外，葡萄酒貿易在英國的限制，與其說爲了要防止人民走入（如果可以這樣說）酒店，無寧說爲了要防止人民，使其不能購買價最廉物美最的飲料。那種限制，有利於葡萄牙的葡萄酒貿易，不利於法國的葡萄酒貿易。據說，對於我國製造品，葡萄牙人是比較好的顧客，法國人是比較不好的顧客，所以，我們應當優待葡萄牙人，加以獎勵。據說，他們照顧了我們，我們也應當照顧他們。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爲一個大帝國政治設施的原則。其實，只有小商人，纔會把這種策略看作是對待顧客的規則。至於大商人，不問這些小節，總是在價最廉物美最美的地方購買他的貨物。

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認爲他們的利益在於使一切鄰國變得窮困。各國都嫉妒與他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並把這些國家的利得，看作是他們的損失。國際通商，家個人通商一樣，原來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爲不和與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們反覆無常的野心，在這世紀及前世紀，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並不大於

商人和製造業者們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間支配者的暴力與不正，自古以來即是一種禍害。我認爲，按照人事的性質，這種禍害是無法除去的。至於不是亦不應該是人間支配者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們，其卑鄙的貪慾，其獨佔的精神，雖也許不能改正，但要不讓他們擾亂別人的安寧，卻是極其容易的。

最初發明這種原則傳佈這種原則的，無疑是獨佔的精神；最先倡導這種原則的人並不象後來信奉這種原則的人那麼傻。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於而且必然在於，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爲什麼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象同業組合內自由人的利益在於阻止國內居民僱用其他人而只僱用他們自己一樣，這班商人和製造業者的利益，在於自己保有國內市場的獨佔權。因此，在英國，在歐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對幹幾乎一切由外國商人輸入的商品，都課以異常重稅。因此，凡能輸入本國，與本國製造品競爭的一切外國製造品，都課以高的關稅，或禁止輸入。因此，對於貿易差額被認爲不利於我國的那些國家，換言之，對民族仇恨異常激烈的國家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

在戰爭或政治上，鄰國的財富，雖對我國有危險，但在貿易上，則確對我國有利益。在戰時，敵國的財富，或可使敵國能夠維持比我國強大的海陸軍。但在和平的通商狀態下，鄰國的財富，必使他們能夠和我們交換更大的價值，必對我國產業的直接生產物或用這種生產物購進來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場。勤勞的鄰近的富人，和窮人比較，是更好的顧客；鄰近的富國，也是這樣。經營同種製造業的富人，固然是鄰近各同業者的危險鄰人，但他的花費，可給鄰近的其餘一切人提供好的市場，所以，對絕大多數鄰人是有利的。不僅如此，較貧的經營同業的工人，又將因此而減低其售價，因而，對其餘一切人有利。同樣，富國的製造業者，無疑會成爲鄰國同種製造業者極危險的競爭者，但這種競爭，卻有利於人民大眾。此外，這樣富國的大花費，必能在其他方面，給人民大眾提供良好的市場，使他們得利。想發財的私人，決不會退居窮鄉僻壤，一定會住在首都或大商業都

市。他們知道，財富流通極少的地方，所可取得的財富極少；財富流通極多的地方，可有些財富歸到他們手裏。指導着一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的常識的原則，應該支配一百萬人、一千萬人、二千萬人的判斷，應該使全國國民都認為，鄰國的富乃是本國可能獲得財富的原因和機會。想由國外貿易致富的國家，在其鄰國都是富裕勤勉的商業國時，最易達到目的。一國四周，如果都是游牧的未開化人和貧窮的野蠻人，那末，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無疑可使國家致富，但要由國外貿易致富，就絕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國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國土地、經營國內商業而致富的。據說，古代埃及人，極不注意國外貿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國人極輕視國外貿易，不給與國外貿易以法律的正當保護。以一切鄰國陷於貧困境況為目標的近代外國通商原則，如果能夠產出它所企望的結果，那就一定會陷國外貿易於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視的地位。

法國和英國間的貿易，所以會在兩國都受到那麼多的阻礙與限制，就是此等原則的結果。如果這兩國能拋棄商業的嫉妒和國民的仇恨，來考察其真實利害關係，那末對英國來說，法國的貿易，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對法國來說，英國的貿易，亦將比歐洲任何其他國家的貿易更有利。法國為英國最近的鄰國。英國南部沿海各地與法國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間的貿易，好象國內貿易一樣，可以每年往返四次、五次乃至六次。這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比較投在國外貿易大多數其他部門上的等量資本，能夠推動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勞動量，能夠僱用和養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人數。這兩國彼此相隔最遠的各地間的貿易，也至少可望每年往返一次。所以，就連這種貿易，也比我國對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國外貿易同樣有利。若與誇大的我國對北美殖民地的貿易（那一般要三年，乃至四年五年以上，才能往返一次）比較，那至少也有利三倍。此外，法國據說有居民二千三百萬，我國北美殖民地居民卻據說不過三百萬。法國又比北美洲富饒得多，雖然由於法國財富分配不平均，法國的貧民乞丐，比北美多得多。所以，與我國北美殖民地比較，法國所能提供的市場，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為頻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英國的貿易，亦同樣有利於法國。英國貿易對於法國的利益，要按照兩國財富、人口與鄰近的程度，大幹法國殖民地貿易對

於法國的利益。這就是兩國智者所認為宜加以阻止的貿易和最受其偏愛獎勵的貿易這二者間很大的差別。

然而，使兩國間開放的自由的貿易對兩國那麼有利的環境，卻成為產生這種貿易的主要障礙的原因。因為是鄰國，它們必然是故國；於是，一方的富強，增加另一方的恐懼，而本來可增進國民友誼的有利因素，卻成為助長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們同是富裕勤勉的國家。每一國商人和製造者，都擔心會在技術與活動上遇到另一國商人和製造業者的競爭。商業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長了商業上的嫉妒，兩者相互助長。兩國的貿易者，都熱烈地確信他們自私自利的謬說，宣稱不受限制的國外貿易，必然會生出不利的貿易差額，而不利的貿易差額，又一定會導致國家的滅亡。

在歐洲各商業國內，自命的這種學說的學者常常預告；不利的貿易差額，將使國家頻於滅亡。這激起了各商業國不少的憂慮，幾乎各商業國都試圖改變貿易差額，使對本國有利而對鄰國不利。但在這一切憂慮以後，在這一切無效的嘗試以後，似乎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曾因上述原因而變得貧困。和重商主義者的預料相反，實行開放門戶並允許自由貿易的都市與國家，不但不曾因此種自由貿易而滅亡，而且因此致富。歐洲今日，從某幾點說，配稱為自由港的都市雖有幾個，但配稱為自由港的國家卻還沒有。最接近於此的國家，也許要算荷蘭了，雖然仍離此很遠。大家承認，不僅荷蘭國民財富全部得自對外貿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資料也得自對外貿易。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有另一種差額，和貿易差額極不相同。一國的盛衰，要看這差額是有利或是不利。這就是年生產與年消費的差額。前面說過，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如果超過了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這超過額的比例而增加起來。在這場合，社會在其收入內維持其生存，每年從其收入中節省下來的部分，自然會加到社會資本上去，並用以進一步增加年生產物。反之，如果年生產的交換價值，小於年消費的交換價值，社會的資本每年就必然會按照短少的比例而減少下去。在這場合，社會的支出超過了社會的收入，那必然會侵蝕社會的資本。資本必然會減退，隨着資本的減退，其產業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亦減退。

生產與消費的差額，和所謂貿易差額全不相同。在沒有對外貿易、不與世界往來的國家內，可以發生這種差額。在財富、人口與改良都在逐漸增進或在逐漸減退的全地球上，也可以發生這種差額。

即使在所謂的貿易差額一般不利於一個國家時，生產與消費的差額仍可不斷地有利於這個國家。即使半世紀來，這個國家輸入的價值都大於輸出的價值；在這全期間內，流入的金銀，全部立即輸出；流通鑄幣逐漸減少而以各種紙幣替代鑄幣；甚至它對各主要通商國家所負的債務，亦在逐漸增加；但它的真實財富，它的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仍可在這期間，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來。我國北美殖民地的狀態，以及它們在現今的擾亂事件發生以前對不列顛的貿易狀態，都可證明這並不是一個不接近於事實的假設。

第四章論退稅

商人和製造業者，不以獨佔國內市場為滿足，卻為他們的貨物謀求最廣大的國外銷售市場。但由於他們的國家在外國沒有管轄權，他們要獨佔外國的市場，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地說，他們只好請求獎勵輸出。

在各種獎勵中，所謂退稅，似乎是最合理的了。在商人輸出時，退還本國產業上的國產稅或國內稅的全部或一部分，並不會使貨物的輸出量，大幹無稅時貨物的輸出量。這種獎勵，不會驅使大部分的資本，違反自然趨勢，轉向某一特定用途，但卻會使課稅不至於驅使這部分資本中的任何部分轉到其他用途去。這種獎勵，不會破壞社會上各種用途間的自然平衡，但卻會使課稅不產生破壞這種自然平衡的作用。這種獎勵，不會破壞社會上勞動的自然分配，而會保存這種分配。在大多數場合，保存這種分配是有利的。

輸入的外國貨物，在再輸出時，亦可退稅。在英國，所退的稅，大都等於輸入稅的最大部分。規定今日所謂舊補助稅的那個議會法令的附則的第二項規定，每個商人，不論國籍，都可於輸出時，收回這種舊補助稅的一半。但英國商人，應於十二個月內輸出，而外國商人應於九個月內輸出。只有葡萄酒、小葡萄乾和絲精製品。因已領有其他更有利的津貼，故不適用此條例。這個議會法令所規定的稅，在當時是唯一的外國商品輸入稅。後來，把這種及其他各種退稅的請求期限延長到三年（喬治一世第七年法令第二十一號第十條）。

舊補助稅實施以後所課的各種稅，有大部分，是在輸出時全部退還的。但此通則有許多例外，所以，退稅的原則，便不象最初制定時那麼單純了。

有些外國商品，輸入量會大大超過國內消費的必要量是早已預料到了的，所以，在其輸出時全部課稅都退還，甚至舊補助稅也不保留半數。在我國美洲殖民地未曾叛變以前，我們獨佔了馬里蘭和弗吉尼亞的菸草。我們輸入菸草約九萬六千大桶，國內消費卻據說不及一萬四千大桶。這個餘額，是必須輸出的。為使這鉅額必要的輸出易於實現，凡是在三年內輸出，所納關稅全部退還。

我們還獨佔（雖不是全部獨佔，但已近於全部獨佔）了我國西印度羣島的砂糖。所以，砂糖如果在一年內輸出，那末在輸入時所納的一切稅，都可退還；如果在三年內輸出，那末除了舊補助稅的一半，其他一切稅都可退還。大部分貨物輸出時，舊補助稅的半數迄今依然保留。砂糖輸入額，雖大大超過國內消費的必要額，但此種超過額，與菸草通常的超過額比較，是不足道的。

有些貨物，因為是我國製造業者嫉妒的對象，所以禁止其輸入，供國內消費。但若繳納一定的稅，即可輸入，落棧以待輸出。但在這些貨物輸出時，所課的稅是完全不退還的。我們的製造業者，對於這種受限制的輸入，似乎亦不願加以獎勵；他們害怕屯棧的貨物會被偷運出一部分，來和他們自己的貨物競爭。只在這樣的限制下才可輸入絲精製品、法國亞麻布與上等細麻布、印花染色棉布等。

我們甚至不願作法國貨物的販運者。法國被視為我國的敵人。我們與其讓他們利用我們作媒介而獲取利潤，無寧放棄我們自己的利潤。在一切法國貨物輸出時，不僅舊補助稅的一半不退還，即附加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稅也不退還。

根據舊補助稅附則第四條，一切葡萄酒在輸出時所准許退還的稅，比輸入時所繳納的稅的一半還要大。立法者當時的目的，似乎是要特別獎勵葡萄酒運送業。與舊補助稅同時徵課或稍後徵課的一些其他稅，如所謂附加稅，新補助稅，三分之一補助稅及三分之二補助稅，1692年關稅，葡萄酒檢驗稅，都允許在輸出時全部退還。但這一切稅，除了附加稅與1692年關稅，都在輸入時以現金繳納；如此巨大金額的利息，所費不貲，所以此種貨物的運送貿易沒有希望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貿易。所以，所謂葡萄酒關稅，只有一部分，在輸出時退還，而法國葡萄酒輸入每大桶所課二十五鎊的稅，即1745年、1763年和1778年徵課的關稅，輸出時均不退還。1779年和1781年對於一切貨物輸入所附加的那兩種百分之五的關稅，在一切其他貨物輸出時都允許全部退還，所以，在葡萄酒輸出時，亦允許其全部退還。1780年特別課加在葡萄酒上的最後關稅，亦允許全部退還。因為保留的關稅多而且重，所以，上述恩典也許不能使一大桶葡萄酒輸出。這種規定，除了我國北美殖民地以外，對一切依法准許輸出的地方都適用。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號法令，名為貿易獎勵法，使英國有了以歐洲一切產物或製造品供給殖民地的獨佔權，葡萄酒亦包括在內。但在海岸線是那麼長的我國北美殖民地及西印度殖民地，我國統治權是那麼微弱，而居民最初被允許以自己的船隻，把政府的未列舉商品運往歐洲各地，後來被允許運往菲尼斯特雷角以南歐洲各國，上述獨佔權，不可能大受人尊重，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也許都有方法，從運往的國家，運回一些貨物。不過，他們要從出產葡萄酒的地方，輸入歐洲的葡萄酒，也許有些困難；他們要從葡萄酒課稅繁重，其大部分又不能在輸出時退還的大不列顛，輸入歐洲葡萄酒，也有些困難。但美洲與西印度羣島，既得與馬迪拉島自由交換各種未列舉商品，馬迪拉的葡萄酒，不是歐洲產物，便可直接輸入美洲與西印度羣島了。1755年戰爭開始時，我國軍官在我國各殖民地所發現的對馬迪拉葡萄酒的普遍的嗜好，也許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養成的。這種嗜好，後來由這些軍官帶回到祖國，在那時以前，此種葡萄酒在祖國還不大流行。戰事完結以後，在1763年（依喬治三世第四年法令第十五號第十二條），除了法國葡萄酒，一切葡萄酒都允許在輸出到殖民地時，退還所繳納的三鎊十先令以外的稅——國民的偏見，不允許獎勵法國葡萄酒的貿易與消費。但是，上述恩典的敕賜和我國北美殖民地的叛變這兩者相隔的時間，似乎過於短促，以致那些國家的風習，不可能產生顯著的變化。

就法國葡萄酒以外的一切葡萄酒的退稅說，殖民地由這法令所受實惠，比其他各國大得多，但就大部分其他貨物的退稅說，殖民地所受實惠卻是小得多。在大部分貨物輸出到其他各國時，舊補助稅得退還一半。但這項法令卻規定，除葡萄酒、白棉布及細棉布外，一切歐洲或東印度生產或製造的商品，在輸出到殖民地時，舊補助稅絲毫也不得退還。

退稅制度的設立，也許原來就是爲了要獎勵運送貿易。運送船舶的運費，常由外國人以貨幣支付，因此運送貿易被認為特別能給國家帶回金銀。運送貿易，雖不應受特殊的獎勵，而設立退稅制度的動機，雖然非常可笑，但此種制度本身，卻似乎很合理。這樣的退稅，決不會使流入運送貿易的資本大於在沒有輸入稅時自會流入這種貿易的資本，只不過使輸入稅不至於完全排斥此種貿易。我們雖不應特別

獎勵運送貿易，卻亦不應加以妨害，我們應該象對待其他各種行業一樣，聽其自由。這種貿易，對於那一部分既不能投在本國農業，亦不能投在本國製造業，既不能投在國內貿易亦不能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必然提供了一個出路。

關稅的收入，不但不會因此種退稅而受損，而且將因此種退稅而得利，因為在退稅時，得保留一部分關稅。如果全部關稅都被保留，那末納稅的外國商品，由於缺少市場不能輸出，因而亦不能輸入。這樣，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關稅，便無從收到了。

這些理由，似乎足以證明，課在本國產物或外國產物上的關稅，即使在輸出時全部退回，退稅亦是合理。誠然，在這場合，國產稅的收入，稍受損失，而關稅的收入則受大得多的損失；但多少要受這種課稅的擾亂的產業的自然均衡，即勞動的自然分工和分配，卻將因這種規定而更趨於均衡。

但上述理由僅證明，在輸出貨物到完全獨立的外國時退稅是合理的，並不證明在輸出貨物到我國商人、製造業者享有獨佔權的地方時退稅是合理的。例如，在歐洲貨物輸出到我國美洲殖民地時退稅，並不能使輸出額大於無退稅制度時的輸出額。因為我國商人、製造業者在那裏享有獨佔權，所以，即使保留全稅額，未必會增加運到那裏去的輸出額。所以，在這場合，退稅常是國產稅及關稅收入的純損失，決不能改變貿易狀態，決不能擴大貿易。至於在什麼程度上，這種退稅可認為是對我國殖民地產業的適當獎勵，或者說，在什麼程度上，允許他們免去本國其他人民所不能免去的賦稅，纔有利於母國，我打算在考察殖民地時，加以論述。

但必須指出，只在輸出品真正輸到外國去，而不再祕密輸入我國的時候，退稅制度纔會帶來益處。大家都知道，有些退稅，尤其是菸草的退稅，就往往被人濫用，併產生了許多既有害於收入而同樣有害於公正商人的欺詐行為。

第五章論獎勵金

對英國某些產業的產品，常常有人請求輸出獎勵金，而政府有時也發給輸出獎勵金。據說，我國商人和製造業者，賴有這種獎勵金，才能在外國市場上，以與競爭者同樣低廉或更為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貨物。據說，輸出量因此增大，而貿易差額亦變得更有利於我國。在外國市場上，我們不能象在國內市場那樣，給我們工人以獨佔權。對外國人，我們不能象對本國人那樣，強迫他們購買我國工人生產的貨物。於是，想出了第二個最好辦法，即付錢給外國人購買。這個以貿易差額富國富民的辦法，乃是重商學說所提倡的。

有人認為，獎勵金只應該發給那些無獎勵金即不能經營的商業部門。但無論什麼商業部門，如果商人售貨所得價格，可以償還此貨物製造乃至上市所投下的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那末即使沒有獎勵金，亦必能繼續經營。這樣的商業部門，與其他在無獎勵金狀態下經營的各商業部門，明顯地處在同等地位，所以，這樣的商業部門不需要獎勵金，正象其他商業部門不需要獎勵金一樣。只有商人售貨價格不足補還其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的商業，或售貨價格不足抵償貨物上市實際費用的商業，才需要獎勵金。獎勵金髮給的目的，在於補償此損失，獎勵它繼續經營或開創一種被認為開支大於收益的商業，就是說，每經營一次，投下的資本即虧蝕一部分，而一切其他商業如都具有這樣的性質，那末全國資本不久就會破滅無存。

應該指出，靠獎勵金經營的商業，只是能在兩國間長期經營下去而一國老是虧本（即貨物售價少於貨物上市實際費用）的商業。但是，如果沒有獎勵金來補還商人貨物售價上的損失，他自身的利害關係，不久也會使他改變資本用途，或尋找其他能以貨物售價償還貨物上市所用的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的行業。象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其他各種辦法的結果一樣，發給獎勵金的結果，只不過迫使一國商業，不向自然方面發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發展。

有一個聰明而見聞廣博的作者，在他的穀物貿易論文集裏，很明白地說，自從穀物輸出獎勵金第一次設置以來，輸出穀物的價格，依一般價格計算，超過輸入穀物的價格，而依非常高的價格計算，則其超過額，大大超過這期間付出的獎勵金的總額。他認為，按照重商主

義的正確原理，這是明明白白地證明，這種強制的穀物貿易，有利於國家。因為輸出價值是這樣超過了輸入價值，以致除了補還國家獎勵輸出所花費的全部特別費用，還大有剩餘。他不知道，這種特別費用，換言之，這種獎勵金，僅是社會為輸出穀物而實際上所花費的極小部分。農業家用來栽種穀物的資本，亦須同樣加以考慮。如果穀物在外國市場上所售的價格，不夠補償這種獎勵金和這個資本以及這個資本的普通利潤，則其差額，便是社會的損失，就是說，國民資財減少了那麼多。但是，被認為必須發給獎勵金的理由，正是穀物在外國市場上的售價不夠作上述那樣的補還。

據說，自從獎勵金設置以來，穀物的平均價格已顯著下落。我曾竭力說明，在前世紀末葉，穀物平均價格稍稍跌落，而且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仍繼續跌落。如果這種事實真如我所確信的那樣真實，那就沒有獎勵金也必然會發生這種結果，而其發生，不可能是獎勵金的結果。法國不僅無獎勵金，而且在1764年以前，一般禁止穀物輸出，但法國穀物的平均價格，和英國同樣降低了。所以，穀物平均價格的這種逐漸的降低，也許既不能歸因於這一種條例，亦不能歸因於那一種條例，而歸根結底應歸因於銀的真實價值的逐漸的不知不覺的上升，我曾在本書第一篇竭力說明，在現世紀中，歐洲一般市場上，都發生了銀的價值逐漸上升這個現象。看來獎勵金不可能是穀物價格降低的助因。

已經說過，由於獎勵金在豐年引起異常的輸出，所以它一定會使國內市場上的穀物價格，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但這就是獎勵金制度倡導者公然標榜的目標。在歉歲，獎勵金雖大都停止，但它在豐年所引起的大輸出，必定會或多或少地使一年的豐收不能救濟另一年的不足。所以，無論年歲豐歉，獎勵金必然有助於提高穀物的貨幣價格，使其略高於無獎勵金時國內市場上穀物的貨幣價格。

在現有耕作狀態下，獎勵金必然有這種趨勢，我想有理性的人，對此是不會有異議的。但許多人卻認為，獎勵金有助於獎勵耕作，而獎勵的方法有二。他們以為，第一，獎勵金給農業家的穀物開闢了一個更廣大的外國市場，所以有助於增加穀物的需求，因而獎勵穀物的生產；第二，獎勵金使農業家得到的價格，比他們在無獎勵金時，按實際耕作情況，所可希望的價格好，所以有助於獎勵耕作。他們以

爲，這種雙重的獎勵，在一個長久的時期內，必定會大大增進穀物的生產，以致在這時期末尾的實際耕作情況下，國內市場上谷價可能降落的程度，遠遠大於獎勵金所能提高的程度。

對於這種意見，我的答覆如下。由獎勵金引起的外國市場的推廣，必定在各年間犧牲了國內市場，因爲靠獎勵輸出，沒有獎勵金就不會輸出的穀物，在無獎勵金的情況下，定可留在國內市場上，以增加消費而減低谷物的價格。應該指出，穀物獎勵金，象一切其他輸出獎勵金一樣，以兩種不同的稅課在人民身上。第一，爲支付獎勵金，人民必須納稅；第二，由於國內市場上這商品價格提高而產生的稅，必須由人民大眾繳納，因爲人民大眾都是穀物購買者。所以，就這商品說，第二種稅，比第一種稅重得多。讓我們假定，逐年平均計算，每輸出一夸特小麥給獎勵金五先令，只使國內市場上這商品的價格，比在無獎勵金時按實際收穫狀態所應有的價格，每蒲式耳高六便士，即每夸特高四先令。即使按照這個很適中的假設，人民大眾，除了須擔負每夸特小麥輸出獎勵金五先令以外，他們每消費一夸特，還須多支付四先令的代價。但根據上述那位見聞廣博的穀物貿易論文作者所述，輸出的穀物與國內消費的簡物的比例，平均計算不超過一對三十一的比例。所以，如果他們抽納的第一種稅爲五先令，他們所繳納的第二種稅一定是六鎊四先令。把這樣苛重的稅課在第一生活必需品上，必然會減少勞苦貧民的生活品，或必然會導致貨幣工資按照生活品貨幣價格的提高而提高。就前者說，必然會減低勞苦貧民撫養子女、教育子女的能力，因而會抑制國內人口的增長。就後者說，必然會減低僱主僱用貧民的能力，使他們所僱用的人數，少於無獎勵金的場合，因而必然會壓抑國內產業。這樣，獎勵金所引起的穀物的異常輸出，不僅會按照擴大國外市場與國外消費的比例，減少國內市場與國內消費，而且由於壓抑國內人口與產業，最後必傾向於阻抑國內市場使其不能逐漸擴大，所以，歸根到底，與其說它會擴大谷物的整個市場與整個消費量，無寧說它會縮小穀物的整個市場與整個消費量。

又有人說，穀物貨幣價格的這種提高，使這商品更有利於農業家，所以必然會鼓勵這商品的生產。

關於這種意見，我的答覆如下。如果發給獎勵金的結果，使穀物的真實價格提高，換言之，使農業家能以同量穀物，按照當地勞動者

維持生活的方式，不論是大方地、適中地或是省儉地維持更多的勞動者，情形可能真是如此。但獎勵金顯然決不會有這種結果，任何人為制度也決不會有這種結果。獎勵金只對穀物的名義價格有很大影響，但對穀物的真實價格，卻沒有大影響。這種制度課在人民大眾身上的賦稅，對繳納者是苛重的負擔，但對收受者則利益極小。獎勵金的真實效果，與其說是提高穀物的真實價值，無寧說是壓低銀的真實價值，換句話說，使等量的銀，不僅只交換較小量的穀物，而且交換較小量的其他一切國產商品，因為穀物的貨幣價格支配着其他一切商品的貨幣價格。

穀物的貨幣價格支配着勞動的貨幣價格。勞動的貨幣價格，必須經常使勞動者能夠購買一定數量的穀物，夠他大方地、適中地或省儉地維持他們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而社會的進步、退步或停滯等情況，使勞動者的僱主不得不按照大方地、適中地或省儉地生活方式來維持勞動者的生活。

穀物的貨幣價格，支配一切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貨幣價格。在改良的任何階段中，這一切土地原生產物的貨幣價格，一定會和穀物的貨幣價格保持一定的比例，雖然這種比例，因改良階段不同而不同。例如牧草，乾草，家畜肉，馬，馬糧，因而內陸運輸以及大部分國內貿易，其貨幣價格，都受穀物貨幣價格的支配。

穀物的貨幣價格，支配了一切其他土地原生產物的貨幣價格，於是支配了幾乎一切製造業原料的貨幣價格。穀物的貨幣價格，支配了勞動的貨幣價格，於是支配了製造技巧和勤勞的貨幣價格。由於它支配着這二者，所以它也支配着完全製造品的貨幣價格。勞動的貨幣價格，一切土地生產物或勞動生產物的貨幣價格，都必然按照穀物貨幣價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

所以，發給獎勵金的結果，雖可使農業家售賣穀物的價格，由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騰至四先令，並對地主繳納和其生產物擡高的貨幣價格相稱的貨幣地租，但穀物價格這樣擡高的結果，現在四先令所可購得的任何種類國產商品，並不比以前三先令六便士所可購得的多，而農業家與地主的境遇，都不能由於此種價格變更而有多大改進。農業家的耕作，不會有很大的進步；地主的生活，不會有很大的改善。這樣擡高的穀物價格，雖可在購買外國商品時，給他們以些微

利益，但在購買國產商品時，便一點利益也沒有。然而，農業家的費用，就幾乎全部用於購買國產商品，甚至地主的費用，亦有大部分用於購買國產商品。

由於礦山豐饒而產生的銀價低落，對大部分商業世界產生相同或幾乎相同的影響，所以對個別國家，不是什麼重要的事體。由此而產生的一切貨幣價格的騰貴，雖不能使受者實際上更富裕，卻也不能使受者實際上更貧乏。金銀器皿的價格，實際上比從前低廉，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實價值，卻和從前完全一樣。

假若銀價的跌落，是個別國家的特殊情況或政治制度的結果，這雖僅在一國發生，卻成為極重要的事體。這種事體，決不會使任何人實際上更富裕，卻會使一切人實際上更貧乏。一切商品貨幣價格的騰貴（這場合是該國所特有的現象）就會多少阻抑國內各種產業，因而使外國國民在出售幾乎一切種類貨物所索取的銀量，小於該國工人所能出售的銀量，不僅在國外市場上，而且在國內市場上，都比該國售價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富金銀礦山，所以能夠以金銀分配給歐洲其他國家。因此，這兩種金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應略為低廉，而在歐洲其他各國則略為昂貴。但其差額，不應大於運輸費和保險費。由於金銀體積小價值大，運輸費不成為大問題；至於保險費，亦必與任何其他等值貨物的保險費相同。所以，這兩國如果不通過政治制度，加劇這種特殊情況的不利，那末他們由這種特殊情況而蒙受的苦痛，一定是很小的。

對於金銀輸出，西班牙課以賦稅，而葡萄牙則加以禁止，以致輸出須負擔走私費用，使這兩種金屬在他國的價值高於西葡二國的部分，等於祕密輸出的全部費用。譬如以堤壩堵住河流，壩內一經充滿了水，水必越過壩頭外流，好象沒有堤壩一樣。禁止金銀輸出，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禁止金銀輸出，不能在本國保留本國所能使用的程度以上的金銀量。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限制了這一國在鑄幣上，在金銀器皿上，在鍍金上，在金銀裝飾品上，所可使用的金銀量。如果它取得了這個數量，就如堤壩滿了以後流入的全部水流，都必外溢。這樣，西葡二國，雖限制金銀輸出，但每年從西葡二國輸出的金銀，幾乎等於其每年輸入的金銀。但是，正如壩內的水必比壩外

的水深，由於這種限制而保留在西葡二國內的金銀量，和它們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相比，必大於其他各國的金銀量。壩頭愈高愈強，則壩內壩外水的深度的差必然愈大。所以，課稅愈高，禁令所立的刑罰愈嚴峻，警察執行法律愈嚴密，則西葡二國金銀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持的比例，與其他各國這種比例相比，差額亦必愈大。因此，據說，差額是很大的；在西葡二國，家家常可看到許許多多金銀器皿，而看不到按他國標準和此種奢華相配稱的其他東西。貴金屬這樣的過剩，必然使金銀低廉，或者說，必然使一切商品昂貴，這就阻害了西葡二國的農業與製造業，使外國能以比它們國內生產或製造所費的更小的金銀量，供給它們以許多種類原生產物，和幾乎一切種類製造品。課稅及禁止，在兩個不同方面起作用。不僅大大減低西葡二國貴金屬的價值，而且由於保留不應保留的一定數量金銀，致使其他各國貴金屬的價值，略高於原來的價值，從而，使其他各國與西葡二國通商，得享受雙重利益。要是把水門開放，那末壩內的水立刻減少，壩外的水業刻增加，壩內外不久就會相等。同樣，要是撤除此種課稅與禁令，濫末西葡二國的金銀量就會大減，其他各國的金銀量就會稍增，此等金屬的價值，即對土地勞動年產物的比例，不久就會在一切國家間相等或幾乎相等。西葡二國，由金銀這樣的輸出而可能招受的損失，全然是名義上的、想象上的。它們貨物的名義價值，它們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名義價值，將跌落，將以比從前小的金銀量代表，但其真實價值將和從前相同，所能維持、所能支配和所能僱用的勞動量，亦將和從前相同。它們貨物的名義價值將跌落，所餘金銀的真實價值將騰貴，於是和往昔為通商為流通而使用的較大金銀量比較，現今的數量雖較小，但所能達到的目的，則與往昔無二致。流往外國的金銀，決非無所謂地流往外國，那必然會帶回等價值的各種物品。這些貨物，又決不是全然供不生產的遊惰者消費的奢侈品和消耗品。遊惰者的真實財富與收入，既不能由於這種異常的金銀輸出而增加，其消費亦不能由此而大增。所以，由此帶回來的貨物，也許有大部分，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材料、工具、食料，可用以僱用勤勞人民和維持勤勞人民。勤勞人民，必能再生產他們所消費的全部價值並帶來利潤。這樣，社會死資財的一部分就變為活資財，因此能推動比從前更大量的產業。它們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馬上就會增加一點，再過幾年，

便會大大增加。它們產業現今所受最苛重的一個負擔，這樣就除去了。

西葡二國不合理政策所起的作用如是，穀物輸出獎勵金所起的作用必亦如是。不論耕作的實際狀態是怎樣，穀物輸出獎勵金總會使國內市場上的穀物價格略高於無獎勵金的場合，並使外國市場上的穀物價格略低於無獎勵金的場合。因為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多少支配一切其他商品的平均貨幣價格，所以，此等獎勵金又會大大減低國內白銀的價值，稍稍提高外國白銀的價值。這種獎勵金，使外國人，尤其是荷蘭人，不但能以比無獎勵金時他們所出的更廉的價格，而且能以比有獎勵金時我們自己所出的更廉的價格，吃到我國的穀物；一位卓越的權威作者馬太·德克爾先生，曾明確指出這一點。這種獎勵金，使我們的工人，不能象在無獎勵金時那樣，為小量的白銀而提供他們的貨物，卻使荷蘭人能以較小量的白銀而提供他們的貨物。這樣，就使我國製造品，無論在何處，都比無獎勵金時稍稍昂貴，並使他們的製造品，無論在何處，都比無獎金時稍稍低廉，因而，使他們的產業，能享受雙重的利益。

因為這種獎勵金，在國內市場上所提高的，與其說是我國穀物的真實價格，無寧說是我國穀物的名義價格，所增加的，與其說是一定量穀物所能維持和所僱用的勞動量，無寧說是這一定量穀物所能交換的白銀量，所以，必然阻害我國製造業，而對我國農業家或鄉紳又無大的利益。誠然，這兩者都會因此而有較多的貨幣收入，要使他們大部分相信那對他們並無很大利益，也許有點困難；但是，如果貨幣所能購買的勞動量、食料量和各種國產商品量都減少了。那末，由此而得的利益，也就不過是名義上、想象上的利益了。

在整個國家中，受這種獎勵金的實際利益的，或者說，能受這種獎勵金的實際利益的，也許只有一種人，即穀物商人或穀物輸出者和穀物輸入者。獎勵金必然使豐年穀物輸出量大於無獎勵金的場合；而且，由於它使今年的豐收不能救濟明年的不足，它必然使歉歲穀物輸入量大於無獎勵金的場合。在豐年歉歲，它都增加穀物商人的業務。但在歉歲，這種獎勵金，就不但使他能輸入比無獎勵金時（即在今年豐收可多少救濟明年不足時）所能輸入的更多穀物，而且能以較好的

價格出售穀物，因而能獲得較大的利潤。所以，我說，最熱烈贊成繼續發給此種獎勵金的，就是這一種人。

我們的鄉紳，在對外國穀物的輸入課以重稅（那在一般豐年便等於禁止），和對本國穀物的輸出給與獎勵金時，似乎是在仿效我們製造業者的行爲。使用前一種方法，他們取得了國內市場獨佔權；使用後一種方法，他們企圖防止國內市場積存穀物過多。總之，他們使用這兩種方法，企圖提高他們商品的真實價值。在這一點上，他們和製造業者所採取的方法，是一樣的。製造業者亦曾同樣採取這兩種方法，來提高許多種製造品的真實價值。但他們也許沒注意到，穀物和其他各種貨物間有着巨大的根本的差別。以獨佔國內市場的方法，或以獎勵輸出的方法，使毛織物以比無獨佔權和無獎勵金時更好的價格出售，那是可能的，因為使用這些方法，不但提高了此等貨物的名義價格，而且提高了此等貨物的真實價格。使此等貨物等於較大的勞動量與生活品量，就不僅增加了此等製造業者的名義利潤、名義財富與名義收入，而且增加了他們的真實利潤、真實財富與真實收入；這樣他們就能夠過較優裕的生活，或在此等製造業上，僱用較大的勞動量。這實際上就是獎勵此等製造業者，使他們製造業所僱用的國內勞動者比無此制度時所能僱用的多。但這種制度如果應用到穀物，那所提高的就只是穀物的名義價值，不是穀物的真實價值。這樣做，不能增加農業家的真實財富或真實收入，亦不能增加鄉紳的真實財富或真實收入。也不能獎勵穀物的耕種，因為不能使穀物能夠養活和能夠僱用更多的耕種穀物的勞動者。按照事物的本質，穀物有一定的真實價值，不能隨貨幣價格改變而改變。輸出獎勵金，國內市場獨佔，都不能提高穀物的真實價值。最自由的競爭，亦不能使它低減。就全世界說，穀物的真實價值，等於它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就個別地方說，穀物的真實價值，等於穀物按照當地維持勞動者生活的一般方式，即大方地、省儉地或適中地維持其生活的方式，所能維持的勞動量。毛織物和麻織物不是支配性的商品，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實價值，並非最後要由毛織物和麻織物的價值來衡量、來決定。穀物卻不然。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實價值，最後都要由各自平均貨幣價格對穀物平均貨幣價格所持的比例來衡量、來決定。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雖有時會一世紀和一世紀不同，但其真實價值卻不隨此種變動而變動。隨這種變動而變動的，只是白銀的真實價值。

任何國產商品輸出獎勵金，都不免惹人反對。第一，對重商主義一切辦法，一般都可提出反對，因為這些辦法，違反自然趨勢，迫使國內一部分產業，流入較少利益的用途。第二，國產商品輸出獎勵金辦法，特別要惹人反對，因為它不僅迫使國內一部分產業，流入較少利益的用途，而且迫使流入實際不利的用途。無獎勵金即不能經營的生意，必然是一種虧損生意。穀物輸出獎勵金，還要在以下方面惹人反對：它無論從哪一點說，都不能促進它所要促進的那種商品的生產。在鄉紳們要求設置此種獎勵金時，雖然是模仿商人和製造業者，但商人和製造業者完全理解他們的利害關係，其行動通常受這種理解的指導，鄉紳們卻沒有此種完全的理解。他們給國家收入加上了一個極大的耗費，給人民大眾加上了一個極重的賦稅，但他們自己的商品，卻沒因此顯著地增加其真實價值。而且由於銀的真實價值因此稍稍減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國家的一般產業，因為土地改良程度，必然取決於國家的一般產業；所以他們沒有促進他們土地的改良，反而或多或少地妨礙土地的改良。

有人這樣想，為獎勵一種商品的生產，生產獎勵金的作用，比輸出獎勵金更為直接。此外只須對人民課一種賦稅，就是說，人民只須繳納一種用以支付獎勵金的稅。生產獎勵金，不但不會提高商品在國內市場上的價格，而且有減低的傾向。所以，他們不會因此而繳納第二種稅，而他們所繳納的第一種稅，亦將因此至少可得一部分的補還。可是，生產獎勵金，是不常發給的。重商主義所確立的偏見，使我們相信，國民財富直接得自生產的少，直接得自輸出的多。輸出被看作更直接的帶回貨幣的方法，因此更受歡迎。又有人說，依照經驗，生產獎勵金，比輸出獎勵金更易產生欺詐行為。這種說法，真確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但輸出獎勵金，往往被濫用來搞許多欺詐行為，卻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這一切方策的發明者即商人與製造業者的利益在於，他們的貨物在國內市場上不積存過多。生產獎勵金有時會惹起這種情況，而輸出獎勵金卻使過剩部分送往外國，這樣國內殘留的那部分貨物的售價得以提高，所以能切實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因此，在重商主義各種方策中，輸出獎勵金便成為他們最愛好的一種了。我知道，某些行業的經營者，都私下同意從自己的荷包裏掏出錢來獎勵他們一定部分貨物的輸出。這種方策施行得很順利，雖然大大增加了國產商品，卻仍能在國內市場上使他們貨物的價格提高一倍以

上。但是，穀物獎勵金要是真的降低了穀物的貨幣價格，其作用必大不相同。

可是在特定場合，亦曾發給了類似生產獎勵金的獎勵金。鱈白魚業及鯨魚業所得的按漁船噸數計算的獎勵金，或可視為具有此種性質的獎勵金。據說，這種獎勵金。使此商品在國內市場上的價格，比無此等獎勵金時低廉。從別方面看來，我們又必須承認，其結果與輸出獎勵金的結果相同。有了這種獎勵金，國內一部分資本，就被用來使這種貨物上市，但其價格卻不能補償其費用，並且不能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

此等漁業的噸數獎勵金，雖無補於國民財富的增長，但由於可增加船舶及水手數目，所以，可被認為有助於國防，也許可以說，用這種獎勵金來維持國防，比如象維持常備陸軍那樣維持一個龐大的常備海軍（如果我可以使用這名詞），其所需費用，有時也許要小得多。

但雖有這種辯護，下述各點卻使我相信，議會至少在批准發給這些獎勵金中的一種時大大地受騙了。

第一，鱈白色漁船獎勵金似乎太大了。

從1771年冬季漁汛開始直到1781年冬季漁汛完畢，鱈白魚漁船的噸數獎勵金，為每噸三十先令。在這十一年內，蘇格蘭鱈白魚漁船捕撈的鱈白魚總數為三十七萬八千三百四十七桶，在海上捕獲即行醃存的鱈白魚，稱為海條。但要運到市場去售賣，須再加上一定數量的鹽加以包裝，使成為商用鱈白魚。在這場合，三桶海條，往往改裝為商用鱈白魚二桶。所以，在這十一年間，所獲商用鱈白魚，計有二十五萬二千二百三十一又三分之一桶。在這十一年間，付出的噸數獎勵金，總計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三鎊十一先令，即海條每桶得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商用鱈白魚每桶得十二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

醃鱈白魚時所用的鹽，有時是蘇格蘭產，有時是外國產，但都可免納一切國產稅交給醃魚業。但蘇格蘭鹽每蒲式耳，現今須納國產稅一先令六便士，外國鹽每蒲式耳須納十先令。據說，鱈白魚每桶須用外國鹽大約一又四分之一蒲式耳。若用蘇格蘭鹽，平均須二蒲式耳。如果鱈白魚是供輸出的，那就完全免納鹽稅。如果是供國內消費的，那就無論所用的是外國鹽還是蘇格蘭鹽，每桶只納一先令。這是蘇格蘭往昔對一蒲式耳鹽所課的稅，鱈白魚一桶所需用的鹽，即根據最低

的估計，亦需要一蒲式耳。我們知道，在蘇格蘭，外國鹽通常只用以鱈魚。自1771年4月5日至1782年4月5日，輸入的外國鹽，共計九十三萬六千九百七十四蒲式耳，每蒲式耳重八十四磅。蘇格蘭鹽交給醃魚業的數量，卻不過十六萬八千二百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僅五十六磅。由此可見，漁業所用的鹽，主要是外國鹽。此外，每桶鱈白魚輸出，給付獎勵金二先令八便士。漁船捕獲的鱈白魚，又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輸出的。所以，綜合這一切來計算，你就會知道，在這十一年間，漁船捕獲鱈白魚一桶，若以蘇格蘭鹽醃存，則在輸出時，所費於政府的，計十七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國內消費時，所費於政府的，計十四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若以外國鹽醃存，則在輸出時，所費於政府的，計一鎊七先令五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國內消費時，所費於政府的，計一鎊三先令九又四分之三便士。良好商用鱈白魚一桶的價格，最低十七先令或十八先令，最高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平均約為一幾尼。

第二，鱈白魚業的獎勵金是一種噸數獎勵金，按照捕魚船的載重量發給，不按照它勤惰與成敗發給。我恐怕有許多開出去的船舶，不以捕魚為目的，而以捕獎勵金為唯一目的。1759年，獎勵金為每噸五十先令，但蘇格蘭全部漁船所獲，卻不過海條四桶。在這一年，海條每桶，單就獎勵金一項說，政府就費去一百一十三鎊十五先令，而商用鱈白魚每桶，則所費為一百五十九鎊七先令六便士。

第三，有噸數獎勵金的鱈白魚業，往往用載重二十噸至八十噸的大漁船或甲板船。這種捕魚法，也許是從荷蘭學來的，是適宜於荷蘭情況而不怎麼適宜於蘇格蘭情況的。荷蘭陸地，與鱈白魚大批伏處的海，相距很遠；所以，經營這種漁業非使用甲板船不可，甲板船可攜帶充足的水與食料，以備遠海的航行。但蘇格蘭的赫布里迪茲羣島或西部羣島，設得蘭羣島，以及北部海岸與西北部海岸，總之，經營鱈白魚業的主要地區，卻到處都是海灣，伸入陸地，當地把海灣稱為海湖。此等海湖，乃是鱈白魚來遊此海時所羣集的地方。由於此種鱈白魚（我相信，還有許多種其他的魚）來遊的時期，很不一定，所以小舟漁業，看來最適宜於蘇格蘭的特殊情況。這樣，漁人一經捕得鱈白魚，即可運上岸來醃存或生食。每噸三十先令獎勵金，固可給大船漁業以大獎勵，但必然會阻害小舟漁業。小舟漁業沒得此種獎勵金，不

能與大舟漁業在同樣的條件下，以醃魚提供市場。以此之故，在未有
大舟漁業以前很可觀的小舟漁業，據說從前曾僱用不少海員，但現今
卻幾乎全然凋落了。關於此種在今日已經十分凋零而且無人過問的小
舟漁業，以前究竟具有什麼規模，我必須承認，我不能說出何等十分
正確的話。由於小舟漁業沒得到什麼獎勵，所以關稅吏和鹽稅官都不
曾記下什麼記錄。

第四，蘇格蘭有許多地方，在一年內一定季節，鱈白魚成為普通
人民相當大的一部分食品。可使國內市場上鱈白魚價格跌落的獎勵
金，對於境遇不優裕的大多數我國同胞，也許是一個很大的救濟。但
大鱈白魚漁船獎勵金，決不能收到這樣好的效果。最適宜於供應國內
市場的小舟漁業，曾為它所破壞；每桶二先令八使士的附加輸出獎勵
金，又使大漁船所捕鱈白魚，有三分之二以上，輸到外國去。在三、
四十年之前，大漁船獎勵金尚未設置，我相信，那時鱈白魚每桶的普
通價格為十六先令。十至十五年之前，小舟漁業尚未完全衰落，據
說，那時鱈白魚每桶的普通價格為十七先令至二十先令。在最近五年
間，平均每桶為二十五先令。但這種高價，也許應歸因於蘇格蘭沿海
各地實際上缺少鱈白魚。此外，我必須指出，與鱈白魚同時賣掉的桶
（那種桶價計算在上述各種價格內），自從美洲戰事開始以來，已經
漲價約一倍，即由大約三先令漲至大約六先令。我也必須指出，我所
收集的往時價格的記載，並不是完全一致、首尾相符的。有一個很精
明、很有經驗的老人，曾對我說，五十多年以前，良好商用鱈白魚一
桶的普通價格為一幾尼。我以為，直到現在，那還可看作是平均價
格。但我相信，這一切記載都認為，國內市場上鱈白魚的價格，並未
由於大漁船獎勵金而降低。

也許有人認為，此等漁業家，在領受此等豐厚獎勵金以後，如果
仍以往時通常出售的價格或高些的價格，售賣他們的商品，他們可得
到很大的利潤。就某些人說，情況可能如此。但一般說來，我卻有理由
相信，情況決非如此。這種獎勵金的通常意義，是在獎勵輕率的企
業家，使冒險經營他們所不瞭解的事業，但政府發給的非常豐厚的獎
勵金總抵補不了他們由於怠惰無智而引起的損失。1750年，根據第
一次以每噸三十先令獎勵鱈白魚漁業的法令（喬治二世第二十二年第
二十四號法令），又敕立了一個合股公司，資本五十萬鎊，納資人（除

了其他各種獎勵，如上述的噸數獎勵金，如每桶二先令六便士的輸出獎勵金，如鹽稅一律免納）得在十四年間，每納資一百鎊，每年收取三鎊，並由關稅徵收官，每半年支付半額。這家大公司的經理及理事都住在倫敦。但除這公司以外，又公佈在國內各海港，設立資本總額不下一萬鎊的漁業公司為合法。這些比較小的漁業公司的經營，雖由經營者自行負責，盈虧歸經營者自己承擔，但同樣可取得同一的年金以及各種獎勵。大公司的資本不久就滿額了，而在國內各海港，也設立了好幾家漁業公司。可是，雖有這一切大獎勵，這一切公司，無論大的小的，幾乎全失去了他們資本的全部或大部，現在，這種公司的痕跡，亦一點不見了，鱈白魚漁業現今幾乎全部由私人投機家經營。

如果某一種製造業確是國防所必需，那末靠鄰國供給這種製造品，未必就是聰明的辦法。如果這一種製造業非獎勵即不能在國內維持，那末對其他一切產業部門課稅，來維持這一種製造業，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對於英國製造的帆布及火藥的輸出獎勵金，也許都可以根據這個原理來加以辯護。

對人民大眾的產業課稅，以支持個別製造業者的產業，很難說是合理的，但在人民大眾都有很大收入，不知怎樣使用其全部收入的大繁榮時期，對於所愛好的製造業，頒給這樣獎勵金，也就象作別種無謂的花費一樣，不足為怪。不論公的和私的花費，大富也許常常可作為大愚的辯解。但在普遍困難與窮困時期，還繼續此種浪費，其謬誤便非尋常可比了。

所謂獎勵金，有時即是退稅，因此不能與真正的獎勵金一概而論。例如，輸出精砂糖的獎勵金，可說是對赤砂糖、黑砂糖所課賦稅的退還。輸出精絲製品的獎勵金，可說是對生絲、捻絲輸入稅的退還。輸出火藥的獎勵金，可說是對硫黃硝石輸入稅的退還。按照關稅用語，只有那些輸出時其貨物形態和輸入時相同的輸出貨物所得的津貼，才叫做退稅。如果輸入以後，其形態曾由某種製造業加以改變，以致名稱隨着改變，歸入新的項目，則所發給的津貼叫做獎勵金。

社會給予業務有專長的技術家與製造業者的獎金，也不能一概稱為獎勵金，獎金雖可獎勵異常的技巧與技能，從而提高各行業中現有工人的競爭心，但不能使一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以過大的比例，流入任何一個行業。這種獎金不能破壞各行業間的均衡，卻使各行業

的作品儘可能達於完善。此外，獎金所費極輕，而獎勵金所費極大。單就穀物獎勵金說，社會每年所費的有時達三十萬鎊以上，

獎勵金有時被稱為補貼金，正如退稅有時被稱為獎勵金一樣。但我們應時常注意事物的本質，不必重視名稱。

順便談談穀物貿易及穀物條例

世人對於規定穀物輸出獎勵金的法律及與此有關的一系列規則，都加以讚賞。我在未曾指出這種讚賞全是不當的以前，不能結束獎勵金這一章。關於穀物貿易的性質及與穀物貿易有關的英國主要法律的專門研究，可充分證明我的論點是正確的。這題目太重要了，所以技節話即使長些，也是正當的。

穀物商人的貿易，包含四個不同部門。這四個部門，雖有時全由一人經營，但按其性質，實是四種不同的獨立的貿易：第一，內地商人的貿易；第二，國內消費品輸入商人的貿易；第三，供國外消費的國內生產物輸出商人的貿易；第四，運送商人的貿易，即輸入穀物以待輸出。

第一，內地商人的利益，無論乍看起來是怎樣與人民大眾的利益相反，但實際上，甚至在大荒年，卻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利益在於，按照真實歉收情況，把穀物價格提高到應有的程度，但若提高得超過這個限度，那就對他不利。價格的提高，阻礙消費，使一切人，尤其使下等階級人民或多或少地節省食糧。假若提得太高，那就會在很大程度上阻礙消費，以致一季節的供給超過一季節的消費，直到下次收穫物已經上市，上次收穫物還有剩餘，那末他的穀物，不僅會由於自然原因而損失很大部分，而且其剩餘部分，將不得不以比數月前低廉得多的價格出售。但若提得不夠高，那就不能產生阻礙消費的作用，結果一季節的供給，很可能不夠一季節的消費，而他不僅會損失他一部分應得的利潤，而且將使人民在一季節完畢之前，面臨飢饉的可怕威脅，而不是遭受缺乏的困難。為人民的利益計，他們每天、每星期、每月的消費，應儘可能與一季節的供給，保持相應的比例。為內地商人的利益計，也要這樣。他盡判斷能力所及，按這比例，供給人民穀物，他售賣穀物的價格就可能最高，所得利潤亦可能最大。收穫情況如何，每日、每星期和每月的售額如何，他是知道的。這種知識，使他能夠多少正確地判定人民實際上所得的供給，和此比例相差

多少。假定他只顧一己的利益，不顧民衆的利益，那末爲他自身打算，即在不足的年度，也一定要按照謹慎的船長有時待遇船員的辦法待遇人民大眾，即在他預見到糧食快要缺乏時，就叫他們減食。固然，有時船長顧慮太多，在實際沒有必要的時候，亦叫他們減食，使他們感到困難。但這種困難，和他們有時因船長行爲不謹慎而遭受的危難和滅亡比較起來，算不得一回事。同樣，內地穀物商人由於貪婪過度，有時把穀物價格提高到超過荒歉季節所應有的程度，但人民由此種可有效地使他們避免季節末飢饉的行爲所感受的困難，和他們因商人在季節初廉售而產生的季節末飢饉威脅比較起來，也算不得一回事。而穀物商人自身將因這種過度的貪婪而深受其害；這不僅因爲這會使一般人憎厭他，而且他即使能夠避免這種憎厭的影響，亦不能避免下述那一種困難，就是在季節末，在他手上必定會留有一定量穀物，如果下一季節是豐收的，這殘留額的售價，必比他前此可能售賣的價格低得多。

如果一個大國的全部收穫物，都由一大羣商人佔有，那末他們爲利益計，也許會象荷蘭人處置馬魯古羣島的香料那樣，爲了要提高一部分存貨的價格，便把存貨的大部分毀壞或扔掉。但對穀物要確立這樣廣泛的獨佔，即使憑藉法律的暴力，亦是不易辦到的；而且，在法律准許貿易自由的地方，最不易爲能買光大部分商品的少數大資本勢力所壟斷、所獨佔的商品，要算穀物。一國收穫的全部穀物的價值太大了，少數私人的資本是不能掃數購買的；即使有掃數購買的能力，其生產方法，又將使此種購買，全然不能實現。在任何文明國家，穀物都是年消費額最大的商品。所以，一國勞動，每年用以生產穀物的部分，必大於每年用以生產任何其他物品的部分。在它第一次從土地上收穫出來之後，它亦必在更多的所有者中間分配。這種所有者，決不能象許多獨立製造者一樣，集居在一個地方，卻必然會散居在國內各處。此種最初所有者，或直接供給鄰近地域的消費者，或直接供給其他內地商人而間接供給此等消費者。內地穀物商人，包括農業家和格面師，其人數，必多於經營任何其他商品的商人，而且由於散居各處，使他們絕不可能結成任何團體。因此，在歉歲，如果其中有一個商人，發覺他的穀物中有許多不能按時價在季節末售脫，他決不會想保持這個價格，使競爭者得利而自己受損失，而會立即減低此價格，希望在新收穫出來之前，把他的穀物售去。支配一個商人行爲的動機

及利害關係，又將支配其他一切商人，迫使他們都根據他們所能作的判斷，按照對季節豐歉最爲適宜的價格，售出他們的穀物。

關於現世紀及前此二世紀歐洲各地糧食不足與飢饉的情況，有些記載很可靠。誰要是細心研究此中經過，我相信，一定能夠發現，糧食不足的情況，並非起因於內地穀物商人的聯合，而是起因於真正的不足。這種不足有時在個別場合起因於戰爭的浪費，而在最大多數場合，卻起因於年成的不好。也會發現，飢饉發生的原因，只是政府粗暴地以不適當手段來克服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難。

在各部分都有自由通商和自由交通的廣大產麥國內，最不好的年成也不會產生那麼大的糧食不足，以致引起飢饉。若能節省使用，那末即使最歉收的年度，也可在比一般豐收年度略爲緊縮的情況下，養活一樣多的人數一年。最不好的年成，莫過乾旱和淫雨。但由於麥可栽於高地，亦可栽於低地，即既可栽於潮溼土地，亦可栽於乾燥土地，所以，有害於低地的淫雨，可有利於高地，有害於高地的乾旱，又可有利於低地。雖然，在乾旱與多雨的季節，收穫都比氣候順適的季節少得多，但無論是乾旱或是多雨，國內某一部分的所失，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部分的所得得到補償。在產米國內，作物不僅需要極潤溼的土壤，而且在稻的生長期內，有一段時間，還須浸在水裏，所以，乾旱的影響，可怕得多。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國家裏，乾旱亦不見得會那麼普遍，以致必然引起飢饉，只要政府允許自由貿易，飢饉就可避免。數年前，孟加拉的乾旱，也許只會引起極大的糧食不足，而後來所以會轉爲飢饉，也許是因爲東印度公司人員，曾以不適當的條例，不審慎的限制，加在米的貿易上面。

如果政府爲要救濟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們認爲合理的價格售賣他們的穀物，其結果或是使他們不把穀物提供市場，以致在季節之初，即產生飢饉，或是（在他們以穀物提供市場的假設下）使人民能夠迅速消費，因而鼓勵人民迅速消費，以致在季節之末，必然產生飢饉。無限制無拘束的穀物貿易自由，既是防止飢饉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減輕糧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爲真正糧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除去而只能減輕的。沒有一種商業，比穀物貿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護，也沒有一種商業，比穀物貿

易，更需要這種保護，因為沒有一種商業，比穀物貿易，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

歉歲，下級人民，往往把他們的困苦歸因於穀物商人的貪婪。於是，穀物商人，成為他們憎惡和憤怒的目標。在這場合，穀物商人不但賺不到錢，而且常有完全破產的危險，而其倉庫也有給民衆暴力掠奪破壞的危險。但穀物商人團取大利潤的時候，亦就是穀物價格昂貴的歉歲。他通常與一些農業家訂約，在一定年限內，按一定價格，供他一定量穀物。這個契約價格，是按照被認為適中合理的價格即按照普通或平均價格訂定的。那在上次歉收年份以前，普通約為小麥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其他各種穀物每夸特的契約價格，亦以此為準。所以，穀物商人得在歉歲以普通價格購買並以高得多的價格售賣他穀物的大部分。這是一種異常的利潤，但這種異常的利潤，只夠使他的行業與其他行業立在平等地位，只夠補償他在其他場合，由此商品的易腐性或其價格意外變動的頻繁性而產生的許多損失。這種事實，只要看看穀物生意投象其他生意有那麼多發大財的機會，就會明白。他只能在歉歲獲取大利潤，但因此卻引起人們的反感。因此，稍有品格及財產的人，多不願加入此種行業。這種行業，於是聽任那一羣下流商人經營；在國內市場上，介在生產者及消費者中間的人，使幾乎只有磨坊主，麪包房主，制粉商，麪粉經售人，以及若干困苦的小販了。

歐洲往時的政策，對於這樣有利於社會的行業不但不去消除人們對它的憎惡，似乎反視此種憎惡為正當而加以鼓勵。

愛德華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號法令規定，凡購買穀物而想再拿出來售賣的人，應現為犯法的壟斷者，初犯，處以二個月監禁，科以等於穀物價值的罰款；再犯，處以六個月監禁，科以等於穀物價值二倍的罰款；三犯，處以頭手枷刑，和期限長短由國王決定的監禁，並沒收其全部動產。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國昔時的政策簡直一樣。

我們的祖宗，似乎認為，人們向農民購買穀物，比向穀物商人購買便宜，因為他們害怕穀物商人除了他付給農民的代價外，還會要求異常的利潤。所以，他們企圖完全消滅他的行業。他們甚至企圖儘可能防止生產者與消費者間有任何中間人。他們對於所謂穀物商或穀物運送者經營的行業所加的許多限制，其意義即在於此。那時，沒有特

許狀，證明他誠實公正，即不許經營此種行業。依據愛德華六世的法令，則非經三個治安推事認可，就無法取得此種特許狀。但是，這樣的限制，以後仍認為不夠，所以依據伊麗莎白的一個法令，有權頒發此種特許狀的，就只有一年開四次的法庭了。

歐洲古時的政策，企圖照這樣來管理農村最大的職業即農業，而管理的原則，則與管理都市最大職業即製造業的原則完全不同。這種政策，使農民除了消費者或他們穀物的直接經售者即谷商及穀物運送者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顧客，因而強迫他們不但要經營農民的職務，而且要經營穀物批發商人及零售商人的職務。反之，在製造業方面，歐洲古時的政策，卻在許多場合，禁止製造者兼營開店的生意，不許他們零售他們自己的商品。前一種法律的用意，是要促進國家的一般利益，或者說，使穀物趨於低廉，但人們也許不很瞭解這應如何進行。後一種法律的用意，卻要促進特種人即店老闆的利益，當時人們認為，這種人將為製造業者所連累而賤賣，如果允許製造業者零售，這種人的生意，就會破滅。

雖然當時允許製造業者開設店鋪零售貨物，但是製造業者決不會把貨物賣得比一般店鋪老闆還便宜。不管投在店鋪內的這一部分資本是大是小，它必定是從製造業中抽取出來。為使他站在與他人同等的地位上經營他的業務，他這一部分資本必須取得店老闆的利潤，正如他那一部分資本必須取得製造業者的利潤一樣。例如，假設在他所居住的那一城市裏，製造業資本及小賣業資本的普通利潤都是百分之十，那末在製造者自行開店零售的場合，他在店鋪中每售去一件貨物，即須取得利潤百分之二十。當他自工廠搬運貨物至店鋪時，他對貨物所估的價格，必然是他向零售店老闆所能索取的批發價格。如果估得比這低，他的製造業資本的利潤，便失去了一部分。當貨物在他自己店鋪內售去時，如果出售價格，低於其他店鋪老闆所售價格，那他的小賣業資本的利潤，亦失去了一部分。在這場合，他對於同一件貨物，雖似乎取得了加倍的利潤，但因這種貨物曾先後充作兩個不同資本的一部分，所以，對於他投下的資本，他所取得的，其實只是單一利潤。如果他所得利潤比這少，他就是損失者，換言之，他所投下的全部資本，未得到與大部分鄰人相同的利益。

不許製造業者經營的事，卻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農業家來經營，就是說，以他的資本分投於兩種不同用途，即以一部分投在穀倉及乾草場上，以供應市場上不時的需要，而以其餘部分用來耕作土地。但他投於後一部分所得利潤，既不能少於農業資本的普通利潤，所以，他沒於前一部分所得利潤，亦不能少於商業資本的普通利潤。實際用來經營穀物生意的資本，無論是屬於被稱為農業家的人，還是屬於被稱為穀物商人的人，都要有相同的利潤，來補償這樣投資的資本所有者，並使他的職業能與其他職業立於同等地位，使他不致見異思遷。因此，被迫而兼營穀物商業的農業家，決不能把他的穀物賣得比任何其他穀物商人在自由競爭的場合不得不賣的價格，還要便宜。

以全部資本投在單一行業對商人有利，正如以全部勞動用在單一操作對勞動者有利一樣。勞動者從此學得一種技巧，使他能以同樣的兩隻手，完成比別人多得多的作業；同樣，商人亦從此學得一種簡便的買賣貨物方法，使他能以同量的資本，經營比別人多得多的業務。一般地說，勞動者能因此以低廉得多的價格，提供他們的產品；而商人亦能因此以同樣低廉的價格，提供他們的貨物，比資財和心思用在多種多樣的貨物上時低廉得多。大部分製造業者，都不能象處處留神的活躍的小買賣商人——他們的唯一業務是整批地購買貨物、再零星地售賣貨物——以那麼低廉的價格，零售他們自己的貨物。大部分農業家，更不能象處處留神的活躍的穀物商人——他們的唯一業務是整批地購買貨物貯存大谷倉內、再零星地售賣出去——以那麼低廉的價格，把他們自己的穀物，零售給離他們四、五哩的都市居民。

禁止製造者兼營小賣業的法律，企圖強使資本用途的這種劃分發展得比原來更快些。強迫農業家兼營穀物商業的法律，卻妨礙這種劃分的進行。這兩種法律，顯然都侵犯了天然的自由，所以都是不正當的；因為不正當，所以都是失策的。爲了任何社會的利益，這一類事情，都是不應強制，也不應妨礙的。以勞動或資本兼營無經營必要的行業的人，決不會以比他的鄰人更賤的價格售賣貨物，從而傷害其鄰人。他也許會傷害他自己，事實上大都會傷害他自己。諺語說，兼營一切事業的不富。法律應該讓人民自己照應各自的利益。人民是當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瞭解自己的利益。但在這二種法律中，最有害的，卻是強迫農民兼營穀物商業的法律。

這項法律，不僅妨礙了大大有利於社會的資本用途的劃分，而且同樣妨礙了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強使農業家不專營一業而兼營二業，即是強迫他把資本分作二部分，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業上，但若他的全部農作物，一經收穫，他即可自由賣給穀物商人，他全部資本就會立即回到土地，用來購買更多的耕牛，僱用更多的傭工，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如果強迫他零售他自己的穀物，他就不得不把資本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穀倉及乾草場中，再不能象無此種法律時候那樣，以全部資本用於耕作土地。所以，此種法律，必然妨礙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價低廉，而且能減少穀物生產，因而提高穀物價格。

除了農業家的業務，最有助於穀物栽種事業的，就是有適當保護及獎勵的穀物商人的業務，象批發商人的業務有助於製造業者的業務一樣，穀物商人的業務有助於農業家的業務。

批發商人，給製造者提供現成的市場，其貨物一經制成，即被他們買去，有時，在貨物未經制成以前，即預先給付貨物的價格，所以，使製造業者能夠把他的全部資本，甚或比起全部更大的資本不斷地投在製造業上，使他所製成的貨物，比把貨物賣給直接消費者及零售商人的場合多得多。此外，批發商人的資本，一般是夠補償許多製造業者的資本，所以他和他們間的這種來往，使得一個大資本所有者，為着利害關係，願意支持許多小資本所有者，並在他們遭受有破產危險的損失與不幸時，給他們以援助。

農業家和穀物商人間同一種類的來往，若能普遍地建立起來，則所帶來的結果，亦必同樣有利於農業家。農業家因此能以其全部資本，甚或比全部更大的資本，不斷地投在耕作事業上。他們這種職業，比任何其他職業都容易遭受各種意外，但有了這種來往，那就無論在哪一種意外中，他們都可發現，他們的尋常顧客，即富裕的穀物商人，願意支持他們，而且能夠支持他們。這樣，他們就不必象現在那樣，一味依賴地主的寬容及地主管家的慈悲。如能（那恐怕是不可能的）立即把此種來往普遍地建立起來；如能立即把全部農業資本，從其他一切不相宜的用途，移歸相宜的用途，即土地耕作事業；如在必要時，為支持扶助這個大資本的作用，能立即供給另一個幾乎同樣

大的資本，那末，僅僅這種事態的變更，對國內全部土地，將產生如何巨大、如何廣泛和如何急劇的改良，那就很難想象了。

所以，愛德華六世的法令，儘量禁止生產者與消費者間有中間人存在，就是企圖消滅一種有利的貿易。這種貿易，要是自由進行，不僅是減輕糧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預防這災禍的最好方法。除了農業家的業務，最有利於穀物生產的，便是穀物商人的業務了。

這法律的嚴峻，賴後來幾個法規而和緩了不少。這些法規，先後允許在小麥價格不超過一夸特二十先令、二十四先令、三十二先令或四十先令時，可圍購穀物。最後，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號法令規定，在小麥價格不超過四十八先令一夸特時（其他穀物價格以此為準），凡不是壟斷者，即不是購買穀物後在三個月內在同一市場售賣的人，囤積穀物或購買穀物以待售賣，都被認為合法。內地穀物商人所曾享受過的貿易自由，總算依據這項法令而完全取得了。

喬治三世第十二年的法令，幾乎廢止了其他一切取締囤積及壟斷的古代法令，但查理二世十五年法令所設的限制，未曾撤廢，因此繼續有效。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兩個極不合理的世俗偏見。

一、這個法令認為，小麥價格漲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而其他各種穀物亦相應漲價，則囤積穀物，很可能有害於人民。但據我們上面所說，似乎很明顯，價格無論怎樣，內地穀物商人的囤積，不致有害於人民，而且，四十八先令雖可視為很高的價格，但在歉歲，這是在剛剛收穫以後常有的價格，那時，新收穫物還不能賣出任何部分，所以就是無智識的人，亦不會認為，新收穫物的任何部分，會被囤積以妨害人民。

二、這個法令認為，在一定價格下，穀物最易為人所壟斷，即最易為人所囤積，不久又在同一市場內出售，以致妨害民衆。但是，如果商人前往某一市場或在某一市場，儘量收購穀物，以備不久在同一市場內再出售，那一定因為依他判斷，這市場不能全季都有象那時候那麼豐足的供給，不久即將漲價。如果他的判斷錯了，價格並不上漲，那他就不僅會失去如此投下的資本的全部利潤，而且因為儲藏穀物，需要費用，必然遭受損失，所以如此投下的資本，亦將損失一部

分。這樣，他自己所受的損害，必比個別民衆所可能受的損害大得多。固然，由於他的囤積，在某一市期，個別民衆可能得不到供給，但在後此的任何市期，他們卻能以和其他市期同樣低廉的價格得到供給。反之，如果他的判斷是對的，那他就不但無害於人民大眾，而且將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使他們早些感到糧食不足的痛苦，這樣就使他們不至於後來猛烈地感到糧食不足的痛苦。要是目前價格低廉，他們不顧季節的實際不足情況，大大消費，那後來一定會猛烈地感到糧食不足的痛苦。如果不足是真實的，那爲人民計，最好把這種痛苦，儘可能平均分配到一年的各月、各星期、各日去。穀物商人的利害關係，使他要研究儘可能準確地來作這一件事。任何其他人士，都沒有這種利害關係，亦沒有這種知識，更沒有這種能力，來準確處理這一件事。所以，這一件最重要商業上的活動，應當全然委託於他。換言之，至少，在國內市場的供給上，穀物貿易應當聽其完全自由。

世人對囤積與壟斷的恐懼，好比他們對妖術的恐懼與疑惑。以妖術而被問罪的可憐人，是無罪的，以囤積壟斷而被問罪的人，同樣也是無罪的。法律取締告發妖術，使人們不能爲着自己的惡意，而以此種想象上的罪名，控告他們的鄰人，似乎消除了獎勵並支持這種恐懼與疑惑的大原因，從而有效地消滅了這種恐懼與疑惑。同樣，恢復內地穀物貿易完全自由的法律，也許可能有效地消滅世人對囤積與壟斷的恐懼。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號法令，雖有各種缺點，但與法典中任何法律比較，對於充足國內市場供給和增進耕作，也許都有更大的作用。內地穀物貿易所曾享受過的自由與保護，全依這項法令取得了。在國內市場的供給及耕作的增進那兩方面，用內地貿易來促進，比用輸入貿易輸出貿易來促進，有效得多。

根據那位論述穀物貿易作者的計算，大不列顛每年平均輸入的各種穀物量與每年平均消費的各種穀物量所持比例，不過一對五百七十。所以，在國內市場供給那一方面，內地貿易的重要性，必五百七十倍於輸入貿易。

根據同一作者計算，大不列顛每年平均輸出的各種穀物量，不過佔年產額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在給本國產物提供市場以獎勵耕作那一方面，內地貿易的重要，亦必三十倍於輸出貿易。

我不大相信政治算術，也不想證明以上二種計算的正確。我所以在這裏引述，不過爲了要說明，在一個最有思慮最有經驗的人看來，穀物的國外貿易，與穀物的國內貿易比較，是怎樣不重要啊。獎勵金設立前那幾年穀價的大低廉，也許有理由，可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查理二世那項法令的作用。因爲，這項法令是在大約二十五年前頒佈的，有充足的時間產生這種結果。

關於其他三種穀物貿易部門，只要幾句話，就足以說明我所必須說的了。

第二，輸入外國穀物供國內消費的貿易，顯然有助於國內市場的直接供給，因而必直接有利於人民大眾。誠然，它會稍稍減低谷物的平均貨幣價格，但不會減低谷物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不會減少穀物所能維持的勞動量。如果輸入隨時都是自由的，我國農業家和鄉紳每年出售穀物所得的貨幣，也許比在大部分時間裏輸入實際上被禁止的現在少。但他們所得的貨幣，將有更高的價值，將可購買更多的其他物品，僱用更多的勞動。他們的真實財富與真實收入，雖表現爲較少的銀量，但不會比現在少；他們所能耕種所願耕種的穀物，亦不會比現在少。反之，由於穀物的貨幣價格跌落而產生的銀的真實價值的騰貴，稍稍減低一切其他商品的貨幣價格，使國內產業在一切外國市場上取得若干利益，因而能鼓勵並增進其國內產業。但國內穀物市場的範圍，必與種穀國的一般產業，或者說，必與生產從而佔有用以與穀物交換的他物的人數，或者說，必與用以與穀物交換的他物的價格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在一切國家，國內市場都是穀物的最近和最方便市場，所以亦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市場。由於穀物平均貨幣價格跌落而產生的銀的真實價值的騰貴，有助於擴大最大和最重要的穀物市場，所以不但不會阻害穀物生產，而且會促進穀物生產。

查理二世第二十二年第十三號法令規定，在國內市場上，小麥價格不超過一夸特五十三先令四使士時，小麥輸入，每夸特須納稅十六先令；在國內市場上，小麥價格不超過一夸特四鎊時，小麥輸入，每夸特須納稅八先令。前一價格，只在一世紀以前非常不足的時候發生過；後一價格，則據我所知，從未發生過。可是，根據這法令，小麥卻要在未漲至後一價格以前，納這樣的重稅；小麥在未漲至前一價格以前所納的稅，等於禁止其輸入。至於限制其他各種穀物輸入的稅率

與關稅，和其價值相比，亦幾乎是同樣的重。而且，後此的法令，又把這種稅加重了。

歉歲，人民由於此種法律的嚴格施行而遭受的痛苦，也許是很大的。但在歉歲，此種法律，往往由於暫時的條例而停止施行，這些條例允許外國穀物在一定的限期內輸入。需要實施這種暫行條例，就充分說明了那一般法律的不適當。

對於輸入的這種限制，雖先於獎勵金的設立，但制定時所本的精神與原則，則與後來制定獎勵金條例的精神與原則完全一樣。但在有獎勵金制度以後，這種或那種輸入限制政策，就無論本身是怎樣有害，亦是必要的。倘若在一夸特小麥價格不及四十八先令或不大超過此數時，外國穀物得自由輸入，或其輸入僅須納小額的稅，那也許就有人為着獎勵金的利益，再把穀物輸出，不但大有損於國家收入，而且以推廣本國產物市場而不是以推廣外國產物市場為目的的制度，也就完全搞亂了。

第三，輸出穀物供外國消費的貿易，當然對國內市場的充足供給，沒有直接的貢獻，但有間接的貢獻。無論此供給通常出自何種來源，或是出自本國生產，或是從外國輸入，除非國內通常所生產的穀物或通常所輸入的穀物，多於通常所消費的穀物，否則國內市場的供給絕不會豐饒。但是，在一般的場合，如果剩餘額不能輸出，那末生產者將僅按國內市場消費需要而生產，無意多生產，輸入者亦將僅按國內市場消費需要而輸入，無意多輸入。似此，供給此種商品的商人們，無日不提心吊膽，恐怕貨物不能售脫，所以市場存貨很少過剩，常是存貨不足。輸出的禁止，限制了國內的改良與耕作，使穀物的供給，不超出本國居民的需要。輸出的自由，卻使國內耕作事業推廣，以供給外國。

查理二世十二年第四號法令規定，在一夸特小麥價格不超過四十先令，而其他各種穀物的價格也與此價格成比例時，穀物輸出不受禁止。查理二世第十五年，又擴大此種自由，即在小麥價格不超過每夸特四十八先令時，允其自由輸出；第二十二年，無論價格是怎樣高，都尤其自由輸出。誠然，在如此輸出時，必須向國王繳納港稅，但因為一切穀物，在關稅表中，評價很低，所以港稅，對小麥僅為一夸特一先令，對燕麥僅為一夸特四便士，對其他各種穀物僅為六便士。設

置獎勵金的威廉和瑪利第一年那個法令公佈以後，在一夸特小麥不超過四十八先令時，事實上已不再徵收這小額的稅。威廉三世第十二年第二十號法令，公然撤銷這小額的稅，無論價格是怎樣高。

這樣，輸出商人的貿易，就不僅受獎勵金的獎勵，而且比內地商人的貿易自由得多。依照上述各法令中的最後一個，無論價格怎樣，穀物都可囤積以待輸出；但除非一夸特價格不超過四十八先令，穀物是不許囤積以待國內售賣的。上面說過，內地商人的利害關係，決不能和人民大眾的利害關係相反。輸出商人的利害關係，卻可能和人民大眾的利害關係相反，事實上有時確是這樣。在本國正愁糧食不足時，鄰國亦患飢饉，那輸出商人的利害關係，或將使他把大量穀物輸往鄰國，大大加重本國糧食不足的災難。此等法令的直接目的，不是充足國內市場的供給，而是在獎勵農業的口實下，儘量提高穀物的貨幣價格，使國內市場上的不足現象延續下去。阻害輸入的結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時，國內市場亦只能仰給於本國的生產。在價格已高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時還獎勵輸出的結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期間，國內市場亦不能享受本國生產物的全部。在有限期間內禁止穀物輸出，並在有限期間內免除穀物輸入稅的暫行法律，英國不得不常常採用，這事實上充分說明它的一般法律的不適當。如果一般法律是適當的，那末為什麼要常常停止施行呢。

設若一切國家都採用輸出輸入自由制度，那末大陸內所分成的各個國家，就會象大國內所分成的各個省一樣。按道理，據經驗，大國內各省間的國內貿易自由，不僅是緩和糧食不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防止飢饉的最好方法；大陸內各國間的輸出輸入貿易自由，也是緩和糧食不足和防止飢饉的最好方法。大陸越廣大，大陸各部分間水運陸運交通越便利，其中任何部分遭受此二種災難的可能性便越小。一國的不足，很容易由另一國的豐足得到救濟。但不幸的是，完全採取此種自由制度的國家，還極少啊。穀物貿易的自由，幾乎在一切地方，都多少受限制；有許多國家，限制穀物貿易的不合理法律，往往加重糧食不足那不可避免的不幸，使成為可怕的飢饉災難。這種國家，對穀物的需要，常是那麼巨大、那麼急切，所以鄰近小國，若同時覺得自己糧食有些不足，要來供給它們，怕就會使自己陷於同樣可怕的災難。因此，一個國家採用了這種最壞的政策，往往會使另一個國家認

爲，採用原來最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危險的、不慎重的行爲。但是，無限制的輸出自由，對大國說，其危險性就小得多，因爲大國的生產大得多，無論輸出穀物量如何，其供給都不會大受影響。在瑞士一州或意大利一小國內，也許有時還需要限制穀物輸出。但在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大國，卻不見得有這樣的必要。而且，不讓農業家隨時把貨物運到最好的市場，顯然是爲了功利的觀念，或國家的某種理由，把正義的一般法則丟開了。立法者這種行爲，除了在迫不得已的場合，是不應該有的，是萬難原諒的。如果真要禁止，那就只有在穀物價格非常高的時候，才應該禁止其輸出。

關於穀物的法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和關於宗教的法律相比擬。對於現世生活的維持，以及對於來世生活的幸福，人民是那麼關心，政府因此必須聽從人民的意見，而且爲了確保公共的安寧，必須建立他們所贊成的制度。也許由於這樣，關於這兩種大事，我們很少看到合理的制度被建立起來。

第四，輸入外國穀物以備再輸出的運送商人的貿易，亦有助於國內市場上供給的豐足。此種貿易的直接目的，雖不是在國內售賣穀物，但運送商人卻往往願意這樣做。而且，即使這樣出售所得的貨幣，比外國市場上所可望獲得的少得多，他亦願意這樣做。因爲，這樣可省免上貨及下貨、運送及保險等費用。以運送貿易爲媒介而成爲他國倉庫堆棧的國家，其居民不常感到缺乏。運送貿易雖可減低國內市場上穀物的平均貨幣價格，但不會因此減少它的真實價值。那隻會稍稍提高銀的真實價值。

在大不列顛，由於外國穀物輸入須納重稅，而其中大部分又不能退還，所以即在一般的場合，運送貿易事實上是受到禁止的；而在異常的場合，當糧食不足使我們通過暫行法律停止徵課這些稅時，輸出總被禁止。因此，實施這一類法律的結果，穀物運送貿易，實際上在一切場合都受到禁止。

所以，建立獎勵金制度的這一類法律，雖一向被人稱讚，實則毫不值得稱讚。英國的改良與繁榮，常被說成是此等法律的結果，其實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原因來說明。英國法律保證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勞動的果實。只要有這種保證，就能使英國繁榮，儘管有了上述以及二十條其他不合理的商業條例。而且，由革命而完成的這種保證，

和獎勵金的設置，幾乎是同時的。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時，各個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個那麼強大的力量，以致沒有任何幫助，亦能單獨地使社會富裕繁榮，而且還能克服無數的頑強障礙，即妨害其作用的人為的愚蠢法律，不過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這種努力的自由，或減少了這種努力的安全。在大不列顛，產業是很安全的；雖不能說完全自由，但與歐洲各國比較，總是一樣自由或者更為自由。

大不列顛最繁榮最進步的時期，是在那些和獎勵金有關的法律實施以後出現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此便說，大不列顛繁榮與進步的原因是那些法律。那也是在舉借國債以後出現的，但舉借國債無疑不是大不列顛繁榮與進步的原因。

與獎勵金有關的這一類法律，和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政策，都傾向於在實施這一類法律的國家內稍稍減低貴金屬的價值。但是，西班牙與葡萄牙也許是最貧乏，而英國卻無疑是歐洲最富的國家。它們境遇上的這種差異，很容易由下述二個原因說明。（一）輸出金銀，在西班牙須納稅，在葡萄牙受禁止，而這種法律的施行，又受嚴厲的監視，所以，這些因素，在這兩個每年有六百萬鎊以上金銀輸入的國家，所產生的降低金銀價值的作用，一定比大不列顛實施穀物條例所產生的降低金銀價值的作用，更直接、更有力。（二）這兩國並無一般的人民自由與安全，來抵消這種不良政策的影響。在那裏，產業既不自由亦不安全，民政制度又是那麼壞，即使其通商條例是賢明的，象大部分其他條例是愚謬的一樣，也夠使它們現在的貧窮狀態，成為恆久的現象。

關於穀物條例，喬治三世第十三年第四十三號法令似乎建立了一種新的體系，那在許多方面，都比舊的好，但在一兩點上，卻也許沒有舊的那麼好。

這個法令規定，中等小麥價格漲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中等黑麥、豌豆或蠶豆的價格漲至三十二先令，大麥的價格漲至二十四先令，燕麥的價格漲至十六先令時，凡供國內消費的輸入，都可免納高的關稅，而代以小額的稅。對小麥，一夸特課稅六便士，其他各種穀物以此為準。這樣，就各種穀物尤其是小麥來說，外國供應品能以比從前低得多的價格供給國內市場。

同一法令又規定，小麥價格漲至一夸特四十先令（先前是四十八先令）時，則小麥輸出的全部獎勵金（五先令）即行停止發給；大麥價格漲至一夸特二十二先令（先前是二十四先令）時，則大麥輸出的全部獎勵金（二先令六便士）即行停止發給；燕麥粉價格漲至一夸特十四先令（先前是十五先令）時，則燕麥粉輸出的全部獎勵金（二先令六便士），即行停止發給。黑麥的獎勵金，由三先令六便士減至三先令；其價格漲至二十八先令（先前是三十二先令）時，獎勵金即停止發給。如果獎勵金象我上面所說是那麼不適當，那末越早停發，數目越減少，越好。

同一法令又規定，在穀物價格最低的場合，要是把輸入的穀物堆在堆棧，同時用兩把鎖（一把是國王的，一把是輸入商人的）鎖住，那就准許為再輸出而免稅輸入穀物。但這種自由，只可在大不列顛二十五個海港內行使。那些全是主要的海港，而其餘大部分海港，也許沒有專為此用的堆棧。

就以上各點說，這項法令，就顯然比舊的法令好。

但這法令又規定，燕麥價格不超過一夸特十四先令時，每輸出一夸特，即可得獎勵金二先令。對於這種穀物的輸出，正象對於豌豆或蠶豆的輸出一樣，以前不曾發給獎勵金。

這法令又規定：小麥價格漲至一夸特四十四先令時，即禁止小麥輸出；黑麥價格漲至一夸特二十八先令時，即禁止黑麥輸出；大麥價格漲至二十二先令時，即禁止大麥輸出；燕麥價格漲至十四先令時，即禁止燕麥輸出。這些價格，都似乎太低了；而且，就以強迫輸出為目的而發給的獎勵金說，在其停止發給的那個價格上，全然禁止輸出，亦似乎不妥當。停止發給獎勵金的價格，應當要低得多才對，不然就應該在高得多的價格上允許穀物輸出。

就以上各點說，這項法令又不如舊的法令。但儘管有這一切論點，我們可用前人批評索倫法律的話，來批評這種法律，就是說，它本身雖不是至善的，但當時的利害關係、偏見和傾向不容許有更好的法律。這也許會給未來的更好法制鋪平道路。

附錄

為要解釋並證明本章關於鱒白魚漁業獎勵金所說的話，我把以下二個報表附在這裏。讀者可信賴它們的正確。

第二個報表，記載自1771年4月5日至1782年4月5日輸入蘇格蘭的外國鹽量和製鹽廠無稅交給漁業的蘇格蘭鹽量，以及這兩者每年平均數。

應該指出，外國鹽每蒲式耳重八十四磅，英國鹽每蒲式耳重五十六磅。

第六章論通商條約

要是某一國家，受條約束縛，只許某一外國某種商品輸入，而禁止其他外國這種商品輸入，或對其他外國某種商品課稅，而對某一外國這種商品免稅，那商業上受惠的國家，至少，它的商人和製造業者，必然會從這種條約取得很大利益。這些商人和製造業者，在這樣寬宏對待他們的國家內，享受了一種獨佔權。這個國家，就成為他們商品的一個更廣闊又更有利的市場。更廣闊，因為其他各國的貨物，不受排斥，就要課更重的稅，因此這個國家的市場容納了比沒有條約時更多的他們的貨物；更有利，因為受惠國商人，在那裏享受了一種獨佔權，因此往往能以比自由競爭場合更好的價格，售去他們的貨物。

這樣的條約，雖可有利於受惠國的商人及製造業者，但必不利於施惠國的商人及製造業者。這樣就把一種有害於他們自己的獨佔權給與某一外國，就須常以比自由競爭場合更昂貴的價格，購買他們所需的外國商品。這個國家用以購買外國商品的那一部分本國產物，必須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因為在兩個物品互相交換時，一個物品的低廉乃是另一個物品昂貴的必然結果，更正確地說，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它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就會因此種條約而減少。但這種減少，不可以說是絕對的損失，卻只是本來可得到的利益的減少。它出售貨物的價格，雖低於無通商條約時所可售得的價格，但售價總不會不及成本，而且，決不會象一些貨他那樣，不領受獎勵金，就不足以補償運送貨物上市所投的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否則，這種貿易，就不能長久繼續。所以，即就施惠國說，經營此種貿易亦是有利，但有利程度不象自由競爭場合那麼大。

有些通商條約，根據與此很不相同的原理，卻認為有利。有時，商業國給某一外國某種商品以有害本國的獨佔權，只因為希望在兩國間的全部貿易上，本國每年所售，能多於每年所購，以致金銀的差額每年都對自己有利。1703年英葡通商條約，就根據這原理而博得非常的讚賞。以下便是這條約的直譯文，僅有三條：

第一條——葡萄牙國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繼人名義，約定在未受法律禁止以前，以後永遠准許英國呢絨及其他毛製品照常輸入葡

萄牙，但以下條所述為條件。

第二條——即英國國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繼人名義，必須以後永遠准許葡萄牙產的葡萄酒輸入英國，無論何時，亦無論英法二王國是和是戰，並無論輸入葡萄酒時所用的桶是一百零五加侖桶、五十二點五加侖桶或其他，都不得在關稅這名義下，亦不得在任何其他名義下，對於此種葡萄酒，直接或間接要求比同量法國葡萄酒所納更多的關稅，並須減除三分之一。如果將來任何時候，上述關稅的減除，竟在任何形式上被侵害，則葡萄牙國王陛下，再禁止英國呢絨及其他毛製品輸入，亦就是正當而合法的。

第三條——兩國全權大使相約負責取得各自國王批准條約，並約定在兩個月內交換批准文件。

這條約規定，葡萄牙國王有義務，要按和英國毛織物禁止輸入以前相同的條件，准許英國毛織物輸入，即不得把禁止以前的稅額提高。但他沒有義務，要以比任何其他國家如法國或荷蘭毛織物輸入條件更好的條件，准許英國毛織物輸入。而英國國王，卻有義務，要以比法國葡萄酒即最能與葡萄牙競爭的葡萄酒輸入條件更好的條件，准許葡萄牙的葡萄酒輸入，就是說比法國葡萄酒少納三分之一的關稅。就這一點說，這條約顯然對葡萄牙有利，而對英國不利了。

但這條約，卻被稱揚為英國商業政策上一種傑作。葡萄牙每年從巴西所得的黃金，比其以鑄幣及器皿形式用於國內貿易的數量還多。把剩餘額鎖在金櫃中，放着不用，未免損失太大了，但在葡萄牙國內，又不能找到有利的市場，所以，儘管禁止輸出，亦必運出以交換在國內有更有利市場的物品。其中，有大部分，每年輸往英國，以交換英國貨物，或間接從英國交換其他歐洲各國貨物。巴勒特說，據說從里斯本到達的週期郵船，每週給英國帶來的黃金，平均在五萬鎊以上。這也許言過其實。果其如此，則一年總計將在二百六十萬鎊以上，比人們認為巴西每年所能提供的數額還要大。

幾年以前，我國商人曾失去葡王好感。有些非經條約規定而由葡王特賜的特權（也許是請求得來的，但結果葡萄牙人卻取得了英王重大的恩惠、防衛與保護），或被侵犯，或被撤回了。於是，通常最稱揚葡萄牙貿易的人亦認為，此種貿易的有利程度，並不象通常所想象的那麼大。他們說，每年輸入的黃金的大部分，甚至幾乎全部，不是

爲着英國利益，而是爲着歐洲其他各國利益；每年從葡萄牙輸入英國的水果與葡萄酒，幾乎抵消了輸往葡萄牙的英國貨物的價值。

即使我們假定，這全部是爲着英國利益，而其總額又比巴勒特所想象的大，仍不能因此便說，這種貿易比輸出品價值等於輸入品價值的其他貿易更有利。

可以認爲，在這全部輸入額中，只有一極小部分是每年用來增加國內器皿或鑄幣的。其餘必送往外國，以交換某些可消費物品，但若這種可消費物品，是直接由英國生產物購買，那就一定比先以英國生產物購買葡萄牙黃金，再以黃金購買這種可消費物品，更有利於英國了。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總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利。而且，要從外國運一定價值的外國貨物到本國市場，前一種貿易所需資本，必比後一種貿易少得多。如果國內產業，僅以較小部分生產適合葡萄牙市場需要的貨物，並以較大部分生產適合其他市場需要的貨物，而英國從此得到它所需要的可消費物品，那就對英國更有利。這樣，英國要獲得它需用的黃金及可消費物品，所使用的資本就比現今少得多。幹是，英國便有一筆節省下來的資本，可用於其他方面，即用來推動更多產業和生產更多年產物。

即使英國完全不與葡萄牙通商，英國在器皿上、鑄幣上或國外貿易上，每年所需的全部黃金，仍不難於獲得。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凡能對黃金支付價值的人，總可在一些地方，取得所需要的黃金。而且，葡萄牙每年剩餘的黃金，仍須輸出，雖不由英國買去，但必由某一其他國家買去，而這一國家又必象今日英國那樣，願以相當價格，把這部分黃金再賣出去。誠然，在購買葡萄牙黃金時，我們是直接購買，而在購買其他各國（除了西班牙）黃金時，我們是間接購買，出價可能略高，但這差額過於微小，不值得政府注意。

據說，我國的黃金，幾乎全部來自葡萄牙。至於我國對其他各國的貿易差額，或是對我國不利，或是對我國無大利。但我們應當記着，我國從某一國輸入了越多的黃金，則從其他各國輸入的黃金自越少。對黃金的有效需求，正象對其他各種商品的有效需求一樣，在任何一國，都有限量。如果我國從某一國輸入這有限量的十分之九，則從其他各國輸入的，就不過是這有限量的十分之一了。而且，每年從某些國家輸入的黃金，越是超過我國在器皿上、鑄幣上所必要的分

量，則向其他各國輸出的黃金，亦必越是增多；近世政策最無意義的目標——貿易差額，對某些國家來說，越是有利於我國，則對其他許多國家來說，就必然越不利於我國。

認為英國無葡萄牙貿易即不能存在的這個可笑的想法，竟使法國和西班牙在上次戰爭快要完結的時候，並沒有藉口受到侮辱或挑釁而就要求葡王驅逐一切英船離開葡萄牙各港，併為防禦英人起見，迎接法國或西班牙守備隊入港。要是葡王接納其姻兄西班牙王所提出的不名譽條件，英國就可免除比喪失葡萄牙貿易要大得多的困難，即可擺脫一個很大的負擔，即支持一個在國防上是那麼無設備的極弱的盟國，以致在另一次戰爭中，英國即使傾全力，恐怕也不能作有效的保衛。對葡萄牙貿易的喪失，無疑會給當時經營此種貿易的商人帶來很大的困難，使他們在一、二年內，不能找到任何其他同樣有利的投資方法，這也許就是英國從這一個引人注目的商業政策所可能招受的困難。

金銀每年大量的輸入，其目的既不是為着制器皿，也不是為着鑄幣，而是為着進行國外貿易。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以這二種金屬作媒介，比以任何其他貨物作媒介更有利。金銀是普遍的商業手段，所以，比任何其他商品，更容易為人接受而換得商品；因為它們體積小價值大，所以，由一地到另一地，來來往往，運輸所費，又比幾乎任何其他商品少，而且，由運輸而減損的價值亦比較小。在一切商品中，沒有一種象金銀那樣便於在某一外國購買而再在其他外國脫售以交換其他商品了。葡萄牙貿易的主要利益，在於使英國各種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為便易。這雖不能說是最大的利益，但無疑是一個相當大的利益。

一國在器皿上及鑄幣上，每年僅需輸入極小量金銀就夠補充，這是十分明顯，可以合理地推定的。我們雖不與葡萄牙直接通商，這小量的金銀，也很容易從其他地方取得。

金匠這一行業，在英國雖很可觀，但每年售出的大部分新器皿，是由舊器皿溶解制成的。所以，我國在器皿上每年所需的補充並不很大，有極小額的年輸入就行了。

就鑄幣說，情況也是這樣。我相信，沒有誰會想象，在最近金幣改鑄以前，那十年間每年八十萬鎊以上的鑄造，有大部分，是每年用

來增加國內一向流通着的貨幣。在鑄幣費用由政府支付的國家，就連鑄幣內含金銀，有充分的標準重量，其價值也決不能比等量未鑄金屬的價值大許多。爲什麼呢，因爲要以一定數量未鑄金銀交換等量金銀鑄幣，只需不怕麻煩到造幣廠去一下，最多等待幾個星期就行了。不過，任何國家流通鑄幣，大部分都有多少磨損，或由於其他原因而低於其標準。在英國，則在最近改鑄以前就更有這種情況，金幣低於標準重量的程度，常在百分之二以上，銀幣低於標準重量的程度，常在百分之八以上。但若四十四幾尼半（包含着十足的標準重量，即一磅金）所能購買的未鑄的金，不比一磅多什麼，那末沒有一磅重的四十四幾尼半，就不能購買一磅重的未鑄的金，而須加上若干，以補不足。所以，金塊的市場流通價格，就不和其造幣廠價格一致，換言之，不是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而大約爲四十七鎊十四先令，有時又大約爲四十八鎊了。但在鑄幣大部分都是這樣低於標準的時候，新從造幣廠出來的四十四幾尼半，不能在市場上購買比其他普通幾尼更多的商品，因爲當它們流入商人金櫃中，與其他貨幣混在一起，就難於辨認，即能辨認，所費亦必多於所值。所以，象其他幾尼一樣，其所值亦不多於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但是，如果傾入熔鍋，用不着有顯著的損失，即可產出標準金一磅，那在任何時候，也可換得金幣或銀幣四十七鎊十四先令乃至四十八鎊，而其效用，卻又無論就那一方面說，也與當初熔解的鑄幣相等。於是，熔化新鑄幣，就顯然有利可圖，而其熔化之速，又非政府所可預防。因此，造幣廠的活動，便有些象潘內洛普的織物了，白晝所織的，晚間又折開了。造幣廠的工作，與其說是逐日增加鑄幣，倒無寧說是補替逐日熔化的最好部分的鑄幣。

假設持金銀到造幣廠鑄造的私人，是自己支付造幣費用，那就象加工所費可增加器皿價值一樣，增加此等金屬的價值。已鑄的金屬，將比未鑄的金屬更有價值。造幣稅，若非過高，則將以稅的全價值，加入金銀條塊之內，因爲，在任何地方，政府都享有專有的造幣特權，沒有什麼鑄幣能以比這低的價值，提供市場。如果課稅過重，換言之，所課的稅，若比鑄造所需勞動與費用的真實價值大得多，那末，金銀條塊與金銀鑄幣間價值巨大的差額，也許會鼓勵國內外私造貨幣者，把大量僞幣注入市場，以致減低官造貨幣的價值。在法國，造幣稅雖爲百分之八，但未曾從此發生了什麼顯著的騷擾。住在本國

的私造貨幣者，及住在外國的他們的代理人或通信人，都到處有遭受危險的可能，這種危險太大了，不值得爲着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的利潤而遭危險。

法國的造幣稅，使鑄幣價值，高於按純金含量比例所應有的程度。於是，1726年1月敕令，二十四克拉純金的造幣廠價格，定爲七百四十利弗九蘇一又十一分之一迪尼厄，合巴黎八盎斯的一馬克。若扣除造幣廠的公差，則法國金幣含有純金二十一又四分之三克拉，及合金二又四分之一克拉。所以，標準金一馬克，只值大約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迪尼厄。但在法國，一馬克標準金鑄爲三十個金路易，每個合二十四利弗，合計七百二十利弗。所以，造幣稅所增加於標準金一馬克的價值的，就是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迪尼厄與七百二十利弗之差了，換言之，增加了四十八利弗十九蘇二迪尼厄的價值。

熔化新鑄幣的利潤，在許多場合，會由於造幣稅而完全喪失，而在一切場合，都會由於造幣稅而減少。此種利潤髮生的由來，往往是通用貨幣應含純金銀量與實含純金銀量二者之差。這差額若小於造幣稅，則熔解新鑄幣，不但無利得，而且有損失。若與造幣稅相等，則無利亦無失。若大於造幣稅，則雖有利可圖，但所得利潤，必少於無造幣稅場合。例如，在最近金幣改鑄以前，鑄造貨幣，倘若須納稅百分之五，則熔解金幣，當受損百分之三；倘若造幣稅爲百分之二，則無利亦無損；倘若造幣稅爲百分之一，則雖可獲得利潤，但只是百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二。在貨幣以個數授受，不以重量接受的地方，造幣稅乃是防止熔解鑄幣及輸出鑄幣的最有效方法。被熔解或被輸出的鑄幣，大都是最好最重的鑄幣，因爲只有這樣纔可圖取最大的利潤。

以免稅方法獎勵鑄造貨幣的法律，最初在查理二世時制訂，但時效有限，以後迭次延長限期，直到1769年，才改訂爲永恆的法律。英格蘭銀行，要以貨幣補充其金櫃，往往不得不持金銀條塊到造幣廠；他們也許認爲，由政府擔負造幣費，比由自己擔負造幣費，對自己更有利益。也許就因爲這大銀行懇求，政府才同意將此法律改訂爲永恆的法律。如果秤金的習慣被廢除——那由於不便，很可能被廢除；如果英國金幣以個數接受，象最近改鑄以前那樣，那末這大銀行，也許會發覺，它在這場合，象在其他場合一樣，大大估錯了它的利害關係。

在最近改鑄以前，英國通用金幣，比其標準重量低百分之二，因無造幣稅，故其價值，亦比應含標準金量的價值低百分之二。所以，在此大銀行購買金塊以備鑄造時，所出價格，必比鑄成後所值多百分之二。假設造幣須課稅百分之二，則通用金幣雖比其標準重量低百分之二，仍必與應含的標準金量，有相等的價值。鑄造的價值，在這場合，抵消了重量的減少。銀行雖然必須支付百分之二的造幣稅，但他們在這全部事務上，所蒙受的損失，亦只是百分之二，和現實的損失完全一樣，不會更多。

如果造幣稅為百分之五，而通用金幣僅比其標準重量低百分之二，則在這場合，銀行將在金塊價格上，得利百分之三；但由於它須支付造幣稅百分之五，所以在這全部事務上，它的損失依然恰好是百分之二。

如果造幣稅僅為百分之一，而通用金幣比其標準重量低百分之二，則在這場合，銀行在金塊價格上，只損失百分之一；但由於它須支付造幣稅百分之一，所以它在這全部事務上的損失，仍象其他一切場合一樣，恰好是百分之二。

如果造幣稅不高不低，而鑄幣同時又包含十足的標準重量，象最近改鑄以來它包含幾乎十足標準重量那樣，那末英格蘭銀行在造幣稅上雖有所失，但在金塊價格上必有所得；在金塊價格上雖有所得，但在造幣稅上必有所失。它在這全部事務上，既無所失，亦無所得，於是，它在這場合，就象在上述其他一切場合一樣，處在和沒有課稅時完全相同的境地。

一種商品的稅，要是適中，不至於獎勵走私，那末以運輸此種商品為業的商人，雖然必須墊付此種賦稅，但因為他可以在商品價格中取回，所以不是真正的納稅者。最後支付這種賦稅的，是最後的購買者，即消費者。但對於貨幣，一切入都是商人。我們購買貨幣都是為了把它再行售賣；就貨幣說，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有最後的購買者或消費者的。所以，在造幣稅是那麼適中，不至於獎勵偽造時，雖然一切人都墊付賦稅，但沒有一個人最後支付這種賦稅，因為一切人都可在提高了的鑄幣價值中，取回各自墊付的數額。

所以，適中的造幣稅，無論如何也不會增加銀行或任何持金銀條塊往造幣廠鑄造的私人費用；沒有這適中的造幣稅，也不至於減少他

們的費用。無論有無造幣稅，如果通用貨幣包含了十足的標準重量，鑄造就不會使任何人破費；如果不及這重量，則鑄造所費，必等於鑄幣應合純金量及其實含純金量之差。

所以，在鑄造費由政府支付時，政府不僅負擔小額費用，而且須損失應得的小額收入，而這種無益的慷慨，又不能使銀行或任何私人得到絲毫利益。

倘若你對銀行理事說，造幣稅的徵課，雖不能給他們以任何利得，卻可保證他們沒有任何損失，他們也許不會聽了這些話，便同意徵收造幣稅。在金幣現狀下，只要繼續以重量接受，他們當然不會因這種改制而得到利益。但若秤衡金幣的習慣一旦被廢除（很可能被廢除），而金幣的質量又低落到最近改鑄以前那樣，那末徵課造幣稅的結果，銀行的利得，或不如說，銀行的節省，也許會極為可觀。把大量金銀條塊送到造幣廠去的銀行，只有英格蘭銀行；每年造幣費的負擔，也全部或幾乎全部落在它身上。如果年年造幣，僅用以彌補鑄幣不可避免的損失與必要的磨損，那就不會常超過五萬鎊，至多亦不過十萬鎊。但若鑄幣低於標準重量，就須在此之外，年年造幣，以補充鑄幣由不斷熔化及輸出而產生的巨大缺額。爲了這個理由，金幣改鑄前那十年或十二年間，每年造幣，平均都在八十五萬鎊以上。但若當時曾徵課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金幣鑄造稅，那即使在當時情況下，也許能有效地阻止鑄幣的輸出與熔解。這樣，銀行每年就不會在要鑄爲八十五萬鎊以上金幣的金塊上損失百分之二點五，換言之，每年不會損失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鎊以上，它所損失的也許還不到這數額的十分之一。

議會把歲入撥作鑄幣的費用，每年不過一萬四千鎊。而所費於政府的真實費用，換言之，造幣廠職員俸給，在普通場合，我相信，不過此額之半數。想節省這樣小的數額，甚或想取得比這大不了多少的另一數額，也許在一些人看來，是大無意義的想法，不值得政府嚴重的注意。但是，要節省那並非不能節省，而且按往事據今例，又似乎每一年都可以節省的一萬八千鎊或二萬鎊，即使對英格蘭銀行那麼大的公司來說，無疑也是一種值得嚴重注意的事體。

上述議論中，有一些放在第一篇論貨幣起源及其效用和論商品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的區別的那幾章內，也許會適當些。但由於獎勵鑄

造的法律，溯源於重商主義的流俗偏見，所以，我覺得，放在這一章，更為合宜。重商主義認為，貨幣是構成一切國家財富的東西，那末，最能與重商主義精神吻合的事情，亦就莫過於獎勵貨幣的生產了。貨幣生產獎勵金，乃是重商主義富國妙策之一。

第七章論殖民地

—第一節論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

歐洲人最初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動機，並沒蒙古希臘羅馬建立殖民地的動機那麼明顯、那麼容易看得出來。

古希臘各邦，各佔有極小的領土；任何一邦人民，增多到本邦領土不易維持的時候，便遣送一部分人民出去，在世界上遼遠的地方，尋找新的住處。他們四周的好戰鄰人，使他們任何一邦，很難在國內大大擴大其領地。多裏安人大都到意大利及西西里去殖民。這兩地，在羅馬建立以前，爲野蠻未開化人民所佔居。伊沃尼亞人及伊沃利亞人（希臘另外兩大部落）大都到小亞細亞及愛琴海各島去殖民。這兩地居民，在當時似與意大利及西西里當時的情況大致相同。母市雖視殖民地爲兒子，常常給與大的恩惠與援助，也得到殖民地的感戴，但卻視殖民地爲已解放的兒子，不要求直接的統治。殖民地自決政體，自定法律，自選官吏，而且以獨立國資格向鄰國宣戰媾和，無需母市的承認或同意。沒有什麼能比樹立這種殖民的動機更明顯、更容易看得出來。

古羅馬，象其他大部分古代共和國一樣，原來是建立在一種土地分配法上，即按一定比例，將所有的公有領地，分配給構成國家的各市民。但人事的變遷，結婚哪，承繼哪，割讓哪，必然會把原來的分配搞亂，常使原來分作許多家族維持手段的土地，歸一個人所有。爲糾正此種弊病——他們也認爲這是一種弊病，他們頒佈了新的法律，限制各市民所佔有的土地量，不得超過五百朱格拉，約合英畝三百五十畝。但這法律，據我所知，雖施行過一兩次，但大都被人忽視或迴避，而財產越來越不平均。大部分市民，是沒有土地的；但按當時風俗人情，無土地即難於維持自由人的獨立。現時，無土地貧民，若稍有資財，可租耕他人土地經營某一種零售業；即使毫無資財，亦可充任農村勞動者或技工。但在古羅馬，豪富人家的土地，都由奴隸耕種；奴隸在監工的監督下工作，監工本身也是奴隸；所以，貧窮自由人，很少有機會成爲農民或農村勞動者。一切商業、製造業，甚至零售業，亦都爲主人的利益而由奴隸經營。主人們的財富、權威與防衛，使一個貧窮的自由人，很難和他們競爭。所以，無土地市民，除

了。在每年選舉時，得到候選人的贈金以外，幾乎沒有別種生計了。當護民官想鼓勵人民反抗豪富時。就叫人民回想古代的土地分配，並說限制那種私產的法律是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人民吵吵鬧鬧地要求土地，但我們自可相信，富豪們是十分決意不把任何部分土地分給他們的。但爲了要給他們相當程度的滿足，富豪們往往提議建立新殖民地。但作爲征服者的羅馬，即在這場合，也沒有必要道送市民到世界各地去尋找出路，如果我可這樣說。它要先知道市民究竟將在什麼地方定居。它大都把意大利被征服各地的土地，指定給與他們。他們在那裏，亦象在共和國領土上一樣，不能建立任何獨立的共和國，至多隻能形成一種自治團體。這種自治團體，雖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權能，但須受母市的統治和懲罰，並遵守母市制定的法律。但這種殖民地的建立，不僅僅在於滿足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因爲一個地方新被征服，當地人民是否服從還屬疑問，常可藉此在當地設置一種守備隊。所以，羅馬殖民地，無論就其性質說或就其建立的動機說，都與希臘殖民地完全不相同。因此，原來用以表示這種建制的字眼，亦有極不相同的意義。拉一丁語colonia表示殖民；反之，希臘語

P128。；。z。則表示離家、離鄉、出門。羅馬殖民地雖在許多點上，與希臘殖民地不同，但建立的動機，卻是同樣明顯同樣容易看得出來的。這兩種制度，都溯源於無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顯著的實利。

歐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起因於必要；樹立的結果，雖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其利益也並不那麼明白顯著。在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誰都不知道這種利益；其建立及其發現的動機，也不是這種利益。而且，直到今日，這種利益的性質、範圍及界限，也還不大爲人所理解。

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間，威尼斯人經營一種極有利的貿易，即販運香料及其他東印度貨物，售給歐洲其他各國。他們大都在埃及購買。埃及當時由高加索軍人統治。高加索軍人是土耳其人的敵人，而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敵人。這種利害關係的一致，加上威尼斯貨幣的援助，使得他們結合起來，這樣就使威尼斯人幾乎享有一種貿易獨佔權。

威尼斯人所得的巨大利潤，誘發了葡萄牙人的貪慾。在十五世紀中，他們努力發現一條海道，通過摩爾人跨沙漠給他們帶來象牙和金沙的那個地方。他們發現了馬德拉羣島、卡內裏羣島、亞速爾羣島、佛德角羣島、幾內亞海岸、盧安果、剛果、安哥拉、本格拉各海岸，最後發現了好望角。他們早就希望分佔威尼斯人有利的貿易；最後那一次發現，為他們開拓了可能分佔的機會。1497年，瓦斯戈·德·加馬，又從里斯本港開航，以四船結成一隊，經過十一個月航行，達到了印度斯坦海岸。一世紀來，以非常的堅毅心，不斷的努力，所進行的那種發現工作，就這樣完成了。

在此若干年之前，歐洲人對葡萄牙未必能成功的計劃，還在疑惑的時候，有個熱那亞舵工，提出更大膽的計劃，要西航達東印度。東印度各國的情況，在當時的歐洲，還是不大清楚的。少數歐洲旅行家，曾誇大這些地方的距離，這也許出自純樸無知，在那些不能計量距離的人看來，原來確是很遠的距離，就顯得無限的遠，也許是藉此誇示他們自己冒險訪問離歐洲很遠的地方的奇蹟。哥倫布很有道理地說，向東走這一路程越遠，那末向西走便越近。他建議走這一條路，因為這條路最近又最穩當。幸而他說服了克斯梯的伊薩伯拉，使她相信他的計劃是可能實現的。於是，他就在1492年8月，即比瓦斯戈·德·加馬從葡萄牙出發的時候大約早五年，從帕羅斯港出航，經過兩三個月的航程，先發現了小巴哈馬羣島，即廬克圓羣島中若干小島，然後發現了聖多明各大島。

但哥倫布這次航海以及以後各次航海所發現的地方，都和他原要訪問的地方不相似。他不曾發現中國和印度的財富、農功與稠密人口，卻在聖多明各以及他曾經到過的新世界一切其他地方，發現一個叢林未墾的地方，僅為裸體窮苦野蠻人所佔據。但他不大願意相信，自己所發現的地方，不是馬哥·孛羅所描寫的一些地方。馬哥·孛羅在歐洲人中，是第一個到過中國和東印度的，至少，把當地情況描寫下來的，他是第一個。於是，哥倫布在發現了聖多明各一座西巴奧山的名字與馬哥·孛羅所提到的西潘各的名字有些相象，便以為那是他早就放在心裏的地方了，雖然明顯的證據證明，不是那地方。他在給裴迪南及伊薩伯拉的信中，把他所發現的那些地方叫做印度。他相信那是馬哥·孛羅所描寫的地方的一端，且與恆河相距不遠，換言之，與亞力

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相距不遠。即使在後來判明瞭那些是兩個不同地方以後，他還以為，那些富庶國家離此不遠。所以，他在後來的一次航行中還沿着火地島海岸，向達裏安地峽航行，來探尋那些國家。

由於哥倫布這一錯誤，那些不幸的國家，從那時以來，一直叫做印度。最後發現了新印度與老印度完全不相同，才把前者叫做西印度，後者叫做東印度，以示區別。然而，不論所發現的是什麼樣的地方，在哥倫布看來重要的是，得向西班牙宮廷陳述他所發現的是極為重要的地方。在各國，構成真實財富的，都是土地上生產的動植物，而那裏當時生產的動植物，沒有什麼可證明他的陳述是正確的。

科裏是介在鼠與兔之間的一種動物，布豐認為，它和巴西的阿帕里亞是同類的動物。它在當時是聖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獸，這動物似乎從來就不很多，據說西班牙人的犬與貓，老早幾乎吃掉了這種動物以及軀體比這還要小的其他動物。然而，此等動物，以及所謂伊文諾或伊關諾的那一類大蜥蜴，便是當地所能提供的最主要的動物性食物了。

居民的植物性食物，雖由於農業不發達，並不豐饒，但不象動物性食物那麼稀少。其中，主要為玉米、芋、薯、香蕉等等。那些食物都是歐洲所不知道的，但不為歐洲人所十分重視，他們並不認為那些植物和歐洲原來生產的一般谷豆有同等的營養力。

誠然，棉花是一種極重要製造業的材料，而在當時歐洲人看來，亦就是那些島上最有價值的植物性產物了。雖然在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地都極重視東印度的軟棉布及其他棉織品，但歐洲各地都沒有棉織製造業，所以，即使這種生產物，在當時歐洲人看來，亦不很重要。

哥倫布看到新發現各地方的動植物，都不足證明這些地方是怎樣重要，就轉移眼光到礦物上來。他以為，礦物界生產的豐富，足夠補償動植物界生產的微薄。他看到那裏居民的服裝上掛着小片的金，並聽他們說，那金片常可從山上下流的溪流或急流中發現，於是他便十分相信，那裏的山必有最豐饒的金礦。這樣，聖多明各就被說成為金礦豐饒的國家，並因此故（不僅根據現今的偏見而且根據當時的偏見），被說成為西班牙國王及其國家取之不盡的真實財富的源泉。哥倫布第一次航海回國時，被按凱旋儀式，引見克斯梯及亞拉岡國王，當時所發現的各國主要生產物，都由隆重的儀仗隊帶在他前面。但有

價值的部分只是金小發帶、金腕環及其他各種金飾品，和幾捆棉花。其餘都是俗人驚異和珍奇的物品，譬如，幾株極大的蘆葦，幾隻羽毛極美的鳥，幾隻大鱷魚、大海牛的剝皮。但在這一切之前，有六七個顏色和相貌奇怪的土人，卻大大增加了這次展覽的新奇。

哥倫布陳述的結果，克斯梯的樞密院，決定佔領這些國家。它們的人民，當然沒有抵抗能力。傳佈基督教這個敬神的目的，使這種非正義的計劃，成為神聖的事業。但此種計劃的唯一動機，卻是希望發現此等地方的金寶藏。而且為了要突出此種動機，哥倫布提議那裏所發現的金的一半，應歸國王。這種提議，亦為樞密院所採納了。

最初冒險家輸入歐洲的黃金，全部或極大部分是由極容易的方法取得，即向無抵抗的土人劫掠而得，所以，要納這樣的重稅，也不會很困難。但土人所有，一旦完全被剝奪盡了——事實上，在聖多明各及哥倫布所發現的一切其他地方，不到六年或八年，就完全被剝奪盡了——要再發現一些，就必須從礦中掘出，就不能再納這樣的稅。據說，這種稅嚴格的徵收，曾使聖多明各的礦山，從那時起，完全停止開採。所以不久金稅就減至金礦總生產額的三分之一，再減至五分之一，再減至十分之一，最後減至二十分之一。銀稅在長期間內為總生產額的五分之一。直到現世紀，才減至十分之一。但最初的冒險家，對銀似乎不大關心，他們認為，比金低賤的東西都不值得他們注意。

繼哥倫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險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動機。使奧伊達、尼克薩、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爾博到達裏安地峽，使科特茲到墨西哥，使亞爾馬格羅和皮查羅到智利和祕魯的，都是對於黃金的強烈慾望。當這班冒險家到達一個未曾被發現的海岸時，首先調查的就是那裏有沒有金礦可以發現。他們就依此決定他們的去留。

在一切費用浩大、成就不確定並使大部分從事者破產的計劃中，也許再沒有比探索新金銀礦山更容易使人破產的了。這也許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得彩者的利得，最不能補償失彩者的損失。因為，有獎的票很少，無獎的票很多，但每一張票的普通價格，卻是一個極有錢的人的全部財產。開礦的計劃，不僅不能補償開礦的資本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而且大都把資本和利潤吞併掉。因此，這種計劃是希望增加本國資本的精明的立法者所最不願意給予特別鼓勵，或以人

爲的方法使大部分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其中的那種計劃。其實，這就是人們對於自身的幸運所懷抱的那種不合理的信念，認爲只要有絲毫成功的可能就會有很大一部分資本自行流入此種用途。

憑冷靜理智與經驗作出的判斷，都認爲此等計劃是絕對不可以實行的，但由人類貪慾作出的判斷，卻認爲此等計劃是完全可以實行的。使許多人有了點金石那種荒唐觀念的慾望，又使許多其他人有了金銀礦山無限豐饒那種荒唐觀念。他們沒考慮到，就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說，此等金屬的價值，主要出於其稀少性，而其稀少性，又由於自然藏量很少，而且那少量金屬，包有堅硬和難於處理的物質，以致挖掘並獲取此等金屬所需要的勞動與費用，極其浩大。他們以爲，此等金屬的礦脈，在許多地方，簡直象鉛、銅、錫、鐵的礦脈那樣，大而且豐。華爾特·羅利夫爵士所作的黃金國的夢，充分證明了，即使有智之士，亦不免有此種奇異的幻想。而在這位偉人死了之後一百餘年，還有耶穌教會會員加米拉相信這個黃金國的存在，而且極其熱烈地，我敢說，還是極其真摯地說，如果他能對那些能夠以優厚報酬酬答傳道工作的人，宣傳福音，真是不勝榮幸。

在西班牙人最初發現的那些國家裏，現在看來，沒有一個值得開採的金銀礦山。最初各冒險家所發現的金屬的量，以及第一次發現以後人們所採掘的各礦山的產出力，都被大大誇大了。但冒險家的報導，足夠喚起他們本國人的貪慾。每一個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發現一個黃金國。命運的女神，在這場合，象在其他極少數場合一樣，光臨了，使虔信者的狂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而且在墨西哥和祕魯被發現與被征服的時候（一在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大約三十年之後，一在大約四十年之後），他們可以說從命運女神手上得到了他們所尋找的豐饒的貴金屬。

一個與東印度通商的計劃，幹是引起了西印度的第一次發現，一個征服的計劃，又引起了西班牙人在這些新發現的國家裏的一切設施。然而使他們去征服的動機，卻又是發現金銀礦山的計劃。這計劃，又由於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居然出乎企劃人合理的期望，大爲成功了。

歐洲其他各國最初企圖到美洲去殖民的冒險家，也是受同樣的妄想的驅使，但他們並不怎麼成功。巴西自第一次殖民以來，經過百餘

年，才發現金、銀和金剛石礦山。在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等國的殖民地中，卻是至今還沒有發現過貴金屬礦山，至少還沒有發現在今日看來有開採價值的礦山。但英國最初在北美殖民的人，為誘使國王給與他們特許狀，都以所發現的金銀五分之一獻於國王。華爾特·羅利夫爵士的特許狀，倫敦公司及普里木斯公司的特許狀，普里木斯參議會的特許狀等等，其發給都以把所得金銀五分之一獻給國王為條件。此等最初殖民者，希望發現金銀礦山，又希望發現到東印度去的西北通路，但對兩者都失望了。

第二節論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

文明國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蕪，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對新來的殖民者讓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類社會富強得更快。

此等殖民者隨身帶來的關於農業和有用技術的知識，自比未開化野蠻人幾百年、幾千年自發地成長的知識強。同時，此等殖民者，又隨身帶來了統治人的習慣，關於正常政府的觀念，維持政府的法制的觀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觀念。他們自然要把這些在新殖民地建立起來。但在未開化野蠻民族中，在保護自身所必需的法律與政府已經確立之後，法律與政府的自然進步就比技術的自然進步還要慢。每個殖民者所得的土地，都多於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無須支付地租，大都不納稅。沒有地主分享他們的收穫，君王所分掉的通常都很少。他自會使生產物增加，因為這生產物幾乎全是他自己的。但他所有的土地往往是那麼廣闊，以致盡他一己的勞動，以及他所能僱用的他人的勞動，也不能使土地生產出它所能生產的數量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極想從各地蒐集勞動者，並以最優厚的工資來作報酬。但此等優厚的工資，加上土地的豐饒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勞動者要離開他，自作地主，以優厚的工資，報酬其他勞動者。正如他們離開他們的主人一樣，這些其他勞動者不久也離開他們。優厚的報酬，獎勵了結婚。兒童們，在幼年期中得到很好的給養，受到很好的照顧，到長大時，他們勞動的價值，大大超過其撫養費。到成年時，勞動的高價格與土地的低價格，又使他們能夠自立，象他們的祖先那樣。

在其他國家，地租和利潤吃掉工資，兩個上層階級壓迫下層階級。但在新殖民地，兩個上層階級的利害關係，使得他們不得不更寬宏地更人道地對待下層階級；至少，在那裏，下層階級不處在奴隸狀

況。生產力極大的荒地，只須付出很小代價就可獲得。身兼企業家的地主，希望從改善耕作增加其收入，這種增加的收入，便是他的利潤。在這情況下，利潤一般極為豐厚。但這種豐厚的利潤，除非僱用他人的勞動來開墾土地耕作土地，就無法取得。在新殖民地地上，土地面積的大與人口之少，其間的不相稱現象使他難於取得這種勞動。所以，他不計較工資，願在任何價格下僱用勞動。勞動工資的高昂，鼓勵了人口的增殖。良好土地的豐饒與低廉，又鼓勵了耕作的改善，使地主能支付這樣高的工資。土地的全部價格，幾乎由此種工資構成。作為勞動的工資，雖覺其高，但作為有那麼大價值的東西的價格，則又覺其低。獎勵人口和耕作的增進的，又獎勵真實財富與強大的增進。

許多古希臘殖民地，因此似乎非常迅速地進於富強。在一世紀或二世紀中，就有一些能與母市抗衡，甚至超過母市了。西西里的塞拉庫西及阿格里琴託，意大利的塔倫圖及洛克裏，小亞細亞的埃弗塞斯和密理圖斯，無論就哪一點說，也至少可與古希臘的任一都市相抗衡。建設雖較晚，但一切學藝、哲學、詩學及修詞學，卻和母國任何部分發生得一樣早，進展水平一樣高。值得指出，兩個最右的希臘學派，即達理士學派及畢太哥拉學派，並不是建立在古希臘，而是一個建立在亞細亞殖民地，另一個建立在意大利殖民地。這一切殖民地，都建立在未開化野蠻民族所居的地方，那裏，新殖民者容易取得他們的居地。新殖民者有很多良好土地，而且因為他們對母市全然獨立，他們還能按照他們自己認為最有利於他們自己的方式，自由處理他們自己的事物。

羅馬殖民地的歷史，似乎沒有這樣輝煌。確實，其中有些，例如弗洛倫斯，經過許多年代，在母市崩潰之後，發展成為大的國家，但其進步，卻沒有一個是非常迅速的。那些殖民地，都建立在被征服的地方，那裏人口十之八九早已十分稠密。分給新殖民者的土地，大都不很大。而且由於殖民地不能獨立，他們並非經常能按照自己認為的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自由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

就良地很多這一點說，歐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所建立的殖民地，和古希臘殖民地相似，甚至超過古希臘殖民地。就附屬於母國這一點說，它們雖和古羅馬殖民地相似，但因為它們離歐洲很遠，就或多或

少地減低了這種依附的程度。它們的位置，使它們在較小程度上受母國的監視和支配。在它們按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它們的行爲，或由於歐洲不知道，或由於歐洲不瞭解，往往被忽視。有時，歐洲只好容忍，因為離開太遠了，難於管束。所以，就連象西班牙那樣強暴專橫的政府，亦往往因恐全體反亂，把已經發下的對所屬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或修改。這一來，歐洲一切殖民地，在財富上，在人口上，在改良上，都有非常大的進步。

西班牙國王，由於分享金銀，所以從殖民地初設以來，即從殖民地取得若干收入。這種收入，同時使西班牙國王得隴望蜀。因此，西班牙殖民地，從初設時起，就吸引着母國很大的注意，而當時歐洲其他國家，卻在長期間內，不大注意。但前者並不因為有這種注意而較為繁榮，後者亦不因為沒有這種注意而較不繁榮。而且，按土地面積比例說，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與農業改良，不如歐洲其他國家殖民地。但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與農業改良方面的進步，亦是非常迅速、非常巨大的。征服後建立的利瑪市，據烏羅阿所說，在將近三十年前，還不過五萬人。基託原僅系印第安一小村落，然據同一作者說，在他那時，和利瑪市有相同的人口。克麥利·卡勒裏——雖然據說是個冒牌旅行家，但其著作，卻是根據極可靠的報告——就說墨西哥城有居民十萬。所以，無論西班牙各作家是怎樣誇大，這十萬的數目，亦比蒙特祖瑪時代的居民數大五倍以上。這數目，大大超過了英國殖民地三大都市波士頓、紐約和菲拉德爾菲亞的居民數。在墨西哥或祕魯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那裏沒有適當的馱畜。駱馬是唯一的馱畜，其力氣似比一般驢子差得多。他們沒有耕犁。他們不知用鐵。他們沒有鑄幣，亦沒有任何確定的通商媒介。他們的貿易，是物物交換。一種木製的鋤，是他們農業上主要用具。尖石是他們切東西的刀斧。魚骨或他種動物的堅腱，是他們縫東西的針。但這一切，似乎就是他們職業上的主要用具了。在這樣的狀態下，此等帝國，當然不能象現今那樣進步、那麼耕種得好。現今，那裏已有各種歐洲牲畜，已經使用鐵和耕犁，並採用許多歐洲技術了。但一切國家的人口密度，必和其改良及耕作程度相稱。所以，土人自被征服以來，雖橫遭殘殺，但這兩大帝國現在的人口仍比從前多。其人種，自然亦大大改變了。我以為，我們必須承認，西班牙種的西印度人，就許多方面說，都比古印第安人種強。

除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要算是歐洲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了。但由於巴西發現後很久，還沒有找到過金銀礦，所以對國王所能提供的收入也很少，甚或沒有，於是有一段長時期，很不受葡萄牙人的注意。然而，就在這種不注意的情況下，它發展成為強大的殖民地了。在葡萄牙還被西班牙統治時，巴西為荷蘭人所侵襲。巴西原分為十四省，荷蘭人佔有其七。荷蘭人本來要奪取其他七省，但不久葡萄牙恢復獨立，布拉甘查王朝執政。當時作為西班牙敵人的荷蘭人，成為葡萄牙人的朋友，因而葡萄牙人亦成為西班牙的敵人。所以，荷蘭人就同意把巴西其餘未被征服的那七省，留給葡萄牙；葡萄牙人亦同意把巴西已被征服的七省，留給荷蘭人。當時，兩國為良好同盟，自不會因此發生爭執。但荷蘭政府不久即開始壓迫葡萄牙的移民了。這些葡萄牙移民，不滿足於發牢騷，終於拿起武器來對付他們的新主。他們雖未曾得到母國公開的援助，但在母國默許之下，就靠着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把荷蘭人逐出了巴西。鑑於自己不能保有巴西任何部分，荷蘭人情願把巴西全部歸還葡萄牙國王。在這個殖民地內，據說有六十萬以上人民，其中，有葡萄牙人，有葡萄牙人的後裔，有西印度人，有黑白混血種人，有葡萄牙族及巴西族的雜種。沒有一個美洲殖民地，包含這樣多的歐洲血統。

在十五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和在十六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海上兩大海軍國。威尼斯雖與歐洲各地通商，但其艦隊卻幾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因為西班牙人是美洲的最初發現者，他們認為美洲全是他們所有。雖然他們不能阻止大海軍國葡萄牙殖民巴西，但大部分其他歐洲國家，卻是那麼害怕西班牙，都不敢在這大陸建立殖民地。企圖在弗羅裏達殖民的法國人，全被西班牙人殺掉。但自所謂無敵艦隊在十六世紀末葉失敗以後。西班牙的海軍力量也衰敗了，再沒有能力阻止其他歐洲國家殖民了。所以，在十七世紀中，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總之，一切有海港的大國，都想在新大陸上殖民了。

瑞典人在新澤西殖民。那裏，現今仍可發現不少瑞典家族，那充分證明了，這個殖民地，如果能得母國保護，很可能繁榮。但瑞典不重視這殖民地，所以不久就被荷蘭人的紐約殖民地所吞併了。荷蘭人的紐約殖民地，則於1674年被英國人所吞併。

丹麥人在新世界上僅佔有聖托馬斯和聖克羅斯兩個小島。這兩個小殖民地，由一個專營公司統治着。只有這個公司，有權購買殖民者的剩餘生產物，並供他們以所需的外國貨物。所以，在買賣上，這公司不僅有權力壓迫他們，而且有壓迫他們的最強烈的動機。專營的商業公司的統治，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最壞的統治，但它不能阻止此等殖民地的進步，不過使其進步較為遲緩。丹麥前國王諭令解散此公司。從那時起，這兩個殖民地就非常繁榮了。

荷蘭人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來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統治。所以，這些殖民地中，雖有一些，與舊殖民地比較，有很大進步，但與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較，其進步就很慢。蘇里南殖民地，雖很可觀，但還不如其他歐洲國家的大部分蔗田殖民地。現今分成紐約和新澤西二省的諾瓦·伯爾基亞殖民地，即使在荷蘭統治下，不久也可能很可觀。良好土地的豐饒與低廉，是繁榮的有力原因，所以，最不好的政治，也不能完全阻止這因素的有效作用。而且，離母國很遠，移居者正可通過走私，多少避免這公司所享有的妨害他們的獨佔。現今，這公司允許一切荷蘭船隻，在納貨物價值百分之二點五的稅，領得特許狀後與蘇里南通商，但非洲與美洲間的直接貿易——那幾乎全是奴隸買賣——依然為其獨佔。公司專營特權的減少，也許是這殖民地今日能夠那麼繁榮的最大原因。庫拉索亞和尤斯特沙——屬於荷蘭的兩大島——是自由港，各國船舶都能出入。主要就因為有了這種自由，所以這兩島雖是不毛之地，但由於其周圍較好殖民地的海港，僅許一國船舶自由出入，所以能夠那麼繁榮。

法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在前世紀大部分時間和現世紀一部分時間內，亦為一個專營公司所統治。在如此不良的行政下，其進步，與其他殖民地比較，必然是很緩慢的；但在所謂密西西比計劃失敗後，這公司被解散了，這殖民地的進步，也就快得多了。當這殖民地後來被英國佔領的時候，它的人口，比神父查理瓦所述二三十年前的人口，就幾乎增加了一倍。這位耶穌教會會員曾遊歷加拿大全部，當然不想少報其實際人數。

法國在聖多明各的殖民地，系由海盜建立。他們在一段長時期內，不需要法國的保護，亦不承認法國的政權。後來，這批盜匪受了招安，承認了法國的政權，但在一段長時期內仍受着非常寬大的待

遇。在這時期內，這殖民地的人口增殖與技術改進都發展得非常快。那裏雖亦有一個時期受一個專營公司的壓迫，而這種壓迫又無疑曾延遲其進步，但其進步並不因此而停止。此種壓迫一旦解除，其繁榮的速度，又和從前一樣的快。現在，那裏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田殖民地了。其產量，據說比全部英領蔗田殖民地總產量還要大。法國其他蔗田殖民地也大都非常隆盛。

但進步最速的殖民地，要算英國的北美洲殖民地了。

一切新殖民地繁榮的兩大原因，似乎是良好土地很多，和按照自己方式自由處理自己事務。

就前一點說，英國的北美洲殖民地，雖有很多良好土地，但不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不比上次戰爭前法國人的一些殖民地好。但是英國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卻比其他三國任何一國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更有利於土地的改良與耕作。

第一，在英國殖民地上，未開墾地的獨佔雖未完全防止，但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受限制。殖民地法規定，各個地主，都有義務，在限定期間內，改良並耕作所有土地的一定部分，而在不履行義務時，可把此種土地交給任何其他人。這種法律雖執行得不很嚴格，但有相當效果。

第二，在賓夕法尼亞，沒有長男繼承權，土地象動產一樣，平均分配給家中一切兒女。新英格蘭只有三省的法律，和摩西律一樣，允許長子得雙份。在這幾省，雖有時有個別人獨佔過大的土地，但只要經過一兩代，土地又可能充分分割了。在其他英領殖民地，雖然象英國法律一樣，長男繼承權依然存在，但在一切莫領殖民地上，根據自由借地法保有的土地的借用權，使得土地易於割讓，大塊土地的領受人，大都覺得，為自己利益計，不如儘速割讓大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額免役地租。在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上，凡附有勳爵稱號的大地產，其繼承都有所謂長子繼承權。這種大地產，全由一個人繼承，實際上都是限定繼承的，都是不可割讓的。法國殖民地都遵循巴黎風俗習慣，在土地繼承方面，比英國法律更有利於幼小的兒子。但在法國殖民地中，有騎士尊號和領地稱號的貴族保有地，若有任何部分割讓，那末在有限期間內，按照贖買權，得由領地繼承人或家族繼承人贖回。國內一切大所有地，都是這種貴族保有地，那必然妨礙割讓。

但在新殖民地上，未開墾的大地產通過割讓似比通過繼承分割的快得多。我們說過，肥沃土地的豐饒與低廉，是殖民地迅速繁榮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獨佔，事實上破壞了這種豐饒與低廉。此外，未耕地的獨佔，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礙。對社會提供最多和最大價值的生產物的，乃是用來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勞動。在這場合，勞動的生產物，不僅支付它自己的工資，和僱用勞動的資本的利潤，而且支付勞動所耕土地的地租。所以，英國移民的勞動，用來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比其他三國中任何一國多，因此所提供的生產物，就數量說，就價值說，也可能較大。這其他三國的殖民地，都實行土地獨佔，這樣就或多或少地使勞動流入其他用途。

第三，英國移民的勞動，不僅可提供較多和較有價值的生產物，而且因為賦稅適中，這生產物的大部分，屬於他們自己，他們可貯蓄起來，用以推動更大的勞動量。英國移民，對於母國的國防和行政費用，從來沒有什麼貢獻。反之，迄今衛護他們所需的費用，幾乎全部由母國支付。海陸軍費用，大大超過必要的行政費用，所以行政費用，總是很少，一般只包括總督、裁判官及其若干警察官吏的適當薪俸，以及最有用的公共工程的維持費。在現今擾亂事件開始以前，馬薩諸塞的行政設施費，往往僅為一年約一萬八千鎊。新議布什爾及羅得島的行政設施費，各為每年三千五百鎊；康涅狄克四千鎊；紐約及賓夕法尼亞各四千五百鎊；新澤西一千二百鎊；弗吉尼亞及南卡羅利納各八千鎊。諾瓦斯科夏及喬治亞的行政費，一部分由議會每年撥款支付。而諾瓦斯科夏每年僅出殖民地行政費大約七千鎊；喬治亞每年僅出大約二千五百鎊。總之，北美全部的行政設施費，除了馬里蘭及北卡羅利納這兩州無正確記載可稽外，在現今擾亂事件開始以前，所費於僑民的，不過每年六萬四千七百鎊；如此少的費用，可以統治三百萬人，而且統治得很好，那真是永遠值得我們記憶的。政府費用的最重要部分即全部防衛費，不斷由母國負擔。在歡迎新總督及新議會開幕之際，殖民地政府的儀式，雖十分隆重，但不鋪張浪費。他們的教會，也是同樣節儉。他們沒有什一稅。他們為數不多的牧師，靠微薄的薪俸或人民的捐款，維持生活。反之，西班牙及葡萄牙政權，在一定程度上仰給於對殖民地所課的稅。法國雖不曾從其殖民地抽取任何可觀的收入，而徵自殖民地的稅，雖大都用在殖民地，但其行政費，卻與其他兩國一樣，是非常大的，而儀式的費用更大。例如，歡

迎一個祕魯新總督，所費就往往不貲。此等儀式不僅使富裕的移民，要在這樣的場合納稅，而且使他們在一切其他場合都養成一種虛榮浪費的習慣。那不僅是暫時的非常苛酷的稅，而且形成永久而更苛酷的稅，即養成能使私人傾家蕩產的奢侈浪費。此外，在這三國的殖民地中，教會也施行苛政。這些地方都抽什一稅；在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殖民地中，更是雷厲風行。這些殖民地都有很多託鉢和尚的募化，未經政府認可，但被宗教所尊崇，這對貧民是個很大的負擔，他們都受到教導，認為佈施和尚是義務，拒絕佈施是非常大的罪惡。而且，在這三國殖民地內，僧侶都是最大的土地獨佔者。

第四，英國殖民地，在處置其剩餘生產物即自己消費不了的生產物時，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都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擁有更廣闊的市場。各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圖獨佔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並因此故，禁止外國船舶和它們通商，禁止它們從任何外國輸入歐洲貨物。但實施此種獨佔的方法，各國不相同。

有些國家，以其殖民地全部貿易，交給一個專營公司經營。殖民地人民必須向這個公司購買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歐產貨物，並必須把他們剩餘生產物全部賣給這個公司。所以，這個公司的利益，不僅在於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售賣前一種貨物，並以儘可能低的價格購買後一種貨物，而且在於即使後一種貨物價格極低，其購入數量應以能在歐洲市場以極高價格脫售者為限。它的利益，不僅在於在一切場合都降低殖民地剩餘生產物的價值，而且在於在許多場合阻抑其產量的自然增加。要妨礙新殖民地的自然發展，在一切可想象得到的方策中，自以設立公司為最有效。這一方策一直是荷蘭所奉行的政策，雖然荷蘭的公司在本世紀中在許多方面已不行使其獨營權。丹麥的政策，也是如此，直到前一國王即位，才放棄這種政策。法國的政策，有時如此。最近，自1755年以來，歐洲其他一切國家都認為這種政策不合理，把它放棄了，但葡萄牙卻仍奉行此種政策，至少在巴西二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馬倫豪仍實施此種政策。

有些國家，沒有設立這種專營公司，但限制它們殖民地全部貿易，使僅能與母國某特定港通商，除在一定期間准許船隊出航，或准許有特許狀（那大都是給付很高代價領得的）的單船出航外，其他船舶都禁止從此特定港出航。誠然，這種政策，使母國全體居民都能從

事殖民地貿易，只要他們是在適當的港口，在適當的期間，使用適當的船隻進行的就行。但投資裝備船隻並領受此等特許證的商人，爲着利益，將合作起來，所以這樣經營的貿易，必然是按照大體上類似專營公司的經營原則經營的。這種商人的利潤，和專營公司的利潤幾乎是同樣的高。殖民地決不能得到良好供給；它們不得不以極高的價格購買，而以極低的價格售賣。這是西班牙的政策，一直到前幾年爲止；一切歐產貨物的價格，據說，在西屬西印度都很高。烏羅阿告訴我們，在基託，一磅鐵賣價大約四先令六便士，一磅鋼售價大約六先令九便士。但殖民地售賣自己產物，主要是爲了要購買歐洲產物。對於後者，他們付價越大，對於前者，他們實得價格就越小。後者的高價與前者的低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這一點說，葡萄牙對於派南布科及馬倫豪二省以外的殖民地所採取的政策，和西班牙苦時的政策，完全一樣，而對於那二省，最近則變本加厲。

有些國家，允許它們全體人民經營殖民地貿易。母國人民，得從母國任何港口，與殖民地通商，除了海關的一般證件外，不需要任何特許狀。在這場合，經商者人數衆多，而且散居各地，不能共同結合，他們彼此間的競爭，使得他們不能榨取非常高的利潤。在這樣寬大的政策下，殖民地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售賣他們自己的生產物，購買歐洲的商品了。自從普里木斯公司解散以來（那時我國殖民地還在搖籃時期），這始終已經是英國的政策了。一般說來，這也是法國的政策，而自從英國人通常所稱的密西西比公司解散以來，法國的政策，就一律如此。所以，英法兩國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利潤並不是非常高的，不過要是准許其他各國自由競爭，利潤也許還要低些。這兩國大部分殖民地的歐產商品價格，因此不算異常的高。

在英國殖民地剩餘生產品輸出方面，亦只有一定種類商品，限定輸到母國市場。此等商品，因曾列舉在航海法及此後頒佈的其他法令上，故名爲列舉商品，其餘稱爲非列舉商品，可直接輸到他國，但運輸的船，須爲英國船或殖民地船。此種船隻，須爲英國人所有，其船員亦須有四分之三爲英國人。

美洲及西印度有幾種極重要產物，亦包含在非列舉商品中，例如各種穀物、木材、醃製食品、魚類、砂糖及甜酒。

穀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耕種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對象。法律准許殖民地有極廣闊的穀物市場，這樣就獎勵它們推廣這種耕作，使其產品大大超過稀少人口的消費，從而，預先為不斷增加的人口，儲存着豐富的生活資料。

在樹木滿地的地方，木材價值低廉，甚至沒有價值，於是開拓土地的費用，就成為改良的主要障礙了。法律准許殖民地有極廣闊的木材市場，使得本來價值低廉的商品，生出一個價格，並使它們能夠從本來是完全耗費的事業，收得若干利潤，這樣改良就變得容易了。

在人口還沒稠密，耕作也還沒充分發展的地方，牲畜的繁殖，自會多於當地居民的消費，因此牲畜往往價值低廉，乃至沒有價值。但我們說過，牲畜的價格與穀物的價格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一國的大部分土地才能夠進行改良。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廣闊的市場，想以此來提高這種商品的價值，因為這種商品價格的上漲，對於土地改良是非常重要的。喬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號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為列舉商品，減低了美洲牲畜的價值。上述自由的良好影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這個法令所抵消了。

通過擴展殖民地漁業來增加我國航運業和海軍的力量，似乎是我國議會經常懷抱着的一個目的。因此，這種漁業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給予的一切獎勵，大大繁榮起來。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漁業，在最近的變亂之前，也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漁業之一。捕鯨業，在英國雖有異常的獎勵金，但成績不大，在一般人看來（但我不想作這種意見的證人），它的生產物全部，比每年所付獎勵金的價值，也多不了許多。而在新英格蘭，雖無獎勵金，卻在大規模經營。魚是北美洲與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沿岸各國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砂糖本來也是隻許輸到英國的列舉商品。但1731年，經甘蔗栽種者陳請，砂糖輸出始準擴展到世界各地。但在允許此種自由時，附有各種限制，而砂糖價格在英國又特高，故這自由沒產生大的作用。英國及其殖民地，依然幾乎是英國蔗糖殖民地所產砂糖的唯一市場。它們的消費量增加得很快，雖有牙買加和被割讓各島日益增加的改良，砂糖的輸入在這二十年內仍大有增加，而輸到外國去的，卻據說並不比從前多了許多。

甜酒是美洲與非洲沿岸通商的極重要商品，而從這種通商帶回來的，就是黑奴。

如果美洲各種穀物、醃製食品和魚類的全部剩餘生產物，都定為列舉商品，強迫輸入英國市場，那就過分妨害我們本國人民的勞動生產物了。此等重要商品所以不但不曾定為列舉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穀物及醃製食品，在一般情況下，都被法律禁止輸入英國，那也許並非為了關心美洲的利益，而是為了防止這種過大的妨害。

非列舉商品，原來可輸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及稻米，曾一度定為列舉商品，此後即定為非列舉商品，但准許輸往的歐洲市場，仍限於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各國。依照喬治三世第六年第五十二號法令，一切非列舉商品，都受同樣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各國，都不是製造業國。所以我們比較不擔心殖民地船，從它們那裏把那些能妨害我們本國製造品的東西帶來。

列舉商品，有二類。第一類，是美洲特有的產物，或是母國所不能生產的產物，至少亦是母國所不生產的產物。屬於這一類的，如蜜糖、咖啡、椰子果、菸草、紅胡椒、生薑、鯨鬚、生絲、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種毛皮、靛青、黃佛提樹及其他各種染色樹木。第二類，非美洲所特有的產物，母國也能夠生產，但其產量不足供應其需要，以致有大部分要仰給於外國。屬於這一類的，如一切海軍用品，船桅、帆桁、牙樁、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鐵、鐵條、銅礦、生皮、皮革、鍋罐、珍珠灰。第一類商品最大量的輸入，亦不能妨礙母國任何生產物的生產與銷售。我們的商人，不僅要想限制這種商品，使僅能輸到本國市場，並由這種限制，使自己能夠在殖民地廉價購買，在國內以較好的利潤售賣，而且要想在殖民地與外國之間，設立一種有利的運送貿易，那必須以英國為中心，就是說，此等商品輸入歐洲，必須先輸到英國。第二類商品的輸入，據說，也須妥為安排，使不妨礙本國同種產物的售賣，而僅妨害外國輸入品的售賣。因為，課以適當的稅，那種商品總會比前者略為昂貴，但比後者低廉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僅能輸入本國市場，並非要妨礙英國產物，所要妨害的，乃是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英國的那些外國的產物。

禁止殖民地以船桅、帆桁、牙樁、松脂、柏油輸到英國以外的任何國家，自然會降低殖民地木材的價格，因而會增加開拓殖民地土地

的費用，而這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礙。170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規定，除非它的商品由它的船隻裝運，按它自定價格，並按它認為適當的數量運出，否則禁止其輸出，它企圖通過這辦法來擡高其商品到英國去的價格。爲了要對抗這一個令人注意的商業政策，並使英國儘可能不僅不依賴瑞典，而且無須依賴北方任何其他國家，英國對於美洲海軍用品的輸入，發給獎勵金。這種獎勵金，使美洲木材價格擡高到大大超過木材限定輸入國內市場所能減低的程度。因爲這兩個規定是同時頒佈的，其連帶的作用，不是妨礙美洲土地的開拓，而是鼓勵其開拓。

生鐵和鐵條，雖亦爲列舉商品，但從美洲輸入，免納重稅，而從其他各國輸入，卻得納重稅，所以這規則一部分起鼓勵美洲制鐵廠建設的作用，另一部分起妨礙的作用，而鼓勵的作用比妨礙的作用大。沒有一種製造業，能象熔鐵爐那麼需要柴火的消費，或能象熔鐵爐那麼促進樹木遍野的地方的開拓。

這些規定，有些會提高美洲木材的價值，因而促進土地的開拓。但這種趨勢，既不爲立法機關所注意，亦不爲立法機關所理解。其有利效果，雖就這方面說全是偶然的，但並不因此而真實。

英領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間的貿易，無論就列舉商品說或就非列舉商品說，都有最完全的自由。此等殖民地，現在是那麼富庶，所以彼此間，對於彼此所有的產物，都能提供廣大的市場。把這一切殖民地合起來看，那對於彼此的產物，就是一個大的國內市場了。

但英國對其殖民地貿易所採用的寬大政策，大體上限於原料或粗製品的貿易。至於殖民地產物更精緻的加工，英國商人和製造者要自己經營，並請求國會，以高關稅或組對禁止，使這些製造業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例如，從英領殖民地輸入粗製砂糖，每百斤僅納稅六先令四便士，白糖納稅一鎊一先令一便士，單制或複製的精製糖塊，納稅四鎊二先令五又二十分之八便士。在課稅如此苛重時，英國是英領殖民地砂糖輸出的唯一市場，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場。這種高的關稅，起初等於禁止白糖或精製砂糖，使不能供應外國市場，現在又等於禁止製造白糖或精製砂糖，使不能供應那也許可銷其全產量十分之九以上的市場了。因此，法國蔗糖殖民地有很發達的砂糖精製業，但在英國殖民

地上，除供應殖民地本地市場的精製業外，簡直沒有其他砂糖精製業。當格倫納達由法國人佔領時，其他各蔗園，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廠。但一經英國人佔領，這一類製造廠就幾乎全部放棄了。現今（1773年10月）我相信，這島上至多不過有二、三個廠。但是，現今因為海關寬縱，白糖或精製糖，若能從塊狀研成粉末，通常可作為粗砂糖輸入。

英國，一方面允許生鐵和鐵條從美洲無稅輸入（由他國輸入，則不能免稅），以獎勵美洲這種製造業，另一方面卻又絕對禁止在任何英領殖民地上建立制鋼廠及鐵工廠。它甚至不允許其殖民地人民為自身消費而製作這種精製品，卻要他們向它的商人和製造者購買他們所需要的這一類物品。

它又禁止由水運，甚至由車馬陸運，把美洲生產的帽、羊毛和毛織物，從一省運至另一省。這種條例，很有效地使這個殖民地不能為遠地販賣而建立這一類商品的製造業，這樣就使殖民地人民只能經營通常僅供自用或其同省鄰人使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製造業。

禁止人民大眾製造他們所能製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把自己的資財與勞動，投在自己認為最有利的用途上，這顯然是侵犯了最神聖的人權。然而，此種禁令，雖是那麼不公正，但沒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殖民地。土地仍是那麼低廉，勞動仍是那麼昂貴，以致他們仍能以比自己製造更低廉的價格，從母國輸入幾乎一切種類的精製品。所以，即使不禁止他們建立這一類製造業，但在現有改良情況下，他們一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也許就會使他們不願經營這種事業。在他們現有的改良情況下，此等禁令，也許沒拘束他們的勞動，沒使他們的勞動不能投在按自然趨勢要投的用途上。不過這是母國商人和製造者，由於無根據的嫉妒毫無理由地加在他們身上的無禮的奴役標記。但在比較進步的情況下，這種禁令，很可能成為不能容忍的真正的壓迫。

英國把殖民地某幾種極重要產物，限定輸入它的市場，作為補償，它又使殖民地某幾種產物在這市場裏佔有某種優勢，其所用的方法是對由他國輸入的同種產物課以高關稅，而對由殖民地輸入的則給予獎勵金。按前一種方法，它在國內市場裏給予殖民地的砂糖、菸草和鐵以上述好處，按後一種方法，它給予殖民地的生絲、大麻、亞

麻、靛青、海軍用品和建築木材以輸入獎勵金。以獎勵金獎勵殖民地產物輸入的這第二種方法，據我所知，是英國所特有的。第一種方法卻不是這樣。葡萄牙不滿足於僅以高關稅限制菸草從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輸入本國，而乾脆禁止其輸入，違者重罰。

關於歐洲貨物的輸入，英國對於殖民地的處置，也比任何其他國家寬大。

英國對於外貨輸入時所納的稅，準其在再輸出時，退還一部分。那幾乎都是一半，一般是大部分，有時是全部。如果外貨輸入英國時須課極重的稅，而在再輸出時又不許退還任何部分，那就沒有一個獨立的外國會承受這種再輸出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輸出時退還部分的稅，否則重商主義耶麼提倡的運送貿易，便會告終了。

但我們的殖民地，並不是獨立的外國，而英國又取得了以一切歐洲商品供給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權利，英國正可象他國對付殖民地一樣，強制其所屬殖民地，承受這種在輸入母國時課有重稅的商品。但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貨，在輸到我國殖民地時和輸到任何獨立外國時一樣要退稅。不過，1763年喬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號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這種寬大待遇，它規定：“歐洲或東印度的農產品、製造品，從本王國輸到任何英屬美洲殖民地時，稱為舊補助稅的那一種賦稅的任何部分不得退還，但葡萄酒、白洋布、細洋布除外。”在這法律頒佈之前，有許多種外國貨，在殖民地購買比在母國購買價廉；現在，有些貨物仍然如此。

在制定關於殖民地貿易的大部分條例時，都以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商人為主要顧問，那是必須知道的。所以，此等條例，在更大程度上注意這種商人的利益，在較小程度上注意殖民地或母國的利益，那是一點也不足怪的。他們有專營的特權，可以輸運歐洲貨物供應殖民地，又可以購買殖民地不妨害他們國內貿易的那部分剩餘生產物。這種專營的特權，顯然是犧牲殖民地的利益，來顧全商人的利益。他們在把歐洲及東印度大部分貨物再輸到殖民地去的時候，又象再輸到獨立國家去一樣，享有退稅。這種退稅，即按照重商主義的利益觀念，亦是犧牲母國利益，來顧全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於，對運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國貨物，儘可能少納稅，對輸入英國的外國貨物，儘可能收回所墊付的稅。這樣他們就能在殖民地售賣等量貨物，得到較多

利潤，或售賣較大數量貨物，得到同樣多的利潤，因而能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得利。殖民地的利益同樣在於，以儘可能低的價格，取得儘可能多的這一切貨物。但母國的利益，未必總是這樣。退還此等貨物輸入時所納稅的大部分，會影響母國的收入；由於有了這種退稅，外國製造品得以更便易的條件運到殖民地，使得母國製造品在殖民地市場跌價售賣，這就會影響母國的製造業。人們常說，德國亞麻布再輸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稅，大大推遲了英國亞麻布製造業的進步。

但是，關於殖民地貿易，英國的政策，雖和其他各國一樣，受着重商主義精神的支配，但總的說來，不象任何其他國家那麼偏狹、那麼令人難受。

除了對外貿易，英屬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說，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在一切方面，他們的自由，都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樣有個人民代表議會來保證這自由，人民代表議會，獨享有權力課稅以維持殖民地政府。這個議會的權力，超越行政權力，即最卑賤或最可憎惡的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憂懼總督或省內文武官吏對他們的憤怒。殖民地議會，和英國衆議院一樣，未必都是極平等的人民代表機關，但總更具有這種性質。行政機關也許無力收買議會，而且因為行政機關經費由母國支付，亦無收買議會的必要。所以，一般地說，這種議會也許更受選舉人意旨的影響。殖民地參議院，與英國貴族院相當，但不是由世襲的貴族構成。在一些殖民地，例如在新英格蘭的三個殖民地，此等參議院議員，非由政府指派，卻由人民的代表推選。沒有一個英屬殖民地有世襲的貴族。在所有殖民地，象在其他自由國家一樣，老殖民家族的後裔，雖比有同等功績同等財產的暴發戶受到人們更大的尊敬，但亦只更受人們尊敬，並沒有煩擾鄰人的特權。在現今的變亂開始以前，殖民地議會，不僅有立法權，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權。在康涅狄克及羅得島，總督亦由議會選舉。在其他殖民地上，會議規定的賦稅，由會議直接派員出去徵收，徵收員對議會直接負責。所以，人民在英屬殖民地，就比在母國更為平等了。他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其政府，尤其是新英格蘭那三個政府，一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專制政治，卻又在它們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來。此種政治，大都以獨斷權授與一切下級官吏，由於相隔遙遠，此等獨斷權的執行，目比平常還要強暴。我們知道，在一切專制政治之下，首都總比較更有自由。君主自己，不想破壞正義的制度，不想壓迫人民大眾，這對他亦無利。首都為君主所在地，下級官吏有所威懾，但在遠地，人民的怨聲，不容易傳到君主耳裏，下級官吏乃得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但是，歐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總比以前為人所知的最大帝國的最遠省份要遠得多。自有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屬殖民地政府，能給那麼遙遠的省區人民，以完全的保護。法國殖民地的行政，與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殖民地的行政相比，總是較為寬宏溫和。這種較好的政治，和法國民族的性格相稱，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稱，他們政府的性質，與英國相比，雖較為專橫，然與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則比較守法、比較自由。

英國殖民地政策的優越，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進步上表現出來。法國蔗糖殖民地的進步，與英國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進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勝一籌，但英國蔗糖殖民地，卻和英屬北美殖民地幾乎享受同樣的自由政治。不過，法國沒象英國那樣阻礙殖民地精製自產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們政府的特質，使他們對於黑奴，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一切歐洲人殖民地內，甘蔗都由黑奴栽種。生長在歐洲溫帶的人民的體格，據說，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從事挖土勞動。就今日情況說，栽種甘蔗，都是手工勞動。許多人認為，使用錐犁，當大有利。但犁耕的利潤與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牛馬的良好管理，奴隸耕作的利潤與成效，必同樣取決於奴隸的良好管理。我想，一般都承認，法國種植者比英國種植者更擅長於管理奴隸。對奴隸給予些微保護，使不大受主人欺凌的法律，似乎在政治十分專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可能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設有不幸的奴隸法規的國家，地方長官在保護奴隸時，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財產管理。在自由國家，主人或為殖民地議會代表，或為代表的選舉人，所以地方長官，非經充分考慮，不敢干涉他們。地方長官不得不把他們放在眼中，這樣就使他難於保護奴隸了。但在政府十分專制的國家，地方長官常常干涉個人的私有財產管理，要是個人不

依他的意見管理，他也許發出拘票逮捕他們，所以，他要保護奴隸，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會使他這樣做。地方長官的保護，使主人不敢輕視奴隸，因而不得不給予相當的重視，和比較溫和的待遇。溫和的待遇，使奴隸不僅更誠實，而且更聰明，因此變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於自由傭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主人忠實，並照顧主人利益。自由傭人常有的這種德行，奴隸決不會有。在主人有完全自由並不受干涉的國家，奴隸一般受着奴隸的待遇。

我相信，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的政策，都可證明這種議論，即奴隸在專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在古羅馬史上，第一個保護奴隸，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長官，就是皇帝。維迪阿·波利奧，在奧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僅僅犯了一點小過失的地的一個奴隸，截成小塊，投入池中餵魚，皇帝大為憤怒，命令立即將此奴釋放，並把他的其他奴隸同時釋放。在共和政治下，長官不能有充足的權力來保護奴隸，更談不上處罰主人了。

應該指出，用以改良法國殖民地尤其是聖多明各大殖民地的資本，幾乎全部來自此等殖民地逐漸的改良與開墾。那幾乎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勞動的產物，換言之，是由良好經營而逐漸蓄積並用以生產更多產物的那部分產物的價格。但英國蔗糖殖民地改良及開墾的資本，卻有大部分來自英國，並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的生產物。英國蔗糖殖民地繁榮的主要原因，是英國財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如果我可這樣說）此等殖民地。但法國蔗糖殖民地繁榮的全部原因，卻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經營。法國移民，在這一點上，優於英國移民。這個優點，在奴隸的良好管理上最明白地顯現出來了。

以上所述，是歐洲各國對所屬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綱。

所以，關於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後此的繁榮（僅就內政方面說），歐洲政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

支配着最初計劃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動機，似乎是癡想與不義。探求金銀礦山，足見其癡想；貪圖佔有一個由從未損害歐洲人，而且親切殷勤地對待歐洲最初冒險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國家，足見其不義。

後來建立殖民地的冒險家，似乎除了妄想尋覓金銀礦山外，還有其他比較合理比較可稱頌的動機，但就是此等動機，亦不是為歐洲政策增光。

英國的清教徒，因在國內受限制，逃往美洲以求自由，並在新英格蘭建立了四個政府。英國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為不公允，亦逃至美洲，在馬里蘭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則在賓夕法尼亞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猶太人，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財產被剝奪，而且被趕到巴西，他們以身作則地在原為流犯與娼婦居住的殖民地，傳入了某種秩序與產業，並教他們栽種甘蔗。所以，在這些場合，使人民僑居美洲並從事耕作的，並不是歐洲各國政府的智慧與精明，而是它們的亂政與橫暴。

歐洲各國政府，對於建立這種殖民地的一些最重要的計劃和計劃的實現，都沒有一點功績。墨西哥的征服，不是西班牙樞密院的計劃，而是古巴總督的計劃。而使此計劃實現的，乃是大膽冒險家的精神。總督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冒險家，不久就懊悔，遇事加以掣肘，但不能使這計劃失敗。智利及祕魯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陸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此等地方時，除了得到西班牙國王允許並以他的名義，建設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國家的任何獎勵。這班冒險家，都是自己冒危險出費用的。西班牙政府，沒對他們有什麼貢獻。至於英國政府，則對其所屬一些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拓殖，也同樣沒有貢獻。

但在此等殖民地已經建立，而且相當可觀，足以引起母國政府的注意時，母國最初對它們頒佈的一些條例，其目的總在於保證它獨佔此等殖民地的貿易，限制它們的市場，犧牲它們以擴大自己的市場，因此，與其說促進它們的繁榮，倒不如說加以壓抑。不過，歐洲各國施行此種獨佔的方法，並不相同，這就是歐洲各國殖民政策大相逕庭的一點。其中，最好的是英國的方法。但英國的殖民政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不象其他國家的殖民政策那麼偏狹、那麼苛刻罷了。

這樣說來，歐洲政策，究竟在什麼方面有助於美洲各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現在的繁榮呢？在一個方面，只在一個方面，有很大的幫助。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夠完成如此偉大事業，建立如此偉大帝國的人才。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政策，能夠造就這種人才，實際上亦不曾造就此種人才。這些殖民地應當把它們富有積極進取心的建設者所受的教育與他們所以具有偉大眼光歸功於歐洲政策。一些最大

最重要殖民地，就其內政說，亦就只有這一點，應歸功於歐洲的政策。

美洲殖民地從歐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如上述。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所得的利益是怎樣呢？

這些利益可分成二類。第一，作為一個大國，歐洲從此等大事件所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各殖民國從所屬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它們對所屬殖民地都享有統治權。

作為一個大國，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

（一）這大國的享樂用品增加了；（二）這大國的產業增大了。

輸入歐洲的美洲剩餘生產物，給這大陸居民提供了許多種類的商品，要不是由於美洲的發現和拓殖，他們是不可能有這些商品的，其中有的是便利品與有用物品，有的是裝飾品，因此增加了他們的享樂用品。

顯而易見，美洲的發現與拓殖，促進了以下各國的產業：（一）與美洲直接通商的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二）不直接與美洲通商，但以他國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貨物送到美洲的國家，如奧屬法蘭德斯和德國的某幾省。這一切國家，顯然都有比較廣闊的市場，來銷售他們的剩餘生產物，因而必然受到鼓勵來增加剩餘生產物的數量。

這類大事件，對於不曾把自己生產的物品輸出到美洲去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波蘭，是否也產生促進產業的作用，雖沒有那麼明顯，但這類大事件的這個作用，卻是無可懷疑的。美洲生產物，有一部分是在匈牙利和波蘭消費；那裏，對於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菸草，亦有若干需要。這類商品的購買，必須用匈牙利和波蘭產業產物或用若干此等產物購入的東西來購買。美洲的這類商品，乃是新的價值，新的等價物，輸出到匈牙利和波蘭，交換那裏的剩餘生產物。這類商品輸到那裏去，就給那裏的剩餘生產物開闢出一個新的較為廣闊的市場，提高它的價值，因而促進它的數量的增加。所以，那裏的剩餘生產物，雖可能沒有任何部分輸出到美洲，但可輸到其他國家，由其他國家用一部分美洲剩餘生產物來購買。這種貿易原來是由美洲剩餘生產物引起的，有賴於這種貿易，匈牙利和波蘭的剩餘生產物才找到了市場。

這類大事件，對於不曾把物品輸到美洲而且沒從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國家，也可能起增加享樂用品和增進產業的作用。就是這些國家，也可能從那些與美洲通商因而增加了剩餘生產物的國家收到更多的其他商品。這種更多的商品，必然增加它們的享樂用品，所以必然增進其產業。有更多新的等價物呈現在它們面前，來交換它們產業的剩餘生產物了。這樣就給這個剩餘生產物創造了更廣闊的市場，提高它的價值，因而促進它的數量的增加。每年投入歐洲大商場，並通過週轉，每年分配給歐洲各國的商品總量，必由於美洲全部剩餘生產物而增加。這個總量加大了，分歸各國的數量亦會加大，這樣就會增加它們的享樂用品，促進它們的產業。

母國專營的貿易，會減少母國特別是美洲殖民地的享樂用品和產業，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發展。這是使人類大部分事務所賴而推動的大發條之一的活動受到阻抑的一種巨大力量。這種專營貿易使殖民地產物在一切其他國家騰貴起來，這樣就減少殖民地生產物的消費，因而縮減殖民地的產業和一切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因為享樂用品須付較高價格，享樂用品便減少，生產所得的價格較低，生產便減少。這種專營貿易，又使一切其他國家產物在殖民地騰貴起來，這樣也就縮減一切其他國家的產業，並縮減殖民地的享樂用品與產業。這是一個障礙物，某些國家，為了想象上的利益，妨礙了一切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而殖民地所受的妨礙尤大。它不僅儘量排斥所有其他國家，使不能進入某一市場，而且儘量限制殖民地使僅能在某一市場貿易。封閉某一市場而開放其他一切市場，開放某一市場而封閉其他一切市場，這是完全兩回事。但殖民地剩餘生產物是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得以增進享樂用品和產業的源泉，而母國的專營貿易卻能大大損害這富足的源泉。

各殖民國家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亦有二種。（一）各帝國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二）那些據說由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這一非常特異的性質造成的特殊利益。

各帝國從所屬領地得到的一般利益如下：（一）各領地所提供的保衛帝國的兵力；（二）各領地所提供的維持帝國民政的收入。歲馬殖民地，有時同時提供了這兩種利益。希臘殖民地，有時提供兵力，但幾乎不曾提供任何收入。它們幾乎不承認它們應受母市統治。在戰

時，它們通常是母市的同盟，但在平時，它們的人民幾乎不是母市的屬民。

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從來不曾提供任何兵力來保衛母國。它們的兵力，不足以保衛它們自己；在母國加入戰爭時，它們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國要大大分散其兵力，來保護所屬殖民地。所以，在這一點上，一切歐屬殖民地，與其說使母國強大，無寧說使母國削弱，一切都如此，沒有一個例外。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提供了若干收入，以防衛母國或維持母國民政。至於歐洲其他各國，尤其是英國，對殖民地所課的稅，能與平時所付的費用相等，已屬罕見，若要支付戰時殖民地所增加的費用，那就無論如何也是不夠的。所以，這樣的殖民地，對其母國，只是負擔，不是財源。

所以，各母國從此等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後一種利益了，即據說，由具有美洲殖民地這種非常特殊性質的領地造成的利益。大家又認為，這一切特殊利益的唯一泉源乃是專營貿易。

這種專營貿易的結果，那一部分被稱為列舉商品的英屬殖民地剩餘生產物，就只能輸往英國，不能輸往任何其他國家了。後來，其他國家，不得不向英國購買。於是，這類物品，在英國必比在任何其他國家低廉，因此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進英國享樂用品的增加，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進英國產業的增加。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英國在以本國剩餘生產物交換此等列舉商品時，必然得到更好的價格。例如，英國的製造品，與任何其他國家同種製造品比較，能購得更大數量它所屬殖民地的砂糖與菸草。所以，在英國製造品及他國製造品都用以交換英屬殖民地砂糖及菸草時，這種優越的價格，就使英國製造業得到一種獎勵，而其他各國，在這情況下，不能享有這種獎勵。由於殖民地專營貿易減少了，至少是阻抑了，不能經營此種貿易的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所以對於能經營此種貿易的國家，就提供一種顯然比其他國家優越的利益了。

但這種利益，與其說是絕對的利益，無寧說是相對的利益；實施此種專營貿易的國家，享有優越的利益，與其說是由於獎勵本國的產業與生產，使其發展超過貿易自由下自然會有的發展，倒不如說是由於阻抑其他各國的產業與生產。

例如，馬里蘭和弗吉尼亞菸草，就因為英國享有獨佔權，能以較廉的價格輸入英國。至於法國，所需菸草的大部分，通常從英國轉運，所以此等菸草在法國的價格較為昂貴。如果法國及歐洲一切其他國家，都能隨時與馬里蘭和弗吉尼亞自由通商，那末此等殖民地的菸草，就不但能以比今日實際價格低廉的價格輸入一切其他國家，而且能以更低的價格輸入英國。但菸草市場既較往昔廣大得多，其產量或可大大增加，以致栽種菸草的利潤——據說今日還是稍稍越過自然的標準——降落到和栽種穀物的利潤相同的自然水平。菸草價格可降落到，略低於今日的價格。於是，與今日比較，英國及任何其他國家，都能以同量商品，在馬里蘭和弗吉尼亞，購買較大數量的菸草，因而能在那裏，以更好的價格售去它們的商品。所以此種菸草，如果由於豐饒低廉，能增進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或產業，那末在貿易自由的場合，就一定會比今日在這兩方面有更大的成果。在這場合，英國就沒有優於他國的任何利益。它也許要以比今日略低的價格購買其殖民地的菸草，因而以比今日略高的價格，售賣它本國的商品，但與他國比較，它既不能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前者，亦不能以較高的價格售賣後者。它這時也許會得到一種絕對的利益，但一定會失去相對的利益。

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可相信，英國爲了要取得殖民地貿易上這種相對的利益，爲了要實施儘量排斥他國分享殖民地貿易那一種惹人惡感的有害計劃，不僅犧牲了它和一切其他國家本來能從此種貿易取得的絕對利益的一部分，而且使它自己幾乎在一切其他貿易部門上，忍受一種絕對的不利和一種相對的不利。

在英國依據航海條例而獨佔殖民地貿易時，先前投在這種貿易上的外國資本不得不撤除出去。先前經營這貿易的一部分的英國資本，現今要經營這貿易的全部。先前以殖民地所需歐洲產物的一部分供給殖民地的英國資本，現今要以殖民地所需歐洲產物的全部供給殖民地了。但英國資本不能供給這所需的全部，於是由英國資本供給的商品，必然以很高價格在殖民地出售。而且，原先只購買殖民地剩餘生產物一部分的資本，現在又用來購買其全部了。但這樣的資本，決不能依照和原價差不了多少的價格，把這全部買去，因此它所買的物品，又必然是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買的。但在資本的使用方面，商人能

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出售，而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買，其利潤必然是非常的大，必然大大超過其他貿易部門普通利潤的標準。殖民地貿易利潤的優越，必然把其他貿易部門資本的一部分吸引過來。資本這樣的轉移，必然逐漸增加殖民地貿易中資本的競爭，因而必然逐漸減少其他貿易部門中資本的競爭；必然逐漸減低前者的利潤，因而必然逐漸提高後者的利潤，使一切的利潤，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一個新水平，與舊水平不同，而且比舊水平略高。

這雙重的結果——從一切其他貿易吸引資本；提高所有貿易的利潤率，使略高於先前的利潤率——不僅是此種獨佔權知立時所產生的結果，而且是有此種獨佔權以來所繼續產生的結果。

第一，這種獨佔權，不斷地從一切其他貿易吸引資本，使投入殖民地貿易。

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財富雖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其增加，必定沒和殖民地貿易的增加，保持同一的比例。一國的國外貿易，自然按其財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其剩餘生產物又自然按其全生產物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國吞併了幾乎所謂殖民地國外貿易的全部，而其資本，卻沒和殖民地國外貿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斷地從其他貿易部門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裏的資本，並吸取比原先投在那裏的更大的資本，就將無法經營。因此，自從航海條例訂立以來，殖民地貿易不斷增加，而其他許多國外貿易部門，尤其是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卻不斷凋落。我國以供外銷為目的的製造品，不象航海法未訂立以前那樣，適合於鄰近的歐洲市場，或適合於較遠的地中海周圍各國的市場，而卻有較大部分，適合於更遠的殖民地市場，換言之，不適合於有許多競爭者的市場，而適合於享有獨佔權的市場。德克爾爵士及其他作家，研究其他國外貿易部門衰落的原因，說是賦稅過重，課稅方法不當，勞動價格昂貴，奢侈增加等等。其實，殖民地貿易的過度膨大，可以說是這原因的全部。英國的商業資本雖很大，但不是無限的；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資本大大增加，但沒和殖民地貿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斷地從其他貿易部門吸取一部分資本，因而使其他貿易部門在一定程度上衰落，那就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經營這種貿易。

應該指出，不僅在航海條例已使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得以鞏固以前，而且在殖民地貿易尚未盛大以前，英國就已經是個大商業國，其商業資本已經很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大。在克倫威爾當政時期，在對荷戰爭中，其海軍比荷蘭海軍強大。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發的戰爭中，英國海軍的實力至少和荷法二國聯合海軍相等，也許還要強大。這種優越的海軍力量，現今似未增大，至少在荷蘭海軍對荷蘭商業今昔都保持同一比例的場合是這樣。但在這兩次戰爭中，這強大海軍力量，並不歸功於航海條例。第一次戰爭中，這個條例，剛剛擬訂計劃；第二次戰爭爆發前，這個條例雖已制定完成，但時間不久，還不可能產生大的成效，而條例中建立殖民地專營貿易的部分，則尤少成效。與今日比較，那時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貿易，都是不足道的。牙買加島還是一個不適居住的荒島，沒有什麼居民，更沒有什麼耕作。紐約和新澤西為荷蘭佔有；聖克里斯托弗有一半為法國所佔領。安提瓜島、南北卡羅利納、賓夕法尼亞、喬治亞、諾瓦斯科夏還沒殖民。弗吉尼亞、馬里蘭、新英格蘭已經殖民，它們雖是極繁榮的殖民地，但在那時，歐洲或美洲也許沒有一個人能預先料到，即使猜想，那裏的財富、人口和改良後來會有那樣急速的進步。在英國各殖民地中，當時的情形與今日情形相類似的只有巴巴多斯一個島。殖民地貿易（即在航海條例訂立以後若干時間內，英國僅佔有此種貿易的一部分，因為航海條例在訂立幾年以後，才被嚴格執行），決不能在當時成為英國貿易盛大的原因，亦不能在當時成為海軍力量強大的原因。當時支持英國強大海軍力量的貿易，是歐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國的貿易。但英國今日所享有的這種貿易，在當時怕就不夠支持如此強大的海軍力量。如果殖民地日益增長的貿易，任由一切國家自由經營，那末英國所得而佔有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歸於英國——定然是它原先佔有的大貿易的附加部分。獨佔的結果，殖民地貿易增加了，但與其說增加了它原先佔有的貿易，倒不如說引起了貿易方向完全的改變。

第二，這種獨佔權必然會提高英國各種貿易部門的利潤率，使其超過一切國家都可自由與英屬殖民地通商時的自然利潤率。

由於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必然使大部分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殖民地貿易，所以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排斥一切外國資本，

必然減少投在此種貿易上的資本的總量，使少於自由貿易下自然會有的資本量。但由於獨佔會減少這貿易部門中資本的競爭，所以必然會提高這貿易部門的利潤率。由於它減少一切其他貿易部門英國資本的競爭，所以必然提高一切其他貿易部門的英國利潤率。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商業資本，在任一時期的狀況與範圍，不管是怎樣，但在這狀況延續的期間，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必然提高英國普通利潤率，使英國這一貿易部門及一切其他貿易部門的利潤率，高於沒有這種獨佔的場合。如果英國普通利潤率，從航海條例訂立以來，已大大降落——確已大大降落——那末，要是沒有這個條例所建立的獨佔權促其提高，它就一定會落得更低。

但是，什麼使一國違反自然趨勢，提高其普通利潤率，必然使它的各種無獨佔權的貿易蒙受絕對的和相對的不利。

加使它蒙受絕對的不利，因為在此等貿易部門，它的商人如不以比原來更高的價格售賣外國輸入品及本國輸出品，就不能取得這較大的利潤。他們的國家必須貴買貴賣，必須少買少賣，而它的享受和生產必然比它原來所能享受和生產的少。

那使它蒙受相對的不利，因為在此等貿易部門，不蒙受絕對不利的其他國家，和它比較，將處於較前更有利的地位，或處於不象從前那麼不利的地位。於是，其他國家，能因此比它享受更多，生產更多。就是說，那便增大它們的優勢，或減小它們的劣勢。由於提高了它生產物的價格，它使其他國家的商人，能在國外市場上以比它低的價格出賣，因而把它不曾享有獨佔權的那一切貿易部門的商品，從外國市場排除出去。

我國商人常常埋怨說，英國工資高昂，是他們製造品在外國市場賤賣的原因，但關於他們資本利潤的高昂，他們卻三緘其口。他們常常埋怨他人的過分利得，但對他們自己的過分利得，卻默然不發一言。英國資本利潤的高昂，和英國勞動工資的高昂，在許多場合，一樣起了提高英國製造品價格的作用，在若干場合，則前者尤有此種作用。

我們可恰當地說：英國資本，就在這情況下，有一部分，從我國未曾享有獨佔權的各種貿易部門，尤其是歐洲貿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中，被吸引過去，有一部分，被排除出去。

一部分是這樣被吸引過去的，殖民地貿易繼續增大，一年一年總是感到經營殖民地貿易的資本的不足，造成殖民地貿易的高利潤，這種高利潤，把這些貿易部門的資本吸引過去。

一部分資本是這樣被排除出去的，英國建立的高利潤率使其他各國，在英國不享有獨佔權的一切貿易部門中，都處於優勢。這種優勢，把資本從這些貿易部門排除出去。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把一部分原要投在其他貿易部門的英國資本吸引過去，它也使許多在殖民地無獨佔權時不會投在這些部門的外國資本流入這些部門。它使英國資本在這些貿易部門上的競爭減少了，因而使英國的利潤率增高，超過應有水平。反之，它使外國資本的競爭增加，因而使外國的利潤率減低到不應有的水平。這兩種作用，顯然使英國在其他貿易部門蒙受相對的不利。

也許有人說，什麼都沒象殖民地貿易對英國那麼有利，而獨佔迫使較大部分的資本，投入這種貿易，這樣就使這種資本轉到對英國更有利的用途。

對於資本所屬的國家，最有利的資本用途，乃是能夠維持最大生產性勞動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勞動年產物的用途。本書第二篇曾經指出，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與其往返的次數，恰成比例。例如，一千鎊資本，投在一年經常往返一次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所能繼續僱用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等於一千鎊每年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如果一年往返二次或三次，則所能繼續僱用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等於二千鎊或三千鎊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所以，一般地說，對鄰國進行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對遠國進行的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一般地說，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這一點我們亦在第二篇指出了。

但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就其對英國資本用途的影響來說，卻在一切場合，都迫使一部分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而在多數場合，迫使一部分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第一，在一切場合，殖民地貿易的獨佔，都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在一切場合，都迫使一部分資本，從歐洲貿易及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流入更遠的美洲貿易及西印度貿易。美洲貿易及西印度貿易，不僅因為距離較遠，而且因為此等地方情況特殊，往返的次數較少。我們說過，新殖民地總感到資本不足。新殖民地的資本，總是比它們能夠大大有利地用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資本少得多。所以，它們總是不斷需要自己資本以外的資本。為要彌補自己的不足，它們儘可能設法向母國借債，所以它們對於母國總負有債務。但殖民地人民借款的最普通方法，不是立據向母國富人借貸（雖然他們有時也這樣做），卻是儘可能拖欠來往商人，即以歐洲貨物供給他們的商人的款項。他們每年的還款，往往只達欠款的三分之一，有時還不及三分之一。於是，他們的來往商人，墊付給他們的全部資本，很少能夠在三年以內歸還英國，有時甚至不能在四年五年內歸還。但是，五年才往返一次的英國資本一千鎊，其能經常僱用的英國勞動也只及一年往返一次的英國資本一千鎊的五分之一。這樣，這一千鎊資本一年內所能繼續僱用的勞動量，僅等於二百鎊資本一年內所能繼續僱用的勞動量了。美洲移民，以高價購買歐洲的貨物，以高利息購買遠期的期票，以大佣錢調換短期的期票，雖可彌補其來往商人因他付款延期而蒙受的損失，甚或彌補這損失而有餘，但這隻能彌補其來往商人的損失，不能彌補英國的損失。在往返期間相隔很遠的貿易中，商人的利潤可能和在往返期間相隔很近而且往返次數很多的貿易中一樣大，甚或更大；但他居住國的利益，他居住國所能繼續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他居住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必定因此而少得多。與歐洲貿易比較，甚至與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比較，美洲貿易的往返期間相隔更遠，而且更不確定、更不規則，西印度貿易尤甚，我想凡對這些貿易部門略有經驗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

第二，在多數場合，殖民地貿易的獨佔，都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間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不能運送到英國以外任何市場去的列舉商品，有幾種在數量上大過英國的消費額，因此不得不以一部分輸到其他各國。但是，要這樣做，不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流入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那就無法辦到。例如，馬里蘭和弗吉尼亞每年送到英國去的菸草，在九萬六

千桶以上，但英國消費額，據說卻不過一萬四千桶。於是，有八萬二千桶以上的菸草，必須輸出到法國、荷蘭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國去。運這八萬二千桶菸草到英國，再把它輸出到其他國家，並從其他國家挽回貨物或貨幣的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就是投在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而且必須投在這用途上，以售脫這個大的剩餘。如果計算此種資本全部，要多少年才能回到英國，我們必須在對美洲貿易往返期間上，加上對其他各國貿易往返的期間。如若我國投在對美洲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非三年四年不能回到英國，那末投在這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全部資本，就非四年或五年不能回到英國了。與一年往返一次的資本比較，如果前者能夠繼續僱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本國勞動量，那末後者就只能繼續僱用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本國勞動量了。在某幾個輸出港上，外國商人輸出菸草，往往可賒欠。在倫敦港，通常以現錢售賣，通例是現秤現付。所以，在倫敦港，全部迂迴貿易的最後往返期間，僅比美洲貿易的往返期間，多了堆棧停留不賣的期間；但這期間，有時也是夠長的。倘若殖民地菸草不僅僅售給英國市場，那末輸入我國的菸草，也許只不過我國國內所需之數。在這情況下，我國現在以這大量剩餘菸草輸到他國而用售得之款購回的供本國消費的物品，也許就要用本國產業的直接產物或本國若干製造品來購買。現在，我國產業的直接產物或製造品，幾乎全部只供應一個大市場，但若經這種變化，那也許會供應很多較小的市場。英國現在經營一個大的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但若經這種變化，那也許會經營很多小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由於往返頻繁，只需現在經營這一個大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的資本的一部分，也許只需一小部分，即不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夠經營很多小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就可繼續僱用等量的英國勞動，就可同樣維持英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樣，這種貿易的各方面，就需要少得多的資本，就有大量剩餘資本，可用於其他用途，即改良土地，增加製造業，擴張商業，至少也可以與投入這一切用途的其他英國資本相競爭，從而減低這一切用途的利潤率，使英國在這一切用途上，對其他國家，佔有比現今更優越的地位。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也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運送貿易，因而使多少用以維持英國產業的資本，有一部分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產業，有一部分用來維持其他各國的產業。

例如，用這八萬二千桶剩餘菸草每年再輸出而每年購回英國的貨物，並不完全在英國消費。其中，有一部分，例如從德意志和荷蘭購回的麻布，必須運到殖民地去，專供它們消費。但是，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即用以購菸草而以菸草購麻布的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必不能再用來維持英國的產業，而全部被抽出去，一部分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產業，一部分用來維持那些以本國產業產物購買這種菸草的國家的產業。

此外，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迫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這似乎就完全破壞了英國一切產業部 {攔的自然均衡。英國產業，不和多數小的市場相適應，而卻主要和一個大市場相適應。英國的貿易，不在多數小的商業系統進行，而卻主要被引到一個大的商業系統上去。這樣，它的整個工商業系統，亦變得比較不安全了，其政治組織的全部狀態，也變得比較不健康了。英國在現今狀態下，有些象一個不健全的機體，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長得過大，以致容易發生許多危險的疾病，那在各部分發展比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爲地造成的一個大血管過分的膨脹，並迫使過大部分的產業與商業流入這個血管，這樣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滯，就會使全部政治組織陷於最危險的紊亂中。英國人民對於母國與殖民地決裂的恐懼，超過了他們對西班牙無敵艦隊或法國侵襲的恐懼。這種恐懼，無論有沒有道理，卻使一般人，至少使各商人，都覺得應該把印花稅法令廢除。我們大部分商人往往認爲，殖民地市場連續數年完全排斥英國商品，可預見得到，他們的貿易就會完全停止；我國大部分製造業者，也往往認爲，這樣一來，可預見得到，他們的事業就會完全破壞；我國大部分工人，也往往認爲，可預見得到，他們會完全失業。但是，與大陸任何鄰國絕交的可能，雖亦會使此等人民中，有一些預料會停止或中斷其職業，但不會引起那麼普遍的情緒。若干小血管內血液循環停滯，血液很容易流到大血管，不會引起任何危險性疾病。但是，任何大血管的血液要是停滯，其直接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痙攣，半身不遂，乃至死亡。沒有一種製造業，由於獎勵金，或由於國內市場及殖民地市場的獨佔，不自然地過度膨脹，超過自然發展的程度，那末只要稍有停滯或中斷，往往就會意起騷擾與紊亂，使政府驚駭，國會狼狽失措。他們想，我國主要製造業者，如果有許多突然完全停止營業，定會引起很大的紊亂與騷擾。

將來無論什麼時候，要把英國從這種危險中拯救出來，要使英國能夠甚或強制它從這種過大的用途，撤回一部分資本，投在利潤較少的用途上，要逐漸減縮一個產業部門，逐漸增大一切其他產業部門，要一步一步地，把一切產業部門，恢復到自然的、健全的，併為完全自由制度所必然建立、亦僅能由完全自由制度加以保持的比例，唯一的方策，似乎就是適度地、逐漸地放寬那給英國以殖民地貿易獨佔權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為止。立即開放殖民地貿易，使一切國家都可以進來經營，那不僅會引起一些暫時性困難，而且將使現今以勞動與資本經營這種貿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損失。不說別的，單說那輸入八萬二千桶菸草的船隻，突然廢而不用，就會受到重大的損失。這就是重商主義一切法規的不幸結果！這一切法規，不僅給政治組織造成了危險性很大的紊亂，而且這種紊亂，即使不引起（至少在短時間內不引起）更大的紊亂，也往往難於矯正。所以，殖民地貿易應怎樣逐漸公開；什麼限制應首先撤除，什麼限制應最後撤除；完全自由與正義的自然制度應怎樣逐漸恢復，這些問題，留待未來政治家和立法者運用智慧去解決吧。

一年多以來（從1774年12月1日以來），北美洲十二聯邦完全排斥英國商品。在殖民地貿易中喪失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這在一般人想來，定會使英國人痛切地感到損失。幸而發生了五件不曾預見，而且不曾想到的事情，使他們沒有這種感覺。（一）此等殖民地，相約不輸入英國商品，為作好準備，曾把適合於它們市場的一切英國商品全部買盡。（二）西班牙船隊，為着異常的需要，曾在這一年買盡德意志及北歐的許多商品，尤其是亞麻布。那許多商品，甚至在英國市場，亦常和英國製造品競爭。（三）俄羅斯與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市場有了異常的需要。因為，前些時候土耳其在困難當中，而俄羅斯艦隊又在愛琴海巡邏，土耳其市場非常缺乏供應品。（四）在過去若干時間，北歐對於英國製造品的需要，逐年增加。（五）波蘭最近的被瓜分和平定，為這大國開拓了一個市場，使得英國製造品，除有北歐日益增加的需要外，又在這一年，加上了這個市場異常的需要。這五件事情，除第四件外，按性質說都是暫時的偶然的。假設不幸，這十二聯邦長此繼續排斥英國貨物，那麼英國對殖民地貿易中這麼重要的一部分被排斥，仍會惹起一定程度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因為來得漸緩，所以不象突然發生的痛苦那麼難受。同時，英國的勞動與資

本，也能發現新的用途與方向，使此種痛苦，不達到任何顯著的高度。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既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此種貿易，所以在一切場合，使英國資本，由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改投到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在多數場合，使英國資本，由直接的消費品國內貿易，改投到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在一些場合，又使英國資本，由一切消費品國外貿易，改投到運送貿易。總之，在一切場合，都使英國資本，由所僱生產性勞動量較多的方面，改投到所僱生產性勞動量少得多的方面。此外，它使那麼大的部分的英國產業與商業，僅僅適合於一個特殊市場，這樣就使英國產業與商業的全部狀態，比其生產物能適合較多市場の場合更不確定、更不安全。

我們必須細心分別殖民地貿易的影響及殖民地貿易獨佔的影響。前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後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為前者是那麼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貿易被獨佔，而獨佔又是那麼有害，就全體說，殖民地貿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過，設若沒有獨佔，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

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給英國產業的鄰近市場即歐洲市場與地中海沿岸各國市場所不能容納的那一部分產物，開拓了一個雖是很遠但卻很大的市場。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不會使英國從原來運銷鄰近各市場的產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卻會使殖民地不斷提出新等價物來交換英國剩餘生產物，從而獎勵英國不斷增加其剩餘生產物。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傾向於增加英國生產性勞動量，卻不傾向於改變其原先的用途。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得由一切其他國家進入競爭，這樣就使新市場或新行業上的利潤率不會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新市場，用不着從舊市場吸取任何東西，就會創造（要是可以這樣說）一個新生產物來供給自己。而這新化物就會構成一個新資本，來經營新行業，新行業同樣用不着從舊行業吸取一點東西。

反之，殖民地貿易的獨佔，由於排斥其他國家的競爭，從而提高新市場及新行業上的利潤率，勢必從舊市場吸取產物，從舊行業吸取資本。增大殖民地貿易中我國的份額，是這種獨佔公開提出的目的。

如果殖民地貿易中我國所佔的份額，並不比沒有獨佔時多，那就沒有設立這種獨佔的理由。這種貿易的往返，比大部分其他貿易的往返為慢，而時間相隔也較久。要是迫使任何一國過大部分的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必使那裏每年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的總量，每年所生產的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物的總量，比原來的少。這樣就使這國居民的收入，不及自然狀態下的收入，因而減少他們的蓄積能力。那不僅在一切時候，使其資本不能照常僱用那麼大的生產性勞動量，而且使其資本不能照常增加，這樣就使它不能僱用更大的生產性勞動量。

但是，就英國說，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結果，足以抵消獨佔的惡劣結果而有餘，所以，雖有獨佔的害處，象現今進行的此等貿易，不僅有利，而且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貿易所開拓的新市場與新行業，比因獨佔而損失的那一部分舊市場與舊行業大得多。由殖民地貿易而創造（如果可這樣說）的新產業與新資本，在英國所能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比因資本從往返次數較多的貿易部門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產性勞動量來得多。不過，要是家今日進行的那種殖民地貿易，對英國還有利，那不是由於獨佔，而是由於獨佔以外的其他原因。

殖民地貿易所開拓的新市場，與其說是歐洲原生產物的新市場，倒不如說是歐洲製造品的新市場。農業是一切新殖民地的適當業務；因為其土地低廉，故與他處相比，農業顯得更有利。所以，殖民地富有土地原生產物，它們不但不要輸入土地原生產物，而且通常有大量的剩餘輸出。新殖民地的農業，往往從一切其他職業技取工人，或把工人拉住，使其不流入任何其他職業。留給必需品製造業使用的工人已經不多；裝飾品製造業可使用的工人簡直沒有。所以，對於這兩種製造品的大部分，它們都覺得，與其親自制造，不如向他國購買更合算。殖民地貿易對於歐洲農業的鼓勵，主要是間接的，即鼓勵歐洲製造業，從而間接鼓勵歐洲農業。殖民地貿易所維持的歐洲製造業，是歐洲土地生產物的一個新市場。我們說過，最有利的市場，即穀物和牲畜、麪包和家畜肉的國內市場，在這情況下，賴美洲貿易而大大擴張了。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充分證明，富庶殖民地貿易的獨佔，並不能使任何國家建立製造業，甚或不能維持製造業。西葡兩

國，在沒有任何大殖民地時，就是工業國了。但自它們佔有世界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來，便都不是工業國了。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獨佔的惡影響，加上其他原因，也許幾乎把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抵消了。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其他各種獨佔；金銀價值比其他大多數國家低；對輸出品課以不適當的稅，以致不能參加外國市場，對國內各地間貨物的運輸，課以不適當的稅，以致縮小國內市場；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規則與不公平，常常保護有錢有勢的債務人，使能避免受害的債權人的追索，並使國內勞動階級不敢製造貨物來供這班大人先生消費，因為，對於這班大人先生，他們不敢拒絕賒賣，而大款能否歸還，又極不確定。

反之，在英國，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加上其他原因，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獨佔的惡影響。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貿易的一般自由，那裏雖有若干限制，但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至少有相等的自由，也許有更大的自由；輸出自由，本國產業的產物，幾乎無論什麼種類，又幾乎無論輸到什麼國家，都能無稅輸出；更重要的是本國產業的產物，由本國這地運至那地，不須報告任何官廳，不須受任何盤問檢查，換言之，得以享受毫無限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最下級英國人民的權利，為最上級英國人民所尊重，使各個人能保有各自的勞動果實，這樣就對各種產業，給予最大而且最有效的鼓勵。

但是，設若英國製造業由於殖民地貿易而有所進步（事實上確曾如此），那不是靠了對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而是靠着獨佔以外的其他途徑。獨佔的結果，不是增加英國製造品產量，而是改變英國製造品一部分的性質與形式，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再適合於往返頻繁而期間相隔又很短暫的市場，卻適合於往返遲緩而期間相隔又很久的市場。所以，其結果乃是改變一部分英國資本的用途，大大減少這部分資本所能維持的製造業的數量，因此不但沒有增加英國製造業的總量，而且把它減少了。

所以，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象重商主義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樣，阻抑其他一切國家的產業，但主要是殖民地的產業，不但沒有一點增加，反而減少那為着本國利益而設立的產業。

無論母國在特定期間有多少資本，這種獨佔必定會妨礙它的資本，使它不能維持本來能夠維持的那麼大的生產性勞動量，並使它不能給勞動大眾提供本來能夠提供的那麼多的收入。由於資本只能由節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礙資本使不能提供本來能夠提供的那麼多的收入的獨佔，就必然妨礙資本，使不能按本來能夠增加的速度增加起來，因而不能維持更大的生產性勞動量，不能給國內勞動大眾提供更多的收入。一個很大的收入泉源，即勞動的工資，由於有了這種獨佔，必定在各個時候，都不象沒有獨佔的場合那麼富足。

獨佔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因而妨礙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現實生產額和加投資本后土地可能生產額之差。如果這差額所能提供的利潤，比等量資本能從商業取得的利潤大，那末土地改良事業，就從各種商業吸去資本。如果所提供的利潤，小於商業利潤，商業就從土地改良事業吸去資本。所以，凡是提高商業利潤率的措施，就會使土地改良事業高的利潤減低，或使其低的利潤降得更低。在前一場合，使資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後一場合，把資本從這用途吸引出來。獨佔妨礙土地的改良，勢必延遲另一個大的收入原始泉源——土地的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獨佔提高利潤率，勢必提高市場利息率，使其達到不應有的水平。但與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價格，即通常按若干年地租而計算的買價，必隨利息率上升而下降，必隨利息率下降而上升。這樣，獨佔在以下二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即延遲地租的自然增加，並延遲與地租成比例的土地價格的自然增加。

誠然，獨佔提高商業利潤率，因而稍稍增加我國商人的利得。但由於它妨礙資本的自然增加，所以不會增加國內人民從資本利潤率所得收入的總額，而會減少這個總額。大資本的小利潤，通常比小資本的大利潤提供更大的收入。獨佔提高了利潤率，但使利潤總額不能增高到和沒有獨佔的時候一樣。

獨佔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勞動的工資、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不象無獨佔時那麼富足。爲了要促進一個國家一個小階級的利益，獨佔妨害了這個國家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的利益。

只有通過提高普通利潤率，獨佔才能使任何一個階級得利或能夠得利。但是，一般說來，高的利潤率對於國家所必然產生的各種壞影響，除上述外，還有一種更壞的影響；按照經驗，這種壞影響和高的利潤率分不開，而其有害作用，也許比上述各種壞影響合起來的作用還要大。高的利潤率，隨便在什麼地方，都會破壞商人在其他情況下自然會有的節儉性。在利潤很高時，儉樸似乎是多事，而窮奢極侈，似乎更適合於寬裕的境遇。但大商業資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國實業界的領袖和指導者。他們的榜樣對國內全部勤勞民衆生活方式的影響，比任何其他階級的影響大得多。若僱主是小心的、節儉的，工人亦大都會如此；若主人是放浪的、隨便的，那末擁工亦會按主人的榜樣工作，亦會按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這樣，本來最會蓄積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蓄積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不能因這些本來最會使這基金增加的人們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國家的資本不能增加，反而逐漸枯竭。國內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異常的利潤，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資本嗎？他們減輕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貧窮嗎？促進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產業嗎？這兩個商業都市的商人的費用是那麼大，以致異常的利潤不但沒有增加國家的總資本，而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資本。我敢說，外國資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闖進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貿易中去。爲了要把外國資本從自己資本日益不夠經營的這種貿易中驅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強這種不合理的獨佔。試比較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習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習俗，你就會感到，受高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爲與性格，與受低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爲與性格，是怎樣不相同啊。誠然，倫敦的商人，雖不象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樣，一般都成爲堂堂貴族，但與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較，卻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節儉。但是，據說，大部分倫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卻略有遜色。倫敦的利潤率，與前者比較，一般是低得多；與後者比較，一般是高得多。俗語說，“容易來，容易去”。隨便什麼地方，消費的一般情況，與其說受真實消費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說受弄錢花費的難易程度支配。

這樣，獨佔給唯一階級帶來的唯一利益，在許多不同方面妨害國家的一般利益。

僅僅爲了要培育顧客而建立一個大帝國的計劃，乍看起來，似乎僅僅適合於小買賣商人的國家，究其實，那種計劃，對於小買賣商人的國家，也是全不相宜的，但適合於政府受小買賣商人支配的國家。這樣的政治家，也只有這樣的政治家，纔會認爲，用同胞的血與財寶來建設並維持這樣一個帝國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對一個小買賣商人說，你賣給我一塊地皮，我就會常常在你鋪子裏購買衣物，雖然你鋪子裏的賣價比別家鋪子昂貴。他不見得會很踊躍地接受你的提議。但若另一個人賣給你這樣一塊地皮，並吩咐你要在那小買賣商人鋪子裏購買你所需的一切衣物，這小買賣商人對他便會非常感激。有些英國人在國內不能安居，英國給他們在遠地購買了一塊大地皮。誠然，其價格很小，不是今日的普通買價，即三十年年租，而只等於初次發現、踏勘海岸和奪取土地的各種費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廣闊的，耕作者得有大量土地耕作，有時又得自由隨意在任何地方售賣其生產物，所以不過三、四十年（1620—1660年），就變成了一個那麼富庶繁榮的民族。於是，英國的小買賣商人及其他各種商人，都想長此獨佔這些人的光顧。他們不敢說，他們原來用一部分貨幣購買土地，嗣後又用一部分貨幣來改良土地，他們只向國會請願，美洲殖民地人民將來只許向他們的店鋪買賣：（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歐洲產貨物，都得向他們的店鋪購買；（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們認爲適於購買的那些殖民地產物，全數賣給他們的商店。他們並不認爲全部產物都適於購買，因爲其中有若干部分輸入英國可能妨害他們在國內經營的某些商業部門。這若干部分生產物，他們自然希望移民們儘量對外地售賣，愈遠愈好；即因此故，他們提議，把這些生產物的銷售市場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國。這種真正小買賣商人的提議，在有名的航海條例中定爲一個條款了。

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佔。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來維持母國的內政，亦不曾提供任何兵力，來維持母國的國防；其主要利益，據說就是這種專營的貿易。此種獨佔，即是此等殖民地隸屬我國的主要標誌，亦是我國從這種隸屬所得的唯一果實。英國一向用以維持這種隸屬的費用，其實都是用以維持這種獨佔。在現今騷擾事件開始之前。殖民地按平時編制的一艘軍費，爲二十聯隊步兵的給養，炮兵隊及軍需品的費用，和他們所需異常的食品，以及爲警戒無限長的北美海岸及西印度海岸，

並防範其他各國祕密出入船隻而須不斷維持的極大海軍力量的費用。這平時編制的軍費全部，是英國收入上一個負擔，但同時也只是殖民地統治所費於母國的極小部分。如果我們要知道費用全數，我們必須在這平時編制每年軍事費用之外，加上英國在各個時期為防衛殖民地所花費的款項的利息。尤其是上次戰爭的全部費用和這次戰爭以前的那次戰爭的費用大部分必須加上。上次戰爭純然是殖民地戰爭，其全部費用，無論用在什麼地方，用在德意志，或用在東印度，都應算在殖民地賬上。總數在九千萬鎊以上，它不僅包含新債，而且包含每鎊附加一先令的地稅，以及每年動用的減債基金。1739年開始的西班牙戰爭，主要是殖民地戰爭。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殖民地與西班牙本土祕密通商的船舶的搜查。這全部費用，其實等於維持獨佔的獎勵金。其公然提出的目的，雖為獎勵英國製造業、發展英國商業，但其實際結果，卻是提高商業利潤率，使我國商人能以過大部分的資本，轉投到往返較為遲緩而相隔時間較長的貿易部門。如果獎勵金能阻止那兩種事件，使不發生，那也許真值得發給這樣一種獎勵金。

所以，在現今的經營管理下，英國從統治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損失。

建議英國自動放棄它對殖民地的一切統治權，讓它們自己選舉地方長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決定對外措和宣戰，就等於提出一個從來不曾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亦永遠不會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的議案。沒有一個國家自動放棄過任何地方的統治權，儘管這個地方是怎樣難於統治，儘管它所提供的收入與其所費相比是怎樣微小。這種犧牲雖往往符合一國利益，但總會損害一國威信。更重要的也許是，這種犧牲，往往不符合其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因為他們對於許多有責任有利潤的位置的處分權，將從此被剝奪，他們那許多獲取財富與榮譽的機會，亦將從此被剝奪。佔據最動亂不安而對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能取得這種處分權與機會。所以，即使最愛作非非之想的人，也不會認真希望這種建議能被人採納。但若真的被採納，那末英國不僅能立即擺脫掉殖民地平時每年全部軍事費用，而且可與殖民地可立商約，使英國能夠有效地確保自由貿易，那與它今日享受的獨佔權相比，雖對商人不怎麼有利，但對人民大眾必更有利。這樣，殖民地和母國，就象好朋友的分離，那末幾乎為近來的不和所消滅的殖民地對

母國的自然感情，就會很快地恢復。他們不僅會長此尊重和我們分離時所訂定的商約，而且將在戰爭上、貿易上贊助我們，不再作騷擾搗亂的人民，卻將成為我們最忠實、最親切、最寬宏的同盟。古希臘殖民地與其所從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種父母之愛，一方面有一種孝敬之心。我想，我們如果那樣辦，英國與其殖民地間同樣的感情，亦會恢復起來。

一個省份，要有利於其所屬的帝國，則在平時對國家所提供的收入，不僅要足夠支付其平時編制的軍費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來維持帝國總政府。每一個省份，對於帝國總政府的經費的增加，都必須或多或少地有所貢獻。若有任何個別省份，不按比例擔負這種費用，那末帝國一些省份的負擔，就顯得不均。此外，由此類推，對全帝國非常收入的負擔，亦應象平時經常收入一樣，保持同一的比例。英國從殖民地取得的經常收入與非常收入，對於英帝國的全部收入，不曾保持這個比例，那是大家都會承認的。據說，獨佔增加英國人民的私人收入，因而增加他們的納稅能力，這樣就補償殖民地公共收入的不足。但是，我曾說過，這種獨佔，雖對殖民地是一項極苛重的賦稅，雖可增加英國特定階級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人民大眾的收入，而卻減少人民大眾的收入，因此不增加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而卻減少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收入因獨佔而增加了的人，是一個特殊階級，要他們超出其他階級應納的比例完稅，既是絕不可能，亦是最大的失策，這我要在下一篇來說明。所以，從這特殊階級，不能取得特殊收入。

殖民地可由其自己的議會課稅，也可由英國議會課稅。

殖民地的議會，似不可能由母國操縱，使它們能向當地人民徵收足夠的公共收入，以維持一切時期的本地民政和軍政，又按適當比例負擔英帝國總政府的經費。甚至是直接受君主監督的英國國會，也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才被置於這樣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說才使它提供足夠的稅收，以維持本國軍民兩政。君主只由於曾以軍政民政官職大部分及支配此官職的權能大部分，分給國會中個別議員。才取得了對英國國會的這種控制。殖民地議會離君主很遠，數目衆多，分散各處，而組織又多樣，所以，君主即使擁有同樣的控制手段，亦難於如此控制，而且‘他並沒有這種手段。他絕對不能把英帝國總政府的職

位大部分或支配此職位的權能大部分，分給殖民地議會的主要成員，使他們甘冒不韙，向選民課徵，以維持那總政府，這樣總政府的薪俸，幾乎全部都要分配給他們不相

識的人。此外，英國政府又難免不知道各個議會中各個代表的相對地位，徵企圖作這樣的控制時，難免觸犯他們，難免犯了錯誤，這樣就會使這種控制辦法，對殖民地議會全不適用。

而且，殖民地議會，對於全帝國的國防經費及維持費，不可能是適當的判斷者。此等事務，沒委託殖民地議會考慮。這不是他們的任務，他們關於此等事務，亦不能經常得到情報。省議會，象教區委員會一樣，關於所屬地域的事務，能作適當的判斷。但關於全帝國的事務，他們卻無法作適當的判斷。關於本省對全國所持的比例是怎樣，或關於本省與他省的相對重要性和富裕程度，它們甚至不能作適當的判斷，因為其他各省，並不受這省區議會的監督和指揮。全帝國的國防和維持所需要的是什麼，每省所負擔的部分是多少，只有一個議會能作適當的判斷，即監督和指揮全帝國事務的議會。

於是，有人建議，向殖民地派徵賦稅，即各殖民地應納的數額，由英帝國議會決定，而省議會則按各省情況，決定最適宜的抽取方法。這樣，關於全帝國的事務，由監督和指揮全國事務的議會決定。而各殖民地當地的事務，仍可由其自己的議會決定。在這場合，殖民地雖不派代表出席英國議會，但我們可根據經驗來判斷，國會的派徵不至於不合理。對於不派代表出席國會的帝國所屬各地，英國議會從來沒有加以過重的負擔。根西及澤西二島，雖無任何手段抵抗國會權威，但比別省卻納更少的賦稅。國會雖企圖行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徵課的權利（無論有無根據），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們國內同胞應納的正當比例納稅。此外，殖民地納稅，如果要按土地稅的增減而比例增減，那末國會非同時對其自己選民課稅，即不能對殖民地課稅，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可以說實際上在國會裏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辦法同一標準課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而由君主決定各省應納數額，一些省份由君主決定抽收辦法，另一些省份則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這在其他帝國，也不乏先例。法國就有些省份，不僅納稅額由國王決定，而抽收辦法，亦由國王決定。但對另一些省份，他僅僅決定數額，而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依據派徵賦

稅計劃，英國國會對於殖民地會議，和法國國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而且據說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議會，就幾乎處在同樣的地位了。

不過，按照這計劃，雖然殖民地人民無正當理由可憂懼，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負擔比較，會超過適當的比例，但英國卻有正當理由憂懼，殖民地對國家的負擔不會達到這適當的比例。法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的那些省份的統治權已經鞏固，但英國在過去若干時期內，卻沒有確立同樣的統治權。殖民地議會，若不十分樂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否則他們是不大會十分樂意的），仍有許多借口來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派徵。假定說，一次對法戰爭爆發了，必須立即徵收一千萬鎊，來保衛帝國中心地。這個款項，必須由國會以某項基金為擔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貸借。這基金的一部分，國會提議在英國國內課稅抽徵，另一部分則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議會派徵。殖民地議會離戰地遙遠，而且有時認為與這事件無多大關係，而這個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決於殖民地議會的高興，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據這個基金的擔保，而貸借款項呢？由這樣一個基金所貸得的貨幣，也許不會多於英國國內課稅被設想可以償還的數額。這樣，戰時所借債務的全部負擔，就會象往昔一樣，總是落在大不列顛身上，換言之，落在帝國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國的全部。自有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國一國，開疆闢土，只增加其費用，從沒增加它的資源。其他國家，大都以帝國防衛費絕大部分，課在自己的從屬地方，從而解除自己的負擔。英國卻一向以這費用的幾乎全部課在本國，從而解除從屬地方的負擔。要使大不列顛與法律一向認為是隸屬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國會在派徵賦稅計劃上，似乎必須有手段，使其派徵立即生效，不致為殖民地議會所逃避、所拒絕。至於這種手段是什麼，卻不是容易想得出來，而且是個未曾闡明的問題。

倘若英國國會，同時充分確立了不得殖民地議會同意即可對殖民地課稅的權利，則此等議會的重要地位，馬上就會終結，而英領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着完結。人們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組織是怎樣安定、怎樣持久，就看這個國家大部分的領導人（即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能如何保持或保衛其重要地位。所以，國內派別活動和野心活動，就在於此等領袖人物不斷地互相攻擊別人的重要地

位，保衛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領導人物，象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物一樣，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想象，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認為其權力與英國國會相等——大權旁落，僅僅成為英國國會的低聲下氣的巨僕或執行吏，他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喪失了。所以，他們拒絕議會派徵賦稅的建議，象雄心勃勃、意氣昂揚的人一樣，寧願劍拔弩張來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

當羅馬共和國日趨衰微的時候，負有防禦國家擴大帝國重任的羅馬同盟國，都要求享有與羅馬市民所享的同樣特權。在共和國拒絕它們的要求時，內戰就爆發了。在這樣的戰爭中，羅馬以此種特權，一個一個地給予大部分同盟國，而且按它們的獨立程度給予。現在，英國的國會主張對殖民地課稅，而殖民地則拒絕這種課稅，因為他們未曾派代表出席國會。設若對要脫離聯盟的各殖民地，英國都許其按所納國稅的比例，選舉代表，而且由於納稅，允其自由貿易，使與他們本國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數，隨其納稅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領導人物，就有了一種奪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對象了。這樣，他們也許會希望，從英國政治界那國家彩票獲得大獎，因為他們象其他人一樣，對於自己才能及幸運自有妄想，不想從殖民地這小彩票獲得小獎。明顯地，這種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滿足他們的野心。除了用這種方法或其他同樣方法，他們不見得會自動服從我們的。我們應當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強迫他們服從我們，那流出的每一點血，都是我們國民的血，不然就是願為我們國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為，時機一到，極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實是非常愚鈍的。現今主持所謂聯合殖民地議會的人，自己感到一種為歐洲最大公民所不會感到的重要地位。他們由小買賣商人、商人、律師，一變而為政治家和立法者，給一個廣大帝國，制定一個新政體。他們自誇，那將成為世界上自有國家以來最大而又最強的一個國家，也許真會如此。直接在聯合殖民地議會工作的人，也許有五百，聽這五百人號令的人，也許有五十萬，他們都同樣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黨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想象自己現令的位置，不僅比過去優越，而且也比他們所預期的優越。除非有一種新的野心對象出現在他或其領袖面前，否則他若有一般人的志氣，定會拚命護衛他的那個地位。

亨諾主席曾說，我們現今很有興趣地讀着關於同盟的許多小事件的記錄，但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也許不被人看做極重要的新聞。他說，當時各人都認為他們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那時流傳下來的許許多多記錄，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興記錄那些事件的人們記下來的。他們自誇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當時曾頑強地保衛自己，曾為着抗拒最好而後來又是最為人愛戴的那位國王而忍受一次那麼可怕的飢饉，這是世人所熟知的。那裏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說支配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為預先看到，舊政府一旦恢復，他們的重要地位就會立即消滅，所以竭力為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戰。除非我們能誘導我國殖民地同意和我們結合，否則它們亦會象巴黎市頑強抗拒其國王中最好的一個那樣，抵抗母國中最好的一個母國。

古代沒有代表制的觀念。當一國人民在他國取得了市民權的時候，他們除了與他國人民一塊兒投票、一塊兒討論，即無法行使這種權利。以羅馬市民特權給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壞了羅馬共和國。這樣，就無從判別，誰是羅馬市民，誰不是羅馬市民。這樣，一個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員。這樣，任何種類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議會，他們可能趕走真正市民，並儼然以真正市民自居，決定共和國事務。但是，即使美洲派五十個或六十個新代表出席國會，衆議院的門房，亦不難判別，誰是國會議員，誰不是國會議員。所以，羅馬組織，雖必然由於羅馬與意大利同盟國的聯合而遭受破壞，但英國組織卻不會由於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聯合而受絲毫損害。反之，其組織將因此而完善；沒有這種聯合，反會覺得不完善。討論並決定帝國一切部分事務的議會，為要得到正確的情報，應當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這種聯合，能不能容易實行，執行時會不會發生困難，我不敢妄斷，但我沒有聽見，不能克服的困難。主要的困難，可能來自大西洋兩岸人民的偏見與成見，並非出幹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不必憂懼美洲代表的衆多，將打破組織的均衡，或過度地增加國王勢力，或過度地增加民主勢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數，與美洲所納的稅成比例，那末受統治人數的增加，將與統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統治手段的增加，亦將與受統治人數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聯合之後，君主勢力與民主勢力，仍必和聯合之前一樣，彼此間保持同程度的相對實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優懼他們因離政府所在地遙遠而可能遭受許多壓迫。他們出席國會的代表，自始就該是很多的，他們的代表，必能保護他們，使其不受到這一切壓迫。距離的遠，不會削弱代表對於選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認為，靠後者選拔，才得議員一席，並從這一席取得好處。前者為要保待後者對他的好感，定會以國會議員的權力，申訴帝國這遼遠地帶民政或軍政長官的違法亂紀行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干理由認為，他們不會長此繼續與政府所在地遠隔。象那裏一向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樣快速的進步，也許只要一世紀，美洲的納稅額將超過不列顛的納稅額。帝國的首都，自然會遷到帝國內納稅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發現及繞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兩件事。其影響已經很大了；但自有這二發現以來，只不過經歷了二三百年，在這樣短的期間內，其影響勢不可能全部呈現出來。這兩大事件，以後對於人類，將產生利益，或將引出不幸，人類的智慧，還不能預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部分，使它們能互相救濟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獎勵彼此的產業，其一般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過，對於西印度及東印度兩處的土人，這兩事件本來能夠產生的一切商業上的利益，卻被它們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這種不幸，與其說出自它們的本性，無寧說出自偶然。美洲及東印度通路被發現時，歐洲人的優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遼遠地方，作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今後，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只有這樣，纔可引起相互的恐懼，從而威壓一切獨立國的專橫，使它們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但最能建立此種同等實力的，似乎就是相互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了，但這種結果，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伴隨着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而來臨。

同時，這二發現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進重商主義的發展，使其達到非此決不能達到的那麼顯著、那麼壯大的程度。這個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國，不如說由商業及製造業而富國，與其說由農村產業而富國，不如說由都市產業而富國。但這二發現的結果，歐洲商業都市，不僅成為世界極小部分的製造業者和運送業者（那極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過的歐洲各國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

周圍各國），而且成為美洲許多繁榮耕作地區的製造業者，和亞洲、非洲、美洲各地的運送業者，並在若干方面，亦是這各地的製造業者了。這樣就給他們的產業，開拓了兩個新世界，每一個都比舊世界大得多廣得多，其中一個市場，還在日益擴大起來。

誠然，佔有美洲殖民地並直接與東印度通商的國家，在外表上享受這大商業全部。但其他國家，雖受那令人厭惡的旨在排斥它們的限制，卻往往享受這大商業實際利益的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對於其他國家產業所提供的真實獎勵，就比它們本國產業所受的鼓勵大。單就亞麻布一項說，此等殖民地的消費，據說每年就在三百萬鎊以上，不過我不敢肯定有這麼多。但這鉅額的消費，幾乎全部由法國、弗蘭德、荷蘭、德意志供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僅僅供給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亞麻布供給殖民地的資本，每年在那些國家人民中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消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僅僅是這資本的利潤，給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維持最豪侈的浪費。

連一國所訂立以保證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貿易的條例，亦往往在較大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惠益的國家，而在較小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妨害的國家。對他國產業不正當的壓迫，反過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落在壓迫者頭上，並以更大的程度破壞他們的產業。例如，根據此等條例，漢堡商人必須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亞麻布送往倫敦，並把要送到德國去的菸草，從倫敦帶回，因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亞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從美洲帶回菸草。由於這種限制，此等商人也許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價格售賣亞麻布，而以稍稍昂貴的價格購買菸草，其利潤也許因此縮減若干。但是，即使我們假定，美洲還款不象倫敦那麼準時——這絕不是事實——漢堡與倫敦貿易，商人資本的往返，也許要比直接與美洲通商，要快得多。這樣，排斥漢堡商人，使不能直接與美洲通商，反使漢堡商人的資本，能在德意志繼續僱用大得多的勞動量。這樣雖可減少他個人的利潤，卻不會減少他的國家的利益。但對英國，情形就全然兩樣了。獨佔自然會吸引（如果我可這樣說）倫敦商人的資本，使流入對自己更有利而對國家卻更不利的用途，因為往返緩慢。

歐洲各國雖都企圖用各種不正當方法獨佔所屬殖民地貿易的全部利益，但沒有一個國家，除了擔負平時維持和戰時保衛其對殖民地的

統治權所開支的費用以外，能單獨得到什麼。由佔有此等殖民地而產生的困難，應有盡有，由此等殖民地貿易而產生的利益，卻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分享。

乍看起來，對美洲大貿易的獨佔，似乎當然是一種無上價值的獲得。在無辨別力的輕優野心家看來，在紛雜的政爭及戰爭中，那自然會作為一種很值得爭奪的迷人的目標出現。但是，這目標的炫人外觀，這貿易的巨大，使獨佔此種貿易具有有害的性質，換言之，獨佔使一種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對國家利益更少，但卻吸收了比自然狀態下更大部分的國家資本。

第二篇說過，一國商業資本，自然會尋求（如果可這樣說）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運送貿易上，那末它所屬的國家，將成為它所經營的各國貨物貿易的中心市場。這資本所有者，必願盡其所能，把這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他這樣就省免了輸出的麻煩、危險與費用，並因此放，儘管在國內市場，所得價格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價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潤亦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利潤小，他總必願意在國內市場售賣。所以，他當然盡其所能，設法使運送貿易變作消費品國外貿易。此外，他的資本如果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他又必為了同一理由，願意盡其所能，把他蒐集來準備輸到外國市場去的國內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因而盡其所能，設法使消費品國外貿易變成國內貿易。各國的商業資本，都自然會尋求近的用途，而避開遠的用途；尋求往返次數多的用途，而避開往返遲遠的用途；尋求能僱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大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而避開僅能僱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小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總之，它自然會尋求在普通場合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而避開在普通場合對國家最無利的用途。

此等遠的用途，在普通場合，雖對國家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潤，偶然提高，足夠抵消近的用途的好處，那末這種高的利潤，就會把資本從近的用途吸引過來，一直到各種用途的利潤，都回到適當的水平為止。不過，這種高的利潤證明，在社會實際情況下，此等遠的用途的資本，與其他用途的資本，稍稍不相稱，而全社會的資本，不按最適當的方式，分配到社會內不同用途。它證明，有若干物品，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廉的價格買入，或以較昂的價格賣

出，市民中有某一階級，多少受到壓迫，以致違反應有的或自然會有的一切階級平等狀態，支付較多或收得較少。同量資本，投在遠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雖決不能僱用相同的生產性勞動量，但遠的用途和近的用途，也許同樣為社會幸福所必需。有許多由遠的用途經營的貨物，就為許多近的用途經營所必需。但若經營此等貨物的人的利潤，超過了應有的水平，此等貨物就將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昂的價格售賣，即以稍稍超過自然價格的價格售賣。此種高價格，就會使一切從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壓迫。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在這場合，就要求有若干資本，從此等近的用途撤回，而轉入遠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潤，使達到適當水平，並降低他們所經營的貨物的價格，使達到自然價格。在這異常的場合，公共的利害關係，必定要求有若干資本，從通常對公眾較有利的用途撤回，能投到通常對公眾較少利益的用途。在這異常的場合，亦象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場合一樣，個人的自然利害關係與傾向，恰好符合幹公眾的利害關係，使他們從近的用途撤回資本，改投入遠的用途。

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使他們把資本投在通常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但若由於這種自然的傾向，他們把過多資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這些用途利潤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立即使他們改變這錯誤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儘可能按照最適合於全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義一切法規，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亂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資本分配。但關於美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的法規，則比其他任何法規，尤有這種結果。因為，這兩大洲的貿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兩個貿易部門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資本。不過，給這兩個貿易部門造成紊亂的法規，卻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獨佔為大手段，但獨佔的種類不同。這一種或那一種獨佔，似乎是重商主義的唯一手段。

對於美洲貿易，各國都盡其所能，企圖獨佔其所屬殖民地的全部市場，並完全排斥其他各國，使其不能與所屬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葡萄牙人企圖以同樣方法，控制東印度的貿易，他們聲言他們擁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權，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這通路。荷蘭人仍繼續排斥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不能與其所屬香料

產島直接通商。這種獨佔，顯然妨害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它們不能經營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並使它們不得不以比它們自己直接從產地輸入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專營貿易所經營的貨物。

但從葡萄牙權力失墜以來，歐洲國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專營權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現今開放，一切歐洲國家船隻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來的法國，各歐洲國家的東印度貿易，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這一種獨佔，妨害了實行獨佔的國家。這國家大部分人民，不僅從此失去一種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國人民都能自由經營這種貿易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獨佔貿易所經營的貨物。例如，自從英領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英國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從事這種貿易，而且須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這種獨佔，要使此公司，在售賣此等貨物時，取得異常的利潤；而且這樣一個大公司處理事務，難免發生弊端，因而引起異常的浪費。這種異常的利潤和異常的浪費，都得由本國購買者支付。所以，第二類獨佔的不合理，比第一類獨佔的不合理更為明顯。

這兩種獨佔都多少會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樣的方式破壞。

第一種獨佔，總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着過大部分的社會資本，使流人享有獨佔權的特殊貿易。

第二種獨佔，隨着不同情況，有時吸引資本。使流人享有獨佔權的特殊貿易，有時又排拒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在貧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過多的資本，使流入這種貿易；但在富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排拒許多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

例如，東印度貿易，如果不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象瑞典和丹麥那樣的貧國，也許從來不會派一艘船到東印度去。這個專營公司的設立，必然獎勵冒險家。他們的獨佔權，使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能抵制一切競爭者，而在外國市場上，他們又和他國貿易者有同樣的機會。他們的獨佔權，告訴他們，他們對大量的貨物，可十拿九穩地收到大的利潤，對大量貨物，有得到大的利潤的機會。沒有這種異常的鼓勵，這種貧國的窮商人，也許決不會想把小資本冒險投在象東印度貿易那麼遼遠和那麼不確定的事業。

反之，象荷蘭那樣的富國，也許會在貿易自由的場合，派遣比現今多得多的船隻到東印度去。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限制的資本，使許多本來會流入這種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不流入這種貿易。荷蘭的商業資本很多，所以不斷流出，有時流到外國公債，有時流到外國商人與冒險家的私債，有時流到最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時流到運送貿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滿着資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潤可圖的資本，全都投下了，荷蘭資本，必然會流向最遠的用途。假使東印度貿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許會吸收這過剩資本的大部分。東印度提供了一個比歐洲、美洲合起來還更大更廣的市場，來銷售歐洲的製造品及美洲的金銀和其他產物。

資本自然分配的擾亂，必然妨害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不論是排拒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流入一個特定貿易部門，或是吸引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特定貿易部門。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必比現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將比現在小，也許竟不存在，而它們一部分資本，投在不適合它們現今情況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們很大的損失。按照它們現在的情況，寧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儘管出價較昂，不應該從它們小額資本中，抽出那麼大部分來經營那麼遙遠的貿易，因為那種貿易的往返是那麼遲緩，所能維持的國內生產性勞動量是那麼小，而在它們國內，生產性勞動是那麼需要，有許多事未曾進行，有許多事還待進行。

所以，沒有專營公司，雖有個別國家不能對東印度進行直接的貿易，但不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公司，應在那裏設立，而只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國家，在這情況下，不應與東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經驗，充分證明，這樣的公司，一般說來並不是經營東印度貿易所必需。因為，葡萄牙雖沒有任何專營公司，卻幾乎享有了這貿易全部達一世紀以上。

據說，沒有一個商人能有足夠的資本來維持東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經理人，使這些人能為他們不時開往那邊的船隻備辦貨物。除非他們能夠這樣做，否則尋找待運貨物的困難，往往使船期貽誤，而由船期延誤所引起的費用，不僅會吃掉冒險的利潤，而且往往會產生很大

的損失。這種說法，如果能夠證明什麼，所證明的就是，沒有一個大貿易部門，能不惜專營公司而經營，而這是違反一切民族的經驗的。就一個大貿易部門說，任何一個私商的資本，也不夠經營一切要經營主要貿易部門就必須經營的附屬貿易部門。但在一國有資格經營某大貿易部門時，就自然有些商人投資經營這主要的部門，有些商人投資經營其附屬部門。這一切貿易部門雖都有人經營，但全由一個商人資本經營的事例，卻極少見。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有資格經營東印度貿易，自然有一定部分的資本，分投在這貿易的一切不同部門。其中，有些商人覺得，為自己的利益，要住在東印度，投下資本，給住在歐洲的其他商人供給貨物，由他們的船隻運出。歐洲各國在東印度所獲得的殖民地，若能從此等專營公司的手裏，移歸君主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對於殖民地所屬國的商人，是安全而又便易的居住地。如果某個時候，某國自願投於東印度貿易的那一部分資本，不夠經營此貿易的各個部門，那就證明，在那時候，那個國家還沒有經營這種貿易的資格，寧可向其他歐洲國家購買所需的東印度貨物，儘管價格大些，不可直接從東印度輸入此等貨物。因這種貨物價格高而引起的損失，很少會等於因從其他更必要、更有用或更適宜的用途抽出一大部分資本來經營東印度直接貿易而遭受的損失。

歐洲人雖在非洲海岸及東印度佔有許多重要殖民地，但在這些地方，他們卻沒有建立象美洲各島及美洲大陸那麼多那麼富庶的殖民地。非洲及幾個統稱為東印度的國家，都是野蠻民族居住的。不過此等民族，並不是象可憐的無用的美洲土人那麼軟弱那麼無抵抗力；而且，和他們居住地的自然產出力相稱，他們的人煙稠密得多。非洲或東印度最野蠻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連好望角的土人也是游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祕魯，只是狩獵民族。同樣肥沃和同等面積的土地，所能維持的游牧人數與狩獵人數，相差很大。所以，在非洲及東印度，要想驅逐土人，並把歐洲殖民地推廣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那就比較困難。此外，已經指出，專營公司的精神，不利於新殖民地的增長，那也許是東印度殖民地不能有多大進步的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經營非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未曾設有專營的公司；他們在非洲海岸的剛果。安哥拉和本格拉以及在東印度的果阿所建立的殖民地，雖由於迷信與各種惡政，未能充分發展，但總有些象美洲殖民地，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裏已居住了好幾世代。荷蘭人

在好望角、在巴達維亞的殖民地，現今算是歐洲人在美洲及東印度建立的最大殖民地了。這兩個殖民地，都佔有特別有利的地位。好望角的土人，全是野蠻的，象美洲土人一樣無抵抗力。此外，那裏又是歐洲和東印度間的半路客棧——如果可以這樣說——歐洲船隻的往返，都得在此停留若干時候。此等船隻所需的各種新鮮食品、水果、葡萄酒，由那裏供給。單有這點，就給殖民地的剩餘生產物，提供了一個極廣泛的市場。正如好望角是歐洲和東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棧一樣，巴達維亞是東印度各大國間的半路客棧，當印度斯坦到中國與日本通路的要衝，並幾乎居於此通路的中點。而航行於歐洲與中國間的一切船隻，亦幾乎都在巴達維亞停泊。此外，巴達維亞又是所謂東印度國家貿易的中央主要市場；歐洲人經營的那一部分，不用說了，即東印度土人所經營的那一部分，亦如是。中國人、日本人、越南東京人、馬六甲人、交趾支那人、西利伯島人所航駛的船隻，往往在此停泊。這種有利的地位，使這兩個殖民地能夠克服一切障礙，雖有專營公司的壓抑精神，亦不能抑止它們的增長。這種有利的地位又使巴達維亞能夠克服另一種不利情況，即巴達維亞也許是世界上氣候最有得健康的地方。

雖然英荷兩國的公司，除了上述兩殖民地，不曾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但曾在東印度征服了許多地方。在它們統治新屬民的方法上，這種專營公司所固有的精神，最明顯地表示出來。據說，在香料產島上，荷蘭人對於豐年所產的香料，恐其過多，不能提供他們認為滿足的利潤，往往把過多的部分加以焚燬。在他們未曾佔有殖民地的島上，他們對於採集丁香及豆蔻幼花綠葉的人，給予一種補助金；那種植物，天然生長在那裏，但由於這種野蠻政策，現在據說幾乎絕種了。據說，甚至在他們佔有殖民地的島上，他們亦大大減少了這類樹木的數目。如果他們領島上的產物，超過了他們市場所需，他們就害怕土人會把其中若干部分運到其他國家，於是，他們認為，保證獨佔的最上策，乃是使產物不超過他們市場所需。他們曾通過各種壓迫行為，減少馬魯古羣島中若干島的人口，使其人數只夠以新鮮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給他們自己的少數守備隊和他們不時來運香料的船隻。但是，即在葡萄牙那樣的統治下，那些島據說人煙還很稠密。英國的公司還不曾有充分時間在孟加拉建立這麼完全的破壞制度。但他們政府的計劃，卻有這種趨勢。我確信，公司分支機構的頭腦往往命

令農民掘翻罌粟良田以栽種稻米或其他穀物。其藉口爲防止糧食缺乏，而其真實理由，則是給他以機會，使能以較好的價格，售賣他手上的大量鴉片。有時，他卻命令農民掘翻栽種稻米或其他穀物的良地以栽種罌粟，如果他預先看到，售賣鴉片可得異常的利潤。公司的職員，爲自己的利益，曾幾次企圖在一些最重要的國外和國內貿易部門中建立獨佔。如果允許他們繼續這樣做，他們早晚定會企圖限制他們要想獨佔的特殊商品的生產，使其數量不超過他們所能購買的數量，而且使其數量能在售賣時給他們提供自己認爲滿足的利潤。英國公司的政策，也許會在這情況下，在一世紀或二世紀內，象荷蘭的政策一樣，也完全有破壞性。

但是，對於作爲他們所征服的國家的統治者的此等公司，再也沒有比這個破壞性的計劃，更直接違反此等公司的利益的了。幾乎一切國家統治者的收入，都來自人民的收入。人民的收入愈大，他們土地勞動年產物愈多，他們能給統治者繳納的數額亦愈大。所以，統治者的利益，在於儘可能增加此年產物。但是，如果這是一切統治者的利益，那末統治者收入主要來自土地地租的，如孟加拉統治者，這就更加是他的利益了。地租，必與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成比例，但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必須取決於市場的範圍。其數量，總會多少準確地適應有實力購買生產物的人的消費，而他們所願給付的價格，總是和其競爭的熱切程度成比例。所以，這樣的統治者，爲着自己利益，應給其國家生產物開拓最廣泛的市場，准許最完全的貿易自由，以儘量增加購買者的人數及競爭；並因此故，不僅應廢除一切獨佔，而且應廢除以下限制，即限制本國生產物由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運輸，限制本國生產物到外國的輸出，和限制能與本國生產物交換的任何商品的輸入。這樣，他就最能增加這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因而，最能增加他享有的那一部分生產物，換言之，最能增加他自己的收入。

但是，商人團體，似乎不可能把自己看做統治者，甚至在他們成爲統治者以後，也不會這樣看。他們仍然認爲，自己的主要業務是貿易，即購買以後再售賣；他們不可思議地認爲，統治者的地位，僅是商人地位的一個附屬物，前者應爲後者服務，就是說，要使他們在印度能以較廉價格購買，並在歐洲售賣，能得到較好利潤。爲要達到這目的，他們企圖從他們所統治國家的市場上，儘可能驅逐一切競爭

者，至少把所統治國家的剩餘生產物減少一部分，使僅足供給他們自己的需要，換言之，使他們在歐洲售賣能得到自己認為合理的利潤。這樣，他們作為商人的習慣，幾乎必然，也許是不知不覺地，使他們在一切一般場合，寧可獲得獨佔者小的暫時的利潤，不願獲得統治者大的永久的收入，而且逐漸使他們，象荷蘭人處置馬魯古那樣，處置他們所統治的國家。作為統治者的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在於，運至印度境內的歐洲貨物，儘可能以最低價格出售，而從印度輸出的印度貨物，儘可能以最好價格或最高價格在歐洲售賣。但他們作為商人的利益，則與此相反。作為統治者，他們的利益，與所統治國家的利益恰相一致。作為商人他們的利益與所統治國家的利益就直接相反。

這樣一個政府的傾向，就其對歐洲的管理說，基本上也許是無可矯正的錯誤，就其對印度的統治說，更是這樣。這個統治機構，必然等於一個商人協會。商人的職務，無疑是極可尊敬的，但這個職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帶有一種本來會威壓人民，不用暴力就夠使人民自願服從的權威。這樣一個商人協會，只能用武力，來命令人民服從，所以，他們的政府，必然是憑武力執行命令和專橫的政府，但他們的本來職務，是商人的職務。他們的本來職務，是受主人委託，售賣歐洲貨物，並買回在歐洲市場售賣的印度貨物。就是說，儘可能以高價售賣前者，以廉價購買後者，從而儘可能在他們買賣的特定市場，排除一切競爭者。所以，就公司的貿易說，統治機構的傾向，和管理機構的傾向，是相同的。它要使政府從屬於獨佔的利益，因而阻抑當地剩餘生產物至少其若干部分的自然生長，使僅足夠供應這個公司的需要。

此外，一切行政人員，都或多或少地為自己打算經營貿易，要加以禁止，亦無效果。此等行政人員，既有經營貿易的手段，其辦公地點，又在一萬哩以外，幾乎全然不受主人監視，要命令他們立即放棄一切為自己打算的營業，永遠放棄一切發財的希望，而滿足於主人所認可的一般的、不大可能增加的而且通常只與公司貿易所得真實利潤相稱的薪俸，那真是再蠢沒有。在這情況下，禁止公司人員為自己打算而貿易，除了使上級人員能借口執行主人命令來壓迫不幸的下級人員以外，就再不會有其他的結果了。此等人員，自然會竭力效法公司的公貿易，而設立同樣有利於他們個人貿易的獨佔。如果聽任他們為

所欲爲，他們將公開地、直接地建立這種獨佔，並禁止一切其他人民，使不能經營他們要經營的那種貨物的貿易。這也許是建立獨佔的最好而又是最不壓迫人的方法。但若歐洲命令來到，禁止他們這樣幹下去，他們就會祕密地、間接地建立這樣的獨佔，那對國家就有更大的害處。如果有人干涉他們以代理人爲媒介而祕密經營或至少不公開承認是他們經營的貿易部門，他們就會使用政府的全部權力，並顛倒是非曲直，加以鉗制或破壞。但公司人員的私貿易，自比公司的公貿易能推廣到多得多的商品種類。公司的公貿易，僅限於歐洲的貿易，僅包含國外貿易的一部分，而公司人員的私貿易，卻可推廣到一切國內外貿易部門。公司的獨佔，僅會阻抑在貿易自由時要輸到歐洲去的那一部分剩餘生產物的自然生長。公司人員的獨佔，卻將阻害他們要經營的一切產物，即指定供作國內消費或輸出的一切產物的自然生長，結果會損壞全國的耕作事業，減少全國居民的人數。這樣就會使公司人員所要經營的各種產物，甚至生活必需品，減少到他們能夠購買和按他們預期獲得利潤而售賣的數量。

此等人員，由於他們所處地位的性質，一定會使用比他們主子更苛刻的手段，來維持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們所統治國家的利益。這國家屬於他們的主子，他們的主子當然要相當注意屬國的利益。但這國家不屬於此等人員。他們主子的真實利益，如果他們能夠了解的話，是與屬國的利益恰好一致的；如果主子壓迫屬國，那主要是由於無知和卑陋的重商偏見。但此等人員的真實利益並不與屬國的利益一致，所以，即使有最完全的知識，也未必會使他們不壓迫屬國。從歐洲發出的條例，雖甚脆弱，但在多數場合，都有善意。而在印度的工作人員，其所訂條例，雖有時更爲聰明，但也許更少善意。這真是個奇怪的政府，其人員都想盡可能快地離開這國家，並儘可能快地和這政府脫離關係。在他們離去而財產亦全部搬出之後，雖有地震把那個國家毀掉，也與他們的利害無關。

以上所述，並不是詆譏東印度公司人員的一般品格，更不是詆譏任何個別人員的品格。我所要責備的，是政治組織，是這些人員所處的地位，並不是這些人員的品格。他們的行爲，正符合他們的地位；厲聲咒罵他們的人，其行爲亦不見得更好。馬德拉斯及加爾各答協議會，在戰爭及商議上，就有好幾次的行動，其果斷與明智，有如羅馬

共和國最盛時代的羅馬元老院。此等協議會成員的職業，與戰爭及政治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僅僅他們的地位，無需教育、經驗甚或榜樣，似乎就可陶冶他們的地位所要求的偉大品質，使他們具有能力與德行，他們自己也許還不知道自己有這種能力與德行。所以，他們的地位，如果在某些場合誘使他們幹出那樣寬宏高潔出人意料的行為，那末他們的地位，在其他場合促使他們幹出和上述多少不相同的行為，亦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無論就那一點說，這種專營公司，都是有害的；對於設立此種公司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困難，而對於不幸受此種公司統治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禍害。

第七章論殖民地

—第一節論建立新殖民地的動機

歐洲人最初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動機，並沒蒙古希臘羅馬建立殖民地的動機那麼明顯、那麼容易看得出來。

古希臘各邦，各佔有極小的領土；任何一邦人民，增多到本邦領土不易維持的時候，便遣送一部分人民出去，在世界上遼遠的地方，尋找新的住處。他們四周的好戰鄰人，使他們任何一邦，很難在國內大大擴大其領地。多裏安人大都到意大利及西西里去殖民。這兩地，在羅馬建立以前，爲野蠻未開化人民所佔居。伊沃尼亞人及伊沃利亞人（希臘另外兩大部落）大都到小亞細亞及愛琴海各島去殖民。這兩地居民，在當時似與意大利及西西里當時的情況大致相同。母市雖視殖民地爲兒子，常常給與大的恩惠與援助，也得到殖民地的感戴，但卻視殖民地爲已解放的兒子，不要求直接的統治。殖民地自決政體，自定法律，自選官吏，而且以獨立國資格向鄰國宣戰媾和，無需母市的承認或同意。沒有什麼能比樹立這種殖民的動機更明顯、更容易看得出來。

古羅馬，象其他大部分古代共和國一樣，原來是建立在一種土地分配法上，即按一定比例，將所有的公有領地，分配給構成國家的各市民。但人事的變遷，結婚哪，承繼哪，割讓哪，必然會把原來的分配搞亂，常使原來分作許多家族維持手段的土地，歸一個人所有。爲糾正此種弊病——他們也認爲這是一種弊病，他們頒佈了新的法律，限制各市民所佔有的土地量，不得超過五百朱格拉，約合英畝三百五十畝。但這法律，據我所知，雖施行過一兩次，但大都被人忽視或迴避，而財產越來越不平均。大部分市民，是沒有土地的；但按當時風俗人情，無土地即難於維持自由人的獨立。現時，無土地貧民，若稍有資財，可租耕他人土地經營某一種零售業；即使毫無資財，亦可充任農村勞動者或技工。但在古羅馬，豪富人家的土地，都由奴隸耕種；奴隸在監工的監督下工作，監工本身也是奴隸；所以，貧窮自由人，很少有機會成爲農民或農村勞動者。一切商業、製造業，甚至零售業，亦都爲主人的利益而由奴隸經營。主人們的財富、權威與防衛，使一個貧窮的自由人，很難和他們競爭。所以，無土地市民，除

了。在每年選舉時，得到候選人的贈金以外，幾乎沒有別種生計了。當護民官想鼓勵人民反抗豪富時。就叫人民回想古代的土地分配，並說限制那種私產的法律是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人民吵吵鬧鬧地要求土地，但我們自可相信，富豪們是十分決意不把任何部分土地分給他們的。但爲了要繪他們相當程度的滿足，富豪們往往提議建立新殖民地。但作爲征服者的羅馬，即在這場合，也沒有必要道送市民到世界各地去尋找出路，如果我可這樣說。它要先知道市民究竟將在什麼地方定居。它大都把意大利被征服各地的土地，指定給與他們。他們在那裏，亦象在共和國領土上一樣，不能建立任何獨立的共和國，至多隻能形成一種自治團體。這種自治團體，雖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權能，但須受母市的統治和懲罰，並遵守母市制定的法律。但這種殖民地的建立，不僅僅在於滿足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因爲一個地方新被征服，當地人民是否服從還屬疑問，常可藉此在當地設置一種守備隊。所以，羅馬殖民地，無論就其性質說或就其建立的動機說，都與希臘殖民地完全不相同。因此，原來用以表示這種建制的字眼，亦有極不相同的意義。拉一丁語colonia表示殖民；反之，希臘語

P128。；。z。則表示離家、離鄉、出門。羅馬殖民地雖在許多點上，與希臘殖民地不同，但建立的動機，卻是同樣明顯同樣容易看得出來的。這兩種制度，都溯源於無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顯著的實利。

歐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起因於必要；樹立的結果，雖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其利益也並不那麼明白顯著。在殖民地剛剛建立的時候，誰都不知道這種利益；其建立及其發現的動機，也不是這種利益。而且，直到今日，這種利益的性質、範圍及界限，也還不大爲人所理解。

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間，威尼斯人經營一種極有利的貿易，即販運香料及其他東印度貨物，售給歐洲其他各國。他們大都在埃及購買。埃及當時由高加索軍人統治。高加索軍人是土耳其人的敵人，而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敵人。這種利害關係的一致，加上威尼斯貨幣的援助，使得他們結合起來，這樣就使威尼斯人幾乎享有一種貿易獨佔權。

威尼斯人所得的巨大利潤，誘發了葡萄牙人的貪慾。在十五世紀中，他們努力發現一條海道，通過摩爾人跨沙漠給他們帶來象牙和金沙的那個地方。他們發現了馬德拉羣島、卡內裏羣島、亞速爾羣島、佛德角羣島、幾內亞海岸、盧安果、剛果、安哥拉、本格拉各海岸，最後發現了好望角。他們早就希望分佔威尼斯人有利的貿易；最後那一次發現，為他們開拓了可能分佔的機會。1497年，瓦斯戈·德·加馬，又從里斯本港開航，以四船結成一隊，經過十一個月航行，達到了印度斯坦海岸。一世紀來，以非常的堅毅心，不斷的努力，所進行的那種發現工作，就這樣完成了。

在此若干年之前，歐洲人對葡萄牙未必能成功的計劃，還在疑惑的時候，有個熱那亞舵工，提出更大膽的計劃，要西航達東印度。東印度各國的情況，在當時的歐洲，還是不大清楚的。少數歐洲旅行家，曾誇大這些地方的距離，這也許出自純樸無知，在那些不能計量距離的人看來，原來確是很遠的距離，就顯得無限的遠，也許是藉此誇示他們自己冒險訪問離歐洲很遠的地方的奇蹟。哥倫布很有道理地說，向東走這一路程越遠，那末向西走便越近。他建議走這一條路，因為這條路最近又最穩當。幸而他說服了克斯梯的伊薩伯拉，使她相信他的計劃是可能實現的。於是，他就在1492年8月，即比瓦斯戈·德·加馬從葡萄牙出發的時候大約早五年，從帕羅斯港出航，經過兩三個月的航程，先發現了小巴哈馬羣島，即廬克圓羣島中若干小島，然後發現了聖多明各大島。

但哥倫布這次航海以及以後各次航海所發現的地方，都和他原要訪問的地方不相似。他不曾發現中國和印度的財富、農功與稠密人口，卻在聖多明各以及他曾經到過的新世界一切其他地方，發現一個叢林未墾的地方，僅為裸體窮苦野蠻人所佔據。但他不大願意相信，自己所發現的地方，不是馬哥·孛羅所描寫的一些地方。馬哥·孛羅在歐洲人中，是第一個到過中國和東印度的，至少，把當地情況描寫下來的，他是第一個。於是，哥倫布在發現了聖多明各一座西巴奧山的名字與馬哥·孛羅所提到的西潘各的名字有些相象，便以為那是他早就放在心裏的地方了，雖然明顯的證據證明，不是那地方。他在給裴迪南及伊薩伯拉的信中，把他所發現的那些地方叫做印度。他相信那是馬哥·孛羅所描寫的地方的一端，且與恆河相距不遠，換言之，與亞力

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相距不遠。即使在後來判明瞭那些是兩個不同地方以後，他還以為，那些富庶國家離此不遠。所以，他在後來的一次航行中還沿着火地島海岸，向達裏安地峽航行，來探尋那些國家。

由於哥倫布這一錯誤，那些不幸的國家，從那時以來，一直叫做印度。最後發現了新印度與老印度完全不相同，才把前者叫做西印度，後者叫做東印度，以示區別。然而，不論所發現的是什麼樣的地方，在哥倫布看來重要的是，得向西班牙宮廷陳述他所發現的是極為重要的地方。在各國，構成真實財富的，都是土地上生產的動植物，而那裏當時生產的動植物，沒有什麼可證明他的陳述是正確的。

科裏是介在鼠與兔之間的一種動物，布豐認為，它和巴西的阿帕里亞是同類的動物。它在當時是聖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獸，這動物似乎從來就不很多，據說西班牙人的犬與貓，老早幾乎吃掉了這種動物以及軀體比這還要小的其他動物。然而，此等動物，以及所謂伊文諾或伊關諾的那一類大蜥蜴，便是當地所能提供的最主要的動物性食物了。

居民的植物性食物，雖由於農業不發達，並不豐饒，但不象動物性食物那麼稀少。其中，主要為玉米、芋、薯、香蕉等等。那些食物都是歐洲所不知道的，但不為歐洲人所十分重視，他們並不認為那些植物和歐洲原來生產的一般谷豆有同等的營養力。

誠然，棉花是一種極重要製造業的材料，而在當時歐洲人看來，亦就是那些島上最有價值的植物性產物了。雖然在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地都極重視東印度的軟棉布及其他棉織品，但歐洲各地都沒有棉織製造業，所以，即使這種生產物，在當時歐洲人看來，亦不很重要。

哥倫布看到新發現各地方的動植物，都不足證明這些地方是怎樣重要，就轉移眼光到礦物上來。他以為，礦物界生產的豐富，足夠補償動植物界生產的微薄。他看到那裏居民的服裝上掛着小片的金，並聽他們說，那金片常可從山上下流的溪流或急流中發現，於是他便十分相信，那裏的山必有最豐饒的金礦。這樣，聖多明各就被說成為金礦豐饒的國家，並因此故（不僅根據現今的偏見而且根據當時的偏見），被說成為西班牙國王及其國家取之不盡的真實財富的源泉。哥倫布第一次航海回國時，被按凱旋儀式，引見克斯梯及亞拉岡國王，當時所發現的各國主要生產物，都由隆重的儀仗隊帶在他前面。但有

價值的部分只是金小發帶、金腕環及其他各種金飾品，和幾捆棉花。其餘都是俗人驚異和珍奇的物品，譬如，幾株極大的蘆葦，幾隻羽毛極美的鳥，幾隻大鱷魚、大海牛的剝皮。但在這一切之前，有六七個顏色和相貌奇怪的土人，卻大大增加了這次展覽的新奇。

哥倫布陳述的結果，克斯梯的樞密院，決定佔領這些國家。它們的人民，當然沒有抵抗能力。傳佈基督教這個敬神的目的，使這種非正義的計劃，成為神聖的事業。但此種計劃的唯一動機，卻是希望發現此等地方的金寶藏。而且為了要突出此種動機，哥倫布提議那裏所發現的金的一半，應歸國王。這種提議，亦為樞密院所採納了。

最初冒險家輸入歐洲的黃金，全部或極大部分是由極容易的方法取得，即向無抵抗的土人劫掠而得，所以，要納這樣的重稅，也不會很困難。但土人所有，一旦完全被剝奪盡了——事實上，在聖多明各及哥倫布所發現的一切其他地方，不到六年或八年，就完全被剝奪盡了——要再發現一些，就必須從礦中掘出，就不能再納這樣的稅。據說，這種稅嚴格的徵收，曾使聖多明各的礦山，從那時起，完全停止開採。所以不久金稅就減至金礦總生產額的三分之一，再減至五分之一，再減至十分之一，最後減至二十分之一。銀稅在長期間內為總生產額的五分之一。直到現世紀，才減至十分之一。但最初的冒險家，對銀似乎不大關心，他們認為，比金低賤的東西都不值得他們注意。

繼哥倫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險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動機。使奧伊達、尼克薩、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爾博到達裏安地峽，使科特茲到墨西哥，使亞爾馬格羅和皮查羅到智利和祕魯的，都是對於黃金的強烈慾望。當這班冒險家到達一個未曾被發現的海岸時，首先調查的就是那裏有沒有金礦可以發現。他們就依此決定他們的去留。

在一切費用浩大、成就不確定並使大部分從事者破產的計劃中，也許再沒有比探索新金銀礦山更容易使人破產的了。這也許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得彩者的利得，最不能補償失彩者的損失。因為，有獎的票很少，無獎的票很多，但每一張票的普通價格，卻是一個極有錢的人的全部財產。開礦的計劃，不僅不能補償開礦的資本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而且大都把資本和利潤吞併掉。因此，這種計劃是希望增加本國資本的精明的立法者所最不願意給予特別鼓勵，或以人

爲的方法使大部分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其中的那種計劃。其實，這就是人們對於自身的幸運所懷抱的那種不合理的信念，認爲只要有絲毫成功的可能就會有很大一部分資本自行流入此種用途。

憑冷靜理智與經驗作出的判斷，都認爲此等計劃是絕對不可以實行的，但由人類貪慾作出的判斷，卻認爲此等計劃是完全可以實行的。使許多人有了點金石那種荒唐觀念的慾望，又使許多其他人有了金銀礦山無限豐饒那種荒唐觀念。他們沒考慮到，就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說，此等金屬的價值，主要出於其稀少性，而其稀少性，又由於自然藏量很少，而且那少量金屬，包有堅硬和難於處理的物質，以致挖掘並獲取此等金屬所需要的勞動與費用，極其浩大。他們以爲，此等金屬的礦脈，在許多地方，簡直象鉛、銅、錫、鐵的礦脈那樣，大而且豐。華爾特·羅利夫爵士所作的黃金國的夢，充分證明了，即使有智之士，亦不免有此種奇異的幻想。而在這位偉人死了之後一百餘年，還有耶穌教會會員加米拉相信這個黃金國的存在，而且極其熱烈地，我敢說，還是極其真摯地說，如果他能對那些能夠以優厚報酬酬答傳道工作的人，宣傳福音，真是不勝榮幸。

在西班牙人最初發現的那些國家裏，現在看來，沒有一個值得開採的金銀礦山。最初各冒險家所發現的金屬的量，以及第一次發現以後人們所採掘的各礦山的產出力，都被大大誇大了。但冒險家的報導，足夠喚起他們本國人的貪慾。每一個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發現一個黃金國。命運的女神，在這場合，象在其他極少數場合一樣，光臨了，使虔信者的狂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而且在墨西哥和祕魯被發現與被征服的時候（一在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大約三十年之後，一在大約四十年之後），他們可以說從命運女神手上得到了他們所尋找的豐饒的貴金屬。

一個與東印度通商的計劃，幹是引起了西印度的第一次發現，一個征服的計劃，又引起了西班牙人在這些新發現的國家裏的一切設施。然而使他們去征服的動機，卻又是發現金銀礦山的計劃。這計劃，又由於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居然出乎企劃人合理的期望，大爲成功了。

歐洲其他各國最初企圖到美洲去殖民的冒險家，也是受同樣的妄想的驅使，但他們並不怎麼成功。巴西自第一次殖民以來，經過百餘

年，才發現金、銀和金剛石礦山。在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等國的殖民地中，卻是至今還沒有發現過貴金屬礦山，至少還沒有發現在今日看來有開採價值的礦山。但英國最初在北美殖民的人，為誘使國王給與他們特許狀，都以所發現的金銀五分之一獻於國王。華爾特·羅利夫爵士的特許狀，倫敦公司及普里木斯公司的特許狀，普里木斯參議會的特許狀等等，其發給都以把所得金銀五分之一獻給國王為條件。此等最初殖民者，希望發現金銀礦山，又希望發現到東印度去的西北通路，但對兩者都失望了。

第二節論新殖民地繁榮的原因

文明國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蕪，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對新來的殖民者讓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類社會富強得更快。

此等殖民者隨身帶來的關於農業和有用技術的知識，自比未開化野蠻人幾百年、幾千年自發地成長的知識強。同時，此等殖民者，又隨身帶來了統治人的習慣，關於正常政府的觀念，維持政府的法制的觀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觀念。他們自然要把這些在新殖民地建立起來。但在未開化野蠻民族中，在保護自身所必需的法律與政府已經確立之後，法律與政府的自然進步就比技術的自然進步還要慢。每個殖民者所得的土地，都多於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無須支付地租，大都不納稅。沒有地主分享他們的收穫，君王所分掉的通常都很少。他自會使生產物增加，因為這生產物幾乎全是他自己的。但他所有的土地往往是那麼廣闊，以致盡他一己的勞動，以及他所能僱用的他人的勞動，也不能使土地生產出它所能生產的數量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極想從各地蒐集勞動者，並以最優厚的工資來作報酬。但此等優厚的工資，加上土地的豐饒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勞動者要離開他，自作地主，以優厚的工資，報酬其他勞動者。正如他們離開他們的主人一樣，這些其他勞動者不久也離開他們。優厚的報酬，獎勵了結婚。兒童們，在幼年期中得到很好的給養，受到很好的照顧，到長大時，他們勞動的價值，大大超過其撫養費。到成年時，勞動的高價格與土地的低價格，又使他們能夠自立，象他們的祖先那樣。

在其他國家，地租和利潤吃掉工資，兩個上層階級壓迫下層階級。但在新殖民地，兩個上層階級的利害關係，使得他們不得不更寬宏地更人道地對待下層階級；至少，在那裏，下層階級不處在奴隸狀

況。生產力極大的荒地，只須付出很小代價就可獲得。身兼企業家的地主，希望從改善耕作增加其收入，這種增加的收入，便是他的利潤。在這情況下，利潤一般極為豐厚。但這種豐厚的利潤，除非僱用他人的勞動來開墾土地耕作土地，就無法取得。在新殖民地地上，土地面積的大與人口之少，其間的不相稱現象使他難於取得這種勞動。所以，他不計較工資，願在任何價格下僱用勞動。勞動工資的高昂，鼓勵了人口的增殖。良好土地的豐饒與低廉，又鼓勵了耕作的改善，使地主能支付這樣高的工資。土地的全部價格，幾乎由此種工資構成。作為勞動的工資，雖覺其高，但作為有那麼大價值的東西的價格，則又覺其低。獎勵人口和耕作的增進的，又獎勵真實財富與強大的增進。

許多古希臘殖民地，因此似乎非常迅速地進於富強。在一世紀或二世紀中，就有一些能與母市抗衡，甚至超過母市了。西西里的塞拉庫西及阿格里琴託，意大利的塔倫圖及洛克裏，小亞細亞的埃弗塞斯和密理圖斯，無論就哪一點說，也至少可與古希臘的任一都市相抗衡。建設雖較晚，但一切學藝、哲學、詩學及修詞學，卻和母國任何部分發生得一樣早，進展水平一樣高。值得指出，兩個最右的希臘學派，即達理士學派及畢太哥拉學派，並不是建立在古希臘，而是一個建立在亞細亞殖民地，另一個建立在意大利殖民地。這一切殖民地，都建立在未開化野蠻民族所居的地方，那裏，新殖民者容易取得他們的居地。新殖民者有很多良好土地，而且因為他們對母市全然獨立，他們還能按照他們自己認為最有利於他們自己的方式，自由處理他們自己的事物。

羅馬殖民地的歷史，似乎沒有這樣輝煌。確實，其中有些，例如弗洛倫斯，經過許多年代，在母市崩潰之後，發展成為大的國家，但其進步，卻沒有一個是非常迅速的。那些殖民地，都建立在被征服的地方，那裏人口十之八九早已十分稠密。分給新殖民者的土地，大都不很大。而且由於殖民地不能獨立，他們並非經常能按照自己認為的最有利於自己的方式，自由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

就良地很多這一點說，歐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所建立的殖民地，和古希臘殖民地相似，甚至超過古希臘殖民地。就附屬於母國這一點說，它們雖和古羅馬殖民地相似，但因為它們離歐洲很遠，就或多或

少地減低了這種依附的程度。它們的位置，使它們在較小程度上受母國的監視和支配。在它們按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它們的行爲，或由於歐洲不知道，或由於歐洲不瞭解，往往被忽視。有時，歐洲只好容忍，因為離開太遠了，難於管束。所以，就連象西班牙那樣強暴專橫的政府，亦往往因恐全體反亂，把已經發下的對所屬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或修改。這一來，歐洲一切殖民地，在財富上，在人口上，在改良上，都有非常大的進步。

西班牙國王，由於分享金銀，所以從殖民地初設以來，即從殖民地取得若干收入。這種收入，同時使西班牙國王得隴望蜀。因此，西班牙殖民地，從初設時起，就吸引着母國很大的注意，而當時歐洲其他國家，卻在長期間內，不大注意。但前者並不因為有這種注意而較為繁榮，後者亦不因為沒有這種注意而較不繁榮。而且，按土地面積比例說，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與農業改良，不如歐洲其他國家殖民地。但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與農業改良方面的進步，亦是非常迅速、非常巨大的。征服後建立的利瑪市，據烏羅阿所說，在將近三十年前，還不過五萬人。基託原僅系印第安一小村落，然據同一作者說，在他那時，和利瑪市有相同的人口。克麥利·卡勒裏——雖然據說是個冒牌旅行家，但其著作，卻是根據極可靠的報告——就說墨西哥城有居民十萬。所以，無論西班牙各作家是怎樣誇大，這十萬的數目，亦比蒙特祖瑪時代的居民數大五倍以上。這數目，大大超過了英國殖民地三大都市波士頓、紐約和菲拉德爾菲亞的居民數。在墨西哥或祕魯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那裏沒有適當的馱畜。駱馬是唯一的馱畜，其力氣似比一般驢子差得多。他們沒有耕犁。他們不知用鐵。他們沒有鑄幣，亦沒有任何確定的通商媒介。他們的貿易，是物物交換。一種木製的鋤，是他們農業上主要用具。尖石是他們切東西的刀斧。魚骨或他種動物的堅腱，是他們縫東西的針。但這一切，似乎就是他們職業上的主要用具了。在這樣的狀態下，此等帝國，當然不能象現今那樣進步、那麼耕種得好。現今，那裏已有各種歐洲牲畜，已經使用鐵和耕犁，並採用許多歐洲技術了。但一切國家的人口密度，必和其改良及耕作程度相稱。所以，土人自被征服以來，雖橫遭殘殺，但這兩大帝國現在的人口仍比從前多。其人種，自然亦大大改變了。我以為，我們必須承認，西班牙種的西印度人，就許多方面說，都比古印第安人種強。

除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要算是歐洲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了。但由於巴西發現後很久，還沒有找到過金銀礦，所以對國王所能提供的收入也很少，甚或沒有，於是有一段長時期，很不受葡萄牙人的注意。然而，就在這種不注意的情況下，它發展成為強大的殖民地了。在葡萄牙還被西班牙統治時，巴西為荷蘭人所侵襲。巴西原分為十四省，荷蘭人佔有其七。荷蘭人本來要奪取其他七省，但不久葡萄牙恢復獨立，布拉甘查王朝執政。當時作為西班牙敵人的荷蘭人，成為葡萄牙人的朋友，因而葡萄牙人亦成為西班牙的敵人。所以，荷蘭人就同意把巴西其餘未被征服的那七省，留給葡萄牙；葡萄牙人亦同意把巴西已被征服的七省，留給荷蘭人。當時，兩國為良好同盟，自不會因此發生爭執。但荷蘭政府不久即開始壓迫葡萄牙的移民了。這些葡萄牙移民，不滿足於發牢騷，終於拿起武器來對付他們的新主。他們雖未曾得到母國公開的援助，但在母國默許之下，就靠着自己的勇氣和決心，把荷蘭人逐出了巴西。鑑於自己不能保有巴西任何部分，荷蘭人情願把巴西全部歸還葡萄牙國王。在這個殖民地內，據說有六十萬以上人民，其中，有葡萄牙人，有葡萄牙人的後裔，有西印度人，有黑白混血種人，有葡萄牙族及巴西族的雜種。沒有一個美洲殖民地，包含這樣多的歐洲血統。

在十五世紀快要結束的時候，和在十六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西班牙與葡萄牙是海上兩大海軍國。威尼斯雖與歐洲各地通商，但其艦隊卻幾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因為西班牙人是美洲的最初發現者，他們認為美洲全是他們所有。雖然他們不能阻止大海軍國葡萄牙殖民巴西，但大部分其他歐洲國家，卻是那麼害怕西班牙，都不敢在這大陸建立殖民地。企圖在弗羅裏達殖民的法國人，全被西班牙人殺掉。但自所謂無敵艦隊在十六世紀末葉失敗以後。西班牙的海軍力量也衰敗了，再沒有能力阻止其他歐洲國家殖民了。所以，在十七世紀中，英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總之，一切有海港的大國，都想在新大陸上殖民了。

瑞典人在新澤西殖民。那裏，現今仍可發現不少瑞典家族，那充分證明了，這個殖民地，如果能得母國保護，很可能繁榮。但瑞典不重視這殖民地，所以不久就被荷蘭人的紐約殖民地所吞併了。荷蘭人的紐約殖民地，則於1674年被英國人所吞併。

丹麥人在新世界上僅佔有聖托馬斯和聖克羅斯兩個小島。這兩個小殖民地，由一個專營公司統治着。只有這個公司，有權購買殖民者的剩餘生產物，並供他們以所需的外國貨物。所以，在買賣上，這公司不僅有權力壓迫他們，而且有壓迫他們的最強烈的動機。專營的商業公司的統治，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最壞的統治，但它不能阻止此等殖民地的進步，不過使其進步較為遲緩。丹麥前國王諭令解散此公司。從那時起，這兩個殖民地就非常繁榮了。

荷蘭人在東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來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統治。所以，這些殖民地中，雖有一些，與舊殖民地比較，有很大進步，但與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較，其進步就很慢。蘇里南殖民地，雖很可觀，但還不如其他歐洲國家的大部分蔗田殖民地。現今分成紐約和新澤西二省的諾瓦·伯爾基亞殖民地，即使在荷蘭統治下，不久也可能很可觀。良好土地的豐饒與低廉，是繁榮的有力原因，所以，最不好的政治，也不能完全阻止這因素的有效作用。而且，離母國很遠，移居者正可通過走私，多少避免這公司所享有的妨害他們的獨佔。現今，這公司允許一切荷蘭船隻，在納貨物價值百分之二點五的稅，領得特許狀後與蘇里南通商，但非洲與美洲間的直接貿易——那幾乎全是奴隸買賣——依然為其獨佔。公司專營特權的減少，也許是這殖民地今日能夠那麼繁榮的最大原因。庫拉索亞和尤斯特沙——屬於荷蘭的兩大島——是自由港，各國船舶都能出入。主要就因為有了這種自由，所以這兩島雖是不毛之地，但由於其周圍較好殖民地的海港，僅許一國船舶自由出入，所以能夠那麼繁榮。

法國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在前世紀大部分時間和現世紀一部分時間內，亦為一個專營公司所統治。在如此不良的行政下，其進步，與其他殖民地比較，必然是很緩慢的；但在所謂密西西比計劃失敗後，這公司被解散了，這殖民地的進步，也就快得多了。當這殖民地後來被英國佔領的時候，它的人口，比神父查理瓦所述二三十年前的人口，就幾乎增加了一倍。這位耶穌教會會員曾遊歷加拿大全部，當然不想少報其實際人數。

法國在聖多明各的殖民地，系由海盜建立。他們在一段長時期內，不需要法國的保護，亦不承認法國的政權。後來，這批盜匪受了招安，承認了法國的政權，但在一段長時期內仍受着非常寬大的待

遇。在這時期內，這殖民地的人口增殖與技術改進都發展得非常快。那裏雖亦有一個時期受一個專營公司的壓迫，而這種壓迫又無疑曾延遲其進步，但其進步並不因此而停止。此種壓迫一旦解除，其繁榮的速度，又和從前一樣的快。現在，那裏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田殖民地了。其產量，據說比全部英領蔗田殖民地總產量還要大。法國其他蔗田殖民地也大都非常隆盛。

但進步最速的殖民地，要算英國的北美洲殖民地了。

一切新殖民地繁榮的兩大原因，似乎是良好土地很多，和按照自己方式自由處理自己事務。

就前一點說，英國的北美洲殖民地，雖有很多良好土地，但不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不比上次戰爭前法國人的一些殖民地好。但是英國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卻比其他三國任何一國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更有利於土地的改良與耕作。

第一，在英國殖民地上，未開墾地的獨佔雖未完全防止，但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受限制。殖民地法規定，各個地主，都有義務，在限定期間內，改良並耕作所有土地的一定部分，而在不履行義務時，可把此種土地交給任何其他人。這種法律雖執行得不很嚴格，但有相當效果。

第二，在賓夕法尼亞，沒有長男繼承權，土地象動產一樣，平均分配給家中一切兒女。新英格蘭只有三省的法律，和摩西律一樣，允許長子得雙份。在這幾省，雖有時有個別人獨佔過大的土地，但只要經過一兩代，土地又可能充分分割了。在其他英領殖民地，雖然象英國法律一樣，長男繼承權依然存在，但在一切莫領殖民地上，根據自由借地法保有的土地的借用權，使得土地易於割讓，大塊土地的領受人，大都覺得，為自己利益計，不如儘速割讓大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額免役地租。在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上，凡附有勳爵稱號的大地產，其繼承都有所謂長子繼承權。這種大地產，全由一個人繼承，實際上都是限定繼承的，都是不可割讓的。法國殖民地都遵循巴黎風俗習慣，在土地繼承方面，比英國法律更有利於幼小的兒子。但在法國殖民地中，有騎士尊號和領地稱號的貴族保有地，若有任何部分割讓，那末在有限期間內，按照贖買權，得由領地繼承人或家族繼承人贖回。國內一切大所有地，都是這種貴族保有地，那必然妨礙割讓。

但在新殖民地上，未開墾的大地產通過割讓似比通過繼承分割的快得多。我們說過，肥沃土地的豐饒與低廉，是殖民地迅速繁榮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獨佔，事實上破壞了這種豐饒與低廉。此外，未耕地的獨佔，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礙。對社會提供最多和最大價值的生產物的，乃是用來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勞動。在這場合，勞動的生產物，不僅支付它自己的工資，和僱用勞動的資本的利潤，而且支付勞動所耕土地的地租。所以，英國移民的勞動，用來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比其他三國中任何一國多，因此所提供的生產物，就數量說，就價值說，也可能較大。這其他三國的殖民地，都實行土地獨佔，這樣就或多或少地使勞動流入其他用途。

第三，英國移民的勞動，不僅可提供較多和較有價值的生產物，而且因為賦稅適中，這生產物的大部分，屬於他們自己，他們可貯蓄起來，用以推動更大的勞動量。英國移民，對於母國的國防和行政費用，從來沒有什麼貢獻。反之，迄今衛護他們所需的費用，幾乎全部由母國支付。海陸軍費用，大大超過必要的行政費用，所以行政費用，總是很少，一般只包括總督、裁判官及其若干警察官吏的適當薪俸，以及最有用的公共工程的維持費。在現今擾亂事件開始以前，馬薩諸塞的行政設施費，往往僅為一年約一萬八千鎊。新議布什爾及羅得島的行政設施費，各為每年三千五百鎊；康涅狄克四千鎊；紐約及賓夕法尼亞各四千五百鎊；新澤西一千二百鎊；弗吉尼亞及南卡羅利納各八千鎊。諾瓦斯科夏及喬治亞的行政費，一部分由議會每年撥款支付。而諾瓦斯科夏每年僅出殖民地行政費大約七千鎊；喬治亞每年僅出大約二千五百鎊。總之，北美全部的行政設施費，除了馬里蘭及北卡羅利納這兩州無正確記載可稽外，在現今擾亂事件開始以前，所費於僑民的，不過每年六萬四千七百鎊；如此少的費用，可以統治三百萬人，而且統治得很好，那真是永遠值得我們記憶的。政府費用的最重要部分即全部防衛費，不斷由母國負擔。在歡迎新總督及新議會開幕之際，殖民地政府的儀式，雖十分隆重，但不鋪張浪費。他們的教會，也是同樣節儉。他們沒有什一稅。他們為數不多的牧師，靠微薄的薪俸或人民的捐款，維持生活。反之，西班牙及葡萄牙政權，在一定程度上仰給於對殖民地所課的稅。法國雖不曾從其殖民地抽取任何可觀的收入，而徵自殖民地的稅，雖大都用在殖民地，但其行政費，卻與其他兩國一樣，是非常大的，而儀式的費用更大。例如，歡

迎一個祕魯新總督，所費就往往不貲。此等儀式不僅使富裕的移民，要在這樣的場合納稅，而且使他們在一切其他場合都養成一種虛榮浪費的習慣。那不僅是暫時的非常苛酷的稅，而且形成永久而更苛酷的稅，即養成能使私人傾家蕩產的奢侈浪費。此外，在這三國的殖民地中，教會也施行苛政。這些地方都抽什一稅；在西班牙及葡萄牙兩國殖民地中，更是雷厲風行。這些殖民地都有很多託鉢和尚的募化，未經政府認可，但被宗教所尊崇，這對貧民是個很大的負擔，他們都受到教導，認為佈施和尚是義務，拒絕佈施是非常大的罪惡。而且，在這三國殖民地內，僧侶都是最大的土地獨佔者。

第四，英國殖民地，在處置其剩餘生產物即自己消費不了的生產物時，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的殖民地，都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擁有更廣闊的市場。各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圖獨佔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並因此故，禁止外國船舶和它們通商，禁止它們從任何外國輸入歐洲貨物。但實施此種獨佔的方法，各國不相同。

有些國家，以其殖民地全部貿易，交給一個專營公司經營。殖民地人民必須向這個公司購買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歐產貨物，並必須把他們剩餘生產物全部賣給這個公司。所以，這個公司的利益，不僅在於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售賣前一種貨物，並以儘可能低的價格購買後一種貨物，而且在於即使後一種貨物價格極低，其購入數量應以能在歐洲市場以極高價格脫售者為限。它的利益，不僅在於在一切場合都降低殖民地剩餘生產物的價值，而且在於在許多場合阻抑其產量的自然增加。要妨礙新殖民地的自然發展，在一切可想象得到的方策中，自以設立公司為最有效。這一方策一直是荷蘭所奉行的政策，雖然荷蘭的公司在本世紀中在許多方面已不行使其獨營權。丹麥的政策，也是如此，直到前一國王即位，才放棄這種政策。法國的政策，有時如此。最近，自1755年以來，歐洲其他一切國家都認為這種政策不合理，把它放棄了，但葡萄牙卻仍奉行此種政策，至少在巴西二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馬倫豪仍實施此種政策。

有些國家，沒有設立這種專營公司，但限制它們殖民地全部貿易，使僅能與母國某特定港通商，除在一定期間准許船隊出航，或准許有特許狀（那大都是給付很高代價領得的）的單船出航外，其他船舶都禁止從此特定港出航。誠然，這種政策，使母國全體居民都能從

事殖民地貿易，只要他們是在適當的港口，在適當的期間，使用適當的船隻進行的就行。但投資裝備船隻並領受此等特許證的商人，爲着利益，將合作起來，所以這樣經營的貿易，必然是按照大體上類似專營公司的經營原則經營的。這種商人的利潤，和專營公司的利潤幾乎是同樣的高。殖民地決不能得到良好供給；它們不得不以極高的價格購買，而以極低的價格售賣。這是西班牙的政策，一直到前幾年爲止；一切歐產貨物的價格，據說，在西屬西印度都很高。烏羅阿告訴我們，在基託，一磅鐵賣價大約四先令六便士，一磅鋼售價大約六先令九便士。但殖民地售賣自己產物，主要是爲了要購買歐洲產物。對於後者，他們付價越大，對於前者，他們實得價格就越小。後者的高價與前者的低價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這一點說，葡萄牙對於派南布科及馬倫豪二省以外的殖民地所採取的政策，和西班牙苦時的政策，完全一樣，而對於那二省，最近則變本加厲。

有些國家，允許它們全體人民經營殖民地貿易。母國人民，得從母國任何港口，與殖民地通商，除了海關的一般證件外，不需要任何特許狀。在這場合，經商者人數衆多，而且散居各地，不能共同結合，他們彼此間的競爭，使得他們不能榨取非常高的利潤。在這樣寬大的政策下，殖民地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售賣他們自己的生產物，購買歐洲的商品了。自從普里木斯公司解散以來（那時我國殖民地還在搖籃時期），這始終已經是英國的政策了。一般說來，這也是法國的政策，而自從英國人通常所稱的密西西比公司解散以來，法國的政策，就一律如此。所以，英法兩國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利潤並不是非常高的，不過要是准許其他各國自由競爭，利潤也許還要低些。這兩國大部分殖民地的歐產商品價格，因此不算異常的高。

在英國殖民地剩餘生產品輸出方面，亦只有一定種類商品，限定輸到母國市場。此等商品，因曾列舉在航海法及此後頒佈的其他法令上，故名爲列舉商品，其餘稱爲非列舉商品，可直接輸到他國，但運輸的船，須爲英國船或殖民地船。此種船隻，須爲英國人所有，其船員亦須有四分之三爲英國人。

美洲及西印度有幾種極重要產物，亦包含在非列舉商品中，例如各種穀物、木材、醃製食品、魚類、砂糖及甜酒。

穀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耕種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對象。法律准許殖民地有極廣闊的穀物市場，這樣就獎勵它們推廣這種耕作，使其產品大大超過稀少人口的消費，從而，預先為不斷增加的人口，儲存着豐富的生活資料。

在樹木滿地的地方，木材價值低廉，甚至沒有價值，於是開拓土地的費用，就成為改良的主要障礙了。法律准許殖民地有極廣闊的木材市場，使得本來價值低廉的商品，生出一個價格，並使它們能夠從本來是完全耗費的事業，收得若干利潤，這樣改良就變得容易了。

在人口還沒稠密，耕作也還沒充分發展的地方，牲畜的繁殖，自會多於當地居民的消費，因此牲畜往往價值低廉，乃至沒有價值。但我們說過，牲畜的價格與穀物的價格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一國的大部分土地才能夠進行改良。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廣闊的市場，想以此來提高這種商品的價值，因為這種商品價格的上漲，對於土地改良是非常重要的。喬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號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為列舉商品，減低了美洲牲畜的價值。上述自由的良好影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這個法令所抵消了。

通過擴展殖民地漁業來增加我國航運業和海軍的力量，似乎是我國議會經常懷抱着的一個目的。因此，這種漁業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給予的一切獎勵，大大繁榮起來。特別是新英格蘭的漁業，在最近的變亂之前，也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漁業之一。捕鯨業，在英國雖有異常的獎勵金，但成績不大，在一般人看來（但我不想作這種意見的證人），它的生產物全部，比每年所付獎勵金的價值，也多不了許多。而在新英格蘭，雖無獎勵金，卻在大規模經營。魚是北美洲與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沿岸各國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砂糖本來也是隻許輸到英國的列舉商品。但1731年，經甘蔗栽種者陳請，砂糖輸出始準擴展到世界各地。但在允許此種自由時，附有各種限制，而砂糖價格在英國又特高，故這自由沒產生大的作用。英國及其殖民地，依然幾乎是英國蔗糖殖民地所產砂糖的唯一市場。它們的消費量增加得很快，雖有牙買加和被割讓各島日益增加的改良，砂糖的輸入在這二十年內仍大有增加，而輸到外國去的，卻據說並不比從前多了許多。

甜酒是美洲與非洲沿岸通商的極重要商品，而從這種通商帶回來的，就是黑奴。

如果美洲各種穀物、醃製食品和魚類的全部剩餘生產物，都定為列舉商品，強迫輸入英國市場，那就過分妨害我們本國人民的勞動生產物了。此等重要商品所以不但不曾定為列舉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穀物及醃製食品，在一般情況下，都被法律禁止輸入英國，那也許並非為了關心美洲的利益，而是為了防止這種過大的妨害。

非列舉商品，原來可輸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及稻米，曾一度定為列舉商品，此後即定為非列舉商品，但准許輸往的歐洲市場，仍限於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各國。依照喬治三世第六年第五十二號法令，一切非列舉商品，都受同樣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歐洲各國，都不是製造業國。所以我們比較不擔心殖民地船，從它們那裏把那些能妨害我們本國製造品的東西帶來。

列舉商品，有二類。第一類，是美洲特有的產物，或是母國所不能生產的產物，至少亦是母國所不生產的產物。屬於這一類的，如蜜糖、咖啡、椰子果、菸草、紅胡椒、生薑、鯨鬚、生絲、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種毛皮、靛青、黃佛提樹及其他各種染色樹木。第二類，非美洲所特有的產物，母國也能夠生產，但其產量不足供應其需要，以致有大部分要仰給於外國。屬於這一類的，如一切海軍用品，船桅、帆桁、牙樁、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鐵、鐵條、銅礦、生皮、皮革、鍋罐、珍珠灰。第一類商品最大量的輸入，亦不能妨礙母國任何生產物的生產與銷售。我們的商人，不僅要想限制這種商品，使僅能輸到本國市場，並由這種限制，使自己能夠在殖民地廉價購買，在國內以較好的利潤售賣，而且要想在殖民地與外國之間，設立一種有利的運送貿易，那必須以英國為中心，就是說，此等商品輸入歐洲，必須先輸到英國。第二類商品的輸入，據說，也須妥為安排，使不妨礙本國同種產物的售賣，而僅妨害外國輸入品的售賣。因為，課以適當的稅，那種商品總會比前者略為昂貴，但比後者低廉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僅能輸入本國市場，並非要妨礙英國產物，所要妨害的，乃是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於英國的那些外國的產物。

禁止殖民地以船桅、帆桁、牙樁、松脂、柏油輸到英國以外的任何國家，自然會降低殖民地木材的價格，因而會增加開拓殖民地土地

的費用，而這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礙。170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規定，除非它的商品由它的船隻裝運，按它自定價格，並按它認為適當的數量運出，否則禁止其輸出，它企圖通過這辦法來擡高其商品到英國去的價格。爲了要對抗這一個令人注意的商業政策，並使英國儘可能不僅不依賴瑞典，而且無須依賴北方任何其他國家，英國對於美洲海軍用品的輸入，發給獎勵金。這種獎勵金，使美洲木材價格擡高到大大超過木材限定輸入國內市場所能減低的程度。因爲這兩個規定是同時頒佈的，其連帶的作用，不是妨礙美洲土地的開拓，而是鼓勵其開拓。

生鐵和鐵條，雖亦爲列舉商品，但從美洲輸入，免納重稅，而從其他各國輸入，卻得納重稅，所以這規則一部分起鼓勵美洲制鐵廠建設的作用，另一部分起妨礙的作用，而鼓勵的作用比妨礙的作用大。沒有一種製造業，能象熔鐵爐那麼需要柴火的消費，或能象熔鐵爐那麼促進樹木遍野的地方的開拓。

這些規定，有些會提高美洲木材的價值，因而促進土地的開拓。但這種趨勢，既不爲立法機關所注意，亦不爲立法機關所理解。其有利效果，雖就這方面說全是偶然的，但並不因此而真實。

英領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間的貿易，無論就列舉商品說或就非列舉商品說，都有最完全的自由。此等殖民地，現在是那麼富庶，所以彼此間，對於彼此所有的產物，都能提供廣大的市場。把這一切殖民地合起來看，那對於彼此的產物，就是一個大的國內市場了。

但英國對其殖民地貿易所採用的寬大政策，大體上限於原料或粗製品的貿易。至於殖民地產物更精緻的加工，英國商人和製造者要自己經營，並請求國會，以高關稅或組對禁止，使這些製造業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例如，從英領殖民地輸入粗製砂糖，每百斤僅納稅六先令四便士，白糖納稅一鎊一先令一便士，單制或複製的精製糖塊，納稅四鎊二先令五又二十分之八便士。在課稅如此苛重時，英國是英領殖民地砂糖輸出的唯一市場，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場。這種高的關稅，起初等於禁止白糖或精製砂糖，使不能供應外國市場，現在又等於禁止製造白糖或精製砂糖，使不能供應那也許可銷其全產量十分之九以上的市場了。因此，法國蔗糖殖民地有很發達的砂糖精製業，但在英國殖民

地上，除供應殖民地本地市場的精製業外，簡直沒有其他砂糖精製業。當格倫納達由法國人佔領時，其他各蔗園，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廠。但一經英國人佔領，這一類製造廠就幾乎全部放棄了。現今（1773年10月）我相信，這島上至多不過有二、三個廠。但是，現今因為海關寬縱，白糖或精製糖，若能從塊狀研成粉末，通常可作為粗砂糖輸入。

英國，一方面允許生鐵和鐵條從美洲無稅輸入（由他國輸入，則不能免稅），以獎勵美洲這種製造業，另一方面卻又絕對禁止在任何英領殖民地上建立制鋼廠及鐵工廠。它甚至不允許其殖民地人民為自身消費而製作這種精製品，卻要他們向它的商人和製造者購買他們所需要的這一類物品。

它又禁止由水運，甚至由車馬陸運，把美洲生產的帽、羊毛和毛織物，從一省運至另一省。這種條例，很有效地使這個殖民地不能為遠地販賣而建立這一類商品的製造業，這樣就使殖民地人民只能經營通常僅供自用或其同省鄰人使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製造業。

禁止人民大眾製造他們所能製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把自己的資財與勞動，投在自己認為最有利的用途上，這顯然是侵犯了最神聖的人權。然而，此種禁令，雖是那麼不公正，但沒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殖民地。土地仍是那麼低廉，勞動仍是那麼昂貴，以致他們仍能以比自己製造更低廉的價格，從母國輸入幾乎一切種類的精製品。所以，即使不禁止他們建立這一類製造業，但在現有改良情況下，他們一考慮到自己的利益，也許就會使他們不願經營這種事業。在他們現有的改良情況下，此等禁令，也許沒拘束他們的勞動，沒使他們的勞動不能投在按自然趨勢要投的用途上。不過這是母國商人和製造者，由於無根據的嫉妒毫無理由地加在他們身上的無禮的奴役標記。但在比較進步的情況下，這種禁令，很可能成為不能容忍的真正的壓迫。

英國把殖民地某幾種極重要產物，限定輸入它的市場，作為補償，它又使殖民地某幾種產物在這市場裏佔有某種優勢，其所用的方法是對由他國輸入的同種產物課以高關稅，而對由殖民地輸入的則給予獎勵金。按前一種方法，它在國內市場裏給予殖民地的砂糖、菸草和鐵以上述好處，按後一種方法，它給予殖民地的生絲、大麻、亞

麻、靛青、海軍用品和建築木材以輸入獎勵金。以獎勵金獎勵殖民地產物輸入的這第二種方法，據我所知，是英國所特有的。第一種方法卻不是這樣。葡萄牙不滿足於僅以高關稅限制菸草從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輸入本國，而乾脆禁止其輸入，違者重罰。

關於歐洲貨物的輸入，英國對於殖民地的處置，也比任何其他國家寬大。

英國對於外貨輸入時所納的稅，準其在再輸出時，退還一部分。那幾乎都是一半，一般是大部分，有時是全部。如果外貨輸入英國時須課極重的稅，而在再輸出時又不許退還任何部分，那就沒有一個獨立的外國會承受這種再輸出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輸出時退還部分的稅，否則重商主義耶麼提倡的運送貿易，便會告終了。

但我們的殖民地，並不是獨立的外國，而英國又取得了以一切歐洲商品供給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權利，英國正可象他國對付殖民地一樣，強制其所屬殖民地，承受這種在輸入母國時課有重稅的商品。但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貨，在輸到我國殖民地時和輸到任何獨立外國時一樣要退稅。不過，1763年喬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號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這種寬大待遇，它規定：“歐洲或東印度的農產品、製造品，從本王國輸到任何英屬美洲殖民地時，稱為舊補助稅的那一種賦稅的任何部分不得退還，但葡萄酒、白洋布、細洋布除外。”在這法律頒佈之前，有許多種外國貨，在殖民地購買比在母國購買價廉；現在，有些貨物仍然如此。

在制定關於殖民地貿易的大部分條例時，都以經營殖民地貿易的商人為主要顧問，那是必須知道的。所以，此等條例，在更大程度上注意這種商人的利益，在較小程度上注意殖民地或母國的利益，那是一點也不足怪的。他們有專營的特權，可以輸運歐洲貨物供應殖民地，又可以購買殖民地不妨害他們國內貿易的那部分剩餘生產物。這種專營的特權，顯然是犧牲殖民地的利益，來顧全商人的利益。他們在把歐洲及東印度大部分貨物再輸到殖民地去的時候，又象再輸到獨立國家去一樣，享有退稅。這種退稅，即按照重商主義的利益觀念，亦是犧牲母國利益，來顧全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於，對運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國貨物，儘可能少納稅，對輸入英國的外國貨物，儘可能收回所墊付的稅。這樣他們就能在殖民地售賣等量貨物，得到較多

利潤，或售賣較大數量貨物，得到同樣多的利潤，因而能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得利。殖民地的利益同樣在於，以儘可能低的價格，取得儘可能多的這一切貨物。但母國的利益，未必總是這樣。退還此等貨物輸入時所納稅的大部分，會影響母國的收入；由於有了這種退稅，外國製造品得以更便易的條件運到殖民地，使得母國製造品在殖民地市場跌價售賣，這就會影響母國的製造業。人們常說，德國亞麻布再輸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稅，大大推遲了英國亞麻布製造業的進步。

但是，關於殖民地貿易，英國的政策，雖和其他各國一樣，受着重商主義精神的支配，但總的說來，不象任何其他國家那麼偏狹、那麼令人難受。

除了對外貿易，英屬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說，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在一切方面，他們的自由，都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樣有個人民代表議會來保證這自由，人民代表議會，獨享有權力課稅以維持殖民地政府。這個議會的權力，超越行政權力，即最卑賤或最可憎惡的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憂懼總督或省內文武官吏對他們的憤怒。殖民地議會，和英國衆議院一樣，未必都是極平等的人民代表機關，但總更具有這種性質。行政機關也許無力收買議會，而且因為行政機關經費由母國支付，亦無收買議會的必要。所以，一般地說，這種議會也許更受選舉人意旨的影響。殖民地參議院，與英國貴族院相當，但不是由世襲的貴族構成。在一些殖民地，例如在新英格蘭的三個殖民地，此等參議院議員，非由政府指派，卻由人民的代表推選。沒有一個英屬殖民地有世襲的貴族。在所有殖民地，象在其他自由國家一樣，老殖民家族的後裔，雖比有同等功績同等財產的暴發戶受到人們更大的尊敬，但亦只更受人們尊敬，並沒有煩擾鄰人的特權。在現今的變亂開始以前，殖民地議會，不僅有立法權，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權。在康涅狄克及羅得島，總督亦由議會選舉。在其他殖民地上，會議規定的賦稅，由會議直接派員出去徵收，徵收員對議會直接負責。所以，人民在英屬殖民地，就比在母國更為平等了。他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其政府，尤其是新英格蘭那三個政府，一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的專制政治，卻又在它們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來。此種政治，大都以獨斷權授與一切下級官吏，由於相隔遙遠，此等獨斷權的執行，目比平常還要強暴。我們知道，在一切專制政治之下，首都總比較更有自由。君主自己，不想破壞正義的制度，不想壓迫人民大眾，這對他亦無利。首都為君主所在地，下級官吏有所威懾，但在遠地，人民的怨聲，不容易傳到君主耳裏，下級官吏乃得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但是，歐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總比以前為人所知的最大帝國的最遠省份要遠得多。自有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屬殖民地政府，能給那麼遙遠的省區人民，以完全的保護。法國殖民地的行政，與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殖民地的行政相比，總是較為寬宏溫和。這種較好的政治，和法國民族的性格相稱，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稱，他們政府的性質，與英國相比，雖較為專橫，然與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則比較守法、比較自由。

英國殖民地政策的優越，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進步上表現出來。法國蔗糖殖民地的進步，與英國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進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勝一籌，但英國蔗糖殖民地，卻和英屬北美殖民地幾乎享受同樣的自由政治。不過，法國沒象英國那樣阻礙殖民地精製自產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們政府的特質，使他們對於黑奴，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一切歐洲人殖民地內，甘蔗都由黑奴栽種。生長在歐洲溫帶的人民的體格，據說，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從事挖土勞動。就今日情況說，栽種甘蔗，都是手工勞動。許多人認為，使用錐犁，當大有利。但犁耕的利潤與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牛馬的良好管理，奴隸耕作的利潤與成效，必同樣取決於奴隸的良好管理。我想，一般都承認，法國種植者比英國種植者更擅長於管理奴隸。對奴隸給予些微保護，使不大受主人欺凌的法律，似乎在政治十分專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可能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設有不幸的奴隸法規的國家，地方長官在保護奴隸時，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財產管理。在自由國家，主人或為殖民地議會代表，或為代表的選舉人，所以地方長官，非經充分考慮，不敢干涉他們。地方長官不得不把他們放在眼中，這樣就使他難於保護奴隸了。但在政府十分專制的國家，地方長官常常干涉個人的私有財產管理，要是個人不

依他的意見管理，他也許發出拘票逮捕他們，所以，他要保護奴隸，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會使他這樣做。地方長官的保護，使主人不敢輕視奴隸，因而不得不給予相當的重視，和比較溫和的待遇。溫和的待遇，使奴隸不僅更誠實，而且更聰明，因此變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於自由傭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主人忠實，並照顧主人利益。自由傭人常有的這種德行，奴隸決不會有。在主人有完全自由並不受干涉的國家，奴隸一般受着奴隸的待遇。

我相信，一切時代和一切國民的政策，都可證明這種議論，即奴隸在專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在古羅馬史上，第一個保護奴隸，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長官，就是皇帝。維迪阿·波利奧，在奧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僅僅犯了一點小過失的地的一個奴隸，截成小塊，投入池中餵魚，皇帝大為憤怒，命令立即將此奴釋放，並把他的其他奴隸同時釋放。在共和政治下，長官不能有充足的權力來保護奴隸，更談不上處罰主人了。

應該指出，用以改良法國殖民地尤其是聖多明各大殖民地的資本，幾乎全部來自此等殖民地逐漸的改良與開墾。那幾乎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勞動的產物，換言之，是由良好經營而逐漸蓄積並用以生產更多產物的那部分產物的價格。但英國蔗糖殖民地改良及開墾的資本，卻有大部分來自英國，並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勞動的生產物。英國蔗糖殖民地繁榮的主要原因，是英國財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如果我可這樣說）此等殖民地。但法國蔗糖殖民地繁榮的全部原因，卻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經營。法國移民，在這一點上，優於英國移民。這個優點，在奴隸的良好管理上最明白地顯現出來了。

以上所述，是歐洲各國對所屬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綱。

所以，關於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後此的繁榮（僅就內政方面說），歐洲政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地方。

支配着最初計劃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動機，似乎是癡想與不義。探求金銀礦山，足見其癡想；貪圖佔有一個由從未損害歐洲人，而且親切殷勤地對待歐洲最初冒險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國家，足見其不義。

後來建立殖民地的冒險家，似乎除了妄想尋覓金銀礦山外，還有其他比較合理比較可稱頌的動機，但就是此等動機，亦不是為歐洲政策增光。

英國的清教徒，因在國內受限制，逃往美洲以求自由，並在新英格蘭建立了四個政府。英國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為不公，亦逃至美洲，在馬里蘭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則在賓夕法尼亞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猶太人，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財產被剝奪，而且被趕到巴西，他們以身作則地在原為流犯與娼婦居住的殖民地，傳入了某種秩序與產業，並教他們栽種甘蔗。所以，在這些場合，使人民僑居美洲並從事耕作的，並不是歐洲各國政府的智慧與精明，而是它們的亂政與橫暴。

歐洲各國政府，對於建立這種殖民地的一些最重要的計劃和計劃的實現，都沒有一點功績。墨西哥的征服，不是西班牙樞密院的計劃，而是古巴總督的計劃。而使此計劃實現的，乃是大膽冒險家的精神。總督把這種任務交給一個冒險家，不久就懊悔，遇事加以掣肘，但不能使這計劃失敗。智利及祕魯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陸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此等地方時，除了得到西班牙國王允許並以他的名義，建設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國家的任何獎勵。這班冒險家，都是自己冒危險出費用的。西班牙政府，沒對他們有什麼貢獻。至於英國政府，則對其所屬一些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拓殖，也同樣沒有貢獻。

但在此等殖民地已經建立，而且相當可觀，足以引起母國政府的注意時，母國最初對它們頒佈的一些條例，其目的總在於保證它獨佔此等殖民地的貿易，限制它們的市場，犧牲它們以擴大自己的市場，因此，與其說促進它們的繁榮，倒不如說加以壓抑。不過，歐洲各國施行此種獨佔的方法，並不相同，這就是歐洲各國殖民政策大相逕庭的一點。其中，最好的是英國的方法。但英國的殖民政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不象其他國家的殖民政策那麼偏狹、那麼苛刻罷了。

這樣說來，歐洲政策，究竟在什麼方面有助於美洲各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現在的繁榮呢？在一個方面，只在一個方面，有很大的幫助。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夠完成如此偉大事業，建立如此偉大帝國的人才。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政策，能夠造就這種人才，實際上亦不曾造就此種人才。這些殖民地應當把它們富有積極進取心的建設者所受的教育與他們所以具有偉大眼光歸功於歐洲政策。一些最大

最重要殖民地，就其內政說，亦就只有這一點，應歸功於歐洲的政策。

美洲殖民地從歐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如上述。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所得的利益是怎樣呢？

這些利益可分成二類。第一，作為一個大國，歐洲從此等大事件所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各殖民國從所屬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它們對所屬殖民地都享有統治權。

作為一個大國，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
（一）這大國的享樂用品增加了；（二）這大國的產業增大了。

輸入歐洲的美洲剩餘生產物，給這大陸居民提供了許多種類的商品，要不是由於美洲的發現和拓殖，他們是不可能有這些商品的，其中有的是便利品與有用物品，有的是裝飾品，因此增加了他們的享樂用品。

顯而易見，美洲的發現與拓殖，促進了以下各國的產業：（一）與美洲直接通商的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二）不直接與美洲通商，但以他國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貨物送到美洲的國家，如奧屬法蘭德斯和德國的某幾省。這一切國家，顯然都有比較廣闊的市場，來銷售他們的剩餘生產物，因而必然受到鼓勵來增加剩餘生產物的數量。

這類大事件，對於不曾把自己生產的物品輸出到美洲去的國家如匈牙利和波蘭，是否也產生促進產業的作用，雖沒有那麼明顯，但這類大事件的這個作用，卻是無可懷疑的。美洲生產物，有一部分是在匈牙利和波蘭消費；那裏，對於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菸草，亦有若干需要。這類商品的購買，必須用匈牙利和波蘭產業產物或用若干此等產物購入的東西來購買。美洲的這類商品，乃是新的價值，新的等價物，輸出到匈牙利和波蘭，交換那裏的剩餘生產物。這類商品輸到那裏去，就給那裏的剩餘生產物開闢出一個新的較為廣闊的市場，提高它的價值，因而促進它的數量的增加。所以，那裏的剩餘生產物，雖可能沒有任何部分輸出到美洲，但可輸到其他國家，由其他國家用一部分美洲剩餘生產物來購買。這種貿易原來是由美洲剩餘生產物引起的，有賴於這種貿易，匈牙利和波蘭的剩餘生產物才找到了市場。

這類大事件，對於不曾把物品輸到美洲而且沒從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國家，也可能起增加享樂用品和增進產業的作用。就是這些國家，也可能從那些與美洲通商因而增加了剩餘生產物的國家收到更多的其他商品。這種更多的商品，必然增加它們的享樂用品，所以必然增進其產業。有更多新的等價物呈現在它們面前，來交換它們產業的剩餘生產物了。這樣就給這個剩餘生產物創造了更廣闊的市場，提高它的價值，因而促進它的數量的增加。每年投入歐洲大商場，並通過週轉，每年分配給歐洲各國的商品總量，必由於美洲全部剩餘生產物而增加。這個總量加大了，分歸各國的數量亦會加大，這樣就會增加它們的享樂用品，促進它們的產業。

母國專營的貿易，會減少母國特別是美洲殖民地的享樂用品和產業，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發展。這是使人類大部分事務所賴而推動的大發條之一的活動受到阻抑的一種巨大力量。這種專營貿易使殖民地產物在一切其他國家騰貴起來，這樣就減少殖民地生產物的消費，因而縮減殖民地的產業和一切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因為享樂用品須付較高價格，享樂用品便減少，生產所得的價格較低，生產便減少。這種專營貿易，又使一切其他國家產物在殖民地騰貴起來，這樣也就縮減一切其他國家的產業，並縮減殖民地的享樂用品與產業。這是一個障礙物，某些國家，為了想象上的利益，妨礙了一切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而殖民地所受的妨礙尤大。它不僅儘量排斥所有其他國家，使不能進入某一市場，而且儘量限制殖民地使僅能在某一市場貿易。封閉某一市場而開放其他一切市場，開放某一市場而封閉其他一切市場，這是完全兩回事。但殖民地剩餘生產物是歐洲從美洲的發現和拓殖得以增進享樂用品和產業的源泉，而母國的專營貿易卻能大大損害這富足的源泉。

各殖民國家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亦有二種。（一）各帝國從所屬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二）那些據說由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這一非常特異的性質造成的特殊利益。

各帝國從所屬領地得到的一般利益如下：（一）各領地所提供的保衛帝國的兵力；（二）各領地所提供的維持帝國民政的收入。歲馬殖民地，有時同時提供了這兩種利益。希臘殖民地，有時提供兵力，但幾乎不曾提供任何收入。它們幾乎不承認它們應受母市統治。在戰

時，它們通常是母市的同盟，但在平時，它們的人民幾乎不是母市的屬民。

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從來不曾提供任何兵力來保衛母國。它們的兵力，不足以保衛它們自己；在母國加入戰爭時，它們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國要大大分散其兵力，來保護所屬殖民地。所以，在這一點上，一切歐屬殖民地，與其說使母國強大，無寧說使母國削弱，一切都如此，沒有一個例外。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提供了若干收入，以防衛母國或維持母國民政。至於歐洲其他各國，尤其是英國，對殖民地所課的稅，能與平時所付的費用相等，已屬罕見，若要支付戰時殖民地所增加的費用，那就無論如何也是不夠的。所以，這樣的殖民地，對其母國，只是負擔，不是財源。

所以，各母國從此等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後一種利益了，即據說，由具有美洲殖民地這種非常特殊性質的領地造成的利益。大家又認為，這一切特殊利益的唯一泉源乃是專營貿易。

這種專營貿易的結果，那一部分被稱為列舉商品的英屬殖民地剩餘生產物，就只能輸往英國，不能輸往任何其他國家了。後來，其他國家，不得不向英國購買。於是，這類物品，在英國必比在任何其他國家低廉，因此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進英國享樂用品的增加，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進英國產業的增加。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英國在以本國剩餘生產物交換此等列舉商品時，必然得到更好的價格。例如，英國的製造品，與任何其他國家同種製造品比較，能購得更大數量它所屬殖民地的砂糖與菸草。所以，在英國製造品及他國製造品都用以交換英屬殖民地砂糖及菸草時，這種優越的價格，就使英國製造業得到一種獎勵，而其他各國，在這情況下，不能享有這種獎勵。由於殖民地專營貿易減少了，至少是阻抑了，不能經營此種貿易的國家的享樂用品與產業，所以對於能經營此種貿易的國家，就提供一種顯然比其他國家優越的利益了。

但這種利益，與其說是絕對的利益，無寧說是相對的利益；實施此種專營貿易的國家，享有優越的利益，與其說是由於獎勵本國的產業與生產，使其發展超過貿易自由下自然會有的發展，倒不如說是由於阻抑其他各國的產業與生產。

例如，馬里蘭和弗吉尼亞菸草，就因為英國享有獨佔權，能以較廉的價格輸入英國。至於法國，所需菸草的大部分，通常從英國轉運，所以此等菸草在法國的價格較為昂貴。如果法國及歐洲一切其他國家，都能隨時與馬里蘭和弗吉尼亞自由通商，那末此等殖民地的菸草，就不但能以比今日實際價格低廉的價格輸入一切其他國家，而且能以更低的價格輸入英國。但菸草市場既較往昔廣大得多，其產量或可大大增加，以致栽種菸草的利潤——據說今日還是稍稍越過自然的標準——降落到和栽種穀物的利潤相同的自然水平。菸草價格可降落到，略低於今日的價格。於是，與今日比較，英國及任何其他國家，都能以同量商品，在馬里蘭和弗吉尼亞，購買較大數量的菸草，因而能在那裏，以更好的價格售去它們的商品。所以此種菸草，如果由於豐饒低廉，能增進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享樂用品或產業，那末在貿易自由的場合，就一定會比今日在這兩方面有更大的成果。在這場合，英國就沒有優於他國的任何利益。它也許要以比今日略低的價格購買其殖民地的菸草，因而以比今日略高的價格，售賣它本國的商品，但與他國比較，它既不能以較低的價格購買前者，亦不能以較高的價格售賣後者。它這時也許會得到一種絕對的利益，但一定會失去相對的利益。

但是，我們有充分理由可相信，英國爲了要取得殖民地貿易上這種相對的利益，爲了要實施儘量排斥他國分享殖民地貿易那一種惹人惡感的有害計劃，不僅犧牲了它和一切其他國家本來能從此種貿易取得的絕對利益的一部分，而且使它自己幾乎在一切其他貿易部門上，忍受一種絕對的不利和一種相對的不利。

在英國依據航海條例而獨佔殖民地貿易時，先前投在這種貿易上的外國資本不得不撤除出去。先前經營這貿易的一部分的英國資本，現今要經營這貿易的全部。先前以殖民地所需歐洲產物的一部分供給殖民地的英國資本，現今要以殖民地所需歐洲產物的全部供給殖民地了。但英國資本不能供給這所需的全部，於是由英國資本供給的商品，必然以很高價格在殖民地出售。而且，原先只購買殖民地剩餘生產物一部分的資本，現在又用來購買其全部了。但這樣的資本，決不能依照和原價差不了多少的價格，把這全部買去，因此它所買的物品，又必然是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買的。但在資本的使用方面，商人能

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出售，而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購買，其利潤必然是非常的大，必然大大超過其他貿易部門普通利潤的標準。殖民地貿易利潤的優越，必然把其他貿易部門資本的一部分吸引過來。資本這樣的轉移，必然逐漸增加殖民地貿易中資本的競爭，因而必然逐漸減少其他貿易部門中資本的競爭；必然逐漸減低前者的利潤，因而必然逐漸提高後者的利潤，使一切的利潤，達到一個新的水平，這一個新水平，與舊水平不同，而且比舊水平略高。

這雙重的結果——從一切其他貿易吸引資本；提高所有貿易的利潤率，使略高於先前的利潤率——不僅是此種獨佔權知立時所產生的結果，而且是有此種獨佔權以來所繼續產生的結果。

第一，這種獨佔權，不斷地從一切其他貿易吸引資本，使投入殖民地貿易。

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財富雖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其增加，必定沒和殖民地貿易的增加，保持同一的比例。一國的國外貿易，自然按其財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其剩餘生產物又自然按其全生產物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國吞併了幾乎所謂殖民地國外貿易的全部，而其資本，卻沒和殖民地國外貿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斷地從其他貿易部門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裏的資本，並吸取比原先投在那裏的更大的資本，就將無法經營。因此，自從航海條例訂立以來，殖民地貿易不斷增加，而其他許多國外貿易部門，尤其是對歐洲其他各國的國外貿易，卻不斷凋落。我國以供外銷為目的的製造品，不象航海法未訂立以前那樣，適合於鄰近的歐洲市場，或適合於較遠的地中海周圍各國的市場，而卻有較大部分，適合於更遠的殖民地市場，換言之，不適合於有許多競爭者的市場，而適合於享有獨佔權的市場。德克爾爵士及其他作家，研究其他國外貿易部門衰落的原因，說是賦稅過重，課稅方法不當，勞動價格昂貴，奢侈增加等等。其實，殖民地貿易的過度膨大，可以說是這原因的全部。英國的商業資本雖很大，但不是無限的；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資本大大增加，但沒和殖民地貿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斷地從其他貿易部門吸取一部分資本，因而使其他貿易部門在一定程度上衰落，那就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經營這種貿易。

應該指出，不僅在航海條例已使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得以鞏固以前，而且在殖民地貿易尚未盛大以前，英國就已經是個大商業國，其商業資本已經很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大。在克倫威爾當政時期，在對荷戰爭中，其海軍比荷蘭海軍強大。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發的戰爭中，英國海軍的實力至少和荷法二國聯合海軍相等，也許還要強大。這種優越的海軍力量，現今似未增大，至少在荷蘭海軍對荷蘭商業今昔都保持同一比例的場合是這樣。但在這兩次戰爭中，這強大海軍力量，並不歸功於航海條例。第一次戰爭中，這個條例，剛剛擬訂計劃；第二次戰爭爆發前，這個條例雖已制定完成，但時間不久，還不可能產生大的成效，而條例中建立殖民地專營貿易的部分，則尤少成效。與今日比較，那時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貿易，都是不足道的。牙買加島還是一個不適居住的荒島，沒有什麼居民，更沒有什麼耕作。紐約和新澤西為荷蘭佔有；聖克里斯托弗有一半為法國所佔領。安提瓜島、南北卡羅利納、賓夕法尼亞、喬治亞、諾瓦斯科夏還沒殖民。弗吉尼亞、馬里蘭、新英格蘭已經殖民，它們雖是極繁榮的殖民地，但在那時，歐洲或美洲也許沒有一個人能預先料到，即使猜想，那裏的財富、人口和改良後來會有那樣急速的進步。在英國各殖民地中，當時的情形與今日情形相類似的只有巴巴多斯一個島。殖民地貿易（即在航海條例訂立以後若干時間內，英國僅佔有此種貿易的一部分，因為航海條例在訂立幾年以後，才被嚴格執行），決不能在當時成為英國貿易盛大的原因，亦不能在當時成為海軍力量強大的原因。當時支持英國強大海軍力量的貿易，是歐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國的貿易。但英國今日所享有的這種貿易，在當時怕就不夠支持如此強大的海軍力量。如果殖民地日益增長的貿易，任由一切國家自由經營，那末英國所得而佔有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歸於英國——定然是它原先佔有的大貿易的附加部分。獨佔的結果，殖民地貿易增加了，但與其說增加了它原先佔有的貿易，倒不如說引起了貿易方向完全的改變。

第二，這種獨佔權必然會提高英國各種貿易部門的利潤率，使其超過一切國家都可自由與英屬殖民地通商時的自然利潤率。

由於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必然使大部分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殖民地貿易，所以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排斥一切外國資本，

必然減少投在此種貿易上的資本的總量，使少於自由貿易下自然會有的資本量。但由於獨佔會減少這貿易部門中資本的競爭，所以必然會提高這貿易部門的利潤率。由於它減少一切其他貿易部門英國資本的競爭，所以必然提高一切其他貿易部門的英國利潤率。自航海條例訂立以來，英國商業資本，在任一時期的狀況與範圍，不管是怎樣，但在這狀況延續的期間，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必然提高英國普通利潤率，使英國這一貿易部門及一切其他貿易部門的利潤率，高於沒有這種獨佔的場合。如果英國普通利潤率，從航海條例訂立以來，已大大降落——確已大大降落——那末，要是沒有這個條例所建立的獨佔權促其提高，它就一定會落得更低。

但是，什麼使一國違反自然趨勢，提高其普通利潤率，必然使它的各種無獨佔權的貿易蒙受絕對的和相對的不利。

加使它蒙受絕對的不利，因為在此等貿易部門，它的商人如不以比原來更高的價格售賣外國輸入品及本國輸出品，就不能取得這較大的利潤。他們的國家必須貴買貴賣，必須少買少賣，而它的享受和生產必然比它原來所能享受和生產的少。

那使它蒙受相對的不利，因為在此等貿易部門，不蒙受絕對不利的其他國家，和它比較，將處於較前更有利的地位，或處於不象從前那麼不利的地位。於是，其他國家，能因此比它享受更多，生產更多。就是說，那便增大它們的優勢，或減小它們的劣勢。由於提高了它生產物的價格，它使其他國家的商人，能在國外市場上以比它低的價格出賣，因而把它不曾享有獨佔權的那一切貿易部門的商品，從外國市場排除出去。

我國商人常常埋怨說，英國工資高昂，是他們製造品在外國市場賤賣的原因，但關於他們資本利潤的高昂，他們卻三緘其口。他們常常埋怨他人的過分利得，但對他們自己的過分利得，卻默然不發一言。英國資本利潤的高昂，和英國勞動工資的高昂，在許多場合，一樣起了提高英國製造品價格的作用，在若干場合，則前者尤有此種作用。

我們可恰當地說：英國資本，就在這情況下，有一部分，從我國未曾享有獨佔權的各種貿易部門，尤其是歐洲貿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中，被吸引過去，有一部分，被排除出去。

一部分是這樣被吸引過去的，殖民地貿易繼續增大，一年一年總是感到經營殖民地貿易的資本的不足，造成殖民地貿易的高利潤，這種高利潤，把這些貿易部門的資本吸引過去。

一部分資本是這樣被排除出去的，英國建立的高利潤率使其他各國，在英國不享有獨佔權的一切貿易部門中，都處於優勢。這種優勢，把資本從這些貿易部門排除出去。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把一部分原要投在其他貿易部門的英國資本吸引過去，它也使許多在殖民地無獨佔權時不會投在這些部門的外國資本流入這些部門。它使英國資本在這些貿易部門上的競爭減少了，因而使英國的利潤率增高，超過應有水平。反之，它使外國資本的競爭增加，因而使外國的利潤率減低到不應有的水平。這兩種作用，顯然使英國在其他貿易部門蒙受相對的不利。

也許有人說，什麼都沒象殖民地貿易對英國那麼有利，而獨佔迫使較大部分的資本，投入這種貿易，這樣就使這種資本轉到對英國更有利的用途。

對於資本所屬的國家，最有利的資本用途，乃是能夠維持最大生產性勞動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勞動年產物的用途。本書第二篇曾經指出，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與其往返的次數，恰成比例。例如，一千鎊資本，投在一年經常往返一次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所能繼續僱用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等於一千鎊每年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如果一年往返二次或三次，則所能繼續僱用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等於二千鎊或三千鎊所能維持的本國生產性勞動量。所以，一般地說，對鄰國進行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對遠國進行的更有利。由於同一理由，一般地說，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比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更有利，這一點我們亦在第二篇指出了。

但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就其對英國資本用途的影響來說，卻在一切場合，都迫使一部分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而在多數場合，迫使一部分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第一，在一切場合，殖民地貿易的獨佔，都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在一切場合，都迫使一部分資本，從歐洲貿易及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流入更遠的美洲貿易及西印度貿易。美洲貿易及西印度貿易，不僅因為距離較遠，而且因為此等地方情況特殊，往返的次數較少。我們說過，新殖民地總感到資本不足。新殖民地的資本，總是比它們能夠大大有利地用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資本少得多。所以，它們總是不斷需要自己資本以外的資本。為要彌補自己的不足，它們儘可能設法向母國借債，所以它們對於母國總負有債務。但殖民地人民借款的最普通方法，不是立據向母國富人借貸（雖然他們有時也這樣做），卻是儘可能拖欠來往商人，即以歐洲貨物供給他們的商人的款項。他們每年的還款，往往只達欠款的三分之一，有時還不及三分之一。於是，他們的來往商人，墊付給他們的全部資本，很少能夠在三年以內歸還英國，有時甚至不能在四年五年內歸還。但是，五年才往返一次的英國資本一千鎊，其能經常僱用的英國勞動也只及一年往返一次的英國資本一千鎊的五分之一。這樣，這一千鎊資本一年內所能繼續僱用的勞動量，僅等於二百鎊資本一年內所能繼續僱用的勞動量了。美洲移民，以高價購買歐洲的貨物，以高利息購買遠期的期票，以大佣錢調換短期的期票，雖可彌補其來往商人因他付款延期而蒙受的損失，甚或彌補這損失而有餘，但這隻能彌補其來往商人的損失，不能彌補英國的損失。在往返期間相隔很遠的貿易中，商人的利潤可能和在往返期間相隔很近而且往返次數很多的貿易中一樣大，甚或更大；但他居住國的利益，他居住國所能繼續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他居住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必定因此而少得多。與歐洲貿易比較，甚至與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比較，美洲貿易的往返期間相隔更遠，而且更不確定、更不規則，西印度貿易尤甚，我想凡對這些貿易部門略有經驗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

第二，在多數場合，殖民地貿易的獨佔，都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直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間接的消費品國外貿易。

不能運送到英國以外任何市場去的列舉商品，有幾種在數量上大過英國的消費額，因此不得不以一部分輸到其他各國。但是，要這樣做，不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流入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那就無法辦到。例如，馬里蘭和弗吉尼亞每年送到英國去的菸草，在九萬六

千桶以上，但英國消費額，據說卻不過一萬四千桶。於是，有八萬二千桶以上的菸草，必須輸出到法國、荷蘭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國去。運這八萬二千桶菸草到英國，再把它輸出到其他國家，並從其他國家挽回貨物或貨幣的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就是投在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上，而且必須投在這用途上，以售脫這個大的剩餘。如果計算此種資本全部，要多少年才能回到英國，我們必須在對美洲貿易往返期間上，加上對其他各國貿易往返的期間。如若我國投在對美洲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資本，非三年四年不能回到英國，那末投在這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上的全部資本，就非四年或五年不能回到英國了。與一年往返一次的資本比較，如果前者能夠繼續僱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本國勞動量，那末後者就只能繼續僱用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本國勞動量了。在某幾個輸出港上，外國商人輸出菸草，往往可賒欠。在倫敦港，通常以現錢售賣，通例是現秤現付。所以，在倫敦港，全部迂迴貿易的最後往返期間，僅比美洲貿易的往返期間，多了堆棧停留不賣的期間；但這期間，有時也是夠長的。倘若殖民地菸草不僅僅售給英國市場，那末輸入我國的菸草，也許只不過我國國內所需之數。在這情況下，我國現在以這大量剩餘菸草輸到他國而用售得之款購回的供本國消費的物品，也許就要用本國產業的直接產物或本國若干製造品來購買。現在，我國產業的直接產物或製造品，幾乎全部只供應一個大市場，但若經這種變化，那也許會供應很多較小的市場。英國現在經營一個大的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但若經這種變化，那也許會經營很多小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由於往返頻繁，只需現在經營這一個大迂迴消費品國外貿易的資本的一部分，也許只需一小部分，即不過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夠經營很多小的直接消費品國外貿易，就可繼續僱用等量的英國勞動，就可同樣維持英國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樣，這種貿易的各方面，就需要少得多的資本，就有大量剩餘資本，可用於其他用途，即改良土地，增加製造業，擴張商業，至少也可以與投入這一切用途的其他英國資本相競爭，從而減低這一切用途的利潤率，使英國在這一切用途上，對其他國家，佔有比現今更優越的地位。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也迫使一部分英國資本，從消費品國外貿易，流入運送貿易，因而使多少用以維持英國產業的資本，有一部分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產業，有一部分用來維持其他各國的產業。

例如，用這八萬二千桶剩餘菸草每年再輸出而每年購回英國的貨物，並不完全在英國消費。其中，有一部分，例如從德意志和荷蘭購回的麻布，必須運到殖民地去，專供它們消費。但是，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即用以購菸草而以菸草購麻布的那一部分英國資本，必不能再用來維持英國的產業，而全部被抽出去，一部分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產業，一部分用來維持那些以本國產業產物購買這種菸草的國家的產業。

此外，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迫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這似乎就完全破壞了英國一切產業部 {攔的自然均衡。英國產業，不和多數小的市場相適應，而卻主要和一個大市場相適應。英國的貿易，不在多數小的商業系統進行，而卻主要被引到一個大的商業系統上去。這樣，它的整個工商業系統，亦變得比較不安全了，其政治組織的全部狀態，也變得比較不健康了。英國在現今狀態下，有些象一個不健全的機體，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長得過大，以致容易發生許多危險的疾病，那在各部分發展比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爲地造成的一個大血管過分的膨脹，並迫使過大部分的產業與商業流入這個血管，這樣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滯，就會使全部政治組織陷於最危險的紊亂中。英國人民對於母國與殖民地決裂的恐懼，超過了他們對西班牙無敵艦隊或法國侵襲的恐懼。這種恐懼，無論有沒有道理，卻使一般人，至少使各商人，都覺得應該把印花稅法令廢除。我們大部分商人往往認爲，殖民地市場連續數年完全排斥英國商品，可預見得到，他們的貿易就會完全停止；我國大部分製造業者，也往往認爲，這樣一來，可預見得到，他們的事業就會完全破壞；我國大部分工人，也往往認爲，可預見得到，他們會完全失業。但是，與大陸任何鄰國絕交的可能，雖亦會使此等人民中，有一些預料會停止或中斷其職業，但不會引起那麼普遍的情緒。若干小血管內血液循環停滯，血液很容易流到大血管，不會引起任何危險性疾病。但是，任何大血管的血液要是停滯，其直接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痙攣，半身不遂，乃至死亡。沒有一種製造業，由於獎勵金，或由於國內市場及殖民地市場的獨佔，不自然地過度膨脹，超過自然發展的程度，那末只要稍有停滯或中斷，往往就會意起騷擾與紊亂，使政府驚駭，國會狼狽失措。他們想，我國主要製造業者，如果有許多突然完全停止營業，定會引起很大的紊亂與騷擾。

將來無論什麼時候，要把英國從這種危險中拯救出來，要使英國能夠甚或強制它從這種過大的用途，撤回一部分資本，投在利潤較少的用途上，要逐漸減縮一個產業部門，逐漸增大一切其他產業部門，要一步一步地，把一切產業部門，恢復到自然的、健全的，併為完全自由制度所必然建立、亦僅能由完全自由制度加以保持的比例，唯一的方策，似乎就是適度地、逐漸地放寬那給英國以殖民地貿易獨佔權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為止。立即開放殖民地貿易，使一切國家都可以進來經營，那不僅會引起一些暫時性困難，而且將使現今以勞動與資本經營這種貿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損失。不說別的，單說那輸入八萬二千桶菸草的船隻，突然廢而不用，就會受到重大的損失。這就是重商主義一切法規的不幸結果！這一切法規，不僅給政治組織造成了危險性很大的紊亂，而且這種紊亂，即使不引起（至少在短時間內不引起）更大的紊亂，也往往難於矯正。所以，殖民地貿易應怎樣逐漸公開；什麼限制應首先撤除，什麼限制應最後撤除；完全自由與正義的自然制度應怎樣逐漸恢復，這些問題，留待未來政治家和立法者運用智慧去解決吧。

一年多以來（從1774年12月1日以來），北美洲十二聯邦完全排斥英國商品。在殖民地貿易中喪失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這在一般人想來，定會使英國人痛切地感到損失。幸而發生了五件不曾預見，而且不曾想到的事情，使他們沒有這種感覺。（一）此等殖民地，相約不輸入英國商品，為作好準備，曾把適合於它們市場的一切英國商品全部買盡。（二）西班牙船隊，為着異常的需要，曾在這一年買盡德意志及北歐的許多商品，尤其是亞麻布。那許多商品，甚至在英國市場，亦常和英國製造品競爭。（三）俄羅斯與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市場有了異常的需要。因為，前些時候土耳其在困難當中，而俄羅斯艦隊又在愛琴海巡邏，土耳其市場非常缺乏供應品。（四）在過去若干時間，北歐對於英國製造品的需要，逐年增加。（五）波蘭最近的被瓜分和平定，為這大國開拓了一個市場，使得英國製造品，除有北歐日益增加的需要外，又在這一年，加上了這個市場異常的需要。這五件事情，除第四件外，按性質說都是暫時的偶然的。假設不幸，這十二聯邦長此繼續排斥英國貨物，那麼英國對殖民地貿易中這麼重要的一部分被排斥，仍會惹起一定程度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因為來得漸緩，所以不象突然發生的痛苦那麼難受。同時，英國的勞動與資

本，也能發現新的用途與方向，使此種痛苦，不達到任何顯著的高度。

殖民地貿易的獨佔，既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此種貿易，所以在一切場合，使英國資本，由近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改投到遠國的消費品國外貿易，在多數場合，使英國資本，由直接的消費品國內貿易，改投到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在一些場合，又使英國資本，由一切消費品國外貿易，改投到運送貿易。總之，在一切場合，都使英國資本，由所僱生產性勞動量較多的方面，改投到所僱生產性勞動量少得多的方面。此外，它使那麼大的部分的英國產業與商業，僅僅適合於一個特殊市場，這樣就使英國產業與商業的全部狀態，比其生產物能適合較多市場の場合更不確定、更不安全。

我們必須細心分別殖民地貿易的影響及殖民地貿易獨佔的影響。前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後者總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為前者是那麼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貿易被獨佔，而獨佔又是那麼有害，就全體說，殖民地貿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過，設若沒有獨佔，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

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給英國產業的鄰近市場即歐洲市場與地中海沿岸各國市場所不能容納的那一部分產物，開拓了一個雖是很遠但卻很大的市場。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不會使英國從原來運銷鄰近各市場的產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卻會使殖民地不斷提出新等價物來交換英國剩餘生產物，從而獎勵英國不斷增加其剩餘生產物。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傾向於增加英國生產性勞動量，卻不傾向於改變其原先的用途。在自然與自由狀態下，殖民地貿易，得由一切其他國家進入競爭，這樣就使新市場或新行業上的利潤率不會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新市場，用不着從舊市場吸取任何東西，就會創造（要是可以這樣說）一個新生產物來供給自己。而這新化物就會構成一個新資本，來經營新行業，新行業同樣用不着從舊行業吸取一點東西。

反之，殖民地貿易的獨佔，由於排斥其他國家的競爭，從而提高新市場及新行業上的利潤率，勢必從舊市場吸取產物，從舊行業吸取資本。增大殖民地貿易中我國的份額，是這種獨佔公開提出的目的。

如果殖民地貿易中我國所佔的份額，並不比沒有獨佔時多，那就沒有設立這種獨佔的理由。這種貿易的往返，比大部分其他貿易的往返為慢，而時間相隔也較久。要是迫使任何一國過大部分的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必使那裏每年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的總量，每年所生產的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物的總量，比原來的少。這樣就使這國居民的收入，不及自然狀態下的收入，因而減少他們的蓄積能力。那不僅在一切時候，使其資本不能照常僱用那麼大的生產性勞動量，而且使其資本不能照常增加，這樣就使它不能僱用更大的生產性勞動量。

但是，就英國說，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結果，足以抵消獨佔的惡劣結果而有餘，所以，雖有獨佔的害處，象現今進行的此等貿易，不僅有利，而且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貿易所開拓的新市場與新行業，比因獨佔而損失的那一部分舊市場與舊行業大得多。由殖民地貿易而創造（如果可這樣說）的新產業與新資本，在英國所能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比因資本從往返次數較多的貿易部門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產性勞動量來得多。不過，要是家今日進行的那種殖民地貿易，對英國還有利，那不是由於獨佔，而是由於獨佔以外的其他原因。

殖民地貿易所開拓的新市場，與其說是歐洲原生產物的新市場，倒不如說是歐洲製造品的新市場。農業是一切新殖民地的適當業務；因為其土地低廉，故與他處相比，農業顯得更有利。所以，殖民地富有土地原生產物，它們不但不要輸入土地原生產物，而且通常有大量的剩餘輸出。新殖民地的農業，往往從一切其他職業技取工人，或把工人拉住，使其不流入任何其他職業。留給必需品製造業使用的工人已經不多；裝飾品製造業可使用的工人簡直沒有。所以，對於這兩種製造品的大部分，它們都覺得，與其親自制造，不如向他國購買更合算。殖民地貿易對於歐洲農業的鼓勵，主要是間接的，即鼓勵歐洲製造業，從而間接鼓勵歐洲農業。殖民地貿易所維持的歐洲製造業，是歐洲土地生產物的一個新市場。我們說過，最有利的市場，即穀物和牲畜、麪包和家畜肉的國內市場，在這情況下，賴美洲貿易而大大擴張了。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充分證明，富庶殖民地貿易的獨佔，並不能使任何國家建立製造業，甚或不能維持製造業。西葡兩

國，在沒有任何大殖民地時，就是工業國了。但自它們佔有世界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來，便都不是工業國了。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獨佔的惡影響，加上其他原因，也許幾乎把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抵消了。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其他各種獨佔；金銀價值比其他大多數國家低；對輸出品課以不適當的稅，以致不能參加外國市場，對國內各地間貨物的運輸，課以不適當的稅，以致縮小國內市場；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規則與不公平，常常保護有錢有勢的債務人，使能避免受害的債權人的追索，並使國內勞動階級不敢製造貨物來供這班大人先生消費，因為，對於這班大人先生，他們不敢拒絕賒賣，而大款能否歸還，又極不確定。

反之，在英國，殖民地貿易的自然良好影響，加上其他原因，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獨佔的惡影響。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貿易的一般自由，那裏雖有若干限制，但與任何其他國家比較，至少有相等的自由，也許有更大的自由；輸出自由，本國產業的產物，幾乎無論什麼種類，又幾乎無論輸到什麼國家，都能無稅輸出；更重要的是本國產業的產物，由本國這地運至那地，不須報告任何官廳，不須受任何盤問檢查，換言之，得以享受毫無限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最下級英國人民的權利，為最上級英國人民所尊重，使各個人能保有各自的勞動果實，這樣就對各種產業，給予最大而且最有效的鼓勵。

但是，設若英國製造業由於殖民地貿易而有所進步（事實上確曾如此），那不是靠了對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而是靠着獨佔以外的其他途徑。獨佔的結果，不是增加英國製造品產量，而是改變英國製造品一部分的性質與形式，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再適合於往返頻繁而期間相隔又很短暫的市場，卻適合於往返遲緩而期間相隔又很久的市場。所以，其結果乃是改變一部分英國資本的用途，大大減少這部分資本所能維持的製造業的數量，因此不但沒有增加英國製造業的總量，而且把它減少了。

所以，殖民地貿易的獨佔，象重商主義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樣，阻抑其他一切國家的產業，但主要是殖民地的產業，不但沒有一點增加，反而減少那為着本國利益而設立的產業。

無論母國在特定期間有多少資本，這種獨佔必定會妨礙它的資本，使它不能維持本來能夠維持的那麼大的生產性勞動量，並使它不能給勞動大眾提供本來能夠提供的那麼多的收入。由於資本只能由節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礙資本使不能提供本來能夠提供的那麼多的收入的獨佔，就必然妨礙資本，使不能按本來能夠增加的速度增加起來，因而不能維持更大的生產性勞動量，不能給國內勞動大眾提供更多的收入。一個很大的收入泉源，即勞動的工資，由於有了這種獨佔，必定在各個時候，都不象沒有獨佔的場合那麼富足。

獨佔提高了商業利潤率，因而妨礙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潤，取決於土地現實生產額和加投資本后土地可能生產額之差。如果這差額所能提供的利潤，比等量資本能從商業取得的利潤大，那末土地改良事業，就從各種商業吸去資本。如果所提供的利潤，小於商業利潤，商業就從土地改良事業吸去資本。所以，凡是提高商業利潤率的措施，就會使土地改良事業高的利潤減低，或使其低的利潤降得更低。在前一場合，使資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後一場合，把資本從這用途吸引出來。獨佔妨礙土地的改良，勢必延遲另一個大的收入原始泉源——土地的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獨佔提高利潤率，勢必提高市場利息率，使其達到不應有的水平。但與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價格，即通常按若干年地租而計算的買價，必隨利息率上升而下降，必隨利息率下降而上升。這樣，獨佔在以下二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即延遲地租的自然增加，並延遲與地租成比例的土地價格的自然增加。

誠然，獨佔提高商業利潤率，因而稍稍增加我國商人的利得。但由於它妨礙資本的自然增加，所以不會增加國內人民從資本利潤率所得收入的總額，而會減少這個總額。大資本的小利潤，通常比小資本的大利潤提供更大的收入。獨佔提高了利潤率，但使利潤總額不能增高到和沒有獨佔的時候一樣。

獨佔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勞動的工資、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不象無獨佔時那麼富足。爲了要促進一個國家一個小階級的利益，獨佔妨害了這個國家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的利益。

只有通過提高普通利潤率，獨佔才能使任何一個階級得利或能夠得利。但是，一般說來，高的利潤率對於國家所必然產生的各種壞影響，除上述外，還有一種更壞的影響；按照經驗，這種壞影響和高的利潤率分不開，而其有害作用，也許比上述各種壞影響合起來的作用還要大。高的利潤率，隨便在什麼地方，都會破壞商人在其他情況下自然會有的節儉性。在利潤很高時，儉樸似乎是多事，而窮奢極侈，似乎更適合於寬裕的境遇。但大商業資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國實業界的領袖和指導者。他們的榜樣對國內全部勤勞民衆生活方式的影響，比任何其他階級的影響大得多。若僱主是小心的、節儉的，工人亦大都會如此；若主人是放浪的、隨便的，那末擁工亦會按主人的榜樣工作，亦會按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這樣，本來最會蓄積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蓄積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不能因這些本來最會使這基金增加的人們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國家的資本不能增加，反而逐漸枯竭。國內所維持的生產性勞動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異常的利潤，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資本嗎？他們減輕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貧窮嗎？促進了這兩個乞丐般的國家的產業嗎？這兩個商業都市的商人的費用是那麼大，以致異常的利潤不但沒有增加國家的總資本，而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資本。我敢說，外國資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闖進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貿易中去。爲了要把外國資本從自己資本日益不夠經營的這種貿易中驅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強這種不合理的獨佔。試比較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習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習俗，你就會感到，受高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爲與性格，與受低利潤影響的商人行爲與性格，是怎樣不相同啊。誠然，倫敦的商人，雖不象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樣，一般都成爲堂堂貴族，但與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較，卻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節儉。但是，據說，大部分倫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卻略有遜色。倫敦的利潤率，與前者比較，一般是低得多；與後者比較，一般是高得多。俗語說，“容易來，容易去”。隨便什麼地方，消費的一般情況，與其說受真實消費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說受弄錢花費的難易程度支配。

這樣，獨佔給唯一階級帶來的唯一利益，在許多不同方面妨害國家的一般利益。

僅僅爲了要培育顧客而建立一個大帝國的計劃，乍看起來，似乎僅僅適合於小買賣商人的國家，究其實，那種計劃，對於小買賣商人的國家，也是全不相宜的，但適合於政府受小買賣商人支配的國家。這樣的政治家，也只有這樣的政治家，纔會認爲，用同胞的血與財寶來建設並維持這樣一個帝國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對一個小買賣商人說，你賣給我一塊地皮，我就會常常在你鋪子裏購買衣物，雖然你鋪子裏的賣價比別家鋪子昂貴。他不見得會很踊躍地接受你的提議。但若另一個人賣給你這樣一塊地皮，並吩咐你要在那小買賣商人鋪子裏購買你所需的一切衣物，這小買賣商人對他便會非常感激。有些英國人在國內不能安居，英國給他們在遠地購買了一塊大地皮。誠然，其價格很小，不是今日的普通買價，即三十年年租，而只等於初次發現、踏勘海岸和奪取土地的各種費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廣闊的，耕作者得有大量土地耕作，有時又得自由隨意在任何地方售賣其生產物，所以不過三、四十年（1620—1660年），就變成了一個那麼富庶繁榮的民族。於是，英國的小買賣商人及其他各種商人，都想長此獨佔這些人的光顧。他們不敢說，他們原來用一部分貨幣購買土地，嗣後又用一部分貨幣來改良土地，他們只向國會請願，美洲殖民地人民將來只許向他們的店鋪買賣：（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歐洲產貨物，都得向他們的店鋪購買；（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們認爲適於購買的那些殖民地產物，全數賣給他們的商店。他們並不認爲全部產物都適於購買，因爲其中有若干部分輸入英國可能妨害他們在國內經營的某些商業部門。這若干部分生產物，他們自然希望移民們儘量對外地售賣，愈遠愈好；即因此故，他們提議，把這些生產物的銷售市場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國。這種真正小買賣商人的提議，在有名的航海條例中定爲一個條款了。

英國統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確切地說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維持獨佔。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來維持母國的內政，亦不曾提供任何兵力，來維持母國的國防；其主要利益，據說就是這種專營的貿易。此種獨佔，即是此等殖民地隸屬我國的主要標誌，亦是我國從這種隸屬所得的唯一果實。英國一向用以維持這種隸屬的費用，其實都是用以維持這種獨佔。在現今騷擾事件開始之前。殖民地按平時編制的一艘軍費，爲二十聯隊步兵的給養，炮兵隊及軍需品的費用，和他們所需異常的食品，以及爲警戒無限長的北美海岸及西印度海岸，

並防範其他各國祕密出入船隻而須不斷維持的極大海軍力量的費用。這平時編制的軍費全部，是英國收入上一個負擔，但同時也只是殖民地統治所費於母國的極小部分。如果我們要知道費用全數，我們必須在這平時編制每年軍事費用之外，加上英國在各個時期為防衛殖民地所花費的款項的利息。尤其是上次戰爭的全部費用和這次戰爭以前的那次戰爭的費用大部分必須加上。上次戰爭純然是殖民地戰爭，其全部費用，無論用在什麼地方，用在德意志，或用在東印度，都應算在殖民地賬上。總數在九千萬鎊以上，它不僅包含新債，而且包含每鎊附加一先令的地稅，以及每年動用的減債基金。1739年開始的西班牙戰爭，主要是殖民地戰爭。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殖民地與西班牙本土祕密通商的船舶的搜查。這全部費用，其實等於維持獨佔的獎勵金。其公然提出的目的，雖為獎勵英國製造業、發展英國商業，但其實際結果，卻是提高商業利潤率，使我國商人能以過大部分的資本，轉投到往返較為遲緩而相隔時間較長的貿易部門。如果獎勵金能阻止那兩種事件，使不發生，那也許真值得發給這樣一種獎勵金。

所以，在現今的經營管理下，英國從統治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損失。

建議英國自動放棄它對殖民地的一切統治權，讓它們自己選舉地方長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決定對外措和宣戰，就等於提出一個從來不曾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亦永遠不會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採納的議案。沒有一個國家自動放棄過任何地方的統治權，儘管這個地方是怎樣難於統治，儘管它所提供的收入與其所費相比是怎樣微小。這種犧牲雖往往符合一國利益，但總會損害一國威信。更重要的也許是，這種犧牲，往往不符合其統治階級的私人利益，因為他們對於許多有責任有利潤的位置的處分權，將從此被剝奪，他們那許多獲取財富與榮譽的機會，亦將從此被剝奪。佔據最動亂不安而對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能取得這種處分權與機會。所以，即使最愛作非非之想的人，也不會認真希望這種建議能被人採納。但若真的被採納，那末英國不僅能立即擺脫掉殖民地平時每年全部軍事費用，而且可與殖民地可立商約，使英國能夠有效地確保自由貿易，那與它今日享受的獨佔權相比，雖對商人不怎麼有利，但對人民大眾必更有利。這樣，殖民地和母國，就象好朋友的分離，那末幾乎為近來的不和所消滅的殖民地對

母國的自然感情，就會很快地恢復。他們不僅會長此尊重和我們分離時所訂定的商約，而且將在戰爭上、貿易上贊助我們，不再作騷擾搗亂的人民，卻將成為我們最忠實、最親切、最寬宏的同盟。古希臘殖民地與其所從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種父母之愛，一方面有一種孝敬之心。我想，我們如果那樣辦，英國與其殖民地間同樣的感情，亦會恢復起來。

一個省份，要有利於其所屬的帝國，則在平時對國家所提供的收入，不僅要足夠支付其平時編制的軍費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來維持帝國總政府。每一個省份，對於帝國總政府的經費的增加，都必須或多或少地有所貢獻。若有任何個別省份，不按比例擔負這種費用，那末帝國一些省份的負擔，就顯得不均。此外，由此類推，對全帝國非常收入的負擔，亦應象平時經常收入一樣，保持同一的比例。英國從殖民地取得的經常收入與非常收入，對於英帝國的全部收入，不曾保持這個比例，那是大家都會承認的。據說，獨佔增加英國人民的私人收入，因而增加他們的納稅能力，這樣就補償殖民地公共收入的不足。但是，我曾說過，這種獨佔，雖對殖民地是一項極苛重的賦稅，雖可增加英國特定階級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人民大眾的收入，而卻減少人民大眾的收入，因此不增加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而卻減少人民大眾的納稅能力。收入因獨佔而增加了的人，是一個特殊階級，要他們超出其他階級應納的比例完稅，既是絕不可能，亦是最大的失策，這我要在下一篇來說明。所以，從這特殊階級，不能取得特殊收入。

殖民地可由其自己的議會課稅，也可由英國議會課稅。

殖民地的議會，似不可能由母國操縱，使它們能向當地人民徵收足夠的公共收入，以維持一切時期的本地民政和軍政，又按適當比例負擔英帝國總政府的經費。甚至是直接受君主監督的英國國會，也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才被置於這樣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說才使它提供足夠的稅收，以維持本國軍民兩政。君主只由於曾以軍政民政官職大部分及支配此官職的權能大部分，分給國會中個別議員。才取得了對英國國會的這種控制。殖民地議會離君主很遠，數目衆多，分散各處，而組織又多樣，所以，君主即使擁有同樣的控制手段，亦難於如此控制，而且‘他並沒有這種手段。他絕對不能把英帝國總政府的職

位大部分或支配此職位的權能大部分，分給殖民地議會的主要成員，使他們甘冒不韙，向選民課徵，以維持那總政府，這樣總政府的薪俸，幾乎全部都要分配給他們不相

識的人。此外，英國政府又難免不知道各個議會中各個代表的相對地位，徵企圖作這樣的控制時，難免觸犯他們，難免犯了錯誤，這樣就會使這種控制辦法，對殖民地議會全不適用。

而且，殖民地議會，對於全帝國的國防經費及維持費，不可能是適當的判斷者。此等事務，沒委託殖民地議會考慮。這不是他們的任務，他們關於此等事務，亦不能經常得到情報。省議會，象教區委員會一樣，關於所屬地域的事務，能作適當的判斷。但關於全帝國的事務，他們卻無法作適當的判斷。關於本省對全國所持的比例是怎樣，或關於本省與他省的相對重要性和富裕程度，它們甚至不能作適當的判斷，因為其他各省，並不受這省區議會的監督和指揮。全帝國的國防和維持所需要的是什麼，每省所負擔的部分是多少，只有一個議會能作適當的判斷，即監督和指揮全帝國事務的議會。

於是，有人建議，向殖民地派徵賦稅，即各殖民地應納的數額，由英帝國議會決定，而省議會則按各省情況，決定最適宜的抽取方法。這樣，關於全帝國的事務，由監督和指揮全國事務的議會決定。而各殖民地當地的事務，仍可由其自己的議會決定。在這場合，殖民地雖不派代表出席英國議會，但我們可根據經驗來判斷，國會的派徵不至於不合理。對於不派代表出席國會的帝國所屬各地，英國議會從來沒有加以過重的負擔。根西及澤西二島，雖無任何手段抵抗國會權威，但比別省卻納更少的賦稅。國會雖企圖行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徵課的權利（無論有無根據），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們國內同胞應納的正當比例納稅。此外，殖民地納稅，如果要按土地稅的增減而比例增減，那末國會非同時對其自己選民課稅，即不能對殖民地課稅，在這種情況下，殖民地可以說實際上在國會裏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辦法同一標準課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而由君主決定各省應納數額，一些省份由君主決定抽收辦法，另一些省份則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這在其他帝國，也不乏先例。法國就有些省份，不僅納稅額由國王決定，而抽收辦法，亦由國王決定。但對另一些省份，他僅僅決定數額，而由省議會決定抽收辦法。依據派徵賦

稅計劃，英國國會對於殖民地會議，和法國國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而且據說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議會，就幾乎處在同樣的地位了。

不過，按照這計劃，雖然殖民地人民無正當理由可憂懼，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和他們國內同胞的負擔比較，會超過適當的比例，但英國卻有正當理由憂懼，殖民地對國家的負擔不會達到這適當的比例。法國對於有權組織議會的那些省份的統治權已經鞏固，但英國在過去若干時期內，卻沒有確立同樣的統治權。殖民地議會，若不十分樂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否則他們是不大會十分樂意的），仍有許多借口來逃避或拒絕國會最合理的派徵。假定說，一次對法戰爭爆發了，必須立即徵收一千萬鎊，來保衛帝國中心地。這個款項，必須由國會以某項基金為擔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貸借。這基金的一部分，國會提議在英國國內課稅抽徵，另一部分則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議會派徵。殖民地議會離戰地遙遠，而且有時認為與這事件無多大關係，而這個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決於殖民地議會的高興，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據這個基金的擔保，而貸借款項呢？由這樣一個基金所貸得的貨幣，也許不會多於英國國內課稅被設想可以償還的數額。這樣，戰時所借債務的全部負擔，就會象往昔一樣，總是落在大不列顛身上，換言之，落在帝國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國的全部。自有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國一國，開疆闢土，只增加其費用，從沒增加它的資源。其他國家，大都以帝國防衛費絕大部分，課在自己的從屬地方，從而解除自己的負擔。英國卻一向以這費用的幾乎全部課在本國，從而解除從屬地方的負擔。要使大不列顛與法律一向認為是隸屬大不列顛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國會在派徵賦稅計劃上，似乎必須有手段，使其派徵立即生效，不致為殖民地議會所逃避、所拒絕。至於這種手段是什麼，卻不是容易想得出來，而且是個未曾闡明的問題。

倘若英國國會，同時充分確立了不得殖民地議會同意即可對殖民地課稅的權利，則此等議會的重要地位，馬上就會終結，而英領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着完結。人們所以要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因為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組織是怎樣安定、怎樣持久，就看這個國家大部分的領導人（即這個國家的上層階級），能如何保持或保衛其重要地位。所以，國內派別活動和野心活動，就在於此等領袖人物不斷地互相攻擊別人的重要地

位，保衛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領導人物，象一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物一樣，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或者想象，如果他們的議會——他們把它叫做國會，認為其權力與英國國會相等——大權旁落，僅僅成為英國國會的低聲下氣的巨僕或執行吏，他們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喪失了。所以，他們拒絕議會派徵賦稅的建議，象雄心勃勃、意氣昂揚的人一樣，寧願劍拔弩張來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

當羅馬共和國日趨衰微的時候，負有防禦國家擴大帝國重任的羅馬同盟國，都要求享有與羅馬市民所享的同樣特權。在共和國拒絕它們的要求時，內戰就爆發了。在這樣的戰爭中，羅馬以此種特權，一個一個地給予大部分同盟國，而且按它們的獨立程度給予。現在，英國的國會主張對殖民地課稅，而殖民地則拒絕這種課稅，因為他們未曾派代表出席國會。設若對要脫離聯盟的各殖民地，英國都許其按所納國稅的比例，選舉代表，而且由於納稅，允其自由貿易，使與他們本國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數，隨其納稅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領導人物，就有了一種奪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個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對象了。這樣，他們也許會希望，從英國政治界那國家彩票獲得大獎，因為他們象其他人一樣，對於自己才能及幸運自有妄想，不想從殖民地這小彩票獲得小獎。明顯地，這種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領導人物的重要地位，滿足他們的野心。除了用這種方法或其他同樣方法，他們不見得會自動服從我們的。我們應當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強迫他們服從我們，那流出的每一點血，都是我們國民的血，不然就是願為我們國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為，時機一到，極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實是非常愚鈍的。現今主持所謂聯合殖民地議會的人，自己感到一種為歐洲最大公民所不會感到的重要地位。他們由小買賣商人、商人、律師，一變而為政治家和立法者，給一個廣大帝國，制定一個新政體。他們自誇，那將成為世界上自有國家以來最大而又最強的一個國家，也許真會如此。直接在聯合殖民地議會工作的人，也許有五百，聽這五百人號令的人，也許有五十萬，他們都同樣覺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黨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想象自己現今的位置，不僅比過去優越，而且也比他們所預期的優越。除非有一種新的野心對象出現在他或其領袖面前，否則他若有一般人的志氣，定會拚命護衛他的那個地位。

亨諾主席曾說，我們現今很有興趣地讀着關於同盟的許多小事件的記錄，但當這些事情發生時，也許不被人看做極重要的新聞。他說，當時各人都認為他們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那時流傳下來的許許多多記錄，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興記錄那些事件的人們記下來的。他們自誇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當時曾頑強地保衛自己，曾為着抗拒最好而後來又是最為人愛戴的那位國王而忍受一次那麼可怕的飢饉，這是世人所熟知的。那裏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說支配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為預先看到，舊政府一旦恢復，他們的重要地位就會立即消滅，所以竭力為保衛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戰。除非我們能誘導我國殖民地同意和我們結合，否則它們亦會象巴黎市頑強抗拒其國王中最好的一個那樣，抵抗母國中最好的一個母國。

古代沒有代表制的觀念。當一國人民在他國取得了市民權的時候，他們除了與他國人民一塊兒投票、一塊兒討論，即無法行使這種權利。以羅馬市民特權給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壞了羅馬共和國。這樣，就無從判別，誰是羅馬市民，誰不是羅馬市民。這樣，一個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員。這樣，任何種類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議會，他們可能趕走真正市民，並儼然以真正市民自居，決定共和國事務。但是，即使美洲派五十個或六十個新代表出席國會，衆議院的門房，亦不難判別，誰是國會議員，誰不是國會議員。所以，羅馬組織，雖必然由於羅馬與意大利同盟國的聯合而遭受破壞，但英國組織卻不會由於大不列顛與其殖民地聯合而受絲毫損害。反之，其組織將因此而完善；沒有這種聯合，反會覺得不完善。討論並決定帝國一切部分事務的議會，為要得到正確的情報，應當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這種聯合，能不能容易實行，執行時會不會發生困難，我不敢妄斷，但我沒有聽見，不能克服的困難。主要的困難，可能來自大西洋兩岸人民的偏見與成見，並非出幹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這一岸的我們，不必憂懼美洲代表的衆多，將打破組織的均衡，或過度地增加國王勢力，或過度地增加民主勢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數，與美洲所納的稅成比例，那末受統治人數的增加，將與統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統治手段的增加，亦將與受統治人數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聯合之後，君主勢力與民主勢力，仍必和聯合之前一樣，彼此間保持同程度的相對實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優懼他們因離政府所在地遙遠而可能遭受許多壓迫。他們出席國會的代表，自始就該是很多的，他們的代表，必能保護他們，使其不受到這一切壓迫。距離的遠，不會削弱代表對於選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認為，靠後者選拔，才得議員一席，並從這一席取得好處。前者為要保待後者對他的好感，定會以國會議員的權力，申訴帝國這遼遠地帶民政或軍政長官的違法亂紀行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干理由認為，他們不會長此繼續與政府所在地遠隔。象那裏一向在財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樣快速的進步，也許只要一世紀，美洲的納稅額將超過不列顛的納稅額。帝國的首都，自然會遷到帝國內納稅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發現及繞好望角到東印度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兩件事。其影響已經很大了；但自有這二發現以來，只不過經歷了二三百年，在這樣短的期間內，其影響勢不可能全部呈現出來。這兩大事件，以後對於人類，將產生利益，或將引出不幸，人類的智慧，還不能預見。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聯合世界上最遙遠的部分，使它們能互相救濟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獎勵彼此的產業，其一般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過，對於西印度及東印度兩處的土人，這兩事件本來能夠產生的一切商業上的利益，卻被它們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這種不幸，與其說出自它們的本性，無寧說出自偶然。美洲及東印度通路被發現時，歐洲人的優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遼遠地方，作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今後，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只有這樣，纔可引起相互的恐懼，從而威壓一切獨立國的專橫，使它們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但最能建立此種同等實力的，似乎就是相互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了，但這種結果，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伴隨着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而來臨。

同時，這二發現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進重商主義的發展，使其達到非此決不能達到的那麼顯著、那麼壯大的程度。這個主義的目標，與其說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國，不如說由商業及製造業而富國，與其說由農村產業而富國，不如說由都市產業而富國。但這二發現的結果，歐洲商業都市，不僅成為世界極小部分的製造業者和運送業者（那極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過的歐洲各國及波羅的海和地中海

周圍各國），而且成為美洲許多繁榮耕作地區的製造業者，和亞洲、非洲、美洲各地的運送業者，並在若干方面，亦是這各地的製造業者了。這樣就給他們的產業，開拓了兩個新世界，每一個都比舊世界大得多廣得多，其中一個市場，還在日益擴大起來。

誠然，佔有美洲殖民地並直接與東印度通商的國家，在外表上享受這大商業全部。但其他國家，雖受那令人厭惡的旨在排斥它們的限制，卻往往享受這大商業實際利益的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對於其他國家產業所提供的真實獎勵，就比它們本國產業所受的鼓勵大。單就亞麻布一項說，此等殖民地的消費，據說每年就在三百萬鎊以上，不過我不敢肯定有這麼多。但這鉅額的消費，幾乎全部由法國、弗蘭德、荷蘭、德意志供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僅僅供給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亞麻布供給殖民地的資本，每年在那些國家人民中間分配，並給他們提供收入。消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僅僅是這資本的利潤，給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維持最豪侈的浪費。

連一國所訂立以保證其所屬殖民地的專營貿易的條例，亦往往在較大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惠益的國家，而在較小程度上有害於此種條例所要妨害的國家。對他國產業不正當的壓迫，反過來（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落在壓迫者頭上，並以更大的程度破壞他們的產業。例如，根據此等條例，漢堡商人必須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亞麻布送往倫敦，並把要送到德國去的菸草，從倫敦帶回，因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亞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從美洲帶回菸草。由於這種限制，此等商人也許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價格售賣亞麻布，而以稍稍昂貴的價格購買菸草，其利潤也許因此縮減若干。但是，即使我們假定，美洲還款不象倫敦那麼準時——這絕不是事實——漢堡與倫敦貿易，商人資本的往返，也許要比直接與美洲通商，要快得多。這樣，排斥漢堡商人，使不能直接與美洲通商，反使漢堡商人的資本，能在德意志繼續僱用大得多的勞動量。這樣雖可減少他個人的利潤，卻不會減少他的國家的利益。但對英國，情形就全然兩樣了。獨佔自然會吸引（如果我可這樣說）倫敦商人的資本，使流入對自己更有利而對國家卻更不利的用途，因為往返緩慢。

歐洲各國雖都企圖用各種不正當方法獨佔所屬殖民地貿易的全部利益，但沒有一個國家，除了擔負平時維持和戰時保衛其對殖民地的

統治權所開支的費用以外，能單獨得到什麼。由佔有此等殖民地而產生的困難，應有盡有，由此等殖民地貿易而產生的利益，卻不得不與其他國家分享。

乍看起來，對美洲大貿易的獨佔，似乎當然是一種無上價值的獲得。在無辨別力的輕優野心家看來，在紛雜的政爭及戰爭中，那自然會作為一種很值得爭奪的迷人的目標出現。但是，這目標的炫人外觀，這貿易的巨大，使獨佔此種貿易具有有害的性質，換言之，獨佔使一種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對國家利益更少，但卻吸收了比自然狀態下更大部分的國家資本。

第二篇說過，一國商業資本，自然會尋求（如果可這樣說）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運送貿易上，那末它所屬的國家，將成為它所經營的各國貨物貿易的中心市場。這資本所有者，必願盡其所能，把這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他這樣就省免了輸出的麻煩、危險與費用，並因此放，儘管在國內市場，所得價格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價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潤亦比輸出後所可望獲得的利潤小，他總必願意在國內市場售賣。所以，他當然盡其所能，設法使運送貿易變作消費品國外貿易。此外，他的資本如果投在消費品國外貿易上，他又必為了同一理由，願意盡其所能，把他蒐集來準備輸到外國市場去的國內貨物的大部分，在國內售脫，因而盡其所能，設法使消費品國外貿易變成國內貿易。各國的商業資本，都自然會尋求近的用途，而避開遠的用途；尋求往返次數多的用途，而避開往返遲遠的用途；尋求能僱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大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而避開僅能僱用所屬國或所在國最小生產性勞動量的用途。總之，它自然會尋求在普通場合最有利於國家的用途，而避開在普通場合對國家最無利的用途。

此等遠的用途，在普通場合，雖對國家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潤，偶然提高，足夠抵消近的用途的好處，那末這種高的利潤，就會把資本從近的用途吸引過來，一直到各種用途的利潤，都回到適當的水平為止。不過，這種高的利潤證明，在社會實際情況下，此等遠的用途的資本，與其他用途的資本，稍稍不相稱，而全社會的資本，不按最適當的方式，分配到社會內不同用途。它證明，有若干物品，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廉的價格買入，或以較昂的價格賣

出，市民中有某一階級，多少受到壓迫，以致違反應有的或自然會有的一切階級平等狀態，支付較多或收得較少。同量資本，投在遠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雖決不能僱用相同的生產性勞動量，但遠的用途和近的用途，也許同樣為社會幸福所必需。有許多由遠的用途經營的貨物，就為許多近的用途經營所必需。但若經營此等貨物的人的利潤，超過了應有的水平，此等貨物就將違反應有的程度，以較昂的價格售賣，即以稍稍超過自然價格的價格售賣。此種高價格，就會使一切從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壓迫。所以，他們的利害關係，在這場合，就要求有若干資本，從此等近的用途撤回，而轉入遠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潤，使達到適當水平，並降低他們所經營的貨物的價格，使達到自然價格。在這異常的場合，公共的利害關係，必定要求有若干資本，從通常對公眾較有利的用途撤回，能投到通常對公眾較少利益的用途。在這異常的場合，亦象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場合一樣，個人的自然利害關係與傾向，恰好符合幹公眾的利害關係，使他們從近的用途撤回資本，改投入遠的用途。

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使他們把資本投在通常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但若由於這種自然的傾向，他們把過多資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這些用途利潤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立即使他們改變這錯誤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儘可能按照最適合於全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義一切法規，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亂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資本分配。但關於美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的法規，則比其他任何法規，尤有這種結果。因為，這兩大洲的貿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兩個貿易部門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資本。不過，給這兩個貿易部門造成紊亂的法規，卻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獨佔為大手段，但獨佔的種類不同。這一種或那一種獨佔，似乎是重商主義的唯一手段。

對於美洲貿易，各國都盡其所能，企圖獨佔其所屬殖民地的全部市場，並完全排斥其他各國，使其不能與所屬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葡萄牙人企圖以同樣方法，控制東印度的貿易，他們聲言他們擁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權，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這通路。荷蘭人仍繼續排斥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不能與其所屬香料

產島直接通商。這種獨佔，顯然妨害歐洲一切其他國家，使它們不能經營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並使它們不得不以比它們自己直接從產地輸入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專營貿易所經營的貨物。

但從葡萄牙權力失墜以來，歐洲國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專營權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現今開放，一切歐洲國家船隻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來的法國，各歐洲國家的東印度貿易，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這一種獨佔，妨害了實行獨佔的國家。這國家大部分人民，不僅從此失去一種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國人民都能自由經營這種貿易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獨佔貿易所經營的貨物。例如，自從英領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英國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從事這種貿易，而且須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這種獨佔，要使此公司，在售賣此等貨物時，取得異常的利潤；而且這樣一個大公司處理事務，難免發生弊端，因而引起異常的浪費。這種異常的利潤和異常的浪費，都得由本國購買者支付。所以，第二類獨佔的不合理，比第一類獨佔的不合理更為明顯。

這兩種獨佔都多少會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樣的方式破壞。

第一種獨佔，總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着過大部分的社會資本，使流人享有獨佔權的特殊貿易。

第二種獨佔，隨着不同情況，有時吸引資本。使流人享有獨佔權的特殊貿易，有時又排拒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在貧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過多的資本，使流入這種貿易；但在富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排拒許多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

例如，東印度貿易，如果不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象瑞典和丹麥那樣的貧國，也許從來不會派一艘船到東印度去。這個專營公司的設立，必然獎勵冒險家。他們的獨佔權，使他們在國內市場上能抵制一切競爭者，而在外國市場上，他們又和他國貿易者有同樣的機會。他們的獨佔權，告訴他們，他們對大量的貨物，可十拿九穩地收到大的利潤，對大量貨物，有得到大的利潤的機會。沒有這種異常的鼓勵，這種貧國的窮商人，也許決不會想把小資本冒險投在象東印度貿易那麼遼遠和那麼不確定的事業。

反之，象荷蘭那樣的富國，也許會在貿易自由的場合，派遣比現今多得多的船隻到東印度去。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限制的資本，使許多本來會流入這種貿易的大商業資本，不流入這種貿易。荷蘭的商業資本很多，所以不斷流出，有時流到外國公債，有時流到外國商人與冒險家的私債，有時流到最迂迴的消費品國外貿易，有時流到運送貿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滿着資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潤可圖的資本，全都投下了，荷蘭資本，必然會流向最遠的用途。假使東印度貿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許會吸收這過剩資本的大部分。東印度提供了一個比歐洲、美洲合起來還更大更廣的市場，來銷售歐洲的製造品及美洲的金銀和其他產物。

資本自然分配的擾亂，必然妨害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不論是排拒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流入一個特定貿易部門，或是吸引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特定貿易部門。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必比現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將比現在小，也許竟不存在，而它們一部分資本，投在不適合它們現今情況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們很大的損失。按照它們現在的情況，寧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儘管出價較昂，不應該從它們小額資本中，抽出那麼大部分來經營那麼遙遠的貿易，因為那種貿易的往返是那麼遲緩，所能維持的國內生產性勞動量是那麼小，而在它們國內，生產性勞動是那麼需要，有許多事未曾進行，有許多事還待進行。

所以，沒有專營公司，雖有個別國家不能對東印度進行直接的貿易，但不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公司，應在那裏設立，而只能從此推定，這樣的國家，在這情況下，不應與東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經驗，充分證明，這樣的公司，一般說來並不是經營東印度貿易所必需。因為，葡萄牙雖沒有任何專營公司，卻幾乎享有了這貿易全部達一世紀以上。

據說，沒有一個商人能有足夠的資本來維持東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經理人，使這些人能為他們不時開往那邊的船隻備辦貨物。除非他們能夠這樣做，否則尋找待運貨物的困難，往往使船期貽誤，而由船期延誤所引起的費用，不僅會吃掉冒險的利潤，而且往往會產生很大

的損失。這種說法，如果能夠證明什麼，所證明的就是，沒有一個大貿易部門，能不惜專營公司而經營，而這是違反一切民族的經驗的。就一個大貿易部門說，任何一個私商的資本，也不夠經營一切要經營主要貿易部門就必須經營的附屬貿易部門。但在一國有資格經營某大貿易部門時，就自然有些商人投資經營這主要的部門，有些商人投資經營其附屬部門。這一切貿易部門雖都有人經營，但全由一個商人資本經營的事例，卻極少見。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有資格經營東印度貿易，自然有一定部分的資本，分投在這貿易的一切不同部門。其中，有些商人覺得，為自己的利益，要住在東印度，投下資本，給住在歐洲的其他商人供給貨物，由他們的船隻運出。歐洲各國在東印度所獲得的殖民地，若能從此等專營公司的手裏，移歸君主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對於殖民地所屬國的商人，是安全而又便易的居住地。如果某個時候，某國自願投於東印度貿易的那一部分資本，不夠經營此貿易的各個部門，那就證明，在那時候，那個國家還沒有經營這種貿易的資格，寧可向其他歐洲國家購買所需的東印度貨物，儘管價格大些，不可直接從東印度輸入此等貨物。因這種貨物價格高而引起的損失，很少會等於因從其他更必要、更有用或更適宜的用途抽出一大部分資本來經營東印度直接貿易而遭受的損失。

歐洲人雖在非洲海岸及東印度佔有許多重要殖民地，但在這些地方，他們卻沒有建立象美洲各島及美洲大陸那麼多那麼富庶的殖民地。非洲及幾個統稱為東印度的國家，都是野蠻民族居住的。不過此等民族，並不是象可憐的無用的美洲土人那麼軟弱那麼無抵抗力；而且，和他們居住地的自然產出力相稱，他們的人煙稠密得多。非洲或東印度最野蠻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連好望角的土人也是游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祕魯，只是狩獵民族。同樣肥沃和同等面積的土地，所能維持的游牧人數與狩獵人數，相差很大。所以，在非洲及東印度，要想驅逐土人，並把歐洲殖民地推廣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那就比較困難。此外，已經指出，專營公司的精神，不利於新殖民地的增長，那也許是東印度殖民地不能有多大進步的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經營非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未曾設有專營的公司；他們在非洲海岸的剛果。安哥拉和本格拉以及在東印度的果阿所建立的殖民地，雖由於迷信與各種惡政，未能充分發展，但總有些象美洲殖民地，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裏已居住了好幾世代。荷蘭人

在好望角、在巴達維亞的殖民地，現今算是歐洲人在美洲及東印度建立的最大殖民地了。這兩個殖民地，都佔有特別有利的地位。好望角的土人，全是野蠻的，象美洲土人一樣無抵抗力。此外，那裏又是歐洲和東印度間的半路客棧——如果可以這樣說——歐洲船隻的往返，都得在此停留若干時候。此等船隻所需的各種新鮮食品、水果、葡萄酒，由那裏供給。單有這點，就給殖民地的剩餘生產物，提供了一個極廣泛的市場。正如好望角是歐洲和東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棧一樣，巴達維亞是東印度各大國間的半路客棧，當印度斯坦到中國與日本通路的要衝，並幾乎居於此通路的中點。而航行於歐洲與中國間的一切船隻，亦幾乎都在巴達維亞停泊。此外，巴達維亞又是所謂東印度國家貿易的中央主要市場；歐洲人經營的那一部分，不用說了，即東印度土人所經營的那一部分，亦如是。中國人、日本人、越南東京人、馬六甲人、交趾支那人、西利伯島人所航駛的船隻，往往在此停泊。這種有利的地位，使這兩個殖民地能夠克服一切障礙，雖有專營公司的壓抑精神，亦不能抑止它們的增長。這種有利的地位又使巴達維亞能夠克服另一種不利情況，即巴達維亞也許是世界上氣候最有得健康的地方。

雖然英荷兩國的公司，除了上述兩殖民地，不曾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但曾在東印度征服了許多地方。在它們統治新屬民的方法上，這種專營公司所固有的精神，最明顯地表示出來。據說，在香料產島上，荷蘭人對於豐年所產的香料，恐其過多，不能提供他們認為滿足的利潤，往往把過多的部分加以焚燬。在他們未曾佔有殖民地的島上，他們對於採集丁香及豆蔻幼花綠葉的人，給予一種補助金；那種植物，天然生長在那裏，但由於這種野蠻政策，現在據說幾乎絕種了。據說，甚至在他們佔有殖民地的島上，他們亦大大減少了這類樹木的數目。如果他們領島上的產物，超過了他們市場所需，他們就害怕土人會把其中若干部分運到其他國家，於是，他們認為，保證獨佔的最上策，乃是使產物不超過他們市場所需。他們曾通過各種壓迫行為，減少馬魯古羣島中若干島的人口，使其人數只夠以新鮮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給他們自己的少數守備隊和他們不時來運香料的船隻。但是，即在葡萄牙那樣的統治下，那些島據說人煙還很稠密。英國的公司還不曾有充分時間在孟加拉建立這麼完全的破壞制度。但他們政府的計劃，卻有這種趨勢。我確信，公司分支機構的頭腦往往命

令農民掘翻罌粟良田以栽種稻米或其他穀物。其藉口爲防止糧食缺乏，而其真實理由，則是給他以機會，使能以較好的價格，售賣他手上的大量鴉片。有時，他卻命令農民掘翻栽種稻米或其他穀物的良地以栽種罌粟，如果他預先看到，售賣鴉片可得異常的利潤。公司的職員，爲自己的利益，曾幾次企圖在一些最重要的國外和國內貿易部門中建立獨佔。如果允許他們繼續這樣做，他們早晚定會企圖限制他們要想獨佔的特殊商品的生產，使其數量不超過他們所能購買的數量，而且使其數量能在售賣時給他們提供自己認爲滿足的利潤。英國公司的政策，也許會在這情況下，在一世紀或二世紀內，象荷蘭的政策一樣，也完全有破壞性。

但是，對於作爲他們所征服的國家的統治者的此等公司，再也沒有比這個破壞性的計劃，更直接違反此等公司的利益的了。幾乎一切國家統治者的收入，都來自人民的收入。人民的收入愈大，他們土地勞動年產物愈多，他們能給統治者繳納的數額亦愈大。所以，統治者的利益，在於儘可能增加此年產物。但是，如果這是一切統治者的利益，那末統治者收入主要來自土地地租的，如孟加拉統治者，這就更加是他的利益了。地租，必與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成比例，但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必須取決於市場的範圍。其數量，總會多少準確地適應有實力購買生產物的人的消費，而他們所願給付的價格，總是和其競爭的熱切程度成比例。所以，這樣的統治者，爲着自己利益，應給其國家生產物開拓最廣泛的市場，准許最完全的貿易自由，以儘量增加購買者的人數及競爭；並因此故，不僅應廢除一切獨佔，而且應廢除以下限制，即限制本國生產物由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運輸，限制本國生產物到外國的輸出，和限制能與本國生產物交換的任何商品的輸入。這樣，他就最能增加這生產物的數量與價值，因而，最能增加他享有的那一部分生產物，換言之，最能增加他自己的收入。

但是，商人團體，似乎不可能把自己看做統治者，甚至在他們成爲統治者以後，也不會這樣看。他們仍然認爲，自己的主要業務是貿易，即購買以後再售賣；他們不可思議地認爲，統治者的地位，僅是商人地位的一個附屬物，前者應爲後者服務，就是說，要使他們在印度能以較廉價格購買，並在歐洲售賣，能得到較好利潤。爲要達到這目的，他們企圖從他們所統治國家的市場上，儘可能驅逐一切競爭

者，至少把所統治國家的剩餘生產物減少一部分，使僅足供給他們自己的需要，換言之，使他們在歐洲售賣能得到自己認為合理的利潤。這樣，他們作為商人的習慣，幾乎必然，也許是不知不覺地，使他們在一切一般場合，寧可獲得獨佔者小的暫時的利潤，不願獲得統治者大的永久的收入，而且逐漸使他們，象荷蘭人處置馬魯古那樣，處置他們所統治的國家。作為統治者的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在於，運至印度境內的歐洲貨物，儘可能以最低價格出售，而從印度輸出的印度貨物，儘可能以最好價格或最高價格在歐洲售賣。但他們作為商人的利益，則與此相反。作為統治者，他們的利益，與所統治國家的利益恰相一致。作為商人他們的利益與所統治國家的利益就直接相反。

這樣一個政府的傾向，就其對歐洲的管理說，基本上也許是無可矯正的錯誤，就其對印度的統治說，更是這樣。這個統治機構，必然等於一個商人協會。商人的職務，無疑是極可尊敬的，但這個職務，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帶有一種本來會威壓人民，不用暴力就夠使人民自願服從的權威。這樣一個商人協會，只能用武力，來命令人民服從，所以，他們的政府，必然是憑武力執行命令和專橫的政府，但他們的本來職務，是商人的職務。他們的本來職務，是受主人委託，售賣歐洲貨物，並買回在歐洲市場售賣的印度貨物。就是說，儘可能以高價售賣前者，以廉價購買後者，從而儘可能在他們買賣的特定市場，排除一切競爭者。所以，就公司的貿易說，統治機構的傾向，和管理機構的傾向，是相同的。它要使政府從屬於獨佔的利益，因而阻抑當地剩餘生產物至少其若干部分的自然生長，使僅足夠供應這個公司的需要。

此外，一切行政人員，都或多或少地為自己打算經營貿易，要加以禁止，亦無效果。此等行政人員，既有經營貿易的手段，其辦公地點，又在一萬哩以外，幾乎全然不受主人監視，要命令他們立即放棄一切為自己打算的營業，永遠放棄一切發財的希望，而滿足於主人所認可的一般的、不大可能增加的而且通常只與公司貿易所得真實利潤相稱的薪俸，那真是再蠢沒有。在這情況下，禁止公司人員為自己打算而貿易，除了使上級人員能借口執行主人命令來壓迫不幸的下級人員以外，就再不會有其他的結果了。此等人員，自然會竭力效法公司的公貿易，而設立同樣有利於他們個人貿易的獨佔。如果聽任他們為

所欲爲，他們將公開地、直接地建立這種獨佔，並禁止一切其他人民，使不能經營他們要經營的那種貨物的貿易。這也許是建立獨佔的最好而又是最不壓迫人的方法。但若歐洲命令來到，禁止他們這樣幹下去，他們就會祕密地、間接地建立這樣的獨佔，那對國家就有更大的害處。如果有人干涉他們以代理人爲媒介而祕密經營或至少不公開承認是他們經營的貿易部門，他們就會使用政府的全部權力，並顛倒是非曲直，加以鉗制或破壞。但公司人員的私貿易，自比公司的公貿易能推廣到多得多的商品種類。公司的公貿易，僅限於歐洲的貿易，僅包含國外貿易的一部分，而公司人員的私貿易，卻可推廣到一切國內外貿易部門。公司的獨佔，僅會阻抑在貿易自由時要輸到歐洲去的那一部分剩餘生產物的自然生長。公司人員的獨佔，卻將阻害他們要經營的一切產物，即指定供作國內消費或輸出的一切產物的自然生長，結果會損壞全國的耕作事業，減少全國居民的人數。這樣就會使公司人員所要經營的各種產物，甚至生活必需品，減少到他們能夠購買和按他們預期獲得利潤而售賣的數量。

此等人員，由於他們所處地位的性質，一定會使用比他們主子更苛刻的手段，來維持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們所統治國家的利益。這國家屬於他們的主子，他們的主子當然要相當注意屬國的利益。但這國家不屬於此等人員。他們主子的真實利益，如果他們能夠了解的話，是與屬國的利益恰好一致的；如果主子壓迫屬國，那主要是由於無知和卑陋的重商偏見。但此等人員的真實利益並不與屬國的利益一致，所以，即使有最完全的知識，也未必會使他們不壓迫屬國。從歐洲發出的條例，雖甚脆弱，但在多數場合，都有善意。而在印度的工作人員，其所訂條例，雖有時更爲聰明，但也許更少善意。這真是個奇怪的政府，其人員都想盡可能快地離開這國家，並儘可能快地和這政府脫離關係。在他們離去而財產亦全部搬出之後，雖有地震把那個國家毀掉，也與他們的利害無關。

以上所述，並不是詆譏東印度公司人員的一般品格，更不是詆譏任何個別人員的品格。我所要責備的，是政治組織，是這些人員所處的地位，並不是這些人員的品格。他們的行爲，正符合他們的地位；厲聲咒罵他們的人，其行爲亦不見得更好。馬德拉斯及加爾各答協議會，在戰爭及商議上，就有好幾次的行動，其果斷與明智，有如羅馬

共和國最盛時代的羅馬元老院。此等協議會成員的職業，與戰爭及政治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僅僅他們的地位，無需教育、經驗甚或榜樣，似乎就可陶冶他們的地位所要求的偉大品質，使他們具有能力與德行，他們自己也許還不知道自己具有這種能力與德行。所以，他們的地位，如果在某些場合誘使他們幹出那樣寬宏高潔出人意料的行為，那末他們的地位，在其他場合促使他們幹出和上述多少不相同的行為，亦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無論就那一點說，這種專營公司，都是有害的；對於設立此種公司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困難，而對於不幸受此種公司統治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禍害。

第八章關於重商主義的結論

重商主義提出的富國兩大手段，雖是獎勵輸出和阻抑輸入，但對於某些特定商品，則所奉行的政策又似與此相反，即獎勵輸入和阻抑輸出。但據稱，其最後目標總是相同，即通過有利的貿易差額，使國家致富。它阻抑工業原料和職業用具的輸出，使我國商人處於有利地位，並使他們在外國市場上能以比其他各國貨物價格低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貨物。它提出限制幾種價值不大的商品的輸出，使其他商品在數量和價值上都有大得多的輸出。它又提出獎勵工業原料的輸入，使我國人民能以較廉的價格把這些原料製成成品，從而防止製造品在數量和價值上較大的輸入。至少，在我國的法律全書中，我不曾看到獎勵職業用具輸入的法令。製造業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的時候，職業用具的製作，就成為許多極重要製造業的目標。對這種工具的輸入給予任何獎勵，當然大大妨礙這些製造業者的利益。所以，這樣的輸入，不但不能被獎勵，而且往往被禁止。例如，羊毛梳具，除了從愛爾蘭輸入，或作為破船貨物或捕獲貨物輸入，就依據愛德華四世第三年的法令而禁止了。伊麗莎白女王第三十九年，重申了這種禁令；此後的法令，繼續禁止，使此種禁止成為永久的禁止。

工業原料的輸入，有時得到免稅的獎勵，有時得到獎勵金。

羊毛從若干國家輸入，棉花從一切國家輸入，生麻、大部分染料和大部分生皮從愛爾蘭或英領殖民地輸入，海豹皮從英領格林蘭漁場輸入，生鐵和鐵條從英領殖民地輸入，以及其他幾種工業原料輸入，若按正當手續呈報海關，即可得到免除一切課稅的獎勵。這種免稅條例，以及許多其他商業條例，也許都是我國商人和製造業者，出於私人利害關係，硬要立法當局制定的。但這些規定，是完全正當的、合理的；要是符合國家的需要，可把這種規定推廣到一切其他工業原料，那是一定有利於人民大眾的。

可是，由於大製造業者的貪慾，這種免稅，有時竟大大超過可正當地看作加工原料的範圍。喬治二世第二十四年第四十六號法令規定，外國黃麻織紗每輸入一磅，僅納輕微的稅一便士。先前，帆布麻織紗輸入一磅須納六便士，法國和荷蘭麻織紗輸入一磅須納一先令，一切普魯士產的麻織紗輸入一百磅須納二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但我國

製造業者，仍不長久滿足於這樣的減稅。於是，喬治二世第二十九年第十五號法令，即規定輸出每碼價格不超過一先令六便士的不列顛和愛爾蘭麻布得領獎勵金的法令，免除了對黃麻織紗輸入所課輕微的稅。其實，由亞麻製成麻織紗的各種操作，比由麻織紗製成麻布的操作，需要使用大得多的勞動量。且不說亞麻栽種者和亞麻梳理者的勞動，要使一個織工有不斷的工作，至少須有三個或四個紡工；製造麻布所需要的全部勞動，有五分之四以上，是用在麻織紗製造上面。而我國的紡工，都是可憐人，通常是婦女，散居國內各地，無依無靠。但我國大製造業者取利潤的方法，不是售賣紡工的製品，而是售賣織工的完全製品。他們的利益，在於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售賣完全製品，所以他們的利益，也在於以儘可能低的價格購買原材料。爲使自己的貨物能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出售，他們硬要立法當局對他們自己的麻布的輸出，發給獎勵金，對一切外國麻布的輸入，課以高的關稅，對法國輸入的供國內消費的某幾種麻布，一律禁止。爲要以儘可能低的價格購入貧紡工的製品，他們獎勵外國麻織紗輸入，使與本國出品競爭。他們一心一意要壓低自己所僱織工的工資，正如他們要壓低貧紡工所得一樣。所以，他們企圖提高完全製造品價格或減低原料價格，都不是爲着勞動者的利益。重商主義所要獎勵的產業，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所經營的產業。至於爲貧苦人民的利益而經營的產業，卻往往被忽視、被壓抑。

麻布輸出獎勵金及外國麻織紗輸入免稅條例，頒佈時原以十五年爲期，以後經過二次延長，延續到今日，但將於1786年6月24日國會議期終結時滿期失效。

工業原料得享受獎勵金而輸入的，主要是從我國美洲殖民地輸入的原料。

最初發給的這類獎勵金，乃是在現世紀初葉，對美洲輸入的造船用品所發給的獎勵金。所謂造船用品，包括適於建造船桅、帆桁、牙樁的木材、大麻、柏油、松脂、松香油。但船桅木材輸入每噸二十先令的獎勵金，大麻輸入每噸六鎊的獎勵金，也推廣到蘇格蘭輸入英格蘭的船桅木材。這兩種獎勵金，按原有金額無變更地繼續發給，一直到滿期之時爲止。即大麻輸入獎勵金，於1741年1月1日國會議期終結

時滿期失效，船桅木材輸入獎勵金，於1781年6月24日國會議期終結時滿期失效。

柏油、松脂、松香油輸入獎勵金，在其繼續有效期間內，經過了若干變更。原來，柏油和松脂每噸輸入得獎勵金四鎊；松香油每噸輸入得獎勵金三鎊。後來，柏油每噸輸入獎勵金四鎊，僅限於按特殊方法制造的柏油，其他的良好純潔的商用柏油，減為每噸四十四先令。松脂獎勵金減為每噸二十先令；松香油獎勵金減為每噸一鎊十先令。

按照時間的先後，第二次發給的工業原料輸入獎勵金，便是喬治二世第二十一年第三十號法令對英國殖民地藍靛輸入所發給的獎勵金了。在殖民地的藍靛僅值上等法國藍靛價格的四分之三時，按這法令，領得了每磅六便士的獎勵金。這個獎勵金的發給，亦是有限期的，但曾經數次延期，並減至每磅四便士，將於1781年3月25日國會議期終結時滿期失效。

第三次發給的這一類獎勵金，乃是喬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六號法令對英國殖民地大麻或生亞麻輸入所發給的獎勵金了（在這期間，我國有時討好北美殖民地，有時和它爭執）。這個獎勵金，以二十一年為期，從1764年6月24日至1785年6月24日。每七年分為一期。第一期每噸獎勵金八鎊；第二期六鎊；第三期四鎊。蘇格蘭氣候不宜於種麻，雖亦種麻，但產量不多，品質較劣，故不得享受此種獎勵金。如果蘇格蘭亞麻輸入英格蘭，亦可得獎勵金，那對聯合王國南部本地的生產，就未免是太大的妨害了。

第四次發給的這一類獎勵金，乃是喬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五號法令對美洲木材輸入的獎勵金了。期限為九年，從1766年1月1日至1775年1月1日。每三年分為一期。第一期，每輸入好鬆板一百二十條，得獎勵金二十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呎，得獎勵金十二先令。第二期，每輸入好鬆板一百二十條，得獎勵金十五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呎，得獎勵金八先令。第三期，每輸入好鬆板一百二十條，得獎勵金十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呎，得獎勵金五先令。

第五次發給的這一類獎勵金，乃是喬治三世第九年第三十八號法令，對英國殖民地生絲輸入的獎勵金了。限期二十一年，從1770年1月1日至1791年1月1日。每七年分為一期。第一期，每輸入生絲價值一百鎊，得獎勵金二十五鎊；第二期，得獎勵金二十鎊；第三期，得獎勵

金十五鎊。但養蠶造絲，需要那麼多的手工，而在北美，工價又是那麼高，所以連這樣大的獎勵金，也不可能產生任何大的效果。

第六次發給的這一類獎勵金，乃是喬治三世第十一年第五十號法令，對英國殖民地酒桶、大桶、桶板、桶頭板輸入的獎勵金了。限期九年，從1772年1月1日至1781年1月1日。三年一期，第一期，輸入各物一定量，得獎勵金六鎊；第二期，得四鎊；第三期，得二鎊。

第七次即最後一次發給的這一類獎勵金，乃是喬治王世十九年第三十七號法令，對愛爾蘭大麻輸入的獎勵金了。限期為二十一年，即從1779年6月24日至1800年6月24日，每七年分為一期。這和美洲大麻及生亞麻輸入的獎勵金，全是一樣，而每一期的獎勵金標準，亦是一樣，但不象對美洲那樣，獎勵金不推廣到生亞麻。愛爾蘭生亞麻輸入的獎勵金，對不列顛這種物品的栽種，是太大的妨害了。在對愛爾蘭大麻輸入發給獎勵金時，不列顛議會和愛爾蘭議會之間的感情，並不比以前不列顛和美洲的感情好，但我們總希望，前者是在比後者更順適的情況下發給的。

同時，這幾種商品，若從美洲輸入，我們就給以獎勵金，若從任何其他國家輸入，我們即課以高的關稅。我國美洲殖民地的利害關係，與祖國的利害關係，被認為是一致的。他們的財富，被認為是我們的財富。據說輸到他們那裏去的貨幣，會由於貿易差額，全部回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無論怎樣在他們身上用錢，亦不致使我們減少一個銅板。無論就那一點說，他們的都是我們所有，用錢在他們身上，等於用錢來增進我們自己的財產，對本國人民有利。這樣一個主義的愚妄，已為經驗所充分暴露，我們無須多說一句話來暴露它的愚妄。如果我國美洲殖民地，真是大不列顛的一部分，此種獎勵金便可認為是對生產的獎勵金，但依然要受這類獎勵金所要受的一切非難，但不受其他的非難。

工業原料的輸出，有時由於絕對禁止而受到妨礙，有時由於高的關稅而受到妨礙。

我國呢絨製造者，說服國會，使它相信，國家的繁榮，依存於他們這種業務的成功與推廣，他們在這一點上，比任何其他種類製造業者都更成功。他們不僅從絕對禁止外國呢絨輸入，取得了一種妨害消費者的獨佔，而且從禁止活羊及羊毛輸出，取得了一種妨害牧羊者及

羊毛生產者的獨佔。我國保證歲入的法律，有許多被人適當地指斥說，對那些在法律未頒佈前被認為無罪的行為科以嚴厲處罰，實過於苛刻。但我敢說，連最苛刻的歲入法律，與我國商人和製造業者吵吵鬧鬧地硬要國會頒佈，以支持他們那種荒謬的、不正當的獨佔權的某幾種法律比較，亦會使人覺得平和寬大。象德拉科的法律一樣，支持那種獨佔權的法律，可以說是用血寫成的。

伊麗莎白第八年第三號法令規定，輸出綿羊、小羊、公羊老，初犯沒收其全部貨物，監禁一年，在某一市日，截斷其左手，釘在市鎮上示衆；再犯，即宣告為重罪犯人，判處死刑。此法律的目的，在於防止我國的羊種在外國繁殖。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第十八號法令，又宣佈輸出羊毛亦犯重罪，輸出者須受重犯罪人那樣的刑罰，貨物亦被沒收。

為着國家的人道名譽，我們希望這兩種法律都不實施。第一種，據我所知，雖至今尚未明令撤除，法學家霍金斯認為至今還是有效，但那法律，也許在查理二世第十二年第三十二號法令第三節中，實際被取消了。查理二世的法令，雖沒有明白取消前法令所規定的刑罰，卻規定了一種新刑罰，即凡輸出或企圖輸出羊一頭，科罰金二十先令，並沒收這頭羊及其所有者對船隻的部分所有權。第二種法律，則由威廉三世第七年、第八年第二十八號法令第四節明白撤廢了。這法令宣稱：“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頒佈的禁止羊毛輸出法令，把羊毛輸出看做重罪。因為刑罰過於苛重，犯罪者的控訴，未能按法辦理。該法令關於該犯罪行為定為重罪一節，着即明令撤銷，宣告無效。”

但是，這個較和緩法令所制定的刑罰，以及先前法令所制定而未經這法令撤除的刑罰，都還是十分嚴酷。除了沒收貨物，輸出者每輸出或企圖輸出羊毛一磅，須科罰金三先令；這大抵比其原價高四倍乃至五倍。而且，犯此罪的商人或任何人，不得向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索取債務或要求清還賬目。不問其財產如何，不問其能否交付這樣重的罰款，法律總想使他完全破產。但人民大眾的道德，還沒敗壞到蒙法律制定人那樣，所以我未曾聽到過有人利用這個條款。倘若犯此罪的人，不能在判決後三個月內交付罰款，即處以七年的流刑，未滿期逃歸，作為重犯處罰，不得享受僧侶的特典。船主知罪不告，船

隻及其設備沒收。船長水手知罪不告，所有動產和貨物沒收，並處三個月的徒刑，後又改定為六個月的徒刑。

為要防止輸出，境內羊毛貿易，全部受到極苛刻極煩瑣的限制。羊毛不得裝在箱內、桶內、匣內，只可用布或皮革包裝，外面寫着三吋長的大字“羊毛”或“毛線”，否則沒收貨物及其盛器，每磅罰三先令，由所有者或包裝者交納。除了在日出及日落之間的時候，羊毛又不可由馬或馬車搬運，也不可在離海達五哩以內由陸路搬運，否則沒收貨物及車馬。鄰近海岸的小邑，得於一年內，對由小邑或經過小邑而運出或輸出羊毛的人，提出控訴，如羊毛價不及十鎊，則科以罰金二十鎊，如在十鎊以上，則科以三倍原價及三倍訴訟費的罰金。對居民中任何二人執行裁判，裁判所得向其他居民課稅來償還，象在盜竊的場合一樣。倘有人私通小邑官吏，以求減免罰金，則處以徒刑五年；任何人都可告發。這種法規，全國通行。

肯特及薩塞克斯二郡，限制尤為煩瑣。距海岸十哩以內的羊毛所有者，必須在剪下羊毛後三天內，以所剪的數量及藏所，書面報告最近的海關。在其中任何部分遷移以前，又須以羊毛的捆數、重量，買者姓名住址，及移運地址，作同樣的報告。在這二郡內，凡居在距海十五哩內的人，在未向國王保證，不以這樣購得的羊毛的任何部分再售給距海十五哩內任何他人以前，不得購買任何羊毛。倘若未作這樣的報告和保證，即以羊毛向這二郡的海邊輸運，一經發覺，就沒收其羊毛，犯者科罰金每磅三先令。倘若未作這樣的報告，即以羊毛存放於距海十五哩內者，查封沒收其羊毛；倘在查封后，有人要求領還，必須對國庫提出保證，在敗訴時，除了其他一切處罰，還須交付三倍的訴訟費。

在境內貿易受這樣的限制時，我相信，沿海貿易決不會很自由。羊毛所有者，要輸運或企圖輸運羊毛到海岸任何港埠，從那邊由海道運至海岸上其他港埠，那末在他輸運羊毛路出口港五哩以內的地方以前，須先到出口港報告羊毛包數、重量及記號，否則沒收羊毛，並沒收馬、馬車或其他車輛；其他各種禁止羊毛輸出迄今還有效的法律，當然也定有各種罰則。但威廉三世第一年第三十二號法令，卻又是那麼寬大，它宣稱：“若於剪毛十日後，將羊毛真實捆數及存地，親自向最近的海關提出證明，並在羊毛遷運前三日，親自向最近的海關說明

其意圖，就可把羊毛從剪毛地點運回家來，儘管剪毛地點，是在距海五哩以內的地方。”向沿海輸運的羊毛，必須保證在登記的某港口起運上陸，倘若沒有官吏在前，即行上貨，則沒收其羊毛，併科以每磅三先令的通常罰金。

我國呢絨製造者，爲要證明他們對國會要求施行這樣異常的限制，是完全正當，竟然說英國羊毛具有特殊品質，比任何其他國家的羊毛都好；說他國的羊毛，不攙入若干英國羊毛，就不能造出有相當質量的製造品；說精良呢絨，非由英國羊毛，不能織成；說英國若能完全防止本國羊毛輸出，就能獨佔幾乎全世界呢絨業，沒有誰能和他競爭，他就可隨意擡高價格，售賣呢絨，並在短期間內，依最有利的貿易差額，取得非常大的財富。這種學說，象大多數其他爲許多人民所確信的學說一樣，過去爲多數人民所盲目信從，而且至今仍爲他們所信從。至於一般不懂得呢絨業或未曾研究呢絨業的人，卻是幾乎全體相信。其實，英國羊毛，不但不是製造精良呢絨所必需，而且全不適合於製造精良呢絨。精良呢絨，全由西班牙羊毛織成。並且，把英國羊毛攙到西班牙羊毛中去織造，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減低呢絨的質量。

本書曾經說明，此等法規，不僅使羊毛價格，減低到現時應有價格以下，而且使其大大低於愛德華三世時代的實際價格。英格蘭蘇格蘭合併，此法規即通行於蘇格蘭。據說，蘇格蘭羊毛價格因此跌了一半。《羊毛研究報告》的作者約翰·斯密，是一位極精明、極聰明的作者。他說，最好的英國羊毛在英國的價格，一般比阿姆斯特丹市上極劣羊毛通常售賣的價格低。這些法規公開提出的目的，是把這商品的價格，減至自然應有的價格之下；毫無疑問，它們曾產生預期的效果。

也許有人認爲，價格這樣的降低，由於阻害羊毛的生產，必然大大減低這商品的年產額，雖不比從前低，但比現令狀態下市場要是公開自由任其價格上升到自然應有水平時所會有的產額低。但我總相信，其年產額雖多少會受這種法規的影響，但不可能大受影響。羊毛的生產，不是牧羊者使用其勞動及資本的主要目標。說他從羊毛希圖利潤，不如說他從羊肉希圖利潤。在多數場合，羊肉的平均或普通價格，可以補償羊毛平均或普通價格的不足。本書曾經說過（第一篇第

十一章)：“不論何種規定，如果能降低羊毛及羊皮價格，使低於自然應有的程度，那末在進步和耕作發達的國家，就必然稍能提高羊肉的價格。無論是大牲畜或小牲畜，只要是在改良的耕地上飼養，其價格必須足夠支付地主的合理地租和農民的合理利潤。所謂合理的利潤，即有理由可希望從改良的耕地上取得的利潤。如果不夠，其飼養不久就會停止。羊毛羊皮如不夠支付這種價格，那就必須由羊肉支付。前者所付愈少，後者所付必愈多。這種價格，究竟是怎樣由羊的各部分分擔，地主與農民是不關心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付足了價格沒有。所以，在進步及耕作發達的國家，他們作為消費者，雖因這種規定可提高食品價格，不免受若干影響，但作為地主與農民，他們的利益，卻不大受這種規定的影響。”所以，照這樣推論下去，在進步及耕作發達的國家，羊毛價格這樣的降低，不致引起這商品年產額的減少。不過，由於它使羊肉價格升漲，所以可能稍稍減低這種家畜肉的需要，從而稍稍減低此種家畜肉的生產。但即是這樣，其影響似乎亦不很大。

不過，對幹年產量，其影響雖不很大，但對於品質，其影響卻也許有人認為是非常的大。英國羊毛的品質，雖不比從前低，但比現今農耕狀態下所應有的程度低，也許有人認為，品質的低，幾乎與價格的低成比例。羊毛的品質，既取決於羊種、牧草及羊毛生產全過程中羊的管理與清潔，而牧羊者對於此等事件的注意，又一定要看羊毛價格對所需要的勞動和費用，能提供怎樣的賠償，這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羊毛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羊的健康、發育與體軀；改良羊肉所必要的注意，就某幾點說，亦就很夠改良羊毛了。所以，英國羊毛價格雖低，但其品質，據說，即在現世紀中，亦有相當的改良。價格要是好些，改良也許會大些；價格的低賤，雖然阻礙了這種改良，但卻沒有完全阻止這種改良。

所以，此等規定的粗暴，對羊毛年產量及其品質的影響，似沒達到人們所預期的那麼大（但我認為它對質的影響可能大於對量的影響）；羊毛生產者的利益，雖在一定程度上受傷害，但總的說來，其傷害並不象一般所想象的那麼大。但是，這種考究，決不能證明，絕對禁止羊毛輸出是正當的，只不過充分證明，對羊毛輸出課以重稅，不會是不正當的。

一國君主，對其所屬各階級人民，應給予公正平等的待遇；僅僅爲了促進一個階級的利益，而傷害另一階級的利益，顯然是違反這個原則的。這種禁令，正是僅僅爲了促進製造業者的利益而傷害了羊毛生產者的利益。

各階級人民，都有納稅以支持君主或國家的義務。每輸出羊毛一託德即三十八磅，課稅五先令甚或十先令，就給君主提供很大的收入。這種課稅，也許不象禁止輸出有那麼大的減低羊毛價格的作用，所以對羊毛生產者利益的損害程度，會少一些。對於製造業者，它提供了足夠大的利益，因爲他雖然必須以比禁止輸出的場合高的價格購買羊毛，但與外國製造業者比較，他至少能夠少付五先令或十先令的價格，而且還可省免外國製造業者所必須支付的運費及保險費。要想出對君主能提供很大收入，同時又對任何人都不會引起困難的賦稅，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種禁令雖附有防止輸出的各種罰則，並沒有防止羊毛的輸出。大家都知道，每年輸出仍是很大的。外國市場與本國市場羊毛價格上很大的差額，對於祕密輸出是那麼大的引誘，以致嚴酷的法律也不能加以防止。這種不合法的祕密輸出，除了祕密輸出者外，對任何人都無利。但是，課有賦稅的合法的輸出，既給君主提供收入，又可省免其他更苛重、更難堪的賦稅的徵收，對國內各階級人民都可有利。

漂白土，由於被認爲是呢絨製造及漂白所必需，故其輸出所受的處罰，幾乎和羊毛的輸出相同。煙管土，雖公認和漂白土不相同，但由於很類似，而且因爲漂白土有時可作爲煙管土輸出，亦受同樣的禁止與處罰。

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十四年第七號法令規定，靴、鞋或拖鞋除外，一切生皮鞣皮都禁止輸出；這法律給我國靴匠和鞋匠以一種妨害牧畜業和鞣皮業的獨佔。此後，法律又規定，鞣皮業對每重一百一十二磅鞣皮納輕微的稅一先令，即可擺脫此種獨佔。他們即以不加製造的鞣皮輸出，亦可於輸出時，收回所納國產稅的三分之二。一切皮革製造品，都得免稅輸出；輸出者還可收回所納國產稅全部。我國牧畜者，卻仍繼續受舊時獨佔權的害。牧畜者散居國內各地，彼此隔離，要團結起來，強迫他們同胞接受他們的獨佔、或擺脫他人可能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獨佔，在他們都是極其困難的。各種製造業者，都住在大

都市，所以能夠很容易團結起來。連牛骨亦禁止輸出；在這點上，制角器和制梳那二種不重要的行業，亦得享受一種妨害牧畜業者的獨佔。

以禁止或課稅方法，限制半製成品的輸出，並不是皮革製造業所特有的。在一件物品還要加工才合於直接使用與消費時，我們的製造業者便以為那應當由他們來完成。羊毛線與絨線和羊毛一樣，禁止輸出，受同樣的處罰，甚至白呢絨輸出，亦須納稅；我國染業在這點上，取得了一種妨害呢絨業的獨佔。我國的呢絨製造者，雖有力防禦他們自身，但大部分大的呢絨製造者，兼營染業。所以，用不着防禦了。錶殼，鍾殼，錶針盤，鍾針盤，都禁止輸出。我國製表者和制鐘者，似乎都不願這一類製作品的價格因外國人的競購而擡高。

愛德華三世、亨利八世和愛德華六世的一些法令，規定一切金屬都禁止輸出。鉛錫列為例外，或因為此二金屬極為豐饒。而其輸出，又為當時王國貿易相當大的部分。威廉和瑪利第五年第十七號法令，為要獎勵開礦，允許由不列顛礦物製造的鐵、銅和黃銅的輸出，不受禁止。銅塊無論產自本國或產自外國，後來威廉三世第九年和第十年第二十六號法令都允許輸出。未加工黃銅，即所謂槍炮金屬、鍾鈴金屬或貨幣鑑定人金屬（shroff-metal），卻仍繼續禁止輸出。各種黃銅製造品都得免稅輸出。

不完全禁止輸出的工業原料，往往在輸出時課以重稅。

喬治一世第八年第十五號法令規定，英國一切貨物，無論是英國生產或製造的，按以前法令，在輸出時須納稅的，都得免稅輸出。但下述各貨物，卻作為例外，即明礬、鉛、鉛礦、錫、鞣皮、綠礬、煤炭、梳毛機、白呢絨、菱鋅礦、各種獸皮、膠、兔毛、野兔毛、各種毛、馬匹、黃色氧化鉛礦。這些物品，除了馬匹，都是工業原料，半製成品（可視為要進一步加工的材料），或職業用具。這法令，依然要這些貨物納以前所須繳納的稅，即舊補助稅及百分之一出口稅。

這法令又規定，有許多染色用的外國染料，得於輸入時免納一切稅。但後來輸出時，須納一定的稅，但不能算重。似乎，我國染業者，一面認為，獎勵此等染料輸入，於己有利，一面又認為，稍稍阻害其輸出，於己亦有利。但是，商人為了貪慾而想出的此種令人注目的巧妙手法，卻似乎在這裏失其所望了。因為它必然使輸入者注意，

不超過國內市場需要而輸入。結果，國內市場上，這類商品的供給，總是不足，這類商品的價格，總是比輸入自由輸出亦自由的場合高些。

依照上述法令，西尼加膠或阿拉伯膠，列在染料之內，亦得免稅輸入。在再輸出時，要納輕微的稅，一百一十二磅不過三便士。當時，法國獨佔西尼加附近生產這種染料的國家的貿易；英國市場不容易從生產地點直接輸入來供應。幹是，喬治二世第二十五年規定，西尼加膠，得從歐洲各地輸入（那與航海條例的本旨大相違背）。但此法令的目的，不在於獎勵這種貿易，所以違反英國重商政策的普通原理，於其輸入時，每一百一十二磅課稅十先令，而在輸出時，又不許退還任何部分。1755年開始的戰爭的勝利，使英國象從前的法國一樣，對那些國家也享受專營貿易的特權，和議一成立，我們的製造者即要乘此良機，建立一種有利於他們自己但有害幹這商品生產者及輸入者的獨佔。所以，喬治三世第五年第三十七號法令規定，從英王陛下非洲領土輸出西尼加膠，只許輸往不列顛；象對我國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各列舉商品一樣，加上了同樣的限制、規律、沒收及處罰。誠然，其輸入，一百一十二磅只納輕稅六便士，但其再輸出，一百一十二磅須納重稅三十先令。我國製造業者的意旨，要把這全部產量運到英國來，而且，爲要使自己能以自定的價格購買這商品，又規定其中任何部分，除非負擔大的費用，不能再輸出。事實上，這樣的費用，就夠阻害它的輸出了。他們在這裏，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都是受着貪慾的驅使，但結果同樣大失所望。這種重稅，是祕密輸出的引誘。這種商品，有許多是由英國和非洲，祕密輸往歐洲各製造國，尤其是荷蘭。因此，喬治三世第十四年第十號法令，把此輸出稅減爲每一百一十二磅納五先令。

按舊補助稅所依據的地方稅則，海狸皮一件估定爲六先令八便士；1722年以前，海狸皮每件輸入所納的各種補助稅和關稅，約等於這地方稅的五分之一，即一先令四便士。在輸出時，除了舊補助稅的一半即僅僅二便士外，都可退還。一種這樣重要的工業原料，在輸入時，須課這樣的關稅，被認爲太高；於是，在1722年，地方稅減爲二先令六便士，輸入稅亦減爲六便士。但輸出時，亦僅能退還此額的一半。那次勝利的戰爭，使英國佔領了產海狸最多的地方，而海狸皮又

為列舉商品之一，所以，其輸出，就限於從美洲運至英國市場了。我國製造業者不久就想利用這機會。1764年，海狸皮一件輸入稅減為一便士，輸出稅則提高至每件七便士，並不得退還任何輸入稅。同法令又規定，海狸毛或海狸腹部輸出，每磅須納稅一先令六便士，但對海狸皮輸入稅則無所變改，由英國人用英國船輸入的，所納的稅仍在四先令與五先令之間。

煤炭，可視為工業原料，亦可視為職業用具，故其輸出，課有重稅，現在（1783年）是每噸納稅五先令以上，或每紐卡斯爾煤衡量納稅十五先令以上。這在許多場合，簡直高於炭坑所在地的商品原價，甚或高於輸出港的商品原價。

但真正職業用具的輸出，一般不是通過高關稅，而是通過絕對禁止來限制。於是，威廉三世第七年和第八年第二十號法令第八條規定，織手套和長袜的織機或機械禁止輸出，違則不僅把輸出乃至企圖輸出的織機或機械沒收，而且須科罰金四十鎊，一半歸於國王，一半歸於告發人。同樣，喬治三世第十四年第七十一號法令規定，棉製造業、麻製造業、羊毛製造業和絲製造業使用的一切用具禁止輸出，違則貨物沒收，犯者科罰金二百鎊，知情不報又以船供其運輸的船長，亦須科罰金二百鎊。

當死的職業用具的輸出受到這麼重的處罰時，活的職業用具即技工自不能聽其來去自如。所以，喬治一世第五年法令第二十七號規定，凡引誘英國技工或製造業工人到外國去執行職業或傳授職業者，初犯科罰一百鎊以下的罰金，處三個月徒刑，並繼續拘禁，到罰金付清之時為止；再犯即隨法庭意旨，科以罰金，處十二個月徒刑，並繼續拘禁，到罰金付清之時為止。喬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十三號法令，加重了這種處罰，即初犯科罰金五百鎊，處十二個月徒刑，並繼續拘禁，到罰金付清之時為止；再犯科罰金一千鎊，處二年徒刑，並繼續拘禁，到罰金付清之時為止。

按照上述二法令中前一個法令，某一個人如被證明曾勾引某一技工，或某一技工如被證明受人引誘或答應或訂約為上述目的前往外國，那末這樣的技工，必須向法庭提出不出國的合式的保證，而在未向法庭提出此種保證以前，得由法庭拘禁。

若有某一技工，竟自出國了，並在外國執行其職業或傳授其職業，則在英王陛下的駐外公使或領事的警告下，或在當時閣員的警告下，必須在接警告後六個月內回國，並繼續住在本國，否則即從那時候起，被剝奪一切國內財產的繼承權，亦不得作國內任何人的遺囑執行人或財產管理人，更不得繼承、承受或購買國內任何土地。他自己所有的動產及不動產，也被國王沒收，作為外國人看待，不受國王保護。

我國自誇愛護自由。無須說明，此等規定和此等誇大的自由精神是多麼矛盾。十分明顯，這種自由，在這場合，為了商人和製造業者瑣細的利益而被犧牲了。

這一切規定可稱頌的動機，是推廣我國製造業。但推廣的方法，不是改良自己的製造業，而是阻抑我們鄰國的製造業，並儘可能消滅一切可惡競爭者的搗亂性競爭。我國製造業者認為，他們應當獨佔本國同胞的技能才幹。通過限制某些職業在一個時間內所得僱用的人數，並規定一切職業須有長時間的學徒時期，他們企圖侷限各職業的知識，使僅為少數人所掌握，而且愈少愈好，他們又不願這少數人中有一些人到外國去傳授技能給外國人。

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而生產者的利益，只在能促進消費者的利益時，才應當加以注意。這原則是完全自明的，簡直用不着證明。但在重商主義下，消費者的利益，幾乎都是為着生產者的利益而被犧牲了，這種主義似乎不把消費看作一切工商業的終極目的，而把生產看作工商業的終極目的。

對於凡能與本國產物和製造品競爭的一切外國商品，在輸入時加以限制，就顯然是為着生產者的利益而犧牲國內消費者的利益了。為了前者的利益，後者不得不支付此種獨佔所增加的價格。

對於本國某些生產物，在輸出時發給獎勵金，那亦全是為了生產者的利益。國內消費者，第一不得不繳納為支付獎勵金所必要徵收的賦稅；第二不得不繳納商品在國內市場上價格擡高所必然產生的更大的賦稅。

有名的與葡萄牙籤訂的通商條約，通過高的關稅，使我國消費者不能向鄰國購買我們本國氣候所不宜生產的商品，但必須向一個遙遠的國家購買這種商品，雖明知該國這種商品的品質較差。國內消費

者，爲了使本國生產者能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輸出某幾種產物到這一個遙遠國家去，不得不忍受此種困難。這幾種產物的強迫輸出在國內市場上引起的增高價格，亦得由消費者支付。

但爲管理我國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而訂立的許多法律，比我國所有其他通商條例，都更嚴重地犧牲國內消費者的利益，以顧全生產者的利益。一個大的帝國建立起來了，而其建立的唯一目的，便是造成一個顧客之國，使他們只能向我國各生產者的店鋪購買我國所能供給的各種物品。我國生產者由此種獨佔取得的僅是價格稍稍的提高，而我國消費者要負擔全部費用，以維持這個帝國，護衛這個帝國。爲了這個目的，僅僅爲了這個目的，我國在最近二次戰爭中，用去了二億鎊以上，借債一億七千萬鎊以上，至於前此各次戰爭用費，還不算在裏面。單單這一項借款的利息，不僅大於由殖民地貿易獨佔據說所能得到的異常的利潤的全部，而且大於這貿易的價值的全部，換言之，大於每年平均輸出到殖民地的貨物價值的全部。

誰是這重商學說體系的設計者，不難於確定。我相信，那決不是消費者，因爲消費者的利益全被忽視了。那一定是生產者，因爲生產者的利益受到那麼周到的注意。但在生產者中，我們的商人與製造業者，又要算是主要的設計者。在這一章所討論的商業條例中，我們製造者的利益，受到了最特別的注意。消費者或不如說其他生產者的利益，就爲着製造業者的利益而被犧牲了。

第九章 論重農主義即政治經濟學中把土地生產物

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

關乾重商主義，我覺得有詳細說明的必要。但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農主義，卻不需要這麼長的說明。

據我所知，把土地生產物看作各國收入及財富的唯一來源或主要來源的學說，從來未被任何國家所採用；現在它只在法國少數博學多能的學者的理論中存在着。對於一種未曾、也許永遠不會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學說的謬誤，當然不值得長篇大論去討論。不過，對於這個極微妙的學說，我將盡我所能，明確說出它的輪廓。

路易十四有名的大臣科爾伯特，為人正直，而且勤勉異常，有淵博的知識，對於公共賬目的檢查，又富有經驗，極其精明。總之，在各方面，他的能力都使他對於公共收入的徵收與支出，能搞得井井有條。不幸，這位大臣抱有重商主義的一切偏見。這種學說，就其性質與實質說，就是一種限制與管理的學說，所以，對於一個慣於管理各部公務，並設置必要的制裁與監督，使各部事務不逾越其適當範圍，而又勤苦工作的事務家，是很合脾胃的。他對於一個大國的工業及商業所採用的管理方式，與管理各部公務的方式一樣；他不讓各個人在平等自由與正義的公平計劃下，按照各自的路線，追求各自的利益，卻給某些產業部門以異常的特權，而給其他產業部門以異常的限制。他不僅象歐洲其他大臣一樣；更多地鼓勵城市產業，很少鼓勵農村產業；而且他還願意壓抑農村產業，以支持城市產業。爲了使城市居民得以廉價購買食物，從而鼓勵製造業與國外貿易，他完全禁止穀物輸出；這樣就使農村居民不能把其產業產品的最重要部分，運到外國市場上去。這種禁令，加上舊日限制各省間穀物運輸的各省法規，再加上各省對耕作者的橫徵暴斂，就把這個國家的農業，壓抑得不能依照自然趨勢，按其肥沃土壤和極好氣候所應有的發展程度而發展了。這種銷沉沮喪的狀態，在全國各地都多少感覺到了；關於發生這種狀態的原因，有許多方面業已開始深討。科爾伯特鼓勵城市產業過於鼓勵農村產業的辦法，似乎是此中原因之一。

諺語說，矯枉必須過正。主張把農業視為各國收入與財富的唯一來源的這些法國學者們，似乎採用了這個格言。由於在科爾伯特的制度中，和農村產業比較，城市產業確是過於受到重視，所以在這些重農主義學者的學說中，城市產業就必定受到輕視。

他們把一般認為在任何方面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所貢獻的各階級人民，分為三種。第一種，土地所有者階級；第二種，耕作者、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階級，對於這一階級，他們給以生產階級這一光榮稱號；第三種，工匠、製造者和商人階級，對於這一階級，他們給以不生產階級這一不名譽的稱號。

所有者階級，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把金錢花在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築物、排水溝、圍牆及其他改良或保養上，有了這些，耕作者就能以同一的資本，生產更多的生產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這種增高的地租，可視為地主出費用或投資改良其土地所應得的利息或利潤。這種費用，在這個學說中，稱為土地費用。

耕作者或農業家所以對年產物有貢獻，是因為他們出費用耕作土地。在重農主義體系中，這種費用稱為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原始費用包括：農具、耕畜、種子以及農業家的家屬、僱工和牲畜。在第一年度耕作期間（至少在其大部分期間）或在土地有若干收穫以前所需的維持費。每年費用包括：種子、農具的磨損以及農業家的僱工、耕畜和家屬（只要家屬中某些成員可視為農業僱工）每年的維持費。支付地租後留給他的那一部分土地生產物，首先應該足以在相當期間內，至少在他耕種期間內，補償他的全部原始費用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其次應該足以補償他全部的每年費用，並提供資本的普通利潤。這兩種費用，是農業家用於耕作的兩種資本；倘若這兩種資本不經常地回到他手中，並給他提供合理的利潤，他就不能與其他職業者處在同等地位經營他的業務；他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盡快地放棄這種職業，而尋求其他職業。為使農業家能繼續工作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土地生產物，應視為農業的神聖基金，倘若地主加以侵害，就必然會減少他自己土地的產物，不要多少年，就會使農業家不但不能支付此種苛酷的地租，而且不能支付應當支付的合理地租。地主應得的地租，只是把先前用於生產總產物或全部產物所必需的一切費用完全付清之後留下來的純產物。因為耕作者的勞動，在付清這一切必要費用

之後，還能提供這種純產物，所以在這種學說中，這個階級才被尊稱為生產階級。而且由於同一理由，他們的原始費用和每年費用，在這種學說中。亦被稱為生產性費用，因為這種費用，除了補償自身的價值外，還能使這個純產物每年再生產出來。

所謂土地費用，即地主用來改良土地的費用，在這種學說中，亦被尊稱為生產性費用。此等費用的全部及資本的普通利潤，在還未通過增高的地租完完全全還給他主以前，這增高的地租，應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會不應課以什一稅，國王亦不應課以賦稅。不然，就會妨害土地的改良，從而妨害教會自身的什一稅的未來增加，也妨害國王自身的賦稅的未來增加。因為在良好狀態下，此等土地費用，除了再生產它自身全部價值以外，還能在若干時間以後，使純產物再生產出來，所以在這種學說中，它亦被稱為生產性費用。

在這種學說中，被稱為生產性費用的，就只有這三種，即地主的土地費用，農業家的原始費用及每年費用。其他一切費用，其他一切階級人民，即使一般認為最生產的那些人，亦因為這個緣故，被視為是完全不生產的。

按人們一般的見解，工匠與製造者的勞動，是極能增加土地原生產物的價值的，但在這種學說中，工匠和製造者卻特別被視為完全不生產的階級。據說，他們的勞動，只償還僱用他們的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這種資本乃是僱主墊付給他們的原材料、工具與工資，是被指定用來僱用他們、維持他們的基金。其利潤乃是被指定用來維持他們的僱主的基金。他們的僱主，墊付他們以他們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及工資，也同樣墊付他自己以維持他自己所需的費用。他所墊付的這種維持費，通常和他在產品價格上所希冀的利潤成比例。倘若產品價格不夠償還他為自己而墊付的維持費，以及為勞動者而墊付的原材料、工具與工資，那他就顯然沒有償還他所投下的全部費用。所以製造業資本的利潤，並不象土地的地租一樣，是還清全部費用以後留下的純產物。農業家的資本，象製造者的資本一樣，給資本所有者提供利潤，但農業家能給他人提供地租，製造者卻不能夠。所以用來僱用並維持工匠、製造業工人的費用，只延續——如果可以這樣說——它自身價值的存在，並不能生產任何新的價值。這樣，它是全無生產或不生產的費用。反之，用來僱用農民或農村勞動者的費用，卻除了

延續它本身價值的存在，還生產一個新的價值，即地主的地租。因此，它是生產性費用。

商業資本和製造業資本，同樣是不生產的。它只能延續它自身價值的存在，不能生產任何新價值。其利潤，不過是投資人在投資期間內或收得報酬前為自身而墊付的維持費的補償，換言之，不過是投資所需費用的一部分的償還而已。

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對於土地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不能有什麼增加。誠然，他們的勞動，對於土地原生產物某特定部分的價值，確有很大的增加，但他們在勞動時要消費原生產物其他部分。他們對這部分的消費，恰好等於他們對那部分的增加。所以，無論在那一個時間，他們的勞動，對全部的價值，也沒有一點增加。例如，製造一對花邊的人，有時會把僅值一便士的亞麻的價值，提高到三十鎊。乍看起來，他似乎把一部分原生產物的價值，增加了約七千二百倍，但其實，他對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毫無所增。這種花邊的製造，也許要費他二年勞動。花邊製成後，他所得的那三十鎊，只不過補還這二年他給自己墊付的生活資料罷了。他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勞動，對於亞麻所增加的價值，只不過補償這一日、一月或一年他自身消費掉的價值。所以，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對土地原生產物全年產額的價值，都沒有一點的增加。他繼續消費的那部分原生產物，總是等於他繼續生產的價值。被僱在這種費用多而又不重要的製造業上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貧窮的。這種現象，可使我們相信，他們製造品的價格，在普通場合，並沒有超過他們生活資料的價值。但就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的工作說，情形就不相同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勞動，除了補還他們的全部消費，和僱用並維持工人及其僱主的全部費用外，還繼續生產一個價值，作為地主的地租。

工匠、製造業工人、商人，只能由節儉來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或按這種學說的說法，只能由克己，即自行剝奪自己生活資料基金的一部分，以增加社會的收入或財富。他們每年所再生產的，只是這種基金。所以，倘若他們每年不能節省若干部分，倘若不能每年自行剝奪若干部分的享受，則社會的收入與財富，就絲毫不能因他們的勞動而有所增加。反之，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卻可享受其自己生活資料基金全部，同時仍可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他們的勞動，除了給

自己提供生活資料以外，還能每年提供一種純產物；增加這種純產物，必然會增加社會的收入與財富。所以，象法國、英國那樣以地主和耕作者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就能由勤勞及享樂而致富。反之，象荷蘭、漢堡那樣以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國家，卻只能由節儉與克己而致富。境況如此不同的國家，利害關係也極不相同，所以普通國民性也極不相同。在前一類國家中，寬大、坦白和友愛，自成爲普通國民性的一部分。在後一類國家中，自會養成偏狹、卑鄙和自私心，厭惡一切社會性娛樂與享受。

不生產階級，即商人、工匠、製造業工人的階級，是由其他兩階級——土地所有者階級及耕作者階級——維持與僱用的。這一階級工作的材料，由他們供給，這一階級的生活資料基金，由他們供給，這一階級在工作時所消費的穀物和牲畜，亦由他們供給。不生產階級一切工人的工資以及他們一切僱主的利潤，最終都須由地生及耕作者支付。這些工人和這些僱主，嚴格地說，是地主和耕作者的傭人。他們與家僕的區別，僅爲一在戶外工作、一在戶內工作。這兩種人依賴同一主人出資來養活。他們的勞動，都是不生產的，都不能增加土地原生產物總額的價值。它不但不能增加這總額的價值，還是一種必須從這總額中支付的支出。

不過，對於其他二階級，這個不生產階級，不僅有用，而且是大大有用。有了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地主與耕作者才能以少得多的自己勞動的產物，購得他們所需的外國貨物及本國製造品。要是他們企圖笨拙地、不靈巧地親自輸入或親自制造這些東西，那就要花大得多的勞動量。藉着不生產階級的幫助，耕作者能專心耕作土地，不致爲其他事務分心。專心的結果，耕作者所能生產的產品便更多了。這種更多的產品，能夠充分補償他們自己和地主僱用並維持這一不生產階級所費的全部費用。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就其本身性質說，雖是完全不生產的，但間接有助於土地生產物的增加。他們的勞動，使生產性勞動者專心於原有職業，即耕作土地，因而增進生產性勞動者的生產力。耕耘這一業務，往往由於不以耕耘爲業的人的勞動，變得更簡易，變得更好。

就任何一點說，限制或損害商人、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產業，都不是地主及耕作者的利益。這一不生產階級越自由，他們之間各種職

業的競爭越激烈，其他二階級所需的外國商品及本國製造品，就將以越低廉的價格得到供給。

壓迫其他二階級，也不可能是生產階級的利益。維持並僱用不生產階級的，乃是先維持耕作者再維持地主以後剩留下來的剩餘土地生產物。這剩餘額越大，這一階級的生計與享樂，必越得到改進。完全正義、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確立，是這三階級同臻於最高度繁榮的最簡單而又最有效的祕訣。

在荷蘭和漢堡那樣主要由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這一不生產階級構成的商業國家中，這一類的人，也是這樣由地主及土地耕作者來維持和僱用的。但其中有一區別，亦只有一區別，即這些地主與耕作者，大部分都離這些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非常的遠，換言之，供後者以工作材料和生活資料基金的，乃是其他國家的居民，其他政府的人民。

但這樣的商業國，不僅對其他各國居民有用，而且大大有用。其他各國居民，本應在國內找得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但由於國家政策的某種缺點，不能在國內找到他們。有了商業國，這種極其重要的缺陷，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補。

對此等商業國的貿易或其所供給的商品徵課高關稅，以妨害或抑制此等商業國的產業，決不是有田地的國家——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利益。這種關稅，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勢必減低用以購買商業國商品的它們自己土地的剩餘生產物或其價格的真實價值。這種關稅的唯一作用是，妨害此等剩餘生產物的增加，從而妨害它們自己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反之，准許一切此等商業國享有貿易上最完全的自由，乃是提高這種剩餘生產物價值，鼓勵這種剩餘生產物增加，並從而鼓勵國內土地改良及耕作的最有效方策。

這種完全的貿易自由，就以下一點說，也是最有效的方策。它在適當期間，供他們以國內所缺少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使得他們在國內感到的那種最重要缺陷，在最適當、最有利的情況下得到填補。

土地剩餘生產物不斷增加，到了相當時期，所創造的資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潤率沒在改良土地或耕作土地上。這一剩餘部分，自會改用於在國內僱用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國內的工匠與製造業

工人，能在國內找得他們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資料基金，所以，即使技術與熟練程度遠不如人，亦能立即與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作成他們的產品，因為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必須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所需的材料與生活資料。即使由於缺少技術與熟練程度，他們在一定時間內，不能和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作成他們的產品，但也許能夠在國內市場上，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因為此等商業國同類工匠及製造業工人制造的貨物，必須由很遠很遠的地方運來。而且，在他們的技術與熟練程度改進了的時候，他們很快就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產品。於是，此等商業國的工匠與製造業工人，將在那些農業國的市場上遇着競爭者，不久以後，就不得不賤賣，被趕出市場。隨着技術與熟練程度的逐漸改進，此等農業國製造品的低廉，將使其製造品在適當時期，推廣到國內市場之外，即推銷於許多國外市場，並在那裏，按同樣的方式，逐漸把此等商業國的許多製造品排擠出去。

農業國原生產物及製造品不斷增加，到了相當時期，所創造的資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潤率，投在農業或製造業上。這一部分資本，自會轉投在國外貿易上，把國內市場上不需要的過剩的原生產物及製造品，運到外國去。在輸出本國生產物時，農業國商人，亦將比商業國商人處於更有利地位，象農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比商業國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處於更有利地位一樣。後者必須在遠地尋求貨物、原料與食品，前者能在國內找得這些東西。所以，即使他們航海技術較為低劣，他們亦能和商業國商人，以同樣低廉的價格，在外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貨物。如果有同等的航海技術，就能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了。因此，在國外貿易這一部門，他們不久就能和商業國商人競爭，並在相當期間，把此等商人全部排擠出去。

所以，按照這個寬宏制度，農業國要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最有利的辦法，就是對一切其他國家的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給予最完全的貿易自由。這樣就能提高國內剩餘土地生產物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不斷增加，就將逐漸建立起來一筆基金，它在相當時期內，必然把所需的各種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培育起來。

反之，倘若農業國以高關稅或禁令壓抑外國人民的貿易，就必然在兩個方面妨害它本身的利益。（一）提高一切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價格，必然減低用以購買外國商品及各種製造品的本國剩餘土地生產物的真實價值；（二）給予本國商人、工匠與製造業工人以國內市場的獨佔，就提高工商業利潤率，使高於農業利潤率，這樣就把原來投在農業上的資本的一部分吸引到工商業去，或使原要投在農業上的那一部分資本，不投到農業上。所以，這個政策在兩個方面妨害農業。（一）減低農產物的真實價值，因而減低農業利潤率；（二）提高其他一切資本用途的利潤率。農業因此成為利益較少的行業，而商業與製造業卻因此變得更有利可圖。各個人為了自身的利益，都企圖儘可能把資本及勞動從前一類用途改投到後一類用途。

農業國通過這種壓制政策，雖能以比在貿易自由情況下稍大的速度（這大有疑問）培育本國的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但這是在其尚未十分成熟以前，過早地把他們培育起來（如果可這樣說）。過速地培育一種產業，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更有價值的產業。對於僅能補償所投資本並提供其普通利潤的產業，如以過於急速的方法加以培育，結果就會壓抑另一種產業，即除了補償資本並提供其利潤以外，還能提供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地租的產業。過於急速地鼓勵全不生產的勞動，必然壓抑生產性勞動。

至於按照這個學說，土地年產物全部是怎樣在上述那三個階級之間進行分配，不生產階級的勞動為什麼只補還它所消費的價值，而不增加那全額的價值，則由這一學說的最聰明、最淵博的創始者魁奈，用一些數學公式表明出來了。在這些公式中，他對第一個公式特別重視，標名為《經濟表》。他想象在最完全的自由狀態下，因而是在最繁榮的狀態下，在年產物能提供最大量純產物，而各階級能在全部年產物中享有其應得部分的情況下，他用第一個公式把想象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接着，有幾個公式，又把在有各種限制及規章條例的狀態下，在地主階級和不生產階級受惠多於耕作者階級的狀態下，在這兩個階級侵蝕生產階級應得部分的狀態下，他所想象的這種分配的進行方式，表述出來。按照這個學說，最完全自由狀態所確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蝕，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會不斷地多少減損年產物的價值與總和，因而使社會收入與財富逐漸減少。減少的程

度，必按照侵蝕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而以較速或較緩的程度，日益加劇。這些公式，把這學說認為必和這自然分配所受不同侵害程度相適應的不同減少程度，表述出來。

有些有思想的醫生，以為人體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運動的正確養生方法來保持，稍有違犯，即將按違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經驗似乎告訴我們，在各種不同的養生方法下，人類身體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狀態，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甚至在一般認為很不衛生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實，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就含有一種未被發覺的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並糾正極不良衛生方法的不良結果。魁奈自己就是一個醫生並且是個極有思想的醫生，他似乎對於國家亦抱有同樣的概念，以為只有在完全自由與完全公平的正確制度下，國家才能繁榮發達起來。他似乎沒有考慮到，在國家內，各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能在許多方面預防並糾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壓抑的政治經濟的不良結果。這種政治經濟，雖無疑會多少阻礙一國趨於富裕繁榮的發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國後退。如果一國沒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義，即無繁榮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沒有一國能夠繁榮了。幸運的是，在國家內，自然的智慧，對於人類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許多惡影響，有了充分的準備，來做糾正，正如在人體內，自然的智慧，有充分準備，來糾正人類的懶惰及無節制的不良結果一樣。

但是，這種學說最大的謬誤，似乎在於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看做全無生產或全不生產的階級。這種看法的不適當，可由下面的話來說明。

第一，這種學說也承認這一階級每年再生產他們自身每年消費的價值，至少是延續了僱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那種資財或資本的存在。單就這一點說，把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名稱加在他們頭上，似乎很不妥當。只生一男一次來代替父母、延續人類而不能增加人類數目的婚姻，不能稱為不生兒育女的婚姻。誠然，農業家與農村勞動者，除補償維持他們和僱用他們的資財以外，每年還再生產一種純產物，作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個兒女的婚姻，確比僅生育兩個兒女的婚姻更有生產力，而農民與農村勞動者的勞動，確比商人、製造業工人與工匠

的勞動更有生產力。但是，一個階級的更多的生產，決不能使其他階級成為無生產或不生產的。

第二，無論怎樣說，把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和家僕一樣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適當的。家僕的勞動，不能延續僱用他們和維持他們的基金的存在。他們的維持與僱用，全由主人出費用；他們所搞的工作，在性質上並沒有償還這種費用的可能。他們的工作，大都是隨生隨滅的事務，不固定在亦不實現在任何可賣商品上，以補償他們工資及維持費的價值。反之，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勞動，卻自然而然地固定在並實現在可賣商品上。因此，在討論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那一章中，我把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歸到生產性勞動者內，而把家僕歸到無生產或不生產的勞動者內。

第三，無論根據何種假設，說工匠、製造業工人和商人的勞動，不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都似乎是不妥當的。例如，即使我們假定（象這種學說所假定的一樣），這一階級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費的價值，恰好等於他們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產的價值，亦不能因此便斷言，他們的勞動，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對社會上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無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穫後六個月時間，作成了值十鎊的作業，那末即使他同時消費了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實際上亦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增加了十鎊的價值。在他消費半年收入即價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時，他又生產了一個等價值的產品，使他自己或別人能購買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這六個月時間所消費及所生產的價值，不等於十鎊，而等於二十鎊。誠然，無論在什麼時候，只存在着這十鎊的價值，但若這價值十鎊的穀物及其他必需品，不為這工匠所消費，而為一兵士或一家僕所消費，那末在六個月終，還存在的那一部分年產物的價值，就比這工匠勞動的場合要少十鎊的價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產的價值，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超過他所消費的價值，但無論在什麼時候，市場上貨物實際存在的價值，都賴有他的生產，能比沒有他生產的場合大。

此種學說的擁護者往往說，工匠、製造業工人與商人的消費，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在他們這樣說時，其意思也許只是，他們的收入，或指定供他們消費的基金，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如果他們的

話表達得確切些，如果他們只說，這一階級的收入等於這一階級所生產的價值，讀者們也許更容易想到，這一階級從這個收入節省下來的東西，必會多少增加社會的真實財富。但爲了要說出一種象似議論一樣的東西，他們不得不照他們本來的說法來說了。然而，即使假定事情真如他們所假設一樣，那種議論亦是非常不得要領的。

第四，農業家及農村勞動者，如果不節儉，即不能增加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這和工匠、製造業工人及商人是一樣的。任何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都只能由兩種方法來增加。其一，改進社會上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其二，增加社會上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量。

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改進，取決於：（一）勞動者能力的改進；（二）他工作所用的機械的改進。因爲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勞動，能比農業家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實行更細密的分工，使每個工人的操作更爲單純，所以就工匠及製造業工人說，這兩種改進都能達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這方面，耕作者階級並不比工匠及製造者階級處於優越地位。

任何社會實際僱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必完全取決於僱用有用勞動的資本的增加；這種資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於收入（資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資本出借人的收入）的節省額。如果商人、工匠和製造業工人，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自然而然地比地主及耕作者更有節儉儲蓄的傾向，那末他們也就更能夠增加本社會所僱用的有用勞動量，因而更能夠增加本社會的真實收入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

第五，即使一國居民的收入，真如這一學說所設想的那樣，全由其居民勞動所能獲得的生活資料構成，在其他一切條件都相等的場合，工商業國的收入，亦必比無工業或無商業的國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國通過商業及工業每年能從外國輸入的生活資料量，就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城市居民，雖往往沒有田地，亦能靠自身的勞動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產物，不僅獲得工作的原料，而且獲得生活資料基金。城市與其鄰近農村的關係，往往即是一個獨立國家與其他獨立國家的關係。荷蘭就是這樣從其他國家得到他們生活資料的大部分。活牲畜來自霍耳斯廷及日蘭德；穀物來自幾乎歐洲各個國家。小量的製造品，能購買大量的原生產物。所以，工商業國自

然以小部分本國製造品來交換大部分外國原生產物；反之，無工商業的國家，就大都不得不費去大部分本國原生產物，來購買極小部分的外國製造品。前者所輸出，僅能維持極少數人，供應極少數人使用，但所輸入，卻為多數人的生活資料及供應品。後者所輸出，是多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但所輸入的卻只是極少數人的供應品及生活資料。前一類國家的居民，總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現有耕作狀態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資料。後一類國家的居民，卻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資料。

這一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千真理。因此，凡願細心研討這個極重要科學的原理的人，都得對它十分留意。這一學說把投在土地上的勞動，看做唯一的生產性勞動，這方面的見解，未免失之偏狹；但這一學說認為，國民財富非由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構成，而由社會勞動每年所再生產的可消費的貨物構成，並認為，完全自由是使這種每年再生產能以最大程度增進的唯一有效方策，這種說法無論從哪一點說，都是公正而又毫無偏見的。它的信徒很多。人們大都愛好怪論，總想裝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東西；這一學說與眾不同，倡言製造業勞動是不生產的勞動，也許是它博得許多人讚賞的一個不小的原因。在過去數年間，他們居然組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學派，在法國學術界中，取得了經濟學家的名稱。他們的作品，把許多向來不曾有人好好研究過的題目，提到大眾面前討論，並使國家行政機關在一定程度上贊助農業，所以對於他們的國家，他們確有貢獻。就因為他們這種說法，法國農業一向所受的各種壓迫，就有好幾種得到了解脫。任何未來的土地購買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長到二十七年了。往昔國內各省間穀物運輸所受各省的限制，完全廢除了；輸出穀物到外國的自由，在一切普通場合，亦由王國的習慣法所確認了。這個學派有許多著作，不僅討論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即討論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而且討論國家行政組織其他各部門。這些著作，都絕對遵循魁奈的學說，不加任何修改。因此，他們的著作大部分都和他的學說相同。對於這學說，曾作最明白、最聯貫的闡述的，乃是曾任馬提尼科州長的裏維埃所著《政治社會的自然與基本制度》那一小冊子。這整個學派，對於他們的大師的稱揚，不下於古代任何哲學學派對其創立者的稱揚。不過，這學派的大師自己倒是非常謙虛、非

常樸質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的作者米拉波說，“從有世界以來，有三個大發明在極大程度上給政治社會帶來安定，這些發明，與其他豐富和裝飾政治社會的許多發明無關。第一，是文字的發明，只有它使人類能把其法律、契約、歷史和發明照原樣傳達下去。第二，是貨幣的發明，它使各文明社會聯結起來。第三，是《經濟表》，它是其他二種發明的結果，把這二者的目標弄得齊全，使它們完善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而我們的子孫將從此獲得利益。”

近代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即城市產業，比較不利於農業，即農村產業；其他各國的政治經濟學，則採用不同的計劃，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製造業及國外貿易。

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於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於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佔有若干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租借條件據說很適度，對於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證。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傑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隻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隻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侷限在狹窄的範圍，要是本國船隻或外國船隻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範圍當然就會大得多。

製造品常常是體積小價值大，能以比大部分原生產物更小的費用由一國運至他國，所以在所有國家，它們都是國外貿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員不象中國那麼廣大而國內貿易不象中國那麼有利的國家，製造業亦常需要國外貿易來支持。設無廣闊的國外市場，那在幅員不大僅能提供狹小國內市場的國家，或在國內各省間交通不方便而國內某地生產物不能暢銷國內各地的國家，製造業就沒有好好發展的可能。必須記住，製造業的完善，全然依賴分工，而製造業所能實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場範圍的支配，這是我們曾經說過的。中國幅員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製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

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並不小於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餘各地的國外市場，那末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製造品，大大改進其製造業的生產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自己。

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亦比較有利於農業，比較不利於其他一切職業。

古埃及和印度，都把全體人民分成若干階級或部族，由父至子，世襲某一特定職業或某一種類職業。僧侶的兒子，必然是僧侶；士兵的兒子，必然是士兵；農業勞動者的兒子，必然是農業勞動者；織工的兒子，必然是織工；縫工的兒子，必然是縫工；餘可類推。在這兩國，僧侶階級佔最高地位，其次是士兵；而農業家及農業勞動者階級，在地位上都高於商人及製造者階級。

這兩國的政府都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古埃及國王為使尼羅河灌溉各地而興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很有名的；其遺蹟至今還為旅行者所讚賞。印度古代各王公為使恆河及許多河流灌溉各地而興建的同種工程，雖不如前者有名，但是一樣偉大。所以，這兩國雖亦間有糧食不足情況，但都以糧食豐饒而聞名於世。那裏雖都是人煙極其稠密，但在一般豐年，他們都能輸出大量穀物到鄰國去。

古埃及有畏海的迷信；印度教不許教徒在水上點火，因而不許教徒在水上烹調任何食物，所以實際上就等於禁止教徒作遠海的航行。埃及和印度人都幾乎完全依賴外國航業，來輸出他們的剩餘生產物。這樣的依賴，必然限制市場，所以必然阻害剩餘生產物的增加。而且，它對製造品增加的阻害，在程度上必然大於對原生產物增加的阻害。與最重要部分的土地原生產物比較，製造品需要大得多的市場。一個鞋匠一年可製造三百多雙鞋，但其家屬一年也許不會穿壞六雙。所以，他至少要有五十家象他那樣的家屬來光顧他，不然，他自身勞動的全部產物即無法售脫。在任何一個大國，即使人數最多的那一類工匠，在國內居民中所佔比例，很少在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以上。

但在英國和法國那樣的大國，據一些作家計算，以農業為職業的人數佔全國居民二分之一，據另一些作家計算，則為三分之一，但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作家計算為五分之一以下。英法兩國的農產物，大部分在國內消費，那末照此等計算，每一家農民，只須一家、兩家至多四家象他那樣的家屬來光顧，就可售脫他的全部勞動生產物。所以，農業和製造業比較，更能在市場有限這個不利情況下來維持自己。誠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國市場的狹窄，在一定程度上由內地航運的便利得到補償，內地航運十分有利地給本國各地各種生產物開拓了全國性的市場。而且，印度幅員很大，所提供的國內市場亦很大，足夠支持許多種類製造業。但在古埃及，則幅員很小，不及英國，所以國內市場總是很小，不能維持許多種類製造業。以此之故，孟加拉，即通常輸出穀物最多的印度一個省，所以引人注意，與其說因為它輸出了許多穀物，無寧說因為它輸出了許多種類製造品。反之，古埃及雖亦輸出若干製造品，尤其是精麻布及其他某幾種貨物，但終以輸出大量穀物而聞名於世。有一個長時期，它是羅馬帝國的穀倉。

中國和古埃及的各君主，以及印度各時代割據各王國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絕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種地稅或地租。這種地稅或地租，象歐洲的什一稅一樣，包含一定比例的土地生產物（據說是五分之一），或由實物交付，或估價由貨幣交付；隨各年收穫豐歉的不同，租稅也一年不同於一年。這樣，此等國家的君王，當然特別注意農業的利益，因為他們年收入的增減，直接取決於農業的盛衰。

古希臘各共和國和古羅馬的政策，重視農業，而不重視製造業和國外貿易；但是，與其說他們直接地、有意識地獎勵前一種職業，無寧說他們妨害後一類職業。希臘古代各國，有些完全禁止國外貿易，有些把工匠及製造業工人的職業，看做有害於人類的體力與精神，使人們不能養成他們在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中所要養成的習慣，使人們不能忍受戰爭的勞苦和戰爭的危險。這種職業被認為只適宜於奴隸，不許國家自由市民從事經營。即使象羅馬、雅典那樣的國家，雖然沒有這種禁令，但事實上，人民大眾還是不許經營今日通常為下層城市居民所經營的各種職業。這一類職業，在雅典和羅馬，全由富人的奴隸經營。此等奴隸，為其主人的利益，經營此等職業。這些富人既有財富和權力，又得到保護，所以貧窮的自由市民，要想在市場上以其

產品與此等富人的奴隸的產品競爭，那幾乎是辦不到的。可是，奴隸很少能獨出心裁，一切最重要的節省勞動、便易勞動的改良辦法，無論是機械方面或是工作安排與分配方面，都是自由人發現的。如果有一個奴隸提出這一類的改良辦法，其主人往往認為此等提議是懶惰的表示，是奴隸想以主人為犧牲而節省自己的勞動。這樣，可憐的奴隸不但不能因此得到報酬，也許還要因此受責罵，甚至受懲罰。所以，與自由人經營的製造業比較，奴隸經營的製造業，同量作業通常需要更大的勞動量。以此之故，後者的產品，通常必比前者的產品昂貴。孟德斯鳩曾說，與鄰近的土耳其礦山比較，匈牙利的礦山雖不更為豐饒，但總能以較小的費用開採，因而能獲取較大的利潤。土耳其的礦山由奴隸開採，土耳其人所知道使用的機械只是奴隸的手臂。匈牙利礦山由自由人開採，並使用許多節省勞動、便易勞動的機械。關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製造品的價格，我們知道得很少，但我們從這很少的一點知識中可以知道，精製造品似乎是非常昂貴的。絲與金以等重量相交換。當時，絲並非歐洲的製造品，全是從東印度運來的；長程運輸，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價格的昂貴。但據說，當時貴婦人亦往往以同樣高的價格，購買極精緻的麻布，而麻布則大都是歐洲的製造品，至遠亦不過是埃及的製造品。所以，此種高價的原因，就只是生產麻布的勞動所費很大，而此種勞動所費很大的原因，又只是所用機械過於粗笨。此外，精製呢絨的價格雖不這麼昂貴，但比現今的價格高得多。普林尼告訴我們，按一種方式染的呢絨，一磅值一百迪納裏，即三鎊六先令八便士，而按另一種方式染的呢絨，一磅值一千迪納裏，即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必須記住，羅馬磅僅含今日常衡量十二盎斯。誠然，這樣的高價，似乎主要起因於染料。但若呢絨本身價格不比現在高得多，那末這樣昂貴的染料，大概不會用在呢絨上面。這樣，附屬物與主要物價值間的不均衡，就顯得過於巨大了。再據同一作者所說，一種放在靠近桌子的長椅上的毛織枕墊的價格，是難於令人置信的。有些值三萬鎊以上，有些值三十萬鎊以上。這樣高的價格，也沒說是起因於染料。亞巴斯諾博士說，古時時髦男女的服裝，並不象今天有那麼多的花樣。我們在古代雕像中，只能看出極少式樣的服裝，就可證實他的議論。但他從此推論，他們的服裝，總的說來，必較今日低廉。這個結論，卻似乎不甚妥當。在時裝衣服所費很大時，花樣必定很少，但在製造技術及製造業的生產力已經改良，

以致任何服裝所費都不很大時，花樣自會多起來。富人們在不能以一件價格昂貴的服裝來炫耀自己時，就自然竭力以許許多多各色各樣的服裝來炫耀他們自己了。

前面已經說過，任何一國的貿易，都以城鄉之間的貿易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門。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資料基金，仰給於農村的原生產物，而以一定部分製成了的、適於目前使用的物品送還農村，作為原生產物的代價。這兩種人之間的貿易，最終總是以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與一定數量的製造品相交換。前者愈昂貴，後者必愈低廉；在任何一個國家，提高製造品價格，就會減低土地原生產物價格，因而就會妨害農業。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或其價格所能購買的製造品量愈小，這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必愈小，對地主改良土地和農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產量的鼓勵，亦必愈小。此外，在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工匠及製造業工人，就會縮小國內市場，即原生產物的最重要市場，因而就會進一步妨害農業。

所以，為了增進農業而特別重視農業，並主張對製造業及國外貿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學說，其作用都和其所要達到的目的背道而馳，並且間接妨害他們所要促進的那一種產業。就這一點說，其矛盾也許比重商主義還要大。重商主義為了鼓勵製造業及國外貿易，而不鼓勵農業，雖使社會資本一部分離去較有利益的產業，而支持較少利益的產業，但實際上，總算鼓勵了它所要促進的產業。反之，重農學派的學說，卻歸根到底實際上妨害了它們所愛護的產業。

這樣看來，任何一種學說，如要特別鼓勵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把社會上過大一部分的資本投入這種產業，或要特別限制特定產業，違反自然趨勢，強迫一部分原來要投在這種產業上的資本離去這種產業，那實際上都和它所要促進的大目的背道而馳。那隻能阻礙，而不能促進社會走向富強的發展；只能減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就會樹立起來。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採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士或其他階級相競爭。這樣，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於社會利益的義務。要履行

這種義務，君主們極易陷於錯誤；要行之得當，恐不是人間智慧或知識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儘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爲着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餘，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

這些義務的適當履行，必須有一定的費用；而這一定的費用，又必須有一定的收入來支付。所以，在下一篇，我將努力說明以下各點。第一，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些部分應由對全社會的一般課稅來支付，哪些部分應由對社會內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員的課稅來支付。第二，應由全社會支付的費用，將用各種什麼方法向全社會課稅，而這各種方法的主要利弊怎樣。第三，近代各國政府幾乎都用這種收入的一部分來作抵押以舉債，其理由及原因何在，此種債務對社會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影響又怎樣。所以，下一篇自然而然地分作三章。

第五篇 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第一章論君主或國家的費用

第一節論國防費

君主的義務，首在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而此種義務的完成，又只有藉助於兵力。但平時準備兵力和戰時使用兵力的費用，則因社會狀態不同以及進化時期不同，而大不相同。

就最低級最粗野的狩獵民族說，人人都是狩獵者，人人亦都是戰士。現今北美土人，就是如此。當他為保護社會，或為社會復仇而去戰場打仗時，他也是以自己的勞動維持自己，象在家中時一樣。在這種狀態下，當然既沒有君主，也沒有國家。他的社會，無須為他上戰場，或無須為他在作戰期間的生活負擔何種費用。

就比較進步的游牧民族的社會狀態，如韃靼人和阿拉伯人的社會狀態說，情況也大抵相同。在那種社會中，各個人是遊牧者，同時也是戰士。他們通常在蓬幕中，或在一種容易移動的有篷馬車中生活，沒有一定住所。整個部落或整個民族，每年因季節不同，或因其他偶發事故，時時遷移。當他們的畜羣，把一個地方的牧草吃盡了，他們便移住另一地方，又從那地方移往第三地方。他們在乾燥季節，遷往河岸；在陰溼季節，又退回高地。當他們奔赴戰場時，並不把牲畜交給老人婦女兒童看護，也不把老人婦女兒童拋在後邊，而不予以保護和供養。他們全民族在平時就過慣了流浪的生活，所以一當戰爭，人人都很容易變為戰士。不管作為軍隊進軍時，或作為游牧民遊牧時，他們的生活方式，總大抵一樣，雖然目的有不同。戰爭起來，他們一同作戰，所以每個人都盡其所能來動作。韃靼婦女參加戰爭，那是我們時常聽到的。他們如果戰勝了，敵方全種族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們的勝利報酬；如果戰敗了，就一切都完蛋，自己的牲畜乃至婦女兒童，全都成了戰勝者的戰利品。連大部分沒有戰死的戰士，也不得不為得到當前的生活資料而服從征服者。其餘的一部分人，通常被逐四散，四處逃亡。

韃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操習，在可為其參加戰鬥作準備。他們普通的戶外遊戲，如競走、角力、耍棒、投槍、拉弓等等，儼然就在從事戰爭。他們在實際作戰時，也如平日一樣，由自己所領帶的牲畜維持生活。這些種族，是有酋長或君主的，但酋長或君

主不曾爲了訓練他們作戰，負擔什麼費用。在作戰的時候，掠奪的機會，就是他們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報酬。

狩獵者的隊伍，通常不過二、三百人。因爲狩獵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既不確定，許多人如長久住在一塊，必無法維持。遊牧者不同，他們的隊伍，有時會達到二、三十萬人。只要他們的進行不受阻礙，他們能夠由牧草吃盡了的甲地域，遷到牧草完全沒有損耗的乙地域：他們共同一起進軍的人數，就似乎可無限制地增加。因此，狩獵民族對其鄰近的文明國民，沒有什麼可怕；而遊牧民族，就非同小可。所以，最不可怕的，無過於印第安人在美洲進行的戰爭；最可怕的，無過於韃靼人在亞洲屢次進行的侵略。修昔底德說：“無論是歐洲是亞洲，都不能抵抗團結起來的塞西亞人”。他這個斷言，是一切時代的經驗證明了的。塞西亞或韃靼的曠野，廣漠無垠，沒有大自然的屏障。那裏的居民，往往在一個征服者部落或種族的酋長的統治下團結起來。而他們結合的象徵，總是亞洲許多地方遍被蹂躪，變爲荒地。另一個大遊牧民族，即阿拉伯不毛沙漠的居民，除在穆罕默德及其直接後繼者的統治下結合過一次外，從來不曾團結一起。他們那次的結合，與其說是征服的結果，毋寧說是宗教熱情的結果；但他們那次結合的象徵，也同於上述。假若美洲的狩獵民族都成了牧羊者羣，那麼，鄰近他們的歐洲各殖民地居民，就一定不能象現在這樣平平穩穩地生活下去。

在比較更進步的農業社會，即在沒有對外貿易，除了幾乎全在各自家中製造爲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製造業外，沒有其他製造業的農業社會裏，每個人也都是戰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爲戰士。從事農業工作的人，一般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盡日曬雨打風吹。這種困苦的日常生活在，正可鍛鍊他們，使他們能熬受戰爭的苦難。其實，農業上有若干工作，就與戰時的一部分困難工作非常類似。比方說，農民在農場上，非掘鑿溝渠不可，而有了這套本領，他們便可從容地在戰場上構築戰壕與圍牆。農民的平常消遣，也象遊牧人民的遊戲一樣，儼然是從事戰爭。但由於農民不象遊牧者那樣閒暇，所以不象遊牧者那樣經常地從事這些遊戲，他們雖也都是兵，卻不象遊牧者那樣精於戰鬥本領。可是，照他們的樣子，訓練他們使能上陣打仗，很少要使君主或國家破費。

不過，農業是有固定性的。那怕開化最淺、耕作最幼稚的農民，也必須有一個固定住所。這固定住所一旦放棄，勢必蒙受大損失。所以農耕民族的作戰，就不能象狩獵民族游牧民族那樣，全體出動。他們至少要把老人婦女兒童留在後方，照料住所。可是，其他符合兵役年齡的男子則當全赴戰場，小民族往往都是如此。在一切國家，符合兵役年齡的男子，就一般推算，約佔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假使戰爭在播種期後開始，收穫期前終了，農民及其主要勞動者即使全部離開農場，亦不會蒙受大的損失。在這個期間，農場上雖有必須進行的業作，但他們相信，有老人婦女兒童就很可以把這事情作好。所以，短期從事戰役，他們儘可不要報酬；他們成為戰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國家花很大的訓練費用；他們實際作戰，也不需要君主或國家花很大的維持費用。古代希臘各邦市民，在第二次波斯戰爭發生以前，似即依這種方式從事兵役。伯羅奔尼撒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以前，也還是依這種方式從事兵役。據修昔底德觀察：伯羅奔尼撒人大概在夏季離開戰場，回去辦理收穫。羅馬人在各國王統治下乃至共和國初期，亦是採取這種辦法。直到維伊之圍以後，他們纔開始把維持在前方作戰的人的費用加在那些留在家鄉的人身上。以後羅馬帝國沒落了，它的廢墟上，又建立了歐洲各王國。這些王國，在可適當地叫做封建法制定以前及既經制定了以後若干期間，許多大領主，連同他們的直接屬民，往往是以自己的費用服事國王。他們在戰場上，如在家庭中一樣，也是以自己的收入支持自己；他們從未由國王那裏領到何等俸金或報酬。

在更為進步的社會裏，上戰場作戰的人，以自己的費用維持自己就全不可能了。這其中有兩種原因：一是製造業的進步，一是戰爭技術的改良。

就農民從事遠征說，只要那遠征是播種期後開始，收穫期前終了，他們在作業上這樣的中斷，就不致大大影響其收穫。因為，即使他們不加入勞動，大自然可替他們進行一大部分的殘餘工作。可是，徵役對於一般技術工人，那就非同小可了。比如說，鐵匠、木匠、織工吧，他們一離去作業的場所，其唯一收入源泉馬上就要涸竭。他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大自然不給與一點幫助。所以，他們這種人如為國家服兵役，就無法自己維持，而不能不由國家給養。這樣

看來，一國大部分居民如是技術工人及製造業者，則大部分服兵役的人就不能不由他們中間徵集，因而，他們在服兵役期間，也就不能不由國家的費用維持。

加之，戰爭的技術已漸漸發達成爲一種錯綜複雜的科學。戰爭的行爲，已不是初期社會那種簡單隨便的小格鬥小爭奪；而戰爭的時間更沒有一定，往往連續爭戰幾次，每次說不定要繼續大半年。這時，從事徵役的人民，至少在戰鬥繼續期間，是有仰賴國家維持的必要的。一個人平時不論所執何業，如果要他長期服兵役，長期自費支持，那就未免是一個過重的負擔。所以，第二次波斯戰爭以後，雅典的軍隊似乎大體上就已採用了傭兵制度，一部分由本國人民編成，也有一部分由外國人編成，但全是以國家費用支給薪餉。羅馬自維伊之圍以來，其軍隊在留在前方的期間亦受有相當報酬。以後在各封建政府統治下，大領主及其扈從服兵役的義務，在一定時間後，普遍是以付若干貨幣作抵，這貨幣就是用以維持那班頂替他們服役的人。

在文明社會裏，服兵役人數與人民總數的比例，必然要比未開化社會中小得多。文明社會維持兵士的費用，統由那些非兵士的勞動者負擔。這些勞動者，不但要維持兵士，而且要按照各自的身分，維持他們自身乃至他們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兵士的數目就不能超過這些勞動者除了維持他們自身及國家官吏外所能維持的限度。在古代希臘小農業國家中，全體人民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自認爲兵士，時時從役戰場。但在近代文明各國，一般推算，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百分之一，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

戰場上軍隊概由君主或國家供養以後好久，爲作戰而練兵的費用，才成爲國家的一項大的開支，在此以前，似乎不見得怎樣繁重。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的軍事訓練，是國家加在各個自由市民身上的教育的必要部分。各都市似乎都備有一公共廣場，就在這廣場裏面，各教師在國家官員監督下，對青年施以種種軍事教練。這種簡單設施的費用，似乎構成希臘各共和國爲訓練市民作戰所付的費用的全部。古代羅馬也有所謂運動場教練，那與古希臘的競技場教練，具有同一目的。後來封建各政府，也曾爲這目的，頒發許多命令，規定各區市民，必須演習箭術及受其他軍事訓練，但似乎結果不那麼圓滿。由於所委任執行這些命令的官吏缺乏責任心及其他原因，這種命令，似乎

往往成爲一紙具文。在那些政府的更迭消長中，軍事訓練在人民大眾中似乎逐漸廢而不行。

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存在的整個時期，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後相當長的期間，兵士的職業不是一種獨立的、可判然區劃的職業，不構成某市民階級的唯一的主要工作。一切人民，不論其平日依靠何種職業或業務謀生，在普通的場合，他總覺得他也同樣適合於做一個軍人，而在非常的場合，又覺得有充當軍人的義務。

然而在一切技術中，戰爭的技術確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進步的結果，這種技術也就必然成爲一切技術中最複雜的了。戰爭技術在某特定時期能夠發展到怎樣完善的程度，固然是由機械技術，及其他必然與戰爭技術相關聯的若干技術狀態決定的，但是，要使其發展至十分完善程度，那還有成爲特種市民的主要或唯一職業的必要；並且，和其他技術改良一樣，這種技術的改良，也有分工的必要。不過，他種技術的分工，是個人精明的必然結果，因爲他發覺要增進自己的利益，與其從事幾種職業，不如專精一種特定職業。至於兵士職業與其他職業分開，使成爲一種獨立的專門職業，卻非出於個人的打算、而是出於國家的智慧。在太平無事時，一個不待國家特別獎勵而把自己大部分時間花在軍事訓練上的市民，無疑的，他會在軍事知識上取得很大的進步，此外還可得到很大的樂趣，但對於自身的利益，那卻沒有一點增進。只有國家的智慧，才能使他爲自己的利益，花費大部分時間來從事這種特殊工作。不過有許多國家，即在非有這種智慧即難於繼續存立的時候，往往仍然沒有這種智慧。

遊牧民多餘暇，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民，也有一些空閒時間，至於手藝工人或製造業者，則全無閒暇。關於武藝的訓練，第一種人就是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都幹自己無損。第二種人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也不會蒙受大損失。第三者的情況卻大不同。他費去一小時，即有一小時的損失。爲他自身的利益計，他自然而然地會完全漠視這教練。並且，技術進步，製造業進步，必然會引起農耕上的種種改良，使得農民和城市的工人一樣，沒有閒暇。於是，農民自然而然地也和市民一樣忽視軍事訓練，大多數人都養成了不好戰的習性。然而在另一方面，由農業改良而產生的財富，或者說，由這些改良蓄積下來的財物，卻又不免誘起鄰國的覬覦和侵略。事實上，勤勉

而因此富裕的國家，往往是最會引起四鄰攻擊的國家。所以，國家對於國防如不採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習性是會使他們全然失去自衛能力的。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於國防軍備的設施，似只能採取兩種方策。

第一，它可不管國民的利益怎樣，資質怎樣，傾向怎樣，用一種極嚴厲的法令，施以強迫軍事訓練；凡在兵役年齡內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數，不管他們從事何種職業，非在一定限度上與兵士的職業結合起來不可。

第二，它可維持並僱用一部分公民，不斷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爲一個獨立的特殊職業。

假使國家採取前一方策，那麼，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民兵；如採取後一方策，那麼，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常備軍。進行軍事訓練是常務軍的唯一主要職業。國家給與他們的生活費或餉金，即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至於民兵軍事訓練，則只是臨時的工作，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得由其他職業贏得。在民兵，普通工人、工匠、商人的性質多於兵士的性質；在常備軍，剛軍人的性質多於一切其他職業的性質。這兩種區別，似乎就是這兩種軍人本質上的區別。

單就民兵說，亦分有若干種類。有的國家對於捍衛國防的公民，只施以軍事訓練，卻不曾編爲隊伍，換言之，沒有編爲各個獨立的部隊，沒在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官長下從事操練。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各公民留在家鄉的時候，多半是單獨地、分開地，或和所喜歡的伴侶一同操演，不到實際作戰時期，不屬於任何特定部隊。在其他國家則又不同。它們的民兵，不但要操演，而且編爲隊伍。在英國，在瑞典，乃至在近代歐洲設有這種不完全兵備的一切國家，每個民兵都有其從屬的特定部隊，都有其正式和固定的官長。在戰時固不待言，在平時亦是如此。

火器未發明以前，一個軍隊的優越程度，是要看其中各個兵士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程度而定。體力和動作的敏捷最爲重要，通常以此決定戰鬥的命運。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與今日的劍術同，不是夾在大衆之中能夠學成的。要獲得那種武藝，只有各人進特定的學

校，從特定的教師，單獨學習或和與自己本領相同的特別朋友一起學習。火器發明以來，體力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別技巧和熟練，雖然不是全無用處，但比較以前，不重要得多了。新式火器的性質，雖然不會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練者立於同一水準，但比較以前，卻使他們更接近於同一水準。同時，人們一般認為，使用這新式火器所必要的一切技巧和熟練，可夾在大部隊中學習獲得。

決定近代軍隊戰鬥命運的，與其說是兵上使用武器的技巧和熟練，倒不如說是紀律、秩序和迅速服從命令。近代的火器是有聲響的，是有煙氣的，是會使人一聽到炮聲，而且往往早在距戰鬥開始還很久之前，就感到隨時會遭遇目不能見的死神的。所以，往往戰鬥一經開始，這紀律、秩序和服從性就難於保持。古代的戰鬥情況，遲不相同。除人的叫吼聲外，沒有聲響，沒有煙氣，也沒有看不見的負傷和致死的原因。在致死的武器實際接近以前，在他附近有沒有這種武器，各人都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支軍隊只要對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有相當把握，則維持紀律和秩序，就不但在戰鬥開始時，即在戰鬥全過程中，或者直到兩軍勝負判然時為止，都必定比在使用火器場合容易得多。不過，紀律、秩序和迅速服從命令，那是要在大隊一起操練的軍隊才能獲得的。

可是，民兵不論用什麼方法教練或訓練，訓練好了的民兵，總遠不及紀律良好訓練得宜的常備軍。

在使用武器的熟練上，一週或一月訓練一回的兵士，決不及每日或隔日訓練一回的兵士。軍隊使用武器的熟練，雖可以說在近代沒有往昔孤樣重要，但舉世公認的普魯士軍隊的優越，據說就是得力於他們更善於使用武器。這證明，即在今日，這種熟練，亦還是極其重要的。

一種兵士，僅僅每週或每月聽長官指揮一次，其餘一切時間，都可自由處理自己的事務，在任何方面不必對長官負責。另一種兵士，其全部生活及行動，每日都在長官指揮之下，甚至每日起牀上牀，至少到營舍睡覺，都要依長官的命令。就這兩種兵士比較起來，對於長官的敬畏程度，對於服從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決不如後者的。所以，就所謂手法訓練說，換言之，就操縱和使用武器說，民兵往往不及常備軍。就紀律說，換言之，就迅速服從命令的習慣說，民兵更遠

遠不及常備軍。可是，在近代戰爭中，立即服從命令的習慣，比操縱武器的本事，重要得多。

跟隨平時所慣於服從的酋長作戰的民兵，象韃靼及阿拉伯的民兵那樣，是最好的民兵，他們尊敬長官和立即服從命令的習慣，最與常備軍接近。蘇格蘭高地的民兵，當其在自己酋長指揮下活動時，也具有這種優點。不過，他們不是到處流浪的牧人，而是有固定住所的收人，他們在平時沒有追隨酋長由一個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的習慣。所以，和韃靼人阿拉伯人比較，他們到戰時是不大願意同酋長馳赴遠方的，也是不大願意長久留在戰爭場所的。他們一獲得戰利品，馬上就渴望回家，酋長的權威，不一定能夠制止他們。這就是說，講到服從，他們是遠不及韃靼人、阿拉伯人的。此外，此等高地居民，一向過慣了固定的生活，在野外的時候少，所以他們不象韃靼人、阿拉伯人那樣慣於軍事訓練，不如韃靼人、阿拉伯人那樣善於使用武器。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無論何種民兵，只要作過幾回戰，就可以成爲一個十足的常備軍。因爲他們每日操練武器，不斷在長官的指揮之下，所以不久就獲得了常備軍那樣迅速服從命令的習慣。未赴戰場以前，他們是做什麼的，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作過幾次戰，他們就必然會獲得常備軍的一切優點。所以美洲的戰爭，如果再延長一點，美洲的民兵，無論就那一點說，都可以和那支在前次戰爭中所顯示的武勇並不稍差於法國和西班牙最頑強老兵的常備軍相抗衡。

知道了這個區別，我們就可依歷史的事實，來證明有紀律的常備軍對於民兵，有無比的優越性。

有史可稽的最初出現的常備軍之一，就是馬其頓王腓力普率領的軍隊。他常與色雷斯人戰，與伊里奧人戰，與色薩利亞人戰，乃至與馬其頓鄰近的希臘各都市戰。歷次戰爭的結果，他漸漸把他最初也許是民兵的軍隊，化成了一個受有嚴格訓練的常備軍。就在和平時候——這種時候很少也不很長——他也是小心地把軍隊保留下來，不予解散。後來，經過長久激烈戰爭之後，希臘各主要共和國的勇敢而精練的民兵，被他打敗了，征服了。接着，稍一接觸，大波斯帝國羸弱而缺乏訓練的民兵，也被他征服了。希臘各共和國和波斯帝國的沒落，就是常備軍對於民兵持有無比的優越性的結果。這可以說是歷史中有相當明確詳細記錄的第一次人類事務的大革命。

迦太基的沒落，和代之而起的羅馬的興隆，那是人類歷史中的第二次大革命。這兩個有名共和國的一切消長變動，都可由同一原因說明。

從第一次迦太基戰爭終了，至第二次迦太基戰爭開始，迦太基的軍隊，不斷從事戰爭，相繼由三個大將即哈密爾卡爾、其婿哈斯德拉巴及其子漢尼巴率領。他們最初懲創了自己國內叛變的奴隸，接着鎮定了非洲叛亂的各民族，最後又征服了西班牙大王國。到了漢尼巴率領軍隊，由西班牙向意大利進攻時，他的軍隊必然由這歷次戰爭受到了常備軍的嚴格訓練。當時羅馬人雖不是完全過着和平生活，但他們那時沒有經歷象樣的戰爭，他們的軍事訓練，自然不免大大弛緩。所以羅馬軍隊在特雷比阿、在斯雷米阿以及在肯尼地方，與漢尼巴的軍隊會戰，那是以一種民兵對抗常備軍。這一情況，也許比任何其他情況更有力地決定這幾次戰爭的命運。

漢尼巴留在西班牙的常備軍，對於羅馬派去抵禦它的民兵，也具有同樣的優越性，所以這常備軍在他的弟弟小哈斯德拉巴指揮下，不到幾年，就把羅馬的民兵，通通逐出西班牙了。

漢尼巴沒有從本國得到充分的供給。同時，久役戰場的羅馬民兵，又漸漸在戰爭過程中，成了訓練有素操練純熟的常備軍。在對比上，漢尼巴所固有的優越日益低降。小哈斯德拉巴後來認為有必要領他在西班牙所統率的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常備軍，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兄長。在進軍中，據說被嚮導者指錯了路。他躑躅在生疏的國土裏面，猝不及防地受到另一支同樣精練或更精練的常備軍的襲擊，結果全軍覆沒。

當哈斯德拉巴由西班牙退去後，羅馬大將西皮阿所遭遇的抵抗，不過是一些劣於自己軍隊的民兵。他一氣把那些民兵打敗了、克服了，而他自己的民兵，在戰爭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訓練有素操練純熟的常備軍。後來，這種軍隊，派往非洲，非洲抵抗它的，不過是一些民兵。這時，為防禦迦太基計，漢尼巴的常備軍，有被召回的必要。那些屢戰屢敗的垂頭喪氣的非洲民兵，也加入該常備軍。在查馬會戰中，這些民兵構成漢尼巴的軍隊的大部分。而這相互敵對的兩大共和國的命運，就由那一次戰鬥的結局決定了。

從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告終，直到羅馬共和國沒落，羅馬的軍隊可以說是十足的常備軍。當時馬其頓的常備軍，對它抵抗。在戰爭聲威達於頂點的時候，羅馬軍隊尚須經過兩次大戰爭及三次大會戰，才能征服這小小王國。假使馬其頓的最後國王不肯示弱，恐怕征服這小國還更要困難呢。上古世界一切文明國家的民兵，如希臘的民兵，敘利亞的民兵，埃及的民兵，對於羅馬的常備軍，都只作微弱的抵抗。其他野蠻國家的民兵，則抵抗比較激烈。米斯里德斯由黑海、裏海以北各國率領來的塞西亞或韃靼民兵，是羅馬在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後碰到的最可怕的勁敵。帕斯阿及日耳曼的民兵，亦很可欽佩。他們曾有幾次把羅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就大體說，羅馬軍隊如果好好指揮，這般民兵究竟不是它的敵手。羅馬人對征服帕斯阿、日耳曼不肯徹底做下去的，那恐怕是因為他們認為帝國已經夠大了，無須乎再加上兩個野蠻國家。古代帕斯阿人，似乎為塞西亞或韃靼系屬的民族，始終保持着很多的祖先風習。和塞西亞人或韃靼人一樣，古代日耳曼人也是一種流浪的游牧民族。他們平時由酋長率領着在各地遷流；戰時依舊由同一酋長率領着進行爭鬥。他們的民兵，正與塞西亞或韃靼的民兵同其種類。說不定，他們還是前兩者的後裔。

羅馬軍隊紀律鬆弛的原因，不一而足。而紀律過於嚴峻，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在他們非常強盛時，既已打得天下無敵，那堅重的盔甲，就當作不必要的重荷而拋開了，那煩難的教練，就視為不必要的勞作而疏忽了。加之，羅馬各皇帝治下的那些常備軍，特別是成守邊疆防備日耳曼人及班諾尼亞人的常備軍，他們簡直是各皇帝的危害勢力；它們屢屢反對皇帝，擁立自己的將軍。為要減弱這些常備軍的危害程度，據某些作家說，是德奧克里希恩大帝，又據其他作家說，是康士但丁大帝，首先把總是由兩三軍團合成的大部隊的屯駐邊境的常備軍，召回內地，然後再化分為小部隊，散駐各省的都市，非有用武逐敵必要，即不許其移動。軍隊常川駐在商業及製造業都市，兵士們自身就漸漸變成了商人、技工或製造業者。市民的性質，於是漸漸超過軍士的性質而佔優勢。這一來，羅馬的常備軍，就逐漸頹廢了，成為腐敗、疏忽、無訓練的民兵，後來日耳曼和塞西亞民兵入侵，西羅馬帝國就抵擋不住了。那時，各皇帝沒有辦法，就開始僱傭那些國家中的某些國家的民兵，抵抗另一些國家的民兵，這樣纔多維持了一些時候。西羅馬帝國的沒落，是古代史中比較保有明確詳細記錄的人類

事務上的第三次大革命。這革命的原因，就是野蠻國民兵對於文明國民兵的無比的優越，也就是遊牧者國家的民兵對於由農夫、技工及製造業者組成的國家的民兵的無比的優越。這裏，民兵所戰敗的，大都不是常備軍，只是在訓練與紀律方面不及他們的民兵。希臘民兵戰敗波斯民兵是如此，後來瑞士民兵戰敗奧地利和勃艮第民兵亦是如此。

西羅馬帝國沒落了，在它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是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移遷新土後，他們的兵力依然在若干時期內保持原來的性質，它是由牧人及農夫組成的民兵，在戰時即由平時所慣於服從的酋長帶往戰場作戰。所以，他們是經過了相當訓練，具有相當紀律的。但是，隨着技術及產業的進步，酋長的權威逐漸衰微了，大多數人民能勻出來受訓練的時間也比較減少了。封建式的民兵訓練逐漸荒廢，紀律亦日趨鬆弛。為糾正這缺陷，就逐漸着手建立起了常備軍。並且，編制常備軍的方策，一經為某文明國所採用，其他文明國就有立即仿行的必要。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民兵，非這樣編成的常備軍的敵手，要想國防安固，只有採用這種方策。

常備軍的士兵，縱使從未上過陣，從未經過炮火，也往往顯得有老兵那樣的勇氣，而且，一開始上陣作戰就配得上和最頑強最有經驗的老兵見個高低。1756年，俄羅斯軍隊攻打波蘭，俄羅斯軍隊所表現的武勇，簡直可以與歐洲當時最頑強最老練的普魯士兵士相頡頏。然而俄羅斯帝國前此二十年是國泰民安的；它那時軍隊中曾上過陣的兵士，決不很多。1739年，西班牙戰爭爆發，當時英國享受了二十八年的太平。可是，它的常備兵士並不為這長期和平所腐化，在攻打喀他基那時，他們所表現的武勇尤為特出。這一戰役，是他們在這次不幸戰爭中第一次的不幸冒舉。和平日子過久了，將官們說不定有時會忘卻他們的技能，但管理得法的常備軍，如果不忘訓練，似乎決不會忘卻其武勇的。

一個文明國的國防，如果仰仗民兵守衛，它將隨時有被鄰近野蠻民族征服的危險。亞洲各文明國往往被韃靼人征服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野蠻國民兵對於文明國民兵的自然優越性。有紀律有訓練的常備軍，較任何民兵為優。只有富裕的文明國家，才能好好維持這種軍隊；亦只有這種軍隊，才能保衛這種國家不受貧困野蠻鄰國的侵掠。

所以，一國要永久保存其文明，甚或要相當長久保存其文明，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編制常備軍。

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文明國才能抵禦外侮；同樣，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野蠻國才能突然地而且相當地文明化。常備軍憑其威力，可以把君主的法令，推行到一個帝國的最僻遠地方，可以在沒有常備軍威力的情況下即無政治可言的國家，維持相當程度的正規統治。凡小心考察過俄羅斯彼得大帝變法圖強的各種設施的人，他一定會發覺那各種設施的樞紐，就是正規常備軍的建設。這常備軍，是大帝執行和維持其他一切規章的工具。俄羅斯帝國此後得以享有相當的秩序與和平，不能不說是這種常備軍之賜。

有共和主義思想的人，往往耽心常備軍會危及自由。當擁兵大員的利益與國家憲法的維持不一定有何等關聯時，這危險性的確存在。例如，凱撒的常備軍破壞了羅馬共和國；克倫威爾的常備軍解散了英國成立已久的議會。不過，一國的軍權，如握在君主手裏，各軍隊的主要將官，如是這國的貴介與華族，換言之，全國兵力，如果都是由那些由於自己享有民政權力的最大部分，所以本身的最大利益在於支持民政權力的這種人指揮，則常備軍對於自由決無危險。反之，在某種場合，它說不定還有利於自由。君主有了常備軍護持，他就自以為安全了，無須乎要象近代一些共和國所行的那樣，監視各市民的細微行動，時時疑忌市民擾亂和平。如果一國行政長官，儘管國內的主要人民願意予以支持，但羣衆的每一不滿，都會使其安全感到威脅；或如果那怕是一個小小的紛擾，也有可能不到幾小時就掀起大的革命，那麼為防微杜漸起見，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權力，來鎮壓一切對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滿。反之，一國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貴族，且有精練的常備軍，那麼，就是最粗暴、最無稽、最放肆的抗議，也不至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寬恕這抗議，或竟置之不問。並且，他既意識到了他自己地位的穩固，他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這樣做。所以，接近於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練的常備軍保障的國家，纔可見到；亦只有在這種國家，才無須為公共安全而付與君主以壓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絕對權力。

總之，君主的第一義務，就是策本國社會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橫暴與侵侮。這種義務的實行，勢必隨社會文明的進步，

而逐漸需要越來越大的費用。原來在平時在戰時都無須君主支出何等費用的社會的兵力，隨着社會進步的過程，初則在戰時要君主出錢維持，後則在平時亦非君主出錢維持不可。

火器發明後，戰爭技術起了大變化。於是，平時訓練一定兵額，戰時使用一定兵額，所需的費用，都進一步增加。軍隊所使用的武器與彈藥，都比以前更貴。與矛及弓箭比較，短槍是更貴的武器，與弩炮或石炮比較，大炮或臼炮也是更貴的武器。近代閱兵所消費的火藥，放射出去，就不復返，這更非鉅額的費用不可。至於往時，閱兵所投的矛，所放的箭，均很容易收回，並且其價值極微。與弩炮石炮比較，大炮臼炮不僅為高價的機械，且為非常笨重的機械。這笨重機械，製造起來，要較大的費用，製成後運往戰場，也要較大的費用。此外，近代大炮的作戰效力，非往昔石弩可比，所以要給一個都市設防來抵禦這大炮的攻擊，那怕只是幾個星期也困難得多，因而，其所需費用也浩大得多。近代，有種種原因使國防費用日益增大。在這方面，事物自然推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又被戰爭技術上的大革命促進不少，而引起這個大革命的，似乎不過是一個偶發事件，即火藥的發明。

近代戰爭火藥費用的浩大，顯然給能夠負擔此浩大費用的國家提供了一種利益，而使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立於優勝的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國家很難防禦貧窮野蠻國家的侵略；在近代，貧窮野蠻國家卻很難防禦富裕文明國家的宰割。火器的發明，乍看起來，似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害。但實際上，乃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利。

第一節論國防費

君主的義務，首在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而此種義務的完成，又只有藉助於兵力。但平時準備兵力和戰時使用兵力的費用，則因社會狀態不同以及進化時期不同，而大不相同。

就最低級最粗野的狩獵民族說，人人都是狩獵者，人人亦都是戰士。現今北美土人，就是如此。當他為保護社會，或為社會復仇而去戰場打仗時，他也是以自己的勞動維持自己，象在家中時一樣。在這種狀態下，當然既沒有君主，也沒有國家。他的社會，無須為他上戰場，或無須為他在作戰期間的生活負擔何種費用。

就比較進步的游牧民族的社會狀態，如韃靼人和阿拉伯人的社會狀態說，情況也大抵相同。在那種社會中，各個人是遊牧者，同時也是戰士。他們通常在蓬幕中，或在一種容易移動的有篷馬車中生活，沒有一定住所。整個部落或整個民族，每年因季節不同，或因其他偶發事故，時時遷移。當他們的畜羣，把一個地方的牧草吃盡了，他們便移住另一地方，又從那地方移往第三地方。他們在乾燥季節，遷往河岸；在陰溼季節，又退回高地。當他們奔赴戰場時，並不把牲畜交給老人婦女兒童看護，也不把老人婦女兒童拋在後邊，而不予以保護和供養。他們全民族在平時就過慣了流浪的生活，所以一當戰爭，人人都很容易變為戰士。不管作為軍隊進軍時，或作為游牧民遊牧時，他們的生活方式，總大抵一樣，雖然目的有不同。戰爭起來，他們一同作戰，所以每個人都盡其所能來動作。韃靼婦女參加戰爭，那是我們時常聽到的。他們如果戰勝了，敵方全種族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們的勝利報酬；如果戰敗了，就一切都完蛋，自己的牲畜乃至婦女兒童，全都成了戰勝者的戰利品。連大部分沒有戰死的戰士，也不得不為得到當前的生活資料而服從征服者。其餘的一部分人，通常被逐四散，四處逃亡。

韃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操習，在可為其參加戰鬥作準備。他們普通的戶外遊戲，如競走、角力、耍棒、投槍、拉弓等等，儼然就在從事戰爭。他們在實際作戰時，也如平日一樣，由自己所領帶的牲畜維持生活。這些種族，是有酋長或君主的，但酋長或君

主不曾爲了訓練他們作戰，負擔什麼費用。在作戰的時候，掠奪的機會，就是他們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報酬。

狩獵者的隊伍，通常不過二、三百人。因爲狩獵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既不確定，許多人如長久住在一塊，必無法維持。遊牧者不同，他們的隊伍，有時會達到二、三十萬人。只要他們的進行不受阻礙，他們能夠由牧草吃盡了的甲地域，遷到牧草完全沒有損耗的乙地域：他們共同一起進軍的人數，就似乎可無限制地增加。因此，狩獵民族對其鄰近的文明國民，沒有什麼可怕；而遊牧民族，就非同小可。所以，最不可怕的，無過於印第安人在美洲進行的戰爭；最可怕的，無過於韃靼人在亞洲屢次進行的侵略。修昔底德說：“無論是歐洲是亞洲，都不能抵抗團結起來的塞西亞人”。他這個斷言，是一切時代的經驗證明了的。塞西亞或韃靼的曠野，廣漠無垠，沒有大自然的屏障。那裏的居民，往往在一個征服者部落或種族的酋長的統治下團結起來。而他們結合的象徵，總是亞洲許多地方遍被蹂躪，變爲荒地。另一個大遊牧民族，即阿拉伯不毛沙漠的居民，除在穆罕默德及其直接後繼者的統治下結合過一次外，從來不曾團結一起。他們那次的結合，與其說是征服的結果，毋寧說是宗教熱情的結果；但他們那次結合的象徵，也同於上述。假若美洲的狩獵民族都成了牧羊者羣，那麼，鄰近他們的歐洲各殖民地居民，就一定不能象現在這樣平平穩穩地生活下去。

在比較更進步的農業社會，即在沒有對外貿易，除了幾乎全在各自家中製造爲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製造業外，沒有其他製造業的農業社會裏，每個人也都是戰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爲戰士。從事農業工作的人，一般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盡日曬雨打風吹。這種困苦的日常生活在，正可鍛鍊他們，使他們能熬受戰爭的苦難。其實，農業上有若干工作，就與戰時的一部分困難工作非常類似。比方說，農民在農場上，非掘鑿溝渠不可，而有了這套本領，他們便可從容地在戰場上構築戰壕與圍牆。農民的平常消遣，也象遊牧人民的遊戲一樣，儼然是從事戰爭。但由於農民不象遊牧者那樣閒暇，所以不象遊牧者那樣經常地從事這些遊戲，他們雖也都是兵，卻不象遊牧者那樣精於戰鬥本領。可是，照他們的樣子，訓練他們使能上陣打仗，很少要使君主或國家破費。

不過，農業是有固定性的。那怕開化最淺、耕作最幼稚的農民，也必須有一個固定住所。這固定住所一旦放棄，勢必蒙受大損失。所以農耕民族的作戰，就不能象狩獵民族游牧民族那樣，全體出動。他們至少要把老人婦女兒童留在後方，照料住所。可是，其他符合兵役年齡的男子則當全赴戰場，小民族往往都是如此。在一切國家，符合兵役年齡的男子，就一般推算，約佔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假使戰爭在播種期後開始，收穫期前終了，農民及其主要勞動者即使全部離開農場，亦不會蒙受大的損失。在這個期間，農場上雖有必須進行的業作，但他們相信，有老人婦女兒童就很可以把這事情作好。所以，短期從事戰役，他們儘可不要報酬；他們成為戰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國家花很大的訓練費用；他們實際作戰，也不需要君主或國家花很大的維持費用。古代希臘各邦市民，在第二次波斯戰爭發生以前，似即依這種方式從事兵役。伯羅奔尼撒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以前，也還是依這種方式從事兵役。據修昔底德觀察：伯羅奔尼撒人大概在夏季離開戰場，回去辦理收穫。羅馬人在各國王統治下乃至共和國初期，亦是採取這種辦法。直到維伊之圍以後，他們纔開始把維持在前方作戰的人的費用加在那些留在家鄉的人身上。以後羅馬帝國沒落了，它的廢墟上，又建立了歐洲各王國。這些王國，在可適當地叫做封建法制定以前及既經制定了以後若干期間，許多大領主，連同他們的直接屬民，往往是以自己的費用服事國王。他們在戰場上，如在家庭中一樣，也是以自己的收入支持自己；他們從未由國王那裏領到何等俸金或報酬。

在更為進步的社會裏，上戰場作戰的人，以自己的費用維持自己就全不可能了。這其中有兩種原因：一是製造業的進步，一是戰爭技術的改良。

就農民從事遠征說，只要那遠征是播種期後開始，收穫期前終了，他們在作業上這樣的中斷，就不致大大影響其收穫。因為，即使他們不加入勞動，大自然可替他們進行一大部分的殘餘工作。可是，徵役對於一般技術工人，那就非同小可了。比如說，鐵匠、木匠、織工吧，他們一離去作業的場所，其唯一收入源泉馬上就要涸竭。他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大自然不給與一點幫助。所以，他們這種人如為國家服兵役，就無法自己維持，而不能不由國家給養。這樣

看來，一國大部分居民如是技術工人及製造業者，則大部分服兵役的人就不能不由他們中間徵集，因而，他們在服兵役期間，也就不能不由國家的費用維持。

加之，戰爭的技術已漸漸發達成爲一種錯綜複雜的科學。戰爭的行爲，已不是初期社會那種簡單隨便的小格鬥小爭奪；而戰爭的時間更沒有一定，往往連續爭戰幾次，每次說不定要繼續大半年。這時，從事徵役的人民，至少在戰鬥繼續期間，是有仰賴國家維持的必要的。一個人平時不論所執何業，如果要他長期服兵役，長期自費支持，那就未免是一個過重的負擔。所以，第二次波斯戰爭以後，雅典的軍隊似乎大體上就已採用了傭兵制度，一部分由本國人民編成，也有一部分由外國人編成，但全是以國家費用支給薪餉。羅馬自維伊之圍以來，其軍隊在留在前方的期間亦受有相當報酬。以後在各封建政府統治下，大領主及其扈從服兵役的義務，在一定時間後，普遍是以付若干貨幣作抵，這貨幣就是用以維持那班頂替他們服役的人。

在文明社會裏，服兵役人數與人民總數的比例，必然要比未開化社會中小得多。文明社會維持兵士的費用，統由那些非兵士的勞動者負擔。這些勞動者，不但要維持兵士，而且要按照各自的身分，維持他們自身乃至他們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兵士的數目就不能超過這些勞動者除了維持他們自身及國家官吏外所能維持的限度。在古代希臘小農業國家中，全體人民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自認爲兵士，時時從役戰場。但在近代文明各國，一般推算，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百分之一，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

戰場上軍隊概由君主或國家供養以後好久，爲作戰而練兵的費用，才成爲國家的一項大的開支，在此以前，似乎不見得怎樣繁重。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的軍事訓練，是國家加在各個自由市民身上的教育的必要部分。各都市似乎都備有一公共廣場，就在這廣場裏面，各教師在國家官員監督下，對青年施以種種軍事教練。這種簡單設施的費用，似乎構成希臘各共和國爲訓練市民作戰所付的費用的全部。古代羅馬也有所謂運動場教練，那與古希臘的競技場教練，具有同一目的。後來封建各政府，也曾爲這目的，頒發許多命令，規定各區市民，必須演習箭術及受其他軍事訓練，但似乎結果不那麼圓滿。由於所委任執行這些命令的官吏缺乏責任心及其他原因，這種命令，似乎

往往成爲一紙具文。在那些政府的更迭消長中，軍事訓練在人民大眾中似乎逐漸廢而不行。

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存在的整個時期，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後相當長的期間，兵士的職業不是一種獨立的、可判然區劃的職業，不構成某市民階級的唯一的主要工作。一切人民，不論其平日依靠何種職業或業務謀生，在普通的場合，他總覺得他也同樣適合於做一個軍人，而在非常的場合，又覺得有充當軍人的義務。

然而在一切技術中，戰爭的技術確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進步的結果，這種技術也就必然成爲一切技術中最複雜的了。戰爭技術在某特定時期能夠發展到怎樣完善的程度，固然是由機械技術，及其他必然與戰爭技術相關聯的若干技術狀態決定的，但是，要使其發展至十分完善程度，那還有成爲特種市民的主要或唯一職業的必要；並且，和其他技術改良一樣，這種技術的改良，也有分工的必要。不過，他種技術的分工，是個人精明的必然結果，因爲他發覺要增進自己的利益，與其從事幾種職業，不如專精一種特定職業。至於兵士職業與其他職業分開，使成爲一種獨立的專門職業，卻非出於個人的打算、而是出於國家的智慧。在太平無事時，一個不待國家特別獎勵而把自己大部分時間花在軍事訓練上的市民，無疑的，他會在軍事知識上取得很大的進步，此外還可得到很大的樂趣，但對於自身的利益，那卻沒有一點增進。只有國家的智慧，才能使他爲自己的利益，花費大部分時間來從事這種特殊工作。不過有許多國家，即在非有這種智慧即難於繼續存立的時候，往往仍然沒有這種智慧。

遊牧民多餘暇，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民，也有一些空閒時間，至於手藝工人或製造業者，則全無閒暇。關於武藝的訓練，第一種人就是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都幹自己無損。第二種人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也不會蒙受大損失。第三者的情況卻大不同。他費去一小時，即有一小時的損失。爲他自身的利益計，他自然而然地會完全漠視這教練。並且，技術進步，製造業進步，必然會引起農耕上的種種改良，使得農民和城市的工人一樣，沒有閒暇。於是，農民自然而然地也和市民一樣忽視軍事訓練，大多數人都養成了不好戰的習性。然而在另一方面，由農業改良而產生的財富，或者說，由這些改良蓄積下來的財物，卻又不免誘起鄰國的覬覦和侵略。事實上，勤勉

而因此富裕的國家，往往是最會引起四鄰攻擊的國家。所以，國家對於國防如不採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習性是會使他們全然失去自衛能力的。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於國防軍備的設施，似只能採取兩種方策。

第一，它可不管國民的利益怎樣，資質怎樣，傾向怎樣，用一種極嚴厲的法令，施以強迫軍事訓練；凡在兵役年齡內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數，不管他們從事何種職業，非在一定限度上與兵士的職業結合起來不可。

第二，它可維持並僱用一部分公民，不斷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爲一個獨立的特殊職業。

假使國家採取前一方策，那麼，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民兵；如採取後一方策，那麼，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常備軍。進行軍事訓練是常務軍的唯一主要職業。國家給與他們的生活費或餉金，即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至於民兵軍事訓練，則只是臨時的工作，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得由其他職業贏得。在民兵，普通工人、工匠、商人的性質多於兵士的性質；在常備軍，剛軍人的性質多於一切其他職業的性質。這兩種區別，似乎就是這兩種軍人本質上的區別。

單就民兵說，亦分有若干種類。有的國家對於捍衛國防的公民，只施以軍事訓練，卻不曾編爲隊伍，換言之，沒有編爲各個獨立的部隊，沒在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官長下從事操練。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各公民留在家鄉的時候，多半是單獨地、分開地，或和所喜歡的伴侶一同操演，不到實際作戰時期，不屬於任何特定部隊。在其他國家則又不同。它們的民兵，不但要操演，而且編爲隊伍。在英國，在瑞典，乃至在近代歐洲設有這種不完全兵備的一切國家，每個民兵都有其所從屬的特定部隊，都有其正式和固定的官長。在戰時固不待言，在平時亦是如此。

火器未發明以前，一個軍隊的優越程度，是要看其中各個兵士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程度而定。體力和動作的敏捷最爲重要，通常以此決定戰鬥的命運。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與今日的劍術同，不是夾在大衆之中能夠學成的。要獲得那種武藝，只有各人進特定的學

校，從特定的教師，單獨學習或和與自己本領相同的特別朋友一起學習。火器發明以來，體力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別技巧和熟練，雖然不是全無用處，但比較以前，不重要得多了。新式火器的性質，雖然不會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練者立於同一水準，但比較以前，卻使他們更接近於同一水準。同時，人們一般認為，使用這新式火器所必要的一切技巧和熟練，可夾在大部隊中學習獲得。

決定近代軍隊戰鬥命運的，與其說是兵上使用武器的技巧和熟練，倒不如說是紀律、秩序和迅速服從命令。近代的火器是有聲響的，是有煙氣的，是會使人一聽到炮聲，而且往往早在距戰鬥開始還很久之前，就感到隨時會遭遇目不能見的死神的。所以，往往戰鬥一經開始，這紀律、秩序和服從性就難於保持。古代的戰鬥情況，遲不相同。除人的叫吼聲外，沒有聲響，沒有煙氣，也沒有看不見的負傷和致死的原因。在致死的武器實際接近以前，在他附近有沒有這種武器，各人都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支軍隊只要對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有相當把握，則維持紀律和秩序，就不但在戰鬥開始時，即在戰鬥全過程中，或者直到兩軍勝負判然時為止，都必定比在使用火器場合容易得多。不過，紀律、秩序和迅速服從命令，那是要在大隊一起操練的軍隊才能獲得的。

可是，民兵不論用什麼方法教練或訓練，訓練好了的民兵，總遠不及紀律良好訓練得宜的常備軍。

在使用武器的熟練上，一週或一月訓練一回的兵士，決不及每日或隔日訓練一回的兵士。軍隊使用武器的熟練，雖可以說在近代沒有往昔孤樣重要，但舉世公認的普魯士軍隊的優越，據說就是得力於他們更善於使用武器。這證明，即在今日，這種熟練，亦還是極其重要的。

一種兵士，僅僅每週或每月聽長官指揮一次，其餘一切時間，都可自由處理自己的事務，在任何方面不必對長官負責。另一種兵士，其全部生活及行動，每日都在長官指揮之下，甚至每日起牀上牀，至少到營舍睡覺，都要依長官的命令。就這兩種兵士比較起來，對於長官的敬畏程度，對於服從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決不如後者的。所以，就所謂手法訓練說，換言之，就操縱和使用武器說，民兵往往不及常備軍。就紀律說，換言之，就迅速服從命令的習慣說，民兵更遠

遠不及常備軍。可是，在近代戰爭中，立即服從命令的習慣，比操縱武器的本事，重要得多。

跟隨平時所慣於服從的酋長作戰的民兵，象韃靼及阿拉伯的民兵那樣，是最好的民兵，他們尊敬長官和立即服從命令的習慣，最與常備軍接近。蘇格蘭高地的民兵，當其在自己酋長指揮下活動時，也具有這種優點。不過，他們不是到處流浪的牧人，而是有固定住所的收人，他們在平時沒有追隨酋長由一個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的習慣。所以，和韃靼人阿拉伯人比較，他們到戰時是不大願意同酋長馳赴遠方的，也是不大願意長久留在戰爭場所的。他們一獲得戰利品，馬上就渴望回家，酋長的權威，不一定能夠制止他們。這就是說，講到服從，他們是遠不及韃靼人、阿拉伯人的。此外，此等高地居民，一向過慣了固定的生活，在野外的時候少，所以他們不象韃靼人、阿拉伯人那樣慣於軍事訓練，不如韃靼人、阿拉伯人那樣善於使用武器。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無論何種民兵，只要作過幾回戰，就可以成爲一個十足的常備軍。因爲他們每日操練武器，不斷在長官的指揮之下，所以不久就獲得了常備軍那樣迅速服從命令的習慣。未赴戰場以前，他們是做什麼的，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作過幾次戰，他們就必然會獲得常備軍的一切優點。所以美洲的戰爭，如果再延長一點，美洲的民兵，無論就那一點說，都可以和那支在前次戰爭中所顯示的武勇並不稍差於法國和西班牙最頑強老兵的常備軍相抗衡。

知道了這個區別，我們就可依歷史的事實，來證明有紀律的常備軍對於民兵，有無比的優越性。

有史可稽的最初出現的常備軍之一，就是馬其頓王腓力普率領的軍隊。他常與色雷斯人戰，與伊里奧人戰，與色薩利亞人戰，乃至與馬其頓鄰近的希臘各都市戰。歷次戰爭的結果，他漸漸把他最初也許是民兵的軍隊，化成了一個受有嚴格訓練的常備軍。就在和平時候——這種時候很少也不很長——他也是小心地把軍隊保留下來，不予解散。後來，經過長久激烈戰爭之後，希臘各主要共和國的勇敢而精練的民兵，被他打敗了，征服了。接着，稍一接觸，大波斯帝國羸弱而缺乏訓練的民兵，也被他征服了。希臘各共和國和波斯帝國的沒落，就是常備軍對於民兵持有無比的優越性的結果。這可以說是歷史中有相當明確詳細記錄的第一次人類事務的大革命。

迦太基的沒落，和代之而起的羅馬的興隆，那是人類歷史中的第二次大革命。這兩個有名共和國的一切消長變動，都可由同一原因說明。

從第一次迦太基戰爭終了，至第二次迦太基戰爭開始，迦太基的軍隊，不斷從事戰爭，相繼由三個大將即哈密爾卡爾、其婿哈斯德拉巴及其子漢尼巴率領。他們最初懲創了自己國內叛變的奴隸，接着鎮定了非洲叛亂的各民族，最後又征服了西班牙大王國。到了漢尼巴率領軍隊，由西班牙向意大利進攻時，他的軍隊必然由這歷次戰爭受到了常備軍的嚴格訓練。當時羅馬人雖不是完全過着和平生活，但他們那時沒有經歷象樣的戰爭，他們的軍事訓練，自然不免大大弛緩。所以羅馬軍隊在特雷比阿、在斯雷米阿以及在肯尼地方，與漢尼巴的軍隊會戰，那是以一種民兵對抗常備軍。這一情況，也許比任何其他情況更有力地決定這幾次戰爭的命運。

漢尼巴留在西班牙的常備軍，對於羅馬派去抵禦它的民兵，也具有同樣的優越性，所以這常備軍在他的弟弟小哈斯德拉巴指揮下，不到幾年，就把羅馬的民兵，通通逐出西班牙了。

漢尼巴沒有從本國得到充分的供給。同時，久役戰場的羅馬民兵，又漸漸在戰爭過程中，成了訓練有素操練純熟的常備軍。在對比上，漢尼巴所固有的優越日益低降。小哈斯德拉巴後來認為有必要領他在西班牙所統率的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常備軍，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兄長。在進軍中，據說被嚮導者指錯了路。他躑躅在生疏的國土裏面，猝不及防地受到另一支同樣精練或更精練的常備軍的襲擊，結果全軍覆沒。

當哈斯德拉巴由西班牙退去後，羅馬大將西皮阿所遭遇的抵抗，不過是一些劣於自己軍隊的民兵。他一氣把那些民兵打敗了、克服了，而他自己的民兵，在戰爭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訓練有素操練純熟的常備軍。後來，這種軍隊，派往非洲，非洲抵抗它的，不過是一些民兵。這時，為防禦迦太基計，漢尼巴的常備軍，有被召回的必要。那些屢戰屢敗的垂頭喪氣的非洲民兵，也加入該常備軍。在查馬會戰中，這些民兵構成漢尼巴的軍隊的大部分。而這相互敵對的兩大共和國的命運，就由那一次戰鬥的結局決定了。

從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告終，直到羅馬共和國沒落，羅馬的軍隊可以說是十足的常備軍。當時馬其頓的常備軍，對它抵抗。在戰爭聲威達於頂點的時候，羅馬軍隊尚須經過兩次大戰爭及三次大會戰，才能征服這小小王國。假使馬其頓的最後國王不肯示弱，恐怕征服這小國還更要困難呢。上古世界一切文明國家的民兵，如希臘的民兵，敘利亞的民兵，埃及的民兵，對於羅馬的常備軍，都只作微弱的抵抗。其他野蠻國家的民兵，則抵抗比較激烈。米斯里德斯由黑海、裏海以北各國率領來的塞西亞或韃靼民兵，是羅馬在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後碰到的最可怕的勁敵。帕斯阿及日耳曼的民兵，亦很可欽佩。他們曾有幾次把羅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就大體說，羅馬軍隊如果好好指揮，這般民兵究竟不是它的敵手。羅馬人對征服帕斯阿、日耳曼不肯徹底做下去的，那恐怕是因為他們認為帝國已經夠大了，無須乎再加上兩個野蠻國家。古代帕斯阿人，似乎為塞西亞或韃靼系屬的民族，始終保持着很多的祖先風習。和塞西亞人或韃靼人一樣，古代日耳曼人也是一種流浪的游牧民族。他們平時由酋長率領着在各地遷流；戰時依舊由同一酋長率領着進行爭鬥。他們的民兵，正與塞西亞或韃靼的民兵同其種類。說不定，他們還是前兩者的後裔。

羅馬軍隊紀律鬆弛的原因，不一而足。而紀律過於嚴峻，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在他們非常強盛時，既已打得天下無敵，那堅重的盔甲，就當作不必要的重荷而拋開了，那煩難的教練，就視為不必要的勞作而疏忽了。加之，羅馬各皇帝治下的那些常備軍，特別是成守邊疆防備日耳曼人及班諾尼亞人的常備軍，他們簡直是各皇帝的危害勢力；它們屢屢反對皇帝，擁立自己的將軍。為要減弱這些常備軍的危害程度，據某些作家說，是德奧克里希恩大帝，又據其他作家說，是康士但丁大帝，首先把總是由兩三軍團合成的大部隊的屯駐邊境的常備軍，召回內地，然後再化分為小部隊，散駐各省的都市，非有用武逐敵必要，即不許其移動。軍隊常川駐在商業及製造業都市，兵士們自身就漸漸變成了商人、技工或製造業者。市民的性質，於是漸漸超過軍士的性質而佔優勢。這一來，羅馬的常備軍，就逐漸頹廢了，成為腐敗、疏忽、無訓練的民兵，後來日耳曼和塞西亞民兵入侵，西羅馬帝國就抵擋不住了。那時，各皇帝沒有辦法，就開始僱傭那些國家中的某些國家的民兵，抵抗另一些國家的民兵，這樣纔多維持了一些時候。西羅馬帝國的沒落，是古代史中比較保有明確詳細記錄的人類

事務上的第三次大革命。這革命的原因，就是野蠻國民兵對於文明國民兵的無比的優越，也就是遊牧者國家的民兵對於由農夫、技工及製造業者組成的國家的民兵的無比的優越。這裏，民兵所戰敗的，大都不是常備軍，只是在訓練與紀律方面不及他們的民兵。希臘民兵戰敗波斯民兵是如此，後來瑞士民兵戰敗奧地利和勃艮第民兵亦是如此。

西羅馬帝國沒落了，在它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是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移遷新土後，他們的兵力依然在若干時期內保持原來的性質，它是由牧人及農夫組成的民兵，在戰時即由平時所慣於服從的酋長帶往戰場作戰。所以，他們是經過了相當訓練，具有相當紀律的。但是，隨着技術及產業的進步，酋長的權威逐漸衰微了，大多數人民能勻出來受訓練的時間也比較減少了。封建式的民兵訓練逐漸荒廢，紀律亦日趨鬆弛。為糾正這缺陷，就逐漸着手建立起了常備軍。並且，編制常備軍的方策，一經為某文明國所採用，其他文明國就有立即仿行的必要。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民兵，非這樣編成的常備軍的敵手，要想國防安固，只有採用這種方策。

常備軍的士兵，縱使從未上過陣，從未經過炮火，也往往顯得有老兵那樣的勇氣，而且，一開始上陣作戰就配得上和最頑強最有經驗的老兵見個高低。1756年，俄羅斯軍隊攻打波蘭，俄羅斯軍隊所表現的武勇，簡直可以與歐洲當時最頑強最老練的普魯士兵士相頡頏。然而俄羅斯帝國前此二十年是國泰民安的；它那時軍隊中曾上過陣的兵士，決不很多。1739年，西班牙戰爭爆發，當時英國享受了二十八年的太平。可是，它的常備兵士並不為這長期和平所腐化，在攻打喀他基那時，他們所表現的武勇尤為特出。這一戰役，是他們在這次不幸戰爭中第一次的不幸冒舉。和平日子過久了，將官們說不定有時會忘卻他們的技能，但管理得法的常備軍，如果不忘訓練，似乎決不會忘卻其武勇的。

一個文明國的國防，如果仰仗民兵守衛，它將隨時有被鄰近野蠻民族征服的危險。亞洲各文明國往往被韃靼人征服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野蠻國民兵對於文明國民兵的自然優越性。有紀律有訓練的常備軍，較任何民兵為優。只有富裕的文明國家，才能好好維持這種軍隊；亦只有這種軍隊，才能保衛這種國家不受貧困野蠻鄰國的侵掠。

所以，一國要永久保存其文明，甚或要相當長久保存其文明，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編制常備軍。

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文明國才能抵禦外侮；同樣，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野蠻國才能突然地而且相當地文明化。常備軍憑其威力，可以把君主的法令，推行到一個帝國的最僻遠地方，可以在沒有常備軍威力的情況下即無政治可言的國家，維持相當程度的正規統治。凡小心考察過俄羅斯彼得大帝變法圖強的各種設施的人，他一定會發覺那各種設施的樞紐，就是正規常備軍的建設。這常備軍，是大帝執行和維持其他一切規章的工具。俄羅斯帝國此後得以享有相當的秩序與和平，不能不說是這種常備軍之賜。

有共和主義思想的人，往往耽心常備軍會危及自由。當擁兵大員的利益與國家憲法的維持不一定有何等關聯時，這危險性的確存在。例如，凱撒的常備軍破壞了羅馬共和國；克倫威爾的常備軍解散了英國成立已久的議會。不過，一國的軍權，如握在君主手裏，各軍隊的主要將官，如是這國的貴介與華族，換言之，全國兵力，如果都是由那些由於自己享有民政權力的最大部分，所以本身的最大利益在於支持民政權力的這種人指揮，則常備軍對於自由決無危險。反之，在某種場合，它說不定還有利於自由。君主有了常備軍護持，他就自以為安全了，無須乎要象近代一些共和國所行的那樣，監視各市民的細微行動，時時疑忌市民擾亂和平。如果一國行政長官，儘管國內的主要人民願意予以支持，但羣衆的每一不滿，都會使其安全感到威脅；或如果那怕是一個小小的紛擾，也有可能不到幾小時就掀起大的革命，那麼為防微杜漸起見，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權力，來鎮壓一切對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滿。反之，一國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貴族，且有精練的常備軍，那麼，就是最粗暴、最無稽、最放肆的抗議，也不至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寬恕這抗議，或竟置之不問。並且，他既意識到了他自己地位的穩固，他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這樣做。所以，接近於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練的常備軍保障的國家，纔可見到；亦只有在這種國家，才無須為公共安全而付與君主以壓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絕對權力。

總之，君主的第一義務，就是策本國社會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橫暴與侵侮。這種義務的實行，勢必隨社會文明的進步，

而逐漸需要越來越大的費用。原來在平時在戰時都無須君主支出何等費用的社會的兵力，隨着社會進步的過程，初則在戰時要君主出錢維持，後則在平時亦非君主出錢維持不可。

火器發明後，戰爭技術起了大變化。於是，平時訓練一定兵額，戰時使用一定兵額，所需的費用，都進一步增加。軍隊所使用的武器與彈藥，都比以前更貴。與矛及弓箭比較，短槍是更貴的武器，與弩炮或石炮比較，大炮或臼炮也是更貴的武器。近代閱兵所消費的火藥，放射出去，就不復返，這更非鉅額的費用不可。至於往時，閱兵所投的矛，所放的箭，均很容易收回，並且其價值極微。與弩炮石炮比較，大炮臼炮不僅為高價的機械，且為非常笨重的機械。這笨重機械，製造起來，要較大的費用，製成後運往戰場，也要較大的費用。此外，近代大炮的作戰效力，非往昔石弩可比，所以要給一個都市設防來抵禦這大炮的攻擊，那怕只是幾個星期也困難得多，因而，其所需費用也浩大得多。近代，有種種原因使國防費用日益增大。在這方面，事物自然推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又被戰爭技術上的大革命促進不少，而引起這個大革命的，似乎不過是一個偶發事件，即火藥的發明。

近代戰爭火藥費用的浩大，顯然給能夠負擔此浩大費用的國家提供了一種利益，而使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立於優勝的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國家很難防禦貧窮野蠻國家的侵略；在近代，貧窮野蠻國家卻很難防禦富裕文明國家的宰割。火器的發明，乍看起來，似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害。但實際上，乃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利。

第一節論國防費

君主的義務，首在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而此種義務的完成，又只有藉助於兵力。但平時準備兵力和戰時使用兵力的費用，則因社會狀態不同以及進化時期不同，而大不相同。

就最低級最粗野的狩獵民族說，人人都是狩獵者，人人亦都是戰士。現今北美土人，就是如此。當他為保護社會，或為社會復仇而去戰場打仗時，他也是以自己的勞動維持自己，象在家中時一樣。在這種狀態下，當然既沒有君主，也沒有國家。他的社會，無須為他上戰場，或無須為他在作戰期間的生活負擔何種費用。

就比較進步的游牧民族的社會狀態，如韃靼人和阿拉伯人的社會狀態說，情況也大抵相同。在那種社會中，各個人是遊牧者，同時也是戰士。他們通常在蓬幕中，或在一種容易移動的有篷馬車中生活，沒有一定住所。整個部落或整個民族，每年因季節不同，或因其他偶發事故，時時遷移。當他們的畜羣，把一個地方的牧草吃盡了，他們便移住另一地方，又從那地方移往第三地方。他們在乾燥季節，遷往河岸；在陰溼季節，又退回高地。當他們奔赴戰場時，並不把牲畜交給老人婦女兒童看護，也不把老人婦女兒童拋在後邊，而不予以保護和供養。他們全民族在平時就過慣了流浪的生活，所以一當戰爭，人人都很容易變為戰士。不管作為軍隊進軍時，或作為游牧民遊牧時，他們的生活方式，總大抵一樣，雖然目的有不同。戰爭起來，他們一同作戰，所以每個人都盡其所能來動作。韃靼婦女參加戰爭，那是我們時常聽到的。他們如果戰勝了，敵方全種族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們的勝利報酬；如果戰敗了，就一切都完蛋，自己的牲畜乃至婦女兒童，全都成了戰勝者的戰利品。連大部分沒有戰死的戰士，也不得不為得到當前的生活資料而服從征服者。其餘的一部分人，通常被逐四散，四處逃亡。

韃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操習，在可為其參加戰鬥作準備。他們普通的戶外遊戲，如競走、角力、耍棒、投槍、拉弓等等，儼然就在從事戰爭。他們在實際作戰時，也如平日一樣，由自己所領帶的牲畜維持生活。這些種族，是有酋長或君主的，但酋長或君

主不曾爲了訓練他們作戰，負擔什麼費用。在作戰的時候，掠奪的機會，就是他們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報酬。

狩獵者的隊伍，通常不過二、三百人。因爲狩獵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既不確定，許多人如長久住在一塊，必無法維持。遊牧者不同，他們的隊伍，有時會達到二、三十萬人。只要他們的進行不受阻礙，他們能夠由牧草吃盡了的甲地域，遷到牧草完全沒有損耗的乙地域：他們共同一起進軍的人數，就似乎可無限制地增加。因此，狩獵民族對其鄰近的文明國民，沒有什麼可怕；而遊牧民族，就非同小可。所以，最不可怕的，無過於印第安人在美洲進行的戰爭；最可怕的，無過於韃靼人在亞洲屢次進行的侵略。修昔底德說：“無論是歐洲是亞洲，都不能抵抗團結起來的塞西亞人”。他這個斷言，是一切時代的經驗證明了的。塞西亞或韃靼的曠野，廣漠無垠，沒有大自然的屏障。那裏的居民，往往在一個征服者部落或種族的酋長的統治下團結起來。而他們結合的象徵，總是亞洲許多地方遍被蹂躪，變爲荒地。另一個大遊牧民族，即阿拉伯不毛沙漠的居民，除在穆罕默德及其直接後繼者的統治下結合過一次外，從來不曾團結一起。他們那次的結合，與其說是征服的結果，毋寧說是宗教熱情的結果；但他們那次結合的象徵，也同於上述。假若美洲的狩獵民族都成了牧羊者羣，那麼，鄰近他們的歐洲各殖民地居民，就一定不能象現在這樣平平穩穩地生活下去。

在比較更進步的農業社會，即在沒有對外貿易，除了幾乎全在各自家中製造爲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製造業外，沒有其他製造業的農業社會裏，每個人也都是戰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爲戰士。從事農業工作的人，一般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盡日曬雨打風吹。這種困苦的日常生活在，正可鍛鍊他們，使他們能熬受戰爭的苦難。其實，農業上有若干工作，就與戰時的一部分困難工作非常類似。比方說，農民在農場上，非掘鑿溝渠不可，而有了這套本領，他們便可從容地在戰場上構築戰壕與圍牆。農民的平常消遣，也象遊牧人民的遊戲一樣，儼然是從事戰爭。但由於農民不象遊牧者那樣閒暇，所以不象遊牧者那樣經常地從事這些遊戲，他們雖也都是兵，卻不象遊牧者那樣精於戰鬥本領。可是，照他們的樣子，訓練他們使能上陣打仗，很少要使君主或國家破費。

不過，農業是有固定性的。那怕開化最淺、耕作最幼稚的農民，也必須有一個固定住所。這固定住所一旦放棄，勢必蒙受大損失。所以農耕民族的作戰，就不能象狩獵民族游牧民族那樣，全體出動。他們至少要把老人婦女兒童留在後方，照料住所。可是，其他符合兵役年齡的男子則當全赴戰場，小民族往往都是如此。在一切國家，符合兵役年齡的男子，就一般推算，約佔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假使戰爭在播種期後開始，收穫期前終了，農民及其主要勞動者即使全部離開農場，亦不會蒙受大的損失。在這個期間，農場上雖有必須進行的業作，但他們相信，有老人婦女兒童就很可以把這事情作好。所以，短期從事戰役，他們儘可不要報酬；他們成為戰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國家花很大的訓練費用；他們實際作戰，也不需要君主或國家花很大的維持費用。古代希臘各邦市民，在第二次波斯戰爭發生以前，似即依這種方式從事兵役。伯羅奔尼撒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以前，也還是依這種方式從事兵役。據修昔底德觀察：伯羅奔尼撒人大概在夏季離開戰場，回去辦理收穫。羅馬人在各國王統治下乃至共和國初期，亦是採取這種辦法。直到維伊之圍以後，他們纔開始把維持在前方作戰的人的費用加在那些留在家鄉的人身上。以後羅馬帝國沒落了，它的廢墟上，又建立了歐洲各王國。這些王國，在可適當地叫做封建法制定以前及既經制定了以後若干期間，許多大領主，連同他們的直接屬民，往往是以自己的費用服事國王。他們在戰場上，如在家庭中一樣，也是以自己的收入支持自己；他們從未由國王那裏領到何等俸金或報酬。

在更為進步的社會裏，上戰場作戰的人，以自己的費用維持自己就全不可能了。這其中有兩種原因：一是製造業的進步，一是戰爭技術的改良。

就農民從事遠征說，只要那遠征是播種期後開始，收穫期前終了，他們在作業上這樣的中斷，就不致大大影響其收穫。因為，即使他們不加入勞動，大自然可替他們進行一大部分的殘餘工作。可是，徵役對於一般技術工人，那就非同小可了。比如說，鐵匠、木匠、織工吧，他們一離去作業的場所，其唯一收入源泉馬上就要涸竭。他們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大自然不給與一點幫助。所以，他們這種人如為國家服兵役，就無法自己維持，而不能不由國家給養。這樣

看來，一國大部分居民如是技術工人及製造業者，則大部分服兵役的人就不能不由他們中間徵集，因而，他們在服兵役期間，也就不能不由國家的費用維持。

加之，戰爭的技術已漸漸發達成爲一種錯綜複雜的科學。戰爭的行爲，已不是初期社會那種簡單隨便的小格鬥小爭奪；而戰爭的時間更沒有一定，往往連續爭戰幾次，每次說不定要繼續大半年。這時，從事徵役的人民，至少在戰鬥繼續期間，是有仰賴國家維持的必要的。一個人平時不論所執何業，如果要他長期服兵役，長期自費支持，那就未免是一個過重的負擔。所以，第二次波斯戰爭以後，雅典的軍隊似乎大體上就已採用了傭兵制度，一部分由本國人民編成，也有一部分由外國人編成，但全是以國家費用支給薪餉。羅馬自維伊之圍以來，其軍隊在留在前方的期間亦受有相當報酬。以後在各封建政府統治下，大領主及其扈從服兵役的義務，在一定時間後，普遍是以付若干貨幣作抵，這貨幣就是用以維持那班頂替他們服役的人。

在文明社會裏，服兵役人數與人民總數的比例，必然要比未開化社會中小得多。文明社會維持兵士的費用，統由那些非兵士的勞動者負擔。這些勞動者，不但要維持兵士，而且要按照各自的身分，維持他們自身乃至他們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兵士的數目就不能超過這些勞動者除了維持他們自身及國家官吏外所能維持的限度。在古代希臘小農業國家中，全體人民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自認爲兵士，時時從役戰場。但在近代文明各國，一般推算，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百分之一，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

戰場上軍隊概由君主或國家供養以後好久，爲作戰而練兵的費用，才成爲國家的一項大的開支，在此以前，似乎不見得怎樣繁重。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的軍事訓練，是國家加在各個自由市民身上的教育的必要部分。各都市似乎都備有一公共廣場，就在這廣場裏面，各教師在國家官員監督下，對青年施以種種軍事教練。這種簡單設施的費用，似乎構成希臘各共和國爲訓練市民作戰所付的費用的全部。古代羅馬也有所謂運動場教練，那與古希臘的競技場教練，具有同一目的。後來封建各政府，也曾爲這目的，頒發許多命令，規定各區市民，必須演習箭術及受其他軍事訓練，但似乎結果不那麼圓滿。由於所委任執行這些命令的官吏缺乏責任心及其他原因，這種命令，似乎

往往成爲一紙具文。在那些政府的更迭消長中，軍事訓練在人民大眾中似乎逐漸廢而不行。

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存在的整個時期，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後相當長的期間，兵士的職業不是一種獨立的、可判然區劃的職業，不構成某市民階級的唯一的主要工作。一切人民，不論其平日依靠何種職業或業務謀生，在普通的場合，他總覺得他也同樣適合於做一個軍人，而在非常的場合，又覺得有充當軍人的義務。

然而在一切技術中，戰爭的技術確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進步的結果，這種技術也就必然成爲一切技術中最複雜的了。戰爭技術在某特定時期能夠發展到怎樣完善的程度，固然是由機械技術，及其他必然與戰爭技術相關聯的若干技術狀態決定的，但是，要使其發展至十分完善程度，那還有成爲特種市民的主要或唯一職業的必要；並且，和其他技術改良一樣，這種技術的改良，也有分工的必要。不過，他種技術的分工，是個人精明的必然結果，因爲他發覺要增進自己的利益，與其從事幾種職業，不如專精一種特定職業。至於兵士職業與其他職業分開，使成爲一種獨立的專門職業，卻非出於個人的打算、而是出於國家的智慧。在太平無事時，一個不待國家特別獎勵而把自己大部分時間花在軍事訓練上的市民，無疑的，他會在軍事知識上取得很大的進步，此外還可得到很大的樂趣，但對於自身的利益，那卻沒有一點增進。只有國家的智慧，才能使他爲自己的利益，花費大部分時間來從事這種特殊工作。不過有許多國家，即在非有這種智慧即難於繼續存立的時候，往往仍然沒有這種智慧。

遊牧民多餘暇，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民，也有一些空閒時間，至於手藝工人或製造業者，則全無閒暇。關於武藝的訓練，第一種人就是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都幹自己無損。第二種人把一部分時間花費在它上面，也不會蒙受大損失。第三者的情況卻大不同。他費去一小時，即有一小時的損失。爲他自身的利益計，他自然而然地會完全漠視這教練。並且，技術進步，製造業進步，必然會引起農耕上的種種改良，使得農民和城市的工人一樣，沒有閒暇。於是，農民自然而然地也和市民一樣忽視軍事訓練，大多數人都養成了不好戰的習性。然而在另一方面，由農業改良而產生的財富，或者說，由這些改良蓄積下來的財物，卻又不免誘起鄰國的覬覦和侵略。事實上，勤勉

而因此富裕的國家，往往是最會引起四鄰攻擊的國家。所以，國家對於國防如不採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習性是會使他們全然失去自衛能力的。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於國防軍備的設施，似只能採取兩種方策。

第一，它可不管國民的利益怎樣，資質怎樣，傾向怎樣，用一種極嚴厲的法令，施以強迫軍事訓練；凡在兵役年齡內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數，不管他們從事何種職業，非在一定限度上與兵士的職業結合起來不可。

第二，它可維持並僱用一部分公民，不斷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爲一個獨立的特殊職業。

假使國家採取前一方策，那麼，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民兵；如採取後一方策，那麼，這個國家的兵力，就是所謂常備軍。進行軍事訓練是常務軍的唯一主要職業。國家給與他們的生活費或餉金，即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至於民兵軍事訓練，則只是臨時的工作，他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經常來源，得由其他職業贏得。在民兵，普通工人、工匠、商人的性質多於兵士的性質；在常備軍，剛軍人的性質多於一切其他職業的性質。這兩種區別，似乎就是這兩種軍人本質上的區別。

單就民兵說，亦分有若干種類。有的國家對於捍衛國防的公民，只施以軍事訓練，卻不曾編爲隊伍，換言之，沒有編爲各個獨立的部隊，沒在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官長下從事操練。在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各公民留在家鄉的時候，多半是單獨地、分開地，或和所喜歡的伴侶一同操演，不到實際作戰時期，不屬於任何特定部隊。在其他國家則又不同。它們的民兵，不但要操演，而且編爲隊伍。在英國，在瑞典，乃至在近代歐洲設有這種不完全兵備的一切國家，每個民兵都有其從屬的特定部隊，都有其正式和固定的官長。在戰時固不待言，在平時亦是如此。

火器未發明以前，一個軍隊的優越程度，是要看其中各個兵士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程度而定。體力和動作的敏捷最爲重要，通常以此決定戰鬥的命運。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與今日的劍術同，不是夾在大衆之中能夠學成的。要獲得那種武藝，只有各人進特定的學

校，從特定的教師，單獨學習或和與自己本領相同的特別朋友一起學習。火器發明以來，體力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別技巧和熟練，雖然不是全無用處，但比較以前，不重要得多了。新式火器的性質，雖然不會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練者立於同一水準，但比較以前，卻使他們更接近於同一水準。同時，人們一般認為，使用這新式火器所必要的一切技巧和熟練，可夾在大部隊中學習獲得。

決定近代軍隊戰鬥命運的，與其說是兵上使用武器的技巧和熟練，倒不如說是紀律、秩序和迅速服從命令。近代的火器是有聲響的，是有煙氣的，是會使人一聽到炮聲，而且往往早在距戰鬥開始還很久之前，就感到隨時會遭遇目不能見的死神的。所以，往往戰鬥一經開始，這紀律、秩序和服從性就難於保持。古代的戰鬥情況，遲不相同。除人的叫吼聲外，沒有聲響，沒有煙氣，也沒有看不見的負傷和致死的原因。在致死的武器實際接近以前，在他附近有沒有這種武器，各人都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支軍隊只要對使用武器的熟練和技巧有相當把握，則維持紀律和秩序，就不但在戰鬥開始時，即在戰鬥全過程中，或者直到兩軍勝負判然時為止，都必定比在使用火器場合容易得多。不過，紀律、秩序和迅速服從命令，那是要在大隊一起操練的軍隊才能獲得的。

可是，民兵不論用什麼方法教練或訓練，訓練好了的民兵，總遠不及紀律良好訓練得宜的常備軍。

在使用武器的熟練上，一週或一月訓練一回的兵士，決不及每日或隔日訓練一回的兵士。軍隊使用武器的熟練，雖可以說在近代沒有往昔孤樣重要，但舉世公認的普魯士軍隊的優越，據說就是得力於他們更善於使用武器。這證明，即在今日，這種熟練，亦還是極其重要的。

一種兵士，僅僅每週或每月聽長官指揮一次，其餘一切時間，都可自由處理自己的事務，在任何方面不必對長官負責。另一種兵士，其全部生活及行動，每日都在長官指揮之下，甚至每日起牀上牀，至少到營舍睡覺，都要依長官的命令。就這兩種兵士比較起來，對於長官的敬畏程度，對於服從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決不如後者的。所以，就所謂手法訓練說，換言之，就操縱和使用武器說，民兵往往不及常備軍。就紀律說，換言之，就迅速服從命令的習慣說，民兵更遠

遠不及常備軍。可是，在近代戰爭中，立即服從命令的習慣，比操縱武器的本事，重要得多。

跟隨平時所慣於服從的酋長作戰的民兵，象韃靼及阿拉伯的民兵那樣，是最好的民兵，他們尊敬長官和立即服從命令的習慣，最與常備軍接近。蘇格蘭高地的民兵，當其在自己酋長指揮下活動時，也具有這種優點。不過，他們不是到處流浪的牧人，而是有固定住所的收人，他們在平時沒有追隨酋長由一個地方轉移到其他地方的習慣。所以，和韃靼人阿拉伯人比較，他們到戰時是不大願意同酋長馳赴遠方的，也是不大願意長久留在戰爭場所的。他們一獲得戰利品，馬上就渴望回家，酋長的權威，不一定能夠制止他們。這就是說，講到服從，他們是遠不及韃靼人、阿拉伯人的。此外，此等高地居民，一向過慣了固定的生活，在野外的時候少，所以他們不象韃靼人、阿拉伯人那樣慣於軍事訓練，不如韃靼人、阿拉伯人那樣善於使用武器。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無論何種民兵，只要作過幾回戰，就可以成爲一個十足的常備軍。因爲他們每日操練武器，不斷在長官的指揮之下，所以不久就獲得了常備軍那樣迅速服從命令的習慣。未赴戰場以前，他們是做什麼的，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作過幾次戰，他們就必然會獲得常備軍的一切優點。所以美洲的戰爭，如果再延長一點，美洲的民兵，無論就那一點說，都可以和那支在前次戰爭中所顯示的武勇並不稍差於法國和西班牙最頑強老兵的常備軍相抗衡。

知道了這個區別，我們就可依歷史的事實，來證明有紀律的常備軍對於民兵，有無比的優越性。

有史可稽的最初出現的常備軍之一，就是馬其頓王腓力普率領的軍隊。他常與色雷斯人戰，與伊里奧人戰，與色薩利亞人戰，乃至與馬其頓鄰近的希臘各都市戰。歷次戰爭的結果，他漸漸把他最初也許是民兵的軍隊，化成了一個受有嚴格訓練的常備軍。就在和平時候——這種時候很少也不很長——他也是小心地把軍隊保留下來，不予解散。後來，經過長久激烈戰爭之後，希臘各主要共和國的勇敢而精練的民兵，被他打敗了，征服了。接着，稍一接觸，大波斯帝國羸弱而缺乏訓練的民兵，也被他征服了。希臘各共和國和波斯帝國的沒落，就是常備軍對於民兵持有無比的優越性的結果。這可以說是歷史中有相當明確詳細記錄的第一次人類事務的大革命。

迦太基的沒落，和代之而起的羅馬的興隆，那是人類歷史中的第二次大革命。這兩個有名共和國的一切消長變動，都可由同一原因說明。

從第一次迦太基戰爭終了，至第二次迦太基戰爭開始，迦太基的軍隊，不斷從事戰爭，相繼由三個大將即哈密爾卡爾、其婿哈斯德拉巴及其子漢尼巴率領。他們最初懲創了自己國內叛變的奴隸，接着鎮定了非洲叛亂的各民族，最後又征服了西班牙大王國。到了漢尼巴率領軍隊，由西班牙向意大利進攻時，他的軍隊必然由這歷次戰爭受到了常備軍的嚴格訓練。當時羅馬人雖不是完全過着和平生活，但他們那時沒有經歷象樣的戰爭，他們的軍事訓練，自然不免大大弛緩。所以羅馬軍隊在特雷比阿、在斯雷米阿以及在肯尼地方，與漢尼巴的軍隊會戰，那是以一種民兵對抗常備軍。這一情況，也許比任何其他情況更有力地決定這幾次戰爭的命運。

漢尼巴留在西班牙的常備軍，對於羅馬派去抵禦它的民兵，也具有同樣的優越性，所以這常備軍在他的弟弟小哈斯德拉巴指揮下，不到幾年，就把羅馬的民兵，通通逐出西班牙了。

漢尼巴沒有從本國得到充分的供給。同時，久役戰場的羅馬民兵，又漸漸在戰爭過程中，成了訓練有素操練純熟的常備軍。在對比上，漢尼巴所固有的優越日益低降。小哈斯德拉巴後來認為有必要領他在西班牙所統率的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常備軍，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兄長。在進軍中，據說被嚮導者指錯了路。他躑躅在生疏的國土裏面，猝不及防地受到另一支同樣精練或更精練的常備軍的襲擊，結果全軍覆沒。

當哈斯德拉巴由西班牙退去後，羅馬大將西皮阿所遭遇的抵抗，不過是一些劣於自己軍隊的民兵。他一氣把那些民兵打敗了、克服了，而他自己的民兵，在戰爭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訓練有素操練純熟的常備軍。後來，這種軍隊，派往非洲，非洲抵抗它的，不過是一些民兵。這時，為防禦迦太基計，漢尼巴的常備軍，有被召回的必要。那些屢戰屢敗的垂頭喪氣的非洲民兵，也加入該常備軍。在查馬會戰中，這些民兵構成漢尼巴的軍隊的大部分。而這相互敵對的兩大共和國的命運，就由那一次戰鬥的結局決定了。

從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告終，直到羅馬共和國沒落，羅馬的軍隊可以說是十足的常備軍。當時馬其頓的常備軍，對它抵抗。在戰爭聲威達於頂點的時候，羅馬軍隊尚須經過兩次大戰爭及三次大會戰，才能征服這小小王國。假使馬其頓的最後國王不肯示弱，恐怕征服這小國還更要困難呢。上古世界一切文明國家的民兵，如希臘的民兵，敘利亞的民兵，埃及的民兵，對於羅馬的常備軍，都只作微弱的抵抗。其他野蠻國家的民兵，則抵抗比較激烈。米斯里德斯由黑海、裏海以北各國率領來的塞西亞或韃靼民兵，是羅馬在第二次迦太基戰爭後碰到的最可怕的勁敵。帕斯阿及日耳曼的民兵，亦很可欽佩。他們曾有幾次把羅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就大體說，羅馬軍隊如果好好指揮，這般民兵究竟不是它的敵手。羅馬人對征服帕斯阿、日耳曼不肯徹底做下去的，那恐怕是因為他們認為帝國已經夠大了，無須乎再加上兩個野蠻國家。古代帕斯阿人，似乎為塞西亞或韃靼系屬的民族，始終保持着很多的祖先風習。和塞西亞人或韃靼人一樣，古代日耳曼人也是一種流浪的遊牧民族。他們平時由酋長率領着在各地遷流；戰時依舊由同一酋長率領着進行爭鬥。他們的民兵，正與塞西亞或韃靼的民兵同其種類。說不定，他們還是前兩者的後裔。

羅馬軍隊紀律鬆弛的原因，不一而足。而紀律過於嚴峻，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在他們非常強盛時，既已打得天下無敵，那堅重的盔甲，就當作不必要的重荷而拋開了，那煩難的教練，就視為不必要的勞作而疏忽了。加之，羅馬各皇帝治下的那些常備軍，特別是成守邊疆防備日耳曼人及班諾尼亞人的常備軍，他們簡直是各皇帝的危害勢力；它們屢屢反對皇帝，擁立自己的將軍。為要減弱這些常備軍的危害程度，據某些作家說，是德奧克里希恩大帝，又據其他作家說，是康士但丁大帝，首先把總是由兩三軍團合成的大部隊的屯駐邊境的常備軍，召回內地，然後再化分為小部隊，散駐各省的都市，非有用武逐敵必要，即不許其移動。軍隊常川駐在商業及製造業都市，兵士們自身就漸漸變成了商人、技工或製造業者。市民的性質，於是漸漸超過軍士的性質而佔優勢。這一來，羅馬的常備軍，就逐漸頹廢了，成為腐敗、疏忽、無訓練的民兵，後來日耳曼和塞西亞民兵入侵，西羅馬帝國就抵擋不住了。那時，各皇帝沒有辦法，就開始僱傭那些國家中的某些國家的民兵，抵抗另一些國家的民兵，這樣纔多維持了一些時候。西羅馬帝國的沒落，是古代史中比較保有明確詳細記錄的人類

事務上的第三次大革命。這革命的原因，就是野蠻國民兵對於文明國民兵的無比的優越，也就是遊牧者國家的民兵對於由農夫、技工及製造業者組成的國家的民兵的無比的優越。這裏，民兵所戰敗的，大都不是常備軍，只是在訓練與紀律方面不及他們的民兵。希臘民兵戰敗波斯民兵是如此，後來瑞士民兵戰敗奧地利和勃艮第民兵亦是如此。

西羅馬帝國沒落了，在它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是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移遷新土後，他們的兵力依然在若干時期內保持原來的性質，它是由牧人及農夫組成的民兵，在戰時即由平時所慣於服從的酋長帶往戰場作戰。所以，他們是經過了相當訓練，具有相當紀律的。但是，隨着技術及產業的進步，酋長的權威逐漸衰微了，大多數人民能勻出來受訓練的時間也比較減少了。封建式的民兵訓練逐漸荒廢，紀律亦日趨鬆弛。為糾正這缺陷，就逐漸着手建立起了常備軍。並且，編制常備軍的方策，一經為某文明國所採用，其他文明國就有立即仿行的必要。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民兵，非這樣編成的常備軍的敵手，要想國防安固，只有採用這種方策。

常備軍的士兵，縱使從未上過陣，從未經過炮火，也往往顯得有老兵那樣的勇氣，而且，一開始上陣作戰就配得上和最頑強最有經驗的老兵見個高低。1756年，俄羅斯軍隊攻打波蘭，俄羅斯軍隊所表現的武勇，簡直可以與歐洲當時最頑強最老練的普魯士兵士相頡頏。然而俄羅斯帝國前此二十年是國泰民安的；它那時軍隊中曾上過陣的兵士，決不很多。1739年，西班牙戰爭爆發，當時英國享受了二十八年的太平。可是，它的常備兵士並不為這長期和平所腐化，在攻打喀他基那時，他們所表現的武勇尤為特出。這一戰役，是他們在這次不幸戰爭中第一次的不幸冒舉。和平日子過久了，將官們說不定有時會忘卻他們的技能，但管理得法的常備軍，如果不忘訓練，似乎決不會忘卻其武勇的。

一個文明國的國防，如果仰仗民兵守衛，它將隨時有被鄰近野蠻民族征服的危險。亞洲各文明國往往被韃靼人征服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野蠻國民兵對於文明國民兵的自然優越性。有紀律有訓練的常備軍，較任何民兵為優。只有富裕的文明國家，才能好好維持這種軍隊；亦只有這種軍隊，才能保衛這種國家不受貧困野蠻鄰國的侵掠。

所以，一國要永久保存其文明，甚或要相當長久保存其文明，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編制常備軍。

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文明國才能抵禦外侮；同樣，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野蠻國才能突然地而且相當地文明化。常備軍憑其威力，可以把君主的法令，推行到一個帝國的最僻遠地方，可以在沒有常備軍威力的情況下即無政治可言的國家，維持相當程度的正規統治。凡小心考察過俄羅斯彼得大帝變法圖強的各種設施的人，他一定會發覺那各種設施的樞紐，就是正規常備軍的建設。這常備軍，是大帝執行和維持其他一切規章的工具。俄羅斯帝國此後得以享有相當的秩序與和平，不能不說是這種常備軍之賜。

有共和主義思想的人，往往耽心常備軍會危及自由。當擁兵大員的利益與國家憲法的維持不一定有何等關聯時，這危險性的確存在。例如，凱撒的常備軍破壞了羅馬共和國；克倫威爾的常備軍解散了英國成立已久的議會。不過，一國的軍權，如握在君主手裏，各軍隊的主要將官，如是這國的貴介與華族，換言之，全國兵力，如果都是由那些由於自己享有民政權力的最大部分，所以本身的最大利益在於支持民政權力的這種人指揮，則常備軍對於自由決無危險。反之，在某種場合，它說不定還有利於自由。君主有了常備軍護持，他就自以為安全了，無須乎要象近代一些共和國所行的那樣，監視各市民的細微行動，時時疑忌市民擾亂和平。如果一國行政長官，儘管國內的主要人民願意予以支持，但羣衆的每一不滿，都會使其安全感到威脅；或如果那怕是一個小小的紛擾，也有可能不到幾小時就掀起大的革命，那麼為防微杜漸起見，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權力，來鎮壓一切對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滿。反之，一國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貴族，且有精練的常備軍，那麼，就是最粗暴、最無稽、最放肆的抗議，也不至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寬恕這抗議，或竟置之不問。並且，他既意識到了他自己地位的穩固，他會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這樣做。所以，接近於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練的常備軍保障的國家，纔可見到；亦只有在這種國家，才無須為公共安全而付與君主以壓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絕對權力。

總之，君主的第一義務，就是策本國社會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橫暴與侵侮。這種義務的實行，勢必隨社會文明的進步，

而逐漸需要越來越大的費用。原來在平時在戰時都無須君主支出何等費用的社會的兵力，隨着社會進步的過程，初則在戰時要君主出錢維持，後則在平時亦非君主出錢維持不可。

火器發明後，戰爭技術起了大變化。於是，平時訓練一定兵額，戰時使用一定兵額，所需的費用，都進一步增加。軍隊所使用的武器與彈藥，都比以前更貴。與矛及弓箭比較，短槍是更貴的武器，與弩炮或石炮比較，大炮或臼炮也是更貴的武器。近代閱兵所消費的火藥，放射出去，就不復返，這更非鉅額的費用不可。至於往時，閱兵所投的矛，所放的箭，均很容易收回，並且其價值極微。與弩炮石炮比較，大炮臼炮不僅為高價的機械，且為非常笨重的機械。這笨重機械，製造起來，要較大的費用，製成後運往戰場，也要較大的費用。此外，近代大炮的作戰效力，非往昔石弩可比，所以要給一個都市設防來抵禦這大炮的攻擊，那怕只是幾個星期也困難得多，因而，其所需費用也浩大得多。近代，有種種原因使國防費用日益增大。在這方面，事物自然推移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又被戰爭技術上的大革命促進不少，而引起這個大革命的，似乎不過是一個偶發事件，即火藥的發明。

近代戰爭火藥費用的浩大，顯然給能夠負擔此浩大費用的國家提供了一種利益，而使文明國家對野蠻國家立於優勝的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國家很難防禦貧窮野蠻國家的侵略；在近代，貧窮野蠻國家卻很難防禦富裕文明國家的宰割。火器的發明，乍看起來，似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害。但實際上，乃對文明的持久與繼續有利。

第二節論司法經費

君主的第二個義務，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換言之，就是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這種義務的實行，因社會各時期的不同而有費用大小的差異。

在狩獵民族的社會，幾乎談不到有什麼財產，即使有，也不過值兩三日勞動價值的財產罷了。那種社會，當然用不着何等固定的審判官，或者何等經常的司法行政機構。沒有財產的人們，其所互相毀傷的，頂多不過是彼此的名譽或身體。而且，被人殺害，被人毆辱，被人誹謗的人，雖然感到痛苦，而殺人者，毆辱人者，誹謗人者，卻得不到什麼利益。可是損害財產情形就不同了。加害於人者所得的利益，往往與蒙受傷害者所道的損失相等。能夠激使人們去毀傷他人身體或名譽的，惟有嫉妒、怨恨、憤怒等情緒，而且大多數人並不常受這些情緒的支配。那怕最惡的人，也不過偶然受這些情緒的影響。此外，這些情緒的滿足，對某種人無論是如何愉快，但因為它不帶來任何實際的和持久的利益，所以大多數人總是寧願慎重剋制，不輕求其滿足。即使社會上沒有司法官存在，保護人們不受這些情緒發作的侵害，人類依着他的本性，也還能在相當安定狀態下共同生活。可是，富者的貪慾與野心，貧者厭惡勞動貪圖眼前安樂的性情，卻在足以激發侵害他人財產的情緒。並且這情緒在作用上遠為牢固，在影響上遠為普遍。有大財產的所在，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個鉅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五百個窮人。少數人的富裕，是以多數人的貧乏為前提的。富人的闊綽，會激怒貧者，貧人的匱乏和嫉妒，會驅使他們侵害富者的財產。那些擁有由多年勞動或累世勞動蓄積起來的財產的人，沒有司法官保障庇護，哪能高枕而臥一夜哩。富者隨時都有不可測知的敵人在包圍他，他縱沒有激怒敵人，他卻無法滿足敵人的慾望。他想避免敵人的侵害，只有依賴強有力的司法官的保護，司法官是可以不斷懲治一切非法行為的。因此，大宗價值財產的獲得，必然要求民政政府的建立。在沒有財產可言，或頂多只有值兩三日勞動的價值的財產的社會，就不這樣需要設立這種政府。

一個民政政府，必先取得人民的服從。民政政府的必要程度，既是逐漸隨財產價值的增大而增大，所以使人民自然服從的主要原因，也是逐漸隨財產價值的增長而發展。人民何以會形成這種服從性，或

者說，在有任何民政機構以前，何以若干人就對他們的大部分同胞有支配權力，這似乎有四種自然原因或情況。

這四種原因中的第一原因，就是下述種種的優越：個人資質的優越，體力的優越，容貌的優越，動作敏捷的優越，智慧的優越，道德的優越，正義性的優越，剛毅性的優越，剋制性的優越，等等。肉體上的品質，必須有精神上的品質來支持，否則在社會的任何時期，都不夠從而取得多大的威權。一個非常有力的人，單憑體力，不過能使兩個弱者服從他。同時一個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卻能取得非常大的權威。可是，精神上的品質，我們不能用眼睛看得出來，它們總有爭議的餘地，而且往往是爭議對象。一個社會，野蠻也好，文明也好，當它規定關於等級和服從的法則時，從沒認為可適當地以這些目不可見的品質為標準，而總是以那些明顯的具體事物為依據。

促成服從的第二原因，就是年齡的優越。老年者如果沒有老邁到衰朽不堪，那就總比有同等身分、同等財產及同等能力的年輕者，能到處博得人們更大的尊敬。在北美土人那種狩獵民族中，年齡是身分及優先地位的唯一基礎。他們所謂父，是長上的稱呼；所謂兄弟，是同等者的稱呼；所謂子，是下級的稱呼。在文明富庶的國家，如果一切方面平等，那末，除年齡外，再沒有其他可以規定身分的標準，於是通常都以年齡規定身分。在兄弟姊妹間，年長者佔第一位。當承繼父產時，例如名譽稱呼一類不可分割而必須全部歸一人佔有的東西，大抵總是付與年長者。年齡這種優越的性質，是分明的，顯而易見的，毫無爭議的餘地。

促成服從的第三原因，就是財產的優越。富人在一切社會，雖都有大的聲勢，但在財產最不平等的野蠻社會，則有最大的聲勢。韃靼一個酋長保有的牲畜，增殖起來，足可養活一千人，而其所增殖除了用以養活一千人外，再也沒有其他用途。因為，在他那種未開化的社會狀態中，他沒有可能把自己消費不了的原生產物換得何等製造品、小裝飾品或玩具。由他維持的一千人，既然要靠他生活，所以，在戰時，不能不服從他的命令，在平時，亦不能不服從他的管轄。他於是就必然成了他們的統帥，成了他們的裁判官。他的酋長地位，就是他的財富優越的必然結果。在文明富庶的社會中，一個人儘管比別人擁有大得多的財產，但他也許還支配不到十多個人。他的財產，增殖起

來，也許能夠維持一千人，也許實實在在維持了一千人，但這些人對由他取得的一切，都支付了應付的代價；沒有換得等價物，他亦不會給他們一點什麼。所以，自認為完全靠他生活的人既然沒有，他的權威所及就不過若干家僕。但是，就在文明富裕社會裏面，財產的權威，依舊非常的大。和年齡的權威比較，和個人資質的權威比較，財產的權威，往往是大得多的。這種事實，早已引起財產不平等社會內一切時期中人們的經常不滿。狩獵民族社會，屬於社會第一個時期，這時期沒有財產不平等的可能。普遍的貧乏，造成了普遍平等的局面。年齡的優越，個人資質的優越，就是權威和服從的薄弱基礎，還是唯一的基礎。游牧民族社會，屬於社會第二時期。這時期財產有異常不平等的可能，由財產造成的權威，以這時為最大，因而權威與服從的判分，也以這時為最確定。阿拉伯酋長的權威，非常的大，韃靼可汗的權威，可以說達到完全專制獨裁的程度。

促成服從的第四原因，就是門第的優越。這種優越，是以先代財產上的優越為前提的。任何家族，都是舊時傳街下來的。王侯的祖先，雖說更為人所知道，但與乞丐的祖先比較，在數目上卻不見得更多。古老的世家在任何地方都意味着它在昔日擁有巨大的財富，或者說其上幾代因財富而獲得巨大的聲譽。暴發戶的勢力，到處總不如世家勢力那麼受人尊敬。人們對幹篡奪者的憎惡，對於舊日王族的敬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人們自然而然地輕蔑前者敬慕後者的心理。武官是甘心服從素日指揮他的上官的，一旦他的下級升到他的上位去，他就簡直忍受不了。同樣，人人都情願服從他們自己或他們祖先所服從過的家門，如一向不比他們優越的家門，忽然變做他們的支配者，他們就難免憤憤不平。

門第的顯貴，既是生於財產上的不平等，那麼，在財產平等、家世也差不多平等的狩獵民族中，就根本沒有這種顯貴存在。固然，在那種社會中，賢明勇敢者的兒子，與愚昧怯懦者的兒子比較起來，即使本領相等，也多少更受人尊敬些。但這種差別，畢竟是很有限的。一個全靠智慧德行保存其家世榮譽的大家門，我相信，世上一定少有。

門第的顯貴，在游牧民族中，不但有存在的可能，而且實際上也存在着。他們通常既不知道奢侈物品，當然就沒有由濫費耗去大財產

的事。所以，財富繼續保持在同～家族手裏的長久，以在這種民族中爲最，因此，依着祖先的權勢榮譽而受人尊敬的家門的衆多，亦以在這種民族中爲最。

門第與財產，分明是使一個人高於另一個人一等的兩大要素。它們又是個人顯貴的兩大來源，因此也是人類中自然而然地有發號施令者又有聽人命令者的主要原因。在遊牧民族中，這兩者的作用，可說是發揮盡致了。保有多數羊羣的大牧羊者大畜牧者，因有巨大的財富，且有許多人靠他生活而受人尊敬；因出身高貴、門第光榮而受人崇拜。結果，他就對同羣或同族中其他牧羊者或畜牧者，有一種自然的權威。與其他任何人比較，他都能團結更多的人，歸他支配，而他的兵力，也就更大。在戰時，寧願結集於他旗幟下的人，也比較結集於他人旗幟下的爲多。他就這樣憑着門第和財產，自然獲得了一種行政權力。不但如此，因爲與他人比較，他能團結並支配更多的人，於是，對於那些人中間的危害他人的分子，他就最能夠強迫其賠償損害。於是，凡屬自己沒有防禦能力的人，自然要求他保障。任何人，如果感到自己被他人迫害了，也自然會向他陳訴。他對這些糾紛所作的干涉，比別人所作的更容易使被告者服從。於是，他又憑着門第和財產，自然獲得一種司法權力了。

財產上的不平等，開始於遊牧時代，即社會發達的第二期。接着，它就帶來了人與人之間過去不可能存在的某種程度的權力和服從，而因此又帶來了保持權力和服從所必要的某種程度的民政組織。這種演進，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甚至與上述那必要的考慮無關。不過，那種必要的考慮，此後對權力和服從的維持與保護確有極大的貢獻，那是無疑的。特別是富者，他們當然願意維護這種制度，因爲只有這種制度才能保持他們既得的利益。小富人聯合起來，爲大富人保障財產，因爲他們以爲，只有這樣，大富人才會聯合起來，保障他們的財產。一切牧人感到：他們小畜羣的安全，全靠那最大一個牧者的大畜羣的安全，他們的小權力的保持，全靠這最大一個牧者較大的權力的保持。並且，要使比他們地位低的人服從自己，他們自己就得好好服從他。這樣，他們就構成了一種小貴族。這些小貴族感覺到：要他們的小君主保障自己的財產，支持自己的權力，他們自己就得保障小君主的財產，支持小君主的權力。就保障財產的安全說，民政組織

的建立，實際就是保護富者來抵抗貧者，或者說，保護有產者來抵抗無產者。

可是，這君主的司法權力，不但對於他毫無所費，而且在一長時期中成為他的一種收入源泉。要求他裁判的人，總願意給他報酬；禮物總是隨求隨到。君權確立以後，犯罪者除賠償原告損失以外，還得對君主繳納罰金。因為被告麻煩了君主，攪擾了君主，且破壞了君主的和平，科以罰金，乃罪有應得。在亞洲的韃靼政府下，在顛覆羅馬帝國的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亞民族所建設的歐洲各政府下，無論就君主說，或就君主以下在特定部落、氏族或領地行使特定裁判權的酋長或諸侯說，司法行政，都是一大收入源泉。這司法裁判的職權，原先常由君主酋長等自己行使。此後因為感到不便，才委任代理人、執事或裁判官行使。不過代理人仍有對君主或酋長本人提供關於司法收入的收支的報告的義務。我們試讀亨利二世給與其巡迴裁判官的訓令，就可明白，那些巡迴裁判官巡行全國的任務，不過是要替國王徵集一項收入。當時的司法行政，不但會對君主提供一定的收入，而且獲得這種收入，還是他希望由司法行政取得的主要利益之一。

司法行政象這樣成為一種斂財的組織，結果，自不免生出許多弊害。比如，以大禮物來請主持公道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止公道；以小禮物來請主持公道的人，得到的往往說不上公道。而且，為要使禮物頻頻送來，行使司法權者往往多方遷延，不予判決。為要勒取被告的罰金，他往往把實在無罪者，判為有罪。司法上的這些弊害，我們一翻閱歐洲各國古代史，就知道是司空見慣，毫不稀奇。

司法上的職權，如是君主或酋長自己行使，無論如何濫用，亦無法矯正，因為他是最有權勢的，任何人都不夠資格責問他。可是，這職權如由代理者行使，那就有矯正的餘地。代理者如犯了某種不正當行為，而且又單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君主未必總是不願意懲罰他，或強制他矯正錯誤。但代理者所行的不正，如是為了君主的利益，換言之，如是為了獻媚於任命他重用他的人，那在大多數的場合，就嚴如君主自行不正一樣，無法得到補救。所以，一切野蠻國的司法行政，特別是往昔建立於羅馬帝國廢墟上的歐洲各國的司法行政，都長期陷於極度的腐敗狀態，即在最好國王的統治下，也談不到什麼公正、什麼平等，而在最壞國王的統治下，那就是一塌糊塗了。

在牧羊民族中，所謂君主或酋長，不過是他們集團中或氏族中最大的牧羊者或畜牧者。他同他治下的小牧人或臣民，同是靠着自己的畜羣生活。在剛脫離遊牧狀態，而比遊牧狀態還沒有很大進步的農耕民族，如特洛伊戰爭時代的希臘各部族，以及初移居羅馬帝國廢墟上的日耳曼人和塞西亞人的祖先，所謂君主或酋長，也不過是國中最大的地主；他的生活，完全象一般地主的生活一樣，完全是仰賴自己私有地的收入，換言之，就是仰賴近代歐洲所謂御地的收入。在平時，他的臣民，除了要請求他運用權力，制裁強豪的壓迫，都無需貢獻他一點什麼。他在這種場合領取的禮物，就算是他的全部經常收入，或者說，除了異常緊急的場合外，這就是對於他的支配權的全部報酬。荷馬告訴我們，阿格默農因友誼關係，以希臘七個都市的主權贈與阿塞利斯，並說，阿塞利斯從那七都市可能收得的唯一利益，就是人民所奉敬的禮物。這種禮物，這司法行政的報酬，或者說，司法手續費，只要它構成君主由其主權獲得的全部經常收入，那就不能希望他把這全部收入放棄，甚至不好意思提議要他這樣放棄。提議請他把這禮物確實規定一下，那也許是可以的，而實際上，也曾這樣提議過。但是，君權無限，縱使好好規定了、確定了，要防止他不越出規定範圍，即使不說是不可能的，亦是極其困難的。所以，一任這種狀態繼續下去，由任意的不確定的禮物所造成的司法行政上的腐敗，就簡直無可救藥了。

但後來，當許多原因，就中比較重要的是國防費不斷增加，使得君主私有土地的收入，不夠國家開支行政費用時，當人民為自己安全計，得完納各種賦稅，以應付這些費用時，似乎才一般規定，不問何等理由，君主或君主的代理者及審判官，均不得領取任何禮物。這樣看來，禮物要予以有效的規定和確定是比較困難，全然廢除倒似乎還容易些。審判官定有薪俸，這薪俸，被想象為可抵償其先前在禮物報酬中享有的份額時，君主徵有賦稅，這賦稅被想象為可補償其前此從司法方面所得收入而有餘。從此，審判算是免費了。

然而認真說來，無論那個國家，都不能說審判是免費的。至少，訴訟當事人，總不能不報酬律師和辯護士，否則，他們執行職務，就會比實際情況還要不滿意。每年付給律師、辯護士的手續費，就各法庭總計起來，恐怕要比審判官的薪俸多得多。審判官的薪俸，雖然由

國王付給了，但在任何地方，訴訟事件的必要費用都沒有大減。不過，禁止審判官向訴訟當事人領取禮物或手續費，與其說是爲了減少費用，無寧說是爲了防止腐敗。

審判官是一個有名譽的官職，報酬雖再少，想幹的人依舊多。比審判官職位較低的治安推事，論工作是異常麻煩的，論報酬大抵毫無所得，然而大多數的鄉紳，卻唯恐弄不到手。大大小小的一切司法人員的薪俸以及司法行政的一切費用，即使處理不很經濟，亦不過佔國家全部費用的一極小部分。這情況不限於哪一國，各文明國家都是如此。

此外，也不難從法院手續費裏支付全部司法經費。這種辦法，不會使司法行政陷於何等實際的腐敗危險，而國家收入項下卻可省去一筆——雖然是小小的——開支。可是，法院手續費，如有一部分要劃歸權力極大君主這樣的人，而且構成他的收入的相當大的部分，則這種手續費就很難有效地規定。但如果享有這手續費的主要人物，不是君主，而是審判官，那就極其容易。法律雖不能常常叫君主遵守某種規定，但對於審判官，卻不難使其遵守規定的章程。法院手續費，如管理得、規定得很嚴密精細，並在訴訟的一定期間，全部繳入出納機構，待訴訟決定之後而不在決定之前，才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給各審判官，那麼，和廢止這種手續費比較，徵收這種手續費，也就同樣不會有何等腐敗的危險。這種手續費，可能完全足夠開銷全部司法費用而不至惹起訴訟費用顯著的增加。不到一個案件判決終了，審判官不得支取這手續費，這在案件的審理和判決上，可激勵全體法院人員的勤勉。在審判官員數非常多的法院，如果各人應分這手續費的份額，以他們各人在法院或審判委員會審理案件所花的時間及日數爲標準，這更可激勵各個審判官的勤勉。公家的事務，辦好纔給酬，並且按勤勉的程度決定酬額，這樣才能辦好。法國各高等法院所徵收的手續費，構成審判官最大部分的報酬。就等級與權限說，土魯斯高等法院，是法國第二個大法院。該院審判官每年由國會領到的薪俸，在減除一切扣除額後，不過一百五十利弗，約合英幣六鎊十一先令。這個金額，等於當地七年前一個僕役每年普通的工資。上述手續費的分配，也是以各審判官的勤勞爲標準。一個精勤的審判官，可得到足供安樂生活的收入，雖然其數額也有限。至於怠惰的審判官，那就只能

得到比薪俸多一些的收入。就種種方面觀察，這些法國高等法院，也許不是頂令人滿意的法院，但卻從未受到人們的非難，好象也從未有人懷疑其腐敗。

英國各法院的主要費用，最初似乎也是取給於法院手續費。各法院都儘可能兜攬訴訟事件，那怕本來不是歸自己管轄的案件，也樂於受理。例如，單為審理刑事案件而設的高等法院，居然接受民事案件，而以原告聲稱被告對他所行不義是犯了非法侵害罪或輕罪為受理的口實。王室特別法院的設立，本來單是為了徵收國王收入和強制人民償清對於國王的債務的。但它後來居然受理關於一切其他契約上的債務的訴訟，以原告陳訴被告不償還對他的債務，所以他不能償還對國王的債務這個理由為根據。由於這種種的假託，結果許多案件，究竟歸哪個法院審理，全由訴訟當事人選擇，而各法院要想為自己方面多多招徠訴訟案件，也在審理上力求迅速公平。英國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讚賞的，但一探其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須歸因於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競爭，對一切不正當行為，各個力求在自己法院就法律許可的範圍內給予最迅速最有效的救濟這個事實。普通法院對於違反契約的行為，原不過責令賠償損害。平衡法院作為一種債權法院，首先毅然強制履行特殊約定。當破壞契約的性質是不肯償付貨幣時，對這損害的惟一賠償方法，就是責其償還。這裏，償還就等於履行特殊約定，因此，在這種場合，普通法院所能給予的救濟是充分的。但在其他場合，普通法院的救濟則有所不夠，如果一個積地人，控訴他主非法奪回其租地，那他得到的損害賠償，決不等於佔有土地，所以，這類案件，在一段時期中，都由平衡法院審理，使普通法院蒙受不小的損失。為要把這類案件拉回自己審理，據說普通法院後來發明了假扣留土地的令狀，這令狀對於不正當剝奪土地侵佔土地的事件，是最有效的救濟方法。

由各法院對受理的訴訟案件收印花稅，用以維持各該院法官及其他人員，這種辦法也足以提供司法行政費而不會對社會的一般收入增加負擔。不過，審判官在這一場合，可能為了要儘量增加印花稅收入，而在各案件上增加各種不必要的手續。近代歐洲的習慣，大都是以辯護士及法院書記所寫的公文用紙的頁數決定他們的報酬，而每頁的行數，每行的字數，又都有規定。所以，辯護士及法院書記，為增

加其報酬，往往故意增加許多不必要的語句。其結果，我相信歐洲一切法院公文的文字變得陳腐不堪。同樣的誘惑說不定會使訴訟的手續形式發生同樣的腐化。

但是，無論司法行政費用是由司法方面自行設法籌措，或司法人員的定額薪俸是由其他財源開支，管理這財源的責任，支付這薪俸的責任，總無須委諸行政當局。這財源有的是出於地產的地租，法院既由這地租維持，那管理地產的責任，就不妨由它們各自分別負擔。這財源也有是出自一定數額的貨幣的利息，法院既由這利息維持，出貸那貨幣的責任，也就不妨讓它們各自分別負擔。蘇格蘭有一種巡迴法院，其法官的薪俸，就有一部分——雖只不過一小部分——是出自一定額貨幣的利息。但是，象這樣一種財源，是必然缺乏安定性的。以不安定的財源，充當一種應當永久維持的機構的經費，似乎不大妥當。

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劃分，原始似乎是由於社會進步、社會事務因而增加的結果。社會事務日益加多，司法行政變得那麼麻煩複雜，於是擔當這任務的人，就不能再分心注意到其他方面。同時，擔當行政職責的人，因為無暇處理私人訴訟案件，所以，就任命代理人代為處理。當羅馬帝國隆盛時，大執政官政務繁忙，萬難分身過問司法行政，於是就有代行這種職務的民政官的任命。後來，羅馬帝國沒落了，它的廢墟上建立了歐洲各王國。這些王國的君主及大領主們，都現自己執行司法行政為一種過於煩難而且有失身分的任務。因此，他們通通委任代理者或審判官去執行，藉以推脫這項任務。

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肩負國家重任的人，縱無何等腐敗觀念，有時也會認為，為了國家的重大利害關係，必須犧牲個人的權利。但是，各個人的自由，各個人對於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賴有公平的司法行政。為使各國人感到自己一切應有權利，全有保障，司法權不但有與行政權分離的必要，且有完全脫離行政權而獨立的必要。審判官不應由行政當局任意罷免，審判官的報酬也不應隨行政當局的意向或經濟政策而變更。

第三節論公共工程和公共機關的費用

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並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說，設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決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並且，隨着社會發達時期的不同，執行這種義務所需的費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

除上述國防及司法行政兩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設施和公共工程外，與其性質相同的其他設施和工程，主要為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教育上的設施，可大別為兩種：一是關於青年教育的設施，一是關於一切年齡人民的教育設施。凡此種種設施和工程所需的費用，該如何最妥善地支付，在本章這一節分作以下三項研究。

第一項論便利社會商業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設施便利一般商業的

一國商業的發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樑、運河、港灣等等公共工程。這類工程的建造和維持費用，顯然，在社會各不同發達時期極不相同。一國公路的建設費和維持費，顯然必隨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增加，換言之，必隨公路上所搬運貨物的數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橋樑的支持力，一定要適應可能通過它上面的車輛的輛數和重量。運河的深度及水量，一定要適應可能在河上行駛的貨船的只數及噸數。港灣的廣闊，一定要適應可能在那邊停泊的船舶的只數。

這類公共工程的費用，似乎不必在通常所謂國家收入項下開支。在許多國家，國家收入的徵收和動用都是委之於行政當局的。這類工程的大部分不難如此管理，使它們自身提供足以支付自己費用的特別收入，而無須增大社會一般收入的負擔。

例如，在大多數的場合，公路、橋樑、運河的建築費和維持費，都可出在對車輛船舶所收的小額通行稅；港灣的建築費和維持費，都可出在對上貨卸貨船隻所收的小額港口稅。此外，為便利商業而鑄造貨幣的設施，在許多國家，不但能開支自己的費用，而且能對君主貢獻一筆小收入，即鑄幣稅。另一設施，即郵政局，幾乎在一切國家，除提供本身的開支外，還給君主帶來一項極大的收入。

車輛通過公路或橋樑，船舶通過運河或港口，如果按照其重量或噸數的比例繳納通行稅，那麼，它們就可以說是恰恰按照其所加於各該公共工程的損耗的比例支付其維持費。似乎要維持這些公共工程，不能想出比這更公平的方法。況且，這通行稅雖由販運者支付，他只不過暫時墊支，結果仍是轉嫁在貨物價格上，由消費者負擔。同時，因為有了這類公共工程，貨物的運輸費大大減少了，消費者雖然擔負了這通行稅，卻比在沒有這類公共工程因而沒有通行稅的場合，能購得較便宜的貨物，因為貨物價格由通行稅擡高的程度，究竟不及其由運費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所以，最後支出這稅額者由於課徵該稅而得到的利益，超過由於完納該稅而蒙受的損失。他的支出，恰和他所得的利益成比例，實際上，不過是他的利得中之一部分。他必須捨棄這一部分來取得其餘部分。徵稅的方法，我看再不能比這更公平了。

就車輛而論，如果以重量為標準，對極盡奢華的車輛和對四馬大馬車、驛遞馬車等等所課的通行稅，略高於對不可缺少的車輛如二輪運貨馬車、四輪馬車等等所課的稅，那就可使懶惰與虛榮的富人，不覺困難地對貧民的救濟有所貢獻，換言之，使運往國內各地的笨重貨物的運費減低若干。

公路、橋樑、運河等等，如由利用它們的商業來建造和維持，那麼，這種工程，就只能在商業需要它們的地方興建，因而只能在宜於興建的地方興建。此外，建造的費用，建造的堂皇與華麗規模，也必須與該商業的負擔能力相稱，就是說，必須適度。宏壯的大道，斷不能在無商業可言的荒涼國境內建造，也斷不能單為通達州長或州長所要獻媚的某大領主的鄉村別墅而建造。同樣的，不能在無人通過的地方或單為增益附近宮殿憑窗眺望的景緻，而在河上架設大橋。這類事情，在公共工程建設費不由該工程本身提供的收入支給而由其他收入開支的國家，有時亦有發生。

歐洲許多地方的運河通行稅或水閘稅，是個人的私有財產，這些人為保持這利益，自竭力維護這運河。如果不加以相當的整飭修理，航行就會成為不可能，而他們由通行稅收得的全部利益，也就將跟着消失。如果運河的通行稅，交給那些利不幹己的委員們徵收，他們對於產生這通行稅的工程的維持，一定不會象個人那樣注意。蘭格多克運河，是由法國國王及蘭格多克州拿出一千三百萬利弗建造的；一千

三百萬利弗，按每馬克銀合二十八利弗的前世紀末葉法國貨幣價值計算，約合英幣九十萬鎊。這個大工程完成時，人們覺得最妥善的維護方法，就是把這運河的全部通行稅，贈給設計並監督這工程的技師裏格，叫他不斷加以修理。這項通行稅，現已成了裏格後代子孫的一大宗收入。因此他們對於這運河的經常修理非常注意。假使當時沒有想出這妥善的方法，而把通行稅交給一般利不幹己的委員們管理，那麼這通行稅全部，恐怕都要消費在徒事裝飾的開銷和不必要的開銷上，而這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則任其趨於塌毀。

可是，維護公路的通行稅，卻不能隨便贈與個人，作為他個人的收入。因為，運河不加修理，會變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卻不會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稅者，儘管全不修理這道路，這道路卻依然可以給他提供一樣多的通行稅。所以，維持這一類工程的通行稅，應當交由委員或保管員管理。

在英國，人們對這些保管員在管理這種通行稅方面所有的弊病，時有責言，在許多場合，那些責言都是非常允當的。據說，有許多收通行稅道路所徵的稅額，往往比好好修理這些道路所必要的費用額多兩倍以上，然而工程卻是用極潦草方法進行，而且有時竟然全沒進行。不過，我們應注意一件事：以通行稅充當修路費用的制度，並未成立很久，所以，即使沒有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也毫無足怪。卑污而不適當的人物，為什麼常常被任為管理者；對於他們的行為，對於他們的濫徵通行稅，為什麼沒有設立監督機構，加以檢查和制止，這一切缺陷，都可由一件事實說明和辯解，即以通行稅修理公路的制度，尚在草創時期，多假以時日，議會當不難逐漸採取賢明措施，予以矯正。

據一般人的想象，英國各種收稅道路所收的通行稅，大大超過了修理道路所需的數額。據幾位大臣考察，多餘的數額如果不濫動用，很可充為國家他日緊急費用的一大財源。有人說，收稅道路由政府管理，比由保管員管理，所費少而收效大。對於修補道路，政府有兵士可用，兵士是有正規餉金的，只須略增少額貨幣報酬就行。至於保管員所能僱用的工人，則不外一些工資勞動者，他們的生活資料，全仰繪工資。所以有人主張，通過自己管理收稅道路，政府可不必增加人

民負擔而增添五十萬鎊大收入；收稅道路將會和現在的郵政一樣，提供國家一般的費用。

政府管理收稅道路所可得收入，雖未必能如創擬這計劃者所預期的那麼巨大，但可由此獲得一大宗收入那是無疑的。不過，這計劃本身似乎有若干極重大的缺點。

第一，國家如把取自收稅道路的通行稅，看作供應急需的一個財源，那麼，這種通行稅將要隨着想象上的急需所需要的程度而增大，而按照不列顛的政策，這些通行稅一定會非常迅速地增加。一個大收入能夠這樣不費力地取得，勢必會使政府動不動就向這收入動念頭。如果搏節得宜，是否就能從現行通行稅省出五十萬鎊，雖是疑問，但如把這通行稅增加兩倍，就可能省得一百萬鎊，增加三倍，就可能省得二百萬鎊，那是毫無疑問的。而且，這樣一大宗收入的徵收，並無需任命一個新的收稅官吏。但是，稅路之設，在於便利國內一般商業，設使通行稅象這樣不斷增加起來，那麼原以利商的，卻成為商業的大病。國內由一地運往他地的笨重貨物運輸費，將迅速增加，其結果，這類貨物的市場，將大大縮小，這類貨物的生產，將大受妨害，而國內最重要的產業部門，說不定要全歸消滅。

第二，按照重量比例而徵收的車輛通行稅，如其唯一目的在於修理道路，這種稅就非常公平；如是為了其他目的，或為了供應國家一般的急需，那麼這種稅，就非常不公平。道路通行稅用以修理道路，各車輛可以說就是恰恰按照其對道路所損耗的程度的比例，完納稅金。反之，道路通行稅如還有其他用途，即以資助國家其他急需，那對於各車輛所徵的稅額，就不免要超過其所加幹道路的損耗的程度。況且，由於這稅使貨物價格按貨物重量的比例，而不是按貨物價值的比例而升高，所以主要負擔這種課稅的人，不是價值高而重量輕的商品的消費者，卻是粗劣笨重的商品的消費者。因此，不論國家打算以這稅收應付何等急需，其結果，供應這急需的人，不是富者而是貧者，不是最能擔當這負擔的人，倒是最沒有能力擔當這負擔的人。

第三，設使政府對於損壞的公路漫不修理，我們要強制其適當地劃出通行稅的一部分充當此項用途，將會比現今還更困難。以修繕道路為唯一目的並取自人民的一大收入，可能竟然完全沒有劃出任何部分來修繕道路。如果對於今日卑賤貧困的稅路管理者，有時尚不易強

制他們矯正所犯的錯誤，那麼，換一般富裕者有權勢者來管理稅路，要強制他們矯正錯誤，恐怕比我們現在所假設的場合還要困難十倍。

法國修理公路的基金，放在國家行政當局直接管理之下。該基金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法國大部分地方鄉下人民每年為修理公共道路所應提供的一定日數的勞役，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國王在國家一般收入中決定不用於其他開支而專用於修路的那一部分收入。

按法國以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舊法律，鄉下人民的勞役，向來由地方長官指揮監督；地方長官對於國王的樞密院，無何等直接從屬關係。但依據現行法令，鄉下人民提供的勞役，以及國王為某特定地域或特定稅區修理道路的任何基金，全歸州長管理；州長由樞密院黜陟任免，接受樞密院的命令，並不斷與樞密院保持聯絡。隨着專制政治的發展，行政當局逐漸併吞國家的一切其他權力，所有指定作為公共用途的一切收入，全都攬歸自己管理。但法國的大驛路，即聯絡國內各主要都市的道路，一般都整飭可觀；在若干州境內，這些道路比英國大部分道路宏壯得多。可是，我們英國所稱為十字路，就是說，鄉下的大部分道路，卻全未進行修理，有許多地方，重載車輛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干地方，甚至騎馬旅行也有危除，惟有騾是安全可靠的運載工具。一個崇尚虛飾的朝廷的驕矜大吏，往往樂意經營壯麗堂皇的工程，例如王公貴人時常經過的大道。後者的讚賞，不但使他感到光榮，甚或有助於增進他在朝廷上的地位。至於偏在鄉村的許許多多小工程，既不足以壯觀瞻，又不足以邀聲譽，除了實際上有極大的效用以外，沒有其他可取的地方。這樣，無論就那一點說都似乎是過於瑣細不值一顧的工程，怎能叫堂哉皇踐的大吏注意呢；所以，在這種人的管理下，這種小工程總是受漠視的。

在中國，在亞洲其他若干國家，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這一切國家中，對於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別在中國是如此。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不過，關於那裏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教士。假使這些工程，是經過比較有識者的考察，假使這些報道，是比較忠實的目

擊者的敘述，那麼，那裏的水道公路工程恐怕就不值得我們如此驚異。柏尼爾關於印度這類工程的報告，就遠沒有其他大驚小怪的旅行者的記述那麼誇張。法國對於大公路，即常常成為朝廷及首都人士談話資料的聯絡各地方的通衢，無不慘淡經營，而其餘一切支道橫道，則漫不經意。亞洲各國的情形，說不定也是這樣吧。加之，中印各國君主的收入，幾乎都是以土地稅或地租為唯一源泉。租稅徵收額的大小，取決於土地年產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與收入，與國境內土地的墾治狀況，以及土地產物數量的多寡，土地產物價值的大小，必然有極大的直接關係。要儘可能地使這種生產物又豐盈又有價值，勢須使它獲有儘可能廣泛的市場。要做到這樣，必須使國內各地方的交通既極自由，又極方便，極便宜。而維持這種交通狀態，惟有興築最好的通航水道與最好的道路。然在歐洲，各國君主的主要收入並非仰給於土地稅或地租。固然，歐洲一切大的王國，主要收入的大部分，也許歸根結底也要依靠土地生產物，但這依賴不是直接的，而且不象亞洲各國那樣明顯。因為這樣，歐洲各國君主不象亞洲君主那樣急於增進土地生產物的數量和價值，換言之，那樣急於維持良好的水道及公路，以開拓土地生產物的廣泛市場。因此，即使在亞洲某些地方，浚河修路庶政，行政當局辦得成效卓著，如傳聞所說（據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干疑問），在歐洲現狀下，要想任何地方行政當局把那種事情弄得相當的好，恐怕是沒有希望的了。

一項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維持，而其便利又只限於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區域，那麼，把它放在國家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國家一般收入維持，總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維持，來得妥當。比如，倫敦市上的照明與鋪路費用，如由國庫開支，那街上所點的燈，所鋪的石，能做到現在這樣完善，其費用，能象現在這樣撙節麼？況且，這費用，如非取給於倫敦各特定街坊、特定教區、特定市區的居民所提供的地方稅，那勢必要從國家一般收入項下開支，其結果，王國中不能受到這街燈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無端分攤這負擔了。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州收入，固然有時不免發生弊病，但是，這種弊病苦與管理和花費一個大帝國收入所時常發生的弊病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況且，與後者所生的弊病比較，前者的弊

病，容易矯正多了。在英國，在地方或州治安推事管理之下，鄉下人民為修葺公路，每年所必提供的六日勞役，也許不盡用得宜，但從沒有發生慘酷壓制的事情。在法國，此項勞役，歸州長管理，但不一定比英國用得適當，而強徵勒索的舉動，往往極盡慘酷暴戾之能事。法國人所謂強迫勞役制，成了悍吏魚肉人民的主要工具；設某教區或某村社不幸為悍吏所嫉惡，悍吏往往就藉此以施懲罰。

便利特殊商業的

上述公共設施和公共工程，其目的在幹便利一般商業。若求某些特殊商業的便利，則有待於特別的設施，且須有一項特別的額外費用。

與野蠻未開化國家通商，常需要特別保護。普通堆棧或行店的設備，決不能保障非洲西部海岸貿易商人的貨物。為防止地方土人的劫奪，對於積貨場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建築防禦工事。印度人本來是溫和馴謹不過的，但因印度政府漫無秩序，所以，歐洲人貿易其間，亦有作同樣警戒的必要。英法兩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擁有的幾個最早堡壘，就是藉口防備暴力、保護生命財產而獲准建築的。一國有了強固的政府，自不容外人在本國領土內建築堡壘，在這種場合，就有互派大使、公使或領事的必要。自己國民間發生爭訟，公使或領事可依從本國習慣予以處決；自己國民與駐在國國民間發生爭訟，他可憑外交官的資格，比任何私人更有權力出來干涉。他所能給他的國人的保護，自比他們所能從任何私人獲得的強得多。國家常常專為商業上的利益，需要在外國派駐使館，本來無論就戰爭或同盟關係說，都不需在這些外國設立使館的。首先使英國在君士但丁堡派駐大使的原因，是土耳其公司的商業。英國派駐俄羅斯的最早的大使館，完全是起因於商業上的利益。歐洲各國人民因商業利害關係不斷髮生的衝突，恐怕就是使歐洲各國即在平時亦在一切鄰國永久派駐公使的原因。這個前所未聞的制度，其開始發生，似乎不過在十五世紀末或十六世紀初，也就是說，不過在商業開始擴展到歐洲大部分國家，歐洲各國開始注意到商業利益的時候。

國家為保護某一商業部門而開支的特別費用，如通過向該商業部門抽徵適當的稅來彌補，當不失為公允。例如，在商人開始營業時，徵以小額的營業稅，或更公平的，對商人從特定國家輸入或向特定國

家輸出的貨物，抽若干成特定的稅。據說，最初建立關稅制度，就是爲了支付保護一般貿易免受海盜搶劫的費用的。但是，如果認爲保護一般貿易用去的用費，理應取給於課在一般貿易上的稅，那麼，爲保護特殊貿易用去的特別費用，照理也應取給於對該貿易所課徵的特殊稅收。

保護一般貿易，常被視爲國防的重要事件，因而也就成了行政當局一部分必盡的義務。結果，一般關稅的徵收及應用，就往往委諸行政當局。特殊貿易的保護，既是一般貿易保護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行政當局應盡義務的一部分。如果國家的行動，總是前後一致的，則爲保護特殊貿易而徵收的特殊稅收，自當同樣委諸行政當局管轄。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無論就這方面或其他方面說，各個國家的行動常是矛盾的。歐洲大部分商業國家，就有若干商人集團，說服了立法機構，把行政當局這方面的義務，以及必然與這義務相關聯的一切權力，統統交給他們執行。

此等公司自擔費用，創辦政府也許有所顧慮，不敢貿然嘗試的某些部門的商業，就這一點說，它們對該部門商業的創建，容或有所助益。但最終它們全無例外地或成爲累資或成爲無用，而其經營，不是失當，就是範圍過於狹窄。

這種公司有兩類，其一爲，沒有共同資本，凡具有相當資格的人，都可繳納若干入夥金，加入組織，但各自的資本由各自經理，貿易危險，亦由各自負擔，對於公司的義務，不過是遵守其規約罷了。這種公司，稱爲合組公司。又其一爲，以共同資本進行貿易，各股員對於貿易上的一般利潤或損失，都按其股份比例分攤。這種公司，稱爲合股公司。這些合組公司或合股公司，有時擁有專營的特權，有時又不擁有這種特權。

所謂合組公司，在一切方面，都與歐洲各都市普遍通行的同業組合相類似，而且與同業組合同爲一種擴大的獨佔團體。一個都市的任何居民，如果他不先從同業組合方面取得自由營業權，他就不能從事參加同業組合的一切行業。同樣，在大多數場合，一國的任何人民，如不先成爲這公司的一員，那麼，他就沒有法律上的權利經營合組公司任何一部門的國外貿易。這種獨佔權的強弱，與公司入夥條件的難易相應，也與公司董事權力之大小——即被等有多大權力能把公司控

制得使大部分貿易只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友可以經營——相應。最初，合組公司的徒弟所享的特權，與其他公司徒弟所享的特權一樣。凡在公司服務了相當年限的學徒，不用交什麼人夥金，或只須交比平常人少得多的入夥金即可取得公司成員的資格。只要法律不加制止，組合的普通精神，就橫溢於一切合組公司中。只要容許它們依照其自然傾向行動，它們總是巧立種種苛刻規章，企圖約束有關貿易的經營，從而把競爭限制於盡可能少的人數之間。但當法律不許它們這樣做的時候，它們就變成完全無作用、完全無意義的東西。

對外貿易的合組公司，現今在英國還存有以下五個，即漢堡公司（昔日稱為商人冒險家公司），俄羅斯公司，東方公司，土耳其公司及非洲公司。

漢堡公司的入夥條件，據說今日十分容易。公司董事沒有權力把有關貿易加以繁瑣的約束。至少他們沒有使用這種權力。不過，這還是最近的事，以前不是這樣。在前世紀中葉，該公司的人夥金，有時須五十鎊，有時須一百鎊。據說，那時候公司的行為，非常專橫。1643年、1645年、1661年，英格蘭西部毛織業者及自由貿易者，曾以該公司憑着獨佔者的地位，阻制貿易，壓迫國內製造業者，訴於國會。這種呈訴雖不曾使國會採取什麼行動，但該公司卻因此大嚇一跳，把它向來的行動改正不少。自那時起，至少沒有人再控訴它。俄羅斯公司的入夥金，由威廉三世第十年及第十一年第六號法令減為五鎊；東方公司的入夥金，由查理二世第二十五年第七號法令減為四十先令，同時，各該公司在瑞典、丹麥、挪威乃至波羅的海北岸一切國家的專營特權，統予取消。國會這兩條法令，大概是由該兩公司的行動激成的。在國會未頒佈此等法令以前，約西亞·柴爾德曾稱此兩公司及漢堡公司極端專橫。他並說，當時本國與各該公司特許狀所包括國家間貿易狀態所以不振，正是各該公司經營失當的結果。現在，它們也許沒有那麼專橫，但它們確是沒有用處了。沒有用處實是合組公司應得的最好讚辭，就上述三公司的現狀說，它們通通可承受這讚辭而無愧。

土耳其公司的入夥費，年二十六歲以下者二十五鎊，二十六歲以上者五十鎊。凡非純粹商人不得加入。此種限制，實把一切店員和零售商都排斥在外。又據該公司章程，凡屬英國運往土耳其的製造品，

非經該公司船舶裝載，不許輸出。該公司船舶，例由倫敦一港啓碇，因此，英國對土耳其貿易，就侷限於這個奢華的港口了。經營此項貿易，也侷限於倫敦附近居民了。該公司的另一章程又規定，凡定居倫敦市二十英里以外，沒有取得該市市民權者，不得加入該公司。這種限制，連同前一限制，必然把一切沒有取得倫敦市民權者都排斥在外。該公司船舶的上貨及啓碇日期，既通由該公司董事決定，所以這些董事很容易以自己及有特殊關係友人的貨物裝滿船舶，而以託運過遲為藉口，拒絕他人的貨物。在這種情況下，該公司無論就那一點說，都可以說是嚴密的、專橫的壟斷組織。這種種弊害，惹起喬治二世二十六年第十八號法令的頒佈。依此法令，不論年齡大小，不論是否純粹商人，也不論是否取得倫敦市民權，凡屬情願入夥者，一律繳納入夥費二十鎊，即可取得公司成員的資格。並且，除禁止輸出的貨物外，這些入夥的人，得自由從英國任何港口，輸送任何英國貨物往土耳其任何地方；除禁止輸入的貨物外，都得自由輸入一切土耳其貨物，不過，他們須繳納普通關稅和為支付該公司費用而徵收的特定稅，須服從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與領事的合法訓示，須遵照公司方面正式制定的章程。為防範此等章程流於苛暴，上述法令又規定，此法令通過後，凡公司所訂章程，設使該公司中任何七個夥員感到壓迫，得向貿易殖民局（該局的此種權能，現由樞密院所組織的委員會執掌）呈請修改。但此種呈請，須在該章程制定後一年內提出。此外，此法令通過以前公司所制定的任何章程，如有七個夥員感到壓迫，也可呈請修改，但須在該法令實施後一年內提出。然而在一大公司中，各夥員未必——一部能憑一年的經驗，發現各種章程的弊害。如果某一章程的弊害，他們中有幾個在限定期間以後才發現，那麼，就連貿易局、樞密院委員會也無法挽救了。況且，象一切同業組合的章程一樣，一切合組公司大部分章程的目的，不在於壓迫已經加入的夥員，而在於阻礙外人的加入。除規定很高的入夥費外，它們還可使用其他許多方策以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斷要求自己的利潤增高，愈高愈好，因而，不斷要市上對於他們輸出輸入的存貨，感到不足，愈不足愈好。要做到這層，就只有限制競爭，妨礙新冒險者從事同一貿易。就說二十鎊的入夥費吧，對於一個想永久繼續從事土耳其貿易的人，二十鎊也許不夠阻礙他的意向；但是對於一個只想試做一次土耳其貿易的投機商人，二十鎊就夠使他裹足了。不論何種職業，久於其業者，縱未

締結何等組合，他們也自然會聯成一氣，設法擡高利潤。要使商業利潤降低至相當水準，唯一的方法，就是讓一般投機冒險者不時起而競爭。英國對土耳其貿易，在某種程度上，雖由國會這個法案開放了。但在許多人看來，那實在距離自由競爭局面還遠。土耳其公司開支了一名大使兩三名領事的維持費，其實，公使領事，同為國家官吏，應由國家收入維持，而對土貿易，亦當對國王治下一切臣民開放。況該公司為此目的及其他目的而徵收的各項雜稅，若提歸國有，當不止維持這幾個駐外官吏。

據約西亞·柴爾德的考察，駐外官吏雖常由合組公司維持，但合組公司從未在其所與貿易的國家維持任何堡壘或守備隊。反之，合股公司卻常常在這種國家維持堡壘或守備隊。看來前者實比後者遠不宜於承當這個任務。第一，合組公司董事，對於該公司一般貿易的繁榮，並無何等特別利害關係，而維持堡壘和守備隊的目的在於維護這個繁榮。公司一般貿易的衰退，對他們私人的貿易倒有不少利益。因為，公司一般貿易衰退，競爭者自減少，於是他們自己就能賤買貴賣。合股公司董事的情況，則與此正相反。他們個人的利得，統包含在他們管理的共同資本所生的共同利潤中，離開公司的一般貿易，他們就沒有貿易。他們私人的利害關係，與一般貿易的繁榮，和保障這繁榮的堡壘或守備隊的維持，緊相結合。因此，就維持堡壘或守備隊所必要的不斷和仔細的注意說，和合股公司董事相比，他們似乎更會保持這種注意。第二，合股公司董事，手中常掌管有一大宗資本，即公司方面的股本。堡壘守備隊如有設置、增補、維持的必要，他們當然隨時可以劃出一部分資本，拿來應用。至於合組公司董事，他們並沒有掌管什麼共同資本；除了一點臨時收入，如公司入夥金，及課於公司貿易上的組合稅以外，沒有其他資金可以動用。所以，對於堡壘和守備隊的維持，即使他們和合股公司董事一樣，有利害的關係，作同樣的注意，但也很少有同等資力，使其注意成為有效。至於駐外官吏的維持，那就無須什麼注意，費用亦輕而易舉，就合組公司的性質和能力說，都更為相稱。

然在柴爾德的時代以後許久，即1750年間，一個合組公司又設立了，即是現時的非洲貿易商人公司。英政府最初曾令該公司負擔非洲沿岸由布蘭角至好望角間一切英國堡壘和守備隊的維持費；最後，又

令該公司只負擔魯傑角好望角間一切堡壘和守備隊的維持費。政府關於設立這公司的法案（喬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三十一號法令），似乎有兩個明顯目標。第一，對於合組公司董事自然會有的壓迫精神和獨佔精神，加以抑制；第二，極力強迫他們去注意本來不會注意的一件事，即維持堡壘與守備隊。

關於第一個目標，該法案限定入夥費為四十先令，並限定該公司不得以合股經營的身分，自己出來從事貿易，不得以公印借入資本；對於一切繳納入夥費的英國人民，都當任其在各地自由貿易，不得巧立限制。公司的管理權，操於集駐倫敦的由委員九人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每年由倫敦、布裏斯托爾和利物浦三市的公司夥員中各選三名，任何委員都不得連任三年以上。委員有不當行為，貿易殖民局（現由樞密院委員會接管）在聽了他本人的辯護後得免其職。該委員會不得由非洲輸出黑奴，亦不得運非洲貨物入英國。但因他們須負責維持駐在非洲的堡戍，所以由英國向非洲輸出的各種與這任務有關的貨物及軍需品不在禁止之列。他們由公司領取的錢，不得超過八百鎊。如果開銷在倫敦、布裏斯托爾、利物浦三市的辦事人員和經理人薪俸與倫敦事務所房租以及其他一切雜費後還有餘剩，則可用以報酬他們自己的辛勞，至於如何分配，那聽他們自行決定。一切規定如此嚴密，照理該可切實限制獨佔行為，而充分達到第一項目標了。然樓之實際卻不如此。依喬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號法令，舉凡桑尼加堡壘及其屬地，統由非洲貿易商人公司管理。但至翌年，（依喬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四號法令）公司方面不但要把桑尼加及其屬地，就連由南巴巴利的薩利港至魯傑角全海岸的管理權，亦須統統移歸國王支配。該法令並宣稱：凡屬國王的臣民，都可自由進行非洲貿易。這個法令的宣佈，當然是因為該公司有限制貿易建立某種不當的獨佔的嫌疑。在喬治二世第二十三年法令的那種嚴密規定之下，我們很難設想他們怎能夠這樣做。但是，我曾在下院的議事錄（這議事錄並不總是完全確實的）中看到他們受到這種控告。委員會的九位委員，既都是大商巨賈，各堡戍及殖民地的大小官員，又仰承他們的鼻息，那麼，他們在商務上及事務上有所囑託，那些官員很可能特別注意。這一來，就無形樹立了一種獨佔的場面。

對於第二個目標，該法令規定：堡戍維持費，每年由國會付與該公司一萬三千鎊。公司委員會對此金額的使用，每年須向國庫主計提出報告，國庫主計再向國會報告。但國會對於國家的歲用，往往數百萬鎊，亦漫不注意，這區區一萬三千鎊的使用，當然不會使它注意。況且，就國庫主計的職務和教育而論，堡戍費用得當與否，他不見得能悉其底蘊。不錯，王國海軍艦長或海軍部委派的將官，可以調查堡戍實情，向海軍部報告，但海軍部對該委員會似乎沒有直接管轄權，也沒有權力糾正被調查者的行動，而艦長一類人物，對於築壘這門科學，並不見得總是有高深的造詣的。這些委員如非侵吞公款，即欲加罰，頂多不過罷免官職；我們知道，委員這官職的任期，再長不過三年，而其報酬又極有限，要使罷免的顧慮成爲一種強制他們的動力，使他們經常想到那對自己並無其他利益的守戍事務，那怎能辦到呢？爲修繕幾內亞海岸卡斯爾角的堡壘，議會曾幾度支出了臨時餘額，有人控訴該委員會由英格蘭運去磚石，由這樣長途運去的磚石，據說質量很差，以致用那磚石修築的牆，有推倒再築的必要。魯傑角以北的堡戍，不但維持費出於國家，即管轄權亦直隸於行政當局之下。但該角以南的堡戍費用，至少一部分亦出自公家，而其管轄權卻別有所屬，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布羅陀及米諾卡守戍的設備，其本來目的或口實，在於保護地中海貿易。此等守備隊的維持及管理，從未責成土耳其公司，而始終由行政當局管轄。統治領域的廣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該行政當局聲威所繫，所以，這領域防禦上的必要設置，他們當然不會不問，實際上，直布羅陀及米諾卡守戍的管理，一向並未疏忽。雖米諾卡曾二度被奪，而且現在大概永無恢復希望，但人們從未把這歸咎於該行政當局管轄上的怠慢。不過，我不願被人認爲我是在暗示，這些糜費浩大的要塞，對原來所以把它們從西班牙手中奪過來的目的來說至少是必要的。奪取這些要塞，沒有什麼意義，反之，卻只使英國見棄於其自然的同盟者西班牙，並使波旁王室的兩大支流結成超過血緣關係的更緊密更永久的同盟罷了。

股份公司的設立，或經國王敕許，或由議會通過。它的性質，不但與合組公司不同，即與私人合夥公司，亦有許多點不同。

第一，在私人合夥公司中，非經全公司許可，夥員不得把股份讓渡給他人或介紹新夥員入夥。但夥員如欲退出，得預先聲明，經過一

定時間提回股本。股份公司則不然。股份公司不許股東要求取出股本，但轉賣股票，從而介紹入新股東，卻無須公司同意。股票價值，體現在市場上的價格。這價格時有漲落，因此，股票所有者的實際股金，就與股票上註明的金額，常有出入。

第二，私人合夥公司在營業上如有虧空，各夥員對其全部負債，都負責任。反之，股份公司在營業上的虧空，各股東不過就其股份範圍內，負其責任罷了。

股份公司的經營，例由董事會處理。董事會在執行任務上固不免受股東大會的支配，但股東對於公司業務多無所知，如他們沒有派別，他們大抵心滿意足地接受董事會每年或每半年分配給他們的紅利，不找董事的麻煩。這樣省事而所冒危險又只限於一定金額，無怪許多不肯把資產投於合夥公司的人，都向這方面投資。因此，股份公司吸收的資本通常超過任何合夥公司。南海公司的營業資本，在某一個時期，曾達到三千三百八十萬鎊以上。英格蘭銀行的分紅股本，現在，計達一千零七十八萬鎊。不過，在錢財的處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為他人盡力，而私人合夥公司的夥員，則純是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們監視錢財用途，象私人合夥公司夥員那樣用意周到，那是很難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樣，他們往往設想，着意小節，殊非主人的光榮，一切小的計算，因此就拋置不顧了。這樣，疏忽和浪費，常為股份公司業務經營上多少難免的弊竇。唯其如此，凡屬從事國外貿易的股份公司，總是競爭不過私人的冒險者。所以，股份公司沒有取得專營的特權，成功的固少，即使取得了專營特權，成功的亦不多見。沒有特權，他們往往經營不善，有了特權，那就不但經營不善，而且限制了這種貿易。

現在非洲公司的前身，即皇家非洲公司。該公司取得的專營特權，是根據國王頒給的特許狀，未經議會通過。因此，在民權宣佈後不久，非洲貿易就開放於全國人民。哈德遜灣公司的法律根據與皇家非洲公司同，其特許狀亦未經議會通過。南海公司在它作為貿易公司的期間，始終享有一種經議會確認過的專營特權。現令和東印度進行貿易的聯合商人公司也是如此。

非洲貿易開放後不久，皇家非洲公司自知非私人冒險者的競爭敵手，於是不顧民權宣言，竟把這些私人冒險者稱為無執照營業的私商

而加以迫害。1698年，對私人冒險者幾乎一切部門的貿易均課以百分之十的稅，稅款由公司充作堡壘及守備隊維持費。但儘管有這種重稅，公司在營業上仍不能和私人競爭。公司的資本及信用着着減退。至1712年，公司負債累累，使議會認為，為公司及債權人的安全，有必要制定以下法案，即公司債務的償付日期以及關於債務的其他必要協定，只須公司債權人（就人數言，就價值言）三分之二以上的決議，就對全體債權人有約束力。1730年，公司的業務陷於極度混亂。就連維持它的堡壘和守備隊，亦無能力。然設立這公司的唯一目的或口實，卻就是維持這些堡壘和守備隊。議會見此情形，決定每年撥款一萬鎊，作這用途。此款自那年度起一直撥至該公司解散的年度止。1732年，該公司因多年對西印度黑奴貿易都是虧損，決定從此中止，而把已經由非洲海岸買得的黑奴轉賣於美洲私人貿易者，把公司中的僱役，用以從事非洲內地的金沙、象牙、染料的貿易。但這範圍縮小的貿易，其經營並不比先前範圍廣泛的貿易更為得手。公司的業務，依然日形衰退，無論就那一點說，都達到破產的狀況。議會知無可挽救，下令把它解散。其堡壘及守戍，則責成現今在非洲貿易商人所組織的合組公司管理。在皇家非洲公司設立之前，先後組織進行非洲貿易的，已有三家股份公司，它們都沒有成功。它們都持有特許狀，該特許狀雖未經議會確認，但在當時被認為確賦有專營特權。

在上次戰爭中，哈德遜灣公司受到不小的打擊。可是在此以前，它卻遠較皇家非洲公司幸運。它的必要費用很少。它在各居留地及住所——該公司說得好聽地稱此為堡壘——所維持的人的總數，據說不過一百二十名。但人數雖少，在該公司貨船未到以前，卻足夠把裝滿貨船所必需的數量的毛皮及其他貨物收積妥當。當地海口結冰期長，船舶很少能停泊七、八週以上；因此，預先積貨，成為必要。哈德遜灣貿易不做到這層就無法經營，而私人冒險者想做到這層，非十數年莫辦。所以，該公司資本雖據說不到十一萬鎊，然已足夠使它把特許狀所許可的那雖然廣闊但卻是貧乏的地帶的全部或將近全部的貿易和剩餘生產物，都壟斷無餘。私人貿易者從來沒有企圖到那種地方與公司競爭，所以，該公司在法律上，雖不一定擁有專營特權，而在實際上，卻已享受了專營貿易的利益。加之，該公司所有的少額資本，據說，是由極少數股東集成。一個只有少數股東小額資本的股份公司，其性質實與私人合夥公司相近，從而在經營上，幾乎能和合夥公司同

樣謹慎、同樣注意。處在這樣有利的地位，哈德遜灣公司在上次戰爭前貿易相當成功，是毫無足怪的。不過，該公司獲得的利潤，似乎沒有達到多布斯所想象的那個程度。《商業上歷史和年代的推斷》著者安得生，是一個比多布斯遠為率直而公平的作者，他研究多布斯關於該公司數年中輸出輸入的全部報告，並參酌該公司所冒的大危險和所付的大開支以後，認為該公司的利潤，並不值得羨慕，或者說，並不大超過普通的貿易利潤，如果真有超過的話。他這樣的論評，是很恰當的。

南海公司從沒有維持什麼堡壘或守戍，因而完全不須負擔其他國外貿易公司所通常負擔的一大費用，不過，該公司股本額過大，股東數極多，因之，在整個業務經營上，不免失之迂愚、疏忽和浪費。至於它招股計劃的詭詐與無節制，那非現在討論的主題，而且已為人所深悉，不說了。就它的商業計劃說，與招股計劃比較，也好不了許多。該公司首次經營的貿易，就是把黑奴輸往西領西印度。它對於這項貿易（由尤特雷特條約所認可的所謂阿西思託約定的結果），取得了一種專營的特權。但是，特權雖然取得了，但這項貿易不見得會有多大的好處。在該公司以前，經營同一貿易、享有同一特權的葡萄牙及法國兩公司，早已經倒閉了。該公司有鑑於此，要求並得到准許每年派遣一定噸數的船舶，直接與西領西印度通商，以為彌補。無奈該公司所派船舶，航行十次當中，只有一次（即1731年加洛林皇后號的航行）獲了巨利，其餘九次，幾乎多少都有損失。該公司的代理店及代理人都把營業的不成功歸罪於西班牙政府的強奪與壓迫。但大部分，恐怕是由於代理店及代理人的浪費與掠奪吧。據說：他們中好幾個在一年時間內，就發了大財。1734年，該公司以營業利潤微薄為理由，請求英王許其變賣貿易權與船隻，許其等價賣給西班牙國王。

1724年，該公司開始經營捕鯨業。對於這項業務，它沒有獨佔權，不過，在它經營的期間，並無其他英國人攙入。該公司的船舶，曾航行格林蘭八次。就中，僅有一次得利，其餘均遭損失。在最後第八次航行終了時，即該公司拍賣其船隻、積藏商品、漁具時，才發現這一部門包括資本及利息的全部損失達二十三萬七千鎊以上。

1722年，該公司請求議會，把全部貸與政府的三千三百八十萬鎊巨資，劃分作兩個相等的部分；一半即一千六百九十多萬鎊，作為政

府的公債，與其他公債同，不得由董事用以償付和彌補該公司商業經營上的債務或損失，其他一半，依舊作為貿易資本，得用以償付和彌補債務或損失。它這種請願，議會認為合理採納了。1733年，該公司再向議會陳請，把貿易資本的四分之三作為公債，僅留其餘四分之一充當營業失敗的補償資本。到這時為止，該公司所保有的公債及貿易資本兩者，因政府幾度的償還，已各減少了二百萬鎊以上，因而，這所謂四分之一，就不過三百六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四鎊八先令六便士了。1748年，該公司由於亞琛條約，放棄前此依阿西恩託約定從西班牙國王取得的一切權利，而換得相當等價。這一來，該公司與西領西印度之間的貿易，就告終結。它的殘餘貿易資本，全化為公債，於是該公司再也不是一個貿易公司了。

可是，我們應注意一件事：南海公司所期望能多多獲利的唯一貿易，就是每年派遣船隻到西領西印度進行的貿易。但當它經營這種貿易時，無論在國外市場，或在國內市場，都不是沒有競爭者的。在卡塔赫納，在貝洛港，在拉維拉克魯斯，該公司碰着了西班牙商人的競爭，他們把該公司船舶裝出的同種歐洲貨物，由加的斯運往那些地方。在英國，該公司又碰着了英國商人的競爭，舉凡該公司輸入的西領西印度貨物，他們也由加的斯輸入。不錯，西班牙及英國商人的貨物，要付較重的稅，但該公司人員的疏忽、浪費和貪污，恐怕是一種更高的重稅吧。至於說，如果私人貿易者能夠公開地、正當地和股份公司競爭，股份公司還能經營國外貿易得利，那就違反我們一切的經驗了。

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根據女王伊麗莎白的特許狀設立。在它最初十二次的印度航行中，只有船舶是共有的，貿易資本還是各個人的，彷彿是以一種合組公司的形式在進行貿易。在1612年，各個人的資本才合併為共同資本。該公司持有專營特許狀。這特許狀雖未經議會確認，但當時被認為具有真正的專營特權，所以經營許多年，該公司從未受其他商人的侵擾。它的股本，每股為五十鎊，總額僅七十四萬四千鎊。這個資本不很大，而公司的營業規模也不很大，不致惹起經營上怎樣的疏忽、浪費或貪污。所以，雖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陷害，和其他的意外事變，使它蒙受了很大損失，但在許多年間，它的營業卻很成功。不過，隨着時日的推進，當一般人對於自由的原理

漸有理解時，這由女王發給而未經議會確認的特許狀，能否賦予專營特權日益成爲疑問。對於這個問題，法院的決定並不一律，隨政府權力的消長與各時代民意的變遷而時有變動。私人貿易者日益侵入公司特權範圍。到查理二世晚年，在詹姆士二世整個統治時期和在威廉三世初年，該公司都是在困難中過日子。1698年，有人向議會建議，願以年息八釐貸給政府二百萬鎊，其條件爲購買公債者得設立一個有專營特權的新東印度公司；舊東印度公司亦向議會提出同一性質的建議，願貸給政府七十萬鎊（約與該公司的資本額相等），年息四釐。當時王國的國家信用正處於這樣的狀態，即以年息四釐借入七十萬鎊，倒不如付八釐息借入二百萬鎊來得便利。新公債應募者的建議被容納了，結果，就出現了一個新東印度公司。不過，舊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權利，得繼續至1701年。同時，該公司曾以它會計的名義，極巧妙地認買了新公司股本三十一萬五千鎊。給與認購二百萬鎊公債者以東印度貿易特權的議會法案，由於用辭的含混，關於應募者的資本應否合爲共同資本一點，不很明白。於是，應募僅及七千二百鎊的少數私人貿易者，堅持各別地自用自己資本、自擔危險責任進行貿易的權利。至1701年止，舊東印度公司亦有使用其舊資本獨立經營貿易的權利。並且，在這個時期前後，該公司和其他私人貿易者一樣，也有使用其投入新公司的三十一萬五千鎊的資本單獨經營貿易的權利。新舊二公司與私人貿易者間的競爭，以及兩公司彼此間的競爭，據說幾乎使它們全歸毀滅。1730年，有人向議會提議，主張把印度貿易置於一個合組公司管轄之下，使其相當開放。這個建議，東印度公司極力反對；他們以非常激烈的辭句，陳述那時候上述競爭所演成的可悲結果。他們說，上述競爭，使印度土貨價格，高到不值採購，而在英國市場，該貨物價格，又因存貨過多，跌到無利可獲。可是，供給豐足，英國市場上印貨會大跌特跌，使一般大衆獲得廉價購物的利益，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至於說求購者多，印度市上土貨會大漲特漲，卻不盡可信。由競爭促起的非常需求，在印度的貿易大洋中，不過涓涓一滴而已。況且，需求增加，起初或許會提高價格，但終必引起價格的跌落。因爲購買的競爭，會獎勵生產，會增大生產者間的競爭。各生產者爲使自己的產品，能以比他人產品爲低的價格出售，會實行在其他情況下連想也沒去想的新的分工和新的技術改良。該公司訴說的悲慘結果，即消費的便宜和對生產的獎勵，正是政治經濟學所要促

進的結果。但是，他們垂泣而訴說的競爭，畢竟沒有繼續好久。1702年，這兩個公司通過三方協約（其中一方是女王）在某種程度上合併起來。1708年，又依據議會法案，完全合為一體，而成為今日所謂東印度貿易商人聯合公司。該法案又附一條款，規定各獨立私人貿易者，得繼續營業到1711年米迦勒節為止。同時授權該公司董事對這些獨立私人貿易者發出通知，以三年為期，收買其七千二百鎊的小資本，從而把該公司的全部資本變為共同資本。此外，該法案還規定：該公司的資本，由於對政府的新貸款得由二百萬鎊增加至三百萬鎊。1743年，該公司又貸與政府一百萬鎊，不過，這項借款非來自股東，而是由公司發行公司債得來，所以未增加股東得以要求分紅的資本。但這一百萬鎊，對公司營業上的虧損和債務，與其他三百萬鎊同，也負擔責任，所以，總算是增加了公司的貿易資本。自1708年，或者至少自1711年以來，該公司由於擺脫了一切競爭者，完全掌握英國在東印度的獨佔貿易。貿易經營很得手，股東逐年都由利潤分有適度的紅利。在1741年爆發的對法戰爭中，龐迪徹裏地方的法國總督杜不勒，別具野心，以致東印度公司捲入戰渦和印度土王的政爭中。經過無數次顯著的成功及無數次顯著的失敗後，該公司竟把那時它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馬德拉斯丟掉了。嗣後，亞琛條約成立，馬德拉斯復歸於該公司。這時，該公司派在印度的人員，似充滿了戰鬥及征服精神；後來，從未放棄這精神。在1755年爆發的法蘭西戰爭中，英國的兵力，在歐洲迭獲勝利。該公司的兵力，在印度亦交好運，捍禦馬德拉斯，佔領龐迪徹裏，收復加爾各答，並獲得一個富裕而廣大的領土的收入。這收入在當時，據說，每年有三百萬鎊以上。該公司安然享有這收入好幾年。但1767年，政府以該公司佔領的領土及其收入屬於國王的權利而提出要求，公司於是同意此後每年償付政府四十萬鎊，作為這權利的報酬。在這時以前，公司分派的紅利，已逐漸由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十。就全資本三百二十萬鎊計算，紅利已增加了十二萬八千鎊，換言之，每年紅利額，已由十九萬二千鎊增加至三十二萬鎊。但這時候，公司又企圖把紅利進一步增至百分之十二點五。這如果實行，公司每年分派給股東的金額，就要等於每年提供政府的金額，即四十萬鎊。可是，當公司與政府所訂協定就要實施的那兩年中，議會相繼制定的兩法案不許紅利再有增加。這些法案的目的，在使公司方面加速償還其所負債務。該公司當時的債務，已達六、七百萬鎊了。

1769年，公司與政府所訂協約，議定延期五年，並約定在這五年中，公司得逐漸把紅利增加至百分之十二點五，但一年之中至多隻許增加百分之一。這樣，紅利增加到極限時，亦不過使公司每年付給股東及政府的金額，兩者合計加多六十萬八千鎊。前面說過，公司最近佔領地的總收入，每年計有三百餘萬鎊。依1768年東印度貿易船克魯登敦號提出的報告，除去軍事維持費及其他費用，純收入亦達二百零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鎊。此外，公司方面據說還有其他收入，那收入一部分出自土地，而大部分則出自殖民地所設的海關，其總額亦不下四十三萬九千鎊。至於當時公司的營業利潤，據公司董事長在下院的證言，每年至少有四十萬鎊；據公司會計的證言，每年至少有五十萬鎊；不論怎樣，再少也會等於每年分給股東的最高紅利額吧。有這麼大的收入，公司應當有能力每年增付六十萬八千鎊，同時並提供一項減債基金，以備急速償還債務。然至1773年，公司債務不但未見減少，卻反形增大。未完的國賦達四十萬鎊；未繳的關稅，欠英格蘭銀行的借款，由印度方面向其開出而經其鹵莽地承兌的待付的匯票，這三者共達一百二十餘萬鎊。這些債務所引起的困難，使公司不得已一下子減低股息至百分之六，此外更乞憐政府，請其第一，豁免年納四十萬鎊的成約；第二，貸款一百四十萬鎊，以救立刻破產的危急。拓殖領地哪，增加歲入哪，該公司的財產是增大了，但財產愈大，對於公司人員，就似乎愈成為更大浪費的口實，並且愈好從中舞弊了。議會為要探知其真相，乃着手調查公司人員在印度的行動，以及公司在歐印兩方面的一般業務狀況。調查的結果，對公司管理機構的組織，國內也好，國外也好，都實行幾種極關重要的變革。在印度方面，該公司的主要殖民地，如馬德拉斯、孟買、加爾各答，以前相互獨立，今則置於同一總督統治之下，輔佐總督的，有四名顧問組成的評議會。第一任總督及顧問，通由議會指派，常駐在加爾各答。加爾各答現成為英國在印度的最重要殖民地，與以前的馬德拉斯同。加爾各答的裁判所，原為審理該市及其附近地方的商業上案件而設立，後因帝國版圖擴大，其司法管轄權亦隨之擴大。此次變革，縮小該裁判所的權限，使還其本來面目，而新設一最高法院代替它，由國王任命審判長一人及審判官三人組成。關於歐洲方面，以前股東出股五百鎊，即該公司每股的原來價格，就有權在股東會投票。現在限定，必須出股一千鎊，纔有這資格。此外，憑這資格取得的投票權，如股票非由承

繼而由自己購買得來，以前只須在購買後六個月就能行使，現在這個期限已延長至一年。還有，以前公司的二十四名董事，每年改選一次，現在也改變了，每個董事四年改選一次，但在二十四名董事中，每年有六個舊董事出去，有六個新董事進來，出去的董事，不能再選為次年的新董事。有了這些改革，料想股東會及董事會應能較鄭重地、穩健地執行任務，不再象從前那樣疏忽隨便。然而，無論怎樣變革，要使他們這般人好好注意促進印度的繁榮，哪能做到呢。他們大多數人的利益，與印度的利益，簡直漠不相關。在一切方面，他們不但不配統治一個大帝國，而且連參加這種統治也不配。有大財產的人，有時甚至小有產的人，往往只因為要取得股東大會的投票權，才購買一千鎊的東印度公司股票。有了這投票權，縱不能自己參加印度的掠奪，也可參加印度掠奪者的任命。這任命權力，固然是操於董事會，但董事會本身，多少不免要受股東勢力左右：股東不但選舉董事，而且有時否決董事會關於派駐印度人員的任命。假若一個股東能享有這權力幾年，因而可在公司方面安插若干故舊，那他慢說對股息不大注意，恐怕連對他投票權所根據的股份的價值也是滿不在乎的，至於那投票權所給與他權力來參加統治的大帝國的繁榮，他哪裏會放在心上呢。不論怎樣的君王，按照事物的本性揣度起來，對於被統治者的幸福或悲慘，對於領土的改進或荒廢，對於政府的榮譽或恥辱，總不會象這個商業公司的大部分股東這樣漠不關心吧。議會依據調查結果，制定種種新規，但這些法規與其說減少了這漠不關心的程度，倒不如說增大了這漠不關心的程度。例如，下院決議案宣稱：當公司把所欠政府債務一百四十萬鎊還清，所欠私人債務減至一百五十萬鎊時，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得對股本分派八釐股息；此外，該公司留在本國的收入及純利，當分作四部分，就中三部分交入國庫，充當國家用途，其餘一部分，則留作償還債務及供應公司不時急需的基金。但是，在全部純收入和利潤都歸自己所有，得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時候，公司還是弊竇叢生，顛預不治；今分去其四分之三的純收入和利潤，更把所保留的四分之一部分置於他人監督之下，須得他人許可方準動用，那要公司事務財政較前改進，怎能做到呢。

就公司方面說，分派八釐股息後，與其依下院決議案規定，把一切餘剩部分，交給聲氣不相投的一羣人手中，倒不如讓公司的僱用人員和隸屬人員隨便濫用了，任意侵吞了，還比較痛快。此外，公司僱

用人員和隸屬人員可能在股東會裏佔那麼大的勢力，以致股東有時竟對貪污舞弊直接違犯自己權益的人，反加援手。就大部分股東說，他們有時甚且把擁護自己權益這件事，看得較輕，把擁護侵犯這權益的人的事體，看得較重。

因此，1773年的規定，不能澄清東印度公司統治的混亂局面。有一次，公司因一時措施得當，在加爾各答金庫中，積存了三百多萬鎊。可是，儘管以後它的支配或掠奪範圍，更加擴大，伸到印度好幾個最富裕、最肥沃的地區，但它所獲的一切，都是照舊濫費了，葬送了完事。到海德·阿利侵入，公司發覺完全沒有準備，無法阻止與抵抗。由於這些混亂，今日（1784年）公司已陷於前此未有的困境。為救濟當前破產危難，又迫而向政府懇求援助。關於改善該公司業務經營，議會中各黨派提出種種計劃。這些計劃，似都同意一點，即該公司不配統治它所佔有的領地。這實是一向就非常明瞭的事實。就連該公司自身，也認為無統治能力，因而想把領地讓給政府。

在僻遠而野蠻的國境裏面擁有設置要塞和守備隊的權利，必然與當地宣戰搖和的權利分不開的。擁有前一權利的股份公司，曾不斷行使後一權利，且常常要求把後一權利明白地給與它們。它們行使這種權利怎樣不得當，怎樣隨便，怎樣殘酷，從最近的經驗，我們知道得再清楚沒有了。

一批商人自出費用，自冒危險，在野蠻異域樹立新的貿易，政府許其組成股份公司，並於經營得手時，給以若干年的獨佔權利，那是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實在說，政府要報酬這種冒險費財而且異日會造福大眾的嘗試，也只有這是最容易、最自然的方法。象這樣一種暫時的獨佔權利，和給與新機器發明者對這機器的專利權，給與新著述的著作者對該著述的出版權，可依同一原理加以辯護。不過，限定的時期既滿，獨佔是應當取消的。如果堡戍仍有維持必要，自應移歸政府，由政府償以相當代價，而當地貿易，則讓全國人民自由經營。設公司長久獨佔，其結果將無異於對全國其他人民加以不合理的負擔。這負擔有二種。第一，聽人民自由貿易，有關貨物的價格必廉，行使獨佔，這些貨物的價格必貴。第二，對大多數人民可能是便於經營、利於經營的一種事業，現在人民弄得不能染指。他們受這負擔，乃是為着最不足道的目的，即不過使某公司能維持其怠慢、浪費、乃至侵

吞公款的僱員罷了。由於這些人員的胡爲亂搞，公司分派的股息，很少超過其他自由事業的普通利潤率，且往往落在這普通利潤率以下很多。吾人就往事推斷，股份公司如未取得獨佔權利，恐怕是無法長久經營任何國外貿易的。在一個地方購入貨物，運往另一地方出售圖利，而在這兩地方都有許多競爭者，這樣就不但需要時刻留心注意需求情況的偶然變動，而且需要時刻留心注意競爭情況或需求所從滿足的供給情況的大得多、頻繁得多的變動；運用巧妙的手腕和正確的判斷力，使各色貨物的數量，都能適應需求、供給和競爭各方面的變動情況，這是伊然從事一種不斷變化着的戰爭，非不斷注意着警惕着，就無勝利希望，然而股份公司的董事先生們，我們那能期望其有這種持久力呢。所以，東印度公司，當債款既已償卻，專營特權亦取消時，議會雖制定法案，許其仍以股份公司資格，在東印度與其他商人共同競爭，但在這種情形下，私人冒險者的警惕與注意，十之八九會不旋踵間就使公司卷於從事印度的貿易。

莫雷勒修道院院長爲法國有名著作家，對經濟學很有研究。他曾列舉1600年以後，在歐洲各地設立的國外貿易股份公司，一共有五十五家；據他說這些公司都取得有專營特權，但都因管理失當，全歸失敗。他舉出的這五十五家，就中有兩三家不是股份公司，而且未遭失敗，被他弄錯了。可是還有幾個失敗了的股份公司，他沒有列出。

一個股份公司沒有取得專營特權而能經營成功的貿易，似乎只有這種性質的貿易，即所有營業活動，都可簡化爲常規，或者說，方法千篇一律，很少變化或毫無變化。這類事業，計有四種：第一，銀行業；第二，水火兵災保險業；第三，建修通航河道或運河；第四，貯引清水，以供城市。

銀行業的原理，雖不免幾分深奧，但其實際業務，卻可一一定爲成規，以資遵守。設貪圖眼前厚利，大膽投機，置成規於不顧，總是極其危險，而且往往陷銀行於無可挽救的境地。但是，以股份公司與私人合夥公司比較，前者實比後者更能遵守成規。因此，股份公司就似乎很適於銀行的營業，無怪歐洲主要銀行，都是股份公司的性質。在這些公司當中，有許多並未取得專營特權，而其經營卻非常興旺。英格蘭銀行，亦全無特權可言，有之，唯議會限定其他銀行的組成，

股東不得過六人以上。愛丁堡兩銀行全為股份公司，並無任何獨佔權利。

由火災水災乃至戰禍發生的危險，其價值雖不能很正確地計算出來，但可大概地估計出來，使得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訂出嚴密規則和一定方法。所以，沒有特權的股份公司，有可能順利地經營保險業；如倫敦保險公司，如皇家貿易保險公司，都是沒有取得何等特權的。

通航河道或運河一度修造成功了，其管理即非常簡單容易，可定出嚴密的規則與方法，甚至進行修造河道也是如此。修一里價多少，建一閘價多少，都可與承包人訂立合同規定。他如修造那引導清水供給城市的運河、水槽或大水管，也可作如此說法。這些事業由股份公司出來經營，即使未取得特權，亦可大獲其利，而實際也往往如此。

但是，設立股份公司，只因為這樣能經營成功，或者說，讓一羣特定商人享受其鄰人享受不到的權利，只因為這樣他們能夠繁榮，那是絕對不合理的。要使股份公司設立完全合理化，必其事業的經營，可以定出嚴密規則及方法，同時還附有其他兩個條件：第一，那種事業的效用，必顯然比大部分的一般商業更大和更普及。第二，其所需資本，必大幹私人合夥公司所能籌集的數額。凡以不很大資本即能舉辦的事業，縱使其效用特大，亦不能成為設立股份公司的充分理由。因為，在這場合，對於那種企業所產出的東西的需要，可很容易由私人企業者出來供給。就上述四種事業說，這兩個條件都同時具備。

銀行業管理妥當，其效用既大且周，本書第二篇已詳細說明了。但如果一家公共銀行的設立，其目的在於維持國家信用，即當國家有特別急需時，對政府墊付某一稅收全部，其數也許達數百萬鎊，而該稅收又須一兩年後才能收入，這種銀行所需資本，當不是私人合夥公司所籌集得來的。

保險業能予個人財產以很大的保障。一種損失本來會使個人趨於沒落的，但有了保險業，他這損失就可分配給許多人，叫全社會分擔起來毫不費力。不過，保險業者要想與他人以保障，他自己就必須有很大的一宗資本。倫敦西保險股份公司設立以前，據說，檢察長處有一名單，開列一百五十個私人保險業者的姓名，他們全都開業不到幾年就失敗了。

通航水道、運河以及供給城市自來水的各種必要工事，很明顯的，不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同時，其所需巨大費用，亦常非個人財力所及。

總之，股份公司的設立，必具上述三個條件，纔可算為合理。具有這三個條件的事業，我除上述四者外，再也不能想出其他的來。就說倫敦的英國制銅公司、熔鉛公司以及玻璃公司吧。言其效用，並不見得怎樣大，怎樣特別，言其費用，也並不是許多個人的財力難於舉辦。至於這些公司所經營的業務，是否能走出嚴密法則及方法，使其適於由股份公司管理，以及它們是否有它們自己所誇稱的可獲厚利的理由，那在我卻不敢佯言知道。礦山企業公司早就破產了。愛丁堡英國麻布公司的股票，近來雖沒有從前低落得那麼厲害，但較其票面價格，卻是相差太遠。我們更說其他基於愛國心即為着促進國家某特殊製造業而設立的股份公司吧；這種公司往往因為經營失當，以致減少社會總資本，而在其他各點上，同樣是利少害多。它們董事的意圖即使非常正直，但他們對某些特定製造業的不可避免的偏愛（這些製造業的當事人矇蔽他們、欺騙他們）必定會妨害其他製造業，必定會使在其他情況下必會存在的適當產業與利潤間的自然比例，多少受到破壞，而這自然比例，乃是一國一般產業的最大而最有效的獎勵。

第二項論青年教育設施的費用

由本身收入開支本身費用的事業，並不限於前述道路運河等等；對於青年教育的設施亦是如此。生徒付給教師的學金或謝禮，自然構成這一類的收入。

即使教師的報酬，不全取自這自然收入，那也不一定就要由社會的一般收入來開支；在許多國家，行政當局操這收入的徵集和運用之權。就大部分歐洲說，普通學校及專門大學的基金，並不仰給社會一般收入，就是有的話，其數目亦極其有限。教育經費到處都是主要來自地方收入，來自某項地產的租金，或來自指定專作這項用途的專款的利息。這專款或由君主自己撥給，或由私人捐助，交由保管人管理。

這些捐贈財產，曾對教育設施的促進有所貢獻麼？曾激勵教師的勤勉，增進教師的能力麼？曾改變教育的自然過程，使其轉向對個人

對社會雙方都較有用的目標麼？對於這種問題，只作大概的答覆，我想是不會怎樣困難的。

不論在哪種職業，操這職業的大部分人所作努力的大小，總是與他們不得不作這努力的必要性的的大小相稱。這種必要性，因人的境況而不同。一個人的職業報酬，如果是他所期望的財產或甚至是他的普通收入及生活資料的唯一源泉，那這必要性對他就最大。他為取得這財產或甚至為餬口，一年中必須作一定量有一定價值的工作。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麼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當然羅，在某些職業，只有成功纔可獲得偉大目標，這個情況，有時會誘使一些意志堅強雄心遠大的人去作努力。但是，最大的努力，卻明明用不着大目標來敦促。那怕是卑不足道的職業吧，競爭和比賽，亦可使勝過他人成為野心的目標。競爭和比賽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單有大目的而沒有促其實現的必要，很少足夠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在英國，精通法律，能使人到達許多極大野心的目標，但生長於富貴家庭的人，在這種職業上露其頭角的，究竟有幾個呢？

一個普通學校或專門學校如果有了一宗捐助的基金，教師勉勵的必要，就必然要減少若干。教師的生計，要是按月由一定的薪俸維持，那就明明仰給於與其教學成績和名望毫不相關的基金。

有些大學，教師的薪俸，僅佔其報酬的一部分，往往為極小的一部分，其餘大部分，則出自學生的謝禮或學費。在這場合，教師孜孜教誨的必要，雖不免減少一些，但卻不會完全消失。教學的名望還是重要的。此外，他還得關心學生對於他的敬愛、感謝及好評，而博得這種種好感，除了做得配受這些好感而無愧外，別無其他方法，就是說，除了儘自己的能力和勤勉履行各項任務外，再也沒有其他方法。

在其他大學，教師被禁止領受學生的謝禮或學費，而他的薪俸，就是他由這種職務取得的全部收入。在這場合，教師的義務與利益，立於儘可能對立的地位了。每一個人的利益，在於能過着儘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如果對於某種非常吃力的義務，無論他履行與否，其報酬完全一樣，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俗意義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去履行義務。設或這時有某種權力，不許他放棄職務，那他就會在那種權

力容許的範圍內，儘量敷衍了事。如果他生性活潑，喜歡勞動，那他與其把活動力使用在無利可圖的職務上，不如找點有利可圖的事做。

教師應當服從的權力，如掌握在法人團體即專門學校或大學的手，而他自己又為這學校或法人團體中的一員，其他成員大部分亦同為教師或可為教師者，那末這些教師們，彼此間就會寬大為懷；各個人以容許自己疏忽義務為條件，而寬宥同輩疏忽其義務。他們會把這樣做看作共同的利益。最近許多年來，牛津大學一大部分教授，簡直連表面上裝作教師，也不裝了。

如果教師們服從的權力，不掌握在他們自己所屬的法人團體之手，而掌握在外部的人物如主教、州長或閣員之手，那末，他們想全然忽略其義務，就不大做得通。不過，這些大人先生能夠強制教師盡其義務的，也只是使他們上一定時間的課，或者在一週或一年內，作一定次數的演講。至於演講的內容如何，那依然要看教師的勤勉，而教師的勤勉，又視其所以要努力的動機的強弱為轉移。況且，這種外部來的監督，動輒流於無知和反覆無常，其性質往往是任意的、專斷的。行使監督的人，既未親自登堂聽講，又不一定理解教師所教的學科，求其能精明地行使這監督，那是很難得的。加之，這種職務所產生的傲慢，往往使他們不留意怎樣行使其職權，使他們沒有正當理由地、任性地譴責教師，或開除教師。這一來，必然要減低教師的品格，教師原來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現在卻成為最卑賤、最可輕侮的人了。為要避免這隨時可以發作的不好待遇，他就非仰仗有力的保護不為功，而獲得這保護的最妥方法，並不是執行職務能力或勤勉，而是曲承監督者意志的阿諛，不論何時，準備為這種意志而犧牲他所在團體的權利、利益及名譽。誰要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注意法國大學的管理，定可看到，象這種專橫的外加的監督，自然會生出什麼結果。

如果有什麼事情，要一定人數的學生進入某專門學校或大學，而不論教師的學問如何、名望如何，那末，教師學問好名望高的必要，就不免因此而減少一些。

藝術、法律、醫學、神學各科畢業生的特權，如果只要在某些大學住滿一定年限就能獲得，那必然要使一定數量學生，去住這些大學，不管教師學問如何、名望如何。畢業生的特權，也算是一種徒弟

制度。正如其他徒弟制度有助於技術上及製造上的改良，這種徒弟制度，同樣有助於教育上的改良。

研究費、獎學金、貧學津貼那一類的慈善基金，必然會使一定數量學生，貿然到某些大學學習，而不問其名譽如何。仰賴這慈善基金的學生，如能自由選擇其最喜歡的大學，這種自由，說不定會惹起各大學間一定程度的競爭。反之，如果規定連各大學自費生，不得本學校許可，也禁止轉入他校，那麼，各學校間的競爭，就十之八九要消滅了。

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象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象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於職守，荒誤學生。

如果教師是一個有理性的人，當他自己意識到，他向學生講的，都是一些無意義或近似無意義的話，他一定會感到不快。此外，當他看到學生大部分對於他的授課，不來聽講，或來聽講而明顯地表示輕蔑、嘲弄態度，他也一定會感到不快。因此，如果他必須作一定次數的演講，縱無其他利益，他亦必爲了這些心理，而苦苦耐耐地求其相當完善。不過，他可能採用幾種取巧的辦法，這些辦法會有力地削弱這一切激勵勤勉的動機。他有時可對所教的學科，不自加說明，而把關於那種學科的書籍拿來講讀；如果那種書籍是用死的外國語寫成的，他就用本國語向學生譯述；而更不費力的方法，就是叫學生解釋，自己聽着，間或加插幾句話進去，這樣，便可自吹地說他是在講授了。這種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極有限的知識和勤勉就夠了，既不致當面遭到輕蔑或嘲弄，也可避免講出真正迂愚、無意義乃至可笑的話。同時，還有學校的規則，可使教師強制學生全部規規矩矩地經常到黨，並在他講授的全部時間中，維持一種最有禮貌的、最虔敬的態度。

專門學校及大學的校規，大體上不是爲了學生的利益，而是爲了教師的利益，更恰當地說是爲教師的安逸而設計出來的。在一切場

合，校規的目的，總在維持教師的權威。不論教師是疏忽其職務，或是履行其職務，學生總得對教師保持虔敬的態度，好家教師在履行職務上已盡了最大的勤勉和能力那樣。這似乎是根據這一前提，即教師有完全的智慧 and 德行，而學生則是大愚，而且有最大的弱點。但教師果真履行了他們的職務，大多數學生是決不會疏忽他們自己的義務的，我相信從來沒發生過和這相反的事例。講授果真值得學生到堂傾聽，無論何時舉行，學生自會上堂，用不着校規強制。對於小兒，對於極年輕的孩童，為要使他們獲得這幼年時代必須取得的教育，在某種程度確有強制干涉之必要。但學生一到了十二、三歲以後，只要教師履行其職務，無論那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強制干涉。大多數青年人都是非常寬大的。只要教師表示自己要竭力使他們得點益處，那就慢說疏忽輕蔑教師的教導，就連教師在履行職務上有很多的過誤，他們也會原諒的。有時，他們甚至會當着大眾隱蔽教師很多的怠慢。

未有公立機構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這是值得注意的。青年進擊劍學校或舞蹈學校，固然未必都學得很精，但沒有不學會如何舞劍、如何跳舞。馬術學校的好結果，通常沒有如此顯著，這就因為馬術學校費用浩繁，在大多數地方都是由公家辦理的。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誦讀、書寫和算術。迄今學習這三者，進私立學校的還比進公立學校的普遍。但學習者卻都能夠學得所必要學得的程度，學習失敗了的，幾乎沒有一個。

就英國說，公共學校固不免腐敗，但和大學相比，卻要好多了。在公共學校，青年學到或至少可能學到希臘語和拉丁語。即是說，教師所聲明要教的功課或教師應該教的功課，實際都會教給青年。但在大學，青年既沒學到這些法人團體所應該教給他們的科學，亦找不到學習這些科學的適當手段。公共學校教師的報酬，在許多場合，有一大部分，而在某種特殊場合，幾乎全部都是出自學生的謝禮或學費。這種學校是沒有何等排他特權的。一個人要取得畢業學位，並無須繳納在公共學校學過一定年限的證書。如果在考試時候，他顯出已經瞭解公共學校所教的東西，那就不問他是在什麼學校學這東西。

我們可以說，普通歸大學教授的那部分功課，都沒有教得很好。但是沒有這些大學，這部分的功課恐怕就完全教不成，而就個人說，

就社會說，又不免要痛感到教育上缺乏了這個重要的部分。

現在歐洲各大學，一大部分原是為教育僧侶而設立的宗教區體，創辦者為羅馬教皇。在創建之初，學校中所有的教師和學生，都完全置於教皇直接保護之下，而擁有當時所謂僧侶特權。有了這特權，他們就只服從宗教法庭，而不受大學所在國民事法庭的約束。在這種學校裏面所教的，當然要適合於其設立的目的，所以一大部分課程，如不是神學，就是單為學習神學而預備的學問。

當基督教初由法律認為國教時，轉訛的拉丁語，簡直成了西歐全部的普通語。因此，教堂中舉行禮拜，教堂中誦讀的聖經譯文，全用這轉訛的拉丁語，也就是說，用教堂所在國的普通語。自顛覆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侵入後，拉丁語逐漸在歐洲各地不大通行。但是，最初導人宗教形式和儀節並使其合理化的環境，雖早經改變，而人民的虔敬，卻自然把這些既定的宗教形式和儀節保存下來。因此，拉丁語雖然在各地沒有多少人瞭解，教會舉行禮拜，卻依舊使用這種語言。於是，有如在古代埃及一樣，在歐洲，行使着兩種不同的語言，即僧侶的語言和人民的語言，神聖者的語言和凡俗人的語言，有學問者的語言和無學問者的語言。僧侶在執行祭務當中，既必須知道幾分這神聖的、有學問的語言，所以拉丁語自始就成了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

至幹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所謂絕無錯誤的教會佈告，曾宣稱以拉丁語譯成的聖經，即普通稱為拉丁語聖經，與希臘語及希伯來語的原書，同為神的靈感所口授，因而，有同等的權威。這一來，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知識，對於僧侶就非必不可少的了。於是，這兩種語言的研究，很久未成為大學普通課程的必要部分。我敢斷定：西班牙的若干大學，從未把研究希臘語，作為普通課程。最初的宗教改革者們，發現新約全書的希臘語原書，甚至舊約全書的希伯來語原書，比拉丁語聖經對他們的主張更有利。不難設想，拉丁語的聖經譯文，已逐漸形成了適合於支持天主教教會的東西。於是，他們開始暴露拉丁譯文的許多謬誤，而羅馬天主教的僧侶們，則迫而出來辯護或說明。但是，辯護也好，說明也好，對幹希臘和希伯來語沒有若干知識，一定行不通，所以關於這兩者的研究，逐漸被擁護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對宗教改革教理的多數大學列入學校課程中了。

希臘語的研究，與各種古典的研究是有密切關係的。搞古典研究的，雖然最初主要只是天主教教徒及意大利人，但到宗教着手改革教理的那個時候，這就成為時尚了。因此，在多數大學中，在修哲學前，要先修希臘語，學生學習了若干拉丁語後就讀希臘語。至於希伯來語，則因與古典研究無何等關係，除聖經外，再也沒有一部用希伯來文寫成的有價值的書籍。所以，這種文字的研究，總是在哲學研究了之後，當學生進行研究神學時纔開始教授。

最初，各大學的課程中，只要求有希臘語拉丁語初步知識。直到現在，有的大學還是如此。另外一些大學則認為，學生對這兩種語言，至少兩者之一，該有初步知識，所期在於繼續研究。關於這進一步的研究，目下已成了各地大學教育中極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希臘哲學，分有三個部門，即物理學或自然哲學、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及倫理學。這樣的區分，似乎完全合理。

自然的偉大現象，天體的運行，日蝕月蝕，彗星，雷電及其他異常的天文現象；植物動物的發生、生活、成長及死滅等等，必然會刺激人類的驚異心，所以自然會喚起人類的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究其原因。最初，迷信企圖把這一切驚異的現象，歸因於神的直接動作，藉以滿足這種好奇心。往後，哲學努力根據比神的動作更為習見、更為人類所易知的原因去說明它們。這些偉大現象，因為它是人類好奇心的最初對象，所以說明此偉大現象的科學，自然在哲學中成為最初開拓的部門。歷史上留有若干記錄的最早哲學家，似乎就是一些自然哲學家。

不論在哪個時代和哪個國家，人們總會相互注意性格、意向及行動，總會共同同意，規定並確認關於人們生活行動的許多高尚規則及準則。到了寫作流行，許多聰明人或自作聰明的人，就自然要努力來增加這些既經確立和受人敬重的準則並表示他們自己對於某種行為為正當、某種行為為不正當的意見。他們的做法，有時是採用比較虛假的寓言形式，如所謂《伊索寓言》；有時又採用比較單純的箴言形式，如《所羅門金言》，提西奧尼斯及弗西里迪斯的詩，以及希西奧德某一部分作品等。他們在一個長期內，一味是這樣增加智慧及道德的準則，而從未企圖接一種極明確、很有組織的次序，把它們整理起來。至於使用一個或幾個可從而推斷它們的原則，有如從自然的原因

推斷其結果那樣，把它們聯結綜合起來，那就更談不到。把各種不同的觀察，用若干普通原則聯結起來，成爲一個有系統的整列，這種優異的做法，最初出現在自然哲學方面的若干古代簡淺論文中。往後，與此相類似的事情，亦漸在道德方面出現。日常生活的各準則，象在自然現象的研究一樣，也按某種有組織的次序整理起來了，並且也用少數共同原理聯結綜合起來了。研究並說明這些起聯結作用的原則的科學，稱爲道德哲學。

各不同作家，給予自然哲學及道德哲學以各種不同的體系。但是支持他們那些體系的議論，往往全無根據，至多不過是極其無力的蓋然論罷了。有時，他們的議論，不過是詭辯，除不正確的、曖昧的日常說法外，沒有其他根據。不論在何時代，思辨體系的採用，都只是關幹瑣細得不能對有常識的人的意見起決定性作用的推論，也就是關於沒有什麼金錢上利害的事情。詭辯對於人類意見，除關於哲學及思辨方面的事件外，幾乎沒有何等影響，可是對哲學及思辨方面的意見，它的影響往往最大。各自然哲學體系及道德哲學體系的擁護者，自然要努力暴露異己者議論上的弱點。在他們相互討論異己者的議論當中，必然會想到蓋然的議論和論證的議論的差異，似是而非的議論和決定性的議論的差異；由這精審嚴核引起的種種觀察，必然會產生一種科學，討論正確的和錯誤的推論的一般原理，這科學就是論理學。就其起源說，論理學是較遲於物理學及倫理學的，但在古代大部分——雖非全部——哲學學校中，倫理學通常總是先於其他二者的教授。那時候似有這種想法，要使學生在物理倫理這種非常重要的主題上從事推論，當然不能不預先教他們如何理解正確推論和謬誤推論的差異。

古代哲學分作三部分，而在歐洲大部分大學中則改變過來，分作五部分。

在古代哲學中，幾關於人類精神或神的性質的教示，通通是物理學體系的一部分。至幹這精神或神的本質，不論由什麼構成，都是屬於宇宙大體系的部分，也就是能產生許多最重要的結果的部分。人類理智關幹這兩部分所能論斷、所能推測出來的一切，似乎成爲說明宇宙大體系如何起源、如何運行的科學的兩章——無疑是極關重要的兩章。但在歐洲各大學中，哲學只作爲神學的附屬部分教授，所以對於

這兩章，自然要比哲學的其他部分教得詳細些。這兩章逐漸地大大擴充起來，更細分為許多的章節，結果，在哲學體系中，為我們得知極少的精神學說，就與我們得知極多的物體學說佔有同樣長的篇幅。於是，這兩個學說，被視為判然各別的兩種科學。所謂形而上學或精神學，因此被放在與物理學相對立的地位，它在這兩種科學之中，不但被看作比較崇高的科學，而且就某一特定職業說，被看作比較有用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恰合於實驗及觀察的主題，也就是在那上面小心注意便可引出極多有用的發現的主題，幾乎全沒有人留意了。反之，與這正相對立的主題，即除少許極其簡單及幾乎是一見就明白的真理外，任憑怎麼注意也只能發現曖昧的、不確定的東西，而因此只能產出狡智和詭辯的那種主題，卻大被人研究着。

當上述兩種科學這樣被放在相對立的地位時，兩者間的比較和對照，自然會生出第三種科學，即所謂本體學，或討論其他二種科學的主題的共同特質及屬性的科學。但是，假若各學派的形而上學或精神學，有大部分是狡智與詭辯，那本體學這種無聊的科學——有時亦稱為形而上學——就全部是狡智與詭辯。

不僅被視為個人，而且視為一個家族、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的一員的人，其幸福與至善何在？古代道德哲學的目的，就是企圖研究這個。在古代道德哲學，人生的各種義務，都被視為是為了人生的幸福與至善。但是，當教授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單是為了神學的時候、人生的各義務，卻被視為主要是為了來生的幸福。在古代哲學，德行的盡善盡美，被認為必然會使有這德行的人今生享到最完全的幸福。而近代哲學的觀點，卻認為盡善盡美的德行，往往或幾乎總是與今生幸福有矛盾。天國只有由懺悔、禁慾或者修道惜的苦行和自卑纔可跨進；一個人單憑慷慨、寬大、活潑的行動，是不能進入天國的。良心學及禁慾道德，簡直佔了各學校道德哲學的大部分，而哲學一切部門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這樣成了其中最被曲解的部分了。

因此，歐洲有一大部分大學的哲學教育，就是依着以下程序：第一，教論理學；第二，教本體學；第三，教那討論人類靈魂和神的性質的精神學，第四，教一種變質的道德哲學，即被認為與精神學說、人類靈魂不滅學說以及由神的裁判而在來生予以賞罰的學說直接發生關聯的學問；最後，通常教以簡單粗淺的物理學，以結束全部課程。

歐洲各大學對古代哲學課程內容所作的修改，通通是以僧侶教育為目的，使哲學成為神學研究的比較適當的入門。但其所增添的狡智與詭辯，以及由這修改而導入的良心學與禁慾道德，無疑沒使哲學更適宜於紳士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者說，對於他們悟性的發達或感情的改善，並不見得更有作用。

在今日歐洲一大部分大學中，這種哲學課程，依然由教師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教授着，看各大學的組織使教師在這方面勤勉的必要性的以大小為定。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贈基金的大學，導師們往往以教授這變質的課程的零篇斷片為滿足，而且，即對這零篇斷片，一般還是教得非常馬虎膚淺。

近代關於哲學若干部門的改善，雖無疑有若干部分已在大學中實行，但還有一大部分未在大學中實行。大多數大學雖然作了這些改善，然不肯趕快地加以採用。那些被推翻的體系和陳腐的偏見，雖然已經為世界各地所不容，而若干這些學術團體，仍在一段很長時間中，願意充當它們的避難所；它們隱藏在那裏，並得到保護。大概最富裕、有最多捐贈基金的大學，採用這些改善最遲，也最不願意對行之已久的教育計劃，作任何顯著的變動。比較貧困的大學，教師們衣食的大部分都依存於自己的名聲，他們不得不更加注意世界時代的思潮，因此，在這些大學中，改善的採行，顯得比較容易。

但是，歐洲公共學校及大學，雖然其設立原是僅為某種特定職業而實施的教育，即僧侶職業的教育，雖然它們對於這種職業認為必要的科學，也並沒有十分用心地教授學生；但它們卻逐漸把幾乎一切人民的教育，特別是納土及有錢人家子女的教育，吸引到它們這邊來。在人的幼年時期及認真地着手事務，即在其餘生中經營事務那個時期之間，介有一個很長期間。這期間的有利的消費，在當時似乎沒有比進大學還好的方法。然而各公共學校各大學所教授的大部分東西，對於學生後來經營的事務，卻並不是最適當的準備。

在英國，青年人剛在學校畢業，不把他送入大學，卻把他送往外國遊學，這件事已經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風尚。據說，青年人遊學歸來，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進。一個由十七、八歲出國至二十一歲歸來的青年人，歸國時比出國時大三、四歲，在這年齡，在三、四年之中，智能要是沒有很大的發展，那纔是怪事。他在遊學中，一般獲得

一兩種外國語知識。不過這種知識，很少足夠使他說得流利，寫得通順。另一方面，他回國之後，一般變驕傲了，更隨便，更放蕩，更不能專心用功、勤奮作事。如果他不到外國，留在家中，在這短期之中，絕不會變得如此。這樣年青時的漫遊，遠離兩親及親戚的督責、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寶貴的韶光消磨於極放蕩無聊的生活，以前的教育在他內心形成的一切有用習慣，必然不但不能堅固確立，卻反減弱了，或全行消失了。象這樣全無意義的早期漫遊的習尚，所以流行，不外乎社會對於各大學的不信任，而無其他原因。爲人父親者，不忍見到他的兒子在自己面前，無所事事地、漫不經意地墮落下去，所以不得已，暫時把他們送往外國。

近代教育上若干設施的結果，就正是這樣。

在其他時代及國家間，似乎實行有各種各樣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設施。

就古代希臘各共和國說吧，當時各自由市民，通在國家官吏指導之下，學習體操及音樂。體操的用意，在於強健肉體，尖銳勇氣，並養成堪耐戰時疲勞和危險的能力。據一切記錄，希臘的民兵，是世界過去最良民兵之一；所以，這一部分公家教育，無疑完全達到了它要企圖達到的目的。至於其他一部分教育，即音樂教育，其用意是什麼，至少據那些對這種設施留有記述給我們的哲學家及歷史學家的意見，乃在幹使人通人情，使人的性情柔和，並使人有履行社會生活及個人生活上一切社會義務、道德義務的傾向。

古代羅馬有稱爲演武場的體操教練，那與希臘稱爲體育館的體操教練，具有同一目的，並且也似同樣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羅馬人間，沒有與希臘的音樂教育相類似的東西，可是，羅馬人的道德，無論在個人生活上，或在社會生活上，都不比希臘人差，而就整個說，且遠較希臘人爲優。羅馬人在個人生活上優於希臘人的地方，曾由最通曉兩國國情的著者坡裏比阿及哈里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兩人予以證明。至於羅馬人社會道德的優越，則可由希臘及羅馬全史內容得到實證。黨派間的爭執，不發脾氣，不走極端，這是自由民族社會道德上最關重要的事情。希臘人各黨派，動不動就流爲橫暴，表演流血慘劇。反之，在羅馬人，他們至格拉奇時代爲止，卻從未因黨爭而掀起流血事故。格拉奇時代以後，則羅馬共和國實際上已算解體了。這

樣，不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坡裏比阿具有怎樣值得尊重的權威，也不論孟德斯鳩支持此權威有怎樣聰明的理由，似乎希臘人的音樂教育，對改善道德並未著成效。羅馬人沒有音樂教育，其道德總的來說且比希臘人爲優。往時這些哲人對於其祖先所定製度的尊敬，說不定曾導使他們只從古代習俗中尋找政治的智慧，這習俗是由他們的太古社會一直繼續流傳下來，未曾中斷地傳到社會有顯著文化的時期。音樂及舞蹈二者，是幾乎一切野蠻民族的大娛樂，同時也是使他們各人適於款待友伴的大藝能。在今日非洲海岸的黑人間是如此，在古代居爾特人及斯堪的納維亞人間是如此，而據荷馬所說，在特洛伊戰爭以前的古代希臘人間亦是如此。當希臘各民族組織各小共和國的時候，此等藝能的研究，在一個長時期成爲當時人民公共教育、普通教育之一部分，那是很自然的。

以音樂體操教授學生的教師們，在羅馬，甚至在那法律、習俗爲我們熟知的希臘共和國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國家供給薪俸，不是由國家任命。爲戰時捍衛國家計，國家要求各自由市民受軍事訓練。但進行軍訓的教師，則讓市民自己去尋求，國家除了備置一公共廣場，作爲市民教練操演的運動場所外，再也沒有爲此目的做一點什麼。

在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初期，除上述種種科目外，教育上其他科目，就是讀、寫及當時的算術。對於這些技能，富人往往在家庭內請家庭教師教授。而貧窮市民，一般到以教讀爲職業的教師所設的學校去學習，這些人大抵爲奴隸，或由奴隸解放了的自由人。但是，不論在家庭學習，或往學校學習，教育的這一部分，都是由各個人的父母或保護者處置，國家不曾加以何等監督或指導。據索倫所制定的法律，爲親者如忽視其義務，不使子女習得有用的職業，則子女亦得免除其爲親養老的義務。

當文化進步，哲學修辭學成爲流行科學的時候，社會上比較上流的人物，常爲了學習這流行學術，而把子弟送往哲學家及修辭學家所設的學校。可是，對於這等學校，國家沒給予支持，在一個長期內，國家只予以默認而已。很久很久，哲學及修辭學的需要是這麼小，最初以此兩者之一爲專業的教師們，竟不能在任何一都市，找到恆久的工作，而不得不由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地方。埃利亞的曾諾、普羅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以及其他許多學者，都過着這種生活。後

來需要增加，教授哲學及修辭學的學校，就由流動的變為固定的。雅典首開其端，接着其他若干城市，亦有同類學校的設立。可是，國家對於這種學校，除了有的撥給一特定場所作為校址外，再也不作進一步的獎勵。這些學校的校址，有時也有是私人捐贈的。柏拉圖的學園，亞里士多德的講學地，斯多噶學派創建者基齊昂的芝諾的學府，似乎都是國家所賜與。但伊壁鳩魯的學校，則由他自己的花園改作。至馬卡斯·安託尼阿斯時代為止，無論何等教師，都不曾從國家領得薪俸，或者說，教師除由學生奉送的謝禮或酬金以外，再無其他任何報酬。魯西安告訴我們：這個嗜好哲學的皇帝，曾以獎勵金給與一位哲學講師，但這種獎勵金似乎在他死後就停發了。畢業於這等學校，並沒有什麼特權；想從事某項特定職業或事業，亦沒有在這些學校修學的必要。對於這些學校效用的輿論，如不能吸引學生前來，那學生就不會來了，因為法律既不強制任何人進這等學校，也不給進了這等學校的人什麼好處。學校的教師對於學生是沒有管轄權的。教師除了憑其優越德行、優越才能所能博得對學生的自然權威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權威可言。

在羅馬，關於民法的研究，沒成為大部分市民的教育的一部分，而只為少數特定家族的教育的一部分。想求得法律知識的青年，並無一個可入的公家學校；他們除了時常與瞭解法律的親戚故舊過從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研究手段。值得指出，十二銅表的法律，有許多雖然是由古代某希臘共和國的法律抄來的，但法律並不曾在希臘的任何一個共和國發展成為一種科學。在羅馬，法律老早就成為一種科學了。凡具有通曉法律名聲的市民，都會博得顯著的榮譽。在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特別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許多的無秩序的人民團體組成的。他們所作的判決，幾乎常是胡亂的，常是決定於一時的宗派意見或黨派精神的。可是，他們不正當裁判的壞名譽，既由五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五百人（希臘有的法院，包括有這麼多的人數）分擔，落到任何一個人身上的，就不見得怎麼厲害。反之，羅馬就不是如此。羅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個裁判官或少數裁判官構成，判決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別是在公審的場合，就要大受損害。所以，遇到有疑問的案件，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難，自然常常力圖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護符。羅馬法就因為這樣對於慣例或判例的留意，而成為這樣有規則、有組織的體

系流傳至今日。其實，任何他國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樣的留意，都產生了同樣的結果。就性格說，羅馬人是比希臘人優越的，坡裏比阿及哈里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斯，曾極力主張此說。但是羅馬人所以有這優越，與其說是由於這兩位著者提出的種種情況，倒不如說是由於這較好的法院制度。據說，羅馬人特別著名的，是他們對於誓約的尊重；當然哪，慣在辦事勤奮、消息靈通的法院前發誓的人，比那慣在無紀律的無秩序的集會前發誓的人，定會更尊重自己的誓言。

與現代任何國民比較，希臘人羅馬人關於行政上及軍事上的能力，至少，總該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的。我們的偏見，也許把他們那種能力估價過高。但是，除了關於軍事的訓練，國家對於這能力的形成，似乎不會盡什麼力量，因為我怎麼也不相信希臘音樂教育，對於這才能的形成有什麼重大的影響。不過，它們比較上流的人民，如要學習當時社會情況視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術及科學，並不難找到教師。對於這種教育的需要，促成了它總必促成的東西的產生，就是說，促成了滿足此需要的才能的產生。此外，無拘束的競爭所激起的競爭心，更使此才能達到極高的完善程度。古代哲學家似乎比近代的教師更能夠誘發聽講者的注意，控制聽講者的意見和心機，並對聽講者的行動、言論，予以一定的格調和風格。近代公家教師所處的環境，使他們多少不必關心自己在特定業務上是否有名望，是否已成功。他們的勤勉，便不免多少因此受到阻害。加之，他們所得的薪俸，把那些想與他們競爭的私人教師，放在如下所說的那種境地，即好比一個未得到任何獎勵金的商人，想與那得到了很多獎勵金的商人競爭。假使前者以將近同一價格出賣其貨物，他就不能得到同一的利潤，縱不破產沒落，至少，貧窮乞丐的命運是避免不了的。假使他把貨物過於高價出售，顧客就必極其有限，因而，他的境遇也不會改善好多。況且，在許多國家中畢業的特權，對於多數從事有學問的職業的人，對於大多數需要這種學問的教育的人非要不可，至少有了這特權，就非常便利。但是，這特權的獲得，又只有去聽公家教師的講授。私人教師雖最有教授能力，學生雖然最小心地聽他們的講授，但不能由此取得可憑以要求這特權的資格。由於這種種原因，講授大學普通課程的私人教師，在近代一般人看來，是學者中最卑不足道的。具有本領的人要找職業，這要算最可鄙最無利益的職業了。這樣，普

通學校及專門大學的捐贈基金，不但使公家教師的勤勉精神墮落了，並且使優良的私人教師也不容易找到。

假使公家的教育機構全然沒有，那末，沒有相當需要的體系或科學，或者說，按當時情形為非必要的、非有用的或非流行的體系或科學，便全然不會有人教授。一種以前認為有用但已經被推翻或流為陳腐的科學體系，或一種大家都信其為無用，為買弄學問，為胡說的科學，私人教師一定不會從教授它得到好處。象這種體系，這種科學，只能存續於教育機構這種法人團體。在那裏，教師的繁榮與收入，大部分與其名聲無關，且全然與其勤勉無關。如果全然沒有公家教育機構，一個紳士奮其勤勉能力，受了當時所提供的最完全的教育之後，那他與世人談論普通問題，我敢斷言決不會一無所知的。

對於女子教育的公家機構，是全然沒有的，因此，女子教育的普通課程中，便全沒有無用的、不合理的或者幻想的東西。女子所學的，都是她的雙親或保護者判定她必需學習，或者學了對她有用的課程，而別無其他東西。她所學的一切，無不明顯地具有一定的有用目的：增進她肉體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內心的謹慎、謙遜、貞潔及節儉等美德；教以婦道，使她將來不愧為家庭主婦等等。女子在她的整個生涯中，會感到她所受教育的各部分，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對她有某種方便或利益。若在男子則不然，他們所受的儘管是極辛苦極麻煩的教育，可是一生由這種教育得到了何等方便或利益的人卻不多見。

因此，我們可以反問：國家對於人民的教育，不應加以注意麼？如果有注意的必要，那末，對各等級人民，國家所應注意的，是教育的哪些部分呢？而且，它應該怎樣注意呢？

在某種場合，政府儘管不注意，社會的狀態，必然會把大多數人安排於一種境地，使他們自然養成那為當時環境所需要、所容許的幾乎一切的能力和德行。在其他場合，因為社會狀態，不能把大多數人安排在那種境地，所以為防止這些人民幾乎完全墮落或退化起見，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

分工進步，依勞動為生者的大部分職業，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就侷限於少數極單純的操作，往往單純到只有一兩種操作。可是人類大部分智力的養成，必由於其日常職業。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於少數單純的操作，而且這些操作所產生的影響，又是相同的或

極其相同的，那末，他就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或運用他的發明才能來尋找解除困難的方法，因為他永遠不會碰到困難。這一來，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他精神上這種無感覺的狀態，不但使他不能領會或參加一切合理的談話，而且使他不能懷抱一切寬宏的、高尚的、溫順的情感。其結果，對於許多私人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義務，他也沒有能力來作適當的判斷。至於國家的重大和廣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認不了的。除非費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戰時如何捍衛國家，否則無法做到。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質，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氣消毀了，使他看不慣兵士們的不規則、不確定和冒險的生活。就是他肉體上的活動力，也因這種單調生活毀壞了，除了他既經習慣了的職業外，對於無論什麼職業，他都不能活潑地、堅定地去進行。這樣看來，他對自身特定職業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練，可以說是由犧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際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獲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會，政府如不費點力量加以防止，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民，就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

在普通所謂野蠻社會，即獵人社會，牧人社會，甚至在製造業未發達及國外貿易未擴大的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夫社會，情形就不是這樣。在這些社會中，各人工作的多式多樣，使他不得不備其能力，不得不隨時想些方法，去對付不斷髮生的困難，發明定會層見迭出，人的心力也不會陷於呆滯無作用的狀態，象文明社會幾乎全體下級人民的智力都無作用的狀態那樣。我們在前面說過：這所謂野蠻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一個戰士，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政治家。關於社會的利益，關於他們統治者的行動，他們都能作相當的正確判斷。酋長在平時是怎樣的裁判官，在戰時是怎樣的指揮者，幾乎各個人都是明白的。不過，有一點，在未開化社會，沒有人能獲得在文明狀態下有些人所具有的大巧大智。在未開化社會，各個人的職業，雖非常多樣，但社會全體的職業，卻並沒有好多樣。每個人幾乎都在做或能夠做人人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每個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但沒有一個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不過，以他們所具有的那種程度，去對付社會的全部單純業務，大概是夠了的。反之，在文明社會，雖然大部分個人的職業，幾乎沒有何等變化，但社會全體的職業，則種類多至不可勝數。這各種各樣的職業，對於那些自己未從事何等特定職業，有閒暇有意志去研討他人職

業的人，可以說提供無限的研究對象。象這樣又多又雜的對象的觀察，必然會迫使觀察者不斷運用心思，比較看、組合着，從而使他的智能，變得異常敏銳，異常廣泛。可是，他們這少數人如不碰巧佔據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們這大能力，縱然對自身是一種光榮，對社會的善政和幸福，卻可能沒有多少貢獻。儘管這少數人有大能力，但人類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數人民間，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分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有身分有財產的人，他們大概都是到十八、九歲以後，才從事他們想從而揚名的特定事業、職業或藝業。在此以前，他們是有充分時間，來取得那能使他們博得世人尊敬或值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識；至少，他們有充分時間來準備自己，使他們在日後能獲得這一切知識。他們的雙親或保護者，大概都十分切望他們能有這樣智能，在大多數場合，對於必需費用的支出，是毫不躊躇的。如果他們不總是受到適當的教育，那由於費用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於費用的不當；由於教師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於教師馬虎與無能，或由於在當前情況下不易找到或無從找到更好的教師。此外，有身分有財產者消磨其大部分生涯的職業，並不象普通人民的職業那樣單純，那樣不變。他們的職業，幾乎全都是極其複雜的；用手的時候少，用腦的時候多。從事這種職業者的理解力，是不大會因為不用腦力而流於遲鈍的。況且，他們這種人所從事的職業，又不大會使他們終日忙碌，他們大多有很多空閒時間，來對他們在早年已打有相當基礎、或已養成多少嗜好的各種有用的或作為裝飾用的知識作進一步的鑽研，從而完全掌握。

普通人民，則與此兩樣。他們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時間。就是在幼年期間，他們的雙親，也幾乎無力維持他們。所以一到他們能夠工作，馬上就須就職謀生。他們所就的職業，大概都很單純，沒有什麼變化，無須運用多少的智力。同時，他們的勞動，又是那樣沒有間斷，那樣鬆懈不得，他們哪有閒暇做旁的事情，想旁的事情呢？

不過，無論在哪種文明社會，普通人民雖不能受到有身分有財產者那樣好的教育，但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如誦讀、書寫及算術，他們卻是能夠在早年習得的；就是說，在這個期間，就是預備從事最低賤職業的人，亦大部分有時間在從事職業以前，習得這幾門功課。因

此，國家只要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夠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強制全體人民使獲得這最基本的教育。

國家可在各教區各地方，設立教育兒童的小學校，取費之廉，務使一個普通勞動者也能負擔得起，這樣，人民就容易獲得那基本教育了。這種學校教師的報酬，不可全由國家負擔，國家只宜擔負其一部分；因為全部甚或大部分由國家負擔了，教師馬上便會習於怠惰。在蘇格蘭，這種教區學校的設立，幾乎叫全體人民都會誦讀，使一大部分人民都會寫算。在英格蘭，慈善學校的設立，亦曾收得同一的效果。不過，因為沒有設立得象蘇格蘭教區學校那麼普遍，所以其效果亦沒有那麼普遍。假使這些小學校所教的兒童讀物，比現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義一點；假使普通人民的兒童有時在學校學習的但於他們全無用處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語取消不教，而代以幾何學及機械學的初步知識，那末，這一階級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許就會達到所可能達到的最完善程度。沒有一種普通職業，不提洪應用幾何學及機械學的原理的機會，從而，沒有一種普通職業，不逐漸使普通人民能瞭解這些原理——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學的必要入門。

普通人民的兒童中，有些在學業上較為優良。國家對於這種兒童，設能給以小獎賞或小榮譽獎章，必能獎勵這最基本部分教育的獲得。

國家如果規定，在取得加入某種同業組合權利以前，或在有資格在自治村落或自治都市中經營某種職業以前，一切人都得受國家的考試或檢定，那末，國家就幾乎能強制全體人民必須求得這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希臘羅馬各共和國，維持全體人民的尚武精神，就是依着這個方法，便利人民，獎勵人民，強制人民受軍事上及體操上的教練。為便利人民，使人民容易習得這教練計，各共和國都備有一定的學習和實練場所，並對一定的教師，給與在這場所教授的特權。不過，這等教師，似乎沒有由國家領取薪俸，也沒有取得何等排他的獨佔權。他們的報酬，完全出自學生。在公立體育館或演武場習得這教練的市民，對於從私人教師習得這教練的市民，並不享有何等法律上的特權，如果後者也學得一樣好的話。為鼓勵這項學習起見，各共和國對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生，給與小獎賞或小榮譽獎章。在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或地

峽運動大會或納米安運動大會競技獲賞的，不但獲賞者本人有光榮，其家族及親戚全體都有光榮。凡屬共和國的市民，只要召集，都得在共和國軍隊中服務一定年限。這義務，就很夠強制一切市民學習軍事教練及體操教練了，因為不學習這些教練，軍隊服務的工作一定是幹不了的。

治化改進，軍事教練，便須由政府費相當氣力予以支持，否則不免日漸鬆懈，從而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同時隨着衰退；關於這種趨勢，近代歐洲事例提示得十分明顯。各個社會的安全，總多少依賴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固然在近代，沒有精練的常備軍，單靠尚武精神，也許是不夠防禦社會、保障社會的。但是各公民如都具有軍人精神，那所需的常備軍就可減去不少。況且，普通對有常備軍會危害自由的憂慮，無論這個危害是真的危害或只是想象的危害，也必會因市民具有軍人精神，而減少許多。這尚武精神、軍人精神，一方面在外敵侵略時，可以大大便利常備軍的行動；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備軍發生違反國家憲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地加以阻止。

就維持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說，希臘及羅馬往時的制度，似乎比近代所謂民兵制度有效多了。前種制度，簡單得多。制度一經確立，即可自行其事，而以最完全的活力維持下去，政府的注意，幾乎是全然用不着的。至於要在相當程度上維持近代民兵的複雜規則，就須政府不斷的和費力的注意；政府不注意，這規則就不免完全被忽視，或者完全廢而不用。加之，古代制度的影響遠為普遍。在那種制度下，人民全體，都會使用武器。近代則恐怕除瑞士外，各國由民兵規則施教的範圍，都不過及幹國民中的最小部分。但是，一個不能防禦自己或為自己復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類資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樣，在精神方面的殘廢或畸形無異於某一最重要肢體拆毀了、失用了的人在肉體方面的殘廢與畸形。而且，兩者之中，前者顯然是更不幸，是更可憐。因為，苦樂的感覺，全生於心，其受影響於肉體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殘廢或完全的少，而受影響於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殘廢或完全的多。那怕在社會的防禦上已用不着人民的尚武精神，但為防止怯懦必然會引起的這種精神上的殘廢、畸形及醜怪在人民之間蔓延傳播，政府仍應加以最切實的注意。這好象癲病及其他討厭的、令人不愉快的疾病，雖不會致死，或沒有危險，但為防止在大多

數人民之間傳播，政府仍應加以最切實的注意。這注意，縱使除防止社會的這種大害外，沒有何等其他公共利益，亦事在必行。

同樣的說法，可適用於那常常使文明社會一切下級人民的理解力失去作用的無知和大愚鈍。一個人不能適當使用人的智能，假如說是可恥的話，那就比怯懦者還要可恥。那是人性中更重要部分的殘廢和畸形。國家即使由下級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這教育仍值得國家注意，使下級人民不至陷於全無教育的狀態。何況，這般人民有了教育，國家可受益不淺呢。在無知的國民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擾亂。一般下級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會受狂熱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識的人，常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知禮節，更守秩序。他們各個人都覺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上、長上的尊敬，因而他們就更加尊敬那些長上。對於旨在煽動或鬧派別的利己性質的不平之鳴，他們就更能根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細；因此，反對政府政策的放恣的或不必要的論調，就愈加不能欺惑他們了。在自由國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於人民對政府行動所持的友好意見，人民傾向於不輕率地、不任性地判斷政府的行動，對政府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三項論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經費

對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設施，主要是宗教教育的設施。這一種教育，其目的與其說是使人民成為今世的優良公民，倒不如說是為人民作來世生活及更好世界生活的準備。講授這種教義的教師的生活費，也同其他普通教師一樣，有的專靠聽講者的自由貢獻，有的則來自經國家法律認可的某些財源，如地產、什一稅、土地稅、薪水等。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熱心和勤勉，在前一場合，似乎比後一場合要大得多。就這一點說，新教的教師們，要攻擊成立悠久的古舊體系，往往佔有不少的便宜；因為，舊教牧師，賴有聖俸，往往不大注意維持大多數人民的信仰和歸依的熱情；他們懶惰慣了，甚至不能奮發起來，保護他們自身的教會。富有捐贈財產的成立悠久的國教，它的牧師們，常常成為博學及文雅的人，具有紳士或足使他們博得紳士所受的尊敬的品質。但另一方面，他們易於喪失那些使他們對下級人民有權威和感化力的好的和壞的品質，而這些品質，也許就是使他們的宗教得成功為國教的本來原因。這些牧師，當遇着一羣勇敢的克孚衆望但

也許是愚而無知的狂信者的攻擊時，就象亞洲南部懶惰的、柔弱的、飽食的國民碰着了活潑、堅忍而苦飢的北方韃靼人的侵略一樣，全然無以自衛。在這種緊急場合，這些牧師通常所採取的唯一手段，就是申訴於行政長官，稱反對他們的新教徒擾亂公安，而加以迫害、撲滅或驅逐。羅馬天主教教士迫害新教徒，就是這樣假手行政長官；英格蘭教會迫害非國教派，也是這樣假手行政長官。其實，一個既經被認為國教而安安靜靜地渡過了一兩世紀的宗教，通有某種新宗教對其教義教律加以攻擊而自己無法作有力的抵抗時，一般都是請政府出面阻止。在這些場合，就學問文章說，也許有時國教派方面佔優勢，但新起的反對派，總是更長於收買人心，更長於拉攏新信徒的一切技術。在英國，這些技術，早被那些擁有鉅額捐贈財產的國教教會的牧師們拋在一邊了。現在培養這些技術的，主要只有反對國教派及美以美派教徒。不過，在許多地方，反對國教派教師，曾靠自由捐贈、信託權利及其他逃避法律的行為，得到了獨立的生活資料，他們的熱情和活動力，似乎已因此大大減少了。他們很多已變成非常有學問、非常機敏及非常高尚的人物，他們一般已經不是非常孚衆望的傳道者。就今日說，比反對國教派牧師更得人心的，乃是那些學問遠不如反對國教派牧師們的美以美派教徒。

在羅馬教會中，下級牧師出於有力的利己動機，他們的勤勉和熱心，比任何成立悠久的耶穌教教會的牧師活躍得多。許多教區牧師的生活資料，很大部分是得自人民自願的貢獻，而祕密懺悔又給予他們許多機會，來增加這種收入源泉。託鉢教團的生活資料，全都出自這種貢獻。他們很象那些輕騎快步的軍隊，不行掠奪，就沒有給養。教區牧師有類似那些一部分以薪俸一部分以學生所交束脩為報酬的教師，而這報酬的獲得，就常需多少依賴其勤勉和名聲。託鉢教團，有類似那些專靠勤勉以換得全部資料的教師，因此，他們不得不用盡能夠促進普通民衆皈依的種種技術。據馬基弗利爾觀察，在十三世紀及十四世紀，聖多米尼克及聖佛蘭西斯二大託鉢教團的設立，曾把人民對天主教教會日益衰微的信仰和皈依復活了起來。在羅馬天主教各國，這皈依精神，全賴修道僧及貧苦的教區牧師的支持。至於那些教會大人物，儘管他們具有紳士及通達世故的人的一切藝能，有時且具有學者的藝能，並對於維持下級牧師的必要紀律也十分注意，但關於人民的教育卻沒有幾個肯費神去幹的。

有一位現代最著名的哲學家兼歷史學家說：“一個國家的大多數技術及職業，都具有這樣性質，在促進社會利益的同時，並對某些人有用或適合於某些人。國家在這場合，除在一種技術剛剛傳入的時候，所定立的規則，應聽任該職業自由，把鼓勵該職業的任務，交給從它收穫好處的個人。工藝製造者知道了他們的利潤來自顧客的光顧，他們是會盡可能增加其熟練與勤勞的。事物如未受有害的干涉所擾亂，那無論何時，商品的供給都會與其需求保持差不多相稱的比例。”

“不過，還有些職業，對國家雖屬有用，甚至必要，但在個人，卻無何等利益或快樂。關於這類職業的從事者，最高權力自不得不予以不同的待遇。為維持其生活計，它得予以公家的獎勵。為防止其自然流乾怠慢計，它得對那種職業給以特別榮譽，或嚴定階級以為升降，或採取其他敦勸方策。從事財政、海軍及政治的人，都是這一類人的實例。”

“乍看起來，我們可能自然地認為：牧師、教士的職業屬於第一類的職業，和法律家及醫師的職業一樣，對於他們的獎勵，我們可以把它安然委託那些信仰其教義並從其精神上的服務及幫助得到利益或安慰的人們的施捨。他們的勤勉，他們的注意，無疑都會由於這個附加的動機而增加。他們職業上的技巧，他們支配人民思想的機智，亦必由於不斷增加的實踐、研究和注意，而日有進益。”

“但是，我們把這事體更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知道：牧師們這種利己的勉勵，就是一切賢明的立法者所要防止的。因為，把真的宗教除外，其餘一切宗教都有極大的害處，而且都有一種自然傾向，把迷信、愚想及幻想，強烈地灌輸到真的宗教裏面，使其陷於邪道。各宗教上的從業者，為要使他自己在信徒眼中更顯得高貴神聖，總是向信徒宣說其他一切宗派如何橫暴可決，並不斷努力造作新奇，以鼓舞聽眾弛懈了的信心。至於所授教義中所含的真理、道德或禮節，他們卻不注意，而最適合干擾亂人心的教理，卻全被採取了。為吸引光顧的人，各反國教徒的集會不惜以新的勤勉、新的技巧，激動俗眾的情緒，騙取俗眾的輕信。結果，政府將發現：不為教士們設定定俸表面象是節省，而所付代價卻是昂貴的。並且，實際上，政府要與心靈指導者結成最適宜、最有利的關係，就是給他們固定薪俸，用賄賂引誘其怠惰，使他們感到除了防止羊羣誤尋新的牧場而外，其他進一步的

任何活動都是多事。這樣，宗教上的定俸制度，通常在最初雖是生於宗教的見地，但結果卻說明是有助於社會的政治上的利益。”

但是，給與牧師、教士以獨立的給養，不論利弊如何，定立此制者，恐怕很少考慮到這些利弊。宗教上爭論激烈的時代，大概也是政治上鬥爭激烈的時代。在這時候，各政治黨派都發覺，或者都想象：與相爭各教派的某一教派同盟，必有利益。不過，要做到這層，又只有採納或贊成那特定教派的教理。某特定教派若幸而站在勝利的政黨那一邊，它就必然要共享其同盟者的勝利。藉着同盟者的贊助和保護，它馬上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切敵對教派沉默而屈服。這些敵對教派，大概都是與勝利黨的政敵結為同盟，它們因此也就成了勝利黨的敵人。這樣，這特定教派的教士，既完全成了戰場上的支配者，對於大多數人民的勢力與權威，達到了最高頂點，他們的權力於是變得足夠威壓自黨的領袖及指導者，而且足夠強制政府，使其尊重他們的見解和意向。他們對於政府的第一個要求，一般是為他們鎮壓并制服一切敵對的教派。第二個要求，一般是給與他們以獨立的給養。他們既然大有造於政治方面的勝利，要求分享若干勝利品，那於理似無不合。加之，人心反覆無常，要他們一味迎合民衆的心理，藉以取得生活資料，在他們已經覺得可厭了。所以，當這個要求提出時，他們純是為自己的安逸和快樂打算，至於將來會如何影響他們教會的勢力和權威，他們卻沒有多費考慮。在政府方面，要答應這個要求，就只有把寧願歸自己取得歸自己保留的一些東西給予他們。所以，對於這種要求，政府很少立即批准。不過，在需要面前，政府總是要屈服下來，雖然政府往往幾經延擱，推三拔四，才屈服下來。

但是，假若政爭不曾要求宗教的援助，而勝利的黨派，博得勝利時，又不曾特別採用任何教派的教理，那末，這個政黨，對於一切不同的教派，就會平等看待，一視同仁，讓各人去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牧師和宗教。在這種場合，無疑會有許許多多的教派出現。各種不同的會衆，幾乎都會自成一個小教派，或者抱有自己的若干特殊教理。這時，充當教師的人，要保持現有教徒，並增加教徒數目，他定會感到有大賣氣力並使用一切技術的必要。可是，這種必要，是其他一切教師具有同感的，人人大賣氣力，人人使用一切技術，因此任何一個教師或任何一教派教師的成功，都不會過大。宗教教師利己的、積極

的熱心，只在社會只容許一個教派的場合，或一個大社會全體只分成爲兩三個教派，而各教派的教師，又在一定紀律、一定服從關係下協力共作的場合，纔會發生危險與麻煩。如果一個社會分爲二、三百乃至數千小教派的勢力範圍，那其中就不會有一個教派的勢力能夠攪擾社會，而他們教師的熱心，也就全然無害於事了。在這種場合，各宗派教師見到圍繞他們四周的，敵人多於朋友，於是就不得不注意到那常爲大教派教師所漠視的篤實與中庸；大教派教師所以如此，因爲大教派的教理，有政府爲其支援，博得廣大王國或帝國幾乎一切居民的尊敬，而教師們的周圍，因此就佈滿了門人、信徒及低首下心的崇拜者，沒有一個反對的人。小教派教師，因爲覺察到自己幾乎是獨立無助，通常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師；他們彼此相互感到便利而且適意的這種互讓，結果可能使他們大部分的教義，脫去一切荒謬、欺騙或迷妄的夾雜物，而成爲純粹的、合理的宗教。這樣的宗教，是世界各時代賢智之士最希望見其成立的宗教，然而成文法律，從來未曾使其成立，而且將來恐怕亦沒有一個國家能看到其成立；其原因是，關於宗教的成文法律，一向總是多少受世俗的迷信及狂熱的影響，而今後恐怕還要常常受此影響。這種教會管理方案，更適當的說，這個教會無管理方案，就是所謂獨立教派。這教派無疑是一個極其狂熱信徒的教派，英國於內戰終結時，有人建議在英國成立。它要是成立，雖然其起源是極其非哲學的，但到今日也許會使一切宗教教義，都出現最和平的氣質和最適中的精神了。賓夕法尼亞是實施了這個方案的地方。雖然那裏教友派佔最多數，但其法律對於各教派，實是一視同仁，沒有軒輊。據說，那裏就產生了這種合理的和平氣質和適中精神。

對各教派平等待遇，不分軒輊，縱使不能使一個國家中各教派全體或甚至一大部分，產生這種和平氣質和適中精神，但教派的數目，如果十分繁多，而且每個教派的勢力，都小到不夠攪擾社會治安，那末，各教派對於各自教理的過度熱心，就不會產生很有害的結果，反之，卻會產生若干好的結果。政府方面，如果斷然決定，讓一切宗教自由，並不許任何教派干涉其他教派，那就用不着耽心它們不會迅速自行分裂，而形成十分多數。

在各文明社會，即在階級區別已完全確立了的社會，往往有兩種不同的道德主義或道德體系同時並行着。其一稱為嚴肅的或刻苦的體系，又其一稱為自由的或者不妨說放蕩的體系。前者一般為普通人民所讚賞和尊敬；後者則一般為所謂時下名流所尊重和採用。不過，依我想，對於輕浮這種惡德——容易由大繁榮、由過度的歡情樂意生出的惡德——所加非難的程度如何，實構成了這兩個相反主義或體系間的主要區別。象放肆，甚至擾亂秩序的歡樂，無節制的尋歡逐樂，破壞貞節，至少是兩性中的一方面破壞貞操等等，只要不至於敗壞風化，不流於虛妄或不義，自由的或放蕩的體系，大概就會非常寬大地予以看待，而且會毫不躊躇地予以寬恕或原諒。至於嚴肅的體系則不然，這些過度的放蕩行為，都是其所極度憎惡與嫌厭的。輕浮的惡德，對於普通人總會招致毀滅。那怕一個星期的胡行與濫費，往往就足使一個貧窮的勞動者，永遠淪落，並驅使他陷於絕望的深淵，從而鋌而走險，干犯大逆。所以，普通人民中比較賢明而良善的，老是極度厭惡這些放蕩行為。經驗告訴他們，這些行為會馬上給他們這種境遇的人以致命打擊。反之，數年的放蕩及浪費，卻不一定會使一個上流人沒落。他們很容易把某種程度的放蕩，看作屬於他們財產上的一種利益；把放蕩而不受譴責或非難，看作屬於他們地位上的一種特權。因此，與他們同一階級的人，就不大非難這放蕩，而只加以極輕微的責備，或者全不責備。

差不多一切教派，都是在普通人民間創始的，它們從普通人民吸引其最初和最多數的新的皈依者，因此，嚴肅的道德體系，不斷為這些教派所採用，其中雖不無例外，但為數極少。這個體系，就是各教派最易博得那些他們首先向其提出改革舊教理方案的那階級人民的歡心的體系。為要博取這些人的信任，許多教派，也許大多數教派，甚至多方努力，變本加厲地改進這嚴肅體系，一直做到有幾分愚蠢、幾分過度的程度。此過度的嚴格，往往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博得普通人民的尊敬和崇拜。

有身分有財產的人，就其地位說，是社會中顯赫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社會都在注意，而他因此就不得不注意他自身的一切行動。社會尊敬他到什麼程度，和他的權威與名望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凡社會上污名失信的事，他都不敢妄為；他得小心翼翼地注意社會對於

他這種有身分有財產的人一致要求的那種道德，不管這種道德是自由的或是嚴肅的。反之，一個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同了。他說不上是什麼社會的顯赫人物。當他在鄉村中的時候，他的行爲，也許有人注意，所以他自己也許非當心自身行爲不可。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只在這種情況下，纔可以說他有他的名聲，行爲不正，就會損及名聲。但當他一走進大的社會，他馬上就沉於卑賤和黑暗中了。他的行爲，再也沒有人觀察注意了，於是他就任情而動，不加檢點，委身於一切卑劣的遊蕩和罪惡。這是常有的事。一個人想從其微賤地位脫出，想惹起一個體面社會對他行爲的注意，那頂有效果的方法，無過於作一個小教派的信徒。一做了某教派的信徒，他馬上就會受到幾分從來不曾受過的尊重。爲了教派的名譽，一切教友都要留心觀察他的行爲；如果他做出了寡廉鮮恥的事，或者他所做的，大大違反了同門教友所相互要求的嚴肅道德律，他就要受那老是被看作一種極其嚴峻的懲罰，即開除教籍，雖然這懲罰不帶有民法上的結果。因此，在小教派普通人民的道德上，幾乎常是特別有規則有秩序的，比在國教要嚴肅得多。實在說，這些小教派的道德，往往卻未免過於嚴格，過於不合人情，使人覺得討厭。

可是，國家對於國內一切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人情及嚴肅到可厭程度的缺陷，不須使用暴力，只須依兩種極容易而有效的方法就可矯正。

第一種方法，是由國家強制國內有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身分及財產者，幾乎全都從事科學及哲學的研究。國家不應當給教師定額薪俸，以養成其怠惰。國家甚至可對較高深較困難的科學，設定一種檢定或考試制度，不論何人，他在就某種自由職業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選某種名譽的或有酬的職務以前，都須經過這檢定或考試。國家如對這一階級的人，強迫其研究學問，就不需要費神替他們供給適當的師資。因爲他們自己馬上會找到比國家爲他們供給的教師還要好的教師。科學是對於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劑。一國土流社會人士，從這些毒害救出之後，一般下級人民，也就不致大受其害了。

第二種方法，是增進民衆的娛樂。俗衆的迷信及狂妄，常起於心中的憂鬱或悲觀情緒。一大部分人民的這種情緒，不難由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乃至一切戲劇表演消除。所以，爲着自己利益，在

不流於傷風敗俗的範圍內，專以引人發噱，叫人解悶，而從事這些技藝的人，國家當予以獎勵，或者完全聽其自由。煽動俗衆的狂信者，總是恐懼公衆娛樂，厭惡公衆娛樂。由娛樂引起的快適與樂意，與最適合他們的目的，最便於他們的煽動的心理，是全然相反的。加之，戲劇表演，常會揭穿他們的奸詭手段，使其成爲公衆嘲笑的目標，有時甚至使其成爲公衆憎惡的目標。因此，戲劇一項，比其他任何娛樂，更爲他們所嫌忌。

一國法律，如對於國內一切宗教的教師，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則這些教師與君主或行政當局，就不必要保持有何等特定的或直接的從屬關係，而同時君主或行政當局，也不必要在他們職務的任免上，有所處置。在這種情況下，君主或行政當局對待他們，亦可如對待其他人民一樣，唯一任務，就是維持他們彼此之間的和平，即阻止他們相互的迫害、侵侮或壓迫，此外，便無其他關注的必要了。但是，一國如有國教或統治的宗教存在，那情形就完全兩樣。在那種場合，君主如對於該宗教的大部分教師，沒掌握有一種有力的控制手段，他就永無安全的日子。

一切國教，其教士都組織有一個大的法人團體。他們協力共作，以一種計劃，一貫精神，追求他們的利益，有如在一個人指導下一樣，而實際上也常常是在一個人指導之下。作爲法人團體，他們的利益，與君主的利益從來不相同，有時正直接相反。他們的大利益，在於維持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這權威，基於兩種設想：第一，設想他們所諄諄教渝的全部教義，乃是確實而又重要的；第二，設想要由永遠的悲慘解脫，則有以絕對信仰，採用這全般教義的必要。假使君主不自識相，敢對他們教義中甚至最細微的部分，表示嘲笑或懷疑，或是對其他嘲笑懷疑教義者，居然以人道精神，曲加保護，則這些同君主沒有何等從屬關係的教士，就認爲有失體面，而宣佈君主讀神，同時並使用一切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的忠順，從他移向另一個比較馴服的君主。假使君主對於他們的任何要求或侵穿行爲表示反對，危險也同樣的大。一個君主如敢於象這樣反對教會，他的反逆之罪是坐定了，此外，無論他如何嚴肅聲明他的信仰，以及他對於一切教會認爲君主應當格遵的教義的謙抑服從，大概還不免要加以異端僞道的罪名。宗教的權威勝過其他一切權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

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國教教會的教師，如要宣傳顛覆君權的教義，那君主就只有憑藉暴力，即憑藉常備軍的武力，才能維持其權威。有時就連這常備軍，也不能予以永久的保障，因為兵士如果不是外國人——外國人充當兵士的很少——而是從本國人民間募集來的——大概是如此——，那末，這些兵士，不久也恐怕會為那種教義所腐化。我們知道，在東羅馬帝國存續的期間，希臘教士，不知曾在君士坦丁堡惹起了多少次革命；往後幾百年間，羅馬教士也曾在歐洲各地惹起了許多次動亂，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了，一國君主如沒有控制國教或統治宗教教師的適當手段，他的地位，就該是如何危險，如何不安定。

宗教信條，以及一切其他有關心靈的事件，很明顯地都非塵世君主所得管轄；君主縱使有資格好好保護人民，卻很少被人相信有資格好好教導人民。所以關於上述教條及有關心靈的事件，他的權威，往往低不過國教教會教士們結合起來的權威。可是，社會的治安和君主自己的安全，常依存於教士們關於這些事件認為應當宣傳的教義。君主既不能以適當的壓力和權威，直接反抗教士們的決定，所以君主必須有影響他們決定的能力。影響的方法，惟有使教士階級大多數人有所恐懼而又有所希求。派職或其他處罰，是他們所恐懼的；升遷祿位，是他們所希求的。

在一切基督教會中，牧師的聖俸，可以說是他們終身享受的一種不動產。其享有，非憑授與者一時的高興；只要行為端正，即不得任意褫奪。這個財產的保有，如果不是這麼穩固，稍稍開罪於君主達官，即有被褫奪的危險，那末，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就不能維持了。人民會視他們為從屬宮廷的僱傭，對於他們教導的真誠，沒有何等信心。但是，假若君主濫用暴力，借口他們過於熱心散佈朋黨的或煽動的教義，竟行褫奪他們終身享有的不動產，那末，他這種迫害，只不過使被迫害的牧師及其教義，陡增十倍的聲譽，因而對於君主自身，陡增十倍的煩難與危險。幾乎在一切場合，恐怖手段，總是治國治人的一種壞工具，決不可用以對付那些對於獨立自主那怕只有一點點要求權利的人。企圖恐嚇這種人，只有刺激其惡感，堅定其反抗；這反抗如果處置稍為寬大一點，也許很容易使其緩和下來，或者完全放棄。法國政府常用暴力強迫議會或最高法院公佈不享衆望的佈告，然很少成功。可是，它通常所用的手段，即把一切頑強不服者通通監

禁起來，卻可算是十分厲害的了。斯圖亞特王室各君主，有時也用與此相類似的手段，來控制英國議會的若干議員，但那些議員也是同樣地頑強不屈。因此，他們不得不改弦更張了。英國議會今日是在另一種方法上被操縱着。約在十二年前，奇瓦塞爾公爵曾對巴黎最高法院，進行一個極小的實驗，由那個實驗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即採用英國今日使用的方法，法國一切最高法院，可更容易加以操縱。但這種實驗，沒有繼續進行下去。因為，強制與暴力，雖是政府的最壞最危險的工具，而權術與勸說，雖總是最容易最安全的工具，但人類似乎生來就是傲慢的，除非他們不能或不敢使用壞的工具，他們總是不屑使用好的工具。法國政府很能夠而且敢於使用暴力，所以不屑使用權術與勸說。不過，根據一切時代的經驗，我相信，以強制和暴力，加諸國教教會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危險和導引毀滅的可能，實有過於把強制和暴力加諸任何其他階級的人民。牧師有他們的權利，有他們的特權，有他們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與其本階級中的人結有良好關係，即在最專制的政府下，與其他約有同等身分及財產者比較，其權利和自由，是更受人尊重的。在巴黎寬大溫和的專制政府是如此，在君士坦丁猛烈狂暴的專制政府亦是如此，而在此兩極間各種不同程度的專制政府，亦莫不如此。但是，牧師階級雖難以暴力強制，卻與其他階級同樣容易操縱。君主的安全，社會的治安，似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於君主操縱他們的手段，而這手段似乎完全在於他提升他們的權力。

舊時基督教教會的制度，各主教領區的主教，通由主教所轄都市的牧師及人民共同選舉。人民這種選舉權，並不曾保有多久；而且就在保有該權利的時候，他們多半也是唯牧師們的馬首是瞻；牧師們在這類有關心靈的事件上，儼然是以人民自然指導者自居了。不過，這樣操縱人民，也是一種麻煩的事，牧師們不久就厭倦了，他們覺得，主教由他們自己選舉比較容易得多。同樣的，修道院院長，亦由院中修道士選舉，至少大部分修道院的情況是如此。主教領區內的一切下級有俸聖職，通由主教任命，主教認為適當的，即授與職務。這樣，教會一切升遷權力，就全掌握在主教手中了。在這種場合，君主對於他們的選舉事項，雖然也擁有一些間接勢力，雖然教會關於選舉乃至選舉的結果，有時也請求君主同意，但是君主畢竟沒有直接或充分手

段操縱他們。因此，每一個牧師的野心，就自然使他要阿諛本教會中人，而不阿諛君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滿足其升遷期望。

羅馬教皇最先逐漸把幾乎歐洲大部分的主教職、修道院院長職（或即所謂主教公會有俸聖職）的任命權，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種種奸計及口實，把各主教領區內大部分下級有俸聖職的任命權，拿到手中。這一來，所留給主教的，除僅僅足使其維持對所管轄牧師們的權力外沒有什麼了。同時，由於這種安排，君主的境況，也弄得比先前更壞。歐洲各國的牧師們，這樣簡直編組成了一種宗教軍。這種軍隊雖散處各國，但它的一切活動、一切動作，都可由一個首領指揮，並在一種劃一的計劃下進行着。每個特定國家中的牧師，可視為這軍隊的一個支隊；而各支隊的動作，又容易得到四周其他支隊的支持和援助。每個支隊，不僅對於各自駐在國及給養他們的國家的君主是獨立的，而且還隸屬於一個外國君主。這個外國君主隨時可叫他們反戈轉向該特定國家的君主，並使用其他一切支隊為其聲援。

這種武力的可怕，就我們想象得到的，可以算無以復加了。往時，當歐洲技藝及製造業未發達之前，牧師們的富有，使他們對普通人民擁有諸侯對其家臣、佃戶及扈從的同樣權力。諸侯在其領地上，擁有一種司法權；依同一理由，牧師們在皇族及私人基於錯誤的虔敬而捐贈教會的大所有地上，亦確立了一種類似的司法權。在此等大所有地範圍內，牧師們或其執事，不仰仗君主或其他任何人的支持和援助，就能夠維持和平；但是，沒有牧師們的支持及援助，那怕是君主或其他任何人，在那裏都維持不了和平。因此，有如俗世大領主在其特定領地及莊園所保有的司法權一樣，牧師們的司法權，就與國王的法院獨立，而劃在國家司法管理範圍以外了。牧師們的佃戶與大領主的佃戶同，幾乎全是可自由退租的仰戶，完全依靠其直接隸屬的主人。所以，牧師們一旦有了爭鬥，要他們參加，他們就得應召前往。牧師們的收入，計有兩種：其一是這些所有地的地租，其二是從什一稅得到的歐洲所有國家的一切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這兩種地租，大半都以實物繳納，如穀物、葡萄酒及牲畜等。它們的數量，大大超過牧師們自己所能消費的限度。當時既無藝術品或製造品可資交換，他們對於這大量的剩餘，就除了象諸侯處置其剩餘收入一樣，大宴賓客，大行慈善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有利的使用方法。因此，往時牧師

們款客和施捨的規模，據說是非常大的。他們不但維持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全部貧民的生活，並且，許多無以為生的騎士紳士們，也往來於各修道院之間，假皈依之名，收款待之實。若干特殊修道院院長的扈從，往往與最大領主的扈認同樣的多。把一切牧師們的扈從合計起來，也許比一切領主共有的扈從還多。各牧師間的團結，在程度上大大超過凡俗領主間的團結。前者是在一種正規的紀律和從屬關係下，服從羅馬教皇的權威，後者不然，他們彼此間幾乎常在相互猜忌，並且同在嫉視國王。所以，雖然把佃人和扈從合計起來，牧師們所有的，比凡俗大領主少；而單就佃人說，也許少得多，但牧師們的團結力量，卻使他們更為人所恐懼。此外，牧師們的款待和慈善，不但給與了他們支配一支大的世俗力量的權力，同時並大大增加了他們精神武器的力量。他們已由這博施濟衆的善舉，博得了一般下級人民最高的尊敬和崇拜，這些人民，許多是不斷由他們贍養的，幾乎全體都有時由他們贍養的。一切屬於或有關這個有那麼大人望的階級的事物，它的所有物，它的特權，它的教義，必然在普通民衆眼中成為神聖的了；而對於這些神聖事物的侵犯，不論真偽，通是罪大惡極。這樣，如果君主抵抗其治下少數大貴族的同盟，常常感到困難，那就無怪其抵抗治下的牧師們的聯合力量，更感到困難；何況這種聯合力量，還有各鄰國的同一力量為其聲援呢：在此種情況下，君主有時不得不降服，倒不足奇怪；君主常能抵抗纔是怪事。

君主或國家的第三種義務就是建立並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於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說，設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那所得利潤決不能償其所費。所以這種事業，不能期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並且，隨着社會發達時期的不同，執行這種義務所需的費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

除上述國防及司法行政兩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設施和公共工程外，與其性質相同的其他設施和工程，主要為便利社會商業，促進人民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教育上的設施，可大別為兩種：一是關於青年教育的設施，一是關於一切年齡人民的教育設施。凡此種種設施和工程所需的費用，該如何最妥善地支付，在本章這一節分作以下三項研究。

第一項論便利社會商業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設施便利一般商業的

一國商業的發達，全賴有良好的道路、橋樑、運河、港灣等等公共工程。這類工程的建造和維持費用，顯然，在社會各不同發達時期極不相同。一國公路的建設費和維持費，顯然必隨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增加，換言之，必隨公路上所搬運貨物的數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橋樑的支持力，一定要適應可能通過它上面的車輛的輛數和重量。運河的深度及水量，一定要適應可能在河上行駛的貨船的只數及噸數。港灣的廣闊，一定要適應可能在那邊停泊的船舶的只數。

這類公共工程的費用，似乎不必在通常所謂國家收入項下開支。在許多國家，國家收入的徵收和動用都是委之於行政當局的。這類工程的大部分不難如此管理，使它們自身提供足以支付自己費用的特別收入，而無須增大社會一般收入的負擔。

例如，在大多數的場合，公路、橋樑、運河的建築費和維持費，都可出在對車輛船舶所收的小額通行稅；港灣的建築費和維持費，都可出在對上貨卸貨船隻所收的小額港口稅。此外，為便利商業而鑄造貨幣的設施，在許多國家，不但能開支自己的費用，而且能對君主貢獻一筆小收入，即鑄幣稅。另一設施，即郵政局，幾乎在一切國家，除提供本身的開支外，還給君主帶來一項極大的收入。

車輛通過公路或橋樑，船舶通過運河或港口，如果按照其重量或噸數的比例繳納通行稅，那麼，它們就可以說是恰恰按照其所加於各該公共工程的損耗的比例支付其維持費。似乎要維持這些公共工程，不能想出比這更公平的方法。況且，這通行稅雖由販運者支付，他只不過暫時墊支，結果仍是轉嫁在貨物價格上，由消費者負擔。同時，因為有了這類公共工程，貨物的運輸費大大減少了，消費者雖然擔負了這通行稅，卻比在沒有這類公共工程因而沒有通行稅的場合，能購得較便宜的貨物，因為貨物價格由通行稅擡高的程度，究竟不及其由運費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所以，最後支出這稅額者由於課徵該稅而得到的利益，超過由於完納該稅而蒙受的損失。他的支出，恰和他所得的利益成比例，實際上，不過是他的利得中之一部分。他必須捨棄這一部分來取得其餘部分。徵稅的方法，我看再不能比這更公平了。

就車輛而論，如果以重量為標準，對極盡奢華的車輛和對四馬大馬車、驛遞馬車等等所課的通行稅，略高於對不可缺少的車輛如二輪運貨馬車、四輪馬車等等所課的稅，那就可使懶惰與虛榮的富人，不覺困難地對貧民的救濟有所貢獻，換言之，使運往國內各地的笨重貨物的運費減低若干。

公路、橋樑、運河等等，如由利用它們的商業來建造和維持，那麼，這種工程，就只能在商業需要它們的地方興建，因而只能在宜於興建的地方興建。此外，建造的費用，建造的堂皇與華麗規模，也必須與該商業的負擔能力相稱，就是說，必須適度。宏壯的大道，斷不能在無商業可言的荒涼國境內建造，也斷不能單為通達州長或州長所要獻媚的某大領主的鄉村別墅而建造。同樣的，不能在無人通過的地方或單為增益附近宮殿憑窗眺望的景緻，而在河上架設大橋。這類事情，在公共工程建設費不由該工程本身提供的收入支給而由其他收入開支的國家，有時亦有發生。

歐洲許多地方的運河通行稅或水閘稅，是個人的私有財產，這些人為保持這利益，自竭力維護這運河。如果不加以相當的整飭修理，航行就會成為不可能，而他們由通行稅收得的全部利益，也就將跟着消失。如果運河的通行稅，交給那些利不幹己的委員們徵收，他們對於產生這通行稅的工程的維持，一定不會象個人那樣注意。蘭格多克運河，是由法國國王及蘭格多克州拿出一千三百萬利弗建造的；一千

三百萬利弗，按每馬克銀合二十八利弗的前世紀末葉法國貨幣價值計算，約合英幣九十萬鎊。這個大工程完成時，人們覺得最妥善的維護方法，就是把這運河的全部通行稅，贈給設計並監督這工程的技師裏格，叫他不斷加以修理。這項通行稅，現已成了裏格後代子孫的一大宗收入。因此他們對於這運河的經常修理非常注意。假使當時沒有想出這妥善的方法，而把通行稅交給一般利不幹己的委員們管理，那麼這通行稅全部，恐怕都要消費在徒事裝飾的開銷和不必要的開銷上，而這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則任其趨於塌毀。

可是，維護公路的通行稅，卻不能隨便贈與個人，作為他個人的收入。因為，運河不加修理，會變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卻不會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稅者，儘管全不修理這道路，這道路卻依然可以給他提供一樣多的通行稅。所以，維持這一類工程的通行稅，應當交由委員或保管員管理。

在英國，人們對這些保管員在管理這種通行稅方面所有的弊病，時有責言，在許多場合，那些責言都是非常允當的。據說，有許多收通行稅道路所徵的稅額，往往比好好修理這些道路所必要的費用額多兩倍以上，然而工程卻是用極潦草方法進行，而且有時竟然全沒進行。不過，我們應注意一件事：以通行稅充當修路費用的制度，並未成立很久，所以，即使沒有做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也毫無足怪。卑污而不適當的人物，為什麼常常被任為管理者；對於他們的行為，對於他們的濫徵通行稅，為什麼沒有設立監督機構，加以檢查和制止，這一切缺陷，都可由一件事實說明和辯解，即以通行稅修理公路的制度，尚在草創時期，多假以時日，議會當不難逐漸採取賢明措施，予以矯正。

據一般人的想象，英國各種收稅道路所收的通行稅，大大超過了修理道路所需的數額。據幾位大臣考察，多餘的數額如果不濫動用，很可充為國家他日緊急費用的一大財源。有人說，收稅道路由政府管理，比由保管員管理，所費少而收效大。對於修補道路，政府有兵士可用，兵士是有正規餉金的，只須略增少額貨幣報酬就行。至於保管員所能僱用的工人，則不外一些工資勞動者，他們的生活資料，全仰繪工資。所以有人主張，通過自己管理收稅道路，政府可不必增加人

民負擔而增添五十萬鎊大收入；收稅道路將會和現在的郵政一樣，提供國家一般的費用。

政府管理收稅道路所可得收入，雖未必能如創擬這計劃者所預期的那麼巨大，但可由此獲得一大宗收入那是無疑的。不過，這計劃本身似乎有若干極重大的缺點。

第一，國家如把取自收稅道路的通行稅，看作供應急需的一個財源，那麼，這種通行稅將要隨着想象上的急需所需要的程度而增大，而按照不列顛的政策，這些通行稅一定會非常迅速地增加。一個大收入能夠這樣不費力地取得，勢必會使政府動不動就向這收入動念頭。如果搏節得宜，是否就能從現行通行稅省出五十萬鎊，雖是疑問，但如把這通行稅增加兩倍，就可能省得一百萬鎊，增加三倍，就可能省得二百萬鎊，那是毫無疑問的。而且，這樣一大宗收入的徵收，並無需任命一個新的收稅官吏。但是，稅路之設，在於便利國內一般商業，設使通行稅象這樣不斷增加起來，那麼原以利商的，卻成為商業的大病。國內由一地運往他地的笨重貨物運輸費，將迅速增加，其結果，這類貨物的市場，將大大縮小，這類貨物的生產，將大受妨害，而國內最重要的產業部門，說不定要全歸消滅。

第二，按照重量比例而徵收的車輛通行稅，如其唯一目的在於修理道路，這種稅就非常公平；如是為了其他目的，或為了供應國家一般的急需，那麼這種稅，就非常不公平。道路通行稅用以修理道路，各車輛可以說就是恰恰按照其對道路所損耗的程度的比例，完納稅金。反之，道路通行稅如還有其他用途，即以資助國家其他急需，那對於各車輛所徵的稅額，就不免要超過其所加幹道路的損耗的程度。況且，由於這稅使貨物價格按貨物重量的比例，而不是按貨物價值的比例而升高，所以主要負擔這種課稅的人，不是價值高而重量輕的商品的消費者，卻是粗劣笨重的商品的消費者。因此，不論國家打算以這稅收應付何等急需，其結果，供應這急需的人，不是富者而是貧者，不是最能擔當這負擔的人，倒是最沒有能力擔當這負擔的人。

第三，設使政府對於損壞的公路漫不修理，我們要強制其適當地劃出通行稅的一部分充當此項用途，將會比現今還更困難。以修繕道路為唯一目的並取自人民的一大收入，可能竟然完全沒有劃出任何部分來修繕道路。如果對於今日卑賤貧困的稅路管理者，有時尚不易強

制他們矯正所犯的錯誤，那麼，換一般富裕者有權勢者來管理稅路，要強制他們矯正錯誤，恐怕比我們現在所假設的場合還要困難十倍。

法國修理公路的基金，放在國家行政當局直接管理之下。該基金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法國大部分地方鄉下人民每年為修理公共道路所應提供的一定日數的勞役，另一個組成部分是國王在國家一般收入中決定不用於其他開支而專用於修路的那一部分收入。

按法國以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舊法律，鄉下人民的勞役，向來由地方長官指揮監督；地方長官對於國王的樞密院，無何等直接從屬關係。但依據現行法令，鄉下人民提供的勞役，以及國王為某特定地域或特定稅區修理道路的任何基金，全歸州長管理；州長由樞密院黜陟任免，接受樞密院的命令，並不斷與樞密院保持聯絡。隨着專制政治的發展，行政當局逐漸併吞國家的一切其他權力，所有指定作為公共用途的一切收入，全都攬歸自己管理。但法國的大驛路，即聯絡國內各主要都市的道路，一般都整飭可觀；在若干州境內，這些道路比英國大部分道路宏壯得多。可是，我們英國所稱為十字路，就是說，鄉下的大部分道路，卻全未進行修理，有許多地方，重載車輛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干地方，甚至騎馬旅行也有危除，惟有騾是安全可靠的運載工具。一個崇尚虛飾的朝廷的驕矜大吏，往往樂意經營壯麗堂皇的工程，例如王公貴人時常經過的大道。後者的讚賞，不但使他感到光榮，甚或有助於增進他在朝廷上的地位。至於偏在鄉村的許許多多小工程，既不足以壯觀瞻，又不足以邀聲譽，除了實際上有極大的效用以外，沒有其他可取的地方。這樣，無論就那一點說都似乎是過於瑣細不值一顧的工程，怎能叫堂哉皇踐的大吏注意呢；所以，在這種人的管理下，這種小工程總是受漠視的。

在中國，在亞洲其他若干國家，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這一切國家中，對於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別在中國是如此。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不過，關於那裏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教士。假使這些工程，是經過比較有識者的考察，假使這些報道，是比較忠實的目

擊者的敘述，那麼，那裏的水道公路工程恐怕就不值得我們如此驚異。柏尼爾關於印度這類工程的報告，就遠沒有其他大驚小怪的旅行者的記述那麼誇張。法國對於大公路，即常常成為朝廷及首都人士談話資料的聯絡各地方的通衢，無不慘淡經營，而其餘一切支道橫道，則漫不經意。亞洲各國的情形，說不定也是這樣吧。加之，中印各國君主的收入，幾乎都是以土地稅或地租為唯一源泉。租稅徵收額的大小，取決於土地年產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與收入，與國境內土地的墾治狀況，以及土地產物數量的多寡，土地產物價值的大小，必然有極大的直接關係。要儘可能地使這種生產物又豐盈又有價值，勢須使它獲有儘可能廣泛的市場。要做到這樣，必須使國內各地方的交通既極自由，又極方便，極便宜。而維持這種交通狀態，惟有興築最好的通航水道與最好的道路。然在歐洲，各國君主的主要收入並非仰給於土地稅或地租。固然，歐洲一切大的王國，主要收入的大部分，也許歸根結底也要依靠土地生產物，但這依賴不是直接的，而且不象亞洲各國那樣明顯。因為這樣，歐洲各國君主不象亞洲君主那樣急於增進土地生產物的數量和價值，換言之，那樣急於維持良好的水道及公路，以開拓土地生產物的廣泛市場。因此，即使在亞洲某些地方，浚河修路庶政，行政當局辦得成效卓著，如傳聞所說（據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干疑問），在歐洲現狀下，要想任何地方行政當局把那種事情弄得相當的好，恐怕是沒有希望的了。

一項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維持，而其便利又只限於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區域，那麼，把它放在國家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國家一般收入維持，總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維持，來得妥當。比如，倫敦市上的照明與鋪路費用，如由國庫開支，那街上所點的燈，所鋪的石，能做到現在這樣完善，其費用，能象現在這樣撙節麼？況且，這費用，如非取給於倫敦各特定街坊、特定教區、特定市區的居民所提供的地方稅，那勢必要從國家一般收入項下開支，其結果，王國中不能受到這街燈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無端分攤這負擔了。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州收入，固然有時不免發生弊病，但是，這種弊病苦與管理和花費一個大帝國收入所時常發生的弊病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況且，與後者所生的弊病比較，前者的弊

病，容易矯正多了。在英國，在地方或州治安推事管理之下，鄉下人民為修葺公路，每年所必提供的六日勞役，也許不盡用得宜，但從沒有發生慘酷壓制的事情。在法國，此項勞役，歸州長管理，但不一定比英國用得適當，而強徵勒索的舉動，往往極盡慘酷暴戾之能事。法國人所謂強迫勞役制，成了悍吏魚肉人民的主要工具；設某教區或某村社不幸為悍吏所嫉惡，悍吏往往就藉此以施懲罰。

便利特殊商業的

上述公共設施和公共工程，其目的在幹便利一般商業。若求某些特殊商業的便利，則有待於特別的設施，且須有一項特別的額外費用。

與野蠻未開化國家通商，常需要特別保護。普通堆棧或行店的設備，決不能保障非洲西部海岸貿易商人的貨物。為防止地方土人的劫奪，對於積貨場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建築防禦工事。印度人本來是溫和馴謹不過的，但因印度政府漫無秩序，所以，歐洲人貿易其間，亦有作同樣警戒的必要。英法兩國的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擁有的幾個最早堡壘，就是藉口防備暴力、保護生命財產而獲准建築的。一國有了強固的政府，自不容外人在本國領土內建築堡壘，在這種場合，就有互派大使、公使或領事的必要。自己國民間發生爭訟，公使或領事可依從本國習慣予以處決；自己國民與駐在國國民間發生爭訟，他可憑外交官的資格，比任何私人更有權力出來干涉。他所能給他的國人的保護，自比他們所能從任何私人獲得的強得多。國家常常專為商業上的利益，需要在外國派駐使館，本來無論就戰爭或同盟關係說，都不需在這些外國設立使館的。首先使英國在君士但丁堡派駐大使的原因，是土耳其公司的商業。英國派駐俄羅斯的最早的大使館，完全是起因於商業上的利益。歐洲各國人民因商業利害關係不斷髮生的衝突，恐怕就是使歐洲各國即在平時亦在一切鄰國永久派駐公使的原因。這個前所未聞的制度，其開始發生，似乎不過在十五世紀末或十六世紀初，也就是說，不過在商業開始擴展到歐洲大部分國家，歐洲各國開始注意到商業利益的時候。

國家為保護某一商業部門而開支的特別費用，如通過向該商業部門抽徵適當的稅來彌補，當不失為公允。例如，在商人開始營業時，徵以小額的營業稅，或更公平的，對商人從特定國家輸入或向特定國

家輸出的貨物，抽若干成特定的稅。據說，最初建立關稅制度，就是爲了支付保護一般貿易免受海盜搶劫的費用的。但是，如果認爲保護一般貿易用去的用費，理應取給於課在一般貿易上的稅，那麼，爲保護特殊貿易用去的特別費用，照理也應取給於對該貿易所課徵的特殊稅收。

保護一般貿易，常被視爲國防的重要事件，因而也就成了行政當局一部分必盡的義務。結果，一般關稅的徵收及應用，就往往委諸行政當局。特殊貿易的保護，既是一般貿易保護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行政當局應盡義務的一部分。如果國家的行動，總是前後一致的，則爲保護特殊貿易而徵收的特殊稅收，自當同樣委諸行政當局管轄。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無論就這方面或其他方面說，各個國家的行動常是矛盾的。歐洲大部分商業國家，就有若干商人集團，說服了立法機構，把行政當局這方面的義務，以及必然與這義務相關聯的一切權力，統統交給他們執行。

此等公司自擔費用，創辦政府也許有所顧慮，不敢貿然嘗試的某些部門的商業，就這一點說，它們對該部門商業的創建，容或有所助益。但最終它們全無例外地或成爲累資或成爲無用，而其經營，不是失當，就是範圍過於狹窄。

這種公司有兩類，其一爲，沒有共同資本，凡具有相當資格的人，都可繳納若干入夥金，加入組織，但各自的資本由各自經理，貿易危險，亦由各自負擔，對於公司的義務，不過是遵守其規約罷了。這種公司，稱爲合組公司。又其一爲，以共同資本進行貿易，各股員對於貿易上的一般利潤或損失，都按其股份比例分攤。這種公司，稱爲合股公司。這些合組公司或合股公司，有時擁有專營的特權，有時又不擁有這種特權。

所謂合組公司，在一切方面，都與歐洲各都市普遍通行的同業組合相類似，而且與同業組合同爲一種擴大的獨佔團體。一個都市的任何居民，如果他不先從同業組合方面取得自由營業權，他就不能從事參加同業組合的一切行業。同樣，在大多數場合，一國的任何人民，如不先成爲這公司的一員，那麼，他就沒有法律上的權利經營合組公司任何一部門的國外貿易。這種獨佔權的強弱，與公司入夥條件的難易相應，也與公司董事權力之大小——即被等有多大權力能把公司控

制得使大部分貿易只有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友可以經營——相應。最初，合組公司的徒弟所享的特權，與其他公司徒弟所享的特權一樣。凡在公司服務了相當年限的學徒，不用交什麼人夥金，或只須交比平常人少得多的入夥金即可取得公司成員的資格。只要法律不加制止，組合的普通精神，就橫溢於一切合組公司中。只要容許它們依照其自然傾向行動，它們總是巧立種種苛刻規章，企圖約束有關貿易的經營，從而把競爭限制於盡可能少的人數之間。但當法律不許它們這樣做的時候，它們就變成完全無作用、完全無意義的東西。

對外貿易的合組公司，現今在英國還存有下列五個，即漢堡公司（昔日稱為商人冒險家公司），俄羅斯公司，東方公司，土耳其公司及非洲公司。

漢堡公司的入夥條件，據說今日十分容易。公司董事沒有權力把有關貿易加以繁瑣的約束。至少他們沒有使用這種權力。不過，這還是最近的事，以前不是這樣。在前世紀中葉，該公司的人夥金，有時須五十鎊，有時須一百鎊。據說，那時候公司的行為，非常專橫。1643年、1645年、1661年，英格蘭西部毛織業者及自由貿易者，曾以該公司憑着獨佔者的地位，阻制貿易，壓迫國內製造業者，訴於國會。這種呈訴雖不曾使國會採取什麼行動，但該公司卻因此大嚇一跳，把它向來的行動改正不少。自那時起，至少沒有人再控訴它。俄羅斯公司的入夥金，由威廉三世第十年及第十一年第六號法令減為五鎊；東方公司的入夥金，由查理二世第二十五年第七號法令減為四十先令，同時，各該公司在瑞典、丹麥、挪威乃至波羅的海北岸一切國家的專營特權，統予取消。國會這兩條法令，大概是由該兩公司的行動激成的。在國會未頒佈此等法令以前，約西亞·柴爾德曾稱此兩公司及漢堡公司極端專橫。他並說，當時本國與各該公司特許狀所包括國家間貿易狀態所以不振，正是各該公司經營失當的結果。現在，它們也許沒有那麼專橫，但它們確是沒有用處了。沒有用處實是合組公司應得的最好讚辭，就上述三公司的現狀說，它們通通可承受這讚辭而無愧。

土耳其公司的入夥費，年二十六歲以下者二十五鎊，二十六歲以上者五十鎊。凡非純粹商人不得加入。此種限制，實把一切店員和零售商都排斥在外。又據該公司章程，凡屬英國運往土耳其的製造品，

非經該公司船舶裝載，不許輸出。該公司船舶，例由倫敦一港啓碇，因此，英國對土耳其貿易，就侷限於這個奢華的港口了。經營此項貿易，也侷限於倫敦附近居民了。該公司的另一章程又規定，凡定居倫敦市二十英里以外，沒有取得該市市民權者，不得加入該公司。這種限制，連同前一限制，必然把一切沒有取得倫敦市民權者都排斥在外。該公司船舶的上貨及啓碇日期，既通由該公司董事決定，所以這些董事很容易以自己及有特殊關係友人的貨物裝滿船舶，而以託運過遲為藉口，拒絕他人的貨物。在這種情況下，該公司無論就那一點說，都可以說是嚴密的、專橫的壟斷組織。這種種弊害，惹起喬治二世二十六年第十八號法令的頒佈。依此法令，不論年齡大小，不論是否純粹商人，也不論是否取得倫敦市民權，凡屬情願入夥者，一律繳納入夥費二十鎊，即可取得公司成員的資格。並且，除禁止輸出的貨物外，這些入夥的人，得自由從英國任何港口，輸送任何英國貨物往土耳其任何地方；除禁止輸入的貨物外，都得自由輸入一切土耳其貨物，不過，他們須繳納普通關稅和為支付該公司費用而徵收的特定稅，須服從英國駐土耳其大使與領事的合法訓示，須遵照公司方面正式制定的章程。為防範此等章程流於苛暴，上述法令又規定，此法令通過後，凡公司所訂章程，設使該公司中任何七個夥員感到壓迫，得向貿易殖民局（該局的此種權能，現由樞密院所組織的委員會執掌）呈請修改。但此種呈請，須在該章程制定後一年內提出。此外，此法令通過以前公司所制定的任何章程，如有七個夥員感到壓迫，也可呈請修改，但須在該法令實施後一年內提出。然而在一大公司中，各夥員未必——一部能憑一年的經驗，發現各種章程的弊害。如果某一章程的弊害，他們中有幾個在限定期間以後才發現，那麼，就連貿易局、樞密院委員會也無法挽救了。況且，象一切同業組合的章程一樣，一切合組公司大部分章程的目的，不在於壓迫已經加入的夥員，而在於阻礙外人的加入。除規定很高的入夥費外，它們還可使用其他許多方策以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斷要求自己的利潤增高，愈高愈好，因而，不斷要市上對於他們輸出輸入的存貨，感到不足，愈不足愈好。要做到這層，就只有限制競爭，妨礙新冒險者從事同一貿易。就說二十鎊的入夥費吧，對於一個想永久繼續從事土耳其貿易的人，二十鎊也許不夠阻礙他的意向；但是對於一個只想試做一次土耳其貿易的投機商人，二十鎊就夠使他裹足了。不論何種職業，久於其業者，縱未

締結何等組合，他們也自然會聯成一氣，設法擡高利潤。要使商業利潤降低至相當水準，唯一的方法，就是讓一般投機冒險者不時起而競爭。英國對土耳其貿易，在某種程度上，雖由國會這個法案開放了。但在許多人看來，那實在距離自由競爭局面還遠。土耳其公司開支了一名大使兩三名領事的維持費，其實，公使領事，同為國家官吏，應由國家收入維持，而對土貿易，亦當對國王治下一切臣民開放。況該公司為此目的及其他目的而徵收的各項雜稅，若提歸國有，當不止維持這幾個駐外官吏。

據約西亞·柴爾德的考察，駐外官吏雖常由合組公司維持，但合組公司從未在其所與貿易的國家維持任何堡壘或守備隊。反之，合股公司卻常常在這種國家維持堡壘或守備隊。看來前者實比後者遠不宜於承當這個任務。第一，合組公司董事，對於該公司一般貿易的繁榮，並無何等特別利害關係，而維持堡壘和守備隊的目的在於維護這個繁榮。公司一般貿易的衰退，對他們私人的貿易倒有不少利益。因為，公司一般貿易衰退，競爭者自減少，於是他們自己就能賤買貴賣。合股公司董事的情況，則與此正相反。他們個人的利得，統包含在他們管理的共同資本所生的共同利潤中，離開公司的一般貿易，他們就沒有貿易。他們私人的利害關係，與一般貿易的繁榮，和保障這繁榮的堡壘或守備隊的維持，緊相結合。因此，就維持堡壘或守備隊所必要的不斷和仔細的注意說，和合股公司董事相比，他們似乎更會保持這種注意。第二，合股公司董事，手中常掌管有一大宗資本，即公司方面的股本。堡壘守備隊如有設置、增補、維持的必要，他們當然隨時可以劃出一部分資本，拿來應用。至於合組公司董事，他們並沒有掌管什麼共同資本；除了一點臨時收入，如公司入夥金，及課於公司貿易上的組合稅以外，沒有其他資金可以動用。所以，對於堡壘和守備隊的維持，即使他們和合股公司董事一樣，有利害的關係，作同樣的注意，但也很少有同等資力，使其注意成為有效。至於駐外官吏的維持，那就無須什麼注意，費用亦輕而易舉，就合組公司的性質和能力說，都更為相稱。

然在柴爾德的時代以後許久，即1750年間，一個合組公司又設立了，即是現時的非洲貿易商人公司。英政府最初曾令該公司負擔非洲沿岸由布蘭角至好望角間一切英國堡壘和守備隊的維持費；最後，又

令該公司只負擔魯傑角好望角間一切堡壘和守備隊的維持費。政府關於設立這公司的法案（喬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三十一號法令），似乎有兩個明顯目標。第一，對於合組公司董事自然會有的壓迫精神和獨佔精神，加以抑制；第二，極力強迫他們去注意本來不會注意的一件事，即維持堡壘與守備隊。

關於第一個目標，該法案限定入夥費為四十先令，並限定該公司不得以合股經營的身分，自己出來從事貿易，不得以公印借入資本；對於一切繳納入夥費的英國人民，都當任其在各地自由貿易，不得巧立限制。公司的管理權，操於集駐倫敦的由委員九人組成的委員會。委員每年由倫敦、布裏斯托爾和利物浦三市的公司夥員中各選三名，任何委員都不得連任三年以上。委員有不當行為，貿易殖民局（現由樞密院委員會接管）在聽了他本人的辯護後得免其職。該委員會不得由非洲輸出黑奴，亦不得運非洲貨物入英國。但因他們須負責維持駐在非洲的堡戍，所以由英國向非洲輸出的各種與這任務有關的貨物及軍需品不在禁止之列。他們由公司領取的錢，不得超過八百鎊。如果開銷在倫敦、布裏斯托爾、利物浦三市的辦事人員和經理人薪俸與倫敦事務所房租以及其他一切雜費後還有餘剩，則可用以報酬他們自己的辛勞，至於如何分配，那聽他們自行決定。一切規定如此嚴密，照理該可切實限制獨佔行為，而充分達到第一項目標了。然樓之實際卻不如此。依喬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號法令，舉凡桑尼加堡壘及其屬地，統由非洲貿易商人公司管理。但至翌年，（依喬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四號法令）公司方面不但要把桑尼加及其屬地，就連由南巴巴利的薩利港至魯傑角全海岸的管理權，亦須統統移歸國王支配。該法令並宣稱：凡屬國王的臣民，都可自由進行非洲貿易。這個法令的宣佈，當然是因為該公司有限制貿易建立某種不當的獨佔的嫌疑。在喬治二世第二十三年法令的那種嚴密規定之下，我們很難設想他們怎能夠這樣做。但是，我曾在下院的議事錄（這議事錄並不總是完全確實的）中看到他們受到這種控告。委員會的九位委員，既都是大商巨賈，各堡戍及殖民地的大小官員，又仰承他們的鼻息，那麼，他們在商務上及事務上有所囑託，那些官員很可能特別注意。這一來，就無形樹立了一種獨佔的場面。

對於第二個目標，該法令規定：堡戍維持費，每年由國會付與該公司一萬三千鎊。公司委員會對此金額的使用，每年須向國庫主計提出報告，國庫主計再向國會報告。但國會對於國家的歲用，往往數百萬鎊，亦漫不注意，這區區一萬三千鎊的使用，當然不會使它注意。況且，就國庫主計的職務和教育而論，堡戍費用得當與否，他不見得能悉其底蘊。不錯，王國海軍艦長或海軍部委派的將官，可以調查堡戍實情，向海軍部報告，但海軍部對該委員會似乎沒有直接管轄權，也沒有權力糾正被調查者的行動，而艦長一類人物，對於築壘這門科學，並不見得總是有高深的造詣的。這些委員如非侵吞公款，即欲加罰，頂多不過罷免官職；我們知道，委員這官職的任期，再長不過三年，而其報酬又極有限，要使罷免的顧慮成爲一種強制他們的動力，使他們經常想到那對自己並無其他利益的守戍事務，那怎能辦到呢？爲修繕幾內亞海岸卡斯爾角的堡壘，議會曾幾度支出了臨時餘額，有人控訴該委員會由英格蘭運去磚石，由這樣長途運去的磚石，據說質量很差，以致用那磚石修築的牆，有推倒再築的必要。魯傑角以北的堡戍，不但維持費出於國家，即管轄權亦直隸於行政當局之下。但該角以南的堡戍費用，至少一部分亦出自公家，而其管轄權卻別有所屬，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布羅陀及米諾卡守戍的設備，其本來目的或口實，在於保護地中海貿易。此等守備隊的維持及管理，從未責成土耳其公司，而始終由行政當局管轄。統治領域的廣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該行政當局聲威所繫，所以，這領域防禦上的必要設置，他們當然不會不問，實際上，直布羅陀及米諾卡守戍的管理，一向並未疏忽。雖米諾卡曾二度被奪，而且現在大概永無恢復希望，但人們從未把這歸咎於該行政當局管轄上的怠慢。不過，我不願被人認爲我是在暗示，這些糜費浩大的要塞，對原來所以把它們從西班牙手中奪過來的目的來說至少是必要的。奪取這些要塞，沒有什麼意義，反之，卻只使英國見棄於其自然的同盟者西班牙，並使波旁王室的兩大支流結成超過血緣關係的更緊密更永久的同盟罷了。

股份公司的設立，或經國王敕許，或由議會通過。它的性質，不但與合組公司不同，即與私人合夥公司，亦有許多點不同。

第一，在私人合夥公司中，非經全公司許可，夥員不得把股份讓渡給他人或介紹新夥員入夥。但夥員如欲退出，得預先聲明，經過一

定時間提回股本。股份公司則不然。股份公司不許股東要求取出股本，但轉賣股票，從而介紹入新股東，卻無須公司同意。股票價值，體現在市場上的價格。這價格時有漲落，因此，股票所有者的實際股金，就與股票上註明的金額，常有出入。

第二，私人合夥公司在營業上如有虧空，各夥員對其全部負債，都負責任。反之，股份公司在營業上的虧空，各股東不過就其股份範圍內，負其責任罷了。

股份公司的經營，例由董事會處理。董事會在執行任務上固不免受股東大會的支配，但股東對於公司業務多無所知，如他們沒有派別，他們大抵心滿意足地接受董事會每年或每半年分配給他們的紅利，不找董事的麻煩。這樣省事而所冒危險又只限於一定金額，無怪許多不肯把資產投於合夥公司的人，都向這方面投資。因此，股份公司吸收的資本通常超過任何合夥公司。南海公司的營業資本，在某一個時期，曾達到三千三百八十萬鎊以上。英格蘭銀行的分紅股本，現在，計達一千零七十八萬鎊。不過，在錢財的處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為他人盡力，而私人合夥公司的夥員，則純是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們監視錢財用途，象私人合夥公司夥員那樣用意周到，那是很難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樣，他們往往設想，着意小節，殊非主人的光榮，一切小的計算，因此就拋置不顧了。這樣，疏忽和浪費，常為股份公司業務經營上多少難免的弊竇。唯其如此，凡屬從事國外貿易的股份公司，總是競爭不過私人的冒險者。所以，股份公司沒有取得專營的特權，成功的固少，即使取得了專營特權，成功的亦不多見。沒有特權，他們往往經營不善，有了特權，那就不但經營不善，而且限制了這種貿易。

現在非洲公司的前身，即皇家非洲公司。該公司取得的專營特權，是根據國王頒給的特許狀，未經議會通過。因此，在民權宣佈後不久，非洲貿易就開放於全國人民。哈德遜灣公司的法律根據與皇家非洲公司同，其特許狀亦未經議會通過。南海公司在它作為貿易公司的期間，始終享有一種經議會確認過的專營特權。現令和東印度進行貿易的聯合商人公司也是如此。

非洲貿易開放後不久，皇家非洲公司自知非私人冒險者的競爭敵手，於是不顧民權宣言，竟把這些私人冒險者稱為無執照營業的私商

而加以迫害。1698年，對私人冒險者幾乎一切部門的貿易均課以百分之十的稅，稅款由公司充作堡壘及守備隊維持費。但儘管有這種重稅，公司在營業上仍不能和私人競爭。公司的資本及信用着着減退。至1712年，公司負債累累，使議會認為，為公司及債權人的安全，有必要制定以下法案，即公司債務的償付日期以及關於債務的其他必要協定，只須公司債權人（就人數言，就價值言）三分之二以上的決議，就對全體債權人有約束力。1730年，公司的業務陷於極度混亂。就連維持它的堡壘和守備隊，亦無能力。然設立這公司的唯一目的或口實，卻就是維持這些堡壘和守備隊。議會見此情形，決定每年撥款一萬鎊，作這用途。此款自那年度起一直撥至該公司解散的年度止。1732年，該公司因多年對西印度黑奴貿易都是虧損，決定從此中止，而把已經由非洲海岸買得的黑奴轉賣於美洲私人貿易者，把公司中的僱役，用以從事非洲內地的金沙、象牙、染料的貿易。但這範圍縮小的貿易，其經營並不比先前範圍廣泛的貿易更為得手。公司的業務，依然日形衰退，無論就那一點說，都達到破產的狀況。議會知無可挽救，下令把它解散。其堡壘及守戍，則責成現今在非洲貿易商人所組織的合組公司管理。在皇家非洲公司設立之前，先後組織進行非洲貿易的，已有三家股份公司，它們都沒有成功。它們都持有特許狀，該特許狀雖未經議會確認，但在當時被認為確賦有專營特權。

在上次戰爭中，哈德遜灣公司受到不小的打擊。可是在此以前，它卻遠較皇家非洲公司幸運。它的必要費用很少。它在各居留地及住所——該公司說得好聽地稱此為堡壘——所維持的人的總數，據說不過一百二十名。但人數雖少，在該公司貨船未到以前，卻足夠把裝滿貨船所必需的數量的毛皮及其他貨物收積妥當。當地海口結冰期長，船舶很少能停泊七、八週以上；因此，預先積貨，成為必要。哈德遜灣貿易不做到這層就無法經營，而私人冒險者想做到這層，非十數年莫辦。所以，該公司資本雖據說不到十一萬鎊，然已足夠使它把特許狀所許可的那雖然廣闊但卻是貧乏的地帶的全部或將近全部的貿易和剩餘生產物，都壟斷無餘。私人貿易者從來沒有企圖到那種地方與公司競爭，所以，該公司在法律上，雖不一定擁有專營特權，而在實際上，卻已享受了專營貿易的利益。加之，該公司所有的少額資本，據說，是由極少數股東集成。一個只有少數股東小額資本的股份公司，其性質實與私人合夥公司相近，從而在經營上，幾乎能和合夥公司同

樣謹慎、同樣注意。處在這樣有利的地位，哈德遜灣公司在上次戰爭前貿易相當成功，是毫無足怪的。不過，該公司獲得的利潤，似乎沒有達到多布斯所想象的那個程度。《商業上歷史和年代的推斷》著者安得生，是一個比多布斯遠為率直而公平的作者，他研究多布斯關於該公司數年中輸出輸入的全部報告，並參酌該公司所冒的大危險和所付的大開支以後，認為該公司的利潤，並不值得羨慕，或者說，並不大超過普通的貿易利潤，如果真有超過的話。他這樣的論評，是很恰當的。

南海公司從沒有維持什麼堡壘或守戍，因而完全不須負擔其他國外貿易公司所通常負擔的一大費用，不過，該公司股本額過大，股東數極多，因之，在整個業務經營上，不免失之迂愚、疏忽和浪費。至於它招股計劃的詭詐與無節制，那非現在討論的主題，而且已為人所深悉，不說了。就它的商業計劃說，與招股計劃比較，也好不了許多。該公司首次經營的貿易，就是把黑奴輸往西領西印度。它對於這項貿易（由尤特雷特條約所認可的所謂阿西思託約定的結果），取得了一種專營的特權。但是，特權雖然取得了，但這項貿易不見得會有多大的好處。在該公司以前，經營同一貿易、享有同一特權的葡萄牙及法國兩公司，早已經倒閉了。該公司有鑑於此，要求並得到准許每年派遣一定噸數的船舶，直接與西領西印度通商，以為彌補。無奈該公司所派船舶，航行十次當中，只有一次（即1731年加洛林皇后號的航行）獲了巨利，其餘九次，幾乎多少都有損失。該公司的代理店及代理人都把營業的不成功歸罪於西班牙政府的強奪與壓迫。但大部分，恐怕是由於代理店及代理人的浪費與掠奪吧。據說：他們中好幾個在一年時間內，就發了大財。1734年，該公司以營業利潤微薄為理由，請求英王許其變賣貿易權與船隻，許其等價賣給西班牙國王。

1724年，該公司開始經營捕鯨業。對於這項業務，它沒有獨佔權，不過，在它經營的期間，並無其他英國人攙入。該公司的船舶，曾航行格林蘭八次。就中，僅有一次得利，其餘均遭損失。在最後第八次航行終了時，即該公司拍賣其船隻、積藏商品、漁具時，才發現這一部門包括資本及利息的全部損失達二十三萬七千鎊以上。

1722年，該公司請求議會，把全部貸與政府的三千三百八十萬鎊巨資，劃分作兩個相等的部分；一半即一千六百九十多萬鎊，作為政

府的公債，與其他公債同，不得由董事用以償付和彌補該公司商業經營上的債務或損失，其他一半，依舊作為貿易資本，得用以償付和彌補債務或損失。它這種請願，議會認為合理採納了。1733年，該公司再向議會陳請，把貿易資本的四分之三作為公債，僅留其餘四分之一充當營業失敗的補償資本。到這時為止，該公司所保有的公債及貿易資本兩者，因政府幾度的償還，已各減少了二百萬鎊以上，因而，這所謂四分之一，就不過三百六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四鎊八先令六便士了。1748年，該公司由於亞琛條約，放棄前此依阿西恩託約定從西班牙國王取得的一切權利，而換得相當等價。這一來，該公司與西領西印度之間的貿易，就告終結。它的殘餘貿易資本，全化為公債，於是該公司再也不是一個貿易公司了。

可是，我們應注意一件事：南海公司所期望能多多獲利的唯一貿易，就是每年派遣船隻到西領西印度進行的貿易。但當它經營這種貿易時，無論在國外市場，或在國內市場，都不是沒有競爭者的。在卡塔赫納，在貝洛港，在拉維拉克魯斯，該公司碰着了西班牙商人的競爭，他們把該公司船舶裝出的同種歐洲貨物，由加的斯運往那些地方。在英國，該公司又碰着了英國商人的競爭，舉凡該公司輸入的西領西印度貨物，他們也由加的斯輸入。不錯，西班牙及英國商人的貨物，要付較重的稅，但該公司人員的疏忽、浪費和貪污，恐怕是一種更高的重稅吧。至於說，如果私人貿易者能夠公開地、正當地和股份公司競爭，股份公司還能經營國外貿易得利，那就違反我們一切的經驗了。

舊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600年根據女王伊麗莎白的特許狀設立。在它最初十二次的印度航行中，只有船舶是共有的，貿易資本還是各個人的，彷彿是以一種合組公司的形式在進行貿易。在1612年，各個人的資本才合併為共同資本。該公司持有專營特許狀。這特許狀雖未經議會確認，但當時被認為具有真正的專營特權，所以經營許多年，該公司從未受其他商人的侵擾。它的股本，每股為五十鎊，總額僅七十四萬四千鎊。這個資本不很大，而公司的營業規模也不很大，不致惹起經營上怎樣的疏忽、浪費或貪污。所以，雖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陷害，和其他的意外事變，使它蒙受了很大損失，但在許多年間，它的營業卻很成功。不過，隨着時日的推進，當一般人對於自由的原理

漸有理解時，這由女王發給而未經議會確認的特許狀，能否賦予專營特權日益成爲疑問。對於這個問題，法院的決定並不一律，隨政府權力的消長與各時代民意的變遷而時有變動。私人貿易者日益侵入公司特權範圍。到查理二世晚年，在詹姆士二世整個統治時期和在威廉三世初年，該公司都是在困難中過日子。1698年，有人向議會建議，願以年息八釐貸給政府二百萬鎊，其條件爲購買公債者得設立一個有專營特權的新東印度公司；舊東印度公司亦向議會提出同一性質的建議，願貸給政府七十萬鎊（約與該公司的資本額相等），年息四釐。當時王國的國家信用正處於這樣的狀態，即以年息四釐借入七十萬鎊，倒不如付八釐息借入二百萬鎊來得便利。新公債應募者的建議被容納了，結果，就出現了一個新東印度公司。不過，舊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權利，得繼續至1701年。同時，該公司曾以它會計的名義，極巧妙地認買了新公司股本三十一萬五千鎊。給與認購二百萬鎊公債者以東印度貿易特權的議會法案，由於用辭的含混，關於應募者的資本應否合爲共同資本一點，不很明白。於是，應募僅及七千二百鎊的少數私人貿易者，堅持各別地自用自己資本、自擔危險責任進行貿易的權利。至1701年止，舊東印度公司亦有使用其舊資本獨立經營貿易的權利。並且，在這個時期前後，該公司和其他私人貿易者一樣，也有使用其投入新公司的三十一萬五千鎊的資本單獨經營貿易的權利。新舊二公司與私人貿易者間的競爭，以及兩公司彼此間的競爭，據說幾乎使它們全歸毀滅。1730年，有人向議會提議，主張把印度貿易置於一個合組公司管轄之下，使其相當開放。這個建議，東印度公司極力反對；他們以非常激烈的辭句，陳述那時候上述競爭所演成的可悲結果。他們說，上述競爭，使印度土貨價格，高到不值採購，而在英國市場，該貨物價格，又因存貨過多，跌到無利可獲。可是，供給豐足，英國市場上印貨會大跌特跌，使一般大衆獲得廉價購物的利益，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至於說求購者多，印度市上土貨會大漲特漲，卻不盡可信。由競爭促起的非常需求，在印度的貿易大洋中，不過涓涓一滴而已。況且，需求增加，起初或許會提高價格，但終必引起價格的跌落。因爲購買的競爭，會獎勵生產，會增大生產者間的競爭。各生產者爲使自己的產品，能以比他人產品爲低的價格出售，會實行在其他情況下連想也沒去想的新的分工和新的技術改良。該公司訴說的悲慘結果，即消費的便宜和對生產的獎勵，正是政治經濟學所要促

進的結果。但是，他們垂泣而訴說的競爭，畢竟沒有繼續好久。1702年，這兩個公司通過三方協約（其中一方是女王）在某種程度上合併起來。1708年，又依據議會法案，完全合為一體，而成為今日所謂東印度貿易商人聯合公司。該法案又附一條款，規定各獨立私人貿易者，得繼續營業到1711年米迦勒節為止。同時授權該公司董事對這些獨立私人貿易者發出通知，以三年為期，收買其七千二百鎊的小資本，從而把該公司的全部資本變為共同資本。此外，該法案還規定：該公司的資本，由於對政府的新貸款得由二百萬鎊增加至三百萬鎊。1743年，該公司又貸與政府一百萬鎊，不過，這項借款非來自股東，而是由公司發行公司債得來，所以未增加股東得以要求分紅的資本。但這一百萬鎊，對公司營業上的虧損和債務，與其他三百萬鎊同，也負擔責任，所以，總算是增加了公司的貿易資本。自1708年，或者至少自1711年以來，該公司由於擺脫了一切競爭者，完全掌握英國在東印度的獨佔貿易。貿易經營很得手，股東逐年都由利潤分有適度的紅利。在1741年爆發的對法戰爭中，龐迪徹裏地方的法國總督杜不勒，別具野心，以致東印度公司捲入戰渦和印度土王的政爭中。經過無數次顯著的成功及無數次顯著的失敗後，該公司竟把那時它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馬德拉斯丟掉了。嗣後，亞琛條約成立，馬德拉斯復歸於該公司。這時，該公司派在印度的人員，似充滿了戰鬥及征服精神；後來，從未放棄這精神。在1755年爆發的法蘭西戰爭中，英國的兵力，在歐洲迭獲勝利。該公司的兵力，在印度亦交好運，捍禦馬德拉斯，佔領龐迪徹裏，收復加爾各答，並獲得一個富裕而廣大的領土的收入。這收入在當時，據說，每年有三百萬鎊以上。該公司安然享有這收入好幾年。但1767年，政府以該公司佔領的領土及其收入屬於國王的權利而提出要求，公司於是同意此後每年償付政府四十萬鎊，作為這權利的報酬。在這時以前，公司分派的紅利，已逐漸由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十。就全資本三百二十萬鎊計算，紅利已增加了十二萬八千鎊，換言之，每年紅利額，已由十九萬二千鎊增加至三十二萬鎊。但這時候，公司又企圖把紅利進一步增至百分之十二點五。這如果實行，公司每年分派給股東的金額，就要等於每年提供政府的金額，即四十萬鎊。可是，當公司與政府所訂協定就要實施的那兩年中，議會相繼制定的兩法案不許紅利再有增加。這些法案的目的，在使公司方面加速償還其所負債務。該公司當時的債務，已達六、七百萬鎊了。

1769年，公司與政府所訂協約，議定延期五年，並約定在這五年中，公司得逐漸把紅利增加至百分之十二點五，但一年之中至多隻許增加百分之一。這樣，紅利增加到極限時，亦不過使公司每年付給股東及政府的金額，兩者合計加多六十萬八千鎊。前面說過，公司最近佔領地的總收入，每年計有三百餘萬鎊。依1768年東印度貿易船克魯登敦號提出的報告，除去軍事維持費及其他費用，純收入亦達二百零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鎊。此外，公司方面據說還有其他收入，那收入一部分出自土地，而大部分則出自殖民地所設的海關，其總額亦不下四十三萬九千鎊。至於當時公司的營業利潤，據公司董事長在下院的證言，每年至少有四十萬鎊；據公司會計的證言，每年至少有五十萬鎊；不論怎樣，再少也會等於每年分給股東的最高紅利額吧。有這麼大的收入，公司應當有能力每年增付六十萬八千鎊，同時並提供一項減債基金，以備急速償還債務。然至1773年，公司債務不但未見減少，卻反形增大。未完的國賦達四十萬鎊；未繳的關稅，欠英格蘭銀行的借款，由印度方面向其開出而經其鹵莽地承兌的待付的匯票，這三者共達一百二十餘萬鎊。這些債務所引起的困難，使公司不得已一下子減低股息至百分之六，此外更乞憐政府，請其第一，豁免年納四十萬鎊的成約；第二，貸款一百四十萬鎊，以救立刻破產的危急。拓殖領地哪，增加歲入哪，該公司的財產是增大了，但財產愈大，對於公司人員，就似乎愈成為更大浪費的口實，並且愈好從中舞弊了。議會為要探知其真相，乃着手調查公司人員在印度的行動，以及公司在歐印兩方面的一般業務狀況。調查的結果，對公司管理機構的組織，國內也好，國外也好，都實行幾種極關重要的變革。在印度方面，該公司的主要殖民地，如馬德拉斯、孟買、加爾各答，以前相互獨立，今則置於同一總督統治之下，輔佐總督的，有四名顧問組成的評議會。第一任總督及顧問，通由議會指派，常駐在加爾各答。加爾各答現成為英國在印度的最重要殖民地，與以前的馬德拉斯同。加爾各答的裁判所，原為審理該市及其附近地方的商業上案件而設立，後因帝國版圖擴大，其司法管轄權亦隨之擴大。此次變革，縮小該裁判所的權限，使還其本來面目，而新設一最高法院代替它，由國王任命審判長一人及審判官三人組成。關於歐洲方面，以前股東出股五百鎊，即該公司每股的原來價格，就有權在股東會投票。現在限定，必須出股一千鎊，纔有這資格。此外，憑這資格取得的投票權，如股票非由承

繼而由自己購買得來，以前只須在購買後六個月就能行使，現在這個期限已延長至一年。還有，以前公司的二十四名董事，每年改選一次，現在也改變了，每個董事四年改選一次，但在二十四名董事中，每年有六個舊董事出去，有六個新董事進來，出去的董事，不能再選為次年的新董事。有了這些改革，料想股東會及董事會應能較鄭重地、穩健地執行任務，不再象從前那樣疏忽隨便。然而，無論怎樣變革，要使他們這般人好好注意促進印度的繁榮，哪能做到呢。他們大多數人的利益，與印度的利益，簡直漠不相關。在一切方面，他們不但不配統治一個大帝國，而且連參加這種統治也不配。有大財產的人，有時甚至小有產的人，往往只因為要取得股東大會的投票權，才購買一千鎊的東印度公司股票。有了這投票權，縱不能自己參加印度的掠奪，也可參加印度掠奪者的任命。這任命權力，固然是操於董事會，但董事會本身，多少不免要受股東勢力左右：股東不但選舉董事，而且有時否決董事會關於派駐印度人員的任命。假若一個股東能享有這權力幾年，因而可在公司方面安插若干故舊，那他慢說對股息不大注意，恐怕連對他投票權所根據的股份的價值也是滿不在乎的，至於那投票權所給與他權力來參加統治的大帝國的繁榮，他哪裏會放在心上呢。不論怎樣的君王，按照事物的本性揣度起來，對於被統治者的幸福或悲慘，對於領土的改進或荒廢，對於政府的榮譽或恥辱，總不會象這個商業公司的大部分股東這樣漠不關心吧。議會依據調查結果，制定種種新規，但這些法規與其說減少了這漠不關心的程度，倒不如說增大了這漠不關心的程度。例如，下院決議案宣稱：當公司把所欠政府債務一百四十萬鎊還清，所欠私人債務減至一百五十萬鎊時，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得對股本分派八釐股息；此外，該公司留在本國的收入及純利，當分作四部分，就中三部分交入國庫，充當國家用途，其餘一部分，則留作償還債務及供應公司不時急需的基金。但是，在全部純收入和利潤都歸自己所有，得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時候，公司還是弊竇叢生，顛預不治；今分去其四分之三的純收入和利潤，更把所保留的四分之一部分置於他人監督之下，須得他人許可方準動用，那要公司事務財政較前改進，怎能做到呢。

就公司方面說，分派八釐股息後，與其依下院決議案規定，把一切餘剩部分，交給聲氣不相投的一羣人手中，倒不如讓公司的僱用人員和隸屬人員隨便濫用了，任意侵吞了，還比較痛快。此外，公司僱

用人員和隸屬人員可能在股東會裏佔那麼大的勢力，以致股東有時竟對貪污舞弊直接違犯自己權益的人，反加援手。就大部分股東說，他們有時甚且把擁護自己權益這件事，看得較輕，把擁護侵犯這權益的人的事體，看得較重。

因此，1773年的規定，不能澄清東印度公司統治的混亂局面。有一次，公司因一時措施得當，在加爾各答金庫中，積存了三百多萬鎊。可是，儘管以後它的支配或掠奪範圍，更加擴大，伸到印度好幾個最富裕、最肥沃的地區，但它所獲的一切，都是照舊濫費了，葬送了完事。到海德·阿利侵入，公司發覺完全沒有準備，無法阻止與抵抗。由於這些混亂，今日（1784年）公司已陷於前此未有的困境。為救濟當前破產危難，又迫而向政府懇求援助。關於改善該公司業務經營，議會中各黨派提出種種計劃。這些計劃，似都同意一點，即該公司不配統治它所佔有的領地。這實是一向就非常明瞭的事實。就連該公司自身，也認為無統治能力，因而想把領地讓給政府。

在僻遠而野蠻的國境裏面擁有設置要塞和守備隊的權利，必然與當地宣戰搖和的權利分不開的。擁有前一權利的股份公司，曾不斷行使後一權利，且常常要求把後一權利明白地給與它們。它們行使這種權利怎樣不得當，怎樣隨便，怎樣殘酷，從最近的經驗，我們知道得再清楚沒有了。

一批商人自出費用，自冒危險，在野蠻異域樹立新的貿易，政府許其組成股份公司，並於經營得手時，給以若干年的獨佔權利，那是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實在說，政府要報酬這種冒險費財而且異日會造福大眾的嘗試，也只有這是最容易、最自然的方法。象這樣一種暫時的獨佔權利，和給與新機器發明者對這機器的專利權，給與新著述的著作者對該著述的出版權，可依同一原理加以辯護。不過，限定的時期既滿，獨佔是應當取消的。如果堡戍仍有維持必要，自應移歸政府，由政府償以相當代價，而當地貿易，則讓全國人民自由經營。設公司長久獨佔，其結果將無異於對全國其他人民加以不合理的負擔。這負擔有二種。第一，聽人民自由貿易，有關貨物的價格必廉，行使獨佔，這些貨物的價格必貴。第二，對大多數人民可能是便於經營、利於經營的一種事業，現在人民弄得不能染指。他們受這負擔，乃是為着最不足道的目的，即不過使某公司能維持其怠慢、浪費、乃至侵

吞公款的僱員罷了。由於這些人員的胡爲亂搞，公司分派的股息，很少超過其他自由事業的普通利潤率，且往往落在這普通利潤率以下很多。吾人就往事推斷，股份公司如未取得獨佔權利，恐怕是無法長久經營任何國外貿易的。在一個地方購入貨物，運往另一地方出售圖利，而在這兩地方都有許多競爭者，這樣就不但需要時刻留心注意需求情況的偶然變動，而且需要時刻留心注意競爭情況或需求所從滿足的供給情況的大得多、頻繁得多的變動；運用巧妙的手腕和正確的判斷力，使各色貨物的數量，都能適應需求、供給和競爭各方面的變動情況，這是伊然從事一種不斷變化着的戰爭，非不斷注意着警惕着，就無勝利希望，然而股份公司的董事先生們，我們那能期望其有這種持久力呢。所以，東印度公司，當債款既已償卻，專營特權亦取消時，議會雖制定法案，許其仍以股份公司資格，在東印度與其他商人共同競爭，但在這種情形下，私人冒險者的警惕與注意，十之八九會不旋踵間就使公司卷於從事印度的貿易。

莫雷勒修道院院長爲法國有名著作家，對經濟學很有研究。他曾列舉1600年以後，在歐洲各地設立的國外貿易股份公司，一共有五十五家；據他說這些公司都取得有專營特權，但都因管理失當，全歸失敗。他舉出的這五十五家，就中有兩三家不是股份公司，而且未遭失敗，被他弄錯了。可是還有幾個失敗了的股份公司，他沒有列出。

一個股份公司沒有取得專營特權而能經營成功的貿易，似乎只有這種性質的貿易，即所有營業活動，都可簡化爲常規，或者說，方法千篇一律，很少變化或毫無變化。這類事業，計有四種：第一，銀行業；第二，水火兵災保險業；第三，建修通航河道或運河；第四，貯引清水，以供城市。

銀行業的原理，雖不免幾分深奧，但其實際業務，卻可一一定爲成規，以資遵守。設貪圖眼前厚利，大膽投機，置成規於不顧，總是極其危險，而且往往陷銀行於無可挽救的境地。但是，以股份公司與私人合夥公司比較，前者實比後者更能遵守成規。因此，股份公司就似乎很適於銀行的營業，無怪歐洲主要銀行，都是股份公司的性質。在這些公司當中，有許多並未取得專營特權，而其經營卻非常興旺。英格蘭銀行，亦全無特權可言，有之，唯議會限定其他銀行的組成，

股東不得過六人以上。愛丁堡兩銀行全為股份公司，並無任何獨佔權利。

由火災水災乃至戰禍發生的危險，其價值雖不能很正確地計算出來，但可大概地估計出來，使得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訂出嚴密規則和一定方法。所以，沒有特權的股份公司，有可能順利地經營保險業；如倫敦保險公司，如皇家貿易保險公司，都是沒有取得何等特權的。

通航河道或運河一度修造成功了，其管理即非常簡單容易，可定出嚴密的規則與方法，甚至進行修造河道也是如此。修一里價多少，建一閘價多少，都可與承包人訂立合同規定。他如修造那引導清水供給城市的運河、水槽或大水管，也可作如此說法。這些事業由股份公司出來經營，即使未取得特權，亦可大獲其利，而實際也往往如此。

但是，設立股份公司，只因為這樣能經營成功，或者說，讓一羣特定商人享受其鄰人享受不到的權利，只因為這樣他們能夠繁榮，那是絕對不合理的。要使股份公司設立完全合理化，必其事業的經營，可以定出嚴密規則及方法，同時還附有其他兩個條件：第一，那種事業的效用，必顯然比大部分的一般商業更大和更普及。第二，其所需資本，必大幹私人合夥公司所能籌集的數額。凡以不很大資本即能舉辦的事業，縱使其效用特大，亦不能成為設立股份公司的充分理由。因為，在這場合，對於那種企業所產出的東西的需要，可很容易由私人企業者出來供給。就上述四種事業說，這兩個條件都同時具備。

銀行業管理妥當，其效用既大且周，本書第二篇已詳細說明了。但如果一家公共銀行的設立，其目的在於維持國家信用，即當國家有特別急需時，對政府墊付某一稅收全部，其數也許達數百萬鎊，而該稅收又須一兩年後才能收入，這種銀行所需資本，當不是私人合夥公司所籌集得來的。

保險業能予個人財產以很大的保障。一種損失本來會使個人趨於沒落的，但有了保險業，他這損失就可分配給許多人，叫全社會分擔起來毫不費力。不過，保險業者要想與他人以保障，他自己就必須有很大的一宗資本。倫敦西保險股份公司設立以前，據說，檢察長處有一名單，開列一百五十個私人保險業者的姓名，他們全都開業不到幾年就失敗了。

通航水道、運河以及供給城市自來水的各種必要工事，很明顯的，不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同時，其所需巨大費用，亦常非個人財力所及。

總之，股份公司的設立，必具上述三個條件，纔可算為合理。具有這三個條件的事業，我除上述四者外，再也不能想出其他的來。就說倫敦的英國制銅公司、熔鉛公司以及玻璃公司吧。言其效用，並不見得怎樣大，怎樣特別，言其費用，也並不是許多個人的財力難於舉辦。至於這些公司所經營的業務，是否能走出嚴密法則及方法，使其適於由股份公司管理，以及它們是否有它們自己所誇稱的可獲厚利的理由，那在我卻不敢佯言知道。礦山企業公司早就破產了。愛丁堡英國麻布公司的股票，近來雖沒有從前低落得那麼厲害，但較其票面價格，卻是相差太遠。我們更說其他基於愛國心即為着促進國家某特殊製造業而設立的股份公司吧；這種公司往往因為經營失當，以致減少社會總資本，而在其他各點上，同樣是利少害多。它們董事的意圖即使非常正直，但他們對某些特定製造業的不可避免的偏愛（這些製造業的當事人矇蔽他們、欺騙他們）必定會妨害其他製造業，必定會使在其他情況下必會存在的適當產業與利潤間的自然比例，多少受到破壞，而這自然比例，乃是一國一般產業的最大而最有效的獎勵。

第二項論青年教育設施的費用

由本身收入開支本身費用的事業，並不限於前述道路運河等等；對於青年教育的設施亦是如此。生徒付給教師的學金或謝禮，自然構成這一類的收入。

即使教師的報酬，不全取自這自然收入，那也不一定就要由社會的一般收入來開支；在許多國家，行政當局操這收入的徵集和運用之權。就大部分歐洲說，普通學校及專門大學的基金，並不仰給社會一般收入，就是有的話，其數目亦極其有限。教育經費到處都是主要來自地方收入，來自某項地產的租金，或來自指定專作這項用途的專款的利息。這專款或由君主自己撥給，或由私人捐助，交由保管人管理。

這些捐贈財產，曾對教育設施的促進有所貢獻麼？曾激勵教師的勤勉，增進教師的能力麼？曾改變教育的自然過程，使其轉向對個人

對社會雙方都較有用的目標麼？對於這種問題，只作大概的答覆，我想是不會怎樣困難的。

不論在哪種職業，操這職業的大部分人所作努力的大小，總是與他們不得不作這努力的必要性的的大小相稱。這種必要性，因人的境況而不同。一個人的職業報酬，如果是他所期望的財產或甚至是他的普通收入及生活資料的唯一源泉，那這必要性對他就最大。他為取得這財產或甚至為餬口，一年中必須作一定量有一定價值的工作。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麼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當然羅，在某些職業，只有成功纔可獲得偉大目標，這個情況，有時會誘使一些意志堅強雄心遠大的人去作努力。但是，最大的努力，卻明明用不着大目標來敦促。那怕是卑不足道的職業吧，競爭和比賽，亦可使勝過他人成為野心的目標。競爭和比賽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單有大目的而沒有促其實現的必要，很少足夠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在英國，精通法律，能使人到達許多極大野心的目標，但生長於富貴家庭的人，在這種職業上露其頭角的，究竟有幾個呢？

一個普通學校或專門學校如果有了一宗捐助的基金，教師勉勵的必要，就必然要減少若干。教師的生計，要是按月由一定的薪俸維持，那就明明仰給於與其教學成績和名望毫不相關的基金。

有些大學，教師的薪俸，僅佔其報酬的一部分，往往為極小的一部分，其餘大部分，則出自學生的謝禮或學費。在這場合，教師孜孜教誨的必要，雖不免減少一些，但卻不會完全消失。教學的名望還是重要的。此外，他還得關心學生對於他的敬愛、感謝及好評，而博得這種種好感，除了做得配受這些好感而無愧外，別無其他方法，就是說，除了儘自己的能力和勤勉履行各項任務外，再也沒有其他方法。

在其他大學，教師被禁止領受學生的謝禮或學費，而他的薪俸，就是他由這種職務取得的全部收入。在這場合，教師的義務與利益，立於儘可能對立的地位了。每一個人的利益，在於能過着儘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如果對於某種非常吃力的義務，無論他履行與否，其報酬完全一樣，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俗意義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去履行義務。設或這時有某種權力，不許他放棄職務，那他就會在那種權

力容許的範圍內，儘量敷衍了事。如果他生性活潑，喜歡勞動，那他與其把活動力使用在無利可圖的職務上，不如找點有利可圖的事做。

教師應當服從的權力，如掌握在法人團體即專門學校或大學的手，而他自己又為這學校或法人團體中的一員，其他成員大部分亦同為教師或可為教師者，那末這些教師們，彼此間就會寬大為懷；各個人以容許自己疏忽義務為條件，而寬宥同輩疏忽其義務。他們會把這樣做看作共同的利益。最近許多年來，牛津大學一大部分教授，簡直連表面上裝作教師，也不裝了。

如果教師們服從的權力，不掌握在他們自己所屬的法人團體之手，而掌握在外部的人物如主教、州長或閣員之手，那末，他們想全然忽略其義務，就不大做得通。不過，這些大人先生能夠強制教師盡其義務的，也只是使他們上一定時間的課，或者在一週或一年內，作一定次數的演講。至於演講的內容如何，那依然要看教師的勤勉，而教師的勤勉，又視其所以要努力的動機的強弱為轉移。況且，這種外部來的監督，動輒流於無知和反覆無常，其性質往往是任意的、專斷的。行使監督的人，既未親自登堂聽講，又不一定理解教師所教的學科，求其能精明地行使這監督，那是很難得的。加之，這種職務所產生的傲慢，往往使他們不留意怎樣行使其職權，使他們沒有正當理由地、任性地譴責教師，或開除教師。這一來，必然要減低教師的品格，教師原來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現在卻成為最卑賤、最可輕侮的人了。為要避免這隨時可以發作的不好待遇，他就非仰仗有力的保護不為功，而獲得這保護的最妥方法，並不是執行職務能力或勤勉，而是曲承監督者意志的阿諛，不論何時，準備為這種意志而犧牲他所在團體的權利、利益及名譽。誰要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注意法國大學的管理，定可看到，象這種專橫的外加的監督，自然會生出什麼結果。

如果有什麼事情，要一定人數的學生進入某專門學校或大學，而不論教師的學問如何、名望如何，那末，教師學問好名望高的必要，就不免因此而減少一些。

藝術、法律、醫學、神學各科畢業生的特權，如果只要在某些大學住滿一定年限就能獲得，那必然要使一定數量學生，去住這些大學，不管教師學問如何、名望如何。畢業生的特權，也算是一種徒弟

制度。正如其他徒弟制度有助於技術上及製造上的改良，這種徒弟制度，同樣有助於教育上的改良。

研究費、獎學金、貧學津貼那一類的慈善基金，必然會使一定數量學生，貿然到某些大學學習，而不問其名譽如何。仰賴這慈善基金的學生，如能自由選擇其最喜歡的大學，這種自由，說不定會惹起各大學間一定程度的競爭。反之，如果規定連各大學自費生，不得本學校許可，也禁止轉入他校，那麼，各學校間的競爭，就十之八九要消滅了。

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象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象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於職守，荒誤學生。

如果教師是一個有理性的人，當他自己意識到，他向學生講的，都是一些無意義或近似無意義的話，他一定會感到不快。此外，當他看到學生大部分對於他的授課，不來聽講，或來聽講而明顯地表示輕蔑、嘲弄態度，他也一定會感到不快。因此，如果他必須作一定次數的演講，縱無其他利益，他亦必爲了這些心理，而苦苦耐地求其相當完善。不過，他可能採用幾種取巧的辦法，這些辦法會有力地削弱這一切激勵勤勉的動機。他有時可對所教的學科，不自加說明，而把關於那種學科的書籍拿來講讀；如果那種書籍是用死的外國語寫成的，他就用本國語向學生譯述；而更不費力的方法，就是叫學生解釋，自己聽着，間或加插幾句話進去，這樣，便可自吹地說他是在講授了。這種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極有限的知識和勤勉就夠了，既不致當面遭到輕蔑或嘲弄，也可避免講出真正迂愚、無意義乃至可笑的話。同時，還有學校的規則，可使教師強制學生全部規規矩矩地經常到黨，並在他講授的全部時間中，維持一種最有禮貌的、最虔敬的態度。

專門學校及大學的校規，大體上不是爲了學生的利益，而是爲了教師的利益，更恰當地說是爲教師的安逸而設計出來的。在一切場

合，校規的目的，總在維持教師的權威。不論教師是疏忽其職務，或是履行其職務，學生總得對教師保持虔敬的態度，好家教師在履行職務上已盡了最大的勤勉和能力那樣。這似乎是根據這一前提，即教師有完全的智慧 and 德行，而學生則是大愚，而且有最大的弱點。但教師果真履行了他們的職務，大多數學生是決不會疏忽他們自己的義務的，我相信從來沒發生過和這相反的事例。講授果真值得學生到堂傾聽，無論何時舉行，學生自會上堂，用不着校規強制。對於小兒，對於極年輕的孩童，為要使他們獲得這幼年時代必須取得的教育，在某種程度確有強制干涉之必要。但學生一到了十二、三歲以後，只要教師履行其職務，無論那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強制干涉。大多數青年人都是非常寬大的。只要教師表示自己要竭力使他們得點益處，那就慢說疏忽輕蔑教師的教導，就連教師在履行職務上有很多的過誤，他們也會原諒的。有時，他們甚至會當着大眾隱蔽教師很多的怠慢。

未有公立機構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這是值得注意的。青年進擊劍學校或舞蹈學校，固然未必都學得很精，但沒有不學會如何舞劍、如何跳舞。馬術學校的好結果，通常沒有如此顯著，這就因為馬術學校費用浩繁，在大多數地方都是由公家辦理的。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誦讀、書寫和算術。迄今學習這三者，進私立學校的還比進公立學校的普遍。但學習者卻都能夠學得所必要學得的程度，學習失敗了的，幾乎沒有一個。

就英國說，公共學校固不免腐敗，但和大學相比，卻要好多了。在公共學校，青年學到或至少可能學到希臘語和拉丁語。即是說，教師所聲明要教的功課或教師應該教的功課，實際都會教給青年。但在大學，青年既沒學到這些法人團體所應該教給他們的科學，亦找不到學習這些科學的適當手段。公共學校教師的報酬，在許多場合，有一大部分，而在某種特殊場合，幾乎全部都是出自學生的謝禮或學費。這種學校是沒有何等排他特權的。一個人要取得畢業學位，並無須繳納在公共學校學過一定年限的證書。如果在考試時候，他顯出已經瞭解公共學校所教的東西，那就不問他是在什麼學校學這東西。

我們可以說，普通歸大學教授的那部分功課，都沒有教得很好。但是沒有這些大學，這部分的功課恐怕就完全教不成，而就個人說，

就社會說，又不免要痛感到教育上缺乏了這個重要的部分。

現在歐洲各大學，一大部分原是為教育僧侶而設立的宗教區體，創辦者為羅馬教皇。在創建之初，學校中所有的教師和學生，都完全置於教皇直接保護之下，而擁有當時所謂僧侶特權。有了這特權，他們就只服從宗教法庭，而不受大學所在國民事法庭的約束。在這種學校裏面所教的，當然要適合於其設立的目的，所以一大部分課程，如不是神學，就是單為學習神學而預備的學問。

當基督教初由法律認為國教時，轉訛的拉丁語，簡直成了西歐全部的普通語。因此，教堂中舉行禮拜，教堂中誦讀的聖經譯文，全用這轉訛的拉丁語，也就是說，用教堂所在國的普通語。自顛覆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侵入後，拉丁語逐漸在歐洲各地不大通行。但是，最初導人宗教形式和儀節並使其合理化的環境，雖早經改變，而人民的虔敬，卻自然把這些既定的宗教形式和儀節保存下來。因此，拉丁語雖然在各地沒有多少人瞭解，教會舉行禮拜，卻依舊使用這種語言。於是，有如在古代埃及一樣，在歐洲，行使着兩種不同的語言，即僧侶的語言和人民的語言，神聖者的語言和凡俗人的語言，有學問者的語言和無學問者的語言。僧侶在執行祭務當中，既必須知道幾分這神聖的、有學問的語言，所以拉丁語自始就成了大學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

至幹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所謂絕無錯誤的教會佈告，曾宣稱以拉丁語譯成的聖經，即普通稱為拉丁語聖經，與希臘語及希伯來語的原書，同為神的靈感所口授，因而，有同等的權威。這一來，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知識，對於僧侶就非必不可少的了。於是，這兩種語言的研究，很久未成為大學普通課程的必要部分。我敢斷定：西班牙的若干大學，從未把研究希臘語，作為普通課程。最初的宗教改革者們，發現新約全書的希臘語原書，甚至舊約全書的希伯來語原書，比拉丁語聖經對他們的主張更有利。不難設想，拉丁語的聖經譯文，已逐漸形成了適合於支持天主教教會的東西。於是，他們開始暴露拉丁譯文的許多謬誤，而羅馬天主教的僧侶們，則迫而出來辯護或說明。但是，辯護也好，說明也好，對幹希臘和希伯來語沒有若干知識，一定行不通，所以關於這兩者的研究，逐漸被擁護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對宗教改革教理的多數大學列入學校課程中了。

希臘語的研究，與各種古典的研究是有密切關係的。搞古典研究的，雖然最初主要只是天主教教徒及意大利人，但到宗教着手改革教理的那個時候，這就成為時尚了。因此，在多數大學中，在修哲學前，要先修希臘語，學生學習了若干拉丁語後就讀希臘語。至於希伯來語，則因與古典研究無何等關係，除聖經外，再也沒有一部用希伯來文寫成的有價值的書籍。所以，這種文字的研究，總是在哲學研究了之後，當學生進行研究神學時纔開始教授。

最初，各大學的課程中，只要求有希臘語拉丁語初步知識。直到現在，有的大學還是如此。另外一些大學則認為，學生對這兩種語言，至少兩者之一，該有初步知識，所期在於繼續研究。關於這進一步的研究，目下已成了各地大學教育中極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希臘哲學，分有三個部門，即物理學或自然哲學、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及倫理學。這樣的區分，似乎完全合理。

自然的偉大現象，天體的運行，日蝕月蝕，彗星，雷電及其他異常的天文現象；植物動物的發生、生活、成長及死滅等等，必然會刺激人類的驚異心，所以自然會喚起人類的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究其原因。最初，迷信企圖把這一切驚異的現象，歸因於神的直接動作，藉以滿足這種好奇心。往後，哲學努力根據比神的動作更為習見、更為人類所易知的原因去說明它們。這些偉大現象，因為它是人類好奇心的最初對象，所以說明此偉大現象的科學，自然在哲學中成為最初開拓的部門。歷史上留有若干記錄的最早哲學家，似乎就是一些自然哲學家。

不論在哪個時代和哪個國家，人們總會相互注意性格、意向及行動，總會共同同意，規定並確認關於人們生活行動的許多高尚規則及準則。到了寫作流行，許多聰明人或自作聰明的人，就自然要努力來增加這些既經確立和受人敬重的準則並表示他們自己對於某種行為為正當、某種行為為不正當的意見。他們的做法，有時是採用比較虛假的寓言形式，如所謂《伊索寓言》；有時又採用比較單純的箴言形式，如《所羅門金言》，提西奧尼斯及弗西里迪斯的詩，以及希西奧德某一部分作品等。他們在一個長期內，一味是這樣增加智慧及道德的準則，而從未企圖接一種極明確、很有組織的次序，把它們整理起來。至於使用一個或幾個可從而推斷它們的原則，有如從自然的原因

推斷其結果那樣，把它們聯結綜合起來，那就更談不到。把各種不同的觀察，用若干普通原則聯結起來，成爲一個有系統的整列，這種優異的做法，最初出現在自然哲學方面的若干古代簡淺論文中。往後，與此相類似的事情，亦漸在道德方面出現。日常生活的各準則，象在自然現象的研究一樣，也按某種有組織的次序整理起來了，並且也用少數共同原理聯結綜合起來了。研究並說明這些起聯結作用的原則的科學，稱爲道德哲學。

各不同作家，給予自然哲學及道德哲學以各種不同的體系。但是支持他們那些體系的議論，往往全無根據，至多不過是極其無力的蓋然論罷了。有時，他們的議論，不過是詭辯，除不正確的、曖昧的日常說法外，沒有其他根據。不論在何時代，思辨體系的採用，都只是關幹瑣細得不能對有常識的人的意見起決定性作用的推論，也就是關於沒有什麼金錢上利害的事情。詭辯對於人類意見，除關於哲學及思辨方面的事件外，幾乎沒有何等影響，可是對哲學及思辨方面的意見，它的影響往往最大。各自然哲學體系及道德哲學體系的擁護者，自然要努力暴露異己者議論上的弱點。在他們相互討論異己者的議論當中，必然會想到蓋然的議論和論證的議論的差異，似是而非的議論和決定性的議論的差異；由這精審嚴核引起的種種觀察，必然會產生一種科學，討論正確的和錯誤的推論的一般原理，這科學就是論理學。就其起源說，論理學是較遲於物理學及倫理學的，但在古代大部分——雖非全部——哲學學校中，倫理學通常總是先於其他二者的教授。那時候似有這種想法，要使學生在物理倫理這種非常重要的主題上從事推論，當然不能不預先教他們如何理解正確推論和謬誤推論的差異。

古代哲學分作三部分，而在歐洲大部分大學中則改變過來，分作五部分。

在古代哲學中，幾關於人類精神或神的性質的教示，通通是物理學體系的一部分。至幹這精神或神的本質，不論由什麼構成，都是屬於宇宙大體系的部分，也就是能產生許多最重要的結果的部分。人類理智關幹這兩部分所能論斷、所能推測出來的一切，似乎成爲說明宇宙大體系如何起源、如何運行的科學的兩章——無疑是極關重要的兩章。但在歐洲各大學中，哲學只作爲神學的附屬部分教授，所以對於

這兩章，自然要比哲學的其他部分教得詳細些。這兩章逐漸地大大擴充起來，更細分為許多的章節，結果，在哲學體系中，為我們得知極少的精神學說，就與我們得知極多的物體學說佔有同樣長的篇幅。於是，這兩個學說，被視為判然各別的兩種科學。所謂形而上學或精神學，因此被放在與物理學相對立的地位，它在這兩種科學之中，不但被看作比較崇高的科學，而且就某一特定職業說，被看作比較有用的科學。在這種情況下，恰合於實驗及觀察的主題，也就是在那上面小心注意便可引出極多有用的發現的主題，幾乎全沒有人留意了。反之，與這正相對立的主題，即除少許極其簡單及幾乎是一見就明白的真理外，任憑怎麼注意也只能發現曖昧的、不確定的東西，而因此只能產出狡智和詭辯的那種主題，卻大被人研究着。

當上述兩種科學這樣被放在相對立的地位時，兩者間的比較和對照，自然會生出第三種科學，即所謂本體學，或討論其他二種科學的主題的共同特質及屬性的科學。但是，假若各學派的形而上學或精神學，有大部分是狡智與詭辯，那本體學這種無聊的科學——有時亦稱為形而上學——就全部是狡智與詭辯。

不僅被視為個人，而且視為一個家族、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的一員的人，其幸福與至善何在？古代道德哲學的目的，就是企圖研究這個。在古代道德哲學，人生的各種義務，都被視為是為了人生的幸福與至善。但是，當教授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單是為了神學的時候、人生的各義務，卻被視為主要是為了來生的幸福。在古代哲學，德行的盡善盡美，被認為必然會使有這德行的人今生享到最完全的幸福。而近代哲學的觀點，卻認為盡善盡美的德行，往往或幾乎總是與今生幸福有矛盾。天國只有由懺悔、禁慾或者修道惜的苦行和自卑纔可跨進；一個人單憑慷慨、寬大、活潑的行動，是不能進入天國的。良心學及禁慾道德，簡直佔了各學校道德哲學的大部分，而哲學一切部門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這樣成了其中最被曲解的部分了。

因此，歐洲有一大部分大學的哲學教育，就是依着以下程序：第一，教論理學；第二，教本體學；第三，教那討論人類靈魂和神的性質的精神學，第四，教一種變質的道德哲學，即被認為與精神學說、人類靈魂不滅學說以及由神的裁判而在來生予以賞罰的學說直接發生關聯的學問；最後，通常教以簡單粗淺的物理學，以結束全部課程。

歐洲各大學對古代哲學課程內容所作的修改，通通是以僧侶教育為目的，使哲學成為神學研究的比較適當的入門。但其所增添的狡智與詭辯，以及由這修改而導入的良心學與禁慾道德，無疑沒使哲學更適宜於紳士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者說，對於他們悟性的發達或感情的改善，並不見得更有作用。

在今日歐洲一大部分大學中，這種哲學課程，依然由教師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教授着，看各大學的組織使教師在這方面勤勉的必要性的以大小為定。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贈基金的大學，導師們往往以教授這變質的課程的零篇斷片為滿足，而且，即對這零篇斷片，一般還是教得非常馬虎膚淺。

近代關於哲學若干部門的改善，雖無疑有若干部分已在大學中實行，但還有一大部分未在大學中實行。大多數大學雖然作了這些改善，然不肯趕快地加以採用。那些被推翻的體系和陳腐的偏見，雖然已經為世界各地所不容，而若干這些學術團體，仍在一段很長時間中，願意充當它們的避難所；它們隱藏在那裏，並得到保護。大概最富裕、有最多捐贈基金的大學，採用這些改善最遲，也最不願意對行之已久的教育計劃，作任何顯著的變動。比較貧困的大學，教師們衣食的大部分都依存於自己的名聲，他們不得不更加注意世界時代的思潮，因此，在這些大學中，改善的採行，顯得比較容易。

但是，歐洲公共學校及大學，雖然其設立原是僅為某種特定職業而實施的教育，即僧侶職業的教育，雖然它們對於這種職業認為必要的科學，也並沒有十分用心地教授學生；但它們卻逐漸把幾乎一切人民的教育，特別是納土及有錢人家子女的教育，吸引到它們這邊來。在人的幼年時期及認真地着手事務，即在其餘生中經營事務那個時期之間，介有一個很長期間。這期間的有利的消費，在當時似乎沒有比進大學還好的方法。然而各公共學校各大學所教授的大部分東西，對於學生後來經營的事務，卻並不是最適當的準備。

在英國，青年人剛在學校畢業，不把他送入大學，卻把他送往外國遊學，這件事已經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風尚。據說，青年人遊學歸來，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進。一個由十七、八歲出國至二十一歲歸來的青年人，歸國時比出國時大三、四歲，在這年齡，在三、四年之中，智能要是沒有很大的發展，那纔是怪事。他在遊學中，一般獲得

一兩種外國語知識。不過這種知識，很少足夠使他說得流利，寫得通順。另一方面，他回國之後，一般變驕傲了，更隨便，更放蕩，更不能專心用功、勤奮作事。如果他不到外國，留在家中，在這短期之中，絕不會變得如此。這樣年青時的漫遊，遠離兩親及親戚的督責、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寶貴的韶光消磨於極放蕩無聊的生活，以前的教育在他內心形成的一切有用習慣，必然不但不能堅固確立，卻反減弱了，或全行消失了。象這樣全無意義的早期漫遊的習尚，所以流行，不外乎社會對於各大學的不信任，而無其他原因。爲人父親者，不忍見到他的兒子在自己面前，無所事事地、漫不經意地墮落下去，所以不得已，暫時把他們送往外國。

近代教育上若干設施的結果，就正是這樣。

在其他時代及國家間，似乎實行有各種各樣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設施。

就古代希臘各共和國說吧，當時各自由市民，通在國家官吏指導之下，學習體操及音樂。體操的用意，在於強健肉體，尖銳勇氣，並養成堪耐戰時疲勞和危險的能力。據一切記錄，希臘的民兵，是世界過去最良民兵之一；所以，這一部分公家教育，無疑完全達到了它要企圖達到的目的。至於其他一部分教育，即音樂教育，其用意是什麼，至少據那些對這種設施留有記述給我們的哲學家及歷史學家的意見，乃在幹使人通人情，使人的性情柔和，並使人有履行社會生活及個人生活上一切社會義務、道德義務的傾向。

古代羅馬有稱爲演武場的體操教練，那與希臘稱爲體育館的體操教練，具有同一目的，並且也似同樣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羅馬人間，沒有與希臘的音樂教育相類似的東西，可是，羅馬人的道德，無論在個人生活上，或在社會生活上，都不比希臘人差，而就整個說，且遠較希臘人爲優。羅馬人在個人生活上優於希臘人的地方，曾由最通曉兩國國情的著者坡裏比阿及哈里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兩人予以證明。至於羅馬人社會道德的優越，則可由希臘及羅馬全史內容得到實證。黨派間的爭執，不發脾氣，不走極端，這是自由民族社會道德上最關重要的事情。希臘人各黨派，動不動就流爲橫暴，表演流血慘劇。反之，在羅馬人，他們至格拉奇時代爲止，卻從未因黨爭而掀起流血事故。格拉奇時代以後，則羅馬共和國實際上已算解體了。這

樣，不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坡裏比阿具有怎樣值得尊重的權威，也不論孟德斯鳩支持此權威有怎樣聰明的理由，似乎希臘人的音樂教育，對改善道德並未著成效。羅馬人沒有音樂教育，其道德總的來說且比希臘人爲優。往時這些哲人對於其祖先所定製度的尊敬，說不定曾導使他們只從古代習俗中尋找政治的智慧，這習俗是由他們的太古社會一直繼續流傳下來，未曾中斷地傳到社會有顯著文化的時期。音樂及舞蹈二者，是幾乎一切野蠻民族的大娛樂，同時也是使他們各人適於款待友伴的大藝能。在今日非洲海岸的黑人間是如此，在古代居爾特人及斯堪的納維亞人間是如此，而據荷馬所說，在特洛伊戰爭以前的古代希臘人間亦是如此。當希臘各民族組織各小共和國的時候，此等藝能的研究，在一個長時期成爲當時人民公共教育、普通教育之一部分，那是很自然的。

以音樂體操教授學生的教師們，在羅馬，甚至在那法律、習俗爲我們熟知的希臘共和國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國家供給薪俸，不是由國家任命。爲戰時捍衛國家計，國家要求各自由市民受軍事訓練。但進行軍訓的教師，則讓市民自己去尋求，國家除了備置一公共廣場，作爲市民教練操演的運動場所外，再也沒有爲此目的做一點什麼。

在希臘羅馬各共和國初期，除上述種種科目外，教育上其他科目，就是讀、寫及當時的算術。對於這些技能，富人往往在家庭內請家庭教師教授。而貧窮市民，一般到以教讀爲職業的教師所設的學校去學習，這些人大抵爲奴隸，或由奴隸解放了的自由人。但是，不論在家庭學習，或往學校學習，教育的這一部分，都是由各個人的父母或保護者處置，國家不曾加以何等監督或指導。據索倫所制定的法律，爲親者如忽視其義務，不使子女習得有用的職業，則子女亦得免除其爲親養老的義務。

當文化進步，哲學修辭學成爲流行科學的時候，社會上比較上流的人物，常爲了學習這流行學術，而把子弟送往哲學家及修辭學家所設的學校。可是，對於這等學校，國家沒給予支持，在一個長期內，國家只予以默認而已。很久很久，哲學及修辭學的需要是這麼小，最初以此兩者之一爲專業的教師們，竟不能在任何一都市，找到恆久的工作，而不得不由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地方。埃利亞的曾諾、普羅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以及其他許多學者，都過着這種生活。後

來需要增加，教授哲學及修辭學的學校，就由流動的變為固定的。雅典首開其端，接着其他若干城市，亦有同類學校的設立。可是，國家對於這種學校，除了有的撥給一特定場所作為校址外，再也不作進一步的獎勵。這些學校的校址，有時也有是私人捐贈的。柏拉圖的學園，亞里士多德的講學地，斯多噶學派創建者基齊昂的芝諾的學府，似乎都是國家所賜與。但伊壁鳩魯的學校，則由他自己的花園改作。至馬卡斯·安託尼阿斯時代為止，無論何等教師，都不曾從國家領得薪俸，或者說，教師除由學生奉送的謝禮或酬金以外，再無其他任何報酬。魯西安告訴我們：這個嗜好哲學的皇帝，曾以獎勵金給與一位哲學講師，但這種獎勵金似乎在他死後就停發了。畢業於這等學校，並沒有什麼特權；想從事某項特定職業或事業，亦沒有在這些學校修學的必要。對於這些學校效用的輿論，如不能吸引學生前來，那學生就不會來了，因為法律既不強制任何人進這等學校，也不給進了這等學校的人什麼好處。學校的教師對於學生是沒有管轄權的。教師除了憑其優越德行、優越才能所能博得對學生的自然權威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權威可言。

在羅馬，關於民法的研究，沒成為大部分市民的教育的一部分，而只為少數特定家族的教育的一部分。想求得法律知識的青年，並無一個可入的公家學校；他們除了時常與瞭解法律的親戚故舊過從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研究手段。值得指出，十二銅表的法律，有許多雖然是由古代某希臘共和國的法律抄來的，但法律並不曾在希臘的任何一個共和國發展成為一種科學。在羅馬，法律老早就成為一種科學了。凡具有通曉法律名聲的市民，都會博得顯著的榮譽。在古代希臘各共和國，特別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許多的無秩序的人民團體組成的。他們所作的判決，幾乎常是胡亂的，常是決定於一時的宗派意見或黨派精神的。可是，他們不正當裁判的壞名譽，既由五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五百人（希臘有的法院，包括有這麼多的人數）分擔，落到任何一個人身上的，就不見得怎麼厲害。反之，羅馬就不是如此。羅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個裁判官或少數裁判官構成，判決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別是在公審的場合，就要大受損害。所以，遇到有疑問的案件，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難，自然常常力圖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護符。羅馬法就因為這樣對於慣例或判例的留意，而成為這樣有規則、有組織的體

系流傳至今日。其實，任何他國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樣的留意，都產生了同樣的結果。就性格說，羅馬人是比希臘人優越的，坡裏比阿及哈里卡納薩的狄奧尼西阿斯，曾極力主張此說。但是羅馬人所以有這優越，與其說是由於這兩位著者提出的種種情況，倒不如說是由於這較好的法院制度。據說，羅馬人特別著名的，是他們對於誓約的尊重；當然哪，慣在辦事勤奮、消息靈通的法院前發誓的人，比那慣在無紀律的無秩序的集會前發誓的人，定會更尊重自己的誓言。

與現代任何國民比較，希臘人羅馬人關於行政上及軍事上的能力，至少，總該可以說是不相上下的。我們的偏見，也許把他們那種能力估價過高。但是，除了關於軍事的訓練，國家對於這能力的形成，似乎不會盡什麼力量，因為我怎麼也不相信希臘音樂教育，對於這才能的形成有什麼重大的影響。不過，它們比較上流的人民，如要學習當時社會情況視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術及科學，並不難找到教師。對於這種教育的需要，促成了它總必促成的東西的產生，就是說，促成了滿足此需要的才能的產生。此外，無拘束的競爭所激起的競爭心，更使此才能達到極高的完善程度。古代哲學家似乎比近代的教師更能夠誘發聽講者的注意，控制聽講者的意見和心機，並對聽講者的行動、言論，予以一定的格調和風格。近代公家教師所處的環境，使他們多少不必關心自己在特定業務上是否有名望，是否已成功。他們的勤勉，便不免多少因此受到阻害。加之，他們所得的薪俸，把那些想與他們競爭的私人教師，放在如下所說的那種境地，即好比一個未得到任何獎勵金的商人，想與那得到了很多獎勵金的商人競爭。假使前者以將近同一價格出賣其貨物，他就不能得到同一的利潤，縱不破產沒落，至少，貧窮乞丐的命運是避免不了的。假使他把貨物過於高價出售，顧客就必極其有限，因而，他的境遇也不會改善好多。況且，在許多國家中畢業的特權，對於多數從事有學問的職業的人，對於大多數需要這種學問的教育的人非要不可，至少有了這特權，就非常便利。但是，這特權的獲得，又只有去聽公家教師的講授。私人教師雖最有教授能力，學生雖然最小心地聽他們的講授，但不能由此取得可憑以要求這特權的資格。由於這種種原因，講授大學普通課程的私人教師，在近代一般人看來，是學者中最卑不足道的。具有本領的人要找職業，這要算最可鄙最無利益的職業了。這樣，普

通學校及專門大學的捐贈基金，不但使公家教師的勤勉精神墮落了，並且使優良的私人教師也不容易找到。

假使公家的教育機構全然沒有，那末，沒有相當需要的體系或科學，或者說，按當時情形為非必要的、非有用的或非流行的體系或科學，便全然不會有人教授。一種以前認為有用但已經被推翻或流為陳腐的科學體系，或一種大家都信其為無用，為買弄學問，為胡說的科學，私人教師一定不會從教授它得到好處。象這種體系，這種科學，只能存續於教育機構這種法人團體。在那裏，教師的繁榮與收入，大部分與其名聲無關，且全然與其勤勉無關。如果全然沒有公家教育機構，一個紳士奮其勤勉能力，受了當時所提供的最完全的教育之後，那他與世人談論普通問題，我敢斷言決不會一無所知的。

對於女子教育的公家機構，是全然沒有的，因此，女子教育的普通課程中，便全沒有無用的、不合理的或者幻想的東西。女子所學的，都是她的雙親或保護者判定她必需學習，或者學了對她有用的課程，而別無其他東西。她所學的一切，無不明顯地具有一定的有用目的：增進她肉體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內心的謹慎、謙遜、貞潔及節儉等美德；教以婦道，使她將來不愧為家庭主婦等等。女子在她的整個生涯中，會感到她所受教育的各部分，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對她有某種方便或利益。若在男子則不然，他們所受的儘管是極辛苦極麻煩的教育，可是一生由這種教育得到了何等方便或利益的人卻不多見。

因此，我們可以反問：國家對於人民的教育，不應加以注意麼？如果有注意的必要，那末，對各等級人民，國家所應注意的，是教育的哪些部分呢？而且，它應該怎樣注意呢？

在某種場合，政府儘管不注意，社會的狀態，必然會把大多數人安排於一種境地，使他們自然養成那為當時環境所需要、所容許的幾乎一切的能力和德行。在其他場合，因為社會狀態，不能把大多數人安排在那種境地，所以為防止這些人民幾乎完全墮落或退化起見，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

分工進步，依勞動為生者的大部分職業，也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職業，就侷限於少數極單純的操作，往往單純到只有一兩種操作。可是人類大部分智力的養成，必由於其日常職業。一個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於少數單純的操作，而且這些操作所產生的影響，又是相同的或

極其相同的，那末，他就沒有機會來發揮他的智力或運用他的發明才能來尋找解除困難的方法，因為他永遠不會碰到困難。這一來，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習慣，而變成最愚鈍最無知的人。他精神上這種無感覺的狀態，不但使他不能領會或參加一切合理的談話，而且使他不能懷抱一切寬宏的、高尚的、溫順的情感。其結果，對於許多私人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義務，他也沒有能力來作適當的判斷。至於國家的重大和廣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認不了的。除非費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戰時如何捍衛國家，否則無法做到。他的無變化生活的單調性質，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氣消毀了，使他看不慣兵士們的不規則、不確定和冒險的生活。就是他肉體上的活動力，也因這種單調生活毀壞了，除了他既經習慣了的職業外，對於無論什麼職業，他都不能活潑地、堅定地去進行。這樣看來，他對自身特定職業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練，可以說是由犧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際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獲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會，政府如不費點力量加以防止，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民，就必然會陷入這種狀態。

在普通所謂野蠻社會，即獵人社會，牧人社會，甚至在製造業未發達及國外貿易未擴大的幼稚農業狀態下的農夫社會，情形就不是這樣。在這些社會中，各人工作的多式多樣，使他不得不備其能力，不得不隨時想些方法，去對付不斷髮生的困難，發明定會層見迭出，人的心力也不會陷於呆滯無作用的狀態，象文明社會幾乎全體下級人民的智力都無作用的狀態那樣。我們在前面說過：這所謂野蠻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是一個戰士，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政治家。關於社會的利益，關於他們統治者的行動，他們都能作相當的正確判斷。酋長在平時是怎樣的裁判官，在戰時是怎樣的指揮者，幾乎各個人都是明白的。不過，有一點，在未開化社會，沒有人能獲得在文明狀態下有些人所具有的大巧大智。在未開化社會，各個人的職業，雖非常多樣，但社會全體的職業，卻並沒有好多樣。每個人幾乎都在做或能夠做人人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每個人也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但沒有一個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知識、技巧和發明才能。不過，以他們所具有的那種程度，去對付社會的全部單純業務，大概是夠了的。反之，在文明社會，雖然大部分個人的職業，幾乎沒有何等變化，但社會全體的職業，則種類多至不可勝數。這各種各樣的職業，對於那些自己未從事何等特定職業，有閒暇有意志去研討他人職

業的人，可以說提供無限的研究對象。象這樣又多又雜的對象的觀察，必然會迫使觀察者不斷運用心思，比較看、組合着，從而使他的智能，變得異常敏銳，異常廣泛。可是，他們這少數人如不碰巧佔據非常特殊的地位，他們這大能力，縱然對自身是一種光榮，對社會的善政和幸福，卻可能沒有多少貢獻。儘管這少數人有大能力，但人類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數人民間，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在文明的商業社會，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分有財產者的教育，更需要國家的注意。有身分有財產的人，他們大概都是到十八、九歲以後，才從事他們想從而揚名的特定事業、職業或藝業。在此以前，他們是有充分時間，來取得那能使他們博得世人尊敬或值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識；至少，他們有充分時間來準備自己，使他們在日後能獲得這一切知識。他們的雙親或保護者，大概都十分切望他們能有這樣智能，在大多數場合，對於必需費用的支出，是毫不躊躇的。如果他們不總是受到適當的教育，那由於費用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於費用的不當；由於教師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於教師馬虎與無能，或由於在當前情況下不易找到或無從找到更好的教師。此外，有身分有財產者消磨其大部分生涯的職業，並不象普通人民的職業那樣單純，那樣不變。他們的職業，幾乎全都是極其複雜的；用手的時候少，用腦的時候多。從事這種職業者的理解力，是不大會因為不用腦力而流於遲鈍的。況且，他們這種人所從事的職業，又不大會使他們終日忙碌，他們大多有很多空閒時間，來對他們在早年已打有相當基礎、或已養成多少嗜好的各種有用的或作為裝飾用的知識作進一步的鑽研，從而完全掌握。

普通人民，則與此兩樣。他們幾乎沒有受教育的時間。就是在幼年期間，他們的雙親，也幾乎無力維持他們。所以一到他們能夠工作，馬上就須就職謀生。他們所就的職業，大概都很單純，沒有什麼變化，無須運用多少的智力。同時，他們的勞動，又是那樣沒有間斷，那樣鬆懈不得，他們哪有閒暇做旁的事情，想旁的事情呢？

不過，無論在哪種文明社會，普通人民雖不能受到有身分有財產者那樣好的教育，但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如誦讀、書寫及算術，他們卻是能夠在早年習得的；就是說，在這個期間，就是預備從事最低賤職業的人，亦大部分有時間在從事職業以前，習得這幾門功課。因

此，國家只要以極少的費用，就幾乎能夠便利全體人民，鼓勵全體人民，強制全體人民使獲得這最基本的教育。

國家可在各教區各地方，設立教育兒童的小學校，取費之廉，務使一個普通勞動者也能負擔得起，這樣，人民就容易獲得那基本教育了。這種學校教師的報酬，不可全由國家負擔，國家只宜擔負其一部分；因為全部甚或大部分由國家負擔了，教師馬上便會習於怠惰。在蘇格蘭，這種教區學校的設立，幾乎叫全體人民都會誦讀，使一大部分人民都會寫算。在英格蘭，慈善學校的設立，亦曾收得同一的效果。不過，因為沒有設立得象蘇格蘭教區學校那麼普遍，所以其效果亦沒有那麼普遍。假使這些小學校所教的兒童讀物，比現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義一點；假使普通人民的兒童有時在學校學習的但於他們全無用處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語取消不教，而代以幾何學及機械學的初步知識，那末，這一階級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許就會達到所可能達到的最完善程度。沒有一種普通職業，不提洪應用幾何學及機械學的原理的機會，從而，沒有一種普通職業，不逐漸使普通人民能瞭解這些原理——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學的必要入門。

普通人民的兒童中，有些在學業上較為優良。國家對於這種兒童，設能給以小獎賞或小榮譽獎章，必能獎勵這最基本部分教育的獲得。

國家如果規定，在取得加入某種同業組合權利以前，或在有資格在自治村落或自治都市中經營某種職業以前，一切人都得受國家的考試或檢定，那末，國家就幾乎能強制全體人民必須求得這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希臘羅馬各共和國，維持全體人民的尚武精神，就是依着這個方法，便利人民，獎勵人民，強制人民受軍事上及體操上的教練。為便利人民，使人民容易習得這教練計，各共和國都備有一定的學習和實練場所，並對一定的教師，給與在這場所教授的特權。不過，這等教師，似乎沒有由國家領取薪俸，也沒有取得何等排他的獨佔權。他們的報酬，完全出自學生。在公立體育館或演武場習得這教練的市民，對於從私人教師習得這教練的市民，並不享有何等法律上的特權，如果後者也學得一樣好的話。為鼓勵這項學習起見，各共和國對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生，給與小獎賞或小榮譽獎章。在奧林匹克運動大會或地

峽運動大會或納米安運動大會競技獲賞的，不但獲賞者本人有光榮，其家族及親戚全體都有光榮。凡屬共和國的市民，只要召集，都得在共和國軍隊中服務一定年限。這義務，就很夠強制一切市民學習軍事教練及體操教練了，因為不學習這些教練，軍隊服務的工作一定是幹不了的。

治化改進，軍事教練，便須由政府費相當氣力予以支持，否則不免日漸鬆懈，從而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同時隨着衰退；關於這種趨勢，近代歐洲事例提示得十分明顯。各個社會的安全，總多少依賴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固然在近代，沒有精練的常備軍，單靠尚武精神，也許是不夠防禦社會、保障社會的。但是各公民如都具有軍人精神，那所需的常備軍就可減去不少。況且，普通對有常備軍會危害自由的憂慮，無論這個危害是真的危害或只是想象的危害，也必會因市民具有軍人精神，而減少許多。這尚武精神、軍人精神，一方面在外敵侵略時，可以大大便利常備軍的行動；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備軍發生違反國家憲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地加以阻止。

就維持大多數人民的尚武精神說，希臘及羅馬往時的制度，似乎比近代所謂民兵制度有效多了。前種制度，簡單得多。制度一經確立，即可自行其事，而以最完全的活力維持下去，政府的注意，幾乎是全然用不着的。至於要在相當程度上維持近代民兵的複雜規則，就須政府不斷的和費力的注意；政府不注意，這規則就不免完全被忽視，或者完全廢而不用。加之，古代制度的影響遠為普遍。在那種制度下，人民全體，都會使用武器。近代則恐怕除瑞士外，各國由民兵規則施教的範圍，都不過及幹國民中的最小部分。但是，一個不能防禦自己或為自己復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類資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樣，在精神方面的殘廢或畸形無異於某一最重要肢體拆毀了、失用了的人在肉體方面的殘廢與畸形。而且，兩者之中，前者顯然是更不幸，是更可憐。因為，苦樂的感覺，全生於心，其受影響於肉體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殘廢或完全的少，而受影響於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殘廢或完全的多。那怕在社會的防禦上已用不着人民的尚武精神，但為防止怯懦必然會引起的這種精神上的殘廢、畸形及醜怪在人民之間蔓延傳播，政府仍應加以最切實的注意。這好象癲病及其他討厭的、令人不愉快的疾病，雖不會致死，或沒有危險，但為防止在大多

數人民之間傳播，政府仍應加以最切實的注意。這注意，縱使除防止社會的這種大害外，沒有何等其他公共利益，亦事在必行。

同樣的說法，可適用於那常常使文明社會一切下級人民的理解力失去作用的無知和大愚鈍。一個人不能適當使用人的智能，假如說是可恥的話，那就比怯懦者還要可恥。那是人性中更重要部分的殘廢和畸形。國家即使由下級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這教育仍值得國家注意，使下級人民不至陷於全無教育的狀態。何況，這般人民有了教育，國家可受益不淺呢。在無知的國民間，狂熱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擾亂。一般下級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會受狂熱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識的人，常比無知識而愚笨的人，更知禮節，更守秩序。他們各個人都覺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自己更“能”得到法律上、長上的尊敬，因而他們就更加尊敬那些長上。對於旨在煽動或鬧派別的利己性質的不平之鳴，他們就更能根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細；因此，反對政府政策的放恣的或不必要的論調，就愈加不能欺惑他們了。在自由國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於人民對政府行動所持的友好意見，人民傾向於不輕率地、不任性地判斷政府的行動，對政府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三項論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經費

對各種年齡人民的教育設施，主要是宗教教育的設施。這一種教育，其目的與其說是使人民成為今世的優良公民，倒不如說是為人民作來世生活及更好世界生活的準備。講授這種教義的教師的生活費，也同其他普通教師一樣，有的專靠聽講者的自由貢獻，有的則來自經國家法律認可的某些財源，如地產、什一稅、土地稅、薪水等。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熱心和勤勉，在前一場合，似乎比後一場合要大得多。就這一點說，新教的教師們，要攻擊成立悠久的古舊體系，往往佔有不少的便宜；因為，舊教牧師，賴有聖俸，往往不大注意維持大多數人民的信仰和歸依的熱情；他們懶惰慣了，甚至不能奮發起來，保護他們自身的教會。富有捐贈財產的成立悠久的國教，它的牧師們，常常成為博學及文雅的人，具有紳士或足使他們博得紳士所受的尊敬的品質。但另一方面，他們易於喪失那些使他們對下級人民有權威和感化力的好的和壞的品質，而這些品質，也許就是使他們的宗教得成功為國教的本來原因。這些牧師，當遇着一羣勇敢的克孚衆望但

也許是愚而無知的狂信者的攻擊時，就象亞洲南部懶惰的、柔弱的、飽食的國民碰着了活潑、堅忍而苦飢的北方韃靼人的侵略一樣，全然無以自衛。在這種緊急場合，這些牧師通常所採取的唯一手段，就是申訴於行政長官，稱反對他們的新教徒擾亂公安，而加以迫害、撲滅或驅逐。羅馬天主教教士迫害新教徒，就是這樣假手行政長官；英格蘭教會迫害非國教派，也是這樣假手行政長官。其實，一個既經被認為國教而安安靜靜地渡過了一兩世紀的宗教，通有某種新宗教對其教義教律加以攻擊而自己無法作有力的抵抗時，一般都是請政府出面阻止。在這些場合，就學問文章說，也許有時國教派方面佔優勢，但新起的反對派，總是更長於收買人心，更長於拉攏新信徒的一切技術。在英國，這些技術，早被那些擁有鉅額捐贈財產的國教教會的牧師們拋在一邊了。現在培養這些技術的，主要只有反對國教派及美以美派教徒。不過，在許多地方，反對國教派教師，曾靠自由捐贈、信託權利及其他逃避法律的行為，得到了獨立的生活資料，他們的熱情和活動力，似乎已因此大大減少了。他們很多已變成非常有學問、非常機敏及非常高尚的人物，他們一般已經不是非常孚衆望的傳道者。就今日說，比反對國教派牧師更得人心的，乃是那些學問遠不如反對國教派牧師們的美以美派教徒。

在羅馬教會中，下級牧師出於有力的利己動機，他們的勤勉和熱心，比任何成立悠久的耶穌教教會的牧師活躍得多。許多教區牧師的生活資料，很大部分是得自人民自願的貢獻，而祕密懺悔又給予他們許多機會，來增加這種收入源泉。託鉢教團的生活資料，全都出自這種貢獻。他們很象那些輕騎快步的軍隊，不行掠奪，就沒有給養。教區牧師有類似那些一部分以薪俸一部分以學生所交束脩為報酬的教師，而這報酬的獲得，就常需多少依賴其勤勉和名聲。託鉢教團，有類似那些專靠勤勉以換得全部資料的教師，因此，他們不得不用盡能夠促進普通民衆皈依的種種技術。據馬基弗利爾觀察，在十三世紀及十四世紀，聖多米尼克及聖佛蘭西斯二大託鉢教團的設立，曾把人民對天主教教會日益衰微的信仰和皈依復活了起來。在羅馬天主教各國，這皈依精神，全賴修道僧及貧苦的教區牧師的支持。至於那些教會大人物，儘管他們具有紳士及通達世故的人的一切藝能，有時且具有學者的藝能，並對於維持下級牧師的必要紀律也十分注意，但關於人民的教育卻沒有幾個肯費神去幹的。

有一位現代最著名的哲學家兼歷史學家說：“一個國家的大多數技術及職業，都具有這樣性質，在促進社會利益的同時，並對某些人有用或適合於某些人。國家在這場合，除在一種技術剛剛傳入的時候，所定立的規則，應聽任該職業自由，把鼓勵該職業的任務，交給從它收穫好處的個人。工藝製造者知道了他們的利潤來自顧客的光顧，他們是會盡可能增加其熟練與勤勞的。事物如未受有害的干涉所擾亂，那無論何時，商品的供給都會與其需求保持差不多相稱的比例。”

“不過，還有些職業，對國家雖屬有用，甚至必要，但在個人，卻無何等利益或快樂。關於這類職業的從事者，最高權力自不得不予以不同的待遇。為維持其生活計，它得予以公家的獎勵。為防止其自然流乾怠慢計，它得對那種職業給以特別榮譽，或嚴定階級以為升降，或採取其他敦勸方策。從事財政、海軍及政治的人，都是這一類人的實例。”

“乍看起來，我們可能自然地認為：牧師、教士的職業屬於第一類的職業，和法律家及醫師的職業一樣，對於他們的獎勵，我們可以把它安然委託那些信仰其教義並從其精神上的服務及幫助得到利益或安慰的人們的施捨。他們的勤勉，他們的注意，無疑都會由於這個附加的動機而增加。他們職業上的技巧，他們支配人民思想的機智，亦必由於不斷增加的實踐、研究和注意，而日有進益。”

“但是，我們把這事體更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知道：牧師們這種利己的勉勵，就是一切賢明的立法者所要防止的。因為，把真的宗教除外，其餘一切宗教都有極大的害處，而且都有一種自然傾向，把迷信、愚想及幻想，強烈地灌輸到真的宗教裏面，使其陷於邪道。各宗教上的從業者，為要使他自己在信徒眼中更顯得高貴神聖，總是向信徒宣說其他一切宗派如何橫暴可決，並不斷努力造作新奇，以鼓舞聽眾弛懈了的信心。至於所授教義中所含的真理、道德或禮節，他們卻不注意，而最適合干擾亂人心的教理，卻全被採取了。為吸引光顧的人，各反國教徒的集會不惜以新的勤勉、新的技巧，激動俗眾的情緒，騙取俗眾的輕信。結果，政府將發現：不為教士們設定定俸表面象是節省，而所付代價卻是昂貴的。並且，實際上，政府要與心靈指導者結成最適宜、最有利的關係，就是給他們固定薪俸，用賄賂引誘其怠惰，使他們感到除了防止羊羣誤尋新的牧場而外，其他進一步的

任何活動都是多事。這樣，宗教上的定俸制度，通常在最初雖是生於宗教的見地，但結果卻說明是有助於社會的政治上的利益。”

但是，給與牧師、教士以獨立的給養，不論利弊如何，定立此制者，恐怕很少考慮到這些利弊。宗教上爭論激烈的時代，大概也是政治上鬥爭激烈的時代。在這時候，各政治黨派都發覺，或者都想象：與相爭各教派的某一教派同盟，必有利益。不過，要做到這層，又只有採納或贊成那特定教派的教理。某特定教派若幸而站在勝利的政黨那一邊，它就必然要共享其同盟者的勝利。藉着同盟者的贊助和保護，它馬上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切敵對教派沉默而屈服。這些敵對教派，大概都是與勝利黨的政敵結為同盟，它們因此也就成了勝利黨的敵人。這樣，這特定教派的教士，既完全成了戰場上的支配者，對於大多數人民的勢力與權威，達到了最高頂點，他們的權力於是變得足夠威壓自黨的領袖及指導者，而且足夠強制政府，使其尊重他們的見解和意向。他們對於政府的第一個要求，一般是為他們鎮壓并制服一切敵對的教派。第二個要求，一般是給與他們以獨立的給養。他們既然大有造於政治方面的勝利，要求分享若干勝利品，那於理似無不合。加之，人心反覆無常，要他們一味迎合民衆的心理，藉以取得生活資料，在他們已經覺得可厭了。所以，當這個要求提出時，他們純是為自己的安逸和快樂打算，至於將來會如何影響他們教會的勢力和權威，他們卻沒有多費考慮。在政府方面，要答應這個要求，就只有把寧願歸自己取得歸自己保留的一些東西給予他們。所以，對於這種要求，政府很少立即批准。不過，在需要面前，政府總是要屈服下來，雖然政府往往幾經延擱，推三拔四，才屈服下來。

但是，假若政爭不曾要求宗教的援助，而勝利的黨派，博得勝利時，又不曾特別採用任何教派的教理，那末，這個政黨，對於一切不同的教派，就會平等看待，一視同仁，讓各人去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牧師和宗教。在這種場合，無疑會有許許多多的教派出現。各種不同的會衆，幾乎都會自成一箇小教派，或者抱有自己的若干特殊教理。這時，充當教師的人，要保持現有教徒，並增加教徒數目，他定會感到有大賣氣力並使用一切技術的必要。可是，這種必要，是其他一切教師具有同感的，人人大賣氣力，人人使用一切技術，因此任何一個教師或任何一教派教師的成功，都不會過大。宗教教師利己的、積極

的熱心，只在社會只容許一個教派的場合，或一個大社會全體只分成爲兩三個教派，而各教派的教師，又在一定紀律、一定服從關係下協力共作的場合，纔會發生危險與麻煩。如果一個社會分爲二、三百乃至數千小教派的勢力範圍，那其中就不會有一個教派的勢力能夠攪擾社會，而他們教師的熱心，也就全然無害於事了。在這種場合，各宗派教師見到圍繞他們四周的，敵人多於朋友，於是就不得不注意到那常爲大教派教師所漠視的篤實與中庸；大教派教師所以如此，因爲大教派的教理，有政府爲其支援，博得廣大王國或帝國幾乎一切居民的尊敬，而教師們的周圍，因此就佈滿了門人、信徒及低首下心的崇拜者，沒有一個反對的人。小教派教師，因爲覺察到自己幾乎是獨立無助，通常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師；他們彼此相互感到便利而且適意的這種互讓，結果可能使他們大部分的教義，脫去一切荒謬、欺騙或迷妄的夾雜物，而成爲純粹的、合理的宗教。這樣的宗教，是世界各時代賢智之士最希望見其成立的宗教，然而成文法律，從來未曾使其成立，而且將來恐怕亦沒有一個國家能看到其成立；其原因是，關於宗教的成文法律，一向總是多少受世俗的迷信及狂熱的影響，而今後恐怕還要常常受此影響。這種教會管理方案，更適當的說，這個教會無管理方案，就是所謂獨立教派。這教派無疑是一個極其狂熱信徒的教派，英國於內戰終結時，有人建議在英國成立。它要是成立，雖然其起源是極其非哲學的，但到今日也許會使一切宗教教義，都出現最和平的氣質和最適中的精神了。賓夕法尼亞是實施了這個方案的地方。雖然那裏教友派佔最多數，但其法律對於各教派，實是一視同仁，沒有軒輊。據說，那裏就產生了這種合理的和平氣質和適中精神。

對各教派平等待遇，不分軒輊，縱使不能使一個國家中各教派全體或甚至一大部分，產生這種和平氣質和適中精神，但教派的數目，如果十分繁多，而且每個教派的勢力，都小到不夠攪擾社會治安，那末，各教派對於各自教理的過度熱心，就不會產生很有害的結果，反之，卻會產生若干好的結果。政府方面，如果斷然決定，讓一切宗教自由，並不許任何教派干涉其他教派，那就用不着耽心它們不會迅速自行分裂，而形成十分多數。

在各文明社會，即在階級區別已完全確立了的社會，往往有兩種不同的道德主義或道德體系同時並行着。其一稱為嚴肅的或刻苦的體系，又其一稱為自由的或者不妨說放蕩的體系。前者一般為普通人民所讚賞和尊敬；後者則一般為所謂時下名流所尊重和採用。不過，依我想，對於輕浮這種惡德——容易由大繁榮、由過度的歡情樂意生出的惡德——所加非難的程度如何，實構成了這兩個相反主義或體系間的主要區別。象放肆，甚至擾亂秩序的歡樂，無節制的尋歡逐樂，破壞貞節，至少是兩性中的一方面破壞貞操等等，只要不至於敗壞風化，不流於虛妄或不義，自由的或放蕩的體系，大概就會非常寬大地予以看待，而且會毫不躊躇地予以寬恕或原諒。至於嚴肅的體系則不然，這些過度的放蕩行為，都是其所極度憎惡與嫌厭的。輕浮的惡德，對於普通人總會招致毀滅。那怕一個星期的胡行與濫費，往往就足使一個貧窮的勞動者，永遠淪落，並驅使他陷於絕望的深淵，從而鋌而走險，干犯大逆。所以，普通人民中比較賢明而良善的，老是極度厭惡這些放蕩行為。經驗告訴他們，這些行為會馬上給他們這種境遇的人以致命打擊。反之，數年的放蕩及浪費，卻不一定會使一個上流人沒落。他們很容易把某種程度的放蕩，看作屬於他們財產上的一種利益；把放蕩而不受譴責或非難，看作屬於他們地位上的一種特權。因此，與他們同一階級的人，就不大非難這放蕩，而只加以極輕微的責備，或者全不責備。

差不多一切教派，都是在普通人民間創始的，它們從普通人民吸引其最初和最多數的新的皈依者，因此，嚴肅的道德體系，不斷為這些教派所採用，其中雖不無例外，但為數極少。這個體系，就是各教派最易博得那些他們首先向其提出改革舊教理方案的那階級人民的歡心的體系。為要博取這些人的信任，許多教派，也許大多數教派，甚至多方努力，變本加厲地改進這嚴肅體系，一直做到有幾分愚蠢、幾分過度的程度。此過度的嚴格，往往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博得普通人民的尊敬和崇拜。

有身分有財產的人，就其地位說，是社會中顯赫的人物。他的一舉一動，社會都在注意，而他因此就不得不注意他自身的一切行動。社會尊敬他到什麼程度，和他的權威與名望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凡社會上污名失信的事，他都不敢妄為；他得小心翼翼地注意社會對於

他這種有身分有財產的人一致要求的那種道德，不管這種道德是自由的或是嚴肅的。反之，一個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同了。他說不上是什麼社會的顯赫人物。當他在鄉村中的時候，他的行為，也許有人注意，所以他自己也許非當心自身行為不可。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只在這種情況下，纔可以說他有他的名聲，行為不正，就會損及名聲。但當他一走進大的社會，他馬上就沉於卑賤和黑暗中了。他的行為，再也沒有人觀察注意了，於是他就任情而動，不加檢點，委身於一切卑劣的遊蕩和罪惡。這是常有的事。一個人想從其微賤地位脫出，想惹起一個體面社會對他行為的注意，那頂有效果的方法，無過於作一個小教派的信徒。一做了某教派的信徒，他馬上就會受到幾分從來不曾受過的尊重。爲了教派的名譽，一切教友都要留心觀察他的行為；如果他做出了寡廉鮮恥的事，或者他所做的，大大違反了同門教友所相互要求的嚴肅道德律，他就要受那老是被看作一種極其嚴峻的懲罰，即開除教籍，雖然這懲罰不帶有民法上的結果。因此，在小教派普通人民的道德上，幾乎常是特別有規則有秩序的，比在國教要嚴肅得多。實在說，這些小教派的道德，往往卻未免過於嚴格，過於不合人情，使人覺得討厭。

可是，國家對於國內一切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人情及嚴肅到可厭程度的缺陷，不須使用暴力，只須依兩種極容易而有效的方法就可矯正。

第一種方法，是由國家強制國內有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身分及財產者，幾乎全都從事科學及哲學的研究。國家不應當給教師定額薪俸，以養成其怠惰。國家甚至可對較高深較困難的科學，設定一種檢定或考試制度，不論何人，他在就某種自由職業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選某種名譽的或有酬的職務以前，都須經過這檢定或考試。國家如對這一階級的人，強迫其研究學問，就不需要費神替他們供給適當的師資。因爲他們自己馬上會找到比國家爲他們供給的教師還要好的教師。科學是對於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劑。一國土流社會人士，從這些毒害救出之後，一般下級人民，也就不致大受其害了。

第二種方法，是增進民衆的娛樂。俗衆的迷信及狂妄，常起於心中的憂鬱或悲觀情緒。一大部分人民的這種情緒，不難由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乃至一切戲劇表演消除。所以，爲着自己利益，在

不流於傷風敗俗的範圍內，專以引人發噱，叫人解悶，而從事這些技藝的人，國家當予以獎勵，或者完全聽其自由。煽動俗衆的狂信者，總是恐懼公衆娛樂，厭惡公衆娛樂。由娛樂引起的快適與樂意，與最適合他們的目的，最便於他們的煽動的心理，是全然相反的。加之，戲劇表演，常會揭穿他們的奸詭手段，使其成爲公衆嘲笑的目標，有時甚至使其成爲公衆憎惡的目標。因此，戲劇一項，比其他任何娛樂，更爲他們所嫌忌。

一國法律，如對於國內一切宗教的教師，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則這些教師與君主或行政當局，就不必要保持有何等特定的或直接的從屬關係，而同時君主或行政當局，也不必要在他們職務的任免上，有所處置。在這種情況下，君主或行政當局對待他們，亦可如對待其他人民一樣，唯一任務，就是維持他們彼此之間的和平，即阻止他們相互的迫害、侵侮或壓迫，此外，便無其他關注的必要了。但是，一國如有國教或統治的宗教存在，那情形就完全兩樣。在那種場合，君主如對於該宗教的大部分教師，沒掌握有一種有力的控制手段，他就永無安全的日子。

一切國教，其教士都組織有一個大的法人團體。他們協力共作，以一種計劃，一貫精神，追求他們的利益，有如在一個人指導下一樣，而實際上也常常是在一個人指導之下。作爲法人團體，他們的利益，與君主的利益從來不相同，有時正直接相反。他們的大利益，在於維持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這權威，基於兩種設想：第一，設想他們所諄諄教渝的全部教義，乃是確實而又重要的；第二，設想要由永遠的悲慘解脫，則有以絕對信仰，採用這全般教義的必要。假使君主不自識相，敢對他們教義中甚至最細微的部分，表示嘲笑或懷疑，或是對其他嘲笑懷疑教義者，居然以人道精神，曲加保護，則這些同君主沒有何等從屬關係的教士，就認爲有失體面，而宣佈君主讀神，同時並使用一切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的忠順，從他移向另一個比較馴服的君主。假使君主對於他們的任何要求或侵穿行爲表示反對，危險也同樣的大。一個君主如敢於象這樣反對教會，他的反逆之罪是坐定了，此外，無論他如何嚴肅聲明他的信仰，以及他對於一切教會認爲君主應當格遵的教義的謙抑服從，大概還不免要加以異端僞道的罪名。宗教的權威勝過其他一切權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

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國教教會的教師，如要宣傳顛覆君權的教義，那君主就只有憑藉暴力，即憑藉常備軍的武力，才能維持其權威。有時就連這常備軍，也不能予以永久的保障，因為兵士如果不是外國人——外國人充當兵士的很少——而是從本國人民間募集來的——大概是如此——，那末，這些兵士，不久也恐怕會為那種教義所腐化。我們知道，在東羅馬帝國存續的期間，希臘教士，不知曾在君士坦丁堡惹起了多少次革命；往後幾百年間，羅馬教士也曾在歐洲各地惹起了許多次動亂，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了，一國君主如沒有控制國教或統治宗教教師的適當手段，他的地位，就該是如何危險，如何不安定。

宗教信條，以及一切其他有關心靈的事件，很明顯地都非塵世君主所得管轄；君主縱使有資格好好保護人民，卻很少被人相信有資格好好教導人民。所以關於上述教條及有關心靈的事件，他的權威，往往低不過國教教會教士們結合起來的權威。可是，社會的治安和君主自己的安全，常依存於教士們關於這些事件認為應當宣傳的教義。君主既不能以適當的壓力和權威，直接反抗教士們的決定，所以君主必須有影響他們決定的能力。影響的方法，惟有使教士階級大多數人有所恐懼而又有所希求。派職或其他處罰，是他們所恐懼的；升遷祿位，是他們所希求的。

在一切基督教會中，牧師的聖俸，可以說是他們終身享受的一種不動產。其享有，非憑授與者一時的高興；只要行為端正，即不得任意褫奪。這個財產的保有，如果不是這麼穩固，稍稍開罪於君主達官，即有被褫奪的危險，那末，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就不能維持了。人民會視他們為從屬宮廷的僱傭，對於他們教導的真誠，沒有何等信心。但是，假若君主濫用暴力，借口他們過於熱心散佈朋黨的或煽動的教義，竟行褫奪他們終身享有的不動產，那末，他這種迫害，只不過使被迫害的牧師及其教義，陡增十倍的聲譽，因而對於君主自身，陡增十倍的煩難與危險。幾乎在一切場合，恐怖手段，總是治國治人的一種壞工具，決不可用以對付那些對於獨立自主那怕只有一點點要求權利的人。企圖恐嚇這種人，只有刺激其惡感，堅定其反抗；這反抗如果處置稍為寬大一點，也許很容易使其緩和下來，或者完全放棄。法國政府常用暴力強迫議會或最高法院公佈不享衆望的佈告，然很少成功。可是，它通常所用的手段，即把一切頑強不服者通通監

禁起來，卻可算是十分厲害的了。斯圖亞特王室各君主，有時也用與此相類似的手段，來控制英國議會的若干議員，但那些議員也是同樣地頑強不屈。因此，他們不得不改弦更張了。英國議會今日是在另一種方法上被操縱着。約在十二年前，奇瓦塞爾公爵曾對巴黎最高法院，進行一個極小的實驗，由那個實驗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即採用英國今日使用的方法，法國一切最高法院，可更容易加以操縱。但這種實驗，沒有繼續進行下去。因為，強制與暴力，雖是政府的最壞最危險的工具，而權術與勸說，雖總是最容易最安全的工具，但人類似乎生來就是傲慢的，除非他們不能或不敢使用壞的工具，他們總是不屑使用好的工具。法國政府很能夠而且敢於使用暴力，所以不屑使用權術與勸說。不過，根據一切時代的經驗，我相信，以強制和暴力，加諸國教教會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危險和導引毀滅的可能，實有過於把強制和暴力加諸任何其他階級的人民。牧師有他們的權利，有他們的特權，有他們個人的自由，只要他們與其本階級中的人結有良好關係，即在最專制的政府下，與其他約有同等身分及財產者比較，其權利和自由，是更受人尊重的。在巴黎寬大溫和的專制政府是如此，在君士坦丁猛烈狂暴的專制政府亦是如此，而在此兩極間各種不同程度的專制政府，亦莫不如此。但是，牧師階級雖難以暴力強制，卻與其他階級同樣容易操縱。君主的安全，社會的治安，似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於君主操縱他們的手段，而這手段似乎完全在於他提升他們的權力。

舊時基督教教會的制度，各主教領區的主教，通由主教所轄都市的牧師及人民共同選舉。人民這種選舉權，並不曾保有多久；而且就在保有該權利的時候，他們多半也是唯牧師們的馬首是瞻；牧師們在這類有關心靈的事件上，儼然是以人民自然指導者自居了。不過，這樣操縱人民，也是一種麻煩的事，牧師們不久就厭倦了，他們覺得，主教由他們自己選舉比較容易得多。同樣的，修道院院長，亦由院中修道士選舉，至少大部分修道院的情況是如此。主教領區內的一切下級有俸聖職，通由主教任命，主教認為適當的，即授與職務。這樣，教會一切升遷權力，就全掌握在主教手中了。在這種場合，君主對於他們的選舉事項，雖然也擁有一些間接勢力，雖然教會關於選舉乃至選舉的結果，有時也請求君主同意，但是君主畢竟沒有直接或充分手

段操縱他們。因此，每一個牧師的野心，就自然使他要阿諛本教會中人，而不阿諛君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滿足其升遷期望。

羅馬教皇最先逐漸把幾乎歐洲大部分的主教職、修道院院長職（或即所謂主教公會有俸聖職）的任命權，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種種奸計及口實，把各主教領區內大部分下級有俸聖職的任命權，拿到手中。這一來，所留給主教的，除僅僅足使其維持對所管轄牧師們的權力外沒有什麼了。同時，由於這種安排，君主的境況，也弄得比先前更壞。歐洲各國的牧師們，這樣簡直編組成了一種宗教軍。這種軍隊雖散處各國，但它的一切活動、一切動作，都可由一個首領指揮，並在一種劃一的計劃下進行着。每個特定國家中的牧師，可視為這軍隊的一個支隊；而各支隊的動作，又容易得到四周其他支隊的支持和援助。每個支隊，不僅對於各自駐在國及給養他們的國家的君主是獨立的，而且還隸屬於一個外國君主。這個外國君主隨時可叫他們反戈轉向該特定國家的君主，並使用其他一切支隊為其聲援。

這種武力的可怕，就我們想象得到的，可以算無以復加了。往時，當歐洲技藝及製造業未發達之前，牧師們的富有，使他們對普通人民擁有諸侯對其家臣、佃戶及扈從的同樣權力。諸侯在其領地上，擁有一種司法權；依同一理由，牧師們在皇族及私人基於錯誤的虔敬而捐贈教會的大所有地上，亦確立了一種類似的司法權。在此等大所有地範圍內，牧師們或其執事，不仰仗君主或其他任何人的支持和援助，就能夠維持和平；但是，沒有牧師們的支持及援助，那怕是君主或其他任何人，在那裏都維持不了和平。因此，有如俗世大領主在其特定領地及莊園所保有的司法權一樣，牧師們的司法權，就與國王的法院獨立，而劃在國家司法管理範圍以外了。牧師們的佃戶與大領主的佃戶同，幾乎全是可自由退租的仰戶，完全依靠其直接隸屬的主人。所以，牧師們一旦有了爭鬥，要他們參加，他們就得應召前往。牧師們的收入，計有兩種：其一是這些所有地的地租，其二是從什一稅得到的歐洲所有國家的一切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這兩種地租，大半都以實物繳納，如穀物、葡萄酒及牲畜等。它們的數量，大大超過牧師們自己所能消費的限度。當時既無藝術品或製造品可資交換，他們對於這大量的剩餘，就除了象諸侯處置其剩餘收入一樣，大宴賓客，大行慈善以外，再也沒有其他有利的使用方法。因此，往時牧師

們款客和施捨的規模，據說是非常大的。他們不但維持了幾乎所有國家的全部貧民的生活，並且，許多無以為生的騎士紳士們，也往來於各修道院之間，假皈依之名，收款待之實。若干特殊修道院院長的扈從，往往與最大領主的扈認同樣的多。把一切牧師們的扈從合計起來，也許比一切領主共有的扈從還多。各牧師間的團結，在程度上大大超過凡俗領主間的團結。前者是在一種正規的紀律和從屬關係下，服從羅馬教皇的權威，後者不然，他們彼此間幾乎常在相互猜忌，並且同在嫉視國王。所以，雖然把佃人和扈從合計起來，牧師們所有的，比凡俗大領主少；而單就佃人說，也許少得多，但牧師們的團結力量，卻使他們更為人所恐懼。此外，牧師們的款待和慈善，不但給與了他們支配一支大的世俗力量的權力，同時並大大增加了他們精神武器的力量。他們已由這博施濟衆的善舉，博得了一般下級人民最高的尊敬和崇拜，這些人民，許多是不斷由他們贍養的，幾乎全體都有時由他們贍養的。一切屬於或有關這個有那麼大人望的階級的事物，它的所有物，它的特權，它的教義，必然在普通民衆眼中成為神聖的了；而對於這些神聖事物的侵犯，不論真偽，通是罪大惡極。這樣，如果君主抵抗其治下少數大貴族的同盟，常常感到困難，那就無怪其抵抗治下的牧師們的聯合力量，更感到困難；何況這種聯合力量，還有各鄰國的同一力量為其聲援呢：在此種情況下，君主有時不得不降服，倒不足奇怪；君主常能抵抗纔是怪事。

古代牧師們的完全不受世俗司法權支配的特權（在我們今日看來，是最不合理的），例如，英格蘭所謂牧師的特權，正是這種事勢的自然結果或更正確地說是必然結果。一個牧師不論所犯何罪，他的教會如有保護他的意向，並表示犯罪證據不夠處罰神聖人物，或說所加於神聖人物的懲罰過嚴，那末，君主這時想執法懲治那位牧師，該是多麼危險呢！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莫如讓那位犯罪者，由教會法庭去審判他。為他們全教會的名譽計，該法庭必儘可能抑制教會中每一個牧師；犯大罪，固所不許；即惹起世人惡感的醜行，亦在所必禁。

在第十世紀、十一世紀、十二世紀、十三世紀以及這前後若干時期的情況下，羅馬教會組織，可以說是反對政府權力和安全，反對人類自由、理性和幸福（這種種，只有在受到政府保護的地方，才能發揚）的曠古未有的可怕團結。在這種制度下，極愚蠢的迷信幻想，得到如此多數私人利己觀念的支持，以致任何人類理性的攻擊，都不能動搖它。因為，理性雖然也許能夠揭穿某些迷信妄想，使普通人也能明白其無稽，但理性決不能瓦解那基於利己心的結合。設使教會組織沒有碰到其他對頭，只有無力的人類理性對之施展攻擊，它是一定會永遠存在的。然而這個廣大牢固的組織，這個為一切人類智慧德性所不能動搖尤其不能顛覆的組織，卻由於事物的自然趨勢，先變成了萎弱，然後部分毀滅，而照現在的傾向，不到幾百年，恐怕還要全部瓦解。

技藝、製造業及商業逐漸的發達，是大領主權力瓦解的原因，也是牧師們在歐洲大部分的世俗權力全部瓦解的原因。象大領主一樣，牧師們在技藝、製造業及商業的生產物中，找到了可用以交換自己所有的原生產物的東西，並且由此發現了自己可以消費其全部收入的方法。自己既能完全消費自己的所有物，不必分許多給旁人，所以他們的施與，逐漸縮小範圍，他們的款待，也不象先前那樣慷慨、那樣豐盛。其結果，他們先前那麼多的扈從，由漸漸減少以致全部散去。為要過着大領主那樣的生活，為要滿足其虛榮和無意識的慾望，這些牧師也想由他們的所有地，獲取較多的地租。但是，要增加地租，只好答應跟租地人締結佃租契約，這一來，租地人大體上就脫離他們而獨立了。從此，使下級人民要聽牧師們支配的利害關係，一天天衰微，

一天天瓦解。和那使孩階級人民受大領主支配的利害關係的衰微與瓦解比較，前者的衰微與瓦解，還要來得迅速。這是因為大部分教會的采地，遠不如大領主領地之多，因此，每個采地的所有者，自己消費其全部收入就更快更容易。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封建諸侯的勢力，在歐洲大部分達於極點。但牧師們的世俗勢力，即他們曾一度擁有對大多數民衆的絕對支配權，卻在這時就非常衰微了。教會這時在歐洲大部分的勢力，幾乎就只剩下了心靈上的權威；甚且連這心靈上的權威，也因牧師們慈善不行，款待中輟，而非常薄弱了。下級人民對於這一階級，再也不視為是他們苦惱的安慰者和貧窮的救濟者了。在另一方面，富有牧師們的虛榮、奢侈與耗費，又惹起這般下級人民的憤激和嫌惡，因為一向被視為貧民世襲財產的東西，現在竟被這些牧師為自己尋樂而浪費了。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國君主力圖挽回他們曾一度享有的支配教會重要聖職的勢力。他們一方面恢復各主教領區副主教及牧師選舉主教的舊權利，一方面恢復各修道院修道士選舉院長的舊權利。這種舊制度的重建，就是十四世紀英格蘭制定的若干法令，特別是所謂有捧聖職栓敘條例的目的，也是十五世紀法國頒發的基本詔書的目的。依據這條例或詔書，要使選舉發生效力，進行選舉須先得君主的同意；被選的人物，亦須得君主的同意。這樣，選舉雖在想象上仍是自由的，但君主的地位，必然會使他掌握有種種間接手段，來支配其屬下牧師。在歐洲其他地方，亦設有與這同一傾向的規定，但羅馬教皇任命教會重要聖職的權力，在宗教改革前，似乎在英法兩國，被限制得最厲害而且最普遍。以後在十六世紀時，羅馬教皇與法國國王間成立了一種協定；根據這協定，法國對於法國教會一切重要聖職（即所謂主教大會聖職），有了絕對推薦權。

自基本詔書及上述協定成立以來，法國一般牧師對於教皇命令的尊敬，就不及其他天主教國家了。每當君主與教皇有所爭議，他們幾乎常是站在君主一邊。這樣看來，法國牧師們對於羅馬教皇的獨立，主要就是由於這基本詔書和協定了。在比較前些時代，法國牧師們極忠心於教皇，與他國牧師們原非兩樣。當克培王室第二君主羅伯特被教皇逐出教會時，教皇的處置雖極不正當，但法王的從臣，據說就把

法工食桌上的食物投擲於狗。他們拒絕吃罪王所觸穢了的一切東西。不難推測，法王左右居然這樣做，必是由當時國內牧師的指使。

對於教會重要聖職任命權的要求（爲了擁護這種要求，教皇宮廷常使基督教國家若干最有力君主的王位發生動搖，甚至於傾覆），就是這樣在歐洲各國，甚至在宗教改革以前，被抑制了，被變更了，或者完全放棄了。隨着牧師們對人民的勢力的減少，國家對牧師們的勢力日益加大。因此，牧師們攪擾國家治安的勢力和意向，就大非昔比了。

引起宗教改革的爭論開始在德國發生的時候，羅馬教會權威就是處於這種傾頓狀態。該爭論不旋趣間就傳播到歐洲各地。新教義到處大受歡迎。傳播這新教義者，以一般人攻擊既定權威時所常具的那樣熱烈奮發精神，從事宣傳。就其他方面說，新教教師，也許不比許多擁護舊教的牧師們更有學識，但大體上，他們對於宗教的掌故似乎比較熟悉，也比較知道舊教權威所由樹立的思想體系的起源與沿革，所以在一切論爭上，他們總佔優勢。他們的態度是嚴肅的，普通人民把他們循規蹈矩的行動，和自己大多數牧師們的浪漫生活對照起來，就分外覺得他們可敬了。加之，博取名望及吸收信徒的種種技術，這股新教教師，都比其反對者高明得多，反對者爲教會的驕子，自視不凡，他們現這些爲無所用的技術，早把其拋在腦後。新教義的理論，使某些人歡喜它；新教義的新奇，使很多人歡喜它；新教對舊教牧師們的憎惡和輕侮，使更多的人歡喜它。不過，使最大多數人民歡喜它的，還是宣傳新教義者到處諄諄教誨這教義的雄辯，那有時雖不免流於粗野下流，然而是熱誠的、熱情的、狂熱的雄辯。

新教義的成功，幾乎到處都是極大的。當時與羅馬教皇宮廷發生齟齬的君主，一憑着這教義，就不難把自己領域內的教會顛覆下來；教會是失了下級人民的尊敬和崇拜的，大抵都不能有所反抗。德意志北部有若干小君主，因一向受羅馬教皇宮廷輕視，曾有些對不起他們的地方，因此，他們就在自己領土內進行宗教改革。克雷蒂恩二世及阿普索大主教特諾爾的暴虐無道，使卡斯塔瓦斯·瓦薩能夠把他們逐出瑞典；教皇要袒護這暴君及主教，所以卡斯塔瓦斯·瓦薩在瑞典進行宗教改革，並未發現什麼困難。往後，雷蒂恩二世又在丹麥被廢，因其行爲不改，也象在瑞典時招人厭恨。但教皇還是袒護他；於是繼登王

位的霍斯泰恩的徘徊德烈為報復教皇，仿卡斯塔瓦斯·瓦薩的前例實行宗教改革。柏恩與久裏克政府，原是和教皇無特別爭執的，但因少數牧師一時的越軌行為，以致這兩地方人民憎惡輕視其全階級；在這種事故發生不久，宗教改革就極容易在這兩個地方完成了。

在這種危機四伏的狀態下，教皇宮廷不得不苦心孤詣地求好於法蘭西及西班牙的有力君主。後者在當時為德國的皇帝。仗着他們的援助，教皇宮廷才得在很大困難與很大流血慘劇之下，把他們領土內的宗教改革運動全然鎮壓住，或者大大地阻止了。對於英格蘭國王，教皇宮廷也分明是有意拉攏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因為怕得罪了更有力的西班牙國王兼德國皇帝查理五世，這友好終未結成。英王亨利八世原不盡信革新的教義，但因這教義已在國內一般流行了，所以他就樂得順水推舟，鎮壓領土內一切寺院，消除一切羅馬教會權威。他雖做到這裏就停止，沒有更進一步，但那些宗教改革的擁護者，卻已有幾分滿意了。往後英王嗣子繼位，政權卻操在這般宗教改革論者之手，亨利八世未竟之功，就由他們毫不費力地完成了。

有的國家，其政府是薄弱的，不得民心的，且未十分穩固的。象蘇格蘭就是如此。那裏的宗教改革運動，不但有力推翻羅馬教會，並且同樣有力推翻那企圖支持羅馬教會的國家。

宗教改革的信奉者，散佈在歐洲各國了。但他們之間，迄未有一個最高法庭，蒙羅馬教皇宮廷或羅馬全體教會會議那樣，能夠解決一切信奉者間的爭議，並以不可抗拒的權威，給他們規定正教的正確範圍。所以，一國宗教改革的信徒，如同另一國宗教改革的信徒的意見發生齟齬，因為沒有共同裁判官可向其訴請，所以那爭論從未得到解決；而他們彼此之間，又發生這類爭論很多。在各種爭論中，關於教會的統治及教會職務的任命這兩者，也許和市民社會的和平與福利最有關係。因此，在一切信徒之間，就產生了兩個主要黨派或教派，即路德派和喀爾文派。新派原亦分有不少的宗派，但其教理與教律，曾在歐洲各地，由法律加以規定的，卻只有這兩個宗派。

路德的信奉者與所謂英格蘭教會，都多少保存了監督制度的形式，牧師之間，樹立有一定的從屬關係，一國領土內一切主教職及其他主教會議牧師職的任免權，通給與君主，這一來，君主就成為教會的真正主腦了。至於主教領區內下級牧師職的任免權，雖仍操在主教

手裏，但君主及其他新教擁護者，不但有推薦權，而且這種推薦權還受着鼓勵。這種教會管理組織，從開頭即對於和平及良好秩序有利，對於對君主的服從也有利。所以，不論何國，這種教會管理組織一經確立，就從來沒有成爲何等騷擾或內訌的根源。特別是英格蘭教會，它自誇對於所信奉的教理忠心恪守，始終沒有例外，這的確不是沒有理由的。在這種教會管理制度之下，牧師們自會努力博取君主、宮廷及國中貴族巨紳的歡心，因爲他們所期待的升遷，就爲那般人的意向所左右。爲討那般人的歡心，無疑的，他們有時流於下流的曲諛和阿附，但他們通常都很考究那最值得尊敬從而最易博得有身分有財產者的敬重的技巧，如各種有用的及增添風致的學識哪，風度客態的端詳自在哪，社交談吐的溫恭曠逸哪，公然輕蔑一般狂信者的背理矯情的苦行哪，不一而足。他們所以公然輕蔑那些狂言者，是因爲這些狂言者，要博取普通人民的尊敬，同時爲使普通人民對大部分昌言不能刻苦的有身分有地位者懷抱憎惡，才教誨和假裝實行偽善的苦行。但是，這種牧師，在獻媚於上流階級的同時，很容易全然忽略了維持他們對人民的感化力與權威的手段。不錯，他們是受上等人物的注意、稱讚和尊敬的，但當他們在下級人民前受到那些最無知的狂信者的攻擊時，常常不能有效地、使聽衆信服地防衛他們的穩重和不走極端的教義。

茨溫克利的信奉者，或者比較妥當地說，喀爾文的信奉者，和路德的信奉者不同。他們把各教會牧師職的選舉權，付與各教區人民，牧師隨時出缺，人民隨時可以選舉。此外，他們在各牧師之間，樹立最完全的平等關係。就這制度的前一部分說，在它風行的時期，似乎也只不過導致了無秩序和混亂的狀態，並使牧師們及人民雙方都道德淪落。就後一部分說，除達到完全平等外，似沒有何等結果。

各教區人民在保有牧師選舉權的期間內，幾乎常是依照牧師們的意旨行事，而這些牧師又多半是最富於黨派精神和最爲狂熱的。爲要保持他們在這民衆選舉上的勢力，他們多數人自己成了狂信者，或者裝成了狂信者，他們鼓勵民衆信奉狂信主義，並常把優良位置接與那些最狂信的候選人。一個教區牧師的任命，原是一件小事，但結果不但在本教區內，並且動不動在一切鄰近教區內，釀起了猛烈的鬥爭。教區如在大城市中，這鬥爭便會把全區居民分成兩個黨派。設使那個

城市自身構成了一個小共和國，或者是小共和國的首都，如瑞士、荷蘭許多大城市那樣，那末，這無聊的鬥爭，除了激起其他黨派的憎惡情感以外，更會在教會內留下新的宗派，在國家內留下新的黨派。因此，在那些小共和國中，政府爲了維持社會治安起見，不久就覺得，把牧師職推薦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乃是緊急要圖。在蘇格蘭，也就是樹立長老管理教會制度的最大國家，在威廉第三柄政之初設立長老會的一個法令，事實上撤消這種推薦權。這法令至少使各教區某些階級的人，得以少許的代價，購買本區牧師的選舉權。基於那項法令形成的制度，大約存續了二十二年，卒因這比較普遍的選舉，到處惹起無秩序和混亂，乃由安妮女王第十年第十二號法令廢除了。不過，蘇格蘭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僻遠教區發生紛擾，究竟不會象在一個小國那樣容易驚動朝廷。所以安妮女王同年的法令，把牧師職推薦權恢復起來。根據這個法令，凡有推薦權者推薦的人物，法律雖一律與以牧師職位，全無例外，可是教會（教會關於這方面的決定，並不一樣）在接與被推薦者以靈魂監督權或教區的教會管轄權以前，有時要求須先得到人民的贊同。至少，它有時以教區治安爲藉口，一直延宕到這贊同能夠得到時才授與。鄰近有些牧師有時爲了使他得到這贊同，但更經常爲了阻止這贊同而進行的私下干涉，以及爲了利用這樣的機會更有效而研究出頗爲有名的手段和技巧，也許就是蘇格蘭民間或牧師間還存有舊時狂信遺風的主要原因。

長老管理教會制度在牧師間樹立的平等，計有兩種，第一是權力或教會管轄權的平等，第二是聖俸的平等。在一切長老的教會中，權力的平等算做到了，聖俸的平等卻沒有做到。不過，聖俸之間的差等，究還沒有大到那種程度，使一般牧師們，爲要獲取較優聖俸，不惜對於推薦者作下流的曲諛阿附。在牧師職推薦權完全確立了的長老教會中，牧師要取得其上位者的愛顧，大概都是憑着學問、生活嚴整有規律、履行職務忠實勤勉這一類比較高尚比較冠冕的技術。甚至，他們的提拔者往往埋怨他們過於獨立不阿，視爲忘恩負義。其實，說得頂壞，他們也不過因無進一步的希求，態度流於冷淡罷了。因此，歐洲各地最有學問、最有禮節、最有獨立精神、最值得敬重的牧師們，恐怕要算荷蘭、日內瓦、瑞士及蘇格蘭長老教會內的大部分牧師了。

教會聖俸將近同等，其間沒有一個很大的聖俸，聖俸這樣的拉平狀況，雖或有不免操之太過，但對教會本身，卻有若干極良好的結果。一個小有產者想保持威嚴，唯一的方法就是具有很可為人模範的德行。要是浮薄虛華，品行乖戾，勢必惹人嘲笑，而且會使他趨於毀滅，與一般浮浪者無異。因此，他們這種人在自己行為上，就不得不遵循普通人所最尊敬的道德體系。他博得普通人的尊敬和好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指引他去遵循的生活方式。一個人的情況，如多少同我們自己情況接近，而且在我們看來，應該優於我們，那我們對於這個人，就自然而然會發生親切的感情。所以，普通人對這種牧師就同我們對上述人那樣親切，而牧師也變得很小心教導他們，很關心幫助並救濟他們。對於對他這樣親切的人，他甚至不會看不起他們的私心偏見，他決不會象富裕教會的傲慢牧師那樣，動輒以輕侮驕蹇的態度對待他們。因此，就對於普通人民思想的支配力說，恐怕長老教會的牧師，要勝過其他任何國教教會的牧師。由於這個緣故，普通人民不加迫害，即全部改信國教教會這事實，只有在實行長老教會制的國家，才能見到。

一國教會大部分的聖俸，如很普通，那末，大學教職所得的報酬，就一般要比教會有俸聖職的報酬優厚。在這場合，大學的教授人員，便會由全國所有牧師中抽取選拔，因為在任何國家，牧師是有最多數學者的階級。反之，一個教會大部分的聖俸，如很是可觀，那教會自然會把大學中大部分知名的學者吸引過去；這些學者一般不難找到有權推薦他們的人，因為這些人常以推薦他們為榮耀。在前一種情況下，全國知名的學者，將叢集於各大學；在後一種情形下，留在各大學的知名學者將限於少數，而就其中最年輕的教師，早在他們獲有充分的教授經驗與學識以前，說不定也已被教會網羅去了。據伏爾泰的觀察；耶穌教徒波雷，原不算學者中怎樣了不得的人物，但在法國各大學的教授中，還只有他的著作值得一讀。在產生這麼多的知名學者的國家，竟然其中沒有一個充當大學教授的，看起來，一定該有幾分奇怪吧。有名的加桑迪，在他青年時代，原是艾克斯大學教授。後來正當他天才發泄的黎明期，有人勸他進教會去，說那裏容易得到比較安靜、比較愉快的生活，並且容易得到比較適合於研究的環境。他聽信了，立即捨去大學教職，而投身到教會中去。我相信，伏爾泰的觀察，不但可適用於法國，對一切其他羅馬天主教國家也可適用。除了

教會不大屬意的法律和醫學這兩方面的人材外，你要想在這些國家的大學教授中，找出知名學者，那就真是鳳毛微角了。羅馬教會之外，在一切基督教國家中，英格蘭教會要算最富裕，最有捐贈財產的了。因此，英格蘭各大學的一切最優良最有能力的學者，就不斷被這教會吸引過去了。其結果，想在那裏找到一個學問馳名於歐洲的老教師，其難得幾乎與在任何羅馬天主教國家不相上下。反之，在日內瓦，在瑞士新教各州，在德意志新教各邦，在荷蘭，在瑞士，在瑞典，在丹麥，它們培植出來的最著名的學者，雖非全部，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充當大學教授。在這些國家，教會中一切最有名的學者，不斷被大學吸引過去。

在古代希臘羅馬，除了詩人、少數雄辯家及歷史家外，其餘最大部分知名的學者，大概都是充當哲學或修辭學的公私教師，這件事也許值得我們注意一下。從裏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時代，降至普魯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韋託尼阿及昆蒂裏恩時代，這個說法都可適用。把某一特定部門的學科，逐年專責成某一個人教授，那實是使他對於那門學科專精深造的最有效方法。因為，他今年教那一門，明年後年還得教那一門，如果他不是什麼都做不成的人，在數年之內，他一定能通達那一門學問的各部分；並且，如果他在今年對於某點的見解，還欠斟酌，到明年講到這同一個主題時，他多半會加以改正。科學的教師，確是真正想成為學者的人的自然職業，而同時這職業又是使他受到充實學問的最適當的教育。一國教會的聖俸，如僅是普通，則學者大部分，自然會從事這最有用於國家最有用於社會的教學職業，同時並可由此獲得他所能接受的最良好的教育。這一來，他們的學問，便會成為最充實、最有用的了。

應該指出，各國國教教會的收入，其中除特定土地或莊園收入外，雖然也是國家一般收入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沒用在國防上，而轉用到與國防非常相異的目的上了。例如，向教會繳納的什一稅，是一種真正的土地稅；教會如不把它收去，土地所有者對國防所能提供的貢獻，是要大得多的。國家緊急支出的資源，有些人說是專靠土地地租，有些人說是主要依靠土地地租。教會由這資源取去的部分愈多，國家能由這資源分得的部分就愈少，這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一切其他情形都一樣，教會愈富有，君主和人民就必然愈貧乏，而國家防

禦外侮的能力也就愈要薄弱，這很可說是一個一定不變的原則。在若干新教國家，特別是在一切瑞士新教州中，往時屬於羅馬天主教教會的收入，即什一稅和教會所有地的收入這兩者，已被發現為這麼大的資源，不但足夠提供國教牧師們適當的薪俸，而且只要略加補充，甚或不需要補充，並足夠開銷國家其他一切費用。尤其是強大的伯爾尼州政府，它把以前供給宗教的資金節貯起來，約有數百萬鎊的一大金額，其中一部分存貯國庫，另一部分投資於歐洲各債務國的公債生息，主要是法蘭西及大不列顛國家公債。伯爾尼或瑞士其他新教州各教會，費國家多少費用，我不敢冒以為知。根據一非常正確的計算，1755年蘇格蘭教會牧師們的全收入，包括教會所有地及他們住宅的房租，合理估計起來，不過六萬八千五百十四鎊一先令五又十二分之一便士。這樣極平常的收入，每年要供給九百四十四名牧師的相當生活的資料，再加上教堂及牧師住宅不時修葺或建築的支出，總會計算，每年亦不會超過八萬鎊乃至八萬五千鎊。蘇格蘭教會基金過於貧乏，那是不待言的。可是，就維持大多數人民信仰的統一，皈依的熱忱，乃至秩序、規則及嚴肅的道德精神說，沒有一個基督教國的最富裕教會，能夠超過蘇格蘭的教會。凡被認為國教教會所能產生的一切良好結果，屬於社會方面的也好，屬於宗教方面的也好，其他教會能產出的，蘇格蘭教會也同樣能產出。而比蘇格蘭教會並不見得更富裕的瑞士新教教會，還能在更大程度上產出這些結果。在瑞士大部分的新教州中，差不多找不出一個人，公言他不是新教教會的信徒。的確，如有人暈言他是其他教會的信徒，法律就會強迫他離開州境。但是，要不是牧師們勤勉，預先誘導人民全體——或許有少數例外——改信國教，象這樣嚴峻或者寧說是壓迫的法律，是決難在這種自由國家實行的。因此，在瑞士某地方，因為新教國與羅馬天主教國偶然的結合，改宗者不象其他地方那麼普遍，這兩種宗教，就不但同為法律所默認，而且同被認為國教。

不論何種職務，要其執行良好，其報酬或薪俸似須儘可能與該職務的性質相稱。如報酬過少，那就很容易由奉職者大部分的卑劣無能而受到損害；如報酬過多，那就很容易由他們的疏忽怠惰而受到更大的損害。一個有大宗收入的人，無論他所執何業，他總會覺得，他應當與其他有大收入者過同一的生活，並且在歡樂、虛榮及放蕩上面稍費其大部分時間。但是，對於一個牧師，這樣的生活方法是不行的，

照此下去，他不但會把他應該用在職務上的時間消費掉，並且會使他人格上的莊嚴，在人民心目中完全掃地，而人格的尊嚴，正是使他能以適當的勢力與權威，執行其職務的唯一憑藉。

第四節論維持君主尊嚴的費用

一國君主，除了執行種種職務所必要的費用以外，爲維持其尊嚴計，亦須有一定的費用。這費用的大小，隨社會發達時期的不同而不同，隨政體形態的不同而不同。

在富裕而發達的社會中，各階級人民的房屋、傢俱、食品、服裝以及遊觀玩好之具，都由樸質而流於奢華，在此種情況下要君主獨逆時尚，決難做到。他的一切服用物品，所費必日益加多。因爲不是這樣，就不能維持他的尊嚴。

就尊嚴一點說，一國君主君臨於其臣庶，比之共和國元首對幹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塵莫及；所以爲要維持這較高的尊嚴，勢必要較大的費用。總督或市長的官邸，自不能與國王宮廷比其華麗。

本章的結論

防禦社會的費用，維持一國元首的費用，都是爲社會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因此，照正當道理，這兩者應當來自全社會一般的貢獻，而社會各個人的資助，又須儘可能與他們各自能力相稱。

司法行政的費用，亦無疑是爲全社會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這種費用，由全社會一般的貢獻開支，並無不當。不過，國家之所以有支出此項費用的必要，乃因社會有些人多行不義，勢非設置法院救濟保護不可；而最直接受到法院利益的，又是那些由法院恢復其權利或維持其權利的人。因此，司法行政費用，如按照特殊情形，由他們雙方或其中一方支付，即由法院手續費開支，最爲妥當。除非罪人自身無財產資金夠支付此手續費，否則，這項費用，是無須由社會全體負擔的。

凡利在一地一州的地方費用或州區費用（例如爲特定城市或特定地區支出的警察費），當由地方收入或州區收入開支，而不應由社會一般收入開支。爲了社會局部的利益，而增加社會全體的負擔，那是不大正當的。

維持良好道路及交通機關，無疑是有利於社會全體，所以，其費用由全社會的一般收入開支，並無不當。不過，最直接地受這費用的利益的人，乃是往來各處轉運貨物的商賈，以及購用那種貨物的消費

者。所以，英格蘭的道路通行稅，歐洲其他各國所謂路捐橋捐，完全由這兩種人負擔；這一來，社會一般人的負擔就要減輕許多了。

一國的教育設施及宗教設施，分明是對社會有利益的，其費用由社會的一般收入開支並無不當。可是，這費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宗教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為有受教育利益或宗教利益的必要的人自發地出資開支，恐怕是同樣妥當，說不定還帶有若干利益。

凡有利於全社會的各種設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受到利益的人維持，或不是全由他們維持，那末，在大多數場合，不足之數，就不能不由全社會一般的貢獻彌補。因此，社會的一般收入，除開支國防費及君主養尊費外，還須補充許多特別收入部門的不足。這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我將在下一章詳細說明。

第二章論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一國每年支出的費用，不但有國防費，君主養尊費，而且有國家憲法未規定由何等特定收入來開支的其他必要政費。這些費用的開支，有兩個來源：第一，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而與人民收入無何等關係的資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第一節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的收入源泉

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的資源或收入源泉，由資財及土地構成。

君主由其資財取得收入的方式，與其他資財所有者同，計有兩種，一是親自使用這筆資財，一是把它貸與他人。他的收入在前者為利潤，在後者為利息。

韃靼或阿拉伯酋長的收入全為利潤，他們自身是本集團或本部族中的主要牧畜者，他們自己監督飼養牲畜，由畜羣的乳汁及增殖獲取收入。不過，以利潤為王國收入的主要部分，只是最初期、最幼稚政治狀態下的事情。

小共和國的收入，有大部分是得自商業經營上的利潤。據說，漢堡小共和國的大部分收入，就是來自國營酒庫及國營藥店。君主有暇從事酒、藥的買賣，那個國家當然是不會很大的。公立銀行的利潤，常是更大國家的收入源泉。不但漢堡是如此，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亦是如此。許多人認為，就連不列顛這樣大的一個帝國，也未忽視這種收入。英格蘭銀行的股息為百分之五點五，按資本一千零七十八萬鎊計算，每年除去營業費用剩下的純利潤，實不下五十九萬二千九百鎊。有人主張：政府可以百分之三的利息，把這項資本借過來，自行經營，則每年可得二十六萬九千五百鎊的純利潤。經驗表明，經營這種事業，象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那種貴族政治下有秩序的、謹慎的、節約的政府，才最為適宜；象英格蘭這樣的政府，不論其優點如何，從未曾以善於理財著名。它的行動，在平時一般總是流於君主國自然難免的來自怠惰和疏忽的浪費，在戰時又常常流於一切民主國易犯的無打算的浪費。把這種事業讓它來經營管理，它是否能勝任愉快，至少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郵政局本來就是一種商業。政府事先墊款設置各郵勵併購買或租賃必要的車輛馬匹，這種墊款不久即由郵費償還，而且得有很大的利潤。我相信，各種政府所經營的商業成功的，恐怕只有這種企業。

這上面投下的資本額不很多，而其業務又不具有什麼神祕的性質。資本的收回，不但確定，而且極迅速。

但各國君主往往從事其他許多商業，他們同普通私人一樣，為改善其財產狀態，也常常不惜成為普通商業部門的冒險家。可是他們成功的不多。一種業務，讓君主經營，往往不免流乾浪費，浪費就使他們的成功變為不可能了。君主的代理人，往往以為主人有無盡的財富；貨物以何種價格買來，以何種價格售去，由一地運往他地，花多少費用，他們都是草率從事，不去精打細算。他們往往與君主過着一樣的浪費生活；並且，有時就是浪費了，仍能以適當方法捏造帳目，而積聚有君主那樣大的財產。據馬基雅弗利說：麥迪西的洛倫素，並不是無能的君主，而他的代理人替他經營商業就是如此。由於他的代理人浪費而負的債務，使得弗洛倫斯共和國不得不為他償還了好多次。幹是，他放棄了他的家庭從事致富的經商事業。在後半生，他把剩下的財產及可由他自由處置的國家收入，使用在更適合於自己地位的事業及用度上。

商人性格與君主性格兩不相容的程度，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假若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使它成了極壞的君主，那它的君主精神，似乎也使它成了極壞的商人。當該公司專以商人資格經商時，它是成功的，而且能在贏得的利潤中，支給各股東相當的紅利。但自它成為當地的統治者以來，雖據說有三百萬鎊以上的收入，卻仍因要避免當前破產計，不得不請求政府臨時的援助。在先前的地位，該公司在印度的人員，都視自己為商人的夥計；在現在的地位，他們卻視自己為君主的欽差。

一國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往往是得自貨幣的利息和資本的利潤。假若國家積蓄有一筆財寶，它可把這財寶的一部分，貸借於外國或本國的臣民。

伯爾尼聯邦以一部分財寶借給外國，即把它投資於歐洲各債務國（主要是英國、法國）的公債，獲得了很大的收入。這收入的安全性，第一要看那種公債的安全性如何，管理此公債的政府的信用如何；其次要看與債務國繼續保持和平的可能性的多少。在戰爭勃發的場合，債務國方面最初採取的敵對行為，恐怕就是沒收債權國的公債。以貨幣貸借於外國，據我所知，那是伯爾尼聯邦特有的政策。

漢堡市設立有一種公家當舖，人民以質物交與當舖，當舖即貸款於人民，取利息百分之六。由這當舖，或即所謂放債者提供國家的收入，計有十五萬克朗，以每克朗四先令六便士計，約合英幣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鎊。

賓夕法尼亞政府，是不曾蓄積何等財寶的，但它發明了一種對於人民的貸款方法，不交貨幣，只交與貨幣相等的信用徵券。此證券規定十五年償還，在償還以前，得如銀行鈔票一樣，在市面流通授受；而且由議會法律宣佈為本州一切人民間的法幣。人民藉此證券，須以兩倍價值的土地作為擔保，並須付若干利息。賓夕法尼亞政府是節儉而有秩序的，它每年的經常費用，不過四千五百鎊；它由這種貸款方法籌到的相當收入，對支付這筆費用大有幫助。不過，實行這種方策的功效如何，須視下面的三種情形而定：第一，對於金銀貨幣以外的其他交易媒介有多少需要，換言之，對於必須以金錢向外國購買的消費品，有多少需要，第二，利用這方策的政府，信用如何；第三，信用證券全部價值，決不可超過在沒有這證券的情況下流通界所需金銀幣的全部價值，所以這種方策是否使用得適如其度，亦與其成功大有關係。在美洲其他幾處殖民地，亦曾幾度施行過這同一方策，但由於濫用無度，結局多半是利少害多。

能夠維持政府的安全與尊嚴的，只有確實的、穩定的、恆久的收入，至於不確實的、不經久的資本及信用，決不可把它當作政府的主要收入資源。所以，一切已經超過游牧階段的大國政府，從來都不由這種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

土地是一種比較確實和恆久的資源。所以一切越過了游牧階段的大國的收入，都是以國有地地積為主要源泉。古代希臘及意大利各共和國就是如此。它們國家大部分必要費用的開支，在很長時間內是取給於國有地的產物或地租。而往時歐洲各國君主大部分的收入，亦在很長時間內取給於王室領地的地租。

在近代，戰爭及準備戰爭這兩件事體，佔了一切大國必要費用的大部分。但是在希臘及意大利古代各共和國，每個市民，都是兵士，服役也好，準備服役也好，費用通由他們自備，國家無須支出很多的費用。所以，一項不太大數額的所有地地租，就夠開支政府一切必要費用而有餘。

在歐洲古代君主國中，大多數人民因當時風俗及習尚所趨，對於戰爭，都有充分準備；一旦參加戰爭，依照封建的租地條件，他們自己支付自己的費用，或由直屬領主出資維持，君主無須增加新的負擔。政府其他費用，大都非常有限。司法行政一項，不但毫無所費，而且為收入源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的。鄉下人民於每年收穫前及收穫後，各提供三日勞動；國內商業上認為必要的一切橋樑、大道及其他土木工事，有這項勞動，就夠營造維持了。當時君主的主要費用，似乎就是他自身家庭及宮廷的維持費。他宮廷的官吏，即國家的大官。戶部卿是為君主收地租的，宮內卿及內務卿是為他的家庭掌管出納費用的。君主的廐舍，則委任警衛卿、部署卿分別料理。君主所居的宮寶，通以城廓形式建築，無異於他所有的主要要塞。這要塞的守護者，則有似衛戍總督。君主平時必須出費維持的武官，就只限於這些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大所有地的地租，通常就很可開支政府一切必要的費用了。

歐洲多數文明的君主國的現狀是，全國所有土地，管理得有們全部屬一個人所有，全部土地所能夠提供的地租，恐怕決不會達到各該國平時向人民徵收的普通收入那麼多。例如，英國平常的收入，包括其用作開支必要經常費，支付公債利息，及清償一部分公債等用途的，每年達一千萬鎊以上。然而所收土地稅，以每鎊徵四先令計，尚不及二百萬鎊。這所謂土地稅，按照設想，不僅包括由一切土地地租徵取的五分之一，而且包括對一切房租、一切資本利息徵取的五分之一，免納此稅的資本，只放貸於國家的及用於耕作的部分。這土地稅，很大部分是取自房租及資本利息。例如，以每鎊徵四先令計，倫敦市的土地稅，計達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九鎊六先令七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六萬三千零九十二鎊一先令六便士；沃特赫爾及聖詹姆斯兩宮殿，三萬零七百五十四鎊六先令三便士。這土地稅的一定部分，按照同樣規定向王國各部會各市鎮徵收，而幾乎全都出自房租及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利息。總之，英國值五抽一的土地稅，既然不到二百萬鎊，則全部地租、全部房租、全部資本（貸給政府及用於耕作的資本除外）利息收入總額，當然不超過一千萬鎊，也就是說不超過英國在平時向人民徵收的收入額。英國為徵收土地稅對各種收入所作的估計，就全王國平均起來，無疑是和實際價值相差太遠；雖然據說在幾個州和幾個區，該估計和實際價值很接近。有許多人估計，單單土地

地租一項，即不計房租及資本利息，每年總額，當有二千萬鎊。他們這種估計，是非常隨便的，我認為大概估得過高。但是，假若在目前耕作狀態下，英國全部土地所提供的地租，沒超過二千萬鎊，那末，這土地如通由一個人領有，而且置於他的代辦人、代理人的怠慢、浪費和專橫的管理之下，那全地租額，就莫說二千萬鎊的二分之一，恐怕連四分之一也提供不出來。英國今日王室領地所提供的地租，恐怕還不到這土地如果屬於私人所有的情況下所能提供的數額的四分之一。如果王室領地更加擴大，則其經營方法必定更形惡劣。

人民由土地獲取的收入，不與土地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除播種的種子外，一國全部土地年生產物，都是歸由人民逐年消費，或者用以交換他們所消費的其他物品。凡使土地生產物增加到其本來可能增加到的原因，無論是什麼，它使人民收入因而減少的程度，總大於它使地主收入減少的程度。英國土地地租，即生產物中屬於地主的部份，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達全生產物三分之一以上。假使在某種耕作狀態下，一年只提供一千萬鎊地租的土地，如在另一種耕作狀態下，一年可提供二千萬鎊地租，又假使在這兩種場合，地租都是相當於生產物的三分之一，那末，地主收入因土地被阻滯在前一耕作狀態下所受的損失，只不過一千萬鎊，而人民收入因此所受的損失要達三千萬鎊；未計入的，不過播種的種子罷了。一國土地生產物既減少三千萬鎊，其人口就也要按照這三千萬鎊減去種子價值後的餘額，按照所養各階級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費用方式所能維持的人數減少下來。

在歐洲現代文明國家中，以國有土地地租為公家大部分收入的，已不復存在；但君主擁有廣大領地的情況，仍是一切大君主國共有的現象。王室領地大抵都是林固，可是有時你行經這林園三數英里，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棵樹木。這種土地的保留，既使國家產物減少，又使國家人口減少。假使各國君主盡發賣其私有領地，則所入貨幣，必很可觀；若更以之清償國債，收回擔保品，那由此所得的收入，較之該地在任何時候給君主提供的收入，恐怕都要多得多。在土地改良得極好耕種得極好，當其出售時能產生豐厚地租的國家，土地的售價，例以三十倍年租為準。王室領地，既未經改良耕植，地租輕微，其售價當可望相當於四十倍年租、五十倍年租或者六十倍年租。君主以此大價格，贖回國債擔保品，就立即可以享受此擔保品所提供的收入。而

在數年之內，還會享有其他收入。因為，王室領地一變為個人財產，不到幾年，即會好好地改良，好好地耕植。生產物由此增加了，人口亦必隨着增加，因為人民的收入和消費必因此增大。人民收入和消費增大，君主從關稅及國產稅得到的收入勢必隨着增加。

文明國君主，由其領地獲取的收入，看來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這所損於全社會的，比君主所享有的其他任何同等收入來得多。所以，為社會全體利益計，莫若拍賣王室領地，從而分配給人民，而君主一向由其領地享有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同等收入來代替。

土地用作公園、林囿及散步場所，其目的在供遊樂與觀賞，不僅非收入源泉，而且須時常出費葺治。我看，在大的文明君主國，只有這種土地可屬於君主。

因此，公共資本和土地，即君主或國家所特有的二項大收入源泉，既不宜用以支付也不夠支付一個大的文明國家的必要費用，那末，這必要費用的大部分，就必須取給於這種或那種稅收，換言之，人民須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給君主或國家，作為一筆公共收入。

本書第一篇說過，個人的私收入，最終總是出於三個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潤與工資。每種賦稅，歸根結底，必定是由這三種收入源泉的這一種或那一種或無區別地由這三種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因此，我將竭盡所能，論述以下各點：第一，打算加於地租的稅；第二，打算加於利潤的稅；第三，打算加於工資的稅；第四，打算不分彼此地加於這三項收入源泉的稅。由於分別考究此四種賦稅，本章第二節要分為四項，其中有三項還得細分為若干小目。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許多這些賦稅，開始雖是打算加於某項基金或收入源泉，但結果卻不是由那項基金或收入源泉中支付，所以非詳細討論不可。

在討論各特殊賦稅之前，須列舉關於一股賦稅的四種原則，作為前提。這四種原則如下。

一、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範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一個大國的各個人須繳納政府費用，正如一個大地產的公共租地者須按照各自在該地產上所受利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費用一樣。所謂賦稅

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對幹這種原則是尊重還是忽視。必須注意，任何賦稅，如果結果僅由地租、利潤、工資三者之一負擔，其他二者不受影響，那必然是不平等的。關於這種不平等，我就這樣提一次，不擬多講，以後，我只討論由於某特種賦稅不平等地落在它所影響的特定私人收入上而引起的那種不平等。

二、各國民應當完納的賦稅，必須是確定的，不得隨意變更。完納的日期，完納的方法，完納的額數，都應當讓一切納稅者及其他的人瞭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個納稅人，就多少不免為稅吏的權力所左右；稅吏會藉端加重賦稅，或者利用加重賦稅的恐嚇，勒索贈物或賄賂。賦稅如不確定，那怕是不專橫不腐化的稅吏，也會由此變成專橫與腐化；何況他們這類人本來就是不得人心的。據一切國家的經驗，我相信，賦稅雖再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賦稅稍不確定，其害民實大。確定人民應納的稅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三、各種賦稅完納的日期及完納的方法，須予納稅者以最大便利。房租稅和地租稅，應在普通繳納房租、地租的同一個時期徵收，因為這時期對納稅者最為便利，或者說，他在這時期最容易拿出錢來。至於對奢侈品一類的消費物品的賦稅，最終是要出在消費者身上的；徵取的方法，一般都對他極其便利。當他購物時，繳納少許。每購一次，繳納一次。購與不購，是他的自由；如他因這種稅的徵收而感到何等大的困難，那只有責備自己。

四、一切賦稅的徵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儘可能等幹國家所收入的。如人民所付出的，多於國家所收入的，那是由於以下四種弊端。第一，徵收賦稅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這些官吏，不但要耗去大部分稅收作為薪俸，而且在正說以外，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負擔。第二，它可能妨礙了人民的勤勞，使人民對那些會給許多人提供生計和職業的事業裹足不前，並使本來可利用以舉辦上述事業的基金，由於要繳納稅款而縮減乃至於消滅。第三，對於不幸的逃稅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懲罰辦法，往往會傾其家產，因而社會便失去由使用這部分資本所能獲得的利益。不適當的賦稅，實為逃稅的大誘因。但逃稅的懲罰，又勢必隨這誘因的加強而相應地加重。這樣的法律，始則造成逃稅的誘因，繼複用嚴刑以徵逃稅，並常常按照誘惑的大小，而定刑罰的輕重，設陷阱民，完全違反普通正義原則。第四，稅吏頻

繁的訪問及可厭的稽查，常使納稅者遭受極不必要的麻煩、困惱與壓迫。這種煩擾嚴格地講，雖不是什麼金錢上的損失，但無異是一種損失，因為人人都願設法來避脫這種煩擾。總之，賦稅之所以往往徒困人民而無補於國家收入，總不外由於這四種原因。

上述四原則，道理顯明，效用昭著，一切國家在制定稅法時，都多少留意到了。它們都曾盡其所知，設法使賦稅儘可能地保持公平。納稅日期，輸納方法，務求其確定和便利於納稅者。此外它們並曾竭力使人民於輸納正稅外，不再受其他勒索。但下面對於各時代各國家的主要賦稅的短短評述，將表明各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並未得到同樣的成功。

第一項地租稅即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

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有兩種徵收方法：其一，按照某種標準，對各地區評定一定額地租，估計既定以後，不復變更；其二，稅額隨土地實際地租的變動而變動，隨情況的改善或惡化而增減。

象英國，就是採用前一方法。英國各地區的土地稅，是根據一個一定不變的標準評定的。這種固定的稅，在設立之初，雖說平等，但因各地方耕作上勤惰不齊的緣故，久而久之，必然會流於不平等。英格蘭由威廉及瑪利第四年法令規定的各州區各教區的土地稅，甚至在設定之初，就是極不公平的。因此，這種賦稅，就違反上述四原則的第一原則了，所幸它對於其他三原則，卻完全符合。它是十分明確的。徵稅與納稅為同一時期，它的完納時期與納租的時期相同，所以對納稅者是很便利的。雖然在一切場合，地主都是真正納稅者。但稅款通常是由佃農墊付的，不過地主在收取地租時，必把它扣還佃農。此外，與其他收入相等的稅收比較，這種稅徵收時使用的官吏是很少很少的。各地區的稅額，既不隨地租增加而增加，所以地主由改良土地生出的利潤，君主並不分享。固然，這些改良有時會成為同一地區的其他地主的破產的原因，但這有時會加重某特定地產租稅負擔的程度，極其有限，不足阻礙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產。減少土地產量的傾向既沒有了，擡高生產物價格的傾向自亦沒有，從而對於人民的勤勞，是決不會有何等妨害的。他主除了要納賦稅，不會有其他不便，但納稅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不便。

英國地主，無疑是由這土地稅不變的恆久性，得到了利益的，但這利益的發生，和賦稅本身性質無關，而主要是由於若干外部的情況。

英國自評定土地稅以來，各地繁榮大增，一切土地地租，無不繼續增加，而鮮有跌落，因此，按現時地租計算應付的稅額，和按舊時評定實付的稅額之間，就生出了一個差額，所有的地主，幾乎都按這差額而得了利益。假使情形與此相反，地租因耕作衰退而逐漸低落，那一切地主就幾乎都得不到這差額了。按英國革命以後的情勢，土地稅的恆久性，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君主；設若情勢與此相反，說不定就有利於君主，而不利於地主了。

國稅既以貨幣徵收，土地的評價，自以貨幣表現。自作了此評價以來，銀價十分固定；在重量上和品質上，鑄幣的法定標準都沒有變更。假若銀價顯著騰貴，象在美礦發現之前兩世紀那樣，則此評價的恆久性，將使地主大吃其虧。假如銀價顯著跌落，象在美礦發現之後一世紀那樣，則君主的收入，會因此評價的恆久性而大大減少。此外，如貨幣法定標準變動，同一銀量，或被抑低為較小的名義價格，或被提高為較大的名義價格，例如，銀一盎斯，原可鑄五先令二便士，現在不照這辦法，而用以鑄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末，在後一場合吃虧的是收稅的君主，在前一場合，吃虧的是納稅的地主。

因此，在與當時實際情況多少相異的情形下，這種評價的恆久性，就不免要使納稅者或國家感到極大的不便。然而，只要經過長久時間，那種情況就必有發生的一天。各帝國雖與一切其他人為的事物相同，其命運有時而盡，但它們卻總圖謀永遠存在。所以帝國的任何制度，被認為應與帝國本身同樣永久的，都不但求其便利於某些情形，而且當求其便利於一切情形。換言之，制度不應求其適合於過渡的、一時的或偶然的情況，而應求其適合於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變的情況。

徵收土地稅，隨地租的變動為轉移，或依耕作狀況的進步退步為高下。這曾被法國自命為經濟學派的那一派學者，推為最公平的稅。他們主張：一切賦稅，最終總是落在土地地租上。因此，應該平等地課於最後支付賦稅的源泉。一切賦稅應該儘可能平等地落在支付它們

的最後源泉，這無疑是對的。但是，他們這種極微妙的學說，無非立足於形而上學的議論上，我不欲多所置辯。我們只要看以下的評述，就可十分明瞭：何種賦稅，最終出自地租，何種賦稅，最終出自其他資源。

在威尼斯境內，一切以租約貸與農家的可耕土地，概徵等於地租十分之一的稅。租約要在公家登記冊上登記，這登記冊由各地區的稅吏保管。設若土地所有者自耕其地，其地租即由官吏公平估定，然後減去稅額五分之一。因此，土地所有者對這種土地所納的賦稅，就不是估定的地租的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八了。

與英國的土地稅比較，這種土地稅，確是公平得多。但它沒有那樣確定。它在估定稅額上，常常可能使地主感到大得多的煩惱，在徵收上可能要耗費大得多的費用。

設計這樣一種管理制度，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上述不確定性，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上述費用，也許不是做不到的吧。

比如，責令地主及佃農兩方，必須同在公家登記冊上登記租約。設若一方有隱匿偽報情弊，即科以相當罰金，並將罰金一部分給予告發及證實此情弊的他方，這樣，主佃夥同騙取公家收入的弊竇，可得到有效的防止。而一切租約的條件，就不難由這登記冊徵知了。

有些地主，對於租約的重訂，不增地租，只求若干續租金。在大多數場合，這是浪子的行爲，他們爲貪得進現金而捨去其價值大得多的將來收入。不待說，在大多數場合，這行爲是有損於地主自己的，但也時常損害佃人，而在一切場合，都對國家有害。因爲，佃農常會因此費去很大部分的資本，從而大大減低其耕作土地的能力，使他感到提供續租金而付較低的地租，反比增付較高的地租更加困難。況且土地稅爲國家最重要的一部分收入，因此，凡減低佃農的耕作能力從而損害土地稅收入的事情，都對國家有害。總之，要求續租金，是一種有害的行爲。假若對於這種續租金，課以比普通地租重得多的賦稅，該行爲或可阻止，而一切有關係的人，如地主、佃農、君主乃至全社會，均將受益不淺。

有的租約，規定佃農在整個租期內，應採何種耕作方法，應輪種何種穀物。這個條件，多由於地主自負其具有優越知識的結果（在大多數場合，這種自負是毫無根據的）。佃農受此拘束，無異於提供了

額外的地租，所不同的，以勞務不以貨幣罷了。欲阻止此愚而無知的辦法，惟有對於此種地租，從高評定，課以較普通貨幣地租為高的稅率。

有些地主不取貨幣地租，而要求以穀物、牲畜、酒、油一類實物繳納地租；有些地主，又要求勞務地租。不論實物地租或勞務地租，通常都是利於地主的少，而損於佃農的多。佃農腰包所出，往往多於地主財囊所入。實行這些地租的國家，佃農通是貧乏不堪的，實行愈嚴格，貧乏即愈厲害。這種貽害全社會的勾當，如使用同一方法，即對這種地租高其估計，課以較普通貨幣地租為高的稅率，那也許是制止得了的。

當地主自耕其所有地一部分時，其地租可由鄰近農人及地主公平估定。此估定的地租，如未超過某一定額，可照威尼斯境內所行辦法，略減其若干稅額。獎勵地主自耕，是很關重要的。因為地主的資本，大抵較佃農為多，所以，耕作縱談不及佃農熟練，常常能夠得到較豐盈的收穫。他有財力進行試驗，而且一般是有意進行試驗的。試驗不成功，所損於他的有限，試驗一成功，所利於全國耕作改良的無窮。可是，借減稅鼓勵地主自耕，只可做到足以誘使他自耕其一部分土地的程度。設使一大部分地主都被引誘去自耕其所有土地，那全國將充滿着懶惰放蕩的地主管家（為着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在所擁有的資本及所掌握的技能許可範圍內盡力耕作的認真和勤勉的佃農，盡被那些地主管家所替代）。地主管家這種濫費的經營，不到幾久，便會使耕作荒廢，使土地年產物縮減，這一來，受其影響的，將不僅地主的收入，全社會最重要收入的一部分，亦將因而減少。

象上述那種管理制度，一方面也許可以免除這一種稅收由於不確定所加於納稅者的壓迫與不便；另一方面，在土地的一般經營上，也許又可由此導人一種對全國土地的一般改良及全國耕作的改善有極大貢獻的計劃或政策。

土地稅隨地租變動而變動，其徵收費用，無疑較額定不變的所費為多。因為，在這制度下，不能不在各地多設登記機構，而當地主決定自耕其土地時，就須重新評定該地的地租，而兩者都要增加費用。不過，這一切費用，大抵都很輕微，和其他收入比這種土地稅少得多的稅收的徵收費用相比，實不算一回事。

可變土地稅會阻礙耕地改良，似可作為反對此稅的最重要口實。因為，如果君主不分攤改良的費用，而分享改良所得的利潤，為地主者，必比較不願從事土地的改良。然而，就是這種阻礙，也許亦有法可以免除。要是在地主進行改良土地之前，許其會同收稅官吏，依照雙方共同選擇的鄰近地主及農夫各若干人的公平裁定，確定土地的實際價值，然後在一定年限內，依此評價課稅，使其改良所費，能完全得到賠償，這樣他就沒有什麼不願改良土地了。這種賦稅的主要利益之一，在於使君主因注意自身收入的增加，而留心土地的改良。所以，為賠償地主而規定的上述期間，只應求達到賠償目的，不應定得太長；如地主享受這利益的時期太遠，那就恐怕會大大阻礙君主的這種注意。可是，在這種場合，與其把那期間定得太短，卻倒無妨定得略長一些。因為，促進君主留意農事的刺激雖再大，也不能彌補那怕是最小的阻礙地主注意改良土地的動機。君主的注意，至多隻能在極一般的、極廣泛的考慮上，看怎樣纔有所貢獻於全國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至於地主的注意，則是在特殊的細密的計較上，看怎樣才能最有利地利用他的每寸土地。總之，君主應在其權力所及範圍內，以種種手段鼓勵地主及農夫注意農事，就是說，使他們兩者，能依自己的判斷及自己的方法，追尋自己的利益；讓他們能最安全地享受其勤勞的報酬；並且，在領土內設置最便利最安全的水陸交通機關，使他們所有的生產物，有最廣泛的市場，同時並得自由無阻地輸往其他各國。凡此種種，纔是君主應當好好注意的地方。

假若這種管理制度，能使土地稅不但無礙於土地的改良，而且使土地改良有所促進，那麼土地稅就不會叫地主感到何等不便，要說有，那就是無可避免的納稅義務了。

社會狀態無論怎樣變動，農業無論怎樣進步或退步，銀價無論怎樣變動，鑄幣法定標準無論怎樣變動，這樣一種賦稅即無政府注意，亦自會不期然而然地與事物的實際狀態相適應，而且在這些變動下，都會同樣適當，同樣公平。所以。最適當的辦法，不是把它定為一種總是按一定評價徵收的稅，而是把它定為一種不變的規定，或所謂國家的基本法。

有的國家，不採用簡單明瞭的土地租約登記法，而不惜多勞多費，實行全國土地丈量。它們這樣做，也許因為怕出租人和承租人會

夥同隱蔽租約的實際條件，以騙取公家收入。所謂土地丈量冊，似乎就是這種報確實的丈量的結果。

在舊日普魯士國王領土內，徵收土地稅，都以實際丈量及評價為準，隨時丈量，隨時變更。依當時的評價，對普通土地所有者，課其收入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對教士們課其收入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西里西阿土地的丈量及評價，是依現國王命令施行，據說非常精確。按這評價，屬於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徵其地租百分之二十五；新舊兩教教士的其他收入，則取其百分之五十。條頓騎士團采邑及馬爾達騎士團采邑，通輸納百分之四十。貴族保有地，為百分之三十八點三三，平民保有地，則為百分之三十五點三三。

波希米亞土地的丈量及評價，據說是進行百年以上的工作，直到1748年媾和後，才由現在女王的命令限其完成。由查理六世時代着手的米蘭公領地的測量，到1760年以後才完全竣事。據一般評論，這丈量的精確是從來所未有的。塞沃伊及皮德蒙特的丈量，是出於故王沙廷尼亞的命令。

在普魯士王國中，教會收入的課稅，比普通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課稅要高得多。教會收入的大部分，都出自土地地租，但用這收入改良土地，或在其他方面增進大多數人收入的事，那是不常見到的。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吧，普魯士國王覺得教會收入，理應對國家的急需，比一般要多負擔。然而有些國家，教會土地卻全然免稅；有些國家，即有所稅，亦較其他土地為輕。1577年以前，米蘭公國領土內一切教會土地，僅按它的實際價值三分之一課稅。

在西里西阿，課於貴族保有地的稅，比課於平民保有地的稅高百分之三。這種差異，恐系由於普魯士國王有以下的想法：前者既享有種種榮譽、種種特權，那就很夠抵償他略高的賦稅負擔；同時，後者所感覺的不如人的恥辱，可從減輕賦稅負擔，使其得到幾分彌補。然而在其他國家則不然，它們的賦稅制度，不但不減輕平民的負擔，卻反加重平民的負擔。如在沙廷尼阿國王領地內，及在實行貢稅的法國各省，其賦稅全由平民保有地負擔，貴族保有地反概予豁免。

按照一般丈量及評價而估定的土地稅，其開始雖很公平，但實行不到多久，就必定變為不公平。為防止這流弊，政府要不斷地耐心地注意國中各農場的狀態及其產物的一切變動。普魯士政府、波希米亞

政府、沙廷尼阿政府以及米蘭公國政府，都曾實際注意及此。不過，這種注意，很不適於政府的性質，所以很難待久；即或長久注意下去，久而久之，不但對納稅者無所助益，而且會惹起更多的煩難。

據說，在1666年，芒託本課稅區所徵收的貢稅，系以極精確的丈量及評價為準。但到1727年，這稅卻變為完全不公平了。為矯正此種弊病，政府除對全區迫課一萬二千利弗附加稅外，再也找不出其他較好的方策。這項附加稅，雖按規定要課在一切依照舊的估定稅額徵課貢稅的稅區，但事實上只課在依照舊的估定稅額實際上納稅過少的地方，藉以津貼依照舊的估定稅額實際上納稅過多的地方。比如現在有兩個地區，其一，按實際情況應稅九百利弗，其二，應稅一千利弗。而按舊的估定稅額，兩者通稅一千利弗。在徵收附加稅後，兩者的稅額，都定為一千一百利弗。但要納附加稅的，只限於前此負擔過少的地區；前此負擔過多的地區，則由此附加稅額給予救濟。所以後者所輸納的，不過九百利弗。附加稅既完全用以救濟舊估定稅額上所生的不公平，所以，對政府毫無得失可言。不過，這種救濟方法的運用，大抵是憑稅區行政長官的裁奪，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獨斷獨行的。

不與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的賦稅

課於土地生產物的賦稅，實際就是課於土地地租的賦稅。這賦稅，起先雖由農民墊支，結果仍由地主付出。當生產物的一定部分，作為賦稅付出時，農民必盡其所能計算這一部分逐年的大體價值，究竟有多少，於是從他既經同意付給地主的租額中，扣除相當的數目。向教會繳納的什一稅，就是這一類賦稅。農民交出這年產物，而不預先估算其逐年大抵價值，那是沒有的事。

什一稅及其他一切類似土地稅，表面看似乎十分公平，其實極不公平。在不同情況下，一定部分的生產物，實等於極不相同部分的地租。極肥沃的土地，往往產有極豐盈的生產物；那生產物有一半，就夠償還農耕資本及其普通利潤，其他一半，或者其他一半的價值，在無什一稅的場合，那是足夠提供地主的地租的。但是，租地者如把生產物之十分之一付了什一稅，他就必須要求減少地租五分之一，否則，他的資本及利潤，就有一部分沒有着落。在這種情況下，地主的地租，就不會是全生產物的一半或十分之五，而只有十分之四了。至於貧瘠土地，其產量有時是那麼少，而費用又那麼大，以致農家資本

及其普通利潤的償還，須用去全生產物的五分之四。在此情況下，即無什一稅，地主所得地租，亦不能超過全生產物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二。如果農民又把生產物的十分之一付了什一稅，他就要從地租減除相等的數額，這樣，地主所得，就要減到只相當於全生產物的十分之一了。在肥沃土地上，什一稅往往不過等於每鎊四分之一或每鎊四先令的稅，而在較貧瘠土地上，什一稅有時要等於每鎊二分之一或每鎊十先令的稅。

什一稅既常為加在地租上的極不公平的賦稅，因此對於地主改良土地及農夫耕種土地，常為一大妨礙。教會不支出任何費用，而分享這麼大的利潤；這樣在地主，就不肯進行那最重要、也往往就是需要最多費用的各種改良；在農夫，亦不肯種植那最有價值、大抵也就是最多費用的穀物。歐洲自什一稅實施以來，栽培茜草，並獨佔此有用染料的，只有荷蘭聯邦，因為那裏是長老教會國家，沒有這種惡稅。最近英格蘭亦開始栽培茜草了，這就因為議會制有法令，規定種茜草地，每畝只徵抽五先令，以代替什一稅。

亞洲有許多國家，正如歐洲大部分地方的教會一樣，其主要收入，都仰給於徵收不與土地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的土地稅。中國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國一切土地生產物的十分之一構成。不過，這所謂十分之一，從寬估計，以致許多地方據說還沒有超過普通生產物的三十分之一。印度未經東印度公司統治以前，孟加拉回教政府所徵土地稅，據說約為土地生產物五分之一。古代埃及的土地稅，據說也為五分之一。

亞洲這種土地稅，使亞洲的君主們，都關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據說中國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為求儘量增加其國內一切土地生產物的分量和價值，都曾竭盡心力，從事公路及運河的創建與維持，使得每一部分生產物，都能暢銷於國內。歐洲享有什一稅的教會則不同。各教會所分得的什一稅，數量細微，因此沒有一個會象亞洲君主那樣關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一個教區的牧師，決不能發現有什麼利益，向國內僻遠地方修建運河或公路，以拓展本教區產物的市場。因此，這種稅，如用以維持國家，其所帶來的若干利益，尚可在某種限度抵消其不便；若用以維持教會，那就除不便外，再也無利益可言了。

課於土地生產物的賦稅，有的是徵收實物，有的是依某種評價徵收貨幣。

教區牧師和住在自己田莊內的小鄉紳，有時覺得以實物收取什一稅或地租，也許有若干利益。因為，他徵集的分量既少，所從徵集的區域又小，所以對每一部分應收實物的收集和處理，自己通能親自監視。可是，一個住在大都市而有大資產的紳士，如對於其散在各地的田莊的地租，亦徵收實物，那就不免要蒙受其承辦人及代理人怠慢的危險，尤其是這般人舞弊的危險。至於稅吏由濫權溺職所加於君主的損失，那無疑還要大得多。一個普通人，那怕凡事極其粗心大意，但與小心謹慎的君主比較，對幹督視使用人那一點，恐怕要強得多。公家收入，如以實物徵收，由於稅吏胡亂處理所遭的損失，實際納到國庫的，往往不過人民所出之一小部分。然而中國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據說就是這樣徵收的。中國大官及其稅吏們，無疑的都樂得保持這種徵稅慣例，因為徵收實物，是遠較徵收貨幣容易舞弊多了。

土地生產物稅徵收貨幣，有的是按照隨市場價格變動而變動的評價；有的則是按照一定不變的評價，例如，市場狀態無論如何變動，一蒲式耳小麥總是評作同一貨幣價格。以前法徵收的稅的稅額，不過隨耕作勤惰對實際生產物所生的變動而變動，以後法徵收的稅的稅額，就不但隨土地生產物上的變動而變動，而且會隨貴金屬價值的變動，乃至隨各時代同名鑄幣所含的貴金屬分量的變動而變動。因此，就前法言，稅額對於土地實際生產物的價值，總是保持同一的比例；就後法言，稅額對幹那個價值，在不同時期會保持大不相同的比例。

不徵收土地生產物的一定部分或一定部分的價格，而收取一定額貨幣來完全代替所有賦稅或什一稅，這種稅，就恰與英格蘭土地稅為同一性質。這種稅，既不會隨土地地租而騰落，也不會妨礙或促進土地的改良。有許多教區，不以實物徵收什一稅，而以貨幣代替實物的稅。那種稅法，亦與英格蘭土地稅相類似。在孟加拉回教政府時代，其所屬大部分地區，對於徵收生產物五分之一的實物，亦據說是以相當少的貨幣代替。此後，東印度公司的某些人員，因藉口把公家收入恢復到其應有的價值，在若干州區，也把貨幣代稅改為實物付稅。可是，在他們管理之下，這一改變，一方面因阻礙耕作，同時又造成徵收上營私舞弊的新機會，所以與他們開始管理那種稅收時比較，公家

收入曾大大減少。公司人員大抵曾從這個改變得了好處，但恐怕是以他們的主人及國家為犧牲的。

房租稅

房租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或可稱為建築物租；其二，通常稱為地皮租。

建築物租，是建築房屋所費資本的利息或利潤。為使建築業與其他行業立於同一水準，這種建築物租，就須第一足夠支給建築業者一種利息，相當於他把資本對確實抵押品貸出所能得到的利息；第二足夠他不斷修理房屋，換句話說就是他在一定年限內能收回其建築房屋所費的資本。因此，各地的建築物租，或建築資本的普通利潤，就常受貨幣的普通利息的支配。在市場利率為百分之四的地方，建築物的租金，如除去地皮租後，尚能提供相當於全部建築費用的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六點五的收入，那建築主的利潤，就算是足夠了。在市場利率為百分之五的地方，就也許要提供相當於全部建築費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七點五的建築主利潤，纔算是足夠的。利潤既與利息成比例，如果建築業的利潤，在任何時候超過上述比率過多，則其他行業上的資本，將會有很多移用到建築業上來，直至這方面的利潤，降到它正當的水平為止。反之，如果建築業的利潤，在任何時候低於該比率過多，則這方面的資本立即會移用到其他行業上，直至建築業利潤，再擡高到原來的水平為止。

全部房租中，凡超過提供合理利潤的部分，自然歸作地皮租。在地皮主與建築主為各別個人的場合，這部分，大抵要全數付與前者。此種剩餘租金，是住戶為報酬屋址所提供的某種真實或想象的利益而付給的代價。在離大都市遼遠、可供選擇建築房屋的空地很多的地方，那裏的地皮租，就幾乎等於零，或比那地皮用於農業的場合所得不會更多。大都市附近的郊外別墅，其地皮租就有時昂貴得多。至於具有特別便利，或周圍風景佳美的位置，不待說，那是更其昂貴。在一國首都，尤其是在對房屋有最大需要的特別地段內（不問這需要是為營業，為遊樂，或只為虛榮和時尚），地皮租大都是最高的。

對房租所課的稅，如由住戶付出，且與各房屋的全租成比例，那就至少在相當長期內不會影響建築物租。建築業者如得不到合理利潤，他就會不得已拋棄這行業，這一來，不要多久，建築物的需要提

高，他的利潤便會恢復原狀，而與其他行業的利潤，保持同一水準。這種稅，也不會全然落在地皮租上。它往往會這樣自行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住戶擔當，一部分由地皮主支出。

比方，假定有一個人，斷定他每年能出六十鎊的房租，又假定，加在房租上由住戶支出的房租稅，為每鎊四先令，或全租金的五分之一，那末，在這場合，六十鎊租金的住宅，就要費他七十二鎊；其中有十二鎊，超過了他認為能擔負的額數。這一來，他將願意住壞點的，或租金五十鎊一年的房屋，這五十鎊，再加上必須支付的房租稅十鎊，恰恰為他斷定每年所能負擔的六十鎊的數額。為要付房租稅，他得放棄房租貴十鎊的房屋所能提供的另外便利的一部分。我說他得放棄這另外便利的一部分，因為他很少得放棄其全部。有了房租稅，他會以五十鎊租得無稅時五十鎊所格不到的較好的房屋。因為，這種稅，既把他這個競爭者排除去，對於年租六十鎊的房屋，競爭自必減少，對於年租五十鎊的房屋，競爭亦必同樣減少，以此類推，除了租金最低無可再減，而且會在一定時間因此增加其競爭的房屋外，對於其他一切房屋，競爭都會同樣減少；其結果，一切競爭減少的房屋的租金都必多少下落。可是，因為減少的任何部分，至少在相當長期內，不會影響建築物租，所以，其全部就必然要落在地皮租上。因此，房租稅最後的支付，一部分落在那因為分擔此稅而不得不放棄其一部分便利的住戶頭上，另一部分落在那因為分擔此稅而不得不放棄其一部分收入的地皮所有者頭上。至於他們兩者間，究以何等比例分擔這最後支付，那也許是不容易斷定的。大約在不同情況下，這種分配會極不一樣；而且，隨着這些不同情況，住戶及地皮所有者，會因此稅而受到極不相同的影響。

地皮租所有者由於此稅所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完全是由於上述分擔上偶然發生的不平等。但住戶由於此稅所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就除了分擔上的原因以外，還有其他原因。房租對於全部生活費的比例，隨財產的大小程度而不同。大約，財產最多，此種比例最大；財產逐漸減少，此種比例亦逐漸減低；財產最少，此種比例最小。生活必需品，是貧者費用的大部分。他們常有獲得食物的困難，所以他們細微收入的大部分，都是費在食物上。富者則不然。他們主要的收入，大都為生活上的奢侈品及虛飾品而花費掉；而壯麗的居室，又最能陳飾他的奢侈品，顯示他的虛榮。因此，房租稅的負擔，一般是以富者為

最重。這種不平等，也許不算怎麼背理。富者不但應該按照收入比例為國家提供費用，而且應該多貢獻一些，難道可說這是不合理的嗎？

房租在若干點上，雖與土地地租相似，但在某一點上，卻與土地地租根本不同。土地地租的付給，是因為使用了一種有生產力的東西，支付地租的土地，自己產生地租。至於房租的付給，卻因為使用了一種沒有生產力的東西。房屋乃至房屋所佔的地皮，都不會生產什麼。所以，支付房租的人，必須由其他與房屋絕不相關的收入來源中提取所需的款。只要房租稅是落在住戶身上，它的來源必與房租本身的來源相同，而必由他們的收入來支付，不管這收入是來自勞動工資、資本利潤或土地地租。只要房租稅是由住戶負擔，它就是這樣一種的稅，即不是單獨課於那一種收入來源，而是無區別地課於上述一切收入來源，在一切方面都與任何消費品稅有同一的性質。就一般而論，恐怕沒有哪一種費用或消費，比房租更能反映一個人全費用的奢儉。對這種特殊消費對象比例徵稅，也許所得收入，會較今日歐洲任何其他稅收為多。不過，房租稅如定得太高，大部分人會竭力避免，以較小房屋為滿足，而把大部分費用移轉於其他方面。

確定房租，如採用確定普通地租所必需採用的方策，就容易做到十分正確的地步。無人居住的房屋，自當免稅。如果對它徵稅，那稅就要全部落在房屋所有者身上，使他為不給他提供收入也不給他提供便利的東西完稅。設所有者自己居住，其應納稅額，不應當以其建築費為準，而應按房屋要是租給別人依照公平裁定所能租得的租金為準。假若依其建築所費為準，那每鎊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稅，再加上他項稅捐，就幾乎會把全國的富戶大家全部毀掉，並且，我相信，其他一切文明國如都這樣做，也都會得到同一結果。不論是誰，只要他留心考察本國若干富戶大家的城中住宅及鄉下別墅，他就會發現，如按這些地宅的原始建築費百分之六點五或百分之七計算，他們的房租，就將近要等於他們地產所收的全部淨租。他們所建造的宏壯華麗的住宅，雖積數代的經營，但與其原費相比，卻僅有極少的交換價值。

與房租比較，地皮租是更妥當的課稅對象。對地皮租課稅，是不會擡高房租的。那種稅，將全由地皮所有者負擔。地皮所有者總是以獨佔者自居，對於地皮的使用，儘可能地要求最大的租金。其所得租金為多為少，取決於競相爭用地皮者為貧為富，換言之，取決於他們

能夠出多出少來滿足其對一塊地皮的愛好。在一切國家，爭用地皮的有錢人，以在國都為最多，所以國都中的地皮，常能得到最高的租金。不過，競爭者的財富，既不會因地皮稅而有所增加，所以他們對於使用地皮，亦不願出更多的租。地皮租的稅，是由住戶墊支，或是由地皮所有者墊支，無關緊要。住戶所必須付納的稅愈多，所願付的地皮租就愈少。所以地皮稅的最後支付，完全要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無人居住的房屋的地皮租，當然不應該課稅。

在許多場合，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同為所有者不用親自勞神費力，便可享得的收入。因此，把他這種收入，提出一部分充國家費用，對於任何產業，都不會有何等妨害。地皮課稅以後，與未稅以前比較，社會上地勞動的年產物，即人民大眾的真實財富與收入是不會兩樣的。這樣看來，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就恐怕是最宜於負擔特定稅收的收入了。

單就這點說，地皮租甚至比普通土地地租更適合作為特定稅的對象。因為，在許多場合，普通土地地租至少是部分歸因於地主的注意和經營。地租稅過重，足以成為這注意和經營的妨害。地皮租則不然。地皮租就其超過普通土地地租的數目說，完全是由於君主的善政。這善政，保護全人民的產業，同時，保護若干特殊住民的產業，使這些住民能對其房屋所佔地皮，償付大大超過其實際價值的租金，或者說，使這些住民能對地皮所有者提供大大超過足夠賠償地皮被人使用所受的損失的報酬。對於借國家善政而存在的資源，課以特別的稅，或使其納稅較多於其他大部分收入資源以支援國家的費用，那是再合理沒有的。

歐洲各國，雖然大都對於房租課稅，但就我所知，沒有一國把地皮租視為另一項稅收的對象。稅法設計者，對於確定房租中什麼部分應歸地皮租，什麼部分應歸建築物租，也許曾感到幾分困難。然而要把它們彼此區分，究竟不是何等了不起的困難。

在英國，有所謂年土地稅，照此種稅法，房租稅的稅率，應該是和地租稅的稅率相同。各不同教區和行政區，徵收此稅所定的評價，彼此常為一樣。那在原來已是極不公平，現今依然如此。就全王國大體說，此稅課在房租土的，依然比課在地租上的要輕一些。僅有稅率原來很高而房租又稍稍低落的少數地區，據說，每鎊三先令或四先令

的土地稅，與實際房租的比例相等。無人居住的房屋，法律雖規定要納稅，而在大多數地區，卻由估稅吏的好意免除了。這種免除，有時引起某些特定房屋的稅率的小變動，但全地區的稅率總是一樣。房屋建築修理，租金有增加，房租稅卻無增加，這就使特定房屋的稅率，發生更大的變動。

在荷蘭領土內，所有房屋，不管實際房租多少，也不管有人住着還是空着，一律按其價值，課稅百分之二點五。對於無人居住的房屋，即所有者不能由此取得收入的房屋，也勒令納稅，尤其是納那麼重的稅，未免苛刻。荷蘭的市場利息率，普通不過百分之三，對於房屋的整個價值，課百分之二點五的重稅，那在大多數場合，就要達到建築物租三分之一以上，或達到全部租金三分之一以上。不過，據以徵稅的評價，雖極不平等，但大都在房屋的實際價值以下。當房屋再建、增修或擴大時，就要重新評價，其房租稅即以此新評價為準。

英格蘭各時代房屋稅的設計者，似乎都有這個想法，即相當正確地確定各房屋的實際房租，非常困難。因此，他們規定房屋稅時，就根據一些比較明顯的事實，即他們認定在大多數場合對房租保有相當比例的事實。

最初，有所謂爐捐，每爐取二先令。為要確定一房屋中究竟有幾爐，收稅吏有挨室調查的必要。這種討厭的調查，使這種稅成為一般人討厭的對象。所以，革命後不久，即被視為奴隸制度的標誌，而被廢除了。

繼爐捐而起的，為對於每住屋課以二先令的稅。房屋有十四窗，增課四先令，有二十窗乃至二十窗以上，增課八先令。此稅後來大有改變。凡有窗二十乃至三十以下的房屋，課十先令，有窗三十乃至三十以上的房屋，課二十先令。窗數大抵能從外面計算，無論如何，總不必侵入各私人的內室。因此，關於這種稅的調查，就沒有爐捐那樣惹人討厭了。

往後，此稅又經廢止，而代以窗稅。窗稅設立後，亦曾有幾許變更和增加。到今日（1775年1月）英格蘭每屋除課三先令，蘇格蘭每屋除課一先令以外，窗戶另稅若干。稅率是逐漸上升的，在英格蘭，由對不到七窗的房屋所課最低二便士的稅，升至對有二十五窗乃至二十五窗以上的房屋所課最高二先令的稅。

這各種稅惹人反對的地方，在於不得其平。而其中最壞的，就是它們加在貧民身上的，往往比加在富者身上的，反要重些。鄉間市鎮上十鎊租金的房屋，有時比倫敦五百鎊租金房屋的窗戶還要多。不論前者的住戶怎麼窮而後者的住戶怎麼富，但窗稅既經規定下來，前者就得負擔較多的國家費用。這一年，這類稅就直接違反前述四原則的第一原則了。不過，對於其他三原則，倒還不見得怎樣乖違。

窗稅乃至其他一切房屋稅的自然傾向，是減低房租。一個人納稅愈多，明顯的，他所能負擔的房租就愈少。不過據我所知，英國自窗稅施行以來，通計所有市鎮鄉村的房屋租金，都多少提高了若干。這是因為各地房屋需要增加，使房租提高的程度超過了窗稅使其減低的程度。這事實可以證明，國家繁榮程度已經增大，居民收入已經增多。設無窗稅，房租也許是會提得更高的。

第二項利潤稅即加在資本收入上的賦稅

由資本所生的收入或利潤，自會分成兩個部分：其一為支付利息，屬於資本所有者；其二為支付利息以後的剩餘。

後一部分利潤，分明是不能直接課稅的對象。那是投資危險及困難的報酬，並且，在大多數場合，這報酬是非常輕微的。資本使用者，必得有這項報酬，他才肯繼續使用，否則，從其本身利益打算，他是不會再做下去的。因此，假如他要按全利潤的比例，直接受課稅負擔，他就不得不提高其利潤率，或把這負擔轉嫁到貨幣利息上面去，即是少付利息。假若他按照稅的比例而擡高其利潤率，那麼，全稅雖或由他墊支，結果還是按照他的投資方法，而由以下兩種人民之一付出。假若把他用作農業資本，栽種土地，他就只能由保留一較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或較大部分土地生產物的價值，而擡高其利潤率。他要想這樣做得通，唯有扣除地租，這樣，此稅最後的支付，就落到地主身上了。假若把他用作商業資本或製造業資本，他就只能由擡高貨物價格，而提高其利潤率。在這一場合，此稅最後的支付，就要完全落到消費者身上。假若他沒有擡高利潤率，他就不得不把全稅轉嫁到利潤中分歸貨幣利息的那一部分上去。他對於所藉資本，只能提供較少利息，那稅的全部，就終於由貨幣利息擔當。在他不能以某一方法減輕他自己的負擔時，他就只有採用其他方法來補救。

乍看起來，貨幣的利息，就好象和土地地租一樣，是能夠直接課稅的對象。正如土地地租一樣，貨幣利息，是完全除了投資危險與困難的報酬後所剩下的純收入。地租稅不能擡高地租，因為償還農業家資本及其合理利潤後，所剩下的純收入，決不能在稅後大於稅前。同此理由，貨幣利息稅，也不能擡高利息率，因為一國的資本量或貨幣量，與土地量同，稅前稅後，在推想上，都是一樣的。本書第一篇說過：普通利潤率，到處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資本量對於使用的資本量的比例的支配，換言之，到處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資本量對於必須使用資本來進行的營業量的比例的支配。但資本使用量，或使用資本進行的營業量，決不會因任何利息稅而有所增減。如果可供使用的資本，不增不減，那麼，普通利潤率，就必然要保持原狀不變。但是，報償投資者的危險和困難所必要的利潤部分，也同樣會保持原狀不變，因為投資的危險和困難並無改變。因此，殘餘部分，即屬於資本所有者，作為貨幣利息的部分，也必然要保持原狀不變。所以，乍看起來，貨幣利息就好象和土地地租一樣，是能夠直接課稅的對象。

然而與地租比較，貨幣利息究竟是不宜於直接課稅的，這有兩種的情由。

第一，個人所有土地的數量與價值，決不能保守祕密，而且常能正確地確定。但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金額，卻幾乎常是祕密的，要相當正確地確定，差不多是做不到。此外，資本額隨時容易發生變動。慢講一年，就是一月、一日，也常有增減。對於各個人私人情況的調查，即為求適當課稅，而調查監視各個人的財產變動，乃是非常使人生氣，非人所能忍受的事情。

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產所在國的一個公民。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於那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為了要課以重稅，而多方調查其財產，他就要舍此他適了。他並且會把資本移往任何其他國家，只要那裏比較能隨意經營事業，或者比較能安逸地享有財富。他移動資本，這資本前此在該國所經營的一切產業，就會隨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資本，使用勞動的是資本。一國稅收如有驅逐國內資本的傾向，那麼，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會兩方面的

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資本向外移動，不但資本利潤，就是土地地租和勞動工資，亦必因而縮減。

因此，要對資本收入課稅的國家，歷來都不採用嚴厲的調查方法，而往往不得已，以非常寬大的，因而多少是隨便的估算方法為滿足。採用這個課稅方法，其極度的不公平不確定，只可用極低的稅率才能抵償。因為照此做的結果，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所稅，已遠較其實際收入為低，那麼鄰人所稅雖比他低一些，他也就沒有什麼過不去了。

英格蘭所謂土地稅，原來是打算和對資本所課的稅採用同一的稅率。當土地稅率，每鎊課四先令，即相當於推定的地租的五分之一時，對於資本，也打算課其推定的利息的五分之一。當現行土地稅初行的時候，法定利息率為百分之六，因此，每百鎊資本，應該課稅二十四先令，即六鎊的五分之一。自從法定利息率縮減為百分之五，每百鎊資本應該只課二十先令。這所謂土地稅徵收的金額，乃由鄉村及主要市鎮分攤，就中一大部分是由鄉村負擔。市鎮方面負擔的部分，大半是課自房屋，其對市鎮上的資本或營業（因為對於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不打算課稅）徵稅的部分，遠在資本或營業的實際價值以下。因此，不論原始估定的稅額，不怎麼公平，以輕微緣故，終沒有引起何等紛擾。今日由於全國將近普及的繁榮，在許多地方，土地、房屋及資本的價值，已增高很多了，然而各教區、各地區對於這一切的課稅，卻依舊是繼續使用那最初估定的稅額，所以在現在看來，那種不公平，更無甚關係。加之，各地區的稅率久無變動，這一來，這種稅的不確定性，就其課在個人的資本說，已大大減少了，同時，也變成更不重要了。假若英格蘭大部分土地，沒有依其實際價值的一半估定稅額，那麼，英格蘭大部分資本，就恐怕沒有依其實際價值五分之一估定稅額。在若干市鎮中，如威斯敏斯特，全部土地稅，都是課在房屋上，資本和營業，全不徵稅。但倫敦不是如此。

無論哪個國家，都曾小心謹慎迴避了嚴密調查個人私事的舉動。

在漢堡地方，每個居民，對其所有一切財產，都得對政府納千分之二點五的稅。由於漢堡人民的財產，主要為資本，所以，這項稅，實可視為一種資本稅。各個人輸納國庫的稅額，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長官之前，把一定數額的貨幣，付入國家金庫，並宣誓那是他所有

財產總額的千分之二點五，但無須宣佈其財產額，也不受任何盤詰。這種稅的完納，一般是非常忠實的。因為，在一個小小共和國中，那裏的人民，都完全信賴長官，都確信賦稅是維持國家所必要，並且都相信，所出的稅，將忠實地為維持國家而使用，這種憑良心的自發的納稅辦法，有時是會做得通的，不限於漢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爾德聯邦，常有暴風及洪水的災害，所以常有籌集臨時費的必要。遇此場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佈其財產額數，然後依此課稅。在久裏奇，根據法律，每有緊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個人應依其收入比例納稅，對於該收入數額，人人負有發誓宣佈的義務。據說，當地行政當局，從來沒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騙他們。在巴西爾，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貨物的小額關稅。一切市民，都應當宣誓要每三個月繳付按法應納的一定稅款。一切商人，甚至一切旅舍主人，都須親自登記其在領土內外所賣的貨物，每到三個月末尾，就把計算單——在該單下端算出稅額——送呈國庫官吏。絕沒有人疑慮國庫收入，會因此受到損失。

對於各市民，加以公開宣誓其財產額的義務，在瑞士各聯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漢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苦了。從事冒險性貿易的商人，無時不害怕要公開其財產實況。據他料想，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壞、企業慘敗。至於從未從事此類冒險事業的質樸節約的人民，卻不會感到他們有隱蔽其財產實情的必要。

荷蘭在故奧倫治公爵就總督職後不久，對於全市民的財產，課以百分之二，或所謂五十便士取一的稅。各市民自行估計其財產，以及完稅的方法，全與漢堡相同。據一般推想，他們納稅也很誠實。當時人民，對於剛由全面暴動而樹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這種稅，是為了救濟國家特別急需而設的，只徵收一次。實在說，要是永久徵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荷蘭當時的市場利息率，很少超過百分之三，今對一般資本最高的純收入，課以百分之二的賦稅，即每鎊徵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人民為擔此重稅，而不侵蝕其資本的恐怕不多吧。當國家萬分危急之秋，人民激於愛國熱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棄其一部分資本。但他們決不能長久這樣做下去。設長此做下去，這種稅不久便會毀壞人民，使他們完全無力支持國家。

英格蘭依土地稅法案所課的資本稅，雖與資本額成比例，但並不打算減少或分去資本的任何部分，而只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稅的比例，課貨幣利息以相等的稅。所以，當地租稅是每鎊四先令時，貨幣利息稅，亦是每鎊四先令。漢堡所課的稅，以及翁德沃爾德和久裏奇所課更輕微的稅，也同樣打算以資本的利息或純收入為對象，而不是以資本為對象。至於荷蘭，其所說對象則為資本。

特定營業利潤稅

有些國家，對於資本利潤，課有特別稅，這資本有時是用在特殊商業部門的，有時是用在農業上的。

在英格蘭，對於小販商人及行商所課的稅，對於出租馬車及肩輿所課的稅，以及酒店主為得到麥酒火酒零售執照所納的稅，都屬於前一類稅。在最近戰爭中，曾經提議對店鋪方面課同類的稅。戰爭發動起來了，有人說戰爭保護了本國商業，由此獲利的商人，自應擔負戰爭費用。

不過，對於特殊商業部門資本所課的稅，最終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場合，必須有合理的利潤，並且，在商業自由競爭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過這合理利潤）負擔，而是由消費者負擔。消費者必然要在買物的價格上，支付商人墊付的稅額。而在大多數場合，商人還會把價格提高若干。

當這種稅與商人的營業成比例時，最終總是由消費者付出，於商人無所謂壓迫。但當它不是與商人營業成比例，而同樣課於一切商人時，雖最終亦是出自消費者，卻對大商人有利，對小商人成為多少的壓迫。對於每輛出租馬車，一週課稅五先令，對於每乘出租肩輿，一週課稅十先令，在這種稅是由車輿所有主分別墊付的範圍內，那就恰恰和他們各別的營業範圍成比例。照這樣稅法，它既不有利於大商人，也不壓迫小商人。領麥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二十先令；領火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四十先令；領葡萄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八十先令，這種稅制，對於零賣酒店，通通一律看待，大營業者必然要獲得若干利益，小營業者必然要受到若干壓迫。前者要在貨物價格上取還其墊付稅款，一定比後者容易。不過，因為這稅率輕微，雖不公平，亦比較無關重要，並且，在許多人看來，小麥酒店到處林立，予以小小妨阻，亦無不當。課於店鋪的稅，本來打算大小店鋪多

寡一律，而實際上也只得如此，無他辦法。這種稅要想相當正確地按各店鋪的營業範圍比例課徵，那除了採用自由國家人民絕難忍受的調查外，再也無法進行。這種稅如課得很重，將成為小商人的重大壓迫，並使全部零售業歸於大商人手中。小商人的競爭既不存在，大商人即將享受營業上的獨佔。如其他獨佔者相同，他們立即會聯合起來，把利潤大大擡高到納稅所需的限度以上。這一來，店鋪稅的最後支付，就不是由店鋪主擔當，而是由消費者擔當；消費者且還要為店主的利潤，再付一大筆的價錢。因此之故，就把這種稅的設計，拋在一邊，而代以1759年所設的補助稅。

在法蘭西，有一種稅稱為個人貢稅，這種稅也許是對農業資本利潤所課的最重的稅了，在歐洲一切地方，都實行這種稅。

在昔時歐洲封建政府盛行的混亂局面下，君主迫於情勢，不得不滿足於僅對一般無力拒絕納稅的人民課稅。大領主們，當君主有特別急需時，雖願意幫助，但對於恆久納稅一層，終不肯承認，而君主亦無實力強其承認。歐洲的土地佔有者，其初大部分都是農奴。他們後來在歐洲大部分，逐漸解放。其中一部分人，獲得地產保有權。他們有時在國王之下，有時在大領主之下，以賤奴條件保有地產，如英格蘭音時根據官冊享有土地者一樣。其他沒有獲得保地權的人，則在他們領主之下，以老幹年為期，租得其所佔有的土地，這一來，他們也比較不依附於領主了。大領主們看到這些下級人民，繁榮起來，獨立起來，不勝其忿，既瞧不起，又不甘心，因而樂得同意君主課他們以賦稅。在若干國家，這種稅的對象，限於那些以賤奴條件保有的土地；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地產的貢稅。沙廷尼阿故王設定的土地稅，以及在蘭多克、普馮斯、多菲那及布列塔尼各州，在芒託本課稅區，在亞琛及康頓選舉區，乃至在法蘭西其他若干地區，所課的貢稅，都是課在上述保有地上的賦稅。在其他各國，這種稅的對象，乃是那些租用他人土地者所得的推定的利潤，不問土地的保有條件如何。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個人的貢稅。法蘭西所謂選舉區各州，大部分都是行使這種稅法。地產的貢稅，既只課於一國的一部分土地，那必然是不公平的。可是，雖不公平，究竟不常出以專恣，雖然有時不免如此，至於個人的貢稅，則是打算對某一階級人民的利潤，比例徵收，而這利潤究竟有多少，又只能推測，所以必然是專恣的、不公平的。

法國今日（1775年）所行的個人的貢稅，每年課於稱為選舉區的二十個課稅區的，計達四千零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弗十六蘇。各州負擔這稅額的比例，年有變動，都取決於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各州收穫豐歉程度，以及其他可增減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情況的報告。每個課稅區，區分為若干選舉地域，全課稅區所分擔的上述比例的總稅額，分配於這各選舉地域；各選舉地域分擔的總額，亦是同樣按照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報告，而年有不同。照此看來，樞密院立意雖然盡善，但要想以相當正確比例，決定當年度某州、某區、某地域的實際納稅能力，卻似乎是不可能的。無知與誤報，一定要多少使大公至正的樞密院，錯下判斷。一個教區對全選舉地域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每個人對所屬教區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也是依必然有的不同情況，而逐年不同。這各種情況，在前一場合，是由選舉地域的收稅員判定；在後一場合，是由教區的收稅員判定，這兩者，都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受州長的指導及影響。據說，此等收稅員，往往對於那些情況，錯下評判，不但是由於無知和誤報，而且是由於黨同伐異，乃至個人私怨。任何納稅者，在稅額未評定以前，不能確知他要納稅多少，那是顯明的；他甚至在稅額既經評定以後，亦還不能確切知道。假若一個應該免稅的人，被課有稅，或一個人所稅超過了他應稅的比例，他們雖然都必須暫時付出稅額，但他們如果訴說不平，並證實了不平的理由，那麼，爲了補償他們，翌年全教區便當追徵一個附額。假若納稅者破產，或者全無支付能力，其應納的稅，必須由收稅員墊付，而爲補償收稅員，翌年全教區亦當追徵一個附額。假若收稅員自身破產了，選出他的教區，就必須對選舉地域的總收稅員負責那個收稅員的行動。但是，控訴一全教區，在總收稅員自屬麻煩；所以，他往往先任意選定那區中最富的納稅者五、六人，叫他們補償那收稅員無力支付的損失，而以後再向全教區追徵以補償他們。這種追徵稅，總是那特定年度貢稅以外另收的數額。

當一種稅加在特定商業部門的利潤上時，商人們都會留意，使上市的貨物量，不至過多超過他們能賣得足夠償還所墊付的稅的價格的數量。他們有的由營業上撤回一部分資本，使市場上的供給，較前減少。價格國貨少騰漲起來，那種稅最後的支付，就落在消費者身上了。但是，當一種稅課在農業資本利潤上時，農人如由那種用途撤回一部分資本，一定沒有利益可言。各農民佔有一定量土地，對那土地

支付地租。要求這土地耕作適宜，一定額資本，是必要的。如果他把這必要的資本撤回一部分，他不會更有能力支付地租或賦稅。爲要付稅，他的利益，決不是在於減少農作物產量，也決不是在於減少市上農作物供給量。因此，這種稅決不會使他擡高其產物的價格，把稅轉嫁於消費者，以取償所付的稅。不過，農民也如一切其他營業者一樣，須得有合理的利潤，否則他就會放棄他這種職業。在他有了這種負擔以後，他只有對地主少付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潤。他必須輸納的賦稅愈多，他能夠提供的地租就愈少。設若這種稅，課在租約未滿期以前，那就無疑會使農民陷於困難，甚或陷於破產。可是，當租約滿期續可時，這賦稅就一定要轉嫁於地主。

在施行個人貢稅的各國，農民所納的稅，通常是與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資本成比例。因此之故，他常怕保有良馬良牛，而竭盡所能用那些最惡劣、最無價值的農具耕作。他一般是不信任估稅員的公正，恐其強納重稅，總裝作貧困，以示無力付納。採用這可憐策術的，大概沒有好好考慮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減少生產物所損失的，說不定比他減少賦稅所節約的還多呢。這種惡劣耕作的結果，市場上的供給，無疑要少一些，但由此惹起的些微的價格的開漲，恐怕就連賠償他減少生產物的損失還嫌不夠，哪能使他支付更多的地租給地主呢。這種耕作的退化，公家、農民、地主，都會多少蒙其不利。至於個人的貢稅，在許多方面，都傾向於妨害耕作，從而涸竭富裕國家的財富源泉，我在本書第三篇，已經陳述過了。

北美南部各州及西印度羣島，有所謂人頭稅，即對每個黑奴逐年所課的稅。恰當地說，這稅就是加在農業資本利潤上的一種賦稅。因爲耕作者大部分都是農民兼地主，所以這種稅的最後支付，就由他們以地主的資格負擔了。

對於農業使用的農奴，每人課以若干的稅，往昔全歐洲似乎都曾行過，迄今俄羅斯帝國仍有這種稅。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吧，人們對於各種人頭稅，常視爲奴隸的表徵。但是，對於納稅者，一切的稅，不獨不是奴隸的表徵，而且是自由的表徵。一個人納稅了，雖然表示他是隸屬於政府，但他既有若干納稅的財產，他本身就不是主人的財產了。加在奴隸身上的人頭稅，和加在自由人身上的人頭稅，是截然兩樣的。後者是由被稅人自行支付，前者則是由其他不同階級的人支

付。後者完全是任意抽徵的，或完全是不公平的，而在大多數場合，既是任意抽徵又是不公平的。至於前者，在若干方面，雖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同的奴隸，有不同的價值，但無論就哪方面說都不是任意抽徵的。主人知道他的奴隸人數，就確然知道他應當納稅幾多。不過，這種不同的稅，因為使用同一名稱，所以常被人視為同一性質。

荷蘭對於男女僕役所課的稅，不是加在資本上的，而是加在開支上的，因此，就有類似加在消費品上的一種消費稅。英國最近對於每個男僕課稅二十一先令，與荷蘭的僕役稅相同。此稅的負擔，以中等階級為最重。每年收入百鎊者，或要僱用一個男僕；每年收入萬鎊者，卻不會僱用五十個男僕。至於貧民，那是不會受影響的。

課在特定營業上的資本的利潤稅，決不會影響貨幣利息。一個人放債，絕不會對資本用於有稅用途的人，收取低於向資本用於無稅用途的人所收的利息。一國政府，如企圖按相當正確的比例，對各種用途的資本的收入，一律課稅，那在許多場合，這稅就會落在貨幣利息上。法蘭西的二十分之一即二十便士取一的稅，與英格蘭所謂土地稅相同，同樣以土地、房屋及資本的收入為對象。就其對資本所課的稅，雖不怎樣嚴峻，但與英格蘭土地稅課在資本方面的比較，卻要正確多了。在許多場合，它完全落在貨幣利息上面。在法蘭西，人們往往把錢投資於所謂年金契約，這就是一種永久年金，債務者若能償還原借金額，即可隨時償卻，但債權者卻除了特殊場合，不許請求償卻。這種二十取一的稅，雖對這一切年金課徵，但似乎沒有提高這年金率。

第一項和第二項的附錄

加在土地、房屋、資財上的資本價值的稅

當財產為同一個人所擁有時，對於這財產所課的稅，無論如何恆久，其用意決不是減少或取去其財產的任何部分的資本價值，而只是取去該財產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當財產易主，由死者轉到生者或由一個生者轉到另一個生者時，就往往對這財產課以這種性質的稅，使得必然要取去資本價值的某一部分。

由死者傳給生者的一切財產，以及由生者過渡到另一個生者的不動產如土地、房屋，其轉移在性質上，總是公開的，彰明昭著的，長久隱瞞不得，所以公家對於這種對象。是可以直接徵稅的。至於生者

彼此間在借貸關係上發生的資本或動產的轉移，卻常是祕密的，並老是能保守祕密。對於這祕密轉移，直接徵稅，不容易做到，所以採用兩種間接方法：第一，規定債務契券，必須寫在曾付一定額印花稅的用紙或羊皮紙上，否則不發生效力；第二，規定此類相互接受行為，必須在一個公開或祕密的簿冊上登記，並徵收一定的註冊稅，否則同樣不發生效力。對於容易直接課稅的財產轉移，即對各種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的有關證件，及對不動產由一生者轉移給另一生者的有關證件，也常常徵上述印花稅和註冊稅。

羅馬古代由奧古斯塔斯設定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遺產稅，即對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所課的稅。關於此稅，迪昂·卡西阿斯曾有詳明的記述。據他所說，這種稅，雖課於因死亡而發生的一切繼承、遺贈和贈與行為，但受惠者如是最親的親屬或貧者，則概予豁免。

荷蘭對於繼承所課的稅，與此為同一種類。凡套系繼承，則依親疏的程度，對其繼承的全部價值，課以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稅。遺贈旁系，亦同此稅法。夫妻遺贈，不論夫贈給妻或妻贈給夫，都取稅十五分之一。直系繼承，後輩傳與長輩的悲慘繼承，則僅稅二十分之一。直接繼承，如是長輩傳與後輩的繼承，通例無稅。父親之死，對其生前同居的子女，很少有增加其收入，而且往往會大大減少其收入。父親死了，他的勞動力，他在世所享有的官職，或某些終身年金，都要損失去的，設更由課稅取去其一部分遺產，而加重這損失，那就未免近於殘酷和壓迫。但對於羅馬法所謂解放過了的子女，蘇格蘭法上所謂分過家了的子女，即已經分有財產，成有家室，不仰仗父親，而另有獨立財源的子女，情況則或有不同。父親的財產留下一分，他們的財產就會實際增加一分。所以，對這財產所課的繼承稅，不至比一切其他類似的稅，惹起更多的不便。

封建法使得死者遺給生者和生者讓給生者的土地轉移，通通有稅。在往昔，歐洲各國且現此為其國王主要收入之一。

直接封臣的繼承人，在繼承采邑時，必須付一定稅額，大概為一年的地租。假若繼承人尚未成年，在他未成年期中，此采地的全部地租都歸國王，國王除扶養此未成年者及交付寡婦應得的部分的亡夫遺產（如果這采地有應享遺產的寡婦）外，沒有任何負擔。繼承人達成年時，他還得對國王支付一種交代稅，此稅大概也等於一年的地租。

就目前而論，未成年如為長期，往往可以解除大地產上的一切債項，而恢復其家族已往的繁榮；但在當時，不能有此結果。那時普通的結果，不是債務的解除，而是土地的荒蕪。

根據封建法，采地保有者，不得領主同意，不能逕行讓渡，領主對於這同意，大抵要索取一筆金錢。其初，這筆錢額是隨意指定的，以後，許多國家都把這規定為土地價格中的一部分。有的國家，其他封建慣例雖然大部分廢止了，但對於這土地讓渡稅，卻依然存續着，而為其君主收入的一個極大來源。在伯爾尼聯邦，此種稅率極高；土地為貴族保有的，佔其價格六分之一，為平民保有的，佔其價格十分之一。在盧塞恩聯邦，土地變賣稅，只限於一定地區，並不普遍。但是，一個人如為轉居異地而變賣土地，則對賣價抽稅十分之一。此外，其他許多國家，有的則對一切土地的變賣課稅，有的則對依一定保地條件而保有的土地的變賣課稅，這些稅都或多或少構成其君主的一項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稅形式或註冊稅形式，間接對之課稅，而此等稅，也可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也可不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

英國的印花稅，不是按照轉移的財產的價值（最高金額的借據，只須貼一先令六便士或二先令六便士的印花），而是按照契據的性質，高下其稅額。最重的印花稅，為每張紙或羊皮紙貼六鎊印花。此種高稅，大抵以國王敕許證書及某些法律手續為對象，不管轉移物的價值是多少。英國對幹契約或文件的註冊，毫無所稅，有之，不過管理此冊據官吏的手續費罷了。即此手續費，亦很少超過對該管理者的勞動的合理報酬的數額。至於君主，沒由此取得分文。

在荷蘭，印花稅和註冊稅同時並行。此等稅的徵收，在若干場合，系按照轉移財產的價值的比例；而在其他場合，又沒有按照此種比例。一切遺囑，都需用印花紙書寫，該紙的價格，與所處理的財產成比例，因此，印花紙的種類，就有由三便士或三斯泰弗一張，至三百佛洛林（即二十七鎊十先令）一張的。假若所用印花紙，其價格低於其應用印花紙的價格，繼承財產就全部沒收。這項稅是對繼承所課的其他稅以外的稅。除匯票及其他若干商用票據外，所有一切票據、借據等，都應完納印花稅。但此稅不依轉移物價值比例而增高。一切房屋、土地的變賣，以及一切房屋、土地的抵押契據，都須註冊，而

在註冊時，並對國家納變賣品或抵押品價格百分之二點五的稅。載重二百噸以上之船舶，不問其有無甲板，變賣時也要完納此稅。這大概是把船舶看作水上的房屋吧。依法庭命令而變賣的動產，亦同樣繳納印花稅百分之二點五。

法蘭西亦是印花稅註冊稅同時並行。前者視為國內消費稅的一部分。實施此稅的各州，例由國內消費稅徵收人員徵收。後者則視為國王收入的一部分，由其他官吏徵收。

由印花及註冊課稅的方法，雖同為很晚近的發明物，但不及一百年之間，印花稅已幾乎遍行於歐洲了，註冊稅也非常普遍。一個政府，向其他政府學習技術，其最快學會的，無過於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錢的技術。

對財產由死者轉移到生者所課的稅，最終地和直接地都要落在接受此財產者的身上。對土地變賣所課的稅，卻完全要落在賣者身上。賣者的變賣土地，往往是迫於非賣不可，所以必須接受他所能得到的價格。至於買者，則沒有非買不可的需要，所以，他只肯出他所願出的價格。他把土地所費的價格和賦稅，放在一處划算：必須付出的賦稅愈多，他願意出的價格就愈少。因此，這種稅，常是由那些經濟困難的人負擔，所以一定是殘酷的、難堪的。對變賣新房屋所課的稅，在不賣地皮的場合，大抵是出自買者方面，因為建築家普遍總得獲取利潤，沒有利潤，他一定會放棄這種職業。如果稅由他墊支了，買者大抵總得償還他。對變賣房屋所課的稅，一般由賣者負擔，其理由與變賣土地相同。他賣，大概是因為有賣的必要或因為賣了於他方便些。每年出賣的新房屋數，多少是受需要的支配；那需要如對建築家不能提供利潤，他就不會繼續建築。至於每年出賣的舊房屋數，卻是受偶發事故的支配，這些事故，大抵於需要無何等關係。一個商業城市上如有兩三件大破產事故發生，就有許多房屋要出賣，並且都會以能夠得到的價格出賣。對變賣地皮所課的稅，亦由賣者負擔，其理由與變賣土地同。借貸字據契約的印花稅及註冊稅，全部出自求借者，而事實上也常是由他支出。訴訟事件所課的印花稅及註冊稅，由訴訟者負擔。無論就原告或被告說，這稅都不免減少爭訟對象的資本價值。為爭得某財產所費愈多，到手後的純價值一定愈少。

各種財產轉移稅，如果會減少那財產的資本價值，必會減少那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源。人民的資本，總只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君主的收入，則多半是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這種稅，既是犧牲人民的資本來增益國君收入，所以多少總是不經濟的。

況且，這種稅的徵收，即使按照轉移物的價值的比例，還是不公平的。因為相等價值的財產未必都作同一次數的轉移。至於不按照價值的比例徵收，象大部分印花稅及註冊稅，那就更要不平等了。不過，此稅在任何場合，都是明顯確定的，而不是任意決定的。雖有時不免加在非常無力負擔的人身上，但支付的期間，大概總是便於納稅者。到了支付的日期，他大抵總有錢來付稅。此外，此稅的徵收，用費極少。除納稅本身的無可避免的不便外，它一般不至增加納稅者以任何其他的不便。

在法蘭西，人們對印花稅不曾有什麼怨言，但對所稱為註冊稅，卻怨言四起。它使租稅包收人手下的人員有藉口大事勒索的機會，而勒索又大抵是任意的、不定的。反對法國現行財政制度的刊物，大半都是以這種註冊稅弊害為主題。不過，不確定一點，似乎還不是這種說的內在性質。如果這一般的不平，確有理由，那弊害倒寧可說是生於課稅敕令或法規用語有欠精確和明瞭，而不是生於此稅的性質。

抵押契據以及一切不動產權利的註冊，因其給予債權者及買入者雙方很大的保障，所以極有利於大眾。至於其他大部分契據的註冊，既對大眾無何等利益，又往往對個人不便，甚且危險。一般認為應保守祕密的股據，絕不應存在。個人的信用的安全，不應當信賴下級稅交的正直與良心那樣薄弱的保障。但是，在註冊手續費成了君主收入源泉的場合，則應註冊的契據固須註冊，不應註冊的契據亦須註冊，於是通常無限制地增設註冊機關。法國有種種祕密的註冊簿。這種弊害，雖或不是此稅的必然結果，但我們總得承認，那是此稅非常自然的結果。

英格蘭課加在紙牌、骰子、新聞紙乃至定期印刷物等等的印花稅，恰當地說來，都是消費稅；這些稅最後的支付，是由使用或消費這些物品的人負擔。麥酒、葡萄酒及火酒零賣執照所課的稅，雖原要加在這些零賣者的利潤上，但結果同樣由消費者負擔。象這類稅，雖

然也是稱為印花稅，雖然和上述財產轉移印花稅一樣，由同一收稅人員用同一方法徵收，但其性質完全不同，且由完全不同的資源擔負。

第三項勞動工資稅

我曾在本書第一篇努力說明過；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到處都受兩種不同情況的支配，即勞動的需要，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價格。勞動的需要，是增加呢，不增不減呢，還是減退呢，換言之，是要求人口增加呢，不增不減呢，還是減退呢，這支配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並決定那種生活資料是豐裕、是一般或是短少到什麼程度。食物的普通或平均價格，決定必須付給勞動者若干貨幣，使得他們每年能購買這豐裕或一般或少量的生活資料。當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沒有變動時，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工資數目提高到稍稍超過這稅額以上。比如，假定有一個特定地方，那裏的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使勞動普通工資為十先令一週。又假定，對工資所課的稅，為五分取一，即每鎊取四先令。假若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保持原狀，勞動者仍必須在那個地方獲得那每週十先令所能購得的生活資料，換言之，必須在付過了工資稅之後，還有每週十先令的可自由支配的工資。但是，為要使課稅後，還讓勞動者有這個工資額，那麼，這地方的勞動價格，就得馬上提高，不但要提高到十二先令，而且要提高到十二先令六便士。這就是說，為要使他能夠支付五分取一之稅，他的工資就必須立即提高，不但要提高五分之一，而且要提高四分之一。不論工資稅率如何，在一切場合，工資不但會按照稅率的比例增高，而且還會按照這稅率的比例高些微的比例增高。比方，此稅率如為十分取一，勞動工資不久就會升漲八分之一，而不只十分之一。

對勞動工資直接所課的說，雖可能由勞動者付出，但嚴格地說，就連由他墊支也說不上；至少，在課稅後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仍保持課稅前的原狀的場合是如此。在這一場合，不但工資稅，還有超過此稅額的若干款項，其實都是直接由僱他的人墊支的。至於其最後的支付，則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由各種不同的人負擔。製造業勞動工資由課稅而提高的數額，墊支者為製造業主。製造業主是有權利而且是不得不把那墊支額以及因此應得的利潤，轉嫁到貨物價格上的。因此，工資提高額及利潤增加額，最終都是歸消費者支付。鄉村勞動工資由課稅而提高的數額，墊支者為農業家。農業家為要維持以前相同的勞

動人數，勢必使用較大的資本。爲要收回這較大資本及其普通利潤，他須留下一較大部分的土地生產物，或一較大部分土地生產物的價值。其結果，他對地主就要少付地租。所以，勞動工資提高額及利潤增加額，都要由地主負擔。總之，在一切場合，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比之徵收一種與該稅收入數額相等的稅，即適當地一部分課於地租，一部分課於消費品的稅，必會使地租發生更大的縮減，必會使製造品價格發生更大的上漲。

如果對工資直接所課的稅，不曾使工資相應地增高，那就是因爲一般勞動需要因此發生了大大的減少。農業的衰退，貧民就業的減少，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低減，大概都是這種稅的結果。不過，因有此稅，勞動價格，總一定會比在沒有此稅的場合依照需要的實際狀況所會有的勞動價格高一些，並且，這上增的價格，以及墊支此價格者的額外利潤，最終總是由地主和消費者來負擔。

對鄉村勞動工資所課的稅，並不會按照此稅的比例而提高土地原生產物的價格，其理由，和農業家利潤稅不會按該說的比例而提高該價格一樣。

這種稅雖不合理，雖很有害，但有許多國家在實行。法國對鄉村勞動者及日工的勞動所課的那部分的貢稅，嚴格地說，即屬此種稅。這些勞動者的工資，乃依他們住在地的普通工資率計算，並且，爲使他們儘可能少受格外負擔，每年所得，只按不超過二百日的工資估計。每人的稅，依各年度的情形而每年不同，此等情形的評定，取決於州長委派協助他的收稅員或委員。波希米亞於1748年開始變革財政制度的結果，對手工業者的勞動，課徵一種非常重的稅。這些手工業者，被分爲四個等級，第一級，年稅一百佛洛林，每佛洛林按一先令十便士半換算，計達九鎊七先令六便士；第二級，年稅七十佛洛林，第三級年稅五十佛洛林，第四級，其中包括鄉村手工業者及城市最低級手工業者，年稅二十五佛洛林。

我在本書第一篇說過：優秀藝術家及自由職業者的報酬，必然對於比較低級的職業，保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對這報酬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使該報酬按略高於該稅比例的比例而提高。假若報酬沒象這樣提高，那優秀的藝術及自由職業，就不再與其他職業立幹同一的地

位，於是，從事這些職業的將大為減少，使其不久又重新回覆到原先的地位。

政府官吏的報酬，因為不象普通職業的報酬那樣受自由競爭的影響，所以，並不總是對這職業的性質所要求的報酬，保持適當的比例。在大多數國家，這種報酬，大都高於該職業性質所要求的限度。掌理國政者，對於自身乃至其直接從屬者，大概都傾向於給予以超過充分限度以上的報酬。因此，在大多數場合，官吏的報酬，是很可以課稅的。加之，任官職的人，尤其是任報酬較大的官職的人，在各國都為一般嫉妒的對象。對他們的報酬課稅，即使較他種收入所稅再高，也一定大快人心。比如，在英格蘭，當各種其他收入被認為依照土地稅法是每鎊徵四先令時，對於每年薪俸在百鎊以上的官吏的薪俸，除皇室新成家者的年金，海陸軍官的薪俸，以及其他少為人羨志的若干官薪外，每鎊實徵五先令六便士，曾極得人心。英格蘭沒對勞動工資抽收其他直接稅。

第四項原打算無區別地加在各種收入上的稅

原打算無區別地加於各種收入上的稅，即是人頭稅和消費品稅。這種稅，必須不分彼此地從納稅者各種收入中支付，不管那收入是來自土地地租、資本利潤或勞動工資。

人頭稅

人頭稅，如企圖按照各納稅者的財富或收入比例徵收，那就要完全成為任意的了。一個人財富的狀態，日有不同。不加以很難堪的調查，至少，每年不新訂一次，那就只有全憑推測。因此，在大多數場合，他的稅額的評定，必然要依估稅員一時的好意惡意為轉移，必然會成為完全是任意的、不確定的。

人頭稅，如不按照每個納稅人的推定的財富比例徵收，而按照每個納稅人的身分徵收，那就要完全成為不公平的。同一身分的人，其富裕程度，常不一樣。

因此，這類稅，如企圖使其公平，就要完全成為任意的、不確定的；如企圖使其確定而不流於任意，就要完全成為不公平的。不論稅率為重為輕，不確定總是不滿的大原因。在輕稅，人們或可容忍很大的不公平；在重稅，一點的不公平，都是難堪的。

在威廉三世治世的時候，英格蘭曾實行過種種人頭稅。大部分納稅者的稅額，都是依其身分而定。身分的等差，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士族、紳士及貴族長子末子等。一切行商坐賈，有財富在三百鎊以上，換句話說，商賈中的小康的，同樣課稅，至於三百鎊以上的財富大小不同程度如何，在所不計。在考慮他們稅額時，考慮身分過於考慮財富。有些人的人頭稅，起初是按照他們推定的財富課稅，往後，則改按照其身分課稅。法律家、辯護士、代訴人，起初是按其收入課人頭稅每鎊三先令，往後，改為按紳士的身分課稅。在課稅的過程中，曾發覺所課的稅，如不過重，相當程度的不公平，倒還沒有什麼；一不確定，人就不能忍受了。

法國由本世紀初推行的人頭稅，現尚繼續施行。人民中的最高階級，所課稅率不變；最低階級，則依其推定的財富程度，而年各不同。宮廷的官吏，高等法院的裁判官及其他官吏，軍隊的士官等，都以第一方法課稅。各州的較低階級人民，則以第二方法課稅。法國達官顯貴，對於對他們有影響的稅，如不過重，即使很不公平，一般也肯接受；但州長任意估定稅額的作風，他們則絲毫不能忍受。在那個國家，下層階級人民，對於其長上認為適當而給與他們的待遇，都是忍耐地承受下去的。

英格蘭各種人頭稅，從未收足其所期望的金額，即從未收足徵收如能做到精密應可收到的金額。反之，法蘭西的人頭稅，卻老是收足其所期望的金額。英國政府是溫和的，當它對各階級人民課徵人頭稅時，每以稅得的金額為滿足；不能完納的人，不願完納的人（這種人很多），或者因法律寬大，未強制其完納的人，雖使國家蒙受損失，亦不要求其補償。法國政府則是比較嚴酷的，它對每個課稅區，課以一定的金額，這金額，州長必竭盡所能收足。假若某州訴說所稅太高，可在次年的估定稅額上，按照前年度多納的比例予以扣減，但本年度估定多少，還是必須繳納的。州長為要確能收足本稅區的稅額，有權把這稅額估定得比應收足的額大一些；這樣，由納稅人破產或無力完納而受到的損失，就可以從其餘的人的格外負擔來取償。這種格外課稅的決定，至1756年止，還是一任州長裁決。但在這一年，樞密院把這種權力，握在自己掌中。據見聞廣博的法國賦稅記錄著者觀察，各州的人頭稅，由貴族及享有不納貢稅特權者負擔的比例最輕。

最大部分，乃課在負擔貢稅者身上。其辦法是依他們所付貢稅的多寡，每鎊課以一定金額的人頭稅。

課加在低級人民身上的人頭稅，就是一種對勞動工資的直接稅，徵收這種稅具有種種不便。

徵收人頭稅，所費有限。如果嚴格厲行，那會對於國家提供一項極確定的收入。就因為這個緣故，不把低級人民安逸、舒適及安全放在眼中的國家，人頭稅極其普通。不過，普通一大帝國由此取得的，往往不過是公共收入的一小部分；況且，這種稅所曾提供過的最大金額，也往往可由其他對人民便利得多的方法徵得。

消費品稅

不論採用那種人頭稅，想按照人民收入比例徵收，都不可能；這種不可能，似乎就引起了消費品稅的發明。國家不知道如何直接地並比例地對人民的收入課稅，它就努力間接地對他們的費用課稅。這費用，被認為在大多數場合，與他們的收入保持有一定比例。對他們的費用課稅，就是把稅加在那費用所由而支出的消費品上。

消費品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

我所說的必需品，不但是維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國習俗，少了它，體面人固不待說，就是最低階級人民，亦覺有傷體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嚴格說來，麻襯衫並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據我推想，希臘人羅馬人雖然沒有亞麻，他們還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現在，歐洲大部分，那怕一個日工，沒有穿上麻襯衫，亦是羞於走到人面前去的。沒有襯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窮到了丟臉的程度，並且，一個人沒有做極端的壞事，是不會那樣窮的。同樣的，習俗使皮鞋成為英格蘭的生活的必需品。那怕最窮的體面男人或女人，沒穿上皮鞋，他成她是不肯出去獻醜的。在蘇格蘭，對於最下層階級男子，習俗雖亦以皮鞋為生活所必需，但對同階級的女子卻不然，她赤着腳，是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在法國，無論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國最下層階級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腳，走在人前，而無傷體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釋，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關面子的習俗，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過，稱之為奢侈品，並不是對其適度的使用，

有所非難。比如，在英國，啤酒麥酒，甚至在葡萄酒產國，葡萄酒，我都叫做奢侈品。不論那一階級的人，他如完全禁絕這類飲料，決不致受人非難。因為，大自然沒有使這類飲料成為維持生活的必需品，而各地風習，亦未使其成為少了它便是有失面子的必需品。

由於各地的勞動工資，是部分地受勞動需要的支配，部分地受生活必需品的平均價格的支配。所以，凡提高這平均價格的事物，都會提高工資，使得勞動者仍有力量來購買依照當時勞動需要情況他們應該有的數量的各種必需品，不管那時候勞動需要情況是怎樣，是增加呢，不增不減呢，或減少呢。對這些必需品所課的稅，必然會使其價格提高，並且要略高於那稅額，因為墊支此稅的商人，一股定要收回這項墊支，外加由此應得的利潤。因此，這種必需品稅，必定使勞動工資，按此等必需品價格升漲的比例而提高。

這一來，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和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其所生影響恰恰相同。勞動者雖由自己手中支出此稅，但至少就相當長期說，他甚至連墊支也說不上。那種稅，最終總是通過增加的工資而由其直接僱主墊還給他。那僱主如系製造業者，他將把這增加的工資，連同一定的增加利潤，轉嫁到貨物價格上，所以，此稅最後的支付，以及這增加利潤的支付，將由消費者負擔。那僱主如系農業者，則此等支付，將由地主負擔。

對所謂奢侈品課稅，甚至對貧窮者奢侈品課稅，則又當別論，課稅品價格的騰貴，並不一定會惹起勞動工資的增高。例如，香菸雖同為富者貧者的奢侈品，但對這奢侈品課稅，不致提高勞動工資。香菸稅在英格蘭達原價三倍，在法國達原價十五倍，稅率雖高如此，但勞動工資。似不曾因此受到影響。茶及砂糖，在英格蘭，在荷蘭，已成為最低階級人民的奢侈品了；巧克力糖，在西班牙亦然。對此等奢侈品課稅，與對香菸課稅同，也沒有影響工資。對各種酒類所課的稅，並無人設想其對勞動工資，有何影響。濃啤酒每桶徵附加稅三先令，以致黑麥酒價格陡增，然倫敦普通工人工資，並未因此提高。在此附加稅未課以前，他們每日工資，約為十八便士、二十便士，而現在所得，亦沒有加多。

這類商品的高價，不一定會減少下等階級人民養育家庭的能力。對於樸實勤勞的貧民來說，對這些商品課稅，其作用有似取締奢侈的

法令，這種課稅會使他們儉用或完全剋制不用那些他們已不再能輕易就買得起的奢侈品。由於這種強制節約的結果，他們養家的能力，不但不因此稅而減，而且往往會因此稅而增。一般地說，養活大家庭及供給有用勞動的需要的，主要都是這些樸實勤勞的貧民。固然，一切貧民，並不都是樸實勤勞的；那些放肆的、胡行的，在奢侈品價格騰貴以後，會依然象以前一樣使用，至於放縱行為將如何使其家族困難在所不顧。但象這樣胡行的人，能養育大家庭的少；他們的兒童，大概都由照料不周、處理不善及食物缺乏與不衛生而夭亡了。即使兒童身體健壯，能忍受其雙親不當行為所加於他們的痛苦而活下去，但兩親不當行為的榜樣，通常亦會敗壞此兒童的德行。這些兒童長大了，不但不能以其勤勞貢獻社會，而且會成為社會傷風敗俗的害物。所以，貧民奢侈品價格的騰貴，雖或不免多少增加這種胡亂家庭的困苦，從而多少減低其養家的能力，但不會大大減少一國有用的人口。

必需品的平均價格，不論騰貴多少，如果勞動工資不相應地增加起來，那必然會多少減低貧民養家的能力，從而減低其供給有用勞動需要的能力，不管那需要情況如何，是增加，是不增不減，或是減少，就是說。是要求人口增加，不增不減，或減少。

對奢侈品課稅，除這商品本身的價格外，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都不會因此增高。對必需品課稅，因其提高勞動工資，必然會提高一切製造品的價格，從而減少它們販賣與消費的範圍。奢侈品稅，最終是由課稅品的消費者無所取償地支付的，它們是不分彼此地落在土地地租、資本利潤及勞動工資等收入上。必需品稅，在它們影響貧民的限度內，最終有一部分是由地主以減少地租的方式為其支付，另一部分是從提高製造品價格由富有的消費者或地主或其他的人為其支付。他們且往往要另付一個相當大的額外數額。真為生活所必需，而且是為貧民消費的製造品，例如，粗製毛織物等，其價格的騰貴，必然要由提高工資，使貧民得到補償。中等及上等階級人民，如真能瞭解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就應該一直反對生活必需品稅，反對勞動工資直接稅。這兩者最後的支付，全都要落在他們身上，而且總還附加一個相當大的額外負擔。尤其是地主，他的負擔最重，他對於此等稅，常以兩重資格支付：一是以地主資格，出於減少地租的形式；一是以消費者的資格，出於增加費用的形式。馬太·德克爾，關於生活必需品稅的觀察，是十分正當的。他認為，某種稅轉嫁到某種商品的價格上

的，有時竟重複累積四次或五次。比如，就皮革價格說，你不但要支付你自己所穿的鞋所用的皮革的稅，並須支付鞋匠及製革匠所穿的鞋所用的皮革的稅的一部分；而且這些工匠在為你服務期間所消費的鹽、肥皂及蠟燭等的稅，乃至製鹽者、制肥皂者、制蠟燭者，在他們工作期間所消費的皮革的稅，都須由你付出。

英國對生活必需品所課的稅，主要是加在剛纔說過的那四種商品——鹽、皮革、肥皂及蠟燭。

鹽為最普遍而且最古的課稅對象。羅馬曾對鹽課稅，我相信，現在歐洲各地，無不實行鹽稅。一個人每年消費的鹽量極少，並且，此少量的鹽，還可零用零購。因此，鹽說雖再重，似乎在人們看來，沒有人會因此感到怎樣難堪。英格蘭的鹽稅，每蒲式耳三先令四便士，約三倍其原價。在其他各國，此說還更高。皮革是一種真正的必需品。亞麻布的使用，使肥皂也成為必需品了。在冬夜較長的國家，蠟燭為各行各業的必要工具。英國皮革稅和肥皂稅，都是每磅三便士半。蠟燭則為每磅一便士。就皮革的原價說，皮革稅約達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就肥皂的原價說，肥皂稅約達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五；就蠟燭的原價說，蠟燭稅約達百分之十四或十五。這種種稅，雖較鹽稅為輕，但仍是極重的。這四種商品既都是真正的必需品，如此的重稅，勢必多少增加那樸實勤勞貧民的費用，從而多少提高他們勞動的工資。

在英國冬季這樣非常寒冷的國家，燃料一項，不獨就烹調食物說，即就在戶內工作的各種勞動者生活上的快適說，嚴格地講，亦算是這個季節的必需品。在一切燃料中，煤是最低廉的。燃料價格對於勞動價格影響是這樣的重要，使得英國所有主要製造業，都侷限在產煤區域；在其他區域，由於這必需品的昂貴，它們就難得象這樣便宜作業了。此外，有些製造業，如玻璃、鐵及一切其他金屬工業，常以煤為其職業上的必要手段。假者獎勵金在某種場合，能夠說是合理的，那麼，對於把煤由國內產煤豐饒地帶運往缺乏地帶的運輸，加以獎勵，那就恐怕說得上是合理的了。然而立法機構不但不加獎勵，卻對沿海岸運輸的煤，一噸課稅三先令三便士。此就多數種類的煤說，已為出礦價格百分之六十以上。由陸運或由內河航運的煤，則一律免

稅。煤價自然低廉的地方，可以無稅地消費，煤價自然昂貴的地方，卻反而要負擔重稅。

這類稅，雖然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從而提高勞動價格，但對於政府，卻提供了一項不容易由其他方法得到的大宗收入。因此，繼續實行這類稅，實有相當理由。穀物輸出獎勵金，在實際農耕狀態下，有提高此必需品價格的趨勢，所以必然要生出上述那一切惡果。可是，它對於政府，不但無收入可圖，而且往往要支出一筆大的費用。對外國穀物輸入所課的重稅，在一般豐收年度，實等於禁止其進口。對活牲畜及鹽醃食品輸入的絕對禁止，是在法律的平常狀態下實行的，現因此等物品缺乏，這條法律乃暫時停止適用於愛爾蘭及英國殖民地的產品。這些規定，都有必需品稅所有的一切惡果，而對政府卻無收入可言。要廢止這些規定，只要使大眾確信這些規定所由設立的制度的無益就夠了，似乎不必要採取其他手段。

對生活必需品所課的稅，和英國比較，其他許多國家要高得多。許多國家，對磨坊研磨的麥粉及粗粉有稅，對火爐上烘烤的麪包有稅。在荷蘭，都市所消費麪包的價格，據推測因此稅增加了一倍。住在鄉村的人，則有代替此稅一部分的他種稅，即根據假定每個人消費的麪包的種類，每年各課稅若干。例如，消費小麥麪包的人，稅三盾十五斯泰弗，約合六先令九便士半。這種稅，以及同類其他若干稅，據說，已由提高勞動價格而使荷蘭大部分製造業歸於荒廢了。在米蘭公園，在熱那亞各州，在摩登那公國，在帕馬、普拉遜蒂阿、瓜斯塔拉各公園，乃至在教皇領地，同類的稅亦可見到，不過沒有那樣繁重罷了。法國有一位略有聲名的著者，曾提議改革該國財政，以這最有破壞性的稅，去代替其他各稅的大部分。正如西西羅所說，“那怕是頂荒謬絕倫的事，有時亦會有若干哲學家主張”。

家畜肉稅比這些麪包稅，還要實行得普通。固然，家畜肉在各地是否為生活必需品，可有懷疑餘地。但據經驗，有米麥及其他菜蔬，再輔以牛奶、乾酪、牛油——弄不到牛油，則代以酥油——即無家畜肉，亦可提供最豐盛、最衛生、最營養、最增長精神的食物。許多地方，為着維持體面，要求人人穿一件麻襯衫，穿一雙皮鞋，但卻沒有一個地方要求人吃家畜肉。

消費品，不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都可以兩種方法課稅。其一，可根據消費者曾使用某種貨物消費某種貨物的理由，叫他每年完納一定的稅額；其二，當貨物還留在商人手中，尚未移交到消費者以前，即課以定額的稅。一種不能立即用完而可繼續消費相當的時間的商品，最宜於以前一方法課稅；一種可以立即消費掉或消費較速的商品，則最宜於以後一方法課稅。馬車稅及金銀器皿稅，為前者課稅方法的實例；大部分的其他國內消費稅及關稅，則為後者課稅方法的實例。

好好管理，一輛馬車可以經用十年或十二年。在它離開制車者以前，不妨一次為限課以若干稅。但對買者來說，為保有馬車的特權而年納四鎊，無疑要比除馬車價外，另付給馬車製造者四十鎊或四十八鎊，或相當於他在使用該馬車期間大約要完納的稅額，更為方便些。同樣，一件金銀器皿，有時可以經用百年以上。對消費者來說，對該器皿每重一百盎斯年付五先令，即約當其價值百分之一，比之一次付清這項年金的二十五倍或三十倍，確要容易些，因為在後一場合，此器皿的價格，至少將騰貴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對於房屋所課各稅，自以每年付一比較輕微數額為方便。如在房屋最初建築或變賣時，一次課以相當於各年稅額的全部的重稅，納稅者必感比較不便。

馬太·德克爾爵士有一個有名的提議，主張一切商品，甚至立即或迅速消耗的商品，都須依下面這方法課稅，即消費者為得到消費某商品的許可執照，逐年完納一定金額，商人不付任何稅額。他這計劃的目的，在於撤廢一切輸入稅輸出稅，使商人的全部資本全部信用，都能使用在購買貨物反租賃船舶上，而不必把其任何部分，移用於墊付稅款，使得一切部門的對外貿易，特別是運送貿易，因此有所增進。但是，主張對立即消耗或迅速消耗的商品，亦以這種方法課稅，似乎免不了以下四種極嚴重的弊病。第一，這種課稅方法和普通課稅方法比起來，較不公平，就是說，這樣就不能好好按照各納稅者的費用和消費比例課徵。由商人墊支的麥酒、葡萄酒及火酒稅，結果可由各消費者完全按照他們各個消費的數量的比例付出來。假若這種稅，是以購買飲酒許可執照方式完納，那節用者按照消費量所付的比例，就要比好酒者所付的大得多了；賓客頻繁的家庭所付的比例，就要比賓客少的家庭所付的小得多了。第二，按照這種方法課稅，消費某種商品，或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許可執照的費，這樣，對迅

速消耗商品所課各稅的主要便利之一，即陸續繳付的便利，便要大大減少了。現在黑啤酒一瓶的價格，為三便士半，其中對麥芽、酒花、啤酒所課各稅以及釀酒者為墊支這些稅所索的額外利潤，大概要佔一便士半。假若一個勞動者拿得出此三便士半，他就購買黑啤酒一瓶；如其不能，他將會以一品脫為滿足，由於節約一便士，即等於獲得一便士，他由這種節制就獲得一點錢了。稅由陸續支付，他可願付就付，幾時能付就幾時付，所有支付行為，完全是自發的；他如想避免付稅，也做得到。第三，這種稅所起的取締奢侈的作用就變小了。消費執照一度領得了，領照者多飲也好，少飲也好，其所稅都一樣。第四，假若要一個勞動者一年一次、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出等於現在他在各該時間內不感覺什麼不方便地對所飲每瓶或每品脫的黑啤酒所付的稅的總額，這個金額，恐怕會使他大大叫苦。因此，這種課稅方法，不出以殘酷的壓迫，就不會生出現在課稅方法所能取得的同等收入，而現在課稅方法，卻是沒有何等壓迫的。然而，有若干國家，對立即消耗或迅速消耗商品所課的稅，就是採用這壓迫的方法。荷蘭人領飲茶執照每人要付稅若干。此外，我已經說過，在該國，農家和鄉村消費的麪包，也按同樣方法課稅。

國內消費稅，主要是課在那些由國內製造供國內消費的貨物上。那種稅，只課在銷行最廣的若干種貨物上。所以，關於課稅的貨物，關於各種貨物所課的特定稅率，都清楚明白，沒有夾雜絲毫疑問。這種稅，除了前述鹽、肥皂、皮革及蠟燭，或者還加上普通玻璃外，其餘幾乎全是課在我說的奢侈品上面。

關稅的實行，遠較國內消費稅為早。此稅稱為customs（習慣），即表示那是由遠古習用下來的一種慣例的支付。在最初，它似乎是看作對商人利潤所課的稅。在封建的無政府的野蠻時代，商人和城邑中其他居民一樣，其人格的被輕蔑，其利得的被忌妒，差不多與解放後的農奴，無大區別。加之，大貴族們，既已同意國王對他們自己佃農的利潤課稅，對於在利益上與自己遠遠無關因而不想加以保護的那一階級的利潤，自然不會不願意國王同樣課以貢稅。在那種愚昧時代，他們不懂得商人的利潤無法對其直接課稅，換言之，一切這種稅的最後支付，都要落在消費者身上，此外還要加上一個額外負擔，這種情況，他們那裏懂得呢。

與英國本國商人的利得比較，外國商人的利得，還遭更大的嫉視。因此，後者所稅自然比前者更重。課稅在外國商人與英國商人間有所區別，始於無知時代，以後，又由於獨佔精神，即要使本國商人在外國市場及本國市場佔有利地位而存續下來。

除上述區別外，古時關稅，對於一切種類貨物，不問其為必需品或奢侈品，也不問其為輸出品或輸入品，都平等課稅。同是商人，為什麼某種貨物商人，要比他種貨物商人享有更多特惠呢？為什麼輸出商人，要比輸入商人享有更多特惠呢？這似乎是那時的想法。

古時關稅，分有三個部門。第一個部門，或者說，一切關稅中行之最早的部分，是羊毛和皮革的關稅。這種稅，主要是或全部都是出口稅。當毛織物製造業在英格蘭建立時，國王怕毛織物輸出，失去了他的羊毛關稅，於是把這同一鉤稅，加在毛織物上面。其他兩部門，一為葡萄酒稅，系對每噸葡萄酒課稅若干，稱為噸稅，一為對其他一切貨物所課的稅，系對貨物的推定價格每鎊課稅若干，稱為鎊稅。愛德華三世四十七年，對一切輸出輸入的商品，除課有特別稅的羊毛、羊皮、皮革及葡萄酒外，每鎊課稅六便士。查理二世十四年，此稅每鎊提高至一先令，但三年以後，又由一先令縮減至六便士。亨利四世二年，又提高至八便士，後二年。又回到一先令。由此時至威廉三世九年止，此稅一直為每鎊稅一先令。噸稅及鎊稅，曾經議會依同一法令，撥歸國王，稱為噸稅鎊稅補助稅。鎊稅補助稅，在一個長期內，都是每鎊一先令，或百分之五，因此關稅用語上所謂補助稅，一般都是表示這種百分之五的稅。這種補助稅——現稱舊補助稅——至今仍照查理二世十二年制定的關稅表徵收。按關稅表審定應納稅貨物價值的方法，據說在詹姆士一世時代以前就使用過的。威廉三世九年、十年兩次所課的新補助稅，系對大部分貨物增稅百分之五。三分之一補助稅及三分之二補助稅兩者合起來又組成另一百分之五。1747年的補助稅，為對大部分貨物課徵的第四個百分之五。1759年的補助稅，為對若干特定貨物課徵的第五個百分之五。除這五項補助稅外，有時為救國家的急需，有時為依照重商制度原理，管制本國貿易，還有許多種稅，課加在若干特定貨物上面。

重商制度一天一天地流行起來了。舊補助稅，對輸出貨物及輸入貨物不分差別，一律課徵。以後的四種補助稅，以及其他不時對若干

特定貨物所課各稅，除若干特殊外，則完全加在輸入貨物上面。對本國產品及國內製造品出口所課的舊時各稅，大部分或則減輕或則完全撤廢，而多數是完全撤廢。這些貨物的輸出，甚且發給獎金。對輸入而又輸出的外國貨物，有時則退還其輸入時所完的稅的全部，而在大多數場合，則退還其一部分。其輸入時由舊補助稅所課的稅，當其輸出，只退還半額；但由以後的補助稅及其他關稅所課的稅，當其輸出時，對於大部分貨物，則全部發還。此種對於輸出所給的越來越大好處以及對於輸入所加的阻礙，不蒙其影響的，主要只二三種製造原料。這些原料，我們商人及製造業者，都願其儘可能便宜地到達自己手中，並儘可能昂貴地到達他們外國敵手及競爭者的手中。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有時允許若干外國原料，免稅輸入，例如西班牙的羊毛、大麻及粗製亞麻紗線。有時對國內原料及殖民地特產原料的輸出加以禁止，或課以重稅。比如，英國羊毛的輸出是禁止的；海狸皮、海狸毛及遠志樹膠的輸出，則課以較重的稅，英國目佔領加拿大及塞尼加爾以來幾乎獲得了這些商品的獨佔。

我在本書第四篇說過，重商學說對於民衆的收入，對於一國土地勞動的年產物，並不怎麼有利。對於君主的收入，也不見得比較有利，至少，在那種收入仰賴關稅的範圍內是如此。

這種學說流行的結果，若干貨物的輸入，完全被禁止了。於是，輸入商乃迫而走私；在某種場合，走私完全行不通，而在其他場合，所得輸入的，亦至有限。外國毛織品的輸入，完全被阻止了；外國絲絨的輸入，也大大減少。在這兩場合，能由這些物品輸入而徵得的關稅收入，完全化爲烏有了。

課於許多外國進口物品從而阻止英國消費這些物品的重稅，在許多場合，只不過獎勵走私，而在一切場合，卻把關稅收入減少，使少於課徵輕稅所能收到的數額。綏弗特博士說，在關稅的算術上，二加二不是四，有時只能得一；他這議論，對我們現在所說的重稅，是十分允當的。假若重商學說，沒在多數場合，教我們把課稅用作獨佔手段，不把它用作收入手段，那麼，那種重稅就決不會被人採用了。

對國內產物及製造品輸出有時所給的獎勵金，及對大部分外國貨再輸出所退還的稅金，曾引起許多欺詐行爲，並且引起了最破壞國家收入的某種走私。如一股所知道的，爲要得到獎勵金或退稅，人們往

往把貨物載在船上，送出海口，馬上又由本國其他沿海地方上陸。關稅收入由獎勵金及退稅招致的短缺，非常的大。其中一大部分落到欺詐者之手。至1755年1月5日為止的那一年度的關稅總收入，計達五百零六萬八千鎊。由這總收入中支出的獎勵金（雖然該年度對穀物還沒發給獎勵金），達十六萬七千八百鎊。按照退稅憑證及其他證明書所付的退稅金，達二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鎊。此兩者合計，共達二百三十二萬四千六百鎊。把這一大金額除去，關稅收入就不過二百七十四萬三千四百鎊。再由此額扣除官吏薪俸及其他開支的關稅行政費用二十八萬七千九百鎊，該年度關稅純收入，就只有二百四十五萬五千五百鎊了。這樣，關稅行政費，相當於關稅總收入百分之五與百分之六之間，相當於扣除獎勵金及退稅後的剩餘部分的百分之十以上了。

因為對於一切輸入貨物幾乎都課以重稅，所以我國進口商，對走私輸入力求其多，而對報關輸入則力求其少。反之，我國出口商，有時爲了虛榮心，裝作經營免稅貨物的鉅商，有時爲了獲取獎勵金或退稅，其所報關輸出的，往往超過他們實際輸出的數量。因為這兩方面欺詐的結果，我國的輸出，就在海關登記簿上，顯得大大超過了我國的輸入，這對以所謂貿易差額衡量國民繁榮的政治家們，真給予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

一切輸入貨物，除極少數特別免稅品外，都課有一定關稅。假若輸入某種未載入關稅表的貨物，此貨物就憑輸入者宣誓的申報，對其價值每二十先令課以四先令九又二十分之九便士的關稅，即約略相當於前述五種補助稅或五種鎊稅的比例的關稅。關稅表所包含的極其廣泛，種類繁多的商品，都被列舉其中，有許多而且是不大使用、不爲一般所知道的。以此之故，某種貨物，應屬於那個品目，應課以何種稅率，常常無從確定。這方面的差錯，往往使稅吏失敗，並常常使輸入者感到很大麻煩與苦惱和花很大費用。所以，就明瞭、正確及分別清楚各點說，關稅實遠不若國內消費稅。

爲使社會大多數人民，按照他們各自費用的比例，提供國家收入，似乎不必要對於費用所由而支出的每項物品課稅。由國內消費稅徵取的收入，與由關稅徵取的收入，在想象上是同樣平等地由消費者負擔的。然而國內消費稅，則只課加於若干用途極廣消費極多的物品上。於是，許多人有這種意見，以爲如果管理適當，關稅也可同樣只

課於少數物品上，而不致虧損公家收入，而且可給對外貿易帶來很大的利益。

英國用途最廣消費最多的外國貨，現在主要是外國葡萄酒和白蘭地酒，美洲及西印度所產的砂糖、蔗糖、酒、菸草、椰子，東印度所產的茶、咖啡、磁器、各種香料及若干種類紡織物等。這種種物品，恐怕提供了現在關稅收入的大部分。現在對外國製造品所課的稅，如把剛纔列舉的外貨中若干貨物的關稅除外，那就有一大部分，不是以收入為目的而徵收，卻是以獨佔為目的而徵收，即要在國內市場上，給本國商人以利益。因此，撤廢一切禁令，對外國製造品課以根據經驗可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的適度的關稅，我國工人，可依然在國內市場上保持有很大的利益，而現在對政府不提供收入以及僅提供極少收入的許多物品，到那時亦會提供極大的收入了。

一種重稅，有時會減少所稅物品的消費，有時會獎勵走私，其結果，重稅給政府所提供的收入，往往不及較輕的稅所能提供的收入。

當收入減少，是由於消費減少時，唯一的救濟方法，就是減低稅率。

當收入減少，是由於獎勵走私時，那大抵可以由兩種方法救濟：一是減少走私的誘惑，一是增加走私的困難。只有減低關稅，才能減少走私的誘惑；只有設立最適於阻止那種不法行為的稅收制度，才能增加走私的困難。

根據經驗，國產稅法防止走私活動，比關稅法效果大得多。在各稅性質許可的範圍內，把類似國產稅的稅政制度，用於關稅方面，那就能大大增加走私的困難。這種變更輕而易舉，許多人是設想得到的。

有人主張，輸入應完納關稅的商品的進口商，可把這些商品搬進他自己所備的貨棧，或寄存國家所備的貨棧，一聽他自決，不過，在國家貨棧保管的場合，其鎖鑰當由海關人員執掌，海關人員未臨場，他不得擅開。假若這商人把貨物運往自己的貨棧，那就當立即付稅，以後決不退還；並且，為確定那貨棧內所存數量與納稅貨物數量是否相符，海關人員得隨時蒞臨檢查。假若他把貨物運往國家貨棧，以備國內消費，不到出貨時可不納稅。如再輸往國外，則完全免稅；不過，他必須提供適當的保證，擔保貨物定要輸出。此外，經營這些貨

物的商人，不論其為批發商或零售商，隨時都要受海關人員的訪問檢查，並且還須提示適當的憑證，證明他對自己店鋪中或貨棧中全部貨物，都付了關稅。英國現在對於輸入蔗糖、酒所課的所謂國產稅，就是依此方法徵收；這種管理制度，不妨擴大到一切輸入品的課稅，只要這些稅，與國產稅同樣，只課在少數使用最廣、消費最多的貨物上。如果現在所說的一切種類貨物，都改用這種方法徵收，那要設備十分廣大的國家貨棧，恐怕是不容易吧；況且，極精細的貨物，或者，在保存上非特別小心注意不可的貨物，商人決不放心寄存在別人的貨棧內。

假若通過這種稅務管理制度，就是關稅相當的高，走私亦可大大阻止；假若各種稅時而提高，時而減低，提高能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就提高，減低能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就減低，老是把課稅用作收入的手段，而不是用作獨佔的手段，那麼，只須對使用最廣、消費最多的少數貨物課以關稅，其所得似乎就有可能至少與現在關稅純收入相等，而關稅還可因此成為和國產稅同樣單純、同樣明瞭、同樣正確。在這種制度下，現在國家由外貨再輸出（實則會再輸入以供國內消費）的退稅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損失，就可完全省免了。這項節省，數額非常的大，再加上對國產貨物輸出所給獎勵金的取消——這些獎勵金事實上沒有一種是以前所付的某某國產稅的退稅——，其結果，關稅純收入，在制度變更以後，無疑至少可和其未變更以前相等。

假若制度這樣的變更，國家收入上並無何等損失，全國的貿易及製造業，就確要獲得非常大的利益。佔商品最大多數的未課稅商品的貿易，將完全自由，可來去運銷於世界各地，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這些商品，包含有一切生活必需品及一切製造品的原料。生活必需品既是自由輸入，其在國內市場上的平均貨幣價格必低落，因此，勞動的貨幣價格亦必在此限度內低落，但勞動的真實報酬卻不至減少。貨幣的價值，和它所能購買的生活必需品的數量相稱，而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則與它所能換得的貨幣數量全然無關。勞動貨幣價格低落，國內一切製造品的貨幣價格，必然伴着低落，這一來，國內製造品，就可在一切國外市場上獲得若干利益了。若干製造品，因原料自由輸入，其價格可降低更大。假若中國及印度生絲能夠無稅輸入，英格蘭絲制業者，就比法蘭西意大利的絲制業者，能更低廉地出賣其製品。在那種場合，外國絲絨的輸入，就沒有禁止之必要了。本國製造

品的廉價，不但會保證我國商人，使能佔有國內市場，而且能大大支配國外市場。就連一切課稅品的貿易，亦會比現在有利得多。假若這些商品，因輸往外國，由國家貨棧取出，由於在這種場合，一切稅都蠲免，那種貿易，就完全自由了。在此制度下，各種貨物的運送貿易，將享有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假若這些貨物由國家貨棧取出，是供國內消費，那就因為輸入商前此在未找着機會把貨物賣予商人或消費者時，沒有墊付稅金的義務，所以和那一經輸入就要墊付稅金的場合比較，他這時就能以更廉的價格，出賣其貨物了。這樣，在同一的稅率下，就連有稅的消費品的外國貿易的經營，也會比現在獲得大得多的利益。

羅柏特·沃爾波爾有名的國產稅案的目的，在對葡萄酒及菸草設立一種與上面所提議的無大出入的稅制。他那時向議會提出的提案，雖只含有這兩種商品，但依一般推想，那只是一種更廣泛計劃的緒端。因此，與偷運商人利益結合在一塊的營私黨派，對這提案，掀起了一種極不正當的反對騷鬧。這騷鬧的猛烈程度，使首相覺得非撤回那提案不可，而且以後再也沒有人敢繼起提議這個計劃了。

對於由外圍輸入為國內消費的奢侈品所課的稅，有時雖不免落在貧民身上，而主要則是歸中產及中產以上的人民負擔。如外國葡萄酒、咖啡、巧克力糖、茶、砂糖等的關稅，都屬此類。

對於國內產出、國內消費的較廉奢侈品，所課的稅，是按照各人費用的比例，很平均地落在一切階級人民身上。貧民付自身消費的麥芽、酒花、啤酒、麥酒的稅；富者則付自身及僕婢所消費的各該物的稅。

這裏，須注意一件事，下層階級人民或中層階級以下人民的全部消費，在任何國家，比之中層階級與中層階級以上人民的全部消費，不但在數量上，即在價值上，亦大得多。與上層階級的全部費用比較，下層階級的全部費用，要大得多。第一，各國的全部資本，幾乎都是用作生產性勞動的工資，而分配幹下層階級人民。第二，由土地地租及資本利潤所生收入的大部分，都是用作僕婢和其他非生產性勞動的工資及維持費，每年分配於這階級。第三，資本利潤中有若干部分，是屬於這階級，作為使用自己資本所得的收入。小商店店主、店夥乃至一切零售商人每年掙得的利潤額，到處都是非常之大，並在年

收入中，佔有一個極大的部分。第四，甚至土地地租中的若干部分，亦屬於這一階級，而在此若干部分中，一大部分為比中層階級略低些的人所有，一小部分為最下層階級人民所有，因為普通勞動者，有時亦保有一兩畝的土地。這些下層階級人民的費用，就各個人分開來看，雖是極小，但就全體合攏來看，卻常佔社會全費用中的一個最大部分；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中，把下層階級所消費的除去，剩下來供上流階級消費的，在數量上，在價值上，都總是少得多。因此，主要以上流階級人民的費用為對象的稅，比不分彼此地以一切階級的費用為對象的稅，甚至比主要以下層階級費用為對象的稅，其收入一定要少得多。換言之，即以年產物的較小部分為對象的稅，比不分彼此地以全部年產物為對象的稅，甚至比主要以較大部分年產物為對象的稅，一定要少得多。所以，在以費用為對象的一切課稅中最能提供收入的，就要算以國產酒類及其所用原料為對象的國產稅；而國產稅的這一部門，很多或者說主要是由普通人民負擔。就以1775年五月5日為終止期的那個年度說，這一部門的國產稅總收入，計達三百三十四萬一千八百三十七鎊九先令九便士。

不過，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應當課稅的，是下層階級人民的奢侈費用，而不是他們的必需費用。對他們必需費用，要是課稅，其最後支付，要完全由上層階級人民負擔，即由年生產物的較小部分負擔，而不由年生產物的較大部分負擔。在一切場合，此種稅必會提高勞動工資，或者減少勞動需要。不把那種稅的最後支付加在上層階級身上，勞動價格決無從提高；不減少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即一切稅最後支出的源泉，勞動需要決不致減少。勞動需要由這種稅而減少的狀態不論是怎樣，勞動工資都不免要因此提高到沒有此種稅的場合以上。並且，在一切場合，這提高的工資的最後支付，必定要出自上層階級。

釀造發酵飲料及蒸餾酒精飲料，如不是為着販賣，而是為自家消費，在英國都不課國產稅。這種免稅，其目的雖在於避免收稅員往私人家庭作討厭的訪問與檢查，其結果卻常使此稅的負擔，加在富者方面的過輕，加在貧者方面的過重。雖然自家蒸餾酒精飲料，不甚通行，但有時亦有。在鄉下，許多中等家庭及一切相當富貴的家庭，都在釀造他們自用的啤酒。他們釀造強烈啤酒所費，比普通釀造者每桶要便宜八先令。普通釀造者對其所墊付的一切費用及稅金，都要得有

利潤。所以，和普通人民能夠飲用的一切同質飲料比較，這些人家所飲的，至少每桶要便宜九先令或十二先令，因為普通人民到處都感覺向釀酒廠或酒店零購所飲啤酒較為便當。同樣，為自家消費而製造的麥芽，雖亦不受收稅人員的訪問和檢查，但在這場合，每人卻須納稅七先令六便士。七先令六便士等於麥芽十蒲式耳的國產稅，而麥芽十蒲式耳可以說是節儉家庭平均全家男女兒童所能消費的數量。可是，饗宴浩繁的富貴家庭，其家人所飲用麥芽飲料，不過佔其所消費的全部飲料的一小部分。但也許因為這個稅，也許因為其他原由，自家製造麥芽，竟不及自家釀造飲料那樣通行。釀造或蒸餾自用飲料的人，不必納製造麥芽的人所納上述的稅，其正當理由何在殊難想象。

往往有人說，對麥芽課以較輕的稅，其所得收入，會比現在對麥芽、啤酒及麥酒課以重稅所得的未得多。因為，瞞騙稅收的機會，釀酒廠比麥芽製造場要多得多講且，為自己消費而釀造飲料的人，免納一切的稅，而為自己消費而製造麥芽的人，卻不能免稅。

倫敦的黑麥酒釀造廠，普通每套特麥芽，成酒兩桶半以上，有時成酒三桶。各種麥芽稅，每夸特六先令；各種強烈啤酒及淡色啤酒稅，每桶八先令。因此，在黑麥酒釀造所，課在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上的各種稅，對麥芽每夸特的產額，計達二十六先令及至三十先令。在那打算以普通鄉村為銷售對象的鄉村釀造所，每夸特麥芽的產額，很少在強啤酒二桶及淡啤酒一桶以下，而且往往有產出兩桶半強啤酒的。淡啤酒所課各稅，計每桶一先令四便士。所以，在鄉村釀造所，對一夸特麥芽的產額，所加於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種稅，常為二十六先令，而在二十三先令四便士以下的很少。就整個王國平均計算，對一夸特麥芽的產額，所加於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上的各種稅，恐不能少於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

但是，撤廢一切啤灑稅淡色啤酒稅，而把麥芽稅加大三倍，即對麥芽每夸特的稅由六先令提高至十八先令，據說，由這單一稅所得收入，比較由現在各種重稅所得收入會更多。

1772年舊麥芽稅收入...722, 923鎊11先令11便士

附加稅.....356, 776 79 3/4 1773年舊麥芽稅收入...561, 627

37 1/2

附加稅.....278, 650 153 3/4 1774年舊麥芽稅收入...624, 614
175 3/4

附加稅.....310, 745 28 1/2 1775年舊麥芽稅收入...657, 357
08 1/4

附加稅.....323, 785 126 1/4

合計....., 835, 580 120 3/4

四年的平均數958, 895 30 3/10

1772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43, 128 53

倫敦釀造廠稅額.....408, 260 72 3/4 1773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45, 808 33

倫敦釀造廠稅額.....405, 406 1710 1/2 1774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46, 373 145 1/2

倫敦釀造廠稅額.....320, 601 180 1/4 1775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14, 583 61

倫敦釀造廠稅額.....463, 670 70 1/4

合計.....6, 547, 832 192 1/4

四年的平均數... 1, 636, 958 9 1/2

加入麥芽稅平均數..... 958, 895 鎊 3 先令 340 3/16 便士

兩平均數的和.....2, 595, 853 7 9 11/11

三倍麥芽稅，即麥芽稅每夸特由六先令提高至十八先令。此單一
稅將產出以下的收入：

... 2. 876, 685 9 0 9/16

對於前者的超過額.....280, 832 1 2 14/16

不過，舊麥芽稅中，含有蘋果酒每半桶四先令的稅及強啤酒每桶
十先令的稅。在1774年，蘋果酒稅收入只三千零八十三鎊六先令八便
士。這個稅額，恐較平常稅額稍少，因為該年度對蘋果酒所課的稅，
都在平常收入額以下。對強啤酒課稅雖重得多，但因該酒的消費不
大，所以收入更不如蘋果酒稅。但是，為彌補這兩種稅的平常額，在
所謂地方國產稅項下，含有：一，蘋果酒每半桶六先令八便士的舊國
產稅；二，酸果汁酒每半桶六先令八便士的舊國產稅；三，醋每桶八

先令九便士的舊國產稅；四，甜酒或蜜糖水每加侖十一便士的舊國產稅。這些稅的收入，用以彌補上述麥芽稅中所含蘋果酒稅及強啤酒稅的收入，大概綽有餘裕。

麥芽不但用以釀造啤酒及淡色啤酒，而且用以製造下等火酒及酒精。假若麥芽稅提高到每夸特十八先令，那以麥芽為一部分原料的那些下等火酒及酒精的國產稅，就有低減若干的必要了。在所謂麥芽酒精中，普通以麥芽為其三分之一的原料，其他三分之二，有時全為大麥，有時大麥佔三分之一，小麥佔三分之一。走私機會與誘惑，在麥芽酒精蒸餾所裏面，比在釀造所或麥芽製造場內，要大得多。酒精容積較小而價值較大，所以走私機會多；其稅率較高，每加侖達三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所以走私誘惑力強。增加麥芽稅，減少蒸餾所稅，就可減少走私機會與誘惑，使國家收入有更大的增加。

因為酒精飲料，被認為有害於普通人民的健康，有害於普通人民的道德，所以英國過去某時期，曾以妨礙這種飲料的消費為政策。依此政策，對蒸餾所課稅的低減，不應過大，以致降低此種飲料的價格；酒精的高價，要使其依舊不變，而同時，麥酒、啤酒這一類無礙健康而又能鼓舞精神的飲料，則要使其大大降價。這樣，人民現在怨聲最大的租稅負擔，就可得到部分的減輕，同時國家收入亦可大大增加。

達文南特博士對現行國產稅制度上的這種改變，表示反對，但他的反對意見，似沒有何等根據。據他所說：依這一變革，現在很平等地分配於麥芽製造者、釀造者及零售業者利潤上的國產稅，在它影響利潤的範圍內，將全然歸由麥芽製造者負擔了；釀造者及零售業者可由酒的加價取回其稅額，麥芽製造者卻不容易做到這層；並且，對麥芽課以這麼高的稅，勢必減低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

就相當長的時期說，沒有一種稅能夠減低特定職業的利潤率；任何職業的利潤率，一定常與鄰近的其他職業保持相當的水準。現在的麥芽稅、啤酒稅及淡色啤酒稅，決不會影響商人在這些商品上的利潤；他們可從增加酒價收回所付的稅額，並外加一定的利潤。固然，一種稅加在貨物上，可能使此貨物昂貴，從而減少此貨物的消費。但麥芽的消費，在於釀成各種麥芽酒。對每夸特麥芽徵收十八先令的稅不會使酒的價格比徵收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的稅更貴；反之，這

些酒的價格，說不定還可因此減低一些。其消費，與其說會減少，倒不如說會增加。

爲什麼釀造者，現在能在酒精增高的價格上，收回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時乃至三十先令，而麥芽製造者要在麥芽增高的價格上收回十八先令，卻更困難呢？這是不容易理解的。固然，麥芽製造者，對麥芽每夸特不是墊付六先令的稅，而是墊付十八先令的稅；但釀造者現在卻要對其釀造所用的麥芽每夸特墊付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時甚至三十先令的稅。麥芽製造者墊出較輕的稅，斷乎不會比釀造者現在墊出較重的稅，還要不便。任何麥芽製造者，不會常在倉庫保存這麼多的麥芽存貨，使得賣出這數量的存貨，比釀酒者賣出其通常在酒窖中所保存的啤酒、淡色啤酒存貨，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前者收回他的資金，往往可與後者同樣迅速。麥芽製造者因墊付較重的稅而感到的不便，可很容易救濟，只要給他比現在給釀造者較長數月的時間來繳清稅款就夠了。

凡不是減少大麥需要的原因，都決不會減少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設使改弦更張，把釀造啤酒和淡色啤酒的麥芽，每夸特稅率，由二十四、二十五先令，減到十八先令，那不但不會減少需要，而且會增加需要及外，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是常須與其他同樣肥沃和耕作得同樣好的土地的地租利潤大略相等的。如其較少，則大麥耕地的若干部分，將轉作其他用途；如其較多，則更多土地將立即轉來栽植大麥。當土地的某一特定產物的普通價格，可以說是獨佔價格時，對此所課的稅，就必然會減少那土地的地租及利潤。例如，葡萄酒的有效需要，常大感不足，因此，其價格和同樣肥沃及耕作得同樣好的土地的其他產物的價格比較，往往超過自然的比例；現在如對貴重葡萄酒這種產物課稅，此稅必然要減少葡萄園的地租及利潤。因爲，葡萄酒的價格已經達到了通常上市葡萄酒量所能達到的最高價格；那個數量不減，其價格即不會再高；那種土地既不能轉用以生產其他同樣貴重的產物，如果縮減那上市數量，損失還要更大，所以，賦稅的全部負擔，要落在地租及利潤上，確切地說，要落在葡萄園的地租土。當有人提議課砂糖以新稅時，我國蔗糖栽植者常常說，此稅的全部負擔，不會落在消費者身上，而要落在生產者身上，過去課稅以後，他們從不能把砂糖價格提高，超過未稅以前。可是，未稅以前，砂糖價格似乎已是一種獨佔價格了，所以，他們引來證明砂糖爲不適當課稅

對象的論據，恐怕正好表示那是適當課稅的對象；獨佔者的利得，隨時都是最適於課稅的。至於大麥的普通價格，卻從沒有成爲一種獨佔價格；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對於同樣肥沃和耕作得同樣好的其他土地的地租及利潤，也從沒有超過其自然的比例。課於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種稅，從未減低大麥價格，從未減少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使用麥芽作原料的釀造者對麥芽所付的價格，曾在不斷按照麥芽稅的比例而增高，而這種稅和課於啤酒、淡色啤酒的稅，曾在不斷提高那些商品的價格，或不斷減低那些商品的質量。因此，這類稅的最後支付，總是歸消費者負擔，而不是歸生產者負擔。

一國每年支出的費用，不但有國防費，君主養尊費，而且有國家憲法未規定由何等特定收入來開支的其他必要政費。這些費用的開支，有兩個來源：第一，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而與人民收入無何等關係的資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第一節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的收入源泉

特別屬於君主或國家的資源或收入源泉，由資財及土地構成。

君主由其資財取得收入的方式，與其他資財所有者同，計有兩種，一是親自使用這筆資財，一是把它貸與他人。他的收入在前者為利潤，在後者為利息。

韃靼或阿拉伯酋長的收入全為利潤，他們自身是本集團或本部族中的主要牧畜者，他們自己監督飼養牲畜，由畜羣的乳汁及增殖獲取收入。不過，以利潤為王國收入的主要部分，只是最初期、最幼稚政治狀態下的事情。

小共和國的收入，有大部分是得自商業經營上的利潤。據說，漢堡小共和國的大部分收入，就是來自國營酒庫及國營藥店。君主有暇從事酒、藥的買賣，那個國家當然是不會很大的。公立銀行的利潤，常是更大國家的收入源泉。不但漢堡是如此，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亦是如此。許多人認為，就連不列顛這樣大的一個帝國，也未忽視這種收入。英格蘭銀行的股息為百分之五點五，按資本一千零七十八萬鎊計算，每年除去營業費用剩下的純利潤，實不下五十九萬二千九百鎊。有人主張：政府可以百分之三的利息，把這項資本借過來，自行經營，則每年可得二十六萬九千五百鎊的純利潤。經驗表明，經營這種事業，象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那種貴族政治下有秩序的、謹慎的、節約的政府，才最為適宜；象英格蘭這樣的政府，不論其優點如何，從未曾以善於理財著名。它的行動，在平時一般總是流於君主國自然難免的來自怠惰和疏忽的浪費，在戰時又常常流於一切民主國易犯的無打算的浪費。把這種事業讓它來經營管理，它是否能勝任愉快，至少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郵政局本來就是一種商業。政府事先墊款設置各郵勵併購買或租賃必要的車輛馬匹，這種墊款不久即由郵費償還，而且得有很大的利潤。我相信，各種政府所經營的商業成功的，恐怕只有這種企業。

這上面投下的資本額不很多，而其業務又不具有什麼神祕的性質。資本的收回，不但確定，而且極迅速。

但各國君主往往從事其他許多商業，他們同普通私人一樣，為改善其財產狀態，也常常不惜成為普通商業部門的冒險家。可是他們成功的不多。一種業務，讓君主經營，往往不免流乾浪費，浪費就使他們的成功變為不可能了。君主的代理人，往往以為主人有無盡的財富；貨物以何種價格買來，以何種價格售去，由一地運往他地，花多少費用，他們都是草率從事，不去精打細算。他們往往與君主過着一樣的浪費生活；並且，有時就是浪費了，仍能以適當方法捏造帳目，而積聚有君主那樣大的財產。據馬基雅弗利說：麥迪西的洛倫素，並不是無能的君主，而他的代理人替他經營商業就是如此。由於他的代理人浪費而負的債務，使得弗洛倫斯共和國不得不為他償還了好多次。幹是，他放棄了他的家庭從事致富的經商事業。在後半生，他把剩下的財產及可由他自由處置的國家收入，使用在更適合於自己地位的事業及用度上。

商人性格與君主性格兩不相容的程度，可以說是無以復加了。假若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使它成了極壞的君主，那它的君主精神，似乎也使它成了極壞的商人。當該公司專以商人資格經商時，它是成功的，而且能在贏得的利潤中，支給各股東相當的紅利。但自它成為當地的統治者以來，雖據說有三百萬鎊以上的收入，卻仍因要避免當前破產計，不得不請求政府臨時的援助。在先前的地位，該公司在印度的人員，都視自己為商人的夥計；在現在的地位，他們卻視自己為君主的欽差。

一國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往往是得自貨幣的利息和資本的利潤。假若國家積蓄有一筆財寶，它可把這財寶的一部分，貸借於外國或本國的臣民。

伯爾尼聯邦以一部分財寶借給外國，即把它投資於歐洲各債務國（主要是英國、法國）的公債，獲得了很大的收入。這收入的安全性，第一要看那種公債的安全性如何，管理此公債的政府的信用如何；其次要看與債務國繼續保持和平的可能性的多少。在戰爭勃發的場合，債務國方面最初採取的敵對行為，恐怕就是沒收債權國的公債。以貨幣貸借於外國，據我所知，那是伯爾尼聯邦特有的政策。

漢堡市設立有一種公家當舖，人民以質物交與當舖，當舖即貸款於人民，取利息百分之六。由這當舖，或即所謂放債者提供國家的收入，計有十五萬克朗，以每克朗四先令六便士計，約合英幣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鎊。

賓夕法尼亞政府，是不曾蓄積何等財寶的，但它發明了一種對於人民的貸款方法，不交貨幣，只交與貨幣相等的信用徵券。此證券規定十五年償還，在償還以前，得如銀行鈔票一樣，在市面流通授受；而且由議會法律宣佈為本州一切人民間的法幣。人民藉此證券，須以兩倍價值的土地作為擔保，並須付若干利息。賓夕法尼亞政府是節儉而有秩序的，它每年的經常費用，不過四千五百鎊；它由這種貸款方法籌到的相當收入，對支付這筆費用大有幫助。不過，實行這種方策的功效如何，須視下面的三種情形而定：第一，對於金銀貨幣以外的其他交易媒介有多少需要，換言之，對於必須以金錢向外國購買的消費品，有多少需要，第二，利用這方策的政府，信用如何；第三，信用證券全部價值，決不可超過在沒有這證券的情況下流通界所需金銀幣的全部價值，所以這種方策是否使用得適如其度，亦與其成功大有關係。在美洲其他幾處殖民地，亦曾幾度施行過這同一方策，但由於濫用無度，結局多半是利少害多。

能夠維持政府的安全與尊嚴的，只有確實的、穩定的、恆久的收入，至於不確實的、不經久的資本及信用，決不可把它當作政府的主要收入資源。所以，一切已經超過游牧階段的大國政府，從來都不由這種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

土地是一種比較確實和恆久的資源。所以一切越過了游牧階段的大國的收入，都是以國有地地積為主要源泉。古代希臘及意大利各共和國就是如此。它們國家大部分必要費用的開支，在很長時間內是取給於國有地的產物或地租。而往時歐洲各國君主大部分的收入，亦在很長時間內取給於王室領地的地租。

在近代，戰爭及準備戰爭這兩件事體，佔了一切大國必要費用的大部分。但是在希臘及意大利古代各共和國，每個市民，都是兵士，服役也好，準備服役也好，費用通由他們自備，國家無須支出很多的費用。所以，一項不太大數額的所有地地租，就夠開支政府一切必要費用而有餘。

在歐洲古代君主國中，大多數人民因當時風俗及習尚所趨，對於戰爭，都有充分準備；一旦參加戰爭，依照封建的租地條件，他們自己支付自己的費用，或由直屬領主出資維持，君主無須增加新的負擔。政府其他費用，大都非常有限。司法行政一項，不但毫無所費，而且為收入源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的。鄉下人民於每年收穫前及收穫後，各提供三日勞動；國內商業上認為必要的一切橋樑、大道及其他土木工事，有這項勞動，就夠營造維持了。當時君主的主要費用，似乎就是他自身家庭及宮廷的維持費。他宮廷的官吏，即國家的大官。戶部卿是為君主收地租的，宮內卿及內務卿是為他的家庭掌管出納費用的。君主的廐舍，則委任警衛卿、部署卿分別料理。君主所居的宮寶，通以城廓形式建築，無異於他所有的主要要塞。這要塞的守護者，則有似衛戍總督。君主平時必須出費維持的武官，就只限於這些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大所有地的地租，通常就很可開支政府一切必要的費用了。

歐洲多數文明的君主國的現狀是，全國所有土地，管理得有們全部屬一個人所有，全部土地所能夠提供的地租，恐怕決不會達到各該國平時向人民徵收的普通收入那麼多。例如，英國平常的收入，包括其用作開支必要經常費，支付公債利息，及清償一部分公債等用途的，每年達一千萬鎊以上。然而所收土地稅，以每鎊徵四先令計，尚不及二百萬鎊。這所謂土地稅，按照設想，不僅包括由一切土地地租徵取的五分之一，而且包括對一切房租、一切資本利息徵取的五分之一，免納此稅的資本，只放貸於國家的及用於耕作的部分。這土地稅，很大部分是取自房租及資本利息。例如，以每鎊徵四先令計，倫敦市的土地稅，計達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九鎊六先令七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六萬三千零九十二鎊一先令六便士；沃特赫爾及聖詹姆斯兩宮殿，三萬零七百五十四鎊六先令三便士。這土地稅的一定部分，按照同樣規定向王國各部會各市鎮徵收，而幾乎全都出自房租及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利息。總之，英國值五抽一的土地稅，既然不到二百萬鎊，則全部地租、全部房租、全部資本（貸給政府及用於耕作的資本除外）利息收入總額，當然不超過一千萬鎊，也就是說不超過英國在平時向人民徵收的收入額。英國為徵收土地稅對各種收入所作的估計，就全王國平均起來，無疑是和實際價值相差太遠；雖然據說在幾個州和幾個區，該估計和實際價值很接近。有許多人估計，單單土地

地租一項，即不計房租及資本利息，每年總額，當有二千萬鎊。他們這種估計，是非常隨便的，我認為大概估得過高。但是，假若在目前耕作狀態下，英國全部土地所提供的地租，沒超過二千萬鎊，那末，這土地如通由一個人領有，而且置於他的代辦人、代理人的怠慢、浪費和專橫的管理之下，那全地租額，就莫說二千萬鎊的二分之一，恐怕連四分之一也提供不出來。英國今日王室領地所提供的地租，恐怕還不到這土地如果屬於私人所有的情況下所能提供的數額的四分之一。如果王室領地更加擴大，則其經營方法必定更形惡劣。

人民由土地獲取的收入，不與土地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除播種的種子外，一國全部土地年生產物，都是歸由人民逐年消費，或者用以交換他們所消費的其他物品。凡使土地生產物增加到其本來可能增加到的原因，無論是什麼，它使人民收入因而減少的程度，總大於它使地主收入減少的程度。英國土地地租，即生產物中屬於地主的部份，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達全生產物三分之一以上。假使在某種耕作狀態下，一年只提供一千萬鎊地租的土地，如在另一種耕作狀態下，一年可提供二千萬鎊地租，又假使在這兩種場合，地租都是相當於生產物的三分之一，那末，地主收入因土地被阻滯在前一耕作狀態下所受的損失，只不過一千萬鎊，而人民收入因此所受的損失要達三千萬鎊；未計入的，不過播種的種子罷了。一國土地生產物既減少三千萬鎊，其人口就也要按照這三千萬鎊減去種子價值後的餘額，按照所養各階級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費用方式所能維持的人數減少下來。

在歐洲現代文明國家中，以國有土地地租為公家大部分收入的，已不復存在；但君主擁有廣大領地的情況，仍是一切大君主國共有的現象。王室領地大抵都是林固，可是有時你行經這林園三數英里，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棵樹木。這種土地的保留，既使國家產物減少，又使國家人口減少。假使各國君主盡發賣其私有領地，則所入貨幣，必很可觀；若更以之清償國債，收回擔保品，那由此所得的收入，較之該地在任何時候給君主提供的收入，恐怕都要多得多。在土地改良得極好耕種得極好，當其出售時能產生豐厚地租的國家，土地的售價，例以三十倍年租為準。王室領地，既未經改良耕植，地租輕微，其售價當可望相當於四十倍年租、五十倍年租或者六十倍年租。君主以此大價格，贖回國債擔保品，就立即可以享受此擔保品所提供的收入。而

在數年之內，還會享有其他收入。因為，王室領地一變為個人財產，不到幾年，即會好好地改良，好好地耕植。生產物由此增加了，人口亦必隨着增加，因為人民的收入和消費必因此增大。人民收入和消費增大，君主從關稅及國產稅得到的收入勢必隨着增加。

文明國君主，由其領地獲取的收入，看來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這所損於全社會的，比君主所享有的其他任何同等收入來得多。所以，為社會全體利益計，莫若拍賣王室領地，從而分配給人民，而君主一向由其領地享有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同等收入來代替。

土地用作公園、林囿及散步場所，其目的在供遊樂與觀賞，不僅非收入源泉，而且須時常出費葺治。我看，在大的文明君主國，只有這種土地可屬於君主。

因此，公共資本和土地，即君主或國家所特有的二項大收入源泉，既不宜用以支付也不夠支付一個大的文明國家的必要費用，那末，這必要費用的大部分，就必須取給於這種或那種稅收，換言之，人民須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給君主或國家，作為一筆公共收入。

本書第一篇說過，個人的私收入，最終總是出於三個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潤與工資。每種賦稅，歸根結底，必定是由這三種收入源泉的這一種或那一種或無區別地由這三種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因此，我將竭盡所能，論述以下各點：第一，打算加於地租的稅；第二，打算加於利潤的稅；第三，打算加於工資的稅；第四，打算不分彼此地加於這三項收入源泉的稅。由於分別考究此四種賦稅，本章第二節要分為四項，其中有三項還得細分為若干小目。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許多這些賦稅，開始雖是打算加於某項基金或收入源泉，但結果卻不是由那項基金或收入源泉中支付，所以非詳細討論不可。

在討論各特殊賦稅之前，須列舉關於一股賦稅的四種原則，作為前提。這四種原則如下。

一、一國國民，都須在可能範圍內，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國家保護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繳納國賦，維持政府。一個大國的各個人須繳納政府費用，正如一個大地產的公共租地者須按照各自在該地產上所受利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費用一樣。所謂賦稅

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對幹這種原則是尊重還是忽視。必須注意，任何賦稅，如果結果僅由地租、利潤、工資三者之一負擔，其他二者不受影響，那必然是不平等的。關於這種不平等，我就這樣提一次，不擬多講，以後，我只討論由於某特種賦稅不平等地落在它所影響的特定私人收入上而引起的那種不平等。

二、各國民應當完納的賦稅，必須是確定的，不得隨意變更。完納的日期，完納的方法，完納的額數，都應當讓一切納稅者及其他的人瞭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個納稅人，就多少不免為稅吏的權力所左右；稅吏會藉端加重賦稅，或者利用加重賦稅的恐嚇，勒索贈物或賄賂。賦稅如不確定，那怕是不專橫不腐化的稅吏，也會由此變成專橫與腐化；何況他們這類人本來就是不得人心的。據一切國家的經驗，我相信，賦稅雖再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賦稅稍不確定，其害民實大。確定人民應納的稅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三、各種賦稅完納的日期及完納的方法，須予納稅者以最大便利。房租稅和地租稅，應在普通繳納房租、地租的同一個時期徵收，因為這時期對納稅者最為便利，或者說，他在這時期最容易拿出錢來。至於對奢侈品一類的消費物品的賦稅，最終是要出在消費者身上的；徵取的方法，一般都對他極其便利。當他購物時，繳納少許。每購一次，繳納一次。購與不購，是他的自由；如他因這種稅的徵收而感到何等大的困難，那只有責備自己。

四、一切賦稅的徵收，須設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儘可能等幹國家所收入的。如人民所付出的，多於國家所收入的，那是由於以下四種弊端。第一，徵收賦稅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這些官吏，不但要耗去大部分稅收作為薪俸，而且在正說以外，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負擔。第二，它可能妨礙了人民的勤勞，使人民對那些會給許多人提供生計和職業的事業裹足不前，並使本來可利用以舉辦上述事業的基金，由於要繳納稅款而縮減乃至於消滅。第三，對於不幸的逃稅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懲罰辦法，往往會傾其家產，因而社會便失去由使用這部分資本所能獲得的利益。不適當的賦稅，實為逃稅的大誘因。但逃稅的懲罰，又勢必隨這誘因的加強而相應地加重。這樣的法律，始則造成逃稅的誘因，繼複用嚴刑以徵逃稅，並常常按照誘惑的大小，而定刑罰的輕重，設陷阱民，完全違反普通正義原則。第四，稅吏頻

繁的訪問及可厭的稽查，常使納稅者遭受極不必要的麻煩、困惱與壓迫。這種煩擾嚴格地講，雖不是什麼金錢上的損失，但無異是一種損失，因為人人都願設法來避脫這種煩擾。總之，賦稅之所以往往徒困人民而無補於國家收入，總不外由於這四種原因。

上述四原則，道理顯明，效用昭著，一切國家在制定稅法時，都多少留意到了。它們都曾盡其所知，設法使賦稅儘可能地保持公平。納稅日期，輸納方法，務求其確定和便利於納稅者。此外它們並曾竭力使人民於輸納正稅外，不再受其他勒索。但下面對於各時代各國家的主要賦稅的短短評述，將表明各國在這方面的努力，並未得到同樣的成功。

第一項地租稅即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

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賦稅，有兩種徵收方法：其一，按照某種標準，對各地區評定一定額地租，估計既定以後，不復變更；其二，稅額隨土地實際地租的變動而變動，隨情況的改善或惡化而增減。

象英國，就是採用前一方法。英國各地區的土地稅，是根據一個一定不變的標準評定的。這種固定的稅，在設立之初，雖說平等，但因各地方耕作上勤惰不齊的緣故，久而久之，必然會流於不平等。英格蘭由威廉及瑪利第四年法令規定的各州區各教區的土地稅，甚至在設定之初，就是極不公平的。因此，這種賦稅，就違反上述四原則的第一原則了，所幸它對於其他三原則，卻完全符合。它是十分明確的。徵稅與納稅為同一時期，它的完納時期與納租的時期相同，所以對納稅者是很便利的。雖然在一切場合，地主都是真正納稅者。但稅款通常是由佃農墊付的，不過地主在收取地租時，必把它扣還佃農。此外，與其他收入相等的稅收比較，這種稅徵收時使用的官吏是很少很少的。各地區的稅額，既不隨地租增加而增加，所以地主由改良土地生出的利潤，君主並不分享。固然，這些改良有時會成為同一地區的其他地主的破產的原因，但這有時會加重某特定地產租稅負擔的程度，極其有限，不足阻礙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產。減少土地產量的傾向既沒有了，擡高生產物價格的傾向自亦沒有，從而對於人民的勤勞，是決不會有何等妨害的。他主除了要納賦稅，不會有其他不便，但納稅乃是一種無可避免的不便。

英國地主，無疑是由這土地稅不變的恆久性，得到了利益的，但這利益的發生，和賦稅本身性質無關，而主要是由於若干外部的情況。

英國自評定土地稅以來，各地繁榮大增，一切土地地租，無不繼續增加，而鮮有跌落，因此，按現時地租計算應付的稅額，和按舊時評定實付的稅額之間，就生出了一個差額，所有的地主，幾乎都按這差額而得了利益。假使情形與此相反，地租因耕作衰退而逐漸低落，那一切地主就幾乎都得不到這差額了。按英國革命以後的情勢，土地稅的恆久性，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君主；設若情勢與此相反，說不定就有利於君主，而不利於地主了。

國稅既以貨幣徵收，土地的評價，自以貨幣表現。自作了此評價以來，銀價十分固定；在重量上和品質上，鑄幣的法定標準都沒有變更。假若銀價顯著騰貴，象在美礦發現之前兩世紀那樣，則此評價的恆久性，將使地主大吃其虧。假如銀價顯著跌落，象在美礦發現之後一世紀那樣，則君主的收入，會因此評價的恆久性而大大減少。此外，如貨幣法定標準變動，同一銀量，或被抑低為較小的名義價格，或被提高為較大的名義價格，例如，銀一盎斯，原可鑄五先令二便士，現在不照這辦法，而用以鑄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末，在後一場合吃虧的是收稅的君主，在前一場合，吃虧的是納稅的地主。

因此，在與當時實際情況多少相異的情形下，這種評價的恆久性，就不免要使納稅者或國家感到極大的不便。然而，只要經過長久時間，那種情況就必有發生的一天。各帝國雖與一切其他人為的事物相同，其命運有時而盡，但它們卻總圖謀永遠存在。所以帝國的任何制度，被認為應與帝國本身同樣永久的，都不但求其便利於某些情形，而且當求其便利於一切情形。換言之，制度不應求其適合於過渡的、一時的或偶然的情況，而應求其適合於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變的情況。

徵收土地稅，隨地租的變動為轉移，或依耕作狀況的進步退步為高下。這曾被法國自命為經濟學派的那一派學者，推為最公平的稅。他們主張：一切賦稅，最終總是落在土地地租上。因此，應該平等地課於最後支付賦稅的源泉。一切賦稅應該儘可能平等地落在支付它們

的最後源泉，這無疑是對的。但是，他們這種極微妙的學說，無非立足於形而上學的議論上，我不欲多所置辯。我們只要看以下的評述，就可十分明瞭：何種賦稅，最終出自地租，何種賦稅，最終出自其他資源。

在威尼斯境內，一切以租約貸與農家的可耕土地，概徵等於地租十分之一的稅。租約要在公家登記冊上登記，這登記冊由各地區的稅吏保管。設若土地所有者自耕其地，其地租即由官吏公平估定，然後減去稅額五分之一。因此，土地所有者對這種土地所納的賦稅，就不是估定的地租的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八了。

與英國的土地稅比較，這種土地稅，確是公平得多。但它沒有那樣確定。它在估定稅額上，常常可能使地主感到大得多的煩惱，在徵收上可能要耗費大得多的費用。

設計這樣一種管理制度，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上述不確定性，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上述費用，也許不是做不到的吧。

比如，責令地主及佃農兩方，必須同在公家登記冊上登記租約。設若一方有隱匿偽報情弊，即科以相當罰金，並將罰金一部分給予告發及證實此情弊的他方，這樣，主佃夥同騙取公家收入的弊竇，可得到有效的防止。而一切租約的條件，就不難由這登記冊徵知了。

有些地主，對於租約的重訂，不增地租，只求若干續租金。在大多數場合，這是浪子的行爲，他們爲貪得進現金而捨去其價值大得多的將來收入。不待說，在大多數場合，這行爲是有損於地主自己的，但也時常損害佃人，而在一切場合，都對國家有害。因爲，佃農常會因此費去很大部分的資本，從而大大減低其耕作土地的能力，使他感到提供續租金而付較低的地租，反比增付較高的地租更加困難。況且土地稅爲國家最重要的一部分收入，因此，凡減低佃農的耕作能力從而損害土地稅收入的事情，都對國家有害。總之，要求續租金，是一種有害的行爲。假若對於這種續租金，課以比普通地租重得多的賦稅，該行爲或可阻止，而一切有關係的人，如地主、佃農、君主乃至全社會，均將受益不淺。

有的租約，規定佃農在整個租期內，應採何種耕作方法，應輪種何種穀物。這個條件，多由於地主自負其具有優越知識的結果（在大多數場合，這種自負是毫無根據的）。佃農受此拘束，無異於提供了

額外的地租，所不同的，以勞務不以貨幣罷了。欲阻止此愚而無知的辦法，惟有對於此種地租，從高評定，課以較普通貨幣地租為高的稅率。

有些地主不取貨幣地租，而要求以穀物、牲畜、酒、油一類實物繳納地租；有些地主，又要求勞務地租。不論實物地租或勞務地租，通常都是利於地主的少，而損於佃農的多。佃農腰包所出，往往多於地主財囊所入。實行這些地租的國家，佃農通是貧乏不堪的，實行愈嚴格，貧乏即愈厲害。這種貽害全社會的勾當，如使用同一方法，即對這種地租高其估計，課以較普通貨幣地租為高的稅率，那也許是制止得了的。

當地主自耕其所有地一部分時，其地租可由鄰近農人及地主公平估定。此估定的地租，如未超過某一定額，可照威尼斯境內所行辦法，略減其若干稅額。獎勵地主自耕，是很關重要的。因為地主的資本，大抵較佃農為多，所以，耕作縱談不及佃農熟練，常常能夠得到較豐盈的收穫。他有財力進行試驗，而且一般是有意進行試驗的。試驗不成功，所損於他的有限，試驗一成功，所利於全國耕作改良的無窮。可是，借減稅鼓勵地主自耕，只可做到足以誘使他自耕其一部分土地的程度。設使一大部分地主都被引誘去自耕其所有土地，那全國將充滿着懶惰放蕩的地主管家（為着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在所擁有的資本及所掌握的技能的可許可範圍內盡力耕作的認真和勤勉的佃農，盡被那些地主管家所替代）。地主管家這種濫費的經營，不到幾久，便會使耕作荒廢，使土地年產物縮減，這一來，受其影響的，將不僅地主的收入，全社會最重要收入的一部分，亦將因而減少。

象上述那種管理制度，一方面也許可以免除這一種稅收由於不確定所加於納稅者的壓迫與不便；另一方面，在土地的一般經營上，也許又可由此導人一種對全國土地的一般改良及全國耕作的改善有極大貢獻的計劃或政策。

土地稅隨地租變動而變動，其徵收費用，無疑較額定不變的所費為多。因為，在這制度下，不能不在各地多設登記機構，而當地主決定自耕其土地時，就須重新評定該地的地租，而兩者都要增加費用。不過，這一切費用，大抵都很輕微，和其他收入比這種土地稅少得多的稅收的徵收費用相比，實不算一回事。

可變土地稅會阻礙耕地改良，似可作為反對此稅的最重要口實。因為，如果君主不分攤改良的費用，而分享改良所得的利潤，為地主者，必比較不願從事土地的改良。然而，就是這種阻礙，也許亦有法可以免除。要是在地主進行改良土地之前，許其會同收稅官吏，依照雙方共同選擇的鄰近地主及農夫各若干人的公平裁定，確定土地的實際價值，然後在一定年限內，依此評價課稅，使其改良所費，能完全得到賠償，這樣他就沒有什麼不願改良土地了。這種賦稅的主要利益之一，在於使君主因注意自身收入的增加，而留心土地的改良。所以，為賠償地主而規定的上述期間，只應求達到賠償目的，不應定得太長；如地主享受這利益的時期太遠，那就恐怕會大大阻礙君主的這種注意。可是，在這種場合，與其把那期間定得太短，卻倒無妨定得略長一些。因為，促進君主留意農事的刺激雖再大，也不能彌補那怕是最小的阻礙地主注意改良土地的動機。君主的注意，至多隻能在極一般的、極廣泛的考慮上，看怎樣纔有所貢獻於全國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至於地主的注意，則是在特殊的細密的計較上，看怎樣才能最有利地利用他的每寸土地。總之，君主應在其權力所及範圍內，以種種手段鼓勵地主及農夫注意農事，就是說，使他們兩者，能依自己的判斷及自己的方法，追尋自己的利益；讓他們能最安全地享受其勤勞的報酬；並且，在領土內設置最便利最安全的水陸交通機關，使他們所有的生產物，有最廣泛的市場，同時並得自由無阻地輸往其他各國。凡此種種，纔是君主應當好好注意的地方。

假若這種管理制度，能使土地稅不但無礙於土地的改良，而且使土地改良有所促進，那麼土地稅就不會叫地主感到何等不便，要說有，那就是無可避免的納稅義務了。

社會狀態無論怎樣變動，農業無論怎樣進步或退步，銀價無論怎樣變動，鑄幣法定標準無論怎樣變動，這樣一種賦稅即無政府注意，亦自會不期然而然地與事物的實際狀態相適應，而且在這些變動下，都會同樣適當，同樣公平。所以。最適當的辦法，不是把它定為一種總是按一定評價徵收的稅，而是把它定為一種不變的規定，或所謂國家的基本法。

有的國家，不採用簡單明瞭的土地租約登記法，而不惜多勞多費，實行全國土地丈量。它們這樣做，也許因為怕出租人和承租人會

夥同隱蔽租約的實際條件，以騙取公家收入。所謂土地丈量冊，似乎就是這種報確實的丈量的結果。

在舊日普魯士國王領土內，徵收土地稅，都以實際丈量及評價為準，隨時丈量，隨時變更。依當時的評價，對普通土地所有者，課其收入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對教士們課其收入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西里西阿土地的丈量及評價，是依現國王命令施行，據說非常精確。按這評價，屬於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徵其地租百分之二十五；新舊兩教教士的其他收入，則取其百分之五十。條頓騎士團采邑及馬爾達騎士團采邑，通輸納百分之四十。貴族保有地，為百分之三十八點三三，平民保有地，則為百分之三十五點三三。

波希米亞土地的丈量及評價，據說是進行百年以上的工作，直到1748年媾和後，才由現在女王的命令限其完成。由查理六世時代着手的米蘭公領地的測量，到1760年以後才完全竣事。據一般評論，這丈量的精確是從來所未有的。塞沃伊及皮德蒙特的丈量，是出於故王沙廷尼亞的命令。

在普魯士王國中，教會收入的課稅，比普通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課稅要高得多。教會收入的大部分，都出自土地地租，但用這收入改良土地，或在其他方面增進大多數人收入的事，那是不常見到的。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吧，普魯士國王覺得教會收入，理應對國家的急需，比一般要多負擔。然而有些國家，教會土地卻全然免稅；有些國家，即有所稅，亦較其他土地為輕。1577年以前，米蘭公國領土內一切教會土地，僅按它的實際價值三分之一課稅。

在西里西阿，課於貴族保有地的稅，比課於平民保有地的稅高百分之三。這種差異，恐系由於普魯士國王有以下的想法：前者既享有種種榮譽、種種特權，那就很夠抵償他略高的賦稅負擔；同時，後者所感覺的不如人的恥辱，可從減輕賦稅負擔，使其得到幾分彌補。然而在其他國家則不然，它們的賦稅制度，不但不減輕平民的負擔，卻反加重平民的負擔。如在沙廷尼阿國王領地內，及在實行貢稅的法國各省，其賦稅全由平民保有地負擔，貴族保有地反概予豁免。

按照一般丈量及評價而估定的土地稅，其開始雖很公平，但實行不到多久，就必定變為不公平。為防止這流弊，政府要不斷地耐心地注意國中各農場的狀態及其產物的一切變動。普魯士政府、波希米亞

政府、沙廷尼阿政府以及米蘭公國政府，都曾實際注意及此。不過，這種注意，很不適於政府的性質，所以很難待久；即或長久注意下去，久而久之，不但對納稅者無所助益，而且會惹起更多的煩難。

據說，在1666年，芒託本課稅區所徵收的貢稅，系以極精確的丈量及評價為準。但到1727年，這稅卻變為完全不公平了。為矯正此種弊病，政府除對全區迫課一萬二千利弗附加稅外，再也找不出其他較好的方策。這項附加稅，雖按規定要課在一切依照舊的估定稅額徵課貢稅的稅區，但事實上只課在依照舊的估定稅額實際上納稅過少的地方，藉以津貼依照舊的估定稅額實際上納稅過多的地方。比如現在有兩個地區，其一，按實際情況應稅九百利弗，其二，應稅一千利弗。而按舊的估定稅額，兩者通稅一千利弗。在徵收附加稅後，兩者的稅額，都定為一千一百利弗。但要納附加稅的，只限於前此負擔過少的地區；前此負擔過多的地區，則由此附加稅額給予救濟。所以後者所輸納的，不過九百利弗。附加稅既完全用以救濟舊估定稅額上所生的不公平，所以，對政府毫無得失可言。不過，這種救濟方法的運用，大抵是憑稅區行政長官的裁奪，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獨斷獨行的。

不與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的賦稅

課於土地生產物的賦稅，實際就是課於土地地租的賦稅。這賦稅，起先雖由農民墊支，結果仍由地主付出。當生產物的一定部分，作為賦稅付出時，農民必盡其所能計算這一部分逐年的大體價值，究竟有多少，於是從他既經同意付給地主的租額中，扣除相當的數目。向教會繳納的什一稅，就是這一類賦稅。農民交出這年產物，而不預先估算其逐年大抵價值，那是沒有的事。

什一稅及其他一切類似土地稅，表面看似乎十分公平，其實極不公平。在不同情況下，一定部分的生產物，實等於極不相同部分的地租。極肥沃的土地，往往產有極豐盈的生產物；那生產物有一半，就夠償還農耕資本及其普通利潤，其他一半，或者其他一半的價值，在無什一稅的場合，那是足夠提供地主的地租的。但是，租地者如把生產物之十分之一付了什一稅，他就必須要求減少地租五分之一，否則，他的資本及利潤，就有一部分沒有着落。在這種情況下，地主的地租，就不會是全生產物的一半或十分之五，而只有十分之四了。至於貧瘠土地，其產量有時是那麼少，而費用又那麼大，以致農家資本

及其普通利潤的償還，須用去全生產物的五分之四。在此情況下，即無什一稅，地主所得地租，亦不能超過全生產物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二。如果農民又把生產物的十分之一付了什一稅，他就要從地租減除相等的數額，這樣，地主所得，就要減到只相當於全生產物的十分之一了。在肥沃土地上，什一稅往往不過等於每鎊四分之一或每鎊四先令的稅，而在較貧瘠土地上，什一稅有時要等於每鎊二分之一或每鎊十先令的稅。

什一稅既常為加在地租上的極不公平的賦稅，因此對於地主改良土地及農夫耕種土地，常為一大妨礙。教會不支出任何費用，而分享這麼大的利潤；這樣在地主，就不肯進行那最重要、也往往就是需要最多費用的各種改良；在農夫，亦不肯種植那最有價值、大抵也就是最多費用的穀物。歐洲自什一稅實施以來，栽培茜草，並獨佔此有用染料的，只有荷蘭聯邦，因為那裏是長老教會國家，沒有這種惡稅。最近英格蘭亦開始栽培茜草了，這就因為議會制有法令，規定種茜草地，每畝只徵抽五先令，以代替什一稅。

亞洲有許多國家，正如歐洲大部分地方的教會一樣，其主要收入，都仰給於徵收不與土地地租成比例而與土地生產物成比例的土地稅。中國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國一切土地生產物的十分之一構成。不過，這所謂十分之一，從寬估計，以致許多地方據說還沒有超過普通生產物的三十分之一。印度未經東印度公司統治以前，孟加拉回教政府所徵土地稅，據說約為土地生產物五分之一。古代埃及的土地稅，據說也為五分之一。

亞洲這種土地稅，使亞洲的君主們，都關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據說中國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為求儘量增加其國內一切土地生產物的分量和價值，都曾竭盡心力，從事公路及運河的創建與維持，使得每一部分生產物，都能暢銷於國內。歐洲享有什一稅的教會則不同。各教會所分得的什一稅，數量細微，因此沒有一個會象亞洲君主那樣關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一個教區的牧師，決不能發現有什麼利益，向國內僻遠地方修建運河或公路，以拓展本教區產物的市場。因此，這種稅，如用以維持國家，其所帶來的若干利益，尚可在某種限度抵消其不便；若用以維持教會，那就除不便外，再也無利益可言了。

課於土地生產物的賦稅，有的是徵收實物，有的是依某種評價徵收貨幣。

教區牧師和住在自己田莊內的小鄉紳，有時覺得以實物收取什一稅或地租，也許有若干利益。因為，他徵集的分量既少，所從徵集的區域又小，所以對每一部分應收實物的收集和處理，自己通能親自監視。可是，一個住在大都市而有大資產的紳士，如對於其散在各地的田莊的地租，亦徵收實物，那就不免要蒙受其承辦人及代理人怠慢的危險，尤其是這般人舞弊的危險。至於稅吏由濫權溺職所加於君主的損失，那無疑還要大得多。一個普通人，那怕凡事極其粗心大意，但與小心謹慎的君主比較，對幹督視使用人那一點，恐怕要強得多。公家收入，如以實物徵收，由於稅吏胡亂處理所遭的損失，實際納到國庫的，往往不過人民所出之一小部分。然而中國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據說就是這樣徵收的。中國大官及其稅吏們，無疑的都樂得保持這種徵稅慣例，因為徵收實物，是遠較徵收貨幣容易舞弊多了。

土地生產物稅徵收貨幣，有的是按照隨市場價格變動而變動的評價；有的則是按照一定不變的評價，例如，市場狀態無論如何變動，一蒲式耳小麥總是評作同一貨幣價格。以前法徵收的稅的稅額，不過隨耕作勤惰對實際生產物所生的變動而變動，以後法徵收的稅的稅額，就不但隨土地生產物上的變動而變動，而且會隨貴金屬價值的變動，乃至隨各時代同名鑄幣所含的貴金屬分量的變動而變動。因此，就前法言，稅額對於土地實際生產物的價值，總是保持同一的比例；就後法言，稅額對幹那個價值，在不同時期會保持大不相同的比例。

不徵收土地生產物的一定部分或一定部分的價格，而收取一定額貨幣來完全代替所有賦稅或什一稅，這種稅，就恰與英格蘭土地稅為同一性質。這種稅，既不會隨土地地租而騰落，也不會妨礙或促進土地的改良。有許多教區，不以實物徵收什一稅，而以貨幣代替實物的稅。那種稅法，亦與英格蘭土地稅相類似。在孟加拉回教政府時代，其所屬大部分地區，對於徵收生產物五分之一的實物，亦據說是以相當少的貨幣代替。此後，東印度公司的某些人員，因藉口把公家收入恢復到其應有的價值，在若干州區，也把貨幣代稅改為實物付稅。可是，在他們管理之下，這一改變，一方面因阻礙耕作，同時又造成徵收上營私舞弊的新機會，所以與他們開始管理那種稅收時比較，公家

收入曾大大減少。公司人員大抵曾從這個改變得了好處，但恐怕是以他們的主人及國家為犧牲的。

房租稅

房租可以區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或可稱為建築物租；其二，通常稱為地皮租。

建築物租，是建築房屋所費資本的利息或利潤。為使建築業與其他行業立於同一水準，這種建築物租，就須第一足夠支給建築業者一種利息，相當於他把資本對確實抵押品貸出所能得到的利息；第二足夠他不斷修理房屋，換句話說就是他在一定年限內能收回其建築房屋所費的資本。因此，各地的建築物租，或建築資本的普通利潤，就常受貨幣的普通利息的支配。在市場利率為百分之四的地方，建築物的租金，如除去地皮租後，尚能提供相當於全部建築費用的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六點五的收入，那建築主的利潤，就算是足夠了。在市場利率為百分之五的地方，就也許要提供相當於全部建築費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七點五的建築主利潤，纔算是足夠的。利潤既與利息成比例，如果建築業的利潤，在任何時候超過上述比率過多，則其他行業上的資本，將會有很多移用到建築業上來，直至這方面的利潤，降到它正當的水平為止。反之，如果建築業的利潤，在任何時候低於該比率過多，則這方面的資本立即會移用到其他行業上，直至建築業利潤，再擡高到原來的水平為止。

全部房租中，凡超過提供合理利潤的部分，自然歸作地皮租。在地皮主與建築主為各別個人的場合，這部分，大抵要全數付與前者。此種剩餘租金，是住戶為報酬屋址所提供的某種真實或想象的利益而付給的代價。在離大都市遼遠、可供選擇建築房屋的空地很多的地方，那裏的地皮租，就幾乎等於零，或比那地皮用於農業的場合所得不會更多。大都市附近的郊外別墅，其地皮租就有時昂貴得多。至於具有特別便利，或周圍風景佳美的位置，不待說，那是更其昂貴。在一國首都，尤其是在對房屋有最大需要的特別地段內（不問這需要是為營業，為遊樂，或只為虛榮和時尚），地皮租大都是最高的。

對房租所課的稅，如由住戶付出，且與各房屋的全租成比例，那就至少在相當長期內不會影響建築物租。建築業者如得不到合理利潤，他就會不得已拋棄這行業，這一來，不要多久，建築物的需要提

高，他的利潤便會恢復原狀，而與其他行業的利潤，保持同一水準。這種稅，也不會全然落在地皮租上。它往往會這樣自行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住戶擔當，一部分由地皮主支出。

比方，假定有一個人，斷定他每年能出六十鎊的房租，又假定，加在房租上由住戶支出的房租稅，為每鎊四先令，或全租金的五分之一，那末，在這場合，六十鎊租金的住宅，就要費他七十二鎊；其中有十二鎊，超過了他認為能擔負的額數。這一來，他將願意住壞點的，或租金五十鎊一年的房屋，這五十鎊，再加上必須支付的房租稅十鎊，恰恰為他斷定每年所能負擔的六十鎊的數額。為要付房租稅，他得放棄房租貴十鎊的房屋所能提供的另外便利的一部分。我說他得放棄這另外便利的一部分，因為他很少得放棄其全部。有了房租稅，他會以五十鎊租得無稅時五十鎊所格不到的較好的房屋。因為，這種稅，既把他這個競爭者排除去，對於年租六十鎊的房屋，競爭自必減少，對於年租五十鎊的房屋，競爭亦必同樣減少，以此類推，除了租金最低無可再減，而且會在一定時間因此增加其競爭的房屋外，對於其他一切房屋，競爭都會同樣減少；其結果，一切競爭減少的房屋的租金都必多少下落。可是，因為減少的任何部分，至少在相當長期內，不會影響建築物租，所以，其全部就必然要落在地皮租上。因此，房租稅最後的支付，一部分落在那因為分擔此稅而不得不放棄其一部分便利的住戶頭上，另一部分落在那因為分擔此稅而不得不放棄其一部分收入的地皮所有者頭上。至於他們兩者間，究以何等比例分擔這最後支付，那也許是不容易斷定的。大約在不同情況下，這種分配會極不一樣；而且，隨着這些不同情況，住戶及地皮所有者，會因此稅而受到極不相同的影響。

地皮租所有者由於此稅所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完全是由於上述分擔上偶然發生的不平等。但住戶由於此稅所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就除了分擔上的原因以外，還有其他原因。房租對於全部生活費的比例，隨財產的大小程度而不同。大約，財產最多，此種比例最大；財產逐漸減少，此種比例亦逐漸減低；財產最少，此種比例最小。生活必需品，是貧者費用的大部分。他們常有獲得食物的困難，所以他們細微收入的大部分，都是費在食物上。富者則不然。他們主要的收入，大都為生活上的奢侈品及虛飾品而花費掉；而壯麗的居室，又最能陳飾他的奢侈品，顯示他的虛榮。因此，房租稅的負擔，一般是以富者為

最重。這種不平等，也許不算怎麼背理。富者不但應該按照收入比例為國家提供費用，而且應該多貢獻一些，難道可說這是不合理的嗎？

房租在若干點上，雖與土地地租相似，但在某一點上，卻與土地地租根本不同。土地地租的付給，是因為使用了一種有生產力的東西，支付地租的土地，自己產生地租。至於房租的付給，卻因為使用了一種沒有生產力的東西。房屋乃至房屋所佔的地皮，都不會生產什麼。所以，支付房租的人，必須由其他與房屋絕不相關的收入來源中提取所需的款。只要房租稅是落在住戶身上，它的來源必與房租本身的來源相同，而必由他們的收入來支付，不管這收入是來自勞動工資、資本利潤或土地地租。只要房租稅是由住戶負擔，它就是這樣一種的稅，即不是單獨課於那一種收入來源，而是無區別地課於上述一切收入來源，在一切方面都與任何消費品稅有同一的性質。就一般而論，恐怕沒有哪一種費用或消費，比房租更能反映一個人全費用的奢儉。對這種特殊消費對象比例徵稅，也許所得收入，會較今日歐洲任何其他稅收為多。不過，房租稅如定得太高，大部分人會竭力避免，以較小房屋為滿足，而把大部分費用移轉於其他方面。

確定房租，如採用確定普通地租所必需採用的方策，就容易做到十分正確的地步。無人居住的房屋，自當免稅。如果對它徵稅，那稅就要全部落在房屋所有者身上，使他為不給他提供收入也不給他提供便利的東西完稅。設所有者自己居住，其應納稅額，不應當以其建築費為準，而應按房屋要是租給別人依照公平裁定所能租得的租金為準。假若依其建築所費為準，那每鎊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稅，再加上他項稅捐，就幾乎會把全國的富戶大家全部毀掉，並且，我相信，其他一切文明國如都這樣做，也都會得到同一結果。不論是誰，只要他留心考察本國若干富戶大家的城中住宅及鄉下別墅，他就會發現，如按這些地宅的原始建築費百分之六點五或百分之七計算，他們的房租，就將近要等於他們地產所收的全部淨租。他們所建造的宏壯華麗的住宅，雖積數代的經營，但與其原費相比，卻僅有極少的交換價值。

與房租比較，地皮租是更妥當的課稅對象。對地皮租課稅，是不會擡高房租的。那種稅，將全由地皮所有者負擔。地皮所有者總是以獨佔者自居，對於地皮的使用，儘可能地要求最大的租金。其所得租金為多為少，取決於競相爭用地皮者為貧為富，換言之，取決於他們

能夠出多出少來滿足其對一塊地皮的愛好。在一切國家，爭用地皮的有錢人，以在國都為最多，所以國都中的地皮，常能得到最高的租金。不過，競爭者的財富，既不會因地皮稅而有所增加，所以他們對於使用地皮，亦不願出更多的租。地皮租的稅，是由住戶墊支，或是由地皮所有者墊支，無關緊要。住戶所必須付納的稅愈多，所願付的地皮租就愈少。所以地皮稅的最後支付，完全要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無人居住的房屋的地皮租，當然不應該課稅。

在許多場合，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同為所有者不用親自勞神費力，便可享得的收入。因此，把他這種收入，提出一部分充國家費用，對於任何產業，都不會有何等妨害。地皮課稅以後，與未稅以前比較，社會上地勞動的年產物，即人民大眾的真實財富與收入是不會兩樣的。這樣看來，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就恐怕是最宜於負擔特定稅收的收入了。

單就這點說，地皮租甚至比普通土地地租更適合作為特定稅的對象。因為，在許多場合，普通土地地租至少是部分歸因於地主的注意和經營。地租稅過重，足以成為這注意和經營的妨害。地皮租則不然。地皮租就其超過普通土地地租的數目說，完全是由於君主的善政。這善政，保護全人民的產業，同時，保護若干特殊住民的產業，使這些住民能對其房屋所佔地皮，償付大大超過其實際價值的租金，或者說，使這些住民能對地皮所有者提供大大超過足夠賠償地皮被人使用所受的損失的報酬。對於借國家善政而存在的資源，課以特別的稅，或使其納稅較多於其他大部分收入資源以支援國家的費用，那是再合理沒有的。

歐洲各國，雖然大都對於房租課稅，但就我所知，沒有一國把地皮租視為另一項稅收的對象。稅法設計者，對於確定房租中什麼部分應歸地皮租，什麼部分應歸建築物租，也許曾感到幾分困難。然而要把它們彼此區分，究竟不是何等了不起的困難。

在英國，有所謂年土地稅，照此種稅法，房租稅的稅率，應該是和地租稅的稅率相同。各不同教區和行政區，徵收此稅所定的評價，彼此常為一樣。那在原來已是極不公平，現今依然如此。就全王國大體說，此稅課在房租土的，依然比課在地租上的要輕一些。僅有稅率原來很高而房租又稍稍低落的少數地區，據說，每鎊三先令或四先令

的土地稅，與實際房租的比例相等。無人居住的房屋，法律雖規定要納稅，而在大多數地區，卻由估稅吏的好意免除了。這種免除，有時引起某些特定房屋的稅率的小變動，但全地區的稅率總是一樣。房屋建築修理，租金有增加，房租稅卻無增加，這就使特定房屋的稅率，發生更大的變動。

在荷蘭領土內，所有房屋，不管實際房租多少，也不管有人住着還是空着，一律按其價值，課稅百分之二點五。對於無人居住的房屋，即所有者不能由此取得收入的房屋，也勒令納稅，尤其是納那麼重的稅，未免苛刻。荷蘭的市場利息率，普通不過百分之三，對於房屋的整個價值，課百分之二點五的重稅，那在大多數場合，就要達到建築物租三分之一以上，或達到全部租金三分之一以上。不過，據以徵稅的評價，雖極不平等，但大都在房屋的實際價值以下。當房屋再建、增修或擴大時，就要重新評價，其房租稅即以此新評價為準。

英格蘭各時代房屋稅的設計者，似乎都有這個想法，即相當正確地確定各房屋的實際房租，非常困難。因此，他們規定房屋稅時，就根據一些比較明顯的事實，即他們認定在大多數場合對房租保有相當比例的事實。

最初，有所謂爐捐，每爐取二先令。為要確定一房屋中究竟有幾爐，收稅吏有挨室調查的必要。這種討厭的調查，使這種稅成為一般人討厭的對象。所以，革命後不久，即被視為奴隸制度的標誌，而被廢除了。

繼爐捐而起的，為對於每住屋課以二先令的稅。房屋有十四窗，增課四先令，有二十窗乃至二十窗以上，增課八先令。此稅後來大有改變。凡有窗二十乃至三十以下的房屋，課十先令，有窗三十乃至三十以上的房屋，課二十先令。窗數大抵能從外面計算，無論如何，總不必侵入各私人的內室。因此，關於這種稅的調查，就沒有爐捐那樣惹人討厭了。

往後，此稅又經廢止，而代以窗稅。窗稅設立後，亦曾有幾許變更和增加。到今日（1775年1月）英格蘭每屋除課三先令，蘇格蘭每屋除課一先令以外，窗戶另稅若干。稅率是逐漸上升的，在英格蘭，由對不到七窗的房屋所課最低二便士的稅，升至對有二十五窗乃至二十五窗以上的房屋所課最高二先令的稅。

這各種稅惹人反對的地方，在於不得其平。而其中最壞的，就是它們加在貧民身上的，往往比加在富者身上的，反要重些。鄉間市鎮上十鎊租金的房屋，有時比倫敦五百鎊租金房屋的窗戶還要多。不論前者的住戶怎麼窮而後者的住戶怎麼富，但窗稅既經規定下來，前者就得負擔較多的國家費用。這一年，這類稅就直接違反前述四原則的第一原則了。不過，對於其他三原則，倒還不見得怎樣乖違。

窗稅乃至其他一切房屋稅的自然傾向，是減低房租。一個人納稅愈多，明顯的，他所能負擔的房租就愈少。不過據我所知，英國自窗稅施行以來，通計所有市鎮鄉村的房屋租金，都多少提高了若干。這是因為各地房屋需要增加，使房租提高的程度超過了窗稅使其減低的程度。這事實可以證明，國家繁榮程度已經增大，居民收入已經增多。設無窗稅，房租也許是會提得更高的。

第二項利潤稅即加在資本收入上的賦稅

由資本所生的收入或利潤，自會分成兩個部分：其一為支付利息，屬於資本所有者；其二為支付利息以後的剩餘。

後一部分利潤，分明是不能直接課稅的對象。那是投資危險及困難的報酬，並且，在大多數場合，這報酬是非常輕微的。資本使用者，必得有這項報酬，他才肯繼續使用，否則，從其本身利益打算，他是不會再做下去的。因此，假如他要按全利潤的比例，直接受課稅負擔，他就不得不提高其利潤率，或把這負擔轉嫁到貨幣利息上面去，即是少付利息。假若他按照稅的比例而擡高其利潤率，那麼，全稅雖或由他墊支，結果還是按照他的投資方法，而由以下兩種人民之一付出。假若把他用作農業資本，栽種土地，他就只能由保留一較大部分土地生產物或較大部分土地生產物的價值，而擡高其利潤率。他要想這樣做得通，唯有扣除地租，這樣，此稅最後的支付，就落到地主身上了。假若把他用作商業資本或製造業資本，他就只能由擡高貨物價格，而提高其利潤率。在這一場合，此稅最後的支付，就要完全落到消費者身上。假若他沒有擡高利潤率，他就不得不把全稅轉嫁到利潤中分歸貨幣利息的那一部分上去。他對於所藉資本，只能提供較少利息，那稅的全部，就終於由貨幣利息擔當。在他不能以某一方法減輕他自己的負擔時，他就只有採用其他方法來補救。

乍看起來，貨幣的利息，就好象和土地地租一樣，是能夠直接課稅的對象。正如土地地租一樣，貨幣利息，是完全除了投資危險與困難的報酬後所剩下的純收入。地租稅不能擡高地租，因為償還農業家資本及其合理利潤後，所剩下的純收入，決不能在稅後大於稅前。同此理由，貨幣利息稅，也不能擡高利息率，因為一國的資本量或貨幣量，與土地量同，稅前稅後，在推想上，都是一樣的。本書第一篇說過：普通利潤率，到處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資本量對於使用的資本量的比例的支配，換言之，到處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資本量對於必須使用資本來進行的營業量的比例的支配。但資本使用量，或使用資本進行的營業量，決不會因任何利息稅而有所增減。如果可供使用的資本，不增不減，那麼，普通利潤率，就必然要保持原狀不變。但是，報償投資者的危險和困難所必要的利潤部分，也同樣會保持原狀不變，因為投資的危險和困難並無改變。因此，殘餘部分，即屬於資本所有者，作為貨幣利息的部分，也必然要保持原狀不變。所以，乍看起來，貨幣利息就好象和土地地租一樣，是能夠直接課稅的對象。

然而與地租比較，貨幣利息究竟是不宜於直接課稅的，這有兩種的情由。

第一，個人所有土地的數量與價值，決不能保守祕密，而且常能正確地確定。但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金額，卻幾乎常是祕密的，要相當正確地確定，差不多是做不到。此外，資本額隨時容易發生變動。慢講一年，就是一月、一日，也常有增減。對於各個人私人情況的調查，即為求適當課稅，而調查監視各個人的財產變動，乃是非常使人生氣，非人所能忍受的事情。

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產所在國的一個公民。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於那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為了要課以重稅，而多方調查其財產，他就要舍此他適了。他並且會把資本移往任何其他國家，只要那裏比較能隨意經營事業，或者比較能安逸地享有財富。他移動資本，這資本前此在該國所經營的一切產業，就會隨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資本，使用勞動的是資本。一國稅收如有驅逐國內資本的傾向，那麼，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會兩方面的

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資本向外移動，不但資本利潤，就是土地地租和勞動工資，亦必因而縮減。

因此，要對資本收入課稅的國家，歷來都不採用嚴厲的調查方法，而往往不得已，以非常寬大的，因而多少是隨便的估算方法為滿足。採用這個課稅方法，其極度的不公平不確定，只可用極低的稅率才能抵償。因為照此做的結果，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所稅，已遠較其實際收入為低，那麼鄰人所稅雖比他低一些，他也就沒有什麼過不去了。

英格蘭所謂土地稅，原來是打算和對資本所課的稅採用同一的稅率。當土地稅率，每鎊課四先令，即相當於推定的地租的五分之一時，對於資本，也打算課其推定的利息的五分之一。當現行土地稅初行的時候，法定利息率為百分之六，因此，每百鎊資本，應該課稅二十四先令，即六鎊的五分之一。自從法定利息率縮減為百分之五，每百鎊資本應該只課二十先令。這所謂土地稅徵收的金額，乃由鄉村及主要市鎮分攤，就中一大部分是由鄉村負擔。市鎮方面負擔的部分，大半是課自房屋，其對市鎮上的資本或營業（因為對於投在土地上的資本不打算課稅）徵稅的部分，遠在資本或營業的實際價值以下。因此，不論原始估定的稅額，不怎麼公平，以輕微緣故，終沒有引起何等紛擾。今日由於全國將近普及的繁榮，在許多地方，土地、房屋及資本的價值，已增高很多了，然而各教區、各地區對於這一切的課稅，卻依舊是繼續使用那最初估定的稅額，所以在現在看來，那種不公平，更無甚關係。加之，各地區的稅率久無變動，這一來，這種稅的不確定性，就其課在個人的資本說，已大大減少了，同時，也變成更不重要了。假若英格蘭大部分土地，沒有依其實際價值的一半估定稅額，那麼，英格蘭大部分資本，就恐怕沒有依其實際價值五分之一估定稅額。在若干市鎮中，如威斯敏斯特，全部土地稅，都是課在房屋上，資本和營業，全不徵稅。但倫敦不是如此。

無論哪個國家，都曾小心謹慎迴避了嚴密調查個人私事的舉動。

在漢堡地方，每個居民，對其所有一切財產，都得對政府納千分之二點五的稅。由於漢堡人民的財產，主要為資本，所以，這項稅，實可視為一種資本稅。各個人輸納國庫的稅額，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長官之前，把一定數額的貨幣，付入國家金庫，並宣誓那是他所有

財產總額的千分之二點五，但無須宣佈其財產額，也不受任何盤詰。這種稅的完納，一般是非常忠實的。因為，在一個小小共和國中，那裏的人民，都完全信賴長官，都確信賦稅是維持國家所必要，並且都相信，所出的稅，將忠實地為維持國家而使用，這種憑良心的自發的納稅辦法，有時是會做得通的，不限於漢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爾德聯邦，常有暴風及洪水的災害，所以常有籌集臨時費的必要。遇此場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佈其財產額數，然後依此課稅。在久裏奇，根據法律，每有緊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個人應依其收入比例納稅，對於該收入數額，人人負有發誓宣佈的義務。據說，當地行政當局，從來沒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騙他們。在巴西爾，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貨物的小額關稅。一切市民，都應當宣誓要每三個月繳付按法應納的一定稅款。一切商人，甚至一切旅舍主人，都須親自登記其在領土內外所賣的貨物，每到三個月末尾，就把計算單——在該單下端算出稅額——送呈國庫官吏。絕沒有人疑慮國庫收入，會因此受到損失。

對於各市民，加以公開宣誓其財產額的義務，在瑞士各聯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漢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苦了。從事冒險性貿易的商人，無時不害怕要公開其財產實況。據他料想，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壞、企業慘敗。至於從未從事此類冒險事業的質樸節約的人民，卻不會感到他們有隱蔽其財產實情的必要。

荷蘭在故奧倫治公爵就總督職後不久，對於全市民的財產，課以百分之二，或所謂五十便士取一的稅。各市民自行估計其財產，以及完稅的方法，全與漢堡相同。據一般推想，他們納稅也很誠實。當時人民，對於剛由全面暴動而樹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這種稅，是為了救濟國家特別急需而設的，只徵收一次。實在說，要是永久徵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荷蘭當時的市場利息率，很少超過百分之三，今對一般資本最高的純收入，課以百分之二的賦稅，即每鎊徵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人民為擔此重稅，而不侵蝕其資本的恐怕不多吧。當國家萬分危急之秋，人民激於愛國熱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棄其一部分資本。但他們決不能長久這樣做下去。設長此做下去，這種稅不久便會毀壞人民，使他們完全無力支持國家。

英格蘭依土地稅法案所課的資本稅，雖與資本額成比例，但並不打算減少或分去資本的任何部分，而只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稅的比例，課貨幣利息以相等的稅。所以，當地租稅是每鎊四先令時，貨幣利息稅，亦是每鎊四先令。漢堡所課的稅，以及翁德沃爾德和久裏奇所課更輕微的稅，也同樣打算以資本的利息或純收入為對象，而不是以資本為對象。至於荷蘭，其所說對象則為資本。

特定營業利潤稅

有些國家，對於資本利潤，課有特別稅，這資本有時是用在特殊商業部門的，有時是用在農業上的。

在英格蘭，對於小販商人及行商所課的稅，對於出租馬車及肩輿所課的稅，以及酒店主為得到麥酒火酒零售執照所納的稅，都屬於前一類稅。在最近戰爭中，曾經提議對店鋪方面課同類的稅。戰爭發動起來了，有人說戰爭保護了本國商業，由此獲利的商人，自應擔負戰爭費用。

不過，對於特殊商業部門資本所課的稅，最終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場合，必須有合理的利潤，並且，在商業自由競爭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過這合理利潤）負擔，而是由消費者負擔。消費者必然要在買物的價格上，支付商人墊付的稅額。而在大多數場合，商人還會把價格提高若干。

當這種稅與商人的營業成比例時，最終總是由消費者付出，於商人無所謂壓迫。但當它不是與商人營業成比例，而同樣課於一切商人時，雖最終亦是出自消費者，卻對大商人有利，對小商人成為多少的壓迫。對於每輛出租馬車，一週課稅五先令，對於每乘出租肩輿，一週課稅十先令，在這種稅是由車輿所有主分別墊付的範圍內，那就恰恰和他們各別的營業範圍成比例。照這樣稅法，它既不有利於大商人，也不壓迫小商人。領麥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二十先令；領火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四十先令；領葡萄酒販賣執照所納的稅，每年八十先令，這種稅制，對於零賣酒店，通通一律看待，大營業者必然要獲得若干利益，小營業者必然要受到若干壓迫。前者要在貨物價格上取還其墊付稅款，一定比後者容易。不過，因為這稅率輕微，雖不公平，亦比較無關重要，並且，在許多人看來，小麥酒店到處林立，予以小小妨阻，亦無不當。課於店鋪的稅，本來打算大小店鋪多

寡一律，而實際上也只得如此，無他辦法。這種稅要想相當正確地按各店鋪的營業範圍比例課徵，那除了採用自由國家人民絕難忍受的調查外，再也無法進行。這種稅如課得很重，將成為小商人的重大壓迫，並使全部零售業歸於大商人手中。小商人的競爭既不存在，大商人即將享受營業上的獨佔。如其他獨佔者相同，他們立即會聯合起來，把利潤大大擡高到納稅所需的限度以上。這一來，店鋪稅的最後支付，就不是由店鋪主擔當，而是由消費者擔當；消費者且還要為店主的利潤，再付一大筆的價錢。因此之故，就把這種稅的設計，拋在一邊，而代以1759年所設的補助稅。

在法蘭西，有一種稅稱為個人貢稅，這種稅也許是對農業資本利潤所課的最重的稅了，在歐洲一切地方，都實行這種稅。

在昔時歐洲封建政府盛行的混亂局面下，君主迫於情勢，不得不滿足於僅對一般無力拒絕納稅的人民課稅。大領主們，當君主有特別急需時，雖願意幫助，但對於恆久納稅一層，終不肯承認，而君主亦無實力強其承認。歐洲的土地佔有者，其初大部分都是農奴。他們後來在歐洲大部分，逐漸解放。其中一部分人，獲得地產保有權。他們有時在國王之下，有時在大領主之下，以賤奴條件保有地產，如英格蘭音時根據官冊享有土地者一樣。其他沒有獲得保地權的人，則在他們領主之下，以老幹年為期，租得其所佔有的土地，這一來，他們也比較不依附於領主了。大領主們看到這些下級人民，繁榮起來，獨立起來，不勝其忿，既瞧不起，又不甘心，因而樂得同意君主課他們以賦稅。在若干國家，這種稅的對象，限於那些以賤奴條件保有的土地；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地產的貢稅。沙廷尼阿故王設定的土地稅，以及在蘭多克、普馮斯、多菲那及布列塔尼各州，在芒託本課稅區，在亞琛及康頓選舉區，乃至在法蘭西其他若干地區，所課的貢稅，都是課在上述保有地上的賦稅。在其他各國，這種稅的對象，乃是那些租用他人土地者所得的推定的利潤，不問土地的保有條件如何。在這樣的場合，這種稅可以說是個人的貢稅。法蘭西所謂選舉區各州，大部分都是行使這種稅法。地產的貢稅，既只課於一國的一部分土地，那必然是不公平的。可是，雖不公平，究竟不常出以專恣，雖然有時不免如此，至於個人的貢稅，則是打算對某一階級人民的利潤，比例徵收，而這利潤究竟有多少，又只能推測，所以必然是專恣的、不公平的。

法國今日（1775年）所行的個人的貢稅，每年課於稱為選舉區的二十個課稅區的，計達四千零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弗十六蘇。各州負擔這稅額的比例，年有變動，都取決於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各州收穫豐歉程度，以及其他可增減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情況的報告。每個課稅區，區分為若干選舉地域，全課稅區所分擔的上述比例的總稅額，分配於這各選舉地域；各選舉地域分擔的總額，亦是同樣按照樞密院所收到關於它們各別納稅能力的報告，而年有不同。照此看來，樞密院立意雖然盡善，但要想以相當正確比例，決定當年度某州、某區、某地域的實際納稅能力，卻似乎是不可能的。無知與誤報，一定要多少使大公至正的樞密院，錯下判斷。一個教區對全選舉地域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每個人對所屬教區課稅額所應分擔的比例，也是依必然有的不同情況，而逐年不同。這各種情況，在前一場合，是由選舉地域的收稅員判定；在後一場合，是由教區的收稅員判定，這兩者，都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受州長的指導及影響。據說，此等收稅員，往往對於那些情況，錯下評判，不但是由於無知和誤報，而且是由於黨同伐異，乃至個人私怨。任何納稅者，在稅額未評定以前，不能確知他要納稅多少，那是顯明的；他甚至在稅額既經評定以後，亦還不能確切知道。假若一個應該免稅的人，被課有稅，或一個人所稅超過了他應稅的比例，他們雖然都必須暫時付出稅額，但他們如果訴說不平，並證實了不平的理由，那麼，爲了補償他們，翌年全教區便當追徵一個附額。假若納稅者破產，或者全無支付能力，其應納的稅，必須由收稅員墊付，而爲補償收稅員，翌年全教區亦當追徵一個附額。假若收稅員自身破產了，選出他的教區，就必須對選舉地域的總收稅員負責那個收稅員的行動。但是，控訴一全教區，在總收稅員自屬麻煩；所以，他往往先任意選定那區中最富的納稅者五、六人，叫他們補償那收稅員無力支付的損失，而以後再向全教區追徵以補償他們。這種追徵稅，總是那特定年度貢稅以外另收的數額。

當一種稅加在特定商業部門的利潤上時，商人們都會留意，使上市的貨物量，不至過多超過他們能賣得足夠償還所墊付的稅的價格的數量。他們有的由營業上撤回一部分資本，使市場上的供給，較前減少。價格國貨少騰漲起來，那種稅最後的支付，就落在消費者身上了。但是，當一種稅課在農業資本利潤上時，農人如由那種用途撤回一部分資本，一定沒有利益可言。各農民佔有一定量土地，對那土地

支付地租。要求這土地耕作適宜，一定額資本，是必要的。如果他把這必要的資本撤回一部分，他不會更有能力支付地租或賦稅。爲要付稅，他的利益，決不是在於減少農作物產量，也決不是在於減少市上農作物供給量。因此，這種稅決不會使他擡高其產物的價格，把稅轉嫁於消費者，以取償所付的稅。不過，農民也如一切其他營業者一樣，須得有合理的利潤，否則他就會放棄他這種職業。在他有了這種負擔以後，他只有對地主少付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潤。他必須輸納的賦稅愈多，他能夠提供的地租就愈少。設若這種稅，課在租約未滿期以前，那就無疑會使農民陷於困難，甚或陷於破產。可是，當租約滿期續可時，這賦稅就一定要轉嫁於地主。

在施行個人貢稅的各國，農民所納的稅，通常是與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資本成比例。因此之故，他常怕保有良馬良牛，而竭盡所能用那些最惡劣、最無價值的農具耕作。他一般是不信任估稅員的公正，恐其強納重稅，總裝作貧困，以示無力付納。採用這可憐策術的，大概沒有好好考慮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減少生產物所損失的，說不定比他減少賦稅所節約的還多呢。這種惡劣耕作的結果，市場上的供給，無疑要少一些，但由此惹起的些微的價格的開漲，恐怕就連賠償他減少生產物的損失還嫌不夠，哪能使他支付更多的地租給地主呢。這種耕作的退化，公家、農民、地主，都會多少蒙其不利。至於個人的貢稅，在許多方面，都傾向於妨害耕作，從而涸竭富裕國家的財富源泉，我在本書第三篇，已經陳述過了。

北美南部各州及西印度羣島，有所謂人頭稅，即對每個黑奴逐年所課的稅。恰當地說，這稅就是加在農業資本利潤上的一種賦稅。因爲耕作者大部分都是農民兼地主，所以這種稅的最後支付，就由他們以地主的資格負擔了。

對於農業使用的農奴，每人課以若干的稅，往昔全歐洲似乎都曾行過，迄今俄羅斯帝國仍有這種稅。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吧，人們對於各種人頭稅，常視爲奴隸的表徵。但是，對於納稅者，一切的稅，不獨不是奴隸的表徵，而且是自由的表徵。一個人納稅了，雖然表示他是隸屬於政府，但他既有若干納稅的財產，他本身就不是主人的財產了。加在奴隸身上的人頭稅，和加在自由人身上的人頭稅，是截然兩樣的。後者是由被稅人自行支付，前者則是由其他不同階級的人支

付。後者完全是任意抽徵的，或完全是不公平的，而在大多數場合，既是任意抽徵又是不公平的。至於前者，在若干方面，雖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同的奴隸，有不同的價值，但無論就哪方面說都不是任意抽徵的。主人知道他的奴隸人數，就確然知道他應當納稅幾多。不過，這種不同的稅，因為使用同一名稱，所以常被人視為同一性質。

荷蘭對於男女僕役所課的稅，不是加在資本上的，而是加在開支上的，因此，就有類似加在消費品上的一種消費稅。英國最近對於每個男僕課稅二十一先令，與荷蘭的僕役稅相同。此稅的負擔，以中等階級為最重。每年收入百鎊者，或要僱用一個男僕；每年收入萬鎊者，卻不會僱用五十個男僕。至於貧民，那是不會受影響的。

課在特定營業上的資本的利潤稅，決不會影響貨幣利息。一個人放債，絕不會對資本用於有稅用途的人，收取低於向資本用於無稅用途的人所收的利息。一國政府，如企圖按相當正確的比例，對各種用途的資本的收入，一律課稅，那在許多場合，這稅就會落在貨幣利息上。法蘭西的二十分之一即二十便士取一的稅，與英格蘭所謂土地稅相同，同樣以土地、房屋及資本的收入為對象。就其對資本所課的稅，雖不怎樣嚴峻，但與英格蘭土地稅課在資本方面的比較，卻要正確多了。在許多場合，它完全落在貨幣利息上面。在法蘭西，人們往往把錢投資於所謂年金契約，這就是一種永久年金，債務者若能償還原借金額，即可隨時償卻，但債權者卻除了特殊場合，不許請求償卻。這種二十取一的稅，雖對這一切年金課徵，但似乎沒有提高這年金率。

第一項和第二項的附錄

加在土地、房屋、資財上的資本價值的稅

當財產為同一個人所擁有時，對於這財產所課的稅，無論如何恆久，其用意決不是減少或取去其財產的任何部分的資本價值，而只是取去該財產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當財產易主，由死者轉到生者或由一個生者轉到另一個生者時，就往往對這財產課以這種性質的稅，使得必然要取去資本價值的某一部分。

由死者傳給生者的一切財產，以及由生者過渡到另一個生者的不動產如土地、房屋，其轉移在性質上，總是公開的，彰明昭著的，長久隱瞞不得，所以公家對於這種對象。是可以直接徵稅的。至於生者

彼此間在借貸關係上發生的資本或動產的轉移，卻常是祕密的，並老是能保守祕密。對於這祕密轉移，直接徵稅，不容易做到，所以採用兩種間接方法：第一，規定債務契券，必須寫在曾付一定額印花稅的用紙或羊皮紙上，否則不發生效力；第二，規定此類相互接受行為，必須在一個公開或祕密的簿冊上登記，並徵收一定的註冊稅，否則同樣不發生效力。對於容易直接課稅的財產轉移，即對各種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的有關證件，及對不動產由一生者轉移給另一生者的有關證件，也常常徵上述印花稅和註冊稅。

羅馬古代由奧古斯塔斯設定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遺產稅，即對財產由死者轉移給生者所課的稅。關於此稅，迪昂·卡西阿斯曾有詳明的記述。據他所說，這種稅，雖課於因死亡而發生的一切繼承、遺贈和贈與行為，但受惠者如是最親的親屬或貧者，則概予豁免。

荷蘭對於繼承所課的稅，與此為同一種類。凡套系繼承，則依親疏的程度，對其繼承的全部價值，課以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稅。遺贈旁系，亦同此稅法。夫妻遺贈，不論夫贈給妻或妻贈給夫，都取稅十五分之一。直系繼承，後輩傳與長輩的悲慘繼承，則僅稅二十分之一。直接繼承，如是長輩傳與後輩的繼承，通例無稅。父親之死，對其生前同居的子女，很少有增加其收入，而且往往會大大減少其收入。父親死了，他的勞動力，他在世所享有的官職，或某些終身年金，都要損失去的，設更由課稅取去其一部分遺產，而加重這損失，那就未免近於殘酷和壓迫。但對於羅馬法所謂解放過了子女，蘇格蘭法上所謂分過家了的子女，即已經分有財產，成有家室，不仰仗父親，而另有獨立財源的子女，情況則或有不同。父親的財產留下一分，他們的財產就會實際增加一分。所以，對這財產所課的繼承稅，不至比一切其他類似的稅，惹起更多的不便。

封建法使得死者遺給生者和生者讓給生者的土地轉移，通通有稅。在往昔，歐洲各國且現此為其國王主要收入之一。

直接封臣的繼承人，在繼承采邑時，必須付一定稅額，大概為一年的地租。假若繼承人尚未成年，在他未成年期中，此采地的全部地租都歸國王，國王除扶養此未成年者及交付寡婦應得的部分的亡夫遺產（如果這采地有應享遺產的寡婦）外，沒有任何負擔。繼承人達成年時，他還得對國王支付一種交代稅，此稅大概也等於一年的地租。

就目前而論，未成年如為長期，往往可以解除大地產上的一切債項，而恢復其家族已往的繁榮；但在當時，不能有此結果。那時普通的結果，不是債務的解除，而是土地的荒蕪。

根據封建法，采地保有者，不得領主同意，不能逕行讓渡，領主對於這同意，大抵要索取一筆金錢。其初，這筆錢額是隨意指定的，以後，許多國家都把這規定為土地價格中的一部分。有的國家，其他封建慣例雖然大部分廢止了，但對於這土地讓渡稅，卻依然存續着，而為其君主收入的一個極大來源。在伯爾尼聯邦，此種稅率極高；土地為貴族保有的，佔其價格六分之一，為平民保有的，佔其價格十分之一。在盧塞恩聯邦，土地變賣稅，只限於一定地區，並不普遍。但是，一個人如為轉居異地而變賣土地，則對賣價抽稅十分之一。此外，其他許多國家，有的則對一切土地的變賣課稅，有的則對依一定保地條件而保有的土地的變賣課稅，這些稅都或多或少構成其君主的一項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稅形式或註冊稅形式，間接對之課稅，而此等稅，也可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也可不與轉移物的價值成比例。

英國的印花稅，不是按照轉移的財產的價值（最高金額的借據，只須貼一先令六便士或二先令六便士的印花），而是按照契據的性質，高下其稅額。最重的印花稅，為每張紙或羊皮紙貼六鎊印花。此種高稅，大抵以國王敕許證書及某些法律手續為對象，不管轉移物的價值是多少。英國對幹契約或文件的註冊，毫無所稅，有之，不過管理此冊據官吏的手續費罷了。即此手續費，亦很少超過對該管理者的勞動的合理報酬的數額。至於君主，沒由此取得分文。

在荷蘭，印花稅和註冊稅同時並行。此等稅的徵收，在若干場合，系按照轉移財產的價值的比例；而在其他場合，又沒有按照此種比例。一切遺囑，都需用印花紙書寫，該紙的價格，與所處理的財產成比例，因此，印花紙的種類，就有由三便士或三斯泰弗一張，至三百佛洛林（即二十七鎊十先令）一張的。假若所用印花紙，其價格低於其應用印花紙的價格，繼承財產就全部沒收。這項稅是對繼承所課的其他稅以外的稅。除匯票及其他若干商用票據外，所有一切票據、借據等，都應完納印花稅。但此稅不依轉移物價值比例而增高。一切房屋、土地的變賣，以及一切房屋、土地的抵押契據，都須註冊，而

在註冊時，並對國家納變賣品或抵押品價格百分之二點五的稅。載重二百噸以上之船舶，不問其有無甲板，變賣時也要完納此稅。這大概是把船舶看作水上的房屋吧。依法庭命令而變賣的動產，亦同樣繳納印花稅百分之二點五。

法蘭西亦是印花稅註冊稅同時並行。前者視為國內消費稅的一部分。實施此稅的各州，例由國內消費稅徵收人員徵收。後者則視為國王收入的一部分，由其他官吏徵收。

由印花及註冊課稅的方法，雖同為很晚近的發明物，但不及一百年之間，印花稅已幾乎遍行於歐洲了，註冊稅也非常普遍。一個政府，向其他政府學習技術，其最快學會的，無過於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錢的技術。

對財產由死者轉移到生者所課的稅，最終地和直接地都要落在接受此財產者的身上。對土地變賣所課的稅，卻完全要落在賣者身上。賣者的變賣土地，往往是迫於非賣不可，所以必須接受他所能得到的價格。至於買者，則沒有非買不可的需要，所以，他只肯出他所願出的價格。他把土地所費的價格和賦稅，放在一處划算：必須付出的賦稅愈多，他願意出的價格就愈少。因此，這種稅，常是由那些經濟困難的人負擔，所以一定是殘酷的、難堪的。對變賣新房屋所課的稅，在不賣地皮的場合，大抵是出自買者方面，因為建築家普遍總得獲取利潤，沒有利潤，他一定會放棄這種職業。如果稅由他墊支了，買者大抵總得償還他。對變賣房屋所課的稅，一般由賣者負擔，其理由與變賣土地相同。他賣，大概是因為有賣的必要或因為賣了於他方便些。每年出賣的新房屋數，多少是受需要的支配；那需要如對建築家不能提供利潤，他就不會繼續建築。至於每年出賣的舊房屋數，卻是受偶發事故的支配，這些事故，大抵於需要無何等關係。一個商業城市上如有兩三件大破產事故發生，就有許多房屋要出賣，並且都會以能夠得到的價格出賣。對變賣地皮所課的稅，亦由賣者負擔，其理由與變賣土地同。借貸字據契約的印花稅及註冊稅，全部出自求借者，而事實上也常是由他支出。訴訟事件所課的印花稅及註冊稅，由訴訟者負擔。無論就原告或被告說，這稅都不免減少爭訟對象的資本價值。為爭得某財產所費愈多，到手後的純價值一定愈少。

各種財產轉移稅，如果會減少那財產的資本價值，必會減少那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源。人民的資本，總只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君主的收入，則多半是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這種稅，既是犧牲人民的資本來增益國君收入，所以多少總是不經濟的。

況且，這種稅的徵收，即使按照轉移物的價值的比例，還是不公平的。因為相等價值的財產未必都作同一次數的轉移。至於不按照價值的比例徵收，象大部分印花稅及註冊稅，那就更要不平等了。不過，此稅在任何場合，都是明顯確定的，而不是任意決定的。雖有時不免加在非常無力負擔的人身上，但支付的期間，大概總是便於納稅者。到了支付的日期，他大抵總有錢來付稅。此外，此稅的徵收，用費極少。除納稅本身的無可避免的不便外，它一般不至增加納稅者以任何其他的不便。

在法蘭西，人們對印花稅不曾有什麼怨言，但對所稱為註冊稅，卻怨言四起。它使租稅包收人手下的人員有藉口大事勒索的機會，而勒索又大抵是任意的、不定的。反對法國現行財政制度的刊物，大半都是以這種註冊稅弊害為主題。不過，不確定一點，似乎還不是這種說的內在性質。如果這一般的不平，確有理由，那弊害倒寧可說是生於課稅敕令或法規用語有欠精確和明瞭，而不是生於此稅的性質。

抵押契據以及一切不動產權利的註冊，因其給予債權者及買入者雙方很大的保障，所以極有利於大眾。至於其他大部分契據的註冊，既對大眾無何等利益，又往往對個人不便，甚且危險。一般認為應保守祕密的股據，絕不應存在。個人的信用的安全，不應當信賴下級稅交的正直與良心那樣薄弱的保障。但是，在註冊手續費成了君主收入源泉的場合，則應註冊的契據固須註冊，不應註冊的契據亦須註冊，於是通常無限制地增設註冊機關。法國有種種祕密的註冊簿。這種弊害，雖或不是此稅的必然結果，但我們總得承認，那是此稅非常自然的結果。

英格蘭課加在紙牌、骰子、新聞紙乃至定期印刷物等等的印花稅，恰當地說來，都是消費稅；這些稅最後的支付，是由使用或消費這些物品的人負擔。麥酒、葡萄酒及火酒零賣執照所課的稅，雖原要加在這些零賣者的利潤上，但結果同樣由消費者負擔。象這類稅，雖

然也是稱為印花稅，雖然和上述財產轉移印花稅一樣，由同一收稅人員用同一方法徵收，但其性質完全不同，且由完全不同的資源擔負。

第三項勞動工資稅

我曾在本書第一篇努力說明過；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到處都受兩種不同情況的支配，即勞動的需要，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價格。勞動的需要，是增加呢，不增不減呢，還是減退呢，換言之，是要求人口增加呢，不增不減呢，還是減退呢，這支配勞動者的生活資料，並決定那種生活資料是豐裕、是一般或是短少到什麼程度。食物的普通或平均價格，決定必須付給勞動者若干貨幣，使得他們每年能購買這豐裕或一般或少量的生活資料。當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沒有變動時，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工資數目提高到稍稍超過這稅額以上。比如，假定有一個特定地方，那裏的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使勞動普通工資為十先令一週。又假定，對工資所課的稅，為五分取一，即每鎊取四先令。假若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保持原狀，勞動者仍必須在那個地方獲得那每週十先令所能購得的生活資料，換言之，必須在付過了工資稅之後，還有每週十先令的可自由支配的工資。但是，為要使課稅後，還讓勞動者有這個工資額，那麼，這地方的勞動價格，就得馬上提高，不但要提高到十二先令，而且要提高到十二先令六便士。這就是說，為要使他能夠支付五分取一之稅，他的工資就必須立即提高，不但要提高五分之一，而且要提高四分之一。不論工資稅率如何，在一切場合，工資不但會按照稅率的比例增高，而且還會按照這稅率的比例高些微的比例增高。比方，此稅率如為十分取一，勞動工資不久就會升漲八分之一，而不只十分之一。

對勞動工資直接所課的說，雖可能由勞動者付出，但嚴格地說，就連由他墊支也說不上；至少，在課稅後勞動需要及食物價格仍保持課稅前的原狀的場合是如此。在這一場合，不但工資稅，還有超過此稅額的若干款項，其實都是直接由僱他的人墊支的。至於其最後的支付，則在各種不同的場合，由各種不同的人負擔。製造業勞動工資由課稅而提高的數額，墊支者為製造業主。製造業主是有權利而且是不得不把那墊支額以及因此應得的利潤，轉嫁到貨物價格上的。因此，工資提高額及利潤增加額，最終都是歸消費者支付。鄉村勞動工資由課稅而提高的數額，墊支者為農業家。農業家為要維持以前相同的勞

動人數，勢必使用較大的資本。爲要收回這較大資本及其普通利潤，他須留下一較大部分的土地生產物，或一較大部分土地生產物的價值。其結果，他對地主就要少付地租。所以，勞動工資提高額及利潤增加額，都要由地主負擔。總之，在一切場合，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比之徵收一種與該稅收入數額相等的稅，即適當地一部分課於地租，一部分課於消費品的稅，必會使地租發生更大的縮減，必會使製造品價格發生更大的上漲。

如果對工資直接所課的稅，不曾使工資相應地增高，那就是因爲一般勞動需要因此發生了大大的減少。農業的衰退，貧民就業的減少，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的低減，大概都是這種稅的結果。不過，因有此稅，勞動價格，總一定會比在沒有此稅的場合依照需要的實際狀況所會有的勞動價格高一些，並且，這上增的價格，以及墊支此價格者的額外利潤，最終總是由地主和消費者來負擔。

對鄉村勞動工資所課的稅，並不會按照此稅的比例而提高土地原生產物的價格，其理由，和農業家利潤稅不會按該說的比例而提高該價格一樣。

這種稅雖不合理，雖很有害，但有許多國家在實行。法國對鄉村勞動者及日工的勞動所課的那部分的貢稅，嚴格地說，即屬此種稅。這些勞動者的工資，乃依他們住在地的普通工資率計算，並且，爲使他們儘可能少受格外負擔，每年所得，只按不超過二百日的工資估計。每人的稅，依各年度的情形而每年不同，此等情形的評定，取決於州長委派協助他的收稅員或委員。波希米亞於1748年開始變革財政制度的結果，對手工業者的勞動，課徵一種非常重的稅。這些手工業者，被分爲四個等級，第一級，年稅一百佛洛林，每佛洛林按一先令十便士半換算，計達九鎊七先令六便士；第二級，年稅七十佛洛林，第三級年稅五十佛洛林，第四級，其中包括鄉村手工業者及城市最低級手工業者，年稅二十五佛洛林。

我在本書第一篇說過：優秀藝術家及自由職業者的報酬，必然對於比較低級的職業，保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對這報酬課稅的唯一結果，就是使該報酬按略高於該稅比例的比例而提高。假若報酬沒象這樣提高，那優秀的藝術及自由職業，就不再與其他職業立幹同一的地

位，於是，從事這些職業的將大為減少，使其不久又重新回覆到原先的地位。

政府官吏的報酬，因為不象普通職業的報酬那樣受自由競爭的影響，所以，並不總是對這職業的性質所要求的報酬，保持適當的比例。在大多數國家，這種報酬，大都高於該職業性質所要求的限度。掌理國政者，對於自身乃至其直接從屬者，大概都傾向於給予以超過充分限度以上的報酬。因此，在大多數場合，官吏的報酬，是很可以課稅的。加之，任官職的人，尤其是任報酬較大的官職的人，在各國都為一般嫉妒的對象。對他們的報酬課稅，即使較他種收入所稅再高，也一定大快人心。比如，在英格蘭，當各種其他收入被認為依照土地稅法是每鎊徵四先令時，對於每年薪俸在百鎊以上的官吏的薪俸，除皇室新成家者的年金，海陸軍官的薪俸，以及其他少為人羨志的若干官薪外，每鎊實徵五先令六便士，曾極得人心。英格蘭沒對勞動工資抽收其他直接稅。

第四項原打算無區別地加在各種收入上的稅

原打算無區別地加於各種收入上的稅，即是人頭稅和消費品稅。這種稅，必須不分彼此地從納稅者各種收入中支付，不管那收入是來自土地地租、資本利潤或勞動工資。

人頭稅

人頭稅，如企圖按照各納稅者的財富或收入比例徵收，那就要完全成為任意的了。一個人財富的狀態，日有不同。不加以很難堪的調查，至少，每年不新訂一次，那就只有全憑推測。因此，在大多數場合，他的稅額的評定，必然要依估稅員一時的好意惡意為轉移，必然會成為完全是任意的、不確定的。

人頭稅，如不按照每個納稅人的推定的財富比例徵收，而按照每個納稅人的身分徵收，那就要完全成為不公平的。同一身分的人，其富裕程度，常不一樣。

因此，這類稅，如企圖使其公平，就要完全成為任意的、不確定的；如企圖使其確定而不流於任意，就要完全成為不公平的。不論稅率為重為輕，不確定總是不滿的大原因。在輕稅，人們或可容忍很大的不公平；在重稅，一點的不公平，都是難堪的。

在威廉三世治世的時候，英格蘭曾實行過種種人頭稅。大部分納稅者的稅額，都是依其身分而定。身分的等差，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士族、紳士及貴族長子末子等。一切行商坐賈，有財富在三百鎊以上，換句話說，商賈中的小康的，同樣課稅，至於三百鎊以上的財富大小不同程度如何，在所不計。在考慮他們稅額時，考慮身分過於考慮財富。有些人的人頭稅，起初是按照他們推定的財富課稅，往後，則改按照其身分課稅。法律家、辯護士、代訴人，起初是按其收入課人頭稅每鎊三先令，往後，改為按紳士的身分課稅。在課稅的過程中，曾發覺所課的稅，如不過重，相當程度的不公平，倒還沒有什麼；一不確定，人就不能忍受了。

法國由本世紀初推行的人頭稅，現尚繼續施行。人民中的最高階級，所課稅率不變；最低階級，則依其推定的財富程度，而年各不同。宮廷的官吏，高等法院的裁判官及其他官吏，軍隊的士官等，都以第一方法課稅。各州的較低階級人民，則以第二方法課稅。法國達官顯貴，對於對他們有影響的稅，如不過重，即使很不公平，一般也肯接受；但州長任意估定稅額的作風，他們則絲毫不能忍受。在那個國家，下層階級人民，對於其長上認為適當而給與他們的待遇，都是忍耐地承受下去的。

英格蘭各種人頭稅，從未收足其所期望的金額，即從未收足徵收如能做到精密應可收到的金額。反之，法蘭西的人頭稅，卻老是收足其所期望的金額。英國政府是溫和的，當它對各階級人民課徵人頭稅時，每以稅得的金額為滿足；不能完納的人，不願完納的人（這種人很多），或者因法律寬大，未強制其完納的人，雖使國家蒙受損失，亦不要求其補償。法國政府則是比較嚴酷的，它對每個課稅區，課以一定的金額，這金額，州長必竭盡所能收足。假若某州訴說所稅太高，可在次年的估定稅額上，按照前年度多納的比例予以扣減，但本年度估定多少，還是必須繳納的。州長為要確能收足本稅區的稅額，有權把這稅額估定得比應收足的額大一些；這樣，由納稅人破產或無力完納而受到的損失，就可以從其餘的人的格外負擔來取償。這種格外課稅的決定，至1756年止，還是一任州長裁決。但在這一年，樞密院把這種權力，握在自己掌中。據見聞廣博的法國賦稅記錄著者觀察，各州的人頭稅，由貴族及享有不納貢稅特權者負擔的比例最輕。

最大部分，乃課在負擔貢稅者身上。其辦法是依他們所付貢稅的多寡，每鎊課以一定金額的人頭稅。

課加在低級人民身上的人頭稅，就是一種對勞動工資的直接稅，徵收這種稅具有種種不便。

徵收人頭稅，所費有限。如果嚴格厲行，那會對於國家提供一項極確定的收入。就因為這個緣故，不把低級人民安逸、舒適及安全放在眼中的國家，人頭稅極其普通。不過，普通一大帝國由此取得的，往往不過是公共收入的一小部分；況且，這種稅所曾提供過的最大金額，也往往可由其他對人民便利得多的方法徵得。

消費品稅

不論採用那種人頭稅，想按照人民收入比例徵收，都不可能；這種不可能，似乎就引起了消費品稅的發明。國家不知道如何直接地並比例地對人民的收入課稅，它就努力間接地對他們的費用課稅。這費用，被認為在大多數場合，與他們的收入保持有一定比例。對他們的費用課稅，就是把稅加在那費用所由而支出的消費品上。

消費品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

我所說的必需品，不但是維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國習俗，少了它，體面人固不待說，就是最低階級人民，亦覺有傷體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嚴格說來，麻襯衫並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據我推想，希臘人羅馬人雖然沒有亞麻，他們還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現在，歐洲大部分，那怕一個日工，沒有穿上麻襯衫，亦是羞於走到人面前去的。沒有襯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窮到了丟臉的程度，並且，一個人沒有做極端的壞事，是不會那樣窮的。同樣的，習俗使皮鞋成為英格蘭的生活的必需品。那怕最窮的體面男人或女人，沒穿上皮鞋，他成她是不肯出去獻醜的。在蘇格蘭，對於最下層階級男子，習俗雖亦以皮鞋為生活所必需，但對同階級的女子卻不然，她赤着腳，是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在法國，無論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國最下層階級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腳，走在人前，而無傷體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釋，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關面子的習俗，使其成為最低階級人民所必需的物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過，稱之為奢侈品，並不是對其適度的使用，

有所非難。比如，在英國，啤酒麥酒，甚至在葡萄酒產國，葡萄酒，我都叫做奢侈品。不論那一階級的人，他如完全禁絕這類飲料，決不致受人非難。因為，大自然沒有使這類飲料成為維持生活的必需品，而各地風習，亦未使其成為少了它便是有失面子的必需品。

由於各地的勞動工資，是部分地受勞動需要的支配，部分地受生活必需品的平均價格的支配。所以，凡提高這平均價格的事物，都會提高工資，使得勞動者仍有力量來購買依照當時勞動需要情況他們應該有的數量的各種必需品，不管那時候勞動需要情況是怎樣，是增加呢，不增不減呢，或減少呢。對這些必需品所課的稅，必然會使其價格提高，並且要略高於那稅額，因為墊支此稅的商人，一股定要收回這項墊支，外加由此應得的利潤。因此，這種必需品稅，必定使勞動工資，按此等必需品價格升漲的比例而提高。

這一來，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和對勞動工資直接課稅，其所生影響恰恰相同。勞動者雖由自己手中支出此稅，但至少就相當長期說，他甚至連墊支也說不上。那種稅，最終總是通過增加的工資而由其直接僱主墊還給他。那僱主如系製造業者，他將把這增加的工資，連同一定的增加利潤，轉嫁到貨物價格上，所以，此稅最後的支付，以及這增加利潤的支付，將由消費者負擔。那僱主如系農業者，則此等支付，將由地主負擔。

對所謂奢侈品課稅，甚至對貧窮者奢侈品課稅，則又當別論，課稅品價格的騰貴，並不一定會惹起勞動工資的增高。例如，香菸雖同為富者貧者的奢侈品，但對這奢侈品課稅，不致提高勞動工資。香菸稅在英格蘭達原價三倍，在法國達原價十五倍，稅率雖高如此，但勞動工資。似不曾因此受到影響。茶及砂糖，在英格蘭，在荷蘭，已成為最低階級人民的奢侈品了；巧克力糖，在西班牙亦然。對此等奢侈品課稅，與對香菸課稅同，也沒有影響工資。對各種酒類所課的稅，並無人設想其對勞動工資，有何影響。濃啤酒每桶徵附加稅三先令，以致黑麥酒價格陡增，然倫敦普通工人工資，並未因此提高。在此附加稅未課以前，他們每日工資，約為十八便士、二十便士，而現在所得，亦沒有加多。

這類商品的高價，不一定會減少下等階級人民養育家庭的能力。對於樸實勤勞的貧民來說，對這些商品課稅，其作用有似取締奢侈的

法令，這種課稅會使他們儉用或完全剋制不用那些他們已不再能輕易就買得起的奢侈品。由於這種強制節約的結果，他們養家的能力，不但不因此稅而減，而且往往會因此稅而增。一般地說，養活大家庭及供給有用勞動的需要的，主要都是這些樸實勤勞的貧民。固然，一切貧民，並不都是樸實勤勞的；那些放肆的、胡行的，在奢侈品價格騰貴以後，會依然象以前一樣使用，至於放縱行為將如何使其家族困難在所不顧。但象這樣胡行的人，能養育大家庭的少；他們的兒童，大概都由照料不周、處理不善及食物缺乏與不衛生而夭亡了。即使兒童身體健壯，能忍受其雙親不當行為所加於他們的痛苦而活下去，但兩親不當行為的榜樣，通常亦會敗壞此兒童的德行。這些兒童長大了，不但不能以其勤勞貢獻社會，而且會成為社會傷風敗俗的害物。所以，貧民奢侈品價格的騰貴，雖或不免多少增加這種胡亂家庭的困苦，從而多少減低其養家的能力，但不會大大減少一國有用的人口。

必需品的平均價格，不論騰貴多少，如果勞動工資不相應地增加起來，那必然會多少減低貧民養家的能力，從而減低其供給有用勞動需要的能力，不管那需要情況如何，是增加，是不增不減，或是減少，就是說。是要求人口增加，不增不減，或減少。

對奢侈品課稅，除這商品本身的價格外，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都不會因此增高。對必需品課稅，因其提高勞動工資，必然會提高一切製造品的價格，從而減少它們販賣與消費的範圍。奢侈品稅，最終是由課稅品的消費者無所取償地支付的，它們是不分彼此地落在土地地租、資本利潤及勞動工資等收入上。必需品稅，在它們影響貧民的限度內，最終有一部分是由地主以減少地租的方式為其支付，另一部分是從提高製造品價格由富有的消費者或地主或其他的人為其支付。他們且往往要另付一個相當大的額外數額。真為生活所必需，而且是為貧民消費的製造品，例如，粗製毛織物等，其價格的騰貴，必然要由提高工資，使貧民得到補償。中等及上等階級人民，如真能瞭解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就應該一直反對生活必需品稅，反對勞動工資直接稅。這兩者最後的支付，全都要落在他們身上，而且總還附加一個相當大的額外負擔。尤其是地主，他的負擔最重，他對於此等稅，常以兩重資格支付：一是以地主資格，出於減少地租的形式；一是以消費者的資格，出於增加費用的形式。馬太·德克爾，關於生活必需品稅的觀察，是十分正當的。他認為，某種稅轉嫁到某種商品的價格上

的，有時竟重複累積四次或五次。比如，就皮革價格說，你不但要支付你自己所穿的鞋所用的皮革的稅，並須支付鞋匠及製革匠所穿的鞋所用的皮革的稅的一部分；而且這些工匠在為你服務期間所消費的鹽、肥皂及蠟燭等的稅，乃至製鹽者、制肥皂者、制蠟燭者，在他們工作期間所消費的皮革的稅，都須由你付出。

英國對生活必需品所課的稅，主要是加在剛纔說過的那四種商品——鹽、皮革、肥皂及蠟燭。

鹽為最普遍而且最古的課稅對象。羅馬曾對鹽課稅，我相信，現在歐洲各地，無不實行鹽稅。一個人每年消費的鹽量極少，並且，此少量的鹽，還可零用零購。因此，鹽說雖再重，似乎在人們看來，沒有人會因此感到怎樣難堪。英格蘭的鹽稅，每蒲式耳三先令四便士，約三倍其原價。在其他各國，此說還更高。皮革是一種真正的必需品。亞麻布的使用，使肥皂也成為必需品了。在冬夜較長的國家，蠟燭為各行各業的必要工具。英國皮革稅和肥皂稅，都是每磅三便士半。蠟燭則為每磅一便士。就皮革的原價說，皮革稅約達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就肥皂的原價說，肥皂稅約達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五；就蠟燭的原價說，蠟燭稅約達百分之十四或十五。這種種稅，雖較鹽稅為輕，但仍是極重的。這四種商品既都是真正的必需品，如此的重稅，勢必多少增加那樸實勤勞貧民的費用，從而多少提高他們勞動的工資。

在英國冬季這樣非常寒冷的國家，燃料一項，不獨就烹調食物說，即就在戶內工作的各種勞動者生活上的快適說，嚴格地講，亦算是這個季節的必需品。在一切燃料中，煤是最低廉的。燃料價格對於勞動價格影響是這樣的重要，使得英國所有主要製造業，都侷限在產煤區域；在其他區域，由於這必需品的昂貴，它們就難得象這樣便宜作業了。此外，有些製造業，如玻璃、鐵及一切其他金屬工業，常以煤為其職業上的必要手段。假者獎勵金在某種場合，能夠說是合理的，那麼，對於把煤由國內產煤豐饒地帶運往缺乏地帶的運輸，加以獎勵，那就恐怕說得上是合理的了。然而立法機構不但不加獎勵，卻對沿海岸運輸的煤，一噸課稅三先令三便士。此就多數種類的煤說，已為出礦價格百分之六十以上。由陸運或由內河航運的煤，則一律免

稅。煤價自然低廉的地方，可以無稅地消費，煤價自然昂貴的地方，卻反而要負擔重稅。

這類稅，雖然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從而提高勞動價格，但對於政府，卻提供了一項不容易由其他方法得到的大宗收入。因此，繼續實行這類稅，實有相當理由。穀物輸出獎勵金，在實際農耕狀態下，有提高此必需品價格的趨勢，所以必然要生出上述那一切惡果。可是，它對於政府，不但無收入可圖，而且往往要支出一筆大的費用。對外國穀物輸入所課的重稅，在一般豐收年度，實等於禁止其進口。對活牲畜及鹽醃食品輸入的絕對禁止，是在法律的平常狀態下實行的，現因此等物品缺乏，這條法律乃暫時停止適用於愛爾蘭及英國殖民地的產品。這些規定，都有必需品稅所有的一切惡果，而對政府卻無收入可言。要廢止這些規定，只要使大眾確信這些規定所由設立的制度的無益就夠了，似乎不必要採取其他手段。

對生活必需品所課的稅，和英國比較，其他許多國家要高得多。許多國家，對磨坊研磨的麥粉及粗粉有稅，對火爐上烘烤的麪包有稅。在荷蘭，都市所消費麪包的價格，據推測因此稅增加了一倍。住在鄉村的人，則有代替此稅一部分的他種稅，即根據假定每個人消費的麪包的種類，每年各課稅若干。例如，消費小麥麪包的人，稅三盾十五斯泰弗，約合六先令九便士半。這種稅，以及同類其他若干稅，據說，已由提高勞動價格而使荷蘭大部分製造業歸於荒廢了。在米蘭公園，在熱那亞各州，在摩登那公國，在帕馬、普拉遜蒂阿、瓜斯塔拉各公園，乃至在教皇領地，同類的稅亦可見到，不過沒有那樣繁重罷了。法國有一位略有聲名的著者，曾提議改革該國財政，以這最有破壞性的稅，去代替其他各稅的大部分。正如西西羅所說，“那怕是頂荒謬絕倫的事，有時亦會有若干哲學家主張”。

家畜肉稅比這些麪包稅，還要實行得普通。固然，家畜肉在各地是否為生活必需品，可有懷疑餘地。但據經驗，有米麥及其他菜蔬，再輔以牛奶、乾酪、牛油——弄不到牛油，則代以酥油——即無家畜肉，亦可提供最豐盛、最衛生、最營養、最增長精神的食物。許多地方，為着維持體面，要求人人穿一件麻襯衫，穿一雙皮鞋，但卻沒有一個地方要求人吃家畜肉。

消費品，不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都可以兩種方法課稅。其一，可根據消費者曾使用某種貨物消費某種貨物的理由，叫他每年完納一定的稅額；其二，當貨物還留在商人手中，尚未移交到消費者以前，即課以定額的稅。一種不能立即用完而可繼續消費相當的時間的商品，最宜於以前一方法課稅；一種可以立即消費掉或消費較速的商品，則最宜於以後一方法課稅。馬車稅及金銀器皿稅，為前者課稅方法的實例；大部分的其他國內消費稅及關稅，則為後者課稅方法的實例。

好好管理，一輛馬車可以經用十年或十二年。在它離開制車者以前，不妨一次為限課以若干稅。但對買者來說，為保有馬車的特權而年納四鎊，無疑要比除馬車價外，另付給馬車製造者四十鎊或四十八鎊，或相當於他在使用該馬車期間大約要完納的稅額，更為方便些。同樣，一件金銀器皿，有時可以經用百年以上。對消費者來說，對該器皿每重一百盎斯年付五先令，即約當其價值百分之一，比之一次付清這項年金的二十五倍或三十倍，確要容易些，因為在後一場合，此器皿的價格，至少將騰貴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對於房屋所課各稅，自以每年付一比較輕微數額為方便。如在房屋最初建築或變賣時，一次課以相當於各年稅額的全部的重稅，納稅者必感比較不便。

馬太·德克爾爵士有一個有名的提議，主張一切商品，甚至立即或迅速消耗的商品，都須依下面這方法課稅，即消費者為得到消費某商品的許可執照，逐年完納一定金額，商人不付任何稅額。他這計劃的目的，在於撤廢一切輸入稅輸出稅，使商人的全部資本全部信用，都能使用在購買貨物反租賃船舶上，而不必把其任何部分，移用於墊付稅款，使得一切部門的對外貿易，特別是運送貿易，因此有所增進。但是，主張對立即消耗或迅速消耗的商品，亦以這種方法課稅，似乎免不了以下四種極嚴重的弊病。第一，這種課稅方法和普通課稅方法比起來，較不公平，就是說，這樣就不能好好按照各納稅者的費用和消費比例課徵。由商人墊支的麥酒、葡萄酒及火酒稅，結果可由各消費者完全按照他們各個消費的數量的比例付出來。假若這種稅，是以購買飲酒許可執照方式完納，那節用者按照消費量所付的比例，就要比好酒者所付的大得多了；賓客頻繁的家庭所付的比例，就要比賓客少的家庭所付的小得多了。第二，按照這種方法課稅，消費某種商品，或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許可執照的費，這樣，對迅

速消耗商品所課各稅的主要便利之一，即陸續繳付的便利，便要大大減少了。現在黑啤酒一瓶的價格，為三便士半，其中對麥芽、酒花、啤酒所課各稅以及釀酒者為墊支這些稅所索的額外利潤，大概要佔一便士半。假若一個勞動者拿得出此三便士半，他就購買黑啤酒一瓶；如其不能，他將會以一品脫為滿足，由於節約一便士，即等於獲得一便士，他由這種節制就獲得一點錢了。稅由陸續支付，他可願付就付，幾時能付就幾時付，所有支付行為，完全是自發的；他如想避免付稅，也做得到。第三，這種稅所起的取締奢侈的作用就變小了。消費執照一度領得了，領照者多飲也好，少飲也好，其所稅都一樣。第四，假若要一個勞動者一年一次、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出等於現在他在各該時間內不感覺什麼不方便地對所飲每瓶或每品脫的黑啤酒所付的稅的總額，這個金額，恐怕會使他大大叫苦。因此，這種課稅方法，不出以殘酷的壓迫，就不會生出現在課稅方法所能取得的同等收入，而現在課稅方法，卻是沒有何等壓迫的。然而，有若干國家，對立即消耗或迅速消耗商品所課的稅，就是採用這壓迫的方法。荷蘭人領飲茶執照每人要付稅若干。此外，我已經說過，在該國，農家和鄉村消費的麪包，也按同樣方法課稅。

國內消費稅，主要是課在那些由國內製造供國內消費的貨物上。那種稅，只課在銷行最廣的若干種貨物上。所以，關於課稅的貨物，關於各種貨物所課的特定稅率，都清楚明白，沒有夾雜絲毫疑問。這種稅，除了前述鹽、肥皂、皮革及蠟燭，或者還加上普通玻璃外，其餘幾乎全是課在我說的奢侈品上面。

關稅的實行，遠較國內消費稅為早。此稅稱為customs（習慣），即表示那是由遠古習用下來的一種慣例的支付。在最初，它似乎是看作對商人利潤所課的稅。在封建的無政府的野蠻時代，商人和城邑中其他居民一樣，其人格的被輕蔑，其利得的被忌妒，差不多與解放後的農奴，無大區別。加之，大貴族們，既已同意國王對他們自己佃農的利潤課稅，對於在利益上與自己遠遠無關因而不想加以保護的那一階級的利潤，自然不會不願意國王同樣課以貢稅。在那種愚昧時代，他們不懂得商人的利潤無法對其直接課稅，換言之，一切這種稅的最後支付，都要落在消費者身上，此外還要加上一個額外負擔，這種情況，他們那裏懂得呢。

與英國本國商人的利得比較，外國商人的利得，還遭更大的嫉視。因此，後者所稅自然比前者更重。課稅在外國商人與英國商人間有所區別，始於無知時代，以後，又由於獨佔精神，即要使本國商人在外國市場及本國市場佔有利地位而存續下來。

除上述區別外，古時關稅，對於一切種類貨物，不問其為必需品或奢侈品，也不問其為輸出品或輸入品，都平等課稅。同是商人，為什麼某種貨物商人，要比他種貨物商人享有更多特惠呢？為什麼輸出商人，要比輸入商人享有更多特惠呢？這似乎是那時的想法。

古時關稅，分有三個部門。第一個部門，或者說，一切關稅中行之最早的部分，是羊毛和皮革的關稅。這種稅，主要是或全部都是出口稅。當毛織物製造業在英格蘭建立時，國王怕毛織物輸出，失去了他的羊毛關稅，於是把這同一鉤稅，加在毛織物上面。其他兩部門，一為葡萄酒稅，系對每噸葡萄酒課稅若干，稱為噸稅，一為對其他一切貨物所課的稅，系對貨物的推定價格每鎊課稅若干，稱為鎊稅。愛德華三世四十七年，對一切輸出輸入的商品，除課有特別稅的羊毛、羊皮、皮革及葡萄酒外，每鎊課稅六便士。查理二世十四年，此稅每鎊提高至一先令，但三年以後，又由一先令縮減至六便士。亨利四世二年，又提高至八便士，後二年。又回到一先令。由此時至威廉三世九年止，此稅一直為每鎊稅一先令。噸稅及鎊稅，曾經議會依同一法令，撥歸國王，稱為噸稅鎊稅補助稅。鎊稅補助稅，在一個長期內，都是每鎊一先令，或百分之五，因此關稅用語上所謂補助稅，一般都是表示這種百分之五的稅。這種補助稅——現稱舊補助稅——至今仍照查理二世十二年制定的關稅表徵收。按關稅表審定應納稅貨物價值的方法，據說在詹姆士一世時代以前就使用過的。威廉三世九年、十年兩次所課的新補助稅，系對大部分貨物增稅百分之五。三分之一補助稅及三分之二補助稅兩者合起來又組成另一百分之五。1747年的補助稅，為對大部分貨物課徵的第四個百分之五。1759年的補助稅，為對若干特定貨物課徵的第五個百分之五。除這五項補助稅外，有時為救國家的急需，有時為依照重商制度原理，管制本國貿易，還有許多種稅，課加在若干特定貨物上面。

重商制度一天一天地流行起來了。舊補助稅，對輸出貨物及輸入貨物不分差別，一律課徵。以後的四種補助稅，以及其他不時對若干

特定貨物所課各稅，除若干特殊外，則完全加在輸入貨物上面。對本國產品及國內製造品出口所課的舊時各稅，大部分或則減輕或則完全撤廢，而多數是完全撤廢。這些貨物的輸出，甚且發給獎金。對輸入而又輸出的外國貨物，有時則退還其輸入時所完的稅的全部，而在大多數場合，則退還其一部分。其輸入時由舊補助稅所課的稅，當其輸出，只退還半額；但由以後的補助稅及其他關稅所課的稅，當其輸出時，對於大部分貨物，則全部發還。此種對於輸出所給的越來越大好處以及對於輸入所加的阻礙，不蒙其影響的，主要只二三種製造原料。這些原料，我們商人及製造業者，都願其儘可能便宜地到達自己手中，並儘可能昂貴地到達他們外國敵手及競爭者的手中。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有時允許若干外國原料，免稅輸入，例如西班牙的羊毛、大麻及粗製亞麻紗線。有時對國內原料及殖民地特產原料的輸出加以禁止，或課以重稅。比如，英國羊毛的輸出是禁止的；海狸皮、海狸毛及遠志樹膠的輸出，則課以較重的稅，英國目佔領加拿大及塞尼加爾以來幾乎獲得了這些商品的獨佔。

我在本書第四篇說過，重商學說對於民衆的收入，對於一國土地勞動的年產物，並不怎麼有利。對於君主的收入，也不見得比較有利，至少，在那種收入仰賴關稅的範圍內是如此。

這種學說流行的結果，若干貨物的輸入，完全被禁止了。於是，輸入商乃迫而走私；在某種場合，走私完全行不通，而在其他場合，所得輸入的，亦至有限。外國毛織品的輸入，完全被阻止了；外國絲絨的輸入，也大大減少。在這兩場合，能由這些物品輸入而徵得的關稅收入，完全化爲烏有了。

課於許多外國進口物品從而阻止英國消費這些物品的重稅，在許多場合，只不過獎勵走私，而在一切場合，卻把關稅收入減少，使少於課徵輕稅所能收到的數額。綏弗特博士說，在關稅的算術上，二加二不是四，有時只能得一；他這議論，對我們現在所說的重稅，是十分允當的。假若重商學說，沒在多數場合，教我們把課稅用作獨佔手段，不把它用作收入手段，那麼，那種重稅就決不會被人採用了。

對國內產物及製造品輸出有時所給的獎勵金，及對大部分外國貨再輸出所退還的稅金，曾引起許多欺詐行爲，並且引起了最破壞國家收入的某種走私。如一股所知道的，爲要得到獎勵金或退稅，人們往

往把貨物載在船上，送出海口，馬上又由本國其他沿海地方上陸。關稅收入由獎勵金及退稅招致的短缺，非常的大。其中一大部分落到欺詐者之手。至1755年1月5日為止的那一年度的關稅總收入，計達五百零六萬八千鎊。由這總收入中支出的獎勵金（雖然該年度對穀物還沒發給獎勵金），達十六萬七千八百鎊。按照退稅憑證及其他證明書所付的退稅金，達二百一十五萬六千八百鎊。此兩者合計，共達二百三十二萬四千六百鎊。把這一大金額除去，關稅收入就不過二百七十四萬三千四百鎊。再由此額扣除官吏薪俸及其他開支的關稅行政費用二十八萬七千九百鎊，該年度關稅純收入，就只有二百四十五萬五千五百鎊了。這樣，關稅行政費，相當於關稅總收入百分之五與百分之六之間，相當於扣除獎勵金及退稅後的剩餘部分的百分之十以上了。

因為對於一切輸入貨物幾乎都課以重稅，所以我國進口商，對走私輸入力求其多，而對報關輸入則力求其少。反之，我國出口商，有時爲了虛榮心，裝作經營免稅貨物的鉅商，有時爲了獲取獎勵金或退稅，其所報關輸出的，往往超過他們實際輸出的數量。因為這兩方面欺詐的結果，我國的輸出，就在海關登記簿上，顯得大大超過了我國的輸入，這對以所謂貿易差額衡量國民繁榮的政治家們，真給予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

一切輸入貨物，除極少數特別免稅品外，都課有一定關稅。假若輸入某種未載入關稅表的貨物，此貨物就憑輸入者宣誓的申報，對其價值每二十先令課以四先令九又二十分之九便士的關稅，即約略相當於前述五種補助稅或五種鎊稅的比例的關稅。關稅表所包含的極其廣泛，種類繁多的商品，都被列舉其中，有許多而且是不大使用、不爲一般所知道的。以此之故，某種貨物，應屬於那個品目，應課以何種稅率，常常無從確定。這方面的差錯，往往使稅吏失敗，並常常使輸入者感到很大麻煩與苦惱和花很大費用。所以，就明瞭、正確及分別清楚各點說，關稅實遠不若國內消費稅。

爲使社會大多數人民，按照他們各自費用的比例，提供國家收入，似乎不必要對於費用所由而支出的每項物品課稅。由國內消費稅徵取的收入，與由關稅徵取的收入，在想象上是同樣平等地由消費者負擔的。然而國內消費稅，則只課加於若干用途極廣消費極多的物品上。於是，許多人有這種意見，以爲如果管理適當，關稅也可同樣只

課於少數物品上，而不致虧損公家收入，而且可給對外貿易帶來很大的利益。

英國用途最廣消費最多的外國貨，現在主要是外國葡萄酒和白蘭地酒，美洲及西印度所產的砂糖、蔗糖、酒、菸草、椰子，東印度所產的茶、咖啡、磁器、各種香料及若干種類紡織物等。這種種物品，恐怕提供了現在關稅收入的大部分。現在對外國製造品所課的稅，如把剛纔列舉的外貨中若干貨物的關稅除外，那就有一大部分，不是以收入為目的而徵收，卻是以獨佔為目的而徵收，即要在國內市場上，給本國商人以利益。因此，撤廢一切禁令，對外國製造品課以根據經驗可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的適度的關稅，我國工人，可依然在國內市場上保持有很大的利益，而現在對政府不提供收入以及僅提供極少收入的許多物品，到那時亦會提供極大的收入了。

一種重稅，有時會減少所稅物品的消費，有時會獎勵走私，其結果，重稅給政府所提供的收入，往往不及較輕的稅所能提供的收入。

當收入減少，是由於消費減少時，唯一的救濟方法，就是減低稅率。

當收入減少，是由於獎勵走私時，那大抵可以由兩種方法救濟：一是減少走私的誘惑，一是增加走私的困難。只有減低關稅，才能減少走私的誘惑；只有設立最適於阻止那種不法行為的稅收制度，才能增加走私的困難。

根據經驗，國產稅法防止走私活動，比關稅法效果大得多。在各稅性質許可的範圍內，把類似國產稅的稅政制度，用於關稅方面，那就能大大增加走私的困難。這種變更輕而易舉，許多人是設想得到的。

有人主張，輸入應完納關稅的商品的進口商，可把這些商品搬進他自己所備的貨棧，或寄存國家所備的貨棧，一聽他自決，不過，在國家貨棧保管的場合，其鎖鑰當由海關人員執掌，海關人員未臨場，他不得擅開。假若這商人把貨物運往自己的貨棧，那就當立即付稅，以後決不退還；並且，為確定那貨棧內所存數量與納稅貨物數量是否相符，海關人員得隨時蒞臨檢查。假若他把貨物運往國家貨棧，以備國內消費，不到出貨時可不納稅。如再輸往國外，則完全免稅；不過，他必須提供適當的保證，擔保貨物定要輸出。此外，經營這些貨

物的商人，不論其為批發商或零售商，隨時都要受海關人員的訪問檢查，並且還須提示適當的憑證，證明他對自己店鋪中或貨棧中全部貨物，都付了關稅。英國現在對於輸入蔗糖、酒所課的所謂國產稅，就是依此方法徵收；這種管理制度，不妨擴大到一切輸入品的課稅，只要這些稅，與國產稅同樣，只課在少數使用最廣、消費最多的貨物上。如果現在所說的一切種類貨物，都改用這種方法徵收，那要設備十分廣大的國家貨棧，恐怕是不容易吧；況且，極精細的貨物，或者，在保存上非特別小心注意不可的貨物，商人決不放心寄存在別人的貨棧內。

假若通過這種稅務管理制度，就是關稅相當的高，走私亦可大大阻止；假若各種稅時而提高，時而減低，提高能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就提高，減低能給國家提供最大收入就減低，老是把課稅用作收入的手段，而不是用作獨佔的手段，那麼，只須對使用最廣、消費最多的少數貨物課以關稅，其所得似乎就有可能至少與現在關稅純收入相等，而關稅還可因此成為和國產稅同樣單純、同樣明瞭、同樣正確。在這種制度下，現在國家由外貨再輸出（實則會再輸入以供國內消費）的退稅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損失，就可完全省免了。這項節省，數額非常的大，再加上對國產貨物輸出所給獎勵金的取消——這些獎勵金事實上沒有一種是以前所付的某某國產稅的退稅——，其結果，關稅純收入，在制度變更以後，無疑至少可和其未變更以前相等。

假若制度這樣的變更，國家收入上並無何等損失，全國的貿易及製造業，就確要獲得非常大的利益。佔商品最大多數的未課稅商品的貿易，將完全自由，可來去運銷於世界各地，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這些商品，包含有一切生活必需品及一切製造品的原料。生活必需品既是自由輸入，其在國內市場上的平均貨幣價格必低落，因此，勞動的貨幣價格亦必在此限度內低落，但勞動的真實報酬卻不至減少。貨幣的價值，和它所能購買的生活必需品的數量相稱，而生活必需品的價值，則與它所能換得的貨幣數量全然無關。勞動貨幣價格低落，國內一切製造品的貨幣價格，必然伴着低落，這一來，國內製造品，就可在一切國外市場上獲得若干利益了。若干製造品，因原料自由輸入，其價格可降低更大。假若中國及印度生絲能夠無稅輸入，英格蘭絲制業者，就比法蘭西意大利的絲制業者，能更低廉地出賣其製品。在那種場合，外國絲絨的輸入，就沒有禁止之必要了。本國製造

品的廉價，不但會保證我國商人，使能佔有國內市場，而且能大大支配國外市場。就連一切課稅品的貿易，亦會比現在有利得多。假若這些商品，因輸往外國，由國家貨棧取出，由於在這種場合，一切稅都蠲免，那種貿易，就完全自由了。在此制度下，各種貨物的運送貿易，將享有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假若這些貨物由國家貨棧取出，是供國內消費，那就因為輸入商前此在未找着機會把貨物賣予商人或消費者時，沒有墊付稅金的義務，所以和那一經輸入就要墊付稅金的場合比較，他這時就能以更廉的價格，出賣其貨物了。這樣，在同一的稅率下，就連有稅的消費品的外國貿易的經營，也會比現在獲得大得多的利益。

羅柏特·沃爾波爾有名的國產稅案的目的，在對葡萄酒及菸草設立一種與上面所提議的無大出入的稅制。他那時向議會提出的提案，雖只含有這兩種商品，但依一般推想，那只是一種更廣泛計劃的緒端。因此，與偷運商人利益結合在一塊的營私黨派，對這提案，掀起了一種極不正當的反對騷鬧。這騷鬧的猛烈程度，使首相覺得非撤回那提案不可，而且以後再也沒有人敢繼起提議這個計劃了。

對於由外圍輸入為國內消費的奢侈品所課的稅，有時雖不免落在貧民身上，而主要則是歸中產及中產以上的人民負擔。如外國葡萄酒、咖啡、巧克力糖、茶、砂糖等的關稅，都屬此類。

對於國內產出、國內消費的較廉奢侈品，所課的稅，是按照各人費用的比例，很平均地落在一切階級人民身上。貧民付自身消費的麥芽、酒花、啤酒、麥酒的稅；富者則付自身及僕婢所消費的各該物的稅。

這裏，須注意一件事，下層階級人民或中層階級以下人民的全部消費，在任何國家，比之中層階級與中層階級以上人民的全部消費，不但在數量上，即在價值上，亦大得多。與上層階級的全部費用比較，下層階級的全部費用，要大得多。第一，各國的全部資本，幾乎都是用作生產性勞動的工資，而分配幹下層階級人民。第二，由土地地租及資本利潤所生收入的大部分，都是用作僕婢和其他非生產性勞動的工資及維持費，每年分配於這階級。第三，資本利潤中有若干部分，是屬於這階級，作為使用自己資本所得的收入。小商店店主、店夥乃至一切零售商人每年掙得的利潤額，到處都是非常之大，並在年

收入中，佔有一個極大的部分。第四，甚至土地地租中的若干部分，亦屬於這一階級，而在此若干部分中，一大部分為比中層階級略低些的人所有，一小部分為最下層階級人民所有，因為普通勞動者，有時亦保有一兩畝的土地。這些下層階級人民的費用，就各個人分開來看，雖是極小，但就全體合攏來看，卻常佔社會全費用中的一個最大部分；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中，把下層階級所消費的除去，剩下來供上流階級消費的，在數量上，在價值上，都總是少得多。因此，主要以上流階級人民的費用為對象的稅，比不分彼此地以一切階級的費用為對象的稅，甚至比主要以下層階級費用為對象的稅，其收入一定要少得多。換言之，即以年產物的較小部分為對象的稅，比不分彼此地以全部年產物為對象的稅，甚至比主要以較大部分年產物為對象的稅，一定要少得多。所以，在以費用為對象的一切課稅中最能提供收入的，就要算以國產酒類及其所用原料為對象的國產稅；而國產稅的這一部門，很多或者說主要是由普通人民負擔。就以1775年五月5日為終止期的那個年度說，這一部門的國產稅總收入，計達三百三十四萬一千八百三十七鎊九先令九便士。

不過，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應當課稅的，是下層階級人民的奢侈費用，而不是他們的必需費用。對他們必需費用，要是課稅，其最後支付，要完全由上層階級人民負擔，即由年生產物的較小部分負擔，而不由年生產物的較大部分負擔。在一切場合，此種稅必會提高勞動工資，或者減少勞動需要。不把那種稅的最後支付加在上層階級身上，勞動價格決無從提高；不減少一國土地勞動年產物，即一切稅最後支出的源泉，勞動需要決不致減少。勞動需要由這種稅而減少的狀態不論是怎樣，勞動工資都不免要因此提高到沒有此種稅的場合以上。並且，在一切場合，這提高的工資的最後支付，必定要出自上層階級。

釀造發酵飲料及蒸餾酒精飲料，如不是為着販賣，而是為自家消費，在英國都不課國產稅。這種免稅，其目的雖在於避免收稅員往私人家庭作討厭的訪問與檢查，其結果卻常使此稅的負擔，加在富者方面的過輕，加在貧者方面的過重。雖然自家蒸餾酒精飲料，不甚通行，但有時亦有。在鄉下，許多中等家庭及一切相當富貴的家庭，都在釀造他們自用的啤酒。他們釀造強烈啤酒所費，比普通釀造者每桶要便宜八先令。普通釀造者對其所墊付的一切費用及稅金，都要得有

利潤。所以，和普通人民能夠飲用的一切同質飲料比較，這些人家所飲的，至少每桶要便宜九先令或十二先令，因為普通人民到處都感覺向釀酒廠或酒店零購所飲啤酒較為便當。同樣，為自家消費而製造的麥芽，雖亦不受收稅人員的訪問和檢查，但在這場合，每人卻須納稅七先令六便士。七先令六便士等於麥芽十蒲式耳的國產稅，而麥芽十蒲式耳可以說是節儉家庭平均全家男女兒童所能消費的數量。可是，饗宴浩繁的富貴家庭，其家人所飲用麥芽飲料，不過佔其所消費的全部飲料的一小部分。但也許因為這個稅，也許因為其他原由，自家製造麥芽，竟不及自家釀造飲料那樣通行。釀造或蒸餾自用飲料的人，不必納製造麥芽的人所納上述的稅，其正當理由何在殊難想象。

往往有人說，對麥芽課以較輕的稅，其所得收入，會比現在對麥芽、啤酒及麥酒課以重稅所得的未得多。因為，瞞騙稅收的機會，釀酒廠比麥芽製造場要多得多講且，為自己消費而釀造飲料的人，免納一切的稅，而為自己消費而製造麥芽的人，卻不能免稅。

倫敦的黑麥酒釀造廠，普通每套特麥芽，成酒兩桶半以上，有時成酒三桶。各種麥芽稅，每夸特六先令；各種強烈啤酒及淡色啤酒稅，每桶八先令。因此，在黑麥酒釀造所，課在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上的各種稅，對麥芽每夸特的產額，計達二十六先令及至三十先令。在那打算以普通鄉村為銷售對象的鄉村釀造所，每夸特麥芽的產額，很少在強啤酒二桶及淡啤酒一桶以下，而且往往有產出兩桶半強啤酒的。淡啤酒所課各稅，計每桶一先令四便士。所以，在鄉村釀造所，對一夸特麥芽的產額，所加於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種稅，常為二十六先令，而在二十三先令四便士以下的很少。就整個王國平均計算，對一夸特麥芽的產額，所加於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上的各種稅，恐不能少於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

但是，撤廢一切啤灑稅淡色啤酒稅，而把麥芽稅加大三倍，即對麥芽每夸特的稅由六先令提高至十八先令，據說，由這單一稅所得收入，比較由現在各種重稅所得收入會更多。

1772年舊麥芽稅收入...722, 923鎊11先令11便士

附加稅.....356, 776 79 3/4 1773年舊麥芽稅收入...561, 627

37 1/2

附加稅.....278, 650 153 3/4 1774年舊麥芽稅收入...624, 614
175 3/4

附加稅.....310, 745 28 1/2 1775年舊麥芽稅收入...657, 357
08 1/4

附加稅.....323, 785 126 1/4

合計....., 835, 580 120 3/4

四年的平均數958, 895 30 3/10

1772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43, 128 53

倫敦釀造廠稅額.....408, 260 72 3/4 1773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45, 808 33

倫敦釀造廠稅額.....405, 406 1710 1/2 1774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46, 373 145 1/2

倫敦釀造廠稅額.....320, 601 180 1/4 1775年地方國產稅收入
1, 214, 583 61

倫敦釀造廠稅額.....463, 670 70 1/4

合計.....6, 547, 832 192 1/4

四年的平均數... 1, 636, 958 9 1/2

加入麥芽稅平均數..... 958, 895 鎊 3 先令 340 3/16 便士

兩平均數的和.....2, 595, 853 7 9 11/11

三倍麥芽稅，即麥芽稅每夸特由六先令提高至十八先令。此單一
稅將產出以下的收入：

... 2. 876, 685 9 0 9/16

對於前者的超過額.....280, 832 1 2 14/16

不過，舊麥芽稅中，含有蘋果酒每半桶四先令的稅及強啤酒每桶
十先令的稅。在1774年，蘋果酒稅收入只三千零八十三鎊六先令八便
士。這個稅額，恐較平常稅額稍少，因為該年度對蘋果酒所課的稅，
都在平常收入額以下。對強啤酒課稅雖重得多，但因該酒的消費不
大，所以收入更不如蘋果酒稅。但是，為彌補這兩種稅的平常額，在
所謂地方國產稅項下，含有：一，蘋果酒每半桶六先令八便士的舊國
產稅；二，酸果汁酒每半桶六先令八便士的舊國產稅；三，醋每桶八

先令九便士的舊國產稅；四，甜酒或蜜糖水每加侖十一便士的舊國產稅。這些稅的收入，用以彌補上述麥芽稅中所含蘋果酒稅及強啤酒稅的收入，大概綽有餘裕。

麥芽不但用以釀造啤酒及淡色啤酒，而且用以製造下等火酒及酒精。假若麥芽稅提高到每夸特十八先令，那以麥芽為一部分原料的那些下等火酒及酒精的國產稅，就有低減若干的必要了。在所謂麥芽酒精中，普通以麥芽為其三分之一的原料，其他三分之二，有時全為大麥，有時大麥佔三分之一，小麥佔三分之二。走私機會與誘惑，在麥芽酒精蒸餾所裏面，比在釀造所或麥芽製造場內，要大得多。酒精容積較小而價值較大，所以走私機會多；其稅率較高，每加侖達三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所以走私誘惑力強。增加麥芽稅，減少蒸餾所稅，就可減少走私機會與誘惑，使國家收入有更大的增加。

因為酒精飲料，被認為有害於普通人民的健康，有害於普通人民的道德，所以英國過去某時期，曾以妨礙這種飲料的消費為政策。依此政策，對蒸餾所課稅的低減，不應過大，以致降低此種飲料的價格；酒精的高價，要使其依舊不變，而同時，麥酒、啤酒這一類無礙健康而又能鼓舞精神的飲料，則要使其大大降價。這樣，人民現在怨聲最大的租稅負擔，就可得到部分的減輕，同時國家收入亦可大大增加。

達文南特博士對現行國產稅制度上的這種改變，表示反對，但他的反對意見，似沒有何等根據。據他所說：依這一變革，現在很平等地分配於麥芽製造者、釀造者及零售業者利潤上的國產稅，在它影響利潤的範圍內，將全然歸由麥芽製造者負擔了；釀造者及零售業者可由酒的加價取回其稅額，麥芽製造者卻不容易做到這層；並且，對麥芽課以這麼高的稅，勢必減低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

就相當長的時期說，沒有一種稅能夠減低特定職業的利潤率；任何職業的利潤率，一定常與鄰近的其他職業保持相當的水準。現在的麥芽稅、啤酒稅及淡色啤酒稅，決不會影響商人在這些商品上的利潤；他們可從增加酒價收回所付的稅額，並外加一定的利潤。固然，一種稅加在貨物上，可能使此貨物昂貴，從而減少此貨物的消費。但麥芽的消費，在於釀成各種麥芽酒。對每夸特麥芽徵收十八先令的稅不會使酒的價格比徵收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的稅更貴；反之，這

些酒的價格，說不定還可因此減低一些。其消費，與其說會減少，倒不如說會增加。

爲什麼釀造者，現在能在酒精增高的價格上，收回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時乃至三十先令，而麥芽製造者要在麥芽增高的價格上收回十八先令，卻更困難呢？這是不容易理解的。固然，麥芽製造者，對麥芽每夸特不是墊付六先令的稅，而是墊付十八先令的稅；但釀造者現在卻要對其釀造所用的麥芽每夸特墊付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時甚至三十先令的稅。麥芽製造者墊出較輕的稅，斷乎不會比釀造者現在墊出較重的稅，還要不便。任何麥芽製造者，不會常在倉庫保存這麼多的麥芽存貨，使得賣出這數量的存貨，比釀酒者賣出其通常在酒窖中所保存的啤酒、淡色啤酒存貨，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前者收回他的資金，往往可與後者同樣迅速。麥芽製造者因墊付較重的稅而感到的不便，可很容易救濟，只要給他比現在給釀造者較長數月的時間來繳清稅款就夠了。

凡不是減少大麥需要的原因，都決不會減少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設使改弦更張，把釀造啤酒和淡色啤酒的麥芽，每夸特稅率，由二十四、二十五先令，減到十八先令，那不但不會減少需要，而且會增加需要及外，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是常須與其他同樣肥沃和耕作得同樣好的土地的地租利潤大略相等的。如其較少，則大麥耕地的若干部分，將轉作其他用途；如其較多，則更多土地將立即轉來栽植大麥。當土地的某一特定產物的普通價格，可以說是獨佔價格時，對此所課的稅，就必然會減少那土地的地租及利潤。例如，葡萄酒的有效需要，常大感不足，因此，其價格和同樣肥沃及耕作得同樣好的土地的其他產物的價格比較，往往超過自然的比例；現在如對貴重葡萄酒這種產物課稅，此稅必然要減少葡萄園的地租及利潤。因爲，葡萄酒的價格已經達到了通常上市葡萄酒量所能達到的最高價格；那個數量不減，其價格即不會再高；那種土地既不能轉用以生產其他同樣貴重的產物，如果縮減那上市數量，損失還要更大，所以，賦稅的全部負擔，要落在地租及利潤上，確切地說，要落在葡萄園的地租土。當有人提議課砂糖以新稅時，我國蔗糖栽植者常常說，此稅的全部負擔，不會落在消費者身上，而要落在生產者身上，過去課稅以後，他們從不能把砂糖價格提高，超過未稅以前。可是，未稅以前，砂糖價格似乎已是一種獨佔價格了，所以，他們引來證明砂糖爲不適當課稅

對象的論據，恐怕正好表示那是適當課稅的對象；獨佔者的利得，隨時都是最適於課稅的。至於大麥的普通價格，卻從沒有成爲一種獨佔價格；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對於同樣肥沃和耕作得同樣好的其他土地的地租及利潤，也從沒有超過其自然的比例。課於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種稅，從未減低大麥價格，從未減少大麥耕地的地租及利潤。使用麥芽作原料的釀造者對麥芽所付的價格，曾在不斷按照麥芽稅的比例而增高，而這種稅和課於啤酒、淡色啤酒的稅，曾在不斷提高那些商品的價格，或不斷減低那些商品的質量。因此，這類稅的最後支付，總是歸消費者負擔，而不是歸生產者負擔。

由制度的這種改革而可能受到損害的，只有一種人，即為供自家消費的釀造者。但是，一般貧苦勞動者及工匠們所負擔的重稅，現在上層階級部反得到了免除，那確是最不正當最不公平的；即使不實現這種制度上的變更，那種免除，也是應當撤廢的。然而，從來妨礙這利國裕民的制度上的改革的，說不定就是這上層階級的利益啊。

除上述關稅及國產稅外，還有若干更不公平、更間接影響貨物價格的稅。法蘭西稱為路捐橋捐的，就是這種稅。此在昔日薩克遜時代叫做通行稅，其原來開徵的目的，似與我國道路通行稅及運河與通航河流通行稅的目的相同，即用以維持道路與水路。這樣的稅，最宜於按照貨物的容量或重量徵收。在最初，這些稅原為地方稅或省稅，用於地方或省方用途，所以在許多場合，其管理都是委託於納稅地方的特定市鎮、教區或莊園，因為在設想上，這些團體，是會以這種或那種方法，負責實施此種稅制的。可是往後在許多國家，對此全不負責任的君主，把此項稅收的管理權，握在自己掌中。他雖在大多數場合，把稅大大提高，但在多數場合，卻完全不注意它的實施。假若英國的道路通行稅，成了政府的一個資源，那我們看看許多國家的榜樣，就會十之八九地料到它的結果的。這些通行稅，結果無疑是由消費者支出；但消費者所付的稅，不是按照他付稅時他的費用的比例，不是按照他所消費貨物的價值的比例，而是按照他所消費貨物的容量或重量的比例。當這種稅不按照貨物的容量或重量徵收，而按照其推定的價值徵收時，嚴格地說，它就成為一種國內關稅或國產稅，會大大阻礙一國最重要部門的商業，即國內貿易。

若干小國，對於由水路或陸路通過其領土，而從一外國運往另一外國的貨物，課有與此相類似的稅。此稅在一些國家稱為通過稅。位於波河及各支流沿岸的若干意大利小國家，由此稅取得有一部分收入。這收入，完全出自外人。不妨害自國工商業，而由一國課加於他國人民的稅，這也許是唯一的種類。世界最重要的通過稅，乃是丹麥國王對一切通過波羅的海峽商船所課之稅。

象關稅及國產稅大部分那樣的奢侈品稅，雖完全是不分彼此地由各種收入一起負擔，最終由消費貨物納稅的人，不論這人是誰，無所取償地為其支付，但卻不常是平等地或比例地落在每個人的收入上。由於每個人的消費，是受他的性情支配，所以，他納稅的多寡，不是

按照他的收入的比例，而是視他的性情為轉移；浪費者所納，超過適當比例，節約者所納，不及適當比例。大財主在未成年期間，由國家保護獲得了很大收入，但他通常由消費貢獻給國家的，卻極有限。身居他國者，對於其收入財源所在國的政府，可以說沒在消費上作一點點貢獻。假若其財源所在國，象愛爾蘭那樣，沒有土地稅，對於動產或不動產的轉移，亦無何等重稅，那麼，這個居留異國者，對於保護其享有大收入的政府，就不貢獻一個銅板。此種不公平，在政府就某些方面說是隸屬於或依賴於他國政府的國家最大。一個在附庸國擁有廣大土地財產的人，一般在這場合，總是寧願定居在統治國。愛爾蘭恰好是處在這種附庸地位，無怪乎，對外居者課稅的提議，會在該國大受歡迎。可是，一個人要經過怎樣的外居，或何種程度的外居，纔算是應當納稅的外居者，或者說，所課的稅，應以何時開始何時告終，求其確定，恐怕不免有點困難吧。不過，我們如把這極特殊的情況除外，則由於此稅所產生的各個個人在貢獻上的不公平，很可能由那惹起不公平的情況，得到抵償而有餘；那情況就是，各個人的貢獻，全憑自願，對課稅商品，消費或不消費，他可以完全自決。因此，如果此稅的評定沒有偏差，所稅商品也很適當，納稅的人，總會比完納他稅少發牢騷的。當這種稅由商人或製造者墊付時，最後付出此稅的消費者，不久就會把它與商品價格混同起來，而幾乎忘記自己付了稅金。

這種稅，是完全確定的，或可以說是完全確定的。換言之，關於應付納多少，應何時完納，即關於完納的數量及日期，都能確定，不會留下一點疑問。英國關稅或他國類似各稅雖有時顯出不確定的樣子，那無論如何，總不是起因於這些稅的性質，而是起因於課稅法律措辭不很明瞭或不很靈活。

奢侈品稅，大都是零零碎碎地繳納，而且總是可能零零碎碎地繳納，即納稅者什麼時候需要購買課稅品多少，就什麼時候繳納多少。在繳納時間與方法上，這種稅是最方便的或有可能是最方便的。總的來說，這種稅符合前述課稅四原則的前三原則，不下於任何其他稅。可是，對於最後第四原則，就無論從那方面說，都是違反的。

就此稅的徵收說，人民所納多幹實際歸入國庫的數目，常比任何它稅來得大。可能惹起此流弊的，一共有四種不同情況。

第一，徵收此稅，即在安排極其適當的場合，亦需要設置許許多多稅關及收稅人員。他們的薪俸與津貼，就是國家無所入而人民必須出的真正的稅。不過，英國此種費用，還較其他大多數國家為輕，那是不能不承認的。就1775年1月5日為止的那個年度說，英格蘭國產稅委員管理下各稅的總收入，計達五百五十萬七千三百零八鎊十八先令八又四分之一便士，這個金額，是花了百分之五點五的費用徵收的，不過，在此總收入中，要扣除輸出獎勵金及再輸出退稅，這使其純收入縮減到五百萬鎊以下。鹽稅也是一種國產稅，但其管理方法不同，其徵收所費，也大得多。關稅的純收入，不到二百五十萬鎊；徵收人員薪俸及其他事件的費用，超過百分之十以上。但不論何處，海關人員的津貼，都比薪俸多得多，在若干港口，竟有多至兩倍三倍的。因此，假若海關人員薪俸及其他開支達到了關稅純收入百分之十以上，那麼，把徵收此收入的全部費用合算起來，就要超過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以上了。國產稅的徵收人員，幾無何等津貼；又因這個收入部門的管理機構，為較近設立的機構，所以沒象海關那樣腐敗。海關歷時既久，許多弊害，相因而生，而且得到寬容。如果現在從麥芽稅及麥芽酒稅的徵收的全部收入，都轉向麥芽徵收，國產稅每年的徵稅費用，據料想可節約四萬鎊以上。如關稅只對少數貨物課徵，而且依照國產稅法徵收，關稅每年的徵收費費用，就恐怕可以節約得多得多了。

第二，這種稅，對於某部門的產業，是必然要惹起若干妨礙或阻害的。因為被稅商品常因此提高價格，所以不免要在此限度內妨礙消費，從而妨害其生產。假若此商品為國產品或國內製造品，其生產及製造所使用的勞動就要減少。假若為外國商品，其價格因課稅而騰貴，那在國內生產的同類商品，固然會因此能在國內市場獲得若干利益，而國內產業就有更大部分轉向這種商品的生產。但是，外國商品價格這樣的騰貴，雖會使國內某特殊部門的產業受到鼓勵，但其他一切部門的產業，卻必然要受到阻害。伯明翰製造業者所買外國葡萄酒愈貴，他為買此葡萄酒而賣去的一部分金屬器具或者一部分金屬器具的價格就必然愈賤。與前此比較，這一部分金屬器具對於他的價值減少了，促使他去增產金屬器具的鼓勵也減少了。一國消費者對他國剩餘生產物付價愈昂，他們為買那生產物而賣去自己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或者說，一部分剩餘生產物的價格就必然愈低。與前此比較，這一部分剩餘生產物對於他們的價值減少了，促使他們去增加這一部分

生產物的鼓勵也減少了。所以，對一切消費品所課的稅，都會使生產性勞動量縮減到在不稅場合的自然程度以下：那消費品如為國內商品，則被稅商品生產上所僱用的勞動量縮減；如其為外國商品，則縮減的為外國商品所由而購買的國內商品生產上所僱用的勞動量。此外，那種稅，常會變更國民產業的自然方向，使它轉向一個違反自然趨勢的方向，而這方向大概都是比較不利的方向。

第三，走私逃稅的企圖，常常招致財產的沒收及其他懲罰，使走私者陷於沒落。走私者違犯國法，無疑應加重懲罰，但他常常是不會違犯自然正義的法律的人，假若國法沒把大自然從未視為罪惡的一種行為定為罪惡，他也許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說是一個優良市民。在政府腐敗，至少犯有任意支出、濫費公幣嫌疑的國家，保障國家收入的法律，是不大為人民所尊重的。所以，如果不干犯偽誓罪而能找到容易安全的走私機會，許多人是會無所遲疑地進行走私的。假裝着對購買走私物品心存顧忌，儘管購買這種物品是明明獎勵人家去侵犯財政法規，是明明獎勵幾乎總是和侵犯財政法規分不開的偽警罪，這樣的人，在許多國家，都被視為賣弄偽善，不但不能博得稱譽，卻徒使其鄰人疑為老奸巨滑。公眾對於走私行為既如此寬容，走私者便常常受到鼓勵，而繼續其懺若無罪的職業如果稅收法律的刑罰要落在他頭上，他往往想使用武力來保護其已經慣於認為自己正當的財產。在最初，他與其說是犯罪者，也許不如說是個粗心的傢伙，但到最後，他就屢屢對於社會的法律，出以最大膽、最堅決的侵犯了。而且，走私者沒落了，他前此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亦會被吸收到國家收入中或穩交收入中，而用以維持非生產性的勞動。這一來，社會的總資本就要減少，原來可由此得到維持的有用產業亦要減少。

第四，此稅的施行，至少使經營課稅商品的商人，得服從稅吏的頻繁訪問和討厭檢查，這樣，他有時無疑要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迫，而通常總是不勝其苦惱與煩累。前面說過，煩累雖然嚴格說來，不算是費用，但為免掉煩累，人是願意出費用的，所以煩累確與費用相等。國產稅法，就其設定的目的說，是比較有效果的，可是在這點上，它卻比關稅更招人討厭。商人輸入課稅商品時，如已付過關稅，再把那貨物搬往自己貨棧中，那在大多數場合，就不會再受海關人員的煩擾。如貨物由國產稅課稅，情形就不是如此；商人不斷要受稽徵人員

的檢查與訪問，而隨時得與他們周旋。因此之故，國產稅比關稅更不爲人所歡喜，徵收國產稅的人員，亦更不爲人所歡喜。有人說，國產稅稽徵人員，其執行職務，雖然一般地說，也許不比海關人員環，但因爲他們的職務，迫使他們常常要找鄰人的麻煩，所以大都養成了海關人員所沒有的冷酷性格。然而這種觀察，十之八九是出於那些從事祕密買賣的不正商人。他們的走私，常爲國產稅人員所阻止、所揭發，於是出此以諷刺。

不過，一有了消費品稅，就幾乎免不了這種對於人民的不便。就這種不便說，英國人民所感受的，並不比政費和英國一樣浩大的國家的人民所感受的來得大。我們這個國家，當然未達到完善之境，處處有待改良；但與各鄰國相比，它卻是同樣良好或者較爲優良。

若干國家，由幹認爲消費品稅是對商人利潤所課的稅，所以貨物每賣一次，就課稅一次。其意以爲，進口商或製造商的利潤如果課稅，那麼，介乎他們與消費者之間的中間商人的利潤，似乎要同樣課稅，始得其平。西班牙的消費稅，彷彿就是依此原則設定的。這種稅，對於一切種類動產或不動產的每度變賣，最初抽稅百分之十，後來抽百分之十四，現在抽百分之六。徵收此稅，不但要監視貨物由一地向他地轉移，而且要監視貨物由一店鋪向他店鋪轉移，所以不能不有許多的稅務人員。此外，有了此稅，須忍受稅吏不時訪問檢查的，不僅是經營某幾種特定貨物的商人，一切農業者，一切製造業者，一切行商坐賈，都在檢查訪問之列。實行此稅的國家，其大部分地域，都不能爲銷售遠方而生產。各地方的生產，都須和其鄰近的消費相適應。烏斯塔里斯把西班牙製造業的沒落，歸咎於這消費稅；其實，西班牙農業的凋落，亦可歸咎於此稅，因爲此稅不但課於製造品，而且課於土地原生產物。

在那不勒斯王國，亦有同類的稅，對一切契約價值，從而對一切買賣契約價值，徵抽百分之三。不過此兩者都比西班牙稅爲輕，並且該王國大部分城市及教區，都允許其付納一種賠償金，作爲代替。至於城市教區徵取此賠償金的方法，聽其目便，大概以不阻礙那地方的內地商業爲原則。因此，那不勒斯的稅，沒有西班牙稅那樣具有毀壞性。

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各地通行的劃一課稅制度——只有少數無關重要的例外——幾乎使全國內地商業及內地沿海貿易，完全自由。對內貿易的最大部分貨物，可由王國的一端運往他端，不要許可證、通過證，也不受收稅人員的盤詰、訪問或檢查。雖有若干例外，那都是無礙於國內商業的任何重要部門的。沿海岸輸送的貨物，固然要有證明書或沿海輸送許可證，但除煤炭一項外，其餘幾乎都是免稅的。由稅制劃一而取得的這種對內貿易的自由，恐怕就是英國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每一個大國，當然是本國大部分產業生產物的最好最廣泛的市場。假若把同一的自由擴張到愛爾蘭及各殖民地，則國家的偉大和帝國各部分的繁榮，說不定要遠過於今日呢。

在法國，各省實行的各種稅法，不但需要在國家邊界，而且需要在各省邊界，設置許許多多稽徵人員，以阻止某種貨物的輸入，或對那貨物課以一定稅額。這一來，國內商業就要受到了不少的妨害。有若干省，對於鹽稅，得繳納一種賠償金代替；而在其他各省，則完全豁免。在全國大部分地方，賦稅包收人享有菸草專賣權利，而在若干省，不實施菸草專賣。與英格蘭國產稅相當的稅，其情況各省大不相同。有若干省不收此稅，而代以一種賠償金或其同等物。在其他徵收此稅且採用包稅制度的各省，還有許多地方稅，那些稅的實施，只限於某特別城市或特別地區。至於與我國關稅相當的稅，則分法國為三大部分：第一，適用1664年稅法，而稱為五大包稅區的各省，其中包括皮卡迪、諾爾曼及王國內地各省的大部分；第二，適用1667年稅法，而稱為外疆的各省，其中包括邊境各省的大部分；第三，所謂與外國受同等待遇的各省，這些省，許與外國自由貿易，但與法國其他各省貿易時，所受關稅待遇，亦與外國相同。如阿爾薩斯、茨圖爾、凡爾登三個主教管區，如鄧扣剋、貝昂那、馬賽三市，都屬於這個部分。在所謂五大包稅區各省（往時關稅分為五大部門，每部門原來各成為一特定承包的對象，所以有這個稱呼：現在，這各部門已合而為一了）及所謂外疆各省，都各設有許多地方稅，那些稅的徵收，限於某特定城市或特定地區。稱為與外國受同等待遇的各省，亦徵有某些地方稅，馬賽市特別是如此。這種種稅制如何阻礙國內商業，以及為守護實行這些稅的各省各區的邊界必要增添多少收稅人員，這可不言而喻，無待細述。

除了這複雜稅制所生的一般約束外，法國對於其重要性僅次於穀物的產物，即葡萄酒的貿易，在大多數省還加有種種特殊約束。這些約束的產生，是由於某些特定省區葡萄園所享有的特惠，大於其他各省。產葡萄酒最出名的各省，我相信，就是在葡萄酒貿易上受約束最少的各省。這些省所享有的廣泛市場，鼓勵它們，使它們在葡萄的栽培土，在葡萄酒的調製上，能實行良好的管理方法。

然而這種花樣複雜繁多的稅法，並非法國所特有。米蘭小公國，共分六省；關於若干種類的消費品，各省各定有特別的課稅制度。而比較更小的帕馬公爵領土，亦分有三、四省，各州亦同樣有其各別的課稅制度。在這樣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如不是土壤特別肥沃，氣候非常調適，這些國家，恐怕早就淪為最貧窮最野蠻國家了。

對消費品所課的稅，有兩種徵收方法，其一由政府徵收，在這場合，收稅人員由政府任命，直接對政府負責，並且政府的收入，隨稅收不時的變動，而年各不同。又其一則由政府規定一定額數，責成賦稅包收者徵收，在這場合，包收者得自行任命其徵收員，此種徵收員雖負有按照法律指定方法徵稅的義務，但是受包收者監督，對包收者直接負責。最妥善、最節約的收稅方法，決不是這種包稅制度。包收者除墊付規定稅額、人員薪俸及全部徵收費用外，至少還須從收入稅額中，提取和他所拿出的墊款，所冒的危險，所遇的困難，以及應付這非常複雜事務所必要的知識與熟練相稱的利潤。政府如自己設置象包收者所設的那樣管理機構，由自己直接監督，至少這種利潤——常為一個非常大的鉅額——是可以節省的。承包國家任何大項稅收，必須有大資本或大信用。單為了這條件，這種事業的競爭，便會侷限於少數人之間。況且，持有相當資本或信用的少數人中，具有必要知識或經驗的，更為少數。於是這另一條件，就把那競爭侷限於更少數人之間。此有資格競爭的最少數人知道，他們彼此團結起來，於自己更有利益，於是大家不為競爭者，而為合作者，在包稅投標的時候，他們所出的標額，就會遠在真實價值以下。在公家收入採用包收制的國家，包收者大概都是極富裕的人。單是他們的富，已夠惹起一般人的嫌惡；而往往與這類暴發財富相伴的虛榮，以及他們常用以炫耀其富裕的愚蠢的賣弄，更會增大人們的嫌惡。

公家收入的包收者對懲罰企圖逃稅者的法律，決不會覺得過於苛刻。納稅者不是他們的人民，他們自無所用其憐恤，並且，納稅者即普遍破產，如發生於包收滿期的次日，他們的利益，亦不會受大影響。在國家萬分吃緊，君主對其收入的足數收到定是非常關心的時候，賦稅包收者很少不乘機大訴其苦，說法律知不較現行加厲，付出平常的包額，也將無法辦到。在此國家緊急關頭，他們是有求必應的；所以，這包收稅法，就一天苛酷一天。最慘忍的稅法，常常見於公家收入大部分採用包收制的國家；而最溫和的稅法，則常常見於君主直接監督徵收的國家。君主雖再愚闇，對於人民的憐憫心情，也一定遠過於包稅人。他知道，王室恆久的偉大，依存於其人民的繁榮；他決不會為一時之利而破壞這繁榮。在賦稅包收者，情形就兩樣了；他的昌盛，常常是人民沒落的結果，而不是人民繁榮的結果。

包稅者，提供了一定金額，有時不但取得一種賦稅的權利，而且取得對幹課稅品的獨佔權利。在法國，菸草稅及鹽稅，就是以這種方法徵收的。在此場合，包徵者不僅向人民課取了一個過度的利潤，而且課取了兩個過度的利潤，即包稅者的利潤，和獨佔者的更大利潤。菸草為一種奢侈品，買與不買，人民尚得自由。但鹽為必需品，各個人是不能不向包稅者購買一定分量的；因為這一定分量，他如不向包稅者購買，就會被認為是從走私者那裏購買的。對這兩商品所課的稅，都異常繁重。其結果，走私的誘惑，簡直不可抵抗；但同時由於法律的嚴酷，包稅者所用人員的提防，受到誘惑的人，幾乎可肯定總有破產的日子。鹽及菸草的走私，每年使數百人坐牢，此外，被送上絞架的人數也很可觀。然而稅由這種方法徵收，對政府可提供很大的收入。1767年，菸草包額為二千三百五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利弗，鹽包額為三千六百四十九萬二千四百零四利弗。此兩項包徵，自1768年起，更約定繼續六年。着重君主收入而輕視民膏民脂的人，恐怕都贊同這種徵稅方法。因此，在許多其他國家，特別是在奧地利及普魯士領土內，在意大利大部分小國，對於鹽及菸草，都設立了同種的賦稅與獨佔。

在法國，國王實際收入的大部分，來自八個源泉，即貢稅、人頭稅、二十取一的稅、鹽稅、國產稅、關稅、官有財產及菸草包徵。最後五者，各省大抵都採用包徵制，而前三者，則各地都置於政府直接

監督及指導之下，由稅務機關征收。就取自人民的數額的比例說，前三者實際歸入國庫的，要比後五者為多；後五者管理上更為虛糜濫費，那是世所周知的。

現在法國的財政狀態，似乎可以進行三項極顯明的改革。第一，撤廢貢稅及人頭稅，增加二十分取一的稅，使其附加收入，等於前兩者的金額，這樣，國王的收入，便得保存；徵收費用，可以大減；貢稅及人頭稅所加於下層階級人民的煩累，會全然得到阻止，而且大部分上層階級的負擔，也不至比現在更重。前面說過，二十分取一的稅，差不多與英格蘭所謂土地稅相類似。貢稅的負擔，最終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那是一股所承認的；人頭稅的大部分，乃按照貢稅每鎊若干的比率，課予貢稅的納稅者，所以此稅大部分的最後支付，也是由同一階級人民負擔。因此，二十分取一的稅，即使按照貢稅及人頭稅兩稅所提供的稅額增加，上層階級的負擔，仍不致以此加重。不過，因現在貢稅課於各個人的所有地及租戶不很公平的緣故，一經改革，許多個人，就不免要加重負擔。所以，現在享有特惠者的利害關係及由此利害關係出發的反對，恐怕就是最能阻止此改革及其他相類似的改革的障礙。第二，劃一法國各地的鹽稅、國產稅、關稅、菸草稅，即劃一切關稅，一切消費稅，這樣，這些稅的徵收費用，便可遠較今日為少，並且，法國的國內商業，亦得與英國國內商業同樣自由。第三，把這一切稅，全部歸由政府直接監督指導的稅務機關征收，這一來，包稅者的過度利潤，就加入國家收入中。可是，與上述第一種改革計劃同樣，由個人私利出發的反對，亦很夠阻止這最後二種改革計劃的實現。

法國的課稅制度，在一切方面，似乎都比英國為劣。英國每年從八百萬以下的人民，徵取一千萬鎊稅款，絕未聞有什麼階級受到壓迫。據埃克斯皮利神父蒐集的材料，及《穀物法與穀物貿易論》著者的觀察，法國包括洛林及巴爾在內，人口約共二千三百萬乃至二千四百萬，這個數目，將近有英國人口三倍之多。法國的土壤及氣候，是優於英國的。法國土地的改良及耕作，是遠在英國之先的，所以凡屬需要長久歲月來建造和累積的一切事物，例如大都市以及城市內鄉村內建築優良、居住舒適的房屋等，法國都勝於英國。沒有這種種利益的英國，還能不大費周折地徵收賦稅一千萬鎊，法國總該可以不大費

周折地徵收三千萬鎊吧。然而根據我手邊最好但我承認是極不完全的報告，法國1765年及1766年輸歸國庫的全收入，只在三億零八百萬利弗乃至三億二千五百萬利弗之間，摺合英幣，尚未達到一千五百萬鎊。以法國人民的數目，照英國人民的同一比例納稅，吾人可期望其能得三千萬鎊。上述金額還不到三千萬鎊的半數，然而法國人民所受捐稅的壓迫，遠甚於英國人民，那是世所公認的。不過，歐洲除英國外，法國還算是有最溫和最寬大政府的大帝國呢。

在荷蘭，課於生活必需品的重稅，據說，曾破壞了該國一切主要製造業。連漁業及造船業，恐怕也會逐漸受其阻害。英國對必需品所課的稅很輕，沒有任何製造業受過它的破壞。英國製造業負擔最重的稅，只有幾種原料進口稅，特別是生絲進口稅。荷蘭中央政府及各都市的收入，據說每年有五百二十五萬鎊以上。荷蘭人口不能認為超過了英國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按人口比例計算，荷蘭租稅肯定是重得多了。

在一切適當課稅對象都課過了稅之後，假若國家的急需狀態，仍繼續要求新稅，那就必需對於不適當的對象課稅了。因此，對必需品課稅，並非荷蘭共和政府的愚昧無知。由於共和國要取得獨立，維持獨立，所以平常雖然節約異常，但遇到費用浩大的戰爭，就不得不大事舉債。加之，荷蘭和西蘭，與其他國家不同，爲了保住其存在，換言之，爲不給海水所吞沒，就得花一項巨大費用，因而就得大大加重人民賦稅的負擔。共和的政體，似爲荷蘭現在的偉大的主要支柱。大資本家，大商家，或則直接參加政府的管理，或則間接具有左右政府的勢力。他們由這種地位，取得了尊敬和權威，所以哪怕與歐洲其他地方比較，在這一國使用資本，利潤要輕些；在這一國貸出資金，利息要薄些；在這一國從資本取得的少許收入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要少些，但他們仍樂於居住在這一國。這些富裕人民定居的結果，儘管荷蘭障礙繁多，該國的產業仍能在某種程度上活躍着。設一旦國家災難發生，這共和國的政體陷於破壞，全國統治落於貴族及軍人之手，這些富裕商人的重要性，因此全然消失，他們就不會高興再住在不爲人所尊敬的國家。他們會帶着資本遷往他國，這一來，一向由他們支持的荷蘭產業和商業，就立即要緊跟在資本之後而他適了。

第三章論公債

在商業未開展、製造業未改進的未開化社會，對於僅能由商業及製造業帶來的高價奢侈品還一無所知的時候，有大收入的人，象我在第三篇說過的那樣，除了盡收入能維持多少人，使用以維持多少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費或享受收入的方法。一個大收入，隨時都可說是對一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力。在那種未開化社會狀態下，那收入一般都是以一大量必需品，即粗衣粗食的原料，如穀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物收進的。當時既無商業，又無製造業，所以這些物資的所有者，找不到任何東西，可以交換其消費不了的大部分物資；除了盡其所有，用以供人吃穿外，他簡直無法處置其剩餘。在此情況下，富者及有權勢者的主要費用，就是不奢華的款客和不炫耀的惠施，而這種款客和惠施，我在本書第三篇也曾說過，是不容易使人陷於破產的。至於利己的享樂就不同了，雖至微末，追求的結果，智者有時亦不免於滅亡。例如鬥雞的狂熱，曾經使許多人破了產。我相信，由上述性質的款待或惠施而敗家的人，當不很多，但由鋪張的款客和炫耀的惠施而敗家的則為數極多。在我們封建的祖先之間，同一家族長久繼續保有同一地產的事實，可充分表示他們生活上量入為出的一般性向。大土地所有者不斷行着鄉下式的款待，看來雖與良好的理財原則不可分離的生活秩序有所背離，但我們得承認他們至少也知道搏節，沒把全部收入盡行消費掉。他們大概有機會賣掉其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取得貨幣。這貨幣的一部分，他們也許是用以購買當前環境所能提供的某種虛榮品及奢侈品來消費，但還有一部分，則常是照原樣蓄藏起來。實際上，他們除了把節約的部分蓄藏着，也就再好再怎麼處置。經商吧，那對於一個紳士是不名譽的；放債吧，當時早視為非義，而且為法律所不許，那是更不名譽的。加之，在那種強暴混亂的時代，說不定有一天會被趕出自己的住宅，所以，在手邊藏蓄一點貨幣，以便那時候攜帶一些公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逃往安全地帶，是得計的。使個人以藏蓄貨幣為得計的強暴，更使個人以隱匿其藏蓄的貨幣為得計。動不動就有埋藏物發現，無主財寶發現，那可充分證明，當時藏蓄貨幣及隱匿藏蓄之事，是非常流行的。有一個時候，埋藏物簡直成了君主的一個重要收入部分。然在今日，哪怕全王國的一切埋藏物，亦恐不夠成為一個多財紳士的主要收入部門了。

節約與藏蓄的傾向，流行於人民之間，也同樣流行於君主之間。我在本書第四篇說過，在沒有什麼商業及製造業可言的國家，君主所處境地，自然會使他奉行蓄積所必要的節約。在那種境地，就是君主的費用，亦不能由他的虛榮心支配；他喜歡有一個華麗裝飾的宮廷，但那個無知的時代，卻只能給他提供一點無甚價值的小玩意兒。而這就構成他宮廷的全部裝飾。當時是無常備軍的必要的，所以，象其他大領主的費用一樣，就連君主的費用，除了用以獎勵其佃戶，款待其家臣外，幾乎沒有用處。但是獎勵及款待，很少會流於無節制，而虛榮則幾乎都會流於無節制，因此，歐洲一切古代君主，無不善有財寶。即在今日，聽說每個韃靼酋長，還是積有財寶。

在富有各種高價奢侈品的商業國內，君主自然會把他的收入大部分，用以購買這些奢侈品，象其版圖內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樣。他本國及鄰近各國，供給他許許多多的各種高價裝飾物，這些裝飾物，形成了宮廷華麗但無意義的壯觀。君主屬下的貴族們，爲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種壯觀，一方面打發其家臣，一方面讓租地人獨立，這一來，他們就漸次失掉了權威，以致與君主領土內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沒有區別了。左右他們行爲的浮薄熱望，也左右他們君主的行爲。在他領土內，個個富有者都在徵逐這種享樂，怎能叫他一個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沒把怎麼大的部分的收入用於享樂（他多半是如此），以致減弱國防力量，那麼，超過維持國防需要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費的。他平常的費用，就等於他平常的收入；費用不超過收入，就算萬幸了。財寶的蓄積，再無希望；一旦有特別急需，需要特別費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別的援助。1610年法蘭西國王亨利四世死後，歐洲大君主中蓄有很多財寶的，據推測只有普魯士現國王及前國王。君主政府不說，共和政府，爲蓄積而行節約的事亦幾乎是同樣罕見的。意大利各共和國、尼得蘭共和國都負有債務。伯爾尼聯邦積有不少的財寶，但在歐洲是僅見的。瑞士共和國其他聯邦，全無蓄積可言。崇尚某種美觀，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築物及其他公共裝飾物，最大國王的放蕩的宮廷，自不必說，就連那些小共和國看似質樸的議會議事堂也往往如此。

一國在平時沒有節約，到戰時就只好迫而借債。戰爭勃發起來，國庫中，除了充當平時設施所必要的經常費的款項外，沒有其他款

項。戰時爲國防設備所需的費用，須三倍四倍於平時，因此在戰時的收入，也須三倍四倍於平時收入。即使君主馬上就有一種辦法，能按照費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這幾乎是不會有的——這增大收入的源泉，必出自賦稅，而賦稅的課徵，大抵要經過十個月乃至十二個月，纔有稅款收入國庫。可是，在戰爭勃發的瞬間，或者寧說，在戰爭似要勃發的瞬間，軍隊必須增大，艦隊必須裝備，防軍駐在的都市必須設防，而這軍隊、艦隊、防軍駐在的都市，還須供給武器、彈藥及糧食。總之，在危險臨到的瞬間，就得負擔一項馬上就要的大費用；這費用是不能等待新稅逐漸地慢慢地納入國庫來應付的。在此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除了借債，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

由於道德原因的作用，這種使政府有借款必要的商業社會狀態，使人民具有貸款的能力和貸款的意向。這種商業社會狀態要是通常帶來借款的必要，它也同樣帶來借款的便利。

商人和工廠主衆多的國家，必然有很多這樣的人，不僅是他們自己的資本，而且有願意以貨幣借給他們或以貨物委託他們經營的人的資本，頻繁地在他們手中通過，比不做生意、不從事生產事業，靠自己收入爲生的私人的收入通過自己手中的次數，更要頻繁。象上面所說那種私人的收入，經常每年只通過他自己手中一次。但一個商人，如從事那本利能迅速收回的商業，他的全部資本及信用，就往往每年會通過他手中三、四次。因此，一個商人多工廠主多的國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是願意隨時都能以鉅額款項貸與政府。所以，商業國人民，都具有出貸能力。

任何國家，如果沒有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關於自己的財產所有權，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對於人們遵守契約的信汪心，沒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設想政府未必經常地行使其權力，強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麼，那裏的商業製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發達。簡言之，人民如對政府的公正，沒有信心，這種國家的商業製造業，就很少能長久發達。大商人大工廠主，如平時信任政府，敢把財產委託政府保護，到了非常時候，也就敢把財產交給政府使用。把款借給政府，絕不會減少他們進行商業及製造業的能力，反之，通常卻會增大那能力。國有急需，大抵會使政府，樂於以極有利於出借人的條件借款。政府付與原債權者的保證物，得轉移於任何其

他債權者；並且，由於人民普遍信任政府的正義，那保證物大概能以比原價高的價格，在市場上買賣。商人或有錢者，把錢借給政府，可從此賺到錢，他的營業資本不但不會減少，反會增加。政府如允許他最先應募新借款，他大抵會視為一種特惠。所以，商業國人民，都具有貸款的意向或樂意。

這種國家的政府，極易產生這種信念，即在非常時期，人民有能力把錢借給它，而且願意把錢借給它。它既預見到借款的容易，所以在平時就不孜孜幹節約。

在未開化的社會，既無大商業資本，亦無大製造業資本。個人把他所能節約的貨幣，都藏蓄起來；凡所藏蓄的貨幣，都隱匿起來；他這麼做，因為他不相信政府的公正，並且怕他的藏蓄被知道了，被發覺了，立即就要被掠奪。在此種狀態下，遇着危急的關頭，能貸款給政府的必然很少，願貸款給政府的簡直沒有。為君主者，預知借款的絕不可能，所以他就覺得，須為緊急關頭預先節約。這種先見之明，把他節約的自然傾向加強了。

鉅額債務的增積過程，在歐洲各大國，差不多是一樣的；目前各大國國民，都受此壓迫，久而久之，說不定要因而破產！國家與個人同，開始借款時，通常全憑個人信用，沒有指定特別資源或抵押特別資源來保證債務的償還。在這種信用失效以後，它們繼續借款，就以特別資源作抵押。

英國所謂無擔保公債，就是依前一方法借入的。它有一部分為全無利息或被認為全無利息的債務，類似個人記帳的債務；一部分為有利息的債務，類似個人用期票或匯票借入的債務。凡對特別服役所欠的債務，對尚未給付報酬的各種服役所欠的債務，陸軍海軍及軍械方面臨時開支的一部分，外國君王補助金的未付餘額，海員工資的未付餘額等，通常構成前一種債務。有時為支付這債務的一部分和有時為其他目的而發行的海軍證券或財政部證券，構成後一種債務。財政部證券利『良，自發行之日算起；海軍證券利息，自發行後六個月算起。英格蘭銀行，通過自動按照時價貼現這種證券，以及通過與政府議定以某種報酬條件替它流通財政部證券，即按額面價格收受該證券並支付其所應付的利息等辦法，給該證券保持了價值，便利了流通，從而使政府能夠常常借到鉅額的這種公債。在法蘭西，因無銀行，國

家證券有時須打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折扣出售。在威廉王大改鑄幣時代，英格蘭銀行認為應當停止其平常的業務，財政部證券及符契，據說要打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六十的折扣買賣。其原因，一部分是革命甫定，新政府是否安定尚未可必；另一部分，則是英格蘭銀行沒給予援助。

此種手段行不通，而政府舉債，需要指定或抵押國家特定收入來擔保債務的償還時，政府在不同時候，曾使用了兩種不同的方法。有時這指定或抵押，限於短期，如一年或數年；有時，又定為永久。在前一場合，作為抵押的收入，據推想在限定期間內，足夠付清所借貨幣的本金及其利息。在後一場合，作為抵押的收入，據推想只夠支付利息或等於利息的永久年金，政府幾時能償還借入的本金，就償清它。貨幣以前一方法借入，通稱為預支法；以後一方法借入，則通稱為永久付息法或簡稱為息債法。

英國每年徵收的土地稅及麥芽稅，政府逐年都依據不斷插入課稅法令中的借款條款加以挪用。這項款額，通常由英格蘭銀行墊付，收取利息，到稅款陸續納入國庫時，逐漸收還。其所索利息率，革命以來，迭有變化，自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三不等。如果某年度收入的稅款，不夠還清墊支的金額及其利息（此為常事），則此不足餘額，取償於次年度收入的稅款。這樣，國家收入中尚未用作擔保的這唯一主要收入部門，經常每年在未收歸國庫之前，先已消費了。此與無打算的浪費者同，浪費者對其收入，每迫不及待，而預先出息借支；國家則不斷向其代理人及經理人借款，不斷為使用自己的貨幣而支付利息。

在威廉王及大部分安妮女王時代，永久付息的借款方法，不象今日那麼習見。那時候，大部分新稅，只限於短期（僅四年、五年、六年或七年）徵收，各年度國庫的支出，大抵是得自預先挪用這些稅收的借款。稅收往往在限定期內，不夠支付借款的本金及利息，於是就得延長收稅年限，從而補足這項短額。

1697年，依照威廉三世第八年第二號法令，將這些瞬將滿期各稅的徵收年限，延至1706年8月1日，以彌補它們稅額的不足。這就是當時所謂第一次總抵押或基金。歸這基金負擔的不足額，計達五百十六萬零四百五十九鎊十四先令九便士半。

1701年，這些稅以及其他若干稅的徵收年限，又因同一目的延長至1710年8月1日，是為第二次總抵押或基金。這次基金所負擔的不足額，計達二百零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九鎊七先令十一便士半。

1707年，這些稅又延長至1712年8月1日，作為一種新公債的基金，是第三次總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額，計達九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鎊十一先令九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8年，這些稅（除去半額噸稅、鎊稅這兩種舊補助稅，及由英格蘭蘇格蘭合併協定而撤廢的蘇格蘭亞麻輸入稅）徵收年限又延長至1714年8月1日，作為一種新公債基金，是第四次總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額，計達九十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六鎊九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9年，這些稅（除去噸稅、鎊稅這二種舊補助稅，這些補助稅從那時候起與這新債基金完全沒有關係）徵收年限，為着同一目的，又延長至1716年8月1日，是第五次總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之金額，計達九十二萬二千零二十九鎊六先令。

1710年，這些稅再延長至1720年8月1日，是第六次總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額，計達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五十二鎊九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

1711年，這些稅（到這時，已須供應四種預支的本息）及其他若干稅，規定永久繼續徵收，作為支付南海公司資本利息的基金。該公司在同年度曾借給政府九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鎊十五先令四便士，用以還債及彌補稅收的不足。這次借款，為當時所僅見的最大借款。

就我所知，在此時期以前，為支付債務利息而永久課徵的稅收，只有為支付英格蘭銀行、東印度公司以及當時計劃中的土地銀行三者的貸款利息的各稅（土地銀行的貸款，只是一種擬議，未成事實）。這時，英格蘭銀行貸與政府的金額，為三百三十七萬五千零二十七鎊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年息百分之六，計達二十萬零六千五百零一鎊十三先令五便士；東印度公司貸與政府的金額為三百二十萬鎊，年息百分之五，計達十六萬鎊。

1715年，即喬治一世元年，依據該年十二號法令，那些擔保英格蘭銀行年息的各稅以及由這次法令定為永久徵收的其他若干稅，通通

集為一共同基金，稱為總基金。此基金不僅用以支付英格蘭銀行的年金，而且用以支付其他年金及債務。以後，依據喬治一世三年第八號法令，及五年第三號法令，此基金又增大，而當時附加的各稅，亦同樣定為永久的了。

1717年，即喬治一世三年，依據該年第七號法令，又有其他數種稅，被定為永久徵收，構成又一個共同基金，稱為一般基金。此基金所支付的年息，計達七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九鎊六先令十便士半。

這幾次法令的結果，以前只短期預支的各稅大部分，全都變成永久的了，而其用途，不在干支付連續由預支辦法所借入款項的本金，而在於支付其利息。

假若政府只用預支辦法籌款，那它只需要注意兩點，數年之內，就可使公家收入從債務中解放出來：第一，不使基金在限定期間內負擔的債務，超過其所能負擔的數額；第二，第一次預支未償清以前，不作第二次預支。但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不能注意到這些。它們往往在第一次預支時，就對基金加以過度的負擔；即或不然，也往往在第一次預支未償清以前，就進行第二次第三次的預支，而加重基金的負擔。這樣下去，指定的基金，就變得完全不夠支付所借貨幣的本金及利息，於是就不得不單用以支付利息，或支付那等於利息的永久年金。象這樣無打算的預支，必然會導致那破壞性更大的永久付息辦法的採用。此例既開，公家收入的負擔，就由一定期間，延續到無限期間，而遙遙無解放的日子。但是，在一切場合，由這種新方法能夠籌到的款額，總比由舊的預支方法來得大。所以，人們一習知這新方法，每當國家萬分吃緊之秋，一般都舍舊法而用新法。救目前的急難，是直接參與國事者的要圖，至於公家收入的解放，那是後繼者的責任，他們無暇顧及了。

在安妮女王朝代，市場利息率，由百分之六降至百分之五；安妮女王十二年，宣佈百分之五為私人抵押借款的最高合法利息率。英國大部分暫行稅，變成了永久的，而分別撥充總基金、南海基金及一般基金後不久，國家的債權者，與私人債權者同，亦被說服接受百分之五的利息。這一來，由短期公債換為長期公債的借款的大部分，就產生了百分之一的節約，換言之，由上述三基金支付的年金的大部分，就節省了六分之一。此種節約，使得用作基金的各稅，於支付所擔保

的各項年金後，剩有一個鉅額剩餘，構成此後減債基金的基礎。1717年，此剩餘額，計達三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四鎊七先令七便士半。1727年，大部分公債的利息，進一步降到百分之四。1753年，更降到百分之三點五。1757年，又降到百分之三。於是減債基金，愈益增大了。

減債基金雖為支付舊債而設，然而對於新債的徵募，亦提供了不少便利。它可以說是一種補助基金，在國家有急需場合，即可用它彌補其他基金的不足以舉債。至於英國是經常地用此基金來償還舊債，或經常地用它另舉新債，慢慢就會十分明白的。

借款的方法有二，一是預支，一是永久息債。但介乎這兩者之間的，還有其他兩種方法，即有期年金借款方法和終生年金借款方法。

在威廉國王及安妮女王朝代，往往以有期年金方法借入鉅額貨幣，其期限有時較長，有時較短。1693年，議會通過一法案，以百分之十四的年金，即以十六年滿期，年還十四萬鎊的年金，借款一百萬鎊。1691年，議會曾通過一法案，以今日看來可算是非常有利於債權者的條件，按終生年金方式借款一百萬鎊，但應募之數，不滿該額。於是，翌年乃以百分之十四的終生年金借款，即以七年便可收回本金的條件借款，補此未滿的額。1695年，凡購有此項年金的人，許其往財政部對每百鎊繳交六十三鎊，換取其他九十六年為期的年金，換言之，終生年金百分之十四與九十六年年金百分之十四的差額，以六十三鎊賣出，或者說，以相當於四年半的年金賣出。但條件雖然如此有利，而因當時政府地位不穩，竟找不到幾個買主。安妮女王在位年代，曾以終生年金及三十二年、八十九年、九十八年、九十九年的有期年金，借入款項。1719年，三十二年年期的年金所有者，以其所有年金，換取等於十一年半年全的金額的南海公司股本；此外，對於那時候該年金應付未付的金額，亦發給等價的南海公司股本。1720年，其他長短不等的有期年金大部分，也都合為同一基金。當時每年應付的長期年金，計達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二十一鎊八先令三便士半。1777年1月5日，其剩餘部分，即當時未募滿的額，不過十三萬六千四百五十三鎊十二先令八便士。

在1739年及1755年開始的兩次戰爭中，由有期年金或終生年金借入的款極少。九十八年期或九十九年期的年金，所值貨幣，幾乎與永

久年金相等，所以有理由可設想其應能和永久年金借入同樣多的款。但是，為家庭治財產及謀遠久的人，購買公債，決不願購買那價值不斷減少的公債；而這種人又佔公債所有者及購買公債者的最大部分。因此，長期限年金的內在價值，雖與永久年金的內在價值無大出入，但終沒有永久年金那麼多的購買者。新債的應募者，通常都打算儘快拋出其認購的公債，所以在金額相等時，他們都寧願購買可由議會陵還的永久年金，而不願購買不能贖還的長期年金。永久年金的價值，可以說是始終如一或差不多始終如一，所以和長期年金比較，它更便於轉讓。

在上述兩戰爭期間，有期年金或終生年金，都是除給與年金或利息外，還給新借款應募者一種獎金，就是說，不是作為償還所借貨幣的年金，而是作為對出借人的一種附加獎勵。

終生年金的授與，曾使用以下兩種方法，即對各個別人終生給與的方法，和對一羣人終生結與的方法。後者在法國用發明人的名字命名，叫做頓廷法。在年金是授與各個別人終身的場合，各受領年金者一旦死亡，國家收入即減輕了他這一部分負擔。如按頓廷法授與，國家收入對此負擔的解除，要到那一羣中所有受領年金者都死了才實現；那一羣人數，有時為二十人乃至三十人，就中後死者承受前死者的年金，最後生存者，則承受其一樣全部的年金。設以同一收入抵押借款，用頓廷法總能比用個別人終生年金法借到更多的款。因為，未死者有承受全部年金的權利，哪怕金額相等，實比由個別人單獨領取的年金有更大的價值。各個人對於自己的運氣，天然有幾分自信，這就是彩票生意成功的根據。由於此種自信心理，頓廷年金所賣得的價格，通常都高過其實際價值若干。因此之故，一國政府，如常使用年金辦法借款，大概總是採用頓廷法。政府幾乎總是採擇能夠籌到最多款項的方法，而不願採用能夠解除國家收入負擔最速的方策。

法國公債中由終生年金構成的部分，要比英國大得多。據波爾多議院1764年向國王提出的備忘錄，法國全部公債，計達二十四億利弗，就中，以終生年金借入的約為三億利弗，即公債總額八分之一。此項年金，據估計每年達三千萬利弗，相當於全部公債的估計利息一億二千萬利弗的四分之一。這種計算不大正確，我是十分知道的，但一個有這麼重要地位的機關說這估計數字接近事實，我看，去真實的

程度總該不遠。英法兩國借債方法上所生的差異，不是由於兩國政府對乾渴望解除國家收入負擔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完全是由於出借人的見解及利益有所不同。

英國政府所在地，為世界最大的商業都市，因此以款項貸與政府的人，大概都是商人。商人的貸出款項，其用意不在於減少其商業資本，反之，卻在於增加其商業資本，所以，新債的債券，如不能以相當的利潤賣出，他就不會應募那新債。但是，他貸出款項所購入的如不是永久年金，而是終身年金，那麼，不論這終身年金是他自己的終身，或是其他人的終身，當其轉售時，就難望有何等利潤。不論是誰，購買與自己年齡相若、健康狀態相當的他人的終生年金，總不願出與購買自己的終生年金相同的價格，所以，以自己生命為基礎的終身年金出賣，往往是不免要受到損失的。至於以第三者生命為基礎的終身年金，固然對於買者賣者有同一價值，但其真實價值，在授與年金的那一瞬間，就開始減少了，而且在此年金存續的期間內日益減少。因此，終身年金，要想能與可以假定其真實價值總是一樣或總不會有大出入的永久年金成為同樣便於轉讓的資財，那是決難做到的。

法國政府所在地，不是大商業都市，因而以款項貸與政府的人，就不像英國那樣，大部分是商人。法國政府每有急需，多半是向那些和財政有關係的人，如賦稅包徵者，未經包給人的賦稅的徵收人員，宮廷銀行家等，商量借款。這般人大抵出身微賤，因為有的是錢，所以常很驕傲。他們既不屑與同等身分的婦人結婚，而較有身分的婦人，也不屑與他們結婚，所以他們常決意過獨身生活。他們自己既沒有家庭，對於通常不大願意往來的親戚的家族，又漠不關心，所以他們只求自己一生好好度過去就完了，財產即身而止，那是無所介意的。此外，不愛結婚或其生活狀況不宜或不便於結婚的富人的人數，在法國遠較英國為多。對於這不大為後人打算，或者全不留意後人的獨身者，以其資財換入一種不長不短、恰如其所希望的長期收入，那是再便利沒有的。

近代各國政府平時的經常費，多半是等於或者大約等於其經常收入；所以戰爭一旦發生，要政府按照費用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收入，就不僅非其所願，而且非其所能。它們之所以不願，是因為突然增加如此鉅額的稅，恐傷害人民感情，使得他們嫌惡戰爭。它們之所以不

能，因為戰爭所需費用不定，賦稅應增加多少纔夠，沒有把握。各國政府所碰到的這兩層困難，如採行舉債辦法，就容易解決了。借債能使它們只要增稅少許，就可逐年籌得戰爭所需的費用；並且，通過永久息債，它們可能以最輕微的增稅，逐年籌得最大的款。在一大帝國中，住在首都的人，以及住在遠隔戰場地帶的人，大都不會由戰爭感到何等不便，反之，他們卻可優遊安逸地從報紙上讀到本國海陸軍的功勳，而享其樂。這種享樂，是很可補償他們戰時所納賦稅對平時所納賦稅的小小超過額的損失的。他們通常都不滿意和平的恢復，因為，那一來，他們那種享樂，便要中止；並且，戰爭再繼續些時說不定就會實現的征服及國家光榮的無數虛望，也要消滅了。

可是，和平雖然恢復了，在戰爭中加重的大部分賦稅負擔，卻很少便告解除。那些賦稅，都作了戰債利息的擔保。假若舊稅和新稅，干支付戰債利息及開支政府經常費用外，尚有餘剩，此餘剩部分，也許會轉作償還債務的減債基金。不過，第一，此減債基金，縱不移作其他用途，一般也遠遠不夠在和平可望其繼續的期間內，償付全部戰債；第二，這基金幾乎都被移用於其他目的。

徵收新稅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於償付以此為擔保的借款的利息。若有餘剩，那餘剩的部分，大概都是出乎意料或計劃之外的，所以很少有很大的數額。減債基金的產生，通常都是由於以後應付利息減少，而很少由於收到的稅額，超過應付利息或年金的數額。1655年的荷蘭減債基金，1685年教皇領地的減債基金，通由利息減少而形成，所以，以這種基金償還債務，往往不足。

當國家昇平無事，而有種種特別開支的必要時，政府每覺開徵新稅，不若挪用減債基金來得便利。不論開徵任何新稅，人民都會感到多少的痛苦，因而引起怨聲，引起反對。課稅的種類愈繁多，已課的各稅愈加重，人民對於任何新稅的怨聲必愈囂然，於是另課新稅或加重舊稅，就益形困難。至於暫時停止償還債務，人民是不會馬上感到痛苦的，因此也不致引起怨言，也不致引起不平之鳴。所以，挪用減債基金，常為擺脫目前困難的顯然容易的方策。可是，公債所積愈多，研究如何縮減公債愈成為必要，而濫用減債基金，就愈危險、愈會導致毀滅。公債減少的可能性愈少，挪用減債基金來應付平時種種特別開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愈大。當一國國民已負擔過度的賦稅，除

非迫於新的戰爭，除非為報國仇，除非為救國難，人民是不能再忍受新稅的課徵的。所以減債基金，常不免於濫用。

英國自最初仰賴永久息債法那種破壞性方策以來，平時公債的減少，從來沒和戰時公債的增加相稱。現時存在的鉅額公債，大部分還是起源於從1688年開始並於1697年由里斯韋克條約結束的那一次戰爭。

1697年12月31日，英國的長短期公債，計達二千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二鎊十三先令八便士半。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於短期預支，有一部分是以終身年金借入。所以不到四年，即在1701年12月31日以前，一部分就償還了，一部分又歸於國庫，其額達五百一十二萬一千零四十一鎊十二先令四分之三便士。在如此短期內，償還了如此多公債，實為前所未有。所以當時所餘的公債，就不過一千六百三十九萬四千七百零一鎊一先令七又四分之一便士。

在那次起於1702年而終於烏特勒克特條約的戰爭中，公債益形增大起來。1714年12月31日，公債數額計達五千三百六十八萬一千零七十六鎊五先令六又十二分之一便士。應募南海公司基金，又使公債增加。在1722年12月31日，公債數額達到五千五百二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八鎊一先令三又六分之五便士。1723年起開始還債，但非常緩慢，到1739年12月31日，即在十七年太平無事的歲月中，所償還公債，總共只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四鎊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那一年末，公債餘額，還有四千六百九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鎊三先令四又十二分之七便士。

1739年發端的西班牙戰爭，和緊接西班牙戰爭而起的法蘭西戰爭，使公債益形加多。1748年12月31日，即該戰爭以埃·拉·查帕爾條約結束之後，公債數額已達七千八百二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三鎊一先令十又四分之一便士。上述十七年太平無事歲月中的公債償還頗，不過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四鎊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然而未滿九年的戰爭所增加的公債額，卻為三千一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八十九鎊十八先令六又六分之一便士。

在佩蘭主政的時候，公債利息由百分之四減低至百分之三，於是減債基金增加，償還了某一部分公債。1755年即最近戰爭勃發以前，英國長期公債為七千二百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三鎊。1763年1月5

日，即媾結和約時，長期公債達一億二千二百六十萬三千三百三十六鎊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尚有無擔保公債一千三百九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九鎊二先令二便士。但是，由戰爭引起的費用，並不幹媾結和約之日，便告終止，所以1764年1月5日，長期公債雖已增至一億二千九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八十九鎊十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就中一部分為新公債，一部分則為由無擔保公債改成的長期公債），但根據一位博識著者所著的《英國商業及財政的考察》，該年度及次年度，還剩有九百九十七萬五千零十七鎊十二先令二又四十四分之十五便士的無擔保公債。因此，據同一著者所述，在1764年，英國所有公債（包括長期公債及無擔保公債）達到一億三千九百五十一萬六千八百零七鎊二先令四便士。此外，授與1757年新公債應募者作為獎金的終身年金，按相當於十四年年金估計，約為四十七萬二千五百鎊；授與1761年及1762年新公債應募者作為獎金的長期年金按相當於二十七年年金估計，約為六百八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鎊。以佩蘭對國事的慎重與忠心，經七年太平無事的歲月，尚不能償還六百萬鎊舊債，但在大約相同時間的戰爭中，卻舉借了七千五百萬鎊以上的新公債。

1775年1月5日，英國長期公債為一億二千四百九十九萬六千零八十六鎊一先令六又四分之一便士，無擔保公債，除去一大筆皇室費債務後，為四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三十六鎊三先令十一又八分之七便士，兩者合計共為一億二千九百一十四萬六千三百二十二鎊五先令六便士。依此計算，在太平無事的十七年間所償還的債務，僅及一千零四十一萬五千四百七十四鎊十六先令九又八分之七便士。然而，就是這麼小的公債減少額，尚非全由國家經常收入的節餘償還的，有許多是以與國家經常收入全不相涉的外來款項償還的。例如三年內對土地稅每鎊增加～先令的稅款若干鎊，東印度公司為獲得新地區繳納國家的賠償金二百萬鎊，以及英格蘭銀行為更換特許狀繳納的十一萬鎊，都應算入此外來款項。他如由最近戰爭產生的若干款項，理應視為此次戰費的扣除額，所以亦須附加在這外來的款項。主要如下：

L S. d法國戰利品收入.....	690, 449 18 9
法國俘虜賠償金.....	670, 000 0 0
由割讓各島而得的代價.....	95, 500 0 0
合計.....	1, 455, 949 18 9

假若在這個金額上，加入查特姆伯爵及克爾克拉弗特所推算的餘額，其他同類軍費的節餘，以及上述從銀行、從東印度公司、從增加土地稅所得的三項款項，其總額一定要大大超過五百萬鎊以上。因此，戰爭終結以後，由國家經常收入節餘所償還之公債，平均起來，每年尚未達到五十萬鎊。由於一部分公債的償還，由幹一部分終身年金的滿期，由於由百分之四降至百分之三的利息的低減，和平以後，減債基金無疑是大大增加了；假若一直和平下去，現在說不定每年可以由那基金抽出一百萬鎊來償還公債，而在去年就是償還了一百萬鎊的。但是，皇室費的大債務，尚延而未付，而我們現在又要捲入新的戰爭中，這戰爭發展起來，其費用也許要和以前歷次戰爭同樣浩大。在這新戰爭告終以前所不免舉借的新債，說不定要等於國家由經常收入節約所償還的全部舊債。因此，想由現在國家經常收入節約所得，償還所有的公債，簡直是一種幻想了。

據某著者主張：歐洲各債務國的公債，特別是英國的公債，是國內其他資本以外的另一個大資本；有這個資本，商業的擴展，製造業的發展，土地的開墾和改良，比較單靠其他資本所能成就的要大得多。可是，主張此說的著者，沒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實，即最初債權者貸與政府的資本，在貸與的那一瞬間，已經由資本的機能，轉化為收入的機能了，換言之，已經不是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者，而是用以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就一般而論，政府在借入那資本的當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費了，無望其將來能再生產什麼。固然，貸出資本的債權者，往往不僅僅收到了和該資本等價的公債年金，這年金無疑會償還他們的資本，使他們能進行和從前一樣或更大規模的實業或貿易，就是說，他們可賣出此年金，或以此年金作擔保借款，向他人取得或借入等於或多於他們所貸與政府的資本的新資本。但是，他們象這樣由他人取得或借入的新資本，以前一定是存在這國家中，並且與其他資本同樣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一旦轉入國家債權者手中時，雖然從某一方面來看，對這些債權者是新資本，但對該國家並不是新資本，那不過是由某種用途抽去轉作其他用途的資本罷了。所以，就他們私人說，其貸與政府的資本，雖有所取償，但就整個國家說，卻無所取償。如果他們不把這資本貸與政府，那國家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或年生產物，就有兩份而不只一份了。

當政府為開支政費，以當年未用作擔保的賦稅籌措收入時，人民收入的一定部分，只不過是從維持某種非生產性勞動，移來維持他種非生產性勞動罷了。人民用以付稅的款項中，若干部分無疑是能由他們儲蓄起來成為資本，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但其大部分大概是消費掉，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不過，國家費用在這麼開銷的場合，無疑會多少成為新資本進一步蓄積的阻礙，但不一定會破壞現存的資本。

當國家費用由舉債開支時，該國既有資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壞；從來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若干部分年生產物，必會被轉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不過，在這種場合所徵的賦稅，較在前一場合為輕，所以，人民個人收入上的負擔較少，而人民節約收入一部分以積成資本的能力，亦因此減損較少。和以本年度稅收開支本年度費用的方法比較，舉債方法，如果在較大程度上破壞舊的資本，也在較小程度上妨害新資本的獲得或蓄積。在舉債制度下，社會一般資本時時由政府濫費所意起的損失，是更容易由人民的節約與勤勞得到彌補的。

不過，只在戰爭繼續的期間內，舉債制度才優於其他制度。要是戰費總能從當年所徵的收入來開支，那末，那非常收入所由而來的賦稅，將不會繼續到那一年以上。與舉債制度比較，人民在這種制度下的蓄積能力，在戰時雖較小，在平時則較大。戰爭不一定會惹起舊資本的破壞，和平則必會促成更多新資本的蓄積。在這種制度下，一般地說，戰爭總是比較很快就結束，比較不致於隨便從事的。在戰爭繼續期中，人民因困於戰爭的負擔，不久便會對戰爭發生厭倦；政府為要迎合人民的意向，必會適可而止，不敢故事延長。戰役之興，繁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是可以前知的，設無真實或確定的利益可圖，人民當不肯借然主戰。因此，人民蓄積能力不免多少受到損害的時期，是比較不常見到的，即使有那個時期，也是不會繼續長久的。反之，蓄積能力強大的時期，要比在借債制度下長久得多。

況且，債務一經增加，則由於增加的賦稅，即在平時，其損害人民蓄積能力的程度，亦往往與上述徵稅制度在戰時損害這種能力的程度不相上下。現在英國平時收入，每年達一千萬鎊以上。假若各種賦稅都不曾用作擔保，而且都管理得宜，那怕從事最激烈戰爭，亦無須借一個先令的新債即可夠用。現在英國既已採用了有害的舉債制度，

所以居民個人收入在平時所受負擔，居民蓄積能力在平時所受損害，竟與在最糜費的戰爭期間一般無二了。

有人說，支付公債利息，有如右手支給左手。所有貨幣，都未流出國外，那不過把一國居民某階級的收入一部分，轉移到其他階級罷了，國家不會因此比從前更窮一文。這辯解，全是基於重商學說的詭辯；著者對此學說已經加以詳細的討論，似乎無須再在這裏贅述。此外，主張此說者認為，全部公債都是募自國人，此絕非事實；我國公債就有很大的部分是荷蘭人及其他外國人的投資。即使全部公債沒有外國人投資，也減少不了公債的弊害。

土地及資本，是私人和公家一切收入的兩個源泉。資本不論是用在農業上、製造業上或商業上，都是支付生產性勞動的工資。這兩個收入源泉的支配，屬於不同的兩羣人民，即土地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或使用者。

土地所有者爲了自身收入，必須修理或建築其佃戶的房屋，營造和維持其田莊的必要溝渠和圍牆，從事其他應由地主舉辦或經營的種種改良，使其所有土地能保持良好的狀態。但如果土地稅繁多，以致地主收入大減；各種生活必需品稅、便利品稅繁多，以致該收入的真實價值大減，那地主就會弄得沒有能力進行或維持這種種要花很多費用的改良。地主不能盡他的本分，租地人就也完全無能力盡他的本分。總之，地主的困難愈增加，該國的農業就必然要愈趨於荒廢。

如果各種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的稅的徵收，使資本所有者及使用者，覺得他們資本所得的收入，在某特定國家，不能購得同額收入在其他國家所能購得那麼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時，他們便會打算把他們的資本，移往其他國家。如果此類賦稅的徵收，使大部分或全部商人及製造業者，換言之，大部分或全部資本使用者，不斷受稅務人員惱人擾人的訪問，那移居的打算，不久就要見諸實行了。資本一經移動，靠此資本支持的產業，將隨着沒落，而該國商業製造業，又將繼農業歸於荒廢。

土地和資本這兩大收入源泉所生收入的大部分，如把它由其所有者即對每塊特定土地的良好狀態和對每項特定資本的良好經營都具有直接利益這一批人，移轉到另一批沒有這種直接利益的人（如國家的債權者）手中，久而久之，必定要惹起土地的荒蕪和資本的濫費或遷

移。國家的債權者，對於該國農業、製造業及商業的繁榮，從而對於土地的良好狀態和資本的良好經營，無疑是具有一般利益的，因為那三者中任何一個如遭到失敗或衰退，各種稅收，就不夠支付他應得的年金或利息。但是，國家債權者單就其作為國家債權者來說，對於某塊特定土地的良好狀態，對於某項特定資本的良好經營，是不感興趣的。作為國家債權者，他對於這一特定土地或資本，既無所知，也無從視察，他不會留意到它們。土地或產業荒廢了吧，他有時全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關心，因為這不會使他直接受到影響。

舉債的方策，曾經使採用此方策的一切國家，都趨於衰弱。首先採用這方法的，似為意大利各共和國。熱那亞及威尼斯，是意大利各共和國中僅存的兩個保有獨立局面的共和國，它們都因舉債而衰弱。西班牙似是由意大利各共和國學得此舉債方策，而就天然力量說，它比它們尤見衰微（也許是因為它的稅制比它們的稅制更不明智）。西班牙負債極久。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即在英格蘭未借一先令公債的百年以前，該國即負有重債。法國雖富有自然資源，亦苦於同樣債務的壓迫。荷蘭共和國因負債而衰弱，其程度與熱那亞或威尼斯不相上下。由舉債而衰微而荒廢的國家，所在皆是，英國能獨行之而全然無害麼？

說這些國家的稅制，都較劣於我國，那是不錯的，我亦相信其如此。但是，這裏應當記住一件事，就是最賢明政府，在稅盡了一切適當課稅對象以後，遇有緊急需要，也不得不採行不適當的捐稅。荷蘭那樣賢明的政府，有時也不得不象西班牙那樣，仰賴一些不適當的稅收。如果在國家收入所負的重擔尚未解除以前，英國發生新的戰爭，又如果核戰爭在其發展的過程，所耗費用，也和最近戰爭同樣多，那末，形勢所迫，說不定會使英國稅制，也變成象荷蘭稅制，甚至象西班牙稅制那樣的繁苛。不錯，我國叨現行稅制的恩賜，產業得無拘束地向上發展，因而，即在費用最大的戰爭中，似乎由各個人的節儉與明智行為所產生的積蓄，也夠彌補政府所濫費的社會一股資本。最近戰爭所費之多，為英國曆來戰爭所未有。但在此次戰爭結束時，全國農業和從前同樣繁榮，製造業和從前同樣興旺，商業和從前同樣發達。可見支持各該產業部門的資本，一定是和從前同樣的多。和平恢復以來，農業更有改進，國內各都市各村落的房租益形增加，這是人

民財富及收入增加的實證。大部分舊稅，特別是國產稅及關稅等主要部門的收入，都年有增加，這是消費增加的明顯證明，亦是消費所賴以維持的生產增加的明顯證明。英國今日似乎毫無困難地擔起半世紀以前誰都不相信它支持得了的重負。然而，我們切不可因此就冒昧斷定，英國能支持任何負擔，更不可過於自信，以為再重的負擔，英國亦能不大困苦地支持得了的。

當公債增大到某種程度時，公公道道地完全償還了的實例，我相信幾乎沒有。國家收入上的負擔，如果說是曾經全然解除過，那就老是由倒賬解除的，有時是明言的倒賬，常常是假償還，但沒有一次不是實際的倒賬。

提高貨幣名義價值，那是公債假償還之名行倒賬之實的慣技。例如，六便士的銀幣或二十枚六便士的銀幣，如依議會法令或國王佈告，提高其名義價值為一先令或一鎊，那麼，依舊名義價值借入二十先令或銀約四盎斯的人，在新名義價值下，只須銀幣二十枚或略少於二盎斯的銀，便可償還其債務。約一億二千八百萬鎊的國債，即大約等於英國長期和短期公債合計的債本，如照此方法償還，約須現幣六千四百萬鎊就行了。象這樣償還債務實不過貌為償還罷了，在實際，國家債權者應得的每一鎊，都被騙去了十先令。可是，橫受此種災害的，不但是國家的債權者，私人的債權者，亦都受相應的損失。這對於國家的債權者，不但全無利益，在大多數場合，還要增加他們一項大損失。不錯，國家的債權者，如借有他人的鉅額債款，亦可依同一方法償還，使其損失得到若干賠償。可是，在多數國家中，以貨幣貸與國家的人，多半是富有者，他們對幹其餘同胞市民，多是屬於債權者的地位，而不是屬於債務者的地位。因此，這種貌為償還的辦法，對於國家債權者的損失，沒有減輕，只有增大。國家受不到一點利益，而多數無事人民，卻蒙受橫災。這種辦法將使私人財產受一種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壞，而在大多數場合，將使勤勞、節約的債權者吃虧，怠惰、浪費的債務者致富；這樣，國家資本的大部分，將由能使這資本增益的人，轉移到只知破壞這資本的人。國家如有必要宣佈破產，正如私人有必要宣佈破產時那樣，光明正大和直言不諱的倒賬，總是對債務者名譽損害最輕、對債權者利益也損害最輕的辦法。國家

為隱蔽實際倒賬的不名譽，而出此容易識破又極端有害的欺瞞下策，那真是再笨沒有啊！

然而，國家無論古今，當有此必要時，往往採用這欺瞞的下策。在第一次羅馬和迦太基戰爭終結時，羅馬人減低阿斯（當時計算一切其他鑄幣以此為準）的價值，從含銅十二盎斯，減至含銅二盎斯，即把二盎斯銅賦予等於以前十二盎斯的名義價值。用這種方法，共和國前此所借的鉅債，只須還其實額六分之一就行了。這樣突然的巨大的倒賬，照我們今日設想一定是要惹起極大的喧鬧的；然而當時竟無此等表示。推其原因，是由於制定此貶值的法律，象其他一切關於鑄幣的法律那樣，都由護民官提向民會，通過施行；那在當時，恐怕還是一種很得民心的法律。在羅馬，象在古代其他共和國一樣，貧民不斷向富者和有權勢者借債；富者和有權勢者為要在每年選舉時獲得他們的選票，常以極高利息，貸款給貧民，此債務從未償付，不久就積成了債務者不能償付、他人亦無從代付的鉅額。債務者憚於非常苛刻的誅求，往往迫而投票選舉債權者推薦的候選人，沒得到另外報酬。當時法律儘管嚴禁贈賄及收買，但候選人提供的報酬，及元老院不時頒發的穀物，仍為羅馬共和國晚期貧窮市民賴以生活的主要資源。為要擺脫債權者的控制，這些貧窮市民不斷要求取消他們所欠的全部債務，或要求通過他們所謂新案，即償還積欠債務一部分就算還清全部債務的法案。因此，把一切鑄幣價值，減至其原先價值六分之一，使他們得以原先六分之一的貨幣，償還其全部債務，這種法律，正是一種最有利的方案。富者及有權勢者為要使人民滿足，在許多場合，他們不得不同意此取消債務的法律及施行新案的法律。不過，使他們同意此等法律的，一部分雖不外上述理由，一部分則因他們自身是政府的主要領導者，他們想借此解除國家的負擔，恢復國家的元氣。用這種方法，一億二千八百萬鎊的債務，一下子就減為二千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了。在第二次羅馬和迦太基戰爭期間，阿斯又經過兩次的貶值，第一次是由含銅兩盎斯減至一盎斯，第二次由一盎斯減至半盎斯，即減至本來價值二十四分之一。羅馬的上述三次貨幣貶值，如合併一次實行，那末，象我國現幣一億二千八百萬的債務，就可一下子減至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鎊十六先令八便士。那怕英國負債之巨，使用這種方法，也是馬上可以償還的。

我相信，一切國家鑄幣的價值，都曾通過這方法，逐漸減到比原來價值越來越低，同一名義金額所含的銀，都曾通過這方法逐漸減到比原來數量越來越少。

爲了同一目的，國家有時減低鑄幣的標準成色，即在鑄幣中攙以較大量的劣金。例如，照現行法定標準，每重一鎊的銀幣，只能攙劣金十八本尼威特，若攙入八盎斯，這種銀幣一鎊或二十先令，就與現幣六先令八便士相當，而我國現幣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銀量，就幾乎提高至一鎊的名義價值了。這種標準成色的減低，與法國人所謂增大價值，即直接提高貨幣名義價值，完全相同。

這種直接提高貨幣名義價值的做法，常是公開的、明言的，而就其性質說，亦不得不如此。用此方法，較輕較小的鑄幣，取得了從前較重較大鑄幣的同一名稱。反之，減低貨幣標準成色的做法，大概都是保守祕密的。用此方法，造幣局發出和從前流通的同一名義價值的鑄幣，竭力設法使其重量、體積及外貌保持舊觀，不易辨認，但其實際價值，卻相去甚遠。當法國國王約翰要償還其債務，而減低鑄幣標準成色時，所有造幣局的官吏，都得發誓保守祕密。以上兩種做法，都是不正當的。不過，增大價值這個簡單做法，是公然的、暴戾的不正行爲，而減低標準成色，卻是陰險的、欺詐的不正行爲。所以後者一經發覺（決無長久保守祕密的可能）常比前者要惹起大得多的反感。鑄幣在大大增加名義價值以後，很少恢復其以前的重量，可是被極度減低其標準成色以後，卻幾乎常常又被恢復其以前的成色。因爲在後者，除了恢復成色以外，再沒有其他可平民憤的方法。

在亨利八世當國之末，及愛德華八世當國之初，英國鑄幣不但提高了名義價值，同時並減低了標準成色。在詹姆士六世初年，同樣的欺僞行爲，亦曾行於蘇格蘭。此外，很多其他國家，也常常如此。

英國國家收入的剩餘部分，即開支了常年經費以後的剩餘部分非常的少，想借此完全解除國家收入上的負擔，不，想借此相當減輕那負擔，似乎全然無望。所以，非國家收入大有增加，非國家支出大有縮減，這負擔的解除，是永難實現的。

實施比現在較爲公平的土地稅和房產稅以及前章對於現行關稅制度及國產稅制度所提議的改革，也許可在不增加大多數人民的負擔而只把這負擔平均分配於全體國民的情況下，就可使國家的收入大大增

加。然而，就是最樂觀的設計者，也不敢希望，這樣增加的收入，可以完全解除國家收入上的負擔，或可使國家在太平無事時期，在解除負擔方面，有這樣的進展，以致在下次戰爭，可不增加公債或增加公債而有所取償。

如把英國本國稅制，擴張到帝國所屬各地，而不問那地方的居民是不列顛人或是歐洲人，這一來，收入或可望大有增加。然而，那是很難做得通的。據英國憲法原則，各地方在議會中所佔議員席數，與其納稅額保有一定比例，今着擴張稅制到一切屬地，勢必要承認那些屬地在議會中，或如果我們要這樣說的話，在帝國議會中，按照同一比例，加入其代表，否則就不免失之公允，就不免違背憲法原則。偌大的變革，似和許多強有力者的私人利益與大部分人民的固定成見有所牴觸，求其實現，恐是極其困難，甚或萬難做到的。然而，這種純理論的著作，如果不妄來決定不列顛與各屬地的統一是否可行，而只考察英國的課稅制度，究竟能在什麼程度上應用於該帝國一切屬地；把它應用於帝國各屬地，究竟可望得到多少收入，而這一種的統一，究竟幹全帝國各地的繁榮幸福有何影響，也許沒有什麼不當之處吧。這樣的空論，說得最壞，也只不過是一種新烏托邦，雖沒有莫爾的舊烏托邦那麼有趣，但總不致更為無用、更近於妄想吧。

英國稅收，有四個主要部門，即土地稅、印花稅、各種關稅及各種國產稅。

就付納土地稅的能力說，愛爾蘭無疑與不列顛不相上下，而美洲及西印度殖民地當有過之而無不及。地主在沒有負擔什一稅或救貧稅的地方，與課有此兩稅的地方比較，一定更有能力繳納土地稅。什一稅如不折合金錢繳納，而是徵收實物，那比每鎊實徵五先令的土地稅，要在更大程度上減損地主的地租。這種什一稅，在大多數場合，總要相當於土地真實地租四分之一以上或相當於完全償還農業資本及其合理利潤後的殘餘部分的實物。假若除去一切代金及一切俗人保管的教會財產，不列顛及愛爾蘭的教會什一稅，全部將不下六、七百萬鎊。假若不列顛或愛爾蘭沒有任何什一稅，地主就能多提供六、七百萬鎊土地稅，但其負擔卻不會比他們大部分現在所受的更重。美洲是沒有什一稅的，自然很有能力納土地稅。固然，美洲及西印度的土地，大抵不是出租給農民的，以致課稅沒有地租簿可為根據。但在威

廉及瑪利四年，不列顛的土地稅，也並沒有根據任何地租簿，而是根據一種極不嚴密、極不正確的估價。因此，美洲的土地，用這種方法課稅亦未常不可，否則就照最近米蘭公國及奧地利、普魯士和沙廷尼亞等國領地的辦法，經過正確的丈量後，再依公平評價徵稅好了。

在各屬地推行印花稅，那是顯然沒有困難的。在訴訟程序以及動產不動產移轉契據形式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各地方，這種稅就可同樣照徵，不必要何等更改。

推廣英國關稅法於愛爾蘭及各殖民地，如果同時也擴大其貿易的自由（就正義上說，應當如此），那對這兩者都有最大的利益。現在抑制愛爾蘭貿易的種種可惡的約束，以及對美洲產物所設的列舉與非列舉的區別，將因此完全消除。正如現在菲尼斯特爾海角以南各地，對美洲若干產物，開放其市場一樣，該海角以北各地，亦將對美洲一切產物開放其市場。關稅法這樣劃一之後，英帝國各地間的貿易，將如現在不列顛沿海貿易一樣自由。而帝國對各屬地所有產物，將在自己領土內提供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市場這麼擴大起來，愛爾蘭及各殖民地因增加關稅所受的負擔，是會立即得到補償的。

英國稅制中必須加以若干修改以適應各屬地特殊情況的，唯有國產稅。愛爾蘭的生產和消費，與不列顛具有同一性質，所以，可應用不列顛稅制，而無須修改。至於美洲與西印度的生產和消費性質，就和不列顛大不相同了。把不列顛稅制應用到這些地方，就必須加以若干修改，正如把這稅制應用到英格蘭產蘋果酒啤、酒各州要修改一樣。

例如，美洲稱為啤酒的發酵性飲料，佔當地人民普通飲料的一大部分，因為那是由糖蜜製成，所以與英國所謂啤酒大不相同。那種飲料，只能保存數日，象英國啤酒那樣，不能在大釀造所製造，貯以待售。每個家庭都要自己釀造自己所消費的，如自己烹煮自己的食物一樣。但是，各私人的家庭，如果須和那些麥酒店主，以及以販賣為目的的釀造家，同樣受收稅人員可厭的訪問及檢查，那是完全為自由所不許可的。假若為了公平的緣故，認為此飲料有課稅的必要，那可對其製造原料，在該原料的製造場所課稅；如果商業的情形，不容課此國產稅，那就不妨在該原料輸入消費它的殖民地時，課以進口稅。對於輸入美洲的糖蜜，除了英國議會所課每加侖一便士的稅外，還有以

其他殖民地的船舶輸入麥薩諸塞特灣的糖蜜，每霍格徹德課八便士的州稅，以及由北部各殖民地輸入南卡羅林那的糖蜜，每加侖課五便士的州稅。假若這些方法都感覺不便，那就可仿照英格蘭不徵收麥芽稅的辦法，各家庭隨其人數的多寡，付納一定金額；或可照荷蘭各稅的徵收辦法，各家庭按照其成員的年齡和性別的區別，每年付納若干金額；或可按照德克爾所提議的英格蘭一切消費品稅的徵收方法徵收。他那方法，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對於消費迅速的東西，應用時不太方便，然而沒有較好方法可用的場合，到底是不妨採用的。

砂糖、甜酒及菸草，到處都不算做生活必需品，但到處幾乎都是普遍的消費對象，因此對它們課稅，那是再適當沒有了。假若英國與各殖民地的統一實現，此種商品，可在其離開製造者或栽植者手中前課稅。如果這種課稅方法，對他們不大方便，那就可把這些商品，積存於製造所在地的公共貨棧及它們以後可能運銷的帝國港口的公營貨棧，由其所有者及稅務機關共同管理，不到交給消費者、國內零售商或輸出口商的時候，概不納稅。當其由貨棧提出出口，經出口商提出了適當保證，擔保其確是出口，可以免稅。如果英國與各殖民地的統一成功，英國現行稅制不得不作若干修改的，恐怕主要就是關於這幾種商品的稅。

把這種稅制的施行擴展到帝國所屬各地，其所能生出的收入總額，究竟有多少呢，要想得到相當正確的數字，無疑是不可能的。不列顛依此制度，對於八百萬以下的人民，每年可徵收一千萬鎊的收入。愛爾蘭的人民，有二百萬以上。據某次在美洲議會提出的報告，美洲十二同盟州的人民，有三百萬以上。然而這種報告，恐不免有些誇張，藉以鼓勵其國民，或威嚇我國人民。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假定：我國北美洲及西印度各殖民地人民，合計不過三百萬，歐洲美洲的全部帝國人民，合計不過一千三百萬。如果這課稅制度，對於八百萬以下的居民，能徵收一千萬鎊以上的收入，那麼，對幹一千三百萬居民，當可徵收一千六百二十五萬鎊以上的收入。在這假定能產生的收入中，必須減去愛爾蘭及各殖民地平常為開支政府經費而徵收的收入。愛爾蘭的行政費和軍費連同公債利息，就1775年3月以前的兩個年度平均計算，每年還不到七十五萬鎊。依據極正確的計算，在目下騷亂開始以前，美洲及西印度主要殖民地的收入，計達十四萬一千八百

鎊。不過這個計算，未包括馬里蘭、北卡羅林那以及我國最近在大陸和島嶼方面所獲得的領地的收入。這省略的結果，恐怕有三、四萬鎊的出入。爲使數字簡單起見，姑且假定愛爾蘭及各殖民地開支行政費所必要的收入爲一百萬鎊。在一千六百二十五萬鎊中，減除這一百萬鎊，尚剩有一千五百二十五萬鎊，可供帝國開支一般費用及償付公債利息之用。如果英國由現有的收入中，平時可節約一百萬鎊償付公債，則在此增加的收入中，就不難節約六百二十五萬鎊下來，償付公債。況且，這一大筆減債基金，又因以前各年度既償公債，不須支付利息，可逐年增大。減債基金這樣急速的增加，在幾年之內，就足夠償還全部公債，而完全恢復現在趨於消沉憔悴的帝國活力。與此同時，人民亦可從若干負擔最重的賦稅，即生活必需品稅或製造原料稅中擺脫出來。於是勞動的貧民，將能過較好的生活，以較廉的價格出賣勞動，並以較廉價格提供所產製的貨物於市場。物價既廉，剛那種貨物的需要增加，結果，生產那種貨物的勞動的需要自將增加。勞動需要增加，勞動貧民的人數將會加多，其境遇亦會改善。這一來，他們的消費將增加，同時，對他們所消費的一切物品所課稅的收入，也將因而增加。

然而，由這種課稅制度所生的收入，並不一定會立時按照被稅人民人數的比例而增加。對於帝國領土內從未受慣此負擔而剛開始受此負擔的各屬地，在若干時期內，一切應當從寬。並且，即在各處都儘可能嚴格地依法徵收時，亦不會處處按照人民數目的比例產生收入。因爲，在貧瘠地方，要付關稅及國產稅的主要商品的消費非常的少；而在居民稀少的國家，走私的機會，又非常的多。蘇格蘭的下層人民，飲用麥芽飲料的極少；麥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國產稅收入，按人民人數及稅率（由於麥芽品質的差異，麥芽稅稅率英格蘭與蘇格蘭不同）比例計算，蘇格蘭一定會比英格蘭少得多。至於這些部門的國產稅，我相信，漏稅的程度，在這兩國是不相上下的。課於釀造所的稅及大部分關稅，按人口比例計算，蘇格蘭要比英格蘭少，這不但是因爲被稅商品在蘇格蘭消費較少，而且是因爲走私在該地亦較易進行。愛爾蘭的下層階級人民，較蘇格蘭尤貧，而愛爾蘭大部分地方的人口，則與蘇格蘭同樣稀少。因此，按人口比例計算，愛爾蘭被稅商品的消費，比蘇格蘭更少，而走私的容易，則幾乎與蘇格蘭相同。在美洲，在西印度，那怕是最下層階級的白人，其所處境遇，亦比英格

蘭同一階級人民好得多。他們對於通常愛好食用的一切奢侈品的消費，都比英格蘭同一階層人民所消費的多得多。固然，大陸南部各殖民地及西印度羣島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黑人，他們現在還是奴隸，其處境無疑比蘇格蘭或英格蘭的最窮人民，還要惡劣。但是，我們切不可根據這種理由，就想象他們比英格蘭的最下級人民，所吃的更壞，所浪費的輕稅物品更少。爲使他們好好工作，好好養育他們，照料他們，那是他們主人的利益，正如好好餵養代勞牲畜，是牲畜所有者的利益。不論何處，黑人幾乎與白人同樣受有甜酒、糖蜜及針樅酒的配給，縱使對那些物品課以不太重的稅，這配給恐怕是不會取消的。因此，按居民人數比例計算，美洲及西印度的被稅商品的消費，恐怕不亞於英帝國任何地方。不錯，按國土面積的大小比例計算，美洲的居民較蘇格蘭或愛爾蘭要少得多，因而，那裏走私的機會，也要大得多。但是，現在對於麥芽及麥芽飲料各稅所徵收的收入，如以單一的麥芽稅代替徵收，則國產稅最重要部門的逃稅的機會，幾乎可完全杜絕。如果關稅不課加於一切輸入物品，而只侷限於用途最廣、消費最多的少數物品，又如果關稅都按國產稅稅法徵收，那麼，走私的機會，縱不會全然杜絕，也要大大減少的。經過這兩種顯然非常簡單非常容易的改革，按消費的比例計算，關稅及國產稅，那怕在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也會生出和現在人口最稠密地方一樣大的收入。

有人曾這樣說過：美洲人未保有金幣，亦未保有銀幣，那個地方的內地貿易，全用紙幣進行。間或有金銀流到那裏，又由交換我們的商品，全部送來英國了。沒有金銀，是不能納稅的。我們既已取得了他們所有的金銀，再要榨取，怎樣能夠呢？

然而，美洲現在金銀的稀少，不是由於那個地方貧乏，也不是由於當地人民沒有購買這些金屬的能力。與英格蘭比較，那裏的勞動工資是那麼高，而其食品價格又是那麼低，假若他們大多數人民以購買更多金銀爲必要，爲便利，他們一定是有能力購買的。因此，這些金屬的稀少，定是他們自動選擇的結果，並非形勢需要的結果。

金幣銀幣之所以成爲必要或便利，不外爲了進行國內國外的交易。

本書第二編說過，各國國內交易，以紙幣進行，和以金幣銀幣進行，差不多有同一程度的便利。至少，在和平無事時是如此。美洲人

即以比他們所能容易獲得的多得多的資本，使用在土地改良上，也可得到利潤；因此，儘量節省其剩餘生產物中必須用以購買昂貴的金銀的部分，用以購買職業用具、衣料、傢俱及開墾耕作必要的鐵製農具等，換言之，不購入死的資本，而購入活的生產資料，在他們必定是便利的。殖民地政府發覺了，供給人民以足夠或超過足夠流通國內交易的紙幣量，這對它們有利益。在它們之中，特別如賓夕法尼亞政府，往往以若干釐利息把紙幣貸與人民，從而取得一項收入。其他如麥薩諸塞特政府，一有急需，便發行紙幣，以供國用，往後，在對它便利的時候，按紙幣逐漸下跌的市價，再予收回。1747年，該殖民地即依照此種方法，以相當於其所發行紙幣十分之一的款，償還其大部分的公債。節省國內交易上使用金銀的費用，是殖民地人民的便利；供給一種媒介物，儘管會帶來一些不利，但此費用由此節省，是各殖民地政府的便利。紙幣過多，勢必把金銀驅出殖民地國內交易領域，正如紙幣過多，曾把金銀驅出蘇格蘭大部分國內貿易領域一樣。在這兩國，使紙幣過多的，不是人民的貧乏，卻是他們的企業心和計劃精神。他們都希望把所有資財，用作活動的生產性資財。

各殖民地與英國進行的對外貿易，所使用金銀的多少，完全視需要的大小來決定。在不需要金銀的場合，金銀就很少見到，在需要金銀的場合，一般總不愁沒有金銀。

英國與產煙殖民地間進行的貿易，大概是以英國貨物，先行賒與殖民地人民，經過相當長期之後，再取償於有一定價值的菸草。以菸草支付，不以金銀支付，對殖民地人民，比較便利；商人對和其往來的店家購買貨物，不付金銀，而付以他自己碰巧正在經營的他種貨物，在商人方面，比較便利。這種商人，就不必爲着準備臨時的需要，在他營業資本中，劃出一定額現金，保存不用。他可在店鋪或貨棧中，存儲更多的貨物，或者從事更大的營業。但是，一個商人的一切往來店家，都對他以他碰巧正在經營的一種貨物償付他們所賣給他的貨物感到便利，那種事，畢竟是罕見的。不過，和弗吉尼亞及馬里蘭進行貿易的英國商人，卻碰巧都覺得對於賣給這些殖民地的貨物，以取菸草爲酬比取金銀來得便利。他們可從菸草牟取利潤，而不能從金銀得到何等利潤。因此，在英國與此等產煙殖民地間進行的貿易，金銀是極其少用的。馬里蘭及弗吉尼亞，無論對於國內貿易或對於國

外貿易，幾乎同樣沒有使用金銀的必要。它們所擁有的金銀，因此比美洲其他任何殖民地少。然而，就繁榮說，就富裕說，它們並不比一切鄰近的殖民地差。

在北部各殖民地，即在賓夕法尼亞、紐約、新澤西、新英格蘭四州等地，輸往英格蘭的產物的價值，比它們爲自己使用，及爲其他殖民地使用（在這場合，它們擔任運送人的職務）而由英格蘭輸入的製造品的價值來得小，因而，這項差額，就不能不以金銀付給英格蘭，而它們通常都能找到這項金銀。

產砂糖各殖民地每年輸往英格蘭的生產物的價值，比它們由英格蘭輸入的一切貨物的價值要大得多。要是送往母國的砂糖及甜酒的代價，必須付給這些殖民地，那英國每年就不得不送出一鉅額貨幣；於是，對西印度貿易，就要象某種政治家等所說，成爲極端不利的貿易了。但事實是這樣：許多產糖大農場的主要所有者，都住在英國。他們的地租，都是以他們自己農場的產物，即砂糖甜酒，寄送他們。西印度商人爲自己在這些殖民地購入的砂糖及甜酒的價值，亦比他們每年在那裏賣掉的貨物的價值小。這個差額亦必然要以金銀支給這些商人；然而，通常也是能夠設法找到這項金銀的。

各殖民地償付英國貨款的困難與延滯的程度，和它們各別所欠數額的大小，並不成比例。北部各殖民地通常要把相當大的差額付給英國，而產煙各殖民地則或是全不給付，或是給付小得多的差額。但是，就一般而論，前者每能按期償付，後者卻不能按期償付。我們向各產糖殖民地收取貨款的困難，其大小程度，不是和這各殖民地應付差額的大小成比例，而是和它們所含荒地面積的大小成比例。荒地面積愈大，激使殖民地人民去從事超過他們自己資力所能經營的生意即開荒墾殖這個誘惑力愈大，他們就愈不容易付還欠債。反之，荒地面積愈小，剛結果正相反。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和那些土地已經完全耕種多年，以致沒有餘地可供殖民者投機的小島，如巴道斯、安提瓜及聖克利斯託福等島比較，尚存有極多荒地的牙買加這個大島，其付款就比較不規則、比較不確定。最近格倫納達、託巴戈、聖文遜特及多米尼加的獲得，給這種投機，開了一個新的舞臺；而這些島嶼最近付款的不規則與不確定，與牙買加這個大島沒有兩樣。

因此，就大部分殖民地說，其金銀之所以稀少，並不是由於貧乏。它們對活的生產性資本，有大需要，因此以儘量節省死的資本為便利，並以那與金銀比較雖不合宜，但卻廉賤的交易媒介為滿足。這一條，它們就得以那部分金銀的價值，轉用在職業用具、衣料、傢俱及開墾耕作必要的鐵製農具上了。在那些非金銀貨幣莫辦的交易部門，它們通常總能找到必要的金銀以供使用。如果找不到的話，那也不是它們貧乏的結果，卻是它們從事不必要的和過分膨大的企業的結果。它們對於償付的拖延不定，不是它們貧乏了，卻是它們發財的熱望太過了。即使殖民地的稅收，除用以開銷當地行政費軍事設備費以外的一切部分，統須以金銀送往英國，它們亦必充分具有購買此必要金銀的手段。在這場合，它們不過以其現在購買活的生產性資本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轉用以購買死的資本罷了。固然，它們為了進行國內交易，不得不捨卻廉賤的交易媒介，不得不使用昂貴的交易媒介，而購買這昂貴交易媒介的費用，可能多少抑制它們對於改良土地的過度冒險心與進取心；但是，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需要把金銀送往英國，可以匯票匯寄。這匯票是向曾受委託代售美洲剩餘產物的特定英國商人或公司開出而由其承兌的匯票，該商人或公司收到貨物後，即按票額以貨幣把美洲收入繳交國庫。這一來，美洲無須輸出一盞斯金銀，而一切都辦理妥當了。

愛爾蘭及美洲應幫同英國償還公債，那不是不公道的。英國的公債，原是支持由革命建立的政府而借的。賴這政府，愛爾蘭的新教徒，才得在本國享有現在所享有的全部權力。他們的自由，他們的財產，乃至他們的宗教，才得有所保護。美洲若干殖民地，也賴這政府，纔有其現在的特許狀，現在的憲法。美洲一切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安全和財產，也是靠這政府。這公債的起因，不但是為了保護英國，同時也是為了保護英國一切屬地。特別是最近戰爭中所借的鉅額公債，以及前一戰爭中所借大部分公債，其本來的用途，都是為了保護美洲。

愛爾蘭歸併於英，除享有自由貿易的利益外，還會獲得其他重要得多的利益，這利益會給有餘裕地補償其隨歸併而增加的賦稅。蘇格蘭歸併於英後，從來被貴族權力壓迫的中下級人民，完全得到解放了。貴族權力在愛爾蘭，壓迫更甚，受其受害者更多，如與英國合併，

人民大部分會同樣從貴族壓迫之下得到解放。不同於蘇格蘭貴族，愛爾蘭貴族的形成，不是由於門第財產那些自然的、可尊重的差別，而是基於最可憎的差別，即宗教的偏見及政治的偏見。這種差別最能助長壓迫階級的傲慢及被壓迫階級的憎惡與憤怒，使得同國居民間相互懷抱的敵意，大於異國人民間相互懷抱的敵意。假使愛爾蘭不歸併於英國，其居民在今後數十數百年間，也許還不會把自己看做同國的人民。

在美洲各殖民地，從無專橫貴族存在。但就是它們，如與英國合併，在幸福與安定方面，亦會增益不淺。至少，它們可由此免去在小民主政體下必然會發生的互仇和兇惡的黨爭，那黨爭往往分裂人民間的感情，並擾亂政府的安定。如果美洲完全與英國脫離關係——這脫離，非由這種合併加以防止，是很容易發生的——那黨爭一定會比以前兇暴十倍。在目前的擾亂開始以前，母國的強壓力，常能抑制黨爭，使其不超過暴行及侮辱的範圍。設無此強壓力，恐怕不久就要訴諸暴力而演成流血慘劇了。隸於一個統一政府下的黨派的精神，在一切大國，通常都是橫溢於帝國的中心，在僻遠地方，則較為冷淡。與首都隔遠了，即與黨爭和野心的主要漩渦隔遠了，這樣，對於各敵對黨派的見解，一定會採取比較超然的態度，對於各黨派的行動，一定會採取比較公正不偏的旁觀態度。以目前而論，在蘇格蘭的黨爭，不象英格蘭的黨爭那麼激切；如果合併實現後，在愛爾蘭的黨爭，大概會比蘇格蘭更為緩和；至於美洲各殖民地，則大概不久會出現那為英帝國任何屬地所未曾見的和諧團結景象。固然，合併實現之後，愛爾蘭及美洲各殖民地不免會受到重於現在的賦稅負擔，但如能勤勉地忠實地把國家收入用於償還公債，不久，英國國家收入，就會縮減至足夠維持平時設施的程度，而現在大部分的賦稅，當不致繼續徵收下去。

東印度公司獲得的領土，無疑是屬於國王的權利，也就是屬於英國國家與人民的權利。那些領土，我們可使其成為另一個收入源泉，這源泉可能比上述各源泉還要來得豐富。與英國比較，據說，那些地方更豐饒，更廣大，而就土地面積大小的比例說，地方更富裕，人口更稠密。要從那裏抽取一大收入，大概不必另徵新稅，那裏的賦稅，已經徵到十足的程度，甚至超過十足程度以上。比較妥當的辦法，與

其增加那些不幸人民的負擔，無寧減低其負擔；與其設新稅以裕收入，無寧阻止大部分已收到的賦稅的濫用與中飽。

假若英國無法由上述各源泉，取得很大的增多的收入，那末，可採用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費用。英國在徵稅方法上，在國家收入的開支方法上，無疑尚有改良餘地，不過，與其他鄰國比較，至少不算不經濟。英國平時的國防軍事設備，較之勢均力敵的歐洲任何國家，更為適中，所以想在這個項目上節省費用，似乎不可能。在目下的擾亂開始以前，英國花在南美洲各殖民地的平時建設費，為數浩大，如果不能由這些殖民地取得何等收入，這項費用，無疑應該完全節省。不過，這些殖民地平時的經常費雖再大，和英國為防禦它們作戰所耗費的比較，卻是微乎其微。前面說過，英國完全為保障殖民地而發生的最近戰爭，所費在九千萬鎊以上。主要為保障殖民地的1739年西班牙戰爭，及由此次戰爭結果惹起的法蘭西戰爭，所費在四千萬鎊以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當然應由各殖民地負擔。在這兩次戰爭上，英國為各殖民地所費了的，大大超過前一次戰爭開始以前英國所負公債總額兩倍以上。如果沒有這幾次戰爭，當時的公債，有可能完全償還，或者已實際完全償還了也說不定。如果不是為了這些殖民地，前一次戰爭，也許不致發生；後一次戰爭，則一定不會發生。英國支出了這麼大的費用，就因為它認為這些殖民地是它的省份的緣故。然而，對於維持帝國，既未提供財力，又未提供武力的地方，決不能視為省份。它也許可以算是附屬於帝國的一種壯麗華美的裝飾吧。但帝國如果不能支持這裝飾的費用，早就應當把它放棄；如果不能按照其支出的比例而增加收入，至少應當量入為出。要是各殖民地儘管拒絕納稅，卻仍視為英帝國的省份，那將來防禦殖民地的戰爭，恐怕不免還要耗去英國以前幾次戰爭那麼多的費用。百餘年來，英國統治者曾以我國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個巨大帝國的想象，使人民引為快慰。然而這一個帝國，迄今仍只存在於想象中。不是帝國，只是建立帝國的計劃，不是金礦，只是開發金礦的計劃。這計劃，在過去以至現在，已使英國耗費得太多了，設今後仍同樣繼續下去，將來費用一定極其浩大，而且，還收不到一點利潤。因為，前面說過，殖民地貿易獨佔的結果，於人民大眾是有損無益的。現在，我國統治者該實現自己一向所耽迷以及人民也許也同樣耽迷的黃金夢了，如其不能，就應該自己先由那夢中醒過來，並使人民也醒過來。所作計劃要是無法完成，自

應及早放棄。英帝國的任何省份，如不能對全帝國的維持有所貢獻，英國就該擺脫為防禦那省份而支出的戰費，擺脫任何維持那省份的平時民政或軍事設施的費用，並努力使將來的企圖與計劃，適應它的實際情況。